幻方
——中国古代的城市
The Magic Square
Cities in Ancient China

[德] 阿尔弗雷德 · 申茨　著
梅青　译
吴志强　审
何晓昕　干靓　校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幻 方

——中国古代的城市

The Magic Square

Cities in Ancient China

[德] 阿尔弗雷德·申茨 著
梅 青 译
吴志强 审
何晓昕 干 靓 校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8－276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幻方——中国古代的城市／（德）申茨著；梅青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ISBN 978－7－112－10425－3

Ⅰ.幻… Ⅱ.①申…②梅… Ⅲ.城市史－中国－古代 Ⅳ.K9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59989号

Copyright © 1996 Edition Axel Menges, Stuttgart / London
本书由Axel Menges授权我社翻译、出版、发行本书中文版
The Magic Square / Cities in Ancient China / Alfred Schinz

责任编辑：陈 桦 戚琳琳 吕小勇
责任设计：郑秋菊
责任校对：李志立 兰曼利

＊出版声明：本书所译文字，本着忠实于原著的原则，书中所阐述的观点仅为原著者观点，特此声明。

幻 方
——中国古代的城市
The Magic Square Cities in Ancient China

［德］阿尔弗雷德·申茨 著
梅 青 译
吴志强 审
何晓昕 干 靓 校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印刷
*
开本：889×1194毫米 1/16 印张：30 字数：818千字
2009年12月第一版 2009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108.00**元
ISBN 978-7-112-10425-3
(17349)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序

雨入华心，自成甘苦；水归于器，各现方圆。

在祖国迎来60华诞之际，在世界面临强大创新潮流之时，“幻方——中国古代的城市”这部蕴涵中国古代原创思想与哲学的著作，经过磨砺，终于出版。

这部著作，从宏观历史到微观思绪，呈现中国古人运用智慧首创了中国的城市形态，并代代传承，形成特有的中华城市文明。通过翻译德国学者翔实的汉学研究，因借实证了中国几千年的城市文明，从而反驳了西方人有关“中国没有城市”的言论。

梅女士凭藉兴趣，涉足城市领域，以此书开卷，必将受益。
我们以中国城市发展为己任者，以此书为序，坚信有成。

吴志强

译者序

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的中国，西北，以帕米尔高原；西南，以喜马拉雅山脉；南方，以横断山脉和热带丛林；北方，以广袤无垠的草原和沙漠；东南，以绵延18000多公里的海岸，构成了历史的“四限”。本著作，便涵盖了历史地域内中国城市文明的发展，是对中国文化遗产进行的较为系统而完整的梳理。

德国学者，阿尔弗雷德·申茨（Alfred Schinz）所著的《幻方——中国古代的城市》一书，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城市研究著述中的优秀作品。作者对中国及东亚的城市发展史有广泛的调查，以中国古代城市为研究对象，借助大量丰富翔实的资料，严密逻辑的推理分析，解释与评价了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

人们也许会问，为何要将外国人的汉学研究再翻译过来？对此的回答，正如对为何要将珍藏于海外各大博物馆的艺术珍品又重新召唤、回归到中华世纪坛展出这一问题的回答一样。这样一本以他者的眼光客观论述中国城市的发生、发展与演变历史的书，非常值得翻译引进给中国的建筑与城市规划专业方向读者。作者翔实深入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世界范围对于中国城市发展历史的深入了解与研究。

申茨在德国是学术大家，他的这本著作十几年来在世界上成为阅读中国城市文明的重要窗口，历经考验而重新再版。在过去的海外求学与教学经历中，我们体验到了著作的思想，某种程度上，与之有精神上的契合。

诚然，译著以追求“信、达、雅”为至高境界，即使译者不能完全认同原著一些观点与立场。尤其是著作成书至今已十几年，光阴似箭！今天中国的城市史及汉字研究，推陈出新、百家争鸣中，何妨倾听天籁之音？基于此，我们怀着极度热情，虔诚地到海外取回这部经典著作，呈现在21世纪的读者面前。

宇宙浩淼，四季轮回。自然伟力也许会荡平一切人事之工的物质形态，唯有精神永远流传。

梅　青

2009年4月同济校园

樱花盛开时

目录

序 …… 5

译者序 …… 6

导言 …… 8

第 1 章　定居聚落的开始 …… 13

1.1　新石器时代的背景 …… 13

1.2　新石器时代的传统传说 …… 29

第 2 章　古代：城市的形成时期 …… 33

2.1　青铜时代的初期 …… 33

2.2　商代（公元前 16 世纪 – 前 1046 年） …… 46

2.3　青铜时代的晚期 …… 70

2.4　秦朝（公元前 256– 前 206 年） …… 116

2.5　幻方 …… 124

2.6　老子的裁决 …… 126

第 3 章　中世纪：帝国的宫廷文化 …… 129

3.1　汉帝国（公元前 206–220 年） …… 129

3.2　三国时期与南北朝都城（公元 220–580 年） …… 166

3.3　北魏、隋和唐 …… 171

3.4　功能性街道模式的涌现 …… 232

第 4 章　现代时期：城市文化及其对立面 …… 239

4.1　宋代（公元 958–1279 年） …… 239

4.2　北方的游牧民族 …… 294

4.3　巩固强化和衰退 …… 326

第 5 章　中国城镇的结构 …… 417

5.1　前言 …… 417

5.2　外观 …… 417

5.3　行政结构 …… 419

5.4　经济结构 …… 434

5.5　宗教机构 …… 447

5.6　物质结构 …… 455

5.7　发展进程 …… 468

5.8　展望 …… 474

作者后记 …… 477

译后记 …… 479

导言

学习中国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的原理和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洞察由古人发展起来的、关于世界秩序及其在所规划的聚落结构上投射出的、可能是最精致和最复杂的思想体系与观念。更确切地说，当我们追寻中国四千年的城市发展历史时，这一观念的“运数”、展开与分化，其退化、僵化乃至最终灭亡的过程也将十分明显。

研究人类发展进化、人类文化、社会发展史以及其他人类学问题的学者们，如艾良德（Mircea Eliade）或刘易斯 · 芒福德（Lewis Mumford），运用“古代”这个词汇，主要与“现代”进行比较，以便指明人类发展历程中的某一个时期。本项研究，将“现代”这个词汇，与另外两个词汇一同使用，足以给予人类聚落结构三种不同的类型一个总体概念。其中，“古代”，对应着基于农业定居社会的聚落结构；另一方面，打猎、采集和游牧，是那些可以被称为“旧石器时代”或“史前”人类的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与此种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聚落结构，或者是自然的庇护所：如洞窟，或是临时帐篷式的可移动小屋，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在短时间内轻易地重建。最后，我们将要区分“城市人”与上述两者。尽管不必过着定居生活，“城市人”在永久性的房屋和建筑中生活、工作，并度过大部分时光。也就是说，他可以不在同一处地方——他的出生地度过一生，而很可能会从一个城市迁移到另一个城市，甚至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无论在哪里，只要参与到世界城市文化中，并作为生活的一分子。

其中两个词汇，“史前的”和“古代的”，暗示了一个历史的维度，但是，历史的观点，在本研究中并不是非常重要。“史前的”、“古代的”和“现代的”（或说“城市的”），所有三种生活方式，到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存在有大约 1 万年了，这项研究，仅涉及这一时间跨度的后半个时段。因此，这些词汇，应该用来描述不同的世界概念，及其在聚落模式形成中的作用。特别是对中国的城市和城镇的描绘。这些城镇的发展，多以“古代的”——即农业社会的世界观居支配地位。这本书，很多篇幅描述了这种“古代的”世界观念，并考察这种观念以何种方式影响了聚落模式。因此，在前言中指出几个基本观念，与西方文明中的“史前的”和“城市的”或“现代的”世界观念的基本框架相互比较。

描述这三种世界观念之间区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人如何依赖自然，而人本身又是如何感受这种依存关系的。虽然记载是不完整的，而推测大于事实，对那些要理解人类行为起源和本质的人来说，无疑，应该阅读并理解一下思亮瓦（S.L. Washburn）和兰卡斯特（C.S. Lancaster）在 1968 年发表的漫笔《狩猎的演化》中，所提到的“作为猎者的人”。如果说，狩猎，在人

撿骨執骨

Jian = to collect examine to gather up.

Gu = the bones (of the ancestors)

Zhi = to attend to (to bury properly)

Gu = the bones (of the ancestors)

It is meritorious to collect and examine the bones of the ancestors and to bury them properly.

类形成中，被认为如此重要，那么了解这些狩猎者，或我们在本研究中所称的“史前人”的世界观和生活观，一定更为重要。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绝大部分——约99.5%的时间跨度中，狩猎，是人类生存的惟一途径。因此，狩猎，对于典型的人类本性之影响是最为显著的。虽然，在过去的1万年里，农业，以势不可挡之势，给人类提供了生活所需 而狩猎，在绝大多数的文化中，退居为一项运动，但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人类的行为，即便到了今天，依然可被解释为是狩猎者世界观所致的行为之一部分。今天，很多人不喜欢这样的观点，即，人类在本质上是具有侵略性、破坏性的，人类常常欣赏其他生物的灭亡。直到近期的战争，都可看成是等同于狩猎的行径。而战争在人类历史中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了愉悦人类，使其欣赏枪林弹雨中的同类这样的功能。对于这些人——这些战争中的猎者来说，和他们同类的人，仅是另一项较危险游戏中的猎物。胜利——即成功的杀戮，被证明是作为猎者的人通向辉煌的道路。1945年8月6日，也就是首次使用核武器的日子，表明了战争对于任何参与者都不再令人快乐，而战争，却还是在世界各个地方，几乎不间断地重复着，表明了狩猎意识深深潜藏于人类本性之中。

“作为猎者的人”，视其最贴近的环境为生存基础。为了生存，他必须利用所有他所能利用的，以周围可以获得的植物和动物为食；像任何其他动物一样，他必须获取所有他所能获取的，使出浑身解数以寻找食物，并保护自己的资源，以防其他的狩猎者——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这些竞争者，很多是全副武装的，在体质上更为强壮，但是，借助其发明创造和适应能力，人类凌驾于所有其他动物之上。人可以使用工具和武器，并从其社会组织和合作中获益，为了一个联合的行动，以集体形式，使各种能力汇聚在一起。这些典型的人类能力，是使其区别于所有其他生物的特征。这样做，人类将其能力增加到如此的极限，以至于在耗尽身边的资源后，迁移到遥远的未开发地区继续生存。当然，再重新制造自身的生命资源，对其来说是不大可能的。当自然恢复，气候变化，植物重生，动物繁衍，人类必须适应新环境下的新情况，但是，他们也不得不将所有这些变化的进程，完全交付自然。人的自身，几乎完全是自然的造化，人类屈服于自然那严苛的法则，也屈服于存在于所有生物中的、为生存而进行的无休止争斗，因而，人类负担不起杀戮游戏所带来的痛苦；相反，他只能归属于他的血亲，以及大约20至30个个体所形成的狩猎团体。此外，他们还与一些其他狩猎团体保持着一定的关系，形成了繁育和语言的团体——在一个聚集了游戏和竞争者的无尽世界里的某个有几千平方公里的区域里，逐渐形成了由上百人所组成的部落组织。这些极少的、关于狩猎者生活和世界的特征，足以与其他的两个世界观念，即“古代的”和“城市的”或者说“现代的”作为比较。

除了作为狩猎者的人类，在大约15000年前最后的冰河作用后，一种新型人类形成了。伴随作为耕种者的人类的形成，出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念。一种新的环境出现，并成为新居住地的范本——“伊甸园”，在圣经神话中，有这样的描述：“耶和华神将人安置在伊甸园，让他耕种看守。”（创世纪2：15）耕种看守，这是作为耕种者的人类的一个新观念，而人类，在其新的任务中得到支持，因为“神在他的心中说……只要大地存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将永不停息。”（创世纪8：22）是这永恒的生命循环，给了“古代人”以信心和希望：无论发生什么，这不变的世界秩序，构成了他生产和生活的可以依赖的框架与观念，以及如何进行“耕种看守”的知识。并非仅指这狩猎者的无尽世界，而且还指组织完善的宇宙世界，在其中，每一物都有其位置和功能，所有个体，根据世界蓝图，以及永恒的生命循环，彼此配合。

在中国，人的位置，是处在自然的两个根本力量——阴与阳即地与天之间。人负有使两者和谐的责任，因为，只有当这两个基本的力量和谐共处时，才具有创造力。当一方过于强盛而破坏了这种平衡时，便具有破坏力，打破和谐并带来灾难和混乱。和谐共处，是在“伊甸园”中保持良好秩序的惟一途径。这个

园就是地球，人类是她的守护者。为此，人首先应在自身建立阴阳间的和谐。从生物学意义上说，人是脆弱的生物，他必须建立精神的力量，建立自知自省能力及创造能力。人不仅对自身负有责任，而且对大自然基本力量之间的和谐共处负有责任。当这种和谐消失了，那便是他的失职，因为他忽略了这一责任。为了使人处理这项任务，人类完整体系的结构，必须具有一个清晰的框架，这样，人类才能获得必要的知识和智慧，来治理这“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世纪 1 ： 28），并非以个人的意志，而是依据“全能的上天”的旨意。

当中国在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出现之时，曾自认为处在世界的中心，即原始混沌的“四海”之中央。在天地之间，皇帝，作为人民的代表，肩负着统治天下万物的责任。随后的中北亚游牧民族，秉承“游牧者”的世界观，狩猎中土，曾登上帝王宝座，并想当然地重新解释了皇帝——天地间作为人类和上天的代表的角色。曾几何时，游牧狩猎者，对于中土农业社会的生活和繁荣，构成过持续的威胁，且几次使之陷入大的混乱。在最初的几个朝代形成时期，汉人也许吸收了这些游牧民族的一些特点和风俗，但是，到公元前 3 世纪末，当秦朝形成之后，稳定的农业社会世界观占了上风，游牧民族的侵入，仅仅被看做是对中土秩序及其文化优越感的一种肆意袭击。

当然，基于完善的宇宙秩序而生的“古代的”世界观，我们发现了作为聚落的原型和整个居住的世界——一个定居的农业社会所集居的世界。在中国,这一原型是一种“幻方”——九宫格的形式，[1]它被第一个朝代的建立者，传说中的英雄大禹，当成划分华夏为九州的理想框架；也被周公旦（约公元前 1100 年）当作公元前周代（公元前 1046 年 - 前 256 年）神圣都城的布局模式。直到 12 世纪，这种模式，都一直被当成所谓“圣田”的布局。皇帝，应是子民们的第一个农耕者，在每年的开春时节，第一个犁地，而那里生长的谷物，用于皇家的庆典或祭祀。中国的每一个行政中心，都有自己的“圣田”，每个皇家官吏，在其管辖范围内，代表皇帝，来行使这耕种仪式。因此，“幻方”的形式体系，是一种总体的模式，广泛用于划分空间，以形成重要的空间秩序，而这，正是依据中国人对于永恒的世界秩序及其原型结构的理解。

“幻方”模式的重要性，在于其对自然的基本力量——阴阳的和谐结合，正像神圣数字所产生的几何形式表现出的那样。奇数，等同于天上的阳的力量，而偶数，则像征地上的阴的力量。

首先，大地，根据四个基本方向，被分为四个朝向，代表大地的四个方位空间，也就是“四域”。在此之上，纵横安置 3×3 个正方形，共分为九个部分，这是奇数，代表上天的阳气。这两种划分，形成了阴阳和谐的结合，由位于中心的、代表着人类的“四域中最为高贵”的统治者，保持这种平衡。汉代班固（卒于公元 92 年）的描述里（见《白虎通义》），我们读到：地球的运作，通过提供所有生灵以滋养而获得平衡，苍天提供精神理念，而人类赋予这两者秩序组织。[2]

就考古研究的结果来判断，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幻方”概念作为一种模式用于王城的，是周王城——即今洛阳城附近地区——周公旦（约公元前 1100 年）所设计的“成周”。贯穿整个周王朝（公元前 1046 年 - 前 256 年，西周：公元前 1046 年 - 前 771 年；东周：公元前 771 年 - 前 256 年），这种模式，为几个诸侯在势力范围所兴建的王城，提供了理想的理论基础，但是，仅“成周”王城充分发展了以方形布局，周边 9 里 ×9 里“幻方”的形式观念。当这城市在一千年后作为东汉（公元 25 年 -220 年）的都城重新建造时，布局被改变为一个 9 里 ×6 里的长方形，依然是奇（阳）数，但是，原来的方形被放弃了。这方形，在后来的帝都中再也没有使用过。然而，阴阳一体的基本概念，似乎总是存在的，这种概念，有不同的诠释方法和多种应用，正如在城墙、各种街

1 译注：它又是佛教曼陀罗的一种表现，并形成了模式。这是一个九个小方格组成一个大方格的形式，中文称作“井田制”，一个大方框分成井字形的小方框，小方框中的数字纵向相加或横向相加，其和相等——九方圣土的井田体系。

2 译注：《白虎通义》问世以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它是由皇帝钦定的，内容又包罗万象，在政治思想伦理等各方面，都为人们规定了行为规范。它用阴阳五行来普遍具体地解释世界的一切事物，使阴阳五行成了人们认识与解释世界的万能钥匙。《白虎通义》宣告了经学的衰落，是经学走向没落与衰败的标志。

道和街区模式布局的度量体系中所使用的偶数和奇数制。“幻方”基本原则最为复杂的应用，要算隋唐长安（581–618年，618–907年）的城市布局。这个城市，依然具有宇宙秩序最初的观念，也就是“古代人”的世界观念。后来，元代（1271–1368年）大都布局，是一个有趣的、利用古典文献所开的旧方子进行的尝试，但蒙古族皇帝，也许并无嗜好接受“古代人”的世界观，来改变其作为“狩猎者”那种史前捕猎生活方式所决定的世界观。在宋代(960–1275年),中国“古代的”世界观，由于新儒家思想家和哲学家的理学思想而得到完善和系统化，但没有规划及兴建新的帝都，也就没有产生“幻方”系统应用的例子。明代（1368–1644年），有了一个新的开始，兴建了新都城，在旧城内，重建了帝王宫殿府第。明代创立者朱元璋（洪武）的务实态度，带来城市规划中理性方法的运用，多次尝试了再生复杂的“幻方”系统。皇宫前的“御街千步廊”，在其最终形式上，被认为是最初9里×9里“幻方”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可以被看成是一个难以看到的、但是理想的、将皇帝包围在其中心的一个“幻方”最明确和真实的部分。游牧民族、满族（1644–1911年）的皇帝们，没有真正采用农业定居社会“古代的”世界观念,但是，他们维持传统汉族习俗制度，延续王朝秩序长达几个世纪。在几座新建立的小城市中，可以发现“幻方”观念的轻微痕迹，但这些城市，大概仅仅由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官建造，而不作为皇家政府的重要行政中心。“古代的”世界观，在中国人中根深蒂固，因为，大多数人与基本的农业定居生活密切相连，倾心于生死轮回说，相信一种永恒的轮回是宇宙世界模式的原型。然而，在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其他更新的世界观，正在改变这种生活的方式，至少在很多细节上如此。

为了更进一步地说明，让我们先暂且比较一下，“古代的”宇宙秩序的观念，与“现代的”关于城市文明的观点。现代人，感觉自己被置于一个巨大而无限的宇宙之中。因为其有限的精神能力，现代人，依赖那永远变化的历史过程，即——“始终”——其开始和终结及其意义，如同宇宙的无限一样不可知。作为一个由不可知的造物主的意志生成的创造物，降生于这动荡的历史进程中，他是一个个体，一个独特的产品，从根本上说是不坚定的，或者说是有着个人意志，以求自我实现的。所有形式的道德和社会秩序，对他来说，只是一个迷信的退化与解说，旨在抑制人所谓的真实本性和自我，这里，所有的文化和社会形式，是基于“古代的”世界观念，一种可以认知的宇宙，有着良好的体系，并清晰地界定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作为暴虐的自然的协调者。“古代人”倾其所有力量，通过教化和改善性格，以引导其“自由意志”和“真实本性”，从而能够担负起作为“人”所具有的使命；“现代人”试图增强其“自由意志”,满足其“真实本性”，锻炼其技能和智慧，来实现他所称的由不可知造物主所赋予的独特个性。令人惊异的是，这与作为“狩猎者的人”的世界观念非常接近，也是要满足其“真实本性”，“饥饿”以及“性”的本能，并试图增强其技能，来更有效地利用周围的环境。然而，现代人已经扩展了关于自然和宇宙的知识，远远超乎其自然感知的限度。用所获的知识，人类创造了一个几乎完全人造的人类环境，让自己完全独立于不稳定的自然环境和气候之上。这一人造环境似乎就是那特大喧嚣的都市。因此，“现代人”，主要指特大城市的居民，占大约15%–20%的世界人口。虽然中国以农业占主导，然而，自20世纪至今已经有了大规模的现代化进程。

如果中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代表了整个世界的模型，她也为我们提供了其他关于“现代人”的信息。在“农业的”和“城市的”人口之间，我们发现了所谓的“漂流的”人口，无根的人群，他们已经与农业社会脱离关系，而在都市之中，却还没有找到，或许再不会找到新的位置。任何地方，都不需要这些人，他们属于人口中的非农业人口部分，但是，他们也不是城市人口，他们也许构成了整个人口的另外20%，并且与日俱增。随着人口的增长，特别是非农业城市人口的增长，就会看到一种新“游牧”状况，就是说，人们与其环境的关系，与其生长地及家乡、省份或国家的关系，变得日益薄弱。因此，一批日益增长的

无根的人群，也许为了避开战争横行的地区，而致使其他地区的移民会继续增加。对他们来说，“古代的”世界概念，已经变得毫无意义，然而，他们也很少会积极地参与到现代人——都市文明的世界公民的积极生活之中；结果，现代人的世界观念，对他们也少有价值和意义。最终，留给他们的是作为“狩猎者”的观念，他们被完全置于那由喧闹主宰世界的严酷环境之中，其大部分的生命，是为着生存而斗争，或为着一个更好的条件，而做殊死一搏，结果，破坏了越来越多的自然环境，而日益减少了自己生存的基础。

在这个由中心大城市与卫星城镇构成的人造大居住地上，大都市和城市化的乡村，以及环绕着它们的、日益增长的贫民区，使人们已经脱离了自然环境。其对自然的体验，是非常有限的、理论的、肤浅的，或者说，是科学技术所产生的虚拟幻象。人会越来越对这个环境的维护缺乏责任，特别是，当这一责任完全托付于官僚及所谓的专家的时候。虽然人的生活依然几乎完全依赖自然，他却不再体验自然生产和再生产的生命周期，因此，无从获得一个宇宙秩序的视野。人可能会对其人造的都市环境的基础设施的复杂体系有所了解，也许，他将这有生命的有机体与机器相提并论，但人体的结构，是一个非常脆弱的靠不住的有机构造。

最后，我们将这种对于“现代人”及其世界观念的偏颇和夸张的描述进行扩展，从而指出，实际上，“现代人”完全知晓隐含在其文明中的以上问题，并且已经通过承担职责，来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试图弥补这些不必要的发展。然而，是否能有一个可被认知的总体框架，可以架构基本的条件，并为一般公众接受，正如“幻方”观念在中国沿用千年那样，至今依然拭目以待。1970/1971年，罗马俱乐部倡议了一项“关于人类困境”的项目，在过去20年至今所发表的报告，可能包含了希望的信息：如果人类能够节制自身，并对物质生产亦有所节制的话，人类便能创造一个和谐社会，以达到全球的平衡协调。

这一充满了希望的信息，颇似公元前1000年中国先秦诸子的思想，即是，人类作为天地间各种自然力量的协调者，需寻求各种力量的平衡。如果“现代人”觉得自己在地球上越来越像是定居者，因为，超越了极限，也便没有自由可言，那么，他一定会保持“作为耕者”的世界观念。他便会在适于栖息的有限世界内，担负起责任，而这世界的象征，对于中国人来说，曾是“幻方”——这神奇的方形。

第 1 章　定居聚落的开始

1.1　新石器时代的背景

新石器时代，虽然不能算是中国城市史中的一部分，但这个阶段，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构成了最终导致城市聚落出现的基础。其中萌芽了很多典型的中国文化特质，虽然这些是一个农业社会的特点，同样融入到随后四千年的中国城市文明之中。新石器时期，也同样延伸了四千多年的时间跨度，它的开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9000 年到公元前 8000 年，这归功于在过去 30 年里，中国考古研究的迅速进展。以下简要回顾新石器时代的背景。

"新石器"这个词语，在世界范围人类发展史的脉络中，具有适当位置。大致指介于大约 150 万年前到约公元前 1 万年间的旧石器时代，与大约仅在我们这个世纪前 3000 年开始的青铜器时期之间。然而，新石器时代，由于某些经过了两千年发展形成的复杂文化体系所具有的一些特征而显著存在，并被认为是人类文明的基础。而旧石器时代，是与人类发展的狩猎采集阶段同义的，新石器时代具有农业发展的特征，即在人类控制之下，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在旧石器晚期，食物种子和果实储存作为一个季节使用，就像收割和碾磨技术一样，已被那些狩猎者和采集者所熟悉。某种植物的选择和播种，便于收割，最终导致了农业，特别是在气候条件适宜的地方，例如：有足够长的生长成熟季节，在适当时候，有足够的水分，等等。在大约公元前 15000 年之后，由于世界范围内冰河期以后迅速的气候变化，其显著特征是气温升高、雨水充足，为世界很多地方提供了这种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条件。这种情况，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特别是欧亚大陆，冰川的消退，也留下了足够的土壤和充足的水源。如果我们认为，农业起源于囤积粮食和保存动物的实践活动，那么，这些实践活动，似乎普遍存在于诸多地区。然而，几千年的进程中，发现很多这类的实践活动，是聚集在最为适宜的地方，例如在中东和中国，这些肥沃的区域像月牙形，而农业首先成为了一种有组织的实践。这些地方，选种和育种导致了大量新植物品种的出现，且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人类和动物间紧密的象征关系，也许在人类历史最早的阶段，就已经存在了，但仅仅很少的一些特殊关系，成为定居的农业经济的一部分。因为，在家养动物和假定的野生原型之间，很难画出一条理想的线，而给出家养动物的起源时间，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家养动物，看上去无疑已经是有组织的农业最初形式的一部分了。

在定居聚落的发展过程中，中间阶段，即"狩猎者"—"采集者"—"渔者"经济阶段，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其中，渔业，成为永久性聚落出现的初例。这暗示了人类部落的生存地区与水源的密切关系。湖泊河流的岸边，或者小山丘附近，成为建造永久性居住地带的最适宜的地方，除了食物储存和准备所需要的先进技术——如风干、碾碎、烹调、焙烘等——之外，新的复杂工艺，如编篓、织网、纺织、原始制陶、刻骨、石器磨光，以及在此研究中非常重要的造房造船和木工技艺，也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了发展。

这复杂的新石器文化发展阶段的所有不同部分，虽然在旧石器后

江西仙人洞 公元前 8000 年	
江西 前 4000 年	
半坡	
商代 前 2000 年	
前 1000 年	
西周	

图 1.1.1.1　公元前 9 千纪直到公元前 2 千纪末来自各处的绳纹碎陶片[1]

1 引自《文物》，1977/9。

期结束，紧接着最后的冰河化大多情况下有不同的脉络，却在大约公元前 15000 年后，逐渐形成了一般意义上的“亚热带气候圈”，特别是在以上提到的中东地区和中国。

在公元前 8000 年后，气候剧烈变化，气温升高，当大约公元前 6000 年左右达到最适温度时，新石器文化的发展获得了契机。这种最适温度，持续了大约两千年，直至其末期，新石器文化，随着几个显著和复杂的文化群而涌现。其区别由于自然条件（如生态背景）和人类的种族构成而形成。自从那时起，进一步的发展变得更为清晰，多亏了考古研究发现，直到公元前 2 千纪历史开始了[1]，而考古学越来越受到历史记载的支持，这便是中国城市史的开端。

1.1.1 新石器时代的初期

新石器文化最为重要的标志之一是陶器的存在，考古学家认为，陶器的最初痕迹，表明了这一文化的开始。在中国长江以南的高地，在东部沿海的狭窄河谷，以及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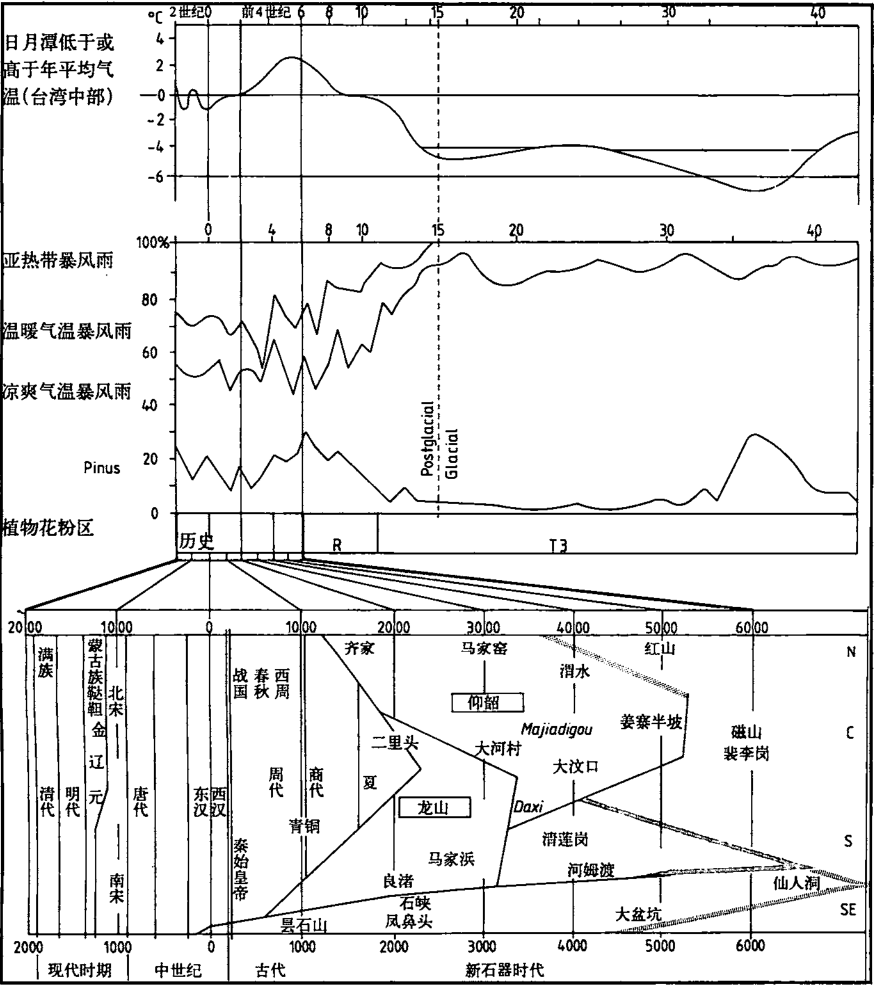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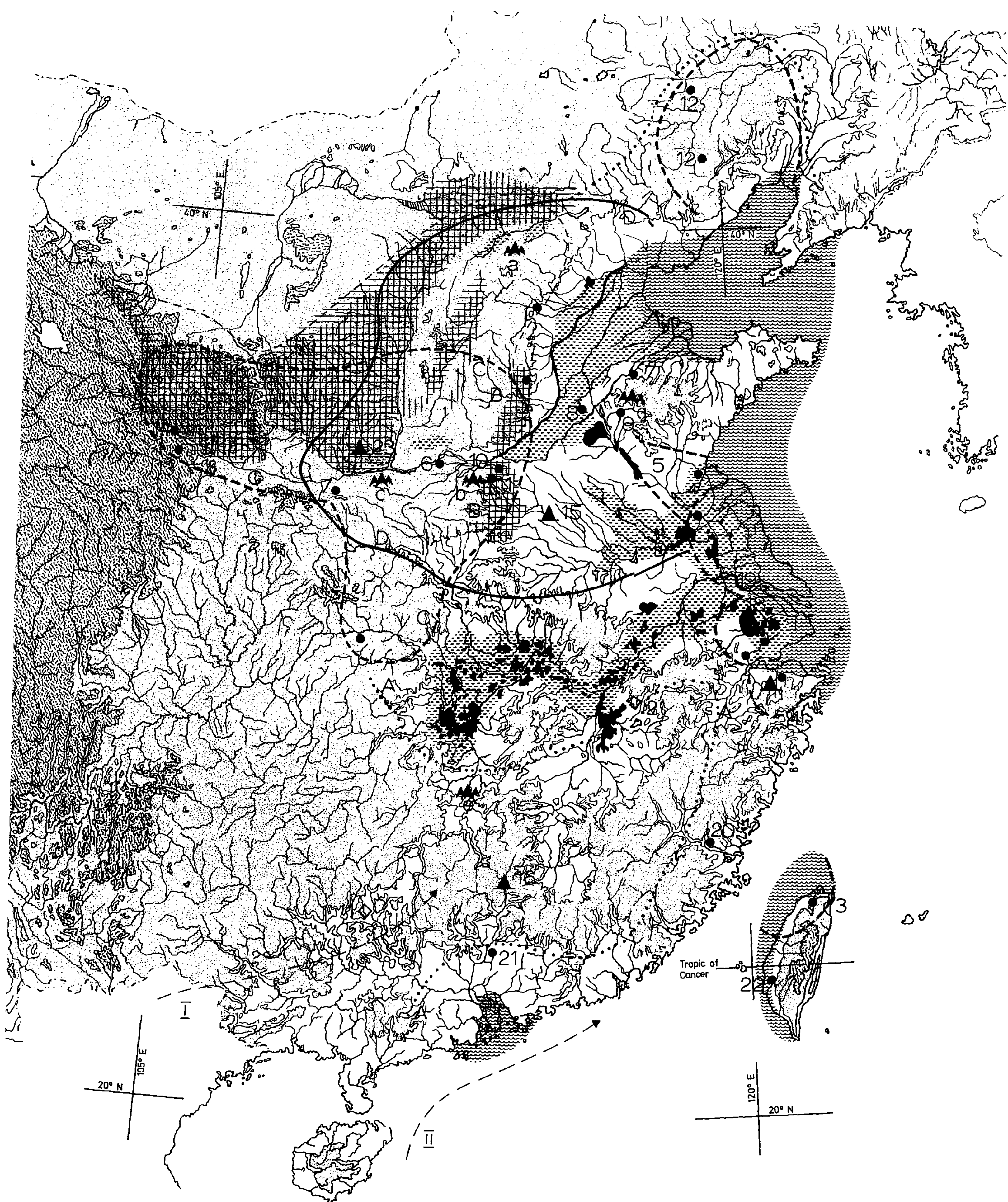


图 1.1.1 公元前 40000 年到公元 2000 年的年代表[2]。
相关的气候温度曲线和花粉图解，显示了后冰河时期几千年的时间表。以下的时间表显示，从大约公元前 6000 年起，代表考古的文化组群和从公元前 2000 年起，中国主要朝代，显示了北部的、中央的、南部的和中国东南的文化组群的一般坐落位置。这个表格并没有打算要完成

图 1.1.2.1 新石器时代中国地图，比例 1：10000000，新石器时代的景观，作为永久聚落的基础。[3] ＂稻作的分布＂[4] 与＂新石器文化组群的分布＂。[5] 已知黄河最初的河道，是沿着华北平原以西的太行山脚。在新石器时代，在这条河道和山东群山之间的整个区域，遍布湖泊沼泽，而洪水淹没区域，向南延伸直到淮河河谷。山东半岛北部和南部的海岸线，比其今日更靠向内陆。扬子江流域遍布湖泊和沼泽，其中最大的是在现今湖北省的江汉盆地。现今江苏省的绝大部分和浙江省的北部，是一个水陆两栖的区域，以小丘点缀着。东南的省份和高出海平面 200 多米的地区，没有变化多少，除了那些小山丘和大山脉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同样的是黄河中部和上游的西北地区的黄土高原地带。
A. 进化的渔人；B. 裴李岗和磁山；C. 仰韶；D. 龙山和龙山文化重要的坐落地点：1. 广西桂林的甑皮岩；2. 江西仙人洞；3. 台湾大盆坑；4. 浙江河姆渡；5. 江苏＂清莲岗＂；6. 河南仰韶；7. 陕西半坡和姜寨；8. 河南西水坡；9. 山东大汶口；10. 河南大河村；11. 河北渭水；12. 内蒙古—辽宁红山；13. 甘肃马家窑；14. 甘肃齐家；15. 伏羲墓；16. 神农墓；17. 山东龙山城子崖；18. 浙江良渚；19. 江苏马家浜；20. 福建昙石山；21. 广东石峡；22. 台湾凤鼻头；23. 黄帝墓
中国传统中的圣山：北：恒山；中：嵩山；西：华山；东：泰山；南：衡山。
稻作分布路线：1 爪哇稻作；2 日本稻作

1 译注：参照夏商周断代工程，参阅《夏商周年表》，2000 年公布。
2 Matsuo Tsukada，Proceeding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55.1966。
7 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图集》，北京，1973；《水文地质图集》，北京，1979；《中国历史地图集》，上海，1982。
8 参见 T.T.Chang.Phil Trans of the Royal Society，伦敦，1976. 卷 275.143-155 页。
9 参见尹达，《新石器时代生活》，北京，1979。



40° N
105° E
120° E
Tropic of Cancer
20° 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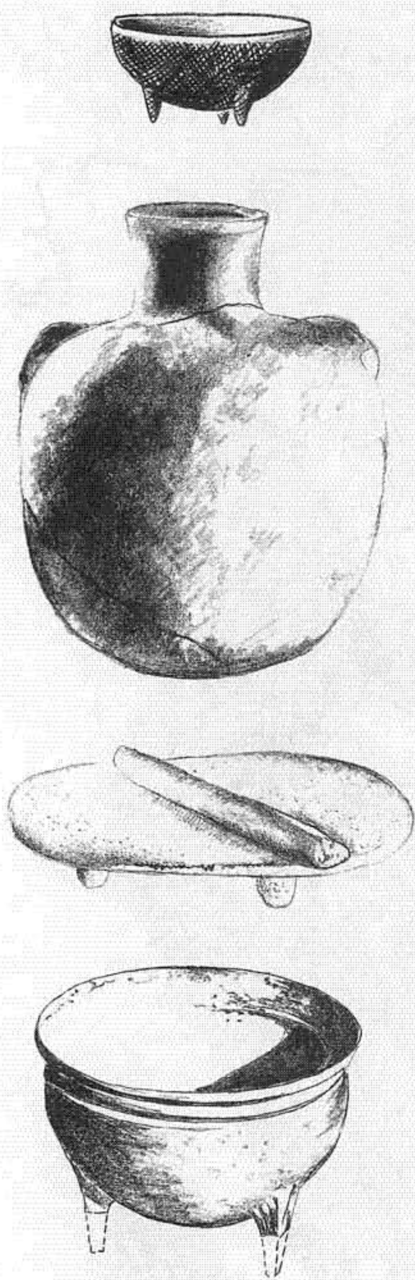


图 1.1.2.2–5 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陶器

图 1.1.2.2 公元前 6 千纪以前陕西南部李家村的三足陶器[1]

图 1.1.2.3, 4 来自河南裴李岗的白陶和磨石，公元前 7 至 6 千纪，1977 年挖掘

图 1.1.2.5 来自河南西水坡的三足陶器，公元前 5 千纪末[2]

一步的内陆靠近河流处的灰岩石窟，发现了最古老的陶器碎片。在鄱阳湖东、江西省万年县石窟的仙人洞遗址，碳 14 测定表明的年代是公元前 8920 年到前 8615 年。在这一带，陶器碎片上发现印有绳纹图案，或是用于装饰，或是有实际用途，这被称为“绳纹陶器”。这也告诉我们，那些陶器制造者，有能力利用植物纤维，这些植物纤维，不单用于装饰陶器，而且用于结网、结绳，以及其他方面的应用。这种“绳纹陶器”文化的覆盖面，被描述为从泰国西部的灵窟穿过越南，沿着中国的南海岸最后到达台湾岛，以及四川南部、广西和江西万年县内陆地区的整个区域。“进化的渔者”这个词汇所指，就是这样一群人。其文化特征是：用于织网的石坠子、鱼及介壳类水生动物的遗骨，以及用于建造独木舟、茅舍和其他木构件的木工工具——锛子和凿子。虽然其生存的主要模式依然是狩猎—渔业—采集，有强烈的迹象表明，这些人很有可能已经开始了园艺，例如豌豆、蚕豆、甘薯和其他球根植物的遗留，以及利用水稻（大概是野生水稻）的第一表征。此外，还发现已经碳化了的稻谷、石镰刀和磨石等。

1.1.2 新石器时代中期

经历了 1 万年气候条件不断改善后的大约 3000 年这一时间跨度，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在这一时间跨度中国文化发展的信息资料。从大约公元前 6000 年始，考古学提供给我们关于新石器文化开始于黄河下游河南省北部的相关信息。在那里，可以看到相对高水平的技术，特别是制陶技术。那时，黄河顺着更往北的河道，沿着坐落其西的太行山脚，流入现在天津一带的渤海湾。在黄河以东直到海边，整个地区年年洪水，形成了一个大沼泽地，以致无处可建永久性的聚落。结果，在这一地区，没有发现任何新石器文化的遗存。而适合较为永久性聚落形成的地区，在今天河南的省会郑州附近。那里，黄河改道向北，嵩山脚在黄河冲积平原外提供了一个较高的聚居地，但又靠近湿地，有取之不尽的鱼类、鸟类和野生猎物。山体提供了必要的木材、用于开垦及畜牧业的待砍伐和焚烧的土地。这里的文化，经过碳 14 测定，日期约为公元前 6500 年到公元前 5000 年之间，被称为“裴李岗”文化，名称来源于郑州以南 40 公里的一个地方，“岗”表示一个小山的意思。

随着温度的升高和变化的气候条件，在冰河时代的末期，新的植被又重新覆盖这一地区。几千年过去之后，茂密的森林，可能覆盖了大小山脉，使其充满了野生动物和大量植物，在这一地区，早期的狩猎者或采集者族群得到发展。我们必须考虑有两条不同的发展脉络：一些人可能向北迁徙，随着冰层的消退，北方有着广阔的草原和众多的兽群，如驯鹿和羊群，这些人，后来发展为接下来持续若干世纪的游牧部落；而另一些人，则适应了

1 参见考古通讯，1958/59。
2 参见中国画报，1988/3。



图 1.1.2.6 太平洋岸文化的桩柱房屋，以传统的如七千年前河姆渡的木构建造，在菲律宾棉兰老岛上的渔村[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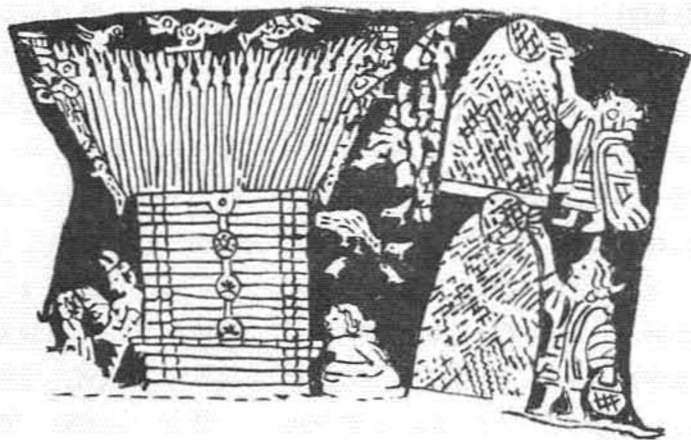


图 1.1.2.7 一座以木桩构造的房屋图片，参照公元前 1 千纪云南滇文化的一个青铜容器上的镌刻[2]

构造遵循着太平洋岸早期文化的传统，例如公元前 5 千纪的河姆渡出土的龟甲和凸榫部分，表现了进化渔人的木刻技艺，装配之简单及构造之强度和适应性是引起这种木构生存并且七千年之后的今天依然使用的资质保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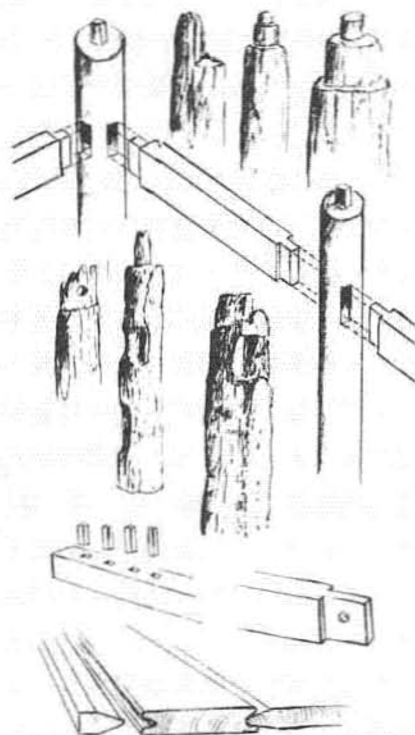


图 1.1.2.8 来自浙江河姆渡木构架的碎片，公元前 5 千纪

1 译者注：Mindanao，又译为民答那峨，菲第二大岛，是菲最南的岛屿。
2 参见《文物》和《考古》1974/75。

变化的植物和动物环境，保持其作为狩猎者、采集者或者还是捕渔者的生活方式。

大多数学者相信，这些人肯定是蒙古人种。然而，他们的一些文化痕迹，正如在河南裴李岗文化中所表现的那样，大概具有南部起源，那里的人，属于傣／泰组群，是蒙古人种的一部分或一个分支，但文化上与北部族群不同。裴李岗文化的清单目录，包括一种带轴的石磨盘，具有锯齿状叶片的镰刀。两者都经过仔细打制，成为磨光的沙石，斧头和铲子也是同种材料制造的。根据考古考察，这些工具，表明食物准备过程发展完善，但并非必须，因为已经可以栽培植物。稻谷在北方地区并非自然生长，人们从其周围的野生植物中选择谷子(小米）来代替。炭化的粟米种子已经挖掘出来。此外，人们继续采集根、茎、果实并打猎。猪和羊就在附近，正如在很多茅屋和储物坑间发现的骨头，以及这些动物原始的黏土形象，即在中国发现的最古老的艺术所显示的那样。陶器，正如各种不同类型所显示的那样，已经具备相当的复杂工艺，并具有鲜明的形式感与功能感，包括罐、瓶、瓠、钵、鼎，所有这些形式开创了后来若干世纪漫长的中国制陶传统工艺的前例。它们都是手工制造的，厚度不均，多数没有装饰，然而造型优雅、表面圆润光滑。它们在由方形或圆形的半地下房屋组成的村庄外面的陶窑里，以 700 ~ 930℃的相对低温淬火完成。村庄不远处是墓地，那里已经有 114 座坟墓被挖掘，多数是单葬。死者与生前所用的生活器皿——也许被认为是最为珍贵的物品，一同埋葬。

“裴李岗”文化范围，向北延伸到达“磁山”，在太行山脚和黄河的古老河道之间，郑州以北 210 公里处。“裴李岗”遗址，向东南至“潢川”以远，距郑州 300 公里，河南南部、淮河以南，那里，小山连绵的乡间，新近变为淮河治理和灌溉项目的稻谷生长区域的一部分。这一区域包含森林，在山的高处生长着竹子、松柏和阔叶树，正如新石器时代一样。

在我们继续对黄河河谷地带新石器文化系列发展的考察之前，我们先要回到东南沿海看看东南一带新石器初期的文化，即“进化的渔人”的文化，在四千年的气候改变和气温升高的情况下，到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在公元前 5000 年后的气候最适条件阶段，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一发展过程与结果的第一证据，我们可以看看这一南方文化，对于北方文化的发展有何贡献，正如我们以上所显示的，尽管所获的数据时间比“裴李岗”的数据要晚一些。

在 1973/1974 年和 1977/1978 年所从事的两项考古活动中，河姆渡——浙江北部宁波以西的一个小村庄的发掘，将一个大约 40000 平方米的聚落带到世人眼前，其中 2699 平方米，实际上被挖掘到四个水平层的深度，经过碳 14 测定，最深层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 5000 年。这个聚落，最初坐落在浙江北部山区山脚下的湖中。那时的海岸也比今天的更近一些。最为惊奇的发现——当时在全世界是独特的发现——是湖上的干阑式村落，以精制处理过的木材和那种虽然经过了七千年的时间，在今天依然使用在木结构中的榫卯结构的木构遗迹。这为试图重构无论是河姆渡的新石器房屋和村庄，还是在其他地方的新石器时代的聚落，都投下了一片新的曙光。假定木工的技艺已经到了如此程度，那么建筑物一定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构构造，而且，肯定与直到最近才重构的原始房屋设想方案毫无关系。这一发现甚至更为惊奇，因为聚落中的陶器非常简洁，由粗糙的陶土手工成型，并在低温下烧制。颜色大多因为炭化的植物灰烬与黏土混合而几乎成为黑色，瓶和罐的类型比“裴李岗文化”中所见的更少变化。经过了数千年，装饰未有多少变化：依然是绳纹印记和刻痕。但后者（河姆渡）在一些例子中，采用了植物和动物的形状，非常自然的猪形象、植物形象和谷穗形象，都是人们喜欢的日常生活所用。既然制陶不能激发更多才艺，河姆渡人就在骨头上、木头上和黏土上雕刻或塑型同样取自日常生活的题材。猪、狗、鸟、鱼和其他动物，甚至家庭成员的头像也有出土。两件出土文物值得特别注意：一件是象牙盘，有雕刻着凤凰形象的鸟，在边缘有些小孔，通过这些小孔它可以被缝到衣服上。另一件是一只木碗，里外都施红色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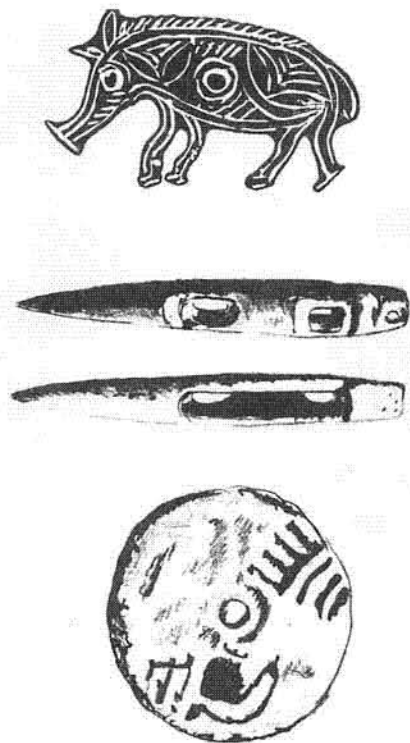


图 1.1.2.9 — 11 河姆渡文化遗迹[1]

图 1.1.2.9 公元前 5 千纪，浙江河姆渡镌刻在黑陶容器上一头猪的图像

图 1.1.2.10 出自河姆渡的织梭，公元前 5 千纪，这表现出了在木构中同样的雕刻技术

图 1.1.2.11 纺纱轮，带有彩绘的泥盘，湖北屈家岭，公元前 3 千纪

1 参见文物，1975。

这两件器物的发现，在亚洲的艺术史上可谓开拓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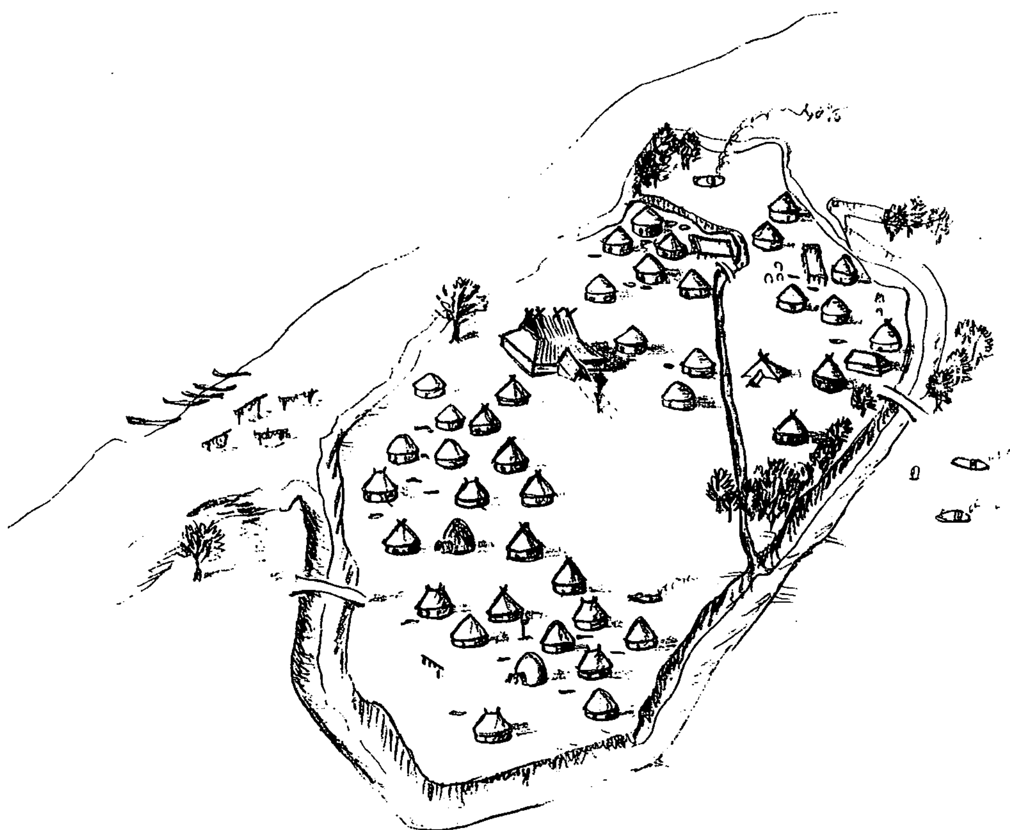
河姆渡人的日常生活，围绕着耕种和浇灌稻田，牵牛种地，在园中种植南瓜和其他蔬菜，采集水生植物、野果、草莓、蘑菇、坚果和中草药等。工具有骨制和木制，用大型动物的肩胛骨作锹、铲和锄。极少用到石头，如果用的话，也仅作制造猎鹿、捕象、捕捉犀牛、老虎及各种鸟类的武器；猎者带着猎狗。发现的一块硬木桨，表明捕鱼捉鳖时使用了独木舟。因为河姆渡是目前研究这一跨越两千年文化的惟一地区，我们关于这一地区在这个发展阶段的图像，依然是残缺不全的。然而，至少已经发现了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化或组群，起源于新石器初期的中国东南沿海及台湾海峡各岛屿，沿海水域成为“进化的渔人”的自然环境。考古学家将台湾这些地点命名为“大盆坑”（译者注：台北）和“凤鼻头”（译者注：高雄），而将福建省厦门附近金门岛的地点命名为“富国墩”，那里发现有非常多的贝壳和蛤，被认为是“厨房的残余物”。这些文化的进一步发展遍及整个区域，导致了当地的变化，一直到公元前 2000 年青铜时代的开始，或更晚些时期。沿着大陆海岸，受到更为内陆的文化影响，丰富多样的地方文化，在同样的时间范围内得到发展，最终形成后来的新石器文化模式。通过这样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累积为一系列的原始人工制品，成为公元前 2000 年以后中华青铜时代的基础。这一过程的主流，将在后面予以描述，并会转回到黄河谷一带——我们曾经探讨过的公元前 6000 年的裴李岗文化。

中国记载最好的，以及自从 1920 年代以来研究最多的新石器文化，是仰韶文化，是根据 1921 年离三门峡不远最早发现的遗址而得名，在河南省西部著名的黄河峡谷地带。无疑，这个地点，对于仰韶文化来说是最为重要的地方，正如后来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这一名称沿用到后来，到现在指大约 1000 多处的地方文化。

1.1.3 仰韶文化集群

自 1954 年以来，挖掘了很多村庄的大部分地方。在中国首次变得可以判断整个聚落地区的范围和结构。特别是在陕西省西安市东部的半坡村和在更东部 15 公里的姜寨，每个聚落遗址大约 5 到 7 公顷，为我们提供了洞察早期农耕社会生活及透视其聚落结构和模式的机会。碳 14 测定的日期是两个聚落年代都介于公元前 4770 年 ±135 年到公元前 4290 年 ±200 年之间。虽然两个村庄在文化上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它们有两种不同的模式，因此需要分别地加以描述。

半坡村中心，位于西安市东北，渭河支流浐水边，高于河床大约 9 米的一个土台之上。重建的平面，表示了这种聚落模式的后期阶段，但在这个遗址之下，是另一个表明属于同一个文化的更为早期占据的地点。早发现的聚落遗址，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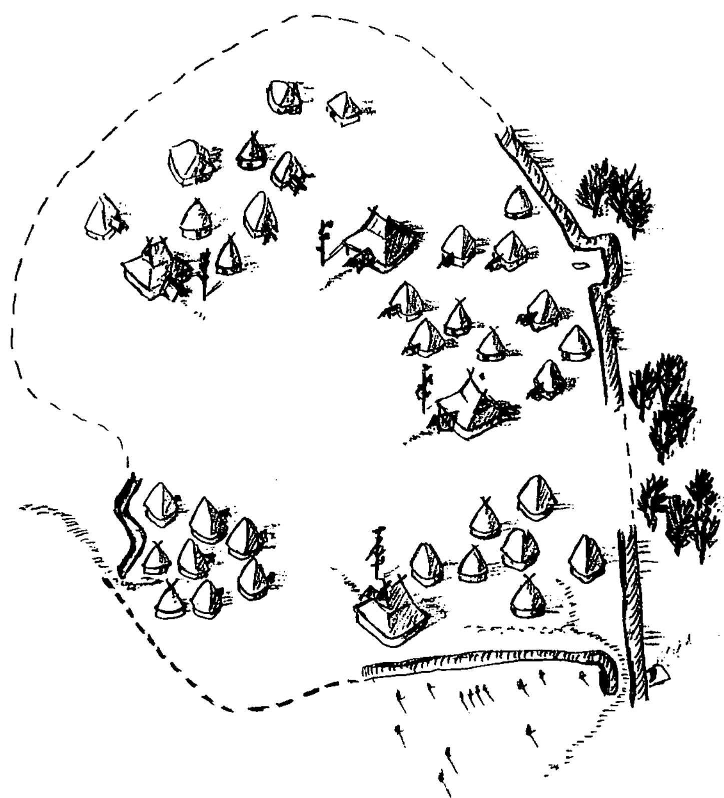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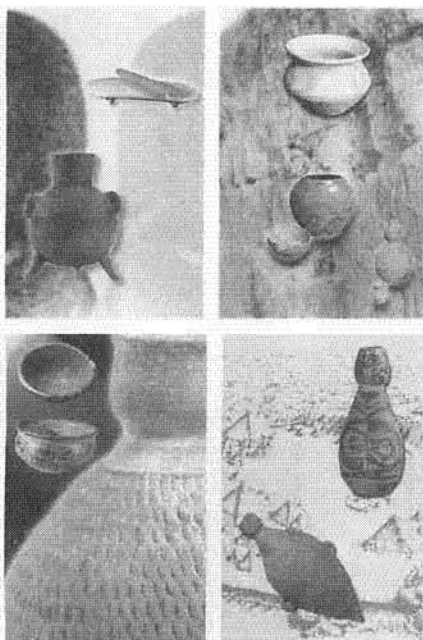


图 1.1.3.1　陕西仰韶文化，在西安半坡的新石器村庄，比例大约 1 ： 1000，参见西安市半坡博物馆的复原图。公元前 5 千纪，在中心有着大房子的聚落二期的复原图。灞河，在村子的西北（左侧），它在当时也许已经被认为比今天的要高一些，而因此，与村子的水平层更接近。在村子外的东边是两个陶窑

图 1.1.3.2　仰韶文化的新石器村庄，陕西姜寨挖掘出土，半坡以东 15 公里，公元前 4770 年 ±135 年到公元前 4290 年 ±200 年，比例大约 1 ： 1000，参照西安半坡博物馆中的平面。在村子中心的四周，发现四个与半坡的大房子同样类型的大房屋。然而，中心到底包含着什么，依然不为人知（1985），在东边的壕沟外，是墓地（下面，北在图的右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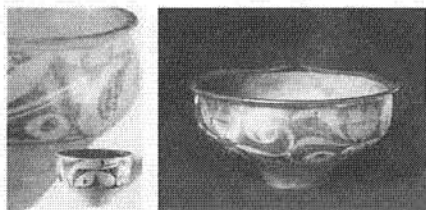
译者插图，左上：裴李岗文化遗存；右上：仰韶文化遗存陶艺；左下：半坡陶艺；右下：姜寨陶艺

挖掘出22座房屋残骸，连同43座储存窖；后来的由24座房屋和多于160座储存窖组成；然而，这两个地平层，每个也许原先包含大约100座房屋。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在后来的村庄中心，有一座有160平方米面积的大房子，而房屋的大部分是建在方形平面上的，与较早的村庄的圆形房子形成对比。这座大房子，被认为是村庄氏族的群落中心，正如所显示的那样，是以一种可能受到我们在河姆渡文化中所见的、属于东南文化系的木工技术影响的方式建造的。同时，它似乎是后来典型的中国建筑中具有公共功能的一个特殊建筑体现的早期实例。

姜寨村，也许和半坡的后期村庄属于同一阶段，展示了一组房屋，每一组，由5到7座大概是方形的房屋和1座与半坡同样类型的大房子组成。这被解释为代表了在氏族村落里小的家庭单元的存在，在总共90到100座房屋中，有大约500到600不等的居民。另外，村子含有3个畜栏、292座储存窖、221个炉灶（家庭），村子之外，有246处墓坑和4座制陶窑，这超出了村庄的额度。两个村庄都由5到6米的壕沟环绕，而半坡又由一道小壕沟划分为两个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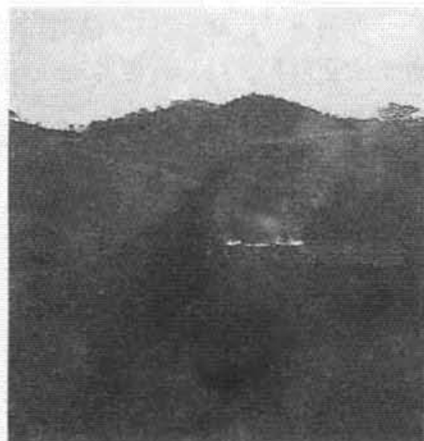
半坡村的两个居住层，被解释为与最为原始的农业方法——烧荒相联系，导致了围绕村庄的耕地渐渐耗尽。这种解释，是基于对植物学中花粉的分析，地质学对于植物花粉沉积层中的或有或无的交替现象的研究，可以表明一处荒地砍伐森林和重新造林的情形。在浐水的上游，发掘出大约有20多个村庄遗址，沿着灞河以东，另外有10个村庄，都来自仰韶文化。这暗示了原始部落是沿着河流的上下游迁徙的，依据生存环境的需要，荒弃或重建村庄。因为这个原因，“永久的农业聚落”这个词汇，必须有某种程度的修正，因而称为半定居的聚落。然而这种氏族和村庄族系的迁徙，与因为食物供给的改善而增加的人口一起，对于仰韶文化沿着河流连续不断地延伸贡献巨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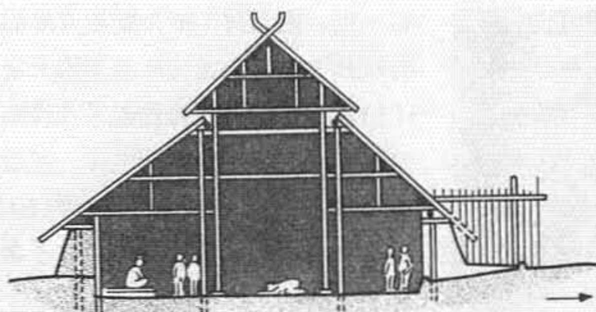
结果，我们发现，仰韶文化最后沿着黄河向北顺流传播直到现代北京，溯流而上进入陕西省北部地区，又溯渭河西行进入甘肃省东部，最后向南进入汉水河谷，至河南省南部淮河上游。这一过程持续整个仰韶文化时期。越是高度发达，离西安城市中心越远。这里，“越是发达”意味着什么呢？在村庄的发展中，半坡村的两种聚落层已经区分出了两个不同阶段。后一种大房子类型、那种可能的氏族中心，在后来阶段的几个其他遗址中，如三门峡以南的庙底沟也有所发现[1]，碳14测定的日期是公元前3910年±125年左右，位于河南省东部，在原来仰韶文化的中心、西安以东大约250公里的地方。再向东距离原来的中心220公里的地方，即郑州城北的大河村，发现了另一种不同的房屋建造类型。碳14测定时间是在公元前3075年±100年和公元前2550年±140年之间，这肯定是仰韶文化的另一个阶段。建造基于一个30到35厘米厚的黏土实墙，以木柱加固，并有直径10到15厘米的孔洞穿过墙体，就像那种硬栅栏有横向的板条，两侧厚厚地涂抹着混合着稻草的黏土。这些墙体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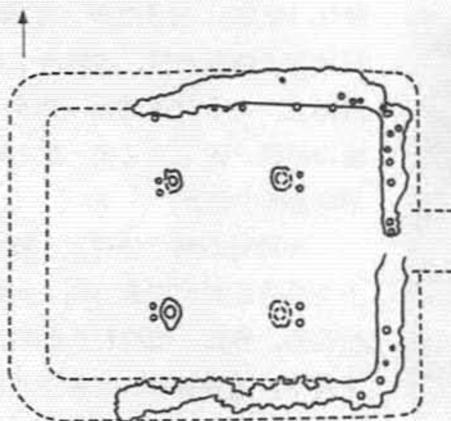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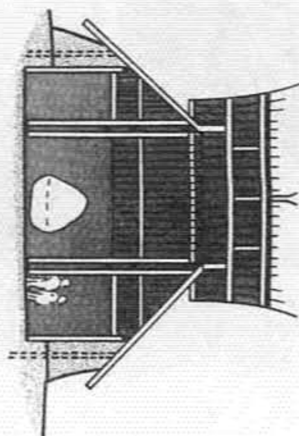
译者插图：庙底沟文化遗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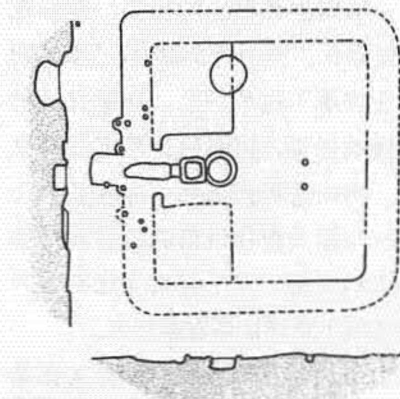
1 译者注：遗址坐落在三门峡市西南郊一块菱形台地上。台地背靠南山，北临涧河，东西各有一道深谷夹峙。庙底沟型彩陶是因在河南陕县庙底沟发现而得名，它晚于半坡型彩陶，器形以大口鼓腹小平底钵为最典型。彩绘主要用黑或紫黑色，纹饰有几何形图案，如圆点、勾叶、弧线。三角带状纹、平行条纹、回旋钩连纹、网格纹等。同时有仿生纹和植物纹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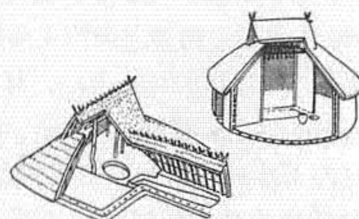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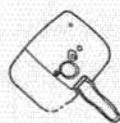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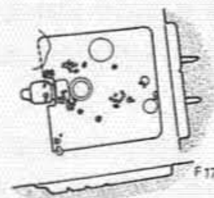




图1.1.3.3 通过烧荒技术，来清理山林以利农业，这在今天南中国省份依然使用

图1.1.3.4－7 仰韶文化的大房屋，比例1：250

图1.1.3.4 半坡村庄类型，布局和复原图，参照西安半坡博物馆，复原图由作者制作。左边：东西剖面；右边：南北剖面；东侧入口

图1.1.3.5 姜寨村庄类型，东边部分参见西安半坡博物馆，复原图由作者制作，西面入口，但是指向村子的中心，注意在两个升起的大概用于晚上睡觉的平台之间入口走道的火炉（生火）的位置

图1.1.3.6 陕西半坡，大约公元前4500年

图1.1.3.7 陕西姜寨，大约公元前4500年

3 4
5 6
7

撑着屋顶。平面由三个房间组成，中间的一个最宽，整座房屋的长度大约9米，进深6米。中央的房间4米宽，似乎是横梁的标准垮度，与在半坡村的大房子所发现的一样。这种建筑类型可被看作是后来若干世纪里中国农屋的“原型”，正如在那些看上去有道理的重建模型中所表现的那样。这种建筑类型，对于中国来说是比较常见的，只是在不同的省份之间，存在着些许地区差异，因此构成了一个大约5000年的建筑传统。

随着在半坡村大房子的建造，以农业人口为主的永久性农业聚落时代，在公元前5000年后期开始了。在不晚于公元前3000年的初期，产生了典型的农房。但是，在东南，始于公元前7000年的桩柱房屋的木建筑，遍布太平洋所有沿海地区，最终形成了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所有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群岛建筑的基础。不容忽视的是，东亚“进化的渔者”娴熟的木工技术，可能影响了中原华夏人的大房子的柱子和屋顶系统的发展。正如在半坡中所显示的那样，必要的知识在公元前5000年就已经存在了。

在进入新石器晚期的讨论之前，需要对新石器中期的物质文化做一个简要的综述。看来，贯穿这个阶段的工具和器皿的基本情况——所有农业社会典型的狩猎捕鱼和采集活动，与我们以上所描述的变化并不太大。真正的变化，发生在艺术的发展方面，特别是制陶方面，与不同阶段和不同地域密切相关的不同风格，是可以辨别出来的。某种程度上，这与宗教概念与信仰仪式的发展是相关的。裴李岗文化的制陶者，似乎已经设计了一些样品，那是各种日常使用器皿的精制样式。后来，整个仰韶文化，数量日渐增长的器皿的生产，虽然依旧以手工成型，肯定不为日常所用，这些器皿，有着磨光的表面和不同风格的绘画。其绘画风格，已经被解释为表达宗教概念，主要表达时间循环的特征和无始无终永恒的延伸，因此，与葬礼仪式密切相关。在几个墓葬中所发掘的葬礼陶罐的比例和数目，无法以实际的名目给予解释，这很明显是巫术的原因。这些，给死者提供了魔器，即绘制的陶罐，这被认为可保持死者处于永恒的生命圈中，使他成为家族或氏族永生的祖先——这是祖先祭礼的最早实例，也是中国宗教哲学的基本概念。其他器皿的发明，是为了宗教庆典时承载牺牲的，特别是所谓的三足鼎，成为整个中国文化史中一直用于承载牺牲的器皿的原型，与毛笔书法绘画传统一起，建立了一个延续了6000年的中国文化传统。

与仰韶文化并行发展的，是更往南的、中国东部江苏和山东省所出现的、各地方差异的文化。在此，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东南的“进化的渔人”的影响，例如，用木制棺，骨、象牙、石器以及细心加工的有完美钻孔的玉石等制成的装饰。这同样解释了制陶技术的进展，因为，越来越多的器皿，是在制陶轮子上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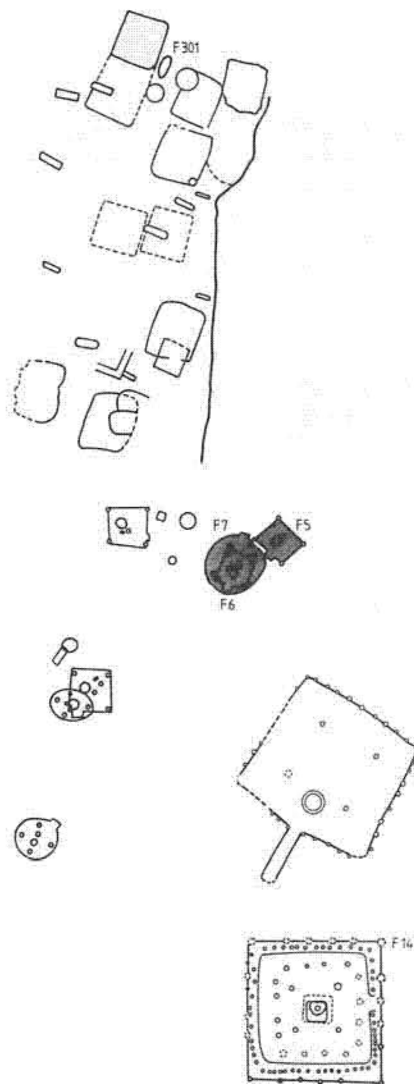


图 1.1.3.8–11 公元前 4–3 千纪新石器村庄的部分

图 1.1.3.8 山东东海域日照县大汶口文化的村子，大约公元前 3500 年，比例 1 ：500，参见考古 1976/6，方形的房屋，在西南有入口

图 1.1.3.9 公元前 2200 年，甘肃马家窑仰韶文化最后阶段的村子，比例 1 ：500，参见考古 1975/2，圆的和方的建筑物西南方向的入口

图 1.1.3.10 河南庙底沟仰韶文化的房屋类型，大约公元前 3500 年，比例 1 ：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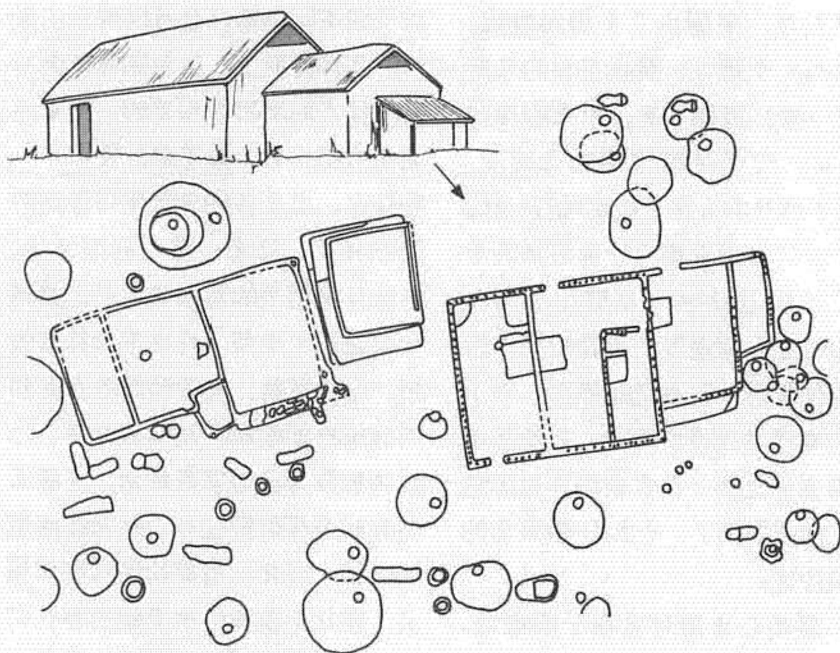
图 1.1.3.11 河南大河村仰韶文化的房屋类型，大约公元前 3000 年，比例 1 ：250

图 1.1.3.12,13　中国农屋的前身，比例 1：200

图 1.1.3.12　来自河南大河村的具有贮藏坑的两间房屋，公元前 3075 年 ±100 年，稍迟的仰韶文化，参见考古 1973/6,1979/3，复原图展现了平面右侧的房屋

图 1.1.3.13　河南孟庄的一个具有三间屋的房屋，公元前 1795 年 ±135 年，参见考古学报，1982/1

位于河南东部现今的商丘城附近，商代的祖宗之地，平面上的剖切部分，表示了由黏土所形成的地面好几个水平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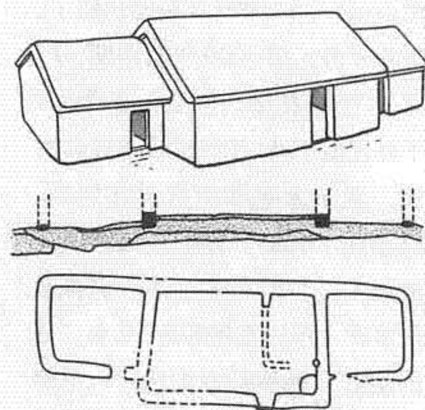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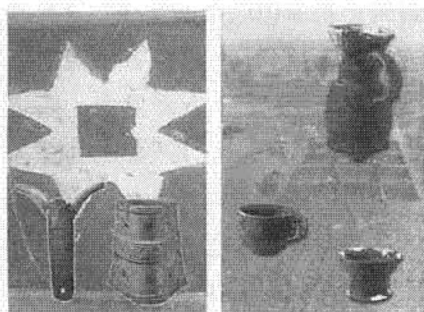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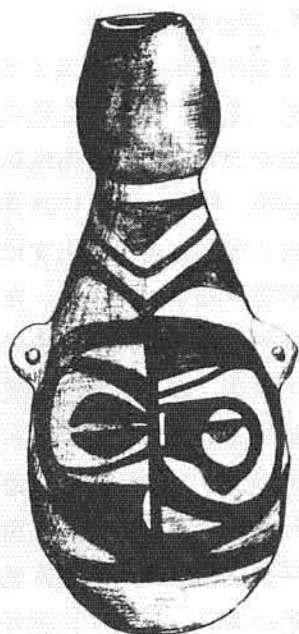
图 1.1.3.14　甘肃省，今天兰州市附近的土坯泥砖房屋，大约是孟庄之后 4000 年时间的情形

成的，产生出完美形状不同种类的制陶黏土，精巧的瓶子和盘子，具有不同的颜色和非常薄的壁。其中一些绘有几何装饰，而几个所谓的文化，亦由此区别开来。这里，最为重要的是，与仰韶文化平行发展的山东大汶口文化。更往南的江苏省的清莲岗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后期平行发展。这后缀“岗”字，表明聚落坐落在沿海地区的小山上，就像在先前河姆渡文化的例子一样。后来，这一地区，出现了马家浜文化（译者注：嘉兴一带）和更后来的良渚文化，或者我们应该称之为亚文化。后者已有所谓的祭祀玉器“琮”，这成为贯穿3000余年历史时期的祖先崇拜之中的非常重要的礼器。



译者插图，左，大汶口艺术；右，王城岗考古发现

伴随着这些亚文化，我们已经到达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它于公元前3000年初，产生于黄河的河谷，作为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结果，逐渐覆盖整个中国中部和东部，在不同的地域，分裂为几个龙山次文化，而最后，随着青铜时代的开始而告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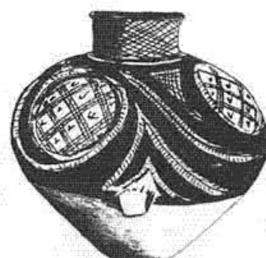










图 1.1.3.15 陕西姜寨仰韶文化初期的彩陶，公元前5千纪初，参见西安半坡博物馆，装饰表现了一条中轴线两侧的正反两面，大概再现了一种阴阳模式，脸谱代表祖先们

图 1.1.3.16 甘肃马家窑的彩陶，仰韶中期，参见考古，1952/6，装饰很可能是以月亮的渐盈和渐亏表现生命循环模式

图 1.1.3.17、18 甘肃临洮县半山彩陶，仰韶文化晚期，大约公元前2400年[1]

图 1.1.3.17 四个部分的螺旋形的模式，也许再现了一年四季和四方之极的永恒循环，那个具有不同模式的图案，也许表示了北方

图 1.1.3.18 大约在公元前1800年，在稍迟的马厂阶段[2]，一种被赋予人形的模式，非常可能表示了祖先或者连续几代祖先们，有时是与蛇的模式相结合，一种繁衍的象征，也是龙的祖先

---

1 J.G.Anderson.Preliminary Report i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Kansu，Beijing，1925.

2 译者注：1924年发现于青海省民和县马厂塬而得名，类型同半山比较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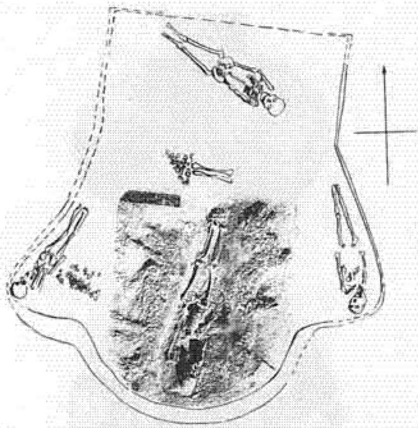


图1.1.3.19 河南濮阳县西水坡仰韶文化埋葬地，公元前5千纪，比例大约1：50，参见中国画报，3/1988

这个埋葬地，因为龙和虎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其将在东边（龙）和西边（虎）之间的中心位置安置死者，脸朝向北方面向北极星，这是至高祖先所在，两个动物以蛤壳而形成，大概表示了太平洋沿岸渔业文化的某些影响，在那时，距濮阳县东仅250公里之遥，其他三边，可能是亲属或者是奴隶的殉葬墓地

1.1.4 新石器时代晚期

上面所用的“龙山次文化”词汇，由“龙山”派生，这是山东北部，如今的省会城市济南城东部的一个小镇。那里，早在1928年，第一批考古发掘，将“龙山文化”遗迹带到世人眼前。接下来，在小镇东一个叫“城子崖”（意为在陡峭山崖上的聚落，也是对基址完美的描述）的地方的考古发掘，展示了一个小村遗址。[1]令人吃惊的是，这个曾经是一个小村的地方，由一座墙体环绕，据推测，该墙体坚硬无比，足以保卫这个村庄抵御外敌侵犯。大量证据，显示了时常发生侵犯的迹象。例如，在聚落领域里的大量箭镞和矛头，在很多地方烂泥般的头颅和残缺不全的骷髅，以及多层基础，都表明了重复性建设和重新建设的迹象，形成了如此程度的岩层，以致墙内地域颇像一个人工台地或小山，而不像在近东的“层层覆盖的古代遗址聚落”。城子崖的龙山聚落呈矩形，400米×500米，大约20公顷，里面的墙和台地依然存在，大约4到5米高。墙体由夯土建造，由连续12至14厘米厚的层层夯土叠成，在新的一层覆盖前，每一层都夯固。这种技术是一个新发明，直到4000年后的今天，一直使用。在其他地方，例如河南安阳南部，在1000平方米的区域里，发掘出了46座房屋，这为更详细地研究聚落结构，提供了可能性。特别在河南北部的中心地区，看上去直径大约4到5米的圆形房屋的比例又增加了，而具有像在大河村[2]中同样建造形式的矩形房屋，多在沿海地区发现。虽然时常见到半地下房屋，那种地面升起并有厚厚一层掺杂贝壳的混合灰泥，外部具有坡度以使得雨水能顺利排泄的房屋并非罕见。也发现了经日晒而烘干的砖。在一些地方，甚至发现有半地下的水管和排水系统。未成年的死者，以大坛子盛装，掩埋在房屋之间；而成年死者，掩埋于外面的墓地，大多数为单独埋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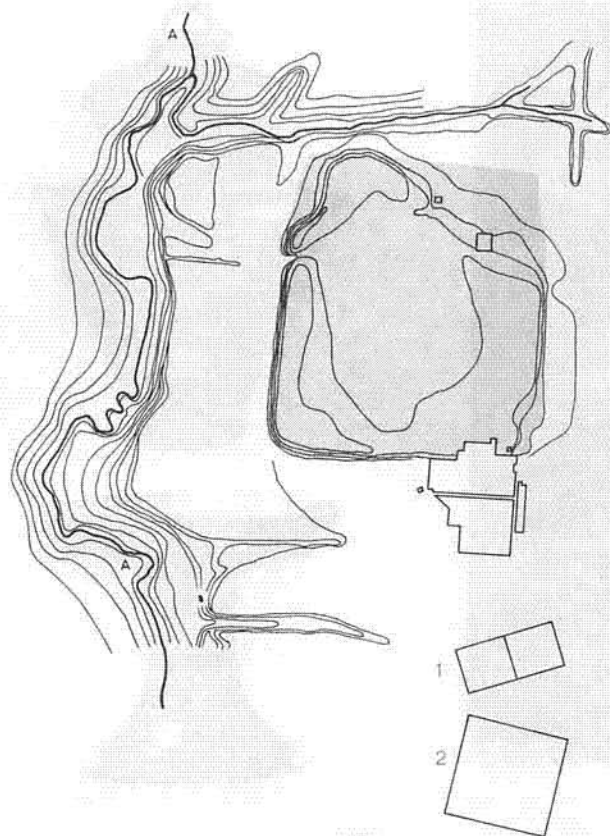
类型更先进的、有墙体环绕的聚落实例，是河南靠淮阳附近的平粮台，研究发现，那里有上面提到的水管。墙体围绕的区域，覆盖着每边仅185米长的正方形地域，但墙基13米厚，顶部8到10米厚。发现的墙体仍有3米高。另外一座墙体环绕的聚落，在中国的河南登封县中岳嵩山以南被发现。这个地方叫“王城岗”，意味着王者之城的山冈。[3]这个正方形聚落，四边仅95米长，但是，其东边附加了另一座由墙体环绕同样大小的方形区域，然而，其大部分，已经被附近的河水冲刷流失了。其墙体，与平粮台的墙体，具有同样的尺度，传统上认为，“王城岗”代表了“夏台”的遗存。传说那地方是夏代的创立者大禹的驻地。碳14测定表明有4010年±85年的历史，推算下来，应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这使因传说而成的“传统”有所根据。一个同样的情形，在山西省南部夏县附近被发现，那里，一座墙体环绕着方形区域，每边长140米，碳14测定为3950年±135年之久。然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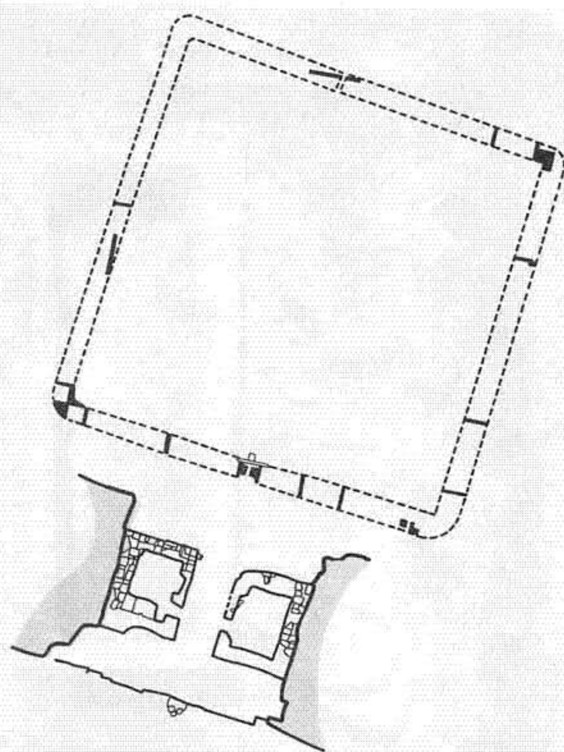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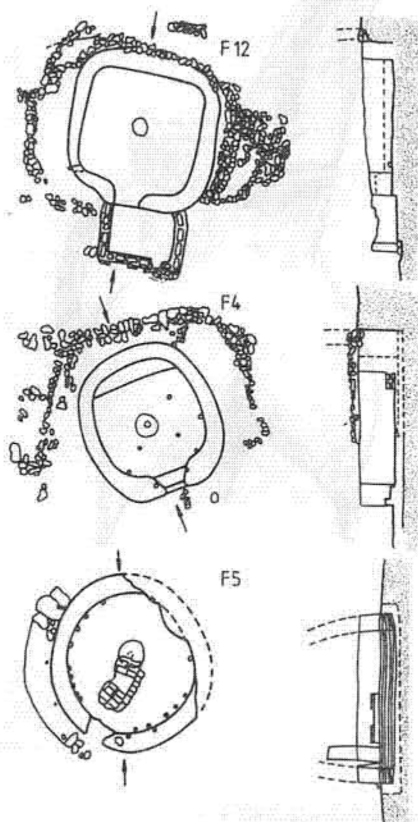
1 译者注：位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东、武原河东岸，中国“龙山文化”最早发现地。

2 译者注：郑州市东北郊柳林乡，遗址面积约30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厚4到12.5米，包含有仰韶、龙山、商代文化3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内容。

3 译者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大型城址和城壕，专家认为，“王城岗”城址极有可能是“禹都阳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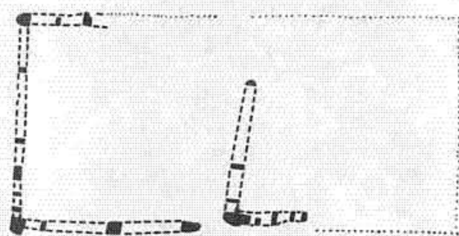


图 1.1.4.1 山东城子崖，新石器时代以墙体围绕的村庄废墟，龙山聚落遗址，比例 1 ：10000[1]。

A–A. 武原河现在的河床，1. 王城，2. 平粮台，以同样的比例为比较而表现（参见 1.1.4.3.4）

图 1.1.4.2 辽宁省北票县龙山文化的房屋，大约公元前 1900– 前 1800 年（3965 年 ±90 年和 3855 年 ±90 年），比例 1 ：250，圆形的地下泥构架，以防御性的石墙围绕，屋顶大概是以泥砖制成的穹隆[2]

图 1.1.4.3.4 河南省龙山文化的新石器城堡，比例 1 ：2500

图 1.1.4.3 平粮台，近河南淮阳，公元前 2000 年。

有着两个房屋的南门细部，在门的两侧，为看门人和门卫准备的房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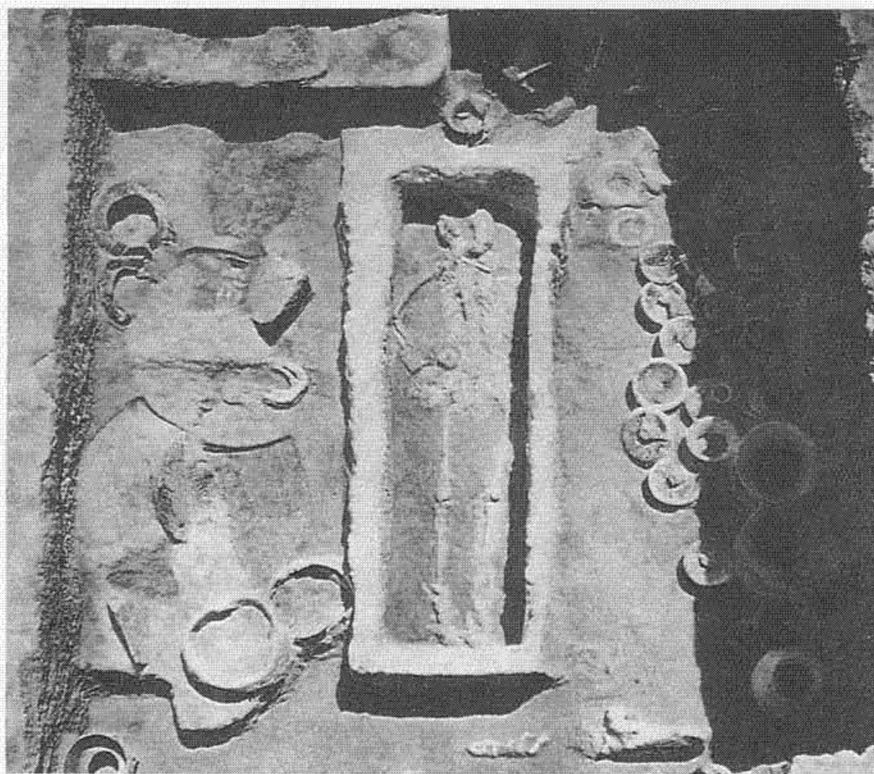
图 1.1.4.4 河南登封县附近的王城，大约在洛阳东南 80 公里处，大约公元前 2000 年（4015 年 ±85 年）[3]。

一个围墙环绕的矩形，分成两个方形部分，王城的废墟与阳城的废墟相距极近，后者被称为"大禹住阳城"，因此，王城的废墟被称为夏墟，即夏代遗迹

1 Li Chi, etal., 城子崖，中央研究院，南京，19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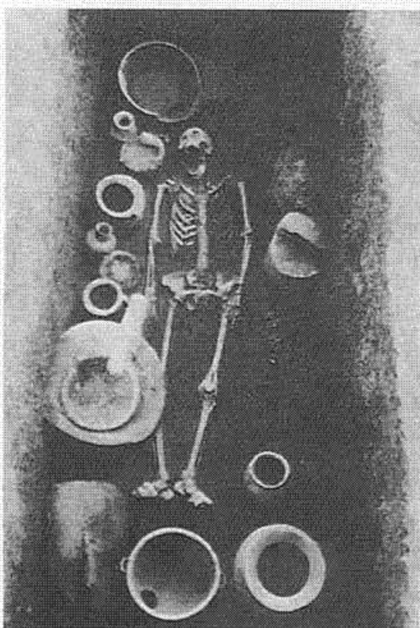
2 参见考古，1976/3。

3 参见文物，1983/3，198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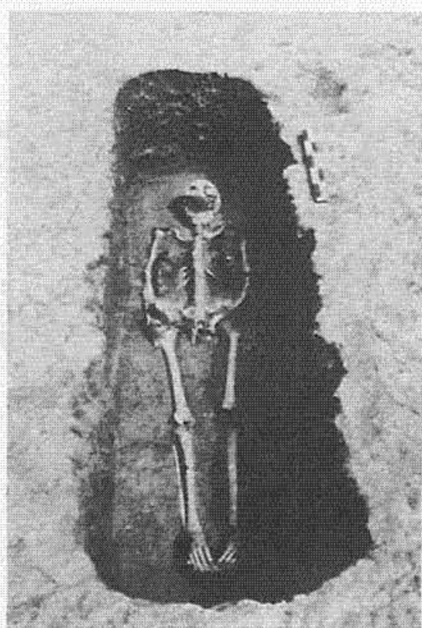




图 1.1.4.5 – 7 山西省襄汾县陶寺的龙山文化墓地，这一地区传统上为著名的夏墟，即夏代的废墟，公元前 2500 年至前 1900 年，在不同规模的墓地中，社会等级区别是很明显的，反映在陪葬品的数量和质量上。大的墓地包含超过 80 个陪葬品，中等的大约 20，而小的则没有[1]

图 1.1.4.8 – 10 龙山文化陶器，公元前 3 到前 2 千纪

图 1.1.4.8 山东省胶县三里河的黑色磨光的罐（罍），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图 1.1.4.9 浙江省良渚的黑色磨光的碗（豆），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图 1.1.4.10 白色的泥制三足鬶，来自山东省西城镇，参见尹达，《新石器时代》，北京，1979

1 参见中国画报，1985 年。

如果说，“城子崖”的那座墙体环绕的村庄，是目前所见最大的史前聚落的话，这三个有坚固墙体的区域，以及内部小而具防护性的生活空间，则更似要塞堡垒一样的权力中心。村庄肯定坐落别处，大概是有完善的、以永久耕作技术为经济基础的较大农业聚落。

在这期间，粟类中已有小麦。除了至今还至为重要的家畜——猪之外，越来越多的羊和牛，畜养在畜栏中。鸡和鸭被饲养，特别是在大量种植水稻的南方。马匹也被广泛使用，大概作为拉拖重物之用。在山西省南部发现的、最早出现的茧，属于仰韶时期，但那并不必然意味着产丝，而是在荒野采集，当作食物。但后来龙山系的农民，在烹饪蚕茧时，也许发现蚕茧含有纤维的特质，适用于纺织。

一般公认，龙山社会是一个分层级的社会，而且可能是依据等级制度建构的。具有专门技能、手艺和专门知识的组群，有组织地进行生产。但对于政治历史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辨别出，具有比氏族组群更大磁场的政治力量的形成，借助联合，或结合几个部落而形成更大的团体，共同合作，以达到共同目标，例如，河流控制、防洪和大规模灌溉等。这也许是在公元前3000年末，大禹建立夏代的潜在原因[1]，大禹，因其在治水方面的成就，而成为了代代相传的神话人物。这种中心权力的建立，无疑毁灭了仰韶人那平静的生活，带来了部落战争和倾轧，正如那些防御墙、堡垒所证实的那样，并造成生命和财产的毁灭。

在这个等级社会，上层由有权势的家庭和家族组成，发展出了一种与礼仪庆典和仪式体系相关的新生活方式，他们财富和影响力的展示，是与社会立场和社会地位相关的。伴随着封建领主而来的是，建立了仪式典礼配合的一种神权统治秩序，为此需要礼器。

所有这些，带来对一些器皿日渐增长的需求，这些器皿，非日常生活所用，而是为了巫术，必须具有极高质量。这对于技术创新和艺术创造都是一种挑战，而专才们似乎满足了这些需求。某些家庭中，建立了专业知识并积累了制造经验，制陶和制玉都达到了新水准。特别是“黑陶”，是龙山文化的显著产品，也是这一时期的标志。它不但以陶工的轮子，制造出非常优雅精美的形式，即所谓的“薄如蛋壳”那样的陶壁，而且，在专门的陶窑里，以高达1200℃的温度烧制，并高标准地控制其烧制过程，从而产生黑色和光滑的表面。这也许可被认作是后来以瓷器为范例的若干世纪中，高水平陶瓷生产的起源。

在玉器制造中，那种穿孔的圆盘，著名的、仅用于仪式的“璧”，是该领域中一个特殊的、同样高技术水准的产品。假设随着陶窑和对于高温控制的不断发展，金属，特别是铜，被发现是一种制造工具的可能材料。在河南省洛阳东南临汝附近，依然处在龙山文化圈中，发现有以融罐提取铜的工艺。在其他地方，小的铜器具，与典型的龙山器物一同展现于世人面前，但它们都仅作日常使用，与那些高水平的陶工、玉工和骨工的产品，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后来有着特殊造型的产品，一定与神权仪式有关，并被君主和他们的嫡系们用于相应的庆典仪式。另一个职业组群，“萨满”，渐渐发展了占卜术，并且逐渐使用动物的骨头，特别是牛的肩胛骨，即所称的甲骨之一种。

大约公元前2000年，伴随龙山文化的最后阶段而开始了青铜时期，但仅仅开始于中原地带。而沿海地区继续发展着新石器晚期的、更为地方化的变化着的形式。龙山文化的结束，以及在中原地区青铜时代的最初阶段，也许已经属于历史上的夏代。文献记载，夏代是在那时的中原地区建立起来的，并持续了大约400年，直到公元前2000年中期。考古资料越来越对这些历史记载进行实证，同样，历史文献也支持推动考古发现。

1.2 新石器时代的传统传说

在与龙山文化相关方面，已经多次提到了夏代的创立者大禹。根据竹书纪年，禹从公元前1989年开始，统治了一些年，后来由17位君主继续统治，直到公元前1558年，夏代被推翻，而商朝建立。这些日期，一般来说也为现代历史学家接受，尽管会有一些小小的更改，但

1 译者注：不过，夏代的历史，至今只有传说，未见确切可靠的考古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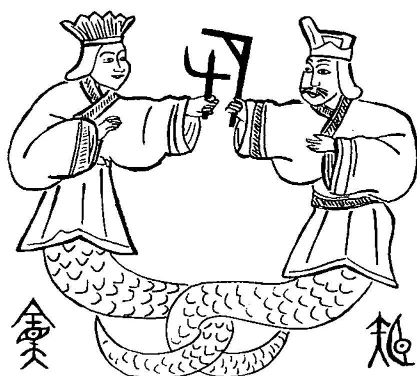


图 1.2.1　伏羲和他的妹妹女娲。他手持木匠的直角尺，而她持一对指北针。引自公元 2 世纪山东嘉祥县武梁祠墓墓壁的装饰。
汉字中，木匠的直角尺为矩，而一对指北针为规，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建立秩序的印象。根据传统，这就是所说的伏羲和女娲所做的。木匠的尺，代表了方形，即是地的象征；而一对指北针，代表了圆形，是天的象征。伏羲，男性（阳），将秩序给予地（阴）；女娲，女性（阴），将秩序给予天（阳）

是，被认为是基于历史事实的有关夏代情况，我们却知道得很少。同样，在夏代建立以前的情况，我们了解更少，虽然传说中，有很多历史人物故事，那些历史人物，被描述为中国文化的奠基者，每一位都有所贡献，有所发明，建立了技术的、社会经济的，或法律的制度。尽管这些传说，正如我们从文献所见，在公元前 1000 年中期以前，大概还没有形成系统，它们包含了一些关于这些人物的有趣细节，或如我们所说，在文明进程中的几个人格化体现。因为，所有这些神话传说，在若干个世纪以来，都一再地传诵，并用于特殊目的。例如，教导统治者们如何行事、具备何种伦理及品德观念，这些传说故事的好几个不同版本，世人都有所知晓。神话学学者们，已试图用现代比较研究方法，为这些神话传说的原始含义提供一些有用的解释。从中国神话传说与那些西方神话传说相比较，所得到的主要印象是：在中国，所有古代英雄，都被表现为是事物和制度的发明创造者，及文明的建立者，而并非是极强壮的，其惟一事业就是为权力而战的斗士。

从这些神话来看，文明——即有秩序的人类生活——开始于两个人物，都被描绘为美人鱼似的。伏羲和女娲，最初是兄妹，后来成为夫妻，并发明了规矩的婚配和家庭姓氏，以阻止同一家庭人之间的婚姻。传说，女娲在一场由可怕的灾难造成的苍天向北倾斜、不再覆盖整个大地时，补天并复原了天地间的秩序。这是对黄赤交角的初次发现，以及对于北极星角度观察的象征表现。女娲重建了四个基点，因此，创造了进一步观察的前提。在有关她最古老的一些图画中，她手执与天体观察相关的规。她的兄长伏羲，成为三皇五帝传说中的第一人，暗示了政权、法律和秩序的建立。据说，他发明了历法，来展示农业技术适时应用的季节。此外，他在龟壳上发现了“八卦”，并由此发展为写字、算数和自然演化中循环变化的哲学。在另一个更为实用的层面，据说，他发明了劈木手斧、木工的矩、狩猎用的绳子和鱼网。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那两个用来比喻规和矩的字——“规矩”——用在一起表示“规则、常规、惯例”和“良好的行为”，也就是保持秩序。更进一步地，可以观察到男性—女性体系，阳—阴的哲学，在此以一种复杂方式表现出来。第一，作为伏羲和女娲；第二，作为规（男性）和矩（女性）；第三，作为执规的女娲和执矩的伏羲。规矩二分法，与天地阴阳关系相同，在这里，意味着男性伏羲，在天地之间建立了和谐秩序。这在汉字“王”中有所表现。上下两横线代表天和地，中间一横代表人，这三者，由中间的一条竖线连接起来，这代表了统治者的地位和功能；正是这位统治者，通过将自身置于天地间平衡和谐的位置，所以，阴阳才得以平衡。

下一个传说中的三皇之一是神农[1]。他被描述为植物采集者，不但发现了适于耕作栽培的植物，而且

1 译者注：主掌稼穑的土神。

探明植物的疗效功能，这也是他的死因，正是因为品尝那致命的草药而中毒身亡。因此，神农代表了从采集野生植物阶段，过渡到农业开始阶段。根据传说，他出生在安徽北部、今天的淮北市附近的烈山山区。这是在新石器仰韶文化地区之东，而伏羲和女娲的出生地，推测为新石器仰韶文化地区之南，长江之南，今天的湖南和江西省。正如一些现代学者们所推断的那样，他们是那里苗族祖先们的氏族部落首领。而今天，苗族是中国南方较大的少数民族之一，拥有 500 万以上的人口。

这些传说故事与考古发现之间的关系，可以总结如下：伏羲和女娲，代表南部和沿海“进化的渔者”的文化；而神农，也许代表了中部地区的文化。两者皆始于公元前 7000 年。

另有惠赐的一副公牛头、却具有人身的帝王，又称“炎帝”。作为掌管火的大师“炎帝”，始制耒耜[1]，教民务农。他发明了烧荒，即以火清除丛生的杂草以便种植庄稼的技术。这样做，使土地含有丰富的草木灰（碳酸钾）。他接着还发明了犁地，以使草木灰充分融进土壤。[2]

沿着这个传说系列的下一个人物，是西北姬姓部落的首领黄帝。上面所描述的三个人物，几乎全部被描述为十分平民的势力。黄帝，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组织了复杂和缜密的体系，大臣们辅佐管理这样一个秩序井然的机构。据说，出身于游牧民族的黄帝，打败了神农的儿子蚩尤。他谴责蚩尤是个愚蠢的、做尽坏事的人，是“第一个破坏了秩序的人”，第一个叛逆，也是武器的发明者。黄帝是首个建造宫殿的人，或者如其他文献记载的那样，他建造了第一座帝王府邸，一座祭拜高处的“神”——上帝——的庙宇。此外，在他统治之下，人民发明了制陶技术和战车车轮，以及养蚕术。在政治层面来说，传说黄帝是向四方拓展疆土最成功的一个人，取得了中国所有文化地区的统一。他将帝国的疆域，依据十进制进行了划分。重量和度量也是根据同样的原则制定的。他还是 60 天一个日历循环的创始者，其中 10 天构成基本单元，相当于今天的星期。更是这位黄帝，建立了宗教庆典和相应仪式，作为政府组织部分的复杂系统，以及某种敬神系统规则，这包括以上所提到的，建立祭坛和庙宇。[3]

将这些传说，与考古学发现自由地联系起来，我们可以说，黄帝的统治及其所代表的，包括他的若干继承者，直到大禹时代，一般意义上与龙山文化相吻合，不仅在其时间跨度和文化特征方面，而且在其疆土的拓展方面。

如此，这些传说，通过指向那些不仅仅是考古挖掘者所关心的物质遗迹的其他事实，为历史增添了色彩。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每一种原始资料，都未能对社会结构的研究提供结论性的证据，例如，证明母系氏族制的存在，及其统治的时间，这是学者们到目前为止，





图 1.2.2 神农，神话中的农夫，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参见三才图绘 1607/1609。

在这里，他被表现为是一个尝百草的专家，当他这样做时中毒身亡，为人类的利益而死

图 1.2.3 黄帝，政权的建立者，参见三才图绘 1607/1609。

在这里，他被描绘为带着具有后来皇朝所见的帽饰，并且在前面和后面都有珠帘遮挡

1 译者注：古代一种像犁的农具，也用作农具的统称。

2 校者注：原文这段话还是说的神农，估计原文作者相信将神农和炎帝混为一谈的神话说。

3 译者注：原文有关十进制的行政区划，译者删除，以免与大禹的九州分划混淆。黄帝自来被看成是华夏民族的老祖宗，许多事物的发明权都要归功于他，然而黄帝实际上大约只是原始社会部落联盟的领袖，处于血缘关系的氏族社会中。详参，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香港：中华书局，1990。

颇感兴趣达几十年尚未明了的问题。作为一个对这个纯学术问题更为原始创想性的贡献是，母系家庭体系，也许在村庄社会之中存在着，但是可能从未留下可辨认的遗迹。几个传说中的祖先们，奇迹般的出生传说，都未提到他们的父亲，似乎是对这种情形含糊的暗示。但是，在后来历代编年史中，包括了这些内容，是具有不同目的的。这种将“神圣的统治者”与超自然力量连接在一起的特殊纽带，目的是用于强调他统治的神圣性。

转向政治结构，正如在考古记载和在传说中所显示的那样，看来，古代神话中的文化英雄，伏羲、女娲以及神农，所具有的在文化上和技术上的意义，抬高了他们在原始社会中的地位。换句话说，他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几乎与社会政治问题无关。随着聚落密度的增加，各个氏族部落纷纷兴起，竞争新的疆域沃土，权力游戏便发展了。在一个部落中的优秀战士，会日渐突出，或英明的领袖人物，会建立一个更为永久的、超越其族人之上的地位。在这种情形下，也可能出现母权制情况，即妇女在其部落中作为领袖而起到重要作用。由于这种争斗，便演化出部落联盟，以及承认某一个部落中的杰出者，作为联盟的领袖，后来在传说中，这被夸张为黄帝建国，以及其权力扩张到大片领土的“历史传统”。然而，龙山文化的延伸，虽然带有地方变化特征，统一了这一广大的地区，却不含有国之存在的意义。但是，黄帝的名声，却给其子孙某些特权，所以，他们能够在几个地方成为地区的领袖，形成了一个统治家族的集团。他们选出集团中的一人作为君主，他可以在位长达子民们所可以忍受的时间，这位君主的作用，是解决子民之间的争端。这些黄帝的子孙们，成为了远古三个朝代——夏、商和周的祖先。在夏代建立以后，君主成为家传世袭，在邻近祖先的祭坛处，就需要更永久和复杂的宫室，这便是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雏形。

第 2 章　古代：城市的形成时期

2.1　青铜时代的初期

到了公元前 3000 年末，在新石器龙山文化的环境中，发现了一种用于制造器皿和工具的新材料：铜——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种金属。在很多年代中，它并未对文化环境产生太多影响，但当更进一步的发展使生产青铜成为可能时，这种金属的重要性迅速增加，导致了文化和社会，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转型。青铜，这种铜和锡的合金，被证明非常有用，可用来制造具有利刃的优良武器，如斧、锛、刀等，而且用途远大于石器时代石质和骨质的武器。新武器，导致了战术方面的很大变化，而且，在几位统治者的权力角逐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于是，兴起了一个新的政治体系，其最初的特征在龙山文化中已经成型，例如，具有相当规模的墙体环绕的村庄、具有坚固城堡的小要塞，以及社会层级，这在最后章节中，将进一步论述。这种变化，可能在中原地区首先发生，即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的黄河河谷地带。在此，考古学研究已发掘出了闻名于世的二里头文化层——一个在龙山水平层以上的文化层。二里头的最底层，正好在龙山层以上，碳 14 测定日期为公元前 1920 年 ±115 年和公元前 1900 年 ±130 年。今天很多学者支持这样的理论，在年代上，以及在其所假设的影响范围内各地域基址的分布上，二里头阶段归属于夏代，或者说，是夏代政治的物质体现。在二里头的第三个层次，碳 14 测定日期为公元前 1625 年 ±130 年，显示了在同样地区的商文化开始的痕迹，虽然直到公元前 1523 年，当最后的夏王——专制的暴君桀被彻底打败后，商才继承了夏而为新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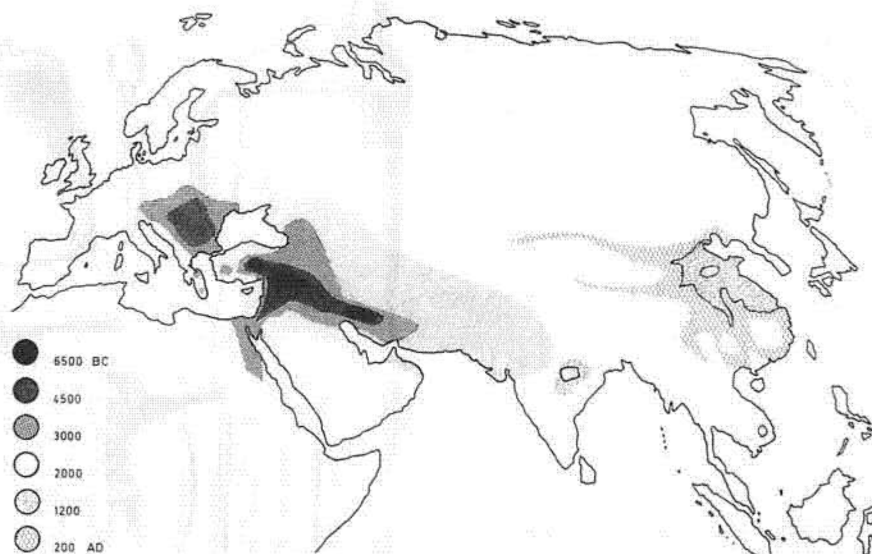


图 2.1.1　古代世界和中国冶金的发展，从公元前 6500 年到公元 200 年[1]。
关于冶金术的掌握是从最古老的中心传播到其他地区，还是冶金术在不同地区独立发展这样的问题尚不能确切回答。冶金术在中东和中国的开始时间，超过 4000 年的时间跨度，这一情形证明了传播理论，但是很多细节又指向了独立发展一说

1 参见 Noel Barnard and Sato Tamotsu, Metallurgical Remains of Ancient China《古代中国的冶金遗存》, Tokyo，19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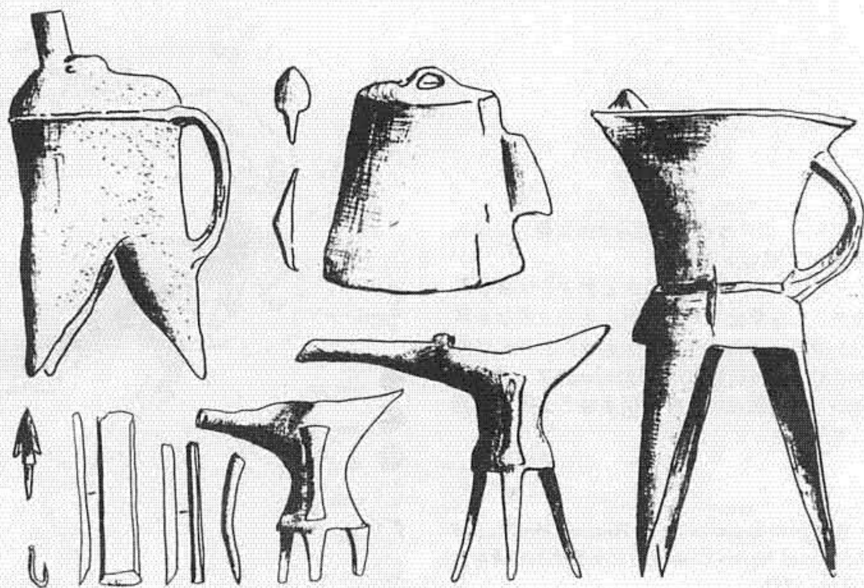
2.1.1 二里头：从龙山文化到商文明

在洛河以南和洛阳城东几公里的偃师县二里头小村中的发掘，展现出了龙山环境下的青铜用具，例如，斧子、凿子、箭头镞、镰刀和作为非常特殊的人工制品的一个青铜钟和一些小的礼器类型，诸如著名的“爵”。更为重要的是两座宫殿或庙宇建筑，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个同类建筑的发现。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发现。它们属于第三层，可推测是商代以前的，而其中所有的重要青铜制品都被发现了。二里头遗址的四个层积覆盖了整个夏代，甚至涉及商代初期。在最底层，龙山文化依然是基础。看上去这个遗址经历了所有的过渡期，或者甚至是所在地区中，创造力将过渡历史前推的主要地方之一。证据似乎是青铜技艺，玉器制造，以及建筑方面的进步，到目前为止，仅在这一区域中发现此类建筑痕迹。

在二里头所调查发现的聚落，被描述为由几个部分构成。在聚落中心，有一个大台子，100 米 ×108 米大小，夯土坚如石头。在这夯土台上，第二层台子形成了一座建筑的基础。这座建筑，有大约 360 平方米底层空间，给人深刻印象，是中国最早具有这种尺寸的建筑。它由一个大合院组成，内部沿外墙的空间有顶覆盖，在南部墙上有一个大门，一个升起的大堂坐落在合院北部。紧邻的第二个像宫殿一样的建筑已经发掘，尺寸略小，73 米 × 58 米，但有同样的布局。此外，距那座大合院约 50 米以南，发现三组 11 座带有夯土基础的小房屋，长方形，具有 60 到 80 平方米的底层空间。在四周，有 260 个储藏窖、3 个制陶窑和 2 口井，也发掘了一些原始人墓葬，一处墓葬中发现了上面提到的青铜钟。其他一些没有殉葬品的墓穴，表明了死者明显是作为陪葬下葬的，有的断肢、有的缚手、有些大概是活埋，是与某种仪式相关的祭祀品，并且肯定是在层级社会中的地位低下者。某些地方的黏土熔罐和模子碎片及青铜块，是青铜铸造业的表征；骨质碎片和半成品的人工骨制品，表明了骨工艺作坊。最古老类型的甲骨被发现了，例如，牛和羊的肩胛骨，有被烧的痕迹，但没有镌刻的痕迹。近来，在第三层发掘的青铜器皿——“爵”——被认为是盛酒用的器皿。就像在两座合院中所见的那样。虽然聚落结构作为一个整体依然有待核实，但毫无疑问，这座二里头遗址，是中国文明最早和最重要的历史城市聚落之一。它更可能是一个时期或另一个时期的都城。然而，传统文献中仅列出了一些都城的名字；因此，这个都城的名字，就无法很肯定地确定。在文献中，大约留传着八个夏代都城的名字，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卷中提到其坐落位置。其中，二里头遗址，看上去，可能是较早的都城坐落位置之一。然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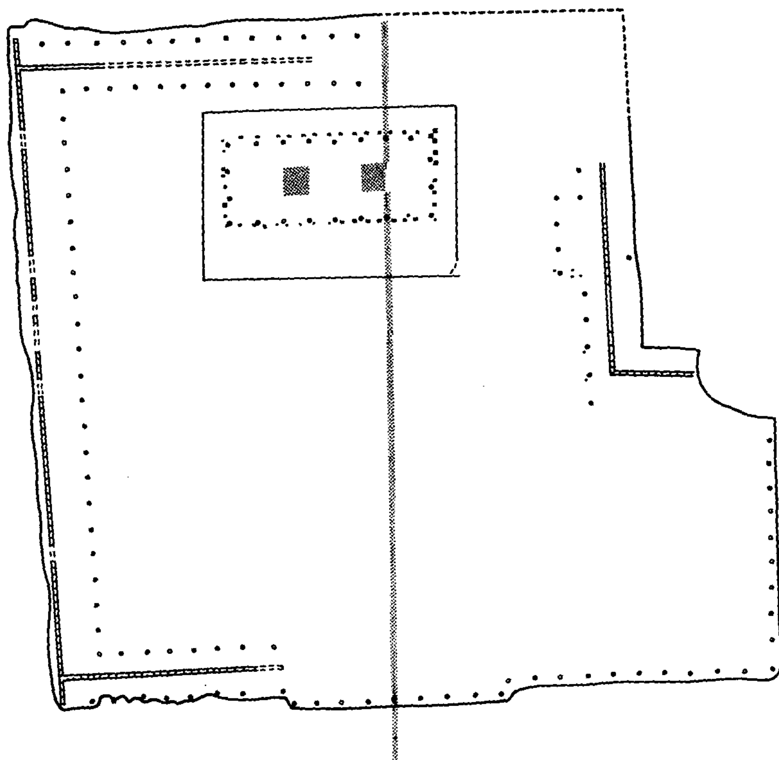
图 2.1.1.1 中国冶金第一批成果，公元前 2000 年初[1]。

河南洛阳以东几公里的偃师县二里头发掘的青铜器皿，其中绝大多数作为仪式之用，日用青铜器具和钟。三足鼎用作祭奠时盛酒器皿，而青铜钟是新发明



1 参见发表于 1959 年《文物》和《考古》上的各种发掘考古报告。

图 2.1.1.2 二里头宫殿、庙宇基础（一号），河南偃师县，公元前 2000 年，比例 1 ∶ 1000[1]
可以辨别出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在主要的轴线上，建立了双祭坛。不规则排列的柱子支撑屋顶。
第二阶段：在西边加了一个延伸部分，柱子非常规则地排列着，从而形成了两个双生祭坛或双个庙宇，布局就院落来说是不对称的。院落中回廊的柱子是依据北墙和南墙排列的，但不是在东部和西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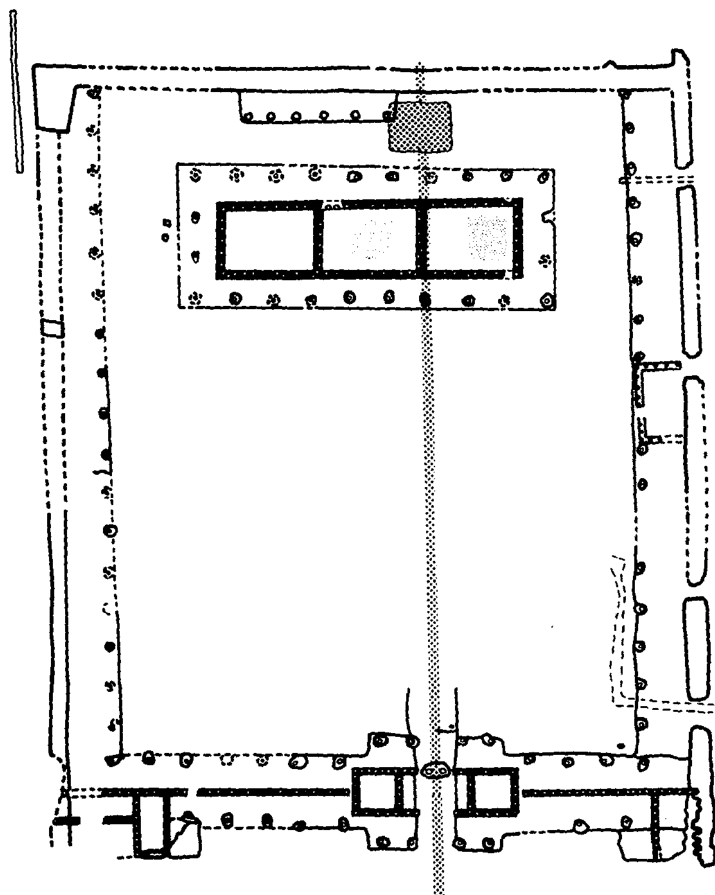


图 2.1.1.3 二里头宫殿或庙宇的基础（二号），河南偃师县，公元前 2000 年，比例：1 ∶ 500[2]
这个建筑物，看来经过了仔细规划，但依然可以辨别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一条中轴线穿过主门直指北端墓穴。在墓穴前方的南部建立了双祭坛。
第二阶段：覆盖祭坛的建筑，向西方延伸，这样便形成了有三个部分的庙宇、宫殿。院落在其西部增大了，但建筑物不再坐落在主入口轴线上，而在南墙之外的边缘建筑，却保持了对称外观

1 参见《商州考古》，北京，1979。
2 参见《考古》198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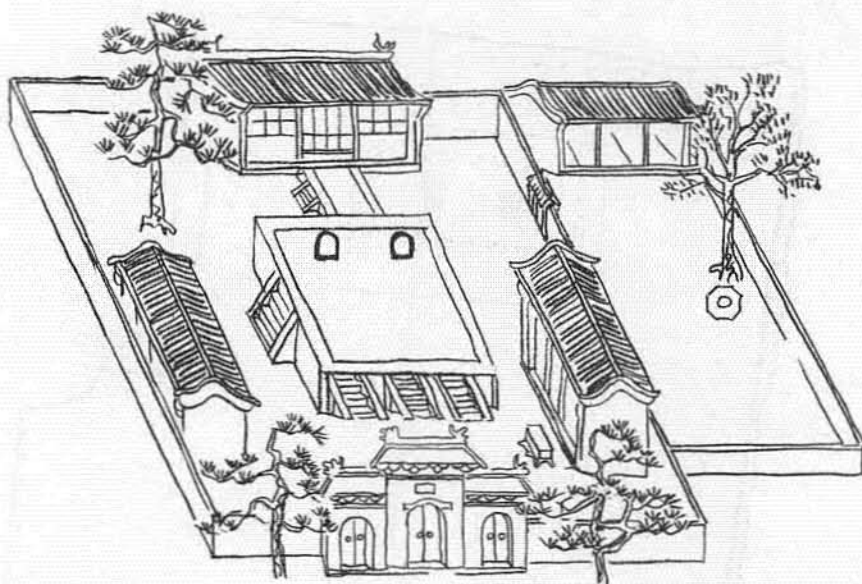


图 2.1.1.4.5 山西浑源在公元 18 世纪的一对祭坛实例，参见 1763 年地方志。两个祭坛建筑都坐落在城市西南城墙外

图 2.1.1.4 为双社稷祭坛

图 2.1.1.5 两个双祭坛，右边的是神农坛，左边的是山川坛、风雷、雪雨和城隍、堰堤和壕沟

图 2.1.1.6 有居室和客厅的双房。参见东汉墓葬装饰，山西，公元 1 世纪和 2 世纪。正如在这一章和下一章中将论及的，公元前 2000 年的很多大型建筑物，是以偶数开间建筑起来的，在中轴线上立柱，而将空间布局分成相等的两部分，一种双生的布局形式。然而，这种概念渐渐消失。随着公元前 1000 年初期周代的开始，大多数建筑物具有奇数开间，中轴线上的开间取代了柱子，并成为建筑的主要入口。这个东汉墓装饰的例子，显示了也许为特殊使用目的而遗留下来极为罕见的双房一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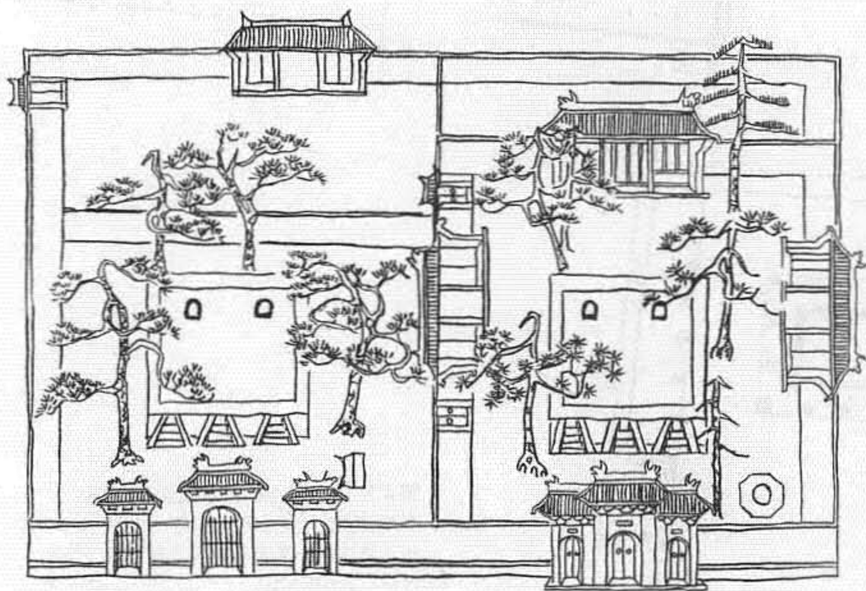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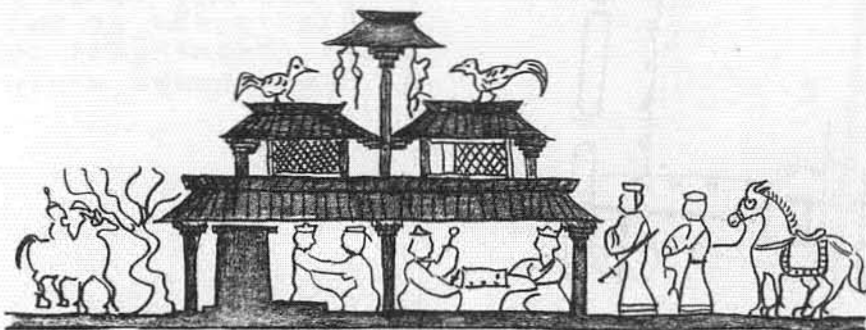


图 2.1.1.7、8 北京先农坛中的双祭坛。[1] 中国本土宗教发展中，最为古老的宗教元素之一，是土地神（社），在代表土地的神圣之地、在有水滋养的地方祭祀土地神，"社"，首先在一个五域神集体庆典上得到祭祀。所有神祇都是匹配的，例如，高山与深林，河流与湖泊，高原与山丘，堤与渠，源泉与沼泽，"社"与五谷神"稷"相合，这两者，成为与农业神有关的两个匹配的神祇[2]

图 2.1.1.7 明代，只用一个祭坛，祭拜两个神祇的做法

图 2.1.1.8 清代，每个神祇，在一个共同的建筑体中有其各自的祭坛



1 参见"北京的坛庙"-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 3 卷，第 5 册，Chinese Engineering University，1935。

2 参见 C.B.Day，Chinese Peasant Cults，2[nd] edition，Taipei，1969。

到了第三层和第四层，都城可能坐落在其他地方，而二里头遗址，虽然繁荣却不具有帝王宫殿地位。它大概被用作一个重要的宗教中心，与时间赋予的宗教仪式密切相关，是围绕洛河—伊河的人烟密集区域，即传统所说的夏墟一带的自然中心。这可能解释了为何还未发现堡垒、要塞，而在其他地方，城市聚落的主要特征是城墙。[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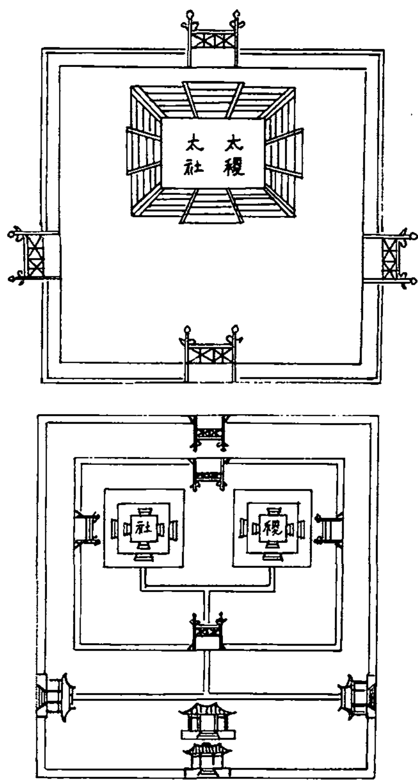
有着堂皇建筑的两个院落，在此文脉中，也许不得不被解释为是庙宇而非宫殿。至少，那个较大建筑物的情况可能如此。主要建筑物平面布局支持这种解释。柱基孔洞的位置，暗示了双祭坛的存在，有顶覆盖但是无墙的开敞大堂不适于居住。[2]那个小院落，可能是宫殿或是庙宇，具有后来若干世纪里一直流行的典型中国式样。在两种情况中，正如那种正式而对称的平面布局所表现的那样，这些建筑是为祭祀更高的神祇，以及与帝王及其祖先相关的事项举行庆典的地方。[3]将二里头与已经提到的在河南省近淮阳县的平粮台以墙环绕的聚落，以及距二里头东南大约50公里的登封县王城岗相比较，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观察到，权势统治者设防的场所与宗教中心开敞的聚落结构之间的区别。特别是王城岗，具有与二里头院落同样的规模，是可用来比较的很好例子，因为，传统上也将王城岗与夏代相联系。

文献资料方面的证据，如在《书经》中所发现的那样，宗教中心，某种程度上是由其神圣性来保护，甚至敌人都尊重它。每场战争过后，胜利者，将那些被征服了的民众，安置在庙宇和祭坛附近，使他们继续对祖先和土地神膜拜祭祀，确保五谷丰登。二里头也许是具有这样的宗教中心的首例，它以一种城市聚落形式出现，仪式建筑代表了一部分高度复杂和完好组织的宗教体系——政教合一，并由帝王和他们的御用巫师维护。

二里头阶段，可能正处于这样一种时期，其中的宗教中心，作为王朝统治下的层级社会复杂的社会政治结构中的一部分而形成。二里头阶段，可能正处于这样一种时期，其中这些宗教中心，对举行与神圣王权概念的发展紧密相连的仪式庆典表演十分必要。这一神圣王权的概念，在中国大约4000年的历史中，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首先用于与古代夏、商和周三个朝代相关的事情，形成了后来超过2000年皇朝制度的基础，一直延续到20世纪开始。中国的每一个皇帝，不管他是当地的统治者，外族征服者还是起义造反者，都欲象征上天之子。

2.1.2 从神圣之地到仪式中心

对半坡新石器村庄的描述，因考古学家的复原而成为可能，但同时应该结合考查这些早期村民的社会组织。在研究由古代诗歌总汇《诗经》传承给我们的早期中华文明的诗歌时，曾经有过这样的尝试，即将《诗经》与村民及少数民族流传下来的习俗相比较。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应该选择两个主题，附加到考



1 译者注：从传说中夏代的地望，配合二里头遗址有大型公众礼仪性建筑，中国考古学界遂将遗址当作夏文化的所在——相当于夏代的王国都城，其实考古数据本身并没有直接证明这一青铜时代初期的城市即是夏都。

2 译者注：也许是墙倒屋不塌。

3 杨鸿勋先生认为二里头遗址 f1 是宫殿，f2 是宗庙，参见杨鸿勋，“宫殿考古通论”建筑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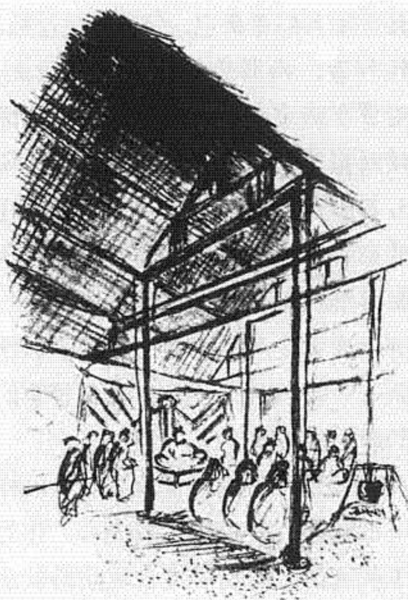


图 2.1.2.1　仰韶的大房子：内部的复原图，展现了令人难忘的尺度（作者速写）

古研究的结果上。其一，涉及村庄中心的大房子；其二，涉及神圣之地的意义。这些，只通过考古挖掘是不能追寻到的，而对于理解社会组织和聚落结构的特征极为重要。重建如下（参见 Marcel Granet）：

农民们，他们整个夏天在田里劳作，在收获结束后聚集在一起度过冬季。因村里的房屋全属于妇女们，男人们共同拥有一座房屋，就是大房子。各种仪式依然为保存那些记忆。依规定，丈夫在女人分娩期，必须回到大房子里居住几个月，主要在冬季。如果受孕期发生在春季大约春分时期，婴儿将会在大约冬至的时间降生。那时，男人们在他们共同的房屋，即公共大房屋——半坡中这象征性的大房子里聚集。他们在冬季初始，就已经搬进去居住了，庆祝适时的传统驱魔节或耐寒节。男人们，在无聊而漫长的冬天里相互陪伴时，他们举行节日庆祝：

“九月肃霜，十月涤场。
朋酒斯飨，曰杀羔羊。
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国风 · 豳风 七月）

当人们再聚集在公共大房屋时，更加认识到了女性的本质。

“傧尔笾豆，饮酒之饫。
兄弟既具，和乐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兄弟既翕，和乐且湛。

死丧之威，兄弟孔怀。
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雅　小雅　棠棣）

冬天的节日，开销增大，构成了竞争，对于男性等级制度的形成是有益的。男人们，饮酒，吃饭，尽享丰收果实：来年的收获一定更丰硕。这喧闹的宴会，是头等的秩序，能够帮助男人们彼此鼓励，对个人的劳作手艺充满信念，并且勇敢地度过冬天那恶劣的日子。在冬季节日中的主要角色，由男性老者邀约自然，男人们适时地退隐、冬眠，这是春天再生的必要准备。身穿丧服手拿家什，老人将这一年带入终点。冬季，这无生气的季节仪式，由老年人的节日开始。

相反，新春，由年轻人举行仪式，以乡间的集会仪式和婚礼作为开始。熟知的仪式，依旧述说着春的节日，而“女孩和男孩们，在人群中欢庆”，接下来便订婚了。只有通过两性结合的力量，才能唤醒生命，只有年轻人的节日，能够唤醒春天。

山和水，在中国人的公众信仰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远古，山水就是祭祀的对象，“山，林，河，谷，丘有着创生的力量，产生雨和风；它们是神，产生神圣的力量。”

婚庆典礼，在美丽的山水、森林和湖泊之间举行，那种原始的创造力量——阴和阳——以自然的每一特征呈现出来。这些地方，与家庭占有之地和景观中尘世使用之地，相互分离。此时，这些地方，又立刻变得神圣和崭新。之所以神圣，是因为自远古以来，祖先曾经在那里开始了社会的、两性的生活；之所以新，是因为如新生儿一样，充溢着春天般创造性的生命。在这里，

年轻人联合起来，以这些节日习俗，以他们所能追求到的最完美的方式，与他们部落神圣之地中鼓舞人心的力量——他们的祖先相亲近。在这里，他们感受生命的力量，代代生息的力量，并传达着这种真正的、永恒生命的情感。

冬至时，为春天而准备的最重要的节目之一，就是半裸身体横渡河水，迅速地到达田间目的地。接触清冽流水，令人瑟瑟发抖，女人们感到她们好像被流动的灵魂沁润透了一样，这流动的灵魂，就是她们已逝的祖先，隐现在黄泉深处，此时，河水流淌出来，灵魂释放出来，附着在新一代身上。

中国最古老的神话之一是牛郎织女，两颗被银河分隔的星座，被认为是夫妻，然而一年仅能相会一个晚上，只有在织女得到王母娘娘的许可后，跨过银河得以实现。

正如以上所提，传说中的女娲，创造了适当的婚姻秩序，据此，只有来自不同家庭，具有不同姓氏，或者出生于不同地方的人们，才能彼此婚配。就是说，她建立了异系婚配规矩。这暗示了，在神圣之地举行的节日，是由来自不同家庭的人和不同村庄的人一同参与的。接下来的婚姻，不但建立了家庭，而且将各个家庭聚集在一起，形成大的社会单位，就是"家族"，神圣的地方，形成了他们和谐地创造生命的中心。

传说，夏代的祖先，是两条争斗的龙，由此产生出泡沫，其中，夏代的第一批成员出生了。为了争斗，他们选择了两条春汛时泛滥的河流所形成的沼泽地带。河流交汇，一种两性的争斗，将两条水流融合一起的两个河神，被看成具有不同的性别，也是异系婚配的表达。春汛时期横渡河水，人们相信这是在模仿竞争的龙，最终达到联合，并继续流向下游。这种信仰流传至今，在赛龙舟的竞赛中有所表达。水流的汇合处，实际上是神圣之地的一部分，古代村民宗族的宗教中心。而当潮汛退去，河水冲积而成的平原，是最肥沃的地方。这里，根据在田间工作的家庭数量，每年春天，重新划分田地。所谓的"井田"制，也许从这些情况中产生，下面我们会再回到"井田"制的讨论中。

总结一下我们对于"神圣之地"的描绘，必须谨记的是，这不仅仅指在一个国家适宜部分一处适宜的场地。在中华传统中，神圣之地的观念，保留到今天的风水术之中，也就是在风水术中所描绘的那样：在一个真正的地方，有一抹神秘的光触及，是如何这样神秘？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山美，水美，太阳美；微风轻拂，天空中有一抹新的光芒：另一个世界。在混乱中，有着平静祥和；在祥和中，洋溢着节日气息。进入到这样的所在，人的眼睛就睁开了；坐在这里，卧在这里，心中充满了喜悦。在这里，聚



图 2.1.2.2 河南偃师县县城附近伊水和洛水的汇流处（从东边望），其城墙可以在右边看到，淹没于春汛的河水中，就是这个地区，孕育了新石器聚落神圣之地的"夏墟"，二里头坐落在背景中伊水湾的内侧；汤王的商城坐落在偃师城墙外洛河北岸的这一侧，而洛阳在洛河之湾，在右侧的背景之中，也在北岸。三个朝代的都城古迹在照片中依稀可辨（由 Count Castell 在 1930 年初拍摄）

气养神。光明闪耀，神秘四射（shen，1652）。而另一种文献这样写道：本质上，当山与水相合，就像男人和女人相伴，他们相互融合，形成了一种局面，就是神圣之地。山和水是男性和女性，基本的解释是性别的，而“男性（阳）”和“女性（阴）”应用于很多事物，如果女性和男性不相合，那么阴和阳就不相配，这个地方就一边倒地呈“阴”性或“阳”性而缺乏生气。而正如所有的山峰、森林、河流、山谷、高地和丘陵，如果形成一个和谐的一体，就有力量产生生命，它们就被说成是“神”——神圣的力量——这些元素在一起再现了和谐的宇宙。

我们可以把在古代节庆的诗歌中所表达的人与自然的概念，与考古学命名的仰韶文化时期相联系。但是，随着新石器后期，即闻名的“龙山文化”的上升趋势，文化的环境变化了，正如我们上面所提到的、黄帝传说中所具有的战争般的气氛，在考古发现中是十分明显的。我们也许很难知道，是否有外族及游牧民族入侵，并将他们的习俗带入中原，并强加在被征服的民众身上，或者，是否在社会政治框架中，因本土的变化转移而带来了变化，或者是两者的相互结合。

几种传说和后来若干世纪中的文献记载暗示，在涌现新的权力结构的顶峰，有两个重要人物：君主（后来被称为“王”）和他的主要助理（后来被称作“宰相”）——第一个辅佐王的贵族。看来，这些主要的助理，就是我们所称的地方领袖。出生于其子民的神圣之地和春节之时发布的告示，体现了他们是祖先的转世灵魂。这通过他们母亲，由某种宇宙中代表神圣之地的神化力量，而灵验显现在其身体之中而降生。这些超自然力量，可能是彩虹、闪电、天体之外降落下来的果实，或者“蛋”，[1]或其他。他们后来在兴修水利、划分田地、疏通水渠这样的实际工作中，充当领袖人物，或者充当巫师，负责适宜的礼仪，以及为庆典组织的表演。大禹的故事，非常鲜明地表达了这一功能。然而，后来他也继承了“王”的地位。这也许已经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最后阶段有所体现。

在另一方面，“王”已经承担了神圣之地的尊严，并具有了魔力。因为神圣之地，是一个具有无限财产的守护力量。农民们节庆之地的神圣尊严，传给他们的王。他以个人名义将其整合；他成为了这个神圣力量的化身。事实上，是非个人化的，他索要的是，地区的敬意。后来，他物质化地接受了一个高度层级化的社会祭祀。在那个离群隔居的年代，当男人和女人们形成密切的小团体，这神圣之地，被尊为最关键的盟约守护者，充当了一个部落首领神圣的一面，这个角色，后来实际上由“神圣之王”所施行。他死后成为“神圣的祖先”。结果，一个农业社会的神圣之地，在后来成为了一代君主的祖先中心。

因此，这两个人物的作用逐渐演变。宰相，在公共大房子中，施行长辈的传统并组织工作，承担了萨满巫师的任务，安排节日并监管社会规则和仪式，作为和平的保持者而出现。“神圣之王”如同“神圣之地”一样，占据着天地之间的位置。那里，天地之力，即阴阳，和谐地联合。即使源于母系祖先的男性优势被建立，首领或领主，依然具有双重的威严。他的力量，延伸超过那种形成宇宙相互对立的力量，如：阴和阳，天和地，水和火，雨和旱。但是必须用最为严酷的牺牲，来集中他的威严。这些牺牲，建立和维护了他与宇宙力量的关系。他必须保持由此产生的和谐与合作。

既然，构成神圣之地的所有特质都是“神”，也就是宇宙的神圣力量，那么，土地和谷物也是“神”。在所有的是“神”的物体中，“神圣之王”与人，具有最直接的密切关系。为了确保繁衍力，他们必须娱乐，这又赋予自身更为显著的人格，必须设置一个特殊的地方，来与他们直接交流：

“九月肃霜，十月涤场。
朋酒斯飨，曰杀羔羊。
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国风 · 豳风 七月）

这首诗可能表现了第一个祭坛的出现，是为土地神和谷物神放置仪式所需的牺牲而准备的。土地神和谷物神，非常像一对祖先，可能是夫妻。这水平的祭坛必须是清洁的，这样，祭酒及贡器，就可以毫不困难地被置于这些神灵之前。

这段描述，适用于上面所提的

1 译者注：正如国家大剧院的造型——外国人将这来自远古的诠释，又还给了今日中国。

二里头大型合院。大概在发展的后期，当有屋顶覆盖后，那些柱子，被调配到祭祀双神的双祭坛。当周围聚落的规模增加了，院落围绕着祭坛而建，创立了一个有别于周围世俗环境的神圣领域。

朝代的王系，一个接一个地建立起来。他们成为以下几代的祖先，而且，他们的居所成了令人崇敬的地方，用来表演、祭祀祖先神灵，也就是为以前的"神圣之王"举行神秘仪式。这个观念，就是将神圣的力量，不间断地从一代传承到下一代，并确保这继续不断的、对祖先神灵的祭祀，能以积极的影响，保护子孙万代成功。此外，它还强化了统治家庭的合法化，并维护了其权力地位。

二里头的第二个合院，似乎已经是这样一个地方。在此，以前的统治家庭的居住地，也许已经成为了一个宗庙，即夏代的宗庙。与第一个合院形成对照的是，前者只在中心有一个屋顶覆盖的平台，而第二个合院的中心，有一个完整的、带有三间有墙围绕的房屋。中间是大堂，大概供有祖宗牌位。此外，围廊部分，也以墙划分为生活和贮藏之用，而南部前面的墙，开有两边各有房间的大门，每边的外面，有更多的、带有房间的外部围廊。在主体建筑后面，一个大约 5 米 × 5 米，相当于 25 平方米规模的墓地，被发掘出来，并被认为是一座商代墓葬，可能是一座宗族墓地，是整个建筑群体的神灵中心。

在有类似这样建筑物的地方，被称为亳，意味着举行祖先庆典的地方，在山东省的西部（编者按：原文如此，应为河南省的东部）、商代的第一个帝王住所，叫做亳，后来，在这个朝代统治时期中，很多地方被称为亳，永远表示祖先崇拜的地方，但不必是帝王的都城。在任何情况下，这些地方是仪式中心，而且，也许是以前这地区备受尊重的部落和人民的神圣之地的延续。而皇家的宫殿，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改变着地点，大概挪到早已确定的神圣之地，却未必总是建立新聚落。当皇家宫殿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时，"神圣之地"保留了旧功能。农民们节日庆典的庄严之地，沦落为新来的王与首领之地，乃至其住所和宫殿。在此"神圣之地"的领域里，围绕着祭坛和大堂，滋生出一个聚落，因此，神圣庄严性，与"王"之个人以及他的宗庙和社稷之坛紧密融合。最后，祭祀中心被选定，并与随之的城门和壁垒相结合，似乎成为朝代的坚固堡垒。然而，就像我们已经在二里头的聚落结构所见的那样，这并非规则。因为，像这样的祭祀中心，不需要城堡和城门的保护。在商代，也有几处没有城堡的例子。它们很明显地是非常重要的祭祀中心，也被认为是王室宗庙，作为与帝王宫廷和政权紧密相关的一些贵族家庭的生活之地，后来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聚落，这也将我们带入一个史载时代。

2.1.3 朝代政权的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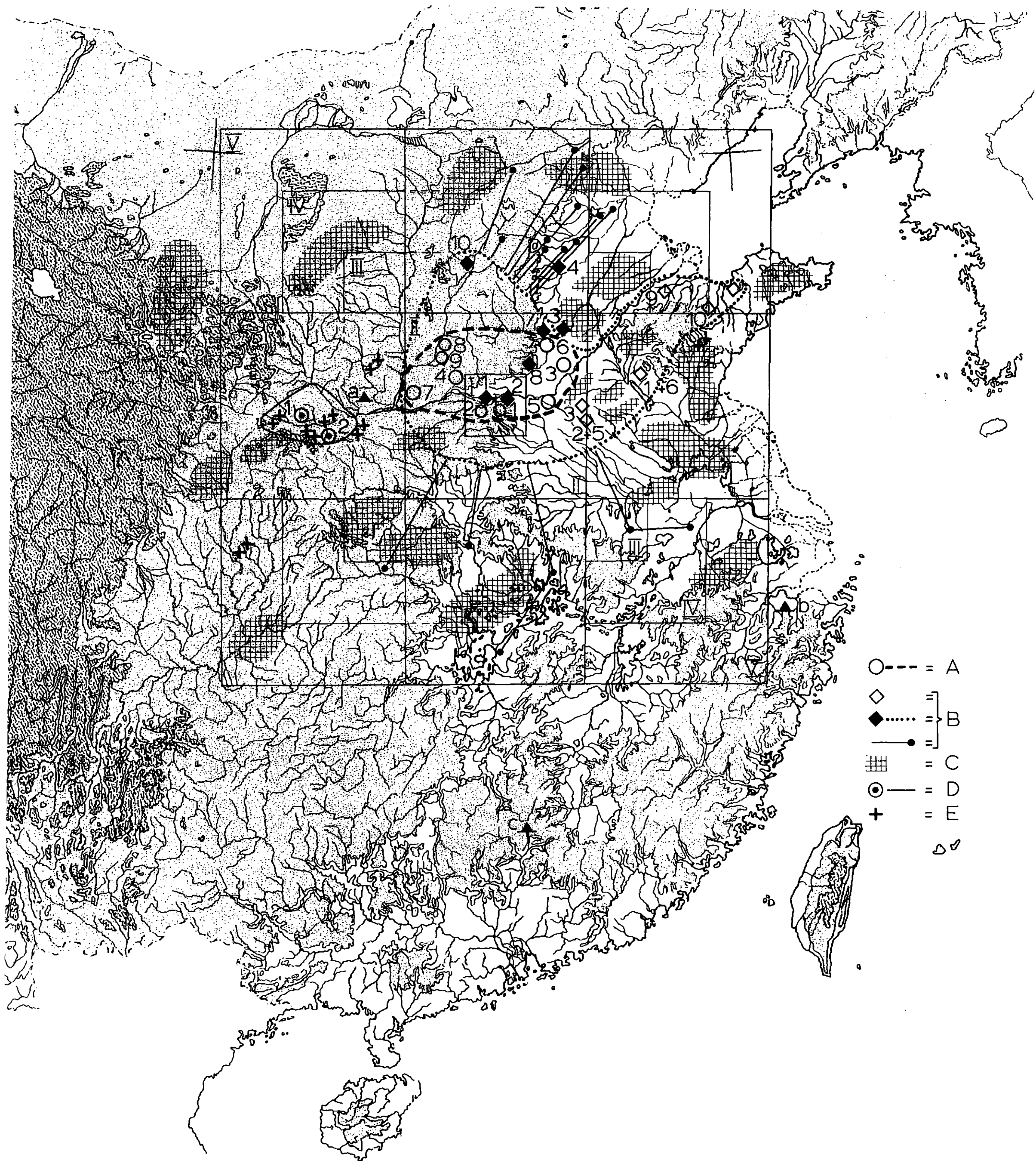
君主制的起源，淹没于史前期的混沌之中。但正如我们所见，随着黄帝的出现，它重现于传说的传统中。黄帝及其所代表的形象，表现了"帝王"的类型，也是中国历史中，政治结构的主要部分。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的人，会认识到，传说中的人物越遥远，其在传说文集中的故事成型越晚。大禹，在公元前 1000 年早期文学的开始部分就几乎出现了。在他之前的黄帝，大约在 7 世纪之后的文学著作中才出现。紧随其后的是，更为遥远的神农和伏羲。然而，在公元前 14 世纪的甲骨文中，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可靠的证据，证实了商代统治者的名字。在那个时候，"王"，已是一个既成事实，并被数世纪的实践合法化和神圣化，未受到质疑。惟一的问题是，这些帝王封号真正属于谁，谁有资格继位。为了减少对历代统治者的威胁，世袭制基本上是以父系继承规则制定的。这样，王权，就可以在同一家谱中，从一代传到下一代。但是，这一规则几次受到挑战。而且，在古代，有三次，挑战者成功地缩短了这种世袭线，而建立了一条新的线索，就是将王室体系纳入到自己的家族，由此建立新朝代。夏代被商代推翻之后，商又让位于周。而周最后又被秦所灭。其中，朝代统治的最为重要的结构性元素之一，便是等级系统中完善而严格的层级社会。从朝代王室下至不同层级，有着自上而下的绝对权威，这种层级组织与军事组织合一，而且同出一辙，纯粹以武力征服人民。正如在龙山文化背景中所表现出的，

这种层级的第一征兆，暗示着不同的武力入侵农业聚落区，征服了原先几乎手无寸铁的村民，并建立了严苛的征服规则。这不一定完全是异族人的入侵，也可能由于他们自己的一些灾难的驱动，如自然灾害或生产资料及其他生存手段的丧失，以到别处寻找供给，或者通过武力，从那些不愿与他们一同分享这些资源的人们那里掠夺过来。

假如这些武士们，是技艺娴熟的猎者或牧者，他们也肯定懂得如何狩猎和牧养人民，这与绝对权力的基本原则相近。他们成功地征服了定居的村民，将自己作为贵族，建立在这些农者之上，将个人意志强令为“共同兴趣”，为此，那些被征服的民众只能屈从。在阶层的上层，是武士们的王，他成为了“神圣之王”，因为他的征服，使其占有了上述的“神圣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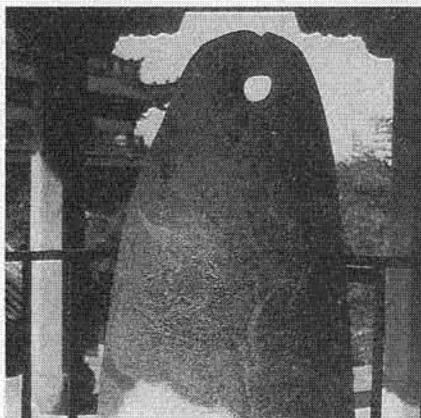
贵族与王室的生活方式相一致。祖先崇拜和大家族中的权力交替，成为了维持他们至高无上地位的根本。结果，贵族们环绕王室和宗庙而居，并且因为他们是惟一掌握武装者，因此，他们依赖战斗能力，以保卫自己并获得地位。战时，他们是技艺超群的战士，形成了王室军队的骨干。王的主要助理也许源于本土，具有农业生产定居生活方式的智慧，以及重要的巫术技巧，因而成为贵族的一员而非武士。他扮演着文明代理人的角色。同时，作为仪式的领袖和组织者，他控制着贵族们有义务参加的宫廷庆典，这占据了其文明生活的主要部分。大禹，最初就是尧和舜这最后两个传说中的统治者的主要助理。后来他继承了王位，并成为了夏代的建立者。他当时的主要助理伯夷，又同样被认为是秦代的祖先。作为主要助理，两者都非常成功，他们擅长水利工程，有效治理了洪水，后来都被奉为文化英雄。大禹的其他助手是契。作为黄帝的后裔，他们出生在神圣之地奇迹般的环境中。契后来被奉为谷物之神，稻谷之王，成了商的祖先。

王权统治的基本原则，来自和平的“神圣之王”概念，而主要助理的影响，肯定支持这种文化适应过程。但是，王的武士般难以驾驭的野性，他们生活方式的游牧性格，以及他们的贵族习性和狭隘的人生观带来的蛮横，在整个青铜时代的历史中是很明显的。在夏代统治的400年中，王室中心八次变换位置。在很多情形下，大概是因不断的战事。同时，商代的祖先们，即龙山文化地区东部的强势部落，也大约8次改变了他们王室的位置。在他们建立了商代以后，在直到公元前11世纪末的500年统治中，王室迁移超过7次。这期间总共产生过15个不同的聚落，平均每60年一个新的聚落形成。在45个统治者中，仅仅有3个留在了同一地方。《诗经》中，关于周代的颂歌之一，全面记载了夏代由公刘所组织的迁徙，大概发生在公元前17世纪。他从邰——如今被确定为是今陕西省西部武功县地区，迁移到名叫豳的地方——今陕西省的郊县和旬邑县，



= A
= B
= C
= D
= E





距省会西安西北大约100公里的距离。几代以后，古公亶父又迁回到渭河河谷，进入到环绕岐山的地区。因为戎和狄部落，最可能是游牧民族，从西北方向重压下来，迫使周部落为生存而溃逃。这一迁移，在《诗经》中也有所描述，在后面我们会有所见。公刘的迁移，是一种有良好组织的军事行动：然后，配备弓箭、盾矛、斧戟，他开始了长征。在做好准备（包括干肉和干谷）前不久，他衣装整齐，佩带玉杖和装饰短剑，当他到达豳的“百春”时，他寻找一个平坦的但是较高的地面安置人民，并在山谷之上的一个崎上建立住所。他的军队被分为三个部分，全副武装的贵族士兵们形成中部，而两翼由武装的普通士兵组成。他的王宫可能是一座城堡。在这一地带，他通过观察日晷晷针的阴影来确定四极方向；为了准备日历，他计算落日的缓慢运动；然后，他登上制高点，观测光和阴影位置，为了充足的水源而俯察流泉。

无论是豳地区还是前面提到的在邰的宫殿，都在夏的领土之外，这意味着，周部落在一般意义上是独立于夏的，既可能是盟友也可能成为敌人。商代之前的商部落，亦是同样情形，这个商部落，也迁移到了夏的领土之外。在河南省东部的亳成为都城之前，商王们已经在总共八个不同的地方建立了王宫。今日山东省的北部，当时被一些自认为是黄帝之子少昊的后代的强势部族占领。他们极有可能与夏的统治者是友好的。在困境时，他们在那里寻求避难。

大约有十个姓氏的宗族和三个以上部落联盟，坐落在从现北京到杭州的中国东部地图上，属于夏领土的东部和南部，还有两个以上的宗族姓氏，与强大的“三苗”部落联盟一起，被辨别出来。从这一点看，夏之领土的实际大小，似乎十分有限，而夏室宗亲和直接的追随者，必须非常艰苦地斗争，以保持他们的领地。他们至高无上的权力，也许仅仅建立在诸如大禹这样杰出的人物和先进的铸造技术上，以提供他们先进的武器装备。当他们在与其他部族首领及其随员进行战斗时，这些武器，有时给他们提供一些优势，但是，边缘地区的胜数总是不大。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大禹与三苗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持续了30年而未获胜；不能与苗太子建立正常关系，直到军队撤退，大禹表示了和平姿态。在战争之前，大禹曾经以一种傲慢的斗士语气说，“这个苗太子愚蠢，无知，犯错误且不值得尊重。”只是在他的宰相伯夷，以他所具有的地位和所能发挥的文明影响，提议展现和平姿态和文明举止，战士们才撤退。然而，还是以傲慢的语气，将所有不屈的人民称为蛮人。夏人过高估计、过度强化了自身的地位。正如《书经》中的、后来被认为是大禹所写的文献表示的那样。特别关于《禹贡》的章节，[1]高度夸张了夏的势力范围。然而，这一章，

1 译者注：写作年代不详，学界迄无定论，代表性说法大致有四：一，西周说；二，春秋孔子说；三，战国中期说；四，战国末至汉初说。其中战国中期说学界尊者较多。

不但是中国历史上，而且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关于地理方面的论述。它包括对中原大部非常有趣的描述。尽管并非所有信息资料可被证实，并与现代中国的很多地方相对应。

《书经》中的另一章，包含有中国王权政治结构的基本概念。虽然这是在大约1000年后所做的记录，它也许极好地表达了大禹建立中国第一个朝代的观念。[1]整个区域被描述为一个方形，4500里 ×4500里，以现代度量衡来看，大约500万平方公里。如果使用商代的度量衡单位来计算，只有一半大小，而覆盖了禹在他的地理论述中其他章节中描述的区域。坐落在这个方形中心的是帝王领域，一个大约500里 ×500里的方形；环绕着这个方形，宽500里的地带，构成了诸侯的领地；而下一个500里的地带是绥抚的领域；接下来是边远领域；而再下来最外面的一个区域被称为蛮荒领域。两个环绕中心的王宫内域，包含着高级大臣和官吏们的城市和地土，以及低级的公国侯国。作为外环，是各皇子皇孙的土地。第三环是教育域，由军事警戒线保卫着。而外面的两个领域，由部落和战犯们占据，离中心越远，部族越野。对于战犯来说，惩罚就越重。这种高度中心化的模式，是王权的理想。然而在现实中，这种聚落模式，从来也没有获得这种中心性，主要是因为都城的坐落位置不断变化，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在最后的2000年，在中国中部和东部，6个不同的都城位置，也在一个时期或另一个时期，作为帝王宫殿使用，还不算那些小的、地区性的、更为严格的、存在约8个世纪的朝代。

然而，中心的观念和由此而来的等级秩序，在武士出身的贵族性格中一直根深蒂固。在整个中国历史中，它在社会组织和文化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它是如此根深，以致无法想像还可以有任何其他观念来代替。然而，宰相作为神圣之地精神力量的后裔，在商代涌现的文化精神实质的发展中，是一个决定性的文明力量。他提供了为武士贵族等级制度和神秘君权实践仪式的背景和庆典秩序。通过他，在人民的神圣之地，为朝代的仪式中心，而产生出献给众神和皇室宗亲的祭坛和宗庙。

由于日益增长的君主力量，在贵族和百姓之间，出现了鲜明的区分。贵族，作为君主的附庸，过着完全由宫廷仪式或战争而非劳作的生活。他们认为田间人民是粗鲁笨拙的而予以藐视。因为，贵族们是根据“礼仪”生活的，这并不下传给百姓。后者是完全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的，那仅是“食肉”的差事。结果，仪式中心和城镇，发展为宫廷文化的一部分，然而，普通村庄依然处在这个过程之外。

夏代帝王宫殿中不健康的气氛以及武士贵族的傲慢，连同他们的自夸和诅咒，并不是教育一位英明统治者的适宜条件。在夏的16个王中，仅有一位被认为是英明的、值得被称为大禹的后代。在夏统治的最初200年中，大约100年是非常



1 在《禹贡》中记载了一种“五服”制 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艰辛的，而君主政权，几乎丧失给了一位起义者。夏代王室逃亡东部，在少昊的后代、大禹时代曾是友好邻邦的商王们那里避难。

商王之一，据说准备了马匹和马车。[1]后来，秩序重新恢复后，另一个商族始祖契，佐禹治理黄河水达24年。他们居住在商丘，他们王室的宗族祖先中心，被证实在河南省东部。那里，有一座现代城市，具有同样的名字，接下来的公元前18和17世纪之间的又一个170年里，是英明君主所统治的最为和平的年代，其中两位君主，加起来统治了有120年时间，其余的时间，由其他三位君主统治。这个时期的中间部分，由英明的不降长期统治，他将其权力范围，沿着黄河向北延伸，在公元前1695年，于西河之西建立了另一个都城。在这个地区，商太子们已经在公元前1755年建立了一个前哨基地，称作“殷”。此时，他们从那里，支撑不降与山西西部的原始部族进行战争，在公元前1666年，这支部族被商所灭。接着，在公元前1632年不降死后的那个世纪，夏的势力迅速衰退。这个世纪的三分之一，是由一个嗜血成性的暴君桀，颇具毁灭性地统治的。根据竹书纪年，他住在斟鄩，在洛河和伊河之间，在他统治的第三年（公元前1585年），他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宫殿。在他统治的第十年，“五个行星偏离了轨道”，“夜里，星星像雨一般地坠落，大地震动，伊水和洛水干涸。”所有这些事件，被认为是他覆灭的前兆和夏代的结束。他斩断了与商太子们的联系，而当商太子汤拜访他时，他将太子囚禁了1年。8年之后，公元前1557年，汤大胜了夏桀。但是，在他能够准备这一行动时，他试图使他的人民信服，这场与实际上是他的君主的夏王桀之战争的必要性，“并不是我，这个祖先的孩子，胆敢从事这个看来是反叛的营生”，汤对他的人民说道，“而是夏的最高统治君主所犯下的如许罪恶，受苍天指责来毁灭他。”但是，人们并未信服，他们说，“我们的王并没有怜悯我们，而是号召我们放下田耕，去攻打和惩罚夏的统治者……夏对我们犯了什么罪呢？”汤试图解释他反夏的行动，这可以轻易地解释为是他个人的野心，并以平和的方式来实现他的计划。但是明显地，他未成功，因此，他这样结束演说：“如果你们不遵从我所对你们说的话，我将你和你们的孩子置于死地，你们将不会得到原谅！”征服之后，汤的宰相伊尹说，“那么，尹和汤，都具有纯粹的德行，并能够满足上天的意愿。”结果，汤接受了苍天光明显赫的惠顾，而成为华夏九州民众的掌管者，继续改变夏的年号，他制定了新的年历。并非是苍天对于商的统治者有任何偏袒；苍天只是惠顾纯粹的德行，而并非是商寻求底层人民的忠心；人民仅仅是转向纯粹的德行。我们可以再补充一点，汤曾经威胁说要铲除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而这些人相信了他的话，当然就追随他了。

2.2 商代（公元前16世纪－前1046年）

商汤，继承了公元前1537年他父亲的封地，在亳建了宫室，学者们认为，这是在山东西部的一个地方。大约离商在商丘的部族祖宗中心以北50公里的地方。在他作为太子的第16个年头，他在山东西部与夏桀的战争中获得了胜利。在他胜利之后，他前往在河南中部夏代的社稷坛，试图将这个祭坛迁走，作为一个最终胜利灭夏的行动。但是，在这些神圣地方面前，汤改变了主意，取而代之是给这些祭坛加筑了屋顶，也即是说，他将社稷坛置于一座庙宇建筑之中，这被记载进《竹书纪年》中，假设这些社坛和稷坛，就是二里头的院落里发现的那些，也许并非没有道理。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和碳14测定的日期（公元前1625±130年）都表明，这是非常可能的。但这个地方是否就是王室斟鄩，不能很肯定，然而，这离那里并不远。新建立的商代都城，依然在一个叫亳的地方，并持续了若干代。汤成为了一代君主，公元前1545年，在他作为商太子的第29年、作为君主和受其人民拥戴的商王的第11个年头时，汤死在这里。因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朝代被灭绝，而被另一个所取代——意味着反叛的过程，仪典中不得不加上适当的礼节。因此，在汤作为君主的第九

1 在公元前1927年，根据竹书纪年，最早的涉及马匹和马车的文献，还未得到考古学证实。

个年头，他迁移了9个铜釜，并将它们安置在都城亳的商族宗庙。通过这些，商的朝代统治牢固地建立起来。这9个铜釜，是由大禹时代作为保持君主与上帝——高高在上的帝王——一种良好关系的主要仪式容器。

汤的宰相伊尹，是他母亲一方的亲戚。追溯伊尹的起源，据说是来自一棵桑椹树洞，在那里，他被汤母亲一族中的一个妇女发现。商族的象征，是桑椹树林，古时神圣的地方。因此，伊尹，是一个神圣之地的后裔，一个具有真正智慧的人，以及商族精神实质的保持者。他的文明影响，也许可在如下的语言中被认识到："如果我不能让我的统治像尧和舜那样(传说中的圣王)，我的心中便充满耻辱，就好像我在市场被鞭打了一样。"而商王继续道，"正如腿和手臂形成了人一样，一个好宰相塑造了贤明的王。"伊尹使他的君主生存，并作为汤的四个继承人的摄政者和导师。他也继续作为商王太甲的宰相。公元前1532年伊尹死后，他的儿子和孙子，处在像他一样的位置，直到大约1个世纪以后。那时候，商的太戊王在其长久和平的75年统治里，将朝代推向了最高水准。他是最后一个居住在亳的，然而，至于这个名字应用于哪个亳，观点并不一致。因为，自商汤时代，就曾有一个西宫命名为亳，大概坐落于河南省中部、现在洛阳城大约30公里以东的地方，在洛河的北岸，与二里头遗址非常接近。

2.2.1 商代初期（公元前1600–前1300年）

近期，发现了一个明显是重要城市的遗址，即西亳的遗址，这一点被很多事实支持，而且甚至被后来若干世纪出土于附近的文献所支持。如果是这样的话，商汤的故事，必须有些修正，比如，当他公元前1573年成为商的太子时，汤的第一个都城是位于河南的亳，在他家族祖上的区域。

当汤在公元前1557年成为商王和中国的君主时，他在夏故都附近，建立了一个新的都城亳，接近二里头。这个西亳，在公元前1548年，当九尊铜釜移往那里时，新的宗庙完工。从那时起，商的统治者，就居住在西亳直到公元前1399年，然后，中丁在近黄河的下游、嚣这个地方，建立了都城。在离西亳遗址不远处，直到今天，尚存商汤的庙宇和衣冠冢，还有他的宰相伊尹的墓。

考古学的调查，已经发现了城墙的绝大部分，也就是：西墙1700米长，北墙1200米长，东墙是弯曲的，并比西墙长，而南墙，已经被洛河冲刷淹没，城墙形成了一个大于2平方公里的矩形，并开以城门。其中，有7座城门还能辨别出来，东西各有3座门，北墙1座门，它们以街道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方格模式，在中心，留出了200米×200米的空间，为一层层的夯土，很明显，是为了宫殿群。大殿（no.4）占地32米×51米的面积，的确是令人震撼的建筑，升起在一个平台之上，通过阶梯和斜坡可达。这也许是商





图2.2.1 商代始祖汤和大臣伊尹（右）、幸求元圣图（视察农夫劳作）[1]

图2.2.2 伊尹作书图，虽然两字都用作为名字，两字都意为"他、官"，是官吏的原始称呼[2]

1 参见《钦定书经图说》，1906年。
2 参见《钦定书经图说》，190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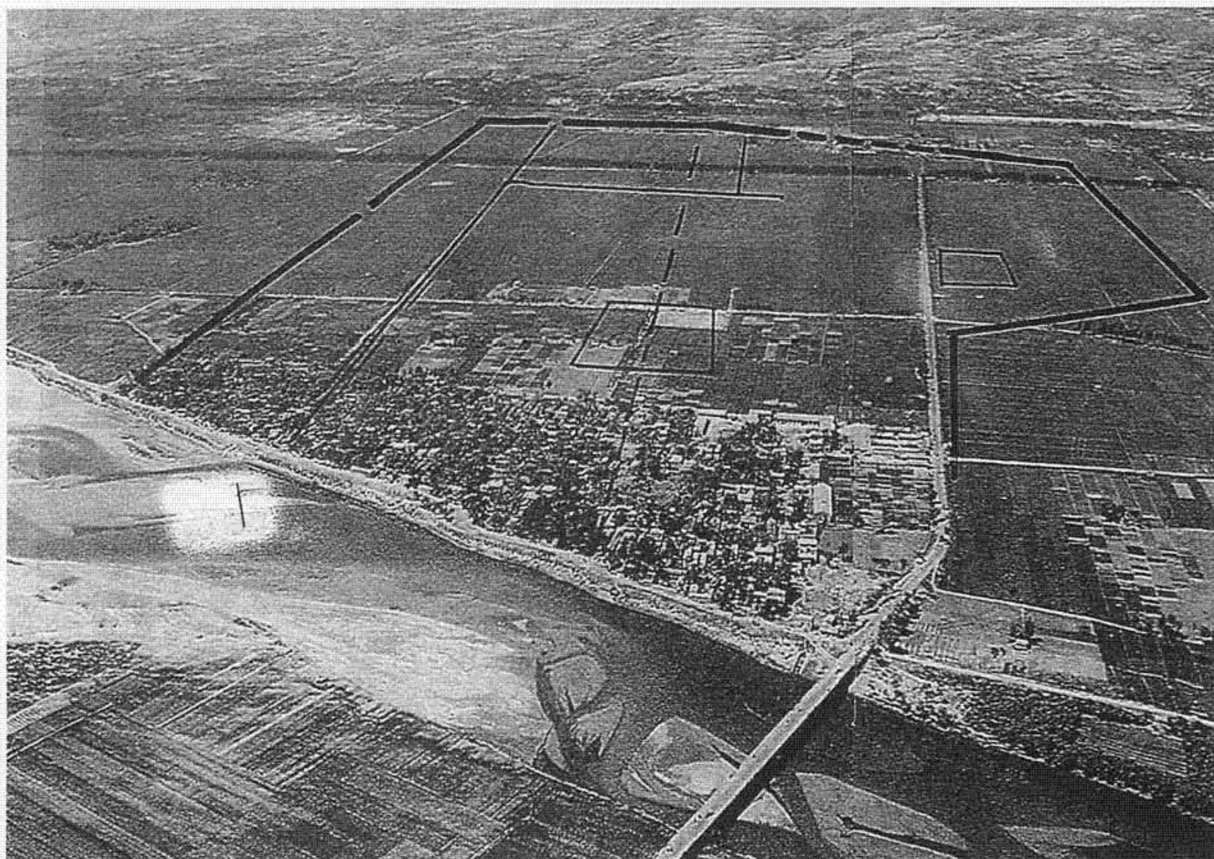


图 2.2.1.1 商代近河南偃师县西亳都城的遗址[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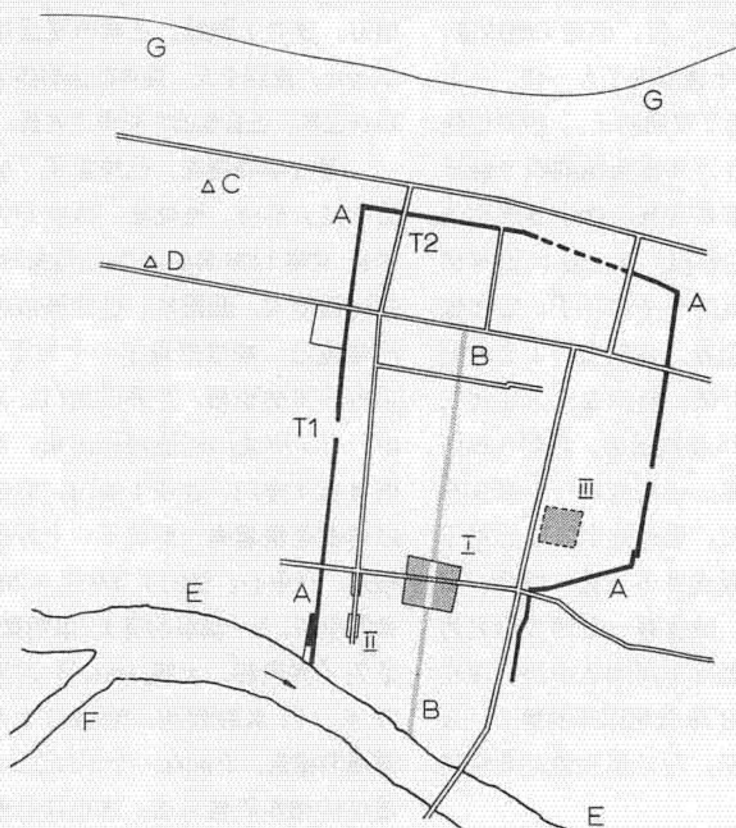


图 2.2.1.2 河南偃师县商代城市平面，公元前16世纪，比例1：20000[2]。

这里大概是由第一个商的统治者，汤，在公元前16世纪末建立的西亳城，在洛河以北，邙山南麓，沿伊水而上几公里以西坐落着二里头（译者注：夏城遗址）。

A 商代城墙，B 宫殿群的主要轴线，C 商汤的宰相，伊尹墓，D 另一个著名的亶父墓，T1 西门，T2 北门，Ⅰ宫殿建筑群，Ⅱ两侧有建筑的旧街道，Ⅲ另一个建筑群

1 参见中国画报，1985/6。

2 参见考古，1984/6。

王太甲以及汤的儿子，在他统治的第10年，向他列祖列宗献祭庆典的地方，也是他第一次向四方之极的神灵献祭的地方。根据《竹书纪年》记载，这大概是公元前1529年，在宫殿南部，有一个通向河岸的街道，也有其他的围合区域和建筑物。铜箭头、甲骨、陶罐和玉器碎片都有所发现。碳14测定的公元前16世纪的日期，支持这样的理论，即这个地方是西亳，商王汤的西都。

接下来的故事，记载在《竹书纪年》中，为公元前15世纪中期，描绘王与其宰相之间的关系，以及后者的文明影响。当商的太戊，在公元前1474年继君主之位时，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有些无原则，还未具备作为帝王应有的德行。7年后，一棵有着两枝树干的桑椹树，在他的宫院中发芽，7天之内长到一个人的腰那么粗，这一奇迹，被当成是来自商之家族精神力量的提示，因为他们曾将来自古代神圣之地象征性的桑椹树，作为行动的信号。宰相伊尹的儿子，作为朝代精神的维护者，他本人也是桑椹树的后裔，就是向王解释这些，并说服他去纠正行为的人。这之后，商的命运又一次复兴了。3年之内，整个汉人领地的太子们，都感谢太戊的君主统治，他们中的76人，送上使者来赞赏他的复兴功德。于是，第二年，也就是他统治的第11个年头里，他命令巫仙向山河祈祷，通过适当仪式，来重建与土地神圣力量的基本关系。其后，他又统治了64年之久，祥和而丰收。公元前1399年太戊去世时，获得了颇受景仰的太宗称号。

公元前1416年，我们第一次听说，一座有围墙的城市，名叫薄姑。根据历史地图集，其位置，确认在山东北部济水河的水口，非常接近那个时期的渤海莱州湾附近的海岸线，那里，的确是一个非常的近海环境。仅这个地方的名字是著名的，但是这个具有周期性河水泛滥、海水高潮淹没的地区的性质，暗示了一座墙或最好是一座堤是需要的，以防止这个聚落被水淹没。

在湖北省武汉市东北盘龙城这地方，发现有商文明初期太戊和平统治的影响。盘龙城坐落在长江以北很近的一个地方，大约离商都嚣(郑州)以南500公里。在盘龙湖中，一个小小的半岛上，有一个带墙的围合区，从北到南290米，从东到西260米，于公元前15世纪，建在高出水面大约6米的地方。在东北角，一个大约100米×60米的台子，作为一个建筑物的基础，有大约34米×6米的水平空间。这可与二里头的建筑物相提并论，的确是一个非常具有感染力的建筑物。其布局与二里头的布局相同，反映了祭祀双灵、双祖的双庙形式；而且在这个例子中，甚至有两对，因为，在中轴线的每一边都有两个房间。后期的甲骨文表明，牺牲是用来献祭商初三王的：太乙（汤，公元前1557-前1545年在位）、太甲（公元前1539-前1527年在位）和祖乙（公元前1371-前1352年在位），祭祀中用了300头牛和羊。如果盘龙城的建筑，是在祖乙时代以前就建造了的话，它也许是奉献给最初的两个祖先的；若是后来建造的，它也许奉献给包括了太戊的祖先，因为他和祖乙以太宗和中宗的名义受到祭祀。另一个可能是，因为太甲引进了崇拜四极神灵，即四个极点的仪式，所以，一组组的墓地在附近出土了，其中有两座最为精致，也是迄今为止所探测到的、那个时间段里装饰得最好的墓地。它们分别包含23和22个二里岗阶段即公元前15世纪末的仪式铜器，尚未发现文献资料，来确认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聚落，甚至连氏族或部族或部落联盟的名字，亦无法准确对应。但是，很明显，这个地方是南方太子之一的一个居住地，他对于商的君主信守臣道，如所希望的那么久。而且，他肯定适当修改了来自商文化的元素，来丰富他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我们可以确信，在墓穴中发现的铜器，是从北部进口的，而非本地生产的。它们也许产于嚣，那里发现了这个时期最大的仪式器皿，即两个方鼎，分别重82.4公斤和64.25公斤。因为一个熔炉仅能生产12.5公斤的融铜，因此大约需要12到15个炉子来铸造。换句话说，已经有一个具有大量劳力的工厂，它只可能在皇家都城的附近存在。那意味着盘龙城也许已经是商文化影响的一个前哨，甚至也是一个政治的前哨，就像郑州以北大约680公里的北京附近的平谷县一样。但是，它没能生存到下一个阶段——即安阳的殷墟阶段。如果盘龙城是南部太子居住地的话，他不可能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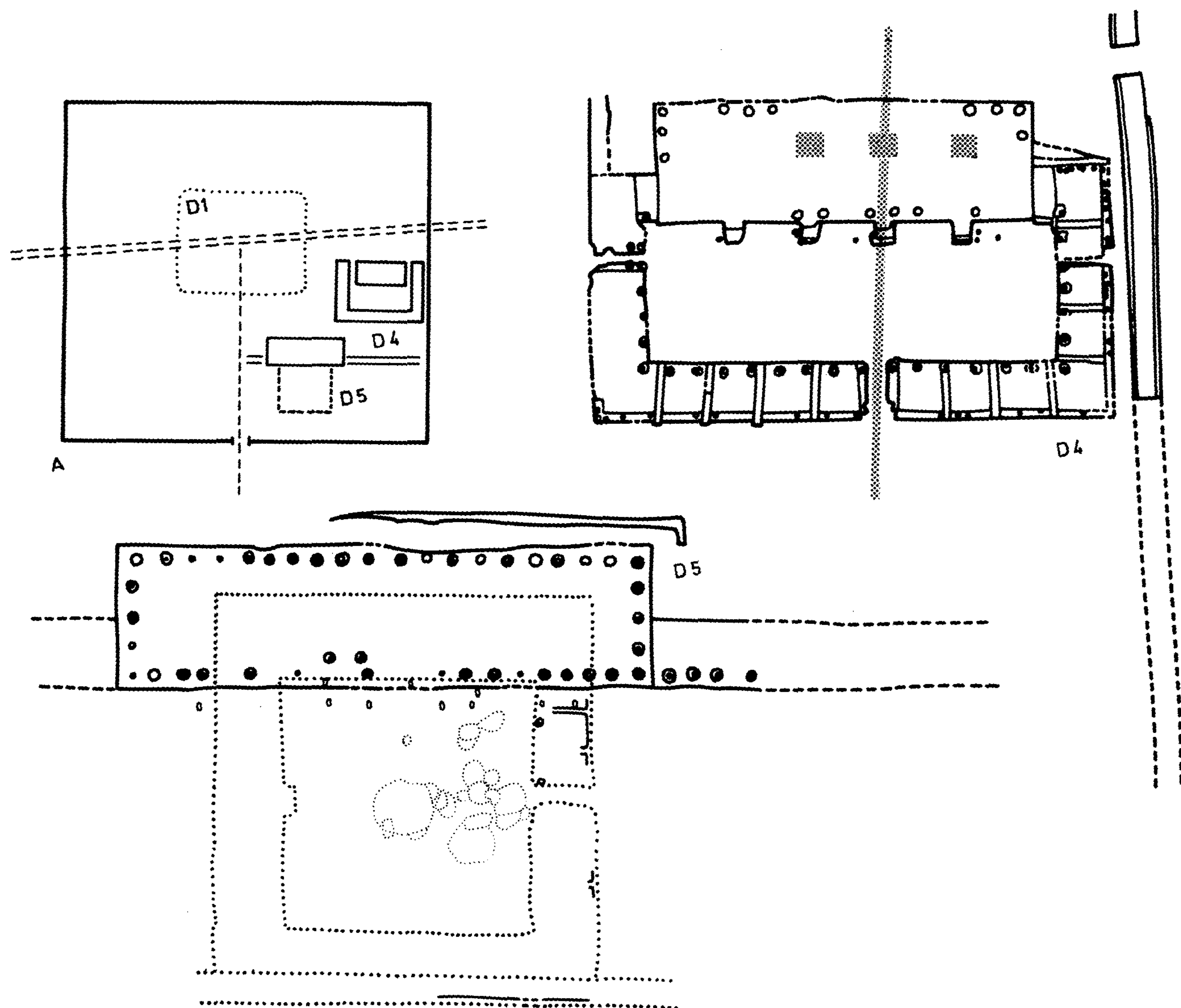


图 2.2.1.3 在河南偃师县西亳遗址的商代宫殿建筑物，比例 1 : 500[1]。

主要地图（A）表明了主要宫殿群和所挖掘的建筑物的坐落位置，建筑 D5 似乎已经是一个有七个部分开敞的大殿，每部分有三开间，总共 21 开间，一个中部开间位于中轴线上。然而，北部的立面少了两开间（19 开间），从而中间三个部分各有三开间，两个部分辅以两端（分别各为五开间）。这种建造很难解释。但如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所见，这种做法在商代的大型建筑中并非罕见。在建筑物 D5 前面的基础，属于一个较老的建筑，其入口在东部。这个老的院落中心，包含几个贮藏坑，里面有各种碎陶瓷片，其中有些来自于仪式器皿。D4 是一个有 4 个部分的大厅，每个有三开间，但是，它前面非对称布局的院落，暗示了西边的扩建部分，说明该建筑当初只有三个部分。第一阶段在中轴线上有一开间；第二阶段在中轴线上是一根柱子。这种假设由这样一个事实支持，即三个最西部轴线到轴线之间的开间宽度 16 尺，而所有其他开间仅 15 尺宽（商尺 =16.9 厘米）。D5 南立面的开间宽度也是 15 尺，而其北边的开间是 16 尺宽，平均以 4 毫米大于原尺

1 参见考古 1985/4，1988/2。

图 2.2.1.4 商代湖北黄陂县盘龙城的防御城镇，武汉城市东北大约 40 公里，比例 1 ：10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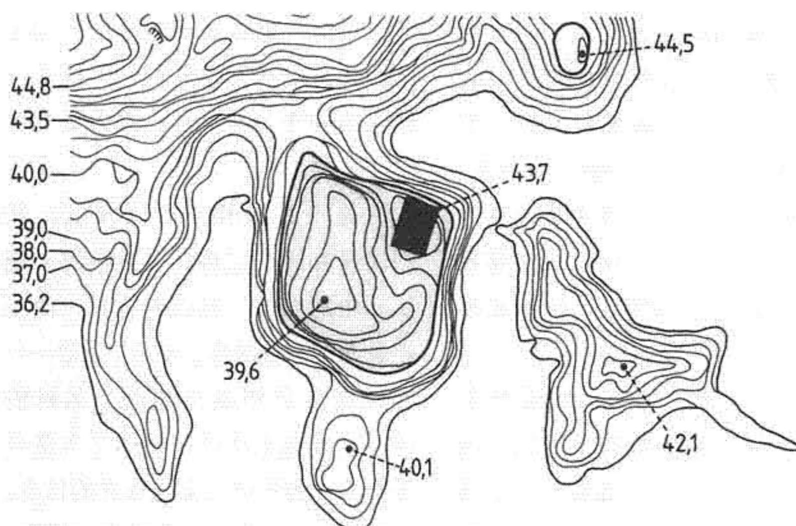
三面以盘龙湖围绕，这个城镇以至今依然高出湖面 5 ～ 6 米的 1 ～ 3 米高的墙体围护，在东北地区的平台，升起于湖面大约 7.5 米。在其北端，坐落着一个大建筑，其屋顶也许升高平台之上 10 米。在城墙外面是居屋和墓葬的遗迹。在城东一个叫李家嘴的岛上，发现两个重要的墓葬，岛上还一起发现了 23 个仪式铜器，大约 40 个铜制武器和器皿。墓室是木结构的，装饰非常漂亮，包含有为这些重要人物而设置的内椁和外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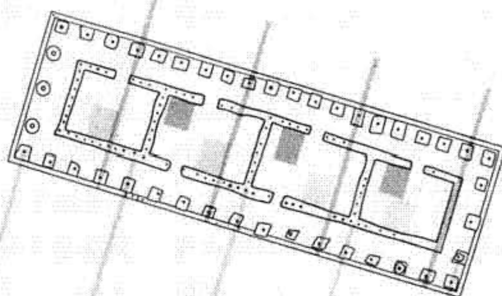
图 2.2.1.5 湖北黄陂县附近商代加固的盘龙城的大房子，比例 1 ：5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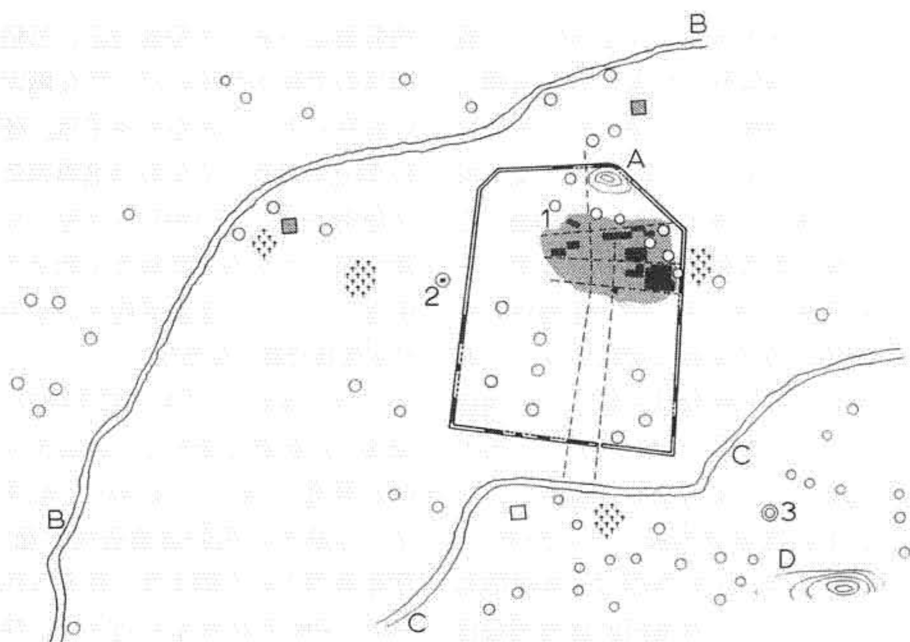
对于布局的严密调查，显示了这个建筑由各有五开间的三个部分演变为各有四开间的四个部分。南立面有 19 开间，但是仅有四个柱子与北边的四个柱子相呼应协调，那里仅有 16 开间。南面的 4 个柱子，形成了 3 个 60 英尺长的部分，划分出 5 个开间，每一个 12 英尺长（1 英尺 =0.305 米）。这也许是第一阶段，在第二阶段，建筑物在西边扩展了一个开间，在东边扩展了三个开间，总共有 19 开间。北面形成了 4 个部分，每一个 60 英尺长，但是划分为 4 个 15 英尺的开间（有几个仅有 14 英尺长）。这种布局与内部的墙相吻合，并划分为 4 个房间，但是墙体没有建造的功能，形成了一个 34 米 ×6 米 =204 平方米的水平空间

图 2.2.1.6 公元前 15 世纪，河南郑州商代遗迹，比例 1 ：40000[3]。

这大概一度是都城嚣，墙围绕的区域是由一组村子、铸铜和墓地所形成的聚落中心。商聚落（圆圈的）的遗迹和墓葬（交叉的）散布广大的区域，在三个地点，出土了冶金中心（方形）遗迹。紫荆山（A）南部是宫殿区（1），有几处建筑基础和街道痕迹。熊耳河（C–C）和金水（B–B）从西向东流过聚居区，南部郊区在二里岗（D）西部和北部，北面是酒厂（3），墙西发现了两个最大的铜器（2）







1 参见商州考古，北京，1979。
2 参见商州考古，北京，1979。
3 参见商州考古，北京，1979 和文物 1983/4。

一个出身于当地南方的太子，而是这哨所的将军，或甚至是商王室家族的成员。他能够在太戊时期，在这一地区保有一个坚固地位。但是，当中心权力衰落时，这个地位也不得不放弃。结果，没有任何部落名称或任何其他军事番号，被列入王室年表中。

太戊的三个儿子，继承君主之位，分别成为商代的王。公元前1399年，他们将王室首先从西亳迁移到了嚣（今郑州），然后，又在前1380年移到相。[1]9年之后，在公元前1371年，太戊的长孙将王室移到邢（一作耿），两年之后，在公元前1369年，移到了庇，[2]其在公元前1363年有墙围绕。在只有30年的过程中，王室转移了四次。最后一次向庇的移动，是因为邢的城市被洪水淹没了。因为所有这些坐落位置都是在洪水易发地区，这也许是对于王室重新择址的解释之一。

一般认为，嚣与在过去30年中所调查出来的、位于河南——黄河之南都城郑州巨大城墙区域相一致。这座城墙，至今还竖立着，最高高度达9.1米、基座36米宽，由8到10厘米厚的层层夯土构成。它的环绕总面积为3.2平方公里，总长度6960米。这一巨大的墙体，不能被认为是所有军事防御工程中的第一个，它更有可能是一个洪水泛滥地区的防洪堤坝。然而，因为土地肥沃和密集的聚居，这是一个适宜于作为重要的城市中心的地方。这座堤坝，正如我们可能称呼的那样，与今天沿着黄河的堤坝形成良好的对比，也是最高的一个。为了保护仪式庆典、建筑物和保持在帝都仪典的季节性节奏，都需要一个防洪区域。

关于帝都相、邢以及庇，我们仅仅知道其记载在《古本竹书纪年》中的名字，具体的位置，尚不能毫无疑问地确定。然而，在嚣——如果这是郑州遗存的适当名称的话——发掘工作已经显示了大量关于聚落结构和居民文化水准的信息，以及这个地区发展过程的年代序列。

当我们将关于商王们在嚣短暂的宫室生活的记载，与考古学的结果比较时，后者显示了一个有着重要建筑物的大规模聚落。这表明：商王们似乎仅仅只有19年的占据期，只是这个聚落史上一个短暂的插曲。聚落总共有30到40平方公里面积，其中，只是仪式中心有墙围绕。墙外扩展远及5公里以外，有一些作坊，其中有些集中在城北河水两侧，有些位于墙南、一个叫二里岗的地方。所有都是与居住区相混合的，包括圆形的半地下居住建筑。仅有铜匠们居住在夯土台的矩形房子里。碳14测定的日期，最早的可追溯到公元前1620年到前1595±135年，正处于河南一龙山文化和商文明之间的水平线上，这条水平线上，至今尚未发现任何金属物件。

接下来的所谓下二里岗阶段，聚落地区的密度增加了，而且铜匠的作坊也出现了，城墙建造起来了，在墙东北角的建筑有所扩建，建造在夯土台上的大堂，拥有大约100～400平方米大小的空间。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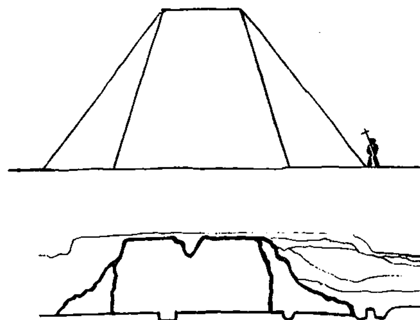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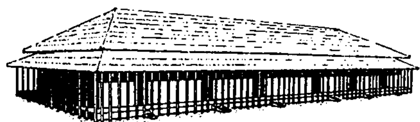


图2.2.1.7 在河南郑州嚣城墙的复原图，商代，比例1：350[3]。
复原图的下面，是原来的剖面，正如所挖掘的那样，表现了城墙的核心及其两边的两个加固结构，增固了对洪水的防范。对于沟渠之神（通常认为是城隍）的崇拜，是古代对于八个神灵献祭的一个自然结果。（同样参照2.1.1.7.8）八个神灵中的第七个，是水墉＝水墙和相应于堰堤和后来被称为城隍（城市的神）的城墙。城墙和其城壕保卫人民，而人民给予它们这种神灵或神，相信神就居住在城墙里面。后来，人民把人类的捍卫者祀奉为神，而这就是城市的神（城隍）的起源[4]

图2.2.1.8 河南郑州大建筑的重建（C 8415）商都嚣的宫殿部分[5]。
这个建筑，类似盘龙城的大殿，但是更长（盘龙城12米×40米，这个建筑12米×60米）。这里，中轴线也是不可抵达，而将建筑物分成了两个部分，每部分有三个入口。这似乎是双重模式和三段式体系的结合，大概由于礼仪上的发展



1 译者注：今安阳的东边，在那时是在黄河的西岸。
2 译者注：山东西部的济水，今天黄河下游的水道。
3 参见商州考古，北京，1979。
4 E.T.C.Werner,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Mythology《中国神话字典》, New York, 1969。
5 参见文物，1983/4。

随上二里岗阶段的开始，大型墓地在城墙东北和西边出现。在这些墓地中，发现了高度发展的铜塑艺术品和其他优质玉器、象牙制品以及硬陶器、白陶器和釉彩陶器。终于在最后阶段，大型墓地包含有人类牺牲品和丰富的殉葬品；甲骨，并非是认真准备的龟甲，偶尔带有一些铭文。最后两个阶段中，较早的一个，被认为是商文明的第一个高峰。这表明，在公元前1380年，当王室离开之后的世纪里，嚣的社会生活并没有衰落，它继续在商的范围中，甚至可能是各位商王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的四阶段里，具有最高秩序的文化中心。公元前1300年，当王室迁移到商核心区北部，现今安阳城附近的殷之后，虽然这一发展的中心是在殷，嚣的情况继续改变，发展成为我们如今所称的最后阶段，即人民公园阶段。

王室的这种迁移，象征了一种不安，而一个地方的泛滥，也许只是作为迁移的一个理性的借口。一个关于周代《易经》非常有趣的研究，已经分析了在不同的六线形，六芒星形[1]基础上搬迁和重建一个城市的过程。重要的观念在于：和平的对立面不是战争而是停滞，这意味着和平是一个过程，一个在自然的各种创造力量之间不断地赋予生命的合作；如果这一过程终止了，社会就停滞了，结果将是腐朽。杰出的太戊及其75年的和平统治，我们认为，他是技术和文化发展的驱动力，然而，其后任们，却可能觉得他低劣、软弱和停滞不前。

对这种停滞的补救，可能会体现于一座新城市的创造，这一行动将引来所有的聪明才智和资源，此外，还会产生关于帝王品性的历史记载，甚至为之竖起一座丰碑。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行动，其产品就是帝王自己的城市，证明帝王的创造力，并赋予他作为造物主的创造地位。这一行动中也存在着竞争因素，这种和平的——生产性的活动，与破坏性的战争和战斗形成对比。这里，创造的概念，实际上是指一种再创造，就是根据祖先们神圣化了的规则，产生出某些东西，来捍卫他们魔幻般的威力。一个不成功的再创造，可能招致灾难，这种不幸的创造者，也许不能赢得其祖先或继承者们的认同。因为，一座帝都的建立，不仅对于帝王本身，而且对于其国家和人民，都是至高无上的大事，接替王位的野心继承人，也许感到有责任尽其最大的力量兴建帝都，来保卫其国家和人民的生死存亡。

在太戊之后的九个商王中，只有一个，强大到能够保持其权力或多或少地不受侵扰，但正是这个祖乙（公元前1380－前1352年在位），不得不两次迁移自己的王室。他至少成功地环绕着他于公元前1363年新建的第二座城市——庇，建造了一座墙。所有其他八位商王，在他君临天下时，是不幸的；大多数，是在争得权力后的几年里，死于混乱和无序之中。第八位商王阳甲（公元前1318－前1314年在位）的最后一个王室，已经由其叔叔在公元前1321年建在现今山东省中部曲阜，大约8个世纪之后的孔子诞生地。他的兄弟盘庚又迁移了王室，并在公元前1299年开始在河南北部的一个地方，商领域的北部边界——殷，建造新城。盘庚是一个幸运的人，也正如我们所设想的，是一位德行的建立者。他的城市，作为王权的所在，也作为整个商王国的主要仪式中心，持续了两个半世纪之久。然而，他的成功，并不完全依赖运气。他必须非常努力地说服其贵族阶层，以使人民追随他的思想。过去几代的经历，依然徘徊在每个人的心里，所以，重新选址并不受欢迎，这花费了盘庚王15年的准备时间来动迁。而他最后的选择，来自于对卜辞的咨询：“我已经通过占卜检查这件事，并得到了答案——这不是我们的地方！以前的王者作任何事情时，都谦恭地遵守上天的命令。在这样特别的例子里，他们没有沉迷于一个永久的安息——他们没有在同样的城市里永久地居住。”他接着对贵族们发表演讲：“看看那些穷人；依然能一起商量关于要给我的规劝。但是，当他们开始说话时，你们已经准备奢谈。为何你们不向我汇报这些话，而到别处空谈，惊吓穷困的民众！?”他又告诉人们：“当大的灾难降临到我们殷商时，前面的大王们，并不喜欢停留在他们自己的地方……为着人民的利益，他们迁移了都城。你们为何不思考回想那些……以我对你们

1 译者注：金字塔形与圣杯图形的叠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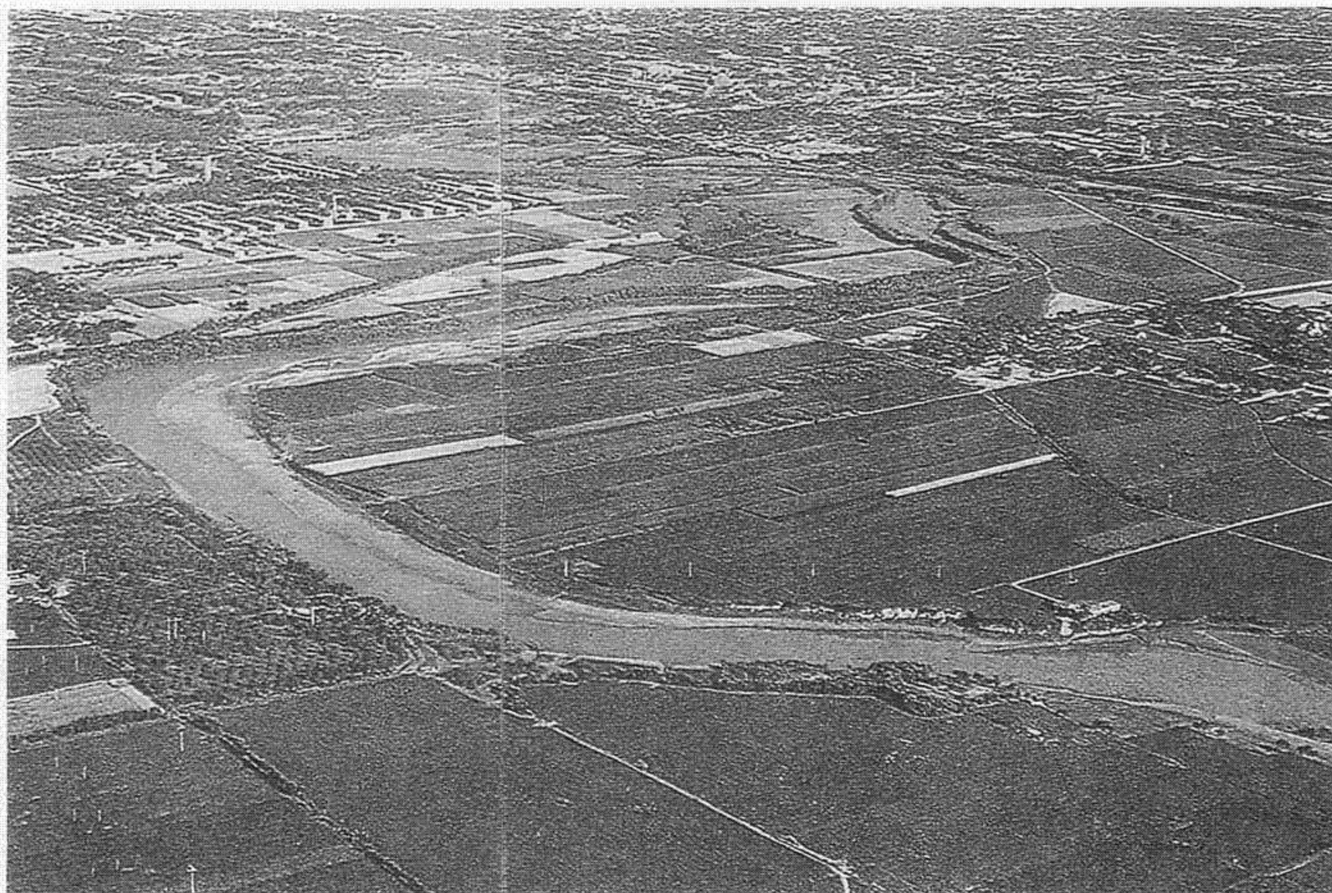


图 2.2.2.1 殷遗址鸟瞰，殷商最后一座都城，从西北方向的鸟瞰图[1]。
右侧可见小屯村，主要的挖掘地址位于左侧中心，其左边是洹河湾，洹河在东南方向流入背景中的地方，并贯穿河南安阳城北部郊区。皇室在西北岗的墓地，位于左侧图画之外，在摄影师的飞机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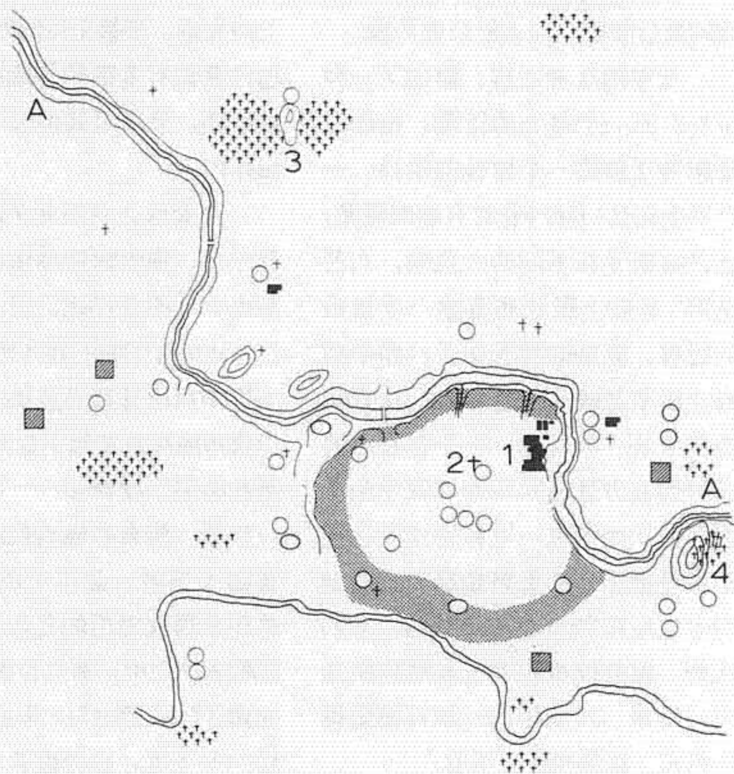


图 2.2.2.2 殷墟，殷商最后一座都城，公元前13－前 11 世纪，比例 1 ：40000[2]。
主要聚落区域，看上去并没有被墙环绕，在这里，不太明确地随地形特征表示出来。根据本地传统，它被认定为这样的一个区域，其中发现有甲骨。在这个区域外，没有发现任何东西。聚落的痕迹，被散布在一个广大的区域（图中圆圈部分），与在郑州的嚣聚落区域非常相似。有四个冶金的作坊（方形的）在中心区之外被发现了。洹水（A_A）从西北到东南越过这个区域。1. 主要宫殿／庙宇建筑；2. 妇好墓；3. 西北岗两边的皇室墓地；4. 在后岗山的另一个墓地

1 参见中国旅游，北京，1977。
2 参见商州考古，北京，1979；Li Chi，Anyang（安阳），Seattle，Wash.，1977；考古，1988/10。

的关心，我只希望与你们同欢同庆。当我召唤你们来珍惜这个新的城市，仅取决于你们本身，也是与你们的意愿高度一致的行动。”

2.2.2 殷商时期(公元前1300年后)

盘庚以降，朝代的名称是殷，与都城的名字相吻合。1928年以来，这个城市的废墟已经被挖掘，该地也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研究第一个培训地。其实，作为殷墟，它已经闻名了几个世纪。

正如嚣（郑州）一样，殷的城市，形成了一个高度组织的群集聚落，围绕着皇家宫殿和庙宇的政治和仪式中心。这个中心坐落在洹河南岸，洹河发源于西部的太行山脉，而在那时是黄河的一个支流。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城墙，但是，因为建筑物是建造在高出河床大约7到10米的平原上，有着自然的、对于洪水的防范，因此，也许没有建造城墙的需要。这一地区，早在公元前5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就已有人居住了。附近夏代的都城之一，也被称作殷，并且在公元前1755年的《古本竹书纪年》中有所记载，也许能确认所在。看看这居住稠密的平原，在一个已经居住了几代的地区，围绕着仪式和政治中心，构成都城群集聚落的名字，必须详细解释一下。

围绕一个类似小镇的非农业聚落，农民们所占据的村子，通常并不包括在我们所称的群集之中，因为区别是基于农业和非农业的特征之上，只有后者可能是一个城市群集的一部分。在中国古代涌现的城市结构案例中，除了中心（那肯定是一个非农业聚落）之外，群集包括那些带有作坊的地段，生产并提供主要由中心居住者使用的产品。墓地也包含在群集中，如果它们是居住于中心的人们最后休息的地方。就居住所涉及的方面，仅仅那些更为精致类型的房屋，建造在夯土台地之上，并由复杂的结构所构造，被认为是群集的一部分，基于这样的假设，这些房屋并非由普通的农者所居。

如今，尽管挖掘和调查已超过60年，在整个地区都有试验性的艰苦挖掘，并不能认为殷墟的遗址地区已经完全被探究，特别在涉及复杂的聚落结构时。任何建筑的复原，都因为证据中的很多漏洞而变得复杂。然而，关于中心和墓地，有大量的信息被收集，对商代这一时期的特征，可以提供相当准确的印象。参照殷墟阶段，其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进步，所谓的在郑州的嚣的二里岗阶段，它似乎与郑州人民公园阶段同期。

最为有趣的聚落地区，当然是在洹河湾小屯村北的大型建筑群。到目前为止，已经调查出宫殿和庙宇地区，占地大约5公顷，[1] 原来的中心聚落，也许覆盖了河湾之内的整个区域；达到大约60到80公顷，比嚣的墙围面积小。然而，正如嚣那样，同时也像盘龙城那样，主要建筑台地，坐落在这个中心聚落的东北角。在这里，殷的夯土台，形成了一个颇为复杂但系统化的布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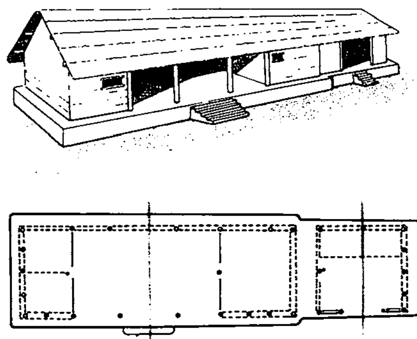


图2.2.2.3.4 考古名之的"alpha4"建筑重建，在小屯北仪式建筑群北部，公元前13世纪，比例1：350[2]。
建筑物由两部分组成，大堂有五开间，其中有三开间，在中心形成了一个开敞的大堂，一个小堂被添加到大堂的北端（图的右侧为北）。屋顶由杂草混合物，用灯心草盖的屋顶，竹子和木柳条粘结在一起。基座是一个夯土平台，其中放置了柱子所需的基石。所有传统中国建筑，基本上都是仪式建筑，不管后来什么其他用途被附加到这些建筑上。从庙宇、宫殿到农房，传统中国建筑的中心是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精神的实质受到尊崇，并由祖先精神、神和崇敬的人所代表。因为这个基本概念，不可能为传统建筑准确地建立功能类别。公牛作为祭祀品，是殷商统治者的王室特权。在安阳发现的甲骨上所提到的献祭公牛的数量，在一个世纪里，记载下来3441头公牛。在一个献祭仪式上，所用公牛的数量，是以血液流量为代表的。血由夯土台下面的地下管道运走

1 在1949年以前仅1.2公顷，已经确定挖掘出来了。
2 参见 Li Chi, Anyang, Seattle, Wash., 1977 Reconstruction by Shi Changju, Academia Sinica, 1954。

与嚣的城市中，那或多或少、自由加建的台地中，没有清晰可辨的模式形成对比。到目前为止，已经确认有三组建筑物；它们相继建造，开始于北边的那一组。然而，这些并不是这一地区的第一批建筑物。在夯土台底下，发现有大量的既用于储藏，又用于居住的凹地集群。这些凹地聚落，持续了一千多年，经历了整个龙山文化，而在此地被盘庚选作殷都以前，依然在商时期由人居住。根据《古本竹书纪年》，这在公元前1300年发生，这里，我们以《古本竹书纪年》作为指导原则。这一时期，第一组建筑物，即北边的那一组已经定妥。大概由盘庚本人于公元前1299年亲自规划布局。正如这一章中开头所引用的文献显示，盘庚的整个意向是和平的。这北边的一组，部分坐落在最高的土台之上，高出海平面97米，部分坐落在北边的山坡上。由7个大型和中型的夯土台组成，台上建造了建筑物和几个其他小型结构物。其中有两个更像祭坛，一个在最北边的东北角，另一个在东南角，正好截然相对。大多数的建筑物是矩形的，正好建造在南北轴线上，看上去主要入口在东面。其中一个房屋已经复原，看上去是一个具有复杂木结构屋顶的殿堂，并带有由在夯土台表面上由石柱脚支撑的柱子。

从结构的布局看，另一建筑很明显地属于这同一建筑群，虽然发掘者将其归入另一组建筑中。它被命名为黄土台。显然是整组建筑群的主要祭台，坐落在最高的台子顶部的大型开敞空间的中心。它的北面，发掘者们发现了一个有大量碎片、破片的储藏坑和为占卜、卜卦用的龟壳。在黄土祭坛的南部，有一个小型夯土基础，可能是一座矮墙或一种板凳，大概用于放置仪式器皿。沿着同一轴线更往南，有一个夯土台，在它下面，有开创性的排水沟渠体系。在壕沟两岸由木桩强化，这些沟渠，顺着南坡，向下流进建筑群的西南角。所有这些结构，可能属于盘庚建王宫于殷的时期。

第二组非常大型的夯土台，在黄土祭台的南面被发现，但是，在一条真正南北轴线西部的一条轴线上，大约5度左右，朝向西南方向。从北向南，首先有一个长方形的台子，在最高一层，即祭坛层的北部开始，通向南部，是一组有着完整布局的大型土台群，这也许形成了一组壮观的、环绕院落和开敞台子的大型殿堂。就其重要性而言，主要建筑物，似乎已经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建筑物，立于自身如固体石头般非常坚硬的夯土座上，平面为每边7米的方形。整个建筑，则坐落在一个非常大的开敞台子的顶部，从东到西是长方形的，大约在祭台最高层以下大约1.5米的最低点，形成了建筑物的南立面。因为这个原因，具有几个踏步或斜坡的楼梯，从南部提供了通往开敞平台的通路。虽然技术建造仅仅是一个小问题，还没有足够证据来支持整个建筑群的复原。建筑区域的东部很久以前被洹河冲刷掉。因此，作为一个整体的建筑物布局无法恢复。

公牛献祭，商殷“食肉者”们的王族特权，在安阳发现的甲骨上所提到的献祭公牛的数量：

一次献祭中所使用的公牛数目	记录在甲骨上的次数	所用公牛的总数
1	23	23
2	23	46
3	17	51
4	6	24
5	13	65
6	3	18
7	2	14
8	1	8
9	8	72
10	21	210
15	1	15
20	3	60
30	10	300
40	2	80
50	5	250
100	6	600
300	2	600
1000	1	1000
		3441

在一个世纪里，记载有3441头公牛被屠宰用作献祭。

在一个献祭庆典中，所用的公牛数量表明了流血量，这必须由地下管道输送走，这些管道埋在夯土台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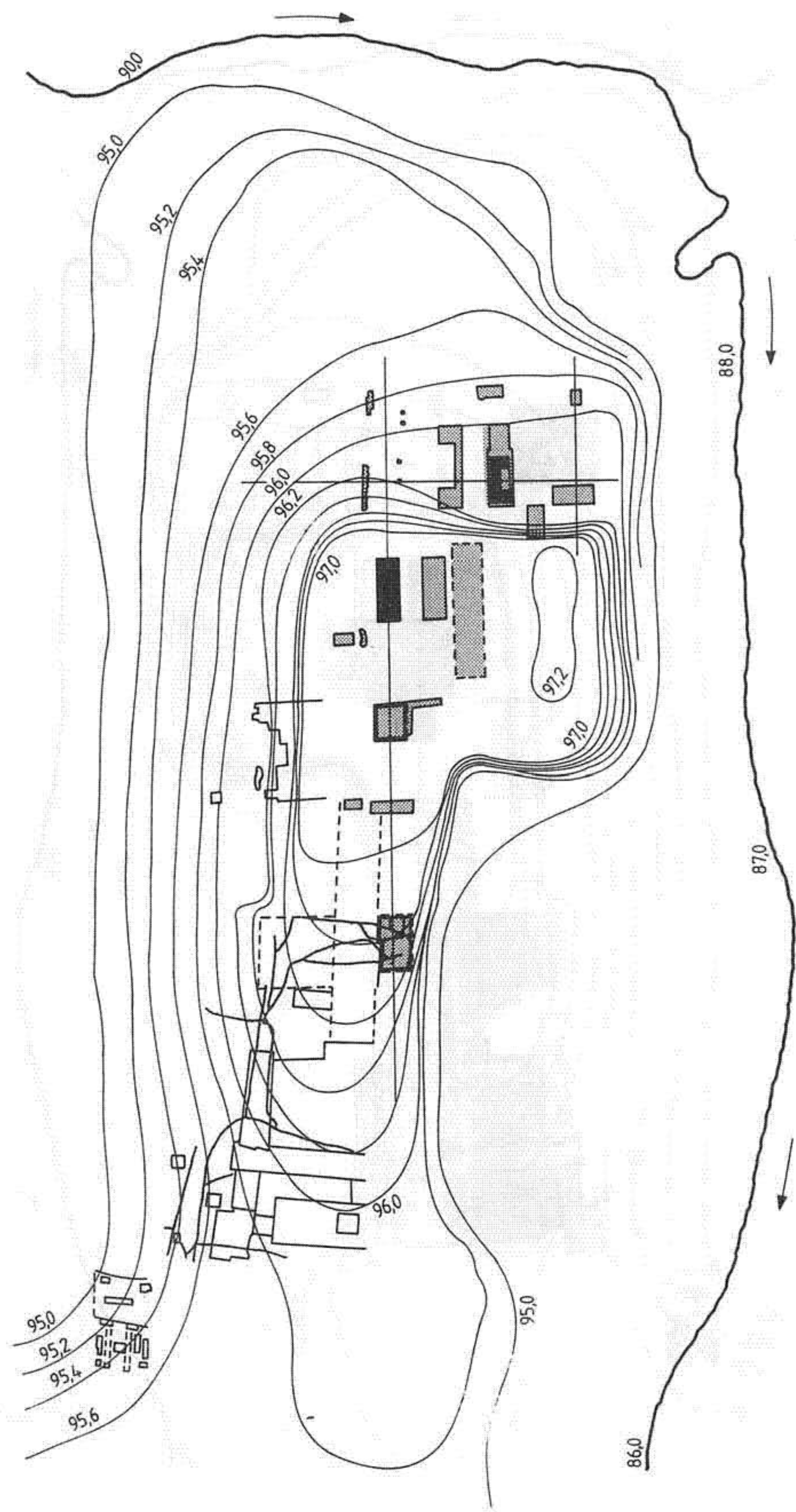


图 2.2.2.5.6. 商代都城殷的中央建筑群，公元前 13 世纪，比例 1 ： 2000 整组建筑群，自 1928 年出土以来，看似仪式与观念逐渐发展的结果。从建筑物的布局可以看出两个主要阶段

图 2.2.2.5. 第一阶段：山丘北坡的一组建筑看似最古老的部分：东北边有一座小型露天祭坛；一座横贯东西的建筑占据祭坛南边空地；祭坛西边有一座建筑，考古名之"alpha4"建筑，即图 **2.2.2.**3.4. 所示。此建筑的主入口在东面（参 **2.2.1.3**）。在这建筑的西边，又有另一座建筑和一些小型建构。这组建筑群南面的山顶上，坐落着三座成一组的建筑群，均为南北朝向。沿这组建筑最西端的那座建筑物的长向，有一条正南北的轴线。沿此轴线往南，首先是"黄土坛"；其次是长凳般的"陈列台"；再次是有地下管道的平台。如此布局，使人对这些不同构筑的目的有如下推测：这条轴线的南端是宰牲处，地下管道用于排泄宰杀牲畜的成河之血，在它北边的"陈列台"，用来放置器皿，它们专门承装献祭于"黄土坛"前的牺牲，"陈列台"是这一连串构筑中的第三要素。在它北面是一座大殿，原本东西朝向，但现在看似南北轴线上最重要的建筑物，也许是存放大禹九鼎或同样极珍贵祭祀器皿的"大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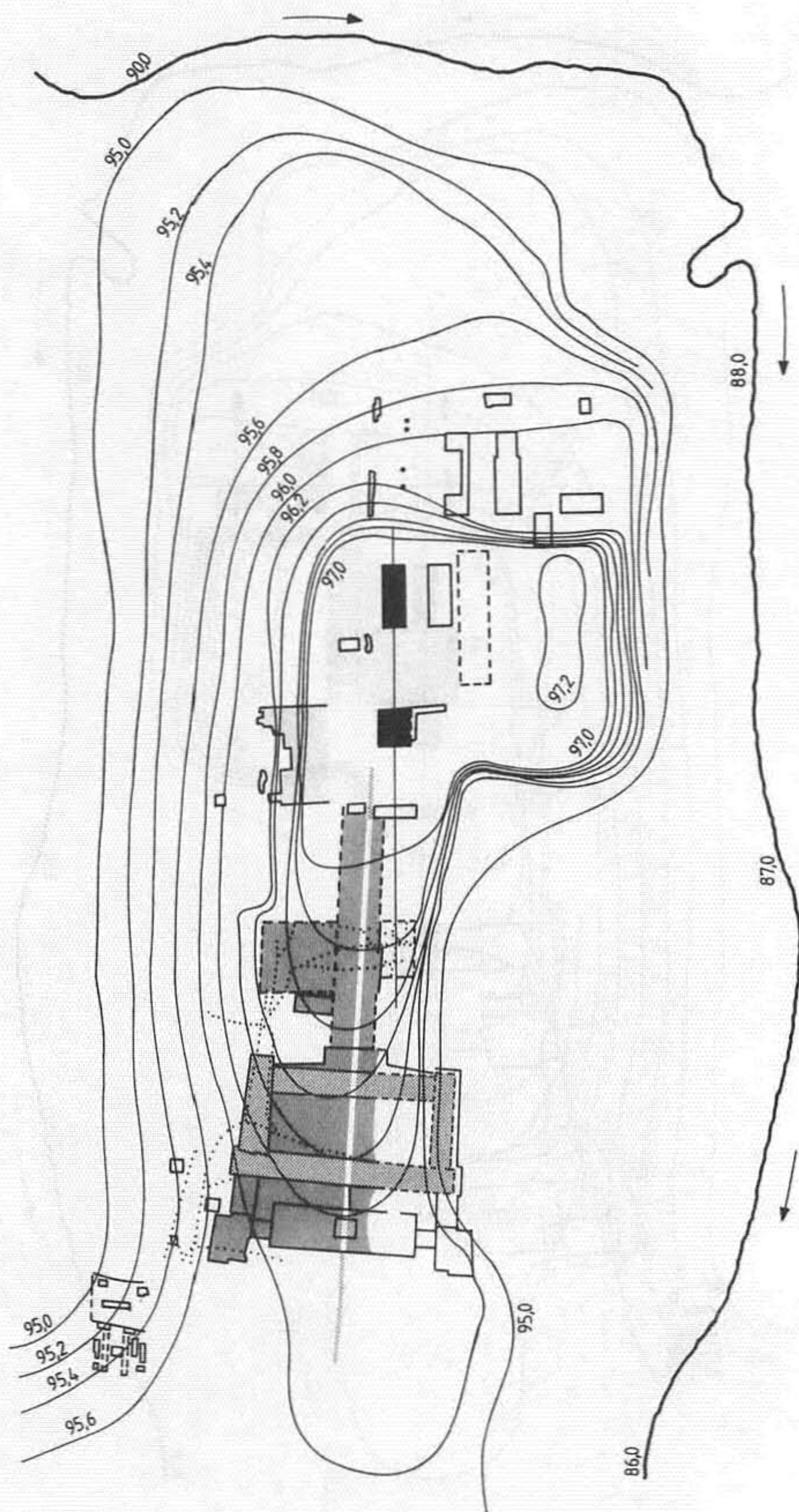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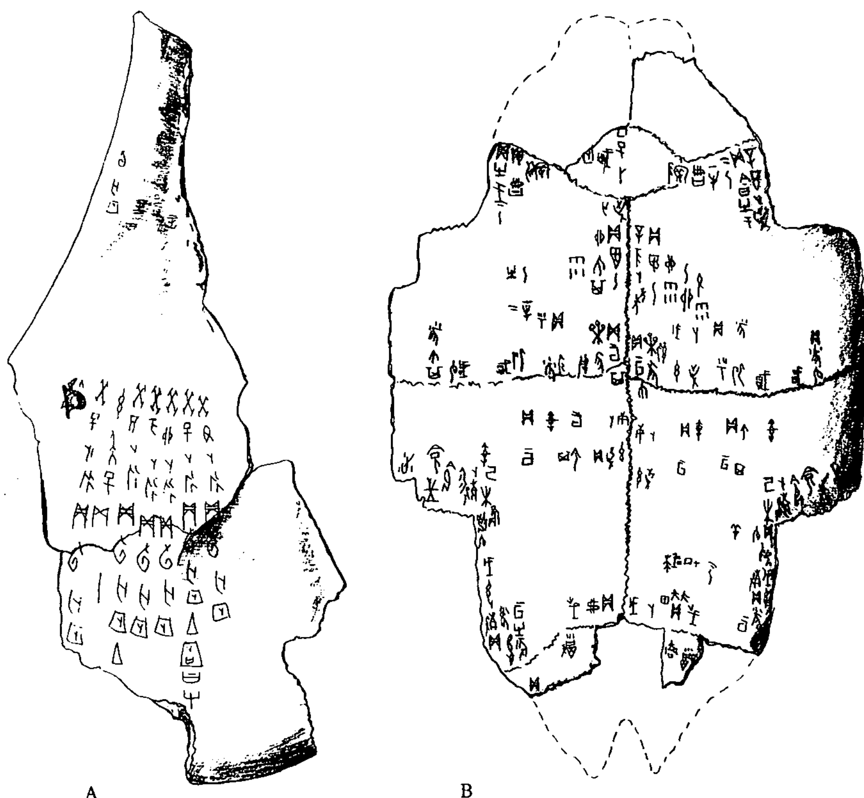


图 2.2.2.6. 第二阶段：在南北主轴线西侧，又有一条新轴线，大概是武丁王（公元前 1273–前 1214 年）时形成的。沿着这条轴线，出土了一系列的夯土台。这条轴线北偏东大约 5°，从南开始，这条轴线从我们所称的存放九鼎的“大殿”和“黄土坛”的西边插过。在“陈列台”的南面，延伸出可称为“献祭”的路径，它穿过宰牲之地，在其西侧是另一处台子，加建有地下管道，直通一座大概是宫殿的“大型合院”。在它南面是一开敞的台子，而在其中心及轴线上，有一座方形的建筑物之特殊的基础，我们也许该称之为“王的宇宙之庙”（其东面入口也参见 2.2.1.3）。在这“大型合院”建筑群西南，有第三组相对较小规模的建筑组群，被确定为宗庙建筑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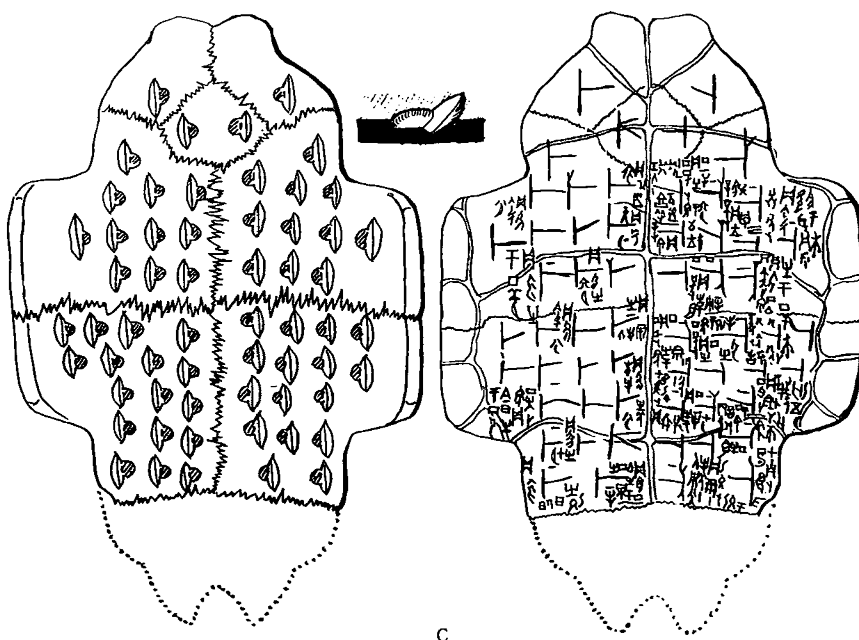


图 2.2.2.7. 安阳，殷－商甲骨，公元前 13 世纪。

图中所示的甲骨文，表示所谓的天干地支六十天循环。

A. 在今日本京都大学的收藏，一头公牛的肩胛骨。

B. 今存于里斯本东方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的龟壳背面。

C. 一幅龟壳的两面：左边的表示龟壳里面，有一对一对的凹窝；右边的表示龟壳背面，有一些成文的〝卜辞〞和双裂纹，1929 年出土于安阳。

在一幅龟壳背面或牛胛骨上可有 50 条到 60 条成文的〝卜辞〞，里面是一对一对凹窝阴刻，一个椭圆形和一个略浅的圆形挨在一起。当占卜者在龟壳背上写下所卜疑问时，在龟壳里面通过持一根灼炽之签刺入凹窝中将里面加热这一程序，结果，就出现每一对凹窝对应的背面的两条裂纹，一条纵向的裂纹，一条横向的裂纹，两者一起形成了汉字〝卜〞，其用于占卜术。只有在横向的裂纹几乎是水平向时，预言好运。

龟甲 3 是为武丁王准备的。在顶部可见裂纹和阴刻的〝卜辞〞混在一起。龟甲 2 包含有为武丁王之妻妇好准备的〝卜辞〞，由两位占卜者镌刻，在中心线的两侧以对句形式如此写道：〝第 39 天，卜问：好女分娩后身体将康健？第 39 天，卜问：好女分娩后身体将不康健？〞另一〝卜辞〞如下：〝武丁王今年将调集军队，并将以妇好再为首领，一同反击西北部落来犯之敌。他会受到保护吗？〞

这是不幸的，因为这对理解整组建筑群的特征和目的至关重要。然而，台子上的小型方形建筑物，已经作为一个二层结构复原。如果我们能够将之看成前面曾经提到的、那个具有中心重要性的建筑物，这也许是一个君王参加仪式和庆典的地方，一个台下的臣民注目的焦点。该建筑，也许是在最为强大的殷商王武丁时期，附加到当初的建筑物上，在武丁长达59年的统治中（公元前1273－前1214年），肯定有充裕的时间和资源，来建造如此巨大的建筑物，武丁并且通过由成千的民众参加的壮观而煞费苦心的典礼，维持了高度的文化水准。在一个曾经可能为巨大院落的西部，开敞土台的后面和北部，发现了一个储物坑，有17096件刻有铭文的甲骨。大多数是龟壳，但也有8片公牛的肩胛骨。绝大多数是有卜辞的，从盘庚到武丁时期，而这些档案是在武丁时期封存储藏的。300多件可恢复原状的带有卜辞的龟壳，为理解殷商文化的特性，提供了基本材料，并被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最为古老的文献汇集，即使是这些记载的目的，某种程度上说是有限的，并单纯地与甲骨相关。

第三组建筑，坐落在大建筑群的西南，在范围上仅是非常小的建筑。它坐落在那最高的、有黄土祭台的土台子以下大约2米的地方，而且是很晚之后建造的。

另一个结构，在这里应该提到，尽管这不是宫殿建筑，它属于武丁的建筑群。大约在开敞土台的西南250米处，最近发现了一个小庙宇遗迹，建在一个墓坑之顶，大概是为墓中的死者举行仪式和祈祷之用。这是殷墟中惟一一例，可以判明其中墓主人的身份是妇好，武丁的64个王妃中的第一个。她非常出众，是一个拥有13000名武士队伍的女首领，她在殷商领域的北部，成功地攻下游牧部落。她死于其丈夫之先，武丁在宫殿区附近，为她建造了陵墓，是个孤例，因为所有其他王族的墓地，都坐落在大约宫殿区东北2.5公里，洹河以北一个叫西北岗的地方。

由此，我们来到聚集聚落的另一部分，一组为中心的居者所用的公共墓地。虽然，遍布整个区域都发现有墓葬，但只有极少的真正墓地。最为重要的是，在一座小山两边的西北向的仪式中心，即西北岗，毫无疑问，那是殷商的皇家公墓。这里，八座非常大的墓地，一座尚未完成，一座和另外四座小一些的已经挖掘。虽然所有这些很久前就被盗过，考古发掘显示了有关殷商文化很多有趣的细节。另一公共墓地，坐落在中心的东南，在洹水的另一湾，而且靠近另一座小山——后岗（后山或是王后山）。两处公共墓地，都有一些小型墓穴。西北王室公共墓地，有1200多座墓穴，大多在小山东部，并有秩序地成排成组布置。不但有人的墓葬，还包含马、象、狗和其他动物墓葬。关于人类的墓葬，很多包含无头颅的骨架或仅是头骨，有些是单个的墓葬，其他则是多个合葬。这种情况，加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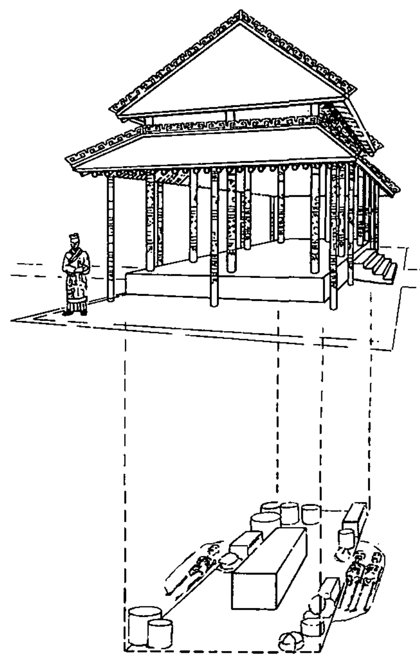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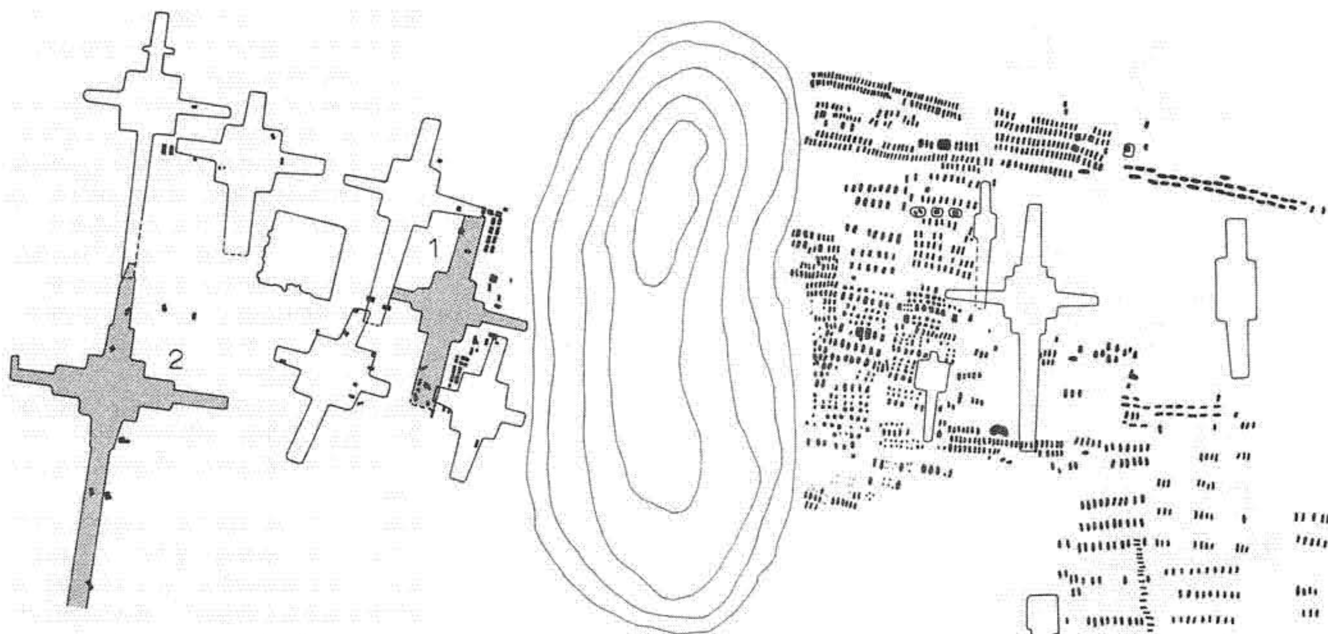


图2.2.2.8. 安阳小屯村以北，商一殷武丁王之妻妇好墓，公元前13世纪，5号墓，参见《文物》，1988/6。

与西北岗皇室墓地布局相对比，妇好墓只是一处无坡道的墓穴，也相对较小（4米×5.6米）。200多件青铜礼器，200多件青铜武器和工具，大约600多件玉器和其他石器，490多件骨质发簪，带有青绿色饰的象牙器皿，大约7000多件玛瑙贝壳（作为钱币），5座大的和18座小的青铜钟，到目前所知最古老的4面铜镜，以及许多其他物件，都置入墓中作为殉葬品。其中殉葬的还有16人，6只狗，他们作为荣誉的守护者。在墓穴顶部，建有一座高出墓地表面8米的一座开敞的亭子，用作举行仪式的小型庙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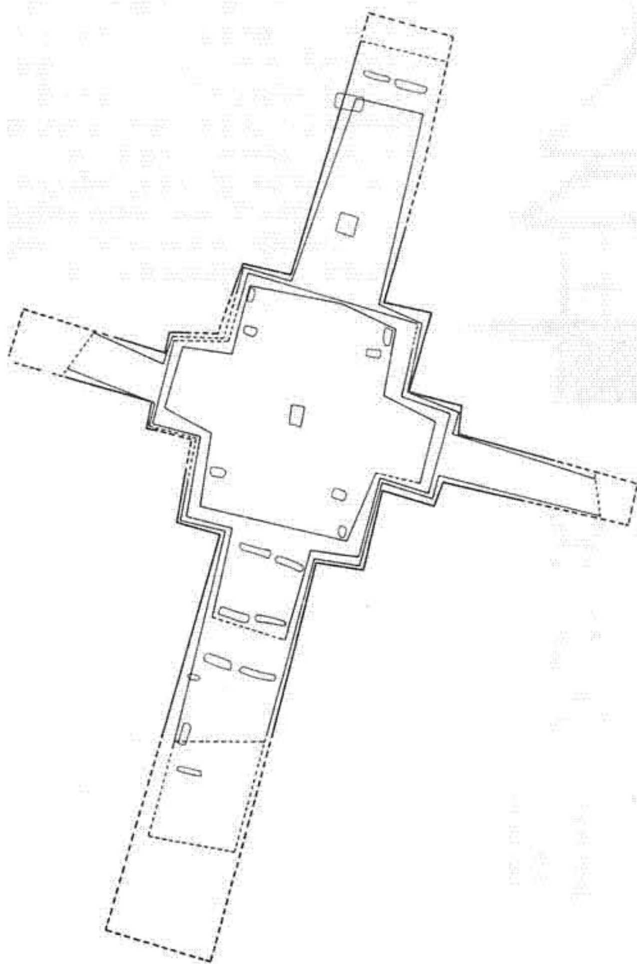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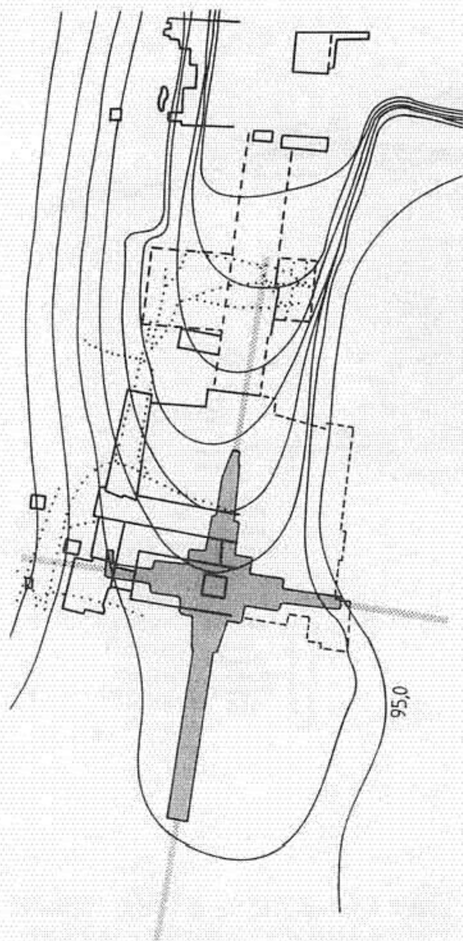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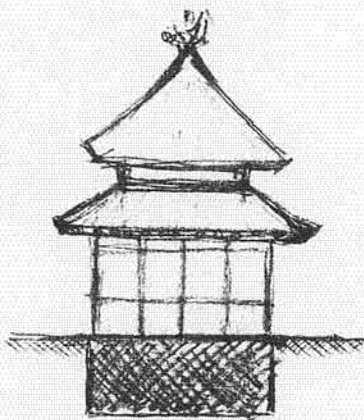
图 2.2.2.9. 公元前 13– 前 11 世纪，河南安阳临近小屯村殷墟西北的西北岗商 – 殷皇室墓地，比例 1 ：2000。

最大的陵墓，正好在山丘之西，为 HPKM1001（1），而在西侧的最外边的一座陵墓是 HPKM1217（2），所有构筑中最大者。排排黑点是无数殉葬人及牲畜的墓穴

图 2.2.2.10、皇家陵墓 HPKM1001，坐落于河南安阳小屯村西北的西北岗皇室墓地中，公元前 13 世纪至公元前 11 世纪，比例 1 ：500，参见《商州考古》，北京，1979。

作为最大的陵墓之一，HPKM1001，表现了商–殷王陵墓的典型布局，是该时期工匠们的发明创造。在中心，是十字形的墓室，原本由大型木梁建构并以典型的施有红彩的精雕细绘而成，这些痕迹已由考古发现。四条坡道通往低于水平面大约 12 米深的木构墓室。在深埋的墓室木板层下面，是九座墓穴。在中心，正好在棺椁之下，是一处墓穴，其中葬有一手执玉戟的死者，玉戟是仪式性的武器。在四个角落的每两边各葬一死者，因此另外陪葬者有 8 人，他们手执真的武器，并陪葬有数只狗。考古学家得出结论，这些殉葬品是保护已逝的主人免除地下的恶魔。整个概念可被看作是“世界的宇宙中心”即“四方之极”的建筑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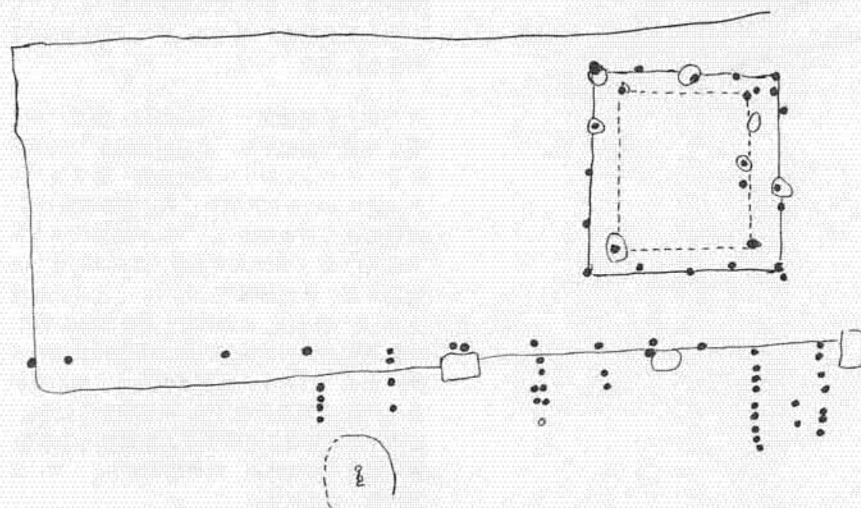


图 2.2.2.11、12　皇家陵墓 HPKM1217，在西北岗墓地的布局，叠加在武丁王的大建筑群布局，以比较这两个概念，比例 1 ：2000。

在南部开敞土台上的方形建筑物，非常特殊地坐落于其非常坚实的基础——深度大于 3 米，它是所有夯土台中最厚且最坚实的混合夯土基础，显示其特别的重要性。我们暂时称其为"君王的宇宙庙宇"（参见：作者试验性的复原，比例 1 ：250）。一个密切相关的概念，也许是在西北岗皇家墓地西部的大皇陵布局的背景，其中，君王位于四极的中心。这一概念，同样在《诗经》的最后一首"殷武"中得到回音。推测这首诗是商代后裔献给武丁王的，大约 600 年之后写于宋国，号称由殷商流传下来。"四域之尊"是一个词汇，意味着"世界的宇宙中心"，也许与上面所描绘的概念一起，在殷商时代就已经发明。

有趣的是，在甲骨文铭刻中，多次提到对于四方之极以及中心的祭祀，或者说，对其神灵的祭祀。专家们持同样意见，认为这种祭祀，非常可能由殷商君王们和他们祭奠的顾问们所发明。"四域之尊"当然是君王，无论在宫殿，还是在坟墓，他都在商的都城受到周到的庇护。四方之神灵及中心之神灵护佑着四域及中心的君王。汉字"极"，我们这里翻译为"至尊"，被用在传统的中国天文学中，用于星宿，北极，即北部的极点。在商代，其中一个星是北极星，被称为极星，所有这些星星，被认为是皇家成员，而极星被设定为"天帝星"，由两个其他的星座包围，形成了我们所称的"紫禁圈"，相似于王宫。商代王室的祖先，被认定在死后转变成上帝，在天宫中以极星出现。结果，所称的上帝星在天宫，"四极的极点"在地球四域的中心，也就是商的都城，在武丁时期就是都城——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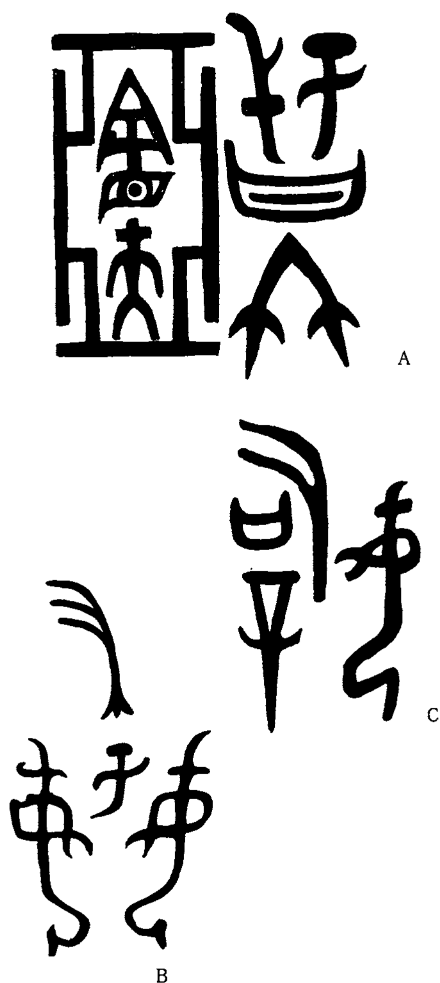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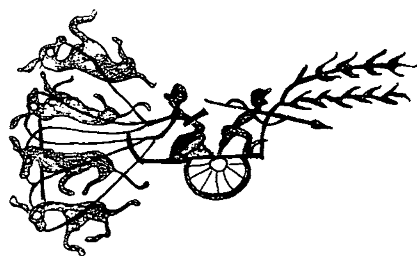


图 2.2.2.13　公元前 13 世纪，在殷商朝代青铜器皿上的镌刻[1]。
A　来自大概公元前 13 世纪的一个方罍（塱），在辽宁省发现。各种书籍文献，已经对这镌刻有所佐证。在"亚"形文字内的文字，象征了"规"，正如女娲手中所示的那样（参见 1.2.1）。
B．来自妇好方鼎，安阳 5 号墓。
C．来自四毋新方鼎　安阳 5 号墓

图 2.2.2.15　三个青铜礼器，大概发掘于河南安阳附近、殷商晚期都城殷都的西北岗皇室墓地的 HPKM1001 陵，大约公元前 11 世纪殷商晚期，72 ～ 73 厘米高，今日为日本东京艺术馆收藏（Fine Art，Nezu Collection）。

自从新石器时代以来，礼器就被用作宗教以及我们冠之以哲学概念等辞汇的表达。在礼器表面所绘制或镌刻的不同设计和模式，提供了象征符号，那也许被认为是最早的书写形式，特别是两者都出于同样目的。大约公元前 2000 年，随着青铜时代的开始，书写系统发展了其自身的抽象原则，而礼器上的设计变得日益自然、写实，它们依然通过结合大多数由动物形式所组成的符号，成为复杂的体系和模式，来表达各种宗教概念。现代对于这些宗教概念分析性的解释，大概永远停留在某种程度的推测，但也许可能获得某些对于思考方式的洞见。

据称，三种礼器并排形成一组，大概安置于一个特殊的长凳之上，就像在几个墓中所发现那样，包括妇好墓在内。中央礼器的盖子，正如铭文所显示的那样，就像一个动物脸谱，有公牛角向内弯曲的曲线装饰，四腿有公羊角的脸谱，两边的礼器，在同样地方有不同脸谱，表明了诸如虎或猫头鹰这些动物的特征，但也有卷曲如蛇一般特征的龙。这些动物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与死亡和再生的生命周期相关，而它们在礼器上变换的位置，也许表明了这个周期。牛角脸谱占据着中心位置，最高贵的位置，并辅有公羊角脸谱。在其他情况下，这些公牛角脸谱，被放置在诸如玉琮这样的礼器的四角，或在仪式玉璧内方形的礼器，或其他方形物的角上。结合这些观察，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公牛角脸谱，象征了中央位置的统治者，也许是一个宗族的象征，其权力延伸到四方，保佑四域。在这三个礼器的例子中，由永恒的死与再生的生命周期所包围着，表达永生的愿望。后代用"万岁"这样的词句来表达这种愿望。这种生命周期，通过由虎和龙代表的灵魂力量而保持动势，而猫头鹰也许表示在死亡黑夜之中的永生（下页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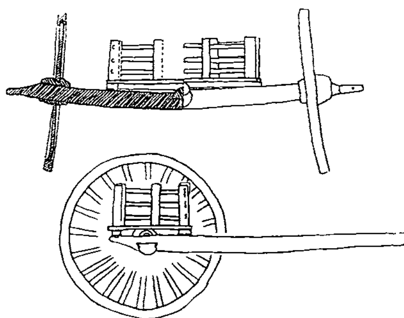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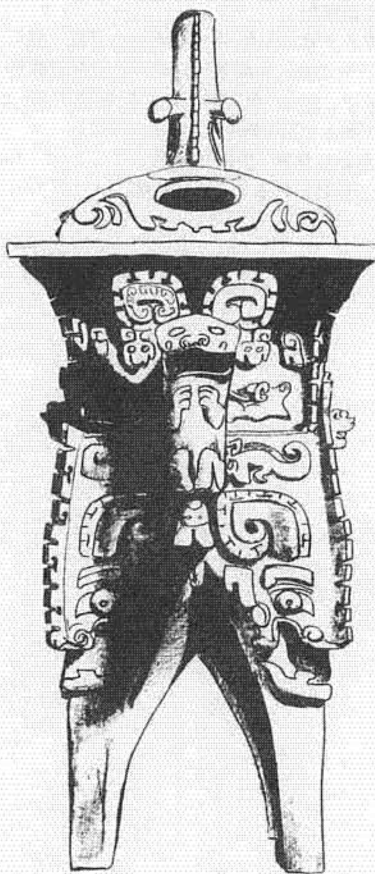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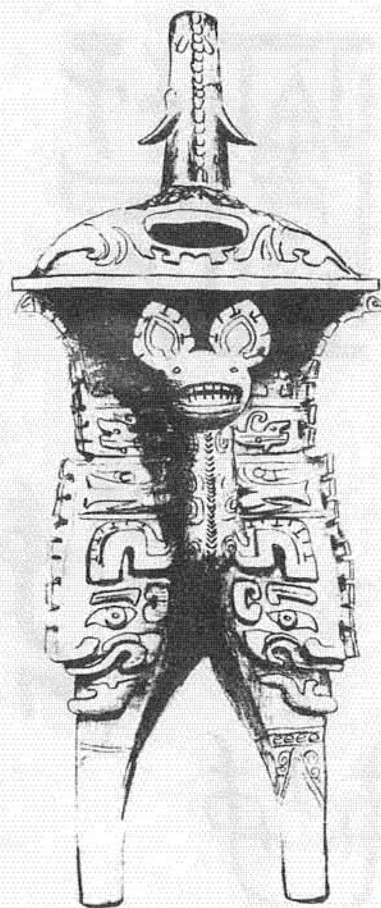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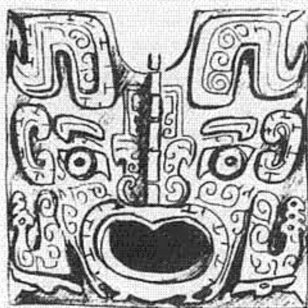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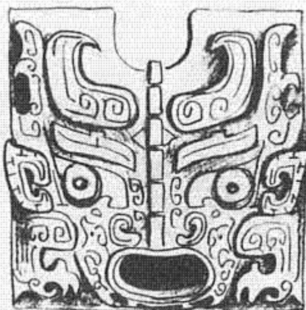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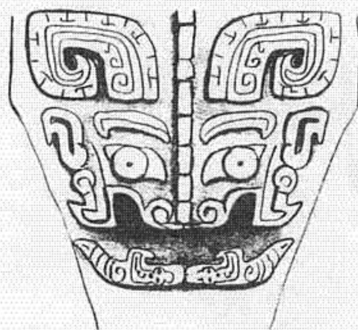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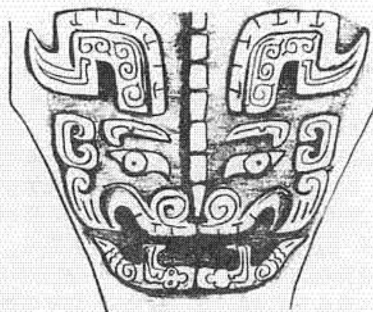


图 2.2.2.14　殷商时期的战车，来自河南安阳殷都附近的坟墓，公元前 13 到前 11 世纪[2]。
在安阳孝民屯附近出土，战车可以从木建构留在土壤中的形象复原。战车同马和车夫埋在一起，面朝下地伏在驾驶者箱子后面。两匹马的脖子上是轭子。后来，外部又添了两匹马，为的是缓解轭子对马脖子的重负所引起的紧张。这在美国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博物馆的东周战国时期簋器皿上的装饰可以看出

1 参见 The Rubbings in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New York，1980.《中国伟大青铜时代的摹拓》New York，1980。
2 参见商州考古，北京，1979。

其精确的秩序，显示大多数的墓葬具有献祭的特征，因此是王室公墓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组献祭的墓穴，在中心的大建筑西边，其中一些直接属于建筑物，大概是在建造过程中作为献祭。另一方面，似乎在王室墓地中没有地面构筑物，虽然，王陵有非常客观的地下构造。

在尺度和布局上，这些王室陵墓，是殷商完全新的创造，明显是一个葬仪发展的结果，发展成为了一个群体，以前未曾听说的一个体系。正如我们以上所提，公元前1463年，武丁有一个祭司；公元前1368年，另一个祭司成为大臣，大概在王室事务中获得了相当影响。在武丁时候，一共有25个祭司生活在宫廷里，而且通过他们的占卜，对仪式施加了某种不可忽视的影响。也许，他们将仪式的发展推向空前的复杂化，从而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和重要性。武丁的宰相为傅说，公元前1267年，也就是武丁统治的第六年，被任命这项职务。据报道，此人是一个建筑工，一个木匠兼石匠。他在黄河以北山西南部一个遥远的地方，过着贤哲般的生活。武丁，在作为一个王子四处周遊的时候，曾经遇到他，后来将他引进内阁事务中。傅说也许对于王陵和建筑物的建造出了主意。这些主意，对于祭司来说是合适的，因为他们创造了一套适应仪式，并表达仪典意义的布局。傅说的文明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仪式中心的扩展。这提供了有组织的空间和背景。由此浮现出殷的武士王国的神权政治结构。武丁对傅说这样说，“你应该教我，我的目的到底该是什么？”傅说道：“审视以前的君王们的完美模式；这样你可能永远受到保护而不犯错误。”这回答证明祖先崇拜的普及很有道理。武丁王同意了，并说道：“愿你能成功地令我成为王室祖先的继承者。”考虑到这个神权政治的背景，与大型建筑物的布局相比较，来解释陵墓的结构，也许会很有趣。基于这样的观点，即陵墓是地下宫殿，或如我们所说，是地下宗庙。

在王室公墓的八座最大的墓穴，都是根据同样布局建造的，而四座较小的墓穴，代表了简单模式。然而，在所有情形下，主要部分是中央的葬坑，其中安置棺椁。坑的底部低于墓顶大约12到12.20米。底部的水平层面积，平均大约150平方米。整个葬坑包含了2000立方米的夯土。在底部是一个木墓室，其中最大的是10.5米×16.2米，加上两个侧室4.0米×4.5米(HPKM1001)，一个较小的能够复原的墓室约3.90米×5.75米，其四边各有一个大约40平方米的墓室，这些木墓室的地面，由20厘米×30厘米的长条木组成，墙大约3米高，精美地装饰绘画。毫无疑问，这些墓室是加了屋顶的，但是10.5米的跨度，中间没有支撑，对木材来说是很大的一个跨度。已经发现的一些残片，显示梁的尺度一定相当可观。考虑到它们必须承载的重量，是大约9米高度的上层土质的重量。大概有一些支撑的柱子，但是它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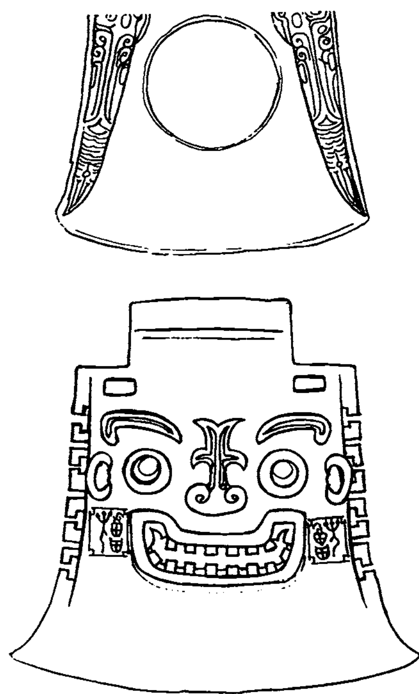


图2.2.2.16，17　两个商代早期和晚期的青铜斧片[1]

图2.2.2.16　来自湖北盘龙城的青铜斧片，在李家嘴墓地M2；长度ca 41.0厘米，公元前16–前15世纪，功能的且优雅的形式，与简易的装饰呈现的光辉，是典型的所谓郑州阶段商代初期艺术呈现的具有刻制的品位。两边蝉的模式，是一个再生的象征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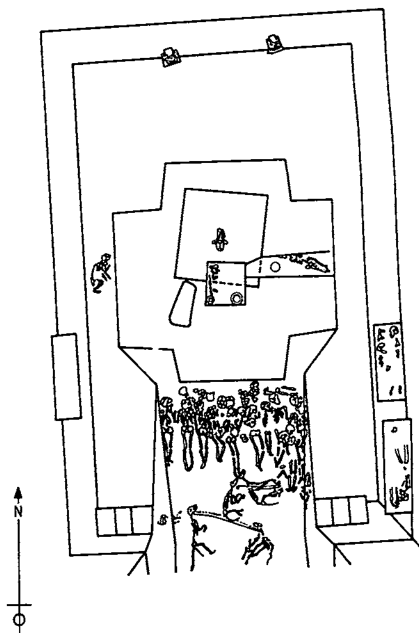
图2.2.2.17，18　斧片来自山东沂都M1墓（参见墓的平面比例1：100）长度31.8厘米，安阳阶段，公元前12世纪，墓主人以跪姿埋葬，面朝北，环绕着三只狗，这个斧和另一个同类型的斧放在他前面。显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布置。在他后面，在斜坡地区从表面直通到墓室，48个献祭的牺牲，大概被这个斧头斩首之后一同埋葬。被蓄意作出的恐怖的面部表情，证明了殷商晚期日渐衰落的俗劣品位（见下页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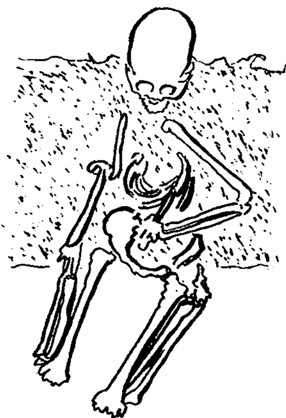
1　参见商州考古，北京：1979。

竖立在地板梁的顶部，并随着它们一同腐烂掉，一点痕迹也不留。

木墓室的地面以下，是有葬品的墓坑。其中心，在设定的棺椁正下面，是一个男子的墓坑，带着一个玉制的戟，是一个典礼的武器；而在四个角落，有八个墓坑，埋有配戴青铜之戟的男子，真正的武器。此外，还发现了九条狗。十字形的木墓室，一个真正的地下王室或宗堂，从四边可以通过指向四方的踏步和斜坡到达。南部的斜坡明显地通向墓室主入口，大概 8 米宽，易于那些抬着棺椁以及所有陪葬礼品的送葬队列通过。当葬仪过程进行到最后——这也许花了几天或甚至几个星期了——整个墓坑以层层实土填满，那些献祭殉葬品埋在不同的层里。这大概与某种仪式重要性概念相符，有多达 96 个人体，这个数字是神圣的，等于 8 乘 12，代表罗盘的八个方向，四季里的 12 个月。在其他层里，发现了 360 件青铜的矛头，而另一层里 141 件头盔、矛头和戟混合一起，所有都是真正的武器，一架拆卸马车的遗存；整个卫队都追随着那死去的君王。

大多数较小的墓穴，没有大型墓葬那么深，东部和西部的坡道也不见了，因此只剩下南部和北部的两个坡道。但是在所有其他方面，较小的墓葬，几乎与较大的墓葬完全一样，并拥有达 79 个献祭殉葬品。殉葬品的特征差异明显很大，其中有几个作为对王室成员的献祭，依循仪式概念，并忠于神圣法则，与君王埋葬在一起。其他人则像动物一样被杀戮，来愉悦祖先灵魂，或其他无论什么隐含在这些野蛮风俗习惯之后的想法。王室公共墓地的几百个小墓坑，大概包括很多战争的囚犯，大约一半是来自西北部落，蒙古人种和爱斯基摩人，而另一半来自南方的海洋人种、黑人种和其他种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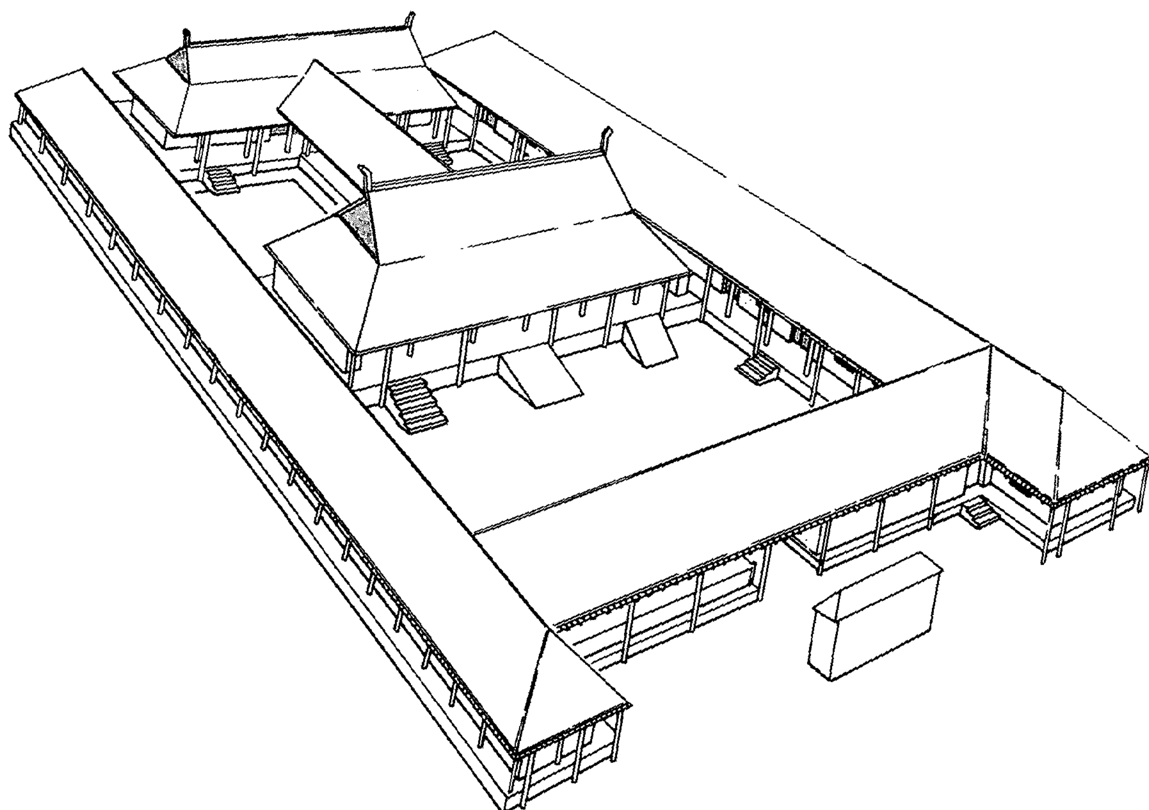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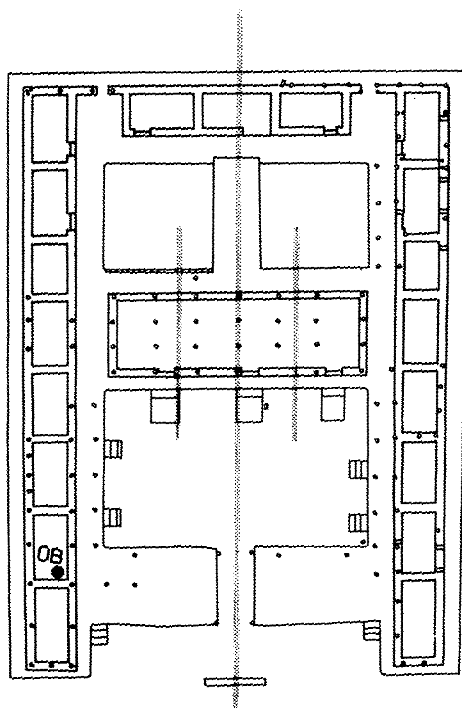


2.2.3 周代以前（前周时期）

关于周人宗族最早祖先之一公刘的传说是这样的：大概在公元前 17 世纪的夏代，公刘将部落移至陕西省中部的豳。因为周人自认是黄帝的后代。他们可能与夏代人有着某些相同的性格特征，因为夏人称黄帝是他们的祖先。最初是游牧民族，他们在豳定居下来，几个世纪在那里过着更为永久性的定居生活。

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是关于他们向南的迁徙，进入渭水河谷到了岐山一带。伟大的商王武丁，公元前 1214 年死后，商势力有某种程度下降，而西部的游牧民族——周人——结束了与商的联盟，武丁的第二个儿子祖甲，大约用了 20 年的时间，最终成功地使周人归顺，公元前 1190 年，他确定了祖庚为豳太子。32 年之后，武丁的太孙武乙在公元前 1158 年成为商王时，豳太子将其臣民迁移到岐山，而在公元前 1155 年，豳太子亶父，在周的新城，被确认为周的古公（号周太王）。有关这个周的新城——在岐山的城市（也称岐邑）——建立的传说，《诗经》中的一首诗如此写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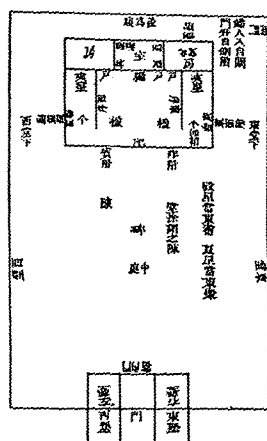


图 2.2.3.1 公元前 11 世纪，陕西岐山凤雏，周代以前庙宇／宫殿院落建筑群的复原，有某些修改[1]。

图 2.2.3.2 公元前 11 世纪，陕西岐山凤雏，比例 1 ：500[2]。从布局来看，这建筑似乎是一个双生建筑，在中轴线上有一根柱子，每一部分三开间，柱子之间的开间 15 英尺宽（周尺 =19.9 厘米，6 商尺大约等于 5 周尺）。但是，墙上的三个门和三个踏步在柱子之间，使得这个建筑物看上去是一个分成三开间的建筑，中央的门和踏步必须移开主轴线。周密设计的院落，以一排房屋围绕着中间的建筑物，在大门两边，总共有 19 间外加两个大厅。在西南角的一个房间，挖掘有大约 17000 件甲骨，其中有 190 个刻有文字，包含多达 32 个文字。这里多次提到前周代的统治者文王的名字，他也许用这个建筑物作为宫殿、庙宇

图 2.2.3.3 周代宗庙复原图，由中国学者基于文献资料，如仪礼图（注：清，张惠言撰）。[3] 两个阶梯直通到平台和门房建筑，似乎显示了双坛的概念。这里的做法，很显然，与分成三开间概念的某些元素结合

1 参阅文物，1981/3。
2 参见商州考古，北京，1979，文物，1981/3，1979/10。
3 参见商州考古，北京，1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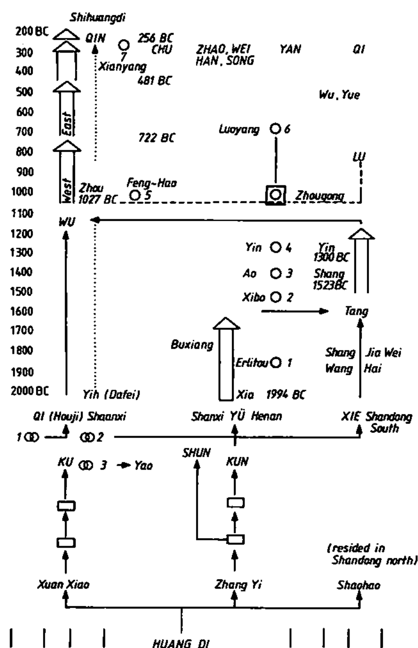


图 2.2.3.4 古代的"三代"图表以及与其共同的祖先——黄帝，想像上的关系。圆圈表示主要的都城，1–4 和 6 在洛水地区，5 和 7 在渭水地区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
率西水浒，至于岐下。
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周原膴膴，堇荼如饴。
爰始爰谋，爰契我龟。
曰止曰时，筑室于兹。

乃慰乃止，乃左乃右；
乃疆乃理，乃宣乃亩。
自西徂东，周爰执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
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
乃立皋门，皋门有伉。
乃立应门，应门将将。"
（雅 · 大雅 绵）

这一描述，似乎与陕西省岐山出土的一个建筑物的构造相吻合，那正是诗中所描述的确切地址。这些建筑物，很有可能是亶父的宫殿或庙宇，或甚至两者合一的建筑。正如诗中所写。碳 14 测定显示的年代，是公元前 1095±90 年，即亶父在世时期。他是公元前 1137 年死的。整个建筑物建造在夯土台上，45.2 米 ×32.5 米，在其中的一间屋子里，出土了大约 17000 件甲骨，其中大约 190 件龟甲上刻有卜辞，其中之一甚至有多达 32 个文字。

建筑物的南面，是一个公共墓地，在此发现了几个青铜器皿。到目前为止，无法获得关于围绕这明显的中心建筑物而成的聚落地区的清晰想法，但是，对于建筑群的一个非常周密的复原是可能的。布局是比二里头 2 号合院更高级更复杂的形式，其详细的设计，为后来的 3000 年建立了典型的中国庙宇及房屋的合院布局。它可能容易地被看成是 19 世纪中国城市中合院式建筑的布局形式。然而，在此，商代晚期的建筑得以很好展现，一个在王都之外的太子的大型建筑物，而商代都城的伟大建筑群，是随着渐渐变化的观念而持续发展的结果。这个合院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规划单元，所有的细部相互配合，后来的附加也没有改变或扩展。布局的实施，展示了一个非常成熟的测绘技巧，以及度量体系的精细应用，以确保建筑物的准确建造。对于度量的深层研究显示，在中心的主要建筑物，以及在它前面的合院，以"六尺"作为度量单位，基于商代以脚步为单位的度量体系，它被叫做"步"，大约相当于 1 米，正如诗词中所提，以一个测量线 12 尺，很有可能量出整个建筑物，并在所有角落得出正确的角度。很有趣的是，在岐山结合采用了那种发现于二里头建筑物的两种模式，即双单元和三个单元。中心的主要建筑是一个双单元，因此这也许可以被称为庙宇，而在其后的建筑物，是一个三个房间为单元的，也许是太子的宫殿。前后两个建筑物，由升起的大概加了屋顶的过道相连，南部的前厅或门厅，在每边有一个伸出的建筑物，好像是为卫兵看守之用或类似的用途。

我们将在这个布局和商都殷的大房子建筑物布局之间进行比较，用以指出两者之间的相同之

处，加以描述，这是前者一个缩小的布局模式，大概适合于君王的诸侯。然而，它可能显示了周公要达到更高目标的雄心，在不久之后他就做到了。

亶父死后，周的命运由两三个非常能干的君主得以增强。公元前1137年亶父的继承人是季历，他赢得了讨伐西北游牧“魔鬼”部落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公元前1127年，在他统治的第十年，他拜谒了殷的宫室，在那里，商王武乙对他极为尊重，授予他珠宝财产，并将商公主许配给他。他继续成功地打败了西部的“西落鬼戎”部落，在公元前1119年，商王将其地位升为第一太子。然而，季历在陕西省东部商领域的边界，于公元前1118年建成了澄城后，征服了更多的部落，将其首领作为阶下囚，并将他们呈献给殷的宫室。商王文丁（公元前1123－前1110年在位）在公元前1112年大概出于公正的考虑，将季历处以死刑，然而，在公元前1101年，太子昌，即季历的儿子和继承者，从商的最后一位王——帝辛那里接受了西部的西亳首领的头衔，据说，太子昌已经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统治者，在公元前1095年，在现在西安城大约30公里以西的地方，他父亲的坟墓前为祖先做了祭祀；这时，他采用文王作为头衔，即文明之王，将自己摆到与商王的同一个层面。公元前1078年，拜访商王时，帝辛将文王投入狱中，六年以后的公元前1072年，不得不将其释放，太子们护送文王回到了澄城。两年以后，文王组织了正规军队远赴西部，两年以后，依然将新近战争中的俘虏带往澄城来增加那里的人口。同一年，鉴于文王“攻与罚”的权力，商王不得不谨慎地与之妥协，这几乎意味着与天帝同样的权力。公元前1066年，文王在现今西安西部的丰，建立了自己的都城，并从澄城迁移到了那里。后来若干年里，多是花费在拓展都城上。跨过丰水，铺开了另一个称为镐的聚落。一同形成的还有一所学校和一座灵塔，一座也许与殷时的大建筑物前面那方形建筑物同样重要的建筑，结果仅仅适用于天子。公元前1060年，文王故去，将使命留给儿子，把周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个儿子周武王，在进攻殷的十年混战之后，完成了这项伟业。商王在公元前1049年（根据当代编年史，为公元前1027年），殷都城某处的宫殿里自焚身亡。

2.2.4 商的城市化——小结

据估计，夏代在公元前2000年前半部分的领域里，有大约1百万人口。但是只要夏版图的界限仍有疑义，这样的数字就没有价值。这也同样适宜商的领土。那里，到商朝末年时，估计拥有大约310万自由人和110万奴隶，算出可耕地面积的可能性更小，这是任何其他理性估计的基础，也就无从判断这块土地上大致的人口密度。从汉代公元2年的第一个统计看，我们可以估算，整个版图的人口密度达到了某种程度，比如，河南省整个地区的密度为，每平方公里大约42人，这个数字，同样适于此前的一千年。如果我们仅仅关心可耕地，这个数目可能会增加二到四倍。一个拥有大约5000居民的城市聚落，也许需要大约400到800平方公里的可耕地，总共需要大约70000到100000人来支撑这片可耕地。嚣（郑州）和殷（安阳）的都市地区，可能都是这样的规模。结果，人们可以计算出，夏的领域，不会超过6到8个这样大小的聚落，外加几个小一些的聚落。对于商的版图来说，我们可以说，大约有20到25个如此规模的城市聚落，外加40来个小一些的城市聚落。这个数目，与甲骨文和其他资料记载的封地数目比较吻合。后者显示王城之下有7个地区可列为二等、15个为三等、27个为四等，3个更低等的，总共52个单位。每个单位，至少有一个城市和仪式中心，所以，整个数目，也许会升至60到70，拥有大约150000到180000的非农业人口。我们不知道商代所影响的任何其他区域的城市聚落，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这些区域向北扩展到辽宁省南部，向南跨过长江界，包括其西部的整个渭河上游河谷，及其南边的汉水河谷。[1]我们仅有些散点式的考古学发现，商代所影响的版图内非农业或城市人口比例，也许未超过整个人口的4%到4.5%。

1 注：参阅谭其骧主编《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1996。



图 2.3.1.1　山东曲阜周公庙中的周公像（卒于公元前 1022 年）。它大概立于当时周宫殿建筑所坐落的地点。这坐像是现代的

2.3　青铜时代的晚期

如上所见，虽然，周代以前的封地，一定是商文明的一部分，在周王作为古代中国封建领主而建立了朝代后所发生的变化，以及有所变化的青铜艺术的出现，证明了“青铜时代晚期”这个语汇。

整个周代，持续了大约 8 个世纪，通常被分为两个主要时期：西周时期，其都城坐落在古代渭河河谷（公元前 1046– 前 770 年）；东周时期，王室进一步向东迁移到今天河南省洛阳一带（公元前 770– 前 256 年）。后者东周时期再细分为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这两者的时间界限为公元前 481 年。

虽然，现代学者们大体同意以公元前 1027 年为周代建立的日期。[1] 为方便起见，我们将继续使用《古本竹书纪年》给出的日期。区别仅仅将近 20 年，而且不管怎样，两个世纪之后，这种区别也将消失。所以，这近 20 年，在此似乎并不重要。其他学者，根据正统《三统历》的纪年，以公元前 1122 年作为断代。这种断代法用了 1000 年，一直用到 13 世纪。因此，我们说，《古本竹书纪年》提供了一个正统的编年史，直到 12 世纪。

武王克殷后，从这个东部地区，撤回到西部其先祖在渭河河谷的势力范围。因此，将整治的君权，从中心区转移出来。过去的几千年来，那里的政治文化持续发展。其根源能够进一步追溯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时期。如同所有朝代的家族，武王也自称是黄帝的后代，而这祖先黄帝传说中的陵墓，刚好位于其王室只有 140 公里以北的地方。但看上去，周的某些基本特征，使之与其遥远的亲属有所不同。这导致了古代中华文化发展相当的变化，这种变化被描述为：中国的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变化和革命，从没有比殷周之际所发生的变化那样大。最初似乎只是一个更为先进的发展，正如我们在岐山的建筑物所见，却可能已经成就了一个基本的区别，一个新的秩序和模式，反映在度量体系的一丝不苟上。

2.3.1　西周（公元前 1046– 前 771 年）

公元前 1158 年，亶父在岐建立了王室，然而，他儿子季历，将封地的都城，在公元前 1118 年后的某个时间，迁移到陕西省东部的澄城，作为商西部边界领土的一个哨卡。而文王在攻克了澄城的首领后，于公元前 1066 年，将其王室沿着渭河又向西移，从澄到丰。在公元前 1066 年，沿着渭河，他已经在这一带攻克了澄的首领。1 年后，在丰水之东，建了新都镐。在此，他建立了辟雍，3 年后，加建了灵台。这是两个具有最高秩序的机构，适于封建领主、君王的地位。不幸的是，我们难以解释其功能和结构。丰 – 镐的双城作为周代的都城，持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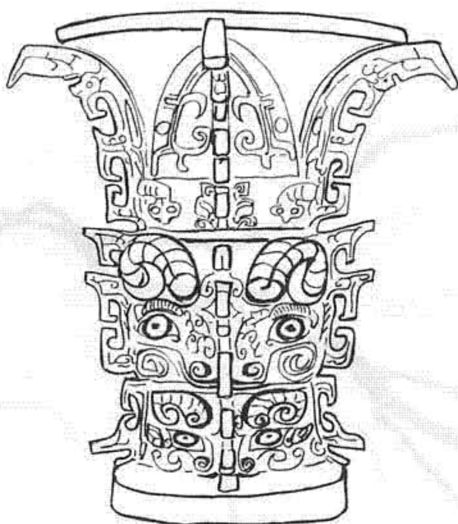
1 最新考古研究已经前推到公元前 1046 年。公元前 1027 年，根据古本《竹书纪年》；公元前 1046 年，根据今本《竹书纪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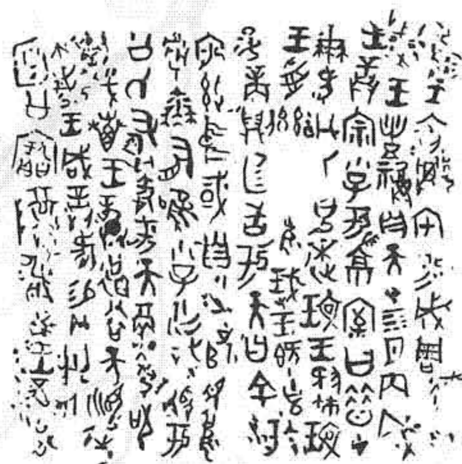
两个半世纪以上。人们相信，祖庙安置在丰，而镐则拥有宫殿、带有好几个部门和机构的皇家首脑。

虽然，考古学已经确认了丰－镐一般的坐落位置，其相当数目的房屋平面，墓葬、作坊以及该地区其他遗存也已经出土，城市聚落的总体模式和布局，依然是一个谜。由于岐山的宫殿，已经如此成功地复原，这里的谜团更甚。目前为止，对这一地区所做的调查，覆盖大约12平方公里的丰和6平方公里的镐。但是后者可能已经覆盖了更大面积。其中有些部分，完全在秦汉两代建造帝王苑囿昆明池时毁坏，因而，这个苑囿，除了其他遗留，含有旧的王都遗存。

由于丰－镐聚落结构，某种程度上与安阳殷商一带的聚落结构相似，只要发现周代的仪式中心，这个迷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资料显示，这个仪式中心，应该坐落在丰的某个地方。大约在这个中心的正北23公里，渭河之外的地方是周王陵。多少世纪以来，那里以文王、武王、成王和康王（即先祖统治者文王和他的三个继承人）的陵墓所在地而闻名。此外，那里还有周公（武王之弟）及其子伯禽（鲁公）三人的墓地。皇家墓地的主轴线，指向正南的某处，那里可能有位于丰之中心的宗庙。丰之正东，镐之东南大约10公里处，坐落着第五位周王穆王之墓，这也许为判断周代仪式中心的坐落位置，提供了另一条线索。

武王94岁死去时，他的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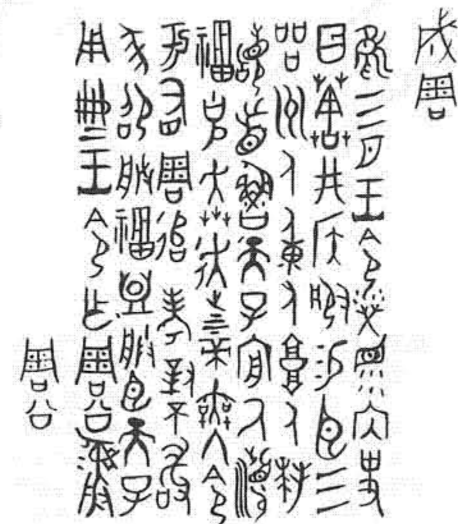


图2.3.1.2 在陕西宝鸡县所发现的祭祀青铜器，现藏于陕西省博物馆，公元前1038年（根据《古本竹书纪年》），38.8厘米高[1]



杨尹默提供何尊图片

这个容器，就是著名的何尊，以殷商晚期青铜风格所进行的设计，在周代初期依然盛行。它顶部是圆形，底部是方形（圆口方体），而且这个方形可以精确置入圆环里，象征四方之土由寰宇环绕。装饰分为三层，在底层最小部分，方形四边各有一个公羊角面谱；在中层部分，是一个更大更为强有力的公羊角面谱的表达形式。最后，在最上面一层，围绕何尊有四道大扉棱装饰，口沿下饰蕉叶纹，颈饰四只蝉翼为装饰主题的蚕纹。这样一种设计，也许可以解释为敬献此尊的人，希望献给苍天保佑的祖先，并以蝉翼象征永恒的回归。因为这个献祭者及其祖先，在层级社会中低于王族，属于诸侯阶层，他们的族徽是羊角，而王族的族徽是牛角，正如我们在上面对殷商青铜器所进行的同样描述。容器的底部有题献铭文，铭文大意是：周成王"初迁宅于成周"，福祭武王、成王五年四月丙戌日，开始在成周营建都城，对武王进行丰福之祭。王在京宫大室中训诰宗族小子，何的父亲辅弼周文王，很有贡献，文王受到上天授予的统治天下的大命。等到武王攻克了大邑商，则迁告于天说：我在这里统治民众，周王室，周王赏赐何贝30朋，何因此作尊，以为纪念。根据《古本竹书纪年》，这应该是公元前1038年，确定了由周公建立成周的日期。[2]

铭文有12行，每行9个字，有点被腐蚀了，具有同样方底圆边一般性设计的容器，在1928年河南洛阳附近和1956年陕西眉县礼村也有发现。前一个，根据《古本竹书纪年》，可以通过铭文判定为公元前982年，而另一个，大概是80年之后的。根据南京博物馆和陕西省博物馆信息，它们都是典型西周风格的青铜器、成周城的名字在右下角提及

1 参见《文物》1966/1，1976/1。

2 参见《文物》，197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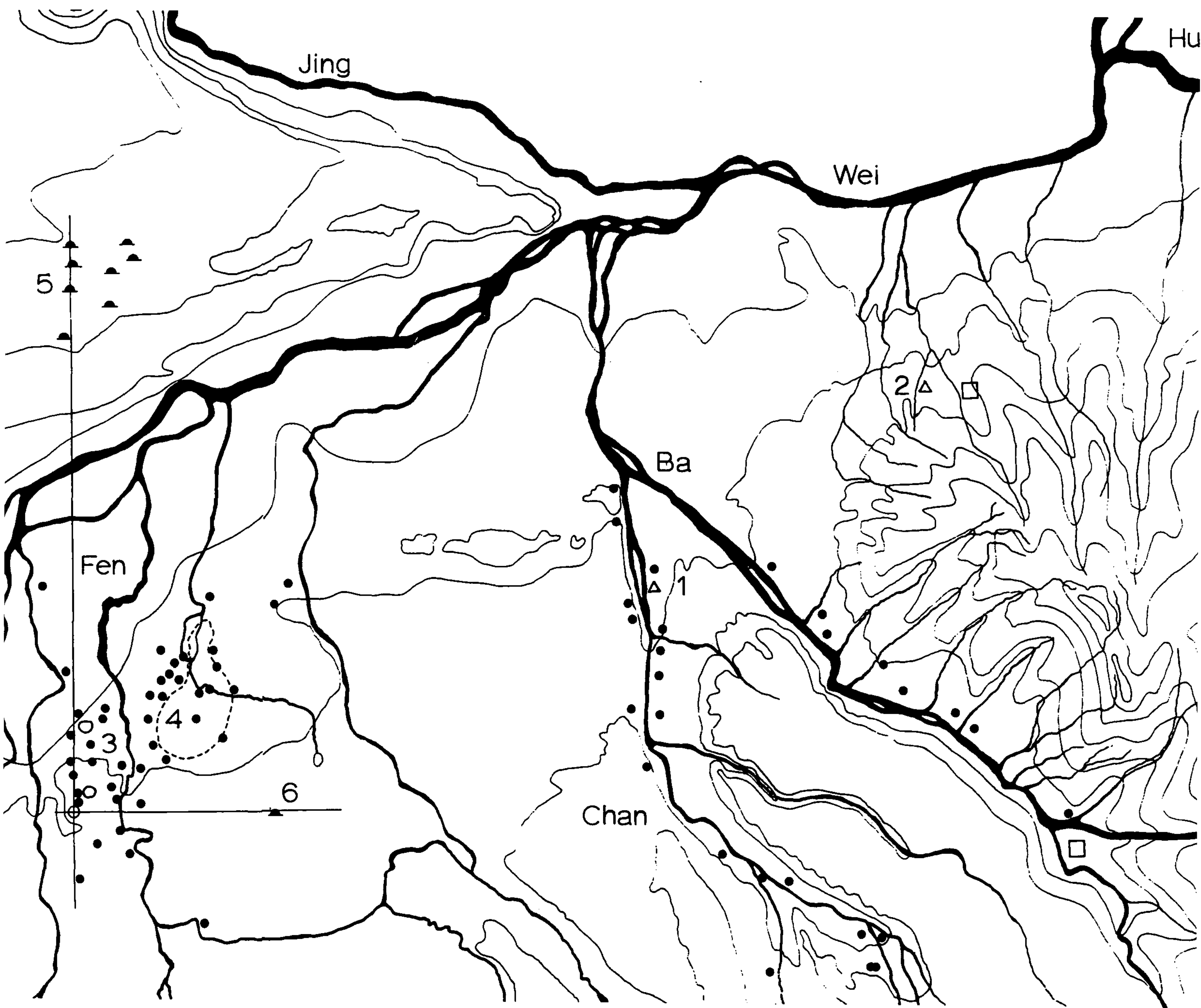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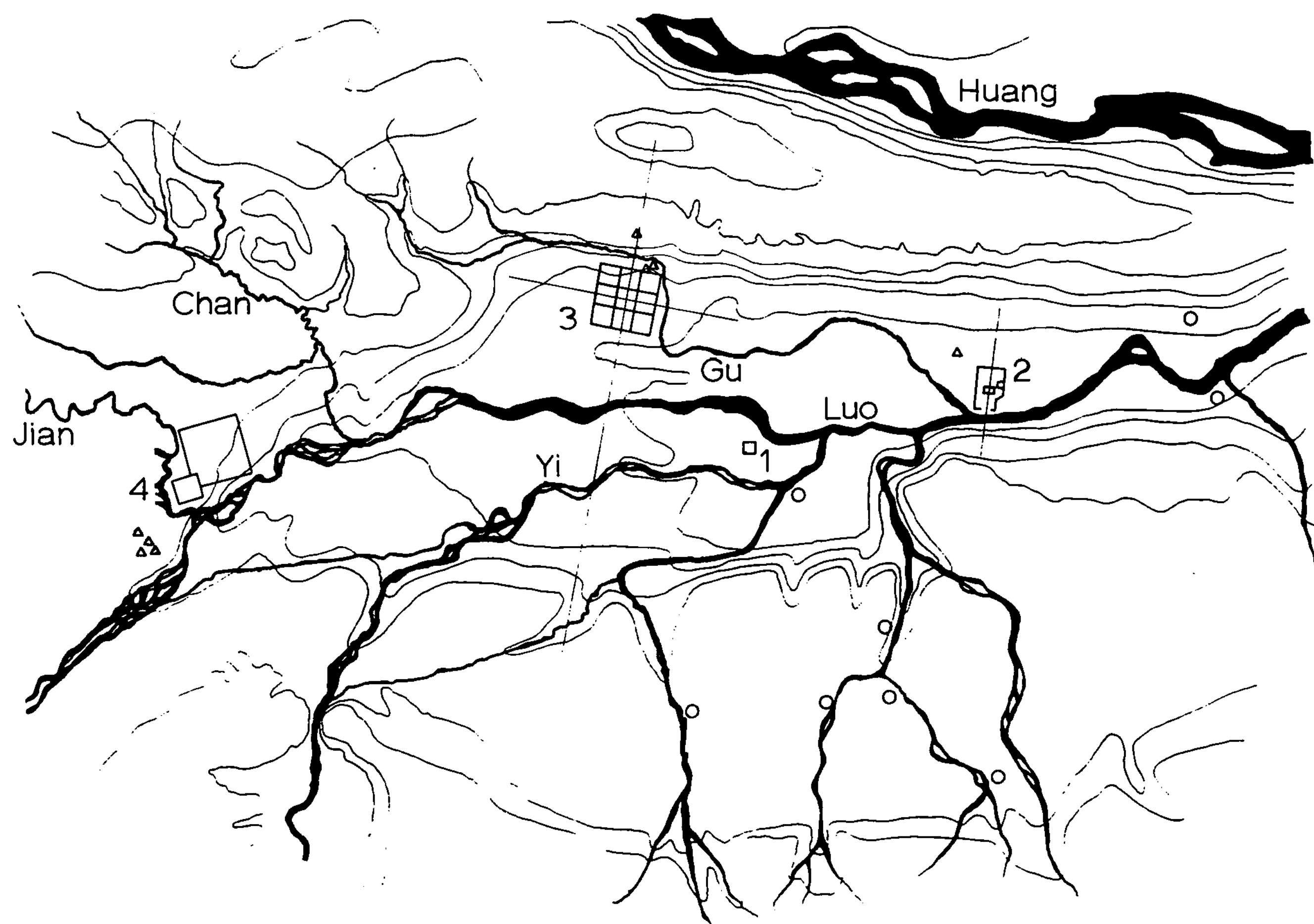


图 2.3.1.3 渭河河谷，比例 1 ∶ 250000。右边是灞河和浐河，那里有仰韶文化的新石器遗址。浐河边上是半坡（1），再向东是一条小溪，边有姜寨（2），左边是汾河，有各种考古遗址，那里发现有周代早期的遗址，在河的西岸坐落着聚落组群，称作"丰"（3），那里，坐落着周代祖先宗祠，河的东岸是"镐"（4），皇室所在处，有宫殿和两座建筑物，即文王的辟雍和灵台。周的王族墓地（5），坐落在渭河以北，丰的正北、镐的东南，是公元前 961－前 907 年在位的第五位周王即周穆王的坟墓(6)。在镐区域的点划线，表示了后来昆明湖的坐落位置，该湖大概毁坏了大部分周的都城镐，或者说镐的遗址。因为丰／镐在公元前 769 年就已经被毁坏了

也是法定继位人，仅 14 岁。与商的习俗形成对比，周的继承法是君王之弟兄不能继位，因此，必须有一位摄政者。武王所有的八弟兄中，根据封建的做法，都接受了封地。其中，在山东的鲁公，任他侄儿的摄政王，他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周公。他已经作为宰相，为皇兄武王服务，作为摄政王，只是继续保持英主的旧传统，当然，很明显地采用不同的方式。王室依然在镐。有权势的武王死后不久，殷的前太子，在周公其他一些兄弟们的支持下反叛，他们也许希望由此摆脱周公。暴乱被平息，然而，公元前 1042 年以及接下来的一年，殷的旧商都，与在山东北部的老城薄姑一起被毁灭。正如上文所提，薄姑，可能是当时暴乱的一个重要据点。那是由商的太戊王，在公元前 1416 年最先以城墙修筑的城市。所有反对叛乱的行动，都控制在周公手中。他在以前商控制区域中心的东部设立了总部。很显然，他觉得，在镐的王室，坐落在太靠西部的远处，以致于无法对大多坐落于东部新建立的周领地实施必要的控制。结果，他提议在河南的洛河之北建立新都。公元

图 2.3.1.4 洛河河谷，不同的青铜时代城市的基址，比例 1 ： 250000。
(1) 二里头，圆圈表示二里头时期附近的其他地点；(2) 偃师县西亳商代的第一个都城，由汤王所建，伊尹的坟墓在它的西北；(3) 周公的“神圣之城”成周，代表周意向的都城。在它的北面，是东周的三位王陵；(4) 西周的洛邑和王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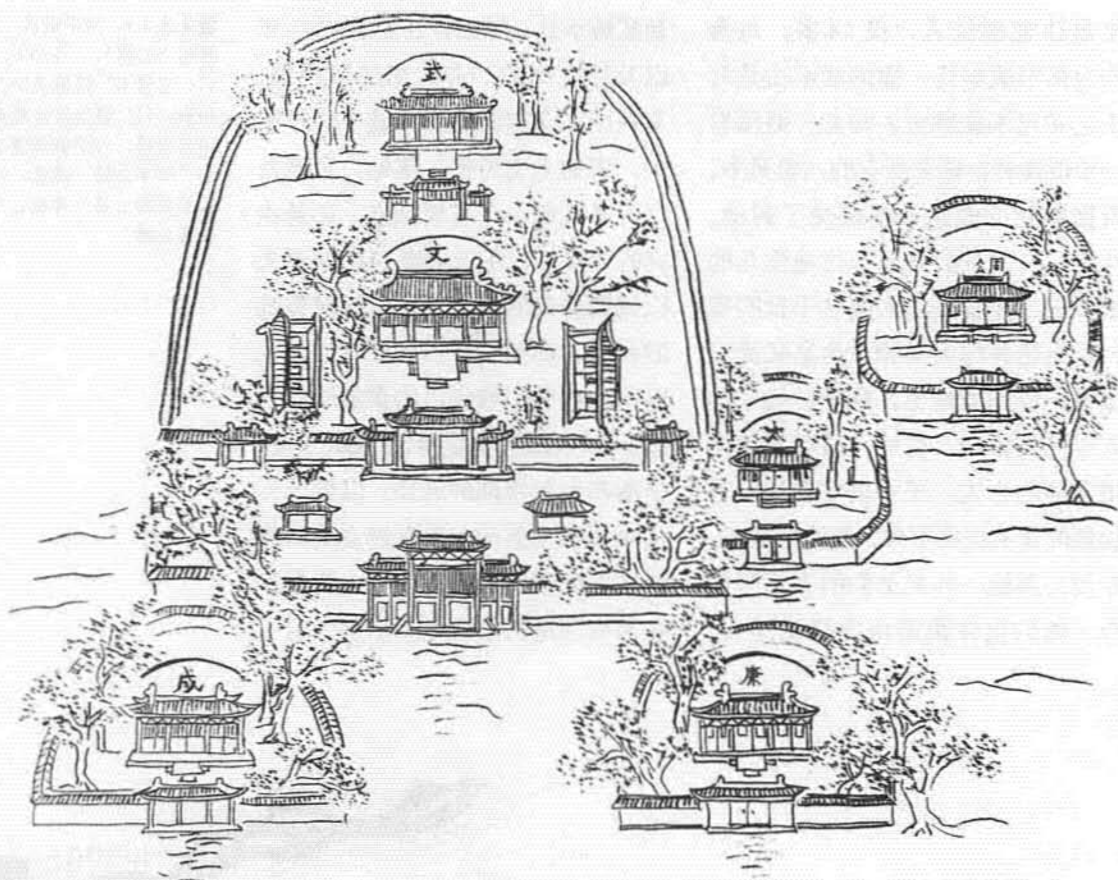




图 2.3.1.5 在陕西咸阳附近的周初王陵，参见《咸阳县志》，18 世纪。

最上面的坟墓是武王墓，在下面围墙围绕的中心是文王墓，在主要建筑群前面左侧是成王墓（公元前 1043– 前 1007 年在位），而右侧是康王墓（公元前 1006– 前 971 年在位），主要建筑群的右侧，两个涉及建立成周的主要人物被埋葬在此，即太师召公和在他后面北边的周公，埋在这里，违背了周公的遗愿，他曾经向年轻的周成王表达了愿望，将他埋在所建的成周。文王因其德行而被认为是朝代事实上的建立者，而武王对于殷商的征服，被认为只是带有造反和弑君行为，这在他们陵墓相对的位置也可以表达出来

图 2.3.1.6 好战的周成王（公元前 1043– 前 1007 年）会见他的叔叔，也是他的宰相周公，参见《钦定书经图说》，1905。

王站在他的士兵们面前，看上去身着将军制服，而周公由官吏和学士们陪同，名称是“王来自奄图”

前 1046 年，正值殷衰落之际，殷商的九鼎，已经转移到了那里。武王本人曾经也表示希望翻开历史新的一页，在那个地区建立自己的都城，但两年后的武王之死，使之没有可能。

公元前 1038 年，行动得以实施。依然居住在殷都的殷人，被迁移到洛河河谷。并且被限定在大概位于商代故都西亳附近的地区。因为周已经摈弃献祭战俘的习俗，代之以割下战俘的左耳，献于祖先的祭坛，这些战俘，被安置住在受控制的地区，重新受教育，从而融进新的王国。因为这样一个目的，洛河河谷建新都城的概念得到发展。随着年轻的成王开始行使职权，周公已经放弃摄政，并于公元前 1036 年，与召公一起担负起建立新城的任务。文献如此记载：召公先于周公前往考察地形，公元前 1036 年 3 月的第 3 天早晨，召公来到洛地。他向龟甲问卜咨询关于地址的选择，并获取了有益的暗示，从而着手制定计划。又过了 3 天，他带领殷人在洛水之北堪舆，任务在第 5 天完成。接下来的一天，周公在早晨来到洛地，并且全面彻底地检查了城市计划。再过了三天。他在所规划的未来城市的郊野之处，祭献了两头公牛，并在新城的土地神灵台，祭献了一头公牛、一头山羊和一头猪。7 天之后的早晨，从他的书写诰文中，人们接受了各自的秩序，他们雀跃地开始自己的工作。在他献给王的报告中，周公说：周王似乎并不臆想上天赋予的、包括新城市的建立等等使命，因此，我听从并追随召公，并对东部地区进行了大量调查，发现一处可以君临天下的地方。清晨，周公来到洛，首先，他们给这东都筑造了城墙。

这是《古本竹书纪年》和《书经》中有关周代新都城建立的描述。在后来的若干世纪中，关于建立的过程或关于坐落地点的解说，并非总是清晰的。但因为有了现场挖掘和考古学的支持，我们也许并不感到难以解释以上的文字。

周公调查了三个不同的地点，第一处位于黄河之北，在河南省的安阳和新乡之间，邻近今天的淇县，这里，因最后一位殷王在其建造用来享乐的宫殿里自焚身亡而著名。这个宫殿，远离殷的宗庙和土地坛的神圣之地。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周公当时对于这个地方的想法，也许是对殷人的一种姿态，周公选择的另外两个地方在洛河之北，邙山之南，涧水之东和老城西亳之西，是汤王的商都。这也许还是对殷人的一种姿态，提醒他们那已逝朝代的王者之德，它甚至可能是对夏代神圣王们例如大禹和不降等的一种敬畏。其中一处在旧商都的西边，称为成周。另一处更往西约 20 公里，涧水之东，因此被称为王城。看上去，周公集中精力于建立成周——“取得成就的周”，它被当成是东都。在问卜了此地是否安吉之后，他考察召公已经规划了的地段，随后对该地的神灵——即神圣之地的精神实质——行了祭礼。如此这般开始了工程。殷人被组织起来，执行周公所命令的任何事情，首先是建造新城的城墙。过些时候，周王来到洛邑附近的另一个地方，殷的太子和贵族们都来表示敬意。周王对这些人发表演说：“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不会对四方有所摈弃），亦惟尔多士（指殷贵族），攸服奔走（服役而效劳），臣我多逊（要臣服于我而多顺从），尔乃尚有尔土（仍能分配给你们土地），尔乃尚宁干止（安心于事业和居处）”《尚书 · 多士》。[1] 周公则说道：“让周王首先在新城中采用殷的庆典和献祭仪式，以一种有秩序的方式做所有事情，但并没有任何张扬”。所以周王在那里一直住到冬天，举行了年度的冬季献祭，向他的父亲武王和祖父文王各献上一头红公牛。动身前往镐的旧宫殿时，他命令周公留在成周作为管理人。然而周公只是说，“现在，这座伟大的城市已经建立，从此，大王可能是苍天的伙伴；从此，他可以虔敬地向普天上下的神灵献祭；从此，他可以在这个中心治理天下。让大王作为上天的代理来到这里，并在这个地方中心实施治理职责。”但是已经获得权力的周王，在新都城建设的第一年，就已经改变了想法，并回到宗周，丰镐，在那里，公元前 1035 年，当他将当时在山西省中部的唐国人，

1 译者注：《尚书》的《多士》，是周公用“王命”来教训迁到洛邑的殷贵族。书序说，“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诰，作多士”。参见杨宽著，《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重新安置到旧都城西北大约100公里处的地方时，他强化了自己的权力基地。同年，他下令，将从殷而来的另一组人安置到鲁，一个最初由武王分封给周公的领地。该封地，后来传给周公最大的儿子伯禽。伯禽在曲阜建立了一个新都城。公元前1321－前1300年间，商已经在那里建造了王室。这种聚落的重建，也许与成周的方式类似。因为鲁的新城基于同样的原则建立，而且可能由周公奠基。公元前1033年，周公退位，并回到了丰，11年后他在那里死去。他的第二个儿子，于公元前1032年，被任命为“成周”的治理者，3年后，即公元前1029年，他完成了城市的建设。

如上所见，洛水和伊水之间的平原，是一个中空地带，被称为“夏墟”。可以推测，这是该地区古老的神圣之地。这里重要的夏代祭祀地点之一，坐落在二里头。当商汤颠覆了夏的最后一位君王时，他也在二里头北部地区建立了自己的“西都”，名为西亳。当最后一位商王被打败，周代的统治者，又在该地区商的西亳附近建立了“东都”。胜利后，他们在西亳之西的洛邑，存放了神圣的九鼎。而新城“成周”，就在这两地之间建立。我们可以假设，这个地区永远被认为是世界的中心，正如后来洛阳城被称呼的那样，而且，每一个朝代都试着在此地重建世界中心，一个极重要的、希望展现奇迹的行为。但历史表明，作为一个真正的政治权力机构的所在地，无论在上古，还是在后来的中世纪，该地区绝无任何特殊重要性。公元1000年末期，它甚至完全失去了重要性。

公元前1025年，周王终于来到洛邑，并在这里，永久地安置了公元前1046年武王带到该地的九鼎。据传说，这正是900年之前，大禹时代夏代之初所铸的献祭器皿。但这种可能性极小。这个仪典具有最高等级，被认为是建立朝代的最后一步，并在后来的时代里附加了各种神圣传说：外观制成了凤凰，在黄河附近敬献牺牲。周公和周成王一起去视察洛河，向水中扔下一块玉璧而结束了所有的典礼，周成王引退，并等待天暗，然后神圣的光线出现，一条绿龙出现在祭台上。在洛河上，大龟甲做着同样的事情。都将卜辞（甲骨文）放在祭台上。记载的全是关于未来帝国命运的兴衰，麒麟在公园中徘徊，凤凰在庭院中飞翔，成王带着一支笛子，吹奏吟唱：凤凰全都围绕着我的殿堂飞翔，我有何德来召唤灵魂？这是从以前的君王那里的影响，那是前人的赞美，在人们的家里回响。

7年之后的公元前1018年，周成王最后一次来到东都“成周”，他召集了大批王子，四域的蛮人部落都来归顺。九年后，他在宗周镐死去，并在公元前1006年被埋葬于渭河之北的皇家陵墓。之后的大约200年间，没有关于“成周”的任何记载。公元前817年，我们读到周宣王在那里聚集了王子们，之后在附近狩猎。公元前769年，开始了成周历史上新的一章。周平王将王室从宗

图2.3.1.7　成周的复原，来自《三礼图》1175，宋代学者错称其为王城（参见2.3.3.1）

图2.3.1.8　洛阳成周城，公元前1038年由周公所建，比例1：20000。这个复原图叠加在公元536年北魏朝代洛阳城墙的考古地图之上[1]。A–A 今天的洛河；B–B 北魏城墙；C–C 邙山；D–D 固水河（也叫阳谷渠）；成周方城的度量基于商尺，相当于16.9厘米（1里=304.2米）1.带有中央宫殿的宫城；2.后来有南宫的宗庙；3.社稷坛；4.宫殿北的三个市场；5.东周墓园：a.景王（贵）墓（公元前544－前520年在位）；b.威烈王（午）墓（公元前425－前402年在位）；c.烈王（喜）墓（公元前375－前368年在位）；墓地中，葬品的日期根据随葬青铜器皿确定。从公元前404到前278年。这个布局，正如基于度量所复原的那样，结合了四方之极的交叉，这在殷商朝代如此重要，有着9里×9里的幻方形式，这种度量线，大概就是街道的基础。在周时城市的等级和尺寸因此在《周礼》之中表达为：王城方形，周边有9里，公7里，侯5里，而贵族3里。参见66页右上角

1 参见《考古》1973/4。

城 王

C
C
D
c
D
a
5
b
4
4
1
B
B
3 2
A
A

周代城市的等级和规模，在《周礼》中有所表示：

“王的城方九里，公的城方七里，侯的城方五里，爵的城方三里”。公元前721年的周传记述：根据前任君王们的规定，具有第一秩序的城市，可以拥有一个围墙区域，面积仅为都城的三分之一；具有第二秩序的城市，可以五分之一，而最末一等，仅九分之一。这应该根据以下所列进行计算：

81 1平方里用于都城的方形=9里×9里=81

81 ：3=27 1平方里＝一等=5里×5里=25

81 ：5=16+1平方里＝二等=4里×4里=16

81 ：9=9平方里方形＝三等=3里×3里=9

图2.3.1.9 （从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建筑，陕西扶风县召陈村出土，大约渭河河谷西安城西150公里，比例：1 ：500[1]。
建筑物有不同的布局，但是，在中轴线上双生双屋都有柱子，这样，它们由在中轴线两侧、带有独立入口的两个部分所组成。复原表现了双层屋顶，商代早期的盘龙城，或大约更早4个世纪，首次出现过此类屋顶。成周的宫殿，看上去也可能与此有些相同。然而，与陕西扶风附近岐山出土的以前朝代宫殿／庙宇建筑物院落布局相比较，建筑物为不规则布局

图2.3.1.10 在山东曲阜的周公庙，现今曲阜东北，位于1970年代出土的汉代宫殿遗址的西部，这个遗址大概也用作周代宫殿

周丰镐的废墟挪至成周，引导了东周的新纪元。从西北而来的游牧部落，周的世敌，将其赶出其祖宗之地。

贯穿整个世纪，这两个地方，成周，及其更向西20公里的新都“王城”，都令人困惑。后来人们给了它们几个其他的名字，例如“东都”或“洛邑”——意指洛河边的城市，还有后来对应着的“西都”的“东都”。这里，我们将予以一些解释，希望对于了解这个由周公精心规划的“成周”新城的创立和发展有所启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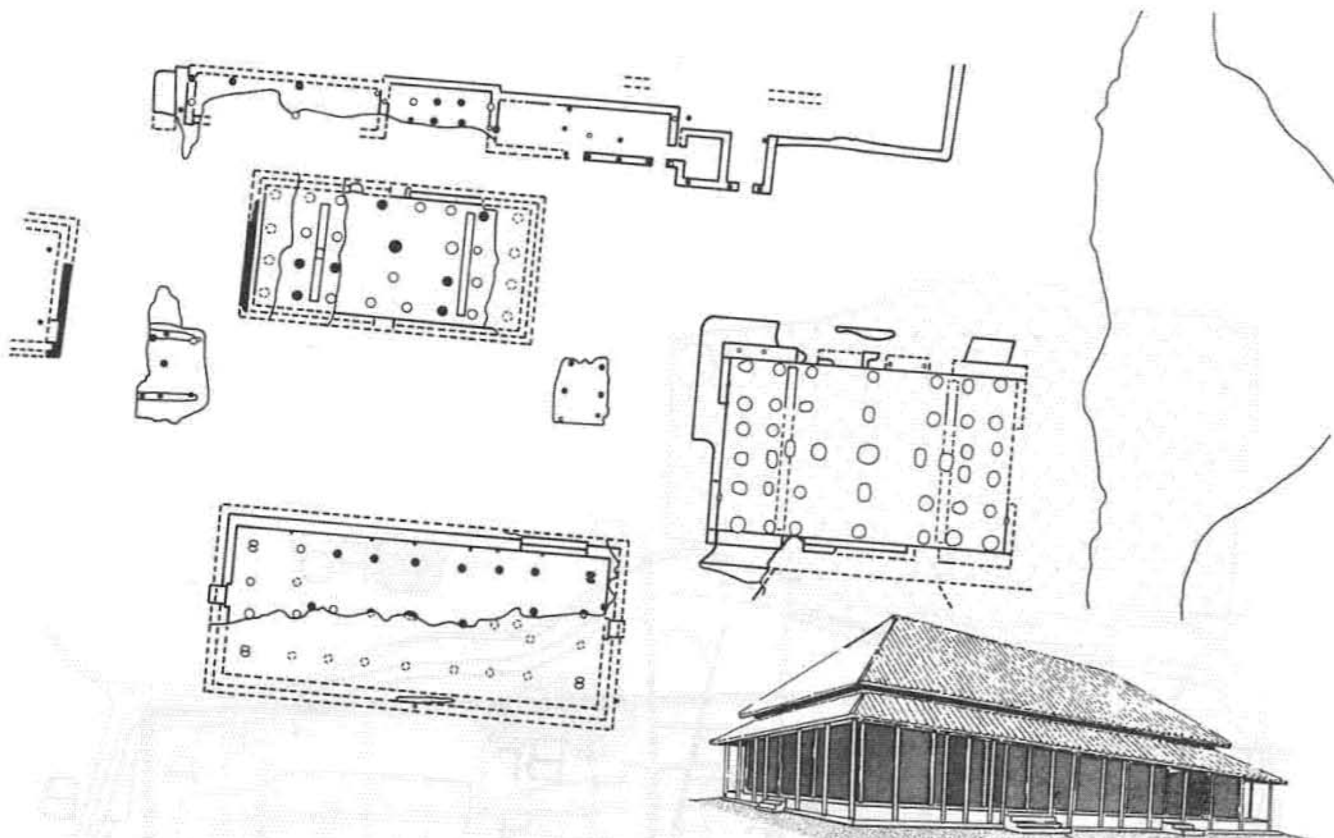
当武王将九鼎移到洛河地区，他将其放在“郏鄏”，郏山之南和洛河更北的一座小城，这个地方因此而得名。这座山，即是今天著名的北邙山，坐落在现今洛阳城市的北面，郏鄏，坐落在涧水东岸，是周公所赐之地。有些时候，这个地方也叫洛邑，意指洛河岸边的小城。但是还不能很肯定，成王是否仅仅在这个地方重建了九鼎，或者是否将九鼎转移到了“成周”新城。也不清楚这个叫“郏鄏”的地方，是否已经被称为王城，即当时王的城。在这个地区挖掘的遗址，已辨别为来自东周早期，即公元前770年不久，所谓的春秋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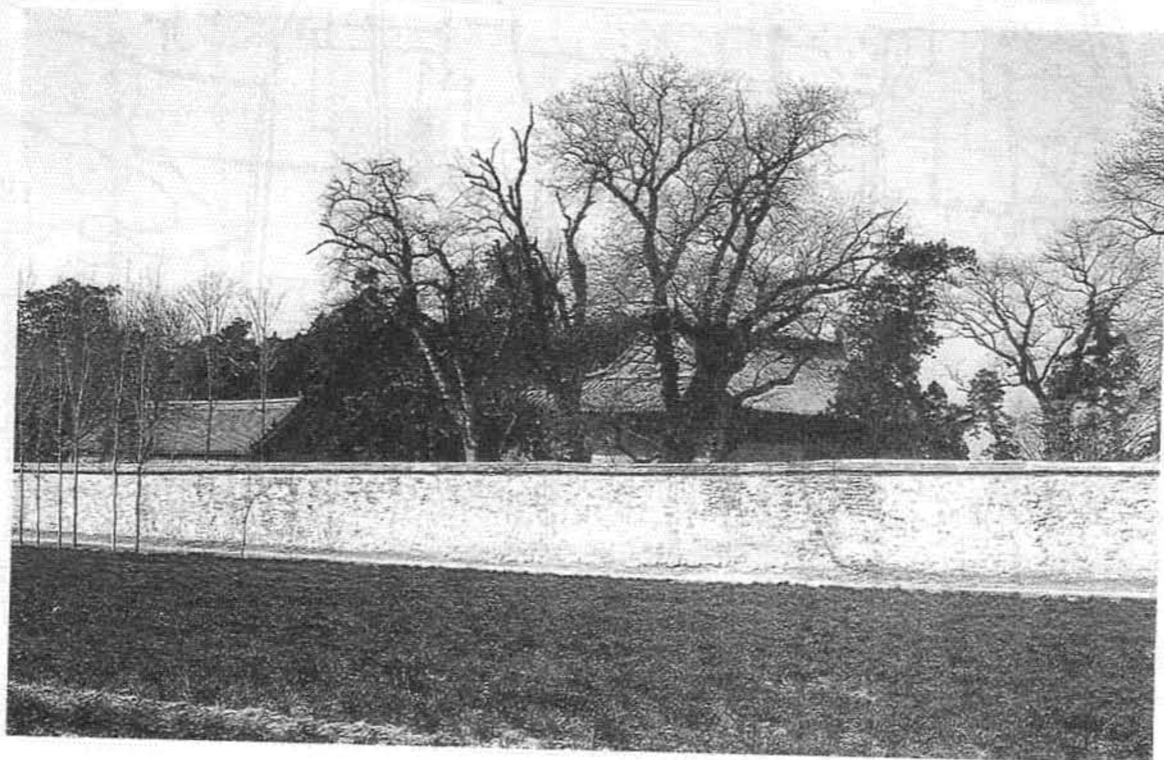
看来，周成王和周公之间，关于成周的未来并没有共识。周公死前不久，表示要埋葬在成周，但是成王将他埋在文王和武王的陵墓附近，正如他自己所说“因为他属于武王”。成王显然并不赞同自己的叔叔，因为他做得过分，以至于违反了适应侄儿规矩的规则。此外，成王对于新都城的命运并不负责任，大概因为，这既不是他自己的想法，也非他个人建立的。那是他父亲武王和他叔叔周公的城市。与他们两人相比，他这个年轻的王，对于天命——上天将让他来统治这个周代刚刚产生的疆域，是毫无疑问的。他是根据继承法，继承了周——也就是天命。而他父亲，通过举兵反抗商代的君主，而成为君王。这是一种颇带有反抗意味的行动。结果，当他父亲参访殷之壮丽的王室和宗庙时，深深地怀疑其行动的合法性。此外，武王感到还没有从上天那里接受到任何信息，授权他来统治天下。他的精力，集中在这样一个想法上，即应该有一个圣洁之地，从中，造物主的精神本质，将渗透到其性格之中，并引导他不断地修炼德行。从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得益于上天影响的居住之地，他那为其子民谋取和平的使命将得到支持，他已经考察了一些地区，正如他告诉自己的兄弟周公那样，这是上天给他的暗示。因为是上天的信号，毫无疑问，这洛水与伊水交汇之地，是上天神灵的居住之地。周公将这信念埋藏于心，并相信周代最终的命运，将依赖于在这一地区建立新都城。不久后，他的兄长武王死去时，这一信念增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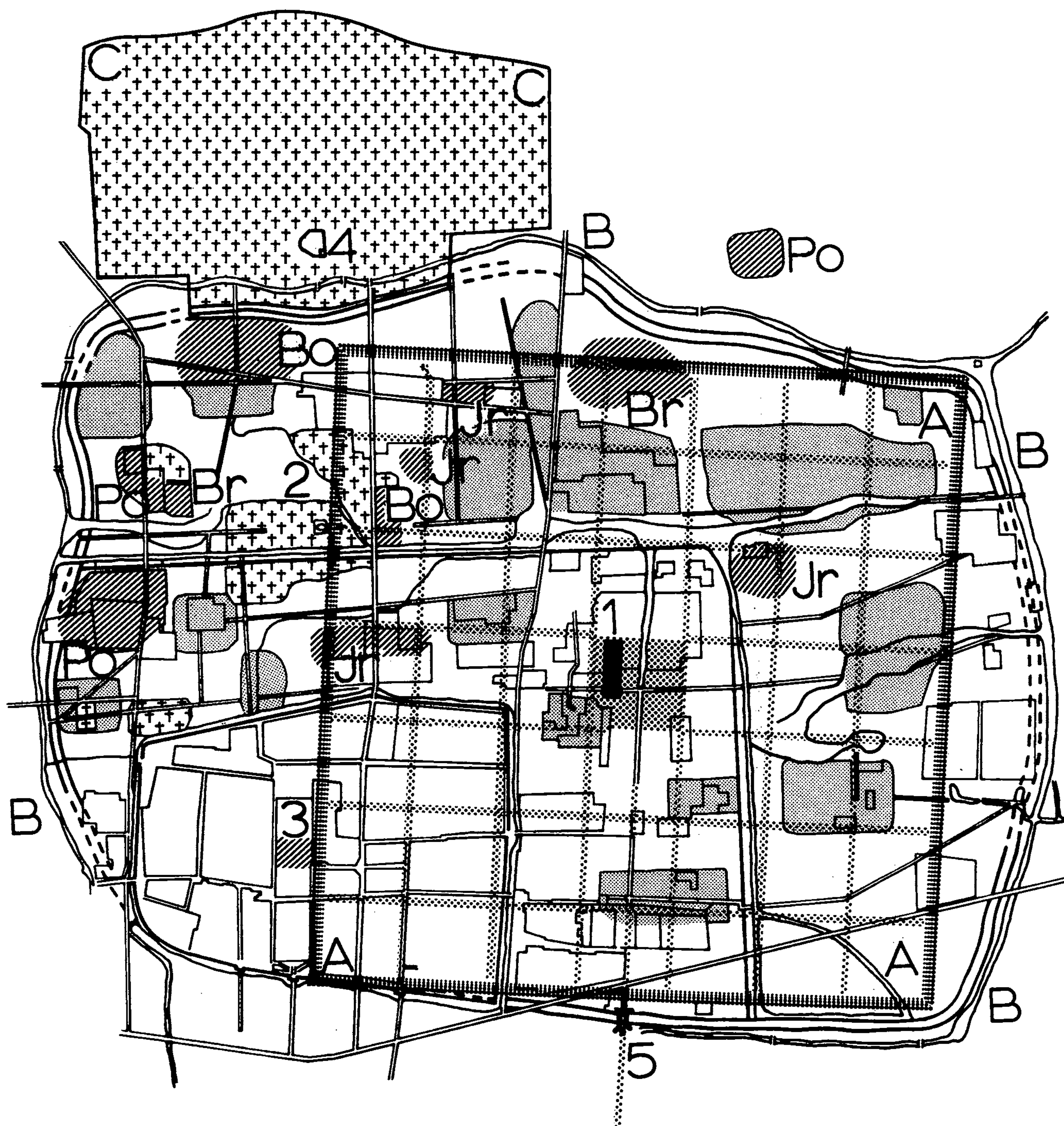
这个成周城像什么？周公对于这项对于朝代极为重要的特殊项目，所采用的基本原则是什么？由召公——太师勾画的新都城的布局和建造的背后，隐含着何种基本原则？

包含了周代法令和仪式的《周礼》一书，对于王都布局进行了适

1 参见《文物》1981/3。






C
C
4
B
Po
Bo
Br
A
B
Jr
Jr
Po
Br
2
Bo
Jr
Po
Jr
1
B
3
A
A
B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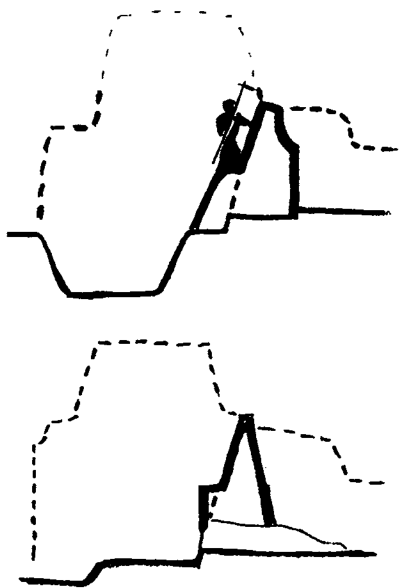


图 2.3.1.11 山东鲁国由周公和他的儿子伯禽在成周建立以后几年所兴建的都城，复原的布局叠加于 1982 年所出土的平面，比例：1 ：20000[1]。
A–A–A 原来的布局，复原为一个 7 里 ×7 里的方形，基于 19.9 厘米的早期周尺（1 里 =358.2 米）。
B–B–B 东周和汉代后来的城墙，有影线的区域是作坊区。制陶，骨割，青铜，铸铁。
1. 周公庙，坐落在最里面的 7 里 ×7 里的方形布局，大概是周代鲁公的宫殿。
2. 周时期的墓地，望父台，是一个像祭台一样的平台，据说是为了周公之子伯禽。
3. 在西门之外、后来在孔庙内的孔府和孔学，在"门楼街"内。
4. 在后来的孔府（C–C）墓地的孔子墓。注意冶铁区都是在原来规划过的（7 里 ×7 里）的鲁城布局里的，而较老的青铜作坊，坐落在外面，并在规划的城市西面和北面。北部的青铜铸造，也许在后来时间向南扩建，周的墓地很大部分坐落在 7 里 ×7 里的方形外面，并在后来向东延伸进方形之中

图 2.3.1.12 公元前 11 世纪末，从其建立的时间来看，是山东鲁城的第一批城墙，比例：1 ：200。[2] 墙体部分的绘制。建造这些墙体，主要是勾勒城区界线并防御盗窃。后来，在东周战国时代，它们被埋在更强更高的城墙里

当描述。这本书的作者，传统上一直认为是周公。他在为周王组织政府结构时，编纂了所有的法令，基于此，整个王国的官僚生活得以精确化、规范化。然而，大多数学者，对于这个传统是非常怀疑的，将这本书的编纂日期，最早划定在公元前 4 世纪或公元前 3 世纪的周代末期，或者甚至更晚。但是，我们可以认为，这个王城的理想布局源于周公，一个富于创造性的政治家。我们可以辨别出，甚至在周代接下来的若干世纪中，许多城市，根据这个理想，而进行规则性布局的显著痕迹。就是说，在周代之前，人们已经能够规划和设计了。岐山的挖掘，显示了一个具有非常规则布局的建筑群，该建筑群体，几乎与《周礼》所描述的理想布局完全一致。匠人们在王都形成了一个方形的布局。每边长 9 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面朝后市，与宫殿一起，有大约 1.5 公顷（1 公顷 =15 市亩）面积。到目前为止，这是《周礼》中有注解的文献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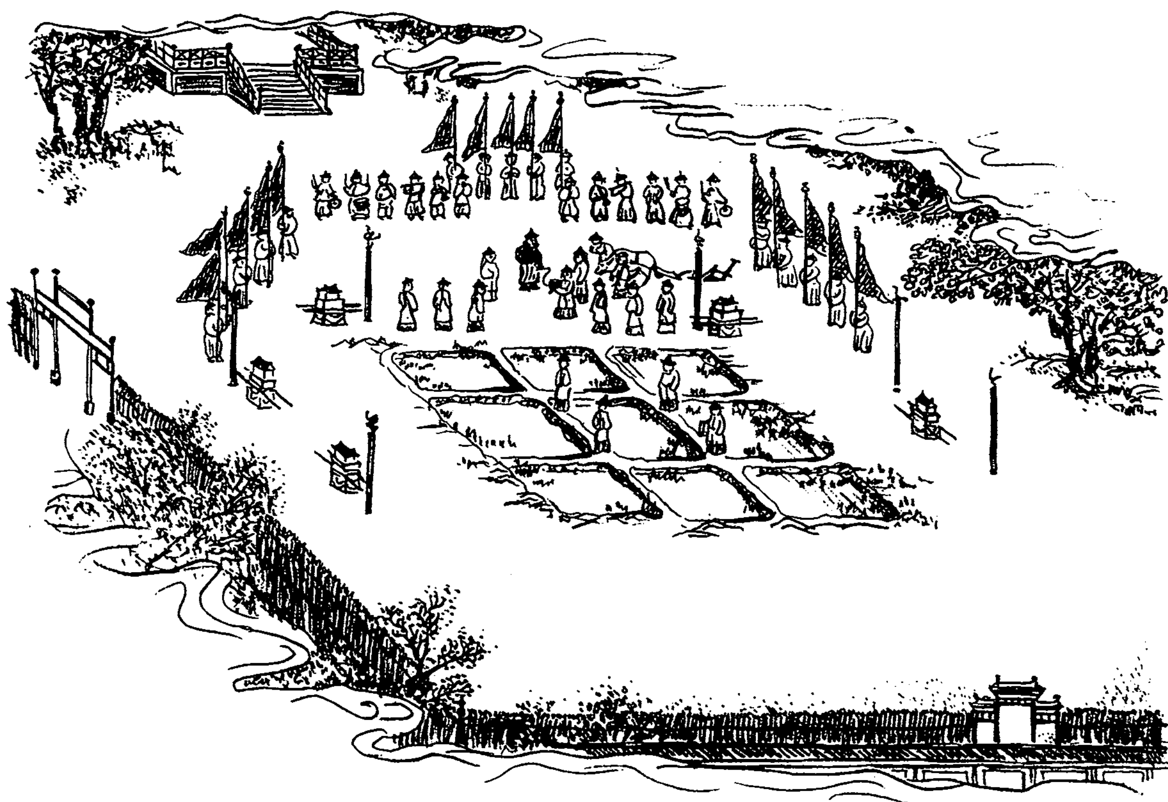
成周城墙的遗址，新近在洛阳旧城区之东大约 15 公里处发现。一般认为，这是东汉（公元 22–220 年）同时也是北魏从公元 495 年到 534 年在此建立过王室的洛阳城市的城墙。但在城墙之内，成周旧城的轮廓可以得到复原，因为每边 9 里，这样一个方形，准确地适应现存城墙不规则轮廓的一部分。此外，城墙建在不同部分，具有不同的尺度，这表明，总体的模式是连续延伸和变化的。它很可能就是成周旧城墙的那些部分，依然埋在现存城墙的下面，所以能够在大约 3000 年不断变化的毁坏和重建中得以幸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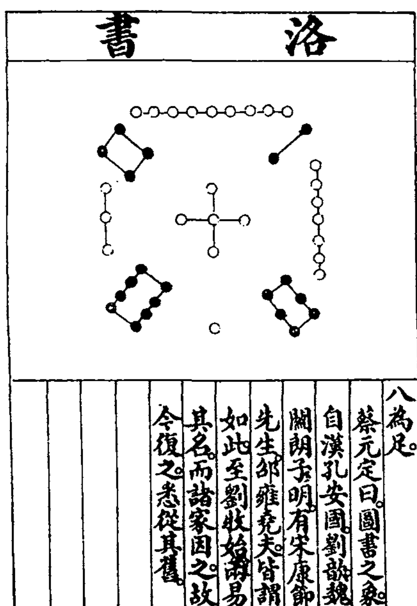
考古学研究，已经提供给我们模糊的、有关周公和他儿子——山东的鲁太子的其他城市项目的痕迹，这可以为我们关于成周的假设提供支持。周公有着很强的秩序感，他很有组织的国家结构，以及为王子们的对于礼节规范的封建等级的法则，严格规划控制着城市的规模，并据此加封君主不同等级。这些规模、大小、等级，显然体现在不同的文献之中。在实际尺寸上，仅存在微小的区别。但是总体概念，也许以前由周公所发明，是容易辨别的。孔子的追随者孟子，在公元前 4 世纪的一本书中写道：城市内城每边 3 里，外城每边 7 里。这一规模，代表了王城以下的第二等级，也许是王室太子的居所。王室已经有了亳，这是给予周公之子伯禽的，那是他被封为鲁国统治者时的封号。

在现今山东曲阜孔子出生地鲁城的考古学调查表明，今天依然可见的城墙，是几个世纪的建设以及重建的结果。细致的挖掘，已在几个地方发现了西周时期的第一批城墙，埋在后期的巨大城墙之下，它们为复原鲁城原状提供了基础。因为它们围绕着极有可能是周公和他儿子伯禽所布局的城市。每边 7 里的方形，很好地适于城墙框架，而这个方形广场的中心，至今还存有周公庙，这是推测中原布局的宫殿区。

我们可以假设，鲁城，实际上是比成周晚些年而建。从《古本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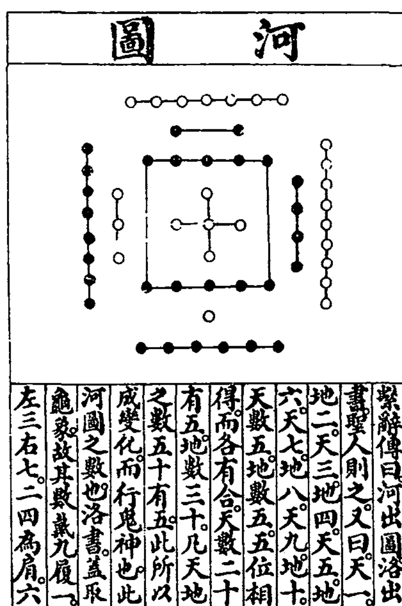
1 参见：曲阜鲁国故城，济南，1982。
2 同上，参见曲阜鲁国故城，济南，1982。





洛書

八爲足。蔡元定曰。圖書之象。自漢孔安國。劉歆。魏關朗子明。有宋康節先生邵雍堯夫。皆謂如此。至劉牧始兩易其名。而諸家因之。故今復之。悉從其舊。



河圖

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河圖之數也。洛書。蓋取龜象。故其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

图 2.3.2.1 皇帝在 17 世纪北京先农坛前耕耘"神圣之地"。参见大清会典中的木刻，17 世纪有踏步的先农坛，可以在背景中看到。着黑色外衣的皇帝，左手执鞭，而带犁的牛，正从一边被牵引到他附近，在皇帝面前是具有九宫格的"圣地"，整个区域围绕着竹篱

图 2.3.2.2，3 正如在周易中所展示的，洛书（左）和河图（右）的模式（图形），是《易经》的另一个版本。洛书代表"圣田"概念 阴的力量，具有偶数的黑点代表了方形的四角

书纪年》中，我们知道，另一些人在第一次移到成周后的3年里，从殷迁移到鲁。我们的假设是基于两个关于度量的不同假定。成周的布局，基于商代的旧度量体系，而鲁布局的复原，采用较新的周度量体系，假设如他们当时所做的那样，当成周主要是由殷人所建时，鲁城的规划，已由周的匠人们运用自己的度量体系实施和设计。

在后来巨大夯土墙下探明的第一座城墙的残余，只不过是勾画城市界线以及防盗用的一个围合体。基座不到2米厚，这座城墙仅仅3米高，而顶部仅1/3米厚。我们可以假设，成周城墙具同样尺度，而且，其惟一目的，就是标出城市的界线。通过稍迟的、于东周初期在成周20公里西建造的王城城墙的尺度，我们这种假想，也许又会被证实。在其基座部分，它仅仅5米厚，并还残存4米的高度，原来的墙体高度，大概不过再增加1到2米。其他地方，也已经发现同样的墙体，属于晚期。它们是早期城市主义的普遍特征，与那些围绕旧的商代城市巨大堰坝和城壕明显不同。这些堰坝，后来在中国北部成为通常形式的城墙，而在南方，特别那些拥有石材而非夯土用作建筑材料的地方，比较小一些的尺度就足够了。

尽管贵族头衔很宽松地使用，不同等级的尊严并不像后来文献记载中的那样严格，某种程度上，城市聚落，也许通过规模而非实际原因而划分等级。以作者看，到目前为止，所挖掘的许多城墙围绕的区域，有几个也许在西周时期经过层级秩序观念而布局。正如以上所见，因为到目前为止，几乎没什么遗存，可经过彻底挖掘和分析，用以考量西周城市，对于现代学者来说，是一个假想的事情，所有围墙区域，都被鉴别为周的后期，即东周时期。但大多数调查的地方，有两座围墙区域，一座是内城，一座是外城，内城——有时是一个非常规则的方形。当我们评价那较小的方形的尺度和检查在现代地图中所表现的由调查者所报告的度量单位时，很显然是应用了商和西周的度量单位。这支持了这样的假定，即这些较小区域当初的布局，要追溯到周代早期。

2.3.2 圣田的概念

传说告诉我们，周成王在公元前1025年安置了九鼎，并在两条河流——黄河和洛河表演了仪式。其时，一条龙和一只龟从河中涌出，并在祭坛之上放置了卜辞。以同样的方式，大禹，以及更早的神话中的尧舜以及黄帝，也都从中收到了这些征兆，大禹，从洛河接收了“大计划”。虽然这些征兆都是以同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的，然而，它们包含有不同信息，其中只有“大计划”和“卦”，通常被称为“河图”和“洛书”留存下来并继续发展。在所有案例中，数字9起了重要作用。所有都由9个部分组成。以中国人的观念，9是适宜的数字，在其上建立了一个适于万物的宇宙秩序，其对于人类具有真正的重要性。

这些卜辞包含不同信息，而九宫格的模式总是一样的。大禹根据国家既存条件状况，为国家提出理想的空间秩序模型时，已经运用了九宫格。这一模式，也用在龟背上的卜辞“洛书”铭刻，从1到9，以一个规定的秩序而组成的数字，稍后，我们会再回到这一主题。

这个模式，就是一个方形，平均分划为9个相等的部分，这被称为“圣土”区划，并因很多不同目的而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大多数与宗教、政治或哲学相联系。在孟子的著作和忠告中，这被用于组织农业和保障高官薪酬而表达秩序，他写道：1平方里包含9方土地，这9方包含900亩，中间的方形是公共田地，而8个家庭，每个有其私人的百亩田地。虽然写于公元前4世纪，运用这种九宫格的证据，至少可以追溯至商代，以文字的形式呈现于甲骨之上，那是如下一些方块字的最早形式，如矩，表示木匠的矩尺；尺，表示一个法规；兴，表示兴起，发展蓬勃。这些意思，似乎与模式的运用紧密相连。比如：用于测量的工具，木匠的方规；建立秩序的法则，矩尺，以及一种获得繁荣的方法，从而将人民的生活，提高到一个舒适的水平。在周公时代，我们完全可以假设，一些人已经知晓这种模式。这些人希望在所有关于国家的工艺事务和生计方面建立良好秩序，从而保证其朝代和民众长久的繁荣。此外，我们已经了解，使用这种模式，并不是为了便利，而是一种神圣的职责，用它

“上帝”，最初是商代已经移向苍天的祖先，而在天穹星宿内，作为北极星出现。周王室不能称他们为自己的世系先祖，因此，他们甘愿称自己为商王们的后裔，他们后来成为河南中部宋国的统治者，并献祭上帝。

周的统治者们，更依赖非人格化的词汇“上天”而不是“上帝”。而且，他们断言，与最后的商－殷统治者们相比，因为周人无可比拟的德行，上天选定他们作为最高的主宰。这种与上天授予的神灵力量的非人性化关系的概念，也许已经滋生了神灵力量的几何图绘。这些图绘的几何和数字的性质，是精神力量的一个实质性部分。自然动物象征符号的神奇价值，在此过程中可能受到损害，这些符号，在周代艺术中，被用作装饰的传统元素，并越来越失去其原始表现力

来取得繁荣昌盛，一个让先祖们首肯的秩序，并确保与世界秩序的精神实质的融合。

“圣田”，已经存在了大约3000年，总是在中国皇帝们周而复始的仪式日历中，扮演重要角色。作为一个真实的圣田，通常在祭奠农业神灵——神农的祭坛前面，皇帝本人亲自犁地，开始一个农业劳动的季节。它是一个四亩的方形田地，并由小堰堤分为九个部分。这种将4个单元土地（其中的数字4是看不见的）、与9个部分的划分（数字9是可见的）相结合的重要性，在于它真正运用了自然界两大根本之力：阴（4）和阳（9），使两者的结合互为创造。这就是数字4和9的结合，偶数代表阴的力量，奇数代表阳的力量，两者创造性的结合，使土地成为圣田。

龟背上的9个数字，即所谓的洛书，安排在九宫格的模式中，即偶数填充到方形的四角，而奇数形成了一个十字形，数字5在中心位置。这里，奇数形成十字形，阳数被放在偶数阴这个变数形成的方形上面。也就是说，与圣田具有同样的基本理念。阴和阳结合，产生创造性的圣土。当然，龟，作为像甲骨上的文字那样的预言中介，向人们传达了这一作为吉兆象征的图案。

关于这些概念的另一有趣实例，是一个具有高度价值的玉璧。几代学者都被公元前1世纪汉代的历史学家，或称史料编纂者班固的评论所迷惑。班固曾说：玉璧，试图用于吸引聪明男子，那种璧，中心方形，外部为圆，女性力量兴起于内，因此，阴的形状在内部发现，其所在为中心。因此，玉璧暗示了天和地、即阳和阴的形状。内部的方形象征地，外部的圆形象征天。该领域研究的一位现代学者，一个著名的专家Laufer，在1912年补充说：但是，据他所知，至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如此描述的玉片。毫无疑问，班固所作评价，一定更深入渗透其意义之中，相信他对于该主题，具有更精确的知识。对于璧的外环和内环两环的比例，更认真和精确的调查显示，璧非常准确适宜于九宫格方形划分的模式，即外在的方形和中间的方形。这一推论，受到东周时代增加到一些玉璧上的装饰的支持。它们绝对标明了九宫格方形的四个角落，它们在璧的内部，并不十分明显，与所设定的阴的特征——隐藏的潜在之力相一致，而可见的阳力的圆形，公开展示出来。作为礼物，敬献给受到高度仰慕和崇敬之人，这种玉璧，因此象征了两种创造力的结合，从而创造生命。因此这种璧，非常适宜于鼓励创造性才能。这些不争的事实——度量和比例，可以非常肯定地追溯到西周初年，也就是周公时代。而制造这种玉璧的艺术家们，非常清楚他们在做什么。我们完全满意于这种年代的分划，因为它能够支持我们的假设，即这种模式，也许有意识地应用于成周城的布局，并具有同样的意图。然而，这样的模式，可以更进一步地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它甚至可以在仰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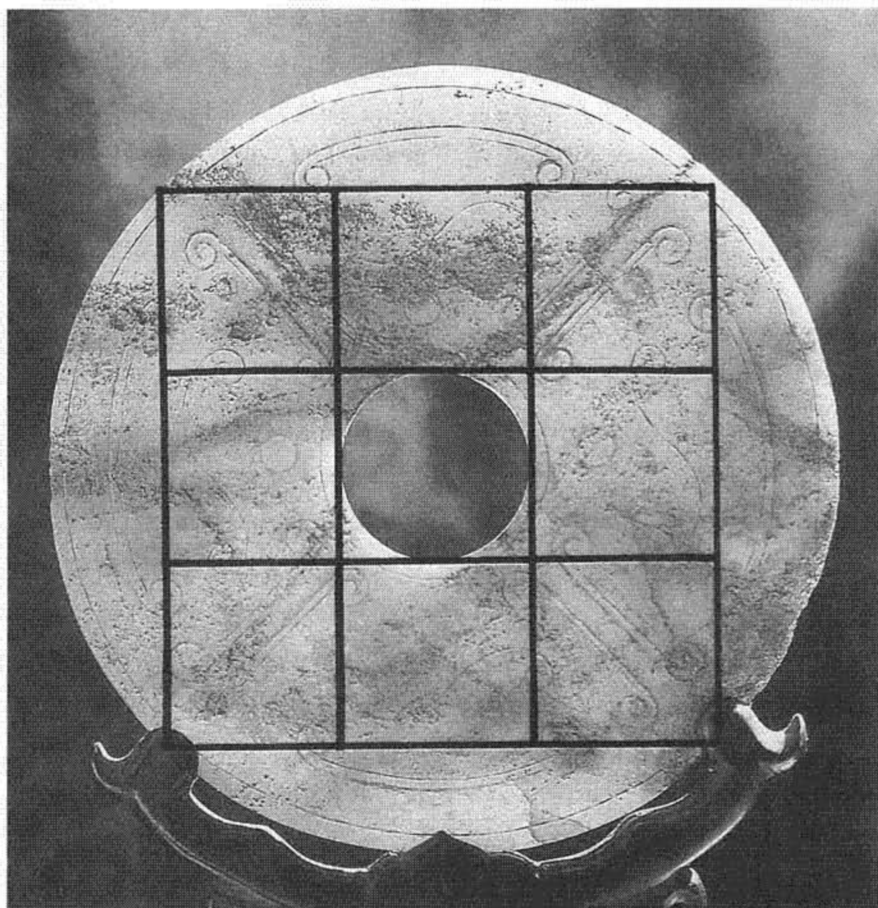
文化新石器村庄中的大房子布局中辨别出来。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说，这种有意义概念的应用、魔幻数字的重要性，以及对具有基本力量的阴阳模式的识别鉴定，也许是周文王和他的儿子周公的杰作。正如以上所引的现代学者观察的那样：周人并不认为他们宇宙的神是人类，而是自然，其力量，具有已经界定良好的权力范围。而且，在伟大的自然现象中固有的几何特性基础上，周人建造了他们自己的图像。这些图像的形状，以几何建造的方式被发现，圆的玉璧和圆的孔，代表了天，一个中空的、由一个代表地的立方体所围绕。几何抽象的神圣图像方面，与周时期整体几何文化有着完美的和谐，建造在对于天体和地域现象进行解释的基础上，由数字公式表达，这一思想的灵魂，在民族的整个生命里程，以及在政府统治、管理、宗教和艺术等所有的事项中徘徊。

我们可以总结成周的布局构架为基本的九宫格方形，它形成今天所称的超级格式，即基本上代表着土地阴性的抽象模式。九宫格划分，根据灵性的阳力提供了空间秩序，这灵性的阳力，通过与地的阴力相互结合，创造出一种有益环境，一个给予人类世界的生命基地。以这种魔幻布局，基本的力量——阴阳被牵引到这个地方，而通过这个抽象模式，他们以以往村民的节日，给予环境——他们精神家园的圣地，以生命和质量，这对于民众已经足够，但对于君王，作为掌握四域的主人——自身置于四方交错中心的王来说，这四域，代表地球的阴这个偶数划分的疆域。然而，四个极点在中心的结合，形成具有阳力的非偶数“五”。在中心地位的君王，获得这一数字。在那里，他担负着保持环绕四季秩序的责任，这样，他可以指导人民的

图2.3.2.4 仪式玉璧，大概来自河南中部，周代早期作品，来自作者的收藏。隐现的神奇方形，代表了阴的力量，并形成了两个圆圈比例的基本框架，这代表了阳的力量，并且非常清楚可见。在外面的界于外圆圈（阳）之内的方形（阴）和在内方形（阴）之内的内圆环（阳），表明了两种力量以一种非常复杂的形式相互联结。详细调查显示，来自周代的仪式玉璧，通常精确地制成具有尖锐的边缘，并运用复杂的度量体系。商代的玉璧并非精确，边缘很钝，常有需改正之处并呈锯齿状，但是在几种情况下，基本的度量体系和比例，似乎基于神奇的方形图形，以非常简单的1：3比例

4	9	2
3	5	7
8	1	6

洛書



生活和工作。

然而，精神层面和实际层面的认真规划过程成果甚微，至少有些发育不全，因为，周王们在后来两个半世纪里，对于这个准备得很好的地方，并未表现出兴趣。他们并没有如周公所提出的那样，将它当作府邸。此外，周王们神权主义的作用与商王们的也不同，它看上去越来越政治化，虽然周王依然是“神圣的”王。更甚者，萨满巫师，不再是宫廷的一部分，君王本人是所有典礼和仪式义务的最高神职牧师，从而导致宫廷仪式的世俗化。这些仪式，仅是其他义务之一，也许也不再占据中心地位。周公之后，不再听说宰相在朝中作为精神力量的事例，这也许表明，那种精神思想，对于在仪式中心即圣王的吉利环境坐落王室的想法，已经不受欢迎。宰相的职责，已经变为更具官僚地位的大臣，而仪式由仪典大臣所管理。这些人，也许已经经历了政治竞争，并常常批评君王的行为，但是，他们并不等同于古代的智者。后来安排了一个治理者治理成周，正如一个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皿上所记载的那样。

看来，王宫也同样建造在成周，历史颇具讽刺意味，所有这些宏大的准备，都被周的各位君王们废止了。另一方面，成周，实际上依然保持着后来几代人的“理想城市”。作为最受尊敬的神圣城市、世界的中心，它成为后来几个朝代很多帝国都城的模型。而如果它并不总是文本的模型，它依然在很多方面，是后来若干世纪规划者们做决策的基础，这将在下面的章节中论述。

2.3.3 东周(公元前771－前257年)

正如以上所见，大约一千年前，周部落就已从更为西部的地区移入渭河河谷。他们大概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的、来自西方的入侵者，正如周王的先祖们，抵御保卫商的疆土不受西方游牧民族入侵，而享有“西部首领”称号一样，如今的周，不得不以连续的战争，抵御那来自西部其他部落的侵犯。好战的君王们，不但保卫自己，同时也颇具侵犯性并渴望战争，在东部和南部为战利品而杀，并抓获上千民众作为奴隶。一项记录提到13081个俘获者以及马、牛、羊及战车，但是需要更多的士兵，人民就变得越不安，而且大多数匠人和“自由人”的城市人口，也疲于这种王室的疯狂。公元前840年，他们攻击了在镐的王室，但是，王逃窜到了山西的彘，在那里放逐14年后就死去了。取代他的是两个大臣接管政府。虽然他的继承者回到了镐，并且重新建立朝代规则，他和下一任幽王——宫涅，失去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自然的灾难，例如河流干涸、山体震颤、夏季霜冻以及日食现象，预示着灾难。西方部落变得更加斗胆，屡屡进攻，直至最后与无能的幽王取得了联姻联盟。他们在公元前771年夺取了都城，杀死幽王和他的卫队，这就是西周的结束。

一年后，幽王的合法继承人平王，离开了这个多灾多难的都城，在洛河谷更东的地方建立了宫室，命名为东周。虽然王子们护卫着王来到成周城，他在洛邑占据了宫室，不甘愿使用这圣城作为他的宫室。取而代之，他将洛邑原有聚落向北延伸，围绕一个大约覆盖8.3平方公里的空间，建造了一个新城墙，仅仅比成周城小一点点。这座城墙的残骸，在今天洛阳以西已经被发掘出来。据发现，这座墙体的基底5米宽，残高1.5到4米，其原来的高度，大概应是这残高的两倍。从这些度量尺度判断，似乎那老的和小一些的城墙区域，可被判别为是嘉峪城，形成了一个每边3里的方形，如同其他地点的许多其他围墙区域。嘉峪之北新的墙体围绕区域，似乎是每边7里，但这7里，是基于另一个度量尺的。较老的度量是西周尺，大约19.9厘米，其1里相当于358.2米，而新的度量是东周尺，大约23.1厘米，1里相当于415.8米。结果，这个新城，明显地被认为仅为排列在王都之下王子的都城，一个7里×7里的方形，而非神圣城市9里×9里的神奇方形。我们今天较少意识到这种区别，因为大尺度的单元较少，而小尺度的单元较多，将实际的总尺寸拉近。当时的测量者并不知道实际尺寸，但那是基于他们当时的度量体系完成的测量，而这些度量体系由君王们制定。

通常相信这个新都是王城，尽管并不清楚这个名字何时开始使用，它也许已经在其起源的时候，就与这个城市相关了，至少这不是没道

理的。在围城内，已经发掘出土了平面面积相当可观的夯土房屋，表明由7里×7里所组成的、方形中央部分重要建筑物的存在。这里，我们也第一次见到了屋顶瓦，平的和半圆形的以及有装饰的檐口瓦，标志了建筑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在西北部分，发现有一组制陶的陶窑、骨雕和石头装饰作坊。在围合范围内，发现大约有260座坟墓，这提供了证据：随着东周的开始，已经出现新的习俗，就是将坟墓坐落在城墙之内。需要注意的是，测绘者工作并非准确，因为在东北角没有正角。然而，这也许是后来的修改。因为掩体整个南部，几个世纪以前已被洛河冲毁，因为这个原因，很难复原当初作为一个整体城市聚落的模式。

在《诗经》中，其中一首诗，描写了东方诸侯之国臣民，对西周王室残酷剥削奴役人民的忧愤情感：

东人之子，职劳不来；
西人之子，粲粲衣服。
舟人之子，熊罴是裘；
私人之子，百僚是试。

或以其酒，不以其浆。
鞙佩璲，不以其长。
维天有汉，监亦有光。
跂彼织女，终日七襄。
（雅 · 小雅 · 大东）

可见，西周宫廷官僚，他们刚刚失去了都城，他们那样傲慢，无法弥补与东部人民的鸿沟。

据说，大约公元前1000年，当周代建立时，一些学者认为，大约有1800个政治单元，对周王表示忠诚义务。我们可以假设，这些主要是部落单元、族人，以及由他们的首领和长者所统治的当地单元联盟。在一些情况下，将士们已演变成贵族及军事城镇领袖，这些城镇，最多是像上面所描绘过的盘龙城那样的防御之地。周，将其封建体系，置于这些小单元集结的基础上，形成了大约170个单元，以周贵族成员作为区域性统治者，将多达几十个旧单元，结合形成新单元体。随着东周的开始，封建诸侯之间的竞争加剧。在这个不断重整权力范围、内部权力角逐游戏过程中，几个区域性的诸侯，变得非常全能，并配备了大批军事力量，而周王仅控制着“一支军队”，那是大约12500的武装士兵，正如公元前695年由庄王所说的那样。与之对比的是，邻国晋的诸侯，在山西南部黄河之北，至少有两支军队在他的调遣之中。

因此，周王非常依赖这些强悍的诸侯们的支持。在这场竞争中，最终仅剩下7个强有力的国家。所有区域性的资源，都集中在诸侯手中，他们现在开始为独裁而战。此时，周王在权力游戏中，几乎没有发言权，而且大多情形下是在霸权或几个诸侯的同情怜悯中度日。每当他们感到应该将周王当作“祖宗仪典的保护者”那样来保护，便将周王拉入联盟中，或者，使自己的政治行动正当合法化。《古本竹书纪年》和其他文献，极少提及东周的君主和诸侯们。详细的记录，仅仅是关于几个有势力的诸侯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情况，很清楚地反映在《春秋纪年》关于公元前516年鲁召公统治的第26年的记载：冬天，一年的第10个月份时，周敬王蒙受天恩来到成周。驱逐了一位周王子，因为他曾经试图借助一些诸侯的帮助来篡权。这位受到挫败的周王子，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完全正义的，在其避难的地方发表演讲，虽然他自己所做的正好与所说的相反，他试图提醒王子们，他们实际上都是来自于同一个王室，并应该保持原来由周武王所建立的封建秩序。然而，时代变了，这些王子中的多数，都在自己的封地自立为王了。6年后，他们聚集在一起，商讨如何“保护”周王。据载，其中一位王子说：“最好给成周城建造城墙，这比总是设岗守卫的好。将来那里若有什么动乱，我们谁也不用管了”。由于有了为成周加建城墙的想法，他们放弃了实际上早已放弃的责任。“负责的官吏命令调查测绘了成周，并计算了一下拟建墙体的高度和厚度，计算了这一工程的时间以及需要的人工，并为材料而进行了准备”。因此，公元前510年，成周作为周王王室而被增加了墙体，将周王留在里面，在这个新的城堡之中自卫。

这次，城墙比王城的旧城墙厚大约3倍，也高很多。因此，挖出一座非常大的城壕，以环绕这座城墙。如此，这座墙成了一座真正的城堡，其规模也使之需要一只拥有12500士兵的军队来防御，1人1米，将城市变成了一座大城壕。在公元前722年到前464年之间，即春秋


158
155
150
158
155
150
4
Shang shu
2
3
1
San

时期的259年里，只有38年没有战争，最为动荡的年代，处于公元前662年和前532年间，在这130年里，仅有10年是平静的，119年都处在战争状态，也就是说，平均每12年中，仅有1年不打仗。

这些权力游戏和军事行动，必须首先被看成是一种社会动荡的表现。大多数战争，发生在国与国之间，或不同的贵族集团之间，也就在野心勃勃的武士之间，构成了为财富、权力和名誉而战的竞争。大多数武士在这些竞争中，以战争来解决。因此战争持续不断地发生。虽然，从公元前463年到前323年这段时间里，战争数量锐减，而战争的规模却增加了，此时的一场战役中，投入成千上万的士兵。从公元前323年到公元前222年这一个世纪中，仅有17年是没有战争的，这后一阶段，是以秦王们的战争所控制的，秦王控制着多达60万人组成的军队，在此期间，其他的军队，有150万之多的伤亡。因为战争变得越来越残酷，仅仅那最为残酷和狡猾的统治者，在公元前221年赢得了胜利。

2.3.4 东周的新社会

随着新的君主在不断变化的权力集群和联盟中的诞生和死亡，随着对更多更好的武器和资源持续的需要，东周时期，社会动荡一代又一代日益增强。周公理想的层级制度彻底瓦解，并被一个过程所取代，这个过程，可以被定义为从一个“神圣之王”到多国“首领”的变化。

当公元前510年，成周成为王室所在地和周王的堡垒时，新的后周社会——即所谓的战国时期，已经很完善地发展，一切似乎已完全改变。

我们已经看到，新石器村庄中神圣之地的神圣性，如何落到获胜的部落首领身上，这些首领，征服了村庄，并建立一个新的王权君主体制，在其中成为了神圣之王。他的亲戚和部落围绕着他，形成了新贵。而且，作为辅助他的王族继承人，帮助他从事与其至高的地位相关的事务和活动。他的权力基地，发展成其势力范围的仪式中心，取代民众旧的神圣之地。

对于神圣王权的继承，最初或多或少追随自然法则和实践，其中，领导者的人格力量或说人格特质，起主要作用，但是“神圣性”必须通过特殊的仪式方能转换，其中，自然和祖先们的精神力量起基本作用。后来，也试用了各种继承法则，因为可以作为领袖人物的远不止一个。最终，基于世袭和血缘关系的朝代法则建立起来。然而并非永远这样，当第三个朝代——周建立后，发明了一个新的概念——“天命”，这是基于一个传统想法，即“圣座”转化中，精神力量起基本的作用。此外，继承权由长嗣规则所控制，根据这个法则，只有长子承继父亲，而且“圣座”成为了一个王室家族的财产。其他王室成员，兄弟和叔叔，如今形成了上层贵族阶层，并帮助君王治理王国，其兄弟们大多数是作为各分封地域的诸侯。公元

图2.3.3.1 王城，河南洛阳东周的都城 比例：1：20000[1]。
在西南角的西周城市，形成了一个3里×3里的方形，基于西周度量体系，其中1里等于358.2米。这也许就是文献之中所提到的郏鄏或洛邑城。东周城也许形成了一个7里×7里的方形，基于东周的度量体系，其中1里＝415.8米。它被称为王城，即王的城。并几次被当作王室。在东周的最后一个阶段，它是一个小领地，即著名的西周中心，正如东周地区的中心在成周一样，城墙的东南部分被洛河冲走。有几座东周墓坐落在河的西南角，传统上认为这是厉王胡的古坟，他在公元前828年，作为一个飘泊流浪者死去；灵王泄心（公元前571－前543年）（2）和三个王，他们在公元前441年到前440年几个月的时间内相继离世（3），另一座古坟，即著名“王的高级官吏”的坟墓（4），在中间的不规则墙体，来自于汉代（参见3.1.21）

1 参见商周考古，北京，1979，考古，1959/2

前510年，周代法则实行500年后，第26位周王——敬王，邀请这些君主和地方诸侯，帮助再建成周城墙，他依然指定这些受封的兄弟和叔叔做事情，但是，这明显只是一个传统姿态，因为时代已经戏剧性地发生了变化。这些诸侯，不再是君王的代理人，而是作为统治他们自己国家的君主。他们与周王的关系，顶多是一种拥有共同的五百年前的先祖而已。周王的神圣性，已经削弱到在成周王室宗庙里，为这些祖先举行适当的仪式以及典礼上的傀儡功能。

在更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第一代统治者的后代们，在政治上越来越不活跃，而沿袭的大臣们，他们往往是大家族的首领，变得非常有势力。曾经一度是王室王子们的地域性统治者，一旦独立于王之外，并在贵族的同等阶层统治自己的领域时，多国体系就出现了。真正的军事力量，在各国间的关系，变成了决定性因素。而弱国渐渐消失，并被强国吞并，在各国内，贵族们依王室模式，形成了自己的强势家庭，这些家庭，为某种程度的影响和重要性而争斗，并最终被他们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所遮蔽。在这些斗争中，一些家族跃居显要位置，并为其所好而选择自己的统治者；其他家族完全面临社会困境，并随之消失。因此，上层阶级在其所有成员的互相残杀之中分解，有时，统治者的优势，他在权力和地位上有所上升。此时，统治者的神圣性，已完全消失而完全被赤裸裸的权力所取代，而一个新的元素被引进了，那就是有能力的专业谋士们的支持。贵族、贵裔，不再是一个谋士的惟一首要条件；在权力斗争中，它甚至更为可能使个人从低阶层上升至高阶层，这首先鲜明地体现于军队。旧贵族们个人马车战术和勇气一起消失了，并越来越被新型战略家、疆场军官和职业士兵们所取代，形成步兵和装甲兵的大部队，能力和功利压倒了出身、宗族和家庭背景。当七个强势国家努力加强国家治理时，让具有特殊能力的个人，跃升到国家管理中的高位，成为一个正常程序，因此，新君主由官僚辅佐，取代了那种一伙贵族，围绕一个君王的形式。公元前722年到前464年间，在文献中所提及的所有各类官员中，26%出身低下。在后来阶段，公元前463年到221年，这个比例升至34%。因此在统治者和人民之中形成的官僚阶层，决不是一个同类组群；这些人提升的渠道是多样的。

因为君王不仅特别重视强固军队，而且重视资源，他对于那些能够增长经济活动和提升生产质量的人们，保持着强烈兴趣。这导致了区域性各种方式的专业生产，并由此促进了不同国家和区域间商贸的兴起。一个全新的、由富裕的家庭组成的社会阶层涌现出来，他们不是贵族成员，也不必与政治有关。在这里也一样，能力更比出身重要，因此，商人被称为“没有头衔的贵族”和“没有王位的君主”。

公元前4世纪，货币铸造的广

图2.3.4.1 东周后期中国地图（战国时期，公元前481－前221年）比例1：10000000。
1. 前周（陕西岐山），2. 丰镐，3. 成周和王城（洛阳），4. 山东鲁国都城曲阜，5. 山东齐国临淄，6. 郑1（陕西），7. 郑2，新郑（河南），8. 魏1 安邑（山西），9. 魏2大梁（河南开封），10. 晋1（山西，曲沃）11. 晋2，绛（山西，平阳），12. 晋3 新田（山西，侯马），13. 晋3 宜阳（河南），14. 晋3，阳翟（河南），15. 晋3，宛（河南，南阳），16. 楚1＋3（楚）郢（湖北），17. 楚2 鄢郢（湖北），18. 楚4，陈（河南），19. 楚5，巨阳（河南），20. 楚6 寿春（安徽），21. 赵1，晋阳（山西），22. 赵2 中牟（河南），23. 赵3 邯郸（河北），24. 中山2（河北），25. 中山1（河北），26. 正定（河北），27. 燕1 冀（北京），28. 燕2 下都（河北），29. 吴邗（江苏，扬州），30. 越，郯城，金陵（南京），31. 吴，淹城（江苏），32. 吴国都城（苏州），33. 越，会稽（浙江，绍兴），34. 越，鄂王城（湖北），35. 秦1 雍（陕西，凤翔），36. 秦2 骊阳（陕西），37. 蜀国都城成都（四川），38. 巴国都城重庆，39. 秦3，咸阳（陕西）。

公元前602年，黄河改道向东偏移，接下来的若干世纪中，建造了几条运河，我们所知的第一条，是公元前6世纪建造的运河，作为连接黄河和淮河的几条运河的网络。这条运河，以汴河的名称而闻名于世（A），作为一个延伸，邗运河（B）在公元前486年由吴王夫差建造连接汴河与长江。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所称的“灵渠”或“魔幻运河”（C），公元前215年建造，与始皇帝向南的探险相联。它将中国南部与帝国中部连接起来，因此，也与北部连接起来。沿着它所开创的水道，建立起三个城市聚落，湖南的长沙（40），广西的桂林（41）和广东的广州（原来称番禺）（42）。

战国时期，各国间不断战争，几个国家试图通过建造城墙以抵御赵国（I）齐国（II）楚国（III）魏国（IV）燕国（V）。公元前353－前300年，秦建造了非常长的长城，以抵御来自北部和东北部蛮族部落的入侵（VI）。公元前300年的赵（VII）和公元前290年的燕（VIII），这些北部的城墙，在始皇帝时结成一条防御墙，公元前3世纪的后半个世纪，成为中国的长城。

公元前6世纪大规模的“牡丹大坝”（译注：近代安丰水库）系统灌溉开始了（a），在安徽省北部，由大臣孙叔敖在楚国建造，此后，公元前4世纪到前3世纪，建造了更多的灌溉体系，典型实例是由公元前316年后，由李冰建于四川成都灌县的都江堰（b）和在公元前246年，郑国在陕西建立的魏碑体系（C）


27
28
24
25
26
V
21
23
22
11
12
10
IV
8
35
36
13
9
A
7
14
18
19
20
15
a
29
B
30
31
17
16
34
b
37
38
41
42
V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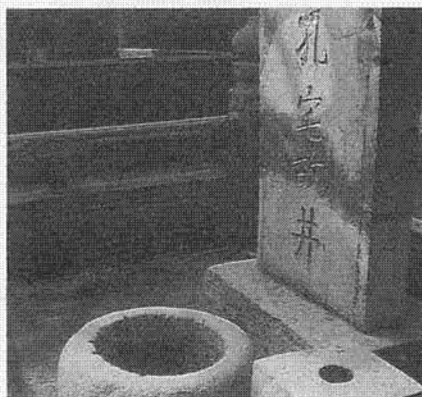




图 2.3.4.2 孔宅故井，在今天山东曲阜，据说，孔子在公元前 6 世纪在此掘井取水，它坐落在孔府附近孔庙建筑群之内（参见重建和图 2.3.1.10，11）。公元前 154 年后，西汉时期鲁王子向西延伸宫殿区域。当房屋的墙体被敲倒后，从孔子的书房中，发现了一些隐藏的书籍，这在接下来的若干世纪中，对于古典文献的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

图 2.3.4.3 山东曲阜孔庙杏坛，据说，圣人在那里讲学。这个杏坛后来成为主要大厅的次结构，直到明代，一座新的大殿在它北面建立起来，而建造了现在的亭子，屋顶上面的琉璃瓦，是皇家建筑的等级象征

泛介绍以及市场经济的涌现，对于商业的发展，甚至长距离的贸易做出了贡献。长线贸易路线上的城市高度繁荣，以至于它们的规模发展空前。其中一些，成为了真正的多功能大都市。它们现在容纳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城市社会，而国与国间频繁的接触，无论是战争似的，还是朋友似的，带来了人口的流动。人口的迁移以及民众间的商品、思想、观念的交换，超越旧的官僚秩序的限制以及新的国家边界。如此，诞生了一种我们可称之为新的城市文化。

在这种新的城市文化中，教育，成为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一新概念的第一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孔子。世界著名的孔夫子，鲁国人，出生于公元前 551 年。他对于教育的观念是：对于公共利益来说，重要的并非是出身、血统，而是一个高尚的道德和原则，因此，他努力教育每一个人，无论其背景怎样，只要他能够完善自我。

孔夫子从文学传统和历史记载中，选择教育的素材。在他的思想中，“神圣之王”的概念，某种程度变成了“有德之王”的概念，即以德行获得上天支持的君王。上天仅仅对具有高尚品格的人给与运气。孔夫子编撰了很多传统文献，并以他自己的想法，使这些论述发扬光大。以这种形式，他影响教育了许多代的官吏直到现代。而且我们可以探知这种影响在今日中国依然持续。孔子不仅是一些后来成为参谋、宰相、教师等人的导师，形成了“儒学”，许多其他有知识的人，也围绕着这些人，建立了其他的思想学派。公元前 479 年孔子死后，在大约两

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兴起了“百家学派”。

王子中，有几个支持这些有学问的人，而且，这些人受到北部山东齐宣王（公元前319－前301年在位）和之后愍王（公元前300－前284年在位）的善待。据载，齐宣王在临淄都城的一个城门外，成立了“稷下学宫”，学派成员们著书立说，阐述邹衍的教理学说，齐王非常欣赏，他给予所有这些人以“士”的称号，沿着一条宽阔的街道，为他们建造了高门大墙的府邸，尊贵地居住其中。而其他王侯的宾客们说，齐能够吸引世界所有学者，这表示了齐王是一个好国君。邹衍的教育，涉及自然科学，然而，此时“稷下学宫”之外的官僚学者，不能欣赏这种科学的开始。不久，这种强烈的压力施加到这一学派，很多追随者被认为是反叛者而被处死，因此，自然科学在官僚世界之外发展着，而关于自然科学的著述，要比关于历史诗歌和中国文学等其他方面的著述少得多。

很多统治者，将自己当作好国君，但是，他们吸引更多的是武士，骑士们周游徘徊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以寻求在某个时间内提供服务。虽然，大多数人具有强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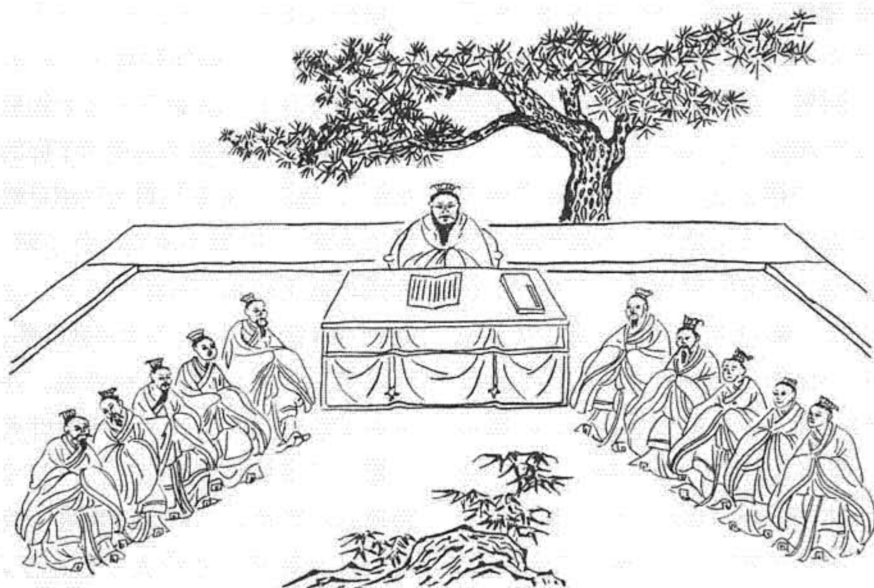


图2.3.4.4 孔子在杏坛教书，参见清代的木刻刻印，绘画暗示了儒学严格的纪律，石头、竹子和松树，象征了学校的道德性和简朴的生活方式，杏树大概不能适应这种环境气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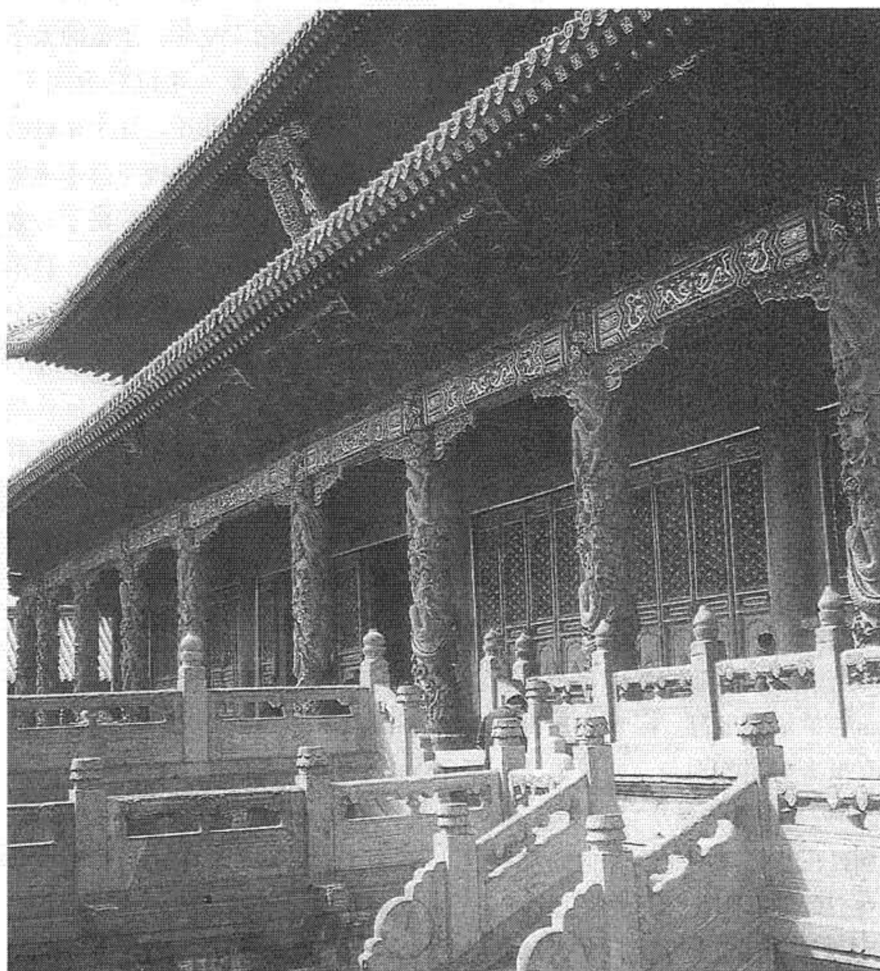


图2.3.4.5 孔庙大殿，山东曲阜孔庙，该建筑建于公元1724年，并且是这个时期中国建筑的杰作之一

荣誉和道德感，他们不能与以前的皇室贵族相比，因为，一旦他们的合同期一到，或者他们的正直诚实受到威胁，他们就离开了君王。

在神圣之王的观念是基于世界的力量—这清晰的上天起源概念的产地，如下的故事显示，造就一位君王，如何成为一个完全涉及金钱和阴谋的尘世事务（译者注，这段历史并不被多数学者认同，此说可供参考）。秦国一位年轻的王子，这个 20 个兄弟中的一个二等妃子的儿子，在赵国的都城邯郸被当作人质，他像一个毫无影响力的人，居住在窘况中。一天，吕不韦，一个通过以低价买进、高价售出，积累了上千的金件而集聚了财运的遊商，遇到了这位王子，以他敏锐的判断，自言自语："这件稀有商品，会是一笔大投资。"在长时间谈话后，吕不韦向王子提交了一个计划："你在这里是个穷人，又是个陌生人，所以，你不会赢得任何支持者。虽然我自己也是穷人，让我以一千金西行去说服你父亲，让你成为他的继承人。"然后，他给王子 500 金，用于交友和赢得靠山，并投资了另外 500 金，用在购买作为礼物的稀少物件和首饰。他西游到了秦，获得了与加冕王后的大姊会晤的机会，并献上他所有的礼物。他谈到了那个年轻王子的价值和智慧，以及在所有国家有很多有用的朋友，并报道了王子的话："我将加冕皇后看作是天意。我日夜想到我的父亲和他的那些仕女们，就忍不住泪流！"这个女士很高兴，而商人劝说这位大姊，去劝说那无子嗣的王后，收养这年轻王子作她儿子，以保障她容颜褪去以后的岁月中，依旧得到这个加冕太子的青睐。"我很幸运成为了你的嫔妃"，这位加冕皇后眼含热泪对她的丈夫说，"但很不幸我没有子嗣。你能让这年轻太子作你的儿子，让我有所依靠吗？"吕不韦回到邯郸，向这未来的太子献上这份厚礼，并举办了盛会，太子的名声便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开来。此后，吕不韦将他自己的情妇，一个邯郸最美貌的宫廷交际花，送给太子作妃子，她及时地生了个儿子，称为太子嬴政，吕不韦又花了 600 块金条贿赂守卫，太子得以脱逃西行至秦。

在公元前 250 年，加冕的太子成为秦王，但是一年以后他死了。这个王后收养的儿子，这个年轻的太子登上了宝座，并授予吕不韦宰相高位。3 年以后，新王死了，童太子嬴政，在 13 岁成为了王，吕不韦成了王国中最有势力的人。这个商人用大量的钱财，使一个落魄的王子成为君王，一个宫廷交际花成为王后，而他自己成为了一个侯爵和大臣。童太子嬴政，当上了秦王，并在公元前 221 年，成为中国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

2.3.5 周后期的城市主义——大城邦国家

周最后几座王宫，依然留在成周一段时间，因此，旧的周公圣城，成为了富裕商人吕不韦的宫室。他修复并增加了更多的宫室建筑，因为有 10000 名家仆和大约 3000 名门

图 2.3.5.1–4 西周城市和东周的扩展，比例 1：4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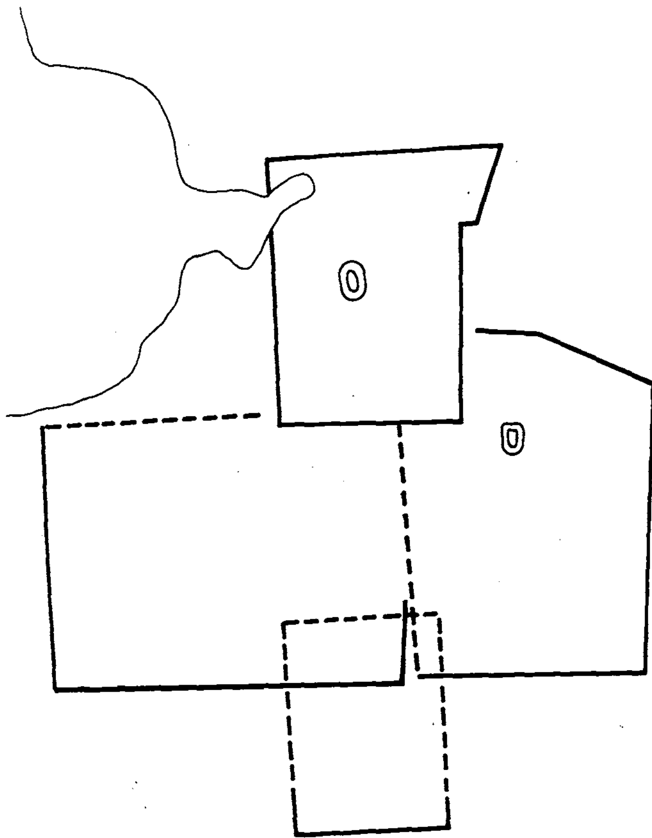
图 2.3.5.1 东周时代曾经作为晋国都城的新田，现今山西侯马市附近[1]。
新田城是晋的 13 个王子的都城，从西周时期直到东周末期。北部的围墙区域，可能是有围墙宫殿的集合体最为古老的部分，后来的加建，也许属于统治家族的不同分支。整个宫殿群最终覆盖大约 10 平方公里，并由骨刻、制陶和铸造厂以及墓地所围绕。几处动物墓葬被发现，包括马、羊和牛，以及在隔开区域的三架马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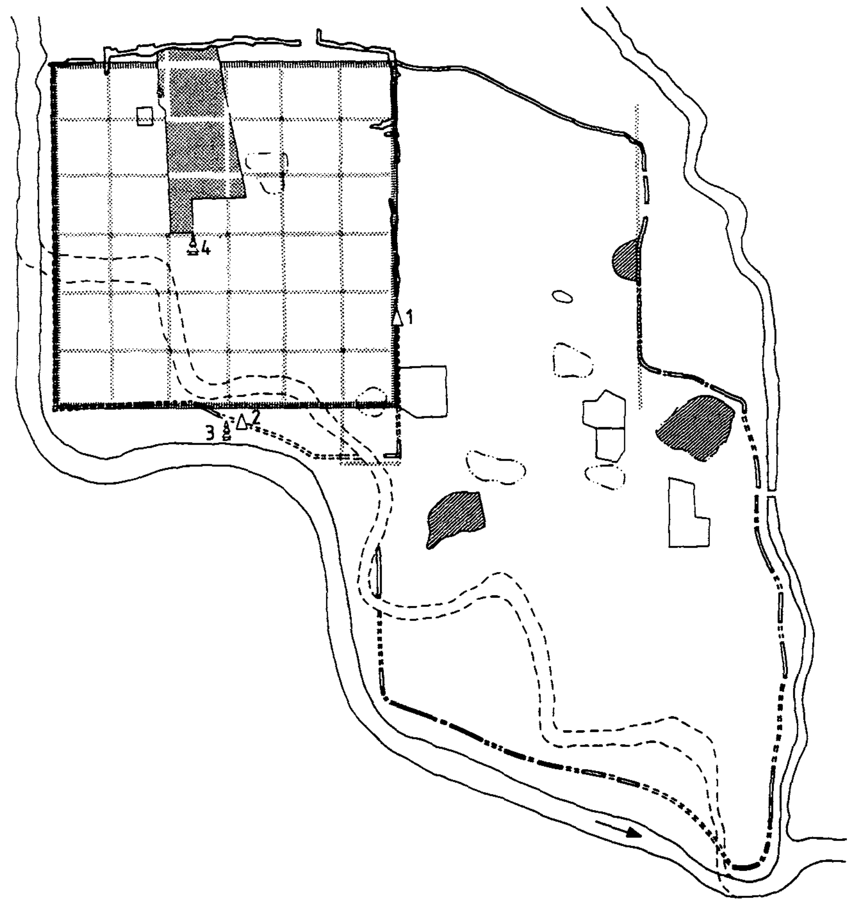
图 2.3.5.2 晋国的安邑城，今天山西夏县的附近，一度是魏的都城[2]。
内城 3 里 ×3 里（商里，1 里＝304.2 米），外城包括几个部分：它曾经可能至少有一座城墙，长 12 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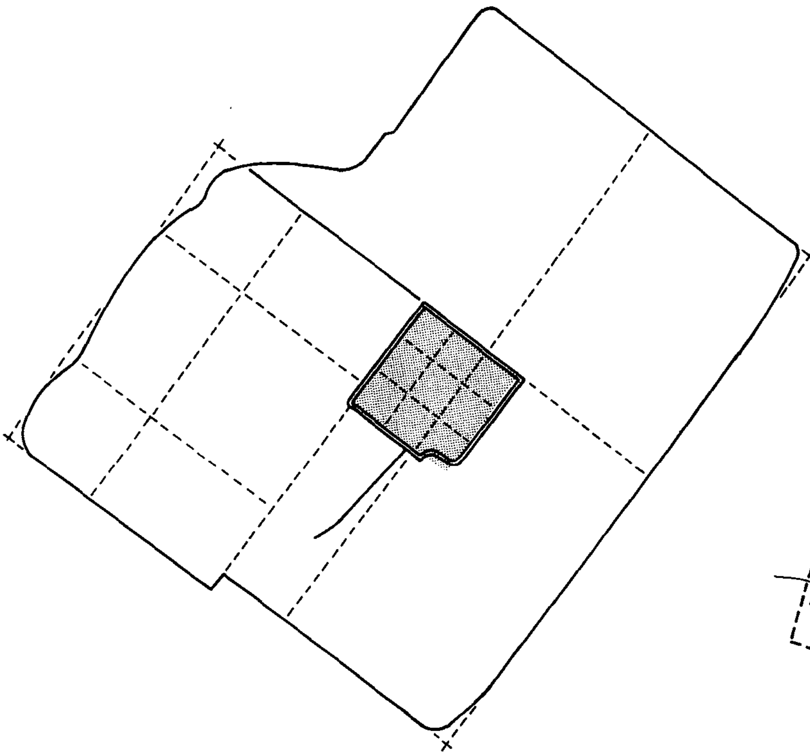
图 2.3.5.3 郑的都城（郑 2，No.7，参见图 2.2.3.1）今天河南新郑县。[3]旧的部分布局，为一个基于东周度量体系（1 里＝396.0 米）的 6 里 ×6 里的方形。其扩建部分，或郊区，为东周时期加建所增加，遵循双吉河（左）与另条小河（右）河岸的自然特征。有点的线，为现今的河道，深阴影区为宫殿，浅阴影区为居住，划线为作坊，1 和 2 为当时的土台，3 和 4 属于后来佛寺的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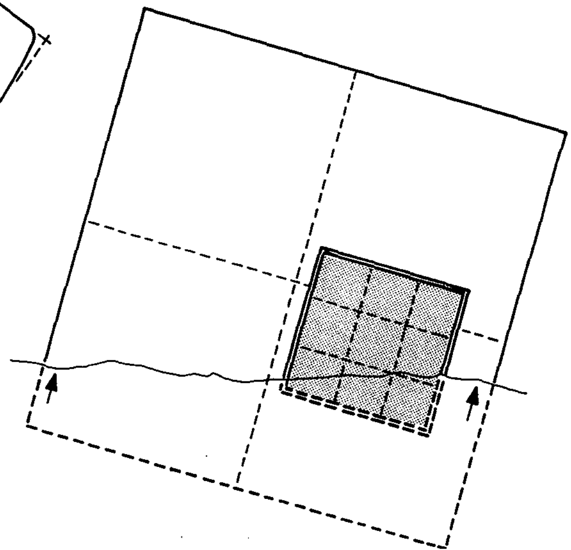
图 2.3.5.4 晋国晋武公城，今天的山西曲沃县附近[4]。
内城 3 里 ×3 里（早期周里，1 里＝358.2 米），外城似乎为战国时期（公元前 5 世纪）所加，并形成一个基于东周尺寸（1 里＝396.0 米）的 8 里 ×8 里的方形，南部后来被河水冲刷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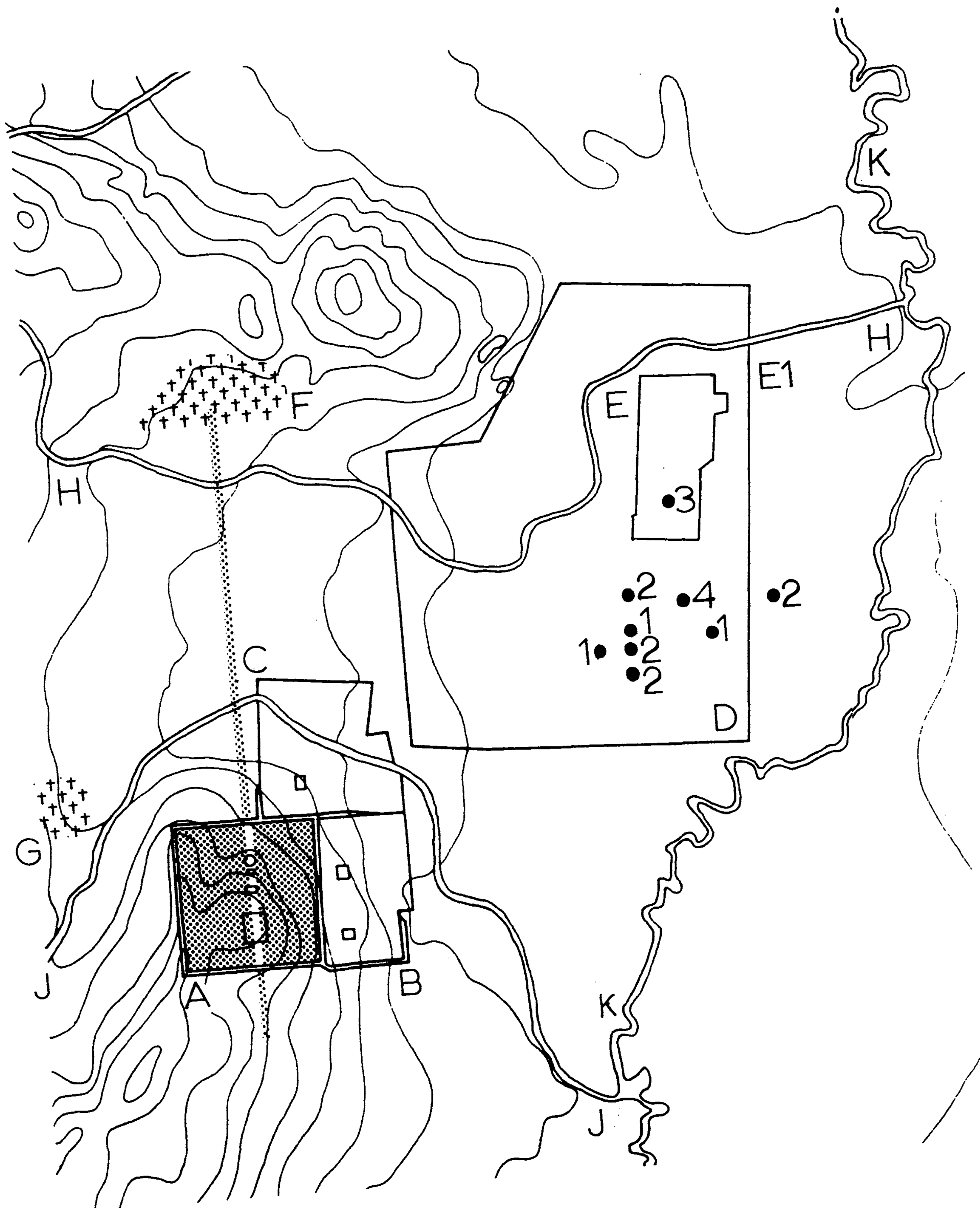
1 参见文物，1988/3。
2 参见文物，1962/4，5。
3 参见杨宽著，战国史，上海，1980 年。
4 参见文物，1960/8，9。




4
1
3
2






K
H
E1
E
F
H
3
2
4
2
1
1
1
2
2
C
D
G
J
A
B
K
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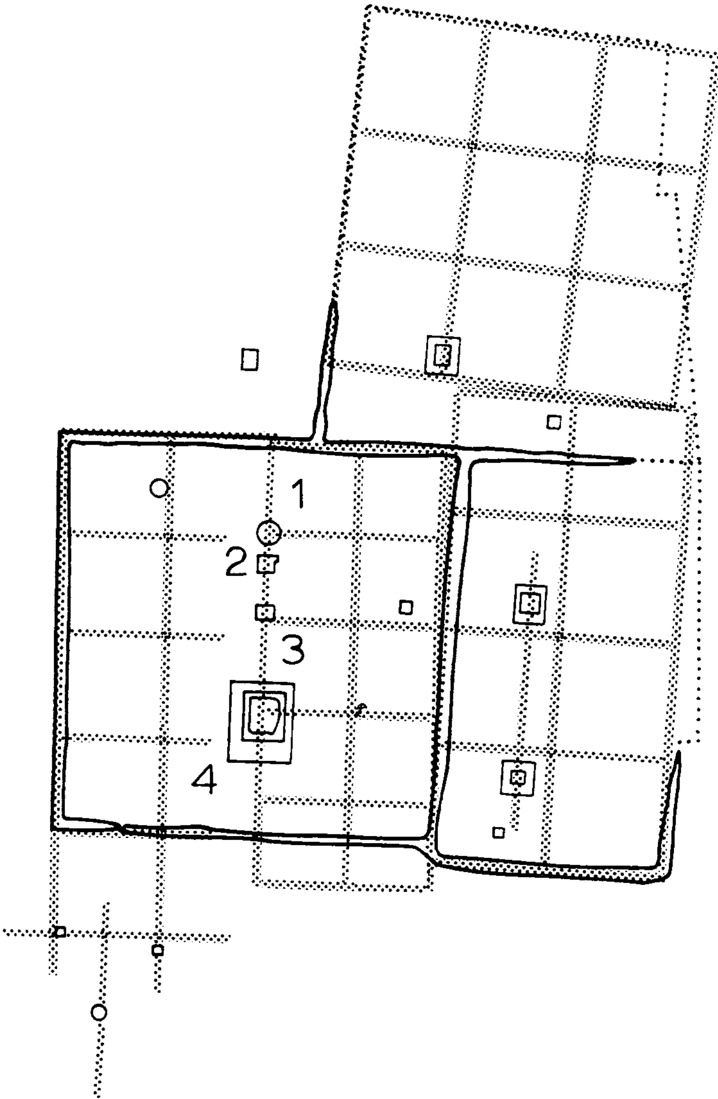
客，大多是有学问的学者。他们帮助吕不韦著述了著名的《吕氏春秋》，在公元前236年，吕不韦被逐除宰相地位退到成周。从那时起，成周已被称作洛阳。一年后，路上拥挤着游行的队伍，各国访客都来拜访吕不韦，以至于秦王害怕吕造反。下令将吕不韦流放到四川，但吕不韦服毒自尽，于公元前235年死于洛阳。

贯穿这些世纪，成周保留着由周公建立的旧形式。其地位和其以前的功能，从未激发任何更进一步的发展。经过了几代人，它大概已经包含了两个宫殿群，位于中心的北部宫殿和围绕着宗祠的南部宫殿，周代最后的几位君王，在其中居住并实施礼仪。从这个城市的规模判断，毫无疑问，它能够容纳超过100000的人口。但我们不知道细部，甚至对于王城也知道得很少。虽然考古学已经表明，直到周代末期，它一直是繁荣的，城墙形成了一个聚落模式，成为所有周后期大城市的典型布局：一个小围合区，其中居住着统治者和有势力的家庭；一个大围合区，提供了空间居住区域，作坊、市场街道甚至坟墓和其他为普通人所用的建筑物。比如，在东周初年兴建的王城的墙体是笔直的，根据准确的度量尺寸进行建造，并推测形成了一个几乎是完美的方形。

公元前769年周平王在王城立足时，得到七位王子支持，他们的

图2.3.5.5 河北邯郸城，比例1：40000[1]。山上的宫殿城堡（A）为公元前2000年末期的布局，并在后来被扩建（B和C）。河谷中的城市（D）为东周时期的赵国建造。E1是由赵武灵王于公元前325－前299年所建之台。城市内部挖掘出几处作坊，有冶铁的（1），制陶的（2），石头的（3）和制骨的（4）。周代的坟墓（F），坐落在旧宫殿堡垒正北的沁河（H–H）和渚河（J–J）以外。滏阳河在黄河（K–K）旧河床的城市之东流过，由后者占据直到公元前600年。一座汉代的坟墓（G），在宫殿城堡之西被发现，明代城市的轮廓线是在E

图2.3.5.6 河北邯郸的宫殿城堡，比例：1：20000[2]。
分析度量体系时，我们发现，城堡的形状，是发展过程中几次变化的结果。最老的部分，与中轴线上的土台子一起，似乎曾经被布局为一个基于商之度量体系（1里＝301.5米）的4里×4里方形，后来，城堡的墙体重建，西部重新布局，但以周里作为基点，1里＝351米。到第三阶段，北段和东段又有扩建，最大可能是基于周代后期的度量体系，1里＝376米。该度量体系，肯定用于这个时期邯郸以北的中山国。中轴线上的土台，从北算起主要有：1. 圆形土台，直径63米，高7.5米；2. 方形土台，平面60米×70米，高3米；3. 另一座方形土台平面49米×51米，高4.5米；4. 3层龙台，高13.5米，基座平面210米×288米，顶层105米×130/40米宽



1 参见考古，1988，2。
2 参见考古，1962/12，1980/2等。

封地坐落在周领土的东部区域。平王的大臣，是郑的武公（公元前770－前744年在位），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物，却是这个地区的新来者，估计他于公元前770年与平王一起来自西部，用自己的影响，发展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封地，包含前王族领域的一部分和一些其他的、随着时间过程已经吞并的封地。大约与王城建立的同一时间，他在成周之东大约一百公里，在现今河南省中心，双吉河北岸，建立了郑国都城作为他的王城。城墙基于东周的度量体系，形成一个6里×6里的方形，比王城低一等级。调查显示，在围合区的北部，具有大范围的重要建筑物的基础，墙上有几座门，显示了一个根据6里×6里模式非常认真设计的布局。大约400年的混乱历史中，它一直保持为封地的都城，一直到公元前375年。

尽管因战争所带来的不幸，但因其靠近主要的中央贸易路线，该城又一度繁荣，成为一个重要冶炼中心，其墙体向东南扩建，形成一个城市区域，整个区域大约16平方公里。尽管具有不规则的外轮廓，墙体明显随地形而建，在墙体内，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用于冶铁和青铜，以及骨制和玉刻作坊的痕迹。遍布中央区域的，是标明战国时期开始的住房组团废墟。几公里南是著名的阳州城，即现今的禹县，著名富商吕不韦的府邸，也坐落在主要的贸易路线上，在韩王公元前375年取得郑作为最后都城之前，这是韩国王子府的第三个位置所在。

晋的封地建立于黄河以北，在公元前11世纪末，周成王治下的山西省南部。当时，几乎变成了加固的城镇，有方形3里×3里的布局，基于商和西周的度量尺度，那些小的城墙区域，也许作为强有力的当地君主的据点，在晋的领地内，这些君主，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并不断地为权力而战。当周平王在公元前769年建立了王城东部居室时，权力争斗加剧。其中一个君主，居住在山西南部中央部分的曲沃，逐渐赢得了权力。大约一个世纪以后，在公元前678年，武公在晋建立了自己的宝座，并增大其居室。环绕大约3里×3里的旧城，他建立了一个非常规则的8里×8里的、基于东周度量体系的方形围合区，反映了他狂妄的野心。也表示旧规范的准确布局，在这个时期依然存在。然而，武公继任者的野心，转向了北方，于公元前669年，在晋阳更北的地方，建立了一座新都城，将其父亲的都城留给了对手，地方首领。很短时间内，他将现今山西省的很大部分，纳入自己的治理，在公元前652年，他成为整个东周最强的诸侯之一。他的都城晋阳，坐落在汾河之西，接近今天的襄汾，它覆盖大约4.2平方公里的面积，并形成另一个非常准确的大约4里×7里大小的矩形平面，其中是一个更为规矩的2里×2里的方形，以墙与其余地方隔开，大概是诸侯宫殿区域。所有可能的度量体系，是东周后期的体系，这样，这些墙体可能属于晋封地的后来时期。然而，布局清晰表示了原则上与旧东周初期规矩的分离。更别提西周了。

在晋国，有几个其他的王子居所，也许并不总是新建，而是对已存聚落的扩展。大多数似乎是纯粹的军事堡垒。因为，没有重要的国家级长线道路横过这一地区，外加持续的斗争，这里的经济发展缓慢。后来，晋国分解为几个由有势力的贵族家庭所控制的势力范围，他们又建立了自己的都城。一个例子是晋阳的赵家，在现今山西省太原城东南。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大型围合区，一个8里×8里的方形，以早期西周度量尺度为单位。在公元前7世纪，它是强势赵氏家族的居室，在那时就支持晋王们征服这一地区，攻克北方的蛮人部落狄。这一地方似乎与晋阳城一致，那里最先曾经是晋王于公元前669年远离曲沃向北迁移之后的一个次级都城，与晋阳城同时代或者先于晋阳城。其形式，8里×8里的规则方形，与曲沃的形式非常相似。后来，在赵人于公元前457年降服北方匈奴人的部落之后，它成为赵的王都。接下来，这些赵人与匈奴的统治者们结成联盟，采用了很多他们的习俗，特别是与马背骑术有关的一切事情，并且发展了他们自己模仿自匈奴人的马术。然而，在公元前424年，他们将都城从晋阳移往中牟，现今河南安阳更往东处。公元前386年，他们又将王室移往安阳以北的邯郸。

邯郸，在周公时代的周代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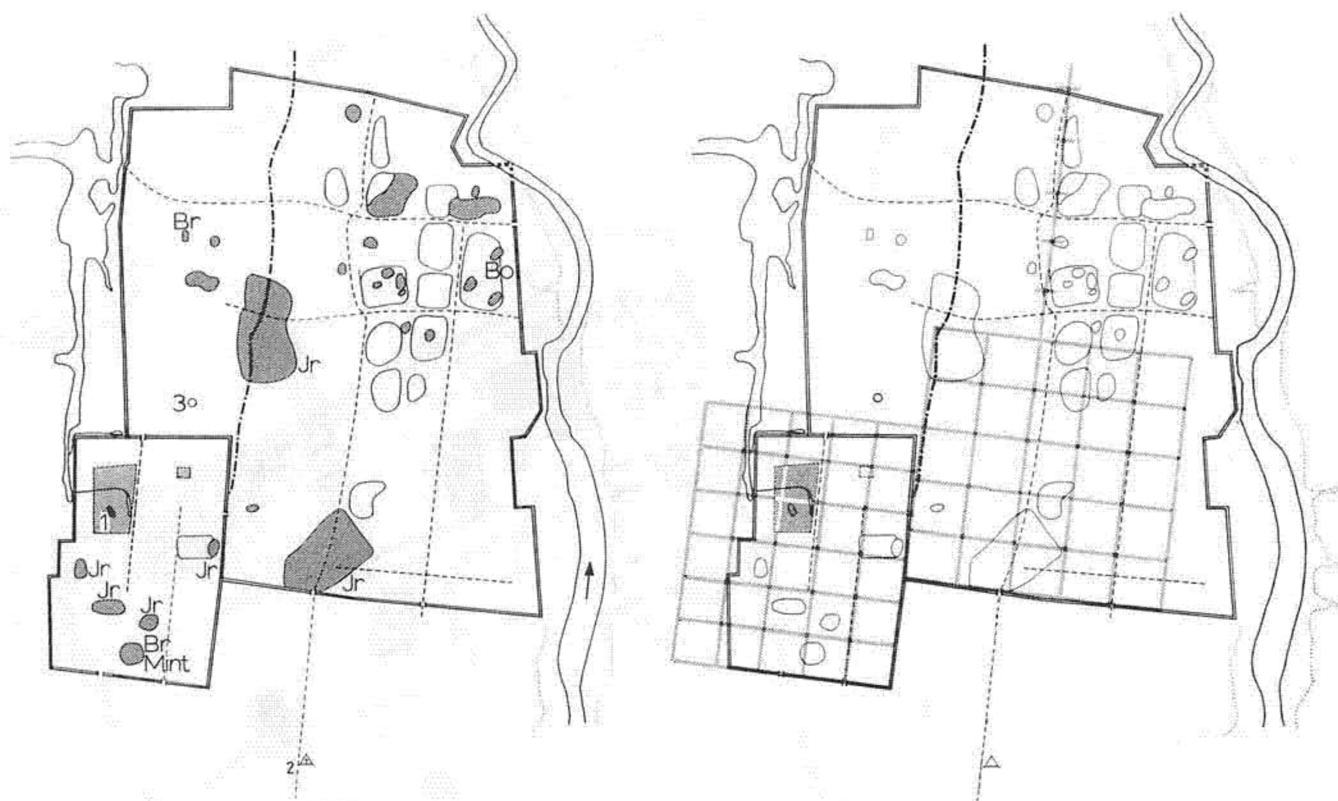


图 2.3.5.7、8 临淄城，一度作为齐国的都城，现今山东省淄博市，在淄河的西岸，比例 1：40000[1]。
浅色阴影为居住区，正如挖掘所确认的，深色阴影为宫殿区域，具有 1. 桓公台，齐桓公（公元前 685－前 643 年在位）；斜线部分是作坊区域，青铜、铁、骨；2. 桓公或是庄公（公元前 794－前 731 年）之陵；3. 晏婴之墓（为灵公、庄公和景公的三朝大臣，公元前 493 年死去）。宫殿平台为 65 米 ×86 米，以 4 层升起至 14 米，其中一座门是稷下门，那里坐落有著名的"华山学派"，此门也许直通农业坛，因为，稷为后稷，是粮食的灵魂，再向南，坐落着后来诸位君王的陵墓。度量的尺度网格，显示了对原布局试验性的复原。那里后来加建以不规则形的城墙，大概以三个不同阶段，并采用了三个不同的度量单位。管仲的非正统观点，似乎对此扩建有所影响："一座城市之形状可以不是方形，其街道也不必追随直线"（《管子·乘马篇》）"一座有 10000 户居民的都城，无需在一层平面之上，而不平的地面也无需填平"（《管子·宙合篇》），这是与周礼"神圣法则"直接的反对[2]

1 参见考古，1988/9，杨宽著，战国史，上海，1980。
2 参见，孙宗文在中国城市规划汇刊的文章，第一卷，第一册，1985。18 页。

之前，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市聚落了，它是一个加固的围合区，4 里 ×4 里，城墙 20 米宽，大约 15 米高，特别坚实坚固，并且拥有几个不均匀分布的城门。沿着方形围合区的南北中轴线，布置着一组四个平台，在墙内和墙外散布有更多的平台，而东边到北边的部分围合区依稀可见，大概是中央堡垒的延伸。在所有平台的顶上，已经发现有战国时期的砖瓦，表明它们是当时的重要建筑物的次结构。河的北面，北墙以北约 3.5 公里处，发掘出一处带有 49 座墓葬和 6 架马车葬坑的公共墓地。其中 12 座墓葬拥有奢华的陪葬，一座墓葬则在地面上有一个土丘，这是典型的周代的墓葬。最近，所有墙体的外轮廓已经复原，看来，在有三面围墙围绕的城堡东北，增加了一个较大的围墙区域，这大概发生于公元前 386 年，其时赵王在此建立宫廷。该围墙区域大约覆盖 12 平方公里，形成一个不规则矩形，并未发现有明显的度量系统。邯郸这个坚固的城堡，几次经历强权军队的围攻而幸存，但终在公元前 228 年，在被持续围困了一年之后，由秦军占领。秦王嬴政，公元前 259 年在此出生，当时，他父亲被赵王作为人质抵押在此。秦王嬴政胜利地进入该城，并活埋所有那些在其出生时与他母亲家族为敌的仇人。

魏国的旧都，是黄河以北，山西西南角的魏城，其时，它属于晋的领地。当初，可能是一个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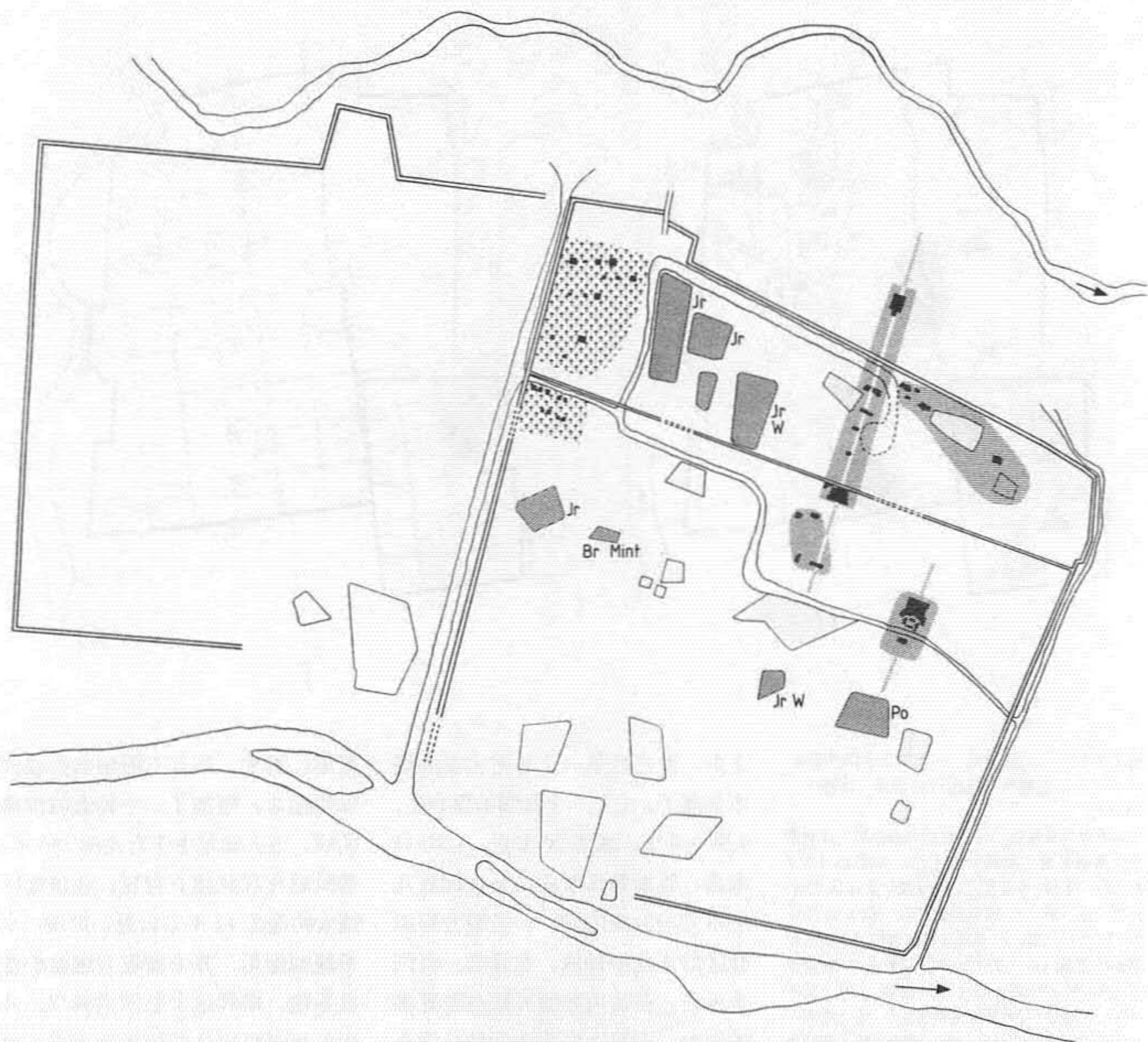


图 2.3.5.9　下都城，一度是燕国都城的下都，在河北易县附近，比例 1 ：40000[1]。
浅色的阴影区为有废墟的居住区域，深色的阴影区为有平台的宫殿区域，黑色平行影线的为作坊区，Br 代表青铜，Jr 代表铁，W 代表武器库，Po 代表陶器，十字代表坟墓区，墙的北和南是伊河的两条分支

1 参见考古，1962/1，1965/1，11 1975/4，1988/7。

常准确的方形，以商的度量单位，3 里 ×3 里，但从今天我们可以寻迹到的，其西部的墙体似乎被重造过。除了居住建筑外，还发现一些战国时期的葬品，当时，魏王已经在更东边，即山西南部盐湿地以北的安邑，建立了王室。在安邑，最古老的城堡是一个 3 里 ×3 里的方形，基于西周的尺度，第二个外城堡，如果以早期东周的度量单位计算，尺寸为 12 里 ×8 里。中心西边的第三个围合区域，加有大约 7 里 ×5 里的墙体，采用的是后来的东周尺度。因此，作为一个整体的围墙区域，由三部分组成，大概建于三个不同阶段，因而产生某种不规则形状。公元前 365 年，魏王室移至大梁，靠近今日黄河以南的河南开封。安邑也许继续作为贯穿山西境内干道的一个重要贸易中心，一个盐业贸易集散中心。

公元前 225 年，秦军攻击魏国，并且改变运河河道，淹没了大梁城。城墙倒塌，魏王投降，其所有的土地被吞并。“影响大梁落位选址的主要因素之一是鸿沟运河，该运河通过汴水和泗水，连接黄河与淮河体系，位于今日的安徽省，并被称为郭河。该运河因其在同类运河中历史最为古老而著名，它在主要的经济地区之间提供水运，并且连接黄河南部所有的分封领地，使其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长途运输线。一些文献宣称它建于公元前 361 年，但这也许仅仅是一个重建，或与大梁的建立相连的一种改善。运河以北，一座墙围区域为 7 里 ×8 里的大梁，是魏惠王（公元前 369－前 335 年在位）的都城。魏惠王是那个时期的周代疆域最为强势的人物。

运河在运输网络中较好的位置，肯定对于城市的经济发展贡献巨大。一匹套上马车的马，在那个时代通用的未铺路面的路上，可以牵拉大约半吨的辎重，如果套在运河上的大驳船上，能拖大约 50 吨的辎重，相差大约 100 倍之多。聪明的魏惠王运用他日益增长的财富，使其宫廷成为学者、诗人和哲学家们的荟萃之地，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道家人物，庄子和极端个人主义者，杨子。惠子像庄子一样，是大梁本地人，成为魏惠王宫室中的大臣。庄子提到他聆听惠子说教：倚长榻听惠子高谈，是时代的一个奇迹。惠子，也许是公元前 4 世纪时一个最为博学之人，一个哲学家和科学家。魏惠王在死前不久，又接受了著名儒家，孟子，然而当这位博学的赞助人死后，孟子离开魏，前往齐国。那里，齐宣王（公元前 319－前 301 年在位）享有同样的声誉，以其在稷下所习的“华山学派”，其都城临淄可以与大梁魏都城相抗衡。

齐国，是周之疆域中最东部的国家，在黄河和渤海湾之间，现今山东的北部。早在周公时代，它作为一个封地就已经建立起来，拥有富裕的自然资源，到公元前 8 世纪末，发展成一个最强势的国家，由齐桓公（公元前 685－前 643 年在位）和大臣管仲（公元前 645 年卒）治理，它是周领土中所有国家的第一个，而齐王成为所有诸侯中的第一个霸主，他的都城，在山东北部的临淄，离海滨不远。

该城市的起源，可追溯到公元前 10 世纪，初建时称作营丘。原来城市的遗迹，可能尚存于聚落群西南角较小的围合区残存的墙体内，以早期周代的度量单位，我们可以假定，这个城市，原来也许是一个 5 里 ×6 里规模的矩形，北半部有宫殿。公元前 839 年，营丘被改称为临淄。齐桓公指定管仲为自己的大臣。城市向着东北方向延伸，直达淄水的岸边，如其新的名称所显示的那样：临眺淄水。这个新扩建的部分，也许以基于东周度量的其他度量单位而布局，而且也许开始时已经形成了一个 6 里 ×6 里的方形，规模相当于旧郑城。该城早在 100 年前，由当时领域内最强势之王、郑国的武公所建，有趣的是，管仲关于城市规划的一些想法，在《管子》一书中的记录里有所留存，这是后来在 4 世纪或 3 世纪编撰的，但是，想必包含管仲的一些原话：任何都城，如果不能在大山脚下建造，应当坐落在大河岸边。书中的一章中也写着：海拔不应太高，从而保证充足的水源；也不应太低，这样人们不必花费太多的劳力建造堤坝防止洪水。都城的基址，应该选在肥沃的、有助于农耕的地区。基址应该坐落在山脚下河边上，以便防止洪水的侵袭。也应该挖掘沟渠疏导雨水流入河流。如果城区大而郊区小，那么，郊区的农业生产，就不能满足都市人口的需要；如果都城大而人口少，那么就缺少人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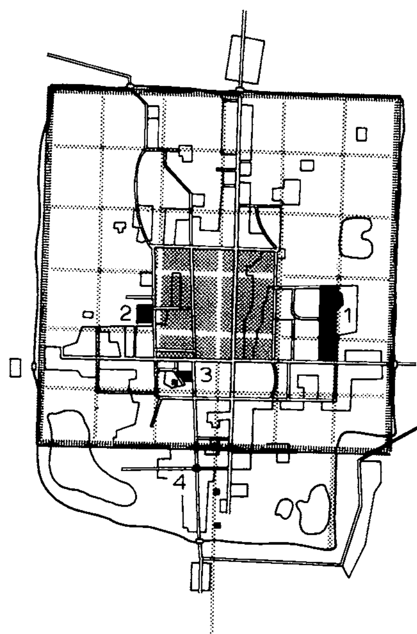
图 2.3.5.10　山东省的黄河，大量的淤泥淤积，迫使河流不断地改变河道，自公元前 602 年，这首次记载的时间之后多次发生。这些变化，不但影响了河床的地理位置，而且造成生命和财产的严重损失，并带来戏剧性的政治发展，乃至新朝代的建立。直至 13 世纪，变化仅在北部平原发生。但是后来，黄河在其向北和向南的河道间转换了很多次，有时甚至流入长江湾，这黄河早期的北部出口以南大约 900 公里处



进行防御。此外，据载，管仲向桓公建议重新组织行政治理区，最终便是基于严格的军事考虑。王公的领土被分成 15 个区域，每个区域又分成 10 个界域，每个界域分成 4 个镇区，其中每个镇区中，包含 50 户人家。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意味着 30000 人家与其相应的官吏。这些人，全部都居于乡村，为依附于土地的民众。在乡村的 15 个区域之外，有 6 个假设的“区域”，所有那些区域里的人与土地都没有联系。即匠人们和商人们，他们不需要服军役。这意味着，王有 30000 人的储备军，在三个区域随时等待调遣，可谓那个时代最强的军队。

据《史记》记载：起先，齐国的土地潮湿而多盐，居民很少。但齐王鼓励妇女将手工业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并且开放了渔业和盐业贸易。结果，男人们和商品一起流入该国，而且像辐条沿着毂一样咬合在一起。管仲大师通过建立九个内阁控制钱币的流通，使得桓公成为一个独裁和霸主。因此，直到公元前 301 年，齐国都保持富强。看上去，临淄那较大的城区，又向北部沿河岸延伸了大约 4 里。以前大多数在城外的几座作坊，如今被包进围合区。然而，公元前 555 年，城市被当时最强捍的晋国军队攻克，并严重地受到损坏。虽然经济并没有遭受最严重的伤害，其政治地位严重受损。公元前 387 年，统治家族衰灭，而由田氏家族取代。接下来的几百年，是临淄历史上最具文化的时期，但公元前 285 年，该城又被在河北北部的燕国军队所攻。城市遭到抢劫，庙宇和宫殿被焚，民众遭到杀戮。然而，它再次恢复并可能得到过重建。新城部分的墙体，朝向新的方向，比较小的和最老的围合区的旧城墙，部分得到重建以满足这新的朝向。因为这个原因，发现原来的布局有些困难，但是，通过考察其对不同度量单位的应用，我们也许

图 2.3.5.11　河北正定城，比例 1 ： 40000，图上也显示了对于原布局采用东周度量单位（1 里＝ 396 米）所做的试验性的复原。
那时，正定，大概是中山国的重要城市之一。根据历史地图集，有两座著名的中山都城坐落在正定附近，最后，一个接近平山，更上溯到滹沱河，那里，最近发现了訾王的坟墓。他大约公元前 310 年被埋葬在这里，度量体系取自 12 世纪的地图，那里显示一些建筑物依然存在。
1．隆兴寺（公元 6 世纪），有著名的观音青铜像（22 米高，公元 10 世纪）。
2．孔庙。
3．关羽庙。
4．有阴影的区域，也许是中山国一座宫殿的坐落位置，城市的区域后来向南部扩建，那里，在旧城布局的中轴线上建有几座塔



可以辨别出城市的不同部分。

考古学已经提供给我们一个相当准确的、关于该城在东周最后几十年城市结构的图像。那即是周代的末期，文献资料可以帮助我们填补其图像。临淄宫城，也就是较小的围合区的城墙 18 米宽，9 米高，而大城，即较大的围合区部分的墙体仅 6 到 7 米高，基座约 13 到 15 米宽。所有这些，都是用于较后期那种坚实城堡之中的尺度，但即使如此巨大的墙体，也不能永远保护城市免于敌人或洪水的入侵。然而，与其他废墟相比，临淄的毁坏要轻得多。一开始那较小的城区显然包含王宫，公元前 7 世纪桓公的宫殿，也许建在北部巨大的土台子之上，面积 65 米 ×37 米，高约 14 米，今天它依然被称为“桓公台”，并且俯瞰整个区域。官吏们应该居住在王宫附近，普通人近城门，匠人和商人们近市场。管仲陈述道：每户人家，应该将前门粉刷成白色，并建造一个大门，邻里之间可以交换柴禾和其他材料，并且饮用一井之水。宫城里也包括铁匠作坊，青铜铸造，铸币作坊，那些可以称为“诸侯铸造厂”，因为齐是第一个发行钱币的国家。东北角，另有一座高平台，一条从城市南部城墙的东门而来的街道，从南面与其相接。尽管尺度较小（8 米 ×12 米），此种布局，也许显示这高台在城内具有仪典的重要性。城墙外是桓公的陵墓，一座土质的金字塔形体，12 米高，置于一座高起周围田野约 20 米的土台之上。围合区的南半部，散布一些生活区。应该提到的是，度量体系为当初土台的坐落及街道和城门的坐落布局提供了基础。

那大的或外部的城，以一座低矮的南北向的墙体被分成两个部分，其分离了两边最后的延伸部分，以脱离开旧的部分。这西部，仅仅包含几个冶铁的作坊。较老部分的南部区域，主要由两个相当大的、可称之为铁厂的区域占据着。而北部，有沿着南北道路的大型聚落区域和几个较小的制铁和刻骨的作坊。看来，管仲的功能性“业态分区”提案得到了应用。

两座围合区加在一起的规模，大约 16 平方公里。根据当时的文献记载，公元前 3 世纪，人口规模升至 350000 人，有 70000 个家庭，大致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20000–22000，而在居住区域，大约每平方公里 30000–40000 人，在中国城市的整个历史过程中，这并非不合理的数字。因此，相应地，一位诸侯的领地，大约有 50 万的居民，据说：关于这个城市，在其 300 个街坊里，如果人们抬抬袖子，就能罩住整个天空，如果他们挥挥汗，天就能下雨，到处是人，人口十分密集。司马迁给了该城一个总体性特征描述：临淄是大海与泰山之间一个重要的中心，当地人比较好相处，心胸开阔，聪明，好辩论，沉稳而不易动摇。他们在团体战中表现怯懦，但在一对一的肉搏中很勇敢，他们拥有的是伟大帝国的风度，这里可发现人们性格的五种类型。有山有海的齐国，有着延展千

里的肥沃土地，那里，桑树养蚕，植物繁茂，人民有着大量的彩色丝绸、布、普通丝绸、鱼和盐。应该注意到，齐的许多财富，以及初期的重要性及其都城临淄，来自于统治者们及其臣民们的商业活动。在中国北方所用的大多数青铜器，特别是铁器，大多通过齐由南方而来。而都城的作坊，不但为本地市场生产，并面向整个华北的遥远地区。文化活动，特别是“华山学派”在临淄稷门，这在前面已经提到了。城西沿着山脚的乡野有许多的温泉，是王子们的猎场及夏季别墅。

我们也许应该说，在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或最大的周代城市，是下都城，它一度是燕国的都城，正如名称所示，是“燕下都”。燕国是最北边的封地，早于周公时代的西周初期建立。在今天北京南面，河北省西北的易县，有大量关于下都废墟的调查和发掘。废墟覆盖有大约32平方公里的面积，是临淄的两倍之大。城墙大约40米厚，将城市分成三个部分，东部包含四个功能性区域：宫殿部分，工业部分，居住部分以及埋葬区域。宫殿区域由一排四个土台主导，坐落在一条北偏东北到南偏西南的轴线上，大约2公里长，几乎是今日北京故宫建筑群轴线的三倍。最南端的台子，依然是11米高，形成一个东西140米，南北110米的矩形。这个台子，由三组矩形的房屋，在三边都有水平楼板所围绕，北边除外。每一组包含一个大房子，建造在几米高的一个大台子上。如果这个仪式中心原来是一个较小的城市，正如很多其他实例所表示的那样，它可能是一个5里×6里的矩形，但是，这一地区，没有任何此种规模的墙体痕迹。相反，某种不规则形状的围合区，其围墙将两座土台包含于内，另两座土台留在墙外，但是，围墙包进了一个具有两个铁作坊的大规模工业区，一个武器制造厂，以及在其西部的一座制骨作坊。更往西，是一处墓葬区域，有四排墓葬小丘高起于陪葬丰厚的墓坑之上。围合区的墙体，穿过这一葬区，正如它穿过宫殿区域一样，显示此墙体是一种稍晚的构造。这座墙的南面，是一个梯形或不规则四边形形状的围合区，8里×10里的规模，里面包含着墓地的其他部分，有10座坟丘，5座一排，共两排，另外还有一个生铁及武器工厂，一个铸铜币的造币厂，一个制陶区域以及几处居住群。南墙邻接河流中部，因而已经被河水冲走了一部分。在河流远处，同一时期的另一处公共墓地坐落在城外。一个壕沟的网络，似乎用来帮助区分各个功能部分。

城市的西边，是另一个围合区，约为9里×9里的规模，大约，在3世纪某个时间之后加上去的。但是，除了在近城的西墙处的东南角，它几乎没有任何占据的痕迹，这一地区，也许被用作一个军营，或仅有临时建筑物的马车营，就像蒙古人的帐篷，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一些观察也许支持这样的假设。自从其在周代初年作为一个封地建立之后的几个世纪以来，燕国没有参与其他国家的政治，而是忙于驱赶其北边的邻人，也就是匈奴人和通古斯人的游牧部落。挤在北部和西部的山区之中，以及黄河三角洲的九曲黄河的沼泽地，它是一个遥远的区域，人烟稀少，并且经常暴露在蛮族入侵之下，但是，那里的人们凶猛如鹰，并且极少深谋远虑。这一区域盛产鱼、盐、枣以及板栗。在燕国没有专门制兵器的匠人，因为每人都知道如何自己制作。正如《周礼·考工记》上说的那样。在公元前5世纪的一段时间里，燕王与赵王建立联盟，他们彼此配合，共同对付北方的匈奴人，但这两位都是当时在南北贸易中占有主要地位的齐国的敌人。当昭王在公元前311年成为燕王时，他在几个大规模的行动中，运用了国家的力量。例如，攻克远达朝鲜的辽东的东北部分。建造长城防御北方的游牧民族，特别是防御来自南方的齐，肯定是与“下都”的建造以及重建相连的。并且将其转变成为进一步行动的坚实据点。北部边界的长城，开始于辽河之东，即现今沈阳城的北面，一直向正西蜿蜒，与赵王所建的城墙连接，并在黄河西边的转弯处，即现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南面结束。这段延伸的一部分，由秦王同时建造。而燕墙体的另一分支，顺着太行山而下，作为防御西部入侵者的第二道防线。

防御齐的南“长城”，是一个由三个分支所组成的体系，既控制了来自南部的主要交通线，也控制了黄河北部的湿地。黄河在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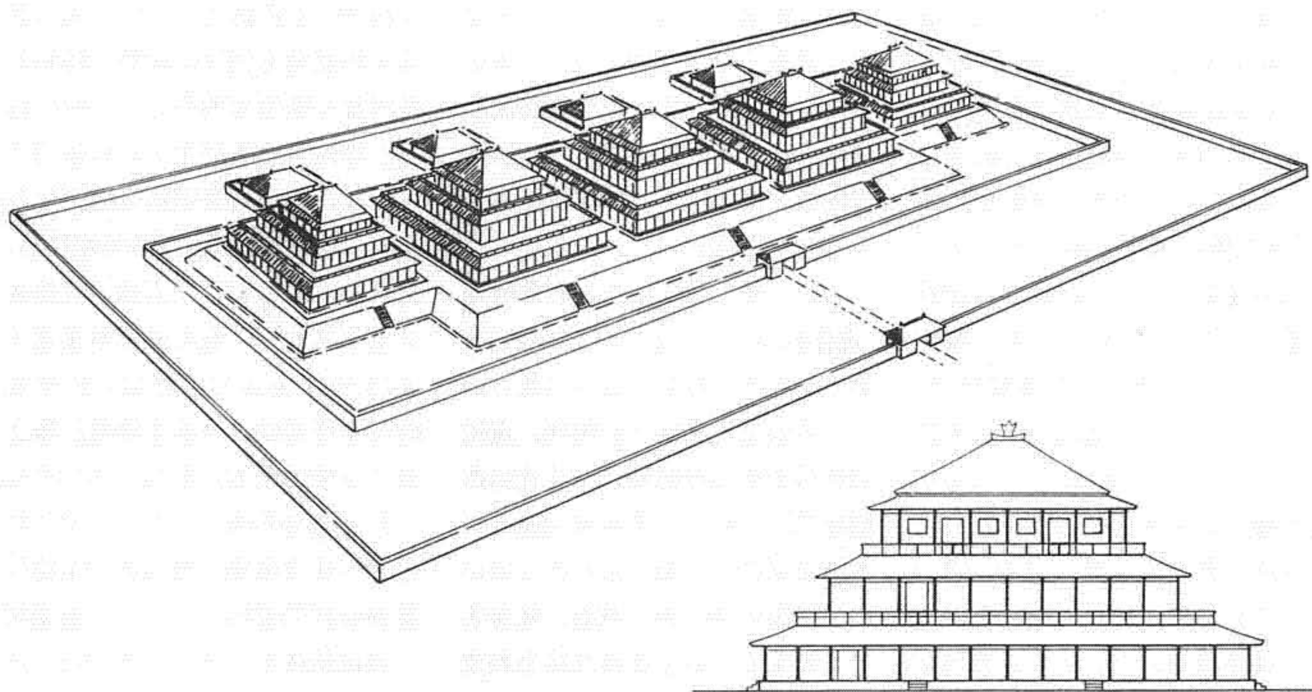


图 2.3.5.12　公元前 4 世纪对中山国墓地卫城的复原[1]。
在最近的发掘中，人们在訾王的墓中，发现了一面青铜盘，上面刻有整个墓地的布局，内镶金银，布局按比例绘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幅建筑绘画。复原显示了围绕着夯土内核而建的表面结构，在地下墓坑上堆积而成。位于临淄城以南的桓公之陵，可能与此墓类似，土台之上的土丘，依然可辨

元前 602 年改道，朝向更东边的方向。而在这里，下都城和守备哨卡，建造在这座南墙西部的端点，处在控制南北驰道的主要位置。在紧急情况下，这巨大的哨卡，可以毫无困难地驻扎几支军队，总共可容 200000 ~ 400000 名士兵，即燕国整个的武装力量。据报道，公元前 260 年，秦和赵之间的战争，后者损失了 450000 名士兵，仅剩 130000 名男丁，抵抗有着 600000 名士兵的燕国军队的进攻。然而，燕军于公元前 250 年为赵国所克，下都城被迫投降给了赵国。

燕国的"上都"是蓟，位于现代北京附近。但关于其规模和结构知道得很少。因为它是燕国的都城，因此，也被叫做"燕京"，一个在更现代时期，有时用来指代北京的名称。而在西方以"Yenching"而著称。

燕国的南面，是一个较小的封地：中山。关于它，文献方面留给我们很少的信息。但是，最近挖掘两座国王之墓（訾王卒于公元前 310 年），向我们提供关于中山国文化非常有趣的细节。出土的一面铜盘，显示了一组金银镶嵌的绘画：五座陵墓，在一座巨大的平台之上，有关于土台之陵、坟丘的度量体系，以及所埋之王非常精确的题辞。图画以 1 ∶ 500 比例而绘，可谓中国历史上第一幅建筑绘画。在这一描述的基础上，很有可能对该时期的王陵作一复原，如此，我们当知它们看上去如何，这也可用于了解后来的齐王们，在临淄都城以南的四座陵墓。历史地图集已经对中山国都城的坐落位置有好几处建设性猜想，但至今为止，尚未发现遗迹。然而，传统认为，现今的正定城，

1 参见考古，1981/1. 文物，1979/1。

可以溯源至那个时代。因为它坐落于南北主干道上，即今天的河北省省会石家庄以北，它也许是当时的中山国较为重要的城镇之一的所在地。依然存在的墙体（1980年）所包含的空间，要是根据当时中山国使用的度量单位，可以被容易地看成是一个6里 ×6里的方形。虽然后来由于一些增加而有某种修正，这种巧合是令人信服的。在后来的世纪里，正定，永远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城市，甚至是一个省的省会。它仅仅在最近才衰落。因为，同一地区的石家庄，开始迅速地发展为一个铁路的交会点，从而成为当今的省城。这里列举此例在于说明：伴随着漫长的历史，也许还有更多的城镇和城市，它们也许依然保留着东周晚期起源之时的痕迹，至少，仍然保留着当时布局时所依据的度量体系。今日正定城与平山县，沿着滹沱河往上的皇室墓地之间的关系，对于一些王室居室和王室墓地之间的重要联系，是具有建设性的。这也许可以支持我们的假定——一个基于城市布局度量体系的假定。

2.3.6 中国南部

自东周建立以来，我们听说越来越多的南部部落渐渐形成国家，并因北方国家所发生的权力斗争而越发保持优势。传说北方朝代的王子逃往荆蛮之地，纹身削发表示不再返回，他们自称是勾吴部落，荆蛮人认为这些是正义之人，因而一千多个家庭追随他们的领导。其中之一就是太伯，将其即将继承的王位让给弟弟季历，也就是后来成为公元前11世纪强势的季公。太伯前往江南地区，成为那里原居民的领袖，后来成为了他们的文化英雄。据推测，他的坟墓，即现在江苏省无锡之东的鸿山。

这一带，属于沿海新石器时期“进化的渔人”的文化，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所探讨的。最早与北方涌现出青铜文化相联系的时间，应追溯到后来的殷商时期，但是直到西周时期，这种影响才发展到能够对本地文明产生影响，某种程度地证明了传说的确实性。然而，从考古学角度来看，似乎在涉及社会和文化变化时，我们必须认为，东周时期才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其时，国家——或者说——王国，得以形成。

那个时期，那个区域的聚落结构以所谓“山地文化”为特征，即湖熟文化。[1]自从新石器时期，几乎所有聚落，都坐落于山上，从一个由洪水淹没的沼泽和湿地的景观中凸显出来。其大部分时间淹没在浩瀚的水体中。这种景观，大部分时间淹没在浩瀚的水体中。它们沿长江上游，一直延伸到今天的湖北省和湖南省，因为在大江两侧也有大的沼泽、洪水冲积而成的平原和大湖，在这些湖岸，早在商代就已经发现了有围墙的城，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前面所描述过的盘龙城。

我们所知的第一个南部的国家是楚国，以今天湖北省中部、广阔的云梦沼泽之西的区域为中心。最为重要的楚国都城，由楚文王于公元前689年在此建立。而其父亲楚武王根据北方国家的原则，特别那些涉及军队发展的原则，来组织国家。楚地虽然不同于中原汉族的人口组成，还是渐渐吸收采纳了汉族文明。同时，发展了某些特殊性格，特别是在艺术和文化方面。其都城就是著名的郢，而它也渐渐覆盖了大约16平方公里的地区，由坚实的夯土墙围绕，坐落于湖北江陵之北5公里的地方，形成了大约9里×11里的矩形布局，但关于它的挖掘并不非常准确，所以我们不能以某种合理的原因，十分肯定地采用一种度量体系。结果，我们便无法从其中得出关于该城发展过程的任何结论。但是，同样可能的是，整个城市，仅仅是由于一个一般性的布局概念和整个结构的一般性想法，便立刻建造起来了。发现有七座城门，一座位于北城墙，另三面城墙各有两座城门，显露出某种规则、整齐的想法。三边的墙脚都被切除了，这似乎有某种潜在的特殊概念——不管它究竟是什么。东南门也许是通往宫殿建筑的主要大门，宫殿建筑，坐落在城中心东南处的什么地方，并绕以小一些的城墙。到目前为止，已经探明有84座建筑物基础，宫殿群其中之一的是63米 ×14米宽，中心有一个隔开部分，将建筑物划分为西厅和东厅。此外，还发现用于熔制青铜的炉和4处有炉和烟道的陶窑地址。一个手工制

1 译者注：中国东南地区青铜时代文化，因江苏江宁湖熟镇而得名，该文化遗址大都位于土墩上，为台形遗址。

作的工业区，也在宫殿区的东南角被辨别出来。有4条河床，穿过城的围合区，并带有3座水门，已经发现有这些水门的木板和256个由陶瓦和木或竹框架仔细构成的水井。葬区遗址坐落在东北部分，其中几个已被挖掘出来。它们被发现为早于城市建造，但依然是楚国的墓葬。南城墙东南3公里处是另一个围合区，即今日著名的郢城。是一个大约3里×3里的方形，其中有樊妃，即楚庄王（公元前614–前591年在位）的名妃之墓葬小丘，但该城可能是一个更老的聚落。

郢这个巨大的城市作为楚国的权力基地长达4个世纪之久，其间，楚国干预并参加了北方诸国的权力争夺。公元前278年，它被秦将白起所控，并从此被永远毁灭。自那时起，城市荒废，这意味着，那里可能会给我们留有一些有趣的挖掘。

另一个属于楚国的围合区，在湖北省中部汉水边宜城之南被挖掘出来。在历史年鉴中，它被确认为鄢城，楚国的东北前哨，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鄢郢，楚的第三王室所在。其城墙包含大约3平方公里的区域，从北到南2公里，从东到西1.5公里。其东墙明显是以一个不规则的样式重建的，大概是在原来的墙被汉水冲毁后重建的。原来的墙，形成了一个非常规则的布局，大概最初是一个根据当时楚的度量单位，规则的5里×5里的方形。在城市的北半部分，已经辨认出一个宫殿区域，在南部坐落着楚昭王（公元前515–前489年在位）的陵墓，他可能是这个地方的建立者。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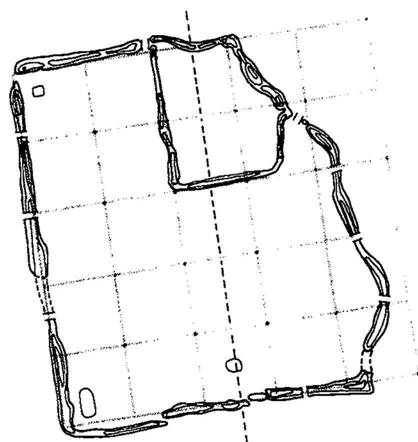




图2.3.6.1 纪南城，一度为楚国都城，在今湖北江陵之北，比例1：40000[1]。
这个城市即著名的郢，大概建于春秋后期或战国早期，即公元前6或5世纪时期，于公元前278年被秦国所灭，之后再也没被用作城市聚落。阴影为宫殿区域，也通过东北方墙体的遗迹表明出来。墙体的遗址，也许表示了原来的基于东周1里=396米的8里×8里布局的西部边界。房屋的废墟，以小的方形表示，水井以中国井汉字的横竖交叉模式来表示。外墙也许为后来的重建和拓展，正如鲁国的古都曲阜的例子所示（参见2.3.1.11）波状符号，表示其所在处发现有器具

图2.3.6.2 楚王国的鄢城，楚皇城，湖北楚王国的宜城之南，汉水之西，比例1：40000[2]。
在城市的南部，楚昭王（公元前515–前489年在位）的坟墓，坐落在据推测为原来布局的中轴线上，与其北边的老宫殿区相对。东边，在汉水冲毁了部分城市以后，以一种不规则的方式被保留

1 译者注：《考古》，1982/3、4。
2 参见《考古》，198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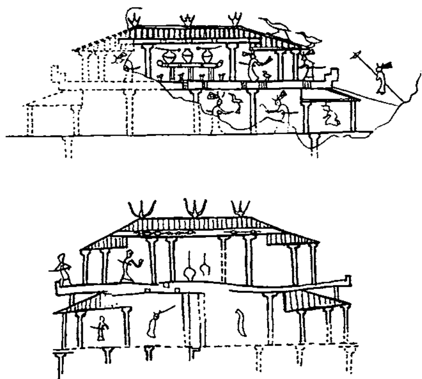


图 2.3.6.3，4　战国时期的青铜器皿镶嵌的装饰上所表现的 3 层建筑。这两幅装饰，也许表示了建筑中的仪式场景，非常像中山国陵墓顶上的结构（参见 2.3.5.12）

图 2.3.6.3　位于山西长治附近汾水岭的建筑[1]

图 2.3.6.4　来自河南辉县的建筑，在山的另一侧长治以南 90 公里处

记载也支持这一假设。公元前 506 年，昭王离开了刚被吴王阖闾所攻破的郢旧都，昭王在通往北方山的关隘，汉水一侧，于公元前 504 年建立了自己的阵地，并命名他的新城为鄢郢，以纪念其前任都城。直到今天，宫殿区被称为紫荆城，城南约 10 公里处，坐落着湖，也是汉水从前的河床。其相对于城市和汉水的地位，足以支持这样的假设，即东部的城墙，在某个时候被冲走了。这也许甚至由于在楚国的一次战争期间，蓄意引起的洪水泛滥所引起。布局的规则性表明，在那个时期的楚国，度量体系被认真地应用和实施，或者作为郢，被建立之后的进一步发展，或者证明郢，最初已经以非常准确的度量体系而布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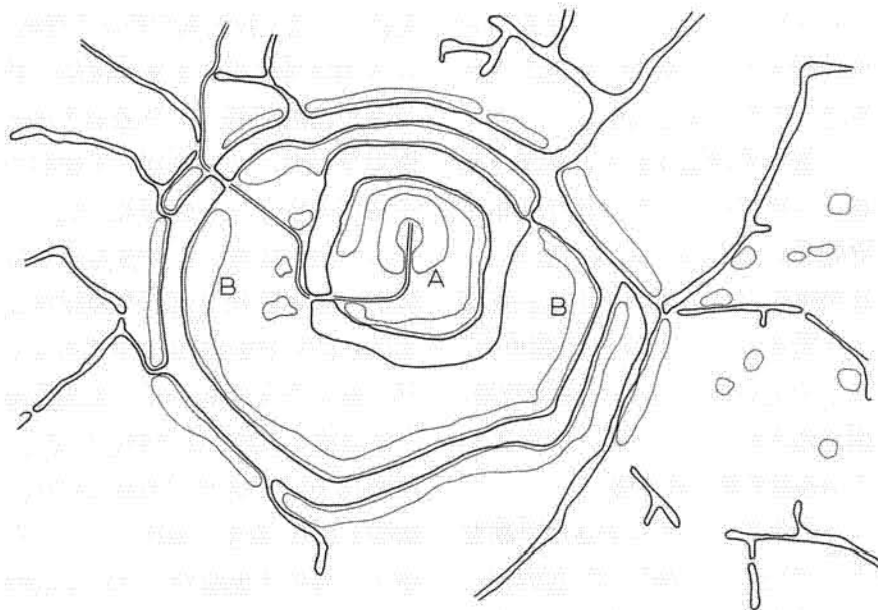
关于公元前 5 世纪，贵族的财富和文明的生活方式，可见于曾侯乙的陵墓华丽的陪葬之中。楚惠王，曾经在公元前 433 年赏给他一面青铜镜，这向我们提供了有关他生平的信息。7000 多件陪葬品，包括一个完整的乐队，具有所需的乐器和属于它的一组舞者。整个乐队，包含有 64 座一套和 32 座一套的编钟。编钟总重量 2.75 吨。此外，还发现笛子、排箫、笙管、各种各样的弦乐器、鼓，以及 140 件铜器，以一种区域性变化和非常特殊的风格形成。13 个舞者的戏团，由 15 到 25 岁年龄之间的女子组成。曾侯乙 45 岁，有 8 个嫔妃随葬。棺椁以及大量的木件，涂有天然漆，所有都具有优异的手工艺技艺，并得到实施。坟墓由大木材建造，并有 4 个墓室；棺椁的前面是乐室，具有两个边室。坟墓坐落在湖北的随县，这个地区即是著名的随国，但是在文献中并没有提及曾侯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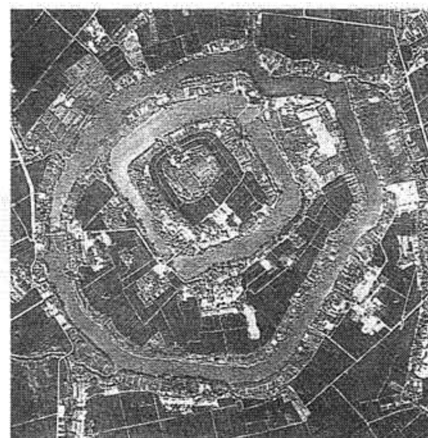
第一个详细的关于花园宫殿的描述，以所谓的楚辞流传下来，《楚辞》，是一部诗歌总汇及仪式的详述。在东周的最后几个世纪中的楚国收集编纂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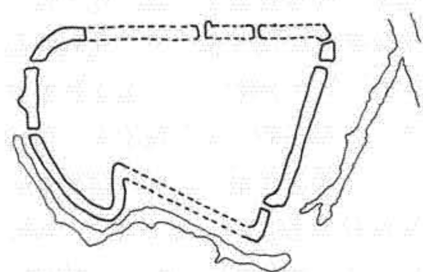
在楚国的东部，长江口的南部，即现今江苏省沿海一带，吴国发展。它由寿梦王，太伯的后裔于公元前 586 年，通过统一勾吴部落而形成。太伯建立了与北部周王们的关系，并建立了强大的军队，在这些努力中，得到了北方国家的支持，作为对楚国的制衡。

吴王室的先祖之地，是在现今江苏省太湖以北的常州和无锡之间的平原地带。两个城市，都将其城市的起源，追溯到公元前 6 世纪之初的寿梦时代。虽然，在遥远的祖先、太伯的传说中，已经提到了无锡，其最老的城市聚落在“锡山”附近被发现，当时的寿梦，将其权力范围向北延伸直达长江两岸，这个新建立的 1 平方里小城，原来的名字是有锡，意为“有锡”，表明了这个地方对于冶炼的重要性，因为青铜是由锡和铜合成的。在公元前 547 年，寿梦的第四个儿子，在现今的常州城，建立了一个同样的聚落，它也是一个方形，大约 1 平方里。更北的镇江，可能也是在此环境中兴建，其最老的部分，坐落在北固山脚，暗示了这个地方也许已经被

1　参见考古 195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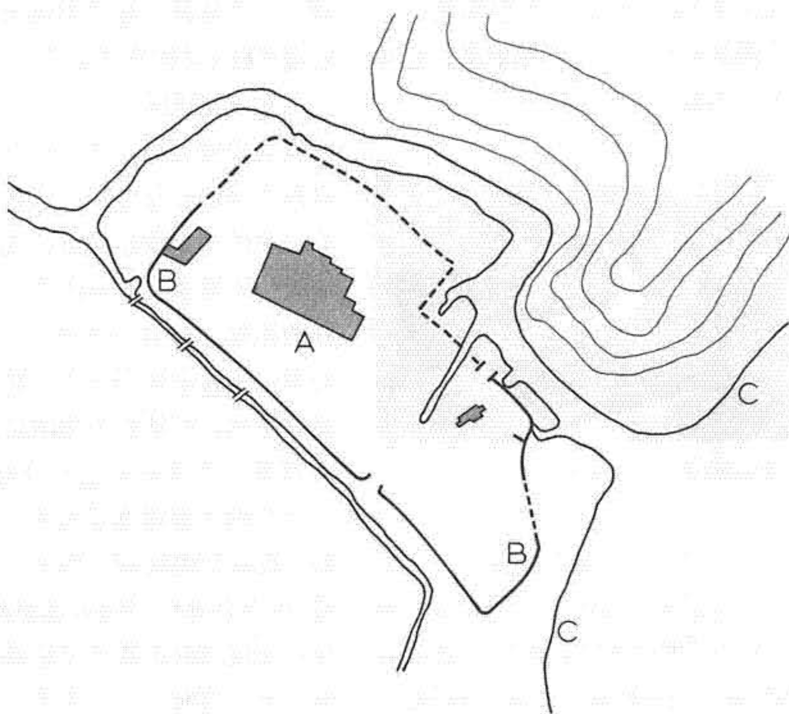


图 2.3.6.5–7 三座中国南部的要塞城镇，比例 1 ： 10000

图 2.3.6.5 江苏常州附近的淹城，吴国早期城镇[1]。
A. 宫殿区 B. 外城，两城都由大城壕所围绕

图 2.3.6.6 今天湖北武汉之东的鄂王城，位于越国与楚国之间的边界要塞[2]

图 2.3.6.7 阖闾城，公元前 6 世纪末的要塞，建于江苏无锡之西的太湖北岸，淹城之南大约 30 公里[3]。
A. 宫殿建筑区 B. 外城 C. 太湖，该城也许是吴王船舰的港口之地

图 2.3.6.8 江苏常州附近淹城废墟的鸟瞰，参见中国画报，1988/3，摄影：金振顺。
左边是北，宫殿有其自己的城壕，现在用作种植水稻，宫殿区还有另一个城壕，而外城由第三座城壕所围绕的，并留存 3000 年至今

1 参见中国城市规划学刊，1985/1。
2 参见江汉考古，1983/3。
3 参见中国城市规划学刊，198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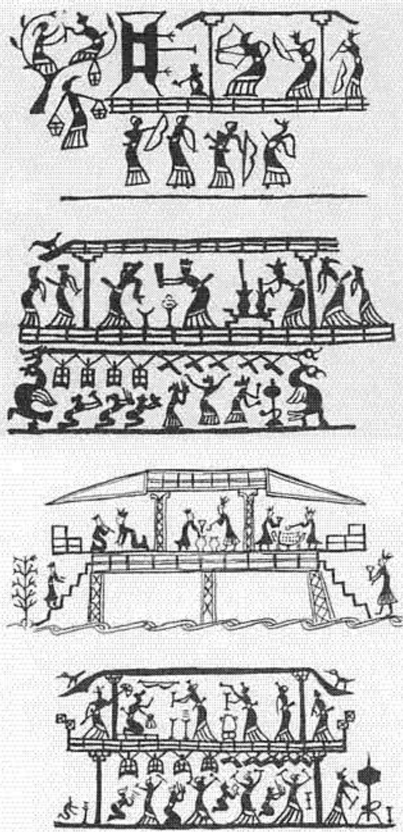


图2.3.6.9–12　东周时代的两层建筑，来自各地的青铜器皿上镶嵌装饰着金和银

图2.3.6.9　公元前5世纪的礼器上的射箭比赛，现藏北京历史博物馆

图2.3.6.10　在同一礼器上的接待厅（上）和具有钟、琴、笛和鼓（下）的乐队

图2.3.6.11　一个同样的接待场景，在其中，房屋的主人是一个大射手，出自四川成都公元前6世纪的礼器[1]

图2.3.6.12　一个有些不同类型（形式）的礼器上的建筑物，上海博物馆

湖熟文化占据。它很可能是西周领域的荆蛮人所占据的、超越洪水平原之上的典型山边聚落。

进一步溯长江而上，在现今南京，一座聚落，在公元前722年建立起来，叫郸城，是铸造业城市，且坐落在高出平原的小山上。在接下来的世纪里，它成为冶炼中心。关于公元前6世纪吴王的阖闾城，据说他在此铸剑。然而，其聚落的大小和形状都无从知晓。

能给我们一些有关这些早期聚落的形状、大小和结构信息的惟一地方是淹城，在常州西南大约7公里，一处规模相当的废墟遗址。西周的文献，提及它为淹的封邑中心。其内城是一个方形，大约250米 × 250米，包含有100米 ×100米的宫殿建筑群，外城形成了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形，大约40公顷，城市的两个部分，都由城墙和大城壕围绕。名称“淹”，令人想像是一个沼泽的环境，令人吃惊的是，它并不在山脚。[2]



淹城俯瞰图（译者插图）

吴国，因其水军的发展闻名于世，这是基于该地区人民非常古老的经历，即“进化的渔人”。公元前548年，当一艘来自楚国的舰船驶下长江时，被吴技艺娴熟的水军挫败。在各国间持续斗争中更多次的交锋后，楚国的船舰，于公元前503年被完全击败。这一胜利，主要归功于吴国大臣，一个楚国人。他以其卓越的组织才能，在很多方面支持吴王。这场胜利之前，当阖闾在公元前6世纪末期的10年中成为吴王时，他命令大臣伍子胥，为他建造一座新城。据载，他曾经这样说道：“我的王国已经远离了都城（周在河南的王城），而东南潜伏着一个危险地区，每年土地浪费，并由于汹涌泛滥的河水，使得土地变得无用。结果，既没有要塞、也没有人驻防来保护我们的王国……，我们将如何做？”伍子胥回答：“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和平和正义的统治者，你必须先以武力统治王国，并渐渐施展你的权力和威严。要取得这一切，我们必须首先为王国建造一个国都，建立一支军队，建造丰裕的谷仓并建造军械库来贮藏武器。”

公元前514年，当吴王从对楚的战役中撤回后，伍子胥在现无锡以西太湖北岸建造了一座大约1平方公里的小型堡垒城市。残存的城墙大约5米宽，并形成了一个不规则的矩形，沿着一条河，流入这里的湖泊。这个矩形之内，是一座宫殿建筑物，但是它不能满足阖闾王的需要，并在6年之后被废除了，当时新的王都建造了起来。这个新都，最初依据阖闾王的名字叫阖闾城，即今日苏州，然而，其坐落位置，在公元前560年就已经是城市活动的地方，当时，吴的太子，从无锡

1 参见文物1976/3。
2 译者注：是我国目前西周到春秋时期保存下来的最古老最完整的地面古城池，据说，这也是世界上公认的三城三河形制的古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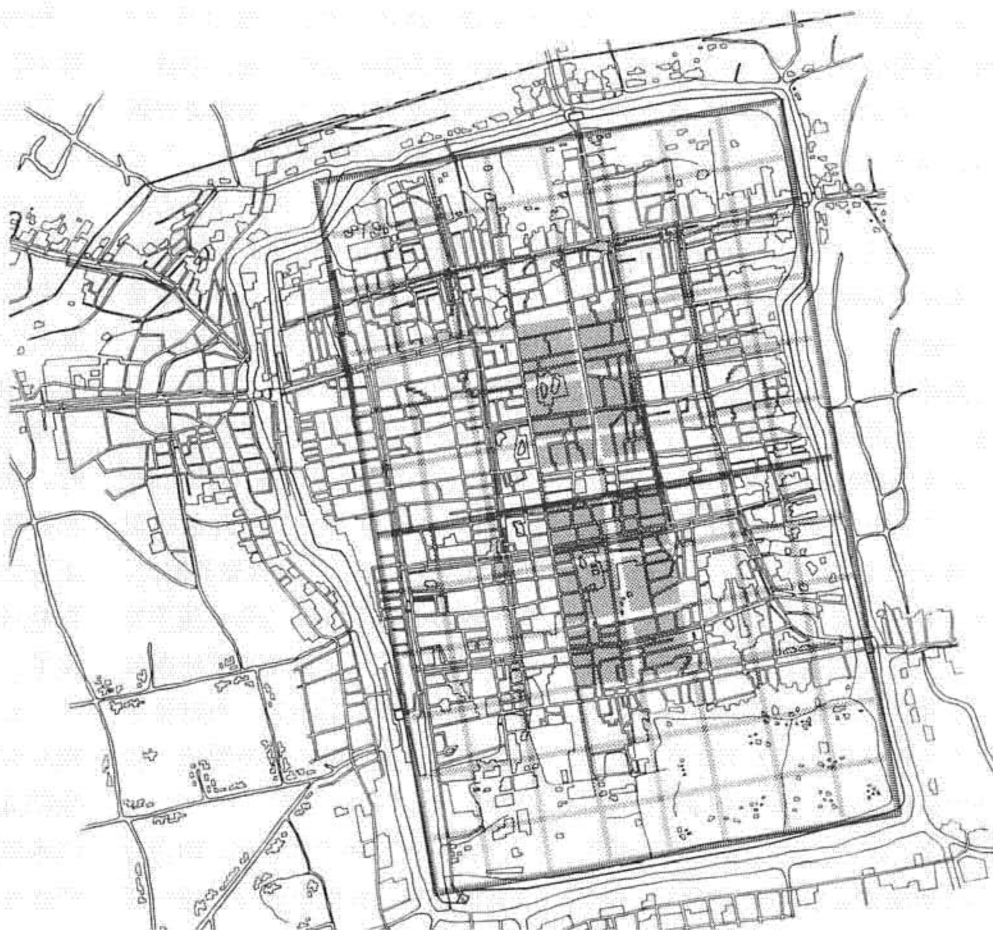


图 2.3.6.13 吴国的都城，今天的江苏苏州。对大约公元前 500 年的原来布局的复原，被叠加在一幅 20 世纪初期的地图上，比例：1：40000。
阴影部分为两个旧宫殿区域，在旧城中，有两部分可以辨别出来，每部分为基于周的度量（1 里 =358.2 米，1 尺 =19.9 厘米）的 7 里 ×9 里的矩形，另一种计算，可基于周的度量 1 里 =405.0 米（1 尺 =22.5 厘米），如此得出两个 6 里 ×8 里的矩形，这似乎更为合理些。这一度量，被用在吴王阖闾的主要大臣伍子胥在楚国的故乡。后来的壁垒（城墙、壕沟等围绕城墙）的不规则形状，仅向我们提供一个大致的基地。但因城市的整体尺度据载从未有变化，该复原似乎有其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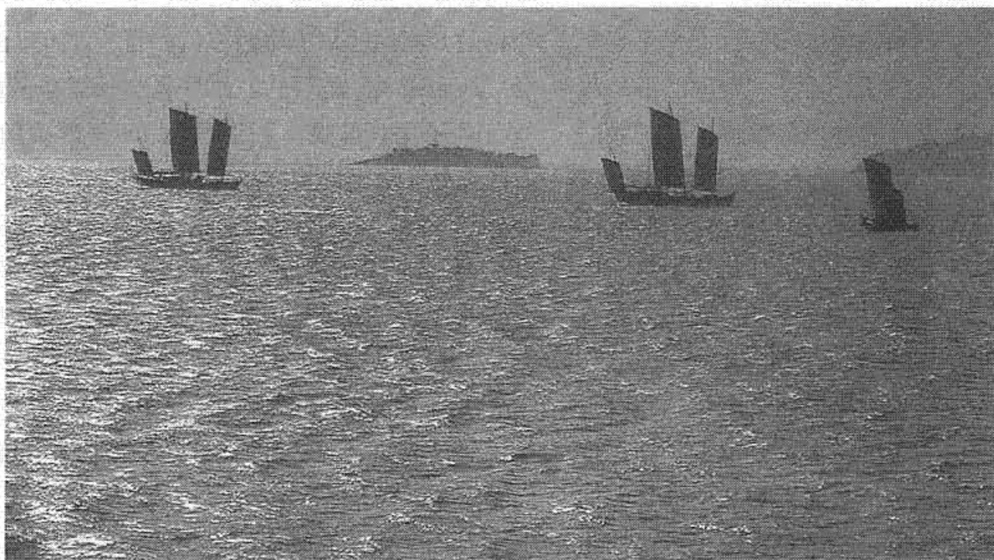


图 2.3.6.14 江苏太湖的北部，如在北岸所见。三桅航船不但为太湖地区之典型，在江苏沿海一带也是非常典型的。它们是江苏货运船，航海帆船即著名的沙船的原型，以其宽阔平坦的底部，它们可以航行在浅滩附近的沼泽地、经常淤积泥沙的溪流和河港而不搁浅。它们从早在周代就已经使用的大型竹筏发展而来。公元前 472 年，越王勾践建造了一只庞大的航行舰队，约 3000 水手组成，运载大约 8000 名的士兵

地区向南迁徙，并开始建造吴的“辅助、备用的”城市。这个地址，坐落在今天苏州城中心，几乎在现代体育场正北。当然，它并不仅仅是一座1平方公里的设防宫殿。

阖闾王命令伍子胥研究所选的作为建造新城之地的风水，要根据八卦规则、与天地和谐地安排布局，建造城墙。正如编年史所载，决定建造一座遵循“八面来风”的模式，具有8座城门的城池，并命令萨满巫师“品土尝水，相天法地”。阖闾王感受到了“地理适应性”和“天体之力”的需要，即“气”或生命的“喘息”，这样，他也许可以在斗争和野心中获得成功。关于新城的大小形状和来源并不清楚，就像往常那样，给出了几个不同的“里”的数字。然而，据说城的布局和大小从来没有变化，除了在修复和重建过程中的一些小小改变，如果我们使用实际的尺寸作为我们计算的基础，正如在现代地图上所表明的那样，我们也许可形成有关伍子胥布局的一个粗略观念。

虽然，城市在形状上几乎是矩形，大约3公里×5公里，正如我们所面对的楚旧都城墙那样，我们这里看到的也是有些不规则的墙体。如果曾经存在过一种度量体系的话，并且这种体系最初是被极准确地实施，那么，伍子胥所构想的布局，也许是一个8里×12里的矩形，基于后来东周的度量单位，与以上楚国的城市所用度量体系一样。这就意味着，楚国都和吴国都具有同样的规模，而这也许由吴王阖闾蓄意安排。这些尺度，可能由两个8里×6里的矩形放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的城市。因为，编年史告诉我们，有两座宫殿建筑群，一个是为阖闾王所建，由一座10里长的墙体所环绕，而另一座为伍子胥所建，有一座9里长的墙体，这些肯定是原来概念的一部分。这两个建筑群，可能已经占据了中央的12个每个1里的方形，即3里×2里面积的阖闾王王宫，而大臣的宫殿在其北面，2.5里×2.0里，两个宫殿之间留出0.5里的距离。王宫保留其形式，作为城市中心达2000多年，伍子胥的宫殿消失了，大概发生于他在公元前483年自杀后不久。当时吴王阖闾的继任者，吴王夫差赐他一剑自刎。

我们仅仅将南部布局，即含有王宫的8里×6里矩形与曾经一度是楚国都城的鄢郢布局相比较，宫殿具有同样的落位，即都位于北部边界而非在中心。这似乎并非不同寻常的决策。此外，鄢郢城墙上的城门数量和位置与苏州的一样，最先也是8座门，每边墙两座门，符合“八面来风”的模式。这些风与“八卦”有关，又代表了四个极点的方向。如在洛书的模式中所安排的那样。同时，它们代表了一年中的8个时期，即夏至冬至，春分秋分。季节的开始，给天地增加了时间的年轮。有了以上这些，城市即融入了自然的永恒法则和秩序体系之中，保证每一事物有其适当的位置，从而至少在原则上保持了和平。

然而，作为有野心的吴王，阖闾和他的儿子夫差（公元前494–前472年在位）难以保持这种和平。一旦他们建立了都城，作为更进一步行动的基地，阖闾和他的能臣们，在公元前529年，又一次攻打楚国。同年，他们袭击了太湖南部的越国，一个曾经被楚国在吴国背后选作联盟的同盟国。当楚的船舰在公元前503年被毁以后，越的船舰取而代之与吴作战。当吴和越在太湖作战时，他们使用了带有相互插手的桨，和好像带有角一样的船。无论勇敢还是怯懦，无论钝器还是利器，所有船只都因天气变化无常被颠覆沉没了。

公元前494年，吴对越新的进攻并不成功。阖闾不久死去，但是，他的儿子夫差，在公元前493年，以水陆两路进攻越的军队，所有这些战斗，在苏州以南的太湖上发生。这次胜利后，吴向北部挺进，在公元前486年，夫差派遣水军进攻齐。一部分舰队沿着海岸航行，直抵山东半岛；其他部分沿着连接长江和淮河的运河。这运河也是那时为此目的而修的，成为后来大运河的前身。

为了保护运河，并作为吴国北部前沿的堡垒，一座3里×3里大小的城，在长江峻峭的北岸建造起来，高出水面大约12米。这个地方被称作邗，后来成为现今扬州城最古老的部分。城由城壕围护，其东南部分以新建的被叫做“邗”的运河所形成。

然而，吴国遭到了来自南方的袭击，在那里，越王勾践等待适宜的时机报复其十年前的失败。公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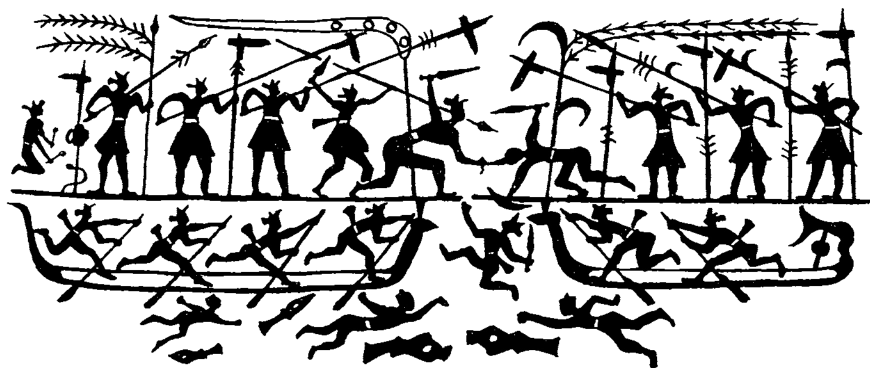


图 2.3.6.15 范蠡，越王勾践（公元前 496–前 465 年在位）的大臣，参见浙江绍兴的纪念墓碑上的雕刻，当时，绍兴是越王宫室所在地

图 2.3.6.16 以双层甲舨战船而战斗的场景，再现于一面公元前 6 世纪出土于四川成都的青铜礼器——觳上的镶嵌装饰。现藏四川省博物馆。参见文物，1976/3。
船只似乎是更为先进的竹筏形式，或大概已经由木材建造了。武士们站在上层甲舨上，船下后加上去的鱼图案，选自现藏于北京历史博物馆的一件礼器上的装饰

前 483 年，吴国能干的大臣伍子胥自杀之后，勾践开始了他持续了十年的战争。公元前 472 年，吴终于被打败，苏州被侵吞焚毁。那时，越王勾践的舰队，由拥有 8000 多水军士兵的 300 艘战船和 3000 人组成的几个双甲板船组成。

越王室位于会稽，即距当今省会杭州东南 70 公里处的浙江省绍兴市。王室的这一坐落位置，给高出洪水泛滥的平原的山体聚落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榜样。这是对史前湖熟文化的继承，今天依旧可辨的最古老部分，是一个长方形，由一度是大约 800 米 ×1200 米的壕沟所围，这表明了最古老的城墙平面图。这个长方形的西北部分，围护了一座大约 50 米高的小山，其南部聚落区域，向南延伸大约 800 米。山脚下是“越王台”，其宫殿也许早在公元前 5 世纪就已经存在了。大约两千年来，这个地方是行政所在地。今天，它依然包含一些行政机构。

这一地区最古老的城市聚落，据说是古城，现绍兴城以西大约 35 公里处。公元前 490 年，一座小宫城，不是建于古城，而是位于中山的山脚，被称作“小城”，是现今城市最古老的部分。据载，它周长 2 里 223 步，所用的度量不为人知，但是它可能比原来的度量较晚，因此也是较长一些，由此，我们可以十分安全地假定，以当时的度量单位，它大概 1 里见方，这就是以上提到的“越王台”。在与吴的几次冲突之后，范蠡，越王勾践的大臣，在绍兴以南的山中，建造了另一座城，叫做“大城”。据载，其周长 20 里 72 步。要是以旧的度量单位计算，可能为 6 里 ×6 里的方形，或 5 里 ×6 里的矩形。这座城，曾经是越王权力基地所在，是一个山寨，而“小城”，坐落在近水和近沼泽的地方，一个为水军的船舰停泊之地。直到“中山”以下的平原，在东汉时受到防洪保护，“小城”才延伸扩大到我们在讨论城中最古老部分时所给出的尺寸。

越王勾践的大臣是范蠡和文种。文种说：“懂得如何竞争的人，事先准备；懂得季节性需要的人，了解商品；而掌握了这两样东西，使得他了解整个市场。”后来，范蠡叹息到：“通过使用文种的七条规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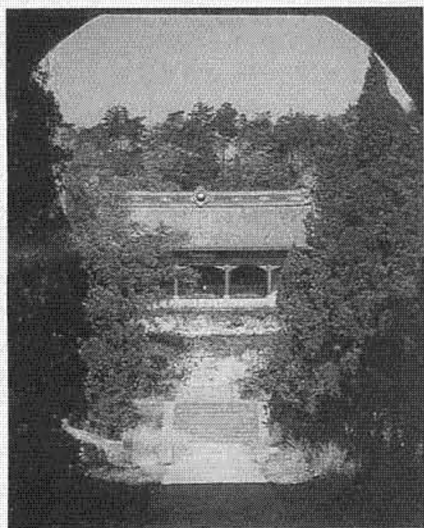


图 2.3.6.17 浙江绍兴的越王台，这是公元前5世纪勾践第一座宫殿的建造处，大概在同一个地点，更为古老的所谓"山地文化"聚落已经存在

的五条，越获得胜利。这已在我们的国家得到应用。而现在，为了我自己的家庭利益，我将试验一下。"然后，当越在公元前472年推翻吴国时，范蠡离开了，他交给越国宰相文种的一封信写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勾践颈项特别长而叼嘴如鹰，这种人只可共患难不可共享乐。"

范蠡顺河而下，乘小船驶过湖泊，改名换姓驶向齐国，在那里，以鸱夷子皮的老酒鬼而著名。然后，他去了陶，在那里，成为著名的陶朱公。在王国的中心，观察那个陶，是一个交流和贸易的中心，在那里，他获得了财产，囤积商品，通过出价积累，没有过多努力便获得利益，他是一个好经理，善于判断人，善于利用时间。在19年中，曾经三次积蓄了上千件金器，而有两次，他将财富分给那些需要的人，事实上，他是一个富裕的慈善家。后来，当他老弱时，便将其物转给他的儿孙，他们继承他的事业直到达到百万。因此，"陶朱公"成为富人的代名词。

这位曾经是越王的大臣，结束其职务后，变为成功商人的例子，与秦的大臣和富商吕不韦的故事恰好相对应。但是，吕不韦对于名利和奢华的野心太大，从而以自杀的形式结束了生命。

对越国的其他城市，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然而，考古学家在长江南岸，现今武汉东南、前越国北部边界，发现了一个小围墙环绕区域。这地方的传统名称是鄂王城——鄂王的城市。[1]这里似乎曾经是越国境内的一个部落。公元前470年，勾践王死后，部落各王子们不再团结，王国分裂成归属为楚国的领地，也许是借助楚国的优势，影响建造了这个前沿阵地。最后，公元前333年，越国崩溃。楚王成为以前吴越王国土地的统治者，其中，一些小的本地封邑，也许有像鄂王城这种居室，其围墙内的面积，大约10公顷，形状不规则，具有五座城墙门。在城内仅仅发现两处制陶区，几处水体，也许是扩建的城壕的遗存。

我们对于东周时期城市的考察，以这样的实例告一段落。正如我们所见，在这个时期中，城市聚落的数目大量增加，一些学者统计出，在公元前770年到前480年这段时期中，发现有大约80个城市，这一数字，仅指在文献中所提及的地方，但是，考虑一下这些文献的性质，这一数目，也许仅是一个粗略的最小数值，另一个本质变化，是地方城市尺度的增加，这完全颠覆了周公的层级体系。虽然君王及其大臣们继续多次地参考这一体系。在公元前4世纪，至少7个列国的都城，比成周神圣城市要大得多，而且，因为几处王宫从一处转到另一处，出现了几座更多的大型城市。到公元前3世纪周代末期，大约700个地方城市，存在于周的领地及其南部邻国中。这些城市中，大约10%属于更为重要的大型类别；15%也许是后来的一些区域中心，在尺度上类似西周旧城，其余是贵族的小宫城和行政中心，对周边地区而言，具有一些经济功能。

1 译者注：鄂王城城址位于今湖北省大冶市西南高河乡胡彦贵村，是一处东周时期遗址，时代上限：春秋晚期；时代下限：战国晚期，距今约2700年。城垣依岗地而建，南高北低，高出附近地面约5～10米。城外有护城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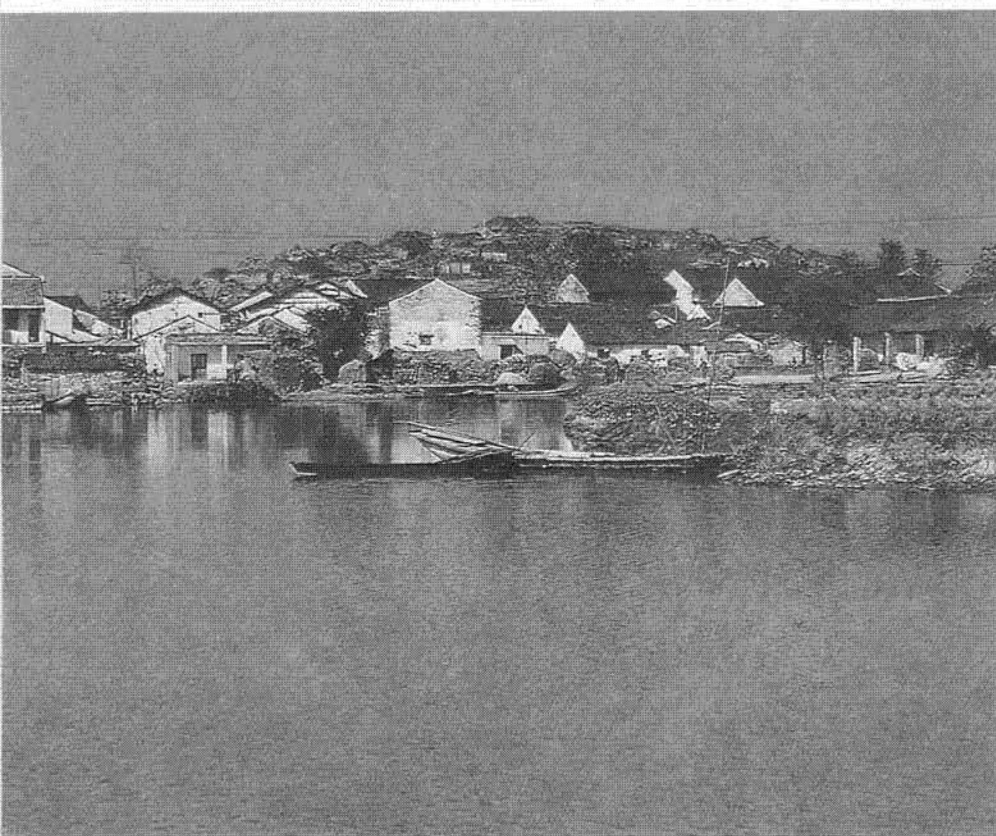


图 2.3.6.18　绍兴城附近的浙江北部平原。今天大约 25%的平原，由各种水体组成，但在勾践时代，此地是一片巨大的沼泽，完全受附近东海潮汐的控制，背景中，可以见到典型的山脉，这是最早的人类聚落的遗址

图 2.3.6.19　一座小山丘脚下的村庄，甚至在今天也仅仅靠船只到达，山上是由石板建成的坟墓的墓地，一个当地的葬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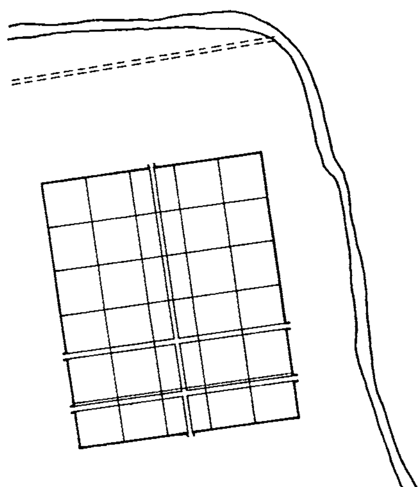


图 2.4.1　栎阳城，从公元前 383 年到前 350 年的秦国都城，在陕西今临潼以北，比例 1：40000。[1] 布局是一个基于周的尺度（1 里 =358.2 米）的 5 里 ×6 里的矩形。右边是渭河的一支小分流，城市之北是一个灌溉渠，大概是旧的郑国渠

我们可以由此假设，在这个时间的周领土中的整个人口，在最后时期，灾难性的战争也许达到了 3000 万到 4000 万人之多，而城市的人口占这数字的 10%，分布在 700 个城市地方之中，其中最大的有大约 200000 到 300000 居民。这可与商代末期的数字相比。当时，整个人口中，约 5% 可能已经是我们所能认可的城市人口，因为那个时期，总共不多于 50 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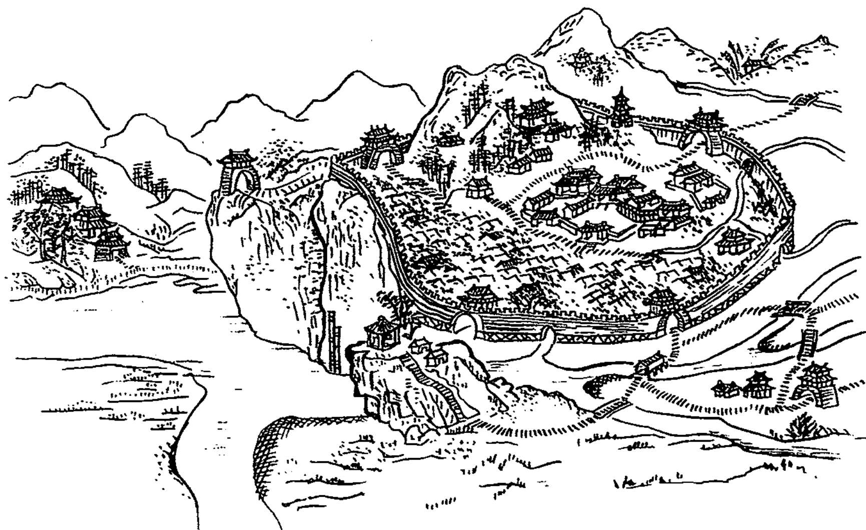
2.4　秦朝（公元前 256– 前 206 年）

对秦国的城市所知很少，可能最初在渭河谷并不需要建造防御性城市。当时，它由周王的诸侯，在公元前建立东周之后所统治。公元前 750 年后，周天子将土地以分封制形式授予了秦的统治者。从公元前 677 年起，秦都城在雍，距今西安以西大约 150 公里。公元前 383 年，一座新城在更东的地方建立，大约位于西安东北处 60 公里，并与东周的王都更为接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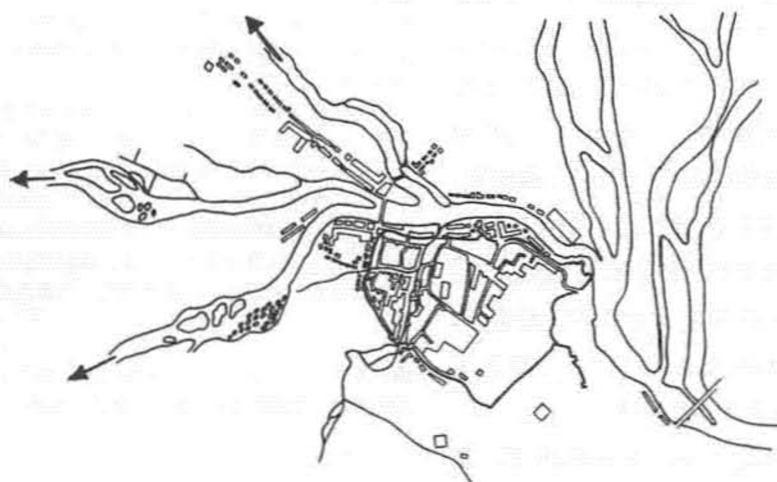
自从商鞅变法从根本上巩固了国家以后，公元前 327 年，秦的统治者采用了“王”的头衔。在感受到自身足够强大、并能参与到其他王们的权力角逐后，他们渐渐形成了“吞并天下所有国家”的计划。这一政治目的，也被秦的下一位王牢记，并将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组织良好的战斗机器。秦的第一个重要成功，就是公元前 256 年，东周最后一个王的让位，那是周代 800 年的完结，并且也是古代神圣之王最后的模糊痕迹。

秦国的最后一位君王是嬴政，他的统治，从公元前 246 年开始，当时他还只是一个 13 岁的男孩。他继承了渭河以北咸阳的宫室——在这里发掘出土了一座宫殿，一直被认为当时就已存在了。这些建筑物，在几个方面是相当不寻常的，但是它们也许属于一个较大的建筑群，那里，它们原本是介于通常的合院

图 2.4.2　灌县的小城，坐落在凤巢岩东，那里，开凿的岩石层之外，山峡的水平线清晰可见，参见灌县县志，1873。灌县人工开凿的切口，是为了四川成都平原的都江堰灌溉系统。岷江水在左边流出画面之外，在那里，它分成几个支流（参见图 2.4.4）“内支渠”从左侧进入画面，并流过中心开凿部分流向右侧，又分流而成几条运河。有台阶的小石岩后面，可见开凿的部分，其上建有献给工程师李冰的灵庙。左侧“内支渠”之外，是李冰的儿子李二郎之庙。这里，每年 4 月，在清淤和疏通运河之后，举行重新开放运河的典礼仪式



1 参见文物，196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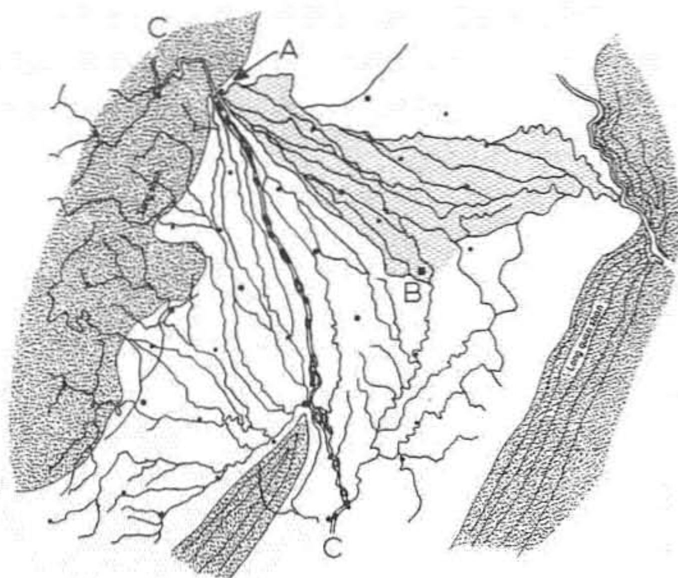


图 2.4.3　灌县城

图 2.4.4　四川灌县的灌溉系统，即今天的都江堰最初于公元前 3 世纪的头 10 年，在秦国大工程师李冰领导下建造。比例：1：1000000。深的阴影为群山区，左边是西藏高原的山脚，那里发源出岷江（C–C）。灌县城附近（A）浅的阴影，为如今依然由李冰所建造的运河系统的北分支所灌溉的区域，成都城（B）建于当时这新灌溉平原的南部





图 2.4.5　人工开凿的山口为的是"内支渠"，正如在河流下游所见，在左边的小石头上所立的是李冰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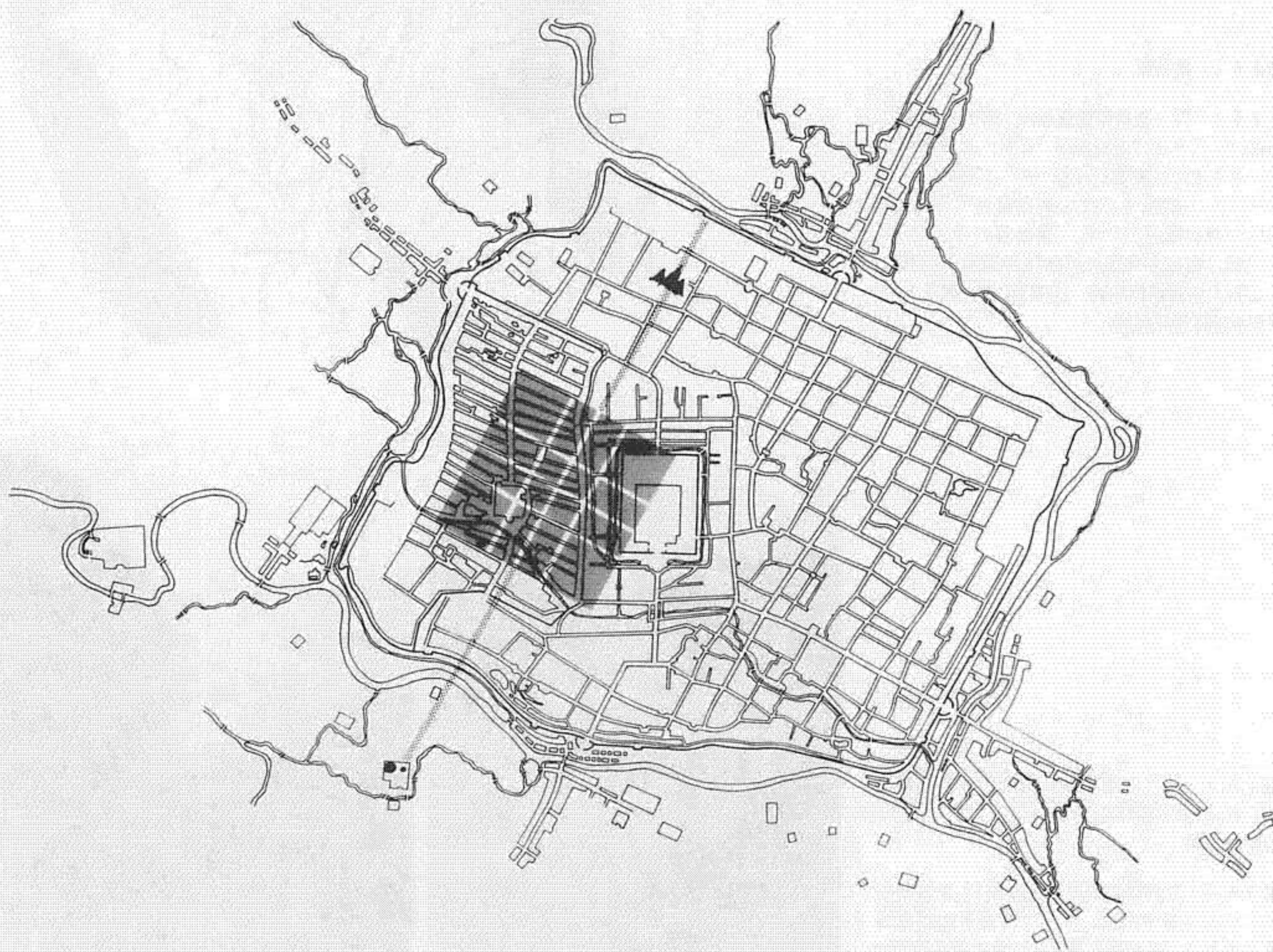
图 2.4.6　来自岷江水的"内支渠"，正如在小石上的李冰庙中所见，人工开凿渠右边的入口是主要入口，是在都江堰发明的基本灌溉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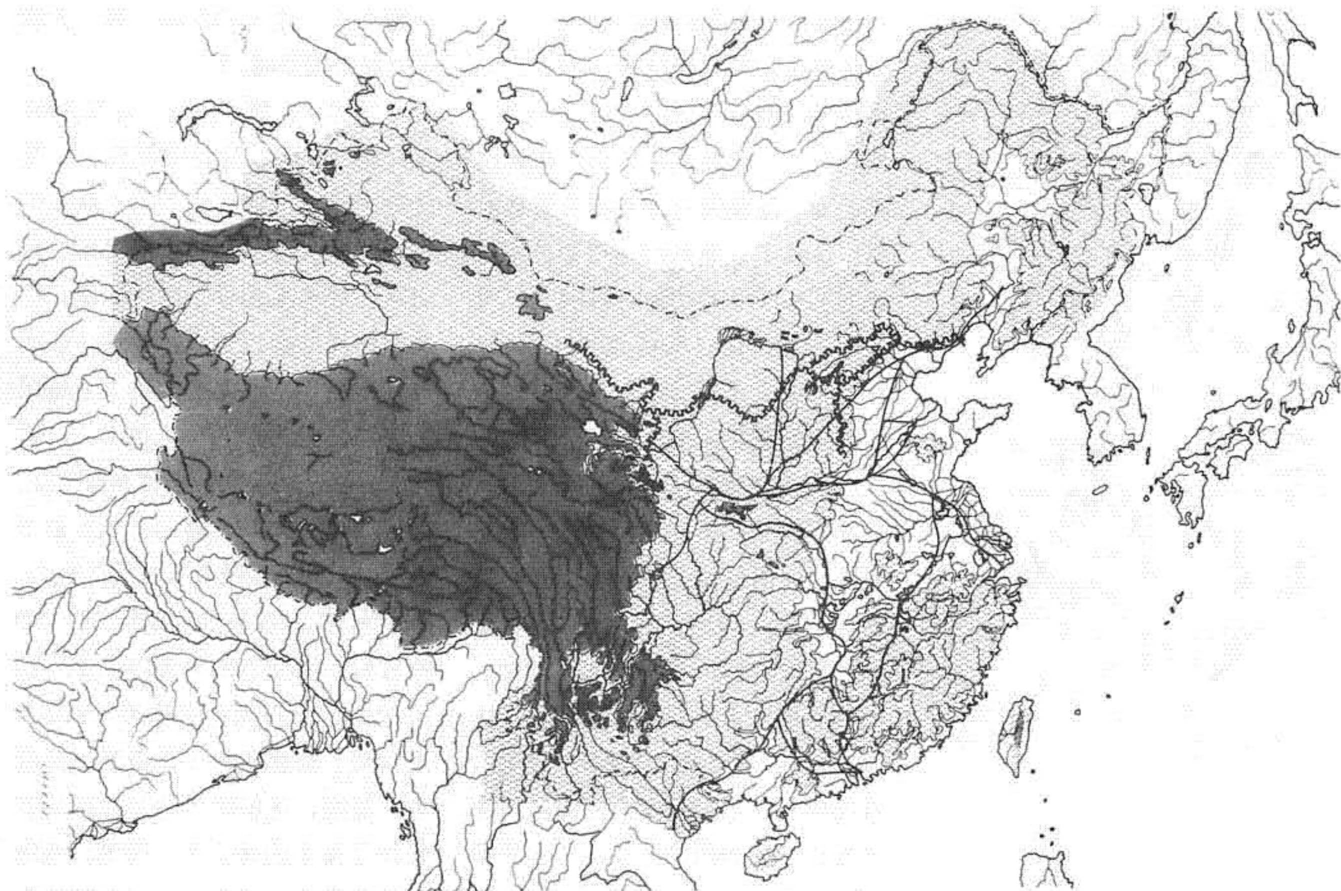
体系。立于6米高的台子上的也许是主要建筑物，但是，其布局是非对称的。为了使整体对称，调查者在复原时，增加了一个类似的建筑物，但是，这复原之后的中心，仅仅是一座跨在一条小河上方的小桥。这座主要建筑，是一个大约15米 ×15米的2层结构，与廊子一起，看上去像一座3层的建筑物。各个房间的功能已经辨别出来，而且，看上去，这座建筑主要包含居住空间。在这座宫殿建筑以西，是那个时期（公元前3世纪）的陵墓，而在其南面，沿着现今的水边，坐落着居住区。一条壕沟的遗迹已被发现，围绕成一个6.7公里 ×9.2公里，即61.6平方公里的大矩形，它被今天的渭河水穿过，而大部分已经被后来泛滥的洪水所冲毁。宫殿建筑，坐落在这个矩形西北角的水边台地上，将陵墓和居民区留在壕沟之外。在东边，探明出了更多的宫殿遗迹，沿着矩形区域的北部边界，覆盖了2公里 ×6公里的面积。

年幼之王统治的最初10年，充满了对于东部和南部不同国家的非同寻常的战争，而且，他的将军们控制了新的区域。这种局面，随着他成

图2.4.7 蜀郡，今天的四川成都市，比例1：40000 复原基于华阳国志校注（晋代的四川志）的描述，公元4世纪，是现存中国最古老的志书，再版1984年，成都。
大约公元前300年，由秦国在此所建城池的原布局，被叠加在20世纪初的地图上。基于周的度量1里 =358.2米，原布局为一个3里 ×3里的方形，据载，城墙上开有12座城门，并根据模数安排，中轴线指向东北，作为防御的山峰小武旦山，锦江流过城市的南部，该城的基址位于山之南，河之北，从风水角度，为最吉祥之地

图2.4.8 古代中国的扩展路线，比例1：30000000，在此路线上，始皇帝建造了驰道





人后而结束。一个危险的宫廷叛乱被镇压。之后，这位秦王，将所有的治理政务掌控于手。对其他国家的进攻也增加了。公元前229年之后，一个接一个的国家被攻破，其中100多万士兵的军队都被摧毁。到公元前221年，秦灭群雄统一了中国，战败的诸侯国王的宗庙和宫殿被夷为大废墟群，并在咸阳重建了宗庙宫殿，沿着渭河的北岸向东延伸大约6公里，直到当地发掘的旧宫殿区之东。重新布置了一系列宫殿、有围墙的街道和亭子，“其中收罗了来自各国的美女、乐器”，也建造了城壕。

公元前221年，秦王登基，并自立为始皇帝。他将帝国划分为36个郡，并将所有投降国的武器收集在一起，融化之后，制造成青铜钟和12尊青铜像，每尊重达240000斤（中国过去使用的重量单位，1斤等于0.5公斤或1.1023磅）。并将它们放置在庭院和宫殿里。秦统一了度量衡和文字。“车同轨书同文”。120000户富裕之家，从整个帝国各地，被迁到咸阳重新安家。几乎整个国家的贵族，都被集中在渭河谷，处于严格的控制之下。除了帝国管理部门及其在36个新郡的军队以外，在整个国土，没有留下其他的政治或军事力量。

从公元前219年起，咸阳扩展形成了一个都市区域，而不仅仅是

当秦惠文王登上王位，他派遣士兵去追捕谋反的商鞅，商鞅逃跑的路上，在边境一个小旅馆寻求住宿过夜。但小旅馆的老板，不知道他是谁，对他说：“根据商鞅的法律，如果我没有得到允许就私留客人，将受到惩罚。”商鞅叹息道：“看，我现在正自作自受”。最后，商鞅被杀，惠文王将其尸首车裂，杀一儆百，他的家人也全部除尽。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评论商鞅性格残忍，他的结局完全是咎由自取。





图2.4.9 荆轲（公元前227年毙命），燕国（现今北京一带）太子丹的使者，公元前227年被派遣去刺杀秦王，即后来的秦始皇。这里，当他的匕首刺入附近的柱子中以后，他试图拔剑刺杀秦王（左）。他脚旁的盒子里，是一个燕国将军的头颅，作为骗局，献给秦王。然而，该计划失败了，荆轲当场被杀。参见山东沂南县东汉墓墙上的装饰

一座城市。在渭河南岸，建造了“信宫（兴乐宫）”，始皇帝并下诏，它将作为“极庙”代表着至高无上。从这里，一条路通往骊山，在其山脚北面、温泉附近的夏宫甘泉宫前面，又建了一座新的前殿。另外还建造了一条两侧有墙的道路，从“极庙”开始，跨过河流直抵咸阳城。在后来的几年里，皇帝几次巡视全国。公元前214年，他命令拆除领土内的所有城墙，所有的防御工事也都被铲平，第二年，他派出一支军队，向南征服南部沿海一带，因此在长沙[1]、桂林[2]和广州[3]建立了3个新郡，每一郡有一座郡治城，大小不超过1平方里。这次的兴建“运动”中，还建造了著名的“灵渠”，首次将长江水系、湖南的湘江与珠江水系、广西的漓江相连，在新控制的南部区域和北方省份之间，建立了粮食运输和交通体系。公元前212年，在咸阳的宫廷大宴中，皇帝下令“焚书”，并说道：“咸阳过于拥挤了（61.6平方公里对于宫殿的汇集来说是太小了），而以前的王宫也是太小了。我听说，周文王的宫殿在丰，武王的在镐。那一区域适宜建帝国都城。”

这里，在那“极庙”信宫之西，公元前211年，建造了阿房宫，及其他几座属于新近建立的上林苑的宫殿。所有这些都在渭河之南。阿房宫在规模上超过了以往所建，往北以跨河的廊道与咸阳相连，往南与南山相连。南山上建造了一座纪念牌坊。超过700000人的劳力，这些人，都是因受到惩罚被判服劳役，他们劳作于此以及骊山之北大都市区域之东的皇帝陵。石材采自北山；木材从南部的省份船运而来，300座宫殿在渭河谷的“关内之地”建造起来，而在渭河谷之东，400多座宫殿，被建造来为皇帝的出游服务。显然，这位始皇帝不喜欢呆在曾经是敌手的城市里，因为，当所有战争结束，那里肯定不是很宜人的地方。270座宫殿和亭台楼阁，在咸阳的200里之内的大都市区域以阁道相连，并点缀着幌子、钟、鼓和美女们，每一个被指定在其固定的位置上。如果谁泄漏了皇帝的行踪就将被处死。始皇帝仅仅在咸

图2.4.10 公元前3世纪，在秦王宫廷中，两名外貌彪悍的武士和侍卫，一名是英勇卓著的伺秦大侠（右），试图捉拿赵王（公元前289年–前266年在位）的使者蔺相如，但智勇双全的蔺相如，威胁说将粉碎左手所执的和氏璧（参见2.3.2.4），山东沂南县东汉墓墙上的装饰



图2.4.11 今西安市北的渭河水向东顺流而下，左岸即为第一帝国的都城，咸阳所在地，现今已部分地被河水淹没

1 译者注：郡治所在“临湘”。
2 译者注：郡治所在广西百色东北。
3 译者注：郡治所在“番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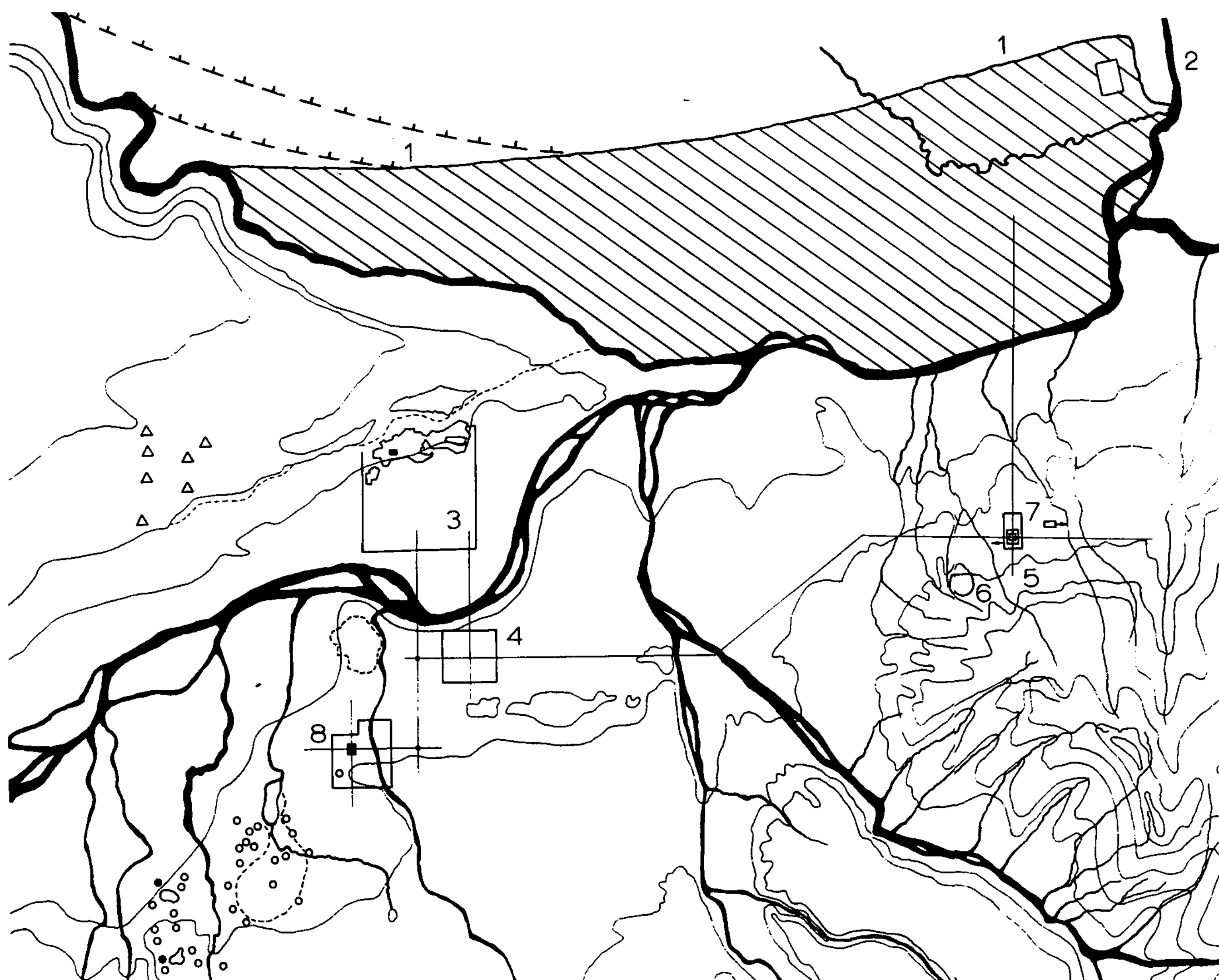


图 2.4.12　围绕现今西安城的渭河，比例 1：25000。

左侧，是拥有西周都城区域丰和镐的考古遗址的汾河（弧线）。渭河以北，是公元前 246 年所建的郑国渠灌溉的区域。运河进水口，位于渭河的支流泾河。因为随着淤泥的疏浚问题，新的进水口，必须溯流而上进行改道（1）。右侧的栎阳城，为公元前 383 年到前 350 年秦国的都城。公元前 350 年后，都城为渭河边的咸阳（3），其宫城建在河之北（黑色方块）的河床之上。咸阳城的外轮廓，根据《文物》1976/2 中的发掘报告所绘。当时，渭河的河道与今天的不同，因为城市可以向南发展。公元前 219 年，一座新的宫殿"信宫"在河水之南建造（4），一条新的道路从这座宫殿直通骊山（5），该山坐落在都城之东，是一个夏季避暑和有温泉的宫殿聚集区域（6），也是秦始皇的陵墓所在地（7）。公元前 211 年，另一座宫殿，在信宫的西南开始动工兴建，这座宫殿"阿房宫"在规模上、尺度上超过以前所建的所有建筑物，在今日西安城以西依然可见其台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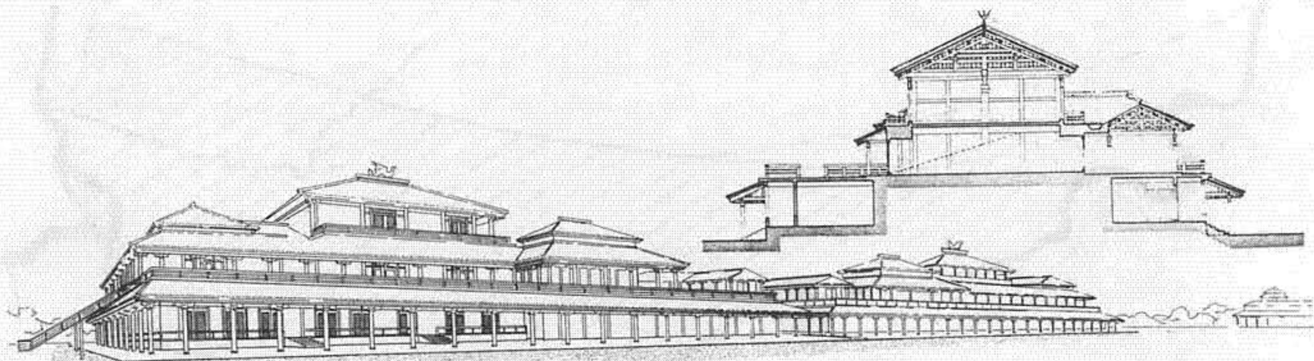


图 2.4.13　咸阳的第一座秦代宫殿，公元前 3 世纪秦始皇的宫室[1]。
在城市北部，秦之旧宫殿主要大殿之 3 层建筑的重建，建筑物建在高出河水 10 米的河谷台地之上，底层被廊道所掩蔽。注意开间的偶数制，这使得在所有三层的中轴线上都有一个柱子，因此，不能从中间进入，没有发现从前面通到主要大殿的楼梯，使人难以判断整个建筑的用途和功能。与早期和后期的宫殿建筑相比，这非比寻常

阳城旧宫殿里听政，听大臣们上奏书，并作决策。这里也是“坑儒”超过 460 人之多的地方，以警示那些正在指责帝国的儒士们。

公元前 214 年以后，在始皇帝统治的最后几年里，当拥有 300000 士兵的军队将匈奴赶回蒙古时，每年有 3 万到 5 万个家庭，被迁移至边界地区的新郡。行政中心和哨卡，沿着边界建设起来，长城也被重新建造，将古老的防御工事重新组织成一个复杂的防御体系。被遣送去修建长城或开发北方和南方各省的劳动力和新移民定居者，都是那些根据商鞅的严苛律法而受到惩罚的人——那些有家室的男人、商人、失宠了的官吏和学者，以及成千上万的百姓。但那些竖立来纪念其旅行期间所行经的石碑上，皇帝有如下的镌刻：土地被征服了，这是被征入伍者的结束，世界处在和平之中；男人乐于耕田，女人照管家庭；一切事物尽有其秩序；恩泽四方，田地分享，所有生灵心满意足（公元前 214 年）。他伟大的统治净化了社会，所有都在其影响之下，所有人都知道他的慷慨；所有人沿着此路，生活在和平与和谐之中，遵守秩序（公元前 209 年）。在公元前 208 年第 7 个月，皇帝死了，两个月后，他被葬进陵墓，一个自公元前 246 年就开始在骊山建造的、坐落在大都以东的陵墓。贾谊（公元前 200－前 168 年）写道：当始皇帝安定了帝国，他深信以其在关内绵延千里的国都之强力，已经建立了一套将被他的子孙承继千万代的统治……但是，这统治，在他死后两年就被推翻了，这朝代，仅仅持续了 14 年，因为它不能以人性和正义来统治，攻和守并不是一回事。

咸阳的人民被项羽所率领的反叛军队残杀；最后的皇帝秦二世胡亥被斩首，子婴被裹挟逃出城外，秦的宫殿也被焚烧。之后 3 个月大火未灭；项羽掠得了所有财宝和漂亮女人，将他们送至东部……

随着公元前 206 年秦朝的结束，中国城市化的形成期宣告结束。城市化的漫长过程，在周代的最后几个世纪，达到了第一个高峰。我们可以称之为城市文明。最不具城市化的国家就是秦。但它以其军事力量和持续不断的野心，完全征服了

1 参见文物，1976/11。

整个国土，在几年之内，几乎完全毁灭了城市文明。大多数城市的上层人士，都被转移到了帝国的大都市区域。在那里，他们不得不在皇帝的严格控制之下生活，并最终几乎被完全毁灭了。

商业贸易者和商人不再存在，百万民众远离家园，被定罪并被征去服劳役。成千上万的家庭，被当作殖民者转移到了边远地区。看上去，城市人口的很大部分都屈从于这些手段，城市几乎成为了人口减少的地方，其经济基础也完全被毁。

咸阳的大都市区，主要是一个帝国宫殿和御苑囿的集合区域，并从帝国吸取所有资源，来支撑其巨大的人口中心化——以现代的词汇来说，是一个集中营。在其中，所有居民都完全在皇帝的意志下生活。旧的“神圣之王”的概念，已经蜕变为一个有权势的独裁者的概念。这独裁者，试图获得不朽并代代相传。

据最近计算，在帝国大统一时，国家的人口总数大约为 2000 万人。这还是以前毁灭性战争之后的数据，说明人口的锐减。考虑一下 120000 个富裕之户，被迫远离家园而重新迁置到都城区——他们的总人口大约为 100 万的四分之三（75 万）——再除去所有的犯人和被征入伍的人口，剩下的，我们很容易计算为顶多 300 万左右。换句话说，15%的人口，或者如果我们将孩子和老人扣除，那就是总人口中大约 30%的成年人被剥夺了权利。他们被完全置于帝国管理的绝对权力之下。因此，秦始皇能够吸收所有对任何统治者来说未知的资源，而这些资源，是专门用于“强化这个国家的”，包括皇帝妄自尊大的、对于庄严大帝国的概念。

与渭河谷大都市区域这巨大的人口集中形成对比的是，在帝国的所有其他地区，几乎完全被剥夺了城市人口。没有任何重要性的城市聚落遗留下来，因为以前秦王朝的行政组织已经被应用于整个帝国。以前曾是城市的地方，如今仅为沿着前沿的小行政中心和要塞城镇。帝国的整个区域，被分成了 36 个郡。正如某些权威人士所相信的那样，这些郡，又进行地方自治。总共大约 800 到 900 个县。同样的数字，应用于小的行政城镇，它们大概总共包含 100 万人。结果，帝国的城市人口，至多只有整个人口的 10%，其中一半集中在大都市区域，在皇帝的直接控制之下。可以肯定的是，剩下的 90%的人口并不都是农民，因为百万人要么是在军队里，要么是被罚劳役修筑长城，或者修筑新的帝国道路，从大都市区域辐射向整个帝国。或者在其他公共工程中。例如修建宫殿、陵墓，或者是运河。如前所述，700000 受罚的劳工，已经在大都市区域劳作。要是算上这些人的家属，这个数字也许会达两倍之多。此外，相当数量的人口，不断地从事运输粮食和其他物资，将物资沿着长城和其他的前沿运到要塞。结果，最多只有 60%到 70%被留下来从事农业，他们却必须支持 30%到 40%的非农业人口。这是一个不能维持很久的比例。

图 2.4.14 广东广州城的五神庙。在那里，根据传说，5 只来自天上白羊宫的公羊，将五谷带到这一地区。这暗示了将稻谷生产引进东南“进化的渔人”的文化脉络。他们可能是园艺师和渔人。传统上，这一事件与公元前 219 年以后秦军攻占南部的省份紧密相连

图 2.4.15 广西桂林城北的漓江。公元前 3 世纪末，它作为通往南部的主要交通路线，通过秦始皇的御用工程师史禄所建造的“灵渠”，它在北部（图中），与湖南的湘江相连。这条运河，正是因为它将两条顺山向下而流向两个相反方向的河流连接在一起而得名。因此，这条运河跨过群山，现实中，虽然运河的河道是被巧妙地选取并勘查，“神奇”却有一个自然的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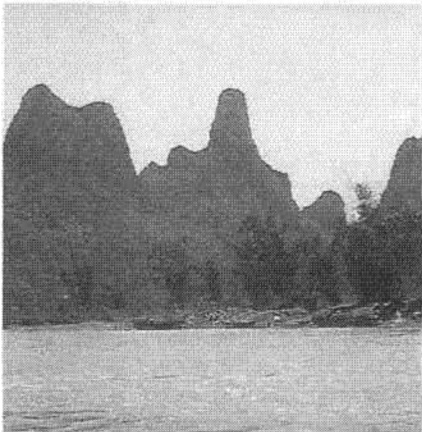




图 2.4.16 秦始皇，参见三才图绘，1607 年的木刻。这里，他被描绘成穿着后代的帝袍，可与山东沂南县汉代汉墓的墙上装饰画比较（参见图 2.4.9.10）



图 2.4.17–20 秦始皇的士兵，发掘于其陕西附近陵墓的地下军队。与真人同样尺寸的原形泥塑，显示了他们的盔甲和帽子，他们最初携带着真正的青铜武器。陕西西安市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这三幅士兵肖像，暗示出对实际的人物描绘非常自然，并表现出军队的民族融合，这也许暗示了这样一种观念：由于废止了将真的活人与墓主人一起埋葬的旧习俗，泥塑就应尽可能地再现实际人物，这样的替代品，就会尽可能真实地满足地下灵魂的需要

2.5 幻方

城市化，一般被理解为是一个过程，它随着文化因素的发展而开始，并不直接与食物生产的狩猎活动、植物和果实的采集活动、畜群和游牧活动，以及最终定居的农业活动有直接关系。随着永久聚落的出现，在文化环境中的某些元素，不再直接与农业活动和食物生产有关。如果某种社会的或耕种的机构开始产生永久性的结构，例如建筑物或纪念物，第一批都市元素开始出现。在中国历史发展中，这些元素是：仰韶村庄的大房子，龙山村庄的防御墙，早期青铜时代的要塞。这些并非村庄而是权力中心。在早期城市主义发展的最重要阶段，是一个封建领主对神圣之地的占领。或者，以历史词汇，以统治家族的建立作为朝代。这个过程，创造了超越于村庄社会的新阶层。其成员并不参加这样的农业生产，而是组织村民，为他们认为重要的任何工作而进行生产。领导和封建领主，不但将他们自己投身于所有的村庄社会的社会政治机构中，而且接管了神圣之地的精神力量，并集这些力量于自身，从而作为神圣之王出现。他故去之后，则成为后代们德高望重的祖先，他的居所，也成了家族的宗庙。因为神圣之地的精神本质和其中体现的自然力量，已经传递给神圣之王，因而，他被认为是自然力量的化身，并能够影响这些自然力，从而为其后代和所统治的民众带来利益。其影响力，还包括有效地利用自然力所发明的方法，从事的贸易和工具。这些神圣之王中，有几个已经成为了传说中古代的文化英雄、宗族神灵的祖先和朝宗圣人。后裔和后来几代王们，在宗庙里，通过仪典仪式中与这些先祖们的神灵对话，寻求帮助和保护，将他们的成就与生产和战争相连，并试图通过甲骨的神灵，来推测神灵们的希望。

因此，宗庙成为统治家族的仪式中心，围绕着这些宗庙，他们安居下来，并形成第一个非农业聚落。这种新型聚落，渐渐地包括仪式建筑，它们不断地围绕着宗庙和统治



家庭的居所而发展。聚落也包含拥有匠人们的作坊，让这些匠人们生产为仪式所用的器皿、武器、装饰和工具等。还包含一些贮藏间，用于贮藏他们所统治的村民们生产的产品。一些地方，仪式中心以堤坝来防御洪水而非敌人。因为在大多数情形下，这些堤坝由夯土建造，即木板和木材之间的夯土。这些堤坝是直的，并围绕仪式中心，围合出一个非常规则的外观。一定距离的地方，通常在围合区之外，渐渐形成一片公共墓地，里面埋有当时在世的几代人的祖先。

在商代，这种类型的仪式中心和王室已经发展完备。也在不同的地点，得到考古学家们的研究。因为商王及其随从们的不稳定特性，对这些仪式中心或应该说它们的几处废墟的研究，变得较为容易。因为那让他们屡次变换王室，很多情形下，他们永远地遗弃了原来的仪式中心。那些中心,再也没有被用过，从而留给我们这个时代进行发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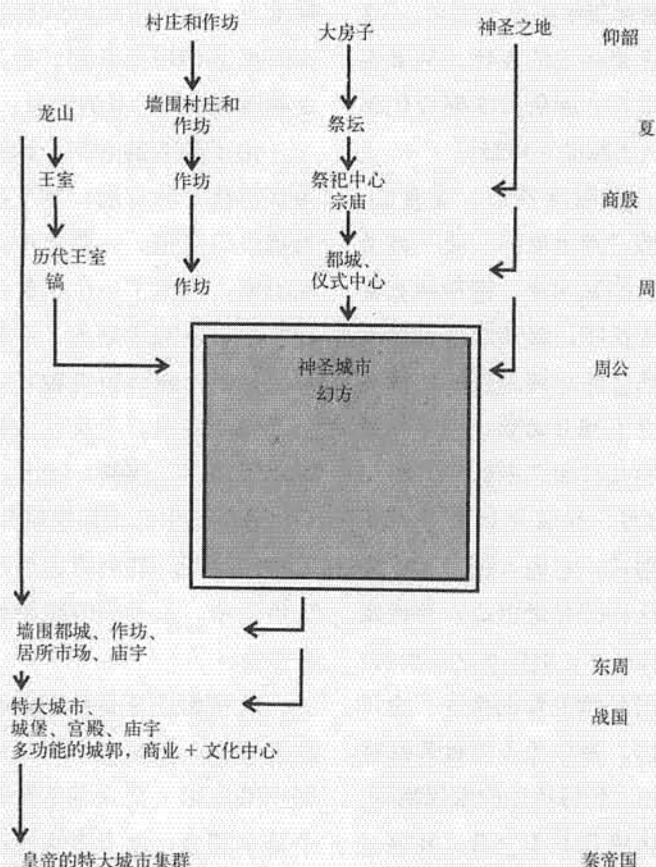
传统观点将政治上的、宗教观念上的仪式仪典，以及政府治理的其他重要事务的制度化、系统化，归功于周代的第一代统治者——文王和他的儿子，特别是周公。现代学者们不能发现任何文献线索，可以支持上述所有这些发展如此之早的说法。但是，艺术史家和考古学家，也许发现他们本人更倾向于接受将这样一个早期的时间，作为世界秩序新观念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其中，我们或许可以对为了较好的方位、而基于数字和几何秩序之上的新思想体系下一定义。“变化，这种在文化上的变化，从来也没有像在殷周之际所发生的变化那么巨大。”（王国维，1923）

我们已经假设周公，或者说，他所代表的“神圣境界”是“神圣城市”概念的发明者。这种神圣城市里，世界秩序，因其聚落布局而昭现。神圣之地自然力量的精神实质和神圣之王神奇力量，通过神圣城市布局的几何图式而结合。换句话说，“幻方”构成了较早期神圣之地的新形式。它由人创造，作为人类世界秩序的神奇中心，并根据自然世界的秩序，由神圣之王所居。产生并根据自然世界的秩序，由神圣之王占据，来作为人类世界秩序的神奇中心。世界秩序的永恒精神，已由上天传递到君王之身，并通过河中浮现出的神物表现出来。幻方，无疑适于启迪人们的想像，并结合进世界秩序的图谱中。因此，它被用来使一切制度化。幻方，通过佛教以曼陀罗图谱形式传至我们，以达同样目的，并以此获得一种神奇性。通过将这个图谱应用于神圣城市的布局，城市聚落由此发展的所有元素，以一种有序的和抽象的几何形式相互结合。这秩序和抽象的几何形式，包含着自然的力量。以这样的方式，幻方，成为吸纳自然力量之帮助，用于更好地治理朝代和统治人民的神奇工具。为确保这种魔幻工具的有效性，布局必须尽可能准确地实施，而所有的度量单位，必须包含与魔幻相关的数字，这是该魔幻工具的内在性质。某种程度上，它们跟规则同样重要。今天的度量和规范准则，是为现代工业制造有用性工具的保障。

由于神奇的方形，越来越发展为获得秩序的方法，并在很多其他领域得以应用，一整套神奇方形涌现出来，构成了一个层级秩序，在其数字质量的基础上，这些神奇方形，被划分成两组奇数和偶数，来再现阴阳力量，以及在这些组团中的层级秩序。同样，这又应用于城市的布局之中，根据规模和重要性，以层级排列，并对应着周代贵族层级体系中，王子们的统治地位和相应等级。

几何形式及奇数和偶数性质的神奇特性，正如它们在城市聚落布局中的应用，变成城市发展中的一个基本部分，这不但体现在发明这一方法的周代，而且贯穿中华帝国城市化的整个历史，直到公元20世纪初的清末。然而，在周代的历程中，特别是东周的500年中，神圣之王及其家族王朝的重要性，衰落直至全部消失。政治划分、经济区域化，以及文化多样化，促进了交通系统中城市网络的发展。在这个网络中，商品和思想的交换，产生出我们所称的城市文明，这里，层级秩序，基于经济重要性和结构的多功能性。城市和城镇，在数量上增加了，在规模上增长了，超过任何适于贵族层级的层级标准，而大都市，作为文化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活动的中心，涌现了出来。

所有上古先哲的古典文献和后来的“圣贤之书”，都是在东周时



期的这些城市中写出来的。很多家庭的财富，而不仅仅是贵族的财富，在艺术家和匠人们的美丽产品之中显现，如此的实例，体现于金银镶嵌的青铜艺术品、各种乐器、象牙和玉器装饰品、木雕和漆器。最后，但一样重要的，是那些美丽装饰性的丝绸织物以及锦缎刺绣，更不用说那些建筑物、宫殿、庙宇、府邸以及在城市人口中上层阶级的花园。扩展的城市布局，遵循着地形特征。坚固的墙体被建造起来，保卫城市人口免受敌国的军事进攻。这个时期和它的城市文明一起结束于一场灾难。秦王们，在战胜了所有的统治者之后，将整个积累起来的财富之家，都聚集到他们自己的都城，结果当秦灭亡时，所有的财富都跟着一起被毁。

2.6 老子的裁决

一次，老子被问到如果世界不得到整治，如何提升一个人的心智，他说："人的心智在压制时将向下发展，在激励时将提升。这种提升或下降会产生凶犯和谋凶。小心，不要去打扰人心。当平静时，它像森林中的湖水一样平静，一旦活跃起来，它便不可驾御不能平静。"庄子后来对此补充道："我已经得到教导要接受和保护我们的世界，并不是提升或更糟的将其纳入一个好的秩序之中。"

审视历史的轨迹时，老子和他的朋友们得出结论：推测黄帝曾经是第一个要将世界纳入良好秩序，并以那些先入为主的、所谓人类理想的理念束缚人心。他们认为，黄帝曾经是亵渎神明的，一个能说善道的、却头脑肤浅的人，他希望引导阴阳的运作，以便运用这种知识作贪婪的抢夺。而他的方法，忽略了自然的方式和人类心智的德性，以条律和规则，来压制或提升人们，并试图抑制人民，来增强自己的伟大。他后代继承者的大部分，继承了他的方法。正如庄子所评论的："到了夏商周三朝时，世界一片颤栗。"他又补充道："在我们现在这一代，那些受到国家惩罚的人，尸横遍野，白骨堆成了山，更不用说无以记数的战争牺牲品和自我招致的灾难了。我们从未听说过，任何人类理想、

善意，或规矩、法理，没有变成枷锁和樊笼，并成为毁灭性的刀和凿的把柄。”在分析原因时，庄子继续说：“所谓神圣的皇帝和伟人，混淆了欢喜和愤怒、智慧与愚蠢、善良与邪恶，世界变得支离破碎。”

在老庄时代，惟一能至少以微弱力量，遗传延伸几代时间的是周的家族。然而，最后几位周王们，几乎完全没有力量，只是受到不断变化的强盗式的诸侯们的怜悯，这些诸侯，大多是以偷和抢获得权力，虽然所有这些强盗式的诸侯和好战的君王们，宣称是黄帝的子孙，他们真正所继承的，仅是蛮勇。他们的地位、国家、宫殿、后宫、城市、财物和臣民们，很容易在一个时期或别的时期被偷，或是他们自己所为，或由他们祖先所为，这些也是自从黄帝时代以来，所有权力斗争背后的主要动机。

城市发展与这些权力斗争是紧密相连的。城市和城镇，最初是作为权力基地、战斗的君王们和贵族的仪式中心，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和忠心的臣民的家园而建。这包括沦为奴隶的匠人和艺人。后来，当城市发展成为区域或国家的多功能中心，城市发展走向更为独立的路线。城市，不仅被皇家所占据承继，而且不断住进了混合和非常复杂的城市社会群体。其中有些非常独立的人群，这些人有着自己的世界观和忠诚节俭的生活经历。他们能够在城市中心网络中迁移，并能够无论在何处，只要是他们所喜欢的地方，建树自己。他们甚至可以从城市生活中退出，在村庄中安居下来，或在乡村遥远的地方安居下来。大多数人能够读、写，受到政治的、社会经济的和技术问题的教育，能与任何对这些话题感兴趣的人讨论。因此，中国古典文学出现，“思想百家”得以发展。到东周末期，已经记录有 189 家学派。他们主要关心的就是时代日益增长的混乱，生活和财产由于不断征讨和持续战争所造成的严重破坏，以及如何建立一个持续的体系，以确保总体的和平。大多数这些学派，是围绕着教育家、哲学家聚集形成的。这些教育家和哲学家的名字，也成为不同思想体系的代名词，如，孔子、孟子等。他们很多人，试图尽可能地实际些，以便对登上权力宝座的各种统治者有用。然而，不管沉得多深，最为重要的是发现生命和宇宙的基本原则，并发现关于宇宙结构最根本的真实，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他们不是将听众限定为权力组团，及其由贵族及官僚组成的层级机构，而是面向人类文明的所有成员，特别是那些城市人口。这些城市人，处在失去与自然、生命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纽带的危险之中，并沉浸在由他们的欲望和受扰乱的心智而激起的表面浮华之中。

由于初期的城市发展，是好战的君王们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非常合理的想法就是王室、宗庙和那些城堡聚落，是向全人类释放恶劣影响的中心。那些具有技巧和能力的人，被迫为这些好战的君王们服务，因而也代表了这些影响。因此，

由此而来的文化发展带来不良气息。如此的都市性结果遭到诚实之人的蔑视。随着武士贵族们奢侈的生活方式开始影响城市人口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越来越多有思想的人，开始批评贵族的标准。他们最终看出这种贵族的生活方式，是造成日渐混乱的根源。《诗经》包含有从公元前8到7世纪东周朝代的“魏风”[1]。特别是第三首和第七首，对于奴隶主统治阶级穷奢极欲给予了揭露讽刺和鲜明的批评。在第三首“园有桃”中的第七章“硕鼠”写道：[2]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
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由老庄所描述的乐土，后来成为了很多关于天堂故事的模本。例如，公元4世纪陶渊明的“桃花源”，简述了这种乐土的本质。超过9/10的中国人是农民，庄子知道。当他谈到城市文明时，他问道：“你是惟一不知道，什么是完美时代，其最高形式中的自然行动是怎样的吗？”历史是教育的主要资源；因此，所有的模式和实例都来源于历史。但是，这个历史是黄帝和他的继承者的历史，是武王们和他们的贵族的历史，而因此也是生活在城市和城镇中人民的历史。因此，庄子继续道：“直到神农时代，人民安居乐业，不想彼此伤害，因为完美卓越的自然，以其最高的形式而统治。然而，黄帝没能保持这种自然的生活，与蚩尤[3]大战而血流百里。当传说中的皇帝尧和舜兴起时，治理的机构就开始建立了。汤——商的建立者放逐王；武王——周的建立者残杀王。从这一刻起，弱者就被强者所凌，少数就被多数推翻，从商汤和周武王开始，所有王者，都是无序和混乱的推进者。因此，庄子将自然的完全作用时代，落实在所谓的“哲人皇帝”时代，这被大多数学派认为是王者之德的无可超越的典型。他们以从黄帝开始，到他们自己时代的所有历史，来面对这个时代，这必须结束，和平才能保持，城市人口才再进入到超过9/10的中国社会之中，使他们有用和真诚，使他们戒除掠夺、偷盗和欺骗，摈弃强抢者与他们的政府。



图2.6.1 老子，骑在青牛上出函谷关驶向未知世界。参见宋代画家赵伯驹的绘画（1120–1182年）

1 译注：魏，周朝分封列国之一，是周初武王分封给同姓功臣的疆域。其领地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故地在今山西芮城东北一带地方，本为舜、禹故都。《魏风》是指产生于魏国的诗歌。

2 译注：春秋之时，魏国实行勤俭政策，因而没落之“士”的生活不免受到影响，由此触动了他们的感伤，作诗讽刺时政。

3 译注：神农之子，传说中的冶金术的发明者。黄帝从他那里偷习了技术。

第 3 章　中世纪：帝国的宫廷文化

3.1 汉帝国（公元前 206–220 年）

我们已经着墨于一些篇幅，阐述第一帝国时期——尽管它只持续了 14 年——因为它所带来的变化，对中国城市化进程十分重要，这个帝国建立之前的几个世纪，其基本情况有利于一个城市社会的发展，以及扩展城市网络。不同地区，原来的资源和财富，集中于整个国家的各个城市中心。便捷的交通，促进了商品和思想观念的交流，而文化和艺术的丰富多样，又丰富了文化环境。只在不同国家的统治者们野心膨胀时才使战争变得日益严酷，而最后残忍和狡猾的统治者能够赢得胜利。由司马迁所引述的一则故事如下：普通民众以为他们将结束战国时期的艰辛，终于迎来一个开明君主的统治，他们高兴欢喜，仿佛重获新生。在这个时期，如果秦减轻刑罚，减少对于人民的苛捐杂税，尊敬慈善和正义，藐视权力和利益；如果，秦将忠诚和真诚看得更有价值，少一些机巧狡猾，想出办法来改革人民生存的方式方法，并以德行教育这个国家，那么，也许就会和平安全地统治这个国家，达几代以上。然而，一样都没做到，而是——青年男子被强迫去战斗，女子苦于运输供给；艰苦使得民不聊生。最后，当秦的第一个皇帝离世时，整个帝国发生了暴动。”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补充，当秦始皇死后，之前时期的城市文化什么也未曾留下。中央集权观念，即帝国手中具有绝对权力，这个秦始皇所履行并传给后代的思想，限制了一般意义上的城市文化，复兴的机会，在中国迟了若干世纪才到来。在帝都和王子贵族们的府邸外面，花费了几乎 1 千年，才发展起一个整个国家性的城市网络，产生广泛的城市文化。强调中心及整个帝国只有一个政府的思想，为区域性和本土性中心的发展留下了极少的空间。以上所引的编年史记录，非常清晰地表示对待政府问题的典型态度，而同样典型的是，甚至未曾有任何人质疑中央集权，没有思考一下什么地方也许存在着根本性的毛病。某种程度上，区域化或本土独立性，至今都被认为是反抗性，而非辅助性的管理和政治结构。这是促使中国文化相对性统一的重要原因之一，与欧洲的基于区域和本土的独立和自我实现的文化形成对比。中国历史上那些不太注重统一和中心化的时期，总被认为是衰落、退步，甚至耻辱的。即使在那些时期，经济的和文化的发展十分繁荣，并反映在城市文化和大部分中国社会的文明生长中。独立战争，是显示野心勃勃的帝王取得江山统一和中心化集权的典型信号，而起义，则是当地人民无法承受过于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的信号。

公元前 207 年使秦灭顶的反叛，就是这后一种形式。它最终导致在夺取至高权力的斗争中胜者涌现，并于公元前 202 年，建立了汉代。这个胜利者就是刘邦，他成为汉代的第一个统治者一高祖。与之前的君主形成对比的是，他并无皇族血统，而是平民。在秦代，他在现今安徽省与江苏省交界的徐州一带的家乡、丰，这个地方机构中，不过是一个小官吏。

3.1.1　西汉——都城长安（公元前 206–24 年）

在渭河谷，秦都城咸阳地区被完全破坏，没有留下可用作新皇宫室的宫殿，这新皇，因此在洛阳的旧皇都建造了宫室。作此决定时所考虑的，当然是那古老神圣之地的尊严。这可以支持他得到天授之命。然而，司马迁告诉我们，刘邦的这一设想，遭到一个齐国人的反对。他建议在渭河谷建立都城。这个齐国人刘靖，明显没有参考实际的历史事实，只是描绘了一幅周代王们



图 3.1.1.1　汉高祖刘邦（公元前 206– 前 195 年在位）西安陕西省博物馆碑林拓片石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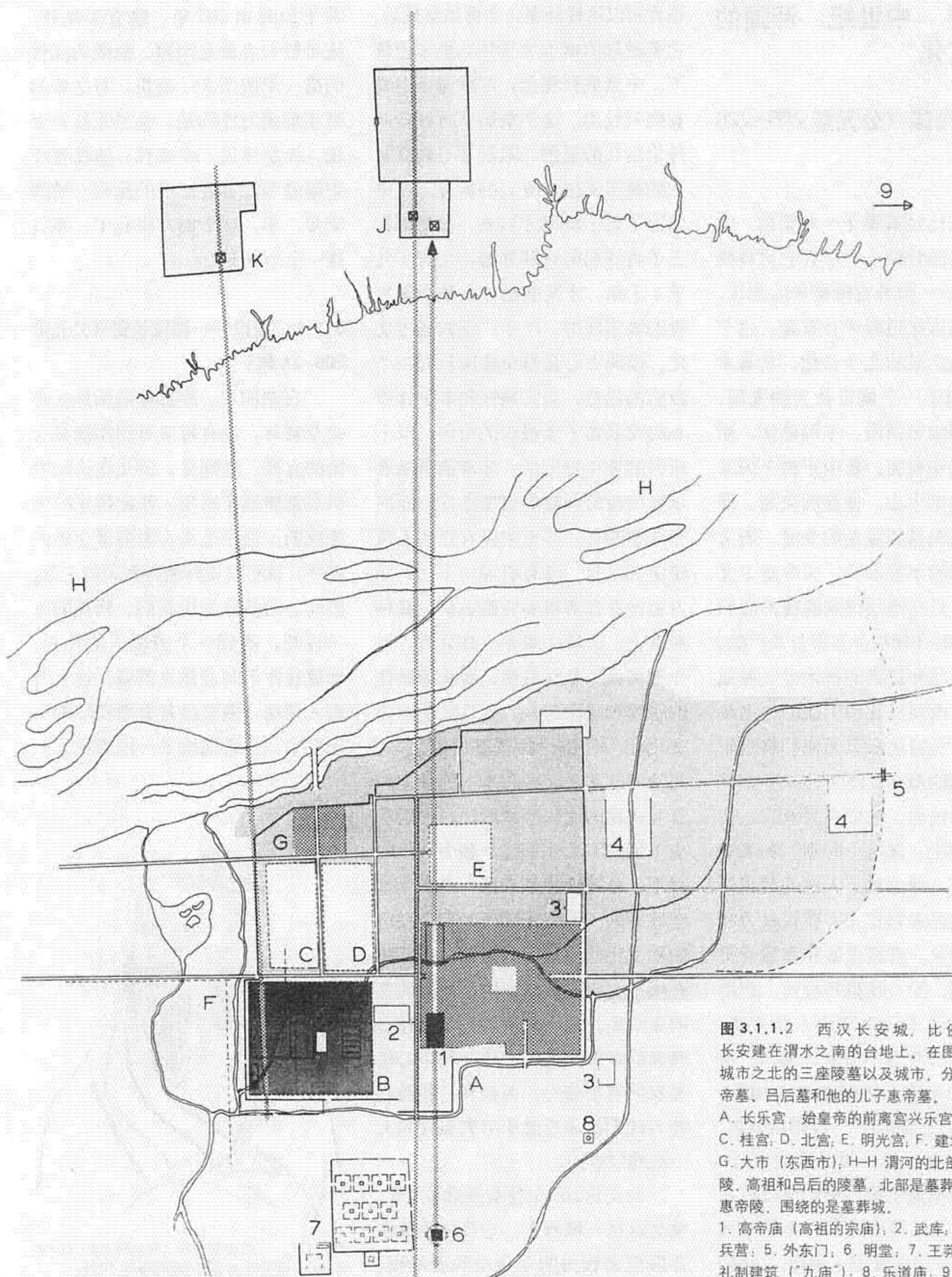


图 3.1.1.2　西汉长安城，比例 1 : 80000
长安建在渭水之南的台地上。在图中河床上部城市之北的三座陵墓以及城市，分别为高祖皇帝墓、吕后墓和他的儿子惠帝墓。
A. 长乐宫，始皇帝的前离宫兴乐宫；B. 未央宫；C. 桂宫；D. 北宫；E. 明光宫；F. 建章宫和御苑；G. 大市（东西市）；H–H 渭河的北部支流；J. 长陵，高祖和吕后的陵墓，北部是墓葬城；K. 安陵，惠帝陵，围绕的是墓葬城。
1. 高帝庙（高祖的宗庙）；2. 武库；3. 太仓；4. 兵营；5. 外东门；6. 明堂；7. 王莽所造的其他礼制建筑（"九庙"）；8. 乐道庙；9. "五帝"庙

神圣城市的理想图画。或许我们可称之为一座理想的中国城市。“陛下，在洛阳建立都城，我敢说，那是试图仿效周代的王室荣誉。”“正是”皇帝回答。“然而，皇上您如今获得帝国的方式，与周获得的方式完全不同。周室持续地集聚德行和善行，已经超过十代人。当成王登基后，他有像周公那样的大臣们的辅助，在洛城建立了首都，称为‘成周’，因为那是世界的中心。”“这样一座城市，对于一位有德行的王来说，易于统治，但是对于没有德行的王来说，易于颠覆。在此建都，是希望子孙后代能够以德治人，而因此人们才会服从，而不是通过将一座都城放置在一个军事强势的位置，以使得后来的统治者们，成为自大的、破坏性的、压制人民的人”。“如今，皇上您使得世人抛撒热血，父子们尸横遍野无以记数，哭声尚未停止，伤员们还未从床榻上起来，您却试图模仿周成王和康王的统治。在此，请允许我斗胆进言，现时与周没有相似之处”。“渭河河谷的秦地，群山环绕，并绕以黄河。四边防守坚固。在紧急突发情形下，能够提供100万兵力。能够占据旧秦区，能享受广袤田野的优势，并能拥有自然所提供的真正仓库。如果陛下能入关进入渭河谷，并在那里定都，那么，虽然在群山之东时有造反，陛下依然能够完全控制秦故地”。

皇帝与各位大臣商量，但是这些人都是上述群山之东的人，连忙指出周室已经持续了几百年，而秦的第二个皇帝在20年后就受到了惩罚，因此，在洛阳周都旧址建造都城是英明的。

但这些话，仍不足以说服皇帝。都城区又在渭河谷建立起来。秦的旧宫殿被保护起来，一个新的宫殿迅速开始建造，两座宫殿之间建起一座武库，位置在渭水之南。历史传说，高祖本人亲自为都城的布局制定周密的布局秩序。为了他的都城，对于八处大城市都做了认真仔细的调查，因为，他意向不但要遵循过去的旧法则，对此，他发现那是不够的，也是太严格的，而且，要建立一个尺度辉煌绝顶的史无先例的都城。他命名为长安—永久的平安—整个城区被划分为三个部分，以管理巨大的集聚人口。那是非常迅速的强制性移民和强制性聚落发展的结果。公元前200年，皇帝迁入新都。5年后，已经记录在册有145000居民了。

刘靖，对他以上提到的观念又加以发展，并以如下方式解释了重建聚落的观点：“关外地区的匈奴，居于离长安不足700里之处，轻骑一天一夜就能到达关内秦故地。尽管秦的这方土地富裕肥沃，可以养育更多的人，但是，它已饱受摧残，因此人口减少。此外，据说，在贵族们开始反抗秦的暴政时，除了齐或楚的某些宗族成员，无人能够获胜。离都城很近的北部，有蛮族强盗，而东部，住有那些力量强大的前六国遗宗。因此，我请求陛下将前面提到的宗族，那些燕、赵、韩和魏家族和前皇室的后代，以及其他强悍而有名望的家族，迁到渭河谷关内地区。只要事情进展顺利，这些人能够防御这一地区而抵制蛮族入侵。而如果这些封建诸侯中有所背叛，他们将形成一支军队，向东挺进以制止暴乱。”这是一种“强化帝国之根而弱化帝国之枝”的战略。所以，以上各宗族就迁移到了“关内地区”，总共超过10万人。皇帝能坐在自己的宫室而稳操胜券，控制所有的强势君主、贵族及其家室。而在整个帝国，皇帝的亲属和官吏们统治人民。就大都市地区的人口集中化而言，这一政策，从始皇帝那里继承而来。在以前各郡安插帝国的亲属作为太子，又复兴了周代的封建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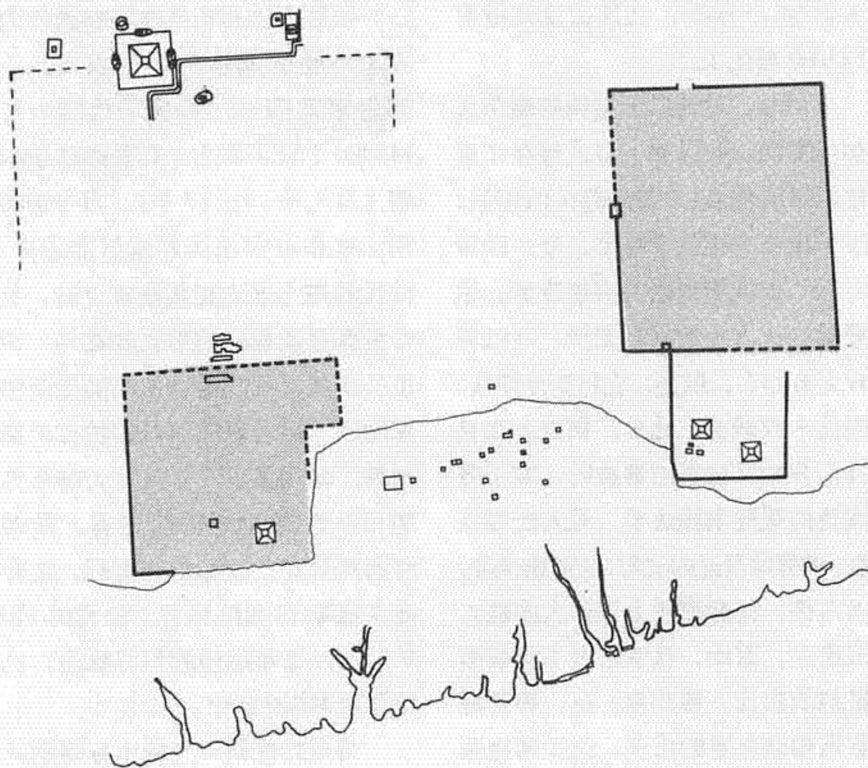
高祖没能活到亲眼看到自己的都城完全建立。公元前195年，在他死后的5年，征集了以都城为中心，辐射半径600里内的农民作为劳工，建成城墙。这些农民，在整个建造期间，形成了持续大约145000个民工劳力。在武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41−87年），当帝国的领土被拓展到远远超越旧的边界，汉代的权力也达到其巅峰之时，长安城取得其最终的形式和结构。城市的发展，可以通过从东部肥沃平原地区，运送到渭河谷的粮食产量判断。公元前180年前后，每年有200000到300000担的稻谷，沿渭河运到长安，分配给官吏们，达到每人每年18担的稻谷。公元前140年前后，每年运输的稻谷数量，已经升到4000000担。

与周代晚期大型城市不规则城

图 3.1.1.3　茂陵，汉武帝（公元前 141–87 年在位）的陵墓，在现今咸阳西部，陕西渭河之北，以上图片是从西南望，在右边是大将军霍去病（公元前 141– 前 117 年）的陵丘

图 3.1.1.4　茂陵的平面（上左）、长陵（上右）和安陵（下左），有陵墓区和城区（阴影部分）。比例：1 ：40000[1]





墙相比，长安的城墙形状是不规则的。城墙内的区域覆盖面积约 36 平方公里，区域内几乎一半的地方，由 5 座巨大的宫殿所占，其中两座最古老的宫殿，每座如城市一般的规模，分别覆盖 5 和 6 平方公里。在这两座宫殿，即长乐宫和未央宫之间，建有一座武库，覆盖面积 25.6 公顷。这两座宫殿，由两层连廊连接，在桥上跨过主要的南北大街。在城墙环绕区域的西北角，有 9 座市场，估计已经形成了一处由 9 部分组成的广场。8 条大街，45 米宽，将城市分成若干街区。未央宫北面的一个，是最高级的奢华街区，官僚府邸所在处。12 座城门中，4 座直通到宫殿，而西北和东北城门，是供普通人进出的主要大门，前者通向渭河上的桥梁，后者通向东面。以此，它们将居住街区、城之北的郊区和城东的 9 座市场连接起来。5 座城门具有城镇的名称，连接着居住街区以及河之北、城之东的郊区，暗示了在大都市区域中与城市聚落的联系。司马迁描述，“人们从帝国的其他所有地区，涌入长安周围那些在皇家陵墓旁建立的城镇，这些城镇与长安都城，就好比车轮的辐条般辐辏于都城。土地面积很小，而人口猛增，因此，人们变得越来越复杂，多才多艺，并转向第二职业，比如从事贸易来谋生。”城市西部以及南部的部分地方，皇帝从始皇帝那里继承下来的帝国狩猎场，覆盖

1　参见《中国古代建筑史》北京，1980 和《考古》1981/5，1981/7。

在第六年的10月，皇帝令帝国的府级城市和城镇各自建造城墙（公元前202年11月/12月），因为第一个皇帝始皇帝，已经毁坏了城市的内墙和其他城墙，高祖命令重新建造。春季的第一个月，长安的城墙得到部分重建（公元前194年2月）；第三年的春天，在距离长安600里的区域内，146000名男女被征集来建造长安的城墙。30天内，他们就全被遣散了（公元前192年春天）

6月，来自附庸诸侯各国约有20000犯人和随从，被送去建造长安的城墙（公元前192年7月）

春天的第1个月，在长安600里内区域中，又征集145000名男女建造长安城墙，30天后，他们又被遣散（公元前190年2月）

9月，长安的城墙完成（公元前190年，10月/11月），长安的西市被兴建起来（公元前189年7月）

着约有635平方公里的上林苑，里面有几处宫殿及两处人工湖，其中，昆明湖覆盖面积大约10平方公里。著名的诗人和政治家，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前117年）对上林苑有如诗般的描述。作为对于他成就的报答，司马相如成为第二个汉代皇帝陵——灞陵的守护者。司马相如，后来在他所服务的皇帝、武帝之陵——茂陵城自己的家中死去。灞陵坐落在都城之东，是一个行政区的中心城镇；茂陵坐落在城市西北，渭河以北，也是一个区域的中心管辖城镇。由于皇家陵墓分布在都城的北面和东面，过了几代之后，帝国陵及其聚落，从东到西扩展了几乎100公里，并覆盖大约2000平方公里的面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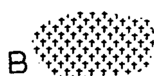
在邻近大都会地区，泾河以北，有一个渭河谷中最为肥沃的地区之一，由郑国的运河灌溉，在公元前3世纪中期就被耕种。汉代，在它延伸以后，受灌溉的区域覆盖几乎200000公顷。由于这个地区生产的农作物，每年可以养育150万人之上，渐渐地，它成为一个重要的军队和资本的贮藏区。粮税从广大的东部平原，顺渭水而向上运输、收取，正如我们上面提到的。但是，在汉武帝时期，在渭水的南部，建立了一条运河，将黄河更直接地引到都城的东墙。这里造有巨大的贮粮仓库，粮食从那里被分发到其他城市人口之中。其他的运河也被挖掘用于城市供水，并灌注城中为排水系统所建的人工湖泊。沿主要大街挖了沟渠，将污水通过城墙上一些巨大的洞口，引到城外的城壕之中，并从那里流入运河。

据我们到目前为止的判断，该帝国都城，似乎是汉代整个大帝国中惟一新建的大城市。其他的大城市是些旧国都，在为建新朝的战争中，那里的人口已经损失了70%到80%。虽然最终有所恢复。只是一个相对小规模的恢复，供一些新封的诸侯及皇亲国戚之居住。后来，随着原来封建王朝在公元前1世纪时期的逐渐消失，这些城市也失去了重要性，并被转变成为当地的行政中心，由帝国官吏们控制。长安的宫廷，是社会和文化生活的缩影模型，丰富奢华的汉文化，事实上主要是宫廷文化的产物，其诠释了整个大汉文明的惊人统一。这种统一性，因专门性制造业的建立而得以增强。其中有些在帝国控制之下，并为整个帝国提供产品。典型实例，就是四川漆器的生产，其产品的实例，发现于韩国的坟墓。那里当时在汉的统治之下，离长安大约3000公里。

3.1.2 汉代的其他城市

始皇帝统治15年以及8年不停的战争之后，主要城市的人口减少了70%－80%。当汉兴起，和平刚刚恢复还给这个世界，大的城镇和著名的城市依然荒漠，并在废墟之中。所以，从前有1万居民的地方，如今的人口册中仅剩2到3户。

关于汉代其他城市和城镇的外观和布局，我们所知甚少。随着公元前1世纪期间的封建分封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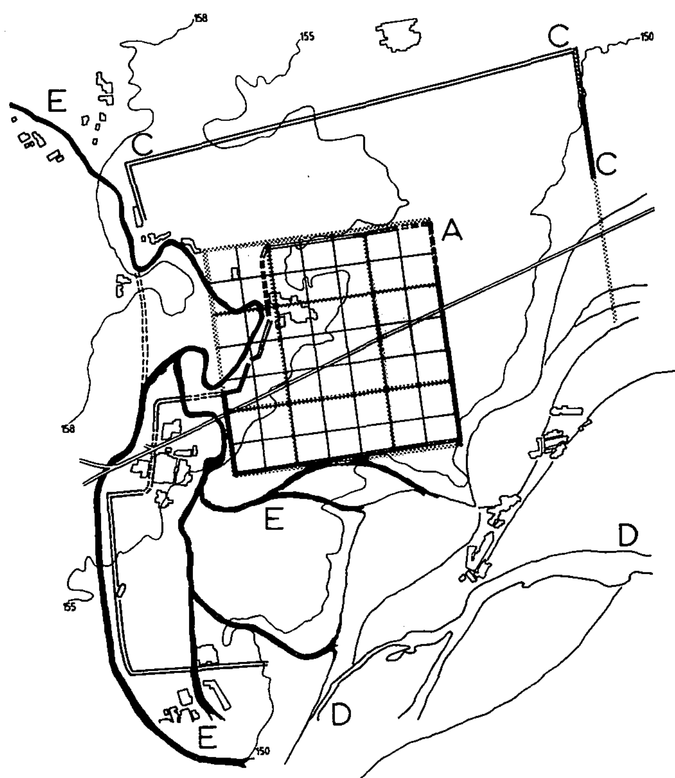


图 3.1.2.1 东周王城城墙之内的河南府城，比例：1 ： 4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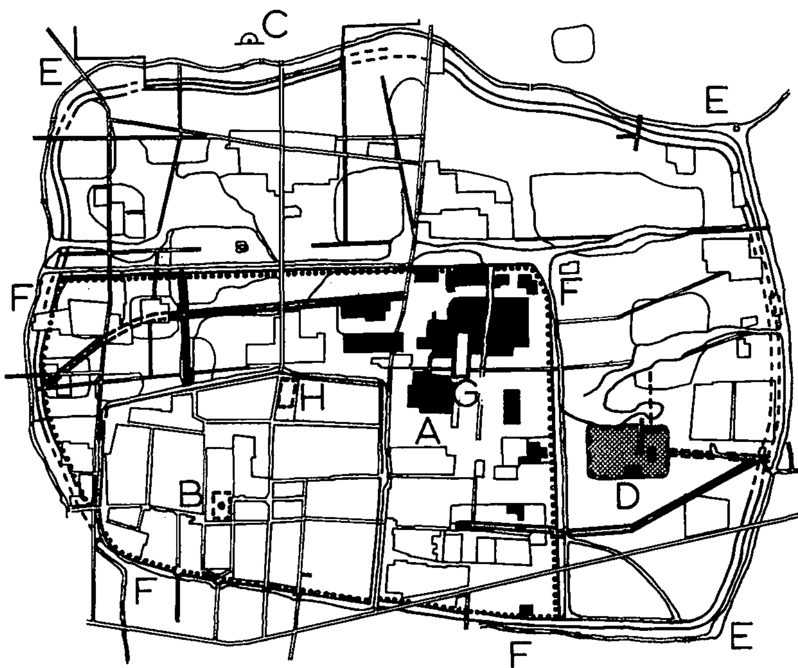
看上去，西汉城市原来的布局是一个 7 半里 × 7.5 半里的方形（423 米 ： 2=211.5 米）。在王城的中心部分之西，是城中心。后来，这个 7 半里 ×7.5 半里的方形的西北角，可能被涧河冲毁，结果，沿着新河道重新修复。使用半里这样的度量单位，在西汉似乎很普遍，正如在旧周中心之西的新城中心坐落地点一样。

A. 河南府，西汉城；B. 西汉墓地；C. 周代王城遗址，南部被洛河水冲掉；D–D 洛河；E–E 涧河

图 3.1.2.2 西汉的鲁公太子城，景帝时期（公元前 157– 前 141 年在位）重建之后的情形，比例 1 ： 40000[1]。

景帝的太子，将宫殿延伸到了旧周宫殿区西部。周公庙依然存在那里（G）。公元前 154 年，当重建开始后，孔宅在拆毁之列（B），但当在住宅的墙壁中发现藏有竹简，拆毁就停了。西汉的城市规模比旧周城小得多，而一个新城墙，围绕着延伸的宫殿建造起来，包括旧城西南角，那里使用旧城墙，在宫殿的东南。在新城之外，建造起一座朝东的庙宇，它也许与城东神圣地方有某种联系，就像传说中，被认为是治理山东的祖先少昊帝的假想坟墓，而且，被认为是太子的祖父汉文帝统治下，四方之极的东方神灵，鲁城就是今天的山东曲阜。

A. 太子公的新汉宫；B. 孔宅；C. 孔子墓；D. 城东的新庙；E. 战国时期，鲁的旧城墙；F. 西汉时期（加点的部分），鲁的新城墙；G. 今日周公庙；H. 孔子的门徒颜回庙



1 参见曲阜鲁国故城，济南，1982 年。

消失，诸侯所有的军队被废除，围绕大城市的坚实城堡变得无用。结果，城镇和城市的城墙围绕区域尺度，缩小到仅包括行政管理官署和官府，匠人和商人们在周围及郊区居住，部分处在古老腐朽颓败的外墙之内。典型的例子是河南府城，在汉代的初期，建于旧王城的城墙围绕区域内，在现今河南洛阳西部。旧周城已经覆盖了大约10平方公里的面积，但是，新汉城规模不到2平方公里，所包含的不过行政管理官署，一些官府，估计是一个小型哨卡。工业的和商业的活动在城门外进行，在那里，指定特殊官员监管，负责税收。一个同样规模的行政城市，在现今的南京地区建立，即丹阳城，一个在现今江苏长江以南的扬州郡的次级行政分支机构。在公元前2世纪末，在现今的广州地区，当汉军降伏了南越的最后一个王时，南海郡被重新建立起来，而番禺旧的行政城镇增大了。结果，围墙的区域，仅仅大约1平方公里的规模，而港口和邻近的市场坐落在城外，离珠江岸边西南大约2公里。

就目前考古学研究所确定的情形，在长安都城之外最大的汉代宫殿区域，是鲁故城刚刚加筑围城不久的区域，即今天著名的曲阜孔子的诞生地。在这里，旧的中央宫殿区域朝向较为偏西的方向延伸。在孔府故宅墙中发现了一卷卷的旧书稿，根据不够确实的传说，这些旧书稿逃过了始皇帝时期的焚书劫难。这完全新近的围墙区域的规模，大致为4.2平方公里，并且可能包括了后来成为孔庙的第一批建筑物。鲁城的旧外墙，围绕着一个大约10平方公里的面积，其防御力量，于公元前3世纪末被秦始皇彻底摧毁之后，这里只剩破败腐朽。

公元前2世纪的整个过程中，行政管理单位总数量的增加，不仅暗示了帝国的成长，且揭示了国家之政治结构的变化。公元前195年，原来的10个诸侯国，渐渐地分成了越来越小的封侯领地，公元2年，只有19个非常小的诸侯国，这些又被分成为39个在帝国行政指挥官之下的领地。当初，高祖建立汉代时，帝国被分成了36个领地，有大约800个区。大约100年之后的武帝统治时期，汉代势力影响下的帝国和区域，由102个领地所组成。公元2年，这103个领地，被分成为1587个区，每个区都有其行政管理中心。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中心，仅有城墙内的官衙和官署，以及在城墙外城门附近的居住区。就像当初分封给汉代第一个皇帝高祖亲属们的侯国一样，这些封建领地，如今又继续地被分成更小的行政单位。因此，大的王城被剥夺了其后方的腹地，从而失去了其更进一步生长所需的支持。结果，在大都市区域外的所有城市，仅以小型城市聚落的面目而告终，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中华帝国的城市结构，几乎在此状态下没有发生过改变。

汉帝国最为可怕的敌人，以及对都城长安最大的威胁是匈奴。正如我们前面所引的刘靖语录所言，那是长安以北约500公里，黄河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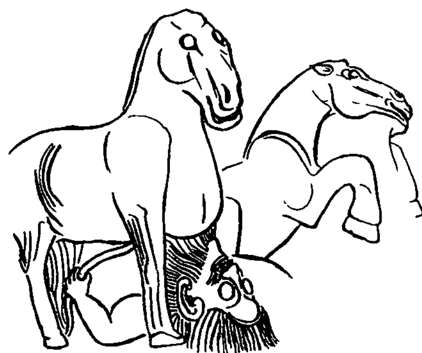


图3.1.2.3 从西安大将军霍去病（公元前141－前117年）墓中出土的马俑。马踏匈奴，飞跃的马，也许是年轻将军所爱之一。当时，他被誉为一个技艺最为娴熟的马背骑士，甚至技超匈奴。公元前117年，在他死去之前，曾经几次战败匈奴。作为特殊的荣誉，他的墓地，建在长安东北，汉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陵墓茂陵城区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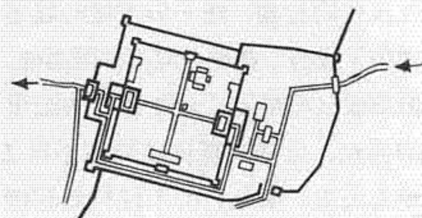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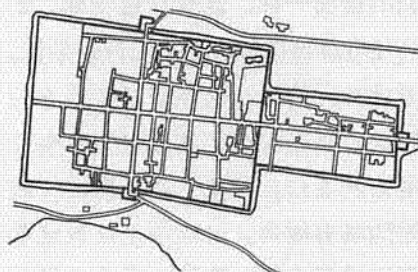
图 3.1.2.4　长城最西边的要塞，曾经是、如今也是甘肃的嘉峪关，它曾经是沿着丝绸之路从西边进入中国的大门。当秦长城在汉武帝时期(公元前 141－前 87 年在位)的前 118－前 113 年，在甘肃河西走廊沿丝绸之路向西延展时，它的最西端，伸展到敦煌以西的玉门关附近。这个边防哨卡，已经幸存了几个世纪，现在的建筑物，为明代构筑，于 1372 年最后一次重建，而到 1506 年完成。前沿的是长城内干涸的河床

图 3.1.2.5　甘肃嘉峪关布局，比例：1：10000

图 3.1.2.6　沿着长城的烽火台和瞭望塔。照片的前景，是甘肃玉门附近的堡垒

图 3.1.2.7、8　公元前 115 年，首先建立作为长城的肃州部分治理中心，在甘肃的旧城布局为一个 2 半里 ×3 半里的矩形（基于汉的度量单位，1 里 =428.5 米，1 尺 =23.8 厘米），比例 1：20000 城墙在公元 343–346 年间重建，以东门作为进入城里的惟一入口。公元前 102 年，大约有 180000 名农民出身的士兵，被安置在这里加强防御系统。1000 年后，在 1395 年，城镇向东延伸，旧的东门变成了城中心的钟鼓楼。南北城墙为 1 里（明代的度量，1 里 =478.5 米）

4　5
6
7　8





的北部和西北部的游牧部落联盟。在秦始皇时代，借助于那些因秦帝国严苛法则而逃亡的汉人的帮助，他们已经将自己组织成一个如国家般的联盟。联盟的首领可以十分容易地聚集成千上万动若旋风的骑士们来进攻大汉军队。尽管著名的长城被建造来保护帝国防御敌人，汉帝国必须继续增强其防御工事。为了加强防御，他们沿着长城，建立了另一条缀有边防哨卡的防御沿线，哨卡里，驻扎着永久性的卫队。为了养育这成千上万的士兵，必须再配备全副武装的农民。这些人，在紧急情况下也便是士兵。结果，沿着边界前线，出现了许多新的行政单位。他们的行政是军事的，而其行政中心是沿着长城的堡垒型城镇。就我们所知，这些堡垒型城镇，甚至比其他的地方行政中心还要小，覆盖了大约 10 公顷或仅 0.1 平方公里的区域，但是，它们有特别坚固的墙体保护。

一个非常特别的北部防御线的延伸，就是对于甘肃走廊，以及沿丝绸之路更往西的地区的控制。匈奴已经被驱赶到更北的中亚大草原。而汉代皇帝的力量，也几乎延伸到塔里木盆地以及西边的帕米尔山脉。对于丝绸之路的有效控制，打开了与西亚各个国家的贸易之路，特别是与罗马帝国的贸易，这是历史上欧洲和亚洲之间首次的某种世界贸易，关于中国之外的广大世界的知识，大量增长，而且，进口的商品，对于在长安的汉代皇帝的宫廷中的奢侈生活极具贡献。在武帝时期，大约有 600000 中国士兵，定居于沿着丝绸之路的地区。12 个左右有围墙的城镇，沿着这条路线，被作为堡垒和行政中心而建立起来，也作为贸易中心和旅行驿站。

与王朝力量向东亚大陆几乎所有人居地挺进相平行，对知识与科学的扩展在延伸，这通过重新建立古老的传统文献而实现。这些文献，渐渐地通过那些老学者的记忆，通过那些历经秦始皇焚书的可怕时代，以及后来的战争所幸存下来的文本而重构。这文艺复兴背后的驱动力，是帝国对行政管理和官吏的教育需要。因为汉代的建立者及其近侍多是普通人，他们通过超凡的军事才能提升，却极少有行政管理的经验，在广大帝国，招聘日益所需的有才干者，变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王朝要生存，而一个关于好政府的理论和实践的资源，当然是历史和诸子百家文献，这在周代的城市文化中已经丰富地开花结果。

公元前 2 世纪的前半部，一个年轻贵族的藏书楼，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这是一些年前在湖南省长沙附近的郊区中挖掘的。那个时候是长沙王封郡的都城，这座藏书楼属于此封地大臣的年轻的儿子。这个封郡的长沙王，是高祖皇帝追随者之一的儿子吴芮，而他的大臣是利苍，该人于公元前 193 年，在湖南被授予封地和长沙王身份。这一头衔，公元前 186 年他死后，由他的长子利豨接替，他又在公元前 162 年死去。大概，利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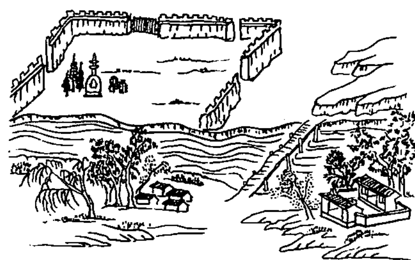


图 3.1.2.9 沙洲城墙遗迹，长城在敦煌部分的行政管理所在，建于公元前 117 年初。原来布局可能是 3.5 里 ×5.5 里，或以更小的度量所表达的 525 步 ×725 步(300 步 =1 里)。在明代，旧城墙被废，而在党河之东建造新城，即现今的甘肃敦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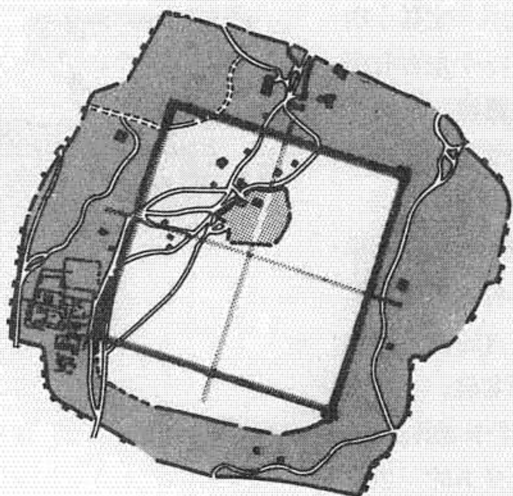


图 3.1.2.10、11 现今新疆丝路上的两座城市，比例 1 ： 20000，参见《考古》1981/2。
当丝路在唐代又因中国驮队西行而开放时，两座城市进行了延扩。虽然，考古学家在两处都发现了汉代遗物，城市最老的布局起源，也许依然存有疑问，然而，其对于高昌的度量体系是毫无疑问的

图 3.1.2.10 高昌，在吐鲁番绿洲中，在丝绸之路北路的南部分支上。西汉时期，内城度量是 4 半里 ×4 半里，基于西汉里 1 里 =414 米

图 3.1.2.11 北庭，近吉木萨尔县，在博格达山北的一个小绿洲，大约乌鲁木齐以东 120 公里，在丝路北路的北部分支上，西汉时期，内城没有明显的度量体系，尽管以直墙建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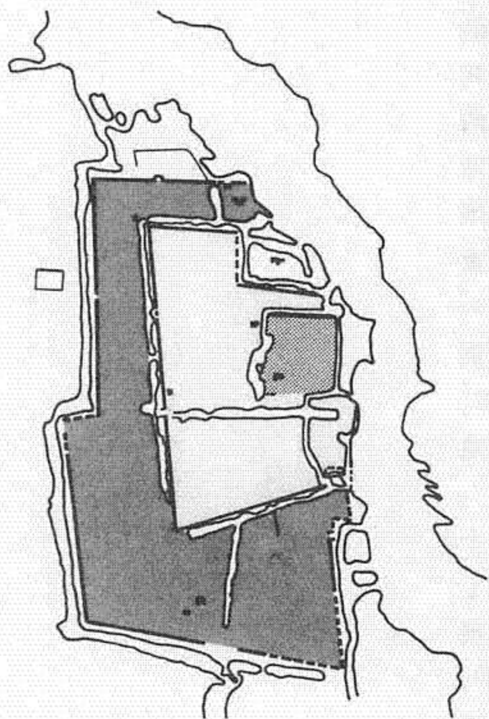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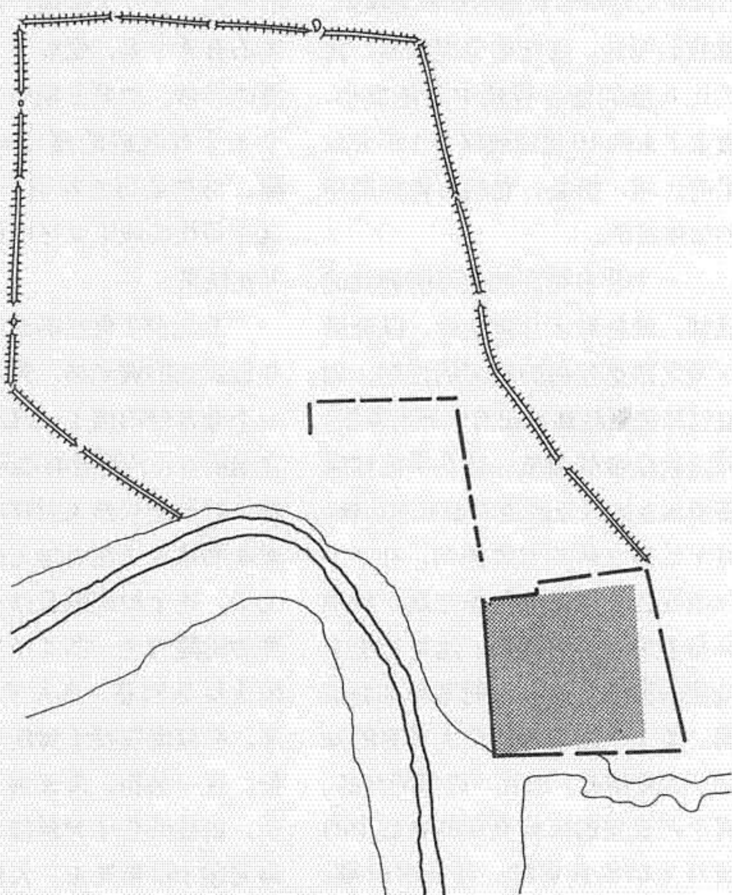


图 3.1.2.12 内蒙古长城以北近呼和浩特的成乐军营城，比例 1 ： 20000[1]。
这西汉行政中心，也许源于长城之外一个原始的边界要塞，这个城市的遗存，也许是西城墙，其尺寸为 1 里（西汉里）。这个城墙，也许是后来东汉时重建的。大型的围墙环绕地区，是公元前 313 年前第一个北魏时的军营首都，成乐西北的第三个小围合区，是辽代真武城（公元 946–1125 年）的小型军事驻防中心



1 参见文物，1977/2。

弟，也是一个高级官吏和军事指挥官，但他在公元前168年死去时，年仅30岁出头，并葬于离他父母很近的地方。在他的墓中，在一条条丝绸和竹简上，发现了无以记数的文字，包括20多本书的拷贝，总共有120000个文字。这些文本，写于埋葬之前的20年间，正好是年轻人在世的时间，包括诸如老子的《道德经》、《易经》和《战国策》等著名文献的版本。除了这些古典文献，还有关于天文学和占星术、医学、年历的编纂，以及相马和其他专题的书籍。并且有两幅地图印制在丝绸上，包含长沙以南地区和与广东边界相接壤的现今桂林东边的区域。当时的广东，是那时的最南前沿，这暗示了这年轻人在这一地区具有一个军事头衔。这些地图，令人吃惊地准确——错误率仅0.9%到1.2%，并且以既定的比例1：180000——它们似乎是今日整个世界现存的最古老精确的地图。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窥见，一个年轻贵族，如何为了一个官僚生涯而进行的准备。这生涯，可能会引导他达到帝国的至高地位。但是，还有许多其他的行政管理职位等着要人，而这些职位，都需要有能力并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才。只有那些有时间学习并受到训练，并且有资源承担这些的人们才能获得。

随着高祖之后几位汉代皇帝统治的稳定性日益增长，社会经济条件大大地改善。在战争的混乱之后，涌现出高度层级化的社会，财富可以通过几种方式而获得，通过政治影响以及通过经济活动，但是要保证这永久的财富，它必须转变成为土地的资产。因此，出现了一个地主阶级。这后来就是著名“绅士阶级”或“大家族”。尽管在2000年过程中历经变化，直到公元20世纪中期，中国历史中的绅士们所扮演的先锋作用都十分明显。因此，中国社会被称为“绅士社会”。原则上，一个典型的绅士家庭有两个分支。一支生活在乡村，在各个省或郡，在那里，他们照看财产，从佃农那里收取租金，通常是其所在的农业区域总产量的一半左右。这些租金，是绅士家庭生计的基础。保持和发展其财产，成为经济上资金充实的企业，保持法律和秩序，是这些绅士家庭的责任。他们为其佃农们挣得生计提供合理的条件，并且尽可能地在战乱时期保护他们。因此，很多在洪水、干旱或战争中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最好的条件就是在一个比较大的阶层之中当佃农。

通过拥有资源和财富，绅士家庭能够在他们的亲戚当中选择适当的人选，给予他们良好的教育，并且让他们跻身于帝国行政管理的官僚阶层。以防灾难或政治不定或其他的困难。这些处于官僚地位的家庭成员，可以施加其影响和权力，来保护在他们家族在当地的家庭财产，他们无需付出什么，就可以支持其家庭利益。靠的是他们在帝国行政管理之中的职位。这种制度，给予绅士家庭以双重的安全性，而在这些家族之间的联姻中，它又保证了许多家族的稳固。尽管历史和生活的浮沉，尽管政府制度和权利机构的变迁，它们之中的诸多家族，依然是超过1000年以上的统治精英，并且将其影响扩展到整个帝国。

绅士家庭成员中的大多数，居住在他们地方上的庄园，而那些拥有官职的成员，即绅士家庭的另一分支，则生活在行政管理的城市和城镇之中。这些人与其管家、助手、仆人和家丁等一起。以上，形成了汉代城市人口的主要部分。如前所见，公元2年，有1587个县，每一县都有一个行政中心，构成103个郡所成的整体。它们形成了行政管理的网络，并以长安的帝国都城为中心。每一个地方官僚，以皇帝代理身份行事，而因为这个原因，帝国之中的每座城市或城镇，也就是一个帝国的聚落。在当地官僚的所有职责功能之中，帝国行政管理，直接得到皇帝及其朝廷的支持。

行政活动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集中于都城的皇帝的仪式职责。结果，在各省的帝国官吏也相应如此。中国的宗教，基于两个主要的概念：一个比较老的概念，大概发展于萨满传统，认为在自然环境之中，一切所有皆有生灵，人类完全依赖这些生灵为生。它们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必须对这些生灵心存感激而顺从。皇帝也将此点表达在那精心计划的典礼和仪式之中，在适宜的地方和吉兆的时刻举行。另一概念，就是对祖先的祭祀，认为先祖在死后同样也变成类似的精灵。这首先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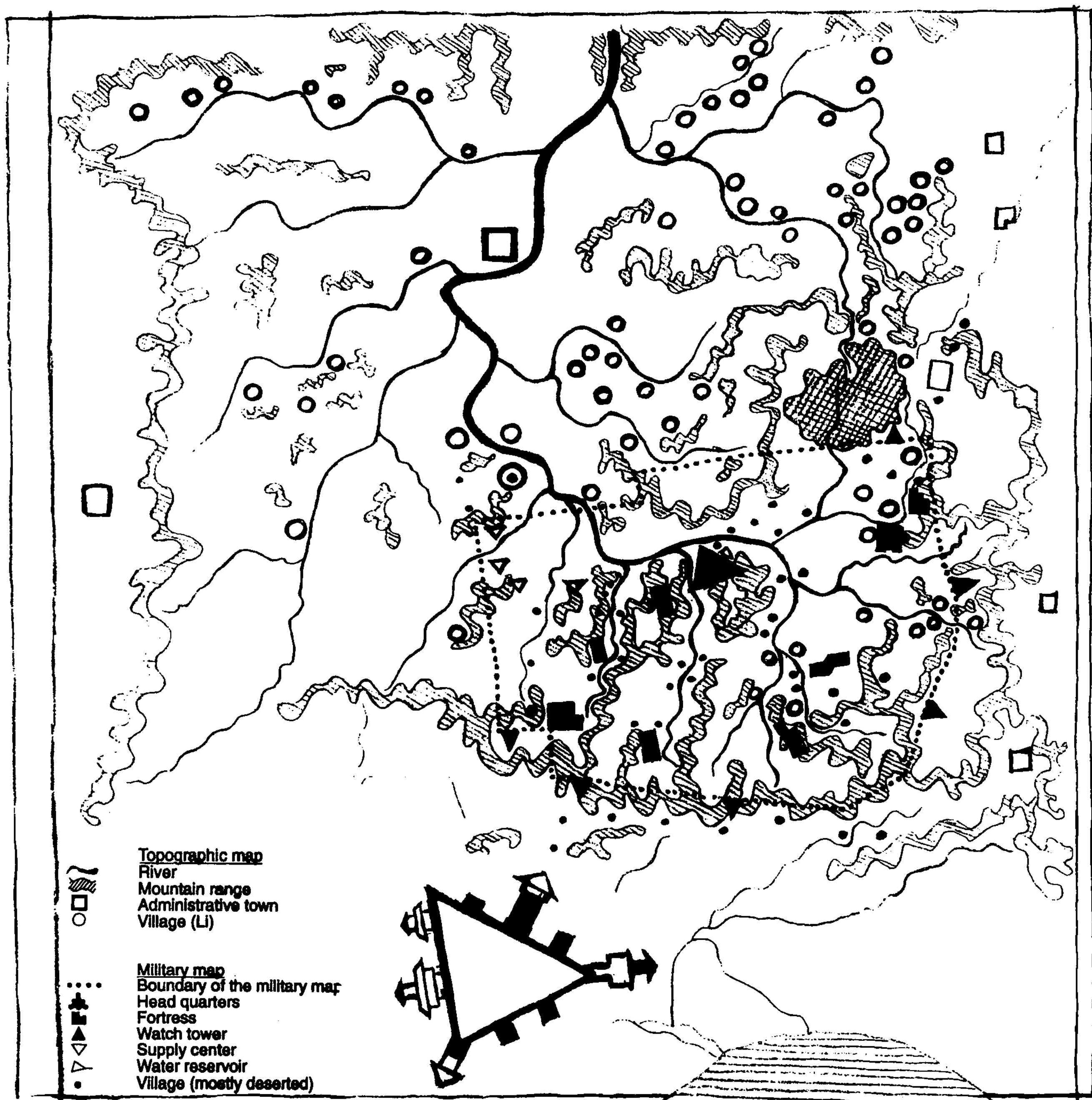


图3.1.2.13 汉代在湖南的南部边界区域，正如湖南近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所发现的两片绢帛上所绘，比例：1 ：1000000[1]。

这里，将在公元前168年去世的官吏利豨之墓所发现的两张地图拼为一张，表示了围绕现今湖南潇水边的道县地区。图的南部没有按照比例，并表示了直到海边的广东一带，黑色的矩形和三角形，是军营和俘虏营，黑点是村庄，大多数在那时被毁。图上圆圈表示村庄，而河流西边的方形是军营，今日道县的县政府所在。左角的插图，表示了军事图上大三角形栅栏图形符号签名，表示瞭望楼和栅栏扶壁的想法。军事区由点划的线所表示，沿着湖南和广东之间的山脉南部边界组成，那时，这个区域是由南越的原居民部落所拥有

1 参见 Mei-Ling Hsu，公元前2世纪的汉地图和《文物》，1975/2，1976/1。

在葬礼上，接着表现在聚落区域家庙之内精心计划的供奉和宗教仪式上。

与皇室家族之祖先祭仪相联系，朝代传说和编年史得到发展，并在后来形成历史学、文学以及政治哲学的发展基础。因其政治的重要性，在皇室祖先祭坛前面所举行的仪式，成为非常重要的国家仪典，由皇帝本人以及他的官吏们，在整个帝国亲自实施。

文帝时期，在长安宫殿内，为了祭祀高祖——这位伟大的朝代建立者，而建造了一座庙宇。后来，在帝国所有的封地，又建造了很多庙宇，供奉伟大的君主文帝，以某种方式，这帝国的太庙，是与“至高无上的祖先”或“天”的概念相联系的。不太清楚这些神祇原来是什么，但是，他们似乎作为神圣的统治者来看管人间社会。先祖过世之后，他们的灵魂，被认为栖息在天堂－上帝之家。在那里，他们依然对人间事有着某种影响。那坐落在都城郊区的天坛，在扩建之后，成为皇帝最为重要的祭祀之地。在长安，这所谓的郊区献祭仪式举行于雍，也就是当初始皇帝远祖们的栖息之地，位于都城以西，渭河以北。在此，天子皇帝向天上的上帝，报告他的成就和丰功，并祈求帮助，以防灾害或洪水的来临。这些自然灾害，被认定为是上天送到人间的惩罚。

汉代，也见证了与萨满教传统密切相关的其他仪式的兴起，例如，在土地坛向山河的献祭，以及向人间其他神祇的献祭。这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其中，有几种是在诸如山东泰山那样的神圣之地举行。而其他的许多仪式，则包括进皇帝及其官吏们所举办的一整套国家仪式中。为了这个目标，祭坛和庙宇建于官署附近，或建于城市、乡镇的区域之内。一个特殊的部门被指派来专门负责管理这些仪式的条例和规则。当然，这仅仅指那些属于国家的仪式，因而成为帝国官吏的职责。对那些敬献给自然神灵和地方神祇的无数祭坛、神龛和庙宇，我们知之甚少。因为它们没有被列进国家仪式之中，而没有建于城市或乡镇之内，看上去，在城市和城镇之中，与中国宗教体系日益增长的复杂性相联系的庙宇和神坛的发展，则晚了很多。

汉代建立者、高祖家族帝王之位的继承链，突然于公元9–23年期间，被起义者王莽打断。王莽称其统治为新朝。在公元2世纪这个时期，第一批所知的户口普查统计数字显示，整个帝国，拥有1220万户人家，人口为5760万，还不算所有在南方、西部和北方的土著部落。所有的相邻国家，与在长安的朝廷，保持着和平的关系，帝国达到其最大的版图。篡权者王莽，欲证明他作为天子的尊贵地位，这的确有问题。因为这个原因，他试图根据周代由来已久的规则，建立自己的政权。这规则，具有古代理想国家君权神授的神圣标记。然而，他的这一企图失败了，帝国很多区域起而反抗他的改革。他的有关建立一个良善政权的主张，被证明至多只是一个托辞。事实上，结果是大规模的征用聚敛。反叛迅速转变成大规模的屠杀，人们彼此争斗。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公元23年，整个帝国崩溃成完全混乱的状态，几乎所有的行政管理中心，沦为废墟，大多数的官吏们被杀戮，长安都城和整个围绕都城的区域一起，受到严重的损毁。

大约在汉彻底覆灭之前20年的公元2年，户口普查统计显示：都城长安大约80000户注册，约246200居民，其他城市，在同一时期的人口数字为：四川的成都，76256户，282147人；河南的洛阳，52839户，195504人；江苏的徐州，40196户，148725人。当然，所有这些数字，指的是相应城市的行政管理区域，某些情况下，甚至包括市区外大约20公里范围内的乡村。例如，成都在那个时期，有一个仅约1.3平方公里的墙围区域，但其人口数字，甚至比有着墙围区域达36平方公里的长安都城的人口数字还要高。在所有情况下，这一户口统计数字，仅仅包含一部分人口，不包括那些免除苛捐杂税的非劳动人员，即所有的官吏、朝廷官员，以及贵族及亲戚们，都没有包括在内。

接下来的两个世纪，见证了汉代的重建——刘氏皇族甚至更为强权的兴起。因为，如今的都城，建在河南北部的洛阳，史称这一时期为东汉，与以西边长安为都城的西汉相对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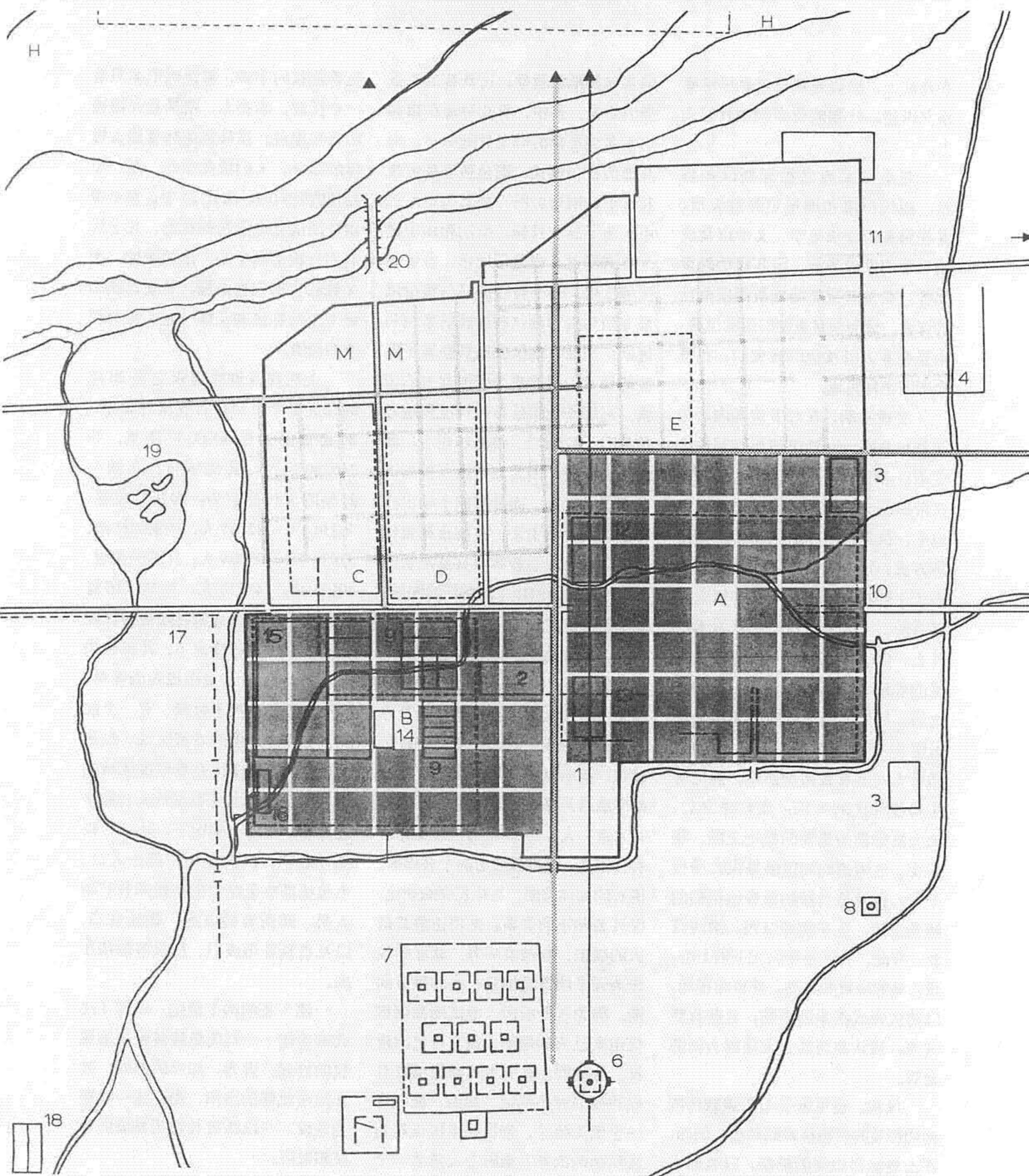

H
H
20
11
M
M
4
E
19
3
C
D
A
10
17
15
9
2
B
14
9
1
3
16
8
7
6
18

图 3.1.3.1 西汉长安城图，比例 1 : 40000。[1] 发展的四个阶段可以描述如下：
1. 在高祖治国时，公元前 200 到 195 年，长乐宫（A）和未央宫（B）开始重建和扩展。这两座宫殿的原始布局，叠加于考古地图之上。这些宫殿的第一期建筑物，在 20 几年前建于始皇帝治下，是帝都咸阳的大都市区域的延伸，其假设的界限（疆域），可见于北部（点划线），因为渭河水的泛滥而毁坏（H–H）。高祖的葬庙（1），后来在长乐宫的西南角建造，宫城区的城墙建成后，与当初的布局有所偏离。未央宫外的宫墙也是如此，因为所有的建筑建于宫城内，而武库（2），建于两座宫殿（长乐宫和未央宫）之间。主要的南北大街似乎已经同两座宫殿建在一起。
2. 高祖死后，宫殿北部的区域的布局具有更普通的网格尺度，并与以往的方位有所不同，略微偏西大约 2 度。城墙和街道采用同样的方位，并部分地遵循网格尺度，而北部的城墙，沿着河流布局。在未央宫北，公元前 189 年建了市场，这是在城墙完成之后建造的。
3. 武帝公元前 141 年登基的一些年之后，城市通过在旧城之北建造一些新宫殿而获新貌。为了扩大后宫，在未央宫北建造了桂宫（c），桂宫之东是用于仪式祭奠的北宫，更为繁复奢华。长乐宫之北，则建造了用于接待和节庆的明光宫（E），也是奢华的风格，用了无数点燃的蜡烛作为装饰。为了腾出地段，成千上万户家庭被迫从这新宫殿区域搬走，结果，在宣平门（11）外发展出东部的郊区，直至东门（5）以远。
4. 在世纪之交，篡位者王莽在未央宫之南建造了一座巨大的仪式“建筑物”。“王莽九庙”（7）在东边的主要建筑坐落在同一南北轴线上高祖庙的正南面，准确地说，长乐宫之南 7 里（6）。建于不同时间的其他建筑物包括：太仓和更南面的另一座粮仓（3），军营和兵营（4），乐道庙（8），霸城门，东墙通往长乐宫的主要入口（10），在长乐宫的军机署（12）可升起的吊桥（13），未央宫前期的老宫殿（14）内宫（15），柏梁台（16），建章宫（17），阿房宫遗址（18），太液池（19），沿河上的桥（20）

3.1.3 汉长安—规划与发展

任何伟大城市，经过长期发展，并受到各种不同人性的影响，在经历了几代之后，似乎总能够像植物一样地生长。结果，其布局的某些不规则形状，让人以为它没有经过任何的规划。考古学家们在汉长安所发掘的，是在几个皇帝和大臣们的治理下，200 多年发展的最终结果。在分析这个最终遗迹时，似乎有必要尽可能地重构其发展过程，并根据形成这终极结果不同部分的基本原则和概念，来确定这一过程的不同阶段。如此，可以为这终极结果及其发展，提供一个更好的解释。它甚至创造了一个戏剧性和生动的图像，在细部和信息方面非常丰富，具有精神和物质力量，这在过程之中是相互作用的。

对于汉长安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辨别出四个基本阶段，以两座宫殿的重建和扩建开始，某种程度上，这两座宫殿，在秦代末期的战乱中幸存下来，并成为汉长安城市最先，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对 20 年前最初为始皇帝而建的已存宫殿的重建，由朝代和城市的奠基人，第一位汉代皇帝高祖，于公元前 200 年左右实施。虽然，城市的建设，在公元前 195 年高祖死后，并无间断地继续着，我们也许可以将吕后时期，划分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此阶段，铺开了两宫之北的聚落区域。到了大约公元前 100 年，在武帝的长期统治下（公元前 141－前 87 年），第三阶段发展达到顶峰。最后，大约 1 个世纪后，在第四阶段，增加了一些显著的建筑，也完成了长安大都市区的聚落结构。发展过程，随着公元 24 年王莽改制而终结，帝都在已经存在了大约 225 年之后，以完全被毁灭的方式结束。

公元 207 年，刘邦，即后来的高祖皇帝攻克了咸阳，宰相萧何，保留了秦始皇的档案，以及一些关于帝国管理的文件，并将它们带往一度是秦都城的栎阳城，大约在咸阳东北 45 公里。这使得高祖在他最终胜利后，能够建立一个装备精良、能迅速有效工作的管理机构。因为秦最后一位皇帝的投降，刘邦几乎不战而入咸阳。所有宫殿和聚落，都完整无损地保持着，没有杀戮和毁灭，仅仅秦始皇的宝库被抢劫。当时，高祖也许曾想保持咸阳作为都城，并新建宫殿。但是这种原本可能的意图，被他的盟友项羽破坏。他仅用几个月就灭了秦皇帝，毁了整个都城。

公元前 202 年，刘邦称帝，命萧何为宰相。结果，萧何在栎阳建了府邸，那里有他曾经寄存的秦代的档案。然而，皇帝将自己安置到免于劫难的洛阳。如我们前面所陈述的那样，他在那里同大臣们讨论皇室的最终所在地。最终决策之后，高祖命萧何立即着手在渭河谷重建宫殿。第一座重新扩建的宫殿，就是以前的兴乐宫，曾经由秦始皇指定用作帝国至上的宫殿，坐落在渭水之南龙首原以西，如今被重新命名为长乐宫，并打算用于最高级的宫廷庆典和仪式。

1 Wang Zhongshu, Han Civilization, New Haven, Conn., 1982. 及《考古》1981/5，198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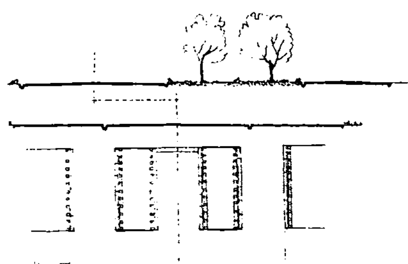


图 3.1.3.2 陕西长安西汉的城门，两条主要大街的轮廓：外观，比例 1 ：700[1]。
在东城墙东北部分的宣平门，是内城通往郊区的主要大门。有三条大门通道与大街相连。这与主要的东西街道一致（三条通道）：约 82 米宽度的霸城门通道的外观是一个例外（比其他街道宽），城墙内所有其他街道，则根据安门街的标准而建，约 46 米宽。20 米宽的中央道路专门留作御用，甚至太子们也不能用。城门的中央门道也仅为御用。虽然所有大街小巷都设有排雨水的沟渠，将雨水通过在城门处的大渠洞疏通到围绕城市的许多渠道之中，整个历史过程中不间断的洪水，依然威胁着这座城市

1 参见考古通讯，1957/5，1958/4。

公元前 200 年，重建工作得以完成，所有的贵族和官僚都来参加 10 月庆典，既是新年庆祝，又恭祝皇帝万岁。为了这个时刻的宫廷庆典，由一群来自山东曲阜中心的学者，在帝国宫廷庆典大臣叔孙通的指导下，准备和实施。两年前，当高祖庆祝新朝代汉代的建立时，叔孙通曾经准备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庆典，因为皇帝本是平民出身，他说庆典只要易于“操作”即可。结果，皇帝很不高兴，因为典礼是如此简易，以致随从官吏接受赐酒，评功论赏，一些人酒醉而狂呼乱叫，另外一些人对着这洛阳南宫宫殿的柱子飞刀，以致于皇帝对他们的行为深感担忧。因此皇帝要求叔孙通将这次的庆典仪式弄得只对他皇上本人容易，而对那些群臣显得繁复。叔孙通后来发表评论：儒士在进攻作战时没什么用，却能够帮助巩固已经取得的战果。

所以，在长乐宫新年庆典时，从贵族以下到有 600 担俸禄的官吏，每个客人轮流地被召集前来敬献祝贺，从贵族到普通百姓都敬畏得发抖。大臣负责监管规章制度的施行，任何人没有正确地在庆典上表现的，立即被拉出队伍并逐出大堂。在接下来的宴饮中，那些正规观众，绝不敢争吵，或稍有表现欠佳之举。看到这些，高祖表示第一次认识到当一个皇帝是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

为了皇室及朝廷的日常运行，萧何，在旧宫殿以西，规划了另一座新宫殿—未央宫。当皇帝公元前 199 年从一次战争中回到长安，看到在建设中的未央宫时，他感觉帝国依然处在骚乱中，尽管已经辛苦地战争这么多年了，还不能说是否将取得最终成功。因此，他非常生气地责问为何建这么奢侈的宫殿。萧何道：“正因为皇帝的命运依然未卜，必须建造这样的宫殿和大堂。真正的天子，四海之内都是他的子民，如果不居住得宏大壮丽，将无法展示权威，也就不能为后人留下建立基业的基础”。高祖听后转怒为喜。

由司马迁所引述的这两个故事，非常清晰地表示了环境的变化，以及与旧时神圣之王和大臣相比较，此时大臣们所发生的思想变化。神奇化了的仪典，变成了保持宫廷纪律以及保卫皇室贵族和朝廷的武器和工具。然而结果仅仅是表面的。因为，虽然给贵族们加封了王侯的头衔，高祖不得不一生都因为这些人的反叛而战斗不休。而且，他在最后一次的战斗中负伤而亡。宫殿建筑的宏伟以及萧何所陈述的理由，是秦始皇妄自尊大的直接延续，远非一个有德行的统治者之道。当然，也就没有文献涉及汉帝都布局对“幻方”神圣秩序的运用，那里的布局，看不出神圣数字的重要性，也没有发现关于神圣数字的结合。

在最新的汉长安布局的复原中，两座宫殿的大小和位置，已经得到考古学家们的证实和认真的挖掘。看来，在发展的第一阶段，基于汉代官方度量尺，原长乐宫的整个面积，也许已经是一个 7 里 ×7 里的方形，而未央宫覆盖 5 里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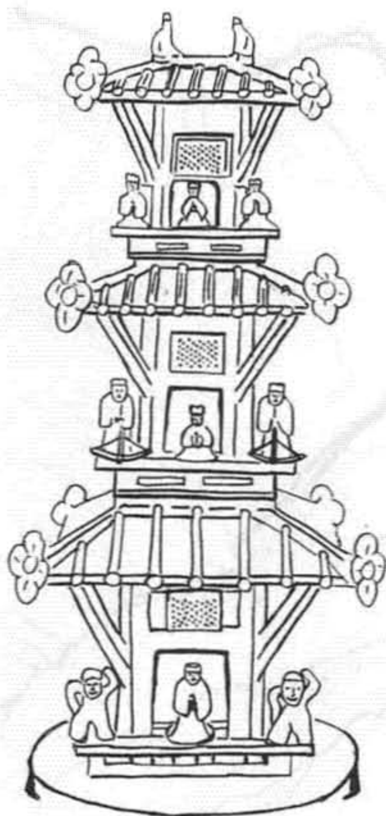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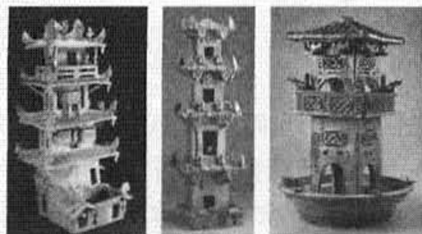




图 3.1.3.3 一个陶制模型，具有绿釉的 3 层塔楼，从公元 1 世纪至 3 世纪的一座坟墓中出土[1]。它是一个木构，就像在文献中所提到的，其宗教功能由各种类型的小泥人所表示，一层代表驱邪师，二层作为弓射手抵挡邪恶灵魂，三层代表所有的祭祀的人



译者补充插图

图 3.1.3.4 两个泥人代表驱邪师，出土自日期为公元 1 世纪到公元 3 世纪的坟墓，亚洲艺术博物馆[2]



图 3.1.3.5 从汉代坟墓中出土的两个泥人，代表着盔甲的驱邪师和庙宇看守

1 参见：Nelson Gallary of Art，Kansas City，Kansas。
2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San Francisco，Cali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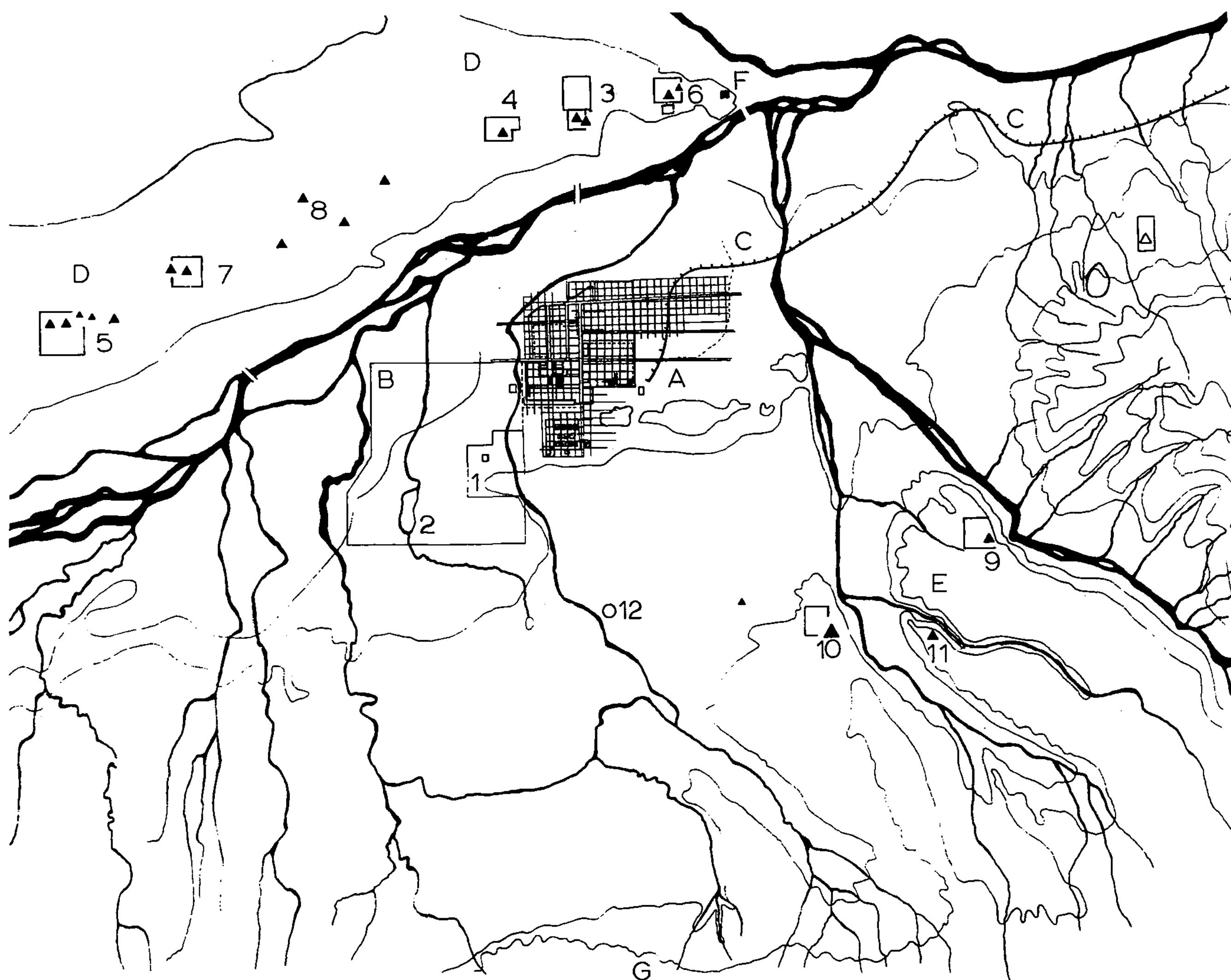


图 3.1.3.6 渭河河谷，西汉都城长安的大都市地区，比例 1 ： 250000。

A 带围墙的城市及其郊区；B. 上林苑，有建章宫 (1) 和昆明湖 (2)，公元前 120 年出土；C–C. 与黄河相连的漕渠（粮食运输的渠道），公元前 130 年，由汉武帝的水利工程师建造；D–D. 渭河之北的陵墓区。3. 高祖和吕后的长陵陵墓；4. 惠帝的安陵；5. 武帝的茂陵；6. 景帝的阳陵 7. 昭帝的平陵；8. 四个最后的皇帝（公元前 48 年 – 公元 5 年）的陵墓；E. 城市东南的陵墓区；9. 灞陵（文帝）；10. 杜陵；11. 太后陵（文帝之母）F. 五帝庙；G. 南山；12. 长安南部的小行政中心

里。这一量值，以前仅用于整个城市，所以，我们可以想像，当高祖看到这一宏伟辉煌的建筑时所表现的惊奇。先前由萧何所建的著名未央宫的殿基，今日依然竖立着，其南北向长 350 米，东西向宽 200 米，而其北端最高，坐落在一个自然的小山上，超出地平面大约 15 米。

长乐宫地区的北部为几座官府，公元前 200 年，当长乐宫完成时，这些府邸就可以居住使用了。在未央宫区域的东部，萧何建造了武库，由卫兵哨卡所围绕。当两座宫殿以基座部分 20 米厚的墙体围绕时，这个区域被减小了，官吏们的居住区被留在了墙外。两座宫殿之间是主要南北大街，直通渭河以外高祖的陵墓，并成为整个城市的主轴线。当萧何建造了东西两个门楼和一个仓库后，未央宫于公元前 198 年完成。由刘靖所形成的豪族，在大都市区域的重新定居，标志了发展过

程中第一个阶段的结束。虽然萧何已经大规模地建造了宫殿，他不同意上林苑的私人猎场方案，并上奏皇帝说："长安非常狭窄有限，然而，在上林苑，有大量的荒闲之地，我恳请，允许百姓用这个苑中的土地耕作，庄稼稻草作为动物的饲料。"虽然皇帝开始时很生气，最终于公元前195年临死前不久，还是同意了。所以，上林苑最后由百姓们用于农业。这里，要描绘一下萧何的个性，据说，在选择其土地和居所时，他总是选择居住在偏僻的地方，他的房子没有精雕装饰的墙壁和屋顶，以这种方式，他常常说，如果我的后代是高尚的人，他们会依照我的样子过简约的生活。如果他们变成无足轻重的人，至少，他们也不会有什么会被没收掠走的东西。他实无必要强调这点，因他是皇帝之下、帝国中最为强势的人，并且是最富有的人，但是他不倚强仗势，而是独立过着毫无奢华财宝的简朴生活。这样，他可以无所畏惧地说出他必须说的话，而不管是否迎合皇帝。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他是一个很实际的人，试图通过建造具有宏伟壮观的建筑，再现皇帝举世无敌、无与伦比的威望，以此宫殿外观，来弥补所失去的神圣之王的神奇性。

公元前195年，高祖离世，埋葬在渭河以北的陵墓—长陵。它以31.8米的高度，耸立河畔，在城市中就可以看到。为了纪念之用，一座仪式大堂，在长乐宫西南角、通往陵墓大街的东面建造起来。仪典每月一次，皇帝的衣冠要排着队伍，沿着这条主要大街被带往这座宫殿的仪殿中，以此方式，宫殿，便持续地与其奠基人高祖及其神灵相通，与这皇宫、这朝代、国家和人民的保护神相通。

皇帝53岁时死去，而皇后吕雉决意不回内宫，她在皇帝的屡次战役中饱经沧桑，她不喜欢那群嫔妃，搬出后宫进入长乐宫居住，并且专权统治。她的儿子，即汉代的第二个皇帝汉惠帝（公元前195—188年在位），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忠孝之人，几乎每天从未央宫穿过南北大街来看望母亲。大街每天只好对公众戒严，惠帝因此建议建造一条有顶的桥廊跨过大街，将两座宫殿、武库和高祖的仪殿联结起来，以增强交通联系。但是这样，高祖的"衣冠"队必须在桥下经过，很不尊重，因此，建造了另一座仪殿，在渭河以北靠近长陵的附近。此后，高祖庙遍布全国地建造起来，在他家乡安徽省的高祖庙，被认为是仅次于长陵边上的一座。

公元前192年，长安发展的第二个阶段，随着宫殿北部聚落地区的扩展，外城墙的整体建造开始了。城墙最初的基座仅3.5米厚，顶部2米厚，大约8米高，很明显，并非是为防御，而只是划定城市界限。公元前192年，惠帝三年的春天，从长安600里范围，整个渭河谷地区，调动了146000名男女劳力，劳动了30天后遣散；第6月，又调动20000的囚犯劳力，为这项工程持续服苦役。到了惠帝五年，即公元前190年3月，又调动了145000人，劳作30天后被遣散。公元前190年9月，城墙修复完工。高3丈5尺（8.08米），厚9尺（2.0米）。城墙的布局有点不规则，然而，仔细分析表明，宫殿以北的北部城墙的朝向，比南部城墙的朝向偏西大约2度，北边的街道模式也是这样。似乎这里的主轴线，就是未央宫的北门。其东面另一条大街，直通北城墙的中门。虽然因为城墙的不规则和街道的不同方向而难于判断，然而北部可能以另一不同的基本度量单位布局，大概是西汉23厘米的尺，即1里为41400米。宫殿以23.8厘米的汉尺，428.56米为1里而布局，这度量单位，在汉治下的400年中，一直使用直到东汉末。

北部城墙的不规则布局，已经引起了各种猜测。惟一合理的解释是，城墙主要是沿河床，如同在曾经早几个世纪前，山东省齐国的都城临淄和郑国京城的做法。此解释，得到如下事实的支持，即在两种情况下，城墙包围着一个扩建的部分，说明它也许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规划。因此，它们必须调整，以适应周围地形。一份古文献告诉我们，前辈们已将龙首原的土，传运到此，来建造城墙…在墙下，有一个城壕围绕，3丈（6.13米）宽，2丈（4.62米）深。石桥都是6丈(13.86米)长，并连续通向大街。

目前，不管从今天的城墙上能见到什么，与这些古文献中所记载的所有度量单位都非常不同。根据考古学家的结论，城墙基础为12

到 16 米宽，12 米高，城壕大约 8 米宽和 3 米深。但是，没有资料提及城墙的变化或重建。我们可以假设，加固城墙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持续的洪水，这是多少世纪一直存在的问题。北城墙基本上沿着渭河南岸上的高水位，但是，从南部秦岭山脉流下河谷的河水，在一年过程中，水流量变化很大，并无法估计，取决于在附近高山不断变化的条件。这些河流，其中之一是潏水，意为“溢出的水”，即使 700 年以后的唐代，坐落在城墙之南 400 米的轮廓线，依然构成其北部洪水区域的界限，包括汉长安的整个城市区域。在汉代的正史“汉书”中，史学家班固，描述了公元前 30 年 9 月秋季，在关内（即渭河谷大都市区域）的一场洪水，一个小女孩听说洪水要来了，跑着进了广明门。通过厨城门,河水到达了未央宫…（因为），官吏和百姓们吓得全部上到了城墙上。很明显地，女孩穿过整个城市，在未央宫的高台上避难，在那里，人们发现她坐在大殿前大约高出地面 15 米的台阶之上。没有人阻止这个女孩，因为每个人，即几万人都在墙上避难，这次，当然是在新的厚厚的墙上。

公元前 180 年吕后死后，第二个阶段结束。接下来的两个皇帝，都没有觉得有必要改善或扩展都城的聚落结构。文帝（公元前 179—前 157 年在位）在其统治的元年，甚至下令所有非朝廷官吏和贵族离开。司马迁描述，在那时，文帝没有打算去增加宫殿或苑囿或城池的尺寸，或者增加狗或马的数量，以及服装和车马的数量。每当一些措施被证明是有害的，他立即废除，以便确保有益于人民。有一次，这位皇帝想起要建造一座开敞的台地，并召集匠人们一起商量。当告知要花费 100 担金时，他回说，100 担金有如 10 个中等家庭的财产那么多，因继承了前任皇帝们的宫殿，一直恐惧会有辱他们。建造这样一个台子有何意义？他对于不能尽用那些巨大建筑物而感到不安，就好像他是在批判祖先一样。

与他之前和之后的所有皇帝相比，他没将自己的陵墓建造在渭河北部，而是城市的东南，在灞河的西边。在建造其在灞陵的陵墓时，他全部使用陶器，不允许用金银铜或锡来做装饰，也没有建造高台，所有这些只是为节省开支，因为他不想驱使太多劳力，因此，司马迁结论性地描述他“以简约的生活方式，为帝国树立了一个榜样。”关于其坟墓特别朝向的选择，并未有何解释，但因为他母亲是一个南方的公主，也许他希望在母亲这一边，与祖先的灵魂建立一个联系。这一南方血缘，可能解释了他与众不同的原因。

公元前 164 年，文帝建立了一个新的庙宇建筑物，奉献给五域神灵，正如在朝向中的第五个方位所表示的那样，根据中国传统，“五”，是在中心的土元素。为五个神灵而建的庙宇，建造在渭河以北。它们有同一个屋顶，但是，每一位神灵有其自己的祭祀厅，每座独立的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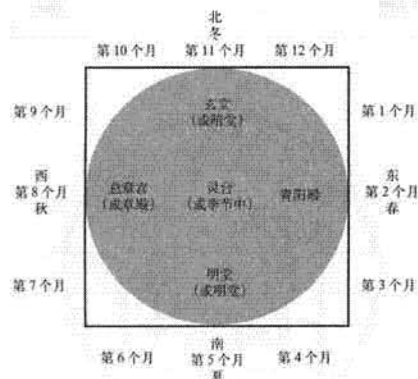
图 3.1.3.7 代表四极四个方向的神秘动物。摹自在四川发现的约为公元前 2 世纪的砖雕上的砖刻。成都四川省博物馆。上部为南，朱雀；左部为东，青龙；下部为北，玄武；右部为西，白虎。在中心的雕刻（镌刻）如此写道："长乐未央"，表明这墙上的雕刻，不只意味着一个装饰来装饰墙面或房间，而且被当作建筑物的吉祥物，它能保证主人生活富裕美好，这四个动物暗示着"所有的四方"

春天的第 1 个月，太阳处在某个位置，天子呆在左边青阳殿以左的房间，（在那里，他表演一系列的仪式并且给予适宜于春天的一些秩序）

春天的中间月份，太阳处在某个位置，天子呆在青阳殿中的太阳殿的太庙

春天的最后月份，太阳处在某个位置，天子呆在青阳殿以右的房间里

冬天的第 3 个月，太阳处在某个位置，天子呆在玄堂右边房间[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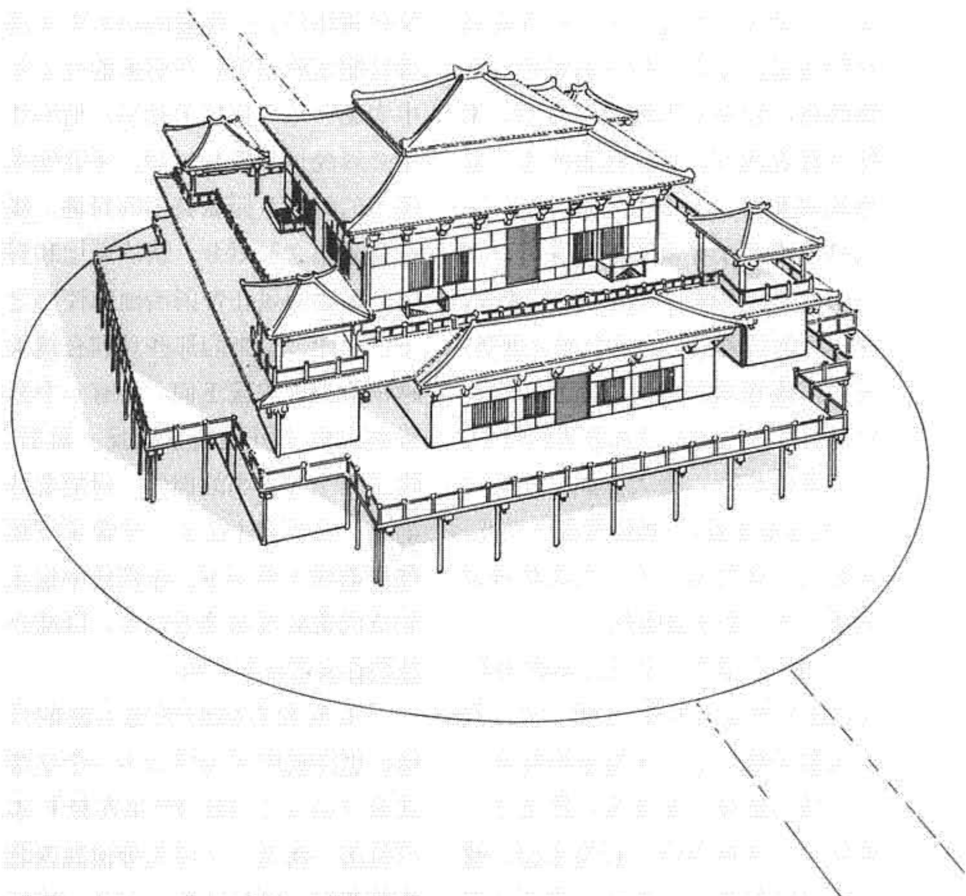


图 3.1.3.8.9 西汉后来的年代里，王莽在长安长乐宫南面所建的仪式建筑物的复原[2]。
3 层的建筑物，建造在一个土台上，它隐藏在底层大堂和连廊的后面，其一部分延伸直到二层。这个方形建筑，是建造在一个圆形基础上，直径 62 米，由夯土构成，是一个著名的方形和圆形的结合，阴阳结合的概念。最上面的建筑，被认为相当于明堂，古代的光明大堂，相信最先是由伏羲，这个传说中的文化英雄所建造。这一传说，也许与仰韶文化中，即我们在本书的第一章中所描述过的的"大房子"相关。虽然，明堂的使用，在历史的过程中被修改过，并最终转变成为其他的建筑物。在汉唐时代，它是一个复杂的仪典体系，被认为对于帝国势力合法化极具重要性(参见 4.3.1.85)。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公元前 3 世纪的一本著作，描述了皇帝根据月份和季节的日历，表演适当的季节性仪式，从一间房屋移入另一间房屋中，这个循环在一年内完成。这种描写与明堂的布局相吻合，这一布局被认为是幻方模式。这里，绘制有对于明堂各种房间设计布局。[3] 另一个与此建筑有关的，被称为灵台，被认为是仪式建筑物的一部分，用于观察天空，即天体的运动以及气候情况。考虑到"幻方"模式，以及将建筑物用作观测台，现作者已经对王世仁所做的复原（考古，1963/9）有所修改，即上层大堂中央的门上并没有中心圆柱，柱子的布置，完全依照布局的九宫格划分

1 公元前 3 世纪，吕不韦的《吕氏春秋》的摘录。
2 参见中国古代建筑史，北京，1980。考古，1963/9。
3 Nancy S.Steinhardt，"The Han Ritual Hall" Chines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New York，1984。

面对五个大厅的每一个，根据所祭拜的神灵，而描绘相应的颜色。五种颜色，分别为黑色代表北方，朱红色代表南方，白色代表西方，青色代表东方，而黄色则表示中心。司马迁描述了在夏季的第 4 月，文帝亲自去祭拜灞河与渭河的汇流处，并同时向渭河以北的五个神灵献祭。五神庙雄视南部渭河，而北方渠道已经被挖掘以引水进入急湍的湖中。当朝南献祭时，篝火点燃，光焰冲天。从城市来看，五神庙坐落在东北，正如司马迁所表达的，东北是神灵居所，西方是坟墓所在。

下一个皇帝景帝（公元前 157–前 141 年在位）的 16 年里，也没有对大都区域的进一步发展做什么贡献。他为祭拜父亲文帝，建造了一座庙宇，并在高祖的长陵东面，建造了自己的墓——阳陵。除了中渭桥和南渭桥（公元前 152 年），他建造了一座北渭桥，跨越在渭河之上，他鼓励人民，搬到离他的阳陵很近的小城镇，并许诺为那些定居在小城的人家，供给 200000 担粮，皇室忠臣，在皇帝死后，居住在皇陵附近新建的小城定居，是当时的约定俗成。他们在其主人的坟边度过余生，并在墓前的庙宇参拜，然而，有些皇帝，似乎没有如此多的忠臣，以致于必须建造一座小城。同时，在公元前 147 年，景帝在东边的郊区建立了一座哨卡，沿着渭河南岸的都城东部城墙外发展，直达那里的北门之外。

公元前 154 年，在帝国的东部，有几位诸侯王和太子谋反朝廷。谋反被镇压后，一项新的由大臣晁错设计制定的政策，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实施。每一位侯王死后，他的儿子必须经过重新加封后，才能继承侯王的封号，而新侯王的封地，要在其兄弟之间划分，新的领地和封区，需要归属在帝国治理的控制之下。因此，后来的那些只拥有越来越小的封地的侯王们，没有一个强势到以致于可能兴军谋反。最后，除了几个非常小的例外，封地全部消失。公元前 142 年，皇帝又将那些在都城无所事事、在朝廷中也无职位的贵族成员遣返回乡，以减小他们在大都市的影响。

王侯和贵族们桀骜不逊的性格，也许说明了为什么下一个皇帝武帝（公元前 141–87 年在位）不但抗击一次又一次侵犯帝国的西北蛮族匈奴，而且开始一次又一次地远征来控制新界并扩展势力。这些远征，使得那些武士贵族完全在帝国之外，并忙于持续不断的战争，也正好得其所好。这些战争和远征，占据了皇帝近 20 年的时间，在此期间，都城不断地发展生长。

帝国行政机构的数量，伴随着新政策增加，对受过更好教育的官吏和官僚的需要增长。公元前 135 年，皇帝因此成立了一种在都城可接受正规教育的太学。为了供应不断增长的人口足够的粮食，也需要良好的交通，因此，公元前 129 年，一条平行于渭河的运河，由大约 30000 囚犯劳力建造完成，将粮食运输所需的时间，从 6 个月减少到 3 个月。一座大谷仓，在离运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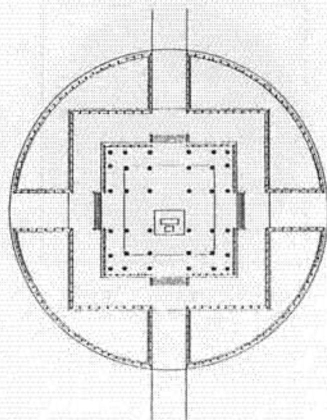


图 3.1.3.10　北京的文英殿，表示皇帝对于朝廷和政府的高级官僚读经释经，参见木刻，钦定书经图说，1906

图 3.1.3.11　北京文英殿的实际的布局，结合方形和圆形，即古典文学中的明堂和辟雍，比例 1 ： 1000

端头很近的城里建了起来。公元前127年，向大都区域北边长城附近移民大约100000的农民。公元前120年，大约700000来自山东的农民，因黄河洪水泛滥而失去了土地，也到了那里定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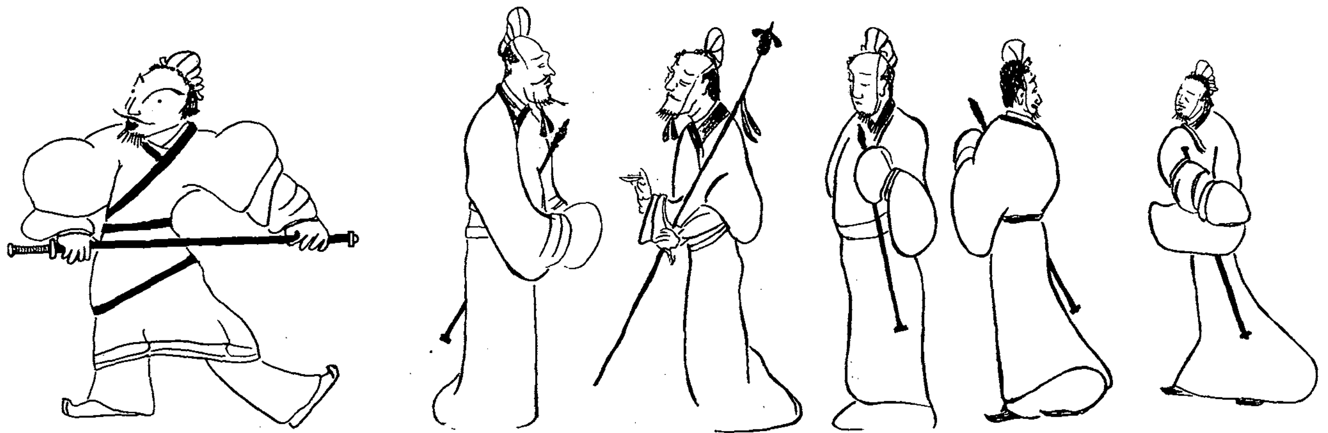
由于新的税制，大量财富在短时间内又聚集在宫殿里，储存在上林苑中的货物和资金变得不计其数，因而命主管水利工程的大臣来负责上林苑。苑中的财宝到这时已满，而又不得不继续增长。在被农民们使用了大约80年后，上林苑不久又得到重建。司马迁记述机构变得日益功能混淆，数量日增，而从各郡移居到都城的人，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从黄河下游运输400万担谷物到上游，增加官吏所买的粮食，这样才足以供应都城运转。从公元前116年起，帝国宫殿建筑日益奢侈，由此，也开始了我们所说的长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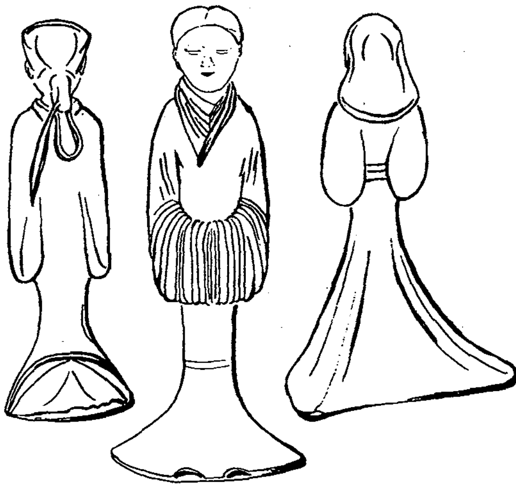
大约在这时，皇帝觉得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得到顺乎天意的预兆，祖先已经同意了他的所为，认识到自己具有举世无双的绝对权力之后，他的态度有所改变。这种认识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他确信自己可以到泰山，这个帝国最神圣的地方，施行神圣的献祭仪式，但是没人知道如何施行这种古代的献祭仪式。因此，公元前124年，他令学者发掘古籍，找寻适当仪式，遵守仪式规则，以便这个敬献仪式行之有效，不会因为错误而事倍功半，这种对古籍的兴趣，促进了公元前135年就已经成立的太学的发展，也导致了汉代对关于古籍的重整。

皇帝观念转变的另一个结果，是他对于幻术和预兆日渐增长的兴趣，特别因为那些术士声称它们能够延长生命甚至获得永生，这迎合了他早有的、获得不朽的想法。他若遵造这些预示去做，将是世上最强势、高贵、不朽的人。然而，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迷信问题，而是与当时最博学的人对宗教和哲学思考紧密相关的。基于周代诸子百家的哲学理论和受到汉武大帝帝国现实的启发，汉代学者们试图建立一个独一无二的思想体系，在自然作为一个总体的文脉下，既能解释宇宙也能解释人类生活。因为自然的力量，传统上一直与仪式和幻术联系在一起，而在前几个世纪中，太多的仪式已经丧失了，因而，新的仪式被建立了起来。其中第一批新仪式之一，就是如上所描述的敬献五灵的仪式，它是基于阴阳五行理论，在这时系统化正规化。其他的仪式包括对于神女，协天大帝，土地老，特别是对于炎帝，他们被想像为具有延长寿命的能力，并最终长生不老。结果，祭献坛和祭献地在很多地方、包括在城市和宫殿里建造起来。

公元前121年，在来自山东的道士法师少翁的带领下，在都城西北大约80公里的北山，建造了甘泉宫。这位道士赢得了皇帝的信任，但是两年以后被处死，因为他的许诺没有兑现，而皇帝本人发现了他的诡计。然而，皇帝已被巫师与天、与不朽神灵相沟通的想法所灌输。为此目的，他建造了柏梁台、由丝柏木料作为栋梁的台子，青铜作柱，并在柱顶树立一不朽的雕像，手中持有承露盘。这一结构，坐落在未央宫的西墙上，并俯视上林苑，这上林苑现在已被重建并添加了新宫殿和亭子。这个苑囿变成了皇家的狩猎园，并将城市向西和南扩展了大约60公里。在这里，皇帝与宫廷随从在秋天去狩猎，流连于这一景观，正如由司马相如（公元前178—118年）在著名的诗作《上林赋》中所描述的那样，他描述帝国狩猎，是对动物的一种残杀。狩猎，被认为是对于贴身侍卫的一种训练，虽然，大臣们总是宣称这是一种野蛮的胡闹，对于在最具文化的民族中心的世界统治者、这个极高权位的皇帝来说并不合适。但是，这种忠告，大多是徒劳的。而在2000多年的历史过后，我们可以补充说，仅有极少的人类统治者，听从过文化人的劝告。相反，大多认为，这种狩猎是皇室特权，并以此为荣。这些人如何能与当时伟大的汉高祖相比？他一度听从萧何的建议，开放了上林苑，并公开地为其以前的行为道歉。

与他的祖父文帝相比，皇帝是一个明智的人，对生和死自有认识—死是遵守天地秩序的一部分，并且是所有被赋予生命的一种自然结局。武帝，在其狂热地渴望不朽的时候，将自己置于最不理性的所谓“巫师”的影响之下，并给予他们官阶头衔及丰厚的报酬。在不超出几个月的时间内，栾大，一个巫师，就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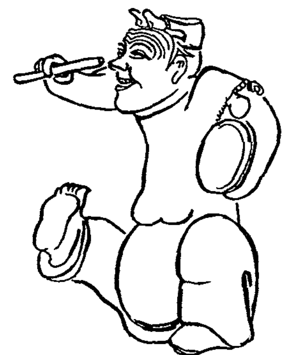


图 3.1.3.12，13　公元前 50 年左右西汉朝代的绅士，参考在洛阳墓中砖画（汉画像砖），今天存于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1] 并参考公元 2 世纪张衡的《西京赋》（长安 126–130 时段）中的描述

图 3.1.3.14　西汉优雅的女士

图 3.1.3.15　在东汉洛阳朝廷中的高级官吏，河南密县公元 2 世纪的墓壁画，洛阳东南 90 公里，参见文物 1977/10

图 3.1.3.16　来自中国北方的农民，汉代"黑首人"，来自陕西的一座墓

图 3.1.3.17　带鼓的说书人，四川成都东汉年间在天水山出土的坟墓中的一个泥人形象

像皇帝这样的观众。身佩六印，并被封为五利将军，而他所获的荣誉，震惊了整个朝野……此后，沿海一带的齐国和燕国的方士，云集京城，兴奋地指天发誓，声称也能请到神仙，并使人长生不朽。栾大毫不迟疑地发出宏誓，绝不暴露和怀疑自己所说的不是事实。然而这次，仅仅只几个月，皇帝就在公元前 113 年将他处死。

这些年里，汉军向南挺进，公元前 110 年，征服了南粤，不久后，守护巫师从南方而来，并提议建造尽可能高的塔，以吸引神灵并获得不朽。皇帝立即命令在长安建造了飞檐塔，在甘泉宫建长命塔和增寿塔，宫殿在此情形之下已经扩展，并从此以后用于大众和政务。公元前 104 年，在未央宫两侧的柏梁台被烧毁，而来自粤的大臣提议"根据粤的习惯，每当有一场大火而建筑物进行重建时，它们必须比以前更大，以克服邪恶的影响。"结果，一座新宫"建章宫"在上林苑西墙之外建造起来，20 里 ×30 里大小，大于一座城市，前殿甚至比未央宫的前殿大。代替以前的台子，凤凰塔被建造了起来，大约高 20 丈（46 米），并有一座花园，其中养着华南虎，宫殿的北面是昆明池，有仙岛蓬莱、方丈、瀛洲和壶梁。宫殿之南是灵台和巨大的木楼阁塔，50 丈高（115 米），皇帝期待在这高塔能与神仙交流。希望神仙能够在这宫殿中陪伴着他——一个不朽的居所——而这不是凡人可以发现的和平之地。正如班固（公元 32–92 年）在他著名的诗篇中所说，而张衡（公元 78–139 年）在他的诗中问道：假如果真有可能世世代代活着，为何如此狂热地建造陵墓呢？皇帝此时年届 50，天命之年，也许正经历着我们如今所称的中年危机。

与此同时，在城墙之内旧宫殿群北面，建造了三座以上的宫殿。桂宫是未央宫内宫的扩展，在桂宫边东侧的北宫，与两座较老的宫殿相连，也许用作仪式和政务。最后，明光宫，因其内部的奢华而著名，坐落在长乐宫以北。为了这三座宫殿的建造，在城墙之内，占用了居住区作为拓建区域，很多家庭被重新安置到别处，主要在东郊，向东延伸大约 5.5 公里，直到临近灞水河岸建造的外东门。然而，大概因为是帝国的控制，大市场依然在城内。

如我们以上所见，大都区域除了都城外包含几个其他城市聚落，它们坐落在皇陵附近。早在公元前 127 年，大臣就建议皇帝，陛下的陵墓既已在茂陵郊区建起来，就应该聚集整个帝国富裕和有势的，以及那些经常制造麻烦的家族，将他们安置在茂陵。这样就可以增加都城的人口，同时避免邪恶的传播和郡中罪恶发生的途径。不用惩罚的方法而避免了危险。结果，皇帝命令那些财富超过三百万吊的人搬到他在茂陵的城中。这些陵边之城，有城墙和门，就像其他城市一样，包含有几千个家庭。外面的农田长时间免征税收，例如，在长陵城，公元前 195 年，高祖埋葬在那里，住在此地的农民的免税待遇，持续到

1 Museum of Fine Arts, Waldo Ross Collection

公元前142年。其他人的墓，那些不太重要的人物也有其聚落。“一个有300个家庭的公园和村庄被建立了起来，有一个监管人、助手和次级的官吏来照料他的坟墓，敬献食物到他的坛庙前，根据法律法规来献祭”。这是司马迁对文帝外祖父在浙江绍兴的坟墓的描述。公元前195年，高祖甚至指派20户人家到始皇陵，因为那里没有留下任何后人来照顾陵墓，并施行适当的献祭仪式。

武帝71岁辞世，是到他为止的所有汉代皇帝中最高寿者。至少，他成功地延长了寿命，他的统治时间也是到他为止最长的，共计54年，将汉代的疆土拓展到最大限度，帝国内外终于建立了和平。在接下来的80年中，军队能够有效地保卫疆土，而且领土内保证了和平和秩序。然而，宫廷中有成千的怨妇和狡猾的宦官，相互间为财富和势力而倾轧，帝国的法律在宫内无法执行，宫内日益陷入阴谋和犯罪中。最后，由于这些母亲、寡妇、夫人、姐妹和女儿们的聚会闹事，王莽在公元9年颠覆了汉室并建立了新朝。他的理想，就是重新建立周代的制度，他曾借助汉代对古籍的重整而理解了周制。在都城长安发展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在城南建造了一组建筑物：明堂、辟雍、灵台与原来武帝所兴建的儒学太学，一起被认为是周王们的神圣建筑的精确翻版。值得注意的是，明堂，这个主要建筑物，是以神奇的方形模式布局的。正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匠人们被要求遵循周代的规则，就如在《周礼》中所编订的那样，以表达重建周制的急切目的。王莽急切需要使自己的篡位合法化，他强调使用周的神圣法则，而看得见的结果就是这些建筑物。

长安城已经一步步地发展到公元最初几年西汉末期，经历了四个时期，就是被后来几代诗人和文人，例如班固和张衡所描绘的长安。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至少，他们可以依赖老一辈人的观察。我们在这里引述一些他们的描述，某种程度地来表现一下在西汉末这个大都市区域人民的生活。这个城市和郊区的布局，每边有三门，从此延伸出平而直的三条街道，是那么宽，可以同时并行12驾马车，道路以直角相互交叉。一排排的房屋是笔直的，屋檐具有同样高度。宫殿北部是上等房屋；若通过门望去，可以看到武器，通常存在帝国的武库里，排放整肃。在这些大堂中的木材装饰如丝绸般华贵，墙壁漆成红色和紫色，犹如帝国的宫室。商人家庭着装华贵如帝王的后裔，用餐时鸣钟，他们用青铜制器吃饭。市场早在公元前189年就已建造，当时，城市向北部扩大。9座市场中有官兵守护，中心有5层高的望楼，在那里守卫，可以俯视市场内的上百条街巷。卖者有成倍的利润，买者也无空手而归。挑担的商贩，出售以次掺好的货物，愚弄乡里农民。车多得无法转弯，城挤满了人，涌出郊外。路两边是成百上千的小店、驻店与旅馆。

作为学术中心，长安拥有大批

图3.1.3.18 在汉代历史过程中，书法的发展。
A.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的泰山诏书的石刻碑文，在山东的圣山泰山顶的石头上。
B. 西汉的印，所有都以小篆体写成，在下面是吕后之印（公元前188—180年在位），左边的是长沙王之印（公元前193—168年），右侧是云南国滇王（公元前109年）之印。
C. 公元16年的石刻，为著名的莱子侯篆刻，以隶书体写成，与王莽齐名。
D. 在山东曲阜孔庙的礼器碑，公元156年以隶书体写成。
E. 曹全碑，公元185年在郃阳令的石刻碑文，以非常和谐的书法写成，表示了娴熟运用毛笔以隶书体书写的碑文。所有的石刻碑文是以相应的石拓片的再制

始建國天鳳
三年二月十
三日萊子侯
為支人為封
使偖子食等
用百余人後
子孫毋壞敗

臣請具刻
詔書金石
刻因明白

滇王之印

軑侯之印

皇后之璽

承志存亡之敬
禮無遺闕是以
鄉人為之諱曰

顏氏聖舅家
魯親里并官
處在安樂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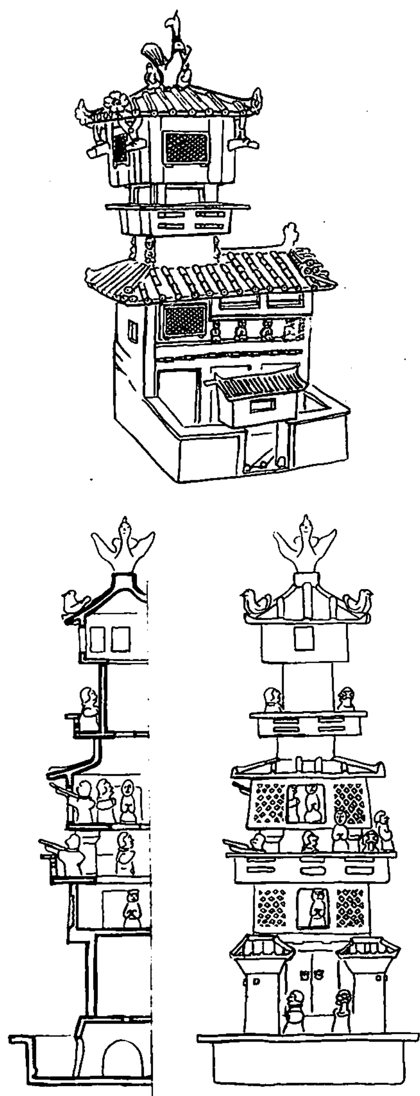


图3.1.3.19 公元150年，河南东汉灵宝县张湾2号墓，带有望楼的贮藏建筑的泥模，河南省博物馆，郑州。注意其非对称的布局和建筑的构成

图3.1.3.20 一个6层塔（3个双层楼），大概具有宗教功能，正如在3.1.3.3所示。参见考古学报，1965/1。左边，内部安排有开窗的楼层，连接了5个上层的房间

学者，随时就任何题目开展辩论。他们在街头巷尾，披头散发，放浪形骸……事业奋进的，与那些憎恨奋激的、还有无业者碰撞竞争。西汉最后几年那里多达几万的官僚候选人。那些具有能力获得金榜提名的将在社会阶层上提升，并惠及子女。其他人，如果是官吏家庭，也许容易沉浸在当时的学术无产者之中。再就是富商百万、落寞贵族、流氓、落伍的学者，这些都是社会秩序的一个侧影。

为了便于治理，大都区已经在公元前116年被划分为三个府。为此被叫做“三府”。中间的府包含城市。公元2年的统计数字中，大约有80000户人家，296000居民，这基于平均每户3.7人的平均数，但是，整个郡的数目是平均每户4.4人，总数则变成352000居民。城市被分成160个巷坊，叫做闾里。每个闾里通常是由100个家庭组成，约16000户，60000到70000的居民，可能分布于城墙内外。宫城总共可能包含至少20000–30000的居民，剩下的多达250000的人也许分散整个府城，覆盖整个渭河下游河谷，至黄河的汇流处，其中大约1/3的人也许属于城区居民。12座陵墓较近的城镇属于其他的两个府，茂陵城包含61087户（277277人），长陵城50057户（179469人）。这大概又为大都市区域都市集合体增加了大约440000的城市居民，大约为整个三府居民人数800000–900000的一半。

公元11年，黄河决口，洪水泛滥之后转道流入旧河道东南的一条新河道，大约有几千平方公里为泥沙覆盖，冲毁了大量农田。之后，叛乱在各处爆发。上天仿佛和人商议好了一样地从事杀戮；各地都加入讨伐王莽的行列，长安没有房屋完好地留下来，尸体遍布乡村，河水泛滥，秦与项羽（公元前207）战争的灾难也不及这一半恐怖。公元23年，王莽被杀死于宫中，那就是长安帝室的结束。新的皇帝，刘秀，后来著名的光武帝，于公元25年建立东汉，并在洛阳建立宫室。然而，重新恢复和平后，长安聚落区域的一部分得以重建。甚至有宫殿在公元43年也准备来使用，几个3到6世纪时期的短命朝代，在长安建立了行政中心。但是，几乎用了600年，大都区才又转变成中世纪不但在中国、而且在整个世界最为高贵而且是最大的帝国宫殿。这个隋唐朝代的长安，将在以下章节进行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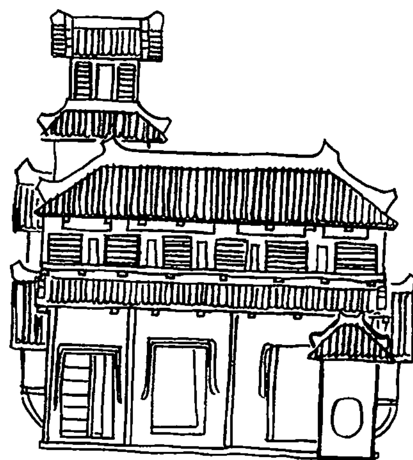
3.1.4 东汉—都城洛阳（公元25–2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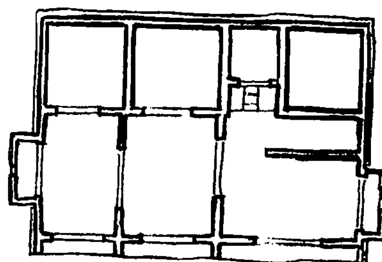
王莽曾经指定洛阳作为他的东都，长安为西都。根据他对于周代历史的诠释，如此这般建造两个都城，也就是以周的第一批君王们为崇高的榜样。他选择洛阳作为都城，显然出于他对神圣威望的期望。但是，当东汉的第一个皇帝光武，在公元25年于洛阳建立他的新都时，虽然他也赞美圣地洛阳的尊严，但肯定有更为实际的原因。

东汉的建立者，出身于帝王之家的一个分支，其在河南南部的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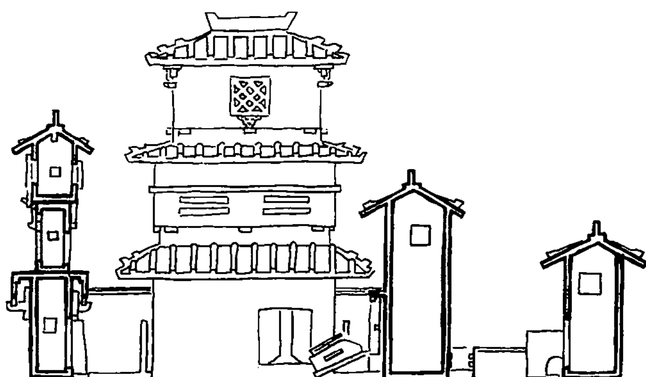
图 3.1.3.21 有 2 个合院式建筑，并具有几个不同建筑物的泥模型，大概是东汉时期一个大地主的宅第，陕西棉县的一座坟墓出土，于北侧有 3 层主要建筑的庭院，南边是一个门房，西边是一个较小的 3 层房屋，东边是有楼梯的贮藏建筑。在这后面朝东，第二个院落有一个猪圈、另一个围合体和贮藏间或仓库[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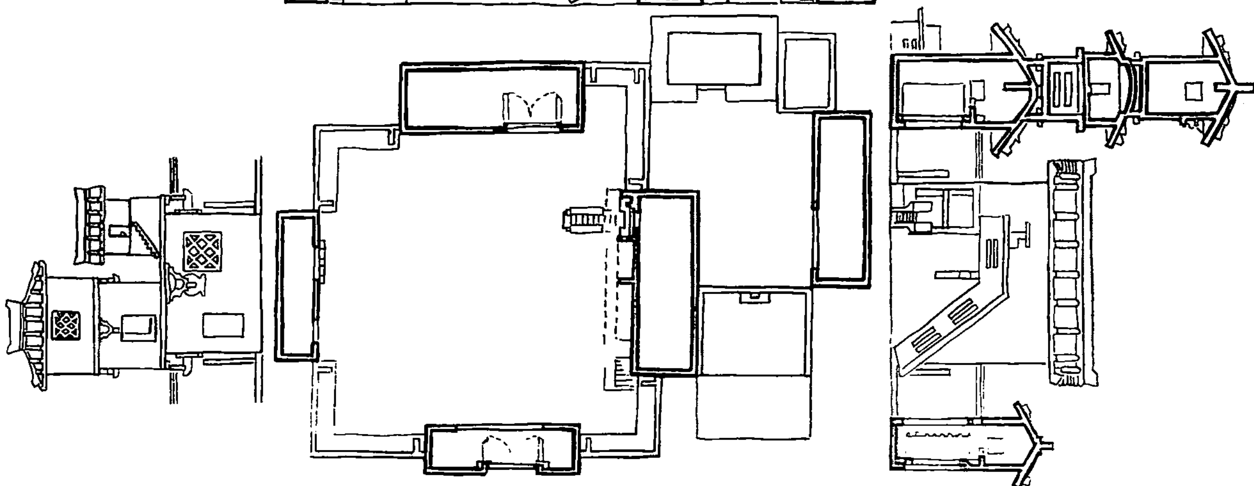
图 3.1.3.22 一个前面有望楼和门房的建筑，出自湖北云梦的泥模型。这大概是乡村地主府邸的主要房屋，显示出舒适的布局，有各种房间，有一个厕所和带阳台的窗户[2]











1 参见考古，1985/5。
2 参见江汉考古，1982/1。

阳一带拥有大量的财产。南阳当时是最富裕的农业地区之一，同时也是生铁冶炼和加工的中心。他的继位是由大地主们所支持的。他们的财产，都坐落在帝国人口密度最高的肥沃的中央平原。从公元 2 年的统计数字，我们可以计算那时依赖这些豪强家族的人数。在总共 5760 万人中，大约 1340 万生活在 23 个封邑和 187 个领地中，受富豪地主、太子直接管辖。这不足人口的 1/4。公元 140 年东汉后来阶段的统计数字报告，总人口 4910 万中，有大约 1500 万人口生活在 19 个封邑和 95 个领地中，这次已经占了大约 1/3 的人口。这些数字，并不包括其他地主家庭的佃农，他们不是贵族成员，而且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豪强家族控制几乎一半的人口。因此，这或多或少是自然的，新皇帝在这地区中建立宫室，某种程度上，政治上的集团，象征那种旧的周代都城在周代开始时期的洛阳，以与长安的坐落布局产生对比，正如我们以上所见。

几个因素，有助于进一步加速豪强家族和地主财产的进一步发展。朝代重建以前的战争和反叛，已经毁灭了百万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公元 57 年的统计数字虽不十分可信，至少给了我们一个关于人口丧失的量值概念——在 25 年里大约为 70%，有 2101 万人生活在 427 万个家庭中。巨大的区域，成为大财团控制的适宜地段，这样能够比农户们更有效地保卫自身在灾难中生存。新皇帝光武的私人财产，在南阳地区受到坚固城堡的保护，城门上方有望楼，城堡内甚至包含有一个市场，以保证守护者和士兵们的生活所需。此外，皇帝欠其同伙地主们和他的支持者们的债务，使他不能干涉这些人的财产增长，更别说减少他们所有权的规模了，因为大多数地主们，是农业方面的专家，有兴趣于土地开垦、土壤改良、排水、灌溉及提高农业技术，各个州（郡）非常迅速地从灾难和毁灭中恢复过来，因而又提供给地主们以充足的生活资料。

这一生长过程，加速了自给自足，加快了那曾经阻碍城市经济潜在增长的落后经济的发展。以前汉代的聚落体系（系统），变得更为显著，城市和乡镇一般来说只作为行政中心，由帝国官吏及其家族居住，某种程度上，仅仅那些继承了某些经济重要性的大城市，设法保留其经济的重要性，特别是那些贵族府邸和王侯府邸所在地。但在整个帝国，这样的地方，绝不多于 16 到 18 个。在一些情形下，其经济重要性基于某些特殊产业，如在四川成都的漆器和锦缎工业，或者在山东临淄的丝绸生产和冶铁产业，供应全国或更多地方。

到公元 140 年，当整个国家已经从损失中恢复，人口的分布已发生急剧变化。长江南部地区经受了来自北方的巨大人口流动。当长沙国大臣的次子被埋葬时，长沙国大约有汉人 25000 户，最多不超过 150000 人。大约 160 年之后的公元 2 年，人口增加到 530000 人。到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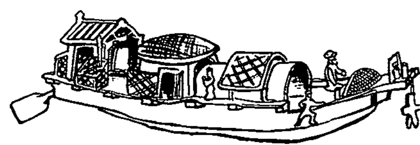


图 3.1.4.1 在广州东汉墓中的一个河船的泥塑模型，现存广州历史博物馆。撑篙用以推动船溯流而上的方式，可以在甲板仓房的两侧看到。那里收起了的双层桅杆，可以升起用于航船。船尾可见舵，正如锚以弓悬挂住一样

图 3.1.4.2 在福建省九龙江上的船，与广州的泥塑模型几乎是同样的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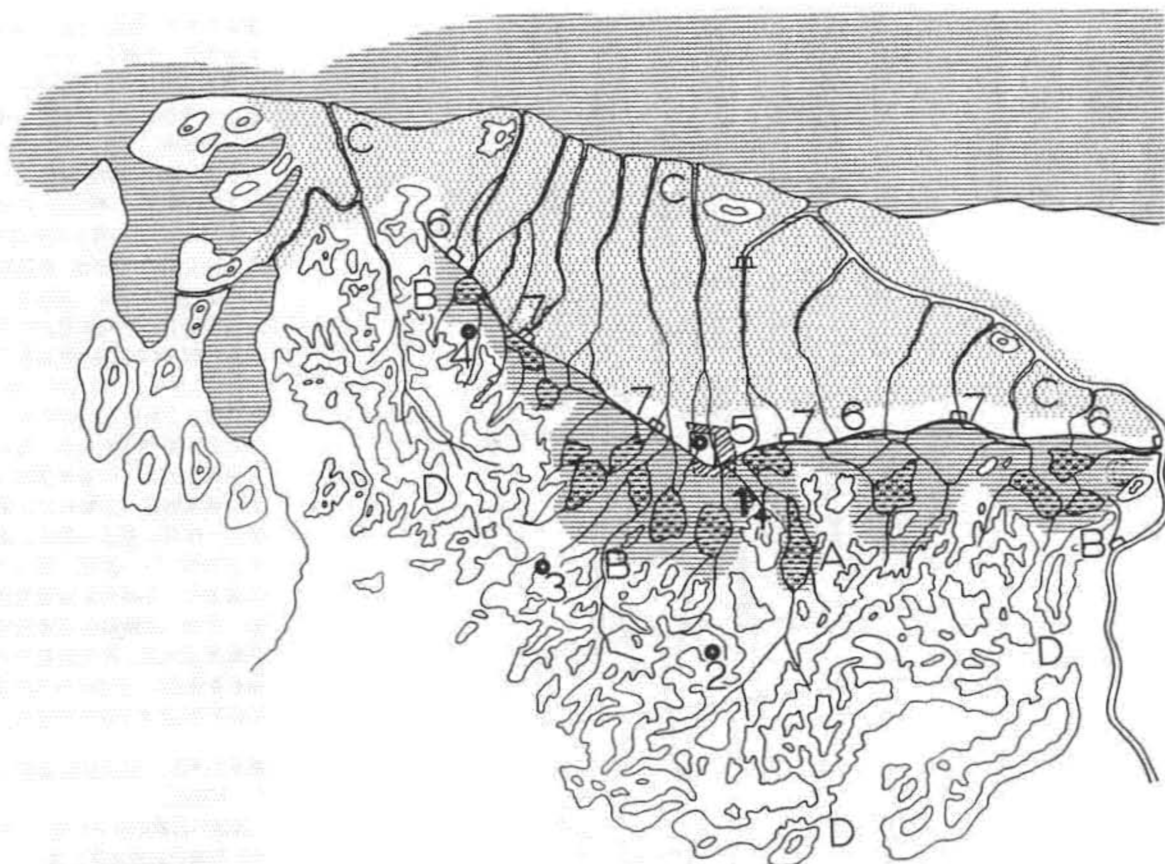




图 3.1.4.3　今日绍兴城附近浙江省的北部平原上的洪水控制和灌溉的项目工程，即著名的"鉴湖工程"比例 1：400000，参见绍兴史话，1982。

公元 142 年，该工程为了更好地实现农业的淡水控制供应而实施。它将洪水泛滥的沼泽地变成了高产的稻田。山脚下各自独立的湖泊（A），由一座长堤结合起来（6），形成一个新湖（B），以供应新的农田（C），通过大量的灌溉水，而进入湖堤之中（7）。这个体系的中心就是绍兴城（5），其他有意思的地方，包括推想中的夏代建立者大禹之墓，传说他与这个地方的一个女子结婚（1），三座以前的城市，坐落在会稽山（D），越城（2），"苦竹"城（3）和旧城（4），河姆渡新石器村庄，正好位于河流之东，地图右侧以外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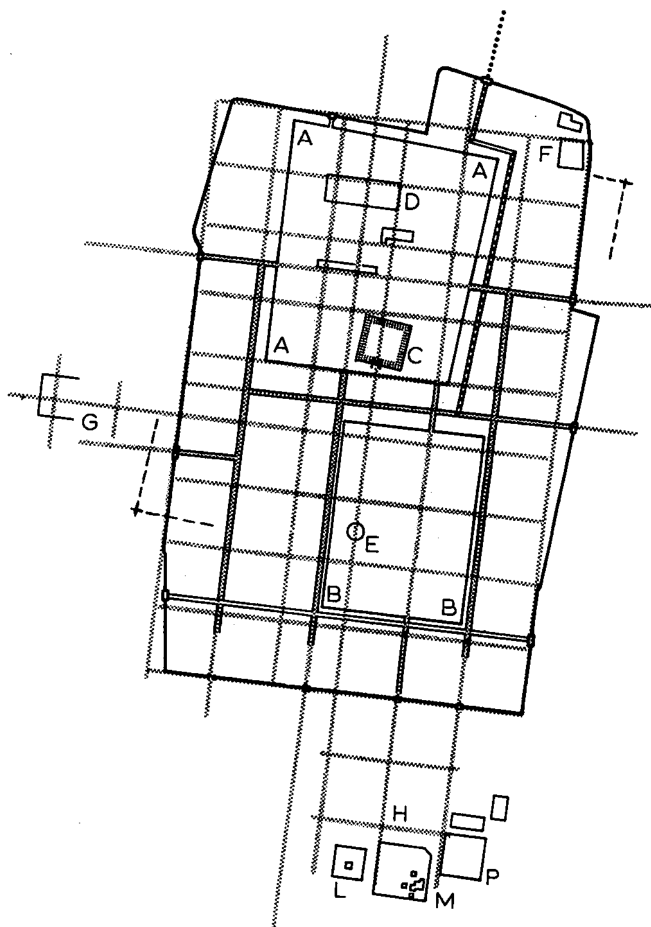


图 3.1.4.4 东汉(公元 25–220 年)的帝国都城，河南洛阳，比例 1：40000[1] (参见 2.3.1.8)。当成周，这个古代周代神圣之王都被重建并转变为东汉帝都时，它包括几座老建筑和旧城墙的一些部分，它们在 300 年之前周代末就已经存在了。这个旧的宫殿建筑区 (C) 被融入新的北宫区域中 (A) 相结合，而周代的宗庙 (太庙) (E)，那里最后的周王们曾经居住过，现在变成新的南宫(B)的一部分。新建筑物沿着轴线布局，朝向更接近南北向，那些在旧城墙基础上所建的新城墙，给予有围墙的区域以某些不规则形状。然而，这种转变，是基于东汉的度量体系 (1 里 =415.8 米，1 尺 =23.1 厘米)，即 6 里 ×9 里这样一个格网，而被称为“九六城”，两者都是适合王室的吉兆数字。看来在这里，半里的方格单元也用于布置街道和城门，这是汉代规划的通常特征，正如在旧宫殿边上置新宫殿的做法一样 (D)，稍迟一些的加建在东北角的区域，包含武库 (F)，并且应该也包含在围墙围绕的区域之中。在墙外东南方加建有 (H)，包括明堂、灵台、辟雍的仪式建筑群，以及一座新的宗教类型建筑。那是据我们所知的中国第一座佛教寺庙(G)。于明帝统治时期(公元 57–75 年)的公元 63 年建于城市的西部

图 3.1.4.5 东汉都城洛阳的城市聚落，比例 1：40000[2]。

I. 成周旧宫殿的坐落位置；II. 周代末成周宗庙(太庙) 和南部宫殿坐落位置

a. 上东门和石桥，b. 中东门，c. 耗门，D. 开阳门，E. 开城门，F. 小苑门，G. 津门，H. 广阳门，J. 雍门，K. 上西门，L. 夏门，M. 谷门，N. 青龙宫门 O. 北宫门，P. 玄武宫门 Q. 东光宫门 R. 朱雀宫门，S. 北宁宫门。

A. 北宫，B. 南宫，C. 永安宫，D. 武库，太仓和雉泉。

E. 汉代宗庙(太庙)和社稷坛，F. 太尉府、司空府、司徒府，G. 金市，H. 先贤庙；X–X 洛河；Z–Z 伊水。

1. 灵台；2. 明堂和辟雍；3. 太学；4. 浮桥；5. 天坛；6. 南坛；7. 中坛；8. 白马寺；9. 宰相刘歧的府邸和花园，公元 159 年被处死；10.Lodge of Tranquil Joy；11. 西坛；12. 地坛；13. 北坛；14. 行刑军演之地；15. 六？坛 Altar of the Six Venerable Ones；16 圣地 (皇帝的躬耕之地)；17.Ever Full Granary and Market；18.Office for the Boat men on the Yung Canal；19. 郊门；20. 东坛；21.Altar of the Supreme Intermediary；22. 羊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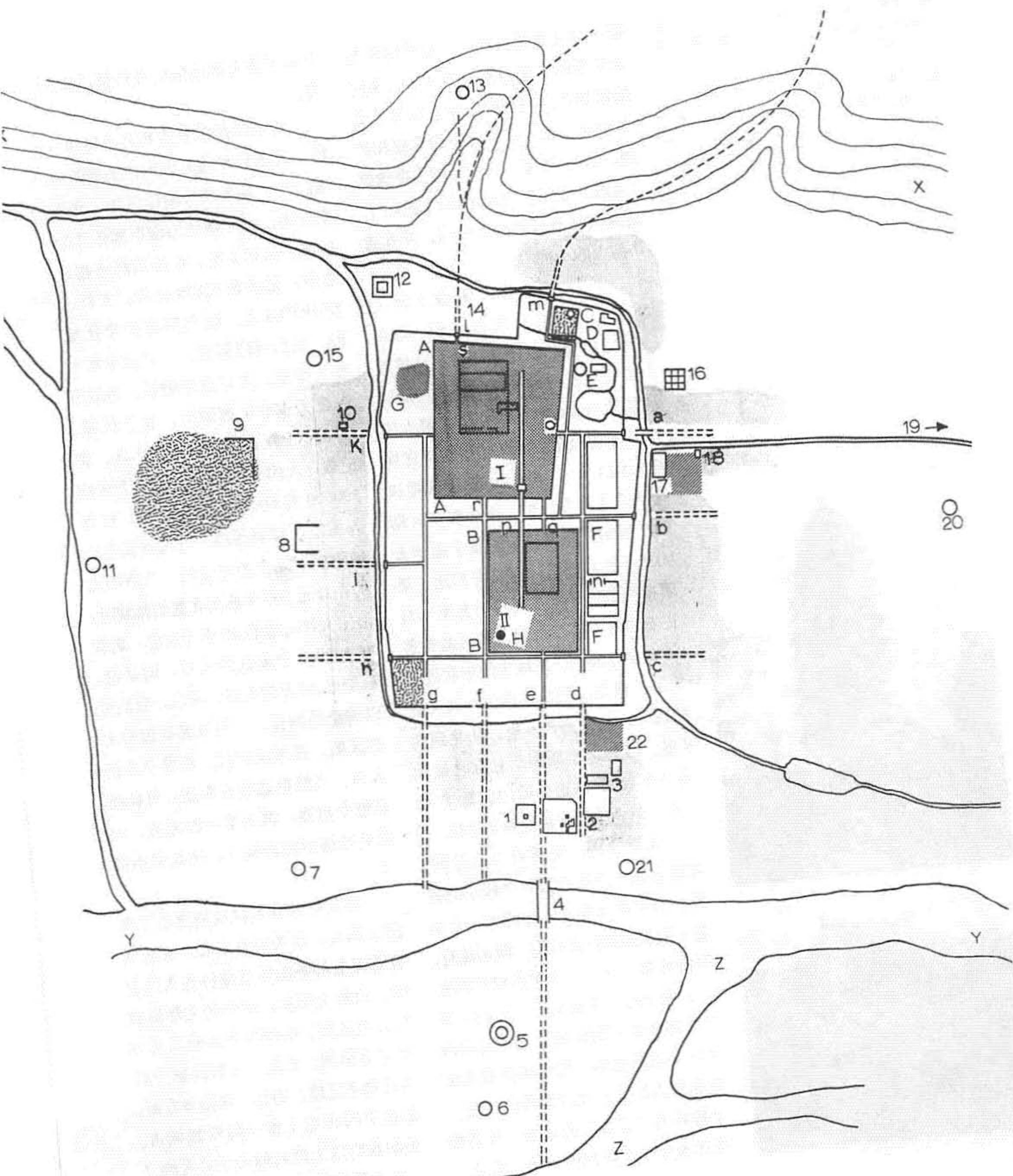
元 140 年，已经有 2562000 人居住在同一地区 (公元 156 年后，长沙国被分裂为 3 个领地)。那是 138 年内 500％的增长。公元前 160 年，长沙国已包含有 13 个郡 (府)，每一个都有一个行政中心，其中大多数大概以栅栏或竹篱笆加固，但没有墙。在公元 140 年，后来的三个领地，如以前的帝国一样覆盖同样地区，除了三个领地中心外，还包含同样类型的 30 个区域中心，但是，仅有 3 个可以被认为是城镇。那些非常小的中心，则肯定覆盖不足 1 平方公里的三分之一的面积。

这种流动，改变了人口的分配——长江以北的人口损失超过 1700 万，而长江以南大约获得 900 万人口——对大量土地的增加作出了贡献。在北方，取而代之的是废弃的农地，或以前洪涝区的再生。在南方，在那些已经安居的地主们的领导之下，新移民们开始发展农业。

都城洛阳在朝代重新建立后迅速成型，但是，既然旧周都城大量遗迹依然存在，新皇帝当然感觉不到自己已经创立了一座全新的城市。有两座旧的周代宫殿：位于原周城中心的北宫和南面围绕着祖先庙宇的南宫。公元前 202 年，汉高祖使用过南宫，它曾经在秦代吕不韦时

1 参见考古 1973/4，1982/5，1988/9 的考古发掘平面，及 Wang Zhoushu，Han Civilization，New Haven，1982。

2 参见 Wang Zhongshu，“汉代文明”，New Haven，1982 Hans Bielenstein “后汉时期的洛阳”。



13
X
12
14
m
C
D
A
s
L
15
E
G
16
10
9
a
19 →
K
I
18
17
A
r
20
B
p
q
F
b
8
11
I
n
II
H
B
F
h
c
g
f
e
d
22
3
1
2
7
21
4
Y
Y
Z
5
6
Z

图 3.1.4.6　中国最早的著名佛寺，白马寺，名称起源与传说有关。现存建筑，像这座砖塔，大约 1000 年后建于 989 和 1125 年的唐代

图 3.1.4.7　白马寺的"凉台"，为僧人图书馆的基地，也许它当时就已经是最老的布局和结构的一部分。它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于公元前 1 世纪）将印度箴言和其他佛教典籍译成中文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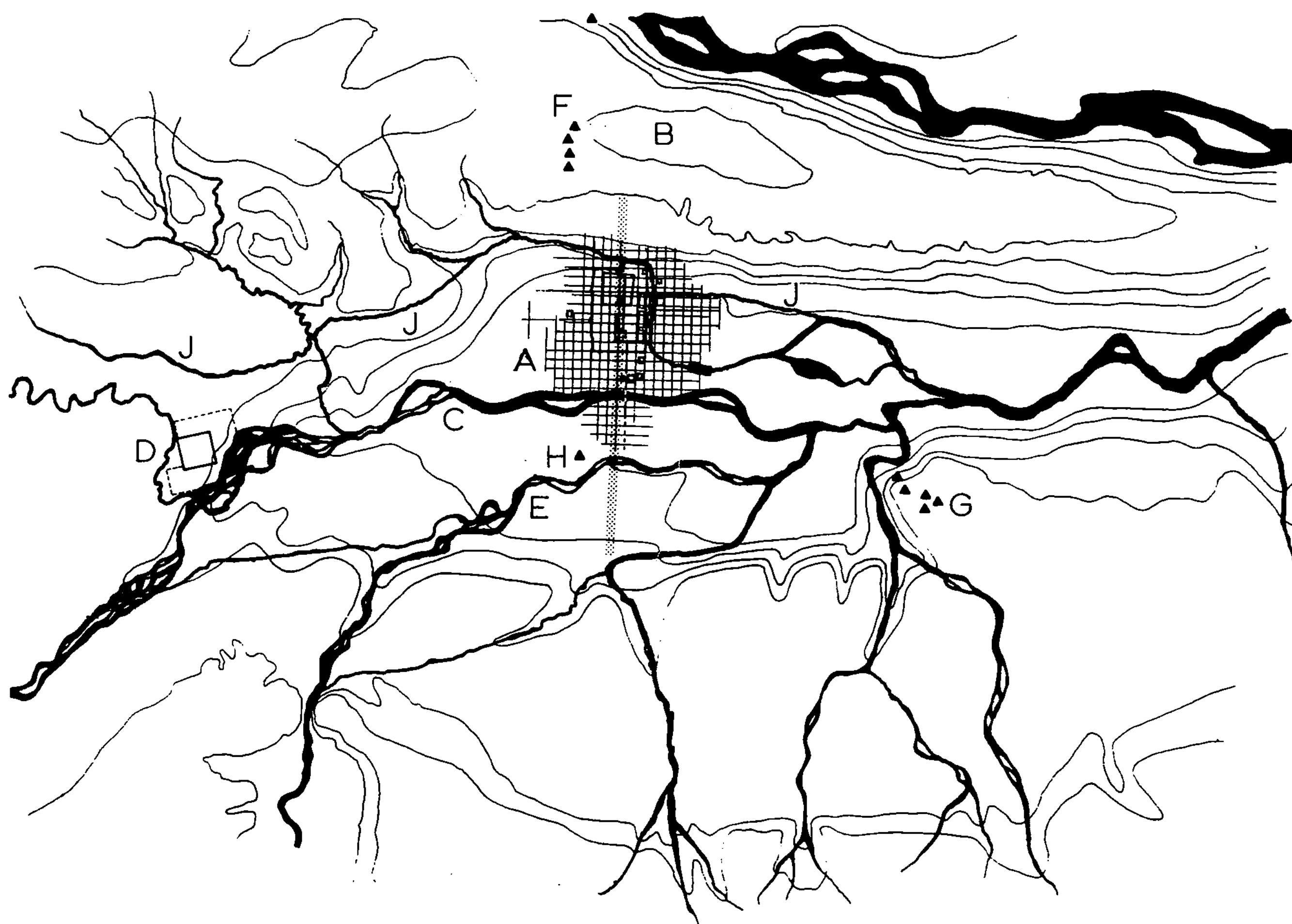
期进行过重建。现在，它被用作光武皇帝的主要宫室。当城市后来向南延伸直达河岸时，南宫获得了更多空间，而进行了奢华的重建和扩建。公元 38 年，内厅、即主要建筑（大殿）完工。宫殿的南门是大门，通向河畔新城墙的大南门，并直通洛河上的小桥。

下一个皇帝，明帝（公元 58–76 年在位）在公元 60–65 年之间，扩建和重建了北宫。从接近旧的周代宫殿地区开始，该宫殿区被延伸到北部城墙，终于覆盖大约 2.05 平方公里。而扩建后的南宫规模大约 1.3 平方公里。旧周城规模大约 7.3 平方公里，但在明帝时期的扩展后，东汉城市的整个面积大约 9.5 平方公里。与长安相比，洛阳相当节俭了，在规模上甚至不及长安的两座西汉宫殿，其总共覆盖 11.0 平方公里。新城市的形状近乎矩形。根据汉的度量单位，其大概的尺寸，从东到西 6 里，从北到南 9 里。因为这个原因，它有时被称为"九六城"，正如城门的数字 12 一样，这两个数字都是神圣之数。

北宫之西，坐落着皇家苑囿，北宫之东，坐落着另一个较小的宫殿，永安宫以及太仓和武库，东南是三座最高的行政机构，即司徒府、司空府和太尉府。帝国宫殿和都府占了城中的一半面积。高官们主要居于环绕南宫的区域；其东北的两个区是很著名的，那里居住着高级将领和大臣。在北宫的西南，是一个被称为"金市"的市场，其名称也许表示了奢侈品的市场，也是一个外国商人展示他们进口货品的地方。

正如汉代的长安和其他城市一样，大多数普通人居住在东西两边城门外，并在渭水南岸以外。有两座市场，河外南郊的南市和东郊的马市。公元 2 年，在洛阳都城建立之前，记录有 52839 住户，人口达到 195504 人。这当然是整个区域的。我们可以假设，一旦这个城市变为帝室，人口也许增长。当洛阳在公元 190 年被毁时，整个区域，变成了 100 公里之内的无人区。据记载，大约 100000 个家庭，有大约 500000 到 600000 人被处罚，百万人被迫迁移到西部，进入到长安区域附近。几个世纪之后，当洛阳大约在公元 500 年成为北魏的都城时，洛阳大都区域的 80 平方公里，据载有 109000 个家庭的人口，即是说，有超过 50 万的人口，所以，我们可以安全地假设，洛阳及其周围的大都区域，在东汉时代，是整个帝国人口，当然也是所有东亚，可能还是整个世界，最为集中的地方，虽然其城墙围绕的城区，比长安小得多。

但是，并非人口规模决定了洛阳之伟大。作为世界中心，它依然有着无数神圣的特性保持在人民之中，由最文明和仁慈帝国文化原则与自然法则，取得与宇宙的崇高力量完全协调。它是一个时间赋予的古代神圣之地，而且，在很多方面，是在中国历史上惟一的理想城市。正如我们以上提到的关于是否确立长安为都城的背景。公元前 2 世纪，



就已经出现有关于两个城市不同情况的争论。这争论，在公元2世纪又重新出现于洛阳居民、史学家班固（公元32–92年）和宫廷天文学家张衡（公元78–139年）的诗句之中。根据这些诗，长安通过在西汉时武力的扩张无辜地消耗了大量人力于宫廷奢华中。而洛阳，因东汉的适度和崇尚简朴、睿智地顺应神圣的平面。因此，形成了一个平衡的城市。两位诗人的诗词，一个支持和捍卫长安，而另一个则支持和捍卫洛阳。最后，来自长安的人声称自己为“粗鄙之人，缺少辨别力，从今后将知道，大汉之德的踪迹都包含在洛阳。”可见，我们今天认为东汉是西汉的直接延续，而当时的人并不这样看，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两个时代之间在原则上和哲学上的基本区别。这种区别体现在两座城市的布局和建造之中：长安，作为军事独裁的都城，被秦合法的物质主义毒素所侵蚀；洛阳，作为某种神权的都城，由已经确立的良好和公认的法律所统治；皇帝用人民的信仰而不是依靠军事力量来捍卫。

以上的赞誉，不仅是诗词方面的夸大。在东汉历史上的那个时候，

图3.1.4.8 拥有东汉首都洛阳的河南洛河河谷，比例：1 ：250000。
A. 洛阳有城墙的城市及其市郊，“阳”这个名字因其坐落山之南；B. 邙山和河之北；C. 洛河，而得名，在邙山之北流淌的是黄河水；D. 河南府城汉代王城废墟，古老的西周城，洛河主要的支流南部是伊水（E），F 北部的皇帝之陵，分别是：明帝（卒于75年，在北方近黄河的地方）、灵帝（卒于189年，最上面的）、安帝（卒于125年）、顺帝（卒于144年）和衡帝（卒于145年）；G. 东南的陵墓，有光武皇帝（卒于57年，近伊河处），章帝（卒于88年）和帝（卒于106年），殇帝（卒于144年），质帝（卒于146年），桓帝（卒于168年）的陵墓。H. 陈平之墓，他是西汉的建立者高祖的一个大臣（公元前206–195年在位），逝于公元前17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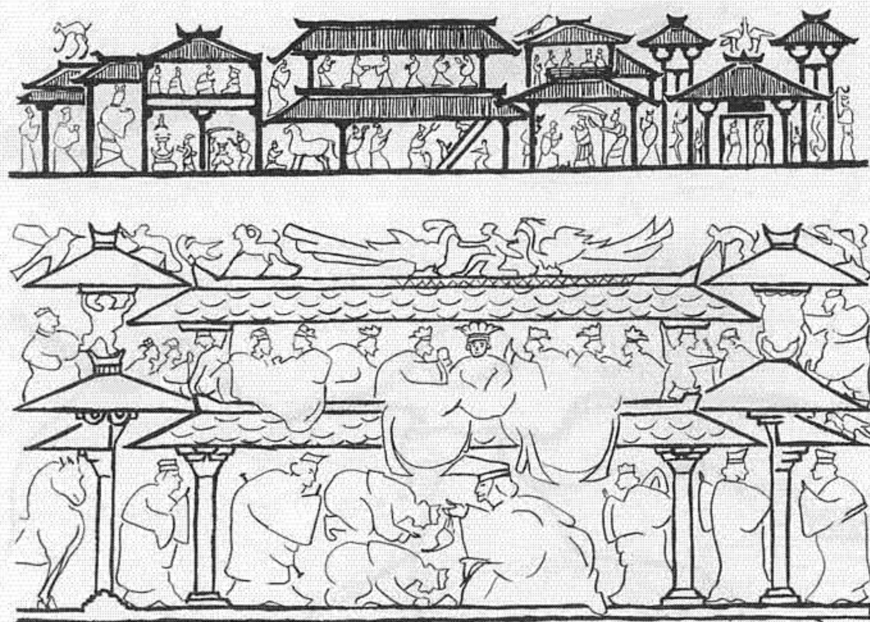


图 3.1.4.9　具有几个不同建筑物的宫殿建筑，包括有两个塔的门屋（右）、一个接待厅、二层作为妇女用房，有 2 层的大殿和一个 2 层的双庙（左），其中有两个神祇，参照江苏徐州东汉墓壁汉画像图

图 3.1.4.10　两层的大殿，大殿两侧有两座塔，参见山东武氏家族墓壁画像，大约公元 150 年（东汉），房屋主人正在大殿中央接待宾客，女主人在上层由一群女士们围绕，二层是女士们的领地，这种方式贯穿中国历史上层家族

它肯定表达了一种真正的信服。几代之中，国家的确在其疆土内外享受到了和平，而且，这也许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国的皇帝堪称为人民的天子，居于世界的中心洛阳。政府的原则，不仅对中国人是好的，他们对于所有人类也同样是好的，没有任何原则，像中国政府的那些原则那么好，其在特征上是普世的。在这里我们用到“中国普世主义”或“中国人的宇宙观”，正如荷兰汉学家高延（J.J.M.de Groot）在他的名著中所赋予的名称一样，这些治理原则，通过对到当时为止的所有中国文献的恢复、组织和系统化而发展起来。中国思想的所有因素都得到复兴，而在我们两位诗人的生命历程中，涌现出一个完整体系，并以“儒学”为人所知。实际上，它仅是从旧的宗教传统、即“中国人的宇宙观”中的一个选择。这个宇宙观，可以被认为是后来的道教宗教体系发展的基础，那是一种特殊的体系，由特定的元素构成，服务于百姓，而儒教，则服务于皇帝和政府。因为其主要功能是教育官吏和维护国家仪典，儒学成为帝国统治的意识形态和宗教的基本框架。皇帝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施行国家仪典，而这些仪式后面的基本概念，就是通过皇帝这个圣人，遵循周王们的古老传统，在精神力量和人类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皇帝必须观察自然法则的功能，以及冥冥之中神明的运作，并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地方，通过献祭和仪式召唤这些神明，并且在每一个所需的方面都要正确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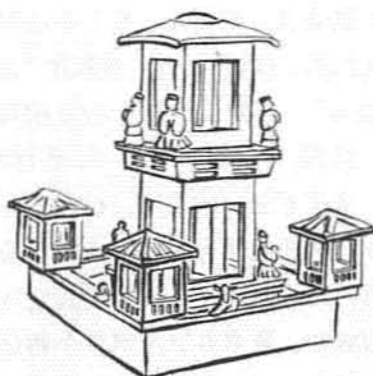
正确、严谨地遵从已经确立的良好的秩序和风俗，以及应用神圣数字作为精神力量的外在表现，不但主导着皇帝及其朝廷的生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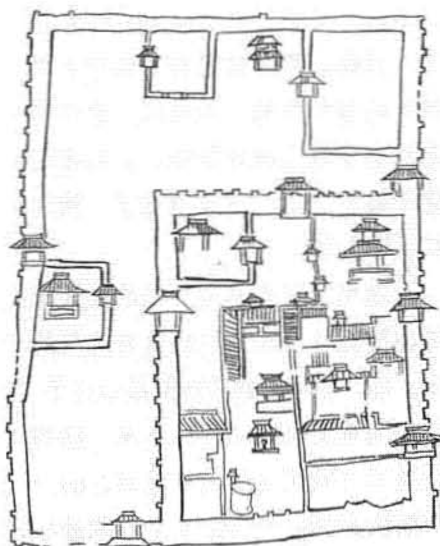
图 3.1.4.11–14　几个泥模型，发现于东汉和西晋墓，大概为仪式建筑物（公元 2 和 3 世纪）

图 3.1.4.11　陶模型，具有绿釉的建筑物，与明堂的概念有关，也与神圣的灵塔有关。出自公元 2 世纪的河南灵宝县张湾 2 号墓。注意上层屋顶的圆形顶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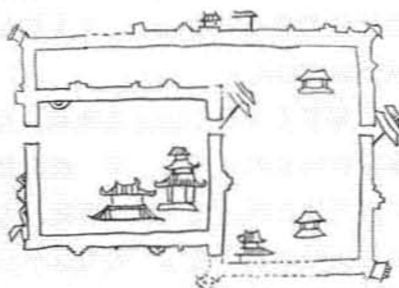
图 3.1.4.12，13　在两个大容器顶上仪式建筑的两个陶制模型，这与在西汉长安挖掘的仪式建筑紧密相关，有四个角亭的中央大殿，上面的一个有 3 层，来自西晋墓（公元 265–316 年），其他的表示了一个两层结构的顶层（公元 3 世纪）

图 3.1.4.14　一个结合四角亭概念的五层的塔之泥模，出自甘肃武威东汉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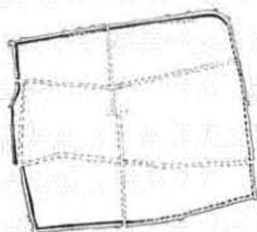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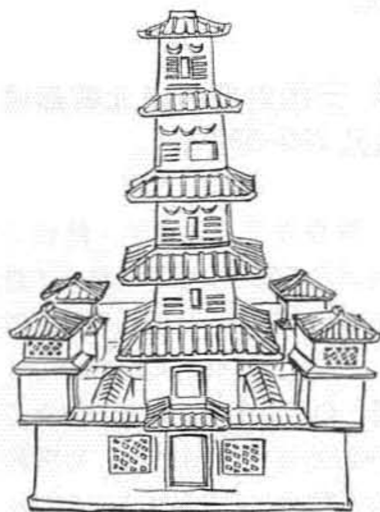


图 3.1.4.15，16　东汉具有围墙区域内部用作官署、外城用作居住的行政中心壁画。墙壁建成城垛，并有塔楼，以及沿着几处宫殿墙壁的塔楼

图 3.1.4.15　今日河南内黄附近的范阳城，来自内蒙古呼伦格的一个坟墓中，在公元 150–166 年之间，坟墓的主人当时在那里驻防

图 3.1.4.16　公元前 108 到公元后 323 年，在朝鲜北部和满洲里南部乐浪的一个汉代的指挥官，在辽东的一座小城，来自一处坟墓，今朝鲜北部，参见考古 1960/1

图 3.1.4.17　国内城，位于今天吉林省集安市，满洲里东南，在鸭绿江边，比例 1 ：20000，参见文物，1984/1，集安县志 1987，这是公元前 108– 公元 150 年汉帝国在玄菟郡的一个行政中心，结果，它成为高句丽国的都城（公元 150–427 年），朝鲜半岛早期帝国中的一个

图 3.1.4.18　当国内城成为高句丽王国的都城时，原来汉代的夯土墙，是以石头贴面的，这里显示了北部墙体的一部分

图 3.1.4.19　大量的陵墓墓地，覆盖着环绕鸭绿江边国内城的平原，这里是一个国王的陵墓的石头金字塔





是所有与帝国有关的建筑——宫殿和朝廷，以及庙宇和其他建筑物——布局和设计的先决条件。奇数和偶数，代表了生存世界阴阳的自然力量。对某些数字的运用，并非因其和谐的比例，而是为了获得由阴阳数字所表现的创造力间的创造性互动。这些数字，被用于建筑单体、整栋建筑群体，乃至城镇和城市的不同尺度之中。

当初，仪式建筑物根据它们与圣地的关系而坐落布局，并不一定必须要与城市和城镇发生关系。坟墓、作为祖先的休息之地，特别是皇室的陵墓坐落于远离王室的地方，而祖先的神坛坐落于宫殿之内。然而，随着国家仪式的发展，特殊的建筑群体，在宫殿区之外创立，用作举行仪典。这些建筑群与皇帝的一些特殊事务相关。正如我们以上所见。西汉的最后几年，在王莽的治理统治下，在长安城以南，建有被称为九庙的三座建筑群，以及几个庙宇式建筑的大型建筑物。其功能到目前为止还未确定。三座主要建筑由一个观察天上吉兆之用的观测台，一道有一些用于仪式箭术设施的圆形城壕和一座基于九方格的、为一条圆形城壕所围的方形建筑所组成。后者，又是坐落在一个方形合院之内，而且又被一个外部圆形城壕所围绕。这种圆形与方形的相互交替，包含了两个基本的创造力即阳（圆）和阴（方）的神秘联合。这三个建筑物的建筑群体，即文献中所引的灵台、辟雍和明堂。在这些建筑中，明堂就是一个大厅堂，其中，皇帝给在朝官吏解释古典经学。因此，明堂被提升为儒学古典教育的最早机构。而东汉，也在洛阳建立了这三座建筑物，它们也是建于城市之南。这次增加了一所学校，即太学。

这里，仅有两所其他的仪式建筑值得提及，因为它们具有持久的重要性，而且直到帝国的最后日子，都作为重要机构而存在下来。这些是城郊（确切地说是在南郊）的一个祭坛表演的“郊祭”；和在农业坛（先农坛）前表演的仪式“耕耘圣土”。两座建筑，对于人民的富裕和朝代的延续都极为重要，而且两者都与城市紧密相连。

尽管东汉皇帝也建造陵墓，大多数在城北的北邙山一带，我们却未曾听说在陵区建城镇。因此，大都市区域限制在城郊。因为这个原因，它的规模要比公元140年所统计的人口数字给人的期望小很多。

两汉这种持续大约400年的形成时期，结束于公元2世纪的后半期。宫廷太监通过宫女可以直接操控皇帝，并且试图在朝廷中产生超过大臣和官吏的影响，这导致了两个集团之间的血腥斗争，它如此削弱了中央政府，以致于各州（郡）的将军们开始为了霸权地位而战，并试图掌控皇帝。因此，如果皇帝赢得了获胜将军的青睐，他就能保持适当的仪典。经济境况日趋恶化。这将另一种力量，也就是起义的农民带上了舞台。在他们反对所有其他党团的斗争中，他们由宗教领袖所组织，有些人成为著名的道教系统的建立者。渐渐地，整个运动因为他们头上明显的头饰，被称作“黄巾起义”。一个战争频发的时期到来，持续了几乎40年。公元190年，众将军之一的董卓，控制了儿皇帝并将他挟持到长安，实际上是作为囚犯，以确保他不受到其他将军的威胁。董卓并试图将整个朝廷连同所有财富从洛阳移往长安，然后整个毁掉洛阳。在去往长安的路上，财宝大多都丢失了，其中包括由7000架马车运输的所有文献资料。围绕洛阳的整个区域都被毁坏，人口减少，曾经辉煌的洛阳及汉代结束了。

公元220年，汉代彻底覆灭，帝国分裂为三个势力范围，即所称的三国，北方的魏、南方的吴和西南（今四川省）的蜀。公元140年，三个国家中所记录的人口为：魏的人口为2900万，吴1170万，而蜀只有750万，但是我们不知道在这些国家建立之前的30多年的战争中有多少人已经死去。然而，这些数字，表明了北方魏的相对力量及其统治地位。

3.2 三国时期与南北朝都城（公元220—580年）

曹操在公元216年，就已经在河南北部现今安阳附近建立了魏国都城邺。这是一座全新布局的新城，从东到西7里，从北到南5里，又是一组神圣数字。此布局建立了一种新的城市规划类型，与那种旧的宫殿居中的方形城市理念明显

洛阳

我登上北邙山的山脊
俯视洛阳城
洛阳是如此宁静
宫殿和房屋全被烧为灰烬
墙和篱笆全部破碎裂口
荆棘和黑草莓长向苍穹
我没有看那些苍老之身躯：
我只看那些年轻之面孔
我转过身来，因为那笔直的道路已经消失了；
田地生长过份并且将永不再犁
我已经离开了如此长久的时间
我不知道哪条路是哪条路
空空的沼泽是如此悲伤丑陋
千里之内荒无炊烟
我想到我们在一起的那些年
我的脑子里充满了悲伤以至于我无以言表。[1]

洛阳

在北邙山，他们如何升上天，那些高高的小山，田野中四五座小山！那些坟丘里面埋葬的是何人？他们都是汉人的君主。[2]

相左。从各种最近的复原所判断推测，这是几个世纪以来，第一个对新的帝都全新而复杂的城市规划。墙体围护的城市，不仅包含王室及衙署，还有大多数的城市居民，包括很多以前住在郊区城门外的百姓。宫殿区域，由两座宫殿组成，大概一座用于居住，另一座用于仪典。但是，两座加一起，仅与洛阳的南宫规模相当，占地不足 1.5 平方公里，在宫城以西的城墙内，是王室专用园林，而宫城以东，是贵族官署和生活区。城北由一条宽阔的东西大街与南部分离，而通往宫殿区的主要途径，是三条南北大街，每条直通宫殿南墙的三座大门之一，最东边的南北大街两侧是衙署。小路划分了城市其余部分，南部划分为几十个里坊，为普通人居住区。然而，看上去，市场依然坐落在城门外。整个城市占地约 6.8 平方公里，其名称为邺，引起后人注意，而且至今一个特别之处是在西墙上的三个台子，其目的依然有待确定，但是，他们也许以某种方式与防御性堡垒相连。在魏国最终建立后，邺城仅作为二级都城。在公元 220 年，魏国的新皇帝，又在洛阳设置了宫殿。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又在公元 190 年毁灭后所留下的宫殿废墟上重建。东汉洛阳的一般布局并无变化，在城墙西北角，被添加上一个坚固的堡垒，由三个分离的堡垒组成，其从东到西约 250 米，从北到南 1080 米。墙体 13 米厚，而整个布置，类似邺城的三个台子。此外，以每 60 到 70 米的间隔，从墙上伸出棱墙，在墙上的其他地方，可发现同样的棱墙，表现了新的发明以及对于当时战争状态的一种回应。

在南部的吴国，孙权在公元 229 年，现今的南京所在地建立了一座宫城，4 里 ×4 里，中心有一座小宫殿。十多年前，他在现今武汉的所在地发迹。但是，那里的宫殿被毁，他便顺江而下到了南京，当时叫建邺。几年后，一座佛寺在城南建立起来，包含一个据记载来自印度所谓的阿育王舍利塔，作为最为神圣之物。它坐落在汉时就曾是行政中心的丹阳郡西部，至今依然存在。

魏国由东汉大将曹操开创，公元 265 年被另一位大将推翻，并建立了晋代。他们俩都是豪族。彼此不断打仗，不能建立任何中央集权。这种混乱给蛮族以可乘之机，他们越来越多地被包容进相互竞争的家族军队中，而且，他们也在东汉覆灭后，在中国北部安定下来。这一过程，加剧了对以前这些游牧民族的同化，直到他们能够在西北建立自己相当完备的国家，采用汉人的治理和教育方法。公元 311 年，他们攻占了洛阳，并且完全毁灭了这座城市。5 年后，在公元 316 年，长安也遭受了同样命运。接下来的几百年里，整个中国北方被所称的“五胡十六国”和他们的继承者所统治。

公元 316 年，晋最后一位皇帝在长安被处死，他在南部扬州当将领的叔叔，自称为皇帝，并在扬州

1 译者注，没有见到原始信笺的情况下，冒失地转译了 J.R.Hightower 英译的公元 3 世纪嵇康给山涛的信。

2 Zhang Zai（公元 280 年），Arthur Waley，诗经，第 8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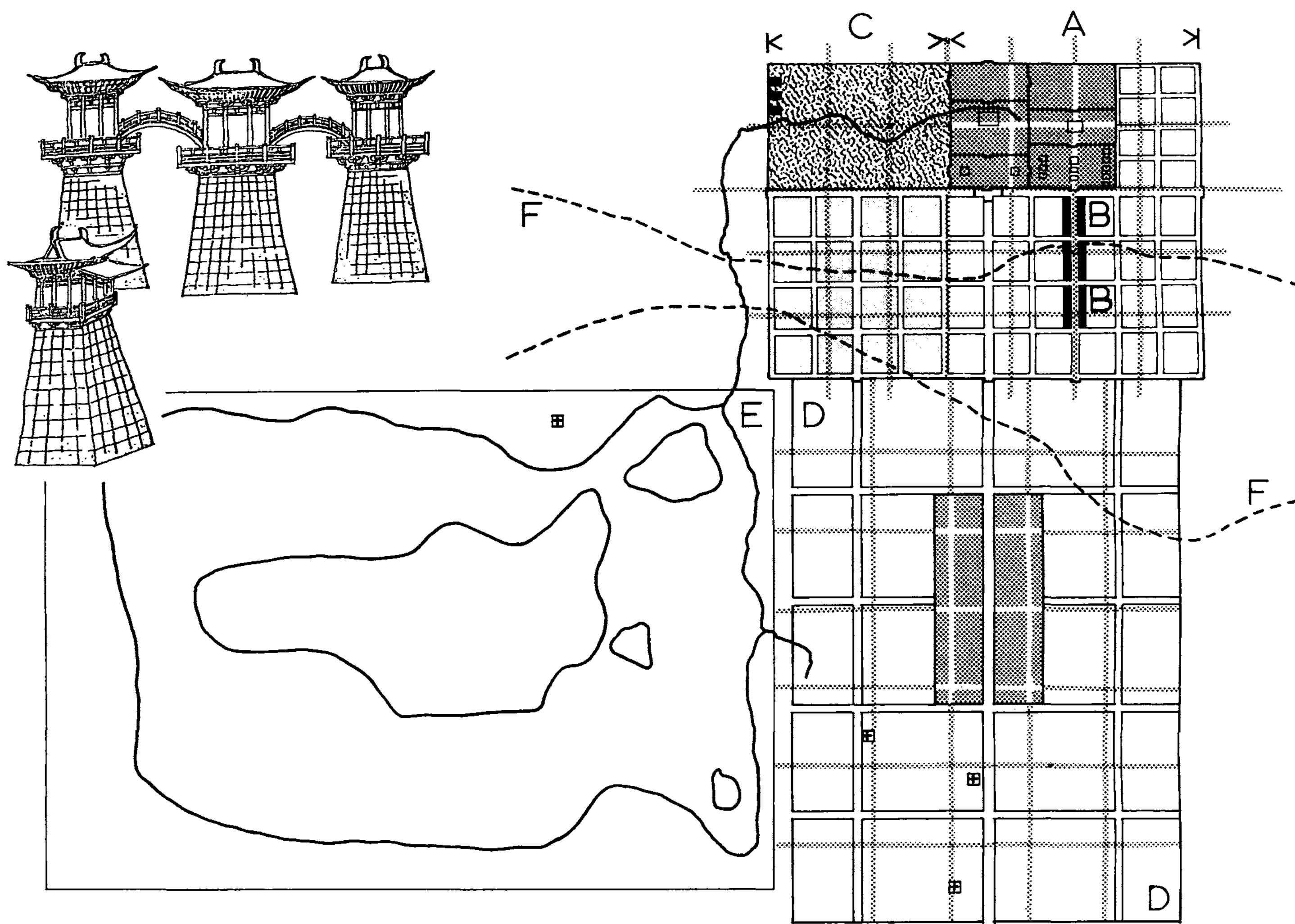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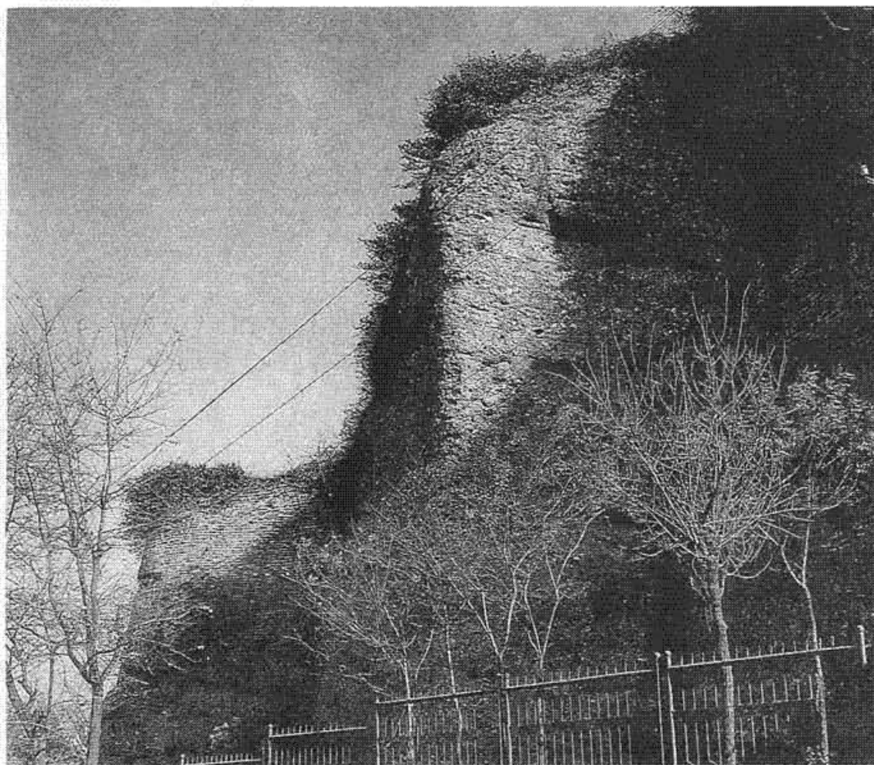


图 3.2.1 河南安阳东北的邺城，根据文献中的一些描述复原，比例 1 ：40000[1]。
上部分由魏国的国君曹操所建（公元 155—220 年在位），围绕着他的宗庙和权力中心兴建。在那里，他已经通过组织那些饱受战争之苦、而在军事管制之下，变为亦农亦军的农民恢复农业生产。作为这些殖民地的行政管理中心，在今日的许昌、亳县、洛阳和邺兴建起来。开始时，后者大概仅由东部所构成，是一个 4 里 × 5 里的矩形，宫殿在北端（A），当时的中轴线上也坐落着行政中心（B）。公元 220 年，曹操死后，他的儿子曹丕（公元 220—226 年在位），从废黜的最后的汉代皇帝那里篡夺了皇帝的头衔。在这种情形下，他也许扩建了自己的都城，邺，增加了另一个 3 里 ×5 里的矩形，在西边有一个御苑（C）。整个城市，后来即著名的 5 里 ×7 里的城市，这个里，也是基于当时的度量体系，相当于 433.8 米（1 尺 =24.1 厘米）。南部郊区是在东魏（534—550 年）时期后来重建的，是一个 5 里 ×7 里的矩形（D），但这个时期，是基于东魏的里，等于 540.86 米（1 尺 =30.04 厘米），一个大的宫殿公园被加到西边（E），但是后来整个城市被河水淹没（F—F），仅仅留下一些台地在后面（小的方形）。其中，在旧宫殿公园的西边有三个台地（C），"铜雀园" 依然十分著名，东魏城，是根据吴良镛的复原绘制的。[2] 在著名的铜雀园中的三个台子，也许类似左上方的图绘，模自甘肃敦煌莫高窟（217 号窟）；三座带有亭子的塔楼由木桥相连，既用于娱乐，也用于防御

1 参见《中国城市建设史》，北京，1985。
2 Wu Liangyang, A Brief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City Planning, Kassel, Germany, 19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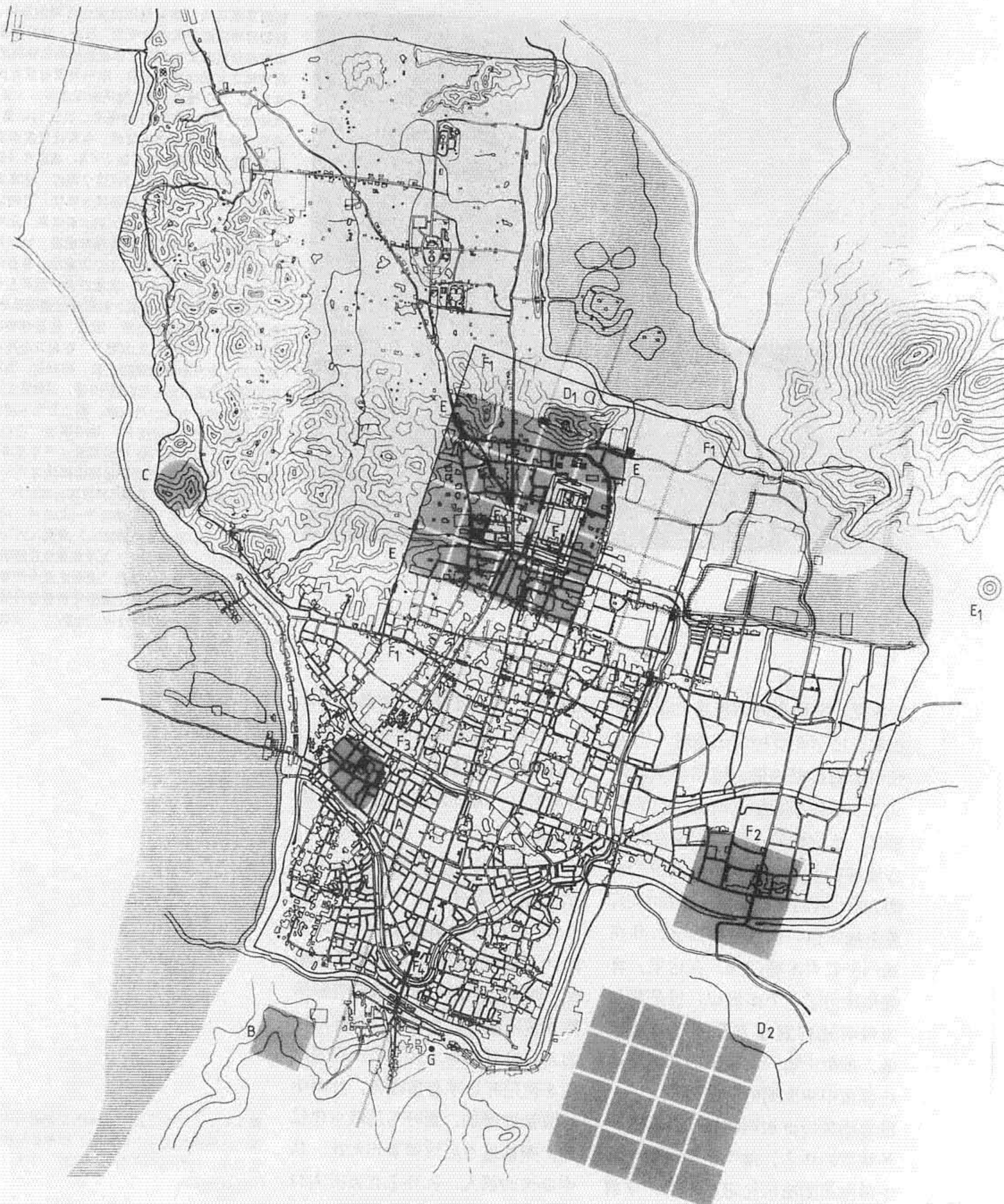


在南京地区内，由孙权所选定作宫殿的地址，很明显地遵循着风水的考虑，后来，每当有关南京是否能够安全地被选作皇室和帝国都城的所在地之类的问题提出时，这种考虑也重复性地呈现。几个传说，将这些风水理念保存下来，从中我们可以架构如下的概念。玄武湖以南，鸡笼山脉以南是秦淮河盆地，今天这里由南京的商业街区所填充。公元前 218 年，始皇帝（公元前 246–208 年）南行到达这个地方，他意识到了这些山、平原和河流的风水形势。当他的大臣（参谋）之一，预言大约 500 年后，此地因为优越的风水特征，将有皇帝出现，始皇帝感到有点生气，命令将河流引进盆地，并且使河水毁坏这些地形特征，洪水泛滥，将其变为一片沼泽。大约 400 年后，孙权通过灌溉盆地，而又获得了这些地势品质，因此，他能够将其宫殿安置，在最具吉兆的地方。在北方山脉的南部和在南方秦淮河道的北部，即阳位。宫殿的中轴线和宫城北偏东大约 10 度，因此它在北方，直接指向山脉的最高峰，那上面后来建造了北极阁（北极星的楼阁），而在南面，它直接指向牛山，大约距西南 15 公里处。一个充满吉兆之地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两山群体之间的位置，即所谓在东部的“青龙”和在相应西部的“白虎”。在南京，这一位置体现于一句谚语，即这里“龙盘（东部较高的紫金山）虎踞（西边较低的山脉）”。在 20 世纪，毛泽东甚至在他的诗中引用了这一古老的谚语“虎踞龙盘今胜昔”。这一概念也体现在围绕东晋朝代新宫殿的城墙上的城门之名：东边的门叫“云龙门”，西边的门叫“神虎门”。

府建邺，即现在的南京建立了他的都城。他早在晋控制该地时，作为统治者而占据这里。建邺曾经是公元 222 年到 280 年三国之一的吴国都城，当它被晋占领后，原有的吴宫城被扩大，形成一个 5 里 ×5 里的方形，新的宫殿区域几乎在中心，整个城市由一圈竹栅栏围绕，并在城门上置有木城门楼。在这里，晋继续统治了一个多世纪，但是其权力没有延伸到北方淮河以外的区域。历史上第一次帝国的都城坐落在远离中华文明的心脏地带，一个没有悠久历史和旧都城所具有的神圣特质的地方。这个新都城，作为中国南部的殖民化进程中的一个前沿基地。这一进程因北方蛮族的统治而加速。因为那迫使成千上万的家庭，离开家园而向南迁移，并试图在那里，为子孙后代建造一个新的未来。

公元 222 年到 589 年间，在这一殖民化进程中，大约 100 个行政中心，在长江以南建立。但是，它们仅仅是前沿聚落，尽管大量的移民，因为这里进一步发展的情形依然非常险峻，这个时期，南部地区的人口没有增加。这种情况直到公元 8 世纪开始才有所改善。行政中心数量的增加，绝对不是城市化过程，而且也不应该被看作如此。从中亚来的胡人，弥补了北方的人口

图 3.2.2 现今江苏南京城西山金陵的陡峭山崖，这里原先是越王的堡垒，后来被包括在城区之中，作为防御体系的一部分。今天，它以石头城而闻名



F1
D1
E
F1
E
C
F
E
E1
F1
F3
A
F2
F4
D2
B
G

图 3.2.3 当吴国在公元 3 世纪初成立时，孙权（公元 229—252 年）在现南京地区的秣陵建造了宫殿，比例 1 : 40000。
公元前 722 年起，这里就已经存在有古老聚落，当时，邺城（A）被建成一个早期冶铁业的重要中心。另一个聚落被称为越城（B），在邺城的南面，公元前 473 年由越王和范蠡兴建。公元前 333 年，一座堡垒在山的西北建造起来，最初称为金陵，公元前 220 年后，称为秣陵。到西汉时，它又名为石头城（C）。公元前 137 年，另一座堡垒，称为北台城（D1），在玄武湖南面建立，这个建造，与早于公元前 154 年成立的丹阳郡行政中心一起进行，是这里第一座真正的城市聚落，它由一个 4 里 ×4 里的有围墙的区域组成（D2），坐落在秦淮河南部的平原上。孙权在秣陵之东，北台城山之南建造了宫殿。公元 229 年，一座宫城围绕着 211—213 年所建造的宫城建立起来，形成了一个 4 里 ×4 里的环围墙区域（E），作为吴王所处位置的必要条件。一座新宫殿，在宫城由竹栅栏加固后，在 247 年完成，而这个城市，现在就叫建邺。吴王孙权的陵墓（E1），坐落在城市以东，明代洪武的陵墓以南，这是 1000 多年以后在此建造的。公元 317 年，当东晋在南中国建立之后，这个城市成为了帝室所在。这是首次帝室没有坐落在渭河或洛河河谷，而是坐落在南中国，一个完全的转变。然而，建邺城很快就被毁坏了，而在成帝时期（325—342 年），一座具有三道栅栏防线的全新的宫殿（F），在旧宫殿废墟的东面建造起来。宫城扩大了，这样，宫殿就坐落在宫城中心，而它现在形成了一个 6 里 ×6.5 里的矩形（F1）。主要的南北轴线，从宫殿向南延伸，跨过河水平原，直通雨花山。雨花山上，一座著名的佛寺，建于 247 年。此时，这座佛寺以更大规模和尺度重建（G）。两个行政中心建造在平原之中，一个是东府城（F2），一个是西周城（F3），在中轴线上建造了南门（F4）。这座门称为"朱雀门"，是一个东府城用于南门的非常典型的名字。离城墙 7 里，城的轴线穿过秦淮河上的石桥，而最终在雨花山脚通过郭门而远离了城市区。围绕城市和宫殿的栅栏在 479—482 年间齐的高帝道成治理之下，由坚固的石墙所代替

流失，使北方的经济发展及相应的城市化发展，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准。然而，在围绕都城、即现今南京地区，以及长江下游以东（即今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豪族势力越来越投入到工业和商业活动之中。公元 3 世纪始，吴国发展了国际贸易关系，当然，是基于老传统，而且，很多中国船只航行到南中国海和印度洋。我们已经从法显关于自己于公元 349—414 年在印度和锡兰的旅行，以及他通过一艘商船，经印度洋和南中国海返回中国的记载中得知，他在山东南部海岸登陆，然后到了都城（今天的南京）。在那里，他翻译了大量随身带回的梵文著作。与他同船的商人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表明中国南方和南中国海以外各国之间的相互贸易活动，这奠定了接下来若干世纪里这一地区城市和城镇繁荣发展的基础。在这一地区最古老最重要的城市是苏州。早在公元前 6 世纪就已经作为更早的吴国都城，其规模一直保持到公元 20 世纪。当苏州在公元 222 年失去了其作为王室所在的功能时，它依然保持其作为南方豪族中心的重要性，这些豪族们在此地主要从事商业活动。

然而。新都城建邺（南京），除了作为帝室和衙署，继续发展其传统的工业，并且使之成为贯穿公元 3 到 6 世纪的南方各朝代重要的商业中心。铁工业、锻炉和铸造、纺织和陶瓷作坊因其特别产品而著名，销售到整个中国并出口海外。但并非仅是本地产品，这里还从南海进口奇珍异品，在建邺的 4 个大市和 10 个小市中，也进行贸易通货以满足人口需要。据说，这些人口达到 280000 个家庭组成。这意味着超过百万的人口生活在都市，即大都市区。

总结一下这个时期，建立新城的需要不再像以往那样迫切，因为在此时，很多城市已经存在了。刘备是现今四川省蜀国的统治者，他将原有的、具 500 年历史的成都，作为自己的都城，而未作改变。没有文献记载其扩展或改变。另一方面，仅仅极少的持续变化和短命的朝代，运用了资源，以建立新的帝国都城，它们仅仅覆盖一小部分国家，并持续地从事战争，更不用说大都市区了。仅仅三国时期，魏的都城和吴的都城是新建的宫城，邺和建邺城。前者提供了一种新概念，结果，在后来的 500 年里，被用在很多新城之中，而后者遵循了传统的布局。因为很多统治者支持新的佛教，随之在城市里和城市附近，建立了很多寺院建筑，新的元素被增加到城市的场景之中。

3.3 北魏、隋和唐

同时，即公元 5 世纪到 6 世纪，北方的政治局势已经变得有些稳定。公元 439 年，所有北部中国都被一个帝国政治所征服，即北魏朝代。它打败了最后的蛮夷十六国。他们本身也是突厥族，北魏的统治者，非常倾心于继承汉人的治理方法。因为，虽然是游牧民族，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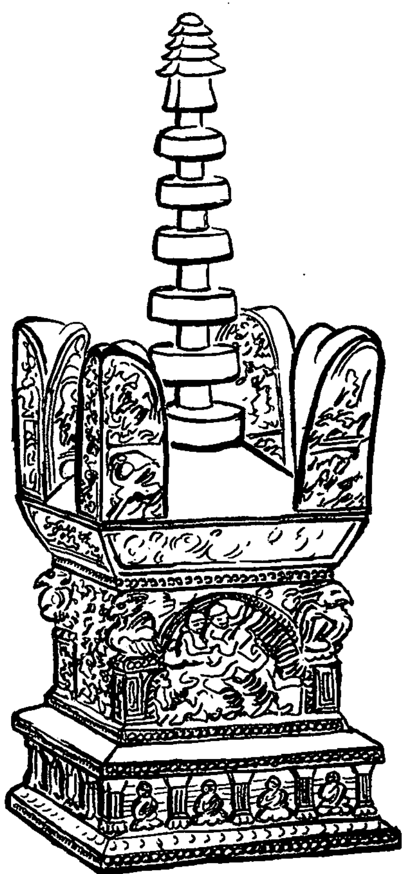


图 3.2.4 从印度引进到浙江的舍利石塔（内置圣骨盒），现藏于宁波附近的阿育王寺中，参见这座佛寺中的照片，根据传说，该石塔是由印度佛教的狂热支持者阿育王（公元前 259–222年）下令而建的 84000 个圣骨盒中的一个。之后，这些圣骨盒被分发到当时所知道的世界各地。公元 281 年，它由僧人怀达，在现今宁波南面的阿育王寺的邻近地区中找回。有同样的故事，描述位于今天江苏南京南门著名的佛教寺院建初寺。该寺建于公元 247 年，那里拥有另一个最神圣的遗迹阿育王舍利塔。大概与这里的舍利石塔为同一种类型。在宁波的阿育王寺最终于 405 年建成。目前还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制成了这座舍利塔，其高度为 37 厘米。它大概是中国（甚至其出生地印度）最为古老的佛教遗迹。这种风格即是著名的"犍陀罗风格"，时间可以追溯到新纪元的初年





图 3.2.5 3 和 4 世纪时北朝的两个武士。参见当时墓中泥塑人物。今天在京都和东京博物馆的展品收藏。艺人们很明显在开这些武士们的玩笑，并以讽刺画描绘他们，大概是藐视他们，正如墓主人那样

图 3.2.6–8 大约公元 275 年的文化人团体"竹林七贤"中的三人。模自出土于南京的一个公元 5 世纪砖墙上的浮雕。中国社会的分裂，北方各族部落间残酷的权力斗争，导致了一半的国人遭灭顶之灾，而在汉代覆灭以后整个省份人口的减少，增强了道家消极避世思想。"竹林七贤"因倡导这种思想而著名

图 3.2.6 嵇康（公元 223–262 年）是竹林的拥有者，七贤常在河南的山阳附近集会。作为一个文人，嵇康有时充当官僚。他能娴熟地弹奏古琴，并热衷于冶金炼丹，常在柳树下练习。最后，他因幻术和异教传播者的罪名被处死，因为他对自然科学感兴趣。临死前，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演奏古琴，其性格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

图 3.2.7 山涛（公元 206–285 年）是一个政治家，因其超越的天才如他的竹林伙伴嵇康而著称。虽然身处作为西晋皇帝武帝（公元 266–290 年在位）的大臣这样的高位，他依然不能挽救他的朋友和手下嵇康的性命

图 3.2.8 阮咸，阮籍（公元 210–263 年）的侄子，在弹奏六弦琴。俩人皆为"竹林七贤"之一。叔侄二人以爱好音乐、饮酒和研修哲学而著名。他们宁愿过安于现状和自我节制的生活，而不愿野心勃勃地抛头露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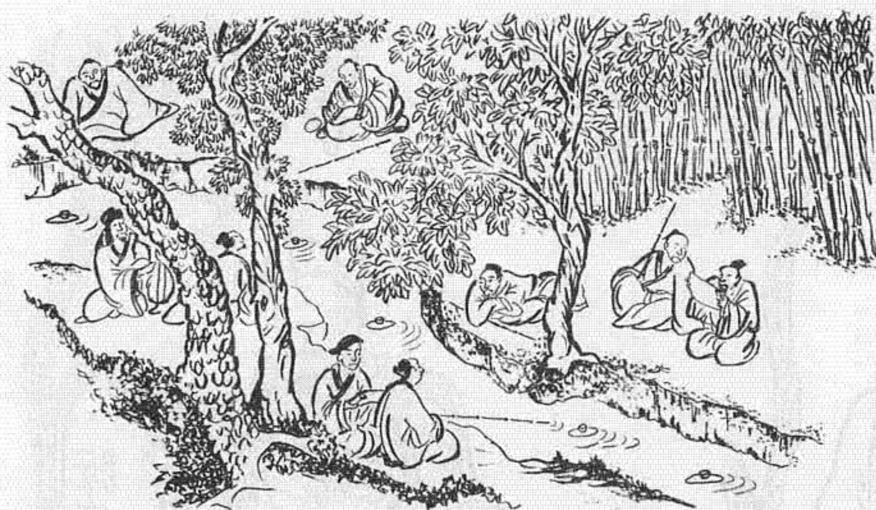


“此外，我对独立自主的兴趣，通过阅读庄子和老子而增强。因此，任何对于功成名就的欲望变得日益薄弱，而对于自由的信奉日益坚定。在这方面。我就像一只野鹿：如果在幼年被捕而圈养，它就会温和而顺从。但是，如果在长成后被提捉，它就会狂野而桀敖不驯。为了逃脱而不惜赴汤蹈火。人也许喜爱锦衣美食，但这远不如自然山林中丰实之野趣……假如我的头脑受浮世的牵制，那便是掩饰，也是对自己不诚实。而即便满足了浮世的期盼，也难保自己就不会蒙羞……偶尔，当宾客满席，喧哗之声震耳欲聋，这噪声这肮脏，污染环境，在我眼里，他们乃口是心非的两面派……我的内心无法再容纷扰，而生活却充满纷纷扰扰……

况且，我总是找汤（商的始祖）和武王（周的始祖）的岔子，或者挑周公和孔夫子的刺，如果在这个社会我不能停止这样做，显然无法融入这时代的信仰和潮流……徜徉于山间溪流，俯仰鱼戏鸟翔，我内心无比欢畅。而一旦我走上仕途，就将不得不放弃这些……如果说，我与普通人有何不同的话，那是因为我自己对功名利禄不感兴趣，这最贴近我的真性情，请君细思量。”[1]

---

1 嵇康致山涛的一封信（公元 3 世纪），J.R.Hightower 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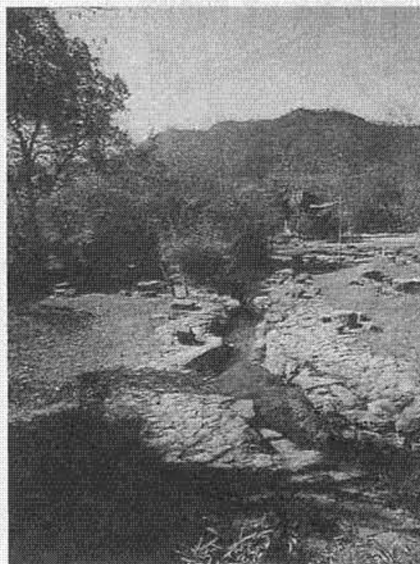
公元353年的兰亭之会："这里所聚乃老少皆宜的卓越杰出之人……我们依序静坐水边，畅饮顺着溪流而来的杯中之水，变换题目吟诗作赋，完全沉浸于这幽静中的促膝而谈。今日，天空澄明，空气清新，微风轻拂。仰观广袤宇宙，俯查天下万物，实在令人愉悦。眼观美景，浮想联翩，耳目一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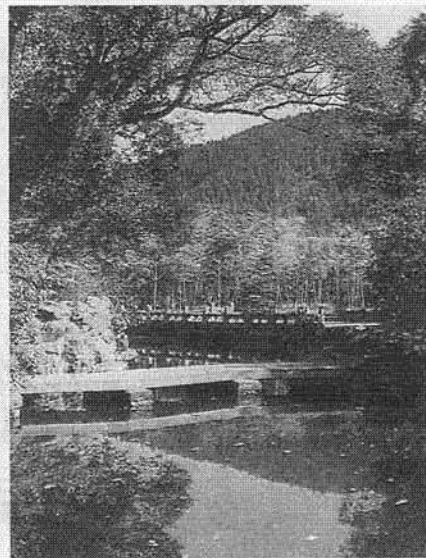
图3.2.9 公元353年，近绍兴兰亭兰园中诗人们的聚会。参见由顾金（1508–1574年）所绘的日期标为1560年的卷轴画

图3.2.10 为了表现分裂时期东晋南部的文化发展，兰亭主人及诗人王羲之（公元321–379年），写了一篇短文，记述了这次在353年的聚会，参见台湾中央博物馆的卷轴。王羲之成为中国最受敬重的书法家，据说发明了楷书体，他高度个人化的书法杰作，名为平安（右上角第三和第四两字）

图3.2.11 绍兴附近的兰园（兰亭），如今日所见，前面可见小溪流，诗人们在那里发明了曲水流觞

图3.2.12 在兰亭园外后面有山的小湖，景观被这个花园所"借景"





鲍照：《芜城赋》

沵迤平原，
南驰苍梧涨海，
北走紫塞雁门。
柂以漕渠，
轴以昆岗。
重江复关之隩，
四会五达之庄。
当昔全盛之时，
车挂轊，
人架肩，
廛閈扑地，
歌吹沸天。
孳货盐田，
铲利铜山。
才力雄富，
士马精妍。
故能侈秦法，
佚周令，
划崇墉，
刳浚血，
图修世以休命。
是以板筑雉堞之殷，
井榦烽橹之勤，
格高五岳，
袤广三坟，
崪若断岸，
矗似长云。
制磁石以御冲，
糊赪壤以飞文。
观基扃之固护，
将万祀而一君。
出入三代，
五百余载，
竟瓜剖而豆分。
泽葵依井，荒葛罥涂。
坛罗虺蜮，阶斗麏鼯。
木魅山鬼，野鼠城狐。
风嗥雨啸，昏见晨趋。
肌鹰厉吻，寒鸱吓雏。
伏虣藏虎，乳血飧肤。
崩榛塞路，峥嵘古馗。
白杨早落，塞草前衰。
棱棱霜气，蔌蔌风威。
孤蓬自振，惊沙坐飞。
灌莽杳而无际，丛薄纷其相依。
通池既已夷，峻隅又以颓。
直视千里外，唯见起黄埃。
凝思寂听，心伤已摧。
若夫藻扃黼帐，歌堂舞阁之基，
璇渊碧树，弋林钓渚之馆，
吴蔡齐秦之声，鱼龙爵马之玩，
皆熏歇烬灭，光沉响绝。
东都妙姬，南国丽人，
蕙心纨质，玉貌绛唇，
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穷尘，
岂忆同舆之愉乐，离宫之苦辛哉？
天道如何，吞恨者多，
抽琴命操，为芜城之歌。
歌曰：边风急兮城上寒，井径灭兮丘陇残。
千龄兮万代，共尽兮何言！

谢朓：《入朝曲》

江南佳丽地
金陵帝王州
逶迤带绿水
迢递起朱楼
飞甍夹驰道
垂杨荫御沟
凝笳翼高盖
叠鼓送华辀
献纳云台表
功名良可收

梁代武帝（502—549 年在位），汉高祖刘邦的丞相萧何的后裔。自从那时大约 7 世纪萧氏家族都属于贵族统治者阶层，各朝各代屡出丞相、将军之人。梁武帝在南朝当时的文化中心南京建立王室。他无数兄弟、侄儿和叔叔们都积极拥立他为皇帝，而其中很多都为饱学之人，正如武帝本人便是一位多才的诗人一样。在太子、也是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萧统于 537 年仙逝后，武帝将佛教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以至于多次引退至他在城市以南雨花山赐建的佛寺中，并将佛教佛寺提升为梁代国教与国寺之崇高地位。如下的诗表现了梁武帝的思想。[1]

如垄生木，
木有异心。
如林鸣鸟，
鸟有殊音。
如江游鱼，
鱼有浮沉。
岩岩山高，
湛湛水深。
事迹易见，
理相难寻。

阶上香入怀
庭中花照眼
春心一如此
情来不可限。

译注：该诗应为梁武帝（萧衍）的《春歌四首》之一

1 引自 H.A. Giles, 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i, 1922.

这是留作印度之梦幻般的奇才菩提达摩的。以诸如无神论、寂灭及非现实的物质世界的三种因素创造了宗教，并通过鼓励神秘和僧侣般的生活，使这些最极端的虚无学说脍炙人口而流行。随后所附加的神话迎合普通百姓的口味，使佛教传播得如此之广，遍及大众……僧侣们的精力主要集中于对来自所感物体的意义直至自我思维的心灵抽象，以此达到一个梦幻般寂静的状态，禅思及心醉神迷的梦幻。这被该派宗的信徒们错误地称作启智开悟或正确的思维。[1]

该体系导致了学习和宗教狂热的普遍衰变。其滋生出的惰性，将中国佛教逐渐引入颓废和麻木不仁的状态，再也没有康复。



图 3.2.13 一个镀金的青铜佛像，日期为公元 338 年，引自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这是最早的、由中国匠人在中国制造的青铜佛像，手姿表现了沉思，冥想

图 3.2.14 甘肃敦煌附近的莫高窟。从西汉以降，敦煌是来自西部旅行者所到达的第一个中国城市。汉代没落以后，这个区域，某种程度上远离了其东面战乱频仍的中原，与世隔绝，并以其相对安静的环境，成为当时那些离开官僚生活，相信佛教是他们尘世生活救世宗教的人们的一个避难之地，并且是中国北方备受蹂躏的聚落。佛教也在游牧民族和草原地带的民族部落中繁荣，他们的统治者和领袖家族，保护和支持宗教活动。丝绸之路，是印度佛教之源的自然交通路线。所有这些因素，对于佛教僧侣社团的建立贡献良多，他们建造寺院，形成一组在敦煌南部小河谷沉积石头的粗削石窟，据载，始于公元 366 年，第一座窟由僧人乐尊建造。建造继续了大约 1000 年，而后，莫高窟成为中国的佛教中心之一，因其在雕塑、壁画以及丰富的文献方面的艺术成就而闻名于世

---

1 J.Edkins, Chinese Buddhism, London,1879,pp.101-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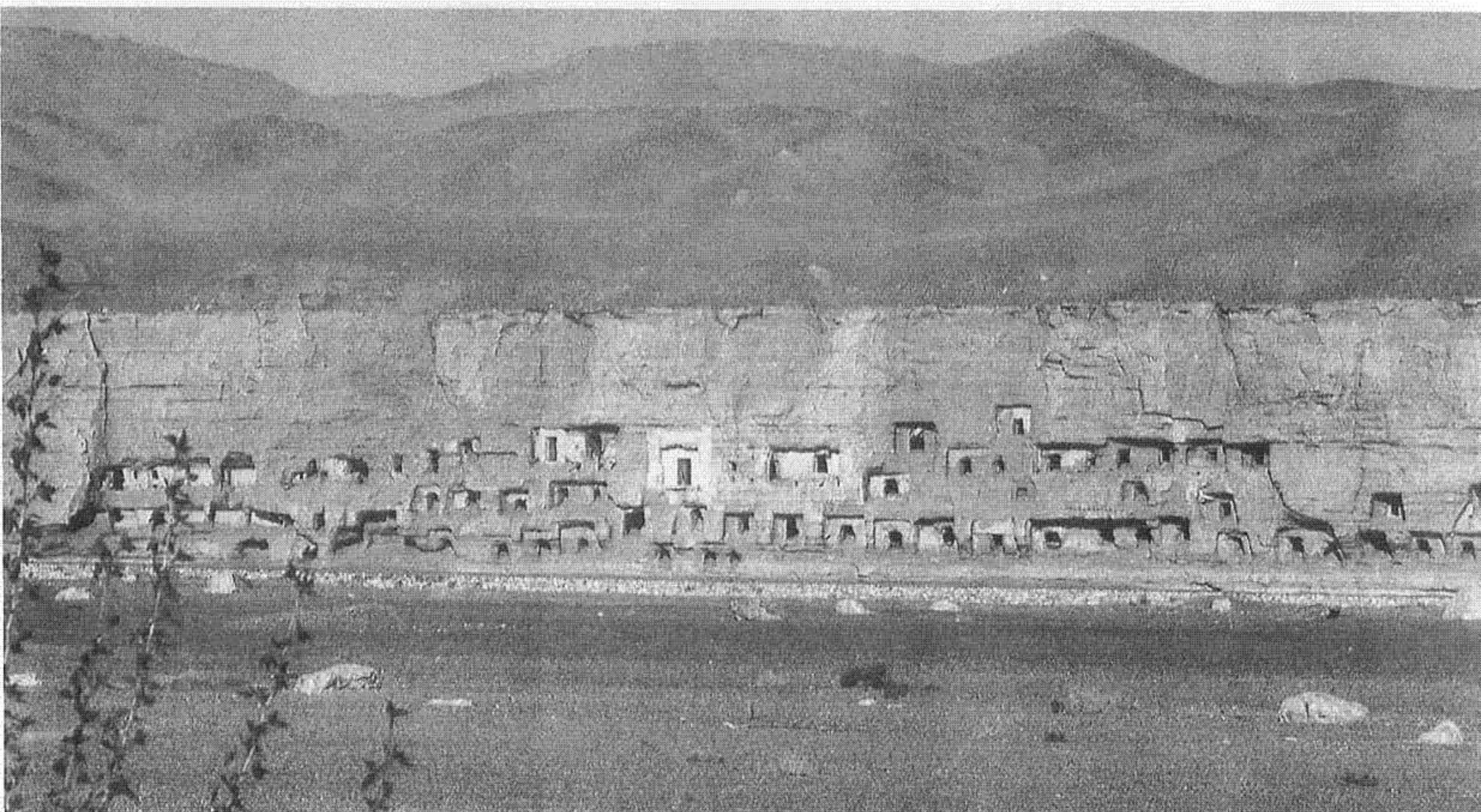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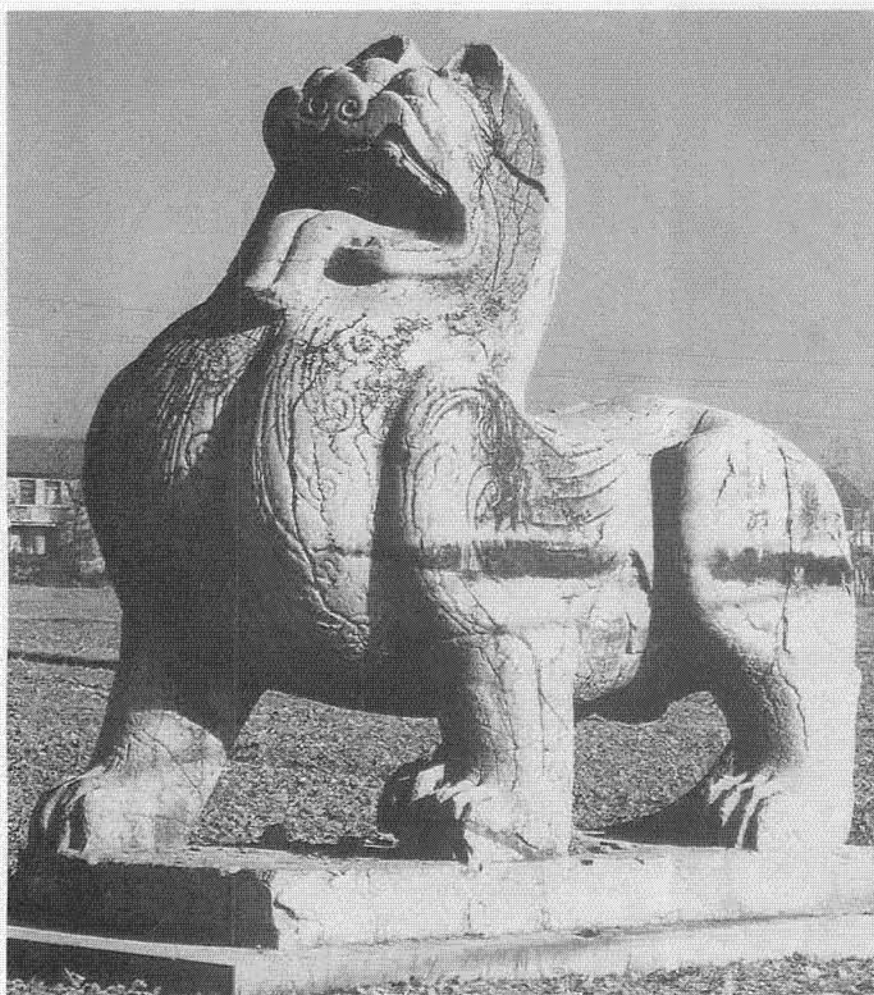






图 3.2.15，16 印度的第 28 代长老达摩跨过长江，离开了梁代（公元 502–557 年）的武帝（公元 502–549 年）。参见仇英的绘画（1510–1551 年），作者收藏。

皇帝曾经邀请这个印度的长老到南京皇室，但是，长老对于不能受到启示的皇帝不满意，便动身前往河南洛阳之东的嵩山少林寺，洛阳在那时是北魏的都城，那里的佛教非常繁盛。在这里，达摩建立了佛教的禅宗，并成为中国佛教的第一个长老。他在 535 年圆寂，并在洛阳之西下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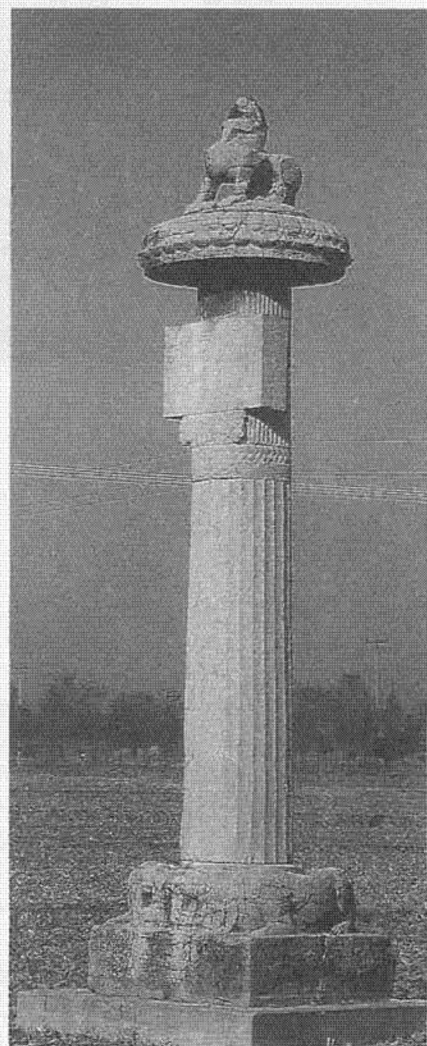


图3.2.17 来自梁代武帝衍的兄弟，武侯萧景陵的有翼的石狮。他在523年被埋在这里，陵道两侧的石雕，是公元6世纪纪念性艺术的非常动人的实例

图3.2.18 在陵道上有凹曲的石柱，表明了印度艺术在南京武帝宫廷里的影响。陵墓坐落在城市东北（参见4.3.1.8 no.8），柱子上的石碑篆刻有翻转的书法，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实例

渐趋统治越来越多的农耕定居地区，并在整个帝国建立了汉人式的官僚治理机构。某种程度上，他们以汉族妇女为妻，并在她们的强烈影响下，甚至完全改变了游牧祖先留下来的生活方式，正像以前多次发生的那样，古老神圣的洛阳都城如此吸引北魏皇帝。公元494年，他将宫廷从围绕现今山西北部的大同移至洛阳，从北部的边缘地带跻身进入农耕定居的心脏地带的中心位置，为此，他必须完全重新建造这座古老的城市。因为，洛阳在公元311年被匈奴人毁坏以后，一直是一片废墟状态。

3.3.1 北魏洛阳(公元385—550年)

重建，始自汉代旧城墙内的区域。然而，南部的宫殿被废弃了。在城市北部的新宫殿现在比汉代宫殿略小，仅占地0.85平方公里，其主要大殿坐落在中心偏西，这样，南部入口被转向南墙的西门。正如邺城那样。衙门机构坐落通往宫殿的路边。整个大都市区域根据前魏（不要与北魏混淆）都城邺布局的基本土地使用原则而进行布局。一个相当细腻的、对于北魏都城洛阳的描述留存至今，因而，很容易将这种描述与近期的考古研究相联系。因此，关于这座城市如何规划，及其在公元6世纪前1/3时间段的鼎盛时期里景况如何，我们可以给出一段相当详尽的描述。

公元493年，当决定在洛阳建立北魏帝国都城时，皇帝颁布了一套基本的条例和法规，用作土地的使用和一般布局，其观念，就是将北魏社会不同的阶级分开，正如由一个世纪以前朝代的建立者曾经实行的那样，并应用于前都城—现今的大同地区那样。城市由一条东西向的大街分为两个部分，北边是宫殿区域。居住区域，仅仅允许建造在这条街的南面或是在城墙以外。这些居住区，又因为不同阶层的人，而被划分为几个坊；官僚与普通人区别开来，各种职业的每一种人，包括匠人、屠夫、酒商、贸易者，等等，都有他们相应的居住区。在以前近大同附近的都城，这些坊区具有不同规模，估计是根据相应的社会组团而决定。但随着在重建过程中新都城的成型，萌生了一个统一的坊巷体系。因此，在公元501年，测出一个从东到西20里和从北到南15里的面积，整个大都市区占地300平方里，城墙围绕的洛阳城居其中心。在洛水南面，当时更向南流，又测量出了另一个地区，增加了20平方里，因此，大都市区增加到320平方里，正如在文献中所记载的那样，根据北魏的459米等于1里的度量单位，这相当于67.4平方公里。公元530年左右，这里有109000户家庭，总人口约为550000人口，或每平方公里超过8000人。

在这个限定的区域内，建有220个坊。标准的坊占地1平方里，并由一座有着4座城门的墙环绕着，有2个看门人，4个低一级的官吏和8个卫兵在每座门把守。每一个坊有其特别的名字，虽然仅有44个坊留存下来，其中9个坐落在城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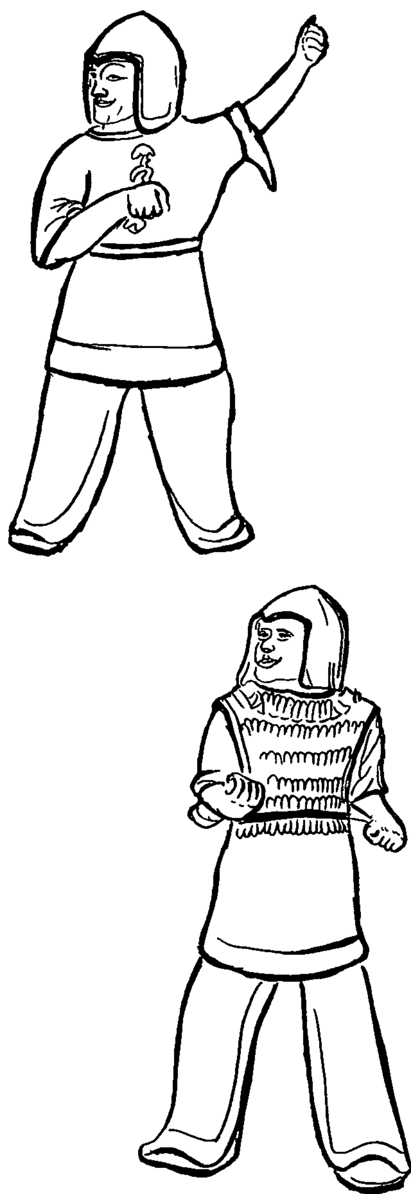


图 3.3.1.1 公元四和五世纪两个北魏武士，从当时墓室中的泥雕塑，这些雕塑并不是讽刺画，而是表现了准备战斗的实际的装备，没有表面浮饰和特别的装扮

围绕的城市里面。另外30个坊仅因名称而著名；它们坐落在内城以西，并预留作为“皇室贵族居住区”。“这是四海之内又恢复平静的时候，所有边远的各国，都定期向中国进贡赋税。结果，帝国的皇亲国戚和太子们，享有富饶的山川，生活在这富饶的河流与森林带来的富裕之中。他们争相建造花园和别墅，并彼此炫耀。鸿门巨室，纵横套叠，琼楼玉宇，在微风和雾气缭绕中隐现，每家每户都建造高台和塔楼，而在每一个花园里，都有花树曲池，夏天桃树、竹林绽放绿色，冬天柏树、梅树劲现性格”。

在这个西部区域围城之中，另外8个坊，集中形成了大市场，而在其东面紧邻的2个坊，因富商而著名，这些坊的名称，显示了大市场区域的特征：财富坊、金店坊、沽酒坊、卖酒坊、贸易坊、运货坊、音乐坊、音律坊。区域中另外2个坊巷的名称则为，母孝坊、敬逝坊。表明了商店的位置和生意，是为了用于葬礼的个人所有物品。这些物品，被大量地用于那些向坟墓送行的队列，以及在那里举行的仪式。在东部有11个坊，我们知道名称。最东端是小市场，与城市很近的坊区，主要是高官和学者居住区。投靠到魏的大多数南方人居住在南区。居住在伊水和洛水附近的居民，允许保留他们自己的习俗。在这个区域中，有超过3000个家庭，他们创造了自己的街巷，并保留了自己的市场区。出售的大部分商品是海货，因此当时的人称此地为鱼鳖市。这里出售伊水和洛水的鱼，城里的文人和普通人都来这里收购鲜美的活鱼。这时，宫廷渴望远方的人移居这里，南方人在此受到优待，无论怎样，来自全中国的、超过1万户人投靠并迁移到北魏都城。坊巷有序地保存着，并被划分为一排排的房屋和无数的门，绿色的洋槐树在街道投下阴影，绿柳在庭院中下垂，来自世界各地的珍稀商品在这里都可以获得。如果仅仅记录下所知的109000户家庭的居住坊巷，平均密度将是每平方公里59300人，看上去高得毫无道理，所以，至少3倍之多的坊巷是肯定有人居住的。

大都市区由两个县衙所管辖，一个管辖西区，一个管辖东区。再高一等级的是府。府衙坐落在内城的东北角，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区域，因为知府的责任在于管理征集的劳工，这对于城市发展第一阶段的重建非常重要。在帝国直接治理之下，而在当地管理的最高层次，是大都市省级的统治者，衙署坐落在帝国大街直通宫殿大门的南端。其职责在于监督管理其所属的地方上两个较低层次的当地政府的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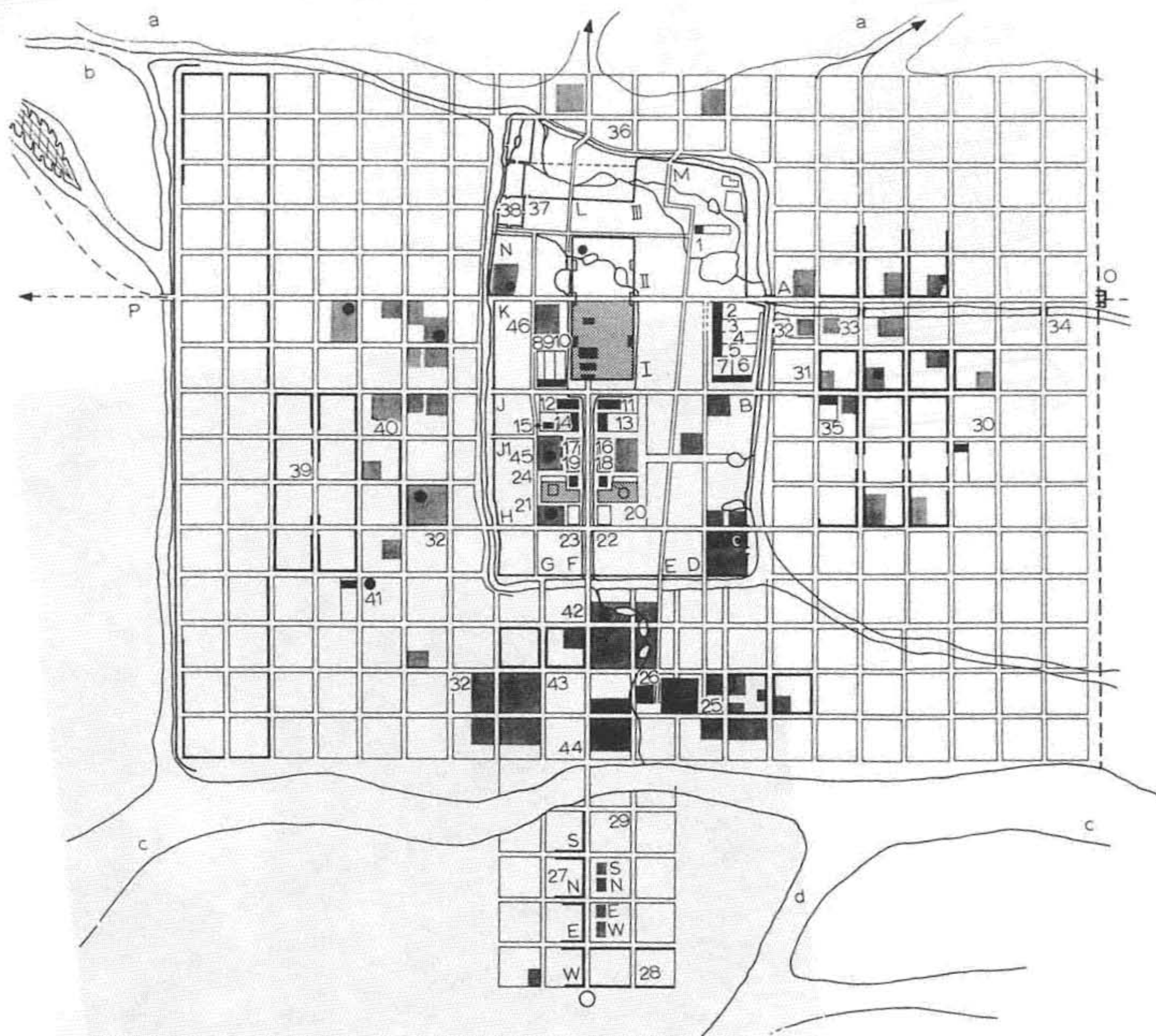
大都市的东界和西界由土墙和城壕划分，我们也知道，一些城门以及通向主要东西大街的桥梁的位置。北边的界限，由邙山陡峭的山崖形成，而南部边界，沿着当时洛河的北岸。都城因此是一个由三个同心的围合圈所组成的聚落复合体，在中心是宫殿区，分成两个部分，北部的内宫和南部的外宫为国家庆典大殿，下一个较大的围合区是内

图3.3.1.2 洛阳城，公元6世纪北魏都城，比例1：40000[1]。
I. 宫殿 II. 苑囿 III. 公园，官衙，市场等。
1. 衙署 2. 苑囿 3. 农业部办公室 4. 圣田的办公室 5. 农业部 6. 太仓 7. 谷类分类的办公室 8. 太学 9. 白马寺 10. 宫廷侍卫署 11. 宫廷左卫府 12. 宫廷右卫府 13. 司徒府 14. 将作曹 15. 九级府 16. 国子监 17, 18. 宗正寺, 19 Office of Civil Appointments 20. 太庙 21. 太社 22. Office of military appointments 23. Governor of the Metropolitan Province 24. 宗教事务所 25. 东汉学府 26. 东汉灵台 27. 来自东南西北的外国人的四个里坊 28. 白象和狮兽坊 29. 近浮桥的南市 30. 洛阳小市 31. 牛马市 32. Tax grain yard 33. 东石桥 34. 七里桥 35. 帝国猎场和湖池的管理机构所在 36. 军事游行和行刑场 37. 洛阳的兵营 38. 金镛城 39. 大市的八个里坊。
主要佛寺：40. 白马寺 41. 公主塔 42. 景明寺（公元520年）胡皇后的7层塔 43. 高阳王寺 44. 双虎庵和报德寺 45. 永宁寺（公元516年胡皇后皈依佛教）46. 长秋寺 a. 邙山；b. 谷水河；c. 洛河；d. 伊河。
内城门：A. 建春门；B. 东阳门；C. 青阳门；D. 开阳门；E. 平昌门；F. 宣阳门；G. 津阳门；H. 西明门；J. 西阳门；J1. 后加的，未命名；K. 长河（天上的紫宫）；L. 大夏（中国）门；M. 广莫门；N. 承明门。
外城门：O. 东墙外的“三门”；P. 外西门. 注：外城的西部是突厥族河阳县的行政区和洛阳县的东部；阴影区为佛教寺院；点划线为塔，以名称著名的里坊，有着作为界限的粗线条。

1 参见考古，1973.4；Mo Pingti，“洛阳495-534”，哈佛亚洲研究学报，26，1966. 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北京，1982；杨衒之，《洛阳伽蓝记》。

城，也划分成两部分。其中，北半部分包括宫殿、御苑和猎场，更多的几个宫殿和一些办公建筑，用于皇家管理。内城南部坐落着国家管理办公室，以及专门用于官僚的居住区域。外城，第三个围合区，主要提供居住空间和都城人口的经济活动，根据社会地位和专业功能，而被仔细地分割成各个坊，在河之南的区域，是一个外城郊，但也是以坊的形式组成。

那些当时对城市的描述首次详细提供了城市结构上的一些新特征，比如，在整个大都市区，分布着无数的佛寺和尼庵。总共有 1367 座佛寺记录在案，其中大约 40 座的名称和大致位置为人所知。但仅有两座依然存在，一座是通过考古学研究而发现，而另一座依然存在，即白马寺，号称是整个远东最古老的佛寺，据说建于东汉初年的明帝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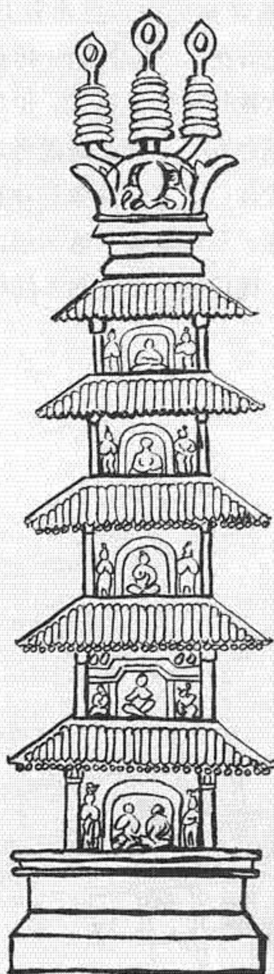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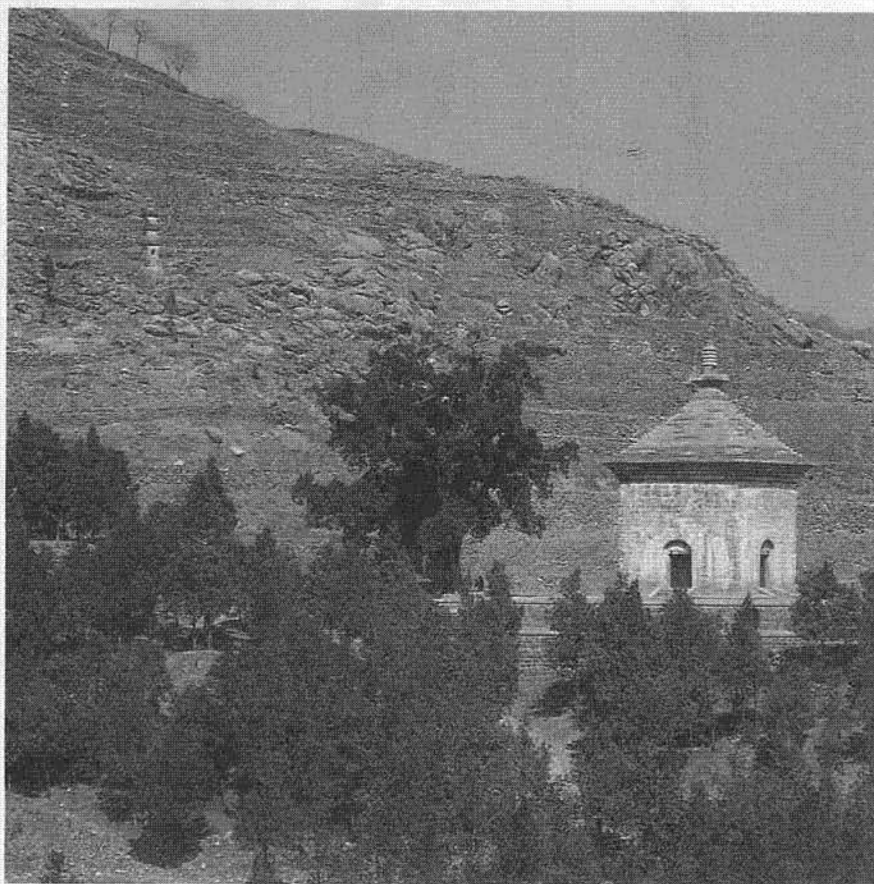
图 3.3.1.3–9 五尊佛之概念（译注：佛教密宗里，供奉的主尊佛亦称"五方佛"或"五智佛"、"五智如来"）。

原先，只有一尊佛的说法，即历史上的释迦牟尼王子。但是，随着大乘佛教的发展，神学家们详尽阐述众佛的概念。公元 2 世纪后，一对佛陀出现在佛经及佛教艺术中，并作为释迦牟尼和他的前身多宝佛，正如在塔的底层所显示的那样，作为再生概念的一个结果，代表前世、现世和来世的三世佛概念，与中国传统的祖先崇拜相混合，这在北魏的云岗石窟佛像中有所体现。五尊佛概念，给三世佛之时间序列增加了空间的元素，即毗卢遮那佛（亦即大日如来）作为永恒原则以及原始创生之源泉，施展其影响至整个宇宙之四极。这一概念在云岗石窟中有所体现，主要表现在最初的一组五尊佛像（参见 **3.3.2.**1–6），而且也许是在此佛塔信仰背后的理念，表示在五个层级上的佛。然而，在同一窟中的 6 号窟，中央有一塔心柱，四边包含有置佛像的佛龛，第五尊半身为方形的柱子，其大概包含舍利。这五方佛的概念与"五帝"那历史悠久的概念十分接近，并且可以回溯到更为久远的最为古老的"四方之极"的概念，它成为中国佛教中塔的布局之基本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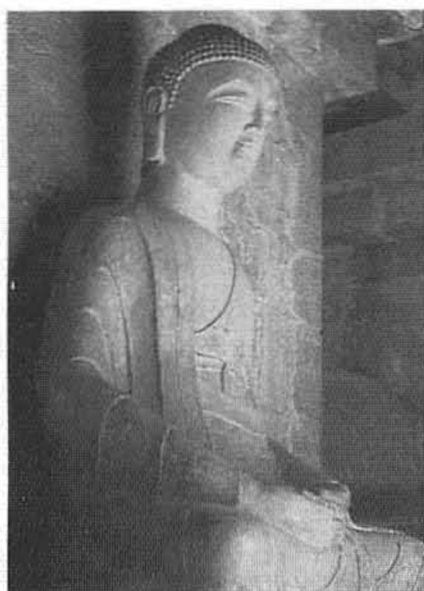
图 3.3.1.3 一座北魏时代的塔，正如公元 5 世纪最后 10 年的云岗 6 号窟一片浮雕上所描绘的

图 3.3.1.4–9 山东柳埠（济南历城）神通寺四门塔，比例 1 ：250

此种布局最早的实例，现存为泰山神通寺北的四门方塔，建于公元 544 年，在寺院以东。它建于公元 4 世纪的前半叶，而且是山东最古老的庙宇之一，大约 15 米高，只有 1 层，耸立其中的是每边有一尊佛，共有四尊佛的中心方形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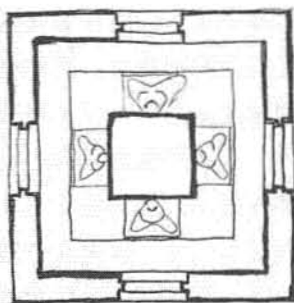






图 3.3.1.10 献佛的仪队。此为佛像基座拓片，现存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内。该佛像为公元 524 年所塑，供养者为某州官。图中，他下马直立于佛像右侧，而他的夫人在左，刚从牛车上下来（北魏朝代）

治时期（公元 57–75 年）。随着这第一座佛寺在洛阳的兴建，其数目，在接下来的世纪里不断增加，据说，在晋代的永嘉时期（公元 307–313 年），洛阳仅有 42 座佛寺，但是后来，当魏国同样选择在洛水和嵩山之间的嵩洛地区作为都城的地点时，佛寺以及讲佛法的法堂数目增加了。王侯和高官们慷慨地奉献出象、马等物，好像脱鞋子一样轻松，富裕的人家舍财就像扔垃圾一样。结果，佛寺一座一座建造起来，佛塔一排排立起来，人们竞相在洛水之畔的龙门石窟建造或临摹佛像。金塔以 50 英尺的高度比拟王朝的观象台，而佛经堂，如秦在长安未完成而废弃的宫殿阿房宫一样壮丽，佛事活动如此密集，不仅木雕人物衣饰丝绸，彩陶塑像也色彩丰富。大多数佛寺很小，与商店住宅和其他建筑物混杂而置，仅由几个僧人住守，据说，逃避财政赋税和强加在普通人身上的劳役，是他们成为和尚的主要原因。但是，有几个我们知道其名称和坐落位置的佛寺，可能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它们拥有感人的建筑物，豪华的花园和公园。在一个例子中，据说一个佛寺占据了两个坊巷，而另一个实例中，我们得知，一座佛寺，原来曾经是一座拥有 6000 仆人和 500 宫女的太子宫。现今的白马寺，在旧城墙以西，依然占据大约半个里坊，然而，塔的坐落位置显示，它在古代时一定大更多。公元 517 年，大臣抱怨说，在建造的 20 年之内，以前圈定作为民居用地的 1/3 的土地，已经被佛寺所占据，显然，皇帝的谕批地，仅仅是在内城建一座佛寺——新近被考古学家调查发掘的永明寺。额外的土地在外城仅提供给一座尼庵。所有其他的，应该坐落在大都市外面，但是，因为佛教由皇帝本人亲自支持，从而受到所有贵族阶层的



支持。帝谕几乎无效。

公元503年，皇帝下令不要再在城内建造塔、寺和庵。但是30年后，又多出十多座佛寺，其中三座，甚至在帝国苑囿区域之内。其中最大的，以前曾是胡皇后所崇太监的宫室，其尺度和装饰如此铺张，甚至连帝国的王府都不能与之比拟。建筑物建于如此巨大的尺度，其柱子和梁，都超过了帝国政府规则所规定的限制。紧邻宫殿处，这个太监，又建了另一座佛寺，事实上，是上述三座中的第二座。两座佛寺一起，形成了一个里坊。新的庙宇之一，在文献中描述如下："长秋寺，刘腾所立也。腾初为长秋令卿因以为名……中有三层浮图（有一座3层塔），一所金盤灵刹，曜诸城内（顶上有一个承露金盘和一个庄严的旗竿，这在城市中可以见到）。作六牙白象负释迦在虚空中（院子里，有一座六个长牙的白象，背上驮着释迦牟尼的雕塑）。庄严佛事悉用金玉工作之异难可具陈（奢侈的佛教装饰，都是由金或玉做成，有着一种独特的难于描述的技巧）。四月四日此像常出辟邪是狮子导引其前吞刀吐火腾骧一面彩幢上索（一个规矩是，这座雕像可从庙宇中携带出来，并在4月4日随着拥有辟邪和狮子等人造动物雕像的游行队列一起到街上举行各种表演：吞匕首、吐火、飞马、攀爬旗竿，以及走绳）。所有的表演都展现出非凡的技艺。他们的技艺和奇异着装在都城是无可比拟的。每当雕像停留处，观者围之若墙，蹒跚而行相互践踏。混乱中，经常有人受伤和遭受意外事故。"[1]

在城区内，有12座从3到9层高度的塔。据说，最高的一座大约1000英尺高。这似乎有些不合理地夸张了。考古学家们对这座塔的基础有所挖掘。他们相信，这塔大概约80米高，依然是一个相当惊人的

北魏的景明寺有三座水塘，其中长着芦苇、灯心草、菱莲及生长着其他水生植物，在所有谷类磨碾中，诸如辗压、粉碎、舂烂成粉等，都由水为动力，寺院里的财富也是不公平的。

一项极其有利的产业——水磨，几乎为具特权的个人、阶层、包括佛寺所独享。水磨被用作为一个主要的动力源，通过碾磨麦子来生产面粉。

1 译者注：参见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上海涵芬楼，1936。页3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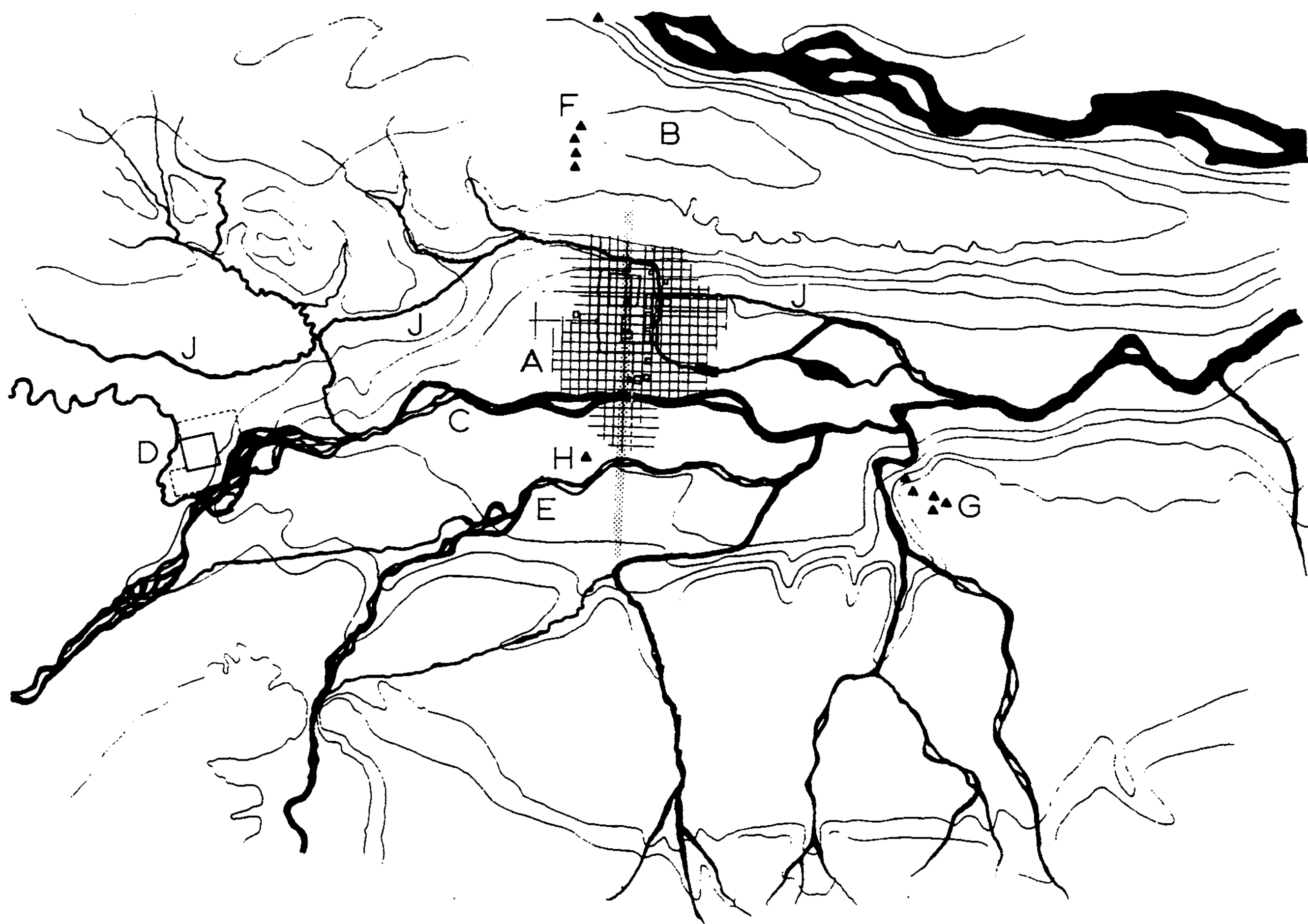


图 3.3.1.11 北魏都城洛阳所在之洛河河谷，比例 1 ∶ 250000。

东汉故都城形成了帝国的城市中心，有宫殿和官署，外城布局使用的度量体系以 1 里方形作为基本单位，并形成了一个 20 里 ×15 里的矩形 (A)，洛河 (B–B) 采取了比今日更往南的河道。但当此河道在后来更朝向北边偏移时，甚至内城的南墙已被冲毁了，再往西南，有一条河道，伊河由此流过山脉 (C)，而那里，著名的龙门石窟坐落于陡峭山壁上 (D)。北魏统治家族和贵族的几座坟墓建在城的西北边 (E)。在其西面是行政中心河南府 (F)，在其东边是偃师县城 (G)，有一组晋代的坟墓坐落在城市以东 (H)

数字。它在 516 年以木材建造，建筑技术一定非常复杂。534 年，它完全被烧毁。普通百姓和皈依佛教者都来看火，痛哭哀号震惊了都城。三个真正出家的和尚纵身火海葬身其中。浓烟持续了 3 个月才完全扑灭。半年后，洛阳被战争完全毁灭。

佛教集会的概念以及贵族舍宅为寺，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宗教气氛，非常不同于神圣之地和旧仪式，以及儒教的国家仪式仪典。公元 1 世纪，佛教在中国的一些地方也许已经存在，并在随后的某个时期繁荣过，但是，北魏统治者们及六朝皇帝们，如此地支持佛寺的建造，以致于整个宗教体系发展成为一个全新的文化复合结构。

在南方，佛寺主要建于偏远之地或山区，然而，在北方，佛寺成为城镇和城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佛教相比，道教也越来越变成一个具有道士和道长的有组织的宗教团体，并且有宫殿般的建筑。每当它由皇家和富裕家庭支持时，正如多次发生的那样，道教的寺院，便被建立起来。从这时起，庙宇和寺院，遵循着与皇帝和王侯宫殿的基本布局同样的建造原则。甚至连公园和

园林，及其他的娱乐场地，也像被添加到宫殿上那样被添加到庙宇中。只有国家仪式的圣坛，还保留其原有的神圣布局。

我们也有一些关于同一时期、在南朝都城建康、也叫建邺、即现今南京的寺庙和尼庵数量的信息。在这里，皇帝是一个狂热的佛教徒，有时甚至出宫，到佛寺之中修行。只是被他的大臣，在他应该履行政事和仪典之时接迎回宫，据记载，在都城大都市区内坐落有500多座寺和庵，100000多名和尚和尼姑聚集其中，但是，没有一个寺院坐落于城内或宫城区域。如今所见的几座寺院的遗迹，都坐落在城外周围乡村的山上。但是，大概它们是公元5到6世纪大都市区的一部分。从可以获得的信息，我们可以估算出，无论在中国南方还是北方，大约10%的大都市地区的人口是和尚和尼姑。

公元534年，北魏崩溃以后，新建立和扩建的洛阳城，又一次被毁，这一次是永远地毁去。因为从这时起，都城的基址永久性被废，直到今天，从来都没有一座城市建于此处。一本关于洛阳佛寺的书《洛阳伽蓝记》的作者，记载了自己于547年再访洛阳时的亲眼目睹：外城和内城都是一片废墟，宫殿颓废，庙宇和寺院沦为灰烬，佛塔仅是荒废的坟墓。城墙上覆盖着野藤，街上到处长满多刺的灌木，在废弃的楼梯下，有野兽生活出没，山中的鸟儿，栖居于荒废庭院的树林中。流浪者和牧牛者，在城中九个街区中来往穿梭，而农夫和犁耕田地的人，在曾经是宫殿的地上种植粮食。这时候，我开始体会到，并不是只



图 3.3.1.12 流经峡谷的伊河水，龙门石窟坐落在西边的岸上（右侧），东岸是琵琶山，那里建造着晚唐的石窟，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就葬在此地

有公元前 12 世纪的微子在殷墟上的悲叹。任何一个周官，如果看到在废墟的宫殿遗址上种了小麦，都会感到悲哀。

公元 534 年，北魏皇帝被划分成西魏和东魏。东魏的都城在邺建立——公元 3 世纪旧魏王国的前都城，这曾是很多宫殿和佛教寺院从洛阳转到了邺。在 1367 个寺院中，仅有 421 个依然留在洛阳，表明在帝国皇室毁灭和迁移后，某种分散的聚落依然存在洛阳。邺的新都城向城区南郊扩展，使其变成了帝国城市。包含宫殿、苑囿、府衙以及贵族府邸。新的区域被测量和设定为普通人的生活区。大致的规模为：从东到西 3240 米（大约 7 里），从北到南 4428 米（大约 9 里），在以前老城的 6.8 平方公里上，又增加了 14.3 平方公里。因此，一共为 21.1 平方公里。南北大街，从皇宫的南门直通两座南城墙中央的城门，将城市分成两个部分，大概也是两个独立的行政管理单元。东市和西市，分别处于城墙外各自的郊区中。都城区大都市区公元 550 年拥有分管 65 个县的 12 个府，371675 住户和 1459835 名居民。但是，这肯定与我们所称的西汉长安大都市区的管理程序不同。

接着是东魏朝代。接下来是 550 年成立的北齐。后者又于 577 年结束。整个邺城随之毁灭。4 年后的 581 年，帝国的整个北部，再次由隋王朝统一。最后，在 589 年，当打败了南朝陈的最后统治者后，隋代的建立者，成功地统一了整个中国。

3.3.2 从神圣之王到高尚的皇帝到佛的转世化身

我们已经看到商周神圣之王的概念，如何在东周王国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渐渐失去影响，直到战国时期，持续战争的统治者，几乎完全以另一种观念彻底取而代之，即纯粹武力和军事优越性，便可以赋予君主之位以足够的合法地位。这种观念，立即在秦代第一个皇帝吞并各国后的傲慢和绝对君权专制中得到最高体现。

在整个西汉的若干世纪里，基于规范理论和孔子的教导，皇帝们改革性地发展了一套新的宫廷治理结构。这通过学者们的努力而得到支持。他们试图重建在秦始皇统治时的焚书坑儒中已丧失殆尽的古典文献。这为帝国学府提供了越来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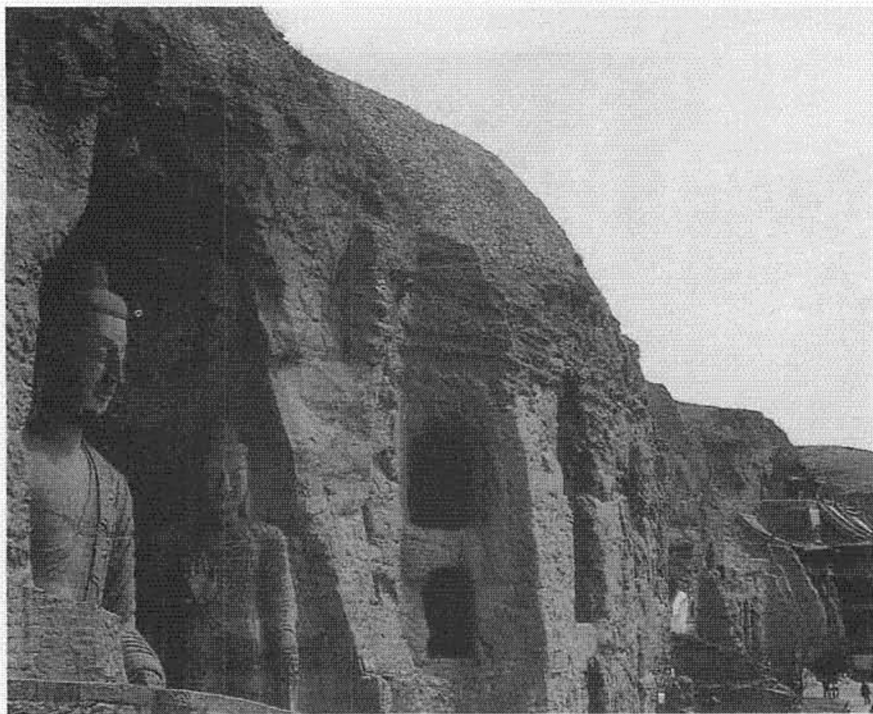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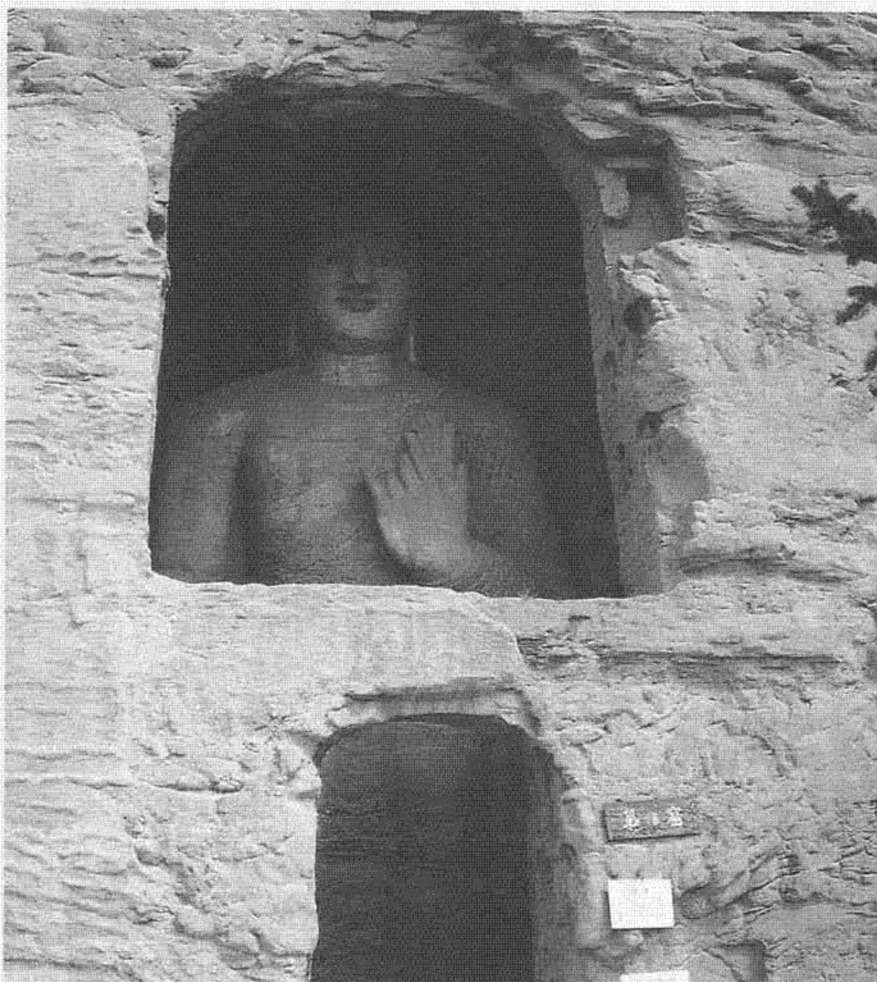
图 3.3.2.1 云岗佛寺，一般的云岗石窟景观，从左边的 20 号窟到远处的 5 号和 6 号窟，庙宇建筑建于 1651 年，在窟的前面，左边的第一批五个石窟是最老的几座窟（no.20–16）。
在北魏朝代 8 位皇帝中，其中一位仅 33 岁的年纪就死去，虽然有些出人意料，似乎自然死亡。第四位皇帝文成帝（公元 452–465 年在位），12 岁时登基，并且在 25 岁时死去，经过僧人昙曜（公元 400–480 年）的建议，在都城平城西边，山西大同附近，武周关隘，云岗的沙石崖上，建造五座具有佛像的大石窟。想法就是这 5 座佛像，应该代表最初的 4 个皇帝和加冕皇子景穆，文成帝的父亲，作为佛的化身

图 3.3.2.2 云岗第 20 号的石窟，表现了道武帝（公元 386–409 年在位），北魏朝代的建立者，在这里代表释迦牟尼佛的化身。这个雕像，遵循的是印度比例法则，宽肩膀，且脸部并未表露出任何中国人的特征，高度 13.7 米

图 3.3.2.3 在 16 号佛窟，表现了文成帝（公元 452–465 年在位）本人，在他的命令下，在 460–475 年间，挖凿出了最初的 5 个石窟。高 13.5 米，脸部也许甚至是其本人的一个真实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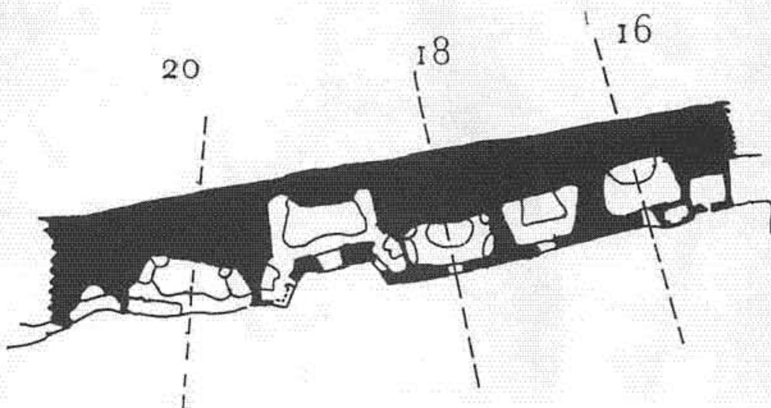
图 3.3.2.4 第 18 号佛窟，也包含了一个释迦牟尼佛，代表了太武帝（公元 423–451 年在位），他实际上支持道教，反对佛教，像高 15.5 米

图 3.3.2.5 关于五窟的主要的地图，比例 1：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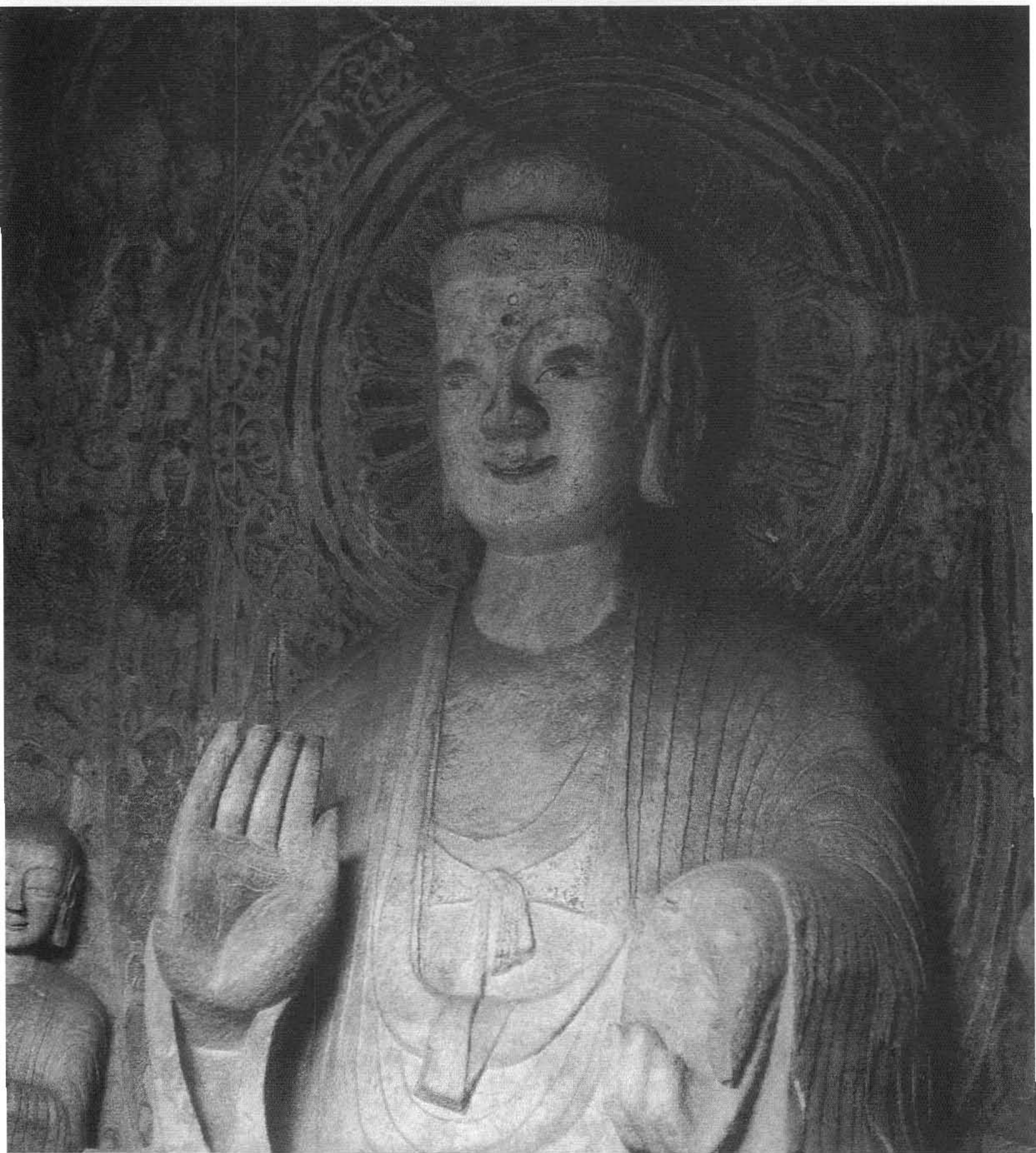


图 3.3.2.6 洛阳附近龙门的宾阳 3 号窟的大佛像（主佛像）。这是龙门石窟中第二个最古老的石窟。建于宣武帝（公元 499–515 年在位）的统治期间。宣武帝最先着手其新都城洛阳的规划扩建。他将这座石窟献给自己的父亲孝文帝（公元 471–499 年在位）。他已经在公元 494/95 年，将其帝室从北部山西平城（近大同和云岗）南迁至洛阳。一般相信这座佛像也再现了北魏都城洛阳的建立者孝文帝。雕像大约 8 米高。动用了 802366 个工日，在 23 年的时间内，建造第一批石窟。据传说，文成帝（参见 3.3.2.3）在 465 年，被他的冯皇后害死，她曾推动北魏社会文明汉化。从大约公元 460 年之后，她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力。当她 476 年毒死自己的儿子献文帝（公元 465–470 年在位）后，作为她的孙子孝文帝（公元 471–499 年在位）的摄政王，而掌握了绝对权力。这位孙子 470 年 5 岁时，在他父亲被强行的逊位后登上皇位。冯皇后死于 490 年，当时，孝文帝仅仅 24 岁，但是，他已经高度沉浸于他祖母的思想，并成为孔子儒教的支持者和保护者，以甚至更大的力量，推动了汉化的过程。他最终创立了洛阳新都。但是，虽然他严格地信奉儒教，在 499 年死后，依然在龙门的宾阳窟中作为佛的化身，当时 33 岁。如果他的死，是自然死亡——他病了大约 1 年——那肯定是为改变那些蛮族人民的费力事情消耗了他的能量。都城依然在洛阳，然而，他的儿子宣武帝（公元 499–515 年在位）本人非常关心大都市区域的规划扩建。当他的第一任皇后和他们的儿子被他第二任皇后毒死以后，他本人在 515 年也被他的第二任皇后毒死，皇后和她的儿子，同样又被他那第三任皇后毒死，恶性循环般地，第三任皇后毒死了她的亲生儿子不久，在 528 年被处死

多的教学资料，在那里，未来的官吏受到儒家精神的教育。为了使皇帝的权力合法化，一种新的概念涌现出来，即贤德皇帝的概念。他的地位，得到上天的支持与认可。这其实是夏商周三个神圣的古代期间就已知道的古老概念。现在，为建立皇帝的行为规则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该概念在东汉朝代完全开花结果。当时皇帝居于洛阳，即周公的神圣之城——成周。在这里，他们也许觉得自己正在继续着神圣周王们贤德的品行。

公元 3 世纪初，东汉结束后，当时中国北方正被来自西北的游牧部落不断侵犯，帝国被分裂成不断变化的、相互争斗的将军们的势力范围，一个接一个短命的朝代相继称帝，贤德皇帝的概念，成为了一个空口号而被滥用。

拓跋氏头领公元 439 年建立了北魏朝代，他们攻克了（现今的甘肃省的）北梁王国，俘获了 3000 名僧侣和当地的官僚百姓 3 万，并将俘虏带往新建的都城平城，即今日山西省北部的大同。这些僧侣中，有几人被安排在朝廷的重要位置，那里，皇帝太武帝（公元 423–451 年在位）非常尊崇佛教，因此，深受那几位僧侣的佛教教义的影响。一个新的皇权思想从僧侣学识中涌现出来，并开始取代神圣之王的概念。已经颇有影响的佛僧，不愿将生命花费在冥想上而离弃日常生活。相反，他们融入到贵族和皇宫官吏之中，讨论政治事物，并表达他们的思想观念："皇帝是睿智的，并热爱真理。因此，他就是活佛，而我们僧侣，应该向他表达敬意，或通过他向佛表达敬意。"以此方式，皇帝被认为是佛的化身，结果，在 460–465 年和 494 年之间，建造于云岗的佛窟寺中的每一个永恒性的佛像，都再现了每一位北魏的皇帝。

当北魏朝代的都城，在公元 494 年，从平城迁往洛阳时，孝文帝（公元 471–499 年在位）立即命令将具有佛像的佛窟嵌进龙门岩石中。在现今城市之南大约 15 公里处，伊水穿过城市，孝文帝的继承人、宣武帝（公元 499–515 年在位）建造了更多的石窟，特别是在宾阳，工程从公元 500 年到 523 年持续了 23 年，用了 802366 个赶工的日夜，皇帝将这些石窟奉献给父母，不仅隐含转世化身的概念，同时也表现了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对于前辈所有的忠孝。这里，在中原皇帝宝座上的突厥族皇帝，将佛教与儒教结合。如我们所预料，对于城市布局的旧规则，没有文献可依，因此，北魏洛阳平面图上，肯定不会发现到幻方概念的痕迹，或者那种具有阴阳意义的神圣数字。"都城从东到西 20 里，从南到北 15 里，除了寺院、神坛、宫殿、官衙和大臣府衙，城市被分成各种坊，每一个相当于 300 步的方形，总共有 220 个坊，这是《洛阳伽蓝记》作者亲眼所见的基于事实的描述。

3.3.3 隋唐都城长安，洛阳、扬州和成都

隋代的建立者，隋文帝（589–

604在位）在长安地区、这个西汉的旧都建起自己的都城，被东汉的皇帝废弃之后，这里曾经作为几个北方朝代的皇室，不断地被毁灭和重建。到了582年，隋文帝在旧汉城的东南，建造了一座全新的宫殿，占地大约2.7平方公里（仅仅是旧汉宫的一半大小），也许因为旧的汉城不再适宜了。不久后，在宫殿之南，增建了一座皇城，作为官吏办公与居住的府邸。这座新城，叫大兴，又增加了5.04平方公里。当宫殿和城市的城墙完成后，为两个新宫殿又增加了更多空间，整个面积增至9.25平方公里。589年，当帝国统一时，皇帝决定将已经发展的大都市区域，整合成一个都城整体。为此，实施了一座全新的布局。这一布局，运用了前面几个世纪中发展的城市规划思想，即邺城和北魏洛阳的城市规划思想，但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尺度。最终，新的都城大兴占地大约8400平方公里面积，并且成为19世纪前世界上任何地方所设计的都城中最大的都市。

城市如此巨大，没有郊区，结果，正如邺城那样，西市和东市全都坐落于城内，东西大街，将城市分成拥有宫城、衙署和贵族府邸的北半部分和南半部分的一般居民区。从城市南门直通宫殿的南北大街，又将城市分成西部和东部两个部分，并将其分成县级层次的独立自治单位。然而，总体的街道模式，将城市分成大小不同的街区或里坊。在皇城东西两侧的北部分，有一些大的街区，也许是为贵族规划的大型府邸。东西大街以南，街道将城市分成三个部分，在皇城正南的中央部分包括最小的里坊，沿着南北大街，分划成4×9个里坊，总共36个。而东西两边的两部分，每个分成25个里坊，并包括两个大的市场，每一市场占两个大里坊的地块。可是，当测完整个区域，并可能计划用于居住之地时，很多官吏离开了北部的皇城，而在外城建造府邸。据记载，在那最初几年里，有40座官府，5个太子宫殿和7个公主宫殿坐落在外城。此外，我们知道，在大兴城内，有64座佛寺和27个尼庵，其中很多集中围绕在大西市。我们第一次所闻的一个新的特色，即10座道观和6座尼庵，主要分布在外城西郊。里坊的大小，并没有像北魏洛阳那样，追随1平方里的模数。大多数是大得多的，并在四周筑墙，且四个城门紧闭，两个大市场也是如此。但是它们每个内部又分成九个部分，以满足不同的贸易。

为了给城市提供水，同时提供灌溉而挖掘了三条渠道，将山泉之水输进城南，而后再从北面输出，排放进城市北边的渭河之中。在此，在城市和河水之间，建造了皇家苑囿。其西部包括了旧汉城，并由一座东西27里，南北33里的墙所围绕，因此，占地像城市的三倍之大。这个大都市区，大概很快就安定下来了，而且，也出现了像在秦和汉大都市区域同样的问题，就是养活突然集中增长的几十万人口。此外，在北部和西北部的游牧民族和半游牧民族，并非同样值得信任。为确保他们被遏制，重修了好几处长城，哨卡也被建立，因此，又必须提供粮食，衣服和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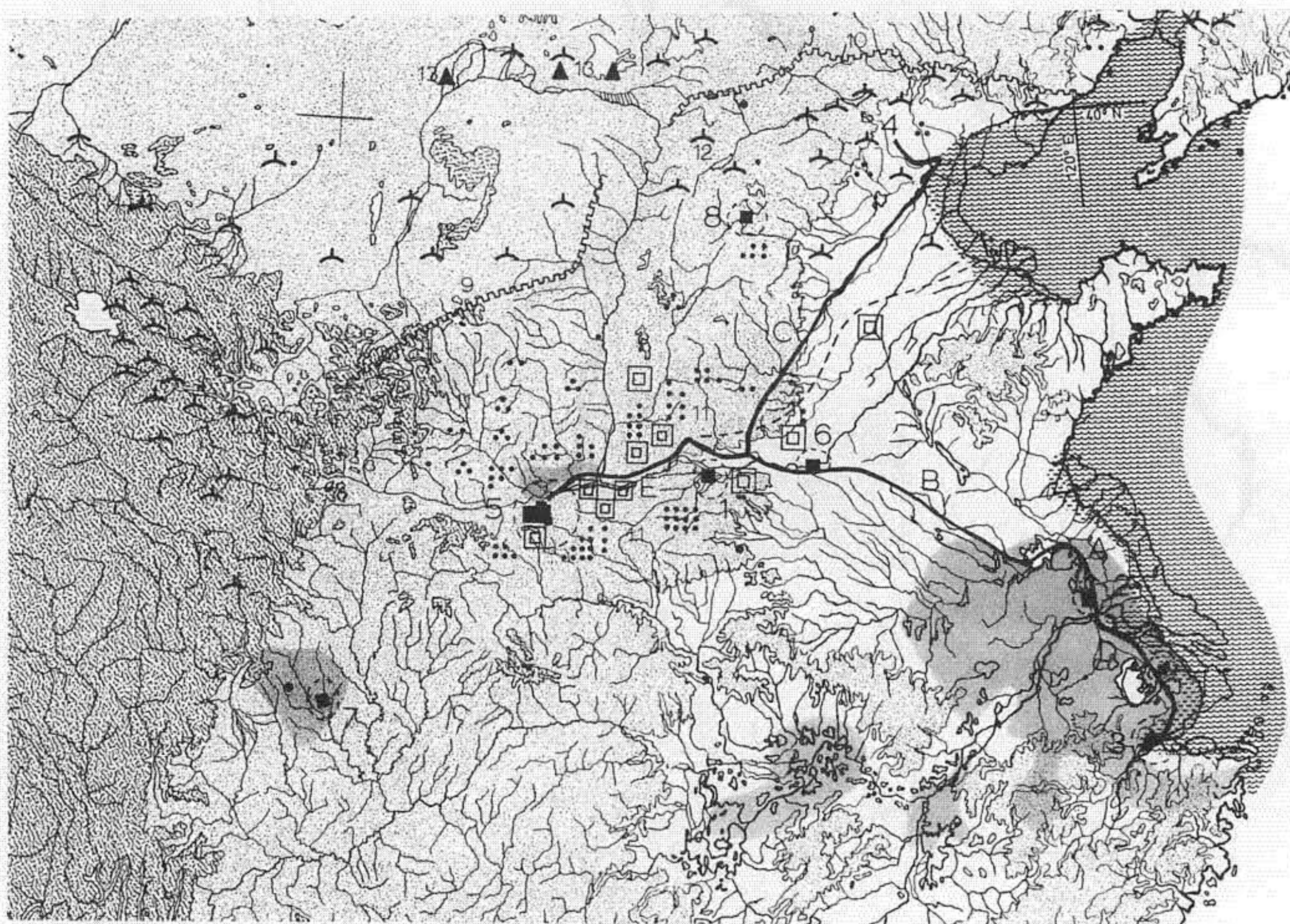
于是，开始了一个发展交通运输网络的工程。第一步，是重建与渭河平行的早在公元前3世纪末秦始皇时期就开始建造的从黄河到都城的运河。这条运河称为漕运运河，同时，重建了连接黄河与更南边的淮河的一条运河。在很多地方，甚至拓展了全新的河道。以此方式，经济上很重要的南部区域与都城区域连接起来。为确保连续不断的粮食供应，沿着运河，建造了大粮仓，储藏量达到160万吨，最初的十年内连年丰收。隋代的开国皇帝报告说，已经储备有足够的粮食，以确保整个国家在几年之内不会受到饥荒的威胁。

隋代的第二个皇帝，炀帝（公元604–617年在位）继续这个工程。最终，在公元7世纪的最初10年里，中国的大运河成型。它实际上连接了在浙江省新成立的杭州城与北方的现今北京一带的区域。整个体系的中心是洛阳，那里，建立了新的次级都城。隋的第二个皇帝在洛阳建立新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虽然，公告仅仅提到其神圣性以及地理位置的中心性，同时承认，洛阳的废墟是不宜建新皇室的。公元604年的公告这样写道：自从古代，在洛水之滨的城市，就是帝国领域的中心之都，这是天地和谐，阴阳和平共处之地……虽然，成周废墟不再适宜重建世界中心，但是，在伊和



图 3.3.3.1 陕西渭河河谷，隋唐都城长安所在，比例 1 ：250000。

公元 582 年，在汉代古都长安（A）废墟的东南，隋代的文帝建造了一座新宫殿（B）。不久，又增加了用于行政管理的皇城（C）。接下来的若干年里，一座宏大的新城（D）在宫殿之南再次铺开。北部，御苑（E）有围墙环绕，该围墙也环绕了汉代的旧都。原用于运输粮食的与渭河平行的运河（F），在修复后，成为公元 610 年完成的新大运河系统的一部分。渭河之北建有隋文帝的连襟、也是唐代奠基人李渊（618—626 年在位）之父李昞之墓［兴宁陵］（G）。渭河之北的另一座陵墓顺陵（G1）由武则天大约于 660 年为其母所造（623—705 年）。公元 618 年，唐代建立后，城市发展没有间断地继续着。634 年，第二位皇帝，李世民（626—649 年在位）还在城墙之外的北部兴建了一座新宫殿——大明宫（H）。后唐时期，新的居住区在城南发展起来，主要在所谓的上林苑山区乡野一带为上层阶级建造别墅。此处也散建了几处佛寺（J），别墅中最著名的是高官、诗人和画家王维（699—759 年）在蓝田（L）东南所造的辋川别业（K）。城市以东约 25 公里处的骊山北坡有温泉华清池（M），这是自西周最后一位帝王、周幽王（公元前 781—770 年在位）时代起就频繁使用的冬季疗养胜地。城南约 25 公里处是秦岭群山，该区域升高到 2600 米的地段为终南山所在（N）。此地，建有几处佛寺与道观。例如南五台寺（b）或几座老君祠（d），著名的唐代诗人白居易（772—846 年）等同样的学者、诗人、画家和其他自然爱好者用作夏季避暑地



10
4
40° N
12
8
9
C
11
6
5
E
1
B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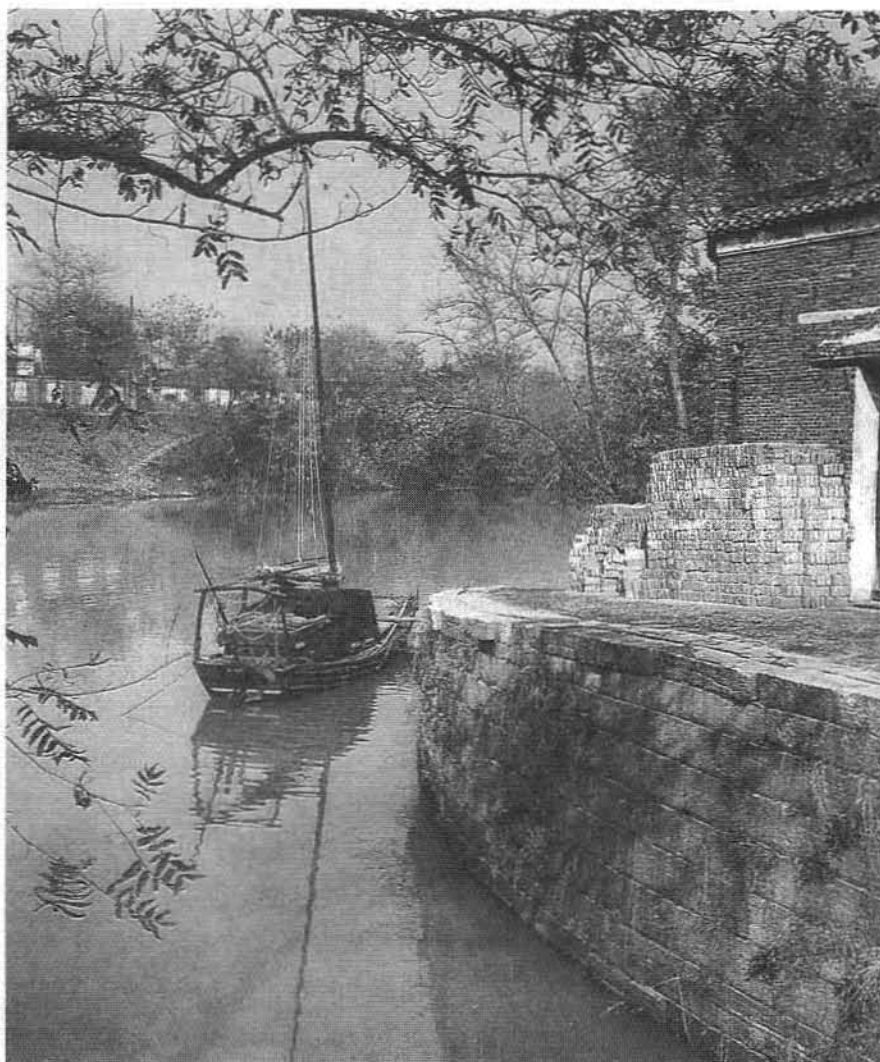


图3.3.3.2 江苏扬州附近的大运河，比例：1：10000000[1]。

该部分是丹阳区段的一个分支，最初由公元前5世纪时的吴王建造，隋代，与扬州城一起建造修复。地图表现了610年与唐代军事防御设施一起完成的大运河体系。

完成于587年的长江和淮河间的丹阳区段（A）是最早的部分，先是在605年向北部延伸，将淮河与黄河相连，即通济渠区段（B）。为此，招募了大约500万的劳工。北面的部分在608年投入使用，并被称为永济渠区段（c）；最后，江南区段的运河（D）将长江与钱塘江相连，并于610年完成整个的运河体系。这包括从黄河沿着渭河（E）直达都城长安的区段。

中心由洛阳城（1）与隋代的南方都城扬州（2）相连。最南部的城市是杭州（3），由文帝和太子的近亲杨素于591年建立。北端是当时的新北京地区，为帝国的北部边防哨卡（4）。在那里，上面提到的杨素，成功地挫败了突厥部落，并需要一条有效的供给运输线，这就是大运河当时的规划。就像杨素所有行动所表现的那样，他可能是整个运河和城市系统背后出谋划策的智多星，这是一个通过权力中心和交通路线联系来稳固权力结构的大体系。隋代第二个皇帝，炀帝，奢侈滥用这种体系，从而倒台。最西端是都城长安（5），另一个主要运输中心是今日开封（6）。在此，主要南北高速路穿越大运河。7. 四川成都，8. 山西太原，9. 公元586–601年的长城，10. 580年的长城，11. 7世纪的军事基地，12. 8世纪御林军驻地，13. 要塞（堡垒），方形为粮仓，阴影部分为稻谷（大米）生产区域

图3.3.3.3 今日从文峰塔所见的跨越扬州城的大运河

图3.3.3.4 扬州以北的大运河一处昔日的登陆地，那里，先前的盐运运河从东部进入主要的南北丹阳区段

1 参见 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1973。

图 3.3.3.5 隋代第二个皇帝，炀帝（604—617年在位），另一个人可能是杨素。摹自阎立本的卷轴画（ca.604—670 年），收藏于美国马塞诸塞州，波士顿，工艺美术馆。炀帝是两座新都城洛阳和扬州的建立者，他的肖像，可能基于一幅当时的速写。他过着奢华的生活，但死得悲惨，埋葬于中国所有皇帝中最虚饰的、大概在扬州城南北轴线上城市之北的坟墓中（参见 3.4.1.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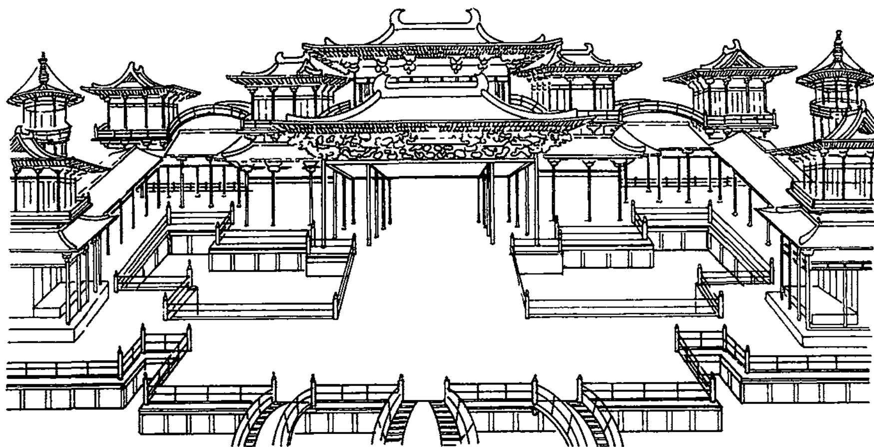


图 3.3.3.6 一座唐代的宫殿建筑，摹自甘肃敦煌莫高窟第 148 号窟壁画，表现了佛教的西方极乐净土。整座建筑群似乎只是装饰性的，前面有开敞的平台，环绕着塔楼、廊道和开敞的厅堂。它也许代表或再现了炀帝——这位隋代第二个皇帝对建筑装饰的极度狂热，这受到唐太宗李世民的批判



洛可以建造东都，在那里，我可以建立具有各种功能的内阁部，以便创造一个人文中心……然而，在墙上无需不必要的装饰，屋顶不需要建造奢侈的屋檐，但是，新的宫殿应作为简约的典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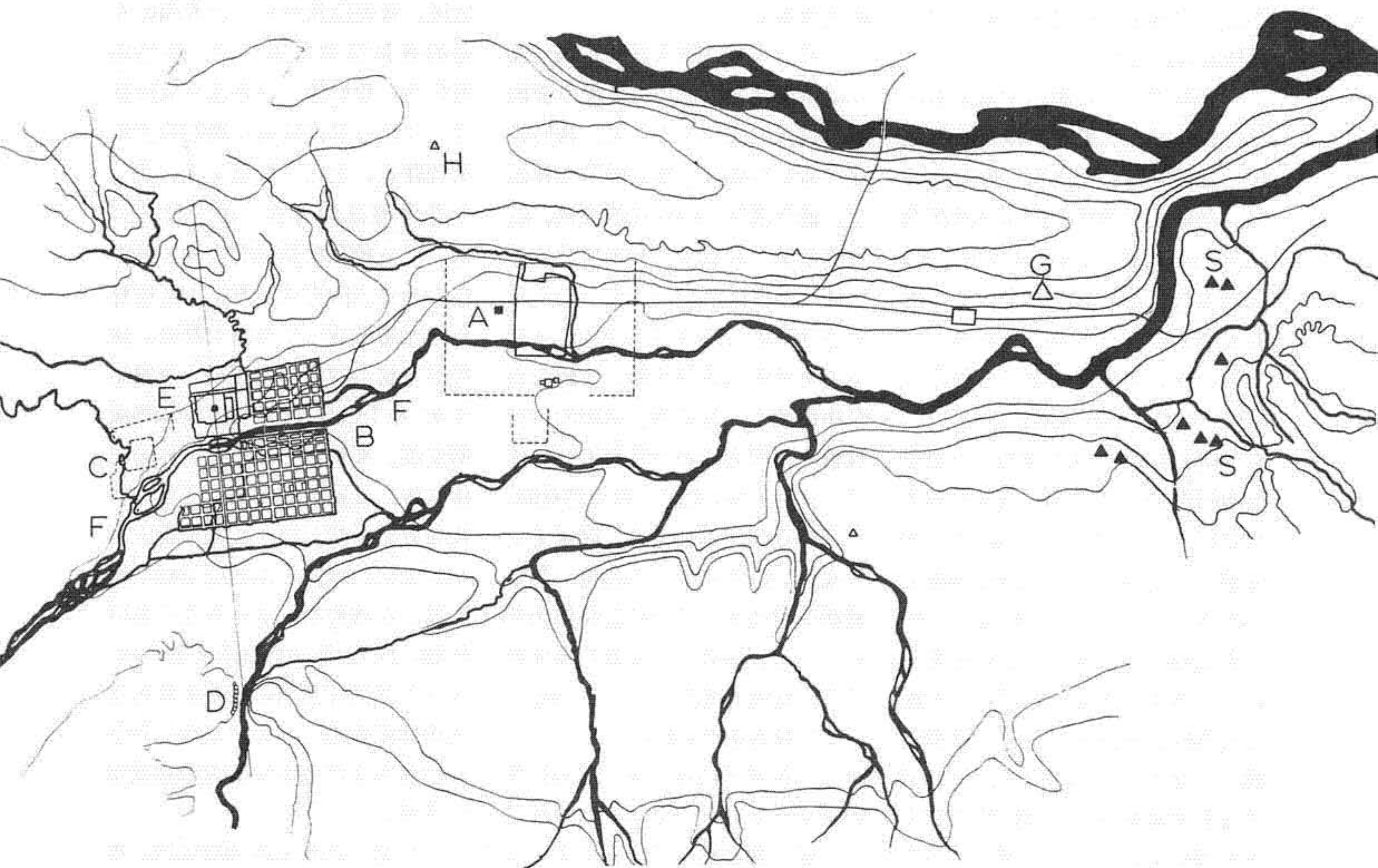
从古本《竹书纪年》及考古挖掘中判断，关于成周城市在此之前的 800 年历史，关于其在世界的“中心的位置”倍受尊崇而且神圣，关于传说中神圣之王们的简约等等，其实只是狂妄自大的隋炀王所使用的空洞辞藻，来掩盖其对虚名的热情。他势力尚弱时，得到大臣杨素的支持。此人在文帝统治期间，已经获得了高至宰相之职。杨素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精明且肆无忌惮。已经负责监管大兴西部宫殿的建造，因之而降山填谷。他曾经因为建筑物奢华的规模和装饰而遭文帝谴责。然而，在炀帝统治下，他能够继续进行所有他所希望的奢华。他所负责的洛阳新东都的建造，几乎在他死后两年就基本完成。十分有趣的是，杨素在洛阳为炀帝建造的最为豪华的宫殿，后来在唐代实际的创立者，也是唐代的第二个皇帝、太宗李世民胜利之后完全被烧毁。李世民评论道：这个由人民鲜血所建造的豪华宫殿，是导致隋代毁灭的原因。作为历史警世后人的例子，这样的建筑应该被毁掉。

选择洛阳一个更实际的原因，是因大兴在渭河谷的地理位置相当遥远，虽然渭河谷建造了运河，到达那里依然困难重重。然而，一个更为个人化的原因，是因为新皇帝对于建筑宫殿亭台和御苑有一种几近疯狂的热情。他更喜欢在全国各地旅行，喜欢乘大驳船沿新运河航行。在公元 605 年，运河刚刚完工，他就向南方首航，所有皇室和近侍伴随而行。驳船的队伍长达 100 多公里，而仅拉船一项，就需要大约 80000 人。从洛阳可以沿着长江支

图3.3.3.7 洛阳的洛河河谷，隋唐的东都，公元604年由炀帝所建，比例1：250000。

公元534年，北魏都城不再存在时，仅有1/3的寺院重建起来。惟一存留至今，并在后来经过一些再建的是白马寺（A）。隋代新建立的洛阳城（B），坐落在旧洛阳城之西，离周代旧王城（C）废墟很近。新建的洛阳城主轴线，坐落在北部的邙山和南部的伊河的龙门峡之间（D），宫殿沿着该主轴布局。洛河将城区分成北和南两半（F）。这是个不断的威胁，因洛河的泛滥会淹没大多有墙围绕的城区。但城墙建造得很好，多次抵御了来自强敌数月的围攻。

武则天居住洛阳期间（大约658年直到她705年死去），她的长子在高宗还在位时的675年死去，时年24岁。尽管他只是皇帝的第五个儿子，他的母亲，还是设法使他加冕为皇太子。他死的时候，一座巨大的陵墓（130米×150米，22米高）在洛阳城以东约35公里处邙山（G）的山坡建造起来，这就是所谓的皇太子李弘的恭陵。武则天的二儿子李贤，也被加冕为皇太子（章怀太子，参见3.3.3.8），但在680年被废成庶人，并于684年被杀。她的第三个儿子李显，第三皇太子，成为中宗几个月后就被废，这都是因为武则天篡权后封自己为新立周代的"皇帝"。她死后200年，在唐洛阳城的东北邙山，建造了另一座陵墓（H）。这是为另一位几乎成为唐代最后的皇帝昭宗（公元888–904年）所建。其时，他在洛阳被杀，长安已被全部毁坏。新的东都是开封，此时的洛阳作为西都，取代前西都长安。至1126年，洛阳作为200多年来几个朝代的西都终于被毁，而在辉煌的唐宫废墟中，建造了一个小行政中心。更向东部，洛河以外，圣山中岳嵩山的西山脚处，北宋的皇帝们建起了他们的皇家墓地（S）



流轻易南下，并在下游、现今的扬州，建立次级都城。这在渭河谷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三门峡一带的黄河峡谷航行，非常困难危险，每年仅在很短时间里可以通行。

洛阳的新城，坐落在旧成周以西约 15 公里处，是一个完全新的基础，而其布局与大兴在很多方面不同。在公元 604 年，隋炀帝登基不久，宫殿和城市的建造就开始了，并且有大量的被征劳力，而且，在极短时间内就完成了。成千上万的富商家庭被命令迁入城市，并在那里定居。这样，在 10 年之内，大约公元 615 年的隋代末期，历史记载 202230 个家庭，超过了 100 万的居民被安置在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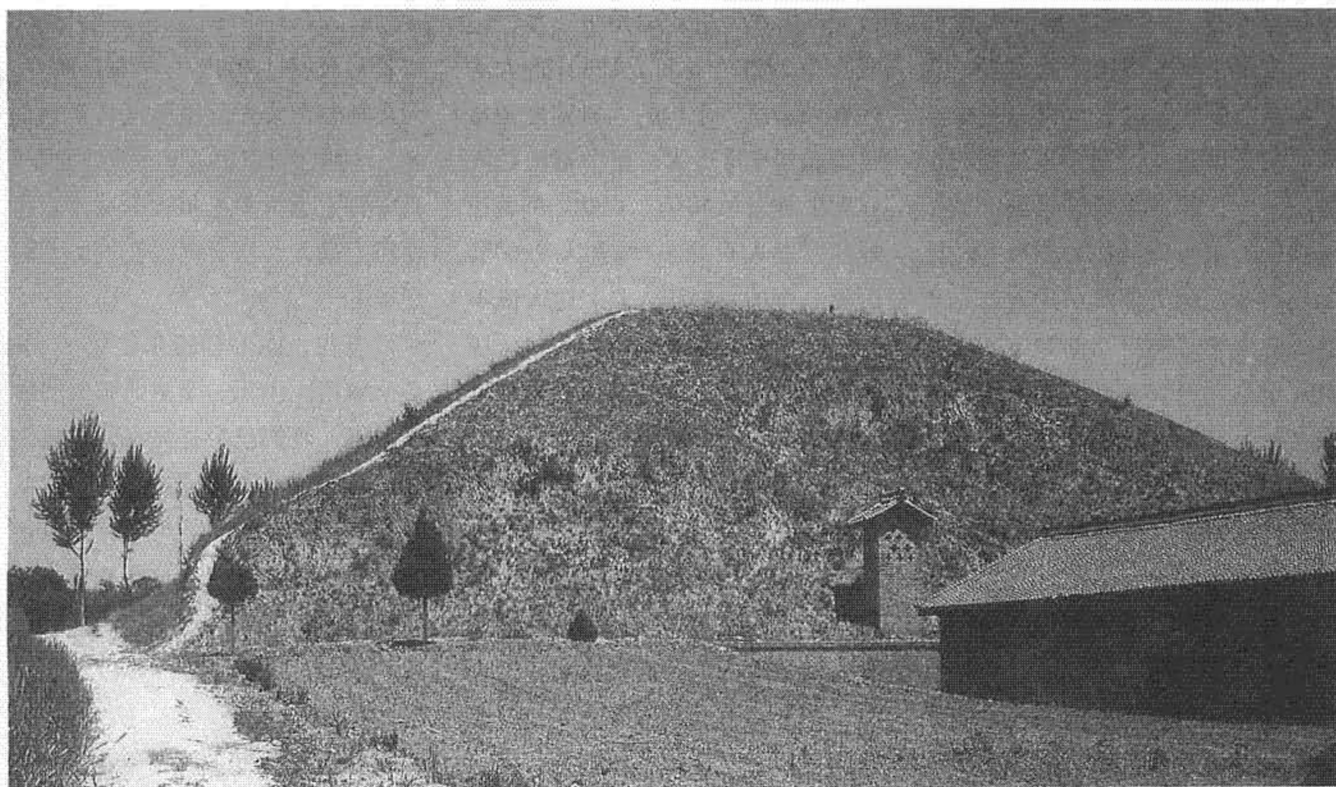
新城的布局，由四个完全不同的部分构成：宫殿、宫殿东北部地区、宫殿正南部地区和宫殿东南部另一个最大的地区。宫城坐落在西北角，同其周围的宫殿和官署一起，占地大约 6 平方公里。在宫城东边有大小不同 29 个里坊，占地 9 平方公里，在其中间是北市。洛河在宫殿以南，从东到西将城市一分为二。宫殿南部有超过 84 个里坊，占地整个面积约 23 平方公里。其中有两个里坊形成了南市，包含有超过 3000 家商店，分成 120 个部分，400 个小旅店。在这环绕市场的地区，居住着富商，外国来贸易者也聚集于此。在城市以西是皇帝御苑，占地大约 625 平方公里——是大兴御苑的三倍之大——而且包含河南府旧的汉代城池废墟，包含旧的西周王城所遗留的部分。人工湖泊、十六座宫殿和星罗棋布的亭子、园林、人工开挖的、用于避暑或娱乐的洞穴和其他娱乐之地，以及来自全国的珍惜动物和植物，都用来为皇帝消遣娱乐。皇帝所到之处，都寻找地方建造更多宫殿，无论是他发现的、或获赠送的珍稀物品，都带回到御苑里。建造宫殿、挖掘运河、领导战争、建造防御城墙、大范围旅行，十几年这样无休止地活动，他的资源及整个国家的资源消耗殆尽。百万人民经历了重重困难，结果，全国造反，在保护战中，皇帝于公元 618 年在南都扬州被杀。不久，唐代在大兴建立，并重新命名此地为长安。

将长安或隋代大兴的布局，放在城市发展和中国历史进程中帝国城市设计的文脉中来考查，我们将这一布局称做城市规划的第二种原型，而在洛阳，即周代的成周，应该算是第一种原型。如前所见，对这两个都城区域间的比较（如果不是竞争的话），是关于道德的论述和文学著作中古老的主题。比较与竞争中的重点，总是放在洛阳的精神性质上，即它的神圣性和道德的优势。其对立面，是基于权力游戏的、与严峻现实相关的考虑，即对于皇帝来说，以其军事上的优势，其轻易的防御要塞，长安被选择作为帝国居住地。或者，正如我们可能所说的，这便是理想主义的道德概念，与实际权力安排的对立。

旧的神圣的成周城几何和抽象的模式，本身是一个神圣的象征符号。是宗教和哲学传统体系中，盘根错节的遥远起源的一种模式——一种组织思想和反省的模式。它原先作为一种魔幻工具用于实际，后来总是与仪式与宗教相连系。以这种方式，它也应用于皇室布局、都城布局。其基础，是一种极为重要的仪式重要性的行为，而其存在，也是天子不可放弃的一部分。

大兴的布局，虽然非常规则，形成了一个矩形的几何形式，可以被看作是在一个精确的度量系统网络中，不同种类的土地使用的一个实际安排。如果说，可以看出某些图式的考虑，其目的在于最具有感染力地展示皇权和堂皇气派，并为居民、官吏以及僧侣、商人和匠人等的各种活动提供空间。虽然矩形作为一个整体，旨在某些象征意义，并且与仪式的或宗教的模式有某种联系，它在一般意义上，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方式，或者说是工具，以一种非常清晰的安排，易于控制和通达的方式，将都市区所有不同元素融成一个帝国大都市。这种皇室建造的实用性布局，也发生于 17 和 18 世纪欧洲的皇室和都城的发展。那里，几乎遵从同样的总体构图，皇家大道两侧以完美的对称布置。虽然，当时的欧洲肯定不知道大兴的模式，而是完全独立地发展，在欧洲的发展过程几乎是同样的。因为，绝对君权的王室布局，从文艺复兴理想城市的抽象几何模式中涌现出来，并发展成为一种展示给观者庄严王室的有效的视觉空间安排。

但是，此处与欧洲的比较，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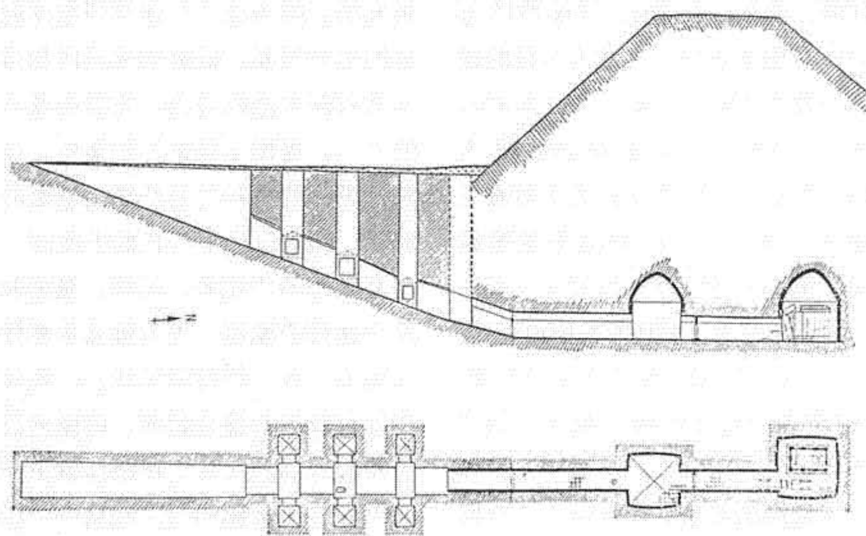


图 3.3.3.8、9　陕西乾县附近的李贤（公元 654–684 年）章怀太子陵墓。武则天和高宗的第二个儿子，建于 706 年，711 年当他复为太子时再建（参见 3.3.3.7），比例 1 ：500。
摹自陕西省博物馆，西安，陕西近西安乾县的乾陵部分，并参考文物 1964/1，金字塔表面仅 55 米 ×55 米，并升高达 11.3 米。布局和以下的剖面，表现了唐墓的思想和在唐之前所有帝陵的常规做法。这座坟墓 1971/72 年被发掘时，其壁画因可信地显示了唐代的绘画而著名。早 10 年，一个相同的坟墓已经在附近发掘，为高宗的孙女永泰公主的墓地

图 3.3.3.10　一个唐代的女子，陕西乾县附近永泰公主墓的拓片，706 年，公主死时年仅 17 岁

仅让我们有机会领略其间的相同性，更显示出差异性。就是说，我们的重点在于，分析大兴布局中体现出的中国主义。在大兴规划的设计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项，显然是选择一组有特殊作用的数字。比如：一个区域的度量单元数，一个区域之中街道和里坊的数字，市场及其他空间应该占有多少部分？里面如何再分？等等。设计人期望这些特别的数字，具有某种特定的吉祥性，从而确保聚落最大可能地获得最佳的运气，与皇帝的高贵品质相匹配。根据古老中国关于阴阳的哲学理论和思考，设计通过对神圣而吉祥的一组数字体系（如奇数为男性，而偶数为女性）所构成的度量体系的应用，使皇室获得适宜的环境。

唐代的前半部分，从 618 年到 907 年，是隋代的直接延续。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治理方面的变化，主要在唐代的第二个皇帝太宗（公元 626-649 年在位）英明统治期间发生。两个都城，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持续地发展，特别是长安——即原来的大兴城，不仅成为中国最具文化的城市，也肯定是当时整个世界上最具文化的城市。原来的布局规模，为任何形式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充裕的空间。已存的隋代都城中的佛教建设，在唐代又增加了 25 座佛寺。还新建了 21 座道观，同时，还建有为许多外国人、商人、娱乐者、艺人以及类似人群使用的摩尼教庙宇、景教教堂。到 8 世纪中叶，城市人口得到增加。公元 742 年，唐代的历史年鉴，记载有 362921 个家庭，1960188 人居住在城市里。平均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23335 人。整个帝国总人口据记载为 5150 万，因此，都城已经包含总人口的 3.8%和大约 60%的整个帝国的城市人口。这大概不超过 350 万。其他的城市人口，居住在 1389 个县级城市和几百个城镇之中。

关于唐代中国的人口规模，各家学者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一些人接受 742 年户口普查数字为整个人口数，而其他学者则认为这些数字仅表示赋税人数，需要将同样的人数，甚至更多，加到 742 年户口普查的数目上。这种不相符处，使得我们较难计算城市人口的百分比。但是，我们将某些关于城市人口的粗略猜测结合在一起，对城市的人口规模进行最高的估算，以便提供一些关于人口比例的看法。

这种对于 618 年的估算给予的总数是：12945 万人。其中 10230 万属于中国北方和长江流域安徽、江西、湖北三个省份。仅有 2715 万分布在南部省份。对城市人口的最高估算为 430 万，或说仅有 3.3%，不足以达到都市区域 50%的城市人口。但是，这给予我们关于所有其他城市聚落（包括 1573 个县级城市）的另外 230 万人的数字。考虑一下唐代前半个朝代的繁荣和发展，再高一点的估算，似乎更显得合理。609 年和 742 年的统计数字，似乎非常不可靠。因为这些数字，仅表示了轻微的差别。而实际上，这段时期的人口大量增长。在一些地区，增长甚至超过 100%，不仅在南方，而且在整个帝国的很多地方都是如此。当然，可以说，从 8 到 9 世纪，长安肯定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在规模上最大，在文化以及权力方面豪华庄严。

唐代，南方和四川建起了 100 多个城市。作为一个更为重要的城市实例，我们已经提到扬州。我们也应该提及四川的都城——成都。它从 8 和 9 世纪，经历了一些可怕的叛乱后，曾经一度被认作为唐代皇帝们预备的新都城。因为此种联系，城市被重新规划，并以新的城墙所围绕。如此一来，整个城市，占地 11 平方公里。街道系统以一种棋盘体系重新组织，偏离正北 18.5 度，大概是因为河流体系等地形条件。

经过了几十年的倾轧、叛乱和战事之后，唐代在 906 年覆没。但在我们离开关于唐代的描述之前，应该提及一个到当时为止，依然属于帝国遥远的角落——福建省的特别发展。因为该省与远至印度洋国家的海外贸易。蜿蜒的海岸线和很多具有深水港的海湾，为沿海城市的发展，提供了特别好的条件。在那一带，航船和贸易是最为重要的职业。除了已经是几代的主要海外贸易中心的广东外，福州、泉州和漳州这样的城市，成为极具重要性的地方。在一些内陆航线，一些较小的行政中心建立起来，以促进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在浙江省东部的宁波，当时称明州，也从一个山

杜甫《丽人行》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

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

……

箫鼓哀吟感鬼神，宾从杂遝实要津。

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

……

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杜甫（公元712–770年）



上的城堡，顺着沿海平原重新布局，与那儿伟大的土地开垦项目直接相联。这个过程，在细节上，很像大汉时期在其西边的绍兴的土地开垦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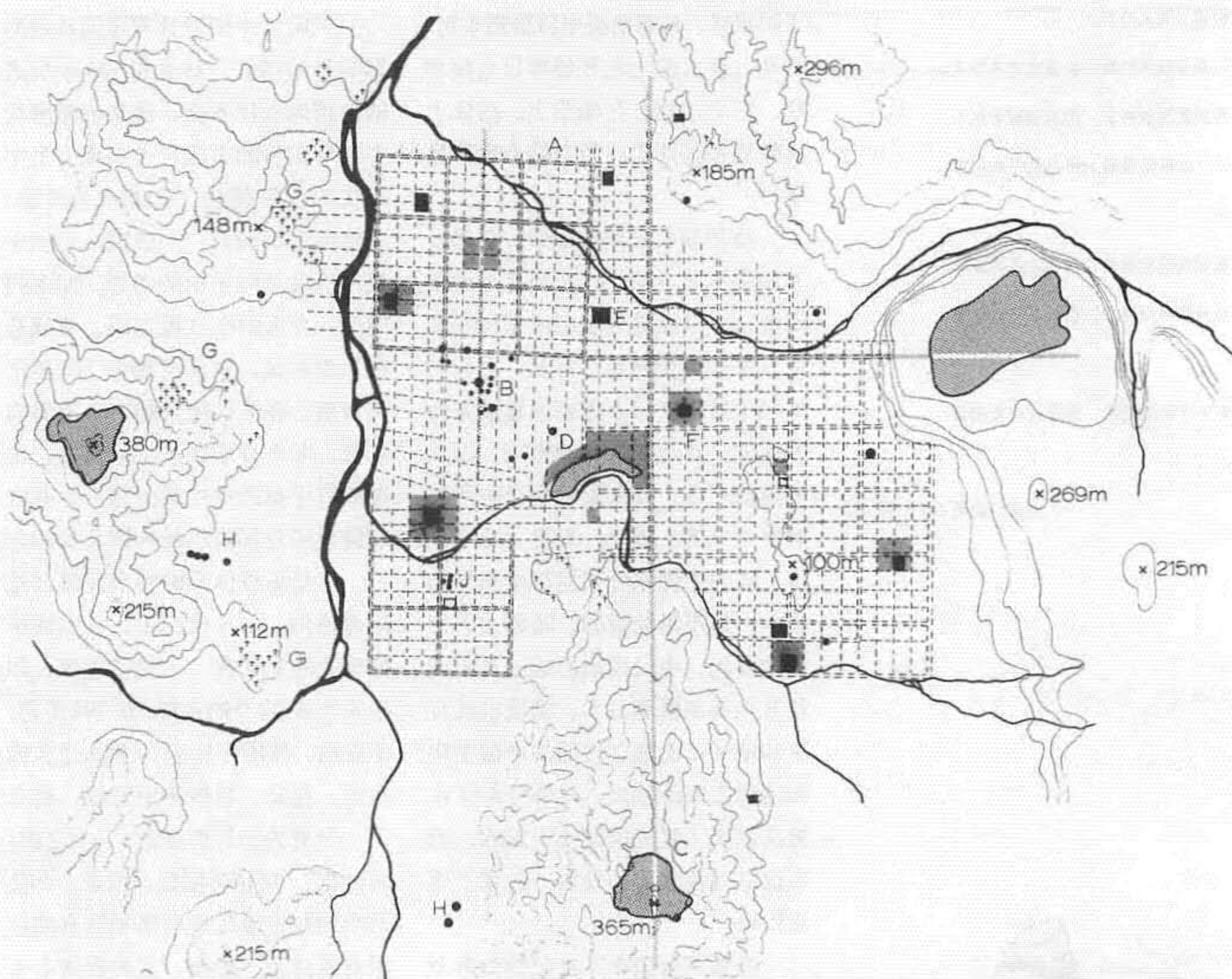
洛阳和长安两座都城，在很多方面的不同，在于其布局与土地使用概念，以及规划者们所采用在测量方法和度量体系。但是，它们均体现了唐代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的成就。政治和文化的影响，以及帝国的声誉，波及影响到当时所知的整个世界。因此，发现这两个城市，作为中国以外其他都城布局的模本，是不足为奇的。随着大唐帝国的升起，中国政治影响远及中亚及其东邻朝鲜和日本，佛教也波及这些地区，而随之传播的中国文化和治理方面的知识，对那些地区在更高层次上建立国家或王国的、而不仅是部落联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新罗帝国在7世纪的后半个世纪统一了朝鲜半岛上的三个帝国时，都城的大都市区域，即现今朝鲜东南的庆州，已经根据北魏和隋都城中所应用的测量方法，得到重新组织。然而，布局没有获得任何预定的形式，没有建造城墙，外边界和街道模式，沿着河流平原自然的河岸线，作为一个整体的聚落区域，没有强加任何预先决定的形状。宫殿和庙宇，以自由的形式遍布各地，其他重要的地方，像坟墓、圣墓、或要塞，坐落于基于地段考虑的传统地点，而非由那些新测绘网格所决定。

同时，中国对日本帝国政府的影响开始增长。日本在645年引进的所谓的大化革新，就是根据唐代中国所实行的方法，来实现一个中心化的政府结构。帝都成为极需。这建造帝都的第一个尝试，开始于奈良府斑鸠町平原的南部，即本州中部，今天的奈良城之南。这就是藤原凉宫城，它仅在694–710年作为皇宫，在8世纪开始，一座新的都城，即今日奈良的平城京城，在斑鸠町平原的中央部分铺开。其空间概念模自那时已经称做长安的大兴，但是里坊体系的细节发展却是来自洛阳。在8世纪末，在山城平原更北边，又建了一座新都城，即平安京城，现今的京都。从794年起，平安京，被用作长达10世纪之久的皇室。在此，根据中国传统，建立了一个更为吉祥的地址：“山之南，河之北”，所谓的阳位。但是，奈良对布局和度量体系网络相结合的应用有所修改，如此，某种程度上失去了魔幻的重要意义。

奈良成立前后，也就是公元8世纪开始之时，渤海国，在朝鲜北部、满洲里东北的部落联邦中涌现出来。它根据中国行政管理体系的原则而组织。皇帝宏伟庄严的住宅，是帝王光辉的基本属性，因为这个原因，建立了龙泉府城，即当今黑龙江省牡丹江河上的东京城。其布局也大约遵循长安的空间概念，当然，以较小的规模，形成一个8.5里 ×6.4里的矩形。在其北部分的中心，有一座大约5里见方的宫殿。

总结在其最初的基础阶段之


×296m
A
×185m
G
148m×
E
G
B
380m
D
F
×269m
H
×100m
×215m
J
×215m
×112m
G
C
H
365m
×215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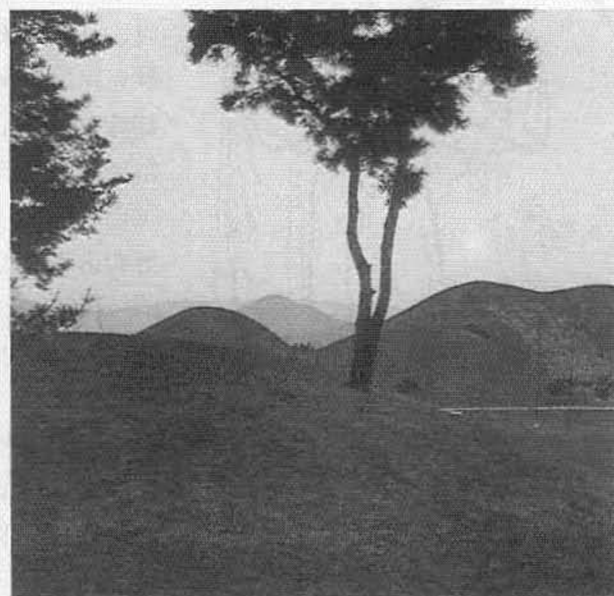


图 3.3.3.11 朝鲜（韩国）东南的第 26 任王新罗的都城儒学妮。比例 1 : 40000，参照 TotoKaichi 1930 年复原、基于韩国的地图 1 : 25000，庆州，1979，NI52-2，06-4。

在他漫长的统治时期（579–632 年在位），儒学妮与中华帝国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无论是何朝代（在此期间有三个朝代），以及无论是哪位皇帝执政（此间有五位），在世纪之交，在他统治的第 21 个年头里（600/601），根据他从中国的城市规划实践之中所学到的原则，他在今天的庆州一带重新塑造了他的都城。对他的重建计划详细的分析表明，布局由不同的部分组成，这些部分，大抵上持续性发展并渐渐地变化。第一部分，似乎是一个基于幻方概念所规划的城市，它坐落在旧皇家墓地的北面（B），一个 3 里 ×3 里的方形，基于 36.56 厘米为 1 韩尺（1 里 = 640.08 米）的旧朝鲜尺度，而被分为九个里坊，每个里坊又被分为若干小里坊，各为 400 尺 ×400 尺，加上 40 尺宽的小街，以及 80 尺宽的大街。十分有趣的是，每一个里坊，因此又被分划成 16 个小里坊（4×4 小里坊），是一个阴数字，而大里坊则根据阳数字 3×3 = 9 而形成，它们一起形成了至高数字 12×12 的组合。所有这些似乎是基于古典经文中旧的秘方，在中国已不再使用，却对韩国帝王依然具有吸引力。然而，阴阳构图，在隋代却是一个流行观念（A）。大的 400 尺 ×400 尺的里坊，现在用于拓展幻方观念，直到整个流域的水平区域都被覆盖了。不足为奇的是，对于整个布局来说，并无现成形式，因此，不能从中吸取魔幻力量。主轴线在每边留出 4 里，从盆地中心旧宫殿区（D）的东部穿过，通向有城堡的南山（C）。在盆地的北部，一座新宫殿在稍后时期轴线西部（E）建造起来。随着统一的新罗王国都城不断发展，据记载，城中的人居部分为 3275 步乘 3018 步，这是基于 30.048 厘米为一尺的高丽尺（×5 = 150.24 厘米 = 1 步，总共相当于 4920.36 米 ×4534.24 米）。55 个区中，有 1360 个里坊，可供 178,336 个家庭居住。因为总共只有 821 个 400 尺 ×400 尺的小方形，里坊明显与这些方形不一致，占地（覆盖）不到 2/3 区域。聚落区域内建有几座庙宇，有些庙宇有大的塔，一座九层的，高约 70 米，公元 643 年由王后在庙（F）中建造。有两座城堡守护着没有城墙的城市，一座在西边，重建于公元 593 年，一座在东，建于 405 年，并与南山的城堡一起于 593 年重建。几处墓地散置于西边的山脚(G)，包括几处王家陵墓（H），而新罗从第 1 到第 2 世纪的第一批王家墓地坐落有 5 座坟墓，在城市的最南部（J）

图 3.3.3.12 韩国庆州的皇家墓地，新罗时期的王家陵墓，在王都最古老部分的南部（地图上的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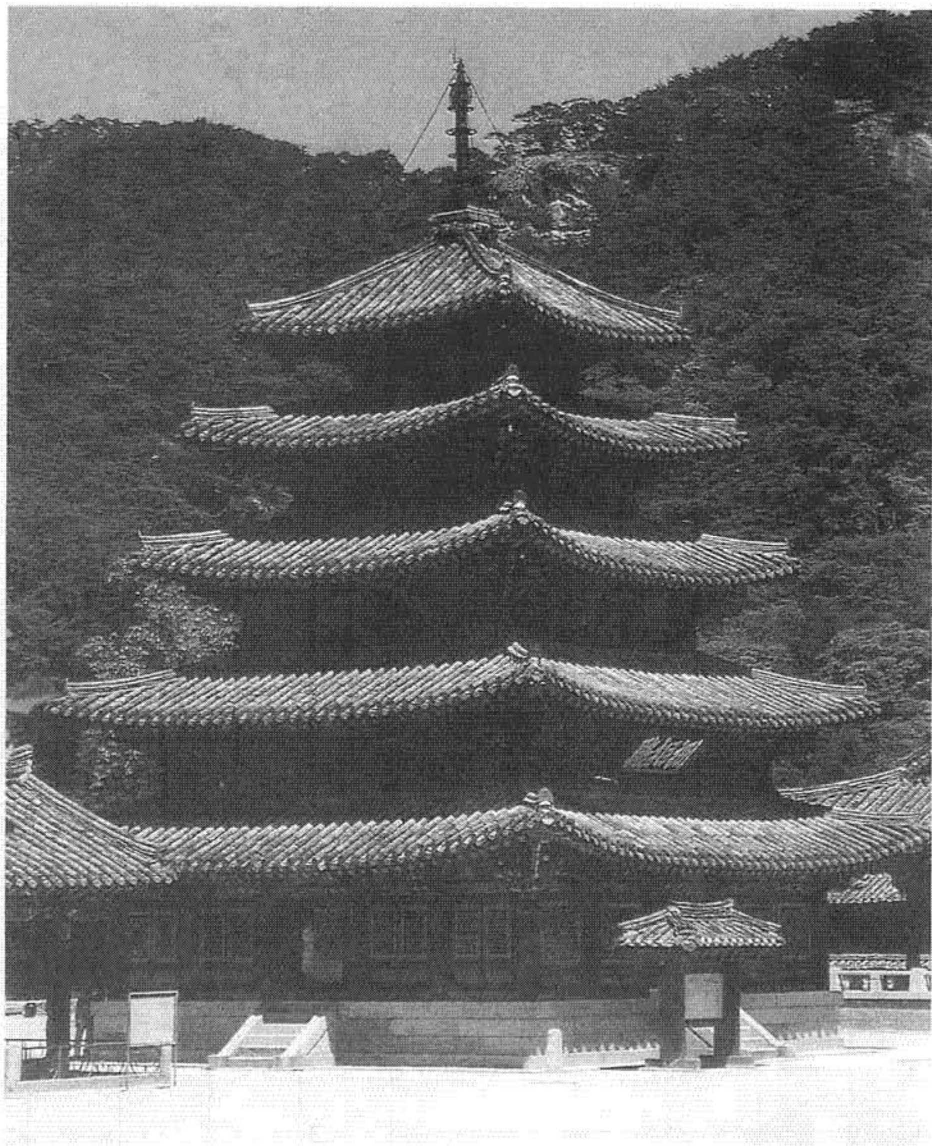


图 3.3.3.13 平畴佛寺庙宇的五重塔，韩国中部大田广域城北部，于 1624 年重建，以取代 16–17 世纪的一座较为古老的塔，塔高 23 米。庙宇于 553 年由和尚义湘从印度归来时兴建。曾经为韩国好几个世纪的第一流佛教中心。该塔是东亚最为古老的木构佛塔实例，其形式在中国已经消失很久

N P R
J
B
H
O
G
L
K
D
F C
E
A
5 4 3 2 1
1 2 3 4 5 6 7 8
2
3
4
5
6
A
7
8
9

图 3.3.3.14　都城平城京，今天日本的奈良，比例：1 ：40000，1973 年的复制。

中华文明影响的主流，在 6，7 和 8 世纪从韩国传向日本，延续了皇室中央皇权的持续发展，由此孕育出一种帝国都城的需要。在那里，一个中央的行政管理区得以建立，而足够的建筑群，将为宫廷和贵族提供帝国机构，宗教中心以及府邸。正如 814 年的记载，1177 个日本贵族家庭中，其血统，大约 15%源自中国的祖先，另外的 15%来自韩国的祖先。

7 世纪期间建造都城的几次尝试之后，在公卿藤原不比（公元 659–720 年）的指导下，文武天皇（公元 697–707 年在位）于 702 年决定在斑鸠町平原的中心建造一座宏伟的都城，这就是今日的奈良。藤原不比也是年轻日皇的岳父，根据中国长安城的模式开始准备。如此，708 年之后宫廷可从斑鸠町平原的南部迁移至奈良。根据 701 年的《大宝律令》，[1] 政府得以重新调整之后，文武天皇在未满 25 岁那一年死去。他的母亲接位为元明天皇（公元 708–714 年在位），也是统治奈良的第一位皇帝。

对于早期尝试建立都城的描述告 诉我们，都城遵循了中国的方法和模型。但是，对于这些布局的精确分析，已经不可能。平城京——当时奈良的称谓的规划，经由日本学者高度准确性地重建，被成功地分析和描述如下：

7 世纪的改革，包括一个新的土地所有制和赋税制体系，为此，测绘了可耕地，并建立了一种度量体系网络，这似乎基于旧“高丽营造尺”的度量，自 4 世纪就开始在日本使用，35.56 厘米为一尺。其名称表明它是朝鲜（韩国）所用的尺，曾经在 7 世纪初朝鲜的东南庆州用于测量都城新罗。因为在新罗，度量模数必须遵循地形特点，因此该尺度带有某些不规则性。然而，它没有影响该方法的功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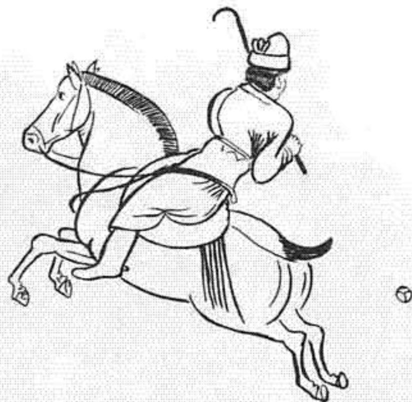
当藤原不比命令御用测量师建立新都城布局时，他们选择了其中一条模数线，作为他们中心的南北轴线（A–A）。他们设定了主轴线以东 4 里，以西 4 里，作为城市的外边界线，从北到南 9 里的距离，形成了一个 8 里 ×9 里的矩形。对于这些数字魔幻般的重要意义，无需过多解释，应该指出的是，与过去几个世纪的中国都城相比，这个规模，与关于帝都规划的古典文献“周礼”所描述的“处方”非常贴近。在城市界限之内，一般的土地使用概念，遵循着长安模式，就是说，宫殿坐落在主轴线的北端（B），主轴线东西两边城市的两部分，各有自己的市场，东市和西市（C，D）。令人特别感兴趣的是，城市布局与周围的土地度量网络的结合：很明显使用了两个不同的长度单位，却和谐地相互结合。网络的最基本单元是 1800 尺所组成的里，分成六个小的部分，各为 300 尺（E）。然而，城市布局的基本单位，是 1500 尺为一里，仅有 5 个小的部分，各 300 尺，从而形成 5 比 6 的比例（F）。因为共同的基本单元都是 300 尺，城市布局可以毫无问题地结合进土地度量网络之中。在唐代中国，通常的习惯是使用一个大里和一个小里，前者用于所有一般性的通用计量单位，后者仅用于与皇帝相关的事务。于此，该计量，就是一种用于皇室和都城的神圣的度量单位。有些令人吃惊的事实是，城市布局的小里与唐中国的度量单位的大里，刚好具有同样的长度。因此，基于 29.63 厘米为一尺的唐尺，645 年起，在日本就被称作著名的“唐尺”。

在城市内部，建立了各种尺度的建筑地块，一个里坊大约 1 里见方，并由街道网络组成。里坊内部，一里见方又被分成 4×4=16 的小方形，这不符合 1 里 =5 个 300 尺所组成的单元，但是，它与新罗（G）里坊的划分方法相同。

在最初的几年里，藤原不比已经将他的家庙，佛教的兴福寺（H）还有春日大社里的一座为祭祀藤原家族祖先神灵的神道庙都移至新都城。他将这些建筑安置在城外和城市的东边，这可能推动了城区向这个方向扩展。许多佛教寺庙，也跟着往新都迁移，并在大都市区内和内城中被兴建起来。因为这个目的，土地分配遵循着等级体系。一等神庙，允许具有 16 个方形划分的 9 个方形，就像在 718 年迁移到这里的药师寺（K），二等庙宇，仅仅允许 4 个方形，就像约建于公元 740 年著名的唐招提寺（L），而三等庙宇，只能包含 1 个方形。王宫涵盖四个街坊（地块），特别重要的寺院，像西大寺（J）这样的寺院，占 2 个街坊，或者像以上提到的兴福寺，占一个地块或 16 个方形。

正如中国的习俗，皇陵建于都城的北方，元明天皇（708–715 年在位）和元正天皇（715–724 年在位）被埋葬在明治天皇（724–749 年在位）和其妻子的墓地之北，称德天皇（750–758 年，765–769 年），将她的坟墓建造在两个旧的陵墓附近，其一为成务天皇（131–190 年）之陵，其二为垂仁天皇的妻子之陵（公元前 29– 公元 70）（N）。垂仁天皇的坟墓，坐落在城市布局之内（O），最大的陵墓，即是最伟大的仁德天皇（313–399 年）之妻的陵墓，它坐落在城市的北边（P），最后一位埋葬在此的皇帝，是平城天皇（806–809 年），他曾经试图在奈良 784 年被弃之后在那里重建皇家行宫。他的陵墓，坐落在宫殿以北，大概用作葬礼的庙宇，并表示宫殿在此时是已经被弃了

图 3.3.3.15　唐代的马球游戏者，摹自陕西乾县附近的章怀太子墓中的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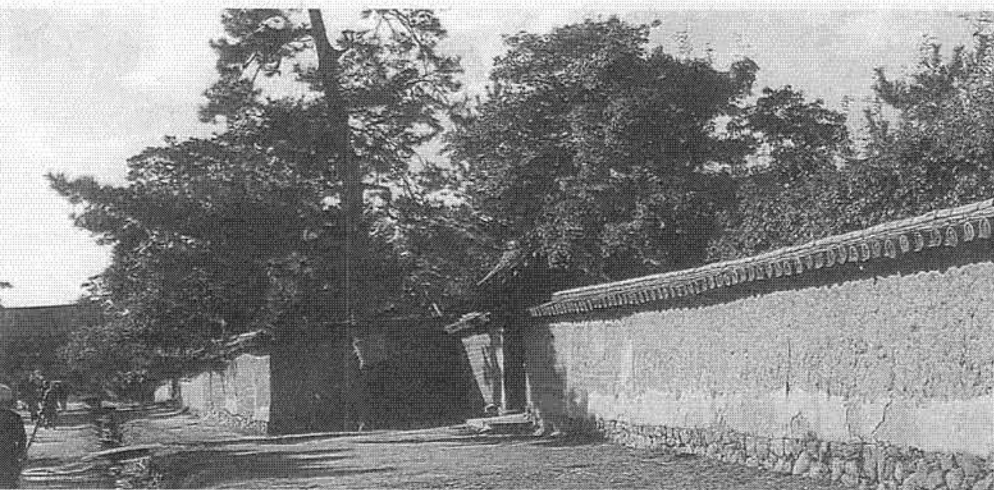
1 译者注：由藤原不比等编纂。



图 3.3.3.16 奈良府法隆寺的五重塔，在 7 世纪末重建，高 31.7 米。寺院是由圣德太子于 587 年兴建，第一座庙宇被毁之后，它被重新建造。塔在 693 年完成，显示了隋唐时期中国塔的式样

图 3.3.3.17 日本奈良府斑鸠町法隆寺庙宇建筑群中的主要东西街道。它最大可能地再现了隋唐时期都城的城市街道的典型特征，其中，所有的里坊、都由带有门的城墙围绕着，这些门在夜间关闭，带有花园和苑囿的府邸，因此与大街隔开，那里也没有商店。注意左侧的灌溉系统

图 3.3.3.18 日本奈良唐招提寺的金堂（参见 3.3.3.14 L），由中国的高僧鉴真和尚（688–763 年）大约于 740 年所建，鉴真在日本以 Ganjin 著称，是日本的佛教律宗代表。这是惟一的，奈良时期存留至今的此类大殿，因为它在 8 世纪早期从中国传入日本，因而是代表真正唐代建筑的实例。金堂的屋顶被重新修改过，而其现存的上层边缘，比原来唐代的也高出一些。鉴真出生于扬州，那里于 1974 年以唐代风格建造了一座鉴真和尚纪念堂（参见 3.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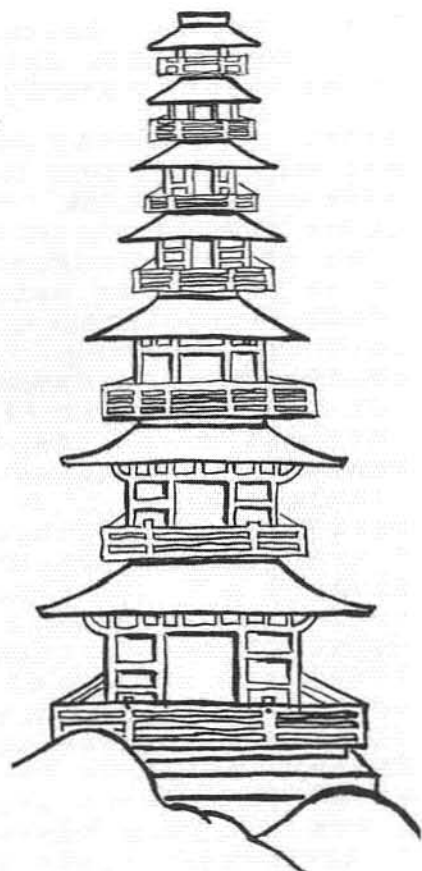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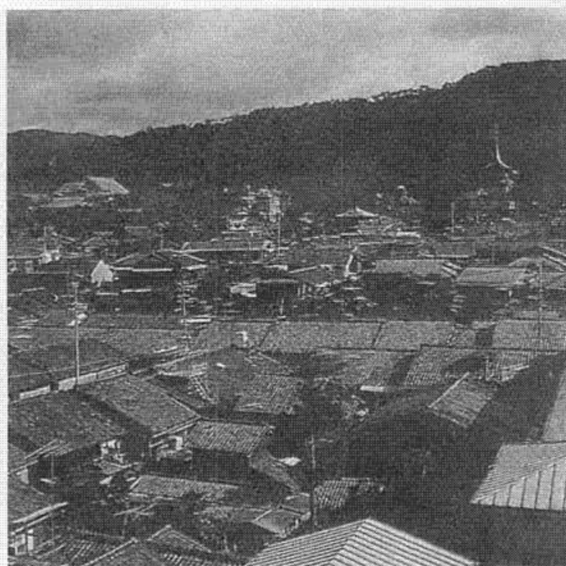




图3.3.3.19、20　奈良的药师寺东塔，718年从旧的都城腾原京移到此地，重建一直延续到730年。这美丽的塔，因其非常别致的构图而十分显著。实际只是一个3层建筑，因为在平台之上额外附加的屋顶，看上去似乎有6或7层。其34.14米的高度比法隆寺的五重塔高一些，但是，整个结构看上去更为轻巧和富态。最初，这座塔和西塔跟佛像一起分置"金堂"两侧，这种安排，将其由一个圣物的重要性，变成一个更为装饰性的构图（参见3.3.3.14K）比较甘肃敦煌莫高窟323窟壁画所绘的7层唐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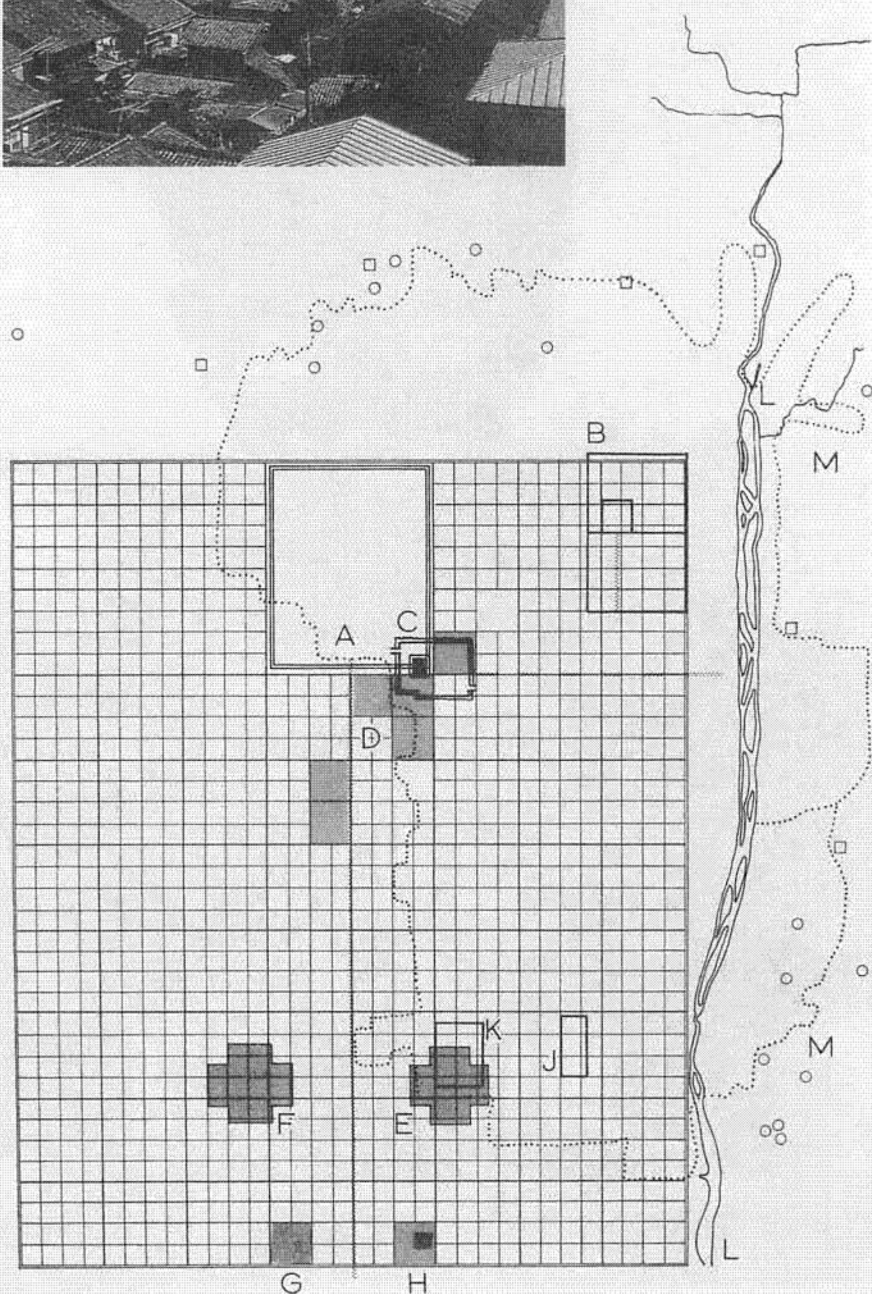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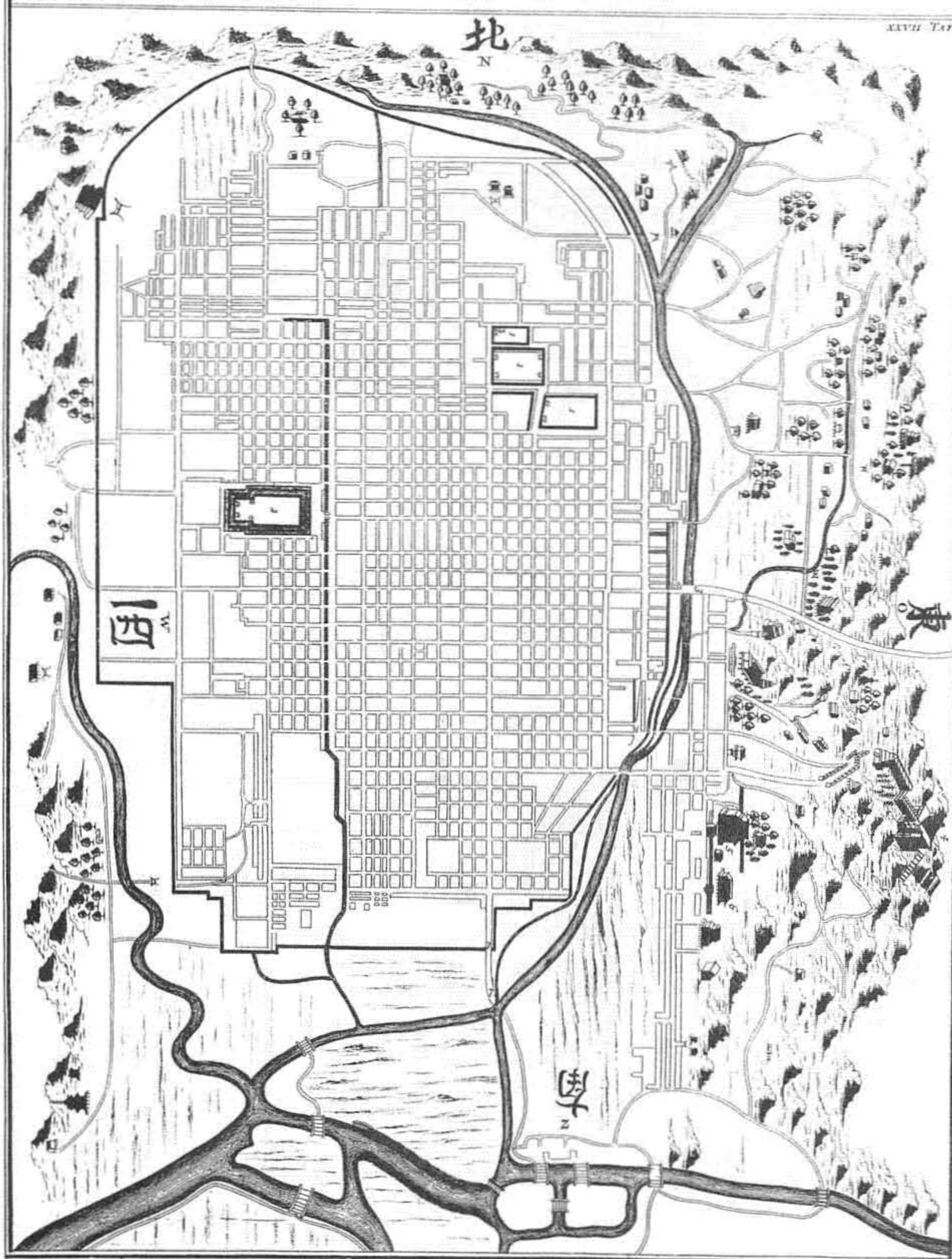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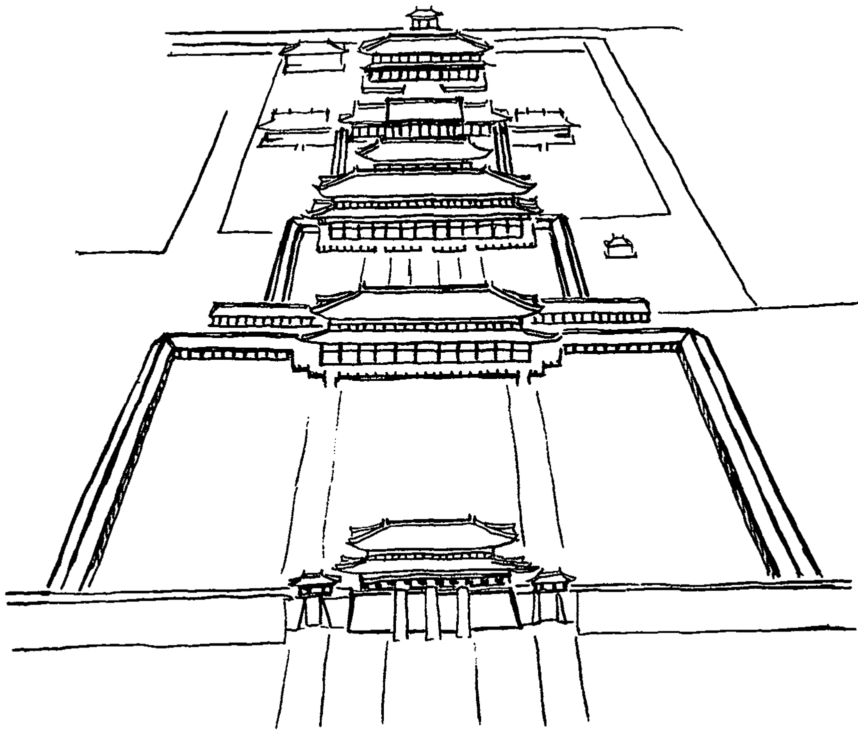
图 3.3.3.21 京都东部风景，背景是山峦和庙宇（在图上的 M）。随着时间的进程，居住建筑的数量增加，而聚落区域内几乎没有留下园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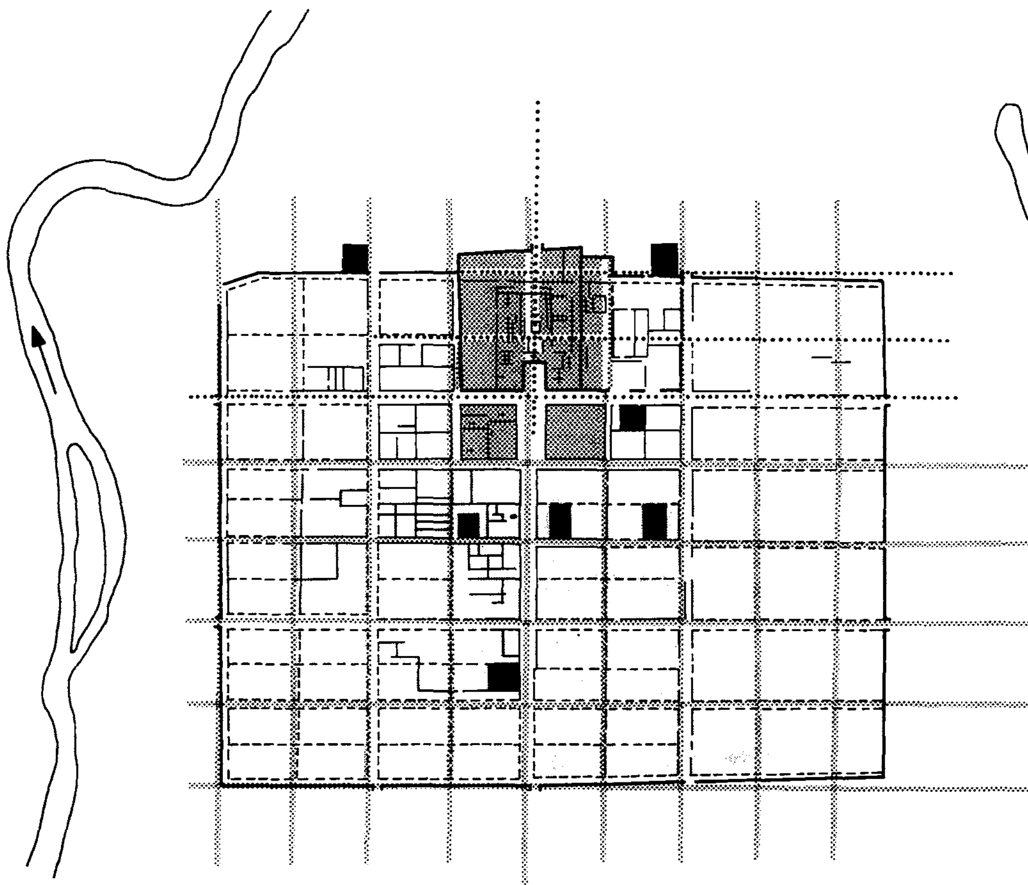
图 3.3.3.22 日本，昔日都城平安京，今天的京都，比例 1 : 40000，根据 Teikichi Kita，1916 年和 Katsu Sekino，1942 年的复制。

公元 794 年，皇室再次迁移至奈良北部的平安京（既当今的京都）重立新都，并在那里维持了约 1 千年。该都城的布局，基本上本着奈良同样的模型，但在度量系统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奈良的核心是精确的 8 里 ×9 里的尺度（尺寸），以确保阴阳数字构图的神奇性质，而京都的布局是里坊的结合，对里坊来说，主要街道的宽度，在两个方向上都有所增加，如此，度量就是从东到西 8 里和 640 尺（所有主要街道的总数），从北到南主要街道就是 9 里半和 410 尺。因此，在阴阳数字所表现的那种布局的神奇性质就消失，实际增加的不同度量结果，也使得京都总面积比奈良的大一些。一个以 30.27 厘米为一尺的不同尺度的运用，一种后唐时代的尺度，也是造成京都大面积的原因。而且虽然布局赋予非常准确的几何性，神奇已不存在。最迟，宫殿象在奈良那样的布局，位于主轴线的北端（A），但在 1788 年向更东的方向也就是现在的所在地迁移（B），那里是皇帝的宫室，而政府的首领幕政府将军的宫室，17 世纪以后就安置在二条城堡（C）。宫城的南方坐落着帝国大学（D），其东面有一座风景园林。原来布局也包括东市和西市（E，F）以及主轴线南端的两座庙宇（西庙和东庙，G，H）。东庙在它 796 年的奠基之后重建过多次，里面有日本最高的塔，5 层高达 56 米。它实际也是都城平安京的惟一的遗存，并依然坐落在原来的位置。然而，东西塔的概念，在 17 世纪初期复兴，当时，东本愿寺（J）被作为一个坐落在原来东市场（E）位置的老的西本愿寺（K）在东面的另一半或对应物。在原来的都城布局的东面，贺茂川沿着大文字山和东山的西坡走向（M），那里坐落有几坐庙宇，即佛寺（圆的）和神道庙（方的）。12 世纪初所建造起来的区域由点画线表示

图 3.3.3.23 日本的都城平安京，今天的京都。根据 18 世纪存在荷兰的地图复制


Platte Grondt van de Stad MIACO, Zetel van den Geestelyken Erf-Keyzer van JAPAN, na een Origineele Japansche Kaart van vyf en een halve voet lang, en vier voet breedt, onder den Ridder Hans Sloane berustende, in 't klein gebracht door
J. G. SCHEUCHSER.
XXVII TAF
北
N
東
O
西
W
南
Z





后，几乎10个世纪的中华帝国的城市历史，我们可以称之为宫城和宫室文化阶段。在汉代和后来唐代的中央化帝国政府行政的发展，导致了非常大的都城，事实上是大都市区的出现，人口集中达到100万。帝国政策的趋势，就是保持权力集中，而非令皇帝的权力缩小，在这种不宜的气候下，其他城市和乡镇，就不能发展成为大的城市聚落，虽然后周时代几个老的王侯之城，依然在城市网络中保持重要地位。

帝国的管理，在整个帝国，以小单元形式分布，为城市聚落提供了内核。但是，因其官僚性格，它不真的是促进城市发展的动态力量，而是一个维持已确立体系的安全性和权威性的稳定因素。在扩大帝国领土的边界区域，军事的元素，在新近建立的要塞城镇的治理体系中作用突出。但是这一元素对于城市的扩展作用甚微。

经济，特别是贸易，对于城市发展总是一个非常强的力量。然而，似乎在这个时期，很多限制性的因素，在帝国内部限制了商业大规模的发展，虽然我们知道一些富商，而且，贸易路线，的确奇妙地延伸到遥远地区，例如中东、甚至罗马帝国。这一贸易，大多数时期是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进行的，商人们从朝鲜沿海航行到爪哇，甚至到南部非洲交换稀有的或奢华的商品，并持续发展国内的很多其他经济活动。然而，内陆贸易中心，主要是周代留下的、大约20个伟大的古老城市，多位于北方。很多贸易者和富商，以他们的财产从事贸易，而对于富裕的城市社团的发展未有贡献。很多这样的商业活动，由帝国官吏所控制，他们试图尽可能多地收税。如果需要更多的钱，这些官吏甚至根据帝国法令，没收那些富商积聚的财富。每当帝国分裂，各省被持续的战争毁坏，城市和乡镇就被毁坏，人口减少，经济发展的潜力，全部耗于毁坏之后的重建和恢复。

关于各种都城和皇室，它们几乎是惟一的、我们对之有所认知的聚落。我们可以探测到，大都市区域布局概念和土地使用及持续发展。西汉继承了以不规则墙体围绕集中宫殿的概念，其遵循自然的地形特征，而非预先接受布局模式，将郊区和墙外区域，完全交付给偶然性的发展过程。东汉皇帝们戒绝夸大狂并减少宫殿规模和数量。他们试图遵循基于对上古经典、特别是基于对阴阳理论文献的再诠释所获得的思想概念。随着中央集权的崩溃，以及帝国分划为三国，出现了建立新都城的机会。然而，在当今南京的南部，吴国的新都城布局，遵循了更为传统的概念。而在现今河南魏国的都城，发明了一种激进性的新布局。这种布局和土地使用概念，结合了大都市区域大多数的元素。后来，它越来越被一些接替的朝代所精炼，直到它进步到作为基本概念，用于世界上最伟大都城、唐代都城——长安的设计。

图3.3.3.24，25 满洲里北部渤海国的都城，现今黑龙江省，比例：1：40000[1]

1 参见考古，1960/4. 建筑学报，1981/2，文物，1985/11.

图 3.3.4.1　隋代都城大兴后来的布局度量体系，比例 1 ：80000。
数字表示以里为度量体系所选的单位的尺度，这对于旁观者来说是不易见到的，而街道模式表明了街区或有围墙的里坊，其由小巷道划分成为四个部分。度量模数与街道模式的结合，在东西向的大街以南的"圣田"之内，创造了"神圣之地"的复杂体系。这些包含了外城的居住区域，"神圣之地"由一个 8 里 ×4 里的矩形构成，其划分成为 9 个里坊，或 3×3 的区块，大的神圣之地是在宫殿之南的外城的 22 里 ×12 里的矩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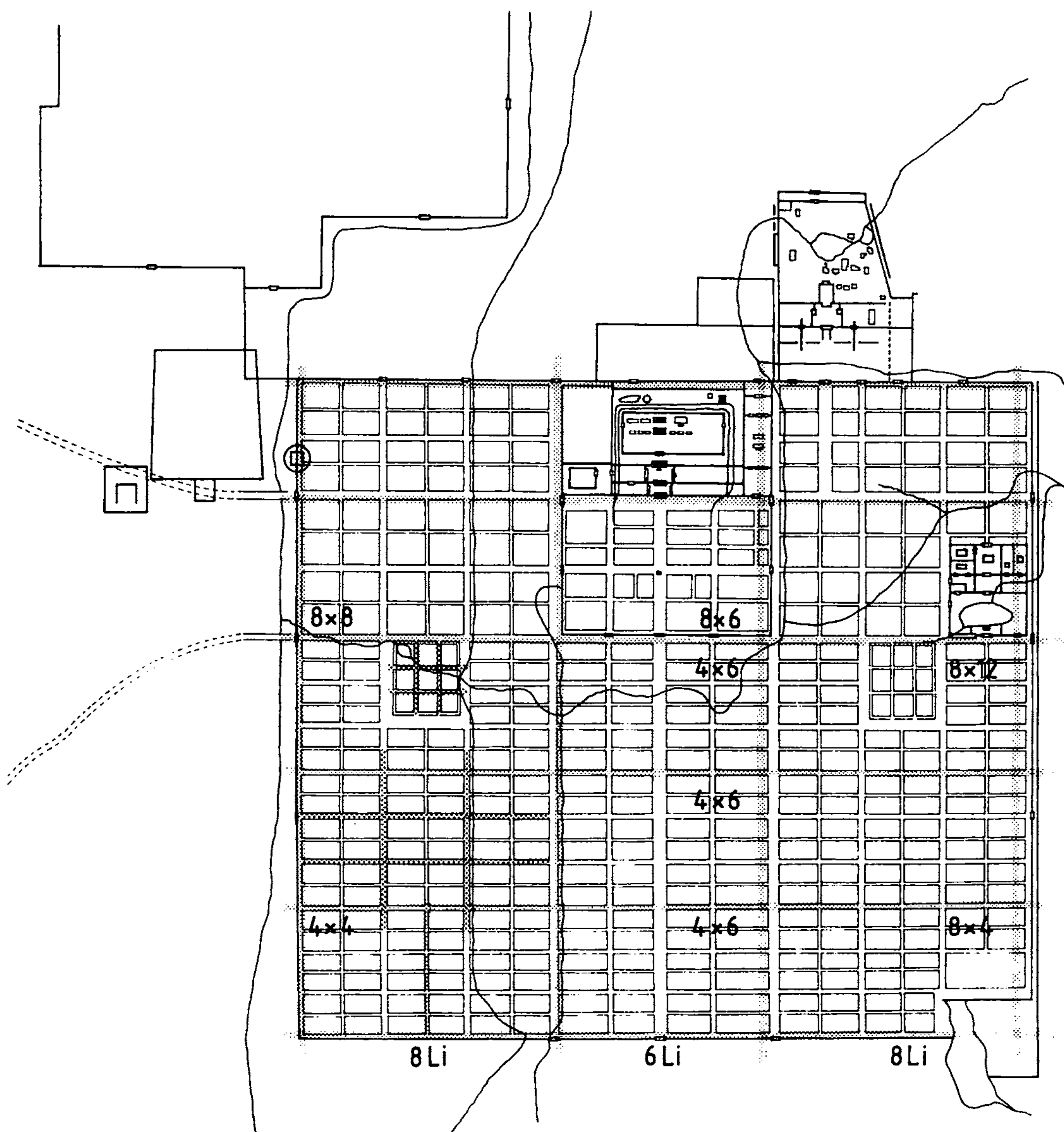




图 3.3.4.2 唐代第二个皇帝太宗李世民（公元 626–649 年在位），参考西安城西北，陕西礼泉所发现的石碑上的碑刻。

李世民是唐代的实际建立者，曾是他父亲的军队中最成功的军官。他父亲李渊 618 年在长安登基为第一个皇帝，高祖。李世民不但以军功建筑了唐朝，且使其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帝国，并将中国文化与文明之声誉传遍整个东亚和中亚，使这些地区以唐朝为楷模。皇帝的人格魅力，也激发了创造力量以及独出心裁，使得唐长安不仅是最大的，而且也是最具文化的辉煌与文明之都。这幅图像，表现了太宗李世民大概在 40 出头时的声誉顶峰时期。他 49 岁逝世，他的舅公杨坚曾经是隋代的第一个皇帝文帝（公元 589–604 年在位）

3.3.4 奇幻对都城布局的影响

根据记载，大兴城的建设，仅用了 9 个月，从公元 582 年 6 月到公元 583 年 3 月。工程从北部的宫殿开始，接着是皇城，并随着外城墙的完成而完成。人们也许以为，在如此短时间内持续的工程，最初的布局将被精心地实施，而不会和原来的概念有任何偏差。然而，对平面的细致分析，就像现代学者们根据考古学家的调查所复原的那样，显示出一些不规则性，令人有些微惊。最明显的不规则，就是宫城和宫殿建筑群的不对称性，其在中央大街以东的一边比以西的一边要大很多，且两边的南门也不在各自围墙的中心，而是有些偏西。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这种不规则性也影响了外城，同样地，外城南墙之门也不是居中，而是稍稍偏西。

不像后来在唐代所发生的变化那样，这种不规则，看上去在工程之初，即在施工的第一阶段就出现了，在施工之前的最后一分钟，布局发生了变化，主要原因似乎是为了在原来规划的宫殿东边，增加一些更多的空间，其结果使得加冕皇太子的宫殿向东边转移，并影响了宫殿区的东部围墙。皇宫向东延伸是一个逻辑的结果，但外城东部的布局，必须适应这一变化。正如在复原图中所见，他们试图通过压缩度量体系，使得这种适应不会对布局带来不必要的变化。如果我们今天需要调查原来的布局及其度量单位，我们只能依赖城市的西部，那里，没有发生变化，那里，我们可尝试探明原来的概念。

除了将作为一个整体的城市划分为宫城、皇城和外城外，街道模式将布局划分为几个不同的街区也就是里坊。主要的东西大街，60 步（步幅 2.5–3 英尺）宽，大约 85 米，将带有皇城、宫城的城市北部与带有居住区以及两个市场的城市南部分开。城市北部的皇城两边，是一些最大的街坊，大概是贵族和高官的府邸。而皇城有自己的街道模式，以满足为其两侧区域的中央政府机构提供空间的功能。这两个区域，各为 8 里 ×8 里，每个被划分为 12 个里坊，皇城配置了一个 6 里 ×8 里的空间。

布局的南部，由两条南北街道分成三部分，这将皇城与其东西两边的居住区分开，并直通南城墙的两座边门。中央部分坐落在南北主要大街两侧的皇城正南，100 步宽，大约 142 米，其面积是 6 里 ×12 里，并被分成 3×12 或 9×4=36 个里坊，另两个部分，分别坐落在这个中央部分东西两侧，各占地 8 里 ×12 里。它们被分成 25 个里坊，外加占了两个里坊空间的市场。实际上，25+2 里坊代表了 9×3=27 里坊，这些数字显示了街区模式与度量体系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一个 8 里 ×4 里的空间，被分成 9 个里坊，比如，度量体系只采用阴数，但是，可见的划分是九个里坊，阳数。这一单元模式，在中央部分东西两地的每一部块中都重复了三次。这种布局背后的理念，是赋予一个由阴数限定整体而阳数划分区块的空间，虽有

些修正，阳数与幻方相关。中央部分由三个矩形所组成，各为 6 里 × 4 里，这是一种阴和阳的结合，在此之上，又加上另一种阴阳数字 3×4=12 的街区结合，东西大街之南、外城的大矩形，因此被分为九个部分，形成某种修正的幻方，六个外部的区块，是一种阴空间的组合（由度量体系中的偶数表达出来）和阳的划分（通过奇数的里坊象征）。在皇城之南的与皇城大街两侧的三个内部街区，也都在用于空间的度量单位体系和里坊划分的数字上，结合了阴阳数字，它们形成了阴阳的双重结合。

隋大兴的布局，正如其平面西部的度量单元所复原的，可以被描述为圣王概念的视觉再现：皇帝在其世俗世界的位置上，三面皆由其臣民环绕，并以一种吉祥的空间秩序安居。皇帝在其王国正中子午线的御座上，面南而坐；他后面，高高在上的是南极星，天帝之座，天子之祖；他脚下，子午线两旁的皇

雪尽终南又欲春，

遥怜翠色对红尘。

千车万马九衢上，

回首看山无一人。

——白居易《七绝 · 过天门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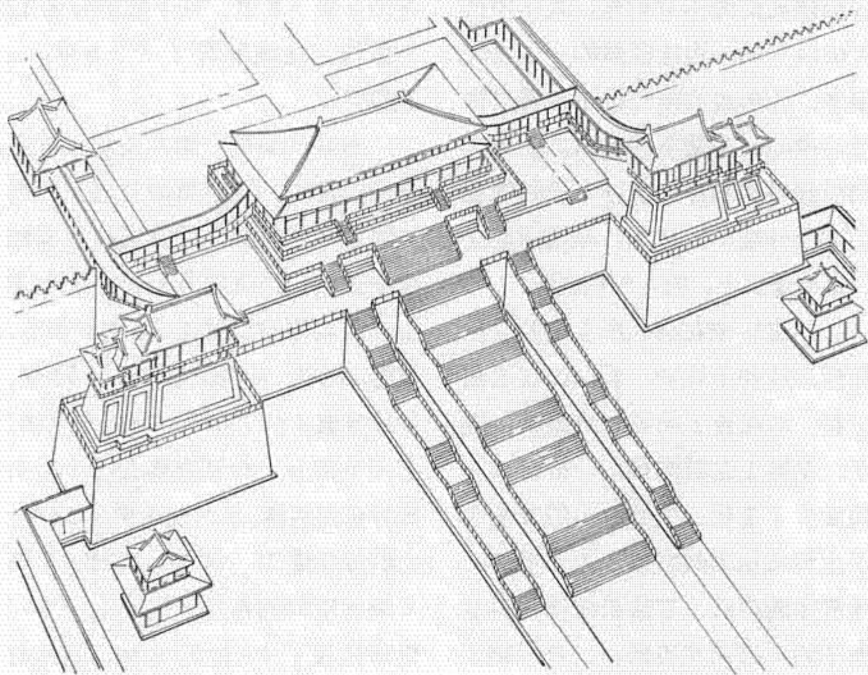


图 3.3.4.3 长安大明宫含元殿，662–663 年建造，根据考古 1959/6，考古 1963/10 和文物 1973/7 复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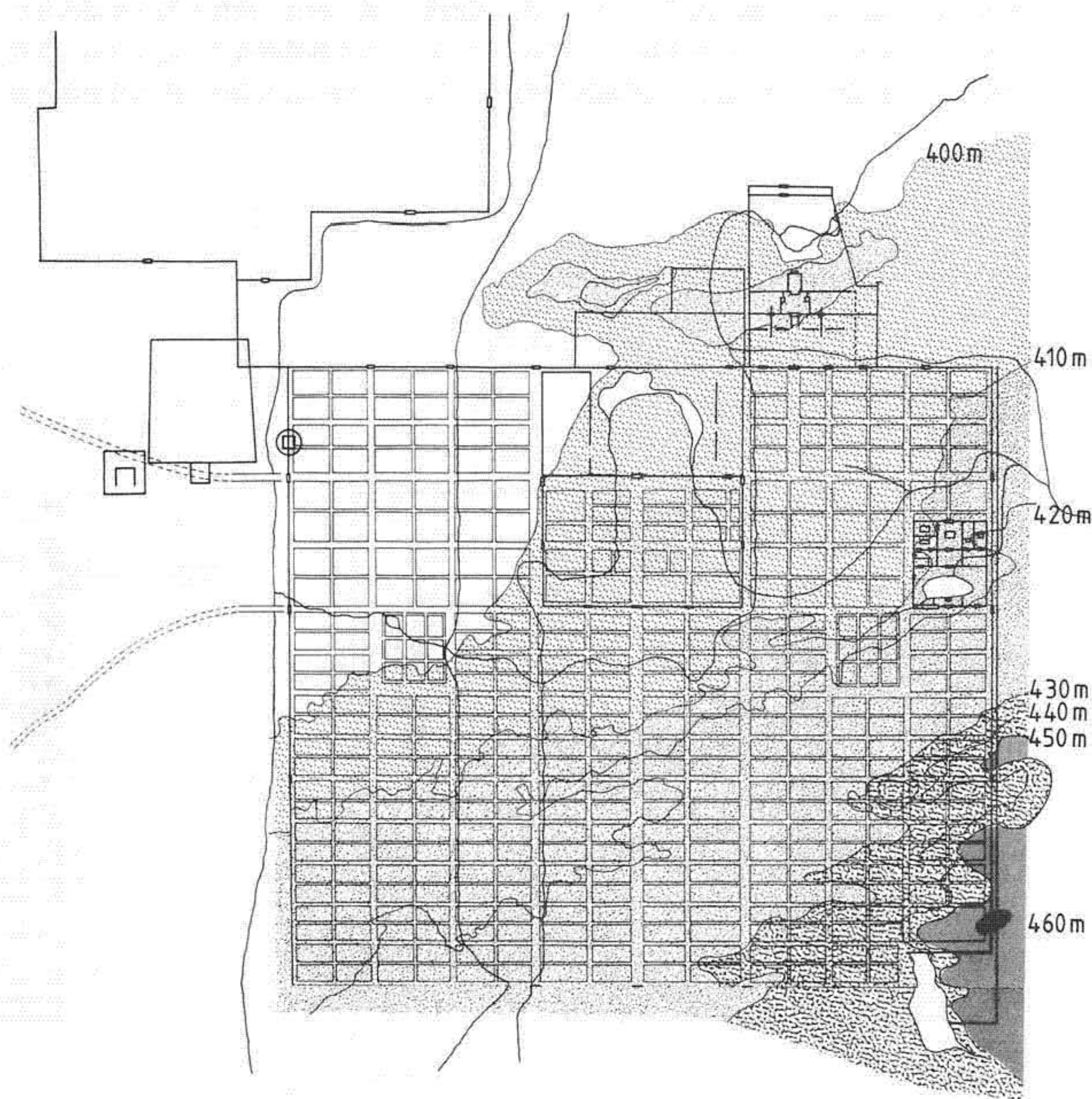
含元殿是在大明宫中最为重要的仪式建筑，由太宗 634 年建造。因为原来在城内的隋代旧宫殿受到洪水的威胁，这是早在 800 年前就已经威胁汉长安的问题。它坐落在较高的院落的北边，其大概用作官吏聚集以及与国家典礼相连的官员们的会聚。据载，含元殿是新年和冬至仪式庆典之地，也用于改换朝代年号。从这座大殿，皇帝视察检阅军队并观看俘获与抢夺的表演。这座大殿配有升起的亭子和廊子，以及有几个踏步通往大约 11 米高的升起的巨大土台。大殿就建在这土台上，这肯定是以如此巨大尺度，设计来感染观者的，而其双层屋顶高出庭院 35 米，可与明清时代在北京的皇宫中之太和殿相比



图 3.3.4.4 在唐代长安宫廷里的军官，参见陕西西安挖掘出土的陶俑，上彩的陶俑有三种颜色，这是唐代艺术家们的杰作，面部表情表现出是军人的性格，就像服饰风格所显示的一样

图 3.3.4.5 这一地区的地形，在此建造了隋代都城。比例 1 : 80000，根据考古 1963/11、1978/11 和 1982/6 的城市布局进行的复原。

虽然一个矩形街道模式以直线作为街道，暗示了地面是平坦的，然而，隋大兴城的城区的地形却并非如此。相反，从西北角到东南角以对角线方向，高起地面 60 多米。低于 410 米等高线的低矮区域易于受到 8 世纪时经常发生的季节性洪涝的侵袭，因此，这一区域为著名的“水县”，这是民间的叫法。最高点高出 460 米的等高线，而在这较高的区域，布局有花园、公园和湖以供市民愉悦。在高出 410 米等高线的城墙以北的一座小山上建造有大明宫，因此，免于洪水淹没。运河体系横贯城市的低矮部分，供水、灌溉以及运输，但是他们也对于洪涝问题贡献不少，因为这些水来自南部的山泉，当时成为成为湍急的河流并且淹没了低矮的区域（参见 3.3.3.1 中的灌溉模式）



城里安置着他的政府；他的左边，也就是东边，是供奉祖先的祭坛；他的右边，是祭祀帝国国土的祭坛，所有臣民的命根子。在他面前的南方，他俯视外城，那里居住着他的臣民，其布局，通过赋予生命力的阴阳结合，从而确保他们为了帝国的利益共同工作。阴的力量，以偶数表达，用于限定空间，而且，为了与阴的隐蔽特性相符，他们运用度量体系，使得外人无法察觉。而阳的力量，以可见的空间划分表达出来，体现在街道模式上，体现在里坊的数目上。如此的阴阳结合，土地神圣化，就像上古的“圣田”，魔幻的方形，将保证在吉祥之地维持生命的繁荣。

很有趣地，我们注意到，甚至在功能和实际的细节方面，阴阳数字也是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很好的实例就是两座市场，正如地图所见，它们被分成九个空间，但是他们填充了两个里坊的空间，于是，它们一起形成了一个四——或八重的划分。两座市场，在布局内的位置，也显示了帝国都城两个理想的概念，即周公的成周和隋代的大兴之间的区别。前者，市场位于圣王的宝座之后，但在大兴这里，不能有任何东西可以安置在帝王之后。

到目前为止，我们仅仅基于布局的西部而对于理想的规划进行了复原。原来的规划在东部已经进行了调整，然而，它已经改变了平面，遵从这一改变而建立的城市，以古代的“幻方”来考虑，并不那么有效。而且，唐代占领这座城市并作为其都城而改名为长安以后，发现宫殿布局不合理，因为它坐落近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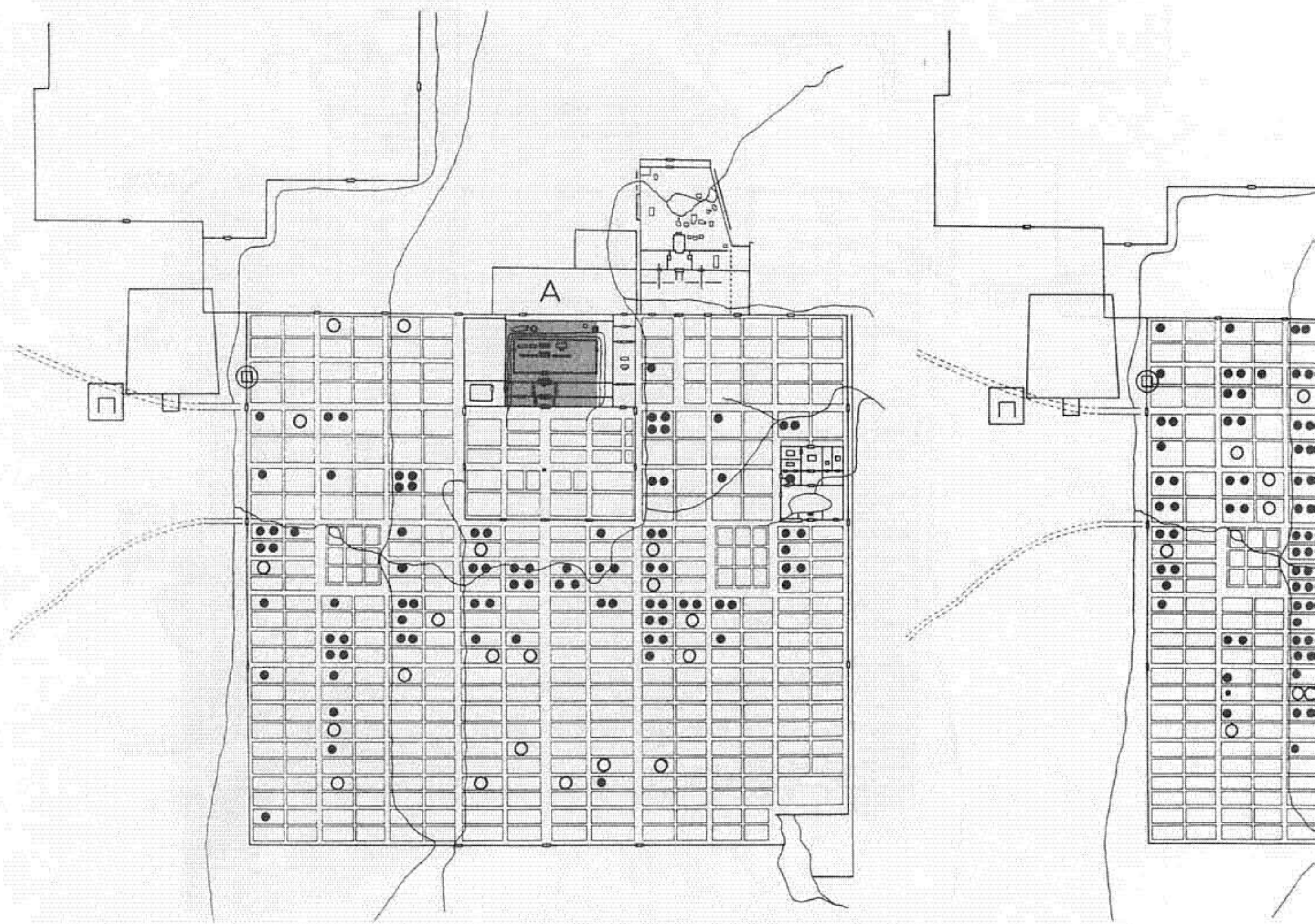


图 3.3.4.6–8 在城市的功能性模式上，大明宫的建造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在居住区的社会结构中所产生的变化，比例 1 ：80000[1]。

在城市高地东部以及在东市以南，为官吏们所兴建的居住区的地位，因 662 年和 714 年两座新宫殿在附近的兴建而得以提升，城市的西部，成为了商人、外国人和普通人的区域，而南部区域留空，并用作农田和园林、公园以及娱乐场，东市发展成为有着财政、商贸和娱乐区的城市中心，并且作为信息和新闻交换的主要区域，其坐落在特别是来自东面的交通主干线旁的位置，对于这一功能模式的发展贡献良多

图 3.3.4.6 在 583 至 662 年间大明宫完成之前的官僚府邸，当时隋代的太极殿（A）是惟一的皇家宫殿，圆圈表明王子们的府邸，而黑点代表官吏们的府邸

图 3.3.4.7 662 年大明宫完成之后（B）的官僚府邸，黑色三角区表示太监们的居所

图 3.3.4.8 714 年兴庆宫完成之后（C）的官僚府邸

1 参见 Xu Song，Tang liangjing chengfang kao，1848，analyzed by Seo Tatsuhiko，Kushi-ro-Bunko，Toyoshi Ken Kyushitsu，Japan，19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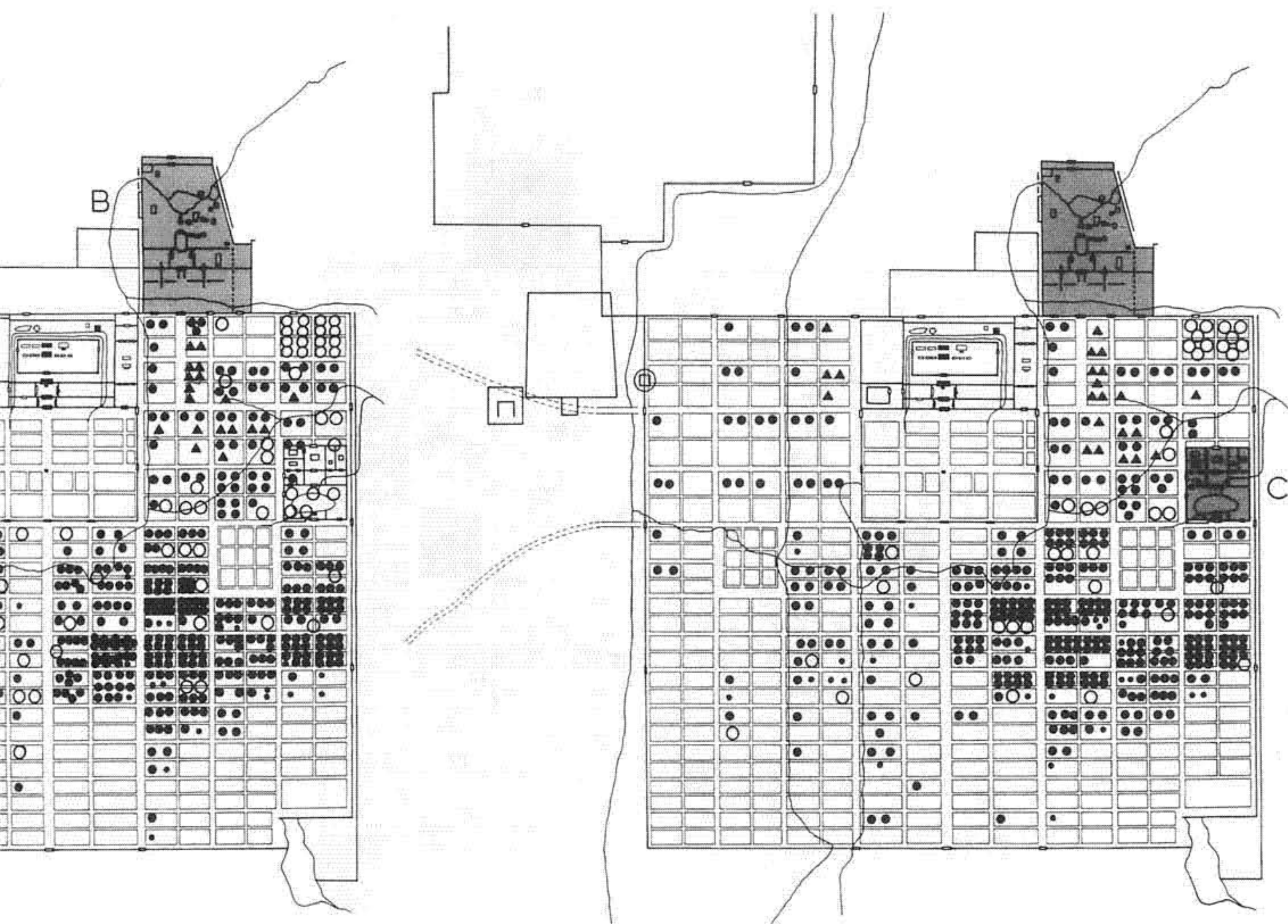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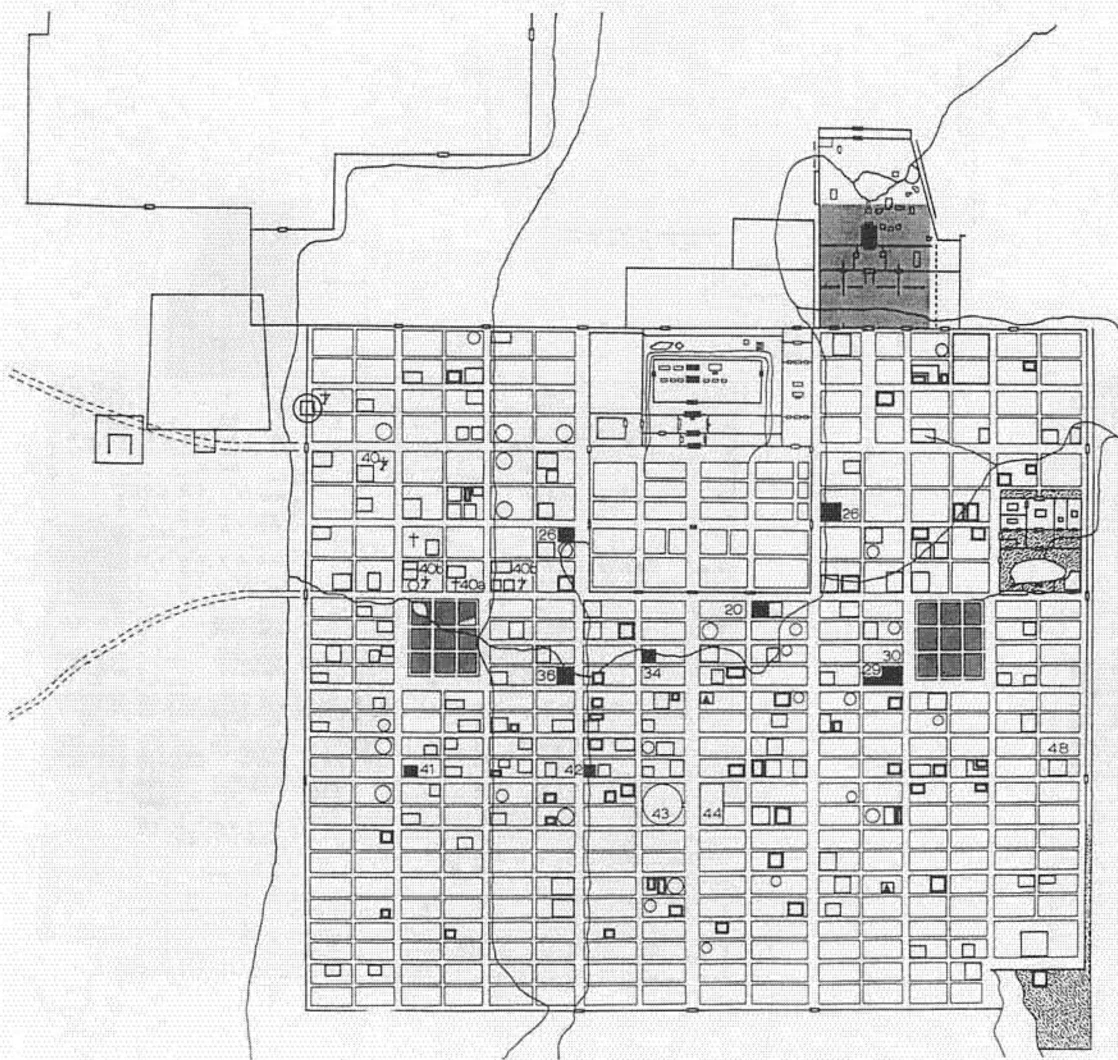


图 3.3.4.9　8 世纪盛唐时期宗教机构的分布，包括佛教、道教和宗祠，比例 1 ：80000，参见考古，1963/11。

圆圈表示道观，浅色方块表示佛寺，深色方块表示宗祠，而黑色方块表示公共的办公室。其中，在西部（41）的为长安县和长安府的府衙，而万年县（30）是在东市的角落，这府衙的西部为盐业代理（29），而造币厂（42）坐落在中心位置。东西向运河横过主要的南北轴线的中心，坐落着主要的官署（34）。在宫城外的东门和西门，坐落着两座警署，十分有趣地注意到，太学（20）兴建于 640 年，犹如公元 1 世纪开始，由王莽所建在汉长安的明堂的坐落位置，与宫城保持着同样的基本关系。然而，太学具有更为世俗的功能，而且似乎在唐长安，没有那样的建筑物，具有汉代时“仪殿”或“明堂”相同的功能。文献中仅提到宇文恺（555–612 年）年间所上交的提案。宇文恺是隋代第一任皇帝的御用建筑师和规划师，他设计了长安的布局，他的想法就是建造一座 12 层高的明堂，并且他解释说：“虽然一座 12 层高的建筑物与古典的法规不相吻合，可是，每一层代表每一个月份却肯定并非绝无道理。但是，这塔绝没有被建造起来。在文献之中，偶然提到为皇帝仪典所用的其他仪式建筑物，例如，郊区中献祭上天的祭坛，以及在城南为春播的“圣田”所设的祭坛。但是，我们对其准确的坐落位置却知之甚少。唐太宗李世民，作为唐代的第二位皇帝，感到其责任在于卓有成效的政府治理，而非没完没了的仪式和庆典。其他皇帝则更加关心佛教和道教，而这也许解释了都城之中数量如此之多的庙宇存在的原因。在这都城，为皇帝还建成了两座教堂。这清晰地表现在城市的两座主要庙宇的坐落位置上，即南北大街西边的道教的玄都观和在其东边的大西兴寺，正好在外城的中心，而且在帝国大街的中心点上，在宫城南门和外城南门之间的路中（在平面中的 43 和 44）。我们也许绝不会知道这个坐落位置是否就是由宇文恺为隋代皇帝所设计的规划之一部分。但是，作为狂热的佛教徒的皇帝，也许毫不犹豫地同意采纳了这项提案。如果，正如我们已经分析的那样，在主要的东西大街以南，外城的布局，代表了基于“幻方”概念的“神圣之地”。这两座寺院占据着“四域的至尊”之位，这位置，从前是留给成周圣城周公时代的“神圣之王”的。（参见 2.3.1.8）将 6 和 7 世纪五座佛的概念，应用于这一布局。皇帝在他的都城北边的太极宫殿中的位置，这似乎是适于释迦牟尼的位置，自从 5 世纪北魏时代起，皇帝就声称是释迦牟尼的化身。另一个传统的、中国的，然而为佛教所颠覆的概念，就是在南墙的庙宇的东门的名字，最近被挖掘出的“青龙”（48）。正如我们以上所见，“青龙”曾经是公元前五千纪仰韶文化时代起中国东方的象征



岑参，《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

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

登临出世界，蹬道盘虚空。

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

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

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

连山若波涛，奔走似朝东。

青槐夹驰道，宫观何玲珑。

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

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

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

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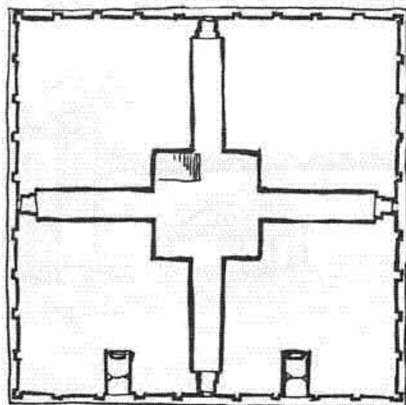


图 3.3.4.10、11 陕西西安的大雁塔，652 年建造，原来有 5 层，而在公元 701–705 年间又加了 2 层，因此，现在有 7 层高出地平线达 60 米（地图上，no.46）比例 1 ：500。

这座塔，由高宗皇帝（公元 649–683 年在位）在听取了玄奘（公元 602–664 年）的建议之后的建造工程。作为一座防火的经室用来贮藏那些由玄奘经过 16 年的长途跋涉，于 645 年从印度所携回的佛教经典宝藏。这些佛经的大多数，是在这座大慈恩寺中翻译的，由僧侣们协助玄奘完成。据载，这座塔并没有以传统的中国风格建造，而是遵循着印度的模式，它今日依然耸立长安，代表唐代的大都气派。巨大的城墙，9 米厚，在底层每边仅仅留下 6.85 米的小空间。在七层的每个房间的中心，供有佛宝，整个有 10000 粒舍利，再现了佛本身。从这些具有中央佛龛的房间里，狭窄的走道，以四个方向直接通向窗子，运用了传统的"四域至尊"的模式（参见 2.2.2.11、12）所隐含的想法，是"世界的宇宙中心"，也是在此，佛，或者说佛舍利（佛骨和佛牙）作为中心，因此假定是佛篡夺了"神圣之王"的受崇拜的地位，并且，佛的地位延伸到中国皇帝的位置。对于真正的中国人来说，在孔子、老子、孟子或庄子以及许多同样的哲人和文人的精神统治中生长，这是一种傲慢的外域以及蛮族概念的入侵以愚弄人民，并逐渐引导走向文明的终结。正如唐代著名学者、高官、诗人及孔子的拥戴者韩愈（768–824 年）所说：不管佛有怎样的德行，其佛骨中绝对没有，而且，佛骨无异于一只狗的骨或一只羊的骨



图 3.3.4.12　玄奘（602–664 年）从他的印度之行（629–645 年）回国，背着一卷卷的佛经，参见唐敦煌莫高窟手抄本残卷。玄奘在长安成为了一个僧人，并在这里出发去往印度。16 年之后，回到都城，收集有大量经文和遗宝。他提议建一座 300 尺高的大雁塔（根据 1 唐尺 =29.55 厘米，实际为 88.65 米），但是，皇帝将尺度缩减至 53 米（180 尺），仅有 5 层，并且没有按照玄奘所提议的以石建塔，而是用砖建造的砖塔

图 3.3.4.13　明德门的重建，外城的大南门，也是外人参拜皇帝必经的第一道门，而且宫廷大臣要履行职责也是必经的大门。参见考古，1974/1。

外城的大门，都是在 654 年重建的，大概是使其更具感染力，主要南门有五个入口，只有中央的为皇帝所用，大街的整个宽度为 155 米，但是，门宽仅仅 55 米

图 3.3.4.14　高宗皇帝（649–683 年在位）的武皇后，参见清代木刻。

在唐代第二位皇帝李世民（太宗 622–649 年在位）的后宫中服侍了十几年后，武曌（则天）24 岁时出家为尼。5 年后，她成为太宗之子及继承人高宗皇帝（649–683 年在位）的宠妃。651 年，她为高宗生了一个儿子，因此在 655 年成功地取代了无子嗣的王皇后，这位王皇后不久在长安与萧妃一起死去。传说，这位新任的武皇后，经常惊梦于这两位受害致死的皇后和皇妃的鬼魂。而为了躲避这不愉快的经历，她移往洛阳，并且整个朝廷，也随之在 658 年迁往洛阳。这着实令皇帝沮丧，并且渐渐失去了作为皇帝的权力，而其权力日益集中于武曌之手。她获得了则天武后的头衔，在此头衔下，作为曾经占据帝王桂冠的统治者——武则天，载入史册。

她的儿子李弘称为加冕皇太子，但死于 675 年，埋葬在洛阳东相当于皇帝的陵墓之中（参见 3.3.3.7，G 地址），但是，武则天没有遵守传统的条例和价值观，她急于建立自己的朝代，并且显示她自己家族的辉煌。她为其母建造了另一座巨大的陵体，即长安以北的顺陵（同样参见 3.3.3.1.G1 地址）。同时，她下令在洛阳以南，建造龙门的大石窟，即有着 16 米高的卢舍那佛的奉先石窟，她想像自己就是这佛的化身。佛像的面部模自她自己的脸。683 年在高宗死后，她篡夺了绝对权力，并于 690 年，改年号为周，并自立为皇帝。那时，在宫殿中建造了明堂（参见 3.3.4.16，圆形建筑），在 694 年，加入其中宇宙之轴线。1 年后，整个建筑烧毁。然而，此"轴线"为 30 米高，新的明堂有 3 层，升起地面高达 86.8 米。从某种程度来说，其概念代表了宇文恺的想法（参见 3.3.4.16），即一层象征了 4 季，二层象征了 12 个月，而三层为一个月的 24 个时段。这建筑物新增加了青铜三足祭坛、帝国的神圣符号，重建了已经丢失的大禹九鼎，每个都是 5.4 米高。

696 年的大火之后，又建了较小的明堂，其基础近日挖掘出土。武则天的朝代于 704 年灭亡，当时她被废黜，武氏家族也在公元 705 年随着这位 83 岁的老妇之死而灭亡。她葬在他丈夫的陵墓——乾陵之中，大约在长安西北 75 公里处。在她陵墓前方的石碑从未有任何镌刻，因而称为著名的"无字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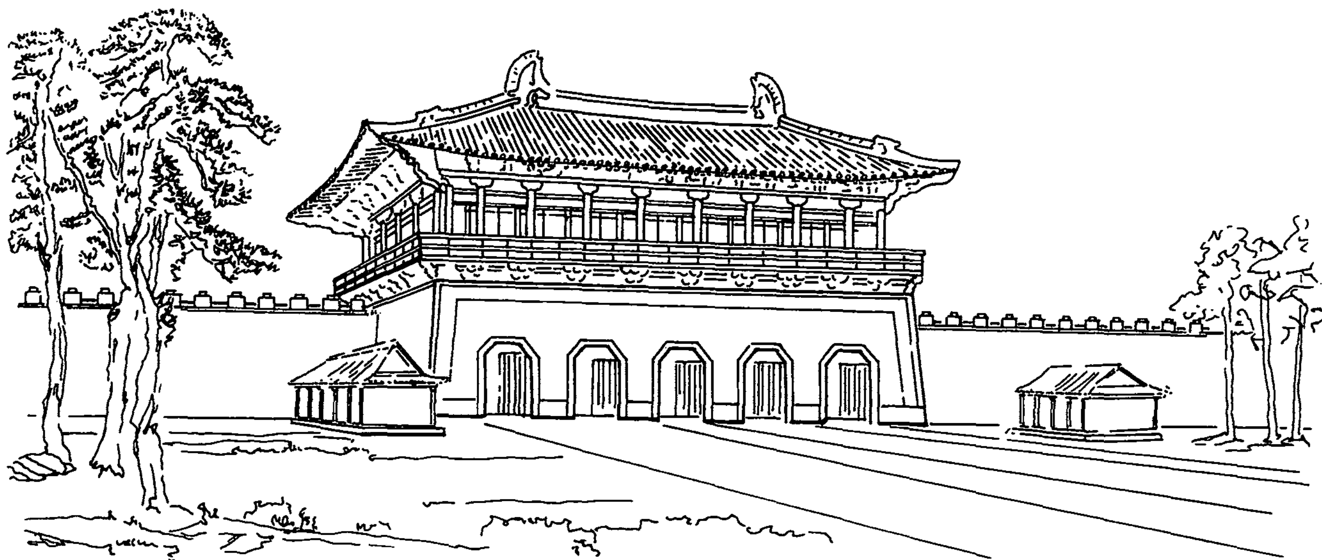


图 3.3.4.15　洛阳城南龙门石窟奉先寺的卢舍那佛。承武则天（公元 658–705 年在位）之命，于公元 671–675 年之间建造。16 米高。一般认为佛像的脸面，根据武则天的面容模制。690 年，一位法相和尚向武则天献示了一本印度佛教箴言的译本，[1] 根据这本佛教箴言，法相解释说，皇后武则天应该被看作是西方弥勒佛，也就是卢舍那佛转世化身，那之后，习惯上认为这尊雕像是这一化身的再现。
然而，所有这些，只是佛教的宣传和夸张，是最无耻的亵渎，并且背离了中国传统几乎所有概念。这导致了武则天死后对其支持拥护者的血腥屠杀，以及后来武宗（840–846 年在位）时期，对佛教寺庙和佛教神职人员的极端镇压。唐代 705 年重新建立之后，洛阳依然是京都，也是许多学者、诗人、画家的安家之地及传统文化中心





市最低处，因此不断遭受洪水侵袭。公元 634 年，唐代第二任皇帝，也是朝代的实际建立者以及中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皇帝之一，下令在都城北墙外地势较高处建造大明宫。因为，他不相信幻术，因此也不信城市布局基于这一观念是多么有效，他基于实际的考虑，为这新宫殿选址。他认为都城北部的小山是一个舒适地点，特别是因为这里离旧宫殿不远，而此旧宫殿依然用作仪式庆典。以此，原来的概念又改变了，而功能性的布局结构变化很大，因为中央绝顶不能被取代，而且无法恢复对称性。这一变化也在居住区的社会结构的渐变中反映出来。紧邻宫城的东部居住区，日益变为高级官僚和贵族的府邸。662 年后，宫殿增扩并成为皇帝们的主要府邸。后来，在 728 年，第七任皇帝建造了一座新宫殿，兴庆宫，它坐落在东西大街以北东墙以内的东区。结果，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围绕着东市的区域成为城市生活的中心，而在其南面的居住区域变得更为密集。更往南，在更高处，高官们建造别墅。城市的南部发展成为一处带有公园和亭台，花园和湖泊以供城市居民

1 译者注：即法相编纂的《大云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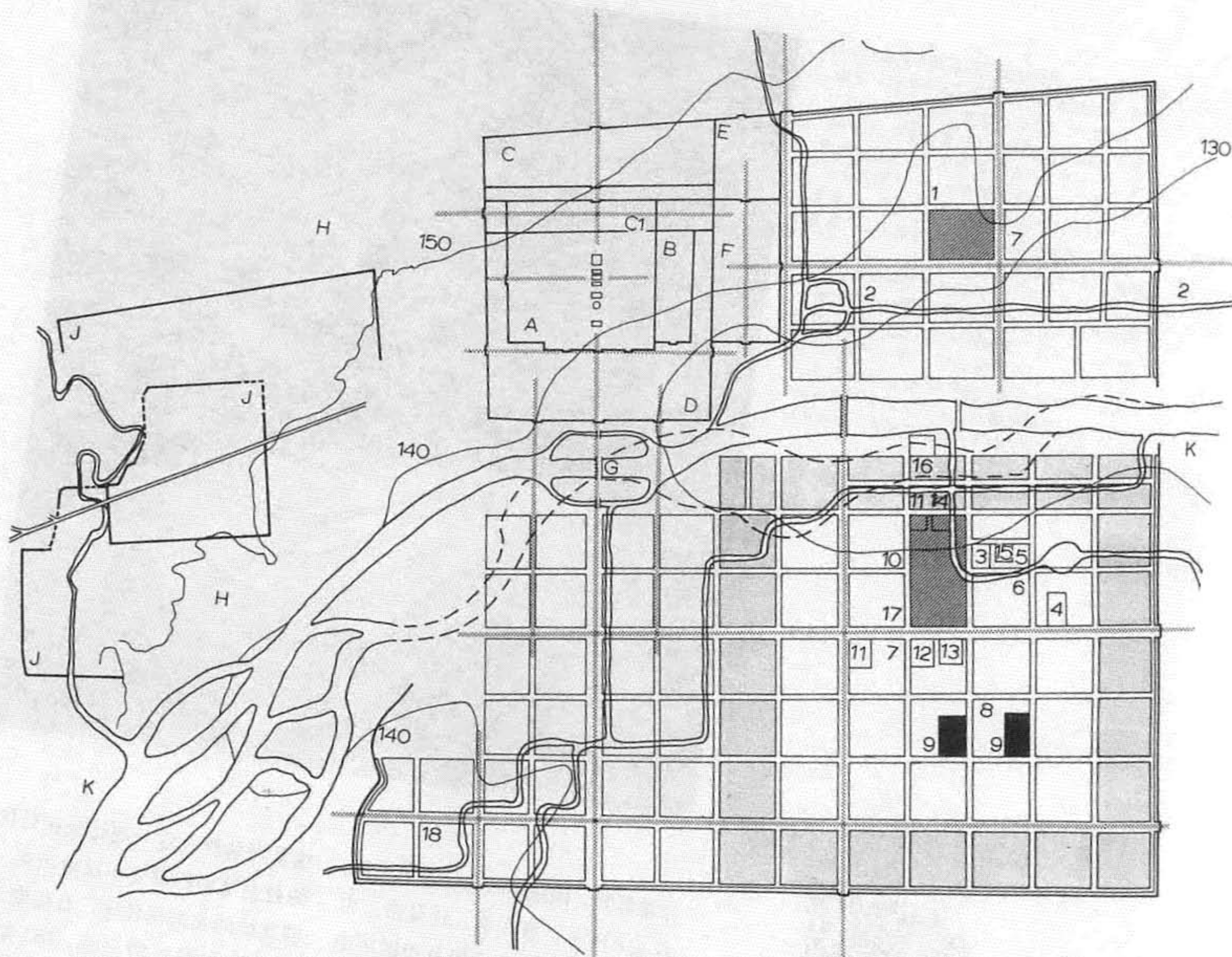


图 3.3.4.16 唐代河南洛阳的东部，比例 1：40000，根据《考古》1961/3、1978/6、1988/3 所做的布局的复原。

同样也是由宇文恺（555–612 年）设计的新都城，布局必须适应地形的特征，例如，北边的邙山和洛河（K–K），从西到东穿过城市，并将城市分成两个部分，并未赋予数字象征或传统模式的重要性，结果是，虽然是规则的，偶然的构图贯穿在城市的不同部分。然而，河流以南的两部分，表现了基于一个特别概念的某种特征。从宫殿主轴线两侧所引导的是两个街区的六排里坊，通过他们的尺度，与环绕南市场区域的 7×7 的街区广场不同

A　宫殿，一排建筑中的圆圈是铜柱的基础，象征武则天 694 年下令所预测的宇宙轴线

B　加冕皇太子的东宫

C　御囿

C1．御花园

D　皇城

E　在 749 年国有大约 32250 吨谷物的大谷仓

F　东宫城

G　洛河上的桥

H　神都西苑和上阳宫

J　汉城和周城的废墟（周时的王城，汉时的河南府）

K–K．洛河

1．北市场和主要商业区，2．主要运河，3．河南府，4．河南县，5．军士（右翼），6．军士（左翼），7．分区官署，8．罚宫 9．孔子庙和大试殿，10．督查所，11．水运输代理机构；12．都城商业税代理机构；13．盐的独家代理机构 14．国家银行分支；15．盐和麦芽交易代理机构，16．木和竹的代理机构，17．南市场和城市中心 18．西市，在桥之东的区域和洛河两岸，占地大约 6 平方公里，在唐代后来的年代里经常遭受水患。小巷子将里坊分成四部分，该模式后来用在朝鲜和日本的都城布局中，就像在长安里坊被墙围起来一样

图 3.3.4.17–19 陕西乾县，高宗（649–683 年在位）和其妻武则天（624–705 年）合葬的乾陵，长安（今日西安）西北大约 75 公里处。前面的马，大约 2.7 米高，而留在武则天为其母所建的顺陵里的雕塑，大约 5.10 米（见图 17），这显示了武后的骄狂，特别是其母从来也不是一个重要人物，更不要说什么帝国的头衔了。下面是一个官吏，神道上雕塑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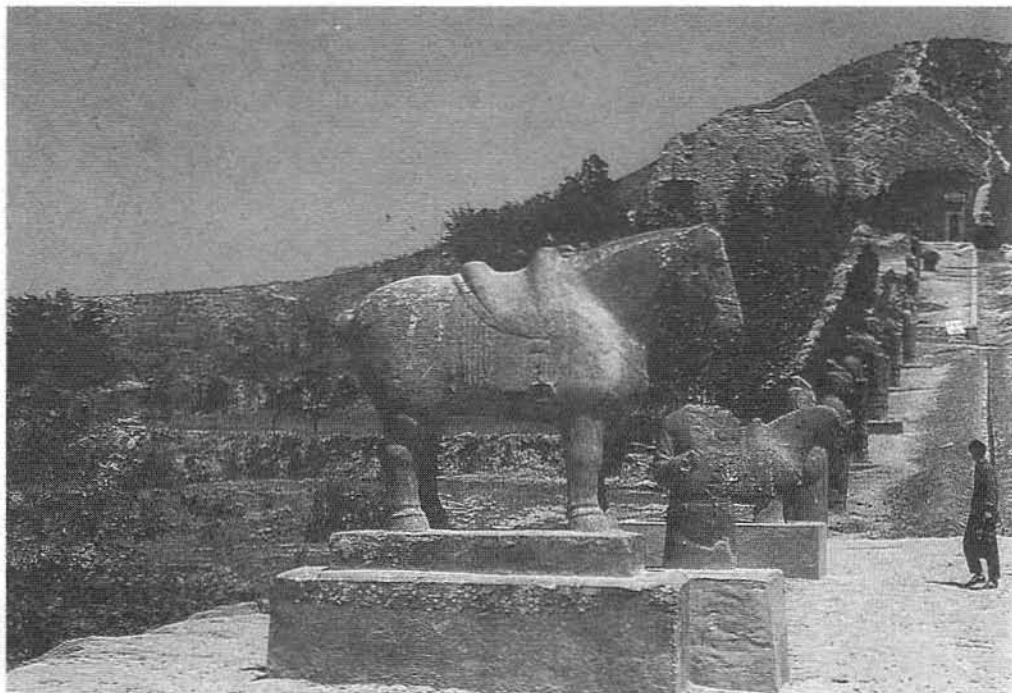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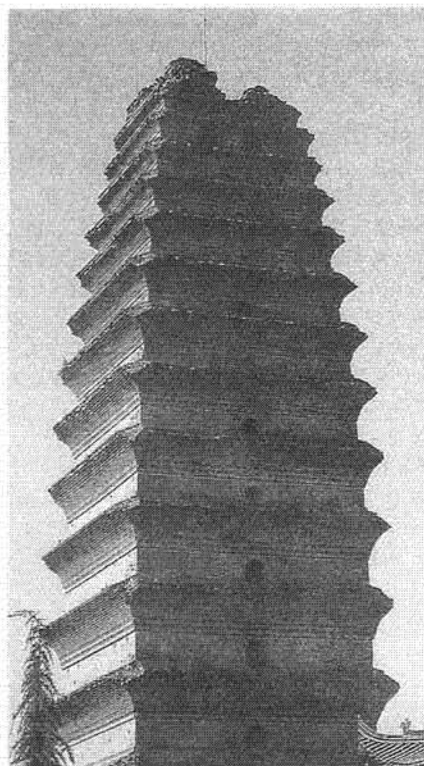






图 3.3.4.20　拥有唐代各皇帝陵墓的渭河谷，比例 1 ：1000000，参见《古都西安》1981。河岸线，显示该地段高出海平面 600 米。在渭河北的阴影区域，是最先兴造于公元前 246 年唐代时重建的古老的郑国灌溉体系（参见 2.4.12）。黑色的矩形，是都城长安，河谷西端的圆圈，是在周公家乡岐山一带（三座小山的标志）的周公庙。黑色三角及其东部的方形，是周代以前的凤雏宫殿遗址（参见 2.2.3.1）以及周太王的坟墓，周太王大概是周部落的祖先。再东南，黑色三角，是隋代建立者文帝之墓（589–604 年在位）。北部的三个方形是宫殿：a. 九成宫（唐代）b. 甘泉宫（汉代），c. 玉华宫（唐代），所有这些都是皇帝的夏季别墅。唐代陵墓（黑三角）如下：1. 李虎之陵，第一任皇帝的祖父（李昞，唐代诸侯，第一任皇帝的父亲，长安以北的小圆圈），2. 李渊之陵，高祖皇帝（618–626 年在位），3. 李世民之陵，太宗皇帝(626–649 年在位)，4. 高宗皇帝(649–683 年在位）和武则天之陵，5. 中宗皇帝之陵（684，705–710 年 在 位），6. 睿 宗 皇 帝 之 陵（684，710–712 年在位），7. 玄宗皇帝之陵（712–756 年在位），8. 肃宗皇帝之陵（756–762 年在位），9. 代宗皇帝之陵（762–779 年在位），10. 德宗皇帝之陵（779–805 年在位），顺宗皇帝之陵（805 年在位），11. 宪宗皇帝之陵（805–820 年在位），12. 穆宗皇帝之陵（820–824 年在位），13. 敬宗皇帝之陵（824–826 年在位），14. 文宗皇帝之陵（826–840 年在位），15. 武宗之陵（840–846 年 在 位），16. 宣 宗 之 陵（846–859 年在位），17. 懿宗之陵（859–873 年在位），18. 僖宗之陵（873–888 年在位），19. 昭宗之陵（888–904 年在位）实际埋葬在洛阳，20. 哀宗之陵［又称景宗］（904–907 年在位）实际葬于山东，21. 李贤之陵，22. 顺陵，武则天母亲的陵墓



在全国大约即将被推倒的4600座或更多的佛寺尼庵中，将有260500个僧人和尼姑必须以世俗生活登录在册到一些家庭之中，他们每年付地税两次，有大约40000或更多的祠庙和隐士将被废除，而最好最肥之地，大约有几百万顷将被没收征用，而男女奴仆耕者达15000人，将列入每年两次交付地税的家庭中，将奖给铜像、铜钟和国中被毁弃的尼庵里声音响亮的金属盘都用来铸造钱币，而相关的州府都要将铁像重塑为农具，金银以及小矿物将被融解送进国库，更有甚者，官吏们要向官府申报他们的金银铜铁，为免弄虚作假，税官将根据有关青铜器的处罚条例处罚他们，但是，泥塑木雕或石雕应该一起留在寺庙之中以作古物……我们也提议在皇室的两条街以及东都洛阳的两条街留下十座寺庙，每一座有十个和尚。每处以国家头等秩序建造最好最美的国家寺庙，而次级都城应保留有两座大寺院，每座应有38个和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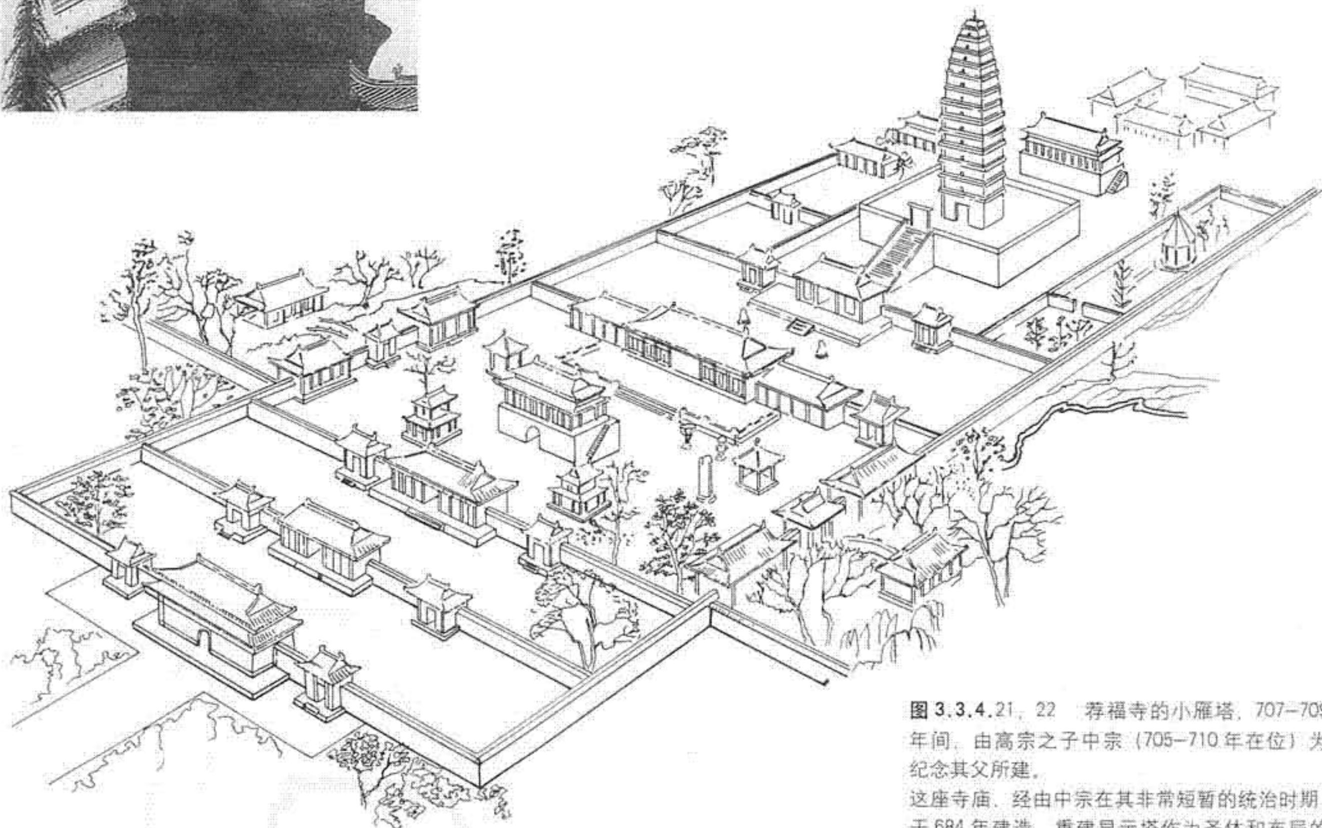


图3.3.4.21，22　荐福寺的小雁塔，707–709年间，由高宗之子中宗（705–710年在位）为纪念其父所建。
这座寺庙，经由中宗在其非常短暂的统治时期，于684年建造，重建显示塔作为圣体和布局的焦点，来替代原先的格局。塔形与其姐妹塔大雁塔不同，因为仅在一层可以进入，并藏有舍利。原来的15层的上部仅仅是装饰。整个高度大约高出2米高的平台之上43米。第一层或者说圣堂高10.5米，或大约占整座塔高度的四分之一，而四分之三作为留下的12层。（这里原文大概有误，如此算来塔共13层）



图 3.3.4.25　8 世纪的长安。复原图基于刻在一块石碑上的绘制的城市平面，由某位叫吕大防的人在 1080 年所刻。很多碎片 1934 年在西安发现，并发表于 1935 年撰写的一份报告。

宫城：A. 太极殿（583 年建）；B. 东宫；C. 皇仓；D. 女眷内室；E. 大明宫（634–663 年建）；F. 西内苑（714 年建）；G. 大安宫；H. 帝苑；J. 汉长安遗址；K. 兴庆宫（714 年建）；L. 太子们的王室；M. 公主们的十六宫室。

皇城：唐代三省六部制：中书，门下，尚书；吏部、户部、兵部、刑部、礼部、工部。

1. 内阁；2. 门下省；3. 尚书六部；4. 唐代户部别贮钱；5. 刑部；6. 兵部；7. 礼部（国家庆典典礼部）；8. 礼部（敬献牺牲部）；9. Secret Council；10.（户部）公共事务部；11. 财政部（帝国财政）；12. Court of the Imperial Stud；13. History Recorder；14. Imperial Clan Court；15. Imperial Censorate；16. 华林驯马场；17. Court for Entertainment；18. 东宫和太子的 Offices；19. 大试殿；20. 640 年成立的 Imperial Academy of Learning；21. 土地神坛；22. 太庙，有着为中宗（684，705–710 年）皇帝的办公室和唐代庙宇；23. 左翼和右翼的守卫等；24. 大安国寺，一座最大的佛寺；25. 太监府；26. 左和右的警卫；27. 景龙寺（707–709 年）；28. 景云寺（710–711 年）；29. 盐监署；30 万年县衙；31. 东市；32. 崇仁坊；33. 平康坊；34. 运河港口；35. 运河；36. 衙署；37. 西市；38. 延寿坊；39. 外国人居住区；40. 由阿罗般在 638 年兴建的景教教堂；40a. 781 年的刻有景教经文的景教碑；40b. 摩尼教堂（621 年）和袄教祠（631 年）；41. 长安县衙；42. 铸币监；43. 玄都观，主要的道教庙宇；44. 大兴寺，主要的佛寺；45. 小雁塔；46. 大雁塔；47. 四明寺？发掘地址；48. 青龙寺发掘地址；49. 寺庙娱乐厅；50. 桃花、牡丹和杏花花园。

在大明宫内：a. secretariat；b. chancellory and history office；c. palace intendant；d. 宫殿宝库；e. 翰林院；f. 麟德殿，发掘现场

图 3.3.4.23　玄宗皇帝（公元 712–756 年在位），也被称作明皇。这是一位容光焕发的皇帝。摹自刘松年的绘画。刘松年是 12 世纪末，南宋朝代住在浙江杭州的一位院士。

玄宗的统治，是唐代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特别是所谓的开元盛世（713–741 年）。然而，安禄山之乱（754–761 年），结束了这一繁荣岁月，皇帝只好从长安逃难到四川。在他的逃难中，他的宠妃杨贵妃被士兵所杀。之后，他青睐于他的儿子，肃宗皇帝（公元 756–762 年在位）。玄宗于 762 年 78 岁时和他的儿子肃宗皇帝一起死去。同年，在其领导人接连的相互杀戮之后，安禄山叛乱平息下来。由这一叛乱所带来的变化，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长安府赋税者的数量减少到原先的 66%，整个帝国的赋税者平均数目减少至原先的 3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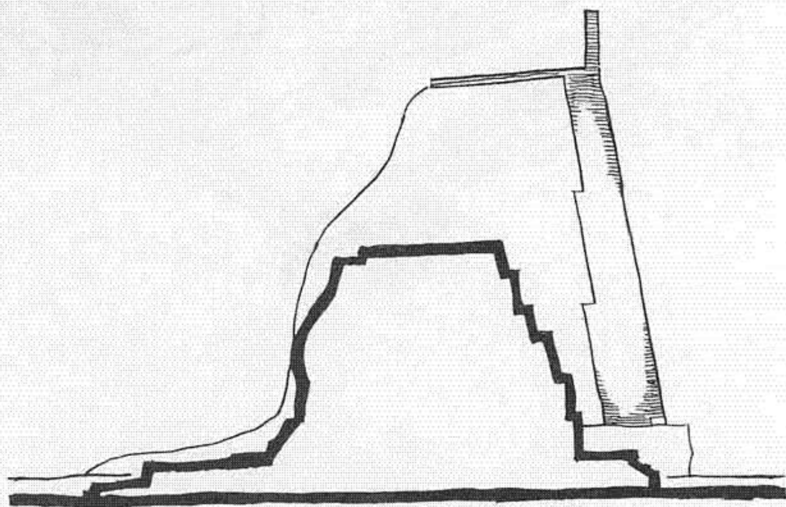


图 3.3.4.24　长安宫城西南门（汉光门）的横剖面，显示了唐代城墙掩埋在明代城墙之下的部分。比例 1：250，参见考古，1987/5



图 3.3.4.26　平定安禄山叛乱的著名将军，郭子仪（697–781 年）。
图为郭子仪于 765 年与西域诸族的抗战期间会见回纥可汗和将领们。摹自李公麟（1049–1106 年）的卷轴画［译者注：即《免胄图》］，藏于台北的故宫博物院。
全副武装的回纥可汗和将领们，对郭调解谈判时不配盔甲的超人勇气心悦诚服。因此，他们甘愿成为他的同盟。这种场面，适合中国人的观念，即作为有修养的文人，通过其卓越的人格风度，感动最为野蛮的蛮族，这是一个多年文化和文明的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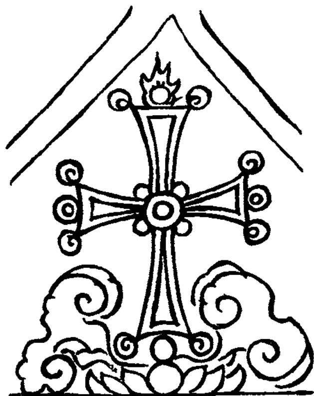


图 3.3.4.27　值得注意的是郭子仪，如果他不是一位景教徒的话，也是一位景教社团热心的保护者。781 年，他在 84 岁的年纪死去时，所谓的"景教碑"被建立起来，以纪念由阿罗般 635 年介绍到中国的基督教分支景教。（参见 3.3.4.25，No.40a）石碑现立于西安碑林，顶上由基督教十字架的象征作为装饰。上面记有郭子仪支持景教教堂的详细报道

图 3.3.4.28 周文矩（公元 917–975 前后）南唐画家所绘的一幅题为“宫中图”卷，由伦敦 Percival 爵士和 David 爵士夫人收藏

图 3.3.4.29 周文矩的同一“宫中图”卷。他师周昉画风，故画中妇女的发式与仪态为典型的唐代风格，以模仿玄宗（公元 712–756 年在位）的宠妃杨贵妃







图 3.3.4.30 著名的唐代诗人杜甫（公元712–770年），临摹自石碑。诗人在此显示为官形象，这是他在晚年得到的一个官位，而且在位仅仅很短的时间。他的足迹几乎遍布整个国家，有时孤旅，有时有家人相伴。而大多是处在困窘的状态下，这在他的诗中有所反映。他在长安生活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亲眼目睹了安禄山的反叛，而在洛阳，他出身于一个很富裕的学者官僚之家。他在四川成都的草堂，是他最著名的居所，在那里，他从760年到765年，淡泊如农夫地生活

娱乐的一处风景区。在后来，富裕人家的府邸在城墙外的远处建造起来，而理想的模式，终于失去了其意义的最后一抹痕迹。

据载，隋大兴的规划者是宇文恺（公元555–612年），起先，他任营建宗庙副监、营建新都副监、将作少监、营造东都副监、将作大匠等职，后来成为第一位隋代皇帝、隋文帝的工部尚书。其家族有匈奴血统，他的几位祖先都是北魏时代的将军并辅助建立了短命的北魏朝代（公元557–581年）。隋代的建立者，是北周朝代最后一位皇帝的亲戚，而显然，宇文恺也许也是他的亲戚。当设计隋大兴的布局时，宇文恺27岁。他肯定对于北魏洛阳和邺城的布局十分熟悉。他所采用的度量体系是基于六世纪中期的度量体系而非隋的度量体系，后者直到后来才被引用。当隋代的第二个皇帝——炀帝，决定在洛阳地区建造第二座都城时，又命宇文恺设计布局。这是604年。现在，新的隋度量体系被使用，但是应用于布局却非常不同。非常不同于大兴的坐落位置，还在于这一地区将根据皇家秩序建造新城。布局必须适宜于更显著的地形特征，特别是洛河，其从西到东横贯城区，将城市分成两个独立的部分。此外，邙山限制了朝北的扩展，因此，城市北部与宫殿一起必须挤在邙山洛河之间，而墙体的布局遵循山脚的脉络。

宫殿，坐落在河流之北，由皇城以一种非常自由的形式所围绕。这座城，形成了一个不规则的、2.7公里 ×2.1公里的矩形，并且似乎与度量单位没有任何相关之处。在皇城东部是一座大谷仓，坐落在一座单独的大型堡垒之内。再往东，坐落着围绕着北部市场的城市北部，而各个街坊的度量单位全都不同并且没有任何明显的体系。宫殿的主轴线与正北向呈偏西大约5度角度，因为它坐落在北部邙山最高峰与龙门山峡之间，洛水流过此隘口，在此，北魏狂热的佛教信徒们建造了著名的龙门石窟。

如果这是一种地形风水考虑，那肯定与龙门石窟有关。因为这些石窟延续若干个世纪，这些石窟持续不断地发展。主要轴线是用来布置主要的南北大街，即100步宽的帝国大街，它从中部的中央宫门开始，以一座长桥横跨洛河，继续向南直达城之南门，并且远达龙门石窟。在主要大街两侧和皇城与宫殿的正南，有一个居住区为4里 ×6里规模，分成24个街坊，在这一带东部，一个7里 ×7里的方形围绕着中央广场，包含城市的主要部分，通过三座城门可达。三条主要道路满足居住区需要。在城市南部的每一个街区大约为1里 ×1里，以100到200尺宽的街道分隔开来。整个度量单位仅是所有街区和街道的总和，而因此不具有数字意义，如果我们又涉及神圣数字这个话题。这是所有更加令人惊奇的，正如炀帝在他604年的颁布令中明确所言：位置的神圣性以其内在的原始力量呈现。要保证城市布局中数字的相互配合，曾经具有逻辑性，但对这

白居易的诗，《早送举人入试》

夙驾送举人，东方犹未明。

自谓出太早，已有车马行。

骑火高低影，街鼓参差声。

可怜早朝者，相看意气生。

日出尘埃飞，群动互营营。

营营各何求，无非利与名。

而我常晏起，虚住常安城。

春深官又满，日有归山情。

座城市来说，那仅是无稽之谈。

城市以西苑囿延伸远达郊区，比长安的帝国苑囿大3倍，但它包括了旧周代和汉代的废墟，在北魏洛阳废墟的东边，其中修复了几座佛寺，散布于整个区域。北边，邙山包含几座前朝的陵墓：有北魏皇帝宣武帝（公元499–515年在位）之陵，位于北城墙之北，从658到705年，武则天居洛阳，此地又变为帝国之都城，尽管，自从唐代建立，它就作为一座二级城市存在。然而，这城市并没有变化，依然是一个文化中心，直到1126年，那时，辽的金人完全将其毁灭。

在山西省现今太原以南的晋阳，原来在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最北端是一座最坚固的堡垒。自从唐代建立者和他的儿子将其用作控制中国的根据地之后，它变成唐代最重要的堡垒。武则天在690年将其升格为北部都城的地位。唐代的第二位皇帝已经在637年，以一座新的7里 ×8里的矩形墙围绕了这座古老的城池。终于，当唐第七位皇帝732年确定其为北都后，整个城池向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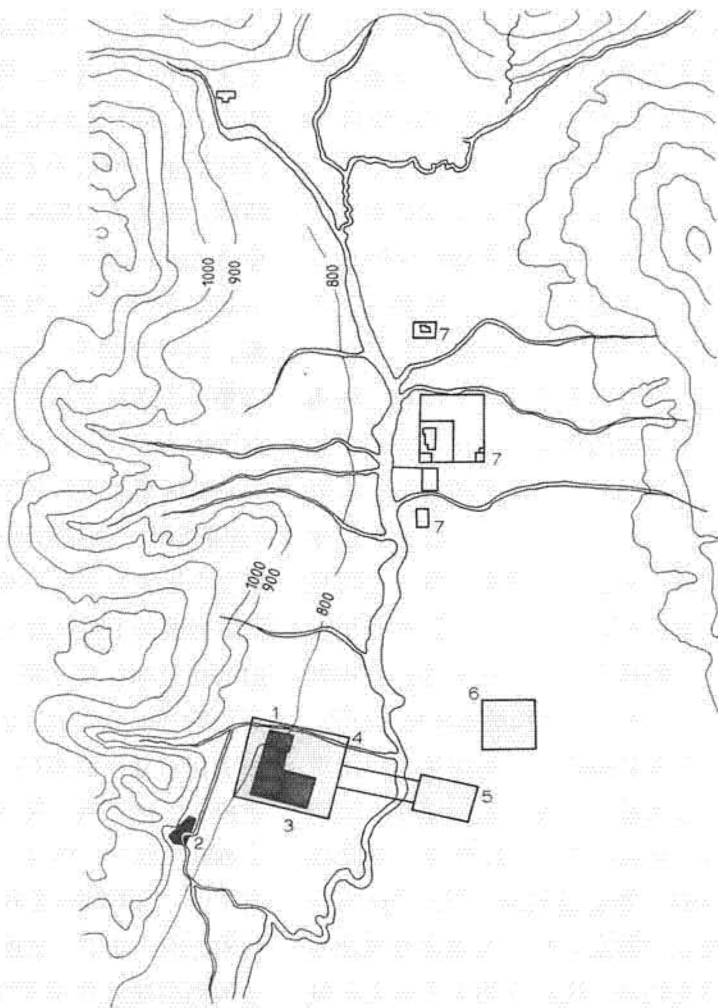


图3.3.4.31　近山西太原的晋阳城，比例1：250000[1]。

1. 晋阳古城，周代起就有的宫殿区；2. 晋祠，5世纪兴建，接近晋河的源头，因此名晋祠，以纪念公元前11世纪唐叔虞；3. 可以追溯到隋代的城市扩建部分，当时城市为唐代建立者李渊的居住地；4. 唐城，637年扩建形成了一个7里 ×8里的矩形；5. 在汾河东边的东城，由在河对岸的中间的城市连接到690年之后时期的唐城，所有这三座城都毁于979年；6. 平晋979年宋时的城基；7. 宋、明和清代的太原城

1 参见City Planning Review，198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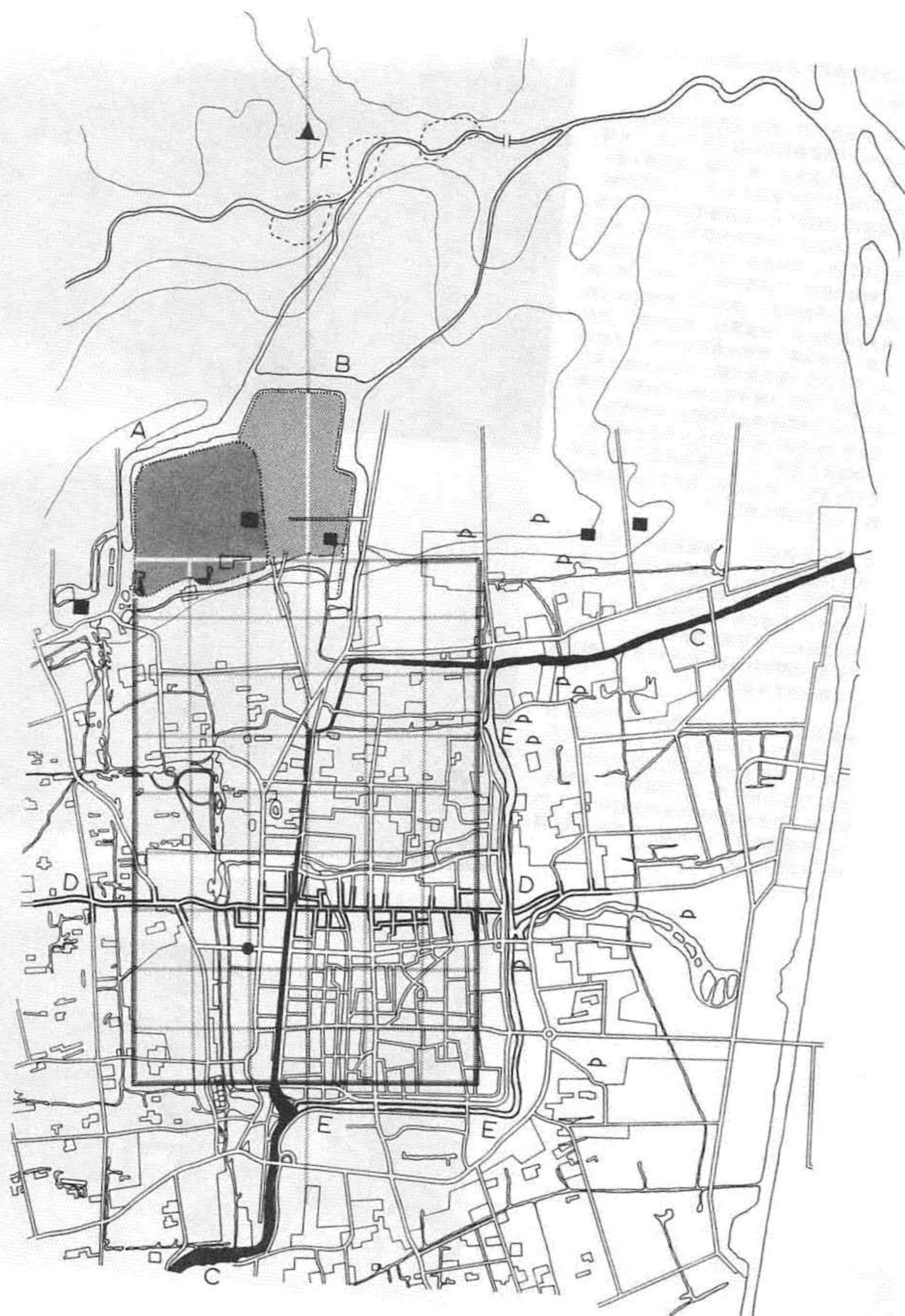
延伸，并且增加了一座所谓的中央城市和一座东部城市。中央的城市横过河流，形成了大约6里长的一座山峡屏障，其东边又增设以超过4里的东城。因此，这山峡以一座11+8=19里长度的堡垒为屏障。据载，晋阳城是一座具有战略重要性，具有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具有财富的城市，它经受住了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多次袭击。但最终，还是于979年为宋军攻克并完全毁坏。

3.4 功能性街道模式的涌现

隋代兴起的第三座城市扬州，坐落在长江以北几公里，也是大运河上主要的停泊地之一。据载，在609和616年间，炀帝在这里的小山上建造了宫殿。当时，这里还只是一座公元前5世纪吴国故地废墟里的一座小城，用作该地区的行政中心。公元5世纪，一座名为“大明寺”的佛寺在其西边兴建。现在，这座旧城向东延伸，并被建造成为一座坚固的堡垒。而在这座山下往南，布局有一座矩形的新城，大概6里×8里。一些学者认为，这座新城，象长安和洛阳一样，也以里坊形式布局，但是，尽管几座里坊的一般性坐落位置和名称已经辨别出来，但是，其尺度或规模之细节，依然无从知晓。大运河从北向南贯通这座城市，有些偏向城中心的西部，而且，我们可以假定，这是城中的主要交通线路。755–763年间安禄山叛乱之后，很多富商从北方移至扬州，使其成为南方最大的城市之一，有大约50万的居民。在那时，城市中心就是所谓的“九里三十步”街，其从东到西横贯城市。其从城内延伸往达郊区，并且遍布珍珠玉石仿若仙境，而夜市那些数不清的灯笼照亮了深邃的天空。这里，也许从未兴建隋代和初唐那种封闭的市场。834年设定了与海外地区自由贸易的新法令，关乎扬州、宁波、泉州和广州。扬州成为了所有中国最为富裕的贸易中心，坐落在稻谷生产的中心。作为帝国税收的贡米十分之九出自这里。城市靠近海边盐田，这是另一个富源。

唐代有着常规城市规划的最后一个实例是四川省的成都。自从公元3世纪兴建以来，它作为四川省的中心，而且是继长安和洛阳之后汉代的第三座最为重要的城市。在隋代，围绕着旧城区的郊区，由一座土墙所围绕。在878–884年黄巢起义之后，皇帝从长安逃亡到成都，四川当时的剑南西川节度使，将整个聚落区加筑了围墙。从其遗存的街道模式，我们可以重建其布局。新城墙似乎形成了一个5里×7里的矩形，围绕着那座四边均为3里×3里的方形的旧城区。这座旧的方形城易于适应新的格网，因为，旧的度量单位的3里，仅比新度量单位的2里少几米，因此，获得了一个相对复杂的布局。为了新的街道模式，这“里”被再划分成为每个600尺的三个部分，总共1800尺为1里，而街坊形成为600尺×600尺的方形，从中，又再划分小街道。这种街道模式存留至今，在内城北

图3.4.1 扬州的唐城，约建于609年。比例1：40000。1984年制图出版公司将复原图叠加在扬州的现代地图上。
这一地区的大运河被重新建造后，一座新城在广陵旧要塞城镇的南面成立了，这里以前被称作公元前5世纪时吴国的邗城（A）；隋朝第二个皇帝、炀帝（605–618年在位）命名这个新城为扬州，并赋予其唐代的南都地位。一个6里×8里的格局在重建的运河两岸铺开，这运河可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C–C）。在中央南北轴线的北端，旧城堡的东面又增加了新的宫殿区（B），“里”的度量是基于隋代开皇时期（590–600年）的尺度，即是29.59厘米。于是得到一个532.64米为一里的基本度量单元。运河迅速成为商业区的主干——经济活动和贸易场所。然而，主要的市场沿着主要的东西大街，从南往北，该市场位于度量模数的第四条线上，与南墙（D–D）3里之远。这条街叫做9里30步街，而且通到城墙之外的郊区，仅6里在城墙之内。正如同时代的观察家所言：这是一座夜市，成千上万的灯笼在清澈的深蓝色天空上闪耀，像神话世界那样堆满了珍珠和美玉。学者们相信，城墙之内的区域像在长安和洛阳那样被划分成为里坊。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未探测到城墙的痕迹，也仅只辨别出几个里坊的名字。旧要塞城镇及其相邻围绕帝国行政官府宫殿区的城墙为30到40米，今日依然清晰可辨。安禄山叛乱后（755–763年），来自北方的移民使城市人口增加了，当它变成帝国最大的城市之一时，其城墙之内，大约居住50万人口。由于90%用于进贡皇室和北方都城的稻谷曾经都产自江南，扬州城经济繁荣。作为长江富裕的出水口区域，扬州成为大运河上采集和船运中心。763年以后，稻谷沿着大运河从省级的船转运到皇家的船上。城市财富的另一个源泉则是和东海岸其他城市的食盐贸易并将这些食盐转送到帝国其他主要区域的运输业。经过城市区域仅15米宽的运河就显得十分地拥挤。因此，于826年在东墙外（E–E）又挖掘了一条新的运河。这带来了新的郊区，其中有三个里坊被辨别出来，一直持续到城墙以外5里的地方。843年，皇家敕令扬州、广州、福建的泉州以及浙江的明州（现今宁波）一起作为外国通商港口。结果，主要由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构成的外国商人社区发展起来。9世纪末，扬州随着唐代的崩溃衰亡。一个短期的朝代吴国920年建立皇室时，这里仅是供几家潦倒的破落户居住的废墟。又一个短期的朝代后周（951–960年），在一个较过去浓缩了许多的规模上重建了城市，占地不到旧隋唐大都城的一半。F. 隋炀帝的坟墓（参见3.3.3.5和3.4.3），城墙外最西端的黑色方形是带有鉴真纪念堂的大明宫


F
B
A
C
E
D
D
E
E
E
C

引起洛阳纸贵的左思（250–305 年）的《三都赋》节选：

“…外则轨躅八达（城外是四通八达的道路），里闬对出（依罗盘指南针指向各个方向）。比屋连甍（街道一条接着一条，房屋一座挨着一座），千庑万室（广厦居屋成千上万）。…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城西为另一座有围墙的城区）。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它包容无数商店市场，是商贸荟萃之地）。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店铺密集成行，商品堆积如山），纤丽星繁（最美的珍宝，亮如星星）。都人士女，袨服靓妆（都城里的男男女女，穿戴华丽，装饰妖艳）。贾贸墆鬻，舛错纵横（商贾往来买卖不绝）。异物崛诡，奇于八方（即使最珍稀之物在此也有出售）。布有橦华（例如从橦树花朵所纺之丝麻），麪有桄榔（从西米椰子磨出的面粉）。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来自马六甲的竹笛且在中亚也很著名），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蒟果胡椒在广州以美味受到赞誉）。…焉独三川，为世朝市（怎能说，惟有洛阳是世界大都）？”

以上所描绘的郊区，沿着城南的河流延伸，大约有 10 里的距离。而在隋代（589–618 年），这些郊区，由一座土墙所围绕。880 年，当新城建立后，旧城在所有各边由城市聚落所围绕。而当蜀国在 10 世纪唐代覆灭后被立为一个独立王国后，成都的城墙总长度为 40 里，根据记载，城中栽植很多芙蓉花。

蜀国的人口，已经由 742 年的 498 万居民，升至 1080 年的大约 830 万人口。如果我们假定，城市人口和王国的整个人口也是同样的比率，那么，城市在 1080 年，也许已经有 650000 居民，并且很可能是帝国为数不多的大城市之一。然而，40 里的城墙，不能重建，内城和外城的城墙不能计算在一起。







图 3.4.2 扬州城，唐代宫城城墙，今日依然可见，高起于地平面和旧城壕

图 3.4.3 隋代炀帝（604–618 年在位）的坟墓。在第二个隋代皇帝死后，无人留下来照看他的坟墓，更不用说建造一座陵墓。传说其祀庙被闪电毁坏三次，因此后来因怕受到上天的诅咒，没人敢再建另一座祀庙，直到 1880–1890 年的清代末年，才建了墓碑，并在 1966 年文革时被严重毁坏，至今石碑的顶部构件，依然寻无踪影

图 3.4.4 现今扬州城西北大明宫的鉴真和尚纪念堂，建于 1974 年，以一种仿唐风格建造（参见 3.3.3.18），可与日本奈良唐招提寺相提并论，那是在 740 年由鉴真和尚兴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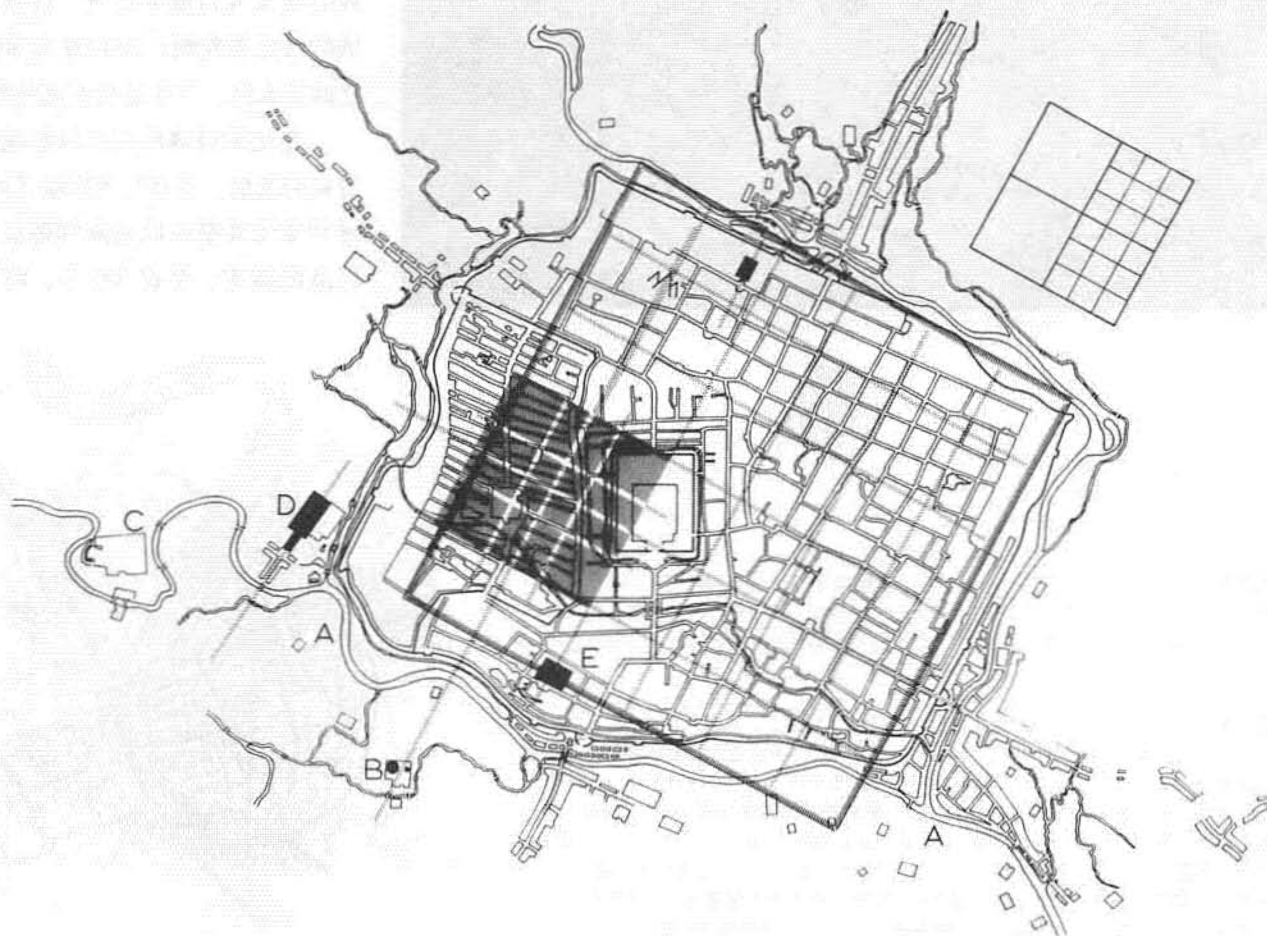
图 3.4.5 唐代成都城市，比例 1 ： 40000。重叠于一幅从 20 世纪早期的现代地图之上的复原。881 年，唐代皇帝僖宗（873–888 年在位），免于黄巢叛军而逃离长安，并撤退到四川成都。这座城市，已经被用作为 755 年安禄山叛乱时期玄宗（712–756 年在位）的避难处。而自从那时起，成都就被称为南都。那次叛乱形式极为严峻危险，而因此决定将成都变成为一座大堡垒和军营。当时受到信任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骈，围绕着老城兴建了一座新的罗城。其以一个 6 里 ×6 里的方格网度量单位布局，基于 31.3 厘米的唐尺，563.4 米为一大里，这是唐代后半个朝代所用的度量单位。这座罗城周长为 24 里，其接近于在编年史中所记载的 25 里。这 25 里，也许是在从城墙前面的城壕外所测量的数据。这座城墙 2 丈 6 尺高，大概 7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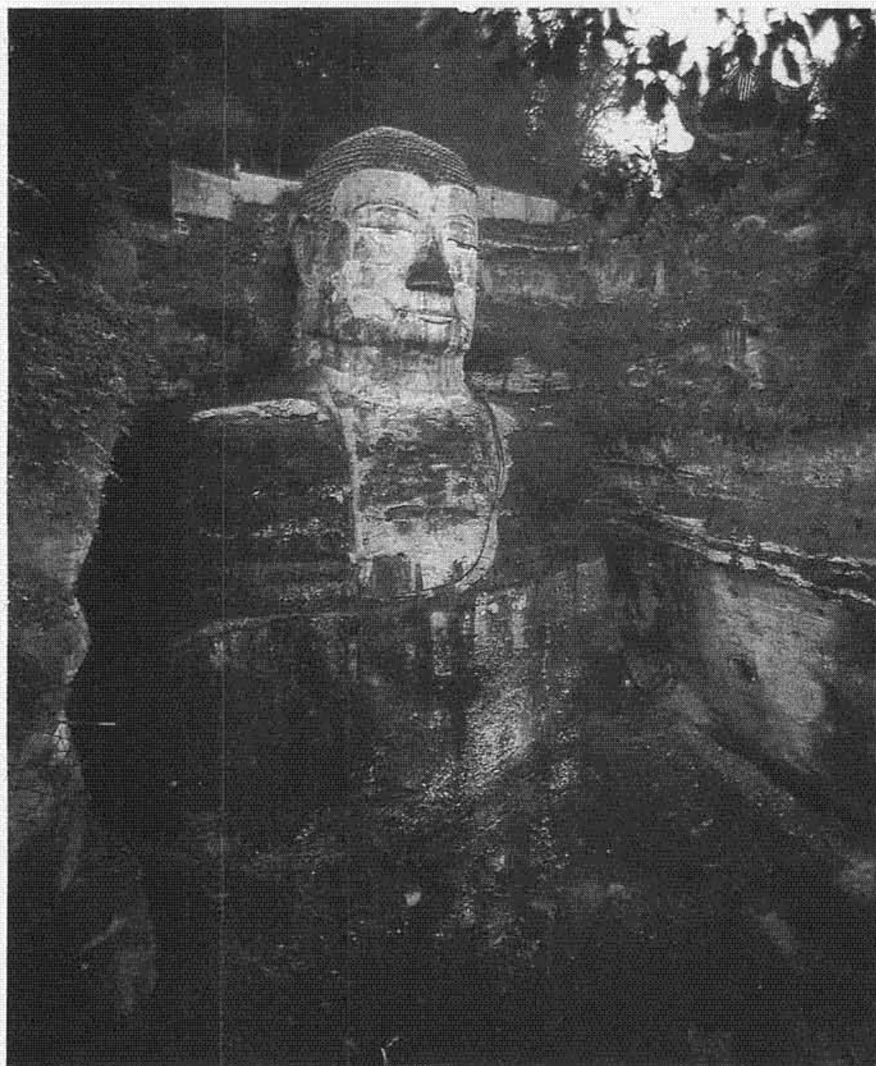
一里的方形区域，被分成九个小的方格，120 步或 600 尺，在每一边，象征幻方的模式。这种划分今日在旧城的东北部分依稀可见。而很多较小的街道的两侧都排列着商店，有如在唐代时所呈现的情形。因此，在由封闭的市场空间所形成的旧市场体系已经瓦解时，还未建立独立的市场。这种将 1 里城区分成较小的方形的划分方法，非常像其时在朝鲜和日本时所用，而且，早已完善地应用于扬州以及洛阳。

然而，这新城仅只是城市聚落的延伸，它已经围绕着旧城发展了，这座旧城早在公元前 4 世纪末由秦代统治者所兴建。坐落在由高山环绕的遥远地区，但是在一个非常肥沃多产的区域中心，这城市持续地发展，相对未受到像在中国其他地方的政治紧张局势的侵扰。而城市在刘备于 221 年将其选作新立的蜀王国的国都时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刘备的坟墓以及诸葛亮（181–234 年）的坟墓坐落在城市（B）之南，而且明显位于旧城池的中轴线上，那城池原来大概是刘备的王宫区域。城市人口，从公元 2 年至公元 140 年的一个半世纪中，从 287000 的居民人数升到 381000 的居民人数。国中整个汉人人口，相当于现今（译注：作者成书年代）的四川省总人口，在同一时期，从 350 万上升到 480 万人。因为城市区居民的人数不能单独指秦的旧城池，我们必须考虑那些大的郊区。

在隋代（589–618 年）元年，围绕成都的城区，建造了一座土墙，以其沿着锦江（A—A）的大郊区环绕着古老的秦代城池，而这些郊区，是从汉代发展起来的。

著名诗人杜甫（712–770 年）从 760 年至 765 年，朴居于锦江之北的“草堂”（C）。青羊宫（D），是一座兴建于唐代的道教庙宇，在古老的秦代加固的城池之南，建造有一座著名的孔庙





部依然可见，尽管因后来的重建而有某种改变。至于是否存在一座市场，依然未置可否。但是，考虑到先进的经济发展以及这种晚唐的不同寻常的街道布局，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即经济活动，并不仅仅集中于一个地方，而是以其特殊的布局遍布整个城市。这种一平方里再划分为九个街坊的做法，非常象隋大兴的两个方形市场的再划分形式，而里坊的尺度，暗示了一种再划分成小的建筑地块的做法，非常典型的商店建筑的做法。甚至大概有沿着窄街的两层建筑物，就如南部城市的市场街道的做法一样。结果，建筑密度显示了各种文献中记载的庞大人口数字结果。从围墙区域的尺度来判断，200000 和 300000 之间的人口，并非是毫无道理的。

变化的经济结构已经影响扬州布局的发展，并在后来影响了成都。这种变化甚至可以追溯到浙江东南沿海的城市。早在 591 年，隋代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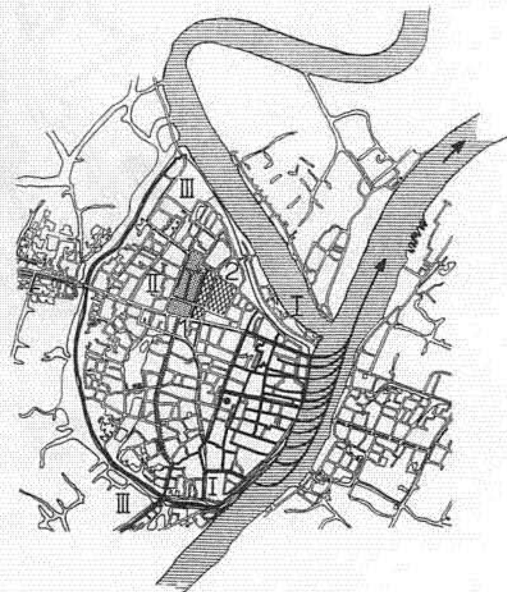


图 3.4.6 四川成都南部乐山大佛。这座大佛雕像 71 米高，在岷江岸红沙崖凿崖而成。在 803 年完成，它大概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尊佛像，也许被当作妄自尊大的顶峰之作，这最终导致了 40 年之后，840–846 年间武宗统治时期对佛教信仰与僧侣们的残酷迫害

图 3.4.7 唐代，在甬江岸边兴建的浙江宁波城，比例 1 ： 40000。1930 年代的平面，这座贸易和商人的城市布局，完全遵循功能考虑，并且适应自然环境。三个不同的部分清晰可辨。东部是沿着河岸的港口，沿着港口，发展了带有边巷（实际为走私网络）的市场街道体系。这市场发展与航船着陆地紧密连接（Ⅰ–Ⅰ），中央部分由行政办公室所控制（Ⅱ），并且包括孔庙（2）以及直通办公区（1）南部前门的大街。西部为居住街区（Ⅲ–Ⅲ），以半月池作为其南半部分，城墙在 9 世纪唐代末年建造时，逐渐环绕着结合在一起的三部分。城市称为明州，在 834 年被选为对外贸易的一个自然港口。这一布局，几乎没有变化地存在了 1200 年，保存其功能直至今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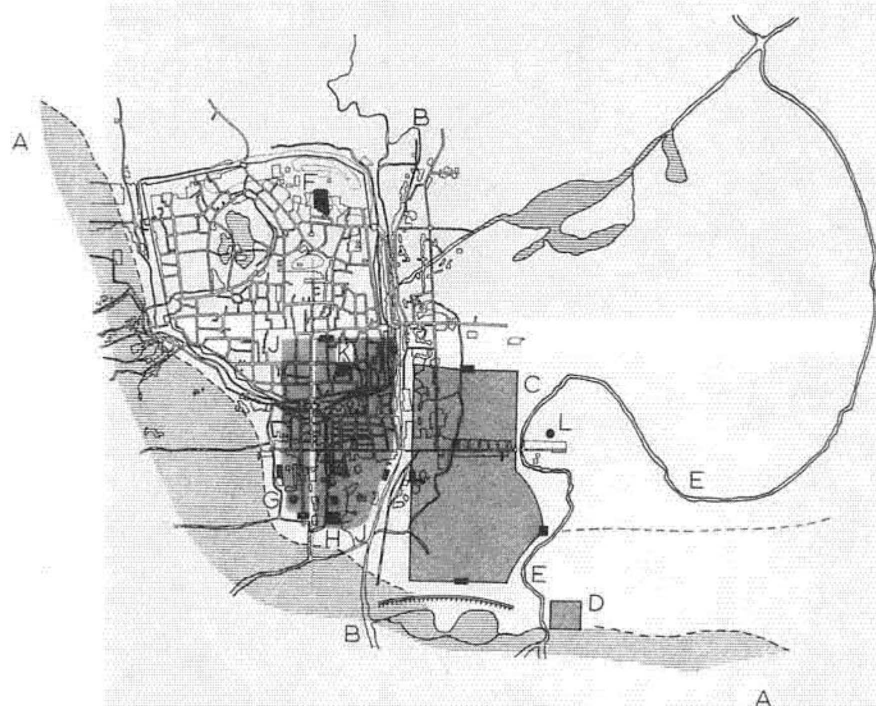
一位皇帝的宰相，建造了一座36里长的城墙，围绕着现今的杭州，在此之前，挖填出运河和堤坝，发展西湖以东的区域。这座城墙遵循地形特征，而街道模式与运河密切相关，其实际上是主要交通线。聚落的布局完全基于实际的和功能性的考虑，因为无需与皇帝的宫室或府邸有任何联系，这可能以其神圣法则影响了布局。同时，在更北边，出现了大运河。610年，新的聚落，通过向北延伸城市运河而与大运河相连。此后，城市成为了海外和内陆贸易网络的船运中心，而迅速发展成为东南沿海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当黄巢起义于884年被镇压后，在891年，墙体得以重建，将北部和南部包括在内。

在同一个区域中另一个经济发展的例子，是浙江省东部甬江盆地的变化，以及738年宁波城的兴建。在南部山区，早在越国时代，就已经有一座非常古老的城市聚落存在。但是，当这沼泽似的盆地排干后，兴建起了防洪堤坝控制淡水供应。城市聚落重新布局，并且布局在甬江和余姚河的汇流处。这里早已经与大运河的支流相连。沿着西部河岸，两河交汇的南部地区因宁波城而得到发展。一些平行的街道，将河上下货区与城内市场街道相联系。因为甬江的低处可泊远洋航船，宁波迅速成为了一个大运河南端非常重要的船运中心。其聚落区域朝西增长并建立了一座行政中心，围绕着所谓的月湖发展了居民区。唐代末期，在西边建造了一座城墙，将余姚河岸与港口区南端的河岸相连。城市的布局和形状，都完全是基于实际的和功能的考虑，正如在杭州那样，并且表示了早期的经济力量对于城市聚落的影响。这几乎依然未变，一直持续直到20世纪，并且依然作为中国的主要港口之一。

8世纪注册户籍数量的缩减（选定的区域）

所选的府城	开元时期（公元713–741年）	元和时期（公元796–820年）	755年安禄山之后的缩减
长安	362909	241202	66.0%
奉贤	44532	7580	17.0%
化州	30787	1437	4.6%
铜州	56509	4861	8.6%
普州	60853	6567	10.8%
陕州	47322	8700	18.4%
洛阳	127440	18799	14.8%
郑州	64619	13944	21.5%
汴州	82190	8218	10.0%
中国总数	7417185	2368775	30.6%

图3.4.8　云南昆明城，唐代建立，作为从750年到13世纪南诏国的一个重要的城市，比例1：40000，重建是基于一幅大约1910年的现代地图和昆明风物志，1982年。围绕现今昆明城的区域，成为公元前109年汉帝国的一部分。但是直到唐代，一个城市聚落才在滇池以北发展起来（A–A为元代以前的岸线）。第一个墙围区域，在764/765年兴建，其时，南诏国成立，最早的部分，坐落在盘龙江（B–B）以东，并且大约占地8个1里的方形（C）。880年，一座城堡（D）添加在金兜河（E–E）东岸，而盘龙江以西，建造了几座庙宇，在城市以北（F）的山上，建有圆通寺和两座庙宇，东庙和西庙。庙宇的塔，依然建在一条南北轴线的两侧，直通在北面的低矮山脉。孔庙同时建造在东庙（H）以南，聚落的西部。在1050年，终于建起了城墙，这是在10世纪南诏国重建为大理王国之后（J），整个带有中央宫殿的聚落完成了，并且，它成为著名的"水闸之城"。因为两条河流已经为防御洪涝和灌溉之故，用闸门来控制。那时，一座石塔在沿着金兜河的庙宇中已经建造起来。塔上有梵文和汉文的镌刻



政府放弃尝试保存一种刚直的对于价格和市场的控制，与8世纪晚期到9世纪晚期的极端重农主义者关于引导所有管理机构采取普遍对放宽以往对贸易与制造业采取抑制和敌对态度恰好吻合。在此，我们可以发觉对于商业的自8世纪中叶伊始的对于部分政府的态度的转变。商业以往被认为是不重要的或"无商不奸"的情形下，现在被接受了，因为贸易既不能被压制，也不能足够地受控制，最好的解决之道就是将其作为一种财源来加以开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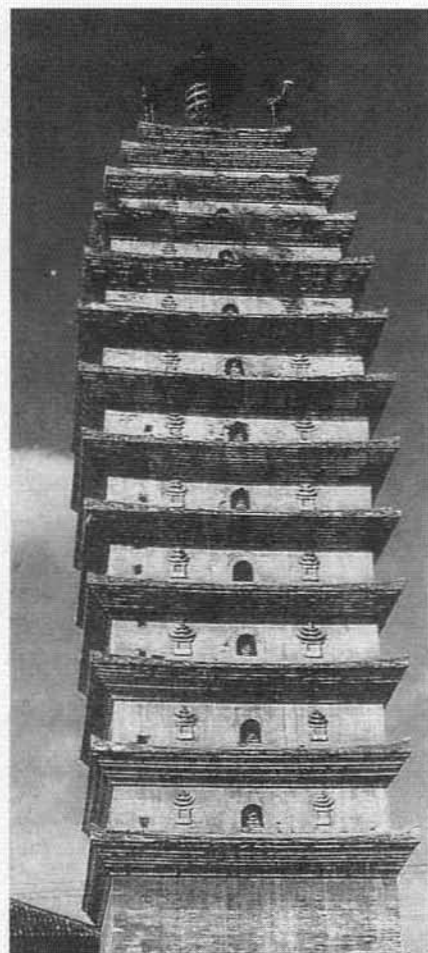




图 3.4.9 云南昆明东寺的塔，原来在唐代由砖建造，1884 年重建。
一条中央南北轴线两侧，坐落着这座塔，与在西侧的西庙的姐妹塔，它们所遵循的概念，几乎与日本京都的平安京的布局几乎同时使用。然而，这塔 36 米高，有 13 层，而且代表了长安的小雁塔，每一层以佛像装饰，并且有梵文雕刻，记录了印度的影响。

图 3.4.10 10世纪的云南昆明大理王国的石塔，原来建造在金兜河畔地藏庙里，装饰包括四大天王和梵文和汉文的镌刻。基座由八条龙组成，传说塔是坐落在这些龙之上的以一劳永逸地防御它们给城市带来洪水，因为，龙是水神

第4章 现代时期：城市文化及其对立面

4.1 宋代(公元958—1279年)

唐代，在一片血腥之中淹没，留下一堆废墟，西都长安也完全毁去。叛乱间，却诞生一个新王朝，一个又一个短暂的国家与朝代交替，却只不过维持了两代人，这就是著名的“五代十国”。名称，表明了其政治的不稳定性和沉寂的权力结构。变化的进程中，旧的都城长安和洛阳完全毁掉，另一个城市中心获得优势地位，即河南东北部的城市开封。实际上，如我们以上所见，这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公元7世纪在大运河开通以后，其战略地位就完全提升了。因为运河这一重要的运输线就在附近通过。几个世纪以来，周围乡村就已经是整个帝国中最为多产的区域之一，人口稠密。以前的都城，不断地在偏僻的、人口稀少的区域建立起来，这些区域由皇帝下诏规划，并重置居民。因此，当由兵士们选出一个新皇帝，并于960年成为宋代的缔造者之后，他重整唐帝国的旧山河，早已发展完善的开封城也成为了他的皇都。在这座过于拥挤、喧嚣的商业城里，朝廷无法根据事先预设的观念来确立其宫殿、皇城以及为皇帝庆典而设的宗教设施布局，更不用说根据旧的或新的现世法则来规划一座新城了。城市，已经由三面城墙围绕的区域所组成。中心坐落着宫城，然后是内城，覆盖着781年建造的城墙之内大约10平方公里的面积；而郊区，由956年建造的外墙所绕，总共包围了超过41平方公里之多的区域。968年，因为意识到皇城的城墙如此不规则，这很不合时宜，一个新的提案出炉，就是重新建造和加强外城墙。但是，在一个人口已经相当密集的区域，这项提案被证明是非常不切实际的，足以引起那些需要搬迁居民的愤怒。此外，第二个皇帝太宗（976—998年在位）拒绝了扩大其宫殿的规划，于是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城市迅速增长，非常快地使外墙被更多的聚落环绕，这些聚落沿着主要道路发展，使得任何重建项目的实施都更为困难，城市只得保留其不规则的形状。

宋代的前六位皇帝，保持了一个持续的政策，国家享受了一段和平时期。这体现在1004年第三位皇帝在泰山所举行的献祭仪式。泰山，作为最神圣的仪式所在地，是中国最为神圣的圣山。根据传统，只有天下太平，最具德行的皇帝才能够在泰山举行仪式。自那以后，帝都渐渐改变了外观，皇帝提供了为帝国神坛所需仪式的所有祭坛和庙宇。这些建筑物主要坐落在外城之南，并与主要南北轴线紧密相连。城内好多地方也建有佛教和道教寺庙。最野心勃勃的项目，似乎就是建造一条新御道，从宫殿的前面穿城而过直抵南墙。项目始于北宋末期的徽宗皇帝统治时期(1100—1126年)。这条新御道是通往宫殿的主要道路，300米宽。

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可以帮助我



图4.1.1 赵匡胤（公元927—976年），宋代的建立者和太祖（960—976年在位），在一个雪夜访问他值得信赖的大臣和朋友赵普（921—991年）。[1]摹自刘俊的绘画（15世纪），[2]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赵普是宋太祖的“掌秘书”和涉及所有内政事务的主要大臣。他的影响使得太祖改变了帝国内部的权力机构，将朝中诸将的兵权移交给由皇帝直接掌管的中央禁军。[3]
赵匡胤于927年在洛阳附近出生，他父亲在那里是晚唐时代明宗皇帝（926—933年在位）朝廷中的官吏。赵家的祖地在北京以南60公里，即现今赵县，936年落入契丹之手，当时晚唐已临近结束。23岁时，赵匡胤入宫作了在开封的后周（951—960年）建立者后周太祖的御林军长官。几年之后，他跃升至后周的殿前禁军统领，不仅作为一个胜利的领袖，而且作为一个慷慨的绅士脱颖而出，他从来不以粗暴或掠夺来对待战俘。后周第二个皇帝周世宗（954—959年在位）突然死亡后不久，后周军队的将士拥立赵匡胤为皇帝。赵匡胤接受黄袍，于960年创立宋朝。[4]16年后他在49岁的年纪死去时，帝国得到了统一，他的朝代持续了超过300年的时间，一直到1276年。这一时期被认为是中华帝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主要因为其城市文化和城市文明。赵匡胤以其热爱和平的性格和实际运作能力，为后来的继承者们塑造了一个受人高度尊敬的典范

1 译者注：即所谓的雪夜定策。
2 译者注：即《雪夜访普图》轴。
3 译者注：建隆二年（961年）的“杯酒释兵权”。
4 译者注：从“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典故看，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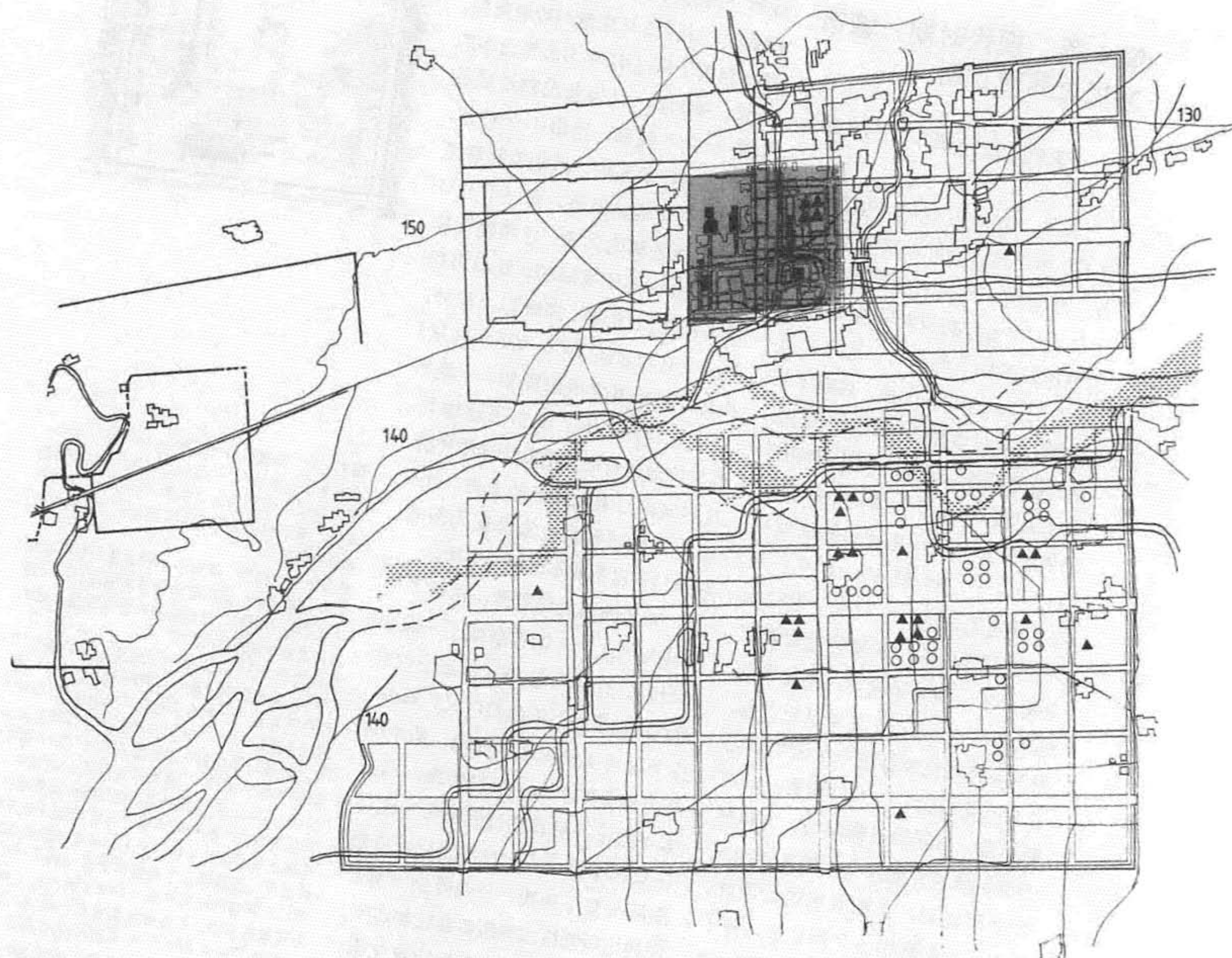


图4.1.2 10世纪和11世纪的洛阳城，比例1：40000。

937年，当后金朝代（936–947年）在汴京（今开封）建造其帝国都城时，洛阳失去了其帝国宫城的地位。然而，洛阳依然是一个知识和文化的中心，很多重要的学者在此出生，或在此生活和工作以度其生。例如，史学家司马光（1019–1086年），政论家和文学家欧阳修（1007–1072年），还有新儒家的主要诠释者二程兄弟（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年）。

这张地图中的黑色三角和圆圈圈，分别表现了五代和北宋官僚绅士们的府邸。当与图3.3.4.16进行比较。

当女真部落，金代的建立者（1115–1234年）于1125年控制了北中国之后，洛阳城被完全毁坏，大部分人口也遭到毁灭。之后，利用部分的宫殿墙体，一个小的行政中心很快被建立起来，与长安的复建过程一样。在那里，大约两个世纪以前，西安的行政中心也是采用老宫殿的墙体建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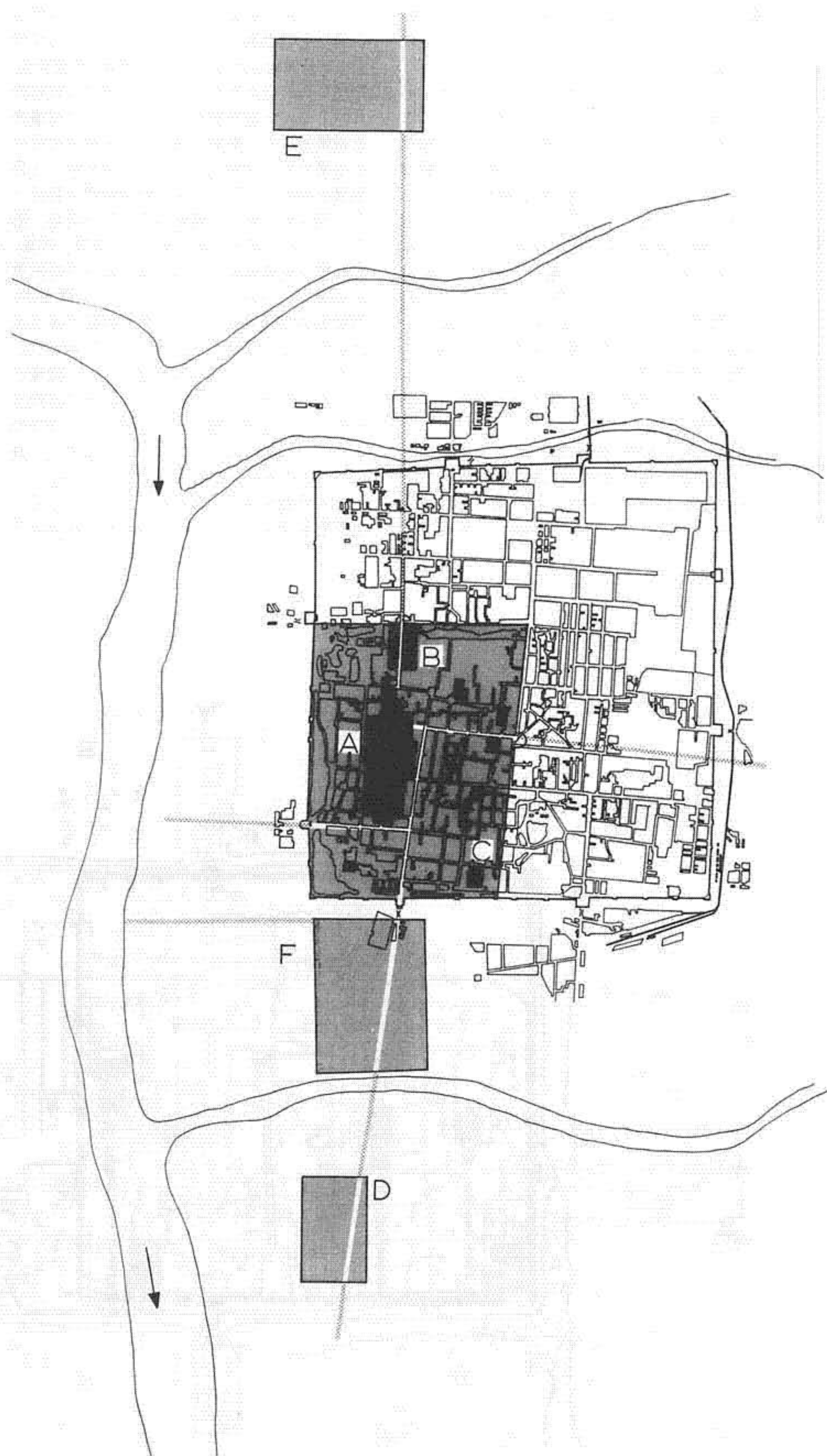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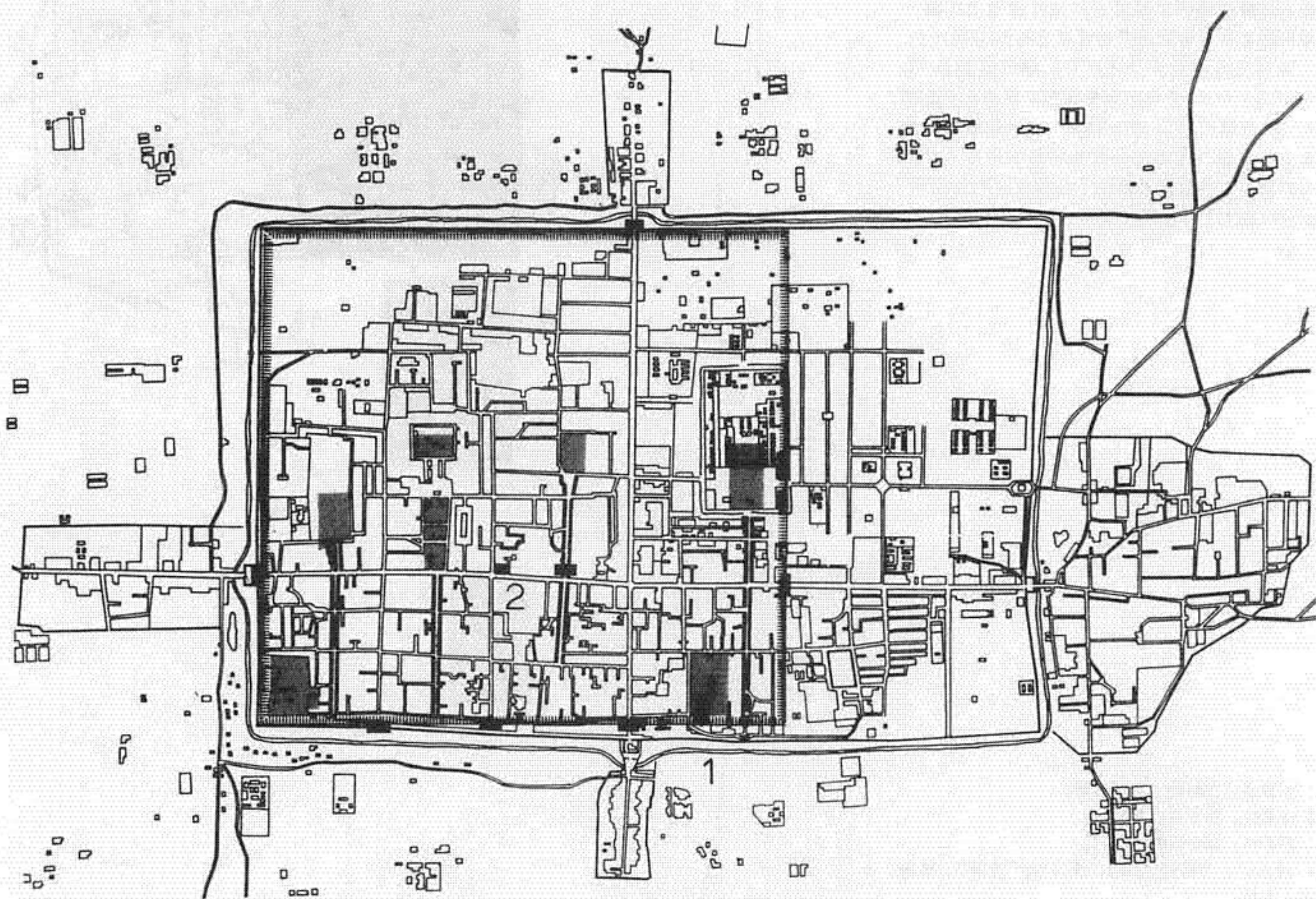
图 4.1.3 宋代的太原城，比例 1 ：40000。复原图被叠加在一幅现代时期（1930 年）的地图上。经过长时期的煎熬，当宋代的第二个皇帝太宗（976—997 年在位）终于在 979 年击败了北汉王朝时，他在北汉的都城晋阳放了一把大火。灰烬和废墟被汾河水完全冲走，从而摧毁了建立地方权力中心的基础。3 年之后，将军潘美[1]（参见 3.3.4.31），在废墟以东建造了一座新的城市，一个由围墙所环绕的 5 里 ×5 里的区域，称为平晋城，意为平定了晋阳。但是，在战火中幸存下来的居民以这个名字为一种侮辱，三代都拒绝在此定居，使得墙体倾塌。这些人宁愿落户到汾河以北和以东 13 公里处叫做明镇（A）[2]的小乡镇和三交村（B）[3]。一些市场街道被增加到这个老的聚落上，并且兴建了一条铁匠街。这不仅重建了经济功能，前晋阳城战略上的重要性也得到了复兴，也就需要坚固的防御。军事治理机构环绕着聚落，并且拥有带四座城门的结实厚墙。但这里无法建立一条笔直的大街，因为所有的街道都是以“T”形路口相连，这是某种奇怪发展的结果。然而，人们相信这是皇帝下令故意建造的。因为，汉字“T”发音类似于丁（即铁钉），以此，皇帝已经“钉下”叛敌，以防止任何地方分裂活动[4]。为了增加军事力量，又建了三座城堡，北城堡（E）、南郊城堡（F）和南兵营城堡（D），因此，主要的公路必须穿过这四个城堡，从而使街道上的每一步行动都在军事管理机构及其士兵的控制之下。人口当然也可以保持在严格的哨卡监控之下。1059 年，在 80 多年的军事管制之后建立了太原府，并在城市（C）的东南角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建立了府衙，因为没有其他可用的地方了。北宋朝廷重实用的氛围排除了任何强有力的措施，即仅仅是为了外观而向居民征收不必要的土地

1 译者注：当时的三交都部署。
2 译者注：即今日的西羊市。
3 译者注：即今日的古城村。
4 译者注：当地传说以丁（钉）破“龙脉”，从而无人造反。

图 4.1.4　宋代的西安城，比例 1 ∶ 40000，复原图叠加在 1930 年代一幅现代地图上，并结合唐长安的地图。

755 ～ 763 年的安禄山反叛，以及 878 ～ 884 年的黄巢起义之后，长安几乎处在不断的毁灭性战火和掠夺之中。845 年，佛寺仅剩 4 座，僧侣也只剩 120 人。895 年，宫廷卫士谋反，宫殿被焚烧。最后，于904 年，在宫室被迁移至洛阳以后，京城长安在后梁（907–923 年）的建立者命令之下，被有计划、有组织地毁坏，说是为了重建所有宫殿、公共建筑以及官府民房，木结构被扔进了渭河顺河漂走。在司马光（1019–1086 年）的笔下，以前的京城已经成了空前未有的废墟，唐朝的皇帝被迫离开长安移到洛阳，整个城市的人也随之往东迁移。那就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城市的终结——帝京长安的终结，此后没有皇帝再在此地居住。

898 年，唐代末期，在宫廷卫士反叛之后，一个名叫韩建的驻守长安的佑国军节度使被任命为"宫殿修复督察"，很明显，他在接下来的荣枯盛衰的岁月里生存了下来。904 年，当长安完全毁坏后，他立即重建了一个治理机构，虽然这仅是一个较低的"县座"级别。在以前的皇城和宫城的城墙之内，几座衙门被修复，而渐渐地，特别是在它成为京兆府的府邸以及万年和长安县两个地方长官的府邸之后，一座新的城墙围合的城市成形。新城形成了一个大概唐或后周的度量体系下的接近 5 里 ×5 里的方形，这仅是偶然的巧合，因为旧隋代的城墙原来是以一个小得多的 6 世纪的度量体系进行的布局，后来还甚至向东延伸，因此没有留下余地。但是，方形似乎是故意的，因为北墙没有使用任何遗留的废墟，而是跨过宫殿区域而重新建造的。旧的街道布局大部分还保留着，但是宽度渐渐地变窄。以前那些宽敞的空间用作商店和旅馆。在宫城（2）的两条主要街道的正中间，建造了一座塔，而新的衙门建筑占用了部分旧宫殿官府的地段。应该注意的是，这些衙门、庙宇和其他公共建筑物的基址一次又一次被使用，直到今天，仅仅有些建筑的功能发生了变化而已。一个特殊的例子，似乎是孔庙的建造，它是在前唐皇室宗庙（1）的基地上建造的。因为所有这些原因，城市似乎布局得非常规则，至今依然如此。但这是隋代的总体布局，不是 10 世纪的布局。对前宫殿区域，似乎没有发现更好的使用用途，所以它只变成新围墙区域的一部分，而没有成为一个军事训练场地。南墙上的三座城门被保留了，但是在每座城门的三个小门里，两座都被关闭。东城门和西城门也以这种压缩的方式使用着，仅仅是北城墙上惟一的一座北城门被重新建造。在 11 世纪，该城市作为对抗西夏入侵的堡垒



们以眼见为实，来证明那清晰的描述。然而，一个非常著名的、几近现实的文本描绘，表达在一幅大约5米长的卷轴画上。其有趣在于，它显示了沿着一些都城小街和运河的每日生活的细节，是由宋代著名画家张择端绘制的题为“清明上河图”的卷轴。这个时期所有的描述和文本都表现了宋代都城的都市生活，完全不同于汉唐皇都高度规范化的居住生活。这种明显的变化被称为“中世纪的经济革命”。这暗示了之前的时代已为发展设定了几个动态的进程，也加速了唐代的终结，并在宋代第一个世纪短时间内不断融合的动态过程中达到顶峰。这就是所谓的“北宋”。一些学者称这种动态的变化为“现代时期的开始”或“复兴”或“传统中的变化”。但是，也有人说：“称‘宋时期’为‘早期现代’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本身并没有产生什么比它之后的时期更为现代的东西。”还有人说：“宋代已经是中国中世纪的晚期。”

4.1.1 北宋时期的转变

简要概括一下此时期的一些变化，我们仅能集中于几点。水稻粮作的引进大大改变了每亩单产量，并允许在同样空间里生产更多的粮食。由此，向南进入长江三角洲的移民增加了，而这一地区的部分农村发展成为了粮食超产的区域。水分配体系与灌溉体系早已极大地改变了乡村，而且事实上创造出了典型的南中国景观。水运成为大宗运输的主要模式，同时，基于不同省份的不同商品生产的经济区分更为增强了。商业互动包围了全国，不仅包括了国内贸易，而且沿海贸易以及航海贸易，这些到宋代就已掌握在了中国人的手中。这种贸易又由于早在唐朝末年东南沿海就已经开始的货币和信贷的再度出现而得到促进，虽然在公元后的整个千年



图4.1.5 山西太原城西南晋祠大殿，圣母殿1023到1031年间建在晋河的源头，它是北宋几座幸存建筑物的代表之一。其宗教背景独特而复杂：与自然的古老神灵相关（因其下的河流），与祖先有关（因公元前11世纪唐叔虞的母亲，她在大殿中以绘像被表现），也与道教有关（唐叔虞在唐代618–907年被当作神灵的保护者）。这棵柏树，是传统庙宇建筑物中的典型，这种非常古老的树木，是显示崇敬的圣物（参见图3.3.4.31，No.2）

公元 955 年。在后周（公元 951–960 年）的周世宗（公元 954–959 年在位）统治时期，皇帝颁发了一条敕令，大意为：优良之佛教，吸取我圣哲之道，助我新朝，教化人民行善；人民受益于那无尚的容光恩泽。此诏令与一位历史学家的陈述颇为接近："在那同一年里，各个省份都接纳了规定注册的寺庙僧侣和神职人员。"从过去世纪里宗教迫害时期所留存下来的寺院数目为 2694 座，有 3336 座已经被毁，在册的僧侣和尼姑人数为 61200 人。

敕令继续如下："在所有省份、州府、区县、哨卡和村庄，拥有帝国特许状的寺院应该以其原来的状态予以保留，但那些没有特许状的，应该通通拆除。其内的作为宗教崇拜之用的佛像等物，应该与和尚、尼姑一起，迁入到那些幸存的寺庙中。"宋代的仁宗皇帝（1022–1063 年在位），在 1033 年下诏"停止兴建和翻新佛寺道观"，但是并未有废除的报告，因此，2694 座寺院就此留存下来。其中有一些依然作为建筑物而存留至今。很多情况下，特别是佛塔，因为其风水特质受到保护而免于拆除，因为大多数佛塔，与寺院形成一个整体，兴建在具有特殊风水特征之地，希望保护其城市和城镇之福祉。





图 4.1.6，7　河北正定龙兴寺主殿，佛香阁内有约 22 米高的观音铜像，中国几大奇迹之一（参见图 2.3.5.11，No.1）。
庙宇和铜像都是在开国皇帝宋太祖统治的开宝时期（962–976 年）建造的。那时，正定是河北最为重要的城市，其寺庙受到御令的保护而免于毁坏。太祖在他统治的第一年公元 960 年就下诏，令所有尚未毁坏的寺庙受到应该得到的保护，佛像也不应该再被融化用于制造钱币，但是也不必再造新的雕像。然而，很显然，这座特别观音铜像的铸造没有遭到任何反对，大概因为它是一个工程和工艺巧妙结合的产物，它肯定使用了以前从雕像所融化的青铜。它依然是有点神秘，如此规模的雕像是如何被铸造出来？不过，据记载，成千上万的工匠，将所有部件分为几个步骤装配而成。建筑物本身是宋代以来为数不多的幸存木结构之一。其设计，在大殿和塔之间的那座十字殿的独特性在于，在三层建筑主体上有五重屋檐，建筑的高度超过 30 米。
观音的很多手臂（千手观音），表明了他试图减少灾难的众多援手，这是一个深植于大乘佛教的概念

图 4.1.8　徽宗皇帝（1100–1125 年在位），摹自台北故宫博物院宫廷画家的绘像。

皇帝本人多才多艺，于是他开始重新塑造都城开封，使其成为一个更具感染力的宫室，并且是一座辉煌庄严的宫殿。城市的主轴线成为了仪式队伍而建的宽阔的大街，宫殿中的空场地又增加了一座以艮岳山景为主的园子。徽宗，堪称他那个时代最好的画家之一。作为一位书法家，他创造了自己别具一格优雅的书法风格，即著名的“瘦金”体。当金代的女真人在 1126 年占领了都城时，他和宫室全部落入敌人之手，并在监禁状态中度过余生。若干年后，他在北满洲里，即今天的哈尔滨死去，到他和他儿子时，北宋彻底结束。但是，赵氏家族继续统治着南宋帝国（1127–1276 年）

图 4.1.9　北宋的帝京开封，沿着汴河的市场街道，参见张择端的绘画（清明上河图 fl.1125）



零露



图 4.1.10 北宋末年的开封城，比例 1：40000[1]。

公元前 361 年，魏惠王（公元前 370–335 年在位）在旧的鸿沟（后来被称为汴河）附近成立大梁城。[2] 这是一个根据东周度量单位 7 里 ×7 里的方形，或一个 7 里 ×8 里的长方形（图中的点划线）。公元前 224 年之后，当秦始皇摧毁了诸国，大梁也随之衰落，几乎有一千年的时间，它都停留在一个小行政中心的地位。当汴河和其他几条运河一起，在 607 年重建而形成隋代的大运河系统时（A–A），城市也恢复了经济功能。781 年，旧城墙的废墟被修复，并与新城墙结合形成了某种不规则的 7 里 ×6 里的矩形，这是根据唐代的官制度量单位，即 443.7 米 =1 里（C–C–C）。956 年，这座墙体围绕的区域成为内城。后周的皇帝世宗（954–959 年在位），则围绕罗城修筑了一座外墙，即东京的外城（E–E）。关于五代的国家文件《五代会要》，编纂有周世宗下令兴建罗城的诏文："东京华夷辐辏（东京是来自全中国的人包括外国人的汇聚地），水陆会通（是陆路和水路交会处），时向隆平，日增繁盛（和平、繁荣、昌盛），而都城因旧，制度未恢（然而，城市局限于原来的规模，并随着增长的人口膨胀）。诸卫军营，或多窄狭，百司公署，无处兴建（现有的军营和官府实在是太过于拥挤，都找不到地方来建造新的建筑）。加以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城市街区中的酒楼和旅店太少）；工商外至，络绎无穷（无法满足络绎不绝、熙熙攘攘的外来商贾旅游者）。僦赁之资，增添不定（店铺太少，无法处理日渐增长的生意）；贫乏之户，供办实多（住房租金高得令人望而却步，普通居民发现这超出了他们的支付能力）。而又屋宇交连，街衢湫隘（住房拥塞，街道狭窄而曲蜒），入夏有暑湿之苦（到了夏天，居民遭受闷热和潮湿的空气），居常多烟火之忧（他们还永远担心街坊邻里随时随地都会发生火灾）。将便公私，须广都邑（无论是为了政府还是为了百姓的便利，都应扩建都城）。宜令所司于京城四面，别筑罗城（政府因此命令在原有的京城四周修建一座新罗城），先立表识（要提前制定好规划），候将来冬末春初（在接下来的冬末和春初），农务闲时，即量差近甸人夫，渐次修筑（当周围乡村的农人闲暇时，即被征发来建造这座新城）。"

宋代的第一个皇帝太祖（960–976 年在位），在此建立了他的都城，并称之为汴京。他将外城墙重新建造，并将其从 40 里拓宽到 48 里 233 步。963 年，宫殿参照洛阳的唐代宫殿的模式重建。一座 5 里长的墙，围绕着规模适中的皇室（G），南墙有门三座，其他几面墙，有超过三座的城门。太祖提出迁都到洛阳，最终甚至移到长安的想法。这是个长期以来的论点，基于周、汉和唐代的传统，就是说，渭河关内有着坚固的、利于都城防守的自然屏障。但是，他的胞弟，也就是后来接替他皇位的太宗皇帝（976–997 年在位），反对这个想法，并说道："安天下者，在德不在险矣！"[3] 太祖先是沉默，后来评论道，我兄弟说得不错。

1075 到 1078 年间，宋代第六位君主统治时期，神宗（1067–1085 年在位）又重新建造了汴京的外城墙，并在某种程度上将其拉直，如此，这些城墙终于成为 50 里 165 步，即 24.5 公里。这是基于宋代的度量尺度，即 486.0 米 =1 里。该墙大约维持了 50 年，是一座颇具感染力的结构。4 丈高，基座 5 丈 9 尺厚，即 10.8 米高和 15.8 米厚。外面是白色的粉刷，城门被漆成朱红，还设置更楼保卫屈曲的城门。这是一种新的防御概念——瓮城概念。城壕（护城河）被拓宽达 50 步，即 77.0 米，并种植了柳树。最后，徽宗皇帝（1100–1125 年在位）重新塑造了内城和外城，赋予整座都城一种更具感染力的外观。这是个给老百姓带来更为沉重负担的措施。太祖在世的话，肯定是极力反对的。一条新的帝国大街，从外城南门直达宫殿，一座美丽的拱形石桥跨过汴河。孟元老写道："坊巷御街，自宣德楼一直南去，约阔 200 余步（在那里，帝国街道是 200 步，即 324.0 米宽），两边乃御廊（每一边都是覆廊街道），旧许市人买卖于其间，自政和间官司禁止（在那里，商人们直到 1117 年都还被允许进行贸易），各安立黑漆杈子（栏杆漆成黑色），路心又安朱漆杈子两行（中间有双层的栅栏涂成红色），中心御道（将街道分隔，留出从北一直到南的中间通道为皇帝专用），不得人马行往，行人皆在廊下朱杈子之外（老百姓的交通被限制在红栅栏之外的廊道上）。杈子里有砖石甃砌御沟水两道（两条狭窄的运河沿着廊道两边），宣和间尽植莲荷（河里栽着莲花和荷花），近岸植桃李梨杏（沿岸栽种了桃、李、梨、杏花树），杂花相间（各种花相互交织），春夏之间（春季与夏季交接之时），望之如绣（人们就会看到像绣缎一样五彩缤纷的景致）。"[4]（《东京梦华录》，宋 · 孟元老）御街千步廊从内城的南门之外开始，一直通到在南宫正中门前的广场。这种建设导致大量公用和私用建筑物的重建。例如，各部府以及大街两侧宫殿南部的其他建筑（图中涂有阴影的区块）。在外城，太学（成立于 955 年），于 1102 年完全重新建造（H），并扩展到拥有大约可供 3000 名学生居住的房屋，所谓的"穷困学生区"。太学建筑群之内最为重要的建筑物是一座"有水环绕的大厅……外圆，内方。"显然是根据旧的明堂（图中的圆圈）相关的概念设计而成。建筑师是著名的李诫，他在 1103 年发表的《营造法式》是中国建筑历史上的第一部著作。在帝国街道西边正对着太学的地方，建造了军事学院以进行军事训练，以及一座武庙和一座国子监（J）。天坛（K）和地坛（L）已经在 950 年到 952 年设立，而现在新建筑物被建造来取代旧的，皇帝住在那里，举行国家大典和献祭仪式。宗庙（N）、社稷坛（O）坐落在帝国大街东部（N）和西部（O）的内城之中，遵循着旧的规矩，但是并不很准确。

几座佛寺（B）留下了踪迹，像 1048 年建于内城东北角之外（B）开宝寺的"铁塔"。还有 977 年建在城市南面另一端的天清寺的方塔，方塔依然存在，但是仅存留下原来九层塔的三层，66 米高。不幸的是，由大师喻皓所建的 96 米高的木塔已经不存在。主要的庙宇是至今尚存的相国寺，在内城南部汴河的正北。原建于 555 年，在唐代变得非常重要。在宋代，有定期的市场庙会（M），随着节庆和公众聚会在此进行，此习俗至今不衰。其他市场（M），坐落在城里其他好几个地方，那里也是酒楼、剧院、旅店、妓院和其他类似建筑物的（Q）集中地，总共有一等的酒楼 72 间和大约 300 家小型旅店。一座道观，坐落在外城西部（D）。主要的商业中心，似乎是沿着汴河的市场街，向东南方向延伸，穿越外城并超过这个区域进入市郊，这些地段的汴河上跨越有 13 座桥，正是张择端创作著名的卷轴画"清明上河图"（1120 年）的灵感源泉。这条市场街道也许在公元前 4 世纪魏惠太子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与其密切相关的是，开封府的政衙（R）也在这里扎根了好几个世纪。外城的四周都是郊区，南郊和西郊有两座对公众开放的公园（S），西城墙之外的汴河边有金明池（P），四周由一些宫殿般的建筑物环绕，一座岛屿由著名的"虹桥"所连。整个就像是一个为宫廷娱乐而用的湖边公园一般。但是，最为著名的园子是大殿东北的艮岳，这是一座以江南江苏太湖石人工堆筑而成的高达 135 米的山体园。

1021 年的人口普查统计记载，内城和外城有 96850 居户，住在 120 个里坊，但是，分配非常不平均。63850 居户，仅仅居住在宫殿东部的东面中部地区。这个东北角，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 70000 人，甚至，对于中国城市来说，也是非常高的密度。这些数字还没有包括郊区的 14 个里坊，或者是"专门"的群体，例如官吏、士兵、僧侣和学生。他们加上其家庭成员，占了总人口的大约 15%。整个数字，也许将近大约 750000 人，这个数字，在接下来的世纪里，增加到超过 100 万，这包括大约 150000 名士兵，他们大多居住在外城东北。

---

1 参见 Liu Yuanlin，1969 年的复原，文物，1979/9；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北京，1982。吴良镛，中国古代城市简史，Kassel，Germany，1986。

2 译者注：鸿沟是中国古代最早沟通黄河和淮河的人工运河。当年楚汉相争，最后以鸿沟划地为界，两分天下，如今，鸿沟引申为不同人在思想上有分歧。

3 译者注：不过他接下来说的是："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4 在那里，帝国街道是 200 步（324.0 米）宽，每一边都是覆廊街道，在那里，商人们直到 1117 年都还被允许进行贸易。栅栏漆成黑色，中间有双层的栅栏涂成红色，将街道分隔，留出从北一直到南的中间通道为皇帝专用，禁止百姓和马匹通过。（老百姓的）交通被限制在红栅栏之外的廊道上。两条狭窄的运河沿着廊道两边，河里栽着莲花和荷花，沿岸栽种了桃、李、梨、杏树。春天，人们就会看到像绣缎样五彩缤纷的景致。

如果开封外墙的重建度量是正确的（看来非常可能，因为其内墙的重建肯定是对的），它采用的应该是宋代早期的度量单位，即 27.00 厘米 =1 尺，也就是 486.0 米 =1 里。地图上看，外墙是 24.5 公里，刚好相当于 50 里 165 步，50×486=24300 米，165×1.35=222.7 米，24300+222.7=24522.7 米。

北宋更为通用的尺度是 30.8 厘米的尺，即 554.4 米为一里，这是宋徽宗时代（1100–1125 年在位）的官式度量单位——官尺。而户部采用的是那小一些的度量单位（即上面提到的 27.00 厘米为一尺，486.0 米 =1 里）。《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孟揆报告说 50 里 165 步。[1] 孟揆是户部侍郎，并且监督艮岳园的建造，所以他肯定熟悉 27.00 厘米为一尺的度量单位，也使用过这一度量单位。有人说，做那些事的人是他的兄弟，但是，这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区别。内城的规模报告为 20 里 155 步，从地图上判断，应该相当于大约 10.8 公里。问题是 20×486=9720 米，155×1.35=209.2，9720+209.2=9929.2，太小；而 20×554.44=11088 米，155×1.54=238.7 米，11088+238.7=11326.7 米，太大。为了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们发现 531.9×20=10638，155×1.47=227.8，10638+227.8=10865.8 米，刚好相当准确。然而，这一计算是基于唐代的 29.55 厘米为一尺，即 531.9 米为 1 里的度量单位，我们可以得出结论：20 里 155 步的说法继承了唐代的度量单位，内城的城墙在 781 年已经建造，说明孟揆采用了传统的数据，而未检查它与自己宋代户部的尺度量体系的不同处。[2]

1 译者注：这里原文作者似乎认同孟揆即孟元老的说法。

2 译者注：孟揆应该不会如此粗心地对不同的度量单位不加区分，或许可以由此推测《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并不熟悉这些不同的尺度，就是说他并非孟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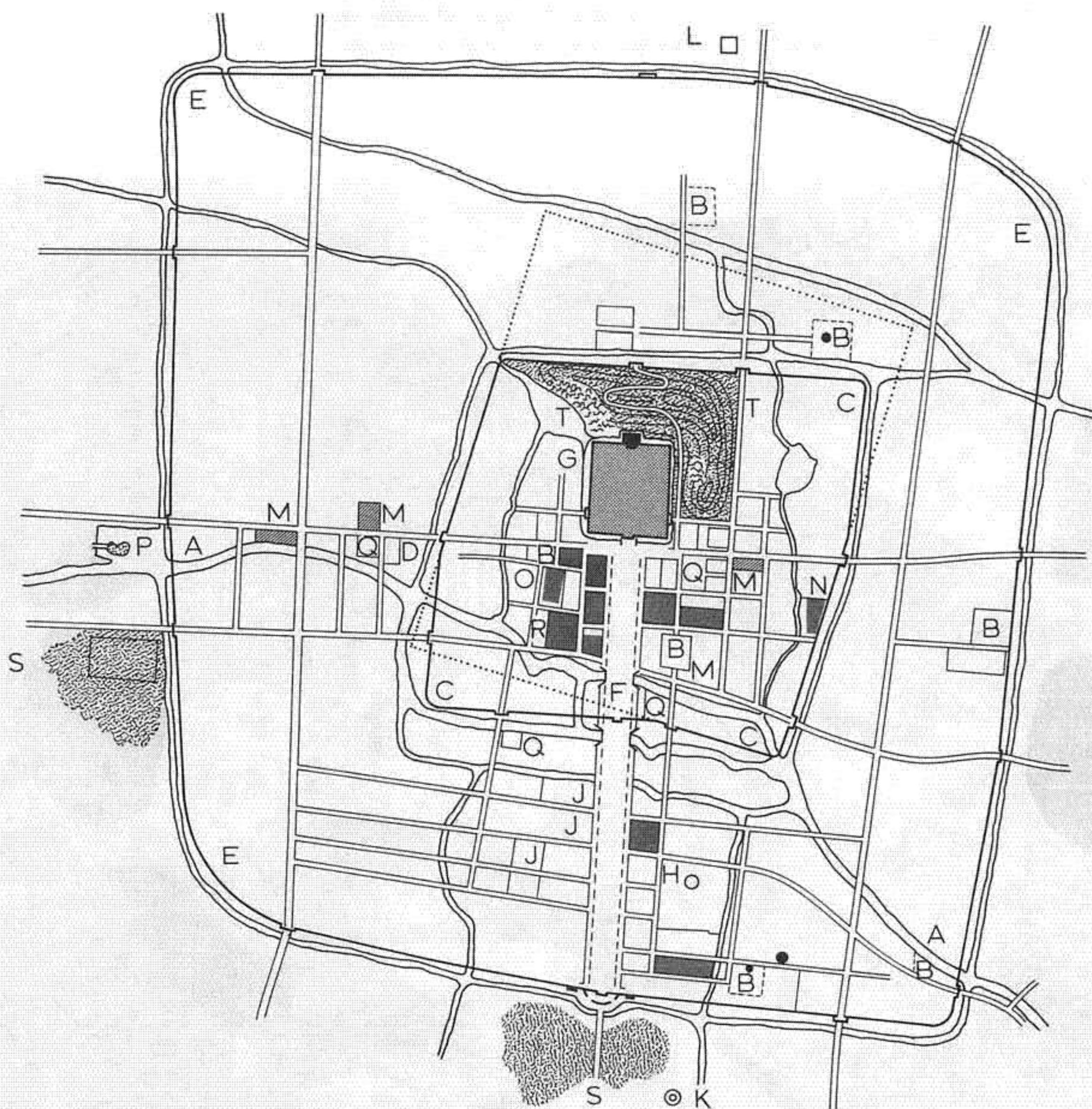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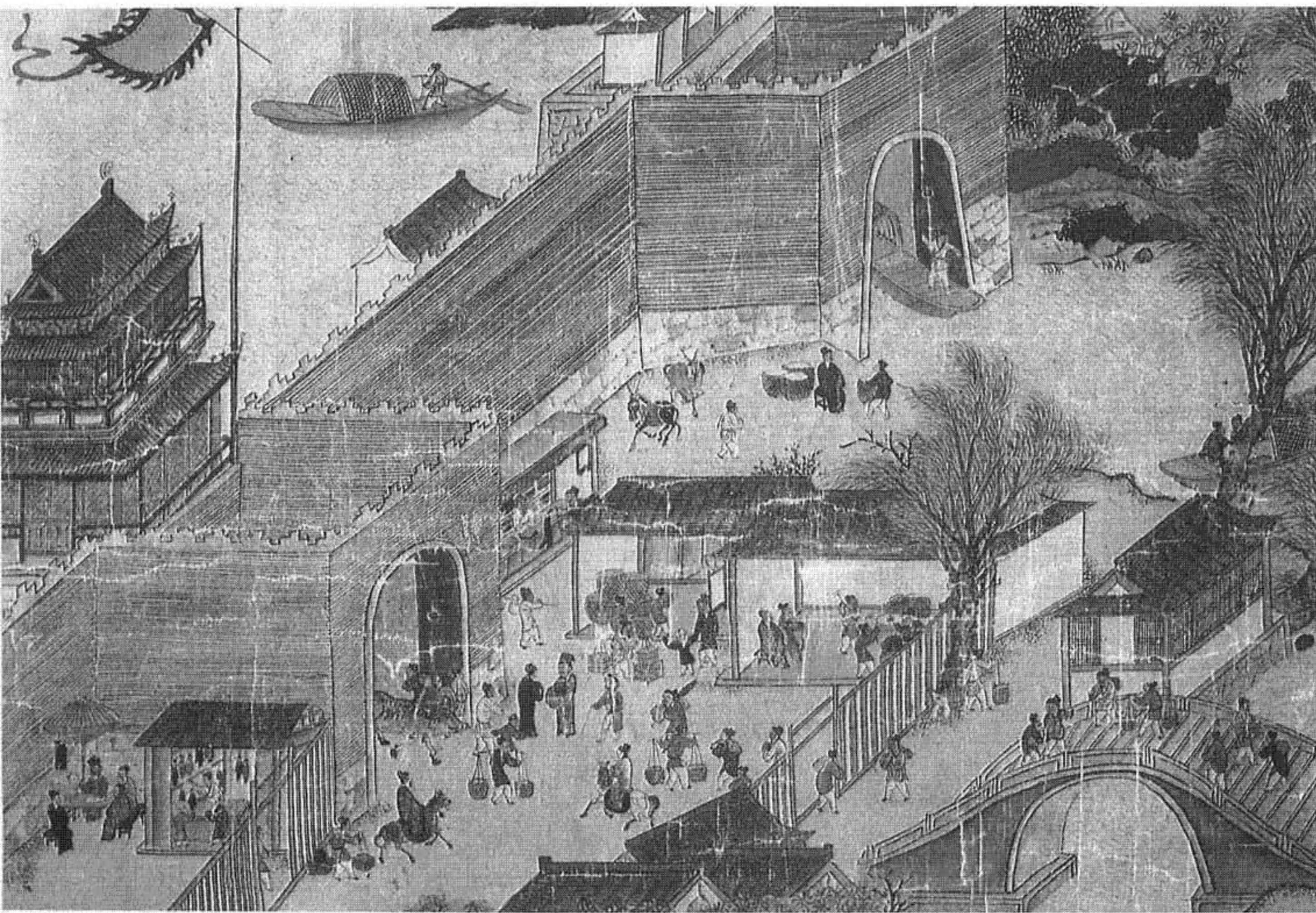
图 4.1.11—16 "有城市和城郊，有山峦和山丘，有沼泽湿地流淌着平静的河水、有溪流和瀑布，有树木和花园，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多得无以记数。至于人物，有官吏、墨客、农民、商贾、劳工、算卦的，和尚、道人、小官吏，渔夫在划船、拉纤，有丈夫和妻子，一些人在走路，其他人坐着，一些人在提问，其他人在回答。一些人在施舍，其他人在接受，一些人在呼唤，一些人在回应，一些人在马背上，一些人肩挑重担，一些人是向导，一些人是木匠，一些人端着杯子提着壶，一些人在风凉，其他人睡觉，其他人在打哈欠，一些人坐在轿子里，透过帘子向外偷看，一些人在拉橇，一些人在尽力逆流航行，船沿着河岸在桥下驶过，也有围观者。一些人呼着号子支持船夫，纤夫逆流而上，更多见的是动物，猴子、骡子、马、牛和骆驼。动物们在劳作着，睡觉、休息、饮水或吃草。当然，还有建筑物，官府、市场、商店、村庄、庙宇；你可以看到窗户、门、篱笆、花园，而在商店里有酒、食物、香、药，以及各种各样的东西在出售，……当仇英看到古旧的原画（由张择端绘制），他仿制了一份，他完美地仿制了。这件仿制品，真的是非常罕见，并且，它可以与原作相比较。我们必须珍惜它"。

文征明（1470—1559 年）于嘉靖十三年，即 1534 年，为仇英临仿的"清明上河图"作跋文。这幅卷轴画由题跋作者文征明收藏，仇英画的时候还是一位年轻的从师画家周臣的古画临仿者。这里的图片，依据张择端（fl.1125）的原作，一幅 25.5 厘米 × 525 厘米的卷轴画，表现了都城汴京，即现今开封东南角汴河的一部分。这幅长卷真品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孟元老在经过了 30 多年的观察之后，于 1147 年写就的《东京梦华录》这样写道："东华门外，市井最盛（东华门外的市场最是繁荣昌盛），盖禁中买卖在此（因为这是皇族宫殿娱乐之地）。凡饮食、时新花果、鱼虾鳖蟹、鹑兔脯腊（摊位上满是食品、饮品、鲜花、水果、鱼、对虾、龟、



螃蟹、鹌鹑、兔子以及熏肉)、金玉珍玩、衣着(店铺里充满了金器和玉制的艺术品、古董和衣物服饰)、无非天下之奇(简言之，这里有世界上所有的珍奇物品)。……其岁时果瓜、蔬茹新上市，并茄瓠之类新出(当水果、蔬菜和茄类应季上市时)，每对可直三五十千，诸合分争以贵价取之(不管什么价格，马上就被抢购)。……马行北去旧封丘门外，袄庙斜街州北瓦子(从马行街向北走，你会到达旧封丘门)，新封丘门大街两边民户铺席外(新封丘门内的街道两侧排列着商铺，一直延伸到十里外)，余诸班直军营相对，至门约十里余，其余坊巷院落，纵横万数，莫知纪极。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在棋盘般街巷里，有成千上万的商铺、大小酒楼、菜馆以及到处散布着的糖果点心店)。……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相国寺每月将庙门开放五次，以允许店主顾客的市场交易)。大三门上皆是飞禽猫犬之类，珍禽奇兽，无所不有(进入前门，可以听到笼中的珍稀鸟类叽叽喳喳的合唱，篮子中的猫，系着皮带的狗以及其他用链条栓在一起的珍奇动物都在出售)。第二、三门皆动用什物，庭中设彩幙露屋义铺，卖蒲合、簟席、屏帏、洗漱、鞍辔、弓剑，时果、腊脯之类(在第二和第三进门内的四合庭院里，有帐篷、棚屋以及带篷的商铺，那里出售着蒲合、簟席、屏帏、洗漱、鞍辔、弓剑、时果、腊脯之类的物品)。近佛殿(在邻近佛堂的广场)，孟家道院王道人蜜煎(孟家道院的王道人在兜售他特别配制的蜜饯)，赵文秀笔(赵文秀的摊上展示着他自己的书法所用的毛笔)，及潘各墨(潘各在那里出售他特制的墨块)，占定两廊(沿着两边的走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生色销金花样幞头帽子，特髻冠子，绦线之类(女尼站在摊位后面，出售刺绣，领抹，花朵，珠翠头饰，生色销金花样，幞头，帽子，特髻冠子，绦线之类的物品)。殿后资圣门前(佛殿后面的资圣门前面)，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文人们徜徉于书籍、书画和珍奇古玩之中，退休的或退隐的官吏、胆小地请求围观者购买他们从家乡带出来的中草药和土特产)。后廊皆日者货术传神之类(佛寺后院的走廊内，那些个相信迷信的老乡们寻求避邪的小装饰品、符咒和护符，或者请人算命)。街西保康门瓦子(沿着汴河河岸的街道，保康门的西面是娱乐地段)，东去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员商贾兵级，皆于此安泊(沿着城墙的都是些不同规模和级别的客店，这是官吏、商贾以及来自南方的军吏们的下榻处)，街南桑家瓦子(街道的南端是桑家说戏娱乐场)，近北则中瓦，次里瓦(近北端是娱乐说戏中心)，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那里有50多座大大小小的戏楼)，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像棚最大，可容数千人(其中大的有莲花楼、孔雀台和大像园等，后者最大，



能容几千人)。"

"出朱雀门，……当街水饭、熬肉、干脯、王楼前獾儿、野狐、肉脯、鸡(朱雀门内及其周围的夜市挤满了马和马车，以致于人们无法穿越甚至找个地方歇一下。街道上挤满了小摊位和商铺叫卖饭粥和炖煮的佳肴，在腌肉王楼下的广场上有带座位的小摊位，可以坐下来吃一顿獾肉、狐狸肉或鸡肉)。梅家鹿家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如果你还不满足，可以走到梅家或鹿家店铺品尝鲜美的鹅、鸭、鸡、兔、猪肚猪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以及鸡碎)，每个不过十五文(味美价廉，每份仅十五文)。至朱雀门，旋煎羊，白肠、鲊脯、(火赞)冻鱼头。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朱雀门附近，你面前有煎羊、腌鱼、(火赞)冻鱼头……龙津桥那里，有好吃的猪头和羊脑在等着被品尝)。直至三更(生意一直热闹到三更)，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酒楼内光辉闪烁，更为闪耀的是那些穿着鲜艳、涂脂抹粉的妓女)，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一些妓女在酒楼里和那些欢宴作乐的人一起饮酒，一些妓女则在外面闲逛，她们看上去就像仙女一般)。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子姜豉、抹脏、红丝水晶脍、煎肝脏、蛤蜊、螃蟹、胡桃、泽州饧、奇豆、鹅梨、石榴、查子、榅桲、糍糕、团子、盐豉汤之类(无论天气如何，夜市从不令你失望，即便是下着大雨或大雪，总有姜豉、炒内脏、煎肝脏、螃蟹、胡桃、鹅梨、奇豆、石榴、查子、榅桲、糍糕、团子和盐豉汤之类的小吃)。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盖都人公私荣干，夜深方归也(到了三更，买茶的上来伺候那些因政府公务或因私人生意而耽误到半夜才能归家的人)。"[1]

早市的情景也生动地描述在《东京梦华录》里：

"每日交五更，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无循门报晓(和尚沿街行走报晓)。亦各分地分，日间求化。诸趍朝入市之人，闻此而起(一些和尚敲打着铁盘，一些和尚则敲击着木鱼，唤醒那些要去早市做买卖的人，也唤醒那些要上朝或去府衙的官僚)。诸门桥市井已开(市场的生意也就开始了)，如瓠羹店门首坐一小儿，叫饶骨头(一个卖南瓜汤的商铺前面，坐着一个男孩，对着路人叫买猪排)。间有灌肺及炒肺(商铺里，有水煮和油煎肺卖)。酒店多点灯烛沽卖，每分不过二十文，并粥饭点心(酒楼里，明烛高照，每杯酒 20 文，配有稀粥和油酥馅饼点心)。亦间或有卖洗面水(偶尔，你会碰到挑担者叫卖一盆盆热水让你洗脸)，煎点汤茶药者(有些人在卖汤或卖茶，一个男人在酿造中草药汤出售)。道至天明(所有这一切一直持续到破晓)。其杀猪羊作坊，每人檐猪羊及车子上市，动即百数(成百上千的屠夫涌进市场，一个接一个，挑着宰好的猪羊)。更有御街州桥至南内前趁朝卖药及饮食者，吟叫百端(从御街的州桥一直到宫殿前面，卖食品饮料的，甚至卖药的小贩以上百种吟唱般的声音呼唤着主顾)。"[2]

1 译者注：参见《东京梦华录》，宋·孟元老。
2 同上。



王安石（公元 1021–1086 年）的诗，引自华兹生（Burton Watson）英译：

夜云不见天，况乃星与月。
萧萧暗尘走，坎坎寒更发。
楼歌客尚饮，酩酊不畏雪。
巷哭复有人，邻风送幽咽。
纷然各所遇，悲喜孰优劣。
君方感庄周，浩荡摆羁绁。
归来亦置酒，玉指调弦拨。
独我坐无为，青灯对明灭。

大梁春雪满城泥，一马常瞻落日归。
身世自知还自笑，悠悠三十九年非。

大梁是汴京旧名，"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海一片"。诗人秦观（公元 1049–1100 年），在其《淮海集》里描述："开封地平四出，诸道辐辏，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无名山大川之限，而汴、蔡诸水参贯，巾车错毂，蹄踵交道，舳舻衔尾，千里不绝，四通五达之郊也。……本朝惩五季之弊，举天下之兵宿于京师，名挂于籍者号百余万，而衣食之给，一毫已上，皆仰县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于农也。非都四通五达之都，则不足以养天下之兵，此谓以兵为险者也。夫以兵为险者，不可以都周雍，犹以地为险者不可都梁也。"[1]

徽宗皇帝在汴京最为奢侈的建造是人工山园，周长 10 里，位于宫殿的东北，即所谓的"艮岳"。正如"艮"这个字所含的意思，它位于东北方向，在风水上非常重要，因为"艮"代表这地方在八卦图中的卦位（参见图 4.3.2.46）。这皇帝是真的相信风水？还是仅仅需要一个可以说得过去的解释？还是以一个借口满足他建造一座豪华山体园的欲望？我们不得而知。直到他那个时代，在都城附近，没有皇家猎场，他肯定希望弥补这种不足。风水传说中，知道这个皇帝在 27 岁登基时没有儿子，有个风水专家解释道，这都怪都城四周平坦的乡村，会给皇家带来不良影响。

1 译者注：《淮海集》卷十三，"安都"条，秦观。



为了抵御这来自东北方的不良影响，50 多年前建造的"铁塔"显然功效不够。惟有山，可以提供必要的保护。因此，宫殿以东密集的聚居区被清除了，人们不得不移到别处，石块被堆积起来，直到它们在一些地方高达大约 135 米。两座最高峰一起被称为寿山。石块的采集地，最近的大约 200 公里远，而那些特殊形状的，最为珍贵的石头必须从 700 公里以外的江苏和浙江运来，这些所谓的太湖石，从湖底采集而来，是鉴赏家喜好的收藏，其中很多都是由专门指定的监督人朱勉从苏州那些石头爱好者的花园中搜集而来，在苏州，这些经水冲刷雕琢的石头拥有最为狂热的爱好者。朱勉的方法非常粗暴，购买和运输这些石块耗资巨大，运载大石块的驳船堵塞了大运河和许多其他的水路，破坏了为都城输送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须品的基本运输。结果，浙江和安徽一带于 1120 ~ 1122 年发生了严重的起义，最终导致北宋于 1127 年彻底覆灭。起义由摩尼教的领头人方腊组织。这些人，都是中国东南部的商人、贸易者及摩尼教的追随者。京城一带的混乱局面，麻痹了任何抵抗金人侵略的部署。1127 年，这些金人将皇室掠为俘虏



僧人所记载的大意为：

1126年的（农历）二月，都城（汴京）受到（金人）劫掠。所有居民都随着我这个僧人逃至艮岳山顶寻求避难。此时，普降暴雪。所有山脉、河谷以及树木看上去都如此明媚，好像这些是现世中最美丽的风景画卷之一部分。我环绕美景行走数日，那无与伦比之美令人惊叹。次年春季，我又回访此地，但这里已经被那些金人毁坏了。他们憎恨那些（前朝）大臣们的名字、文献记载，以及诗词，他们毁掉了匾额将其扔进了城壕。至于那些优美的树木和竹子，各式各样的建筑物，人们将其砍下当柴焚烧。惟一所留便是山体，那赤裸的艮岳。[1]

新城（外城）绝大多数是废墟。一些地方甚至已经犁成了田地。在旧城中（内城），市场刚开张。环顾四周，我倒也能不时地见到那些高耸的结构，都是昔日宫殿、亭台和庙宇的遗迹，都处在一片废墟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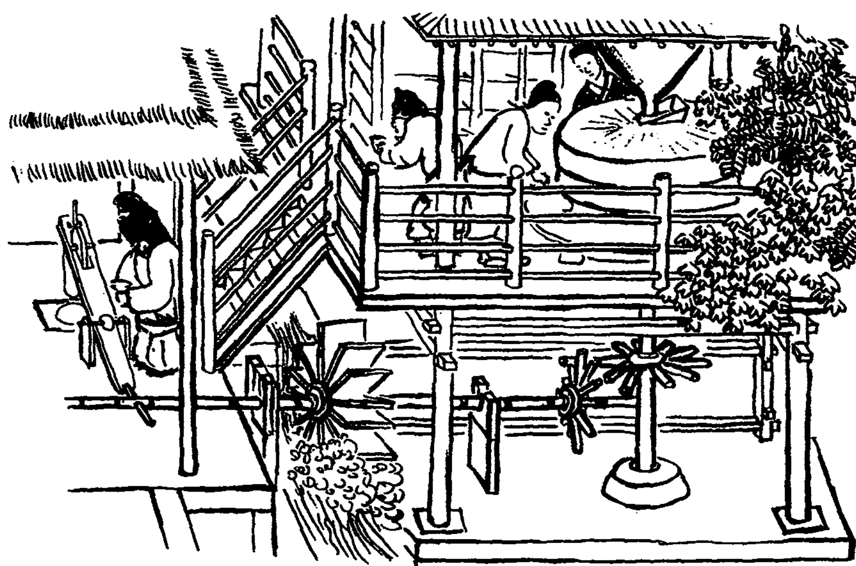
1 From "Record of Hua Yang Palace" by the monk Zu Xiu, in: M.Keswick, *The Chinese Garden*, London, 19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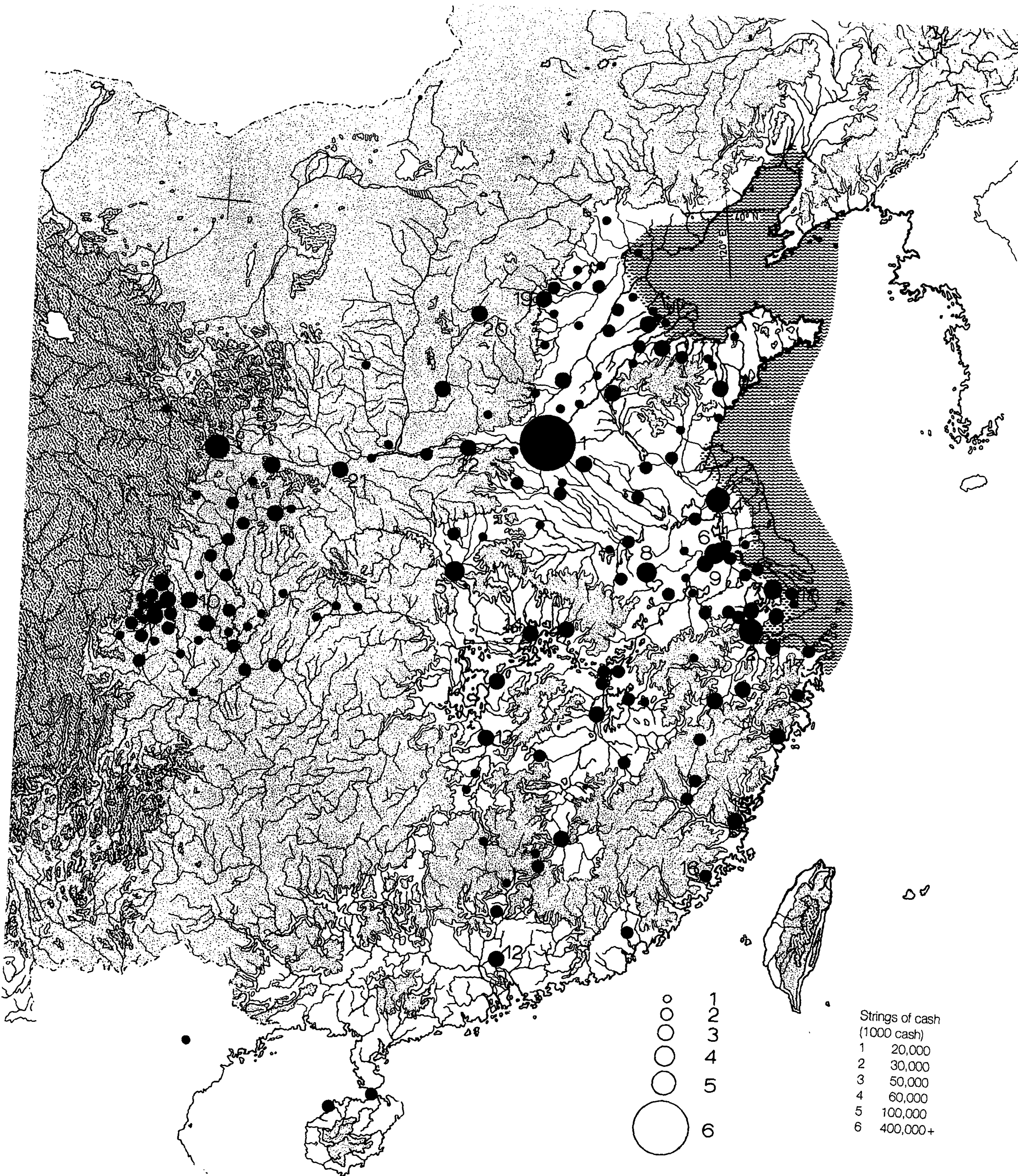


地图上的数字	府	省	府辖区	城市	城市百分比
1	开封	河南	153393	404379	262.3%
2	杭州	浙江	170313	82173	48.1%
3	天水	甘肃	90685	79959	88.2%
4	淮安	江苏	113973	67881	59.5%
5	襄樊	湖北	73614	55467	69.6%
6	仪征	江苏	62880	53536	85.1%
7	苏州	江苏	77072	51034	66.2%
8	合肥	安徽	62072	50315	81.0%
9	南京	江苏	57238	45059	78.7%
10	成都	四川	114420	45005	39.3%
11	扬州	江苏	96186	41849	43.5%
12	广州	广东			
13	长沙	湖南			
14	汉口	湖北			
15	福州	福建			
16	泉州	福建			
17	宁波	浙江			
18	上海	江苏			
19	正定	河北			
20	太原	山西			
21	西安	陕西			
22	洛阳	河南			

图 4.1.1.1 一座 12 世纪的水动碾米磨和碾米槌。山西繁峙县，岩山寺的金代壁画，参见文物，1979/2。
虽然是一个旧的发明，水动碾米磨在宋代的中国被广泛地用于多种用途，例如转动纺纱轮、移动提炼作坊的风箱，以及转动磨盘石头。北宋时期技术和机械的发明和提高，使得所有这些机器更为有效

图 4.1.1.2 宋代的中国。这张地图，显示了 1077 年帝国政府在城市和城镇征收的商业税收，以及主要的水陆交通路线，比例 1 ：10000000。都城开封的绝对优势地位，可以由下面的事实解释：它是王朝皇室的居所，贵族和高官的居所，富商和地主的居所。这些人拥有无限制的购买实力，负担得起精致的品位，他们总是要求拥有一切之中最好的。除了每月法定的大米津贴，官僚们每个季节都收到一些像绸缎、纺绸、绣花绸以及一些大件物件之类的礼品。他们每月薪水很高，对应四十一个不同的官阶和级别，从三千到四千吊不等。如此的购买力，都城的消费量高得令人难以置信。当然会有与之等量齐观的税收了。
这种绝对的优势和地位，也是整个帝国的权利集中于都城的结果，这是汉代和唐代的典型做法，宋代依然如此。但是现在似乎在东南（现今的江苏省），以及西边肥沃的四川成都平原，出现了其他的高消耗区域。右上方的名单，给出了一些城市及其周围区域实际的税收数目，以"吊"为单位（1 吊等于 1000 文）（采用的是今天依然使用的地名）




1
2
3
4
5
6
Strings of cash
(1000 cash)
1 20,000
2 30,000
3 50,000
4 60,000
5 100,000
6 4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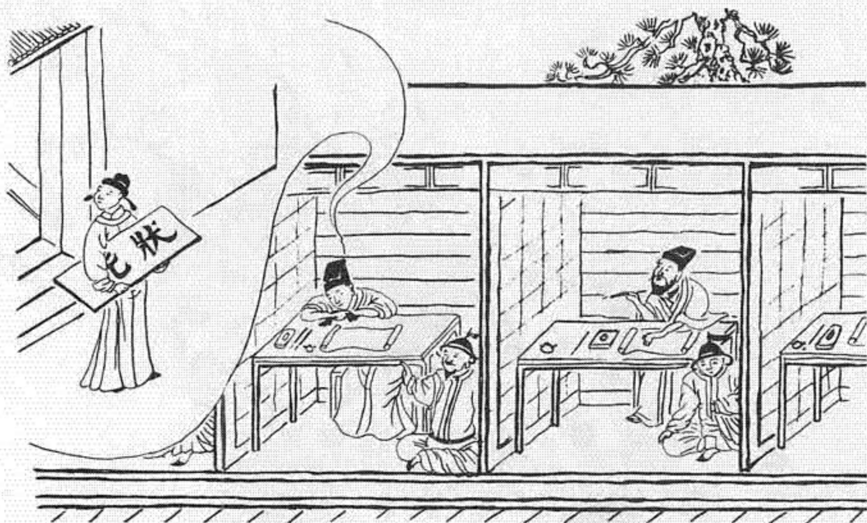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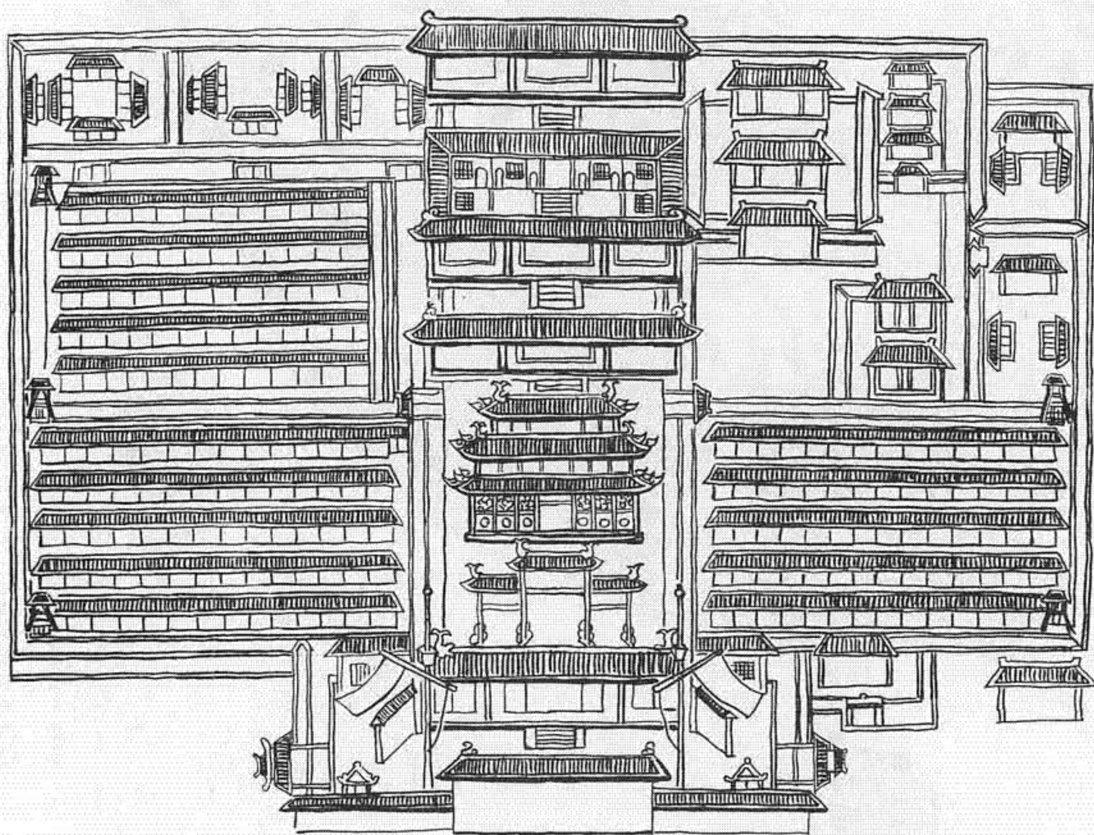


图 4.1.1.3 学生们坐在贡院大试殿中的考间里，引自明代木刻。

这样的大殿，位于府级以上所有主要城市之中。右边那个显然已经很老的考生，正在为其诗文遣词造句，左边的年轻考生，也许幻想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梦想着金榜题名，他手里拿着一块写有自己新身份的木匾，他所梦想的身份就是状元，文人最高的奖赏，只有在都城的殿试中才被授予，这是科举制的最后一步，出现一个如此的名人，会让一个地区欢欣鼓舞，也是该地区持久的荣耀，在珍贵木材上，用金字写就的木匾，将悬挂在这名人家正中大厅的门上。注意学生脚下两个看守人的神态

图 4.1.1.4 湖南长沙府为省级科举而设的贡院，这是科举制的第一步，引自长沙县 1817 年的县志。

中心是仪式大殿，后面的房屋为考官们所设。上层墙体之下的房屋，用于控制管理，左侧用于行政管理，右侧则为贡院院长室和监督长所居。一排排的考试房间在仪式大殿的两侧，由建筑群角落的望楼守卫，在考试期间对外封闭。当长沙在 1664 年变为一个省级都城，即当时的湖广被分成为湖北和湖南时，这组殿堂在此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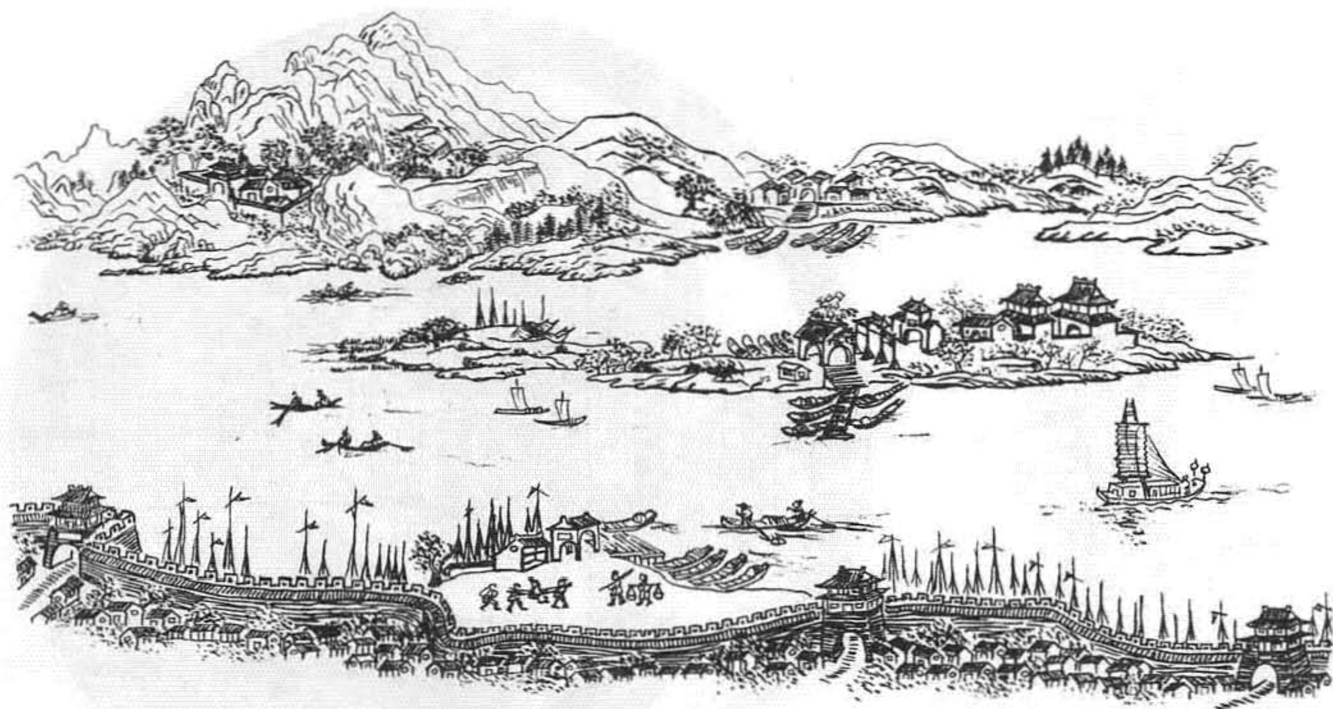


图 4.1.1.5 在湘江边的岳麓山上遥望岳麓书院，引自《中国建设》，1973/7。
书院创立于976年，是宋代集各种哲学流派之大成的新儒家的中心。杰出的新儒家朱熹(1130–1200年)是这里受人敬重的师长。明代以后，书院退化为一座民粹和僵化的传统主义中心，现代时期，它被改造为湖南省的大学。前面是长沙城的城墙，有三座城门通往河边的陆地沙滩、水中的小岛，赋予城市的名称，长沙，意为长长的沙滩。源于其中的果园，岛本身被称为橘子洲，正如所期待的，岛上的庙宇被称为"水神"庙

图 4.1.1.6、7 新桥被建时，老城的结构至今依然留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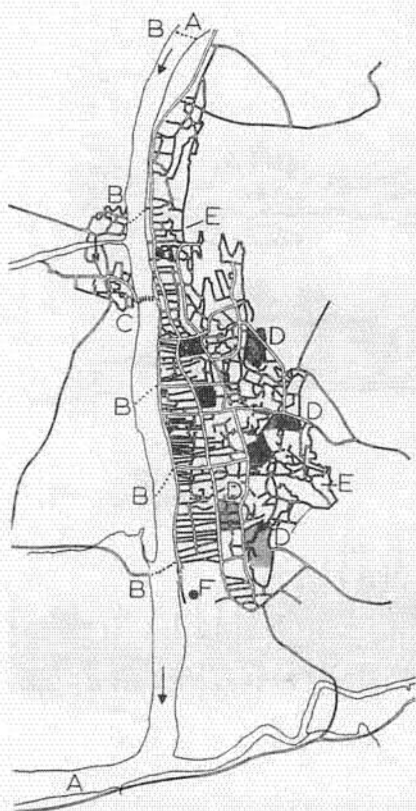






图 4.1.1.8 江西景德镇，自从汉代以来就是最重要的瓷器生产中心，也是一座出产专用产品的早期工业聚落实例，比例 1 ： 40000。

从最早时期以来，景德镇就因其周边地区丰厚的泥土和高岭土而著称，这些土是制陶和制瓷的原材料。宋代，这里设计了相当一批产品专门用于皇室，特别是在真宗皇帝（997–1022 年）统治时的景德时期（1004–1007 年），正是这景德时期，最终为此镇命名。聚落模式渐渐地发展成为沿着河边的市场街，小弄堂将其与陆地连接起来，原材料、木柴以及产品都从那里船运而来，专门的店铺连接成一串生产链条，包括制模，绘画，最后在专门的砖窑里淬火，劳力的分工围绕着专门的产品，整个聚落是一座有着成千上万劳力和居民的巨大工厂。

A– 长江；B– 驳岸，码头；C– 船桥；D– 工厂；E– 庙宇；F– 军用站

图 4.1.1.9 一个古老的台湾的瓷器生产中心，让人看到景德镇那样传统工业城的面目，印象深刻

图 4.1.1.10 景德镇的明代青瓷盘，展现了一座工厂的房屋，中心有一座装饰性的小亭子，南昌博物馆收藏

图 4.1.1.11　湖北汉口镇的市场，今日武汉的一部分，比例 1 ：40000（地图 4.1.1.2 上的 14 号）引自 1932 或 1933 年绘制的地图。

从 10 世纪起，汉口（C）作为汉水和长江交汇处的贸易中心发展起来，它正对着省府武昌（A），在管理性的城市汉阳（B）以北。武昌是省衙的首府所在地和多功能城市，本身是一个巨大的贸易中心。宋代经济的发展，保证了汉水北岸的汉口作为一个更大的贸易中心而持续增长，这是通向北方重要的贸易路线之一。在长江的急流之外，一排码头作为船运中心发展起来，各种物品从汉水上的货船转运到长江上的货船。范成大（1170 年）的旅行日志，描述当时称作鄂州的武昌是四川、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以及淮南和两浙的贸易中心。所到货物一售即空，无论多少，一天之内就能售完。这种描述也适合汉口。

汉口的名字，似乎在 4 世纪和 5 世纪的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源自汉水之口的意思。最初，汉水在这里有好几条支流，形成一种三角洲，但它们渐渐地堆积起来，汉口的沙滩便演变为一条沿着河岸的市场街道。明代初年，宪宗（1464—1487 年）的统治时期，汉口成了汉阳管辖之下的一座镇。

武昌作为一个管理中心的重要性，通过众多的办公建筑和公共机构显示出来（图中黑色区域），而在当时，这些东西汉口一个也没有。宋代，武昌是湖广的中心，不但包括了湖北和湖南，还包括了今天的广东和广西。城外向东，大片的墓地（图中以十字表示）是古老中国城市的典型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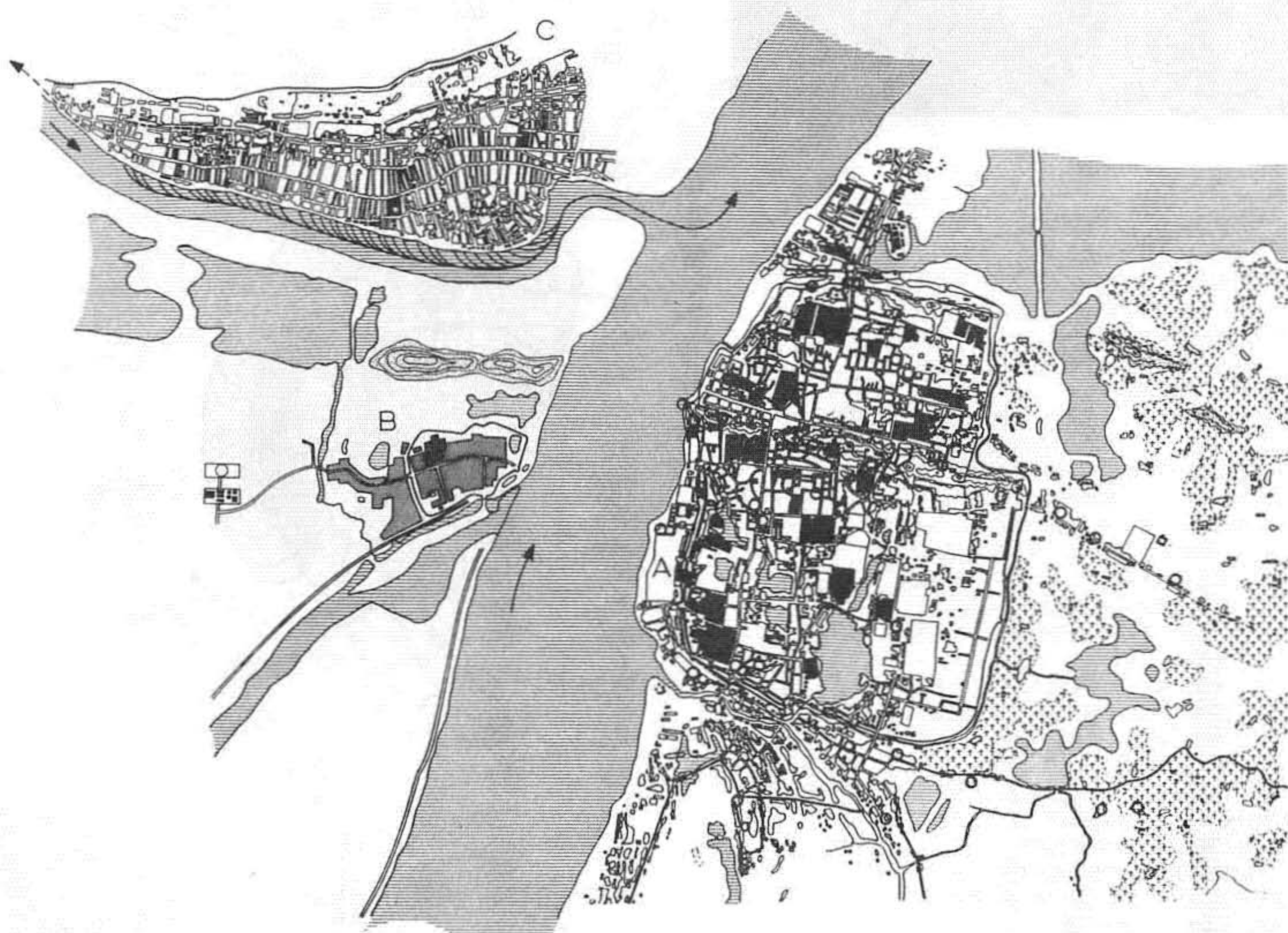




图 4.1.1.12 中国南方，一种典型的市街模式城市，几条街道与河滩平行发展，如今，它们被一座防洪墙隔开，因为水运已经被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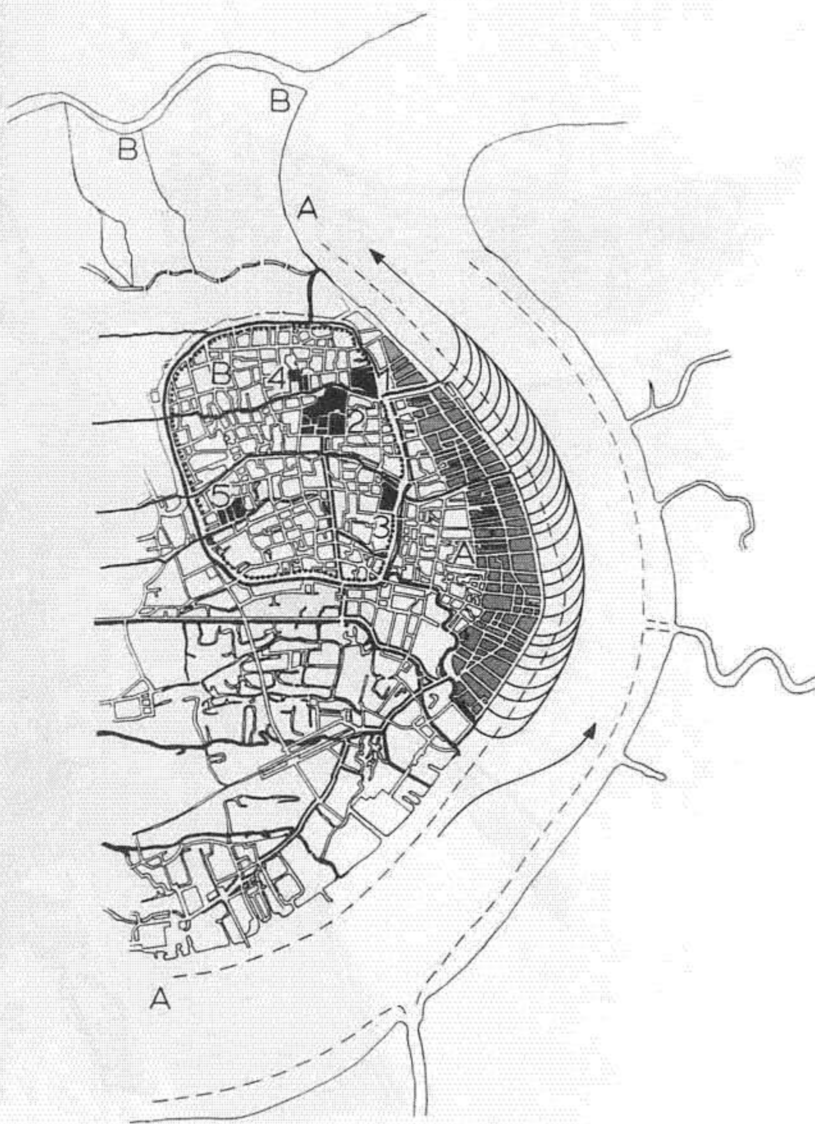


图 4.1.1.13 宋代江苏上海的口岸和市场，比例 1 ∶ 40000（地图 4.1.1.2 上的 18 号）引自 1915 年所绘制的地图。

直到唐代，因为洪水以及河道的不稳定移动，今天上海市所在的区域是不能住人的，但是陆地在更向西的地带被建立起来，作为西北 80 公里处旧苏州的船运中心。吴淞江（B–B），也称作苏州河，是主要的运输线。渐渐地，吴淞江淤积起来，而黄浦江（A–A）加宽了，形成了通向大海的新航道，并在其西岸发展了一块新的陆地，那里，河流比另一边的要缓慢，河岸也高出最高水位。海船从外海驶入黄浦江，在这里下载货物。这些货物再转载到河船上，沿着吴淞江运往苏州，吴淞江在新陆地以北大约 1.5 公里处与黄浦江相汇。这块新陆地，自 1074 年起被称为上海（A）。1095 年，一座帝国海关（1）在这里建立时，新陆地也发展成为一条像汉口那样沿着河岸的市场长街，两个多世纪它都没有自己的管理机构，直到 1292 年，一位县官在市街西边设立衙门之后（2），上海县作为松江府的一部分才建立起来。又大概过了两个半世纪，1564 年，市街西面管理小镇的衙门和庙宇四周建起一道墙（B），形成了开敞的郊区。接下来的若干个世纪，甚至在外国商人 1846 年于城北的聚落建造租界之前，这个郊区就已经发展成中国最大的海港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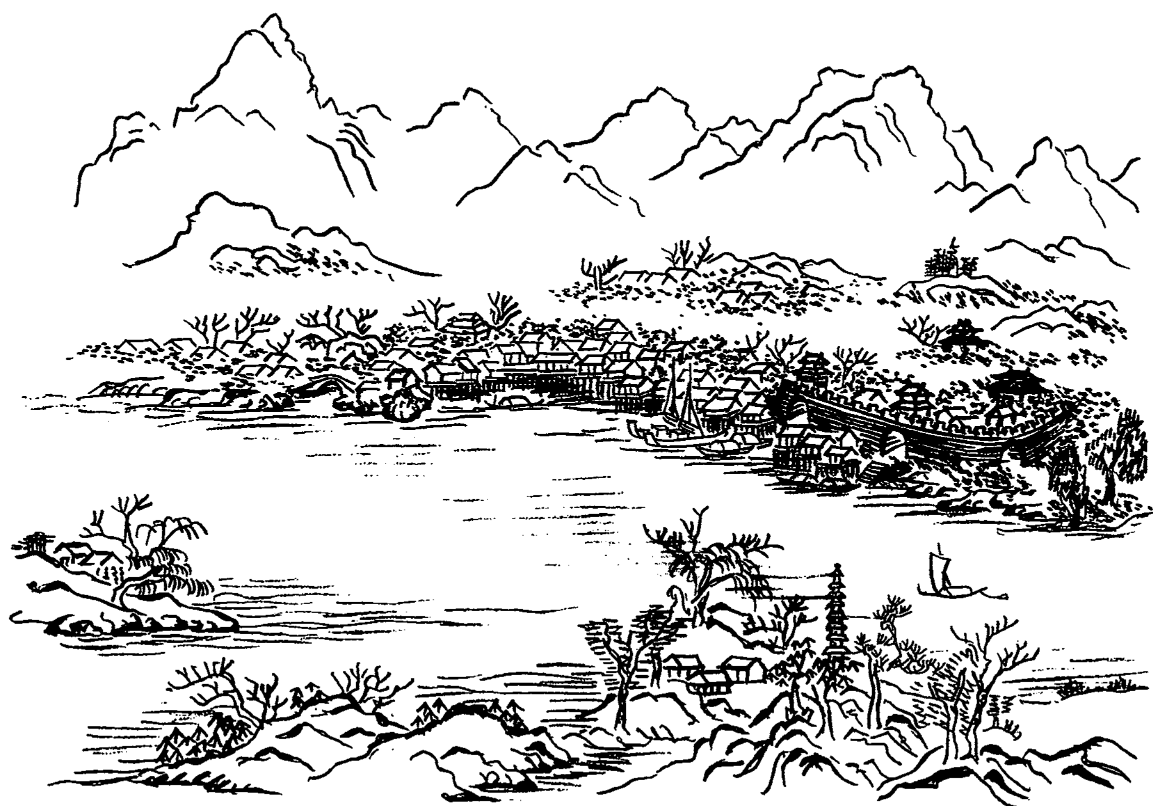
1– 海关办事处，后来作为海防的次级县；2– 具有警署、监狱、仓廪、盐检署；3– 道台；4– 城隍二王庙；5– 孔庙和文庙

中有过几次不甚成功的开始。到了宋代，整个国家付税采取现金形式，而大部分用于海外贸易的中国钱币已在远至东非的一些地方考古发掘出来，可以判别是宋代的物件。一张显示11世纪北宋朝代后期在城市中收税量的地图显示了新的商人阶层的活动区域，其中有两个区域脱颖而出。从所缴的商人税收量来看，首当其冲的是都城开封，其胜过所有其他城市，表明传统的经济活动聚焦于皇室所在地的做法。然而，在东南环长江三角洲地区，尽管没有一座城市可与都城相提并论，然而却可以判断出有大约15～20座城市组群的税收总量与都城相当。在此城市组群中，最重要的是杭州，紧接着是苏州、南京、吴兴和淮安，新兴之地如上海和宁波也包括在内。另一个区域是围绕成都的四川，大约15座城市的税收之和可与杭州和苏州的税收之和相当。

我们应该提到的另一点，就是基于科学的技术之增进，在几个生产领域，特别是纺织业和采矿业的机械化，得益于科学的其他领域伴随印刷术的发明而大大地增强了。在宋代，成千上万的学者们早已在家中有大量的图书收藏。过去世纪里流传下来的传统知识广泛传播，启迪人们去追求和发展诸如医学和数学领域的知识。自然而然，无论是科学还是艺术方面的新文学繁荣发展并使所有感兴趣者都能触手可及。

所有这些带来了我们所称的“城市革命”。不仅在很多地区的城市人口有所增长，而且城市居民的比例在某些县或府也不断增长。我们知道在一些地区，人口增长从原来不到10%升至25%甚至超过30%，而且据估计，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来说，到11世纪末，城市人口也许已经达到大约10%左右，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高度城市化的国家。在城市的社会结构中，更多的重要变化呈现出来，表现在公共生活以及由此出现的社会组织模式。除了我们以上所说的开封的例子，我们应该提一提在唐和宋的城市中商业活动的组织机构之间的不同。在唐长安的商人们原先受限于外城南部的两座大市场，并且无权在城中发展自身。市场由一堵高墙环绕，城市实行宵禁，城门紧锁，街道无人，似乎这种宵禁制度用于所有重要的行政中心。然而，到了唐代末年的9世纪，逐渐开始解除宵禁制度。正如以上所提及的成都，当这一时期城市扩建中，在其新的街道网络中这一严格的宵禁制度早已解除。而对于开封城的描述表明，此时店铺甚至可以对皇家御道敞开，这是极不寻常甚至不可思议的。毕竟那是都城主要的仪式通道，当皇帝要履行仪式职责时需要多次由此经过，此时倒显得他是招摇过市一般，人们欣赏皇家列队而过的辉煌之时，也因皇帝必须屈尊而穿行于沿街闹市而得意，显然是因为所有这些市场和街道变得越发重要之故。我们由此可以假定，市场街道这一中国城市中的重要元素在这些时间出现，要么是与所有其他形成大城市的城市元素相联系，要么是作为形成城市的市场聚落主要元素，在中国历史上，当整个国家变得日益商业化后，首次以不断上升的数字呈现出来。

1078～1082年间，开封城墙得到重建，并且采用非常感人的比例，也许是当时中国最为感人的城墙。城墙高到10.8米，基座厚达15.8米，城壕4.6米深，使得整个防护墙高15.4米。加宽至76.8米的护城河大概是毁坏了部分近郊，但是与来自西北西夏的反击战将一切考虑都置于强化堡垒这一首要考虑之后。此时，开封也许有大约100万的人口，而城墙内区域的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5000～40000人不等。与西夏国家间的战争预示着与西北的野蛮游牧部落间战争冲突的爆发，他们早在唐代末年开始就开始不断骚扰北方前沿哨卡，一直到后来，最后一位北宋皇帝，在激烈交战后，于1127年，被迫将开封城放弃给金人。这一转折点后，宋代的第二个阶段出现了，就是著名的“南宋”。它统治南中国又达150年，都城为浙江杭州及所谓的“临时都城”。这个冠名以“中世纪的经济革命”的过程继续下来没有间断，然而，尽管如所期盼的那样，它仅仅在南部发展至鼎盛。在已既存的和商业上重要的城市建造皇室的过程不断地重复着，但这次是在更为优美的自然环境，比160年前的开封更为宜人。关于开封，在宋代的开始阶段有此一说：“很多年来，我们可以想像，开封的生活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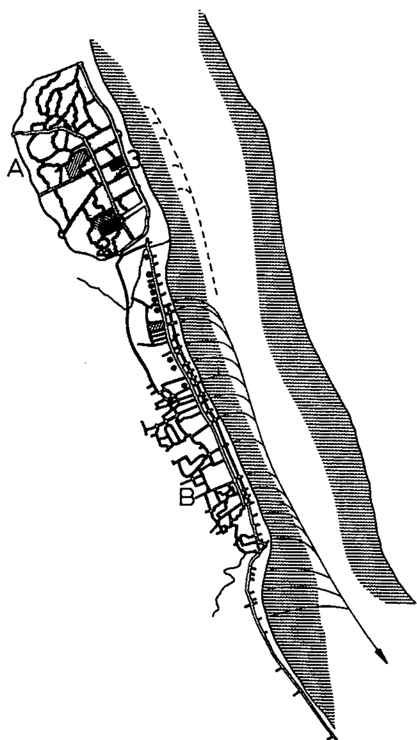


图 4.1.1.14　湖南湘潭市，引自 1747 年《长沙府志》。

右侧是带围墙的行政管理中心，河港和市场街道，沿着河岸从中心向左边延伸，很多的登陆地建在水中的柱桩上。湘江从左侧流来，并在带有城墙的城市和河岸左侧的一座塔之间穿过。这塔大概依照风水的考虑而建，仅仅用于防御

图 4.1.1.15　湖南长沙以南的湘潭市平面。比例 1 ：40000，引自 1889 年《湘潭县志》。

湘潭的城墙在明万历皇帝（1573–1620 年在位）统治下建造以后，这个城市几个世纪以来作为一个重要的河流港口城市和船运中心，停泊那些装载着中草药、茶叶以及煤炭顺流而下的河运驳船。它也是去广东水路的一个站台，公元前 3 世纪就已经开埠，通过那著名的"灵渠"（参见 2.4.15）将湘江与漓江相连。随着城墙的建造，大约三分之二的聚落变成管理中心（A）的郊区。后者包括地方官府办公室（1）、带有图书馆的孔庙（2）以及城隍庙（3）。有趣的是，原来城区的市场街道模式，随着城墙的建造而改变，这墙隔开了登陆地，也将商业区切到外面，为官僚们创造了一个平静的居住区，黑点代表了道观

图 4.1.1.16，17　一些小市场街道的景致，引自古旧木刻。

左边是一座两层酒楼，位于一条小运河上的小桥附近，另一侧是一座小庙，门开向窄巷。另一版表现了小桥附近几家店铺正在出售一些不同的商品。背景是城墙下。星星和月亮也许暗示这是夜市的景象





氛围强烈地反映出那种对于宋代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基础之实用主义的毫无吸引力的结局。对于相对自由的商业者，对于个体的经营者，对于革新和成就斐然者（和他们那直接或间接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知识的获益者）来说，居住在开封的人一直处于竞争状态，目标冲突状态，功利主义的平庸状态，对于社会公德准则和生活模式忽视，而且从毫无经验的城市之道中滋生出不平等。对于一个具有传统思想的老派人来说，城市仅仅在其高度的紧张或无序状态对于创造力来说是必不可少时才看起来有机或有效的。坦白讲，开封从未满足作为象征性都市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要求，然而，它毕竟可以象征一些将宋代初期从中国历史中脱颖而出的一些不太传统的特性。”(E.A.Kracke,jr,1975.)

4.1.2 南宋的城市文化

经过长时间犹豫不决和反复琢磨，才最后选择杭州作为帝王都城。十年之后被选作都城时，仅仅被当作是一个权宜之策。已有的杭州，是一处商业完善、并有显赫历史的城市，早在1077年，这座城市就作为商业之地，排名仅次于都城开封。其结果，与960年的开封相比，它不怎么能够满足皇都形式上的需要。然而，景观的魅力还有适宜的气候弥补了这些缺陷。杭州肯定对城市生活概念的变化有所贡献。在杭州，具有传统思想的宋代人大概比在开封更容易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尽管开封最初百年间勇敢的理想主义，那不受战乱干扰的繁荣岁月，那生气勃勃的改革时代，那在彻底被摧毁前不懈的、仍具活力的发明创造，使开封比杭州更为令人神往，众多的崇尚开封的人甚至在1127年之后都还这么想。从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约略知道杭州城的样子，他在南宋朝代刚刚结束时曾访问了这座城市。称这座城市为Qinsay,大概相当于中文的“行在”意味着“临时的居所”或“临安”。马可波罗告诉我们：“三天后，你抵达这高贵而辉煌的Qinsay城，这个名字象征着天上的城市，它享誉世界，并超乎其他城市的优越之处在于宏伟和美丽，及其无尽的欢乐，它能使居民想像自己好像在天堂一般。”然而，这个城市的官方名字是临安府，这名字是对皇帝哲学上的告诫，还是带有希望的劝导？虽然它暗示了临时这一特点，却又暗示了某种寓意：“旅程中的皇帝，将达到他的最终目的地，在其北方真正的都城中永远安息。”

临时也好，永久也好，将宫廷迁移到那里，给城市的发展带来新的冲击。虽然已经处在中国南方聚落总体上的繁荣所带来的发展进程，现在，这个城市从一个不到200000人口的省府发展成为一座超过100万人口的都城，而如果我们准确地诠释由马可波罗所绘出的数字，这个数字还太小。马可波罗的说法是，大都市区域内含有160万居户，那么就应该有几百万人口。马可波罗之行大约50年后，另一位旅行者观察到那总有好几百里地的范围，无

图 4.1.2.1 一幅典型印刷作坊的图片

图 4.1.2.2 浙江，南宋的都城（1127—1278 年），杭州城，比例 1 ：40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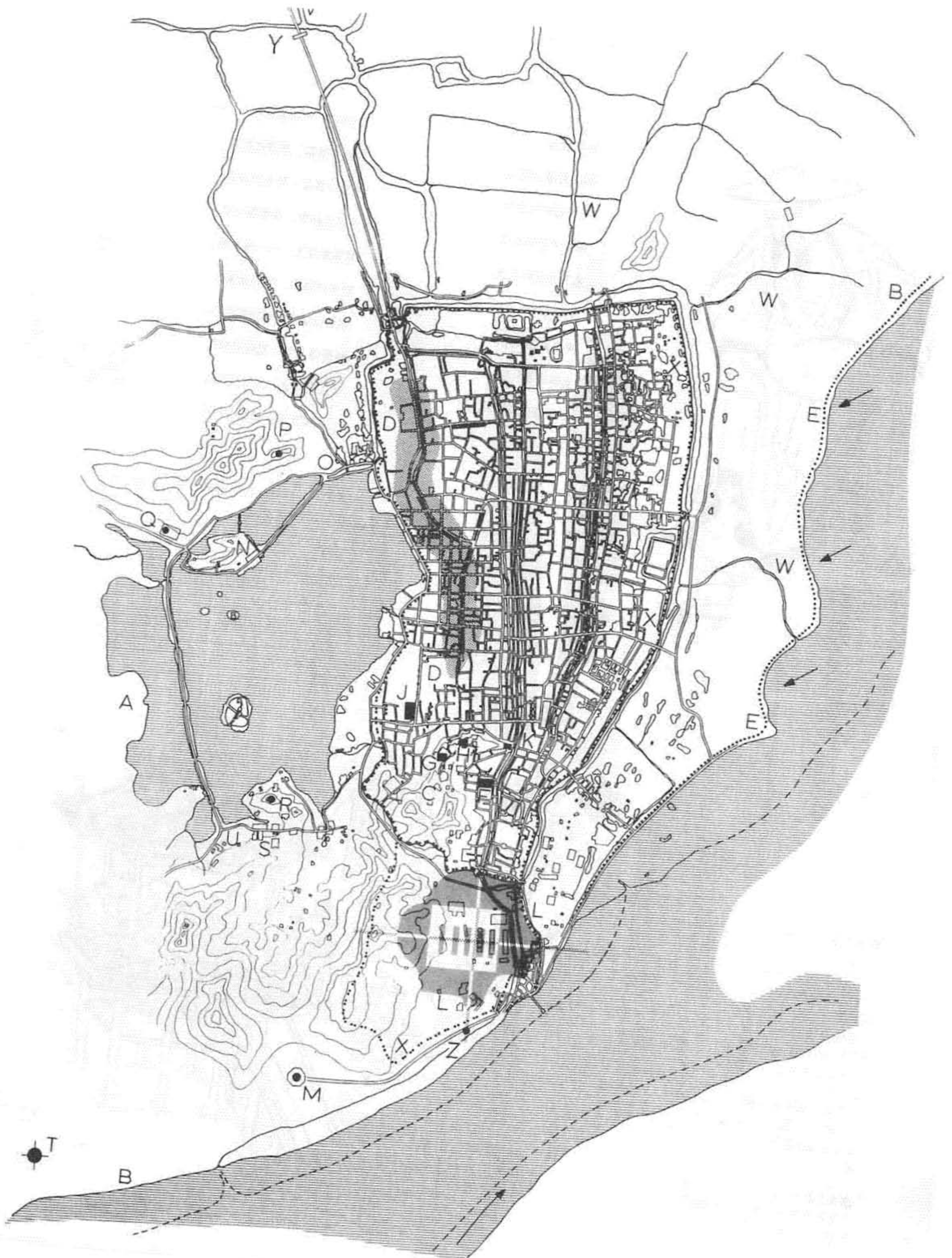
A— 西湖；B— 钱塘江；C— 吴山；D— 第一个堤坝区域；E— 沿海的海防城墙；F— 皇家宗庙；G— 城隍庙；H— 关帝庙；J— 府衙；K— 朝天门；L— 皇宫；M— 天坛；N— 孤山岛；O— 昭庆寺；P— 保叔塔；Q— 岳飞庙；雷峰塔；S— 净慈寺；T— 六和塔；U— 苏堤南端；V— 大运河；W— 郊区；X— 城墙的最大范围；Y— 老北门；Z— 通往天坛的大门。将近汉代时，西湖区域是一个与钱塘江出水口紧密相连的湾区。在今日城市南部的吴山脚下可能已经存在一个"山地文化"聚落。从那时起，一个开垦土地计划也许已经开始了，大概公元 2 世纪与绍兴实施伟大的洪水控制项目同时（参见 3.1.4.3），一座堤坝被建造起来将西湖的湾区与钱塘江的出水口分开。聚落初期的发展已经在 3.4 章节中有所描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的是杭州刺使钱镠在 891—893 年期间所做城墙的扩建工程，当时，他带领 6500 士兵和征集的民工，总共超过 200000 人来扩建城墙……所扩建的城墙 70 里长，含有八座城门……"运河将城市分成两个区域：湖的西边为夹城，东边的是罗城。910 年，已经成为吴越王（907—932 年）的钱镠，在东边沿着钱塘江重建了沿海城墙，使得城墙后面的区域可以接着建造聚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不受干扰地继续着，直到 978 年，吴越向宋代皇帝投降。而一个世纪以后，这座城市是整个中国最重要的沿海城市，从税收的数据看（参见图 4.1.1.2），它在经济上仅次于都城开封。结果，于 1102 年在这里建起一座海上税收机构。开封落入了金人（女真人）之手，北宋时代于 1127 年结束之后，北宋皇室的幸存继承者，徽宗皇帝的儿子（1100—1125 年）终于在杭州落脚，并于 1132 年在这里建立了帝国政府，又于 1135 年建立了宗庙。这座城市被称为"临安"和"行在"，两个名字都表示了它作为皇帝"临时居所"的概念。不管怎样，1138 年皇帝在城南他的新宫殿安居下来，主要原因是他的个人安全，这个地方从北方难以进入，围绕它的乡村由于运河和沼泽曲曲折折，对于像金人这样的马背民族几乎无法顺利通行。因为，这个决定或多或少有些偶然，也就没有发展什么计划或者概念来建造皇都。加上城市本身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聚落覆盖了广大的区域，因此，仅仅专门对帝国宫殿和政府做了些非常有限的重建。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必须顾及一下风水方面的考虑。但是，如果没有投入大量而复杂的规划和经费，布局不可能带有魔幻数字和直线般的设计理念。在南面添加了宫城，并结合山峦进行了建造，城市的南部随着衙门之类建筑的连续兴建渐渐地重构。同样，沿着主要运河的主要大街在某种程度上被拓宽了，并预备和从宫城北面的朝天门开始的御街千步廊一起作为御道使用。

像任何皇都一样，无论规划与否，杭州吸引越来越多的居民在宫城附近定居。结果人口增加，城墙内区域中的人口密度在几年内戏剧性地增加。许多多层房屋，让一些家庭逐步取代了传统的一层家居房屋。郊区在城墙的北面和东面大面积扩展，因此杭州变成一个为来自欧洲的旅行者如马可波罗、鄂多立克还有阿拉伯商人旅行家伊本巴图泰等人所津津乐道的地方。如此地挑战中世纪读者的想像力，以至马可波罗被称为荒谬的谎言家。不仅御街的安排是非正统的，它从北而来，宫殿本身也是如此，其主要的轴线是东西向而非通常的南北向，因此主要的宫门是在边上而非主轴线上。郊区天坛的祭献仪式设在宫殿南边一个周长 70 尺（大约 22 米）、高 32 尺（大约 11 米）的圆形高台上举行。高台由八个区域围绕起来，称为"八卦阵"，算是（传统帝都设计的）魔幻概念的某种微弱运用吧。

1276 年，击败了北方的金人之后，蒙古军队攻克了杭州并结束了宋代。然而，大约十年之后，当马可波罗拜访这座城市时，战争给聚落地区带来的毁坏已经被修复，经济复苏，人口也有所增加。过去的辉煌所剩无几，主要是因为 1862 年太平天国时期的毁坏



1 译者注：基于 1934 年的杭州地图；咸淳临安志，1867 年；杭州史话，浙江，1979；中国六大古都，北京，1983；A.C.Moule，Quinsai with Other Notes on Marco Polo，Cambridge，1957；H.Yule，Book of Ser Marco Polo，London，1903。


Y
W
W
B
E
D
P
O
Q
N
W
X
A
D
J
E
G
C
R
U
S
L
L
X
Z
M
T
B



苏东坡词：

城头月落尚啼乌，
乌榜红舷早满湖。
鼓吹未容迎五马，
水云先已飏双凫。
映山黄帽螭头舫，
夹道青烟鹊尾炉。
老病逢春只思睡，
独求僧榻寄须臾。

苏东坡词：《东坡八首》之一[1]

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
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好语。
分秧及初夏，渐喜风叶举。
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缕。
秋来霜穗重，颠倒相撑拄。
但闻畦陇间，蚱蜢如风雨。
新舂便入甑，玉粒照筐筥。
我久食官仓，红腐等泥土。
行当知此味，口腹吾已许。

1 苏东坡，大概作于他居杭州“东坡”时，B. Watson, 1971.



图 4.1.2.3 1089 年至 1091 年的杭州府知州苏轼（1037–1101 年），著名的官员和诗人，更多的人知道他的名字苏东坡。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长堤，横跨西湖，将湖分成两个部分，也为湖面带来了美妙的步行路径。它是为了疏浚西湖而建，在此过程中，挖出的泥砂和砂砾被垒起来筑堤。苏东坡终生为官，在很多地方呆过。他在杭州度过了几个时期，在那里，正如他的一贯所为，他对生活和乡村民众保持浓厚的兴趣。正如他所承认的，在他为官的内心深处流淌的是农民的血。因此，他以在东坡上的园子之名作为自己的笔名——东坡

图 4.1.2.4 湖边的亭子，一群饮酒者，还有几个小贩和僧人。参见山西繁峙县岩山寺 12 世纪的壁画，文物，1979/2

陆游词：

关山月[1]

和戎诏下十五年，

将军不战空临边。

朱门沉沉按歌舞，

厩马肥死弓断弦。

戍楼刁斗催落月，

三十从军今白发。

笛里谁知壮士心，

沙头空照征人骨。

中原干戈古亦闻，

岂有逆胡传子孙。

遗民忍死望恢复，

几处今宵垂泪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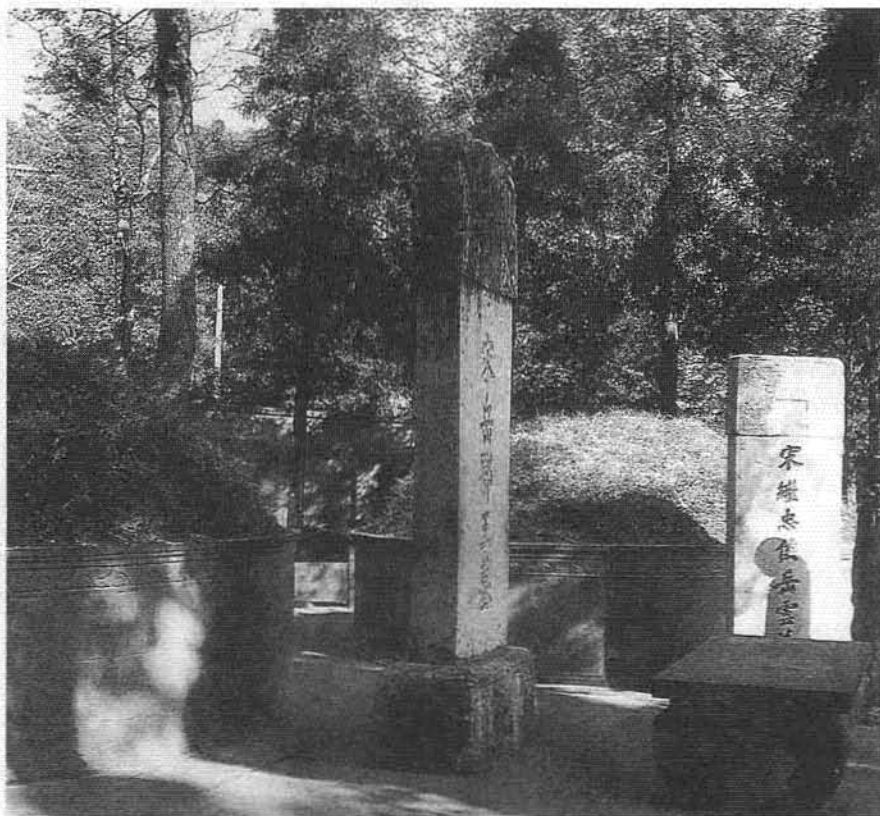


图 4.1.2.5.6　西湖北岸的岳飞（1103–1141 年）墓，

南宋皇帝不得不退到杭州以逃避被金人俘虏，当时在军队领导作战的领袖是岳飞将军，他相信能够击退金人的入侵并渐渐收复所有宋代在北方所失去的领土。但是，当时的宰相秦桧（卒于 1155 年）提倡与金人讲和，并通过阴谋得到上层的支持，结果岳飞和他的儿子一起被处死。图中可见他们的坟墓及其前面的雕像

1 译者注：关山月，汉东府横吹曲名。此诗作于孝宗淳熙四年（1177）正月，陆游 53 岁，在成都赋闲。在北宋灭亡二十周年、隆兴和议进入第十五个年头之际，面对朝廷依然无意恢复的现实，诗人写了《关山月》、《出塞曲》和《战城南》三首乐府诗。

吴越王钱镠（在位：851 年，907–932 年）的后代，通过在西湖边重建和新建寺庙使都城杭州成为佛教中心。早在326年就已经兴建的灵隐寺，现已同三天竺寺（译者注：或称天竺三寺，即上天竺法喜讲寺，中天竺法净禅寺，下天竺法镜讲寺）和孤山圣因寺一起扩大。在 960 年新建了净慈寺，而在 968 年新建了昭庆寺。净慈寺坐落西湖南岸，而昭庆寺坐落西湖北岸。此外，在环湖的小山上建造了三座大宝塔。因为与佛寺没有什么联系，这几座塔主要是风水方面的考虑，用来保护这一地区不受鬼神与洪水的侵犯。在北边是原建于 968 年的保菽塔；在钱塘江的北岸是 970 年建造的六和塔，以保护城市不受江水泛滥所带来的洪淹，以及建于 975 年的雷峰塔，同样用于防范此地鬼神与恶魔。当雷峰塔在 1924 年倒塌后，在砖块碎瓦中，发现了 975 年在杭州印制的一些大慈悲心陀罗尼经。当时的杭州是与四川的成都和河南的洛阳并称的中国三大印制中心之一。吴越王钱淑(947–978年在位）下令建造了这些塔，并命令印制多达 84000 份的陀罗尼经放入每座塔中。他还命令复制出 84000 座所谓的阿育王塔，完全模仿宁波附近的阿育王寺的那座塔（参照 3.2.4），仿效古印度阿育王（Asoka，公元前 259– 前 222 年）的做法，他为佛祖舍利的分散之故，曾建造 84000 座舍利塔用于普及弘扬佛教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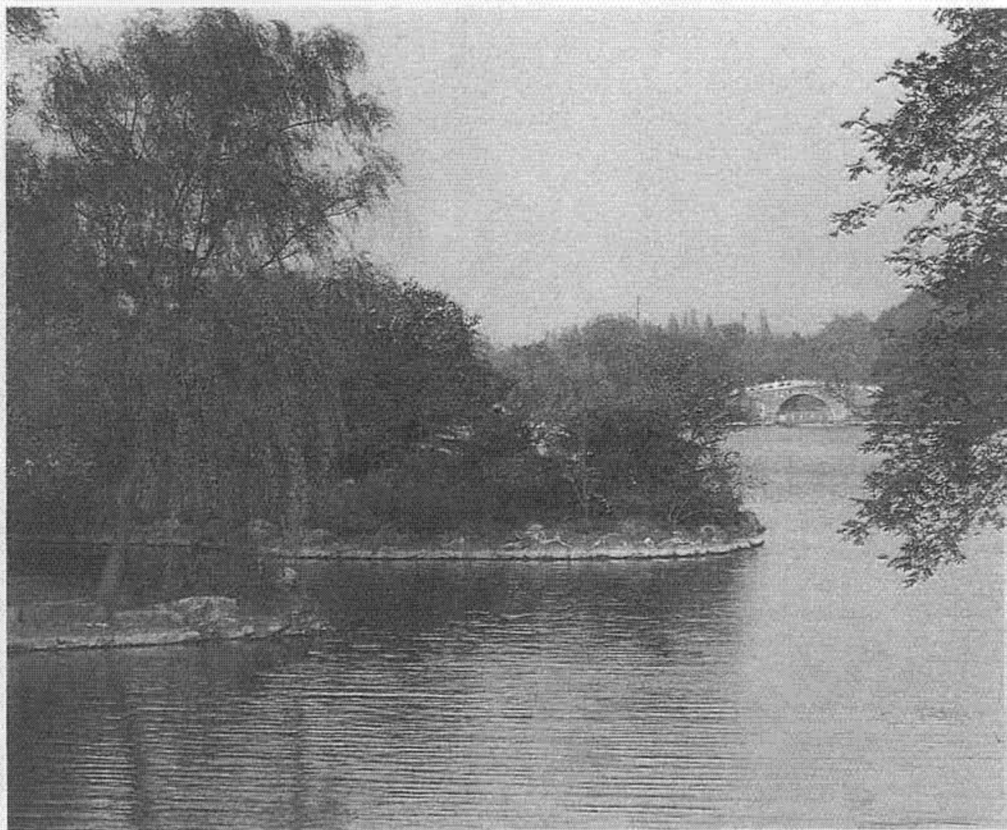


图 4.1.2.7，8　浙江杭州附近西湖的两幅景观图画

图 4.1.2.7　落日照过西湖后面的西山，从城市中望过去

图 4.1.2.8　西湖较小的部分、被称为西里湖，背景是苏堤，也叫六桥堤，图中可见到其中一座桥

图 4.1.2.9　杭州的西湖，1911 年所绘的一幅美景图，这一年发生了孙中山的第一次革命。沿湖边左侧是杭州城的墙（图中顶部是南侧）。1– 吴山上的城隍庙，是这一地区最老的聚落地点；2– 近湖出口处的昭庆寺；3– 保菽塔；4– 孤山及其上的圣因寺；5– 岳飞将军（1103–1142 年）墓和岳飞庙；6– 苏堤，因著名诗人也是杭州知州的苏东坡（1037–1101 年）得名；7– 雷峰山上的雷峰塔；8– 净慈寺；9– 城市的南门，以前的宫殿北门。门后是以前皇家御苑的小山，御苑过去是钱塘江上船只的桅杆；10– 灵隐寺等三座佛教寺庙。城墙之内可见满族城（11）

处不被好好地用来住人。那里有许多的廉价公屋，每个单元可以住10或12户人家。那里还有许多的郊区住着许多人，甚至比城市里的人还多。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伟大到连这位旅行者本人都不怎么敢提它，但是他说，在威尼斯遇见的许多人都到过这里。”他继续提到了这座城市有12座主要城门，每座城门向外大概走8里之后，依然还是城市，比威尼斯大，甚至比帕杜阿（Padua）城大。因此，一个人光在其中一个郊区走，大约要走6～8天，然而，这还只走了城市的一点点。阿拉伯旅行家伊本——巴途泰（Ibn-Batuta）也描述了他在同时期所参观的这座巨大的聚落。以上所有参观者们描述的，正是用我们今天的术语应该称作大都市的区域，我们肯定会发现，它存在很多和我们现代大都市聚合体相似的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首次听到有超过两层的、为家庭而设的住房居住空间，这在后来的世纪中成为中国南方的典型做法，并与北方形成对比。将马可波罗那些贴切的句子放在一起，城墙内部的城市似乎是这样的：从城市的一端延伸到城市另一端的主要街道的路面铺着石头和砖，每边各达十步的宽度，中间部分填充些细小的砂砾，并且供有拱形的输水道，将雨水滴落到相邻的运河里，如此，路面永远保持干燥。这与开封的“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海一片”的劣质街道形成对比。马可波罗还提到，在这些砂砾路面上，马车不停地来来往往。每个小时里，你会见到大量的车马，一些驶向花园，男人和女人们结伴而行，并被领到一些暧昧的幽会场所。在那里，男人们整天沉浸在女人的天地里，天晚时，以他们出门时的方式回家。在主要街道的每一边，都有房屋以及带有花园的大型府邸。附近有匠人们的住屋，他们在自己的贸易作坊里工作。无时无刻，你都会看到大批的人群来来往往。在手工业贸易中，有十二个行当，因其产品的切实可用而被认为高于其他行业。这十二行中，每一行都有上千的作坊。每一个作坊，有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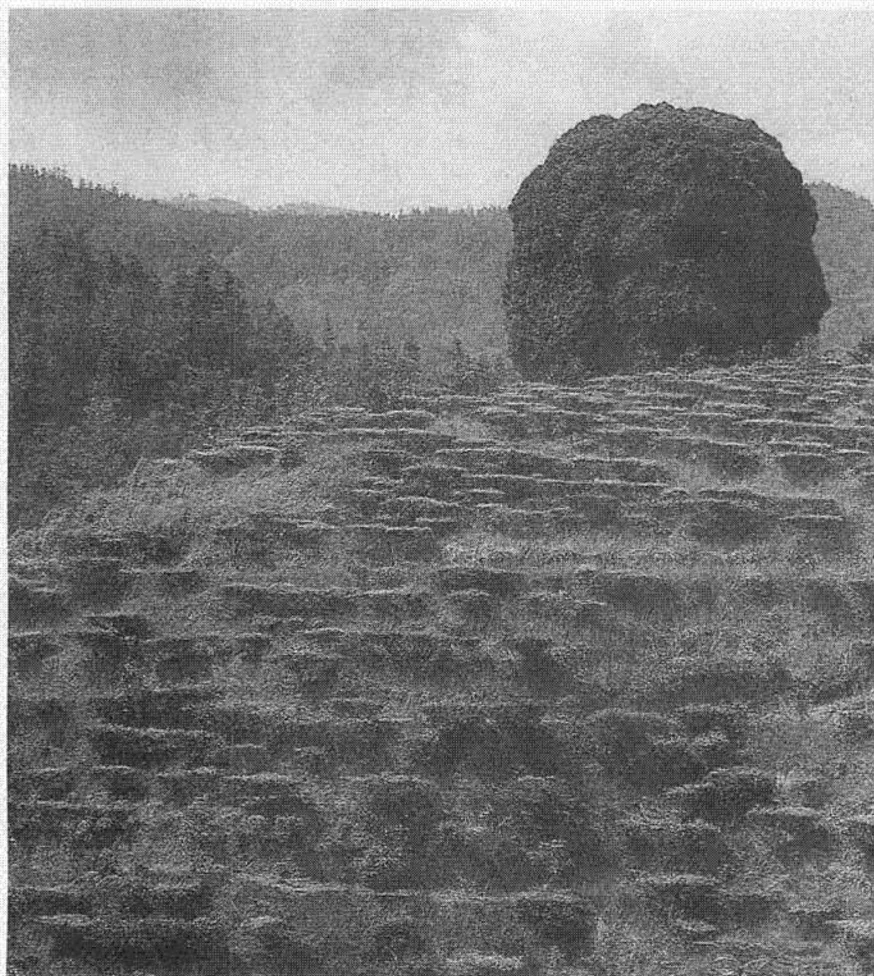


图 4.1.2.10 杭州西湖西山上著名的龙井茶园 宋代，茶叶已经成为城市居民日用的普通饮品，福建、浙江、安徽、湖南和江西一带的茶叶产品大量地增加，杭州被选作帝国的宫室之后，城市周围的区域成为 12 世纪最大的茶叶生产中心之一，尽管茶叶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商品并且已经在 1044 年之后被作为供品进贡给西夏王国，供品的数量渐增到 225000 卡提（东方各国的重量单位，1.32～1.39 磅之间），产自杭州的龙井绿茶依然被认为是中国茶叶中最好的

图 4.1.2.11 12 世纪山东肥县石刻上的茶壶和茶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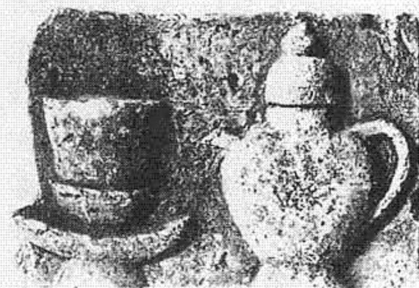
图 4.1.2.12 江苏南部沿着大运河的一座典型市场街道聚落——太湖以南的镇泽镇，庙宇在左侧，称为李公王府，前面有一个带有登岸平台的公共广场、两个亭子以及下到水中的踏步，集场街道通过门分成不同的区块和里坊，这些门在夜晚关闭，注意很多从运河通向商铺的踏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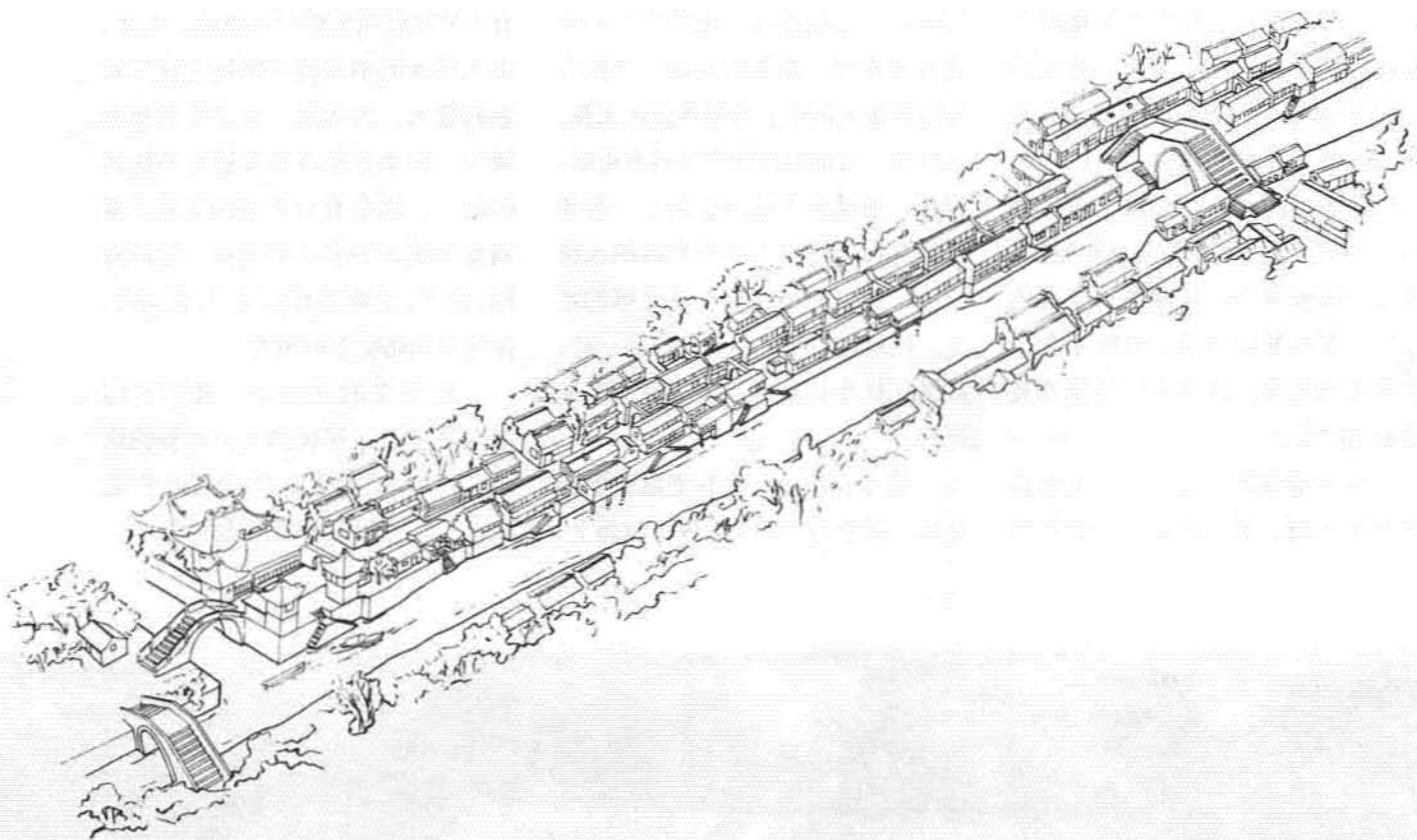
图 4.1.2.13 照片显示了杭州所留下来的主运河模样，13 世纪它是从北到南穿过整个城市最为繁忙的交通线路，御街在右边，水运几乎完全由陆路交通取代，绝大部分其他运河已经封闭，在若干个世纪中，沿岸所建造起来的建筑物无论发生了什么，1500 年来运河履行了它当初的功能

工 10 人、15 人或者 20 人，有时多达 40 人。这些制造业中显示富足的原则是以自己的手工劳作，而显现出一种斯文和炫耀的气氛。他们的房屋建造得很好，有富丽的木雕装饰。

除了沿街无数的商铺，城里有 10 个主要的市场。市场前面有主要的大街，宽达 40 步。与主要街道相平行，但在市场另一边是一条宽广的大运河，运河两岸是石头建造的巨大货栈或仓库，给来自印度及其他地方的商人居住，并堆放货物。这十个市场里，所有的市场都由高高的住屋所围，这些住屋低的部分是商铺，那里从事着每一种制造业，出售着每一件贸易物品，其中有香料、药品、廉价的珠宝以及珍珠。一些特定的商铺只销售家制酿酒，他们不停地酿造，并以合理的价格提供给顾客新鲜美酒，每周有 3 天的时间，总共有 4 万到 5 万的人涌到每一座市场，上门供应批发商品。市场中拥挤着进行贸易的人群，他们带着车船载来的商品，拥塞了整个城市空间。

与市场相连的街道无数，在一些街道里，许多地方提供给男人







和女人冷水浴，这些人在孩提时代起就习惯了冷水浴。城里，有大约3000家浴室，大到足以容纳100人一起洗澡。还有些街道住着高级妓女，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找到这些人，她们穿着华丽的服饰，抹着浓浓的香水，住着装饰华美的房屋。在其他街道里，有医生和占星术士的住屋，这些人传授读写及其他诸门类艺术。

这座城市的一边是一座非常清洁的淡水湖，另一边是一条宽广的大河，与之相连的一系列大大小小流入城市每一角落的运河，将所有的污秽带入河中，并最终流入大海。这样做一方面对净化空气极有贡献，另外，通过水为城市提供了一种像陆路那样通达城市各个角落的水路交通。运河和街道都具有足够的宽度，使船在一侧，而马车在另一边，载着居民生活必需品，方便顺利地通行。

湖岸有很多漂亮和宽敞的宏伟建筑，属于高官和大官僚。湖面上，有大量供娱乐的船只或游舫。的确，水上巨大的消费高于陆地上任何娱乐的收入。因为湖一直延展到整座城市。如果你站在离岸边有些距离的船上，你会看到美丽的景致，看到整座城市的宏伟和美丽，它的宫殿、庙宇、道观还有花园，与此同时，你还可领略船上的风光。

从中文的文献中，我们可以提取更多关于居民和人口增长的信息。1173年，据载有104669户家庭，住在当时杭州城所属的两个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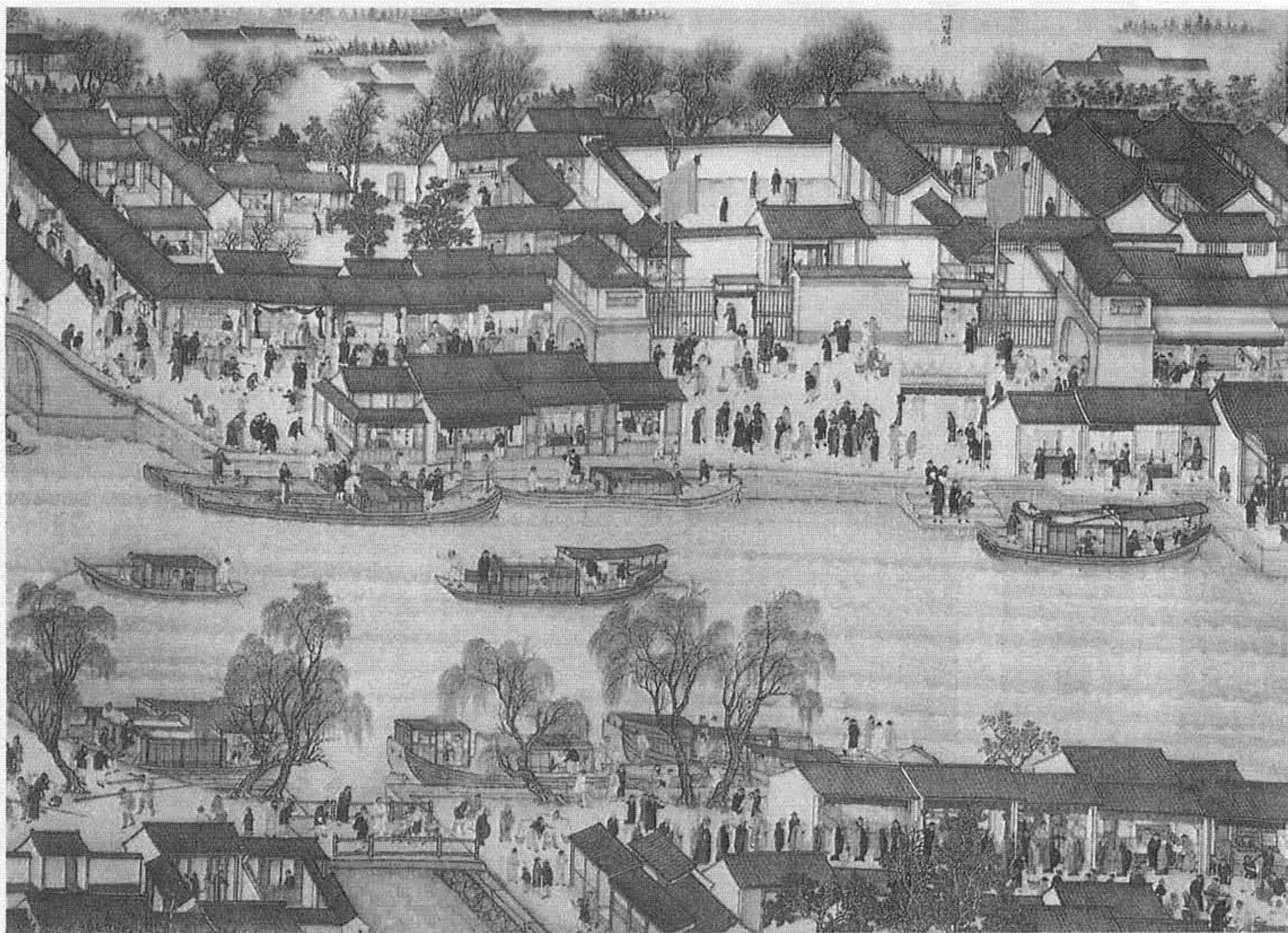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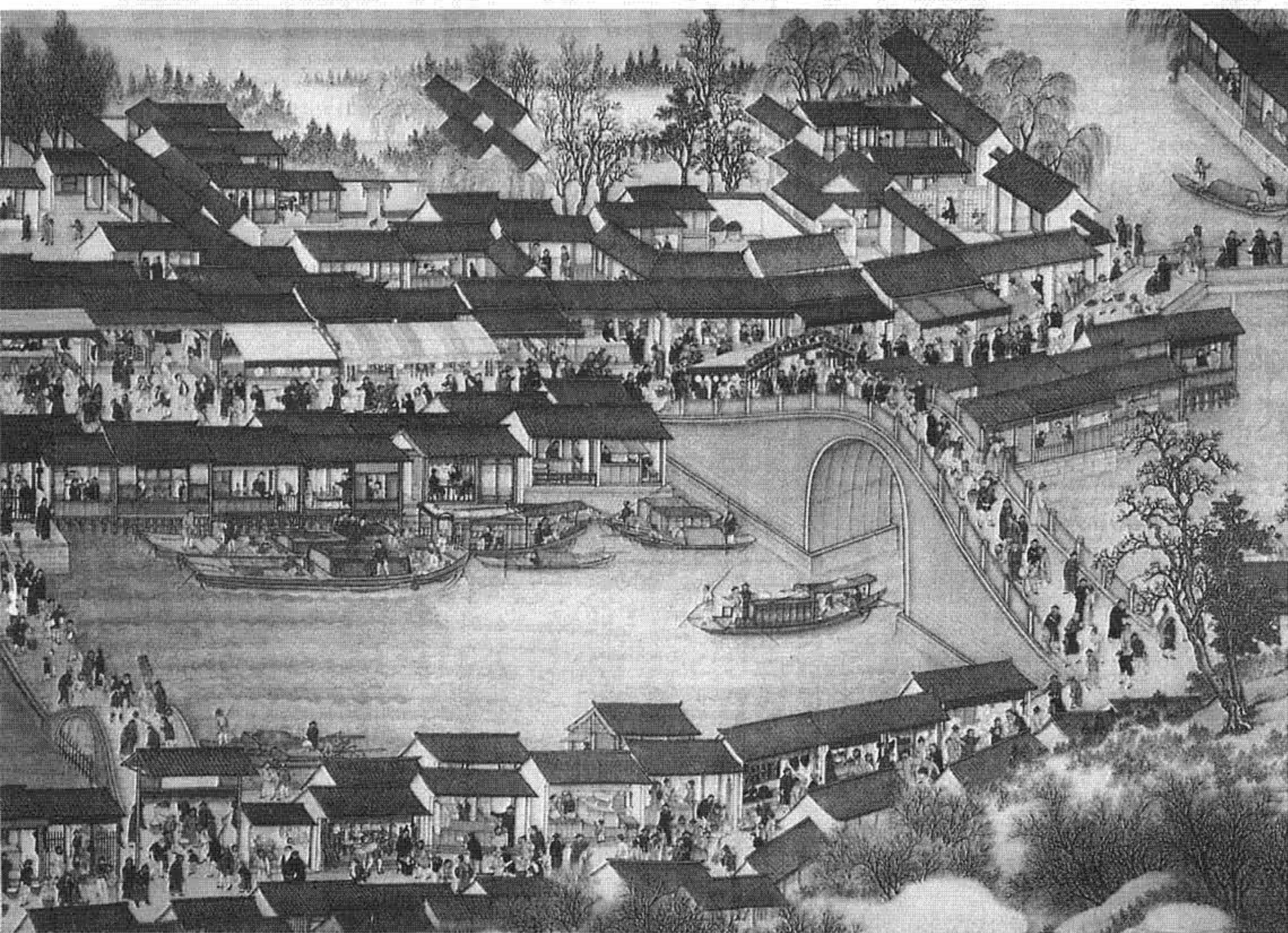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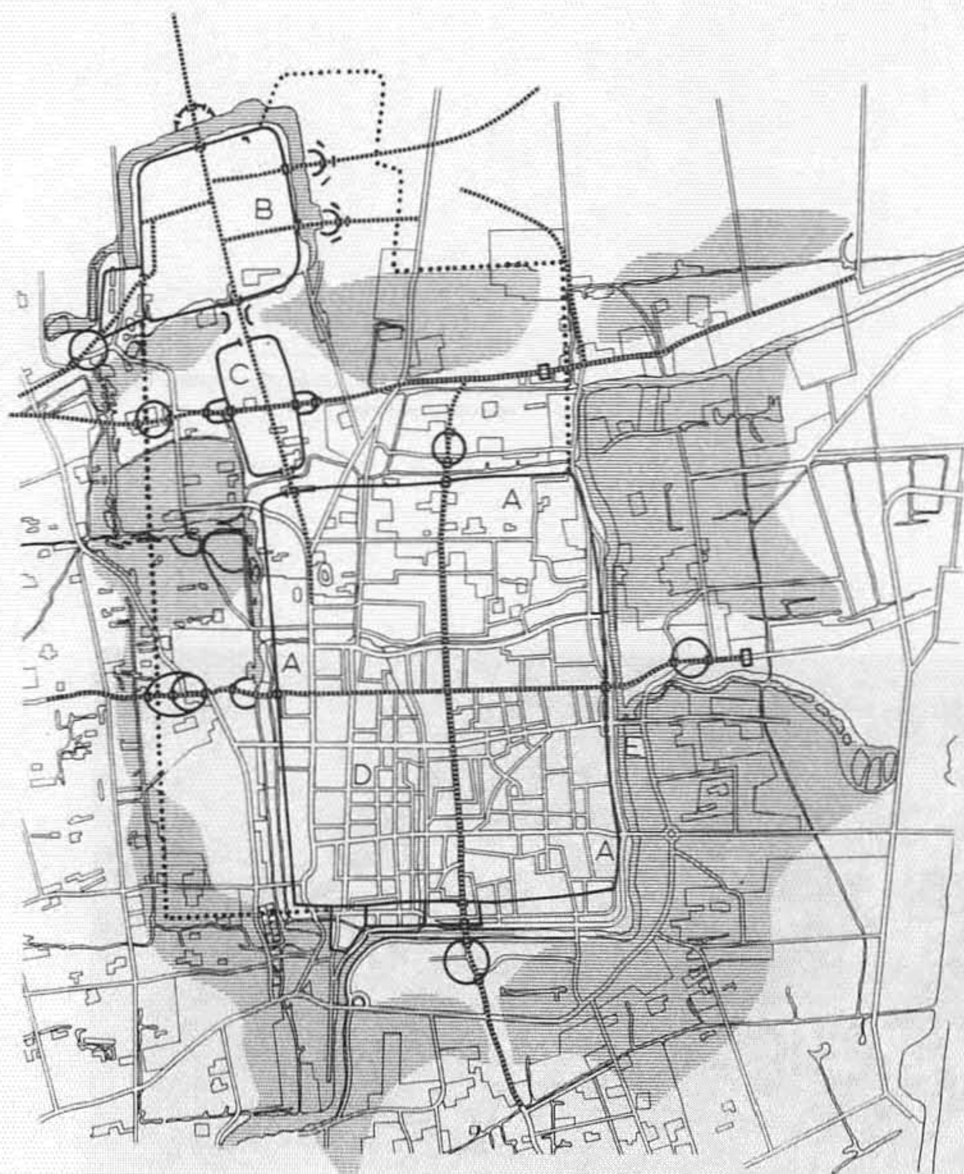


图 4.1.2.14 浒墅关城，今天的浒关镇位于苏州北部大运河上，1689 年《康熙南巡卷图》的一部分，卷七，由一群宫廷画师在著名画家王翚（1632–1717 年）的指导下绘制完成。[1]

左侧是海关衙门，它的前面是运河边上带有踏步的登陆平台。一扇体面的院门直通公共广场，并由钟楼和鼓楼将其与市场街道隔开，主要的入口在"照壁"的两边，而照壁是用来遮挡中央大门的。门里是一个合院，其中进入建筑群的人们必须向右转才到得了衙门的庭院。左侧是南向。注意一下不同类型的桥梁，右侧是一座带有直石条的小桥，主要大运河上架有一座具有一定高度的驼峰桥，一座临时的船桥在节庆的特殊场合，用于拦截运河上的过往船只

1 Courtesy of O.Woldbye，Copenhagen，private collection，published by BMFA，1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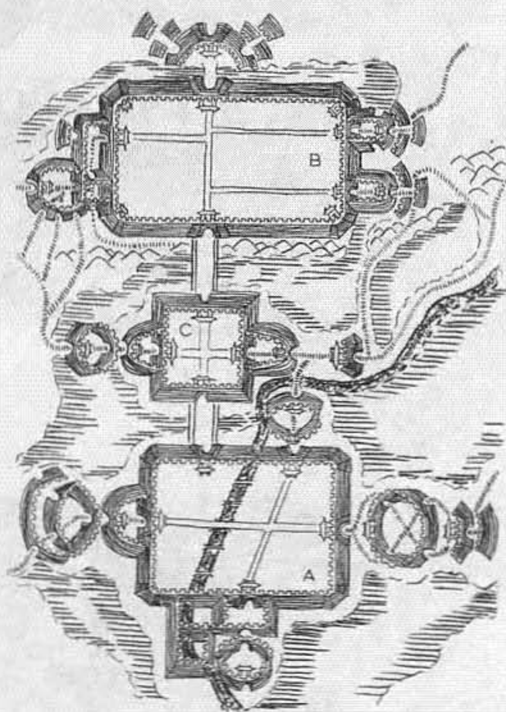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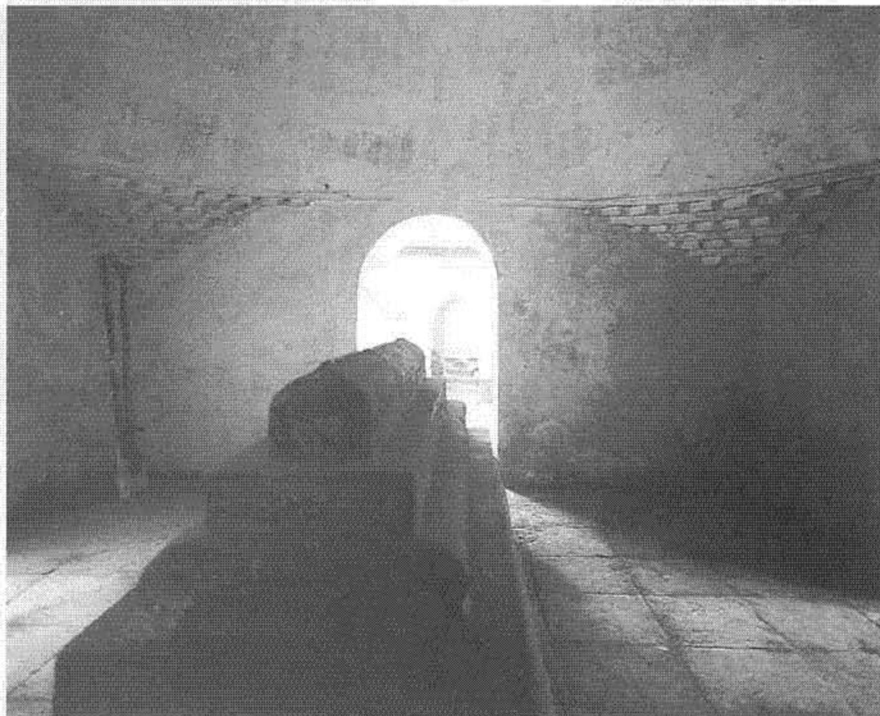
图 4.1.2.15–19　879 年的黄巢起义时期，扬州，这个在唐代财富上仅次于都城的最为富庶的贸易中心，经受了大规模的破坏。892 年，这座城市被杨行密占领，仅有几百户人家在废墟之中逃生。九年后，杨行密成为吴王并寓居扬州，不过只有 20 年。921 年，杨将南京作为都城，937 年当他被南唐推翻以后，扬州又成为了王朝的中心，这一次，作为南唐的东都。然而，当后周 958 年攻克扬州时，因其恶劣的条件，城市无法防御，这使得后周的世宗（954–960 年在位）皇帝命令一万士兵建造了一座新城墙，但是仅为一片较小的区域，即分别在隋唐城市北城墙和西城墙向南 2 里半和向东 1 里半的地方，这个区域被称为"小周城"，仅覆盖原来（隋唐）所留下的布局的一半，并将宫城留在北面，作为北城墙之外的一个独立单元。

960 年，宋代取代前朝。其后大约一个半世纪，扬州又获得了其原来的经济地位，1018 年大运河重新建造以后，其地位甚至有些提高。那时，扬州的船主控制了大约南北贸易的 70%，他们的人数也超过了整个中国南方所有其他的地区。那些年里，扬州是很多著名学者和诗人的为官之地，例如欧阳修（1007–1072 年）和著名的苏东坡（1037–1101 年）。金人在 1127 年几乎彻底毁坏这座城市时，1125 年的城墙修复工作以及建立的一座戍防地所剩无几，工作又留到 1160 年。中国分化为北方的金帝国和南宋帝国，使得这座城市置于两者之间，谁都不关心它。

1234 年，金人被蒙古人击溃，反抗蒙古人的战争于 1251 年开始时，南宋王朝决定使扬州成为帝国中最为坚固的堡垒。1254 年，堡垒添加了碉楼用以加固，"周的小城" 变成了 "宋的大城"(A)。北方的前朝宫殿变为由深深的城壕所围的坚固城堡，城门由碉楼和棱堡的复杂体系所保卫。这两处现在也由一个第三座有城墙环绕的圈地，另一座单独的叫做夹城的城堡 (C) 相连。连接的区域遭到洪水冲击，大量的水环绕着这座 "宋代的三套城"。

这座城市似乎在这个时期恢复了其经济功能，大运河将扬州与南部联系起来，那里的贸易像以往一样繁荣，外国商人生活在城墙之中。1265 年，为阿拉伯社区和一位穆斯林传教士建立了一座清真寺，这个穆斯林传教士据说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第 16 代后裔，中文名字是蒲豪鼎，死后埋在城墙以东近运河处 (E)。参见坟墓照片。平面图，比例 1 : 40000，根据 Cartographic Publishing House1984 年所提供的现代地图复原。点划线显示唐代城市的外轮廓，可与 1733 年地方志上的地图比较。

1266 年，即将于 1271 年成为元代皇帝的忽必烈 (1260-1294 年在位) 下令在北京建立蒙古王朝的新都城，当蒙古将军伯颜 1274 年带领 200000 士兵向南进发时，他通过了扬州的坚固堡垒，并于 1276 年攻克了杭州，将宋代的最后一位皇帝和他的皇室朝廷一起俘获。扬州的军队将领试图与杭州南部宋代的残兵余将建立某种联系来 (一起抵抗)，但他最终还是被俘并被处死，倒是给了扬州一个宋代最后堡垒的名声。在新的朝代下，扬州失去了作为一个边防堡垒的功能，其原因在于，这其实对它是一个不自然的功能，一个仅仅在紧急情况下才强加到它头上的功能。但是，当大运河在 13 世纪战争期间被滥用之后，扬州作为一个贸易中心的功能也受到严重的损害



扬州慢

淮左名都，

竹西佳处，

解鞍少驻初程。

过春风十里，

尽荠麦青青。

自胡马窥江去后，

废池乔木，

犹厌言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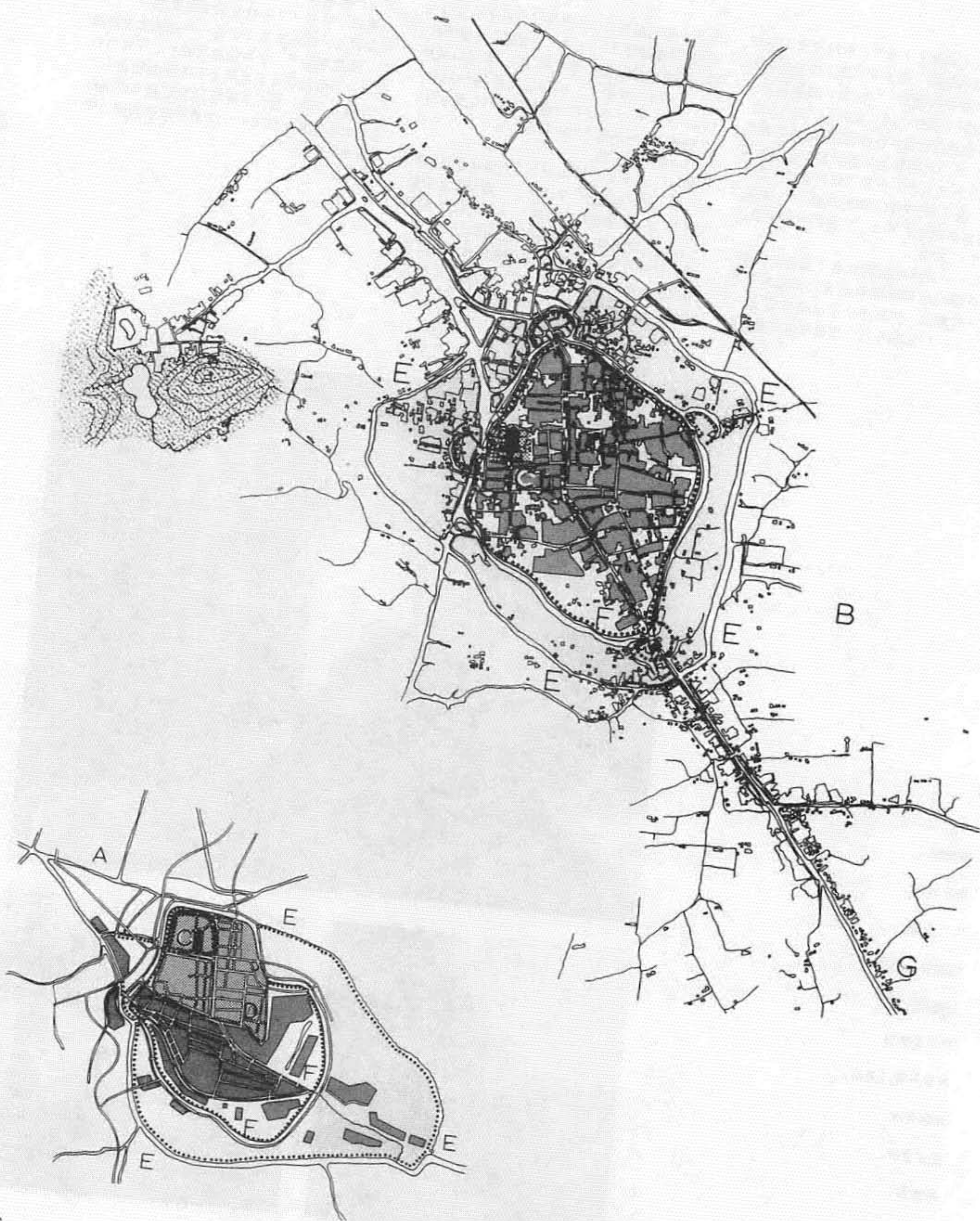
渐黄昏，

清角吹寒，

都在空城。






E
E
B
E
E
F
G
A
E
C
D
F
F
E
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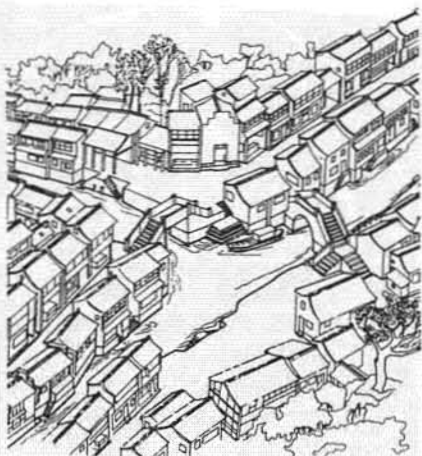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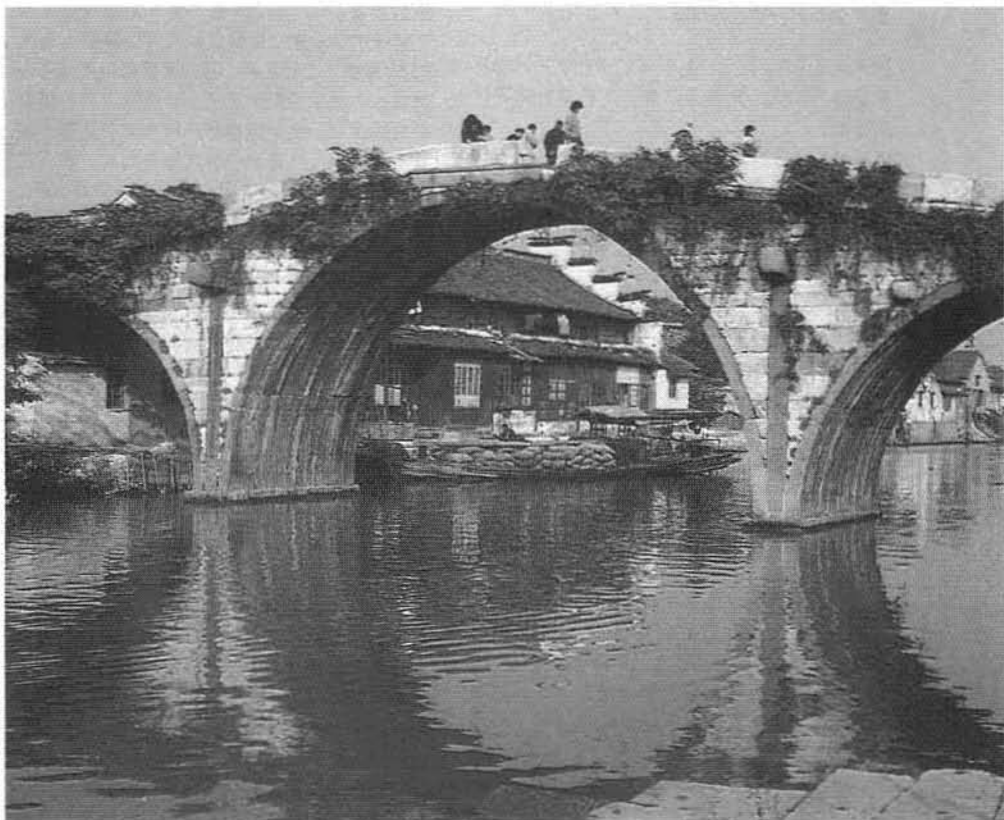


图 4.1.2.20，21　大运河上的两座城市——江苏的无锡和常州，比例 1 ： 40000。引自 1929 年地理调查的地图，比例 1 ： 10000。
大运河的江南区段在 610 年建造时，无锡（B）和常州（A）这两座城市，沿着运河各自在其更早些时旧的行政中心附近发展了市场街道（C）。879 年黄巢起义之后，当时整个区域都荒废了，而常州的府城恢复得很快。892 年，府衙建筑群被加了墙体（C），墙体为 2 里 318 步 2 丈 1 尺长。如果将这一清代的度量转换成唐代的小度量单位，衙门建筑群也许属于一个覆盖一个 1 里见方的区段。20 年之后，在唐代末期的纷乱年代，内城（D）加建了城墙，它外面沿着运河的聚落成为一片郊区。城墙为 7 尺 30 步 2 丈 8 尺长，大约 4.3 公里，保护着官僚们的府邸，以及居住在府衙附近富商们的家庭。20 多年以后，935 年，在杨行密所建立的吴国（920–937 年）反抗晚唐时，整个大约 3.5 公里长的市场街聚落也被增加了墙体，长度 27 里 37 步 1 丈，大约 16.4 公里，这墙包围了宋代时期的外城（E–E）。大体来说，无锡（B）以同样的方式发展，因它仅是县衙所在，防御的考虑就少一些。然而，衙门建筑（C）在 1022 年重建，当时和平已经重现，整个大约 3 公里长的市场街道聚落由外部防御工事和城壕（E–E）环绕。与周围区域的其他城市一样，两座城市都在 1274 ~ 1275 年被蒙古人破坏。1369 年，明代建立者驱逐走蒙古人时，他命令重建城墙，但只是有限度地重建（F–F）。直到清代的后期，城市才沿运河发展了新的郊区。其时，无锡的市场街道（G）延伸到 5 公里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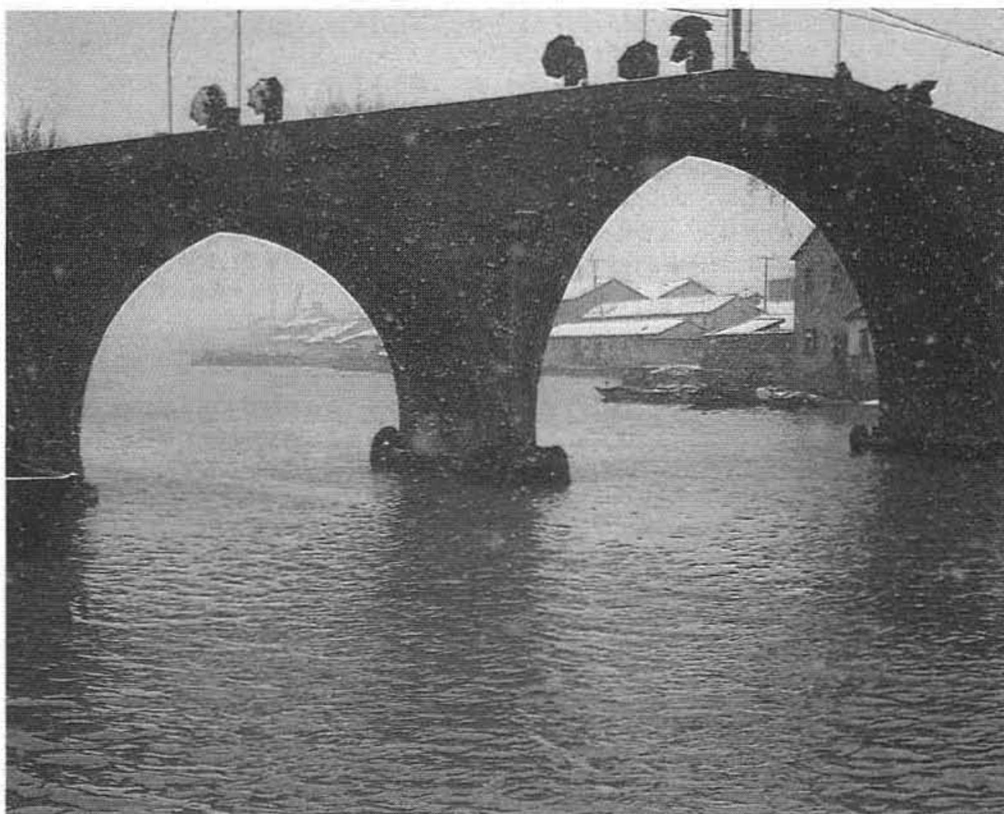


图 4.1.2.22–24　因为市场街道聚落在大运河的两岸发展起来，就必须建造桥梁连接聚落的两个部分。为了让运河上的大船通过，这些桥必须是大而高的结构。因此，很多在唐宋时代建造的桥梁都具有宏伟美丽的结构，它们也履行了超过长达一千年以上职责，例如这座松江城中的桥。松江城是上海和奉贤以南的州府，太湖东南方另一座市场城镇，那里有时在 1 月份下雪。至于典型的运河中心区域城镇，可参照江苏苏州西南的木渎小城的绘画

图 4.1.2.25–27　苏州城

图 4.1.2.25　宋代一份最有价值的有关城市历史测绘和制图，就是平江图，平江即当时苏州的名称。
这幅地图 1229 年刻制于石碑之上，存放于苏州文庙中得以幸存，至今依然可以获得拓印。石碑原物的尺寸是 5 尺 ×10 尺（1.35 米 ×2.70 米）。为了表达当地居民和知府李寿朋对于皇帝宁宗（1194–1224 年在位）的感激之情而刻制，因为皇帝出 300000 两银子建造新的城墙。金人 1127 年彻底毁坏了旧城墙，这片废墟留置长达 50 多年。这张地图上所显示的城墙和城市是基于毁坏之前旧城墙的路线以及城市的布局。该布局自城市在公元前 5 世纪成立起，几乎没有改变地生存下来（也参见 2.3.6.13）。只是城墙的路线在某种程度上被修正。这发生在 875 年黄巢起义后城墙的重建。这时的城墙包括了沿着大运河西北的郊区，因此形成了后来所称的"牙齿形城市"。该墙一直存在到 20 世纪中期。据记载，城墙内区域为 9 里 ×12 里，以小的宋尺计算，因为这和原来布局中使用的旧周尺在规模上相等，所以南北之间的距离正好是 12 里。但是有 1 里被加到东西向的度量尺寸中，原来的 8 里扩到 9 里。宋代的报告中也谈到了四条主要河渠贯通城市的南北，而三条连通东西，有超过 300 条街道，其中很多与小河渠结合。
正如以上所描述的（图 3.1.2.13），中国的测绘者们在公元前 2 世纪就已经能够绘出按照比例的准确地图。在很少留存至今的地图中，这幅平江图是一个稀有的例子，展示了 13 世纪的城市地图是什么样子。它通过测绘，并以一个计划好的 5 英寸为 1 里（小里）的比例绘制，就是说比例为 1：3000。但是，一个详细的研究表明，地图的中心部分包括了吴王阖闾原来的宫城（公元前 5 世纪），即宋时期由市政和军事治理所占用的部分，以 1：1500 的比例绘制，是其他部位的两倍大，这使地图的边缘显现出某种压缩的痕迹。但是，至少从帝国官僚的角度，这图根据城市的重要程度显示了它们的不同部位。
不管怎样，它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在 12 世纪以前所出现的最为准确的城市地图。马可波罗描述了地图被刻制大约 50 年之后他所见到的苏州，并记述苏州人以贸易和手工艺为生，以金或丝来制造衣服。城市的围合如此巨大，有 40 里周长。如此众多的人生活在其中以致于无人知晓其人数……他们是聪明的商人以及精明的手艺人。当然，也有被称为圣人的大智慧者，就像我们的哲学家和伟大的自然学家，他们非常懂得自然……在城市中有将近 6000 座石桥，在石桥的很大的一部分下面，两三只大帆船可同时通过。
只是为了表明"很多"，陪同马可波罗的中国文人们也许以典型的中国方式模糊地说，"两到三千"座桥，马可波罗大概就理解为精确的"两倍于三千"座桥。但是，正如当代文献所记，桥的数量由 359 到 398 座不等，地图据说显示了其中的 295 座，虽然目前只可以辨别出来大约 65 座桥。无论如何，苏州无疑是一座运河边的城市，或以我们的说法，一座运河城，是像上海或汉口、杭州或扬州一样市街的延伸。就我们所判断，从最初的时代就是如此，因为它奠基时的报告就记载了八座陆门，八座水门。八座门所形成的每一组都与"幻方"概念相关，虽然，西面和北面的运河似乎更为重要，将城市与太湖连接起来，而且很可能直通海上的船运，后来变为长江出水口的南岸。这两条运河也许已经为布局形成了基本的元素，而南北运河，在整个历史过程中，都作为苏州主要的干线，它也许应被认为是市场街道沿运河发展最为古老的实例，是许多中国南方城市聚落的范本。
宋代重建和重塑了许多城市，但似乎再也没有建造一座完全依据自己的设计和预先策划布局而建造的新城。苏州同样如此。当时看上去规划良好的城市，至多能做到的就是对许多旧元素（比如：运河、街道、建筑、纪念物和家庙等）有秩序的重建，从而形成一座在现实生活中被唤作新城的庞杂结构。而且这新城的重建在极短时间内进行，处于具有能力的官吏持续的指导之下，并依靠了政府经费的支持。当我们将此图与一张现代地图进行比较时，很明显，城墙内部聚落区域的模式如此规则并组织完善，这只能是复杂的规划，及对最为细微的细部调查的结果。但是总体的布局，不同功能的元素和区域的结合，还有不同类型的土地使用，正如图所显示的那样，应该归功于公元前 5 世纪这座城市最初的奠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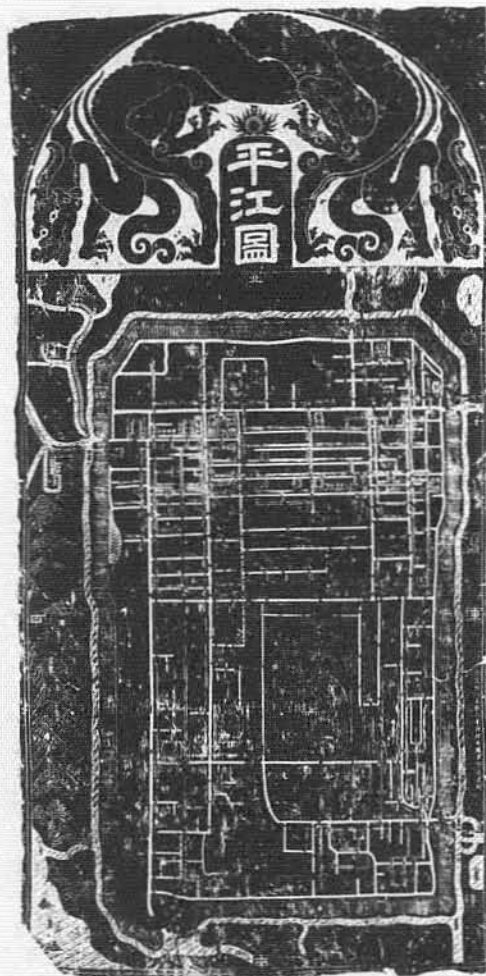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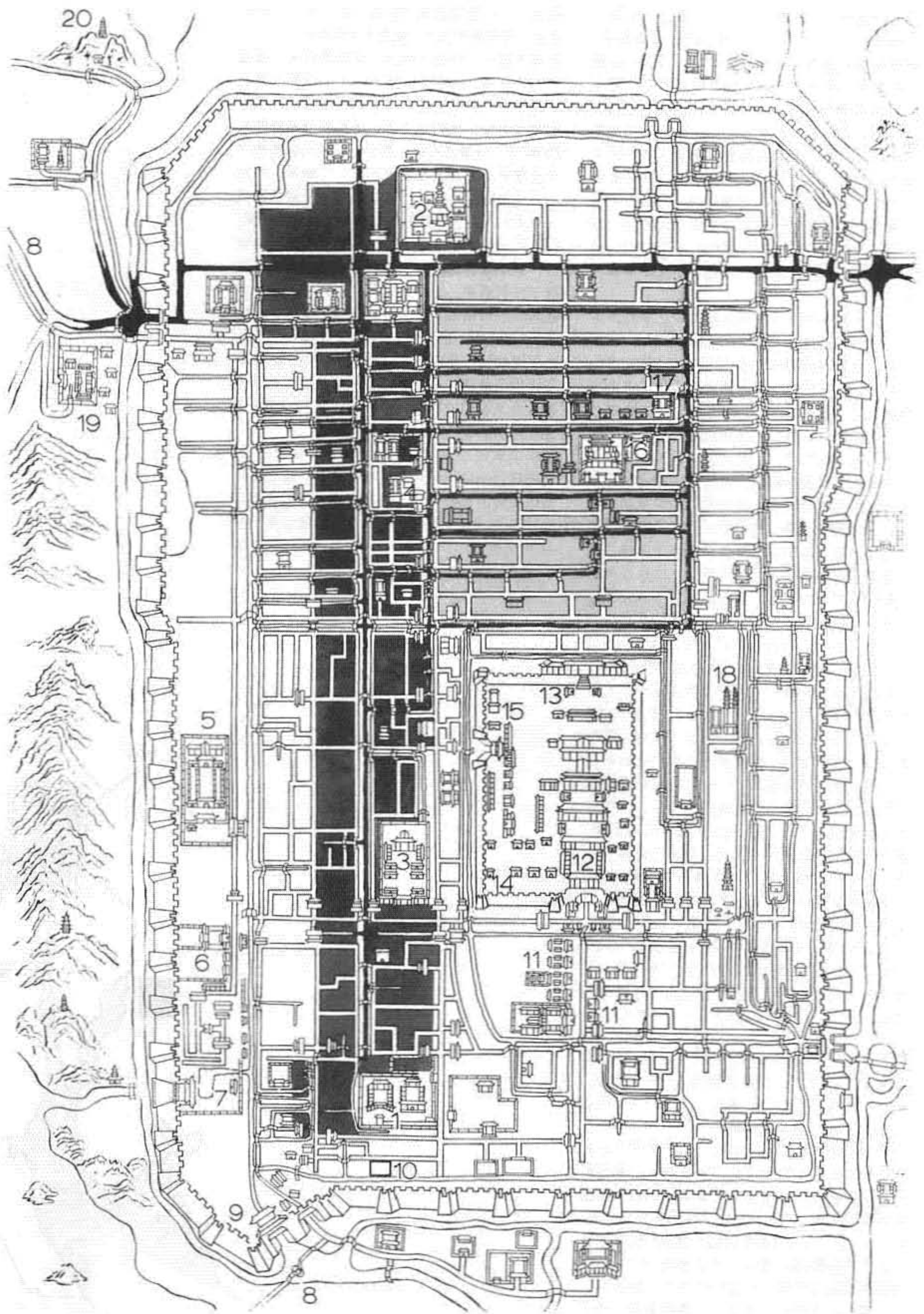


图 4.1.2.26　地图，比例 1：20000。
布局有三个主要元素，沿着运河的市街贸易中心、宫殿以及居住区。看上去，最初的运河也许已经连接到虎丘，这是该地区最古老的丘陵文化聚落，南城墙以南 3 公里的地方为太湖。这最老的运河东部，在其两侧发展了市场街道，并建造了另一条道路，即是所谓的"护龙街"，是城市有机组织的精神脊椎。在南端的孔庙（1）被认为是头，在北端的塔（2）被认为是尾。美丽的九层高塔（70 米）坐落在公元 3 世纪的报恩寺之内。文庙建于 1034 年，[1] 本塔是 1162 年重建的，两者都被整合到布局当中，塔作为一个集中景点，被置于街道的轴线处，这样它成为整个区域的地标。这条街和运河市场街道之间的空间建筑群里有好几座公共建筑，例如，仓廪（3），在那里粮食可以直接从大运河下载；城市所属的吴县衙署（4），还有几座庙宇。在大运河西边是另一座运河——市场街的元素，它原来是最老的吴县布局的西界，而且以前曾是老护城河。1229 年，这座运河的西边建有一座大建筑物，里面有贡院（5）、盐管局（6）、巡官行舍（7）。这些官员们通过大运河到达（8），由南水门（盘门）进入城市（9）。文庙的南部是先农庙？（10）。在那里，由县官来代表皇帝举行春耕圣田的献祭仪式。

1 译者注：范仲淹任知州时在五代吴越钱氏南园旧址创立。范仲淹改革旧制，首创以官学与祭祀孔子的庙堂合为一体的左庙右学新格局，故有"天下有学吴郡始"之说。此制后为各地效仿。


20
2
8
19
17
16
4
18
13
15
5
3
12
14
6
11
11
7
1
10
9
8

宫殿群是布局中的第二个主要元素。它坐落在市场街——运河一带的东部，自身有墙围绕。墙高和墙厚皆为 7.3 米，1229 年被用作平江府和衙署区。县官在南宋时代有很多职责，因此有许多帮助他的多职能部门机构坐落在内城，其南面在两侧沿大街排列（11）。大街的功能颇似御街千步廊，拜访者沿着这条街到达三朝大殿主殿（12），而县衙已经移到农业坛北端最后的建筑物文渊阁（13），其在城墙的顶部，可以俯瞰整个城市。建筑群的西南角是城隍庙，那里祭祀着与县官府精神上对等的人物（14）。西北角，县官和其他官吏们通过箭术比赛修身养性（15）。

最后，布局的第三个主要元素为居住部分服务的运河与街道体系。最为有系统的部分，位于中央商业轴线两侧的政府衙门建筑群的北边。一系列东西平行的街道，通过相应的门进入各自的家庭。房屋的北端是一条小运河，提供了进入住宅后门的路径。在那里，每日生活的必需品通过船运而来。以此方式，运河和街道两个体系因着交通运输的不同模式相结合。正规的方式是从南边进入，旅行者骑马或乘轿，通过陆路或通过运河上的船只到达，而非正规的入口在北边。这种功能性的体系最为便捷，而且再现了城市居住区设计的极致，比过于拥挤的都城杭州更为舒适。只有几座庙宇和公共建筑坐落在这些居住区中，最为重要的是真庆道院，后来被称为玄妙观，它最先兴建于公元 3 世纪，是市场庙会、夜市、节庆以及游行的中心，与都城汴京（开封）的相国寺非常相似。它依然是现代城市的市场中心（16）。这座庙宇的东北是常州县（17）衙署，常州是紧邻城市以东的县城。这些城墙，皇帝曾经捐献了建造的款项，带有碉堡，非常坚固，有很宽的城壕护城河围绕，并且具有五座双重的水陆门。虽然并未在 1229 年的地图上显示出来，我们可以假定，这些门由碉楼所保护，正如在后来的绘画中所显示的那样，具有宋代防御体系的典型形状。整个蒙元时代，城市依然保留 1229 年地图上所显示的那样，也是这一地区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因为当时，周围大多数其他城市都被毁了。但是，1367 年，明代的建立者因为该城不是封邑，毁灭了中心区域的宫殿，这个地段再没有建造新宫殿，双塔（唐代，18），寒山寺（19），虎丘（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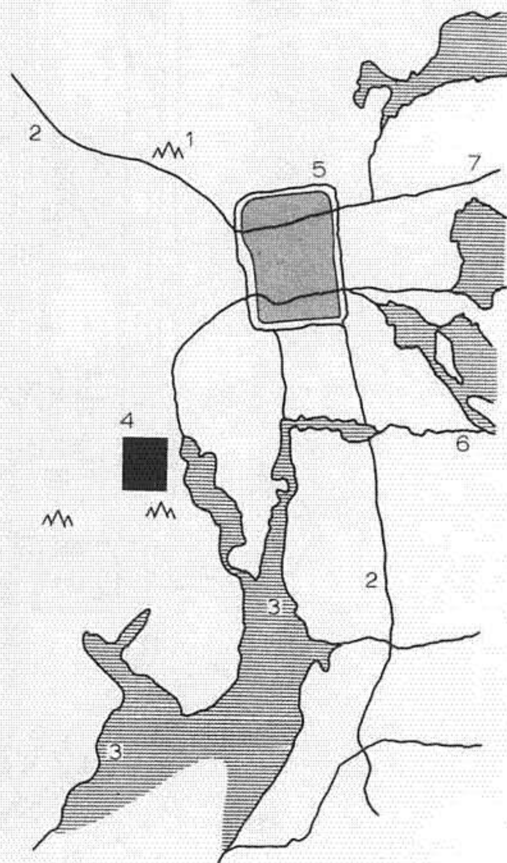


图 4.1.2.27 苏州地图，比例 1：250000，地图显示：1- 虎丘（最老的聚落）；2- 大运河；3- 太湖；4- 新城；5- 老城（旧城）；6- 到上海的水路；7- 通海的水路

文帝 581 年建立了隋代以后，长江南部流域的战争和起义持续不断。550 年，东魏的一名将军侯景已经将苏州城摧毁，并且灭绝了这个地区所有的老家族。苏州有好几十年都未恢复过来。590 年，起义又毁了整个地区，但是，文帝派遣他的大将杨素（参见图 3.3.3.2 和图 3.3.3.5），成功地镇压了反叛。在这一情形下，杨素得了个印象，苏州是一片废墟，不值得重建，他上奏皇帝，在废墟西南 9 里山峦的东部近太湖处建造一座全新的城市。建造于 598 年动工，不久，新城市就被一群新人所居，伴随着极少的废墟中的幸存者。近湖处的场地，为了在其上建造一座新城，必须以硬木打桩加固基础，当杨素问建造者们，他们回答说，这种基础将持续大约 40 年，杨素回答说，那很好，因为城市也不会比那存在更久。在唐代的第一个时期，苏州的废墟被渐渐地清除，新建筑物在老城墙区域内建造起来，这些新的活动吸引了新城的居民，到 624 ~ 626 年，几乎所有人都移入苏州老城区，留下废弃的房屋，自行彻底地崩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种行为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苏州的战略力量，因为它已经多次作为分离者的叛乱基地，使隋代皇帝已决定毁掉它。然而，为了保持这一达百年之久的经济中心，必须要在该地区建造一座新城。虽然这在当时显然不被认为是最后的决定，它被称为平江，等于平定江苏的意思，名字表明了原因。

类似的案例是 979 年宋代初年晋阳城的毁灭，它同样由一座新城代替，称为平晋，建造在晋阳城废墟的东部，并计划取代原先晋阳城的行政和经济功能。但是，它也没有持续多久（参见 4.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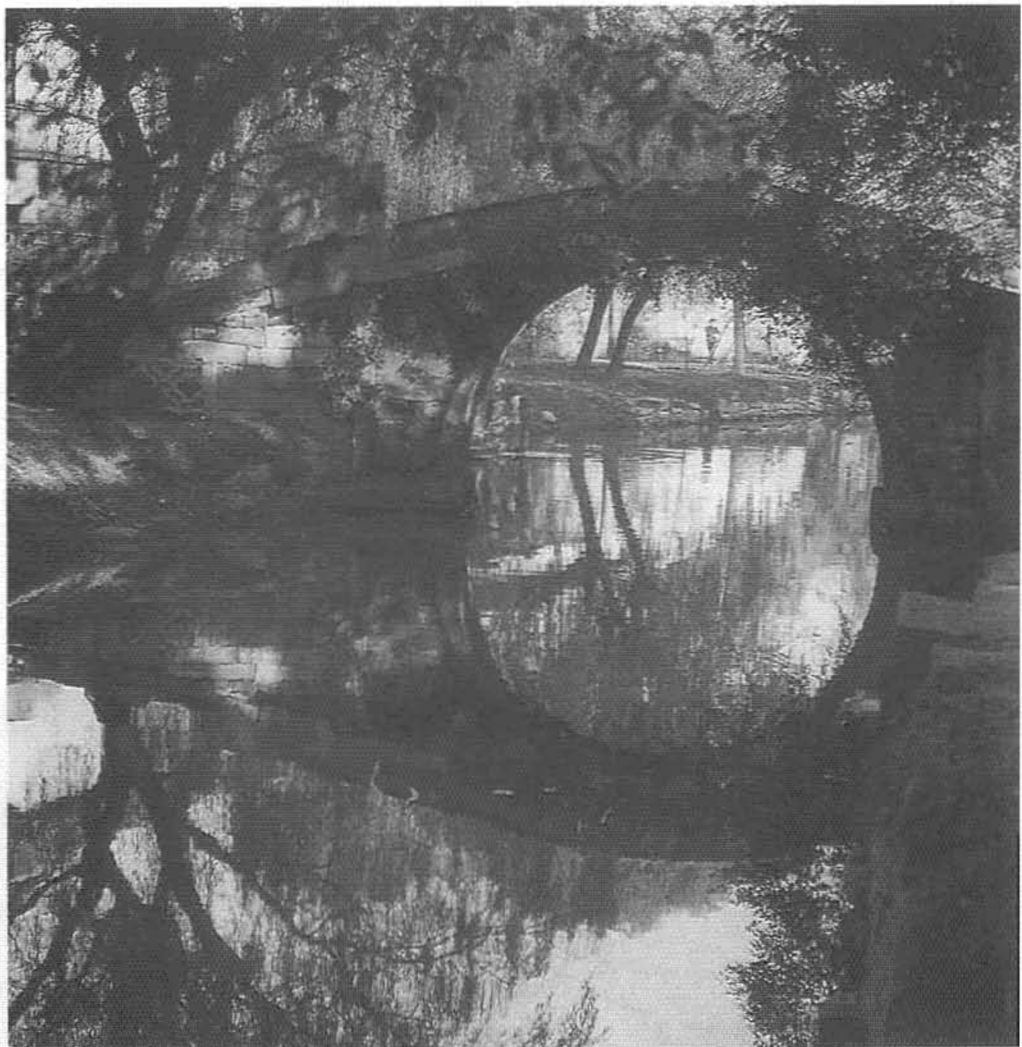






图4.1.2.28 江苏苏州西北角的双门，晚明所绘。引自袁尚统（1570–1660年）[1]1646年所绘的画轴《晓关舟挤图》。
这里，西北的水门刚刚敞开，一位官吏正准备驶船出发，而一群船只正试图驶入。城市在晨雾之中隐藏，只有一座塔耸立在远方

图4.1.2.29–31 江苏苏州的小运河和桥梁

图4.1.2.29 该桥是典型的居住区中运河上的小桥，刚好高到允许驳船通过

图4.1.2.30 左边是一条街道，有正式的路径通往居户，右边是运河，用于运输大量的生活必需品和家庭必需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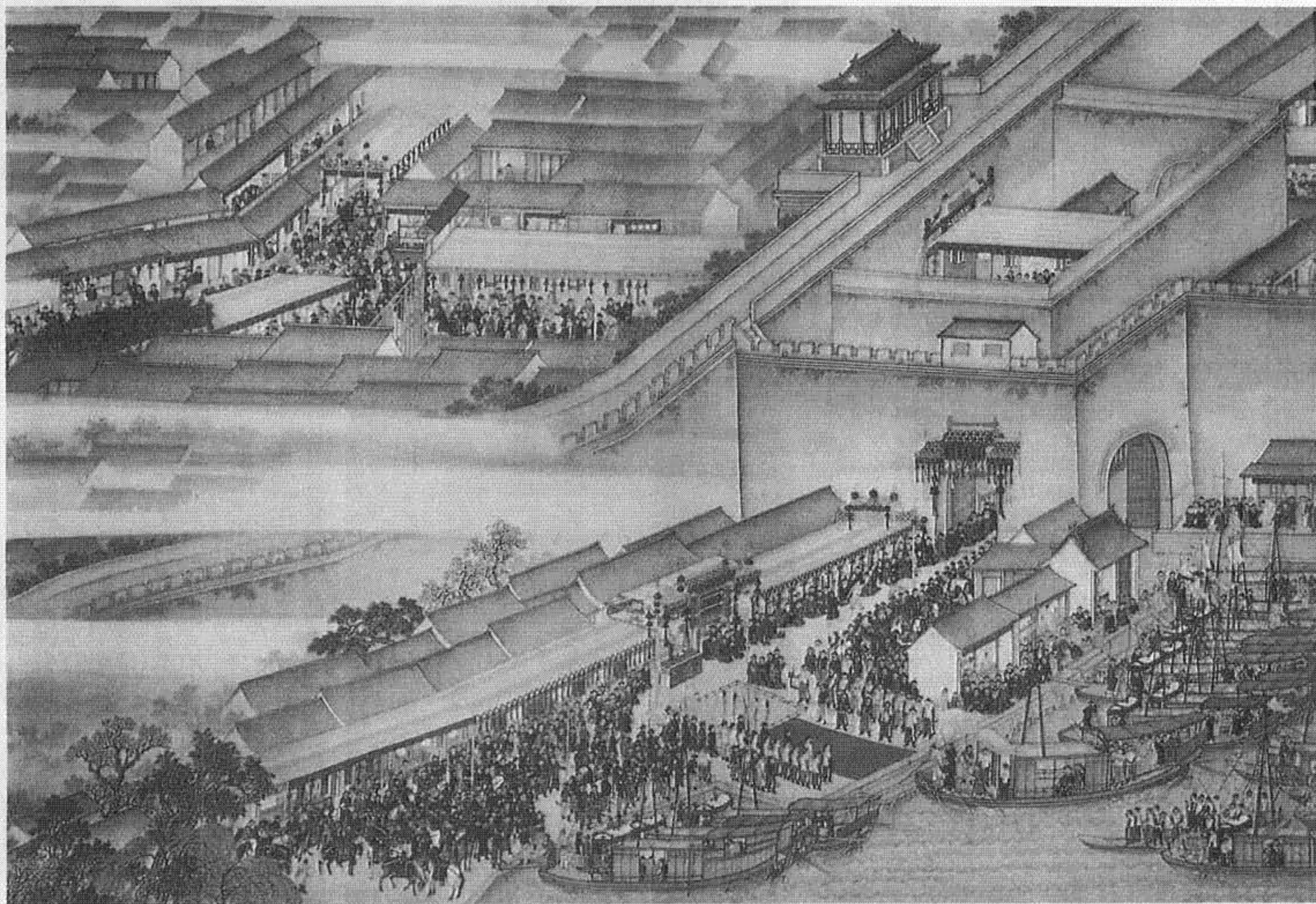
图4.1.2.31 交通繁忙的大运河之一，两侧有成排的商业建筑物

1 译者注：寒江独钓图轴为画家的条绘。

图 4.1.2.32 苏州的双重南门，右边有箭楼和一座穿过城壕的小桥，左边是带有登陆平台的水门，选自宫廷画师们在著名画家王翚(1632—1717 年）指导下，所描绘的关于 1689 年清代康熙皇帝南巡的卷轴画《康熙南巡图》卷七，皇帝刚刚乘船抵达，当地的知府及其手下的官吏们在南水门登陆平台上接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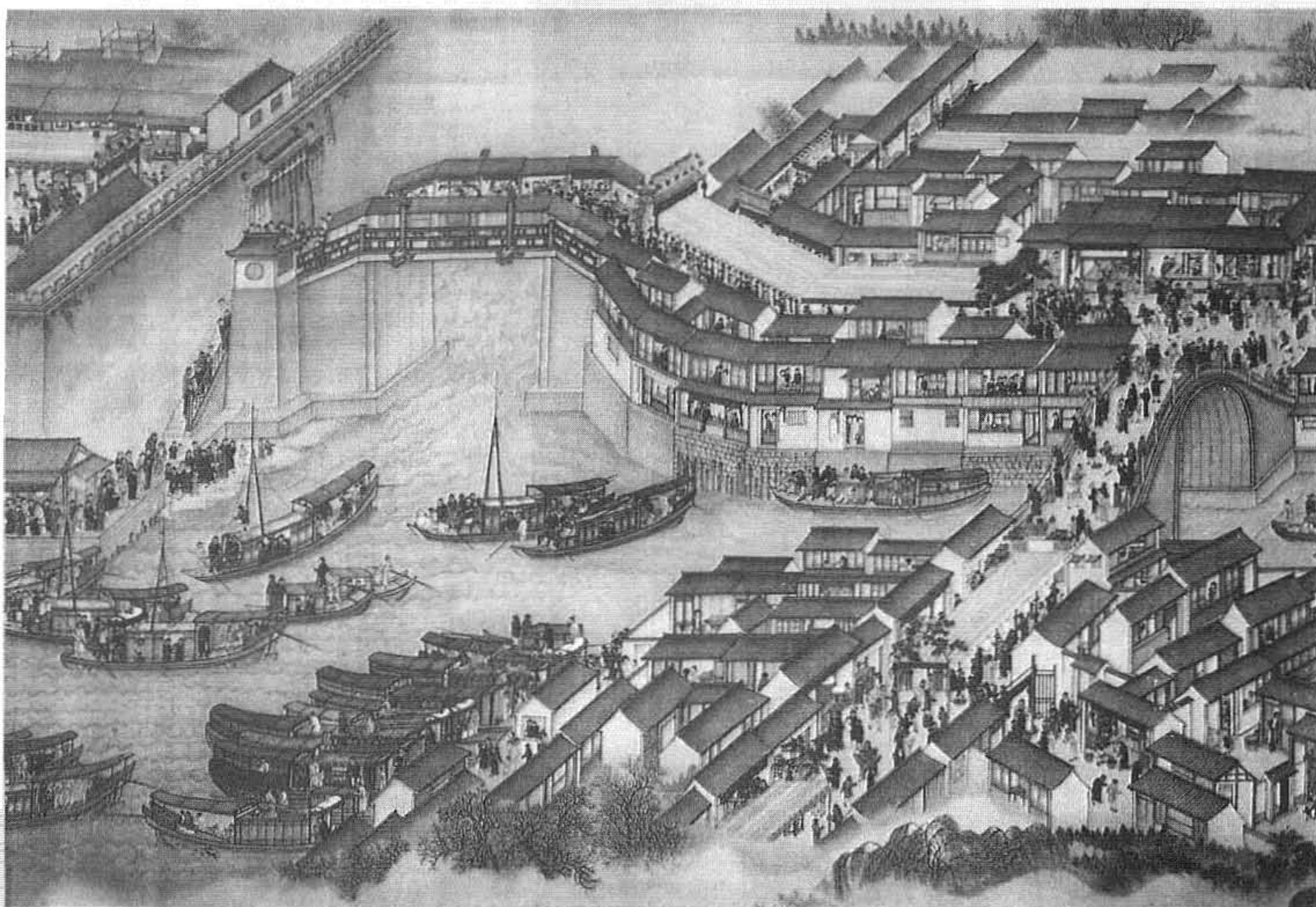
图 4.1.2.33 今日苏州水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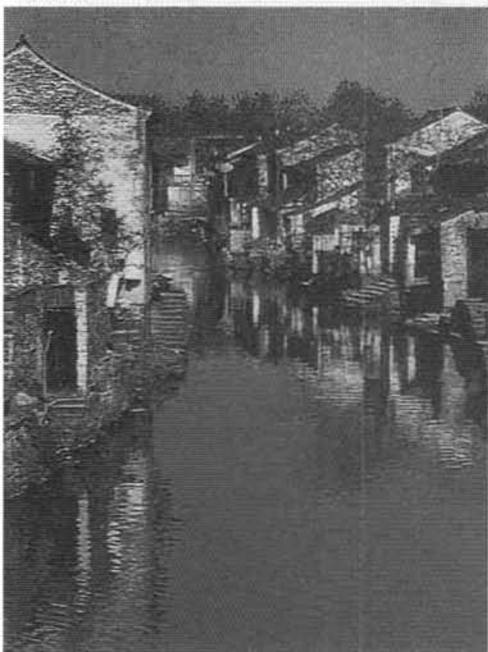
图 4.1.2.34 江苏苏州的北塔，最后一次重建于 1582 年，耸立在城市的主轴线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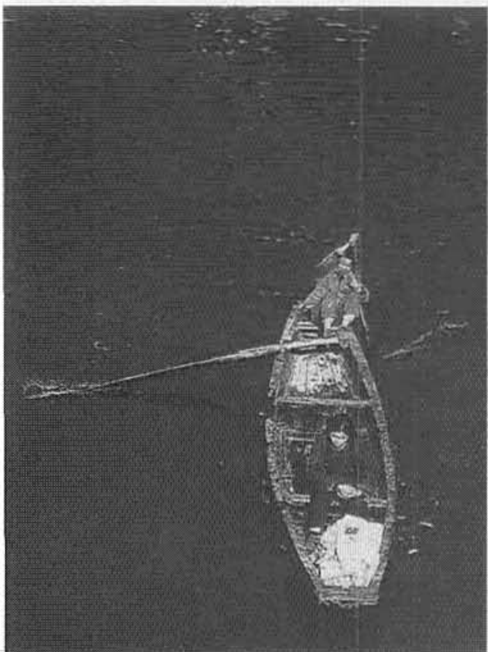




图 4.1.2.35、36　浙江绍兴北部居住区的小运河之一。

每座房子都有登陆平台及踏步。最初这些运河上的交通大多靠小船完成，以双桨驱动，一边由腿划行，一边靠手臂，是这一地区的专门做法。就像可供出租的水上的士那样，人们不但可在城内随意移动，还可到城外别的地方

图 4.1.2.37　浙江绍兴著名的 8 号桥，建于 1256 年，每边有一些踏步，在街道之间非常有限的空间里，既便于行人，又为驳船提供了足够的高度通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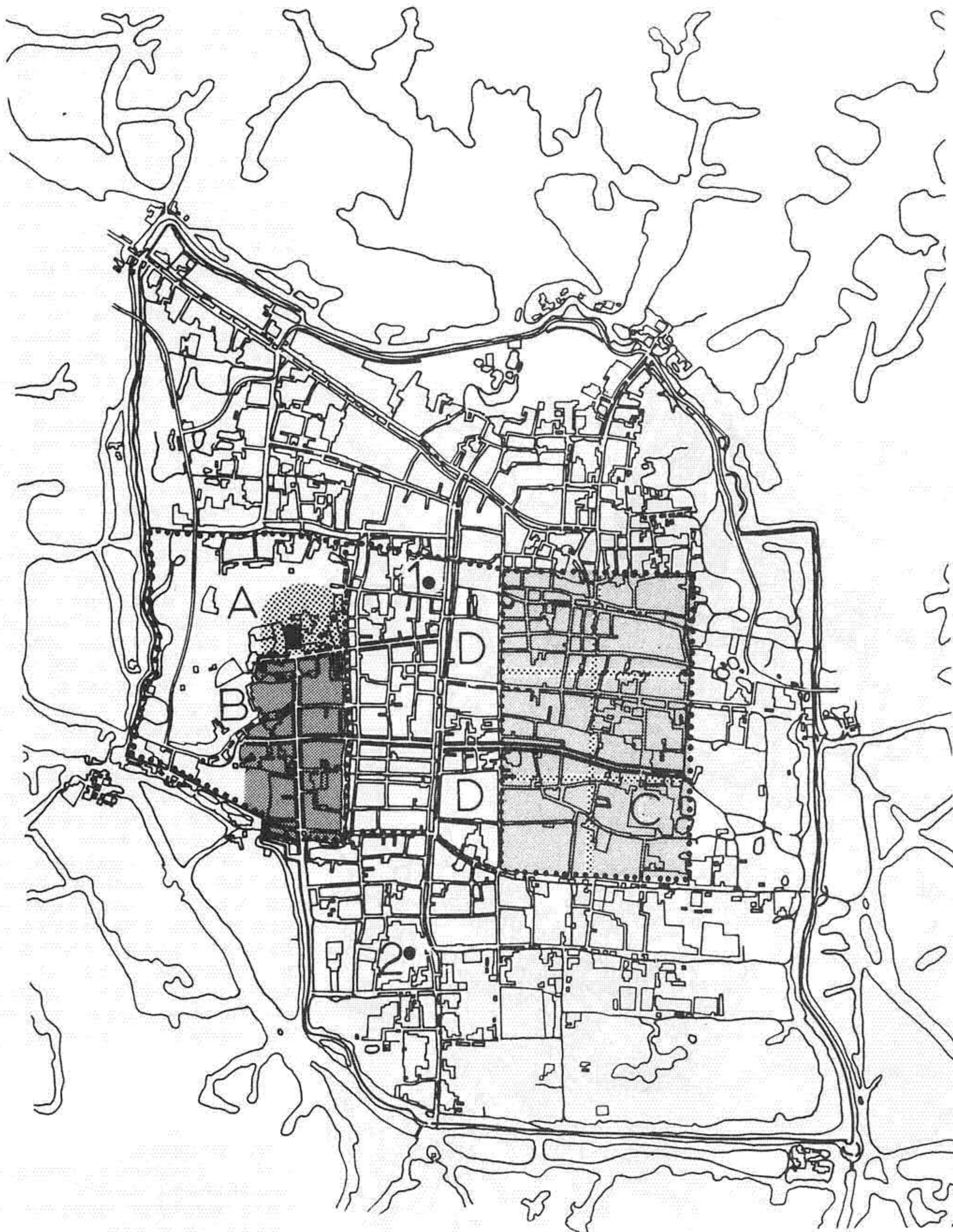
图 4.1.2.38　浙江绍兴城，背景是浙江北部典型的景观，群山从平原升起。直到公元 140 年东汉的洪水治理和灌溉工程的实施，这些山川才得以安定

图 4.1.2.39　浙江绍兴城，比例 1 : 40000，基于 1979 年复原的现代地图。

正如已经图 2.3.6.17 和图 3.1.4.3 所提，绍兴城最古老的部分是一个被称为"越王台"的地方。这是一座公元前 5 世纪越国建立的小城，在龙山山脚（A）。

东汉时代，在城市北部平原上兴建了复杂的灌溉和洪控系统之后，"越小城"迅速发展，聚落区域延伸到台地之南的平原，并以旧的中心作为行政衙署所在地（B）。汉代之后，长江以南，人口迅速增长，绍兴发展成为仅次于都城南京的城市。那个时期（353 年），著名学者王羲之（321–379 年）在城市西南建了兰亭。正如我们在 3.2.10 所提，隋代 605 年之后，老聚落以东，另外增加了一块由城墙包围的约 2 里 ×3 里的区域，这时的城市被称为越州，即越州府中心（C）。整个唐代，这种双重城的格局保持不变，但在两条城墙围绕的区域（A、C）之间，运河和市场街道元素在早于 504 年就已经建造的大善塔之南（1）发展成主要商贸区（D–D）。宋代初年，这个位于中心地带的商贸区，被（点画线）将两座老区（A、C）连接起来的围墙纳入围合的城区。

南宋时期，绍兴成为皇帝的次都，1187 年，他们在城市的东南建造了帝陵区。最终，里面共有六座陵墓。城市增大了，带上新的城墙，估计几乎相当于今日城区的规模。看上去，在扩建居住区时，有过一些扩建成规则性的意图，其中建立起来五个街区，共有 91 个街坊行政区。高宗皇帝（1127–1162 年在位）统治时期之后，这个府被称为绍兴府。三个功能区域清晰可辨：旧城区的行政中心（A 和 B），两座塔之间沿着大运河的商贸区（D–D）［南边的塔（2）于 1004 年建造］，以及围绕隋城镇（C）的居住区。居住区中有些部分，像苏州的居住区那样，通过运河和街道结合组织。以此形式，这座城市一直良好地维持到 20 世纪


A
B
1
D
D
C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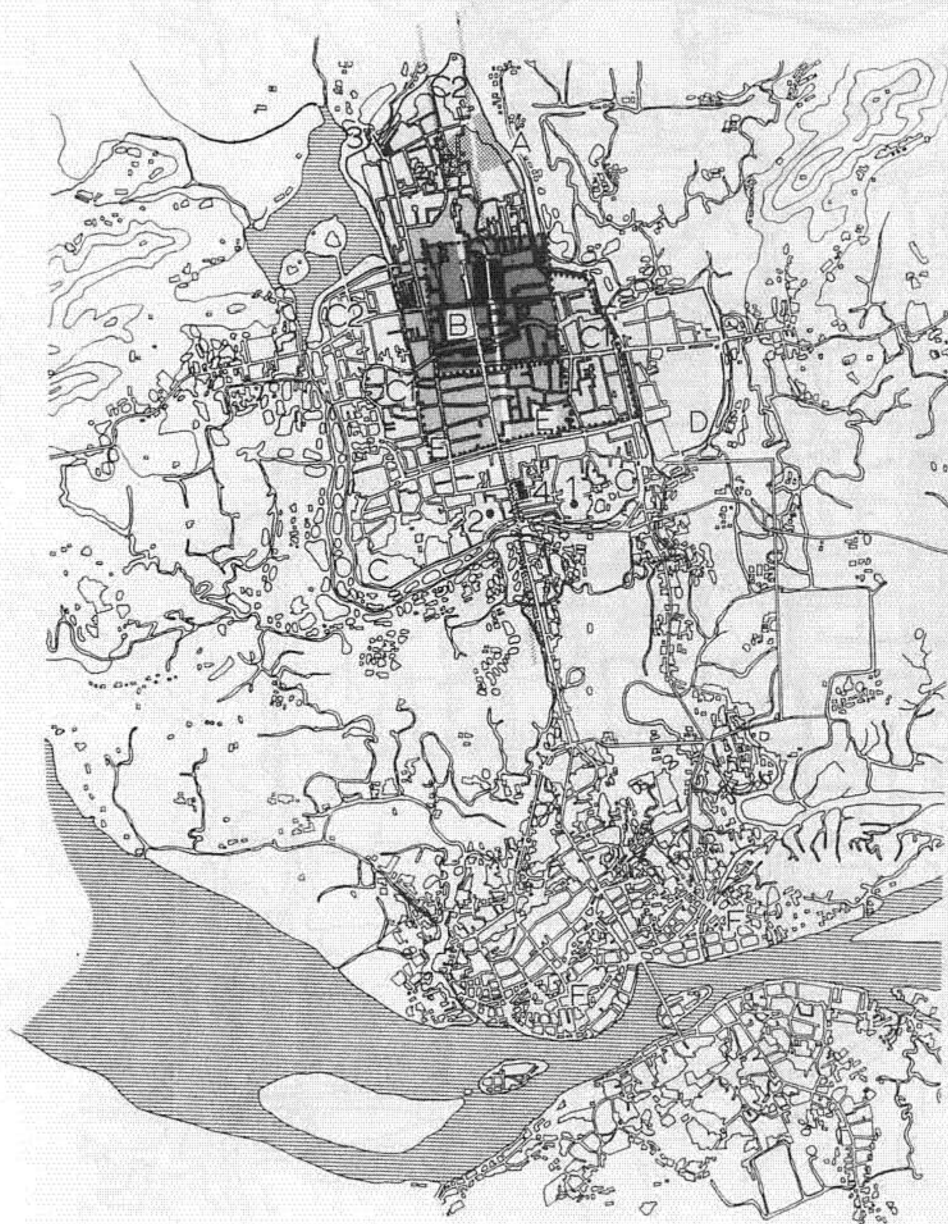


图 4.1.2.40 福建省省会福州，比例 1：40000，基于 1939 年所绘的地图复原。

公元前 202 年，根据传统，由闽越的统治者在现代城市北部一座小山[1]一带建造了冶城。正如名字所示，它是一个像南京一样炼铁的地方，南京的旧城区部分曾经也称作"冶"(A)。[2]

公元 282 年，西晋（266–290 年在位）武帝统治时期，闽越开始建制新的行政体制，并且在冶城之南建造了一个行政中心。1754 年的福州志说，该城的城墙长 950 丈，要是转换成当时西晋的度量单位，估计各边是 2 里见方，即 415.8×2=831.6 米 ×4=3326.4 米 =950 丈，刚好吻合按清代的度量单位给出的数字，1 丈 =3.50 米。这座行政城（B）缓慢地发展，到了唐代的后期，它被郊区所围绕。这时，福州已经成为国际贸易航线上一个便捷的中间港口，而其他口岸比如广州的不好经验说明，最好要把整个聚落区域围上新的城墙。结果，于 901 年重建新的外墙，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夹城（C1）。不久后，在 908 年，另一座外城被兴建（C2），这包括南边的两座小山和北部的旧冶城，并称罗城，即外城。接下来的 909 年，闽王国以福州作为都城建立起来。在这繁荣时期，南边的两座山上分别建造了两座名塔：东边的白塔（1）建于 940 年，西边的乌塔（2）建于 941 年。[3] 更进一步地建造了两座寺庙，908 年在城市东部鼓山建造涌泉寺，965 年在旧冶城之西建造华林寺（3）。944 年，闽王国被南唐所控，968 年，新主人向东边扩建城市（D），并另有城墙围合。十年之后，978 年，所有的加固部分被宋代第二位皇帝太宗（976–997 年在位）所毁，也因此结束了该城第一个持续发展的繁荣期。

大约一个世纪之后，1069 年，在屏山以南建立了一个新的行政城镇，从那里开始，一条新的中轴线在有塔的两山之间向南延伸。该城覆盖了 2 里 ×3 里的面积（北宋的度量，1 里 =486.0 米）。在长方形墙体之外（E），郊区再次发展，并且在主轴线的东面建造了孔庙。更南边的闽江江岸发展了港口郊区（F）。1297 年，建造了一座石桥跨越闽江连接所有聚落。当马可波罗大约于 1290 年访问福州时，该城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口岸之一。他描述这里做着珠宝和其他贵重宝石的大宗贸易，这是因为来自印度的船只运来大量的商品……也出产丰富的蔗糖……这里有很多商人和手艺人。因为 9 世纪末广州被破坏以后，很多外国商人已经居住到福州，外国宗教带来很大的影响。936 年，在此建造了一座清真寺，几个世纪以来，它是摩尼教的中心

1 译者注：即今日福州的冶山。

2 译者注：关于南京冶城的设置时间颇有争议，盛行的说法是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所设置。

3 译者注：据译者所查资料：白塔建于 904 年，乌塔前身建于 791 年，937 年重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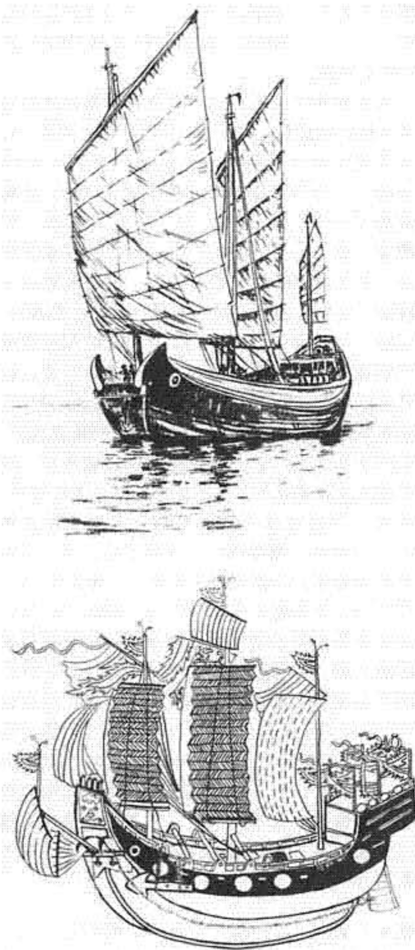


图 4.1.2.41 一艘福州桅杆平底大帆船，或者是木制货船，有三个桅杆。参照一幅李约瑟《中国科技和文明》中的照片绘制，4/29，Cambridge，1971，该航海船约 65 米长，底部水位线以上高 8 米

图 4.1.2.42 另一艘 1757 年出版的书中所描绘的远洋大帆船，给读者一个概念，之前的 5 个世纪，伟大的宋代港口城市里那些国际贸易路线上航行的船只，参见李约瑟书中的木刻，1971 年，Vol.4/29

域之中。这两个区域，也许就是以上意大利佛罗里州帕杜阿的鄂多立克（Odoric of Pordenone）所描述的 100 里周长的区域。100 年之后，同一个地区包含有 183330 个家庭，其中大约 75000 个都是在接下来的前 20 年移来的，说明因北方蒙古征服另一股移民浪潮，这将在大约 2000 平方公里的区域内，给我们带来大约 100 万的居民。当然，他们大多数居住在大都市区域里。马可波罗说，在一个较大的区域，大概是指在府城中，有多达 5 倍之多的家庭，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解释这一区别。无论如何，在中国的文献所记载之中的家庭肯定是永久地安居并且赋税的，因此，我们在假设一个更大的总人口方面也许是对的，包括所有那些非永久定居的人，以及所有那些免除赋税者。后者轻易地就达到了赋税居民的 2/3，几乎是整个家庭户数的两倍，其已经带给我们超过 330000 永久的居户，几乎达到 200 万人。

让我们对中国城市的基本特征给予一个最后的评论。这些中国的城市在宋代已经完全建立起来，而且有些一直持续到了 20 世纪中期。从中国人以及同样从外国人的清晰描绘之中可以得出结论，即在中国城市文化和中世纪欧洲城市之间有着一种非常紧密的相似性，也许仅仅在规模上有些变化。马可波罗，这个来自那个时代最为杰出的城市之中一个商人家庭的人，也许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但是，必须谨记在心的是，虽然在那个时期，欧洲城市和中国城市之间有如此明显的相似性，但其间最为重要的区别在于政治结构，以及因此政治结构在整个社会中发挥的政治作用。

始于周代，中国城市化的基本特征在封建层级社会延伸到最小的行政中心，进入到王室皇族官僚阶层的圣王、圣城的概念，就是古代王权神圣性质的表达。一旦政治力量发展到了像王权或甚至比王权更为强势，王国就已经变成为分崩离析为几个势力范围，一种新的政治结构出现了。这种新结构产生了多层面的城市文化，代表了古代的和中世纪的欧洲城邦。城市类型是那种具有一种多功能性的有相当规模的人口集中，而聚落结构的模式就不够正式而更为功能化。在始皇帝之下的统一帝国建立之后，这些城邦或他们的城邦统治者们失去了其政治的独立性，而且这些城邦也失去了其作为持不同政见者、哲学家、艺术家、诗人、行政管理者、教师、独立思想者和热爱创造性智慧的自由主义者们的港湾。不再有任何余地来进行关于政治原则或文化多样性观念的争论及公平的讨论。的确，无人能逃脱政治体系和政治力量，这也体现在一个单一的城市类型中，即王朝行政管理层级一部分的行政中心。过去，一个统一封建王朝结构的持续存在，焦点在惟一的、绝对的皇帝身上，使以往中国独立的城市发展成为难题。当封建王朝最终崩溃后，从秦始皇帝开始发展的体系和结构土崩瓦解了。因此新概念和新观念又一次地在一个多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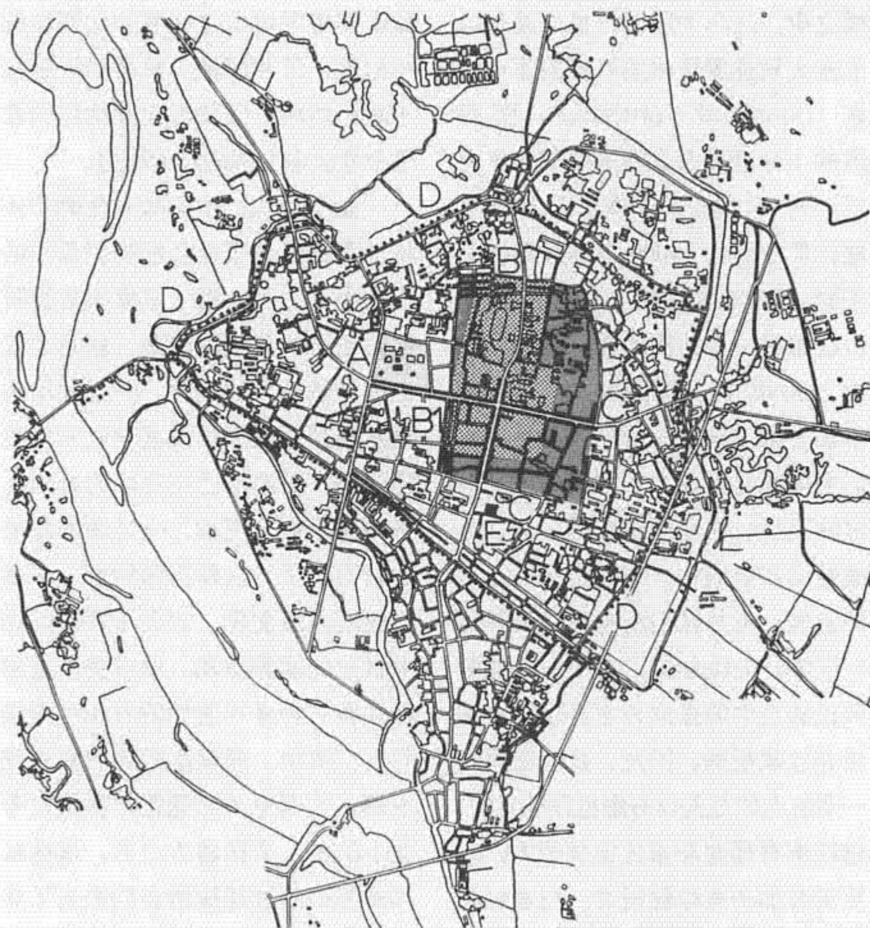


图 4.1.2.43 福建泉州市，马可波罗所称的刺桐，比例 1：40000，参照 1944 年和 1983 年所绘制的地图。

今天泉州所在位置，一个着陆和贸易口岸已经在 6 世纪被提到。686 年，开元寺在此建造，它后来成为一个重要的佛教中心。718 年，一个行政中心在附近建立，并在衙署区（B1）之南建造了一块 1 平方里的（B）圈地。906 年，根据宋 1 里 =554.4 米的尺度，内城的城墙记载为：长 3 里 160 步 =1958.9 米。这依然相当于城墙 4 公里长的唐内城，即那 1 里见方的圈地。同时，外城墙（D）被计为 20 里，但那是以唐代的度量单位计算，只相当于大约 9 公里。依然可以从现代的地图推算出这样的数据。然而，还有第三面墙，它也许是稍后一些时候建造的，长约 3.8 公里（C），环绕衙门以及唐内城。港口的迅速繁荣吸引了大批的外国商人来到泉州，并因此迅速发展了从印度和中东来的商人社区。1009 年，穆斯林社区建造了自己阿拉伯风格的清真寺。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清真寺（E）。1087 年，这里建立了（市舶司）海关。13 世纪，开元寺被重新扩建时，印度庙宇的柱子被用来扩建大殿，是印度影响此地的一个实例。寺里的两座塔分别在 1228 和 1237 年重建，以取代 865 年和 916 年的旧木构。意大利方济各会士约翰 · 孟高维诺（The Franciscan monk Giovanni de Montecorvino）在一封写于 1305 年的信中提到，泉州用一位亚美尼亚妇女提供的资金建造过一座教堂，这教堂用来作为大都会教区的主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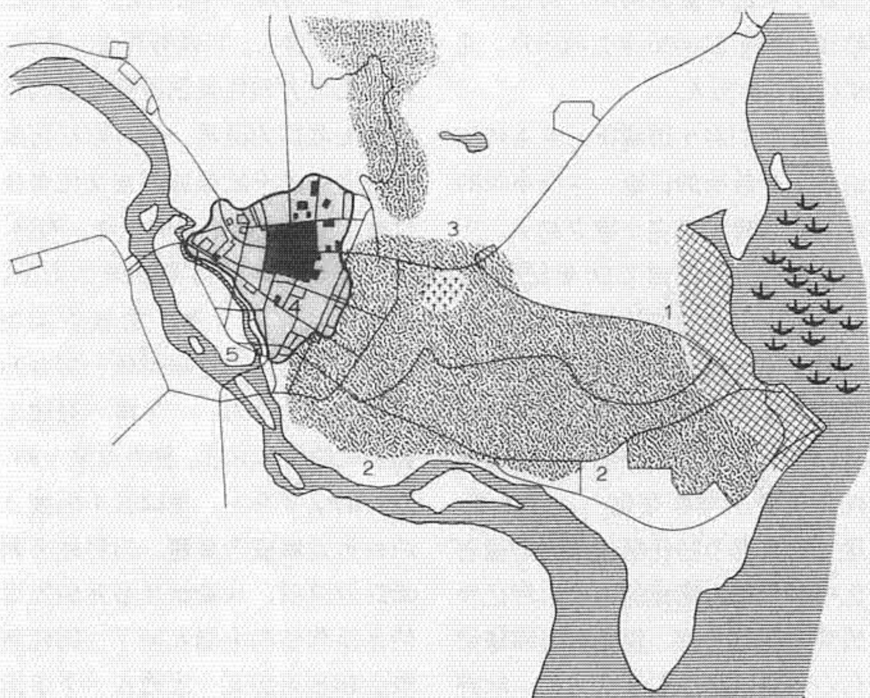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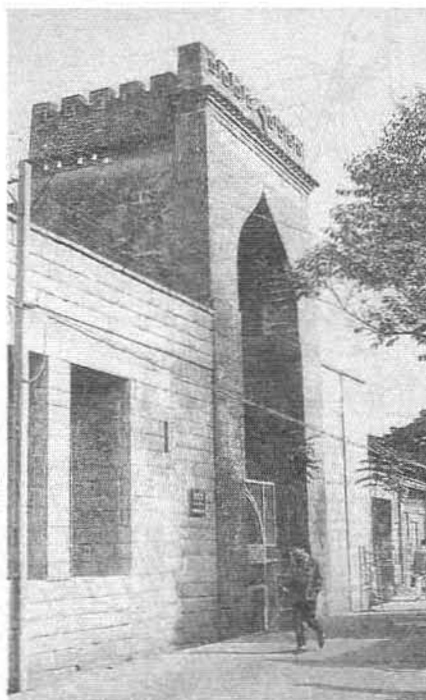
图 4.1.2.44 泉州城，比例 1：80000。

当阿拉伯旅行者伊本巴图泰在泉州的鼎盛期（1325—1354 年）参观该地时，他描述泉州港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或许是最大的。他看到那里有大约 100 艘大船，小船则无以计数。港口由海面伸出的一条大水湾形成，这水湾并穿到陆地的某处与大河相连。在这个城市，正如在所有的中国城市中一样，人们会拥有丰硕果实的花园和开敞的空地，在这花园和空地中间是个人的房产……因为这个原因，他们的城镇是广阔延展的，穆斯林居住在远离他人的区域里。

这描述如此生动，惟一的解释是那时的整个城市区域包括了港口，也就是武则天？后周时期的泉州湾（1）和今天的城市部分。9 公里长，5 公里宽的范围（2）。这个区域的西北有穆斯林墓地（3），里面有早至 7 世纪及其后的坟墓。穆斯林社团住在清真寺（4）南面的郊区（5）。城市街道网络的不规则模式或许也暗示着外国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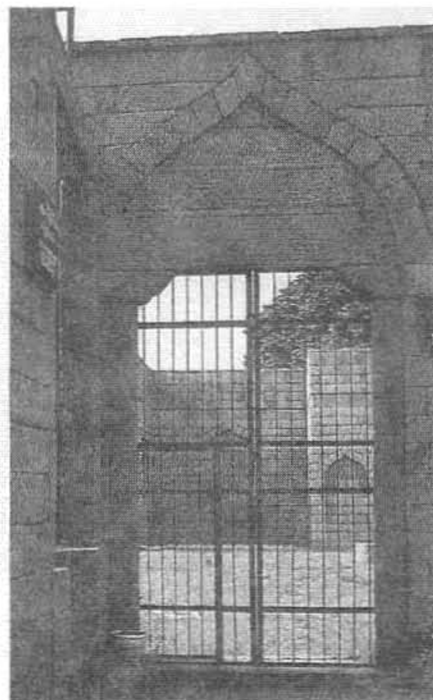


图 4.1.2.45 福建泉州开元寺东塔，865 年最初所建为木结构，1237 年重建为石结构，以屋顶下的悬臂细部模仿木构，高 48 米

图 4.1.2.46 开元寺主殿，初建于 686 年，宋代扩建，前面的阿育王塔（Asoka）建于 1145 年

图 4.1.2.47 福建泉州的清真寺，建于 1009 年，由从事贸易的穆斯林社团以阿拉伯风格建造，在入口大堂的上方，有一间为宣礼员而建的房间而非仅仅一座宣礼塔

图 4.1.2.48 福建泉州的清真寺，从祭堂到祈祷壁龛看过去的风景，朝向麦加，显示了测绘工艺的显著成就，泉州与麦加有同样的纬度，但比麦加偏北 30°，8300 公里，注意入口大门上方过梁上的阿拉伯文镌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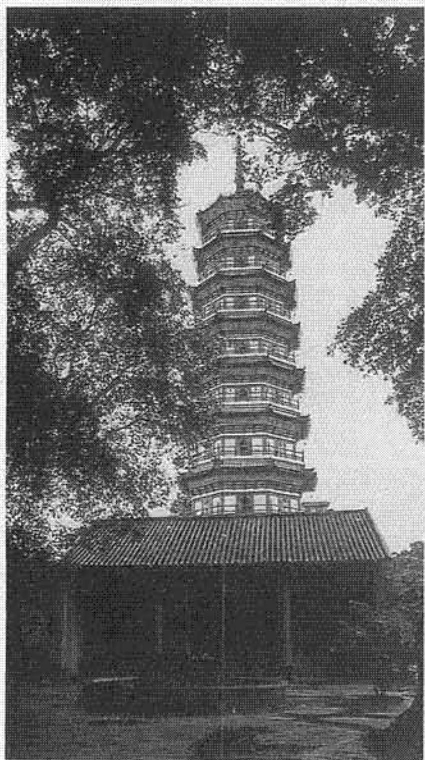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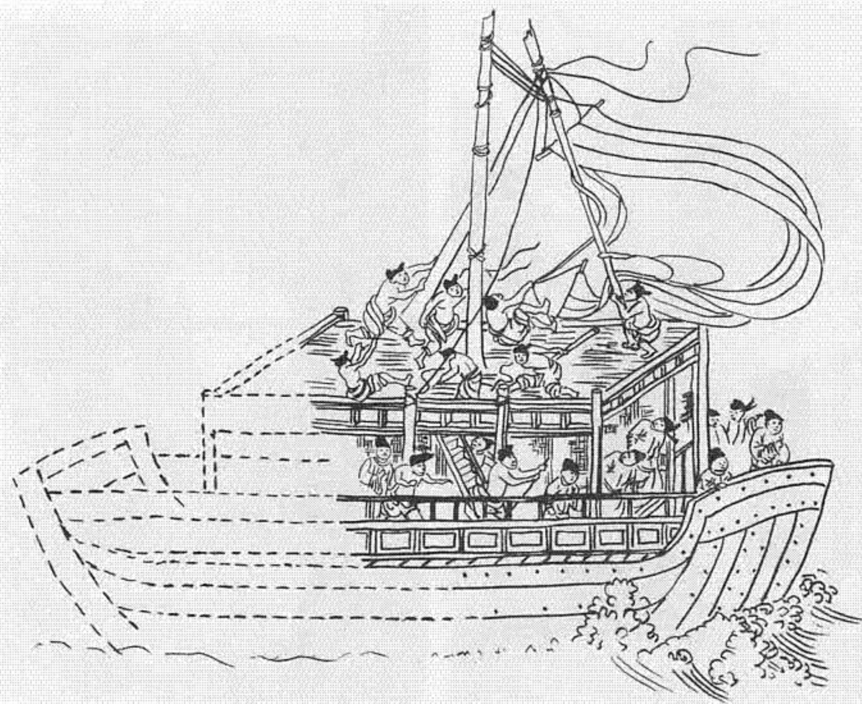
图 4.1.2.49 六榕寺花塔，1097 年重建成今天所见的形式。当时著名诗人和高官苏轼、苏东坡（1037–1101 年），被贬海南的两年之后北归路经广州，他亲笔在匾上写下了寺庙的名字。因为在广州压抑的气候下，他极为欣赏六棵印度大榕树的树荫，他称该寺为六榕，有六棵榕树的寺庙。佛寺中最有价值的物件一棵佛牙保存在塔中。印度僧人达摩 6 世纪在广州登陆时，住过这座佛寺，使其渐渐变成佛教禅宗的一个主要中心之一，也许是其中最为古老的一个[1]

图 4.1.2.50 山西繁峙县，岩山寺的宋代壁画，表现了在暴风雨中的一艘远洋船只。引自文物，1979/2

图 4.1.2.51 广东的广州城，比例 1 ：40000。复原图基于绘于 1928 ~ 1929 年间的地图中最古老部分。

中国南部的海岸陆地，最初由一系列部落占据。这些部落，汉人统称其为“粤”，这些人大概是史前期渔民进化的后裔，他们也许在挨近一些岩石的珠江北岸有一座市场。传说中这样提到，有五位仙人在此居住并变成了这些石头（A）。因为这些仙人据说身上带着五谷，而这些石头后来看上去也像羊，这个传说被解释为这一地区农业的开端，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式的农业。

公元前 214 年，始皇帝镇压了这一地区的部落之后，建立了一个被称为南海的行政区域，中心在番禺（B）。那里建有衙署机构，位于（上面提到的）本地人市场的东北方。大约一个世纪之后，汉武帝（公元前 140– 前 87 年在位）找理由平息反叛地方统治者时，番禺也许已经被建成一所有墙围绕的衙署机构建筑群和镇戍防御据点。汉代的编年史记载因为该地区距离大洋很近，并且拥有大量的犀牛、大象、龟、珍珠、银、铜、热带水果和丝绸，汉商沿海岸进行贸易，积聚了大量财富。这个贸易的中心是番禺……在建制了省府之后，官兵云集乡村，从当地原居民手里抢夺土地并且剥削人民。结果，几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多次起义。



然而，本地统治者最终变成汉代皇帝平和的属臣，在市场的北面和番禺的西边建造了一座宫殿。公元 250 年，这座宫殿被汉代初年南越王赵佗的后裔（玄孙）赵建德改为光孝寺（C）。在接下来的世纪里，更多的寺庙在西部兴建起来：五世纪的长寿寺（D），479 年的六榕寺（E）及其著名的，最初建于 537 年的佛塔，还有 526 年的华林寺（F）。[2]所有这些建造都得到印度僧人的指导，比如其中著名的有 6 世纪到达这里的禅宗始祖达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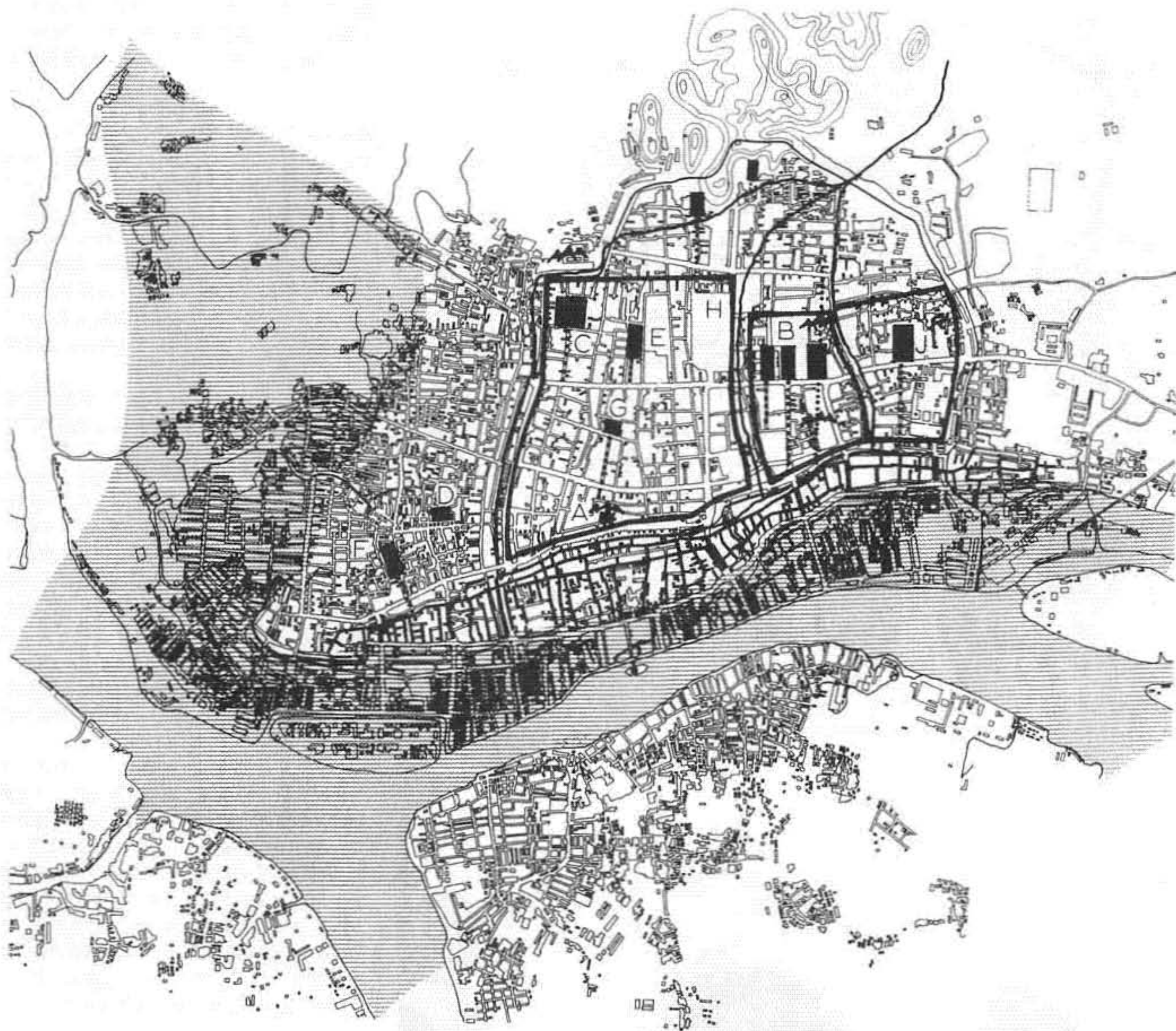
行政结构渐渐地增强，到唐代时，番禺旧的行政城镇向两边扩大。因为有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人还有其他商人的聚落，外国的影响更加深厚。651 年，阿拉伯社团创立伊斯兰教，并兴建了清真寺（G）。聚居区域沿着河岸以及衙署机构建筑群以西延伸，直达北部的“白云山”。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市场中心也不需要围墙。然而，879 年，自封为“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的反叛军黄巢完全毁坏了广州。他屠杀了 120000 名番商及他们的家人，震惊世界，这种恐惧毁坏了几代人的外国贸易关系，商人们的行动则迁移到沿着福建浙江和江苏沿海的其他地带，像泉州、福州、宁波、杭州、苏州、上海和扬州。

971 年，北宋军队占领了南汉（907–981 年）之后，214 个区，共 179263 个家庭被增加到了宋代统一的帝国。结果，广州所在的区域被分成两个省份：广南西路，以桂林为首府；广南东路，以广州为首府。并设置了四个层次级别的行政治理体系。最高级别是掌管陆海军务的节度使。然而，省州级（二级），也是由都城朝庭任命的文臣朝官，这些文臣定期走访监查所负责的地区。第三级是广州府，负责监督第四级即县级。府级官员中有两位居于广州，即番禺县的老长官和南海县的新长官。

11 世纪，三个部分都成为有墙围绕的区域。中央区（B）是老的番禺行政中心，如今含有第三级和第四级的衙署机构，主要用于广州府的行政管理，当然也用于南海县的长官办公室。东边小溪以外是番禺县（J）的长官衙署，有自己

1 译者注：这个也许与历史不合，达摩是住在西来庵，也就是清代改名的华林寺。

2 译者注：这里作者原文有些混乱，长寿寺是六榕寺梁时的名称，二者为一座寺庙，从图看，E 的位置距光孝寺不远，所以是六榕寺无疑，但也是长寿寺，那么 D 的位置是什么寺庙呢？有待考察，D 距华林寺（F）不远，需要找出华林寺不远东北方寺庙的名字，也可能那里什么也没有，广州另一著名佛教寺庙是海幢寺，不知是否处于 D 的位置。



的围墙。这两个部分，由从各个机构主要入口出来的街道笔直通到河岸。最后，在西边，最大的区块是让所有外国人居住的旧居住区（H），还有一些佛教寺院、五仙祠及其他（A）。在围墙环绕的区域之南是市场和登陆地，两个郊区向三个围墙环绕区域的东部和西部延伸。市场和登陆地渐渐地发展成为典型的，像上海和汉口那样与河岸平行的市场街道体系。这时候，珠江也宽了许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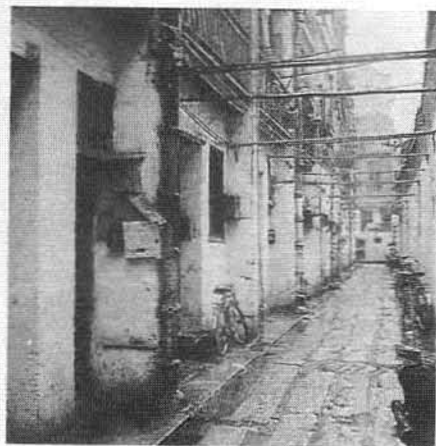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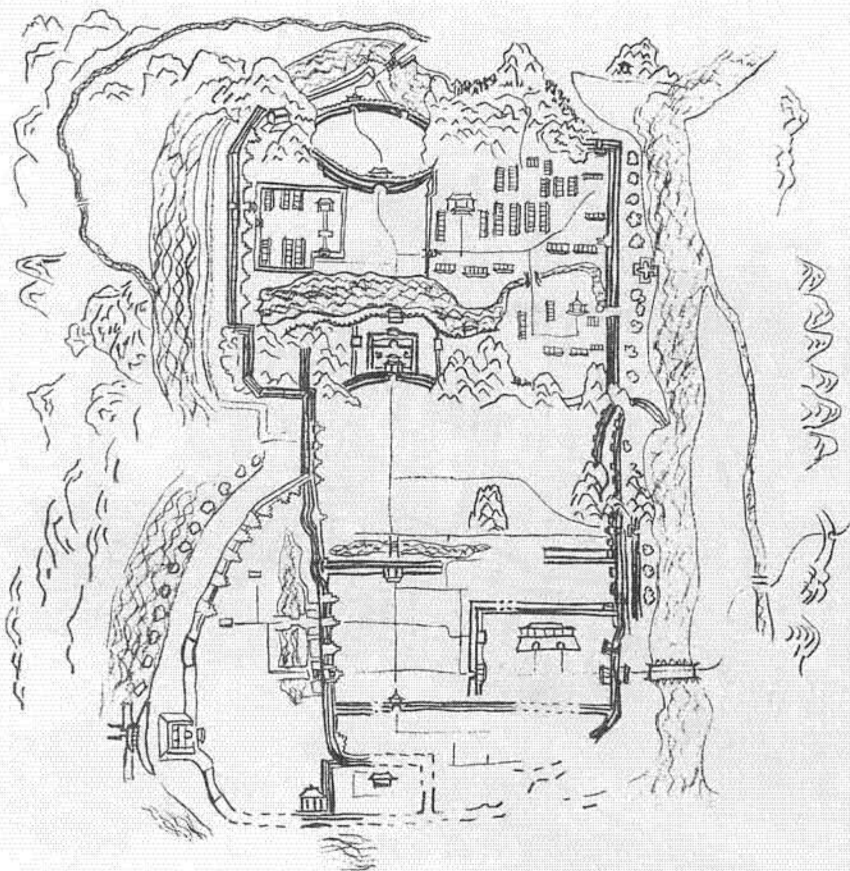


图 4.1.2.52，53　老广州的典型街道，两到三层高的建筑。这里，这些建筑物完全用于居住。但是，同类建筑广泛用于商业活动，底层为商店、餐馆、作坊、食铺、菜馆和类似的用途（参见图 5.4.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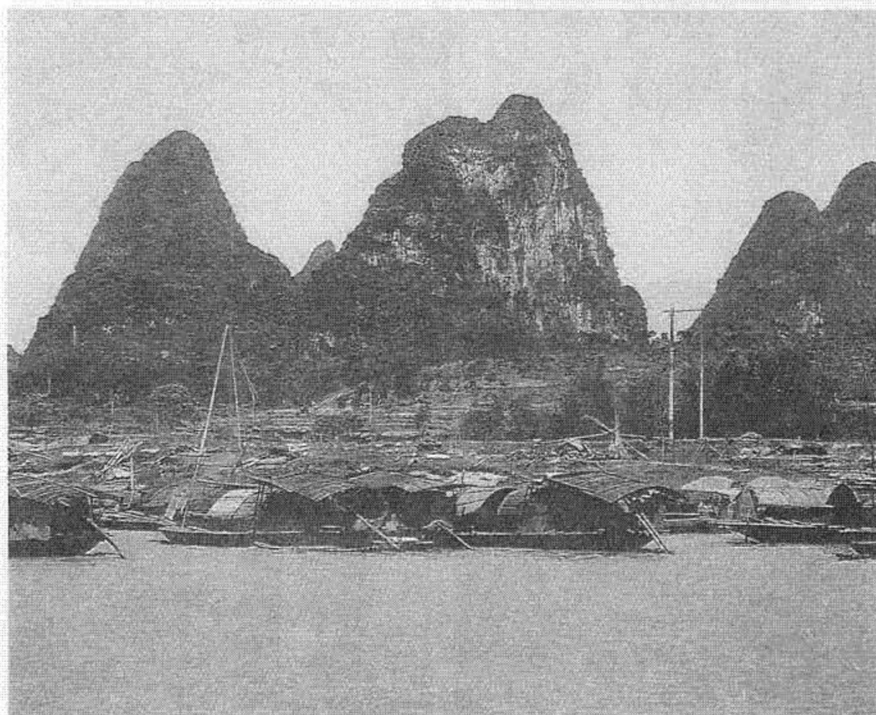


图 4.1.2.54 广西桂林城，坐落在通往南部的主要水运线上。那里，湖南的湘江与广西的漓江，阳江，通过公元前 215 年就已兴建的灵渠体系连接

图 4.1.2.55 桂林城，参见文物，1979/2。
新近发现了一幅南宋时代的地图，表现了 13 世纪的桂林城。那时，城市是广南西路（现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建省的行政中心，称为静江府。正如地图所示，省的行政机构由一个复杂的体系重重防御——好几面墙环绕的几块区域绕有一条宽阔的城壕，并辅以东侧的漓江为把守。北部，一些带有石头的石灰石山也纳入了防御系统。那里，小山环绕着防御据点的兵营和主要办公室。
公元前 214 年，桂林府已经由第一位皇帝——始皇帝建立。作为一个通往南部主要道路上的驿站，叫做南海。公元前 111 年，汉武帝（公元前 141－前 87 年在位）时期建造了第一批环绕兵营和办公室的城墙，它们取代了旧的栅栏（参见汉代出自马王堆的地图，图 3.1.2.13）。
这由墙所围的区域称为寿崴，是一个县的中心，位于和一条河流相交的道路边。根据汉代的度量体系，其尺寸为精确的一平方里。几个世纪以来，格局保持不变。直到唐代，885 到 888 年之间，城镇北部的郊区围以墙体，形成了一座 6.7 里长围墙的外城。这个围合区也包括了独秀峰。589 年，独秀峰山脚下建了一座寺庙。这寺庙在当时被称为开元寺，是这个郊区的中心。
997 年的宋代，广西建立了省。这个时期，聚落区域大量向南和向北延伸，更多的墙体被建造起来以防御这些扩展的部分。如此，像地图中所显示的那种相当复杂的墙体系统应运而生。地方行政衙署依然保持在东南角最古老的一部分，但在北部建立了新的机构。城市中到处都可以找到当时那种连续性发展过程的痕迹，不过，当明代第一位皇帝于 1370 年立自己的侄儿为靖江王时，内部用于分区的（墙体）部分全被毁掉，重建了外墙（参见图 4.3.1.33）



图 4.1.2.56 漓江边的桂林城，参见嘉庆时期（1796–1820 年）的 Jian gui 县志。
左侧是明代宫殿建筑，沿江而筑的城墙始于北部的山脉穿过城中心，小船穿梭江上，在两岸架起"桥梁"。左侧的山是独秀峰，而在中间的是伏波山，伏波山在宋代地图上的城池中心有所反映（参见图 4.1.2.55）

文脉之中出现，又为持不同政见者和各种思想家、哲学家，这次也为在不同国家中各种城市里的不同宗教提供了港湾。但是，这种结构的竞争性质退化变质成为持续战争的极大痛苦一直到唐代的建立，另一个统一的王朝结构继续存在。城市的新概念在不连续统一的时代涌现出来，并且为在更大规模城市发展过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背景，甚至远播延伸至王朝的界限之外。

如果我们认为在唐代覆灭之后的三个半世纪里又是一个分裂时期，尽管宋朝势力的建立覆盖了王朝的主要大部，我们也许并不奇怪发现一个城市文化的出现，其也许被认为是中国城市发展达到了高潮。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作为中国文化影响，即唐朝区域范围内的一个分裂时期。在其中，中国文化基本概念和价值盛行，并且甚至形成在北部和西部半蛮族部落的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当时的西北领土被分裂成为几个政治的区域，有非常不同的政治和民族结构。在此意义上，宋代是在华夏范围内几个朝代中惟一的一个。尽管王朝行政管理一般意义上的专制特征，它并没有在其自己的政治势力范围内完全地控制所有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一个城市居者的新阶层的涌现，带有很多我们可以称作现代的特点，以及带有与欧洲城邦国家中世纪城市文化的相似性，伴随着在大都市区域似乎看上去混乱的城市聚落结构的发展，呈现出非常现代的城市景观，具有

较高生活标准以及一般意义上有效的基础结构和行政部门。从唐代崩溃以后的时期里，我们建造有很多的城市或重建很多城市的例子，后者主要是在南方，在那里，移民的涌入引起了人口增加而必须扩展聚落。然而，城市的城墙通常是在攻克和掠夺的过程之中，在经历了严重的毁坏之后的重建。

随着在公元 10 世纪开始的毁坏，像广州、南京、泉州和福州这样的城市被重建起来，而这些新近重建的聚落是由最适中尺度规模的墙体所围绕的。广州的“三套城”占地不到 3 平方公里；福州在 1115 年后，也几乎是同样的规模；而南京占地 12.6 平方公里，形成了一个 2.8 公里 ×4.5 公里的矩形。扬州和苏州在北宋崩溃之后重新建造起来，而扬州的“三套城”占地 7.6 平方公里，苏州占地 14.8 平方公里。苏州的墙体在公元 13 世纪因为大雨和洪水开始又倒塌了。在 1224 年之后被重建。苏州是一个有超过 300000 居民的繁荣城市，正如镌刻在巨石上标有 1229 年日期的精美地图所显示的那样。地图表示了新近建造的城墙、街道、运河，重要的建筑物和在中心的宫城。它本身按比例绘制，其本身便是一个测绘和地图的杰作，比例是 1 ： 3000，以中国的度量单位表示为 1 寸比 60 步。

这张地图肯定表现了宋代城市规划的结果，尽管苏州城市的模式在过去大约 1600 年历史过程之中已经发展了。街道和运河的基本布局肯定源自其历史的头几个世纪，而既然没有如在城中统治过的皇帝所实施的那样强有力的发号施令，也便没有什么原因来改变其布局。

在南部建立了新城镇，仅仅作为小的行政中心，大多数是与市场区域发展相结合的，而在几种情况下，与采矿中心非常密切，其中有 80 个在南宋时期于东南一带运作，大多数是在福建省、广东省和安徽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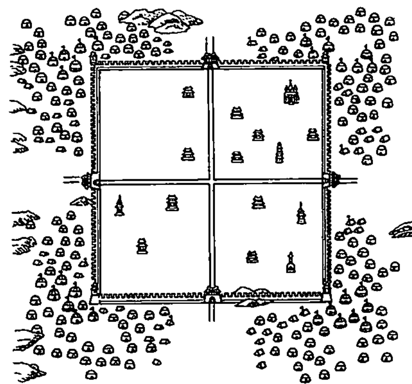
4.2 北方的游牧民族

贯穿整个中国历史，汉人一直都忙于捍卫抵抗生活在北方干旷大草原上的游牧部落，也就是今天的东北地区和蒙古一带。这些游牧部落具有极其复杂的民族背景：蒙古人、突厥人、通古斯人、鞑靼人、吉尔吉斯人、党项人、藏人、回纥人及其他。这些部落为了寻找更好的放牧草场不断地互相争斗，结成时刻变化不定的联盟。每当他们与汉族农人的永久性聚落接触时，他们便和汉人建立贸易关系。通过这些，他们学习了汉人的文化和经济，慢慢地开始吸收某些文化，提升品位。这也诱惑他们通过武力从汉人那里掠夺所要之物，以马背骑兵和弓箭手的姿态不断地侵扰中国北方。

自公元前的最后几世纪开始，汉人沿着北方边界建造了广泛的防御体系。公元前 3 世纪，第一个皇帝——始皇帝终于将这些防御体系连接成中国的长城。沿着这条防御线，市场生长起来，在和平时期，

图 4.2.1 一幅理想化的描绘所刻画的第一座蒙古都城喀拉库伦，显示了一座典型的游牧首都，引自发表在 A. Hubrecht 著作里的木刻画(Grandeur et Suprematie de Pekin，1928 年)。

成吉思汗的第一座蒙古都城的城墙实际是不规则的，但是正如中国木刻家所想像的那样，它以其理想的形式构成了一个方形。然而，对聚落结构的绘制完善，中心地带围墙环绕的城市里有一些主要的建筑物：宫殿、办公建筑、几所寺庙，甚至还有一座基督教堂。城墙之外，城市由游牧民族的帐篷所组成的聚落环绕，大概是由部落、宗族和家庭所形成的组团分组而居。城市和它外面的帐篷聚落之间，城门前沿着主要街道的是露天市场，根据不同类型的商品彼此不同，即马市、牛羊市、竹编和金属器件市、米市和果市等



可以互市和交换信息。在许多个地方，这些市场发展成为以汉人为主导的镇与市。我们知道，自汉代起就出现了这些地方。那个时期，汉人的文化文明被传播到许多游牧民族占据的地区，东部直达太平洋北岸，西部深入到中亚。

汉代之后，公元4世纪开始，有几个部落被纳入中国领土，他们当中很多人在汉人的军队里充当士兵，主要是在他们自己头人领导下的骑兵部。这些人渐渐在权力游戏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开始施展自己的权力。在他们的领导下，部落的联盟形成了，甚至发展成以汉人的王制和管理体系为模本的自立王国。如在上面已经提到了的拓跋王国，后来闻名的北魏。尽管掺入一些蒙古成分，其领导家族主要是突厥族，吸收了在中亚流行的佛教之后，北魏完全汉化了。

那些部落、联盟以及后来王国的强悍领袖们，选择适宜的地带建立自己的居所，以墙体环绕着宫殿和庙宇建筑群的形式，周围环绕广阔的聚落。在今天的东北地区和蒙古一带，很多这些由墙体环绕的聚落遗迹废墟得到考察。毫不奇怪的是，这些墙体环绕的聚落仅仅包括王室这样的中央集权和宗教中心。墙外的市场中心几乎没有留下痕迹，因为它们仅仅是一些不留痕迹的临时帐篷结构，及营地之间的开敞空地，或根本就没有什么房屋。这些游牧民族获得的军事力量越强大，他们就越能够左右政治权力游戏，并很快建立能与汉人相抗衡的王国。公元9世纪唐代衰落之后，有好几个这样的王国与汉人所建的王朝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处，并最终能够在中国本土建立他们的政权。结果，他们基于自己的专制和暴君式的领导概念建立帝都，同时采纳了中国传统中“圣王”的古老概念，这很好地适用于他们征服汉人的目的。因此看来十分合乎逻辑的是，只要可能，他们便将“幻方”概念和“神数”的古老体系一起应用到他们的帝都布局中。

尽管已经高度汉化，这些游牧武士没有随中国文化的发展进入到那种我们称之为“城市社会”的状况，那种宋代所具有的世俗气氛和理性思考，其开放的思想和为城市居民提供的高生活水准。相反，这些人依然停留在军事组织和游牧民族冷漠的原始水平，他们惟一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剥削和征服汉人。

4.2.1 游牧民族掌握的“神圣之王”观念

为使这种情形尽可能清晰地显示出来，这里，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一下“神圣之王”和“幻方”的概念，以及在自建立这些概念以来的发展进程中，中国人态度的变化。

公元前11世纪，周公将“幻方”模式用于新王室（今天洛阳）的布局时，他认为这是和“神圣之王”概念一起构成整体所必需的部分，是“神圣之王”未来周王朝繁荣的先决条件。然而，当时的周王，也就是周公的侄儿，并未采用他的观念。如我们前面所提，这位帝王从没有住进这座具有“幻方”模式，位居世界中心的新都城。后来，并且在整个周代，我们可以说在很多实例中，这些概念肯定对青铜时代晚期，周代统辖之内由各君主所建新城的规划实践具有影响。周公复杂的概念从没有得到完全的实现。同时，“神圣之王”越来越被缩减到他的仪式性功能（或者，我们可说他的魔幻职责），也越来越与他作为世俗世界之王的实际权力相分离。因此，完全剥夺了一个帝王作为世界上真正“神圣之王”的崇高地位。最后，在公元前3世纪，秦王开始了第一个皇帝的称号，将自己凌驾于所有其他诸侯和头领之上，并重新建立了世俗性权力的崇高地位。但是，正如他的统治那样，纯粹以武力和残酷的暴政，他缺少“神圣之王”的所有属性，那种由上天赋予的、人民拥护的、统治者的高尚品德。

汉代的奠基人是一位庶民，使得应用古老的“神圣之王”概念越发困难。然而此时，那些曾经被秦始皇镇压的古典文献的重新发现，为“神奇”和“神圣”的观念，以及从前朝代的哲学概念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信息。根据这些概念，可以为皇帝及其高层统治机构的行为准则建立一套复杂的体系。

以这种方式，“幻方”的概念和建立在阴阳概念之上的“神数”系统也变得制度化。东汉时期，这些概念不仅用于仪礼和哲学上的沉思，同时，尽管以某种修改过的形式，被用于皇宫王室的布局。人们认为

这些概念在建立皇朝并确保朝代繁荣方面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这种复杂的古典文化复兴中，皇帝在仪礼上的职责义务，通过传统维持住其“神圣”特质，甚至更加精致。但是，现在的重点似乎转向皇帝本人的德行方面。他与上天和祖先的关系被认为更是他个人成就的结果，而不像当初“神圣之王”概念所暗示的：这是自然赐予的，来自上苍，无可争辩。

在公元的第一个1000年时间里，随着孔子思想的不断发展，并成为复杂的国家哲学体系，教育取代了“神奇”，成为帝国政府里的重要工作。国家的仪礼为了满足教育人民关于世界结构的目的，于是“神幻”之术的实施与帝国政府分离开来，而留给了宗教，例如道教组织和佛教组织，帝国官僚体系发展成一种组织完善的等级体系，覆盖整个帝国，并在理性规则和思考的基础上几乎完全控制了人民，不管皇帝是好还是坏。这在迅速发展的经济和持续变化的贸易、商业、企业的世界中构成了一个稳定的因素。也是后来相继而出的辽、金、元代外邦统治成功的部分原因，因为在每一次战胜和破坏的骚乱期之后，管理机构都非常迅速地得到恢复。在这些情形之下，“神圣之王”（皇帝）的概念在宋代“城市文化”的现代世界里几乎完全消失了。然而，对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异邦统治者们来说，尽管接纳了佛教，习惯于萨满巫术，此时那几乎早已过时的皇帝神圣性的概念成为了一个具有强烈吸引力的观念。这使得他们夺取神一样完全绝对权力的要求合法化，也为用汉人传统观念征服汉人提供了方法和手段。以此，异族朝代极大程度地阻碍了汉人的发展，并残害了中国社会潜在的创造性进步，甚至直到我们这个时代。

历史的嘲弄是这样：恰恰在那个时候，一位西方的观察者在中国居住和旅行了多年，作为蒙古皇帝忽必烈的一个官，他处在一个可以获取所有想要的关于整个国家的信息，并能够将他的观察传达在作品中。这个人就是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他对于蒙古都城元大都（现代北京）那完全处于控制之中的生活和严格管理以及刚刚废黜的宋王朝的都城临安（今天的杭州）那休闲和松弛气氛的描绘，向我们提供了中国城市主义的两个基本概念，及其实际应用结果的详细信息。

“神圣之王”概念的恢复自然伴随着“幻方”概念和“神数”体系的复活。当蒙古皇帝忽必烈决定建造一个新的帝国首都（即现在的北京），这些概念被用来设计布局，就不足为奇了。受传统主义的汉族官僚的支持，皇帝命令将《周礼》中神奇而神圣的“妙方”僵硬地应用到城市布局中。形式主义的以及对于甚至是细微末节的绝对控制，不但渗透到宫殿和整个城市的布局，而且渗透到城市人口的生活。正如早在500年以前，直到唐代的中国帝王宫殿的做法那样。大汗，忽必烈皇帝，本人是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且是一位英明的统治者，但是，绝大多数他的继承者不那样，以他们暴君似的统治和征服本性，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极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他们几乎完全毁坏了宋代的先进结构。发展的进程被缩短，其创造性的驱动力遭到严重毁坏，可以说，至今都没有得到彻底恢复。当明代后来推行关门政策并剥夺国际贸易时，都城北京成为陈旧思想和视野狭窄的中心，坚持僵化的绝对主义和毫无生气的官僚作风，并抱着久已失去生命力的所谓神圣的“幻方”观念。如此，异族朝代带来的冲击又延伸了三个世纪，当游牧民族满族在17世纪控制了中国并建立了清代以后，这种倾向再一次被强化。人们不应该被两位满族皇帝康熙和乾隆长久和辉煌的统治所蒙蔽，那时的中国看上去是一个治理严明和繁荣的国家。仔细的观察显示，当时仅留存极小的空间得以发展创造性力量。受过良好教育人士的一长串名单本身说明了一些存在的问题，这些人拒绝参与政府公务，并从公共生活中隐退。

满族没有为清代的皇帝建造一座新都城，因而没有关于其布局观念的任何实例，但“幻方”概念依然残存在很多方面，在那些新建的小行政中心，在民间的宗教仪式上，特别是它依然为传统的中国哲学和精神概念提供了基本的构架。在这方面，旧朝代的很多观念一直被保存到20世纪初。最有可能的是，这些观念的延伸得到异族统治者那缺乏创见的政府的支持。他们尽可能表现得有文化，并且汉化。

4.2.2 契丹和女真游牧民族：辽代(937–1125年)和金代(1115–1234年)

我们已经提过其他民族北魏和渤海国，其都城龙泉府在今天中国的黑龙江省。北魏的突厥拓跋统治者在中国建立王朝并以地处中原中心的古老而备受崇敬的洛阳城为其都城时，通古斯人渤海国的统治者在他们自己王国的中心，远离汉土的地方模仿隋唐长安建造了一座新的都城，他们从来都没有真的要征服汉人疆土。渤海州在925年被契丹（一个蒙古和通古斯人的联盟）所毁，这个联盟原来在蒙古的西刺木伦河地区形成，在那里他们与汉人农民有过接触，并吸取了一些中国文化的品位。契丹人变得非常强盛，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们不但控制了整个满洲里和蒙古大部分地区，而且占据了中国北方的很大一部分。(译者注：之所以中国在古语中被称为Cathay）当他们占据了大约今日的北京一带以后，于公元947年建立了辽代。他们将其中心领土划分为带有五座都城的帝国区域，南部和西部区域分别在今天的北京和大同，东部和中部都城在今天的辽阳和承德附近，主要都城或上京在他们的祖地，现今内蒙古的林东镇或巴林左旗一带。上都的废墟主要包括两个围合区域，共占地约7.4平方公里。北部的围合体大致形成一个方形。其北半部的中心有一座宫殿的遗迹。南部的围合体是汉人、回纥和其他族人居住的郊区。该城坐落在大兴安岭山脉，西拉木伦河的上游，城东部的防御城墙沿着大兴安岭山脊。另一座城市，当时叫庆州，在其不太远的西部，直接和这段防御城墙接上（曾经被误称作“成吉思汗”长城）。这是一个行政中心（区域长官）和一个重要的边塞哨卡，离辽时长城的主城门很近。它只有924米×1108米（5 ：6的比例），但是与上都形成对比的是，其布局非常规范，大概是由于中国规划方法的影响。一组有着典型合院布局的牢固坚实的建筑物，表明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其度量方法也许基于北宋朝代，即30.8厘米为一英尺，462米为一里（小里）、或554.4米为一里（大里）。以这样的度量单位计算，这个矩形占地4平方里，即2小里×2大里。辽代的南都在现北京地区，当时即是闻名的南京或称燕京，是一个6里×6里的方形，在西南角有一个分离的宫殿围合体。整个区域大约9平方公里。因为这座城后来变为金代的中都，关于其在辽代时期的内部结构知之甚少，但是，可以很肯定地说，布局是非常规则的。

渤海国在925～926年被毁灭时，通古斯人部族的一个小联盟即所称的“女真”，受到契丹的统治。他们生活在渤海都城之西的地区，在松花江以南。大约200年后，这些部族摆脱了契丹统治者的束缚，在1114–1115年，部落首领宣称自己为“金代的皇帝”。仅仅十年后，他们就推翻了辽——契丹朝代，甚至于1126–1127年成功地攻克了北宋的都城开封。1130年，他们跨过长江，将宋王室一直追赶驱逐到浙江省。当撤回北方时，在江苏省北部和安徽省，沿着淮河建立了残余的宋代帝国边界。他们在北方的帝国与南方的南宋帝国共存了大约一个世纪。

1114年，金代皇室的祖先，女真的鞑靼部落首领之一，在会宁府，即现在的黑龙江省哈尔滨东南接近阿城一带建立都城。这个曾经在金代于1115年建立时作为上都的城池废墟已经被挖掘考查。墙体包围的区域面积大约2300米×3300米，由北部和南部两个相当规则的矩形组成。南部的西南角是宫殿区，但是到目前为止，几乎未探明多少遗存。1153年，在北京的故辽城址上建立了另一座金代皇宫，其名称从燕京变为中京，即“中都”。起先，这个朝代的建立者完颜阿骨打，命令他的儿子粘罕太子，在这个辽代故城的四角建立四个防御性城堡，但是不久，城墙向南部和西部延伸。宫殿因此相应地扩大，占据了更为中心的地带——一个约8里×8里的方形区域。南部和西部城墙的遗迹在几十年前的北京外城墙外依然可见。中国学者近来尝试复原其街道网络以及一些重要建筑物的坐落位置。

金也像辽一样设立了五个都城区域，中都在今天的北京，南都在开封，西都在大同，而东都依然在辽阳。但是，这些都是老的既有城市，至于它们在金时是何等面貌少有记载。在女真的心脏地带，满洲里中部和北部，发掘了几处由墙体围护的废墟，所有的看上去都是某种军营，矩形或方形，但极少是真



图 4.2.2 长城以北，现在内蒙古境内的蒙古帐篷聚落，远处是大兴安岭山脉。[1] 背景的右部是一座有首领驻扎的小部落中心

图 4.2.3 10～13 世纪的蒙古以及中国东北部，比例 1 ∶ 10000000，基于《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上海，1982 年

A. 渤海国通古斯人的心脏地带，建于 696 年，927 年落入辽的控制：u– 上京龙泉府；[2]v– 中京显德府；[3]w– 东京龙原府；[4]x– 南京南海府；[5]y– 西京鸭绿府；[6]z–z– 防御辽的西部长城。

B. 辽代契丹的心脏地带：1– 上京临潢府，今日的内蒙古巴林左旗；3– 东京，辽阳府，于 919 年建立，今天的辽东，辽阳；4– 中京，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5– 西都，西京，山西大同，1044 年后封为都城；6– 南部都城南京，今天的北京，937 年建立，辽代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打下的基础；7– 八里城，哈尔滨以西的防御城镇；9– 庆州，金代长城边的边塞城市；10– 内蒙古，宁城县附近的黑城。

C. 金代女真鞑靼人的心脏地带：1– 临潢的北部都城，后来被毁；2– 上京，会宁府，现今阿城南部，黑龙江哈尔滨以东；3– 东京辽阳；5– 西京大同；6– 后来的大兴中京北京；8– 在哈尔滨以西大安县的塔湖城；10– 在大定黑城的中都，后来的北部都城；13– 在长春以西淮德县的秦家屯；14– 四平以北梨树县的偏脸古城；15– 沿着牡丹江的金代长城，具有东部城堡；16– 沿着大兴安岭的成吉思汗长城，具有西部城堡的金代长城；17– 吐列毛杜古城的防御城镇；18– 黑龙江齐齐哈尔以西的北部长城，在金和南宋之间的 S–S 界限。

长城以南的宋代城市：a– 北宋的东都开封，在 1127 年后成为金代的南都；b– 洛阳，北宋的西都；C– 应天，北宋的南都商丘；d– 大名，北宋的北都；e– 太原；f– 西安；g– 扬州；h– 南京；i– 苏州；k– 杭州，南宋的临时都城（临安）；j– 武昌（今日武汉）；m– 襄阳，今天的襄樊。

D.（夏和西夏国）党项人的心脏地带：I– 夏州，大概是夏代的第一座都城；II– 夏代的第二都城，兴庆府，今日银川，宁夏；III– 黑水古城（故城）西夏朝代的第三和最后一座都城，近内蒙古称为黑水城，在 1227 年被成吉思汗所毁灭。

E. 元代蒙古人的心脏地带：BK– 贝加尔湖；SM– 色楞格河；OG– 西拉木伦河；KL– 克鲁伦河；EG– 额尔古纳河；SK– 石勒喀河；ON– 鄂嫩河，蒙古族部落：Bg– 孛儿只个；Og– 景教祭司乔治王国的领地；Kt– 景教祭司约翰王国的领地；Nm– 奈曼。

蒙古族的城市（元）：A– 成吉思汗的都城喀拉库伦（参见图 4.2.2）；B– 济宁，吉林路的省会，今天的察哈尔右翼前旗图格里克（Togrog Ul）……；C– 应昌府，庆州西南都城金代的长城；D– 上都，成吉思汗的开平府多伦的西北，在一个部落区域的两个城市；3– 辽阳东都；4– 在大定的北都；5– 大同的西都；6– 位于大兴的中都，蒙古人称其为汗八里，在现今北京，这里，大汗以及元代的创立人建立了新的中央都城，大都，今天北京的内城。

F.（清代）满族通古斯人的心脏地带：6– 顺天，清代的第三座都城，今天北京的内城；19– 沈阳（奉天），清代的第二座都城；20– 齐齐哈尔，北部的要塞；21– 吉林，东部的要塞；22– 承德热河，清代的避暑山庄。因为外族统治者忽视了对洪水的控制，1114 年黄河决堤并且改变河道，第一次沿着大运河取道南下流入长江。

---

1 译者注：参见中国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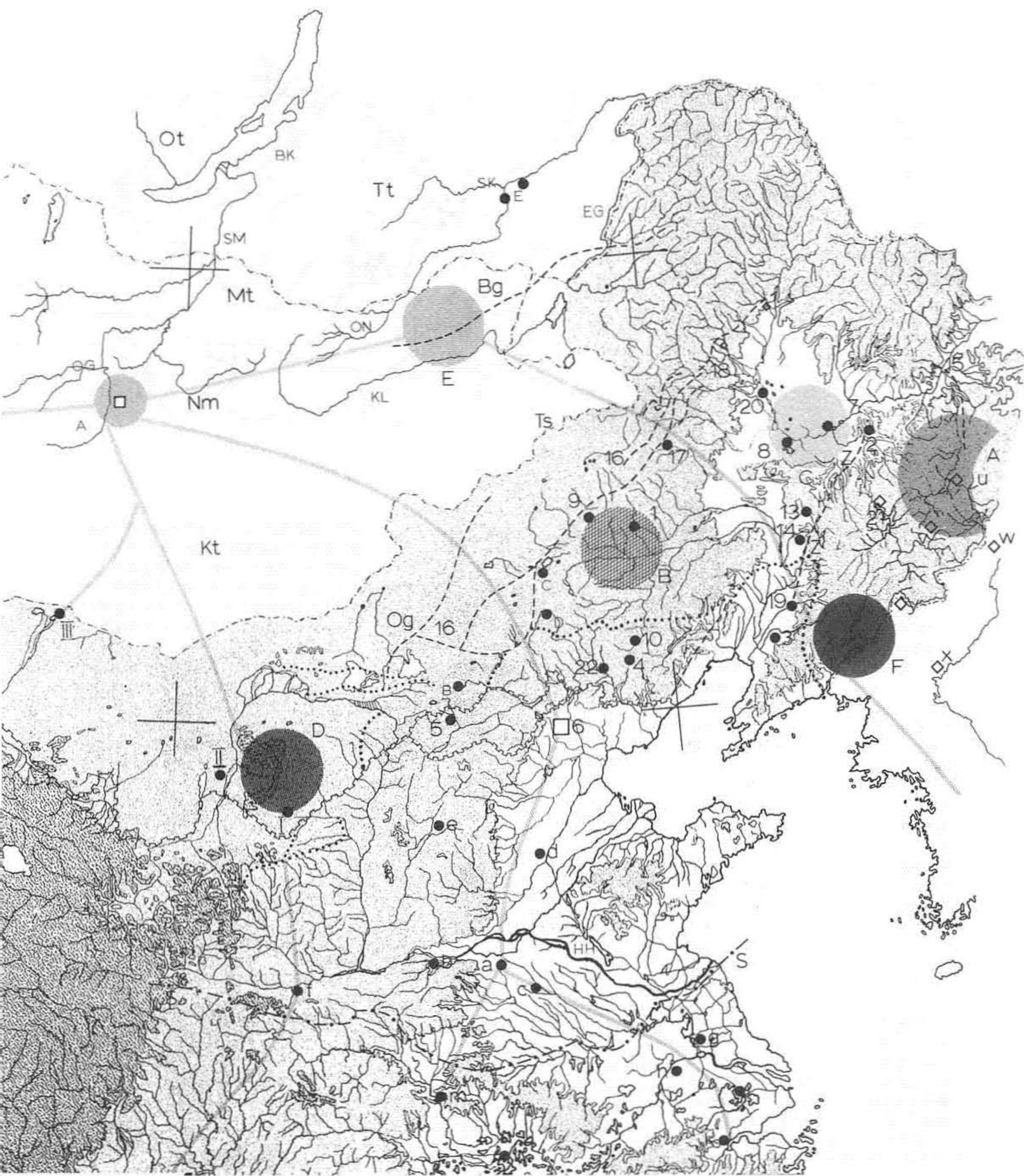
2 译者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宁安县渤海镇东京城。

3 译者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一说于今日吉林敦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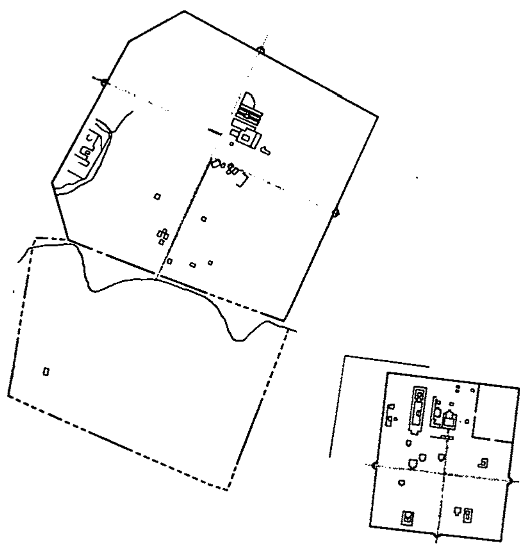
4 译者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八连城。

5 译者注：朝鲜清津市，又说在咸兴。

6 译者注：吉林省白山市临江，一说在朝鲜慈江道鸭绿江东岸。



Ot
BK
Tt
SK
E
EG
SM
Mt
Bg
ON
OG
E
Nm
KL
A
Ts
18
20
16
17
8
2
A
u
9
13
14
W
Kt
B
c
19
3
F
Og
16
b
10
4
22
III
B
5
6
D
II
e
d
HH
S
a
c
f
g
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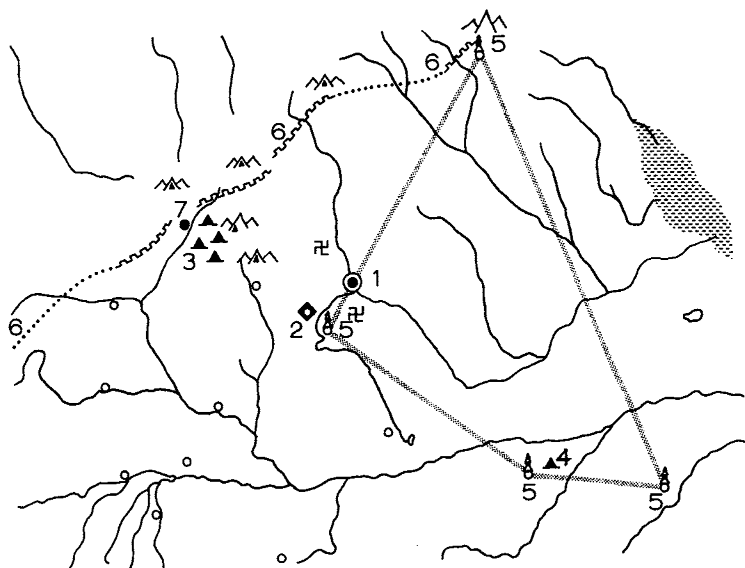


图 4.2.2.1 辽代都城，上京（上都），临潢府，比例1：40000，参见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北京，1982。

907 年，契丹的八个部落首领中选出了一个作为可汗，但是，这次他不顾传统的选举制度，不但为他终生而且为其后人保留了领导权，这就是耶律族的阿保机。生于 872 年，自 901 年开始就已经是一个胜利的征服者。他不但是一个成功的将军，在当选的十年里，采纳了越来越多的汉人统治方法，并任用汉人为其幕僚，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河北的韩延徽。[1]韩延徽被任命建造有城墙的城市、市场和为中原帝国臣民居住的村庄，并教他们农业耕种。916 年，阿保机仿效大唐帝国 907 年覆灭以后其他起义者们的例子，自称皇帝。因此也就有了建立都城的需要。结果，韩延徽在他的祖地，即今天的刺木伦河以北的巴林左旗（内蒙古昭乌达盟），环绕他的皇室建造了一座有城墙的城市，他称之为皇都，即皇帝的城市。大约西南 25 公里处，又在他的四位近祖出生之地建造了另一个有城墙的围合体，叫做祖州，即祖先的地区。围绕皇都（上都、上京），还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建造四座"塔"构成某种神圣的区域，并界定阿保机的猎场，可能还运用了一些猎手们的魔术手法。

上都的墙体表明了一种规则性的尝试，它们形成了约 1470 米 ×1580 米的梯形，在北半部的中心有一座宫殿，三座城门并非彼此相对，也没有一座直通宫殿的主要轴线。据记载，阿保机曾于 918 年建造寺庙，除了天坛和社稷坛，还建造了一座孔庙、一座佛寺和一座道观。912 年，已经在祖州，其祖地附近的天雄寺引入佛教。920 年，在阿保机的命令之下，发明了契丹文字系统，一种基于汉字音韵变体的字母文字，在今天已经不能够破译。同时，都城南部也延伸到郊区。这里，住着汉人与其他部落的臣民，而契丹贵族生活在宫殿城市之中，当然大多数可能是住在帐篷里，宫殿仅用于皇家仪式和接待之用。这个南部的郊区，依照逻辑被称做汉城，即是汉人的城市。而这似乎表明，契丹并未试图变为汉人，尽管经历了持续的汉化过程

图 4.2.2.2 上都西北的庆州城，非常规则并完全对称，三座城门和街道形成一个十字形模式。南北轴线直接指向主要建筑群，那里连着更多的合院建筑和寺庙。在城外的西北方向加有外墙，但是，作为整体，外城的形状并不明显

图 4.2.2.3 临潢府，上都附近辽代都城区域图，比例：1：2600000，引自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上海，1982。

1－临潢双都；2－祖州的祖先聚落；3－庆州城附近的陵墓（宏伟的墓）；4－契丹神话中神秘虚构的祖先，奇首可汗之墓；5－东南西北的四座塔，界划出皇家狩猎场的范围；6－金代抵御蒙古族的长城（成吉思汗长城）；7－庆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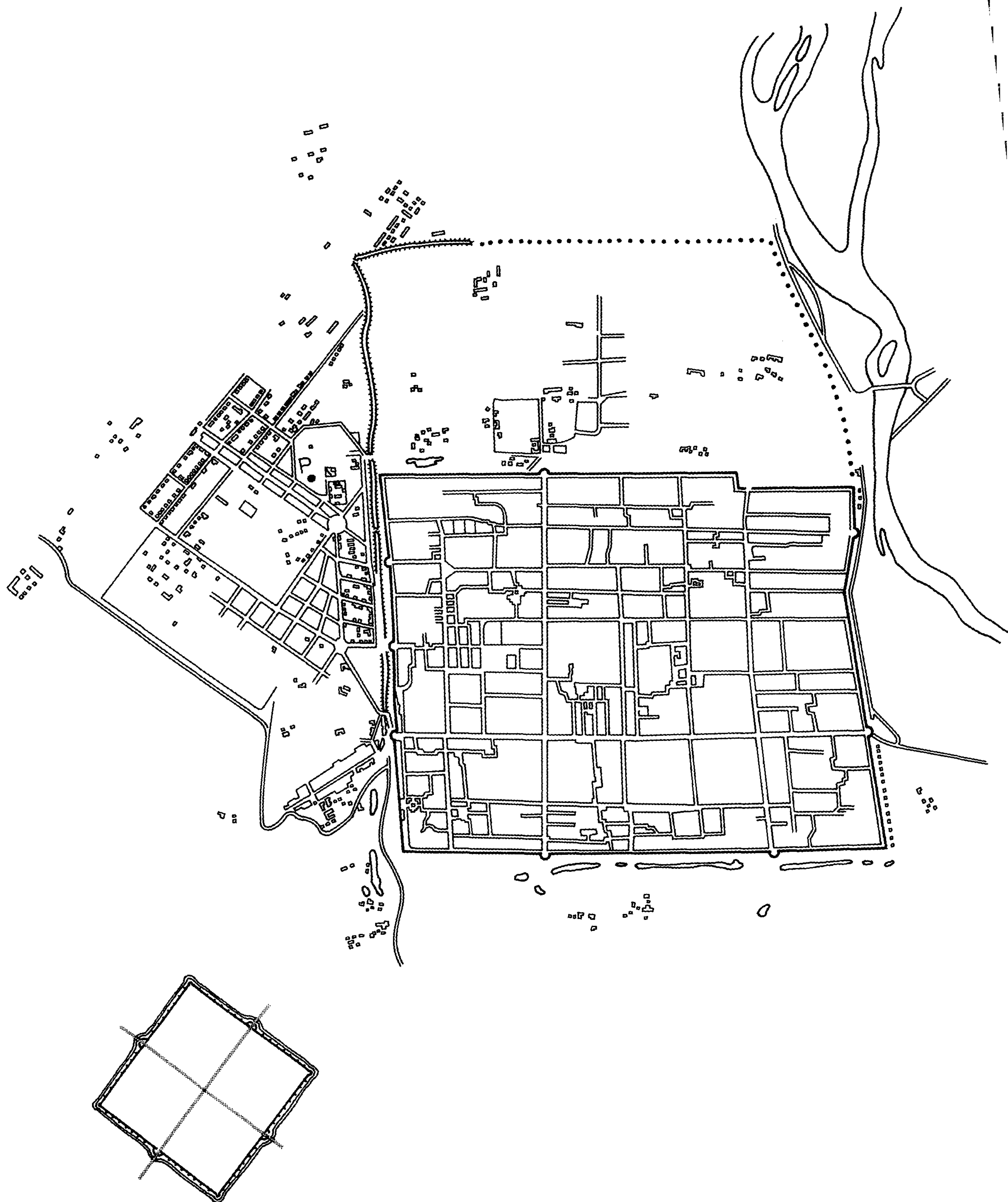
图 4.2.2.4 辽阳城，辽、金、元代的东都，比例：1：20000，引自 20 世纪初地方志上的地图

阿保机的生涯随着 926 年攻占下渤海国而到达顶峰。成千上万的家庭，就像以往一样迁移到征服之地，很多人定居到 919 年建立的东都，即今天的辽阳。这是一个像上都一样的双城。北部，契丹住在帐篷之中，叫做本城，南部还是叫汉城。尽管住在那里的大多数居民都来自原来的渤海国。10 世纪时，据记载全城人口数字有 40600 人。通过分析现代地图，我们能够复原辽城的模式，因为城墙的北部显示了旧城墙的废墟，这大概表现了本城的遗迹，919 年成立的契丹宫城遗迹。据载，所有的城墙大约 9 米高（3 丈），我们可以无误地假定南部的汉城正是今天依然存在的城市。看上去似乎甚至在明代，所有的墙都重新建造过，但只有城市的南部实际有人居住，因为清代当满族人在辽阳以北建造了新都沈阳后，该城失去了其统治地位。然而，在辽代，东都似乎是所有城市之中最大的城市，其城墙总长大约 30 里。但根据现在地图推测，只有当所有的墙体，包括分隔墙算在内，而且应用 10 世纪后周时代（951－960 年）的度量单位，401.23 米为一里的小里度量单位，上述说法才得以成立。测绘人员没有发展出一个规则形状的围合体，并且看来也没有应有的"神奇"意义度量单位（参见图 4.2.2.14－16）

图 4.2.2.5 八里城，渤海国前边境线附近的边塞城镇，比例：1：20000，参见《考古》，1960/2。

正如我们所见，辽代的测量者们能够建立一个像庆州那样非常规则的布局，我们可以在八里城发现另外一个实例，一个带四座门的完全 2 里 ×2 里的方形城市（这是按另一种后周的度量，442.2 米＝1 里），它建立于辽代初期，在黑龙江哈尔滨西北的松花江之北

1 译者注：上京城的规划建设是由汉人康默记等主持的，韩延徽也参加了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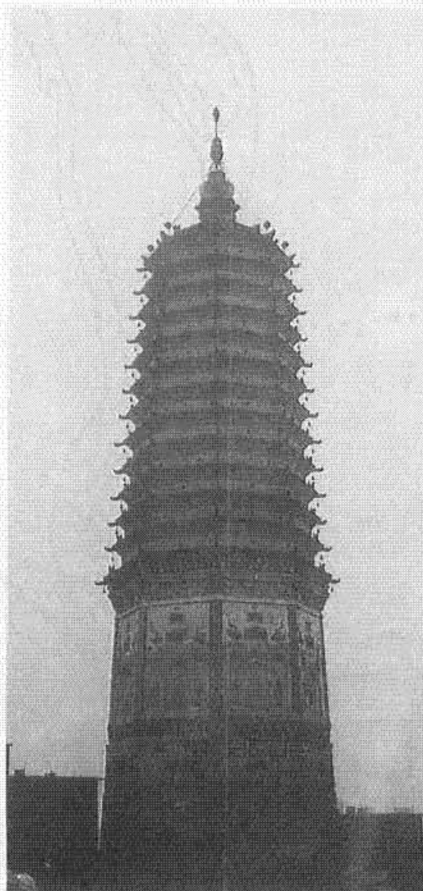




图 4.2.2.8　辽代西都山西大同上华严寺大殿，最早建于 1055 ~ 1064 年年间。
大门入口在东面，正面由墙体包围，这在中国建筑中是不常见的设计。对于这种不同寻常方位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也许因为云岗石窟坐落在同一条东西轴线上的正西方。于此，寺庙在精神上与云岗石窟相连。在 1049 年和 1059 年，统治的辽代皇后命令在云岗大佛前面建造十座寺庙，作为在大同的西都的宗教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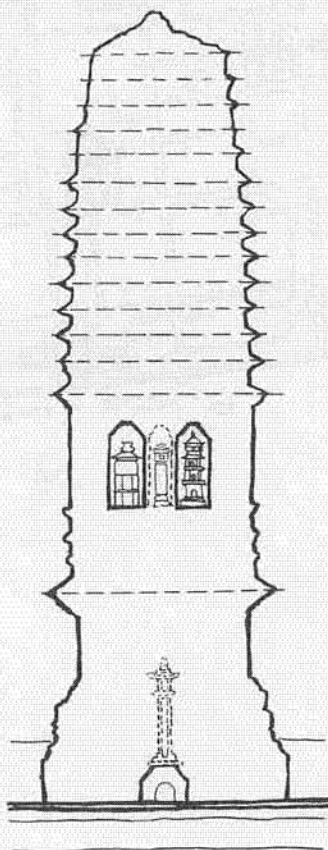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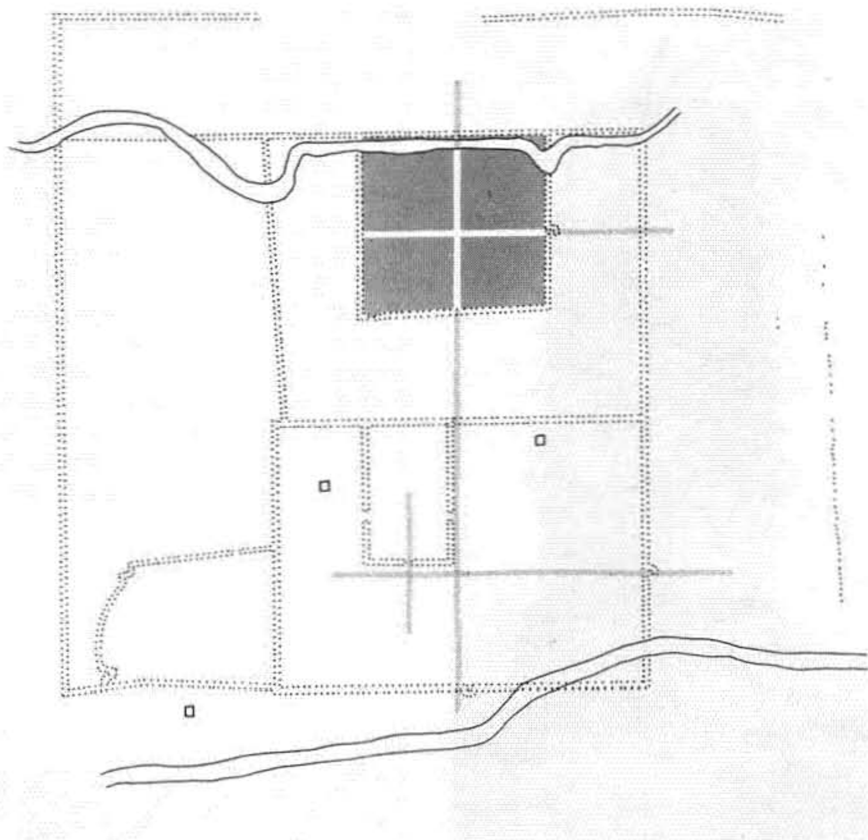


图 4.2.2.6　今日沈阳城市西北有着佛舍利的舍利塔，建于 1044 年，辽代皇帝兴宗统治时期（1031–1055 年在位），本名为耶律宗真。
塔是一座实体砖结构。在塔状基础上，共 13 层，带有装饰，总高 30.5 米

图 4.2.2.7　北京市房山县北正村云居寺南塔剖面，显示了实体的砖结构，里面带有几个孔洞放置舍利的盒子，参见《考古》，1980/2。
上面的三个孔洞中，一个里面放着塔的模型，中间是佛经的经幢，另一个放有年代为 1051 年的舍利盒子，与沈阳的舍利塔为同一时期

图 4.2.2.9 河北承德东部的平泉县，辽代的中都。

建于 11 世纪初期，城市发展成一个带有多城墙围绕区域所组成的建筑群。宫殿群坐落在极有可能是留给契丹贵族的宫城中心，称为皇城。其南部是另一个同样尺寸的围合区，被称为汉城——汉人的城市。城内，一个墙体围绕的区域被安置在一边，大概用于管理。南北向街道几乎准确和中轴线重合，贯穿两座城市直达宫殿建筑。除了南端，城墙所围区域的痕迹在邻近两座城市处被发现。所以推知：整个墙体围绕的区域覆盖面积大约为 2.7 公里 ×3.1 公里的矩形。汉城里还发现典型的辽塔遗迹。宫殿大殿和庙宇大门的名称已被记载下来，暗示了与隋唐长安布局的对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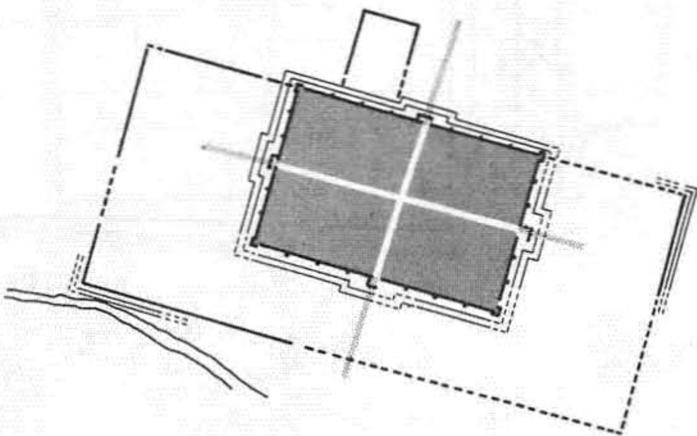


图 4.2.2.10 黑城遗址。[1] 一座辽代城市与一个老的汉代行政中心的融合，位于辽都中京北部内蒙古的宁城县附近，比例 1 ： 20000，引自《考古》，1981/2。

阿拉善旗是一个古老的汉代城墙包围的区域，在其内部建造了辽代的城市黑城，作为契丹的宫城。其北面可能增加了另一个小的有城墙围绕的区域作为另一座独立的宫殿，叫作华城。汉城城墙的尺寸不大，仅超过 2 米高。但是，北部的墙用于辽城，并埋到 6 米高的新墙体之下。两个有墙围绕的区域布局皆是完整的矩形，并以精确的对称相结合（参见图 3.1.2.12）。汉代的矩形尺寸正好为 2 里 ×4.5 里（以汉代度量单位）

1 译者注：该处为辽的州府所在，原文恐有误。董鉴泓先生教科书写的辽中京，位于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县大名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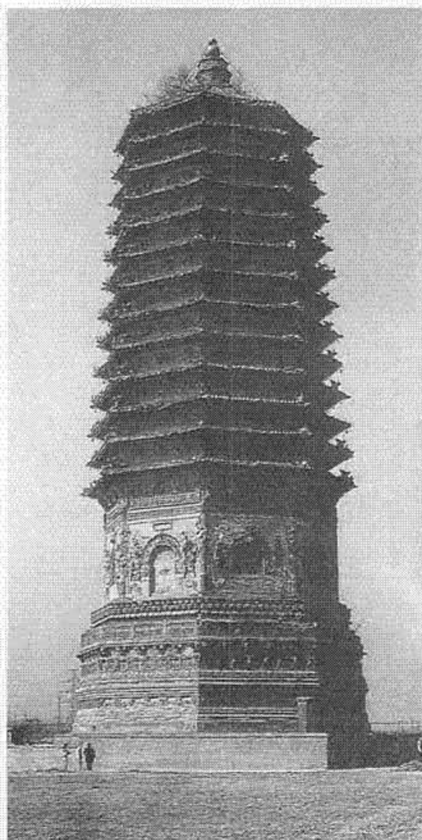


图 4.2.2.12　辽代南都，南京，在现代的北京内，比例 1 ：40000，该平面图基于北京市博物馆所藏的金代中都复原图。

937 年，契丹军队攻占了北京一带，那里一座作为古代燕国中心的小城已经存在有一千多年。在这里，阿保机的继承人，他的儿子耶律德光（926–947 年在位），不仅建造了另一座都城，而且正式建立了辽代，表明他正式登上中国的皇位，并沿袭中国帝制，立其父为太祖，自己为太宗。同时，他建立了渤海国的"五都"制，在此地建立的新城叫做南京，即南部的都城。根据现代地图复原的南京布局表明了一个显著的中国概念和一个完美的方形围合体的实施：6 里 ×6 里，基于 10 世纪的度量单位，一大里等于 554.4 米，因此，形成了一种"幻方"的模式。人们可以感受到传统主义的中国高参的影响，但是，宫殿从中心转移到了西南角，那里曾经可能坐落过旧的唐代的城市。新城的居民主要是汉人，皇帝和他的契丹贵族也许并不喜欢在可能的叛乱时刻被幽禁在城中心。宫殿坐落在西南，可以不必穿过城市就直接到达城外，一旦到了外面，这些骁勇善战的契丹武士们就无所畏惧了。宫殿的正北是天宁寺，已经于 602 年建于北魏佛教地址上。辽在这里建造了一座 13 层的塔，高 57.8 米，其名字正好被用于这种类型的塔——"天宁式塔"。虽然天宁塔也许有意放置在宫殿向南延伸的主要轴线上，其他更为古老的宗教建筑在其固有的位置围合在新城之中，与新布局并没有特殊的关系。

1– 天宁塔，2– 建于 645 年的法源寺，3– 保观寺，1103 年重修，传统上认为这是北京最为古老的寺庙，建于周代，4– 白云观，道教寺庙，唐代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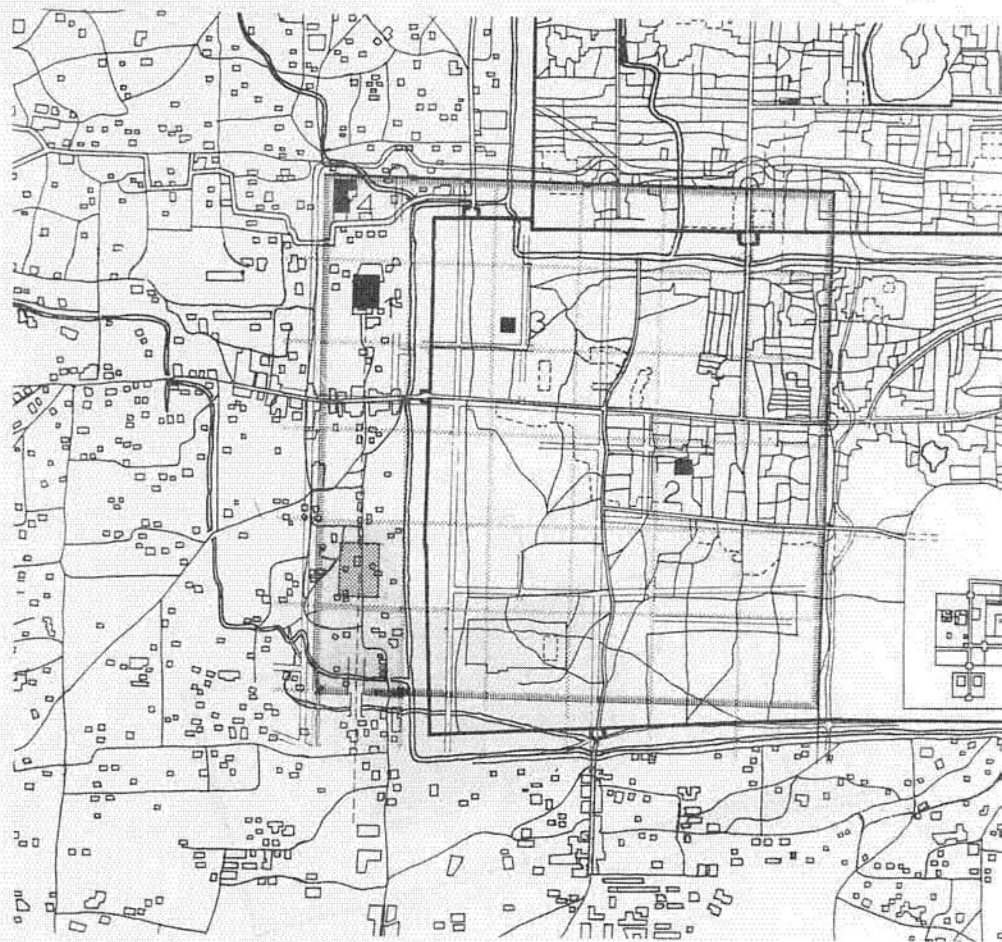


图 4.2.2.11　北京之西八里村的天宁寺塔，是一座塔的真正尺寸的复制品，原塔被称为永安寿塔，1576 年由明代万历皇帝（1572–1620 年在位）的母亲下令而建，塔高 50.2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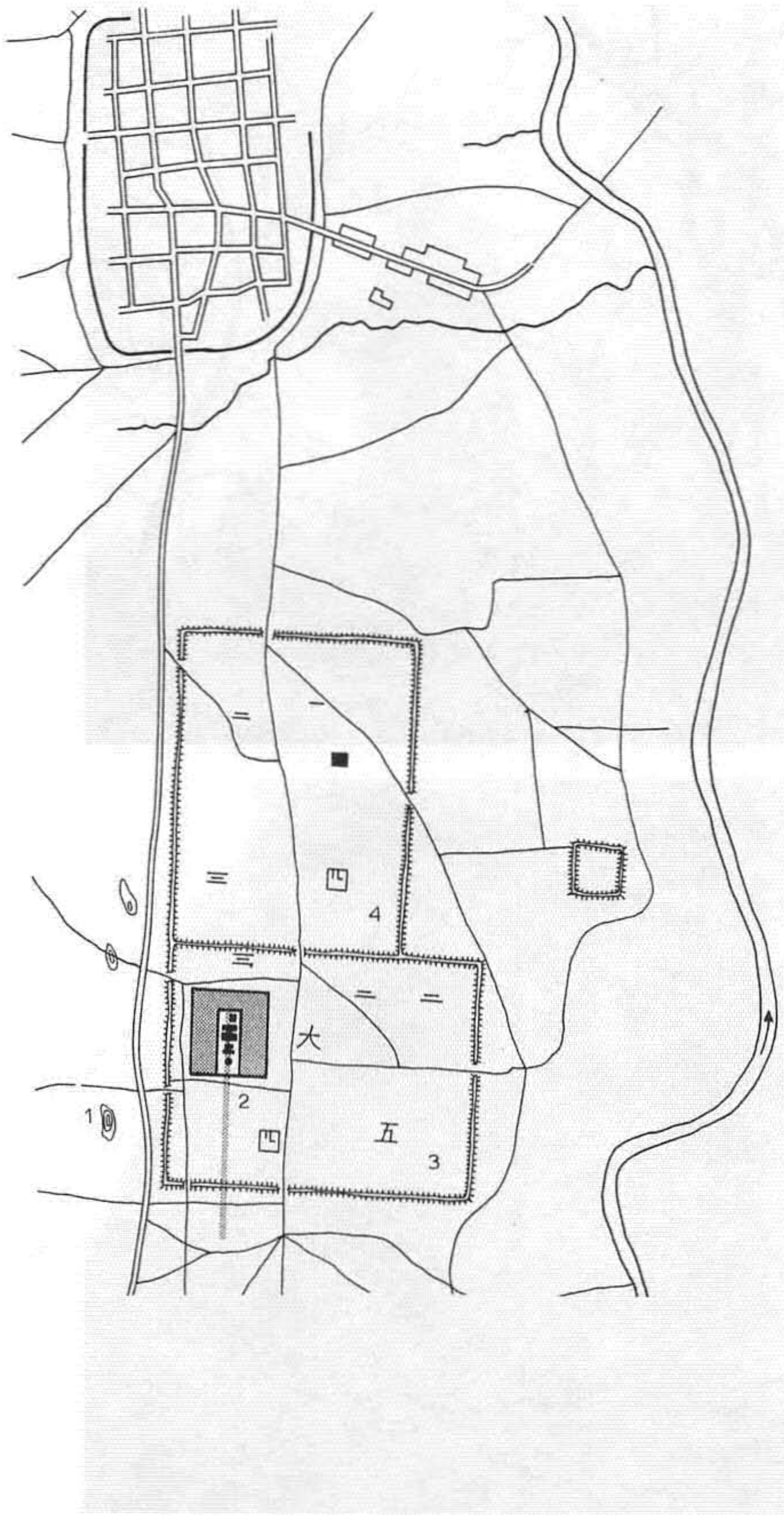


图 4.2.2.13 黑龙江哈尔滨东南阿城县金代的上京，比例：1 : 40000。

根据日本测绘的地图，契丹贵族阶级主要生活在南京的南部，被定居生产的汉族包围着，他们的财富来自于赋税和贡赋。从 1004 年起，宋代每年上缴 100000 盎司的银和 200000 匹丝绸价值 270000 吊的现金。但是这些财富都没有抵达辽帝国北部。结果，1114 年，在女真的领导下发生了反抗暴动，10 年内，辽代的整个权力范围便落到女真人手中。

女真人的第一位领袖是完颜阿骨打（1115–1123 年），他在 1115 年建立了金代。在他 1123 年死后，他的弟弟完颜吴乞买（1123–1135 年）在现黑龙江哈尔滨东南的前渤海国的北部建立了都城。新都叫回宁府和上都，由两个城墙围合的部分构成：南部的宫城（3）和其北部的汉人之地的汉城（4）。阿骨打 1123 年被埋葬于宫城之西的城外，而他的坟墓（1）也许是选择这里作为都城的原因。考古挖掘显示出一个平台，上面有六座大殿，朝南沿南北轴线排列。这些殿堂也许是建造在最北部的汉式建筑物了，主要用作官署。居住则是围绕着这些殿堂的帐篷。在宫殿建筑的南端发现一座带有三条通道的纪念碑式大门，但是城墙的南门并不与该门在同一直线上，表明没有“千步”廊。

现代的阿城在遗址以北，其东有阿什河流过，该河源于南方，流入北部的松花江。河流和遗址之间，有一座不知缘起的方形小城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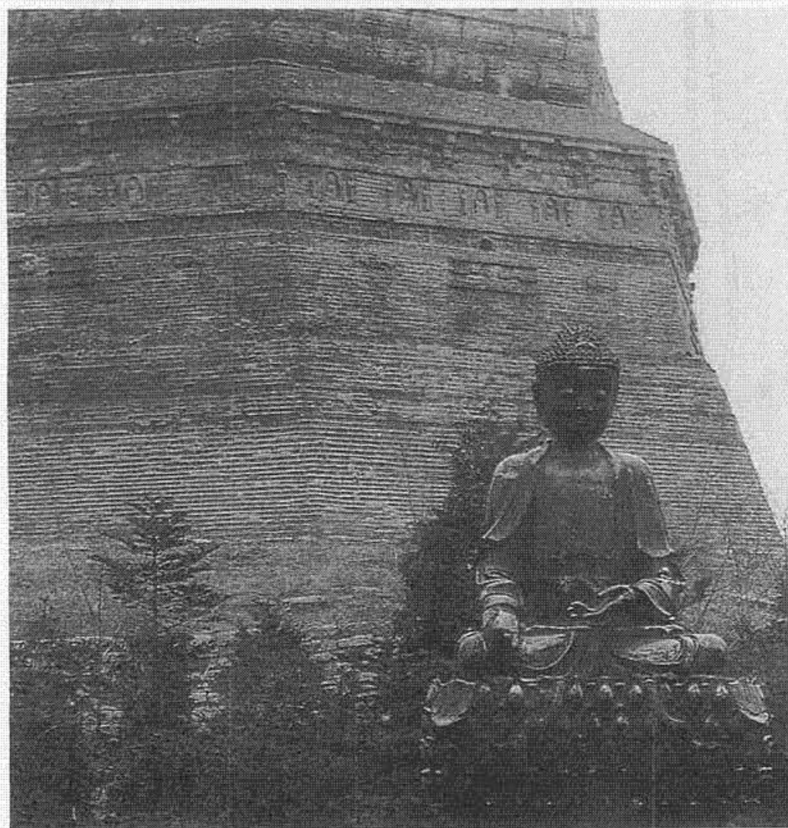


图 4.2.2.14–16　金代东都辽阳的白塔。
当女真军队占据了整个辽帝国，他们接管了已经建立起来的聚落模式和所有辽代城市。依然用辽阳作为东都，大同作为西都，后来在今天的北京，辽时的南京，建立了中都。城市生活几乎不受打扰地继续着，建筑物的建造遵循着几乎同样的概念。
金代的第五个皇帝、金世宗完颜雍（1169–1189 年在位），为纪念其母贞懿皇后李氏在辽阳城墙之西的垂庆寺（译者注：又名广佑寺）建造了一座非常高的塔。八边形的砖塔式，有 13 层，也是天宁，并拥有庞大的基座，总高 71 米。其"魔幻"的目的通过塔上易经八卦的装饰体现出来，这可从垂庆寺佛像后面的背景看到。左边的卦位是坤一地，表示西南位，右边佛像的后面是离一火，表示南面。读者可以对照现代版的古代风水术的文王八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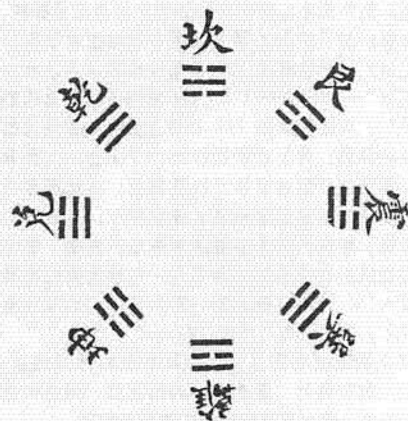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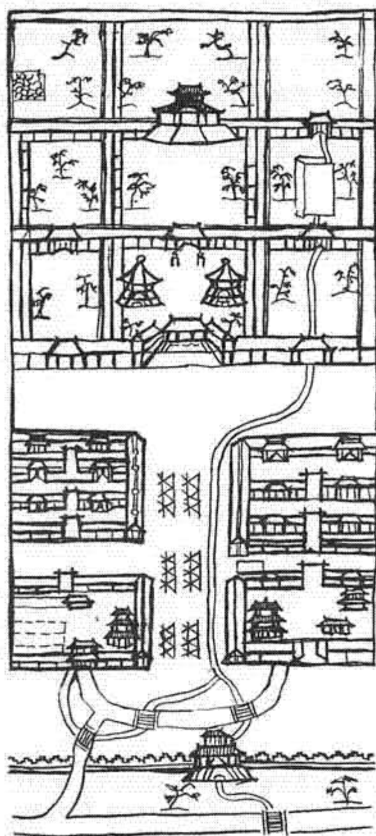
图 4.2.2.17 现代北京城的金代宫殿草图，引自《士林广记》（元代，13 世纪），文物参考资料，1955/7，注意宫殿的"幻方"布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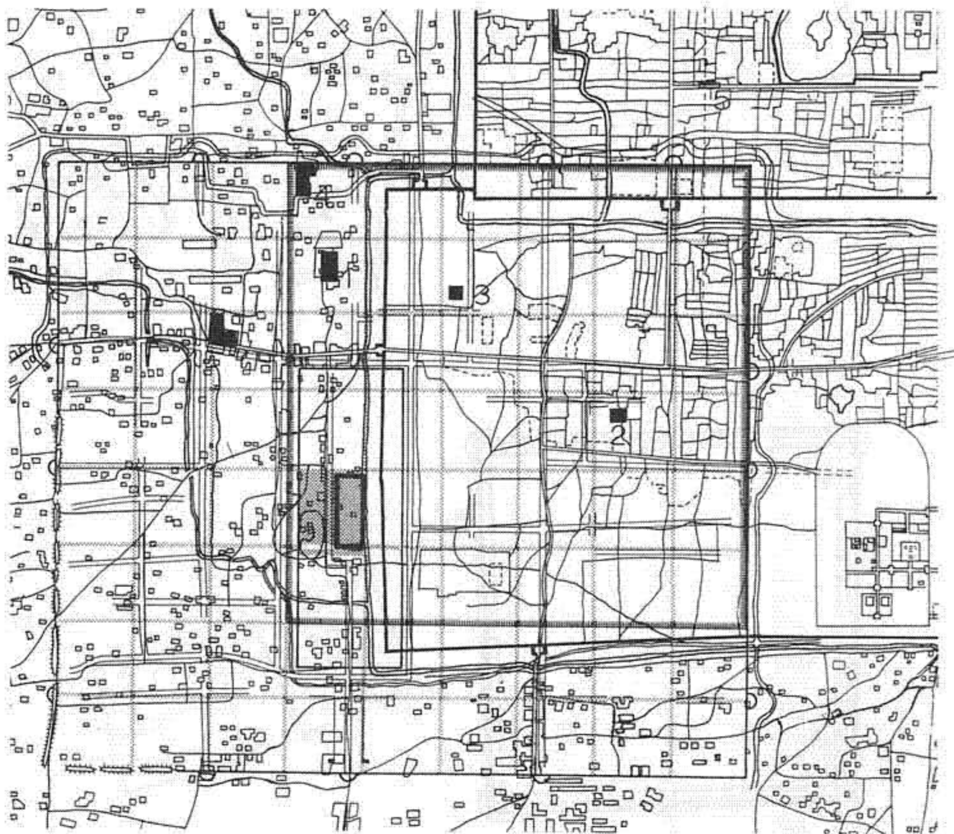
图 4.2.2.18 现代北京城的金代中都，比例 1：40000，引自北京城市博物馆收藏的复原图（参见图 4.2.2.12）。

1123 年，女真族攻克了辽南京之后，辽代结束了。城市成为皇太子粘罕的大本营，记录当时金代都城运动的《金国南渐录》记载它保留了辽代皇帝的宫殿和建筑，但是环绕城市建造了四座城堡，每座城堡周长 3 里。均有两座门，几座塔和像边界要塞那样的城壕，城堡内贮存着谷物和武器，并通过地下（有覆盖物的）通道与城市相连。金代第二和第三个皇帝完颜吴乞买（1123–1135 年在位）和完颜丹（1135–1149 年在位）统治时期，建立了"多个都城"的体系，东都和西都依然坐落在辽阳和大同。后来，在第五个金代统治者海陵王（1150–1161 年在位）时期，故辽都城临潢府成为北部的都城。这座辽上都于 1153 年被毁，因为，北部都城建到了大定府。中都在前辽代南都，今天的北京。南都转到了汴梁，北宋在开封的前帝都，在 1126–1127 年被金攻克。

中都，作为中心都城（在现在北京）正如所称呼的那样，或称为"大兴府"，通过将故辽的 6 里 ×6 里方形延伸为 9 里 ×8 里的矩形而重新改造。这个矩形每边设 3 座城门，再一次证实了该城与"幻方"概念的亲近以及"神数"的运用，建造大师为已经于 1123 年建造了上都的卢彦伦与其他两位汉人。

扩建以后，宫城具有更为中心的位置，并且延伸到北部和南部。其建筑物完全重建，有大理石屏风、瓦屋顶、柱子，甚至有的整座建筑都取材于开封的宋代皇帝徽宗的宫殿。新的宫殿建在旧宫殿的东部，并形成一条新的中轴线，旧宫殿因此失去原来的功能。800000 人和 400000 军队被命令来重建宫殿和城市。这座宫殿不仅包含有用于国家仪典的厅堂，它的西面还有一个小湖的公园，这个合院似乎种植过树木，这里，用于居住的帐篷也有地可放。南宫门的前面是一条"千步廊"，东面有用于文官的房屋，而西面是用于武官的房屋。城市北面挖掘了一面湖，湖中堆有一座小岛，岛上建有超然独立的宫殿，这就是今日北京故宫博物院西部北海中的琼华岛。开封艮岳最大的一块石头被运到了北部并安置在琼华岛上，于是出现了一座皇家公园。最后，在 1171 年，从永定河向东开凿了一条运河，穿过城市的北边，并将城市与通县附近的大运河相连，使货船能够从南部运载粮食直到都城。1190 年，运河北部建立双塔寺（5）。金中都惟一留下的东西是一些城墙废墟，从这些废墟我们得以复原金中都布局的尺度（参见图 4.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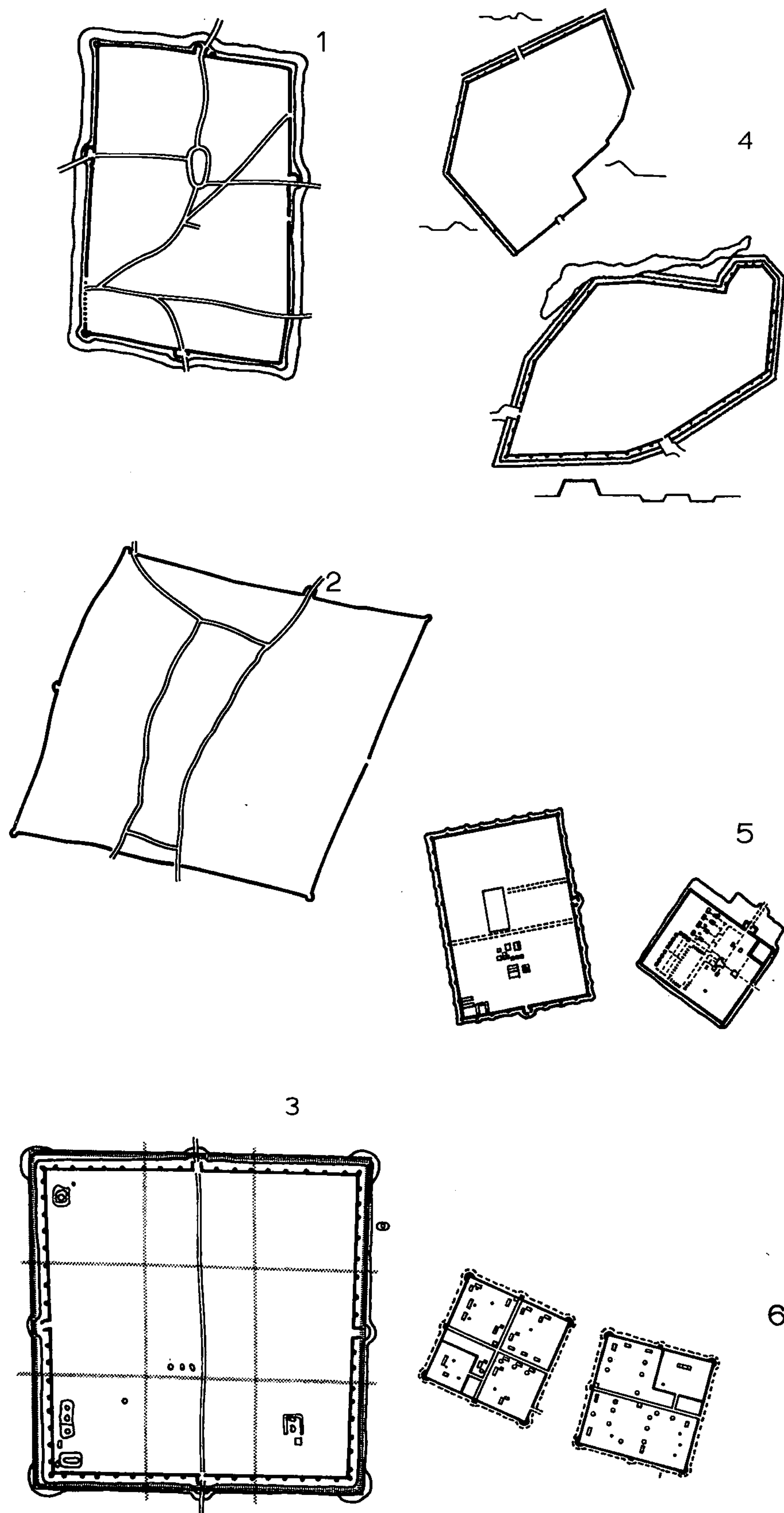


图 4.2.2.19 东北地区和内蒙古金代一些城墙围绕的小城实例，比例 1 ： 20000[1]。

如果用是否规则整齐来决定建造的时期，两个较大的维护结构可被认为是具有城市特性的年代较早的地方。一个是怀德县秦家屯古城（1），另一个是梨树县偏脸古城（2），在现今吉林省长春以西，彼此密切相连。它们的布局表明了寻求规则整齐的尝试，但是游牧民族的工程师似乎已经发现测绘的困难，似乎并未用到任何的度量体系。最为规则的城，尽管不完全准确，是哈尔滨以西和松花江以南（3）达安县的塔湖城，它也许是稍晚些时候建造的。距这里以东不远和河流的北部，是辽代的八里城（参见图 4.2.2.5），其也许已经作为一个典型而存在。然而，塔湖城是一个 3 里 ×3 里的神奇方形，四座门规矩地安排在墙体中部，因此，街道形成了一个十字形。已经发现南北向街道，以及角落的水井和在围城区内用为建筑物基础的平台。墙体北面长度 1322 米，南面 1262 米，东面 1295 米，西面 1302 米，并且基座 6 ~ 6.5 米高和 24 ~ 31.5 米宽，但是顶部 1 ~ 3 米宽。扶壁、碉堡以及双重城壕，强化了防御设施。其他地方是沿着边界的长城东西两侧更小的城堡。较早期的城堡，也许是上都东部牡丹江下游的较大营地，而且大概是王室防御体系之一部分（4）。西边为源自 12 世纪末金代长城部分，建来防御蒙古族的入侵。在城墙中心，近吐列毛杜的地方，发现一座双城，包含主要的储藏设施，坐落位置似乎为蒙古与金国之间主要交通线上的重要门户（5）。更往西，在另一条防御线上和近同一条道路上，两个小城堡，大概是指挥哨卡被挖掘出来，除了包含有指挥官和其储藏设施，还包括一系列的建筑，大概是更为永久的帐篷或者是类似的地点（6）

---

1 引自：1.《考古》，1964/2；2.《考古》，1963/11；3.《考古》，1964/1；4.《考古》，1960/4；5.《文物》，1982/7；6.《考古》，1984/2。

正规则的。有时，在城墙的布局上可以观察出有过规则性的尝试，但是，正角相交的做法显然对部落里的“工程师”有难度，因为，几乎所有的案例中，角度都非真正的90度。度量单位似乎也没有遵循任何既定的体系，至少没有遵循汉人的度量体系。

到了13世纪初，金代不断受到另一个新兴强盛部落联盟的威胁，这就是蒙古族部落，它已经于1147年成立。当时，他们的部落首领合布勒耶速该自立为“大蒙古帝国的皇帝”，他效仿中原王朝，建元“天兴”，自称“祖元皇帝”。相应地，北部的金人部落沿着大兴安岭山脉建造了一条防御长城，从现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以北，到黑龙江省现在齐齐哈尔北部的嫩江江岸，有1500公里长。很多地带的城墙是北魏到西晋朝代3～5世纪旧长城的重建，它们正如前代或后代出现的城墙一样，防御并没有效果。沿着这些城墙，金在防御系统的主要大门入口处建立了营地和小镇，有些已经被发掘出来。它们大多数在布局上是非常规则的。我们可以设想这是金代发展后阶段的结果。因为，所有那些我们可以推测为旧城墙的都是不规则的，最不规则的是今天哈尔滨东部沿牡丹江东部边界防御体系的城墙。

4.2.3 蒙古人的元代(1271–1368年)

1167年铁木真出生于今天蒙古东部奥农河流域，1206年被选为蒙古联邦大汗，并且采用成吉思汗的头衔之后，蒙古人转向有组织的进攻。始于1210年，在5年的时间内攻克了金的绝大部分领土，而在1215年,他进入了中都（现代北京），在1218年和1223年间，他在喀拉库伦,今日蒙古的中心,建立了都城，位于现今乌兰巴托以西的西伯利亚贝加尔湖的南部。

成吉思汗指挥了抗击西夏的战役并于1227年将其歼灭，之后也死去。西夏王国曾于1038年在甘肃省由唐古特部落联盟建立，其统治家族曾是公元6世纪北魏皇帝后裔的拓跋氏家族，其中包括藏族人、维吾尔族人、土耳其人以及汉人。也



图4.2.2.20 沿着大兴安岭建于1190年和1196年间的成吉思汗城墙遗迹。引自Yu Jin编，长城，北京，1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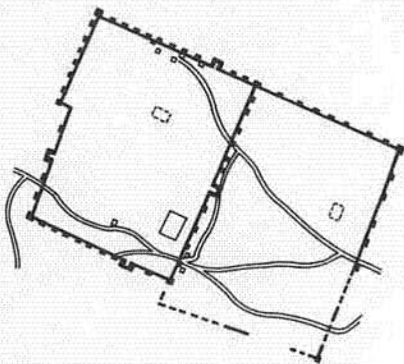
图 4.2.3.1 蒙古族的马背骑士和弓箭手，以无可抗拒的气势勇猛进攻。参照来自 14 世纪的手抄本中一位波斯人的彩饰画，现存柏林国家图书馆。
当蒙古人在 1234 年攻下了华北大部分地区后，山西和山东的生铁和钢材业，供给军队厚重的盔甲，使得在波斯人以及 13 世纪中期欧洲各国在重兵把守下依然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正因此，其文化是混合的。一般来说，其风俗习惯是唐古特的，但他们的语言是藏语，以一种新的音标文字来书写，这是基于中国汉字而发明的一种音标文字。虽然他们的经济基础是牧业和农业，沿着丝绸之路，他们参加到贸易中，而此丝绸之路为他们所控。

结果，他们不但变得非常强有力，而且也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从此，他们持续地威胁宋代在这里的汉人，他们甚至强迫宋代皇帝向他们进贡。1044 年，一项条约规定，要进贡 135000 匹丝绸，72000 盎司白银和 30000 磅的茶叶，所有这些他们大概是用于与西方进行贸易。其都城是目前的宁夏银川，但是，对其几乎一无所知。成吉思汗不愿在其西部边界忍受一个像这样王国的存在，因此，最终在 1227 年终于将其毁灭。西夏的最后都城是今天在内蒙古北部著名的黑水城。

当成吉思汗 1215 年进驻金中都，也就是现代北京时，他俘获了金的官僚并强迫他们为其效劳。这些官僚之一，就是耶律楚材，耶律家族的后代，是契丹——通古斯的辽代原始创立人，而此人成为成吉思汗的大臣。他作为汉化了的金代官僚所受的教育以及经历，以及他的种族背景，不但使他容易被接受，而且特别有用。是他将喀拉库伦建成都城。

对于废墟的挖掘，显示出城池一般的、不规则的轮廓。由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派遣到大汗所在地的特使威廉 · 罗伯鲁（William Rubruk）从 1253 年至 1255 年驻留在此，他对于城市的结构进行一些描述，威廉 · 罗伯鲁说道："那里有两座城，一座是为穆斯林的，那里坐落有市场，而且因为朝廷就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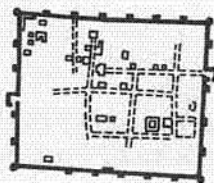


图4.2.3.2 在11世纪由西夏人所发展的代表他们自己语言的基于中国文字基础的文字实例

图4.2.3.3，4 西夏国（1038–1227年）的两都城，比例1：20000

图4.2.3.3 西夏国的第一个都城，称为下都，近今天陕西省的靖边县，参见《考古》，1981/3。西部是主要城市，一座较为古老的汉代行政中心，为西夏占据大约990年，并且遵循辽代都城系统随着东部的外城延伸。第二座都城是兴庆府，今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金川。在城市以西，夏的王陵依然坐落在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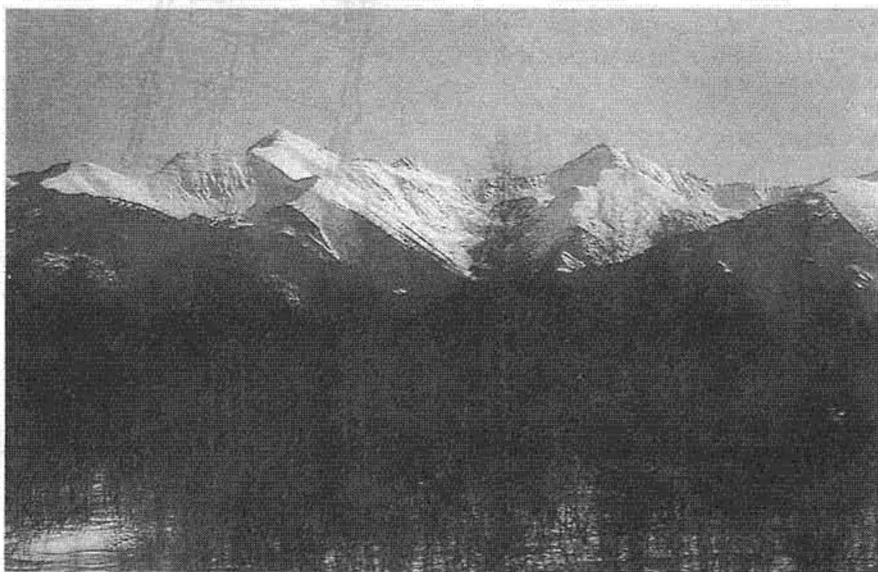
图4.2.3.4 黑水故城，1125年后的第三座都城，也以Karakoto著名，近现今内蒙古的额济纳旗，参见《文物》，1987/7。
原先，这也是汉代北部哨卡之一（参见图3.1.2.7，12，图3.1.4.16），城市在1227年被成吉思汗毁坏之前，大约一个世纪里都作为夏的最后的都城

图4.2.3.5 从空中鸟瞰黑水古城。参见《中国画报》，1988/2

图4.2.3.6，7 蒙古人的家园。我们所知的第一批蒙古人是勃儿只金部落，居住在今日蒙古的北部奥农河一带大草原上的游牧部落。11世纪时，他们与一个部落结成了在西伯利亚道里亚贝加尔湖东面森林里的游牧部落联盟。大约一个世纪以后，那个部落占了上峰，从而抹去了蒙古名字。在1175年，勃儿只金部落领袖耶速该被鞑靼人所杀，他从贝加尔湖南面森林的游牧部落篾儿乞所俘获的妻子，只好在困境下，在来自那个部落的持续威胁中，抚养子女。她的长子，铁木真，生于1167年，在1185～1186年，作为勃儿只金部落低阶层的领袖十年之后，脱颖而出。又过了困难的十几年后，在1196年，他打败了鞑靼人，替父报仇雪恨。他重组了部队，废除了贵族领导体制，这样，任何人都可以在其成就、功勋和忠诚的基础上，成为军中领袖。以此方式，他从所有蒙古部落中吸引到很多抱负不凡者。当战利品全落入铁木真将军之手时，他将这些战利品又全部分给了有功之人，因此，传达了公平和正义的理念。以此新的战争机制，绝大部分的蒙古人部落在1206年降伏统一。当铁木真被选为大汗并采用成吉思汗名号时，在此名号下，他成为了他那个时代令文明世界颤栗的著名人物。
图像表现了在奥农河区域的大草原国家，勃儿只金部落在此生活居住，而铁木真1167年出生于此。在东西伯利亚山脚的道里亚森林，是那个部落森林部落的家，有时是勃儿只金部落的联盟，有时是敌人。在贝尔加湖南部的薛凉格河区域的森林冻原，是铁木真母亲的家，其来自篾儿乞部落，这后来在1215年也被灭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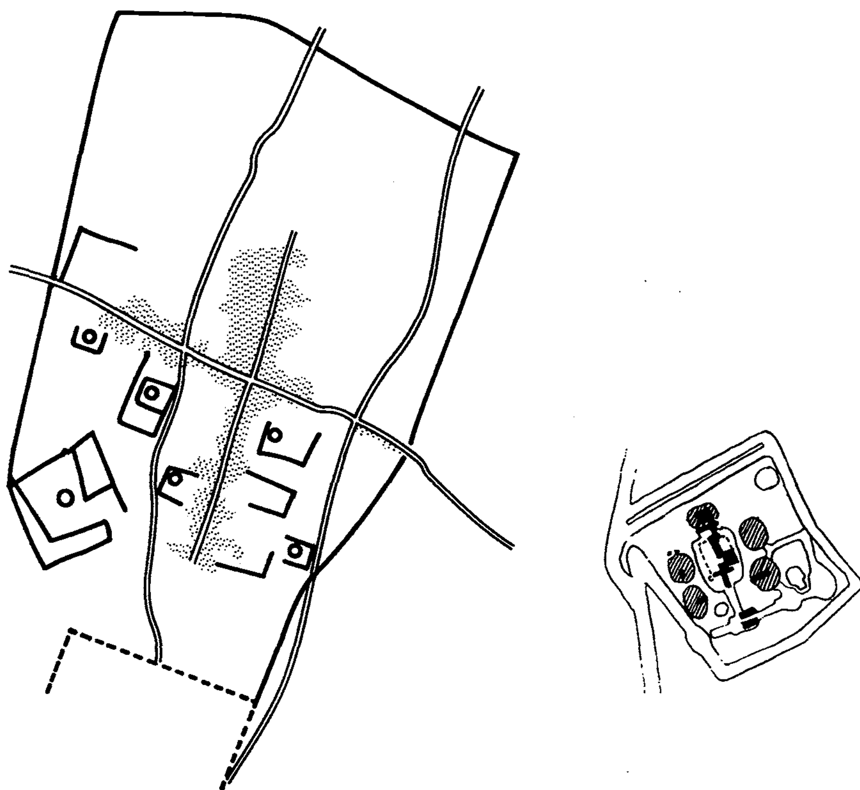


图 4.2.3.8 现今蒙古的卡拉库伦城废墟，比例 1 ：40000[1]。
1218 年，成吉思汗的大臣，一个叫耶律楚材的契丹人，一个辽代前统治家族的成员，围绕着一座古老商旅和贸易的中心，建造了城墙，为蒙古皇帝建立了一种军事都城。布局的形状以及所有细部表明它是一种临时决策下的产物，而非一座帝都预先策划的规划。仅有建筑物和构筑物的建筑外观，表明了汉人的影响，或甚至由耶律楚材所使用的汉人工匠们建造。蒙古人的第二位大汗，窝阔台（1229—1241 年），在城池区域西南角建造有宫殿。其布局显示了对于规则的微弱尝试，但是，建筑群体的主轴线偏离开粗略的方形宫殿群体的方位，其既不指向北也没有表示与作为整体的聚落的任何关系。在这种布局和其他游牧都城之间的基本相同处也许在近外墙处宫殿群的坐落位置可以观察到（也参见图 4.2.2.1，12，13），正如威廉 · 罗伯鲁所说，大概因为贸易中心的很多居民无须是忠实的蒙古人，而一个马背骑手如果无须穿过整个城市而离开，也许会感觉更加安全些

图 4.2.3.9 喀拉库伦宫殿建筑物的布局似乎象征了营帐布局，比例 1 ：20000（也参见理想的规划图 4.2.1）

8 9
10 11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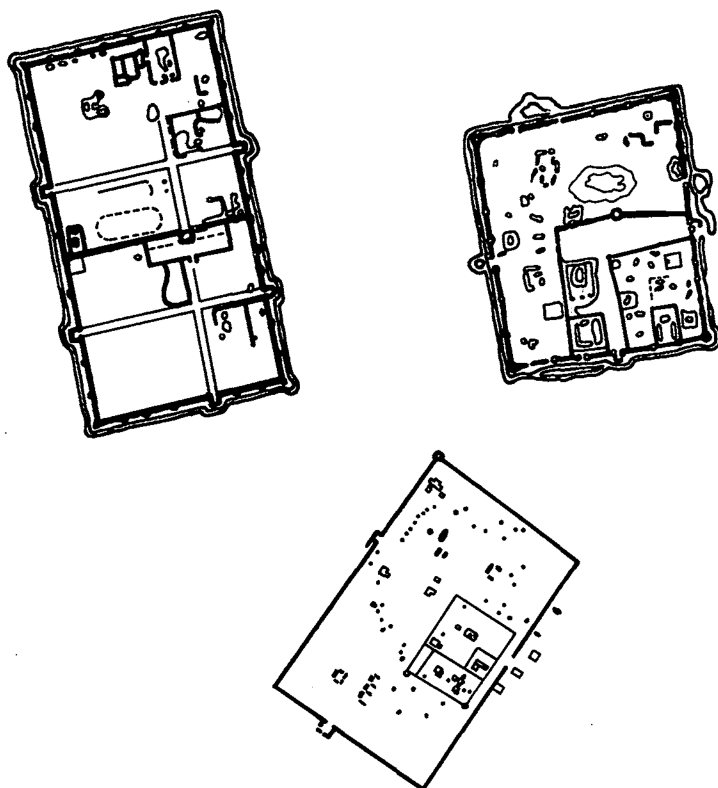


图 4.2.3.10—12 9 ~ 12 世纪，蒙古部落中心的废墟，比例 1 ：20000[2]

图 4.2.3.10 蒙古的道里亚（奥农河的一条支流）。两座城池，北面的可能包含主要宫殿，是辽代的典型布局

图 4.2.3.11 蒙古东南部的一座宫殿，一座围绕它的宫城和外城，辽代布局的第二种类型，也是在道里亚河谷

图 4.2.3.12 蒙古人的王宫，景教"祭司乔治"的王国，马可波罗称之为"天的（Tenduk）"，在山西大同以北，集宁以西的内蒙古[3]。
近城东墙的宫殿和庙宇，西北角是由意大利方济各会士约翰 · 孟高维诺建于 1292 年的哥特式教堂的废墟，当时他将景教转变为他的意大利方济各会的教义

1 参见 V.S.Kiselev.Drevnije Goroda Mongolii ——Old Cities of Mongolia.Sovjetskaa Archeologija，1957，(2)．
2 参见 V.S.Kiselev.Drevnije Goroda Mongolii.Sovjetskaa Archeologija，1957，(2)．
3 参见 N.Egami.Journal Asiatique.26，Paris，1952.

附近，以及许多大使的原因，很多商人汇聚于此。另一城是为汉人的，他们都是手工业者和工匠。在这些区域之外是属于朝廷官僚的大府邸。有12座不同种族的偶像崇拜者的庙宇，两座是清真寺，那里解释穆罕默德的戒律，而在城市的远端是基督教堂。墙体是泥的并有四座门，在东边近门处，他们卖小米和其他谷物，很少是进口的；在西边，他们卖山羊和绵羊；在南门，卖公牛和马车，这些被蒙古人用来搬移帐篷以及当他们随着牛羊迁徙时搬运家什；而在北边，卖主要用于战争的马匹。”这地方原来是蒙古人极少数的帐篷营地之一。而当添建了宫殿后，中央的城池区绝不比当时近巴黎的圣·丹尼斯的郊区大，正如威廉·罗伯鲁告诉我们的那样。然而，城池由部落广大的营地所围绕，大汗绝大部分时间与家人在帐中度日。他仅在城内宫殿中处理政事，那里他还接见众人。

当1231年耶律楚材成为宰相后，根据汉人的原则，他重新组织了扩张帝国的行政治理并且建立了所有机构，形成了后来蒙古政权典型的开发规则。我们可以假设在这个时期，当在蒙古大地引进了行政管理之后，蒙古领袖们参照喀拉库伦来塑造他们的府邸，也即是城池带有宫殿和庙宇并且围绕着大帐篷。几个这样的本地中心在今天的内蒙古和蒙古以及东西伯利亚的一个省，也称道里亚都有发掘。在今天的蒙古，在册的有27座城市废墟，其中，自从1946年起已经出土10座。大多情况下，这些城池是方形或矩形，有些是包含两座城池，其中之一大概用作宫殿。这些围墙内的面积适中，因为绝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墙外帐中。这种城镇一个非常有趣的实例在内蒙古现今的呼和浩特以北发现。而其遗址已经用以与蒙古人时代的西方观察者的描述相比较。

当马可波罗在13世纪70年代穿过中亚到达中国时，路经“天的(Tenduk[1])”。他写道：“都城称为‘天的（Tenduk）’，当下在位的王是祭司约翰的后裔，并依然是约翰祭司，名叫乔治。他既是一位基督徒，也是一位祭司，居民绝大多数也都是基督徒。这位国王乔治，将其国家保持作为大汗的封地……在此，他们同样制造驼毛制品。人民通过农业、贸易和机械劳力自给自足……很多城镇居住有穆斯林和景教基督信徒们。他们靠贸易和制造业获得生机，纺织金丝的布匹点缀着珍珠，以及不同质地和色彩的丝绸……以及各种各样棉织品……并且制作各种军用服饰以及用于军队装备的每一种必须的用品。”“天的（Tenduk）”相信与大约960米×580米的矩形城池相同，现今被蒙古人称作Olon-sume-tor，意为“许多庙宇的废墟”。它是汪古部蒙古人首领的居所，是一个景教的蒙族部落。1305年，当时罗马教皇的使节约翰·孟高维诺（Giovanni di Montecorvino）作为北京的主教大人写道：“在这个世界的某位王，名叫乔治，我1292年到此的第一年向我咨询，在我引导他寻求我们的真实信仰之后，他服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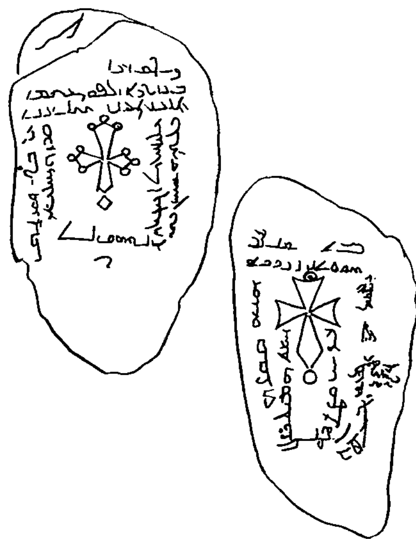


图4.2.3.13　从1186–1345年带有碑刻的景教墓碑，在新疆和哈萨克斯坦之间边境的区域中，发现有大约六百块景教墓碑，这是其中两片的碑刻拓片。参见《考古》，1963/10。
据考证，石块是来自一个汗国都城，在阿塞拜疆的墓地，其坐落近现今新疆近伊犁河谷的霍城

1 译者注：位于北京西北部。



图 4.2.3.14 蒙古元代的第一位皇帝忽必烈以及蒙古人的第十五任大汗，大都的建立者。参见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绘画。

忽必烈生于 1214 年，为成吉思汗孙儿中的一个。1244 年，他被指定作为皇位继承人，那时，他的兄长成为第三位大汗蒙哥（1251–1259 年在位），负责治理鄂尔多斯沙漠以南的所有区域，当时为华北大部，是金王国的南部。1256 年，他建造了北部都城，称为上都，开平府，而在 1260 年，他成为了第四位大汗。在旧的金代中都，也称汗八里的基础上，他于 1267 年创建了新王室，大都。在他 1271 年将自己的朝代命名为元代以后，大都于 1272 年成为了他的都城。1276 年，攻克了南宋之后，在大约 270 多年的分崩离析之后，他将中国重新统一在他一个皇帝之手。1294 年，在他 80 岁时死于都城大都，并且作为中国帝王为数不多的几个伟大人物之一受到纪念，特别是在那些异族皇帝们之中尤其如此

我们的方济各式样的相关法则……，他赢得了相当多的受众和民心，并且建造了一座真正具有王者风范的教堂。”在矩形的城池内，挖掘者发现有几座建筑物的废墟。在近东边城墙的中心，坐落着一座 220 米 × 260 米的宫殿建筑，其也包含着一座大喇嘛庙的废墟，几座佛塔。最后，在城池的西北角，是一座基督教堂的废墟，明显是以欧洲哥特风格建造的。正如马可波罗的描述，城中的人口已经高度汉化，或者说，许多的居民甚至是汉人的手工业者和匠人。教堂似乎是根据罗马教皇的使节约翰 · 孟高维诺的设计而建造的，或甚至搀杂有他那些各会修士们的设想。

蒙古人城市中心的绝大部分是建在城池之内的，这些曾经在 10 世纪和 11 世纪原来为辽代所建。似乎这些城市中心都遵循着同样的基本布局，由几座以不同方式而结合的城墙围绕的区域组成。宫殿区从未在中心，但是与外墙之一离得很近，直接通往城外。后来，当蒙古人在 13 世纪兴建他们自己的行政中心和都城时，继续使用这种布局。

成吉思汗的儿子们继续在各个方向开展进攻。当金代最终在 1234 年灭绝之后，蒙古领袖们在 1235 年决定从四个方向继续进攻：南方进攻中国南部的南宋；东方进攻东部的朝鲜；西南方进攻中东的阿拉伯和波斯帝国；而西方则直接指向欧洲。这些征伐战役，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是蒙古军中的主旋律，直到 1279 年，宋代的南部帝国疆域最终落入蒙军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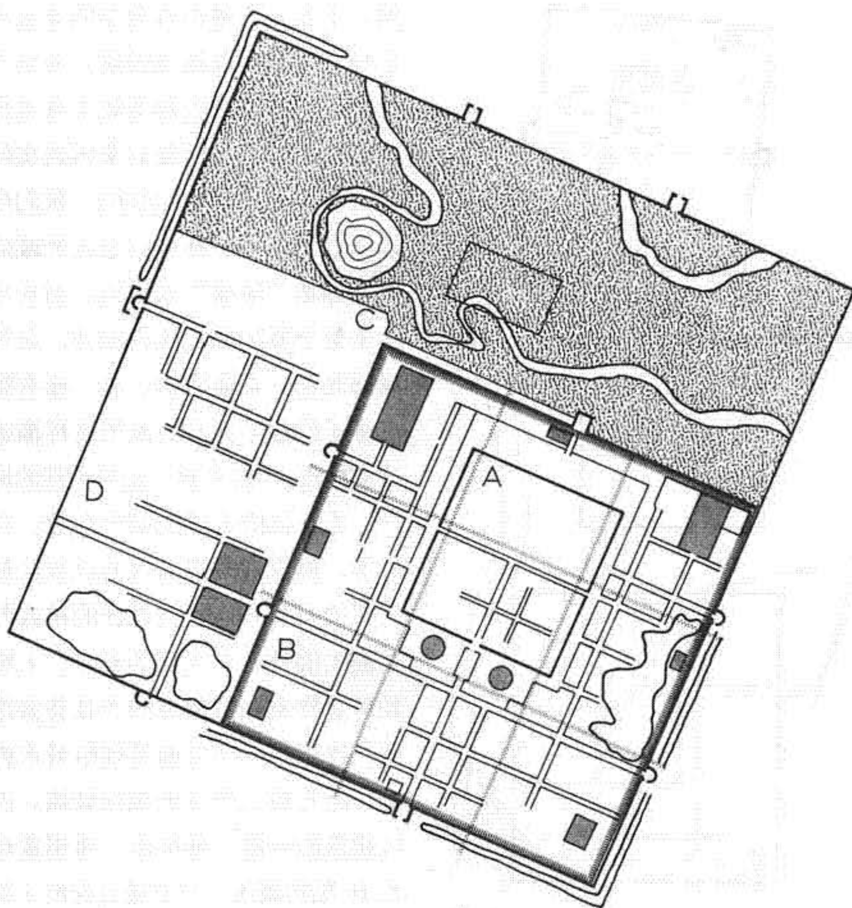
第五位蒙古大汗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即著名的忽必烈（1260–1294 年在位）。他 1271 年建立了元代，并且成为了中国的皇帝——元世祖。早在 1256 年，他的长兄蒙哥，当时是大汗，就已经下令他在开平府，也就是现今内蒙古多伦诺尔（Dolonnur）城的西北建造一座新都城，并在 1264 年，遵照辽代和金代的多都城体制，重新命名为上都。上都的规划者，据载为汉臣刘秉忠（1216–1274 年），他在 1243 年，接替了耶律楚材，与几位其他的汉人大臣一起成为支持皇帝文明汉化的力量。刘秉忠在执政的最初几年里，就已经给皇帝上奏书，其中，他写下为政执政的原则，特别引经据典解释他的原则。非常典型的是，他将大汗（当时的蒙哥）和他年轻的弟弟忽必烈与周代的武王和他的兄弟周公进行比较。他强调了周公在周代建立之时的重要作用，以此，为忽必烈树立了一个典范。这种劝于周公的参照，与他在开平府新都城的布局中使用“神奇方形”概念完全吻合。城墙的废墟表明，有三重城墙围绕的城区：宫城、内城和外城。带有宫殿的内城形成了一个每边 3 里长的完美方形，基于北宋 30.8 厘米为一宋尺，462.0 米为一小里的度量单位。原来的概念，包括根据中国的八卦原则，在内城的八个外部空间的八座寺庙。其中，与在东南角的孔庙一起，已经辨别出来有三座寺庙，并发现宫殿建筑群，离开中心的方形而某种程度地

1366 年，学者陶宗仪（1315–1403 年）完成了他的著作南村辍耕录，在其中，他描述了蒙古人的分类，或更好地说是歧视的制度体系，他讲道了元代社会的三个层级社会：第一层级，蒙古人，有 72 个不同的部落以及在军官贵族和普通百姓之间尖锐的区别；第二层级，几个种族，包括除了蒙古族和汉族之外的所有其他人，即那些大概有 31 个组的具有任意一种描述意义的外国人；第三层级，汉人，包括所有辽代和金代的人民，即契丹人和女真人以及朝鲜人，以及 1275 年后也是中国南部具有最低地位的"新种人"。陶宗仪也增加了对于城市的描述，在其中，他将开封和杭州的设计，那种古代的礼仪规矩及谨慎节制与大都的布局相对比，发现后者是过度且不适宜的。

第一层级，蒙古人，是由士兵、执掌军官以及雇佣者组成的，他们也许总数已经达到了100万。

第二层级，是那些官职人员，例如那些大臣参谋、开银铺的、商人们、技术员们、艺术家们、工匠们等。他们人数很少，但是很具影响力。

第三层级，是汉人，包括契丹人和女真人，也许达1000万之众。而6000万的中国南部的汉人，是"新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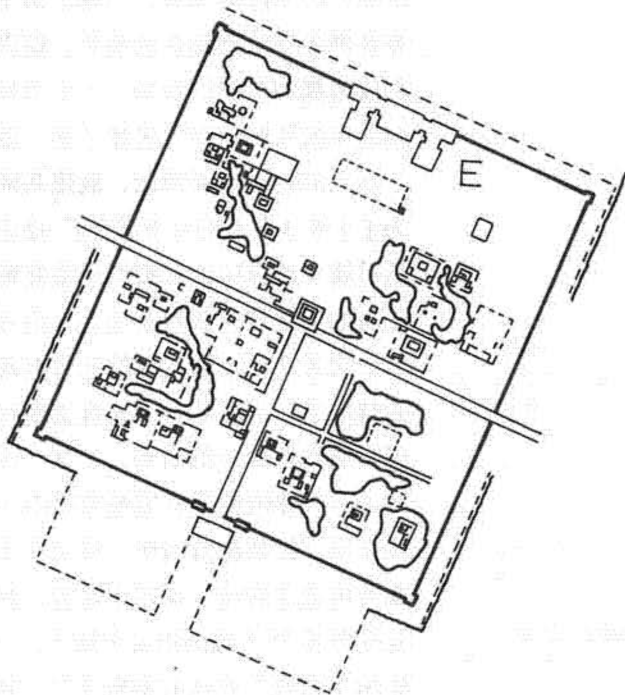


图 4.2.3.15　开平府（北部都城，上都），近内蒙古今天的多伦诺尔，由忽必烈于 1256 年在刘秉忠的指导下兴建，比例 1 : 20000，参见《文物》，1977/5。

沿着宫城城墙，坐落着八座庙宇，其中有三座已经辨别出来，在东南角的庙宇为孔庙，在宫殿建筑群前面的两个圆圈之一，也许是忽必烈的祖先宗祠。

A– 宫殿建筑群，B– 宫城，C– 带有竹宫的御苑，D– 外城

图 4.2.3.16　开平府宫殿建筑群，比例 1 : 10000。

在宫殿建筑中，主要的永久性建筑物是大安阁(E)，五座大殿建筑群，形成了一个弯曲的 U 字形的高台，配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物，据载移自北宋都城汴梁，现代开封。宫殿建筑物的其他部分表现了一种由四座景观园围绕小湖的组成模式。湖上建有亭台楼阁，绝大部分大概是非永久性的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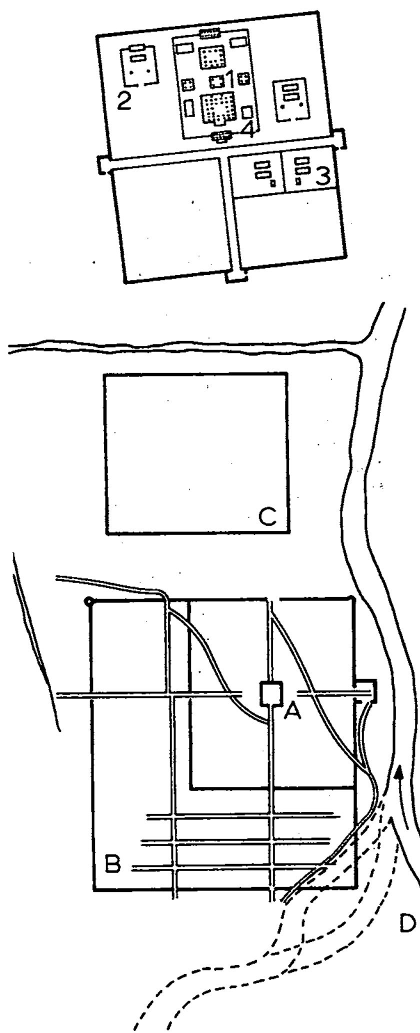


图 4.2.3.17　应城的废墟，在内蒙古 Dalai Nur 湖的西南端的 Yingchang 路的省一级的都城，是参照上都宫殿建筑群的模式，在 1271 年建造的，比例 1 ∶ 10000，参见《考古》，1961/10。
1– 宫殿／寺院；2– 官府或小宫殿；3– 孔学和孔庙；4– 大喇嘛塔

图 4.2.3.18　在山西大同以北的集宁废墟，近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Togrog UL），比例 1 ∶ 20000，参见《考古》，1962/11。
这座城市，是在元代集宁路省级都城的城市。A– 有宫殿和寺院的内城；B– 匠人区的外城；C– 营地；D– 磨子山河

偏向了北方，遵循着典型的蒙古式布局，即将宫殿近墙而建。外城并没有表现一种带有神圣数字度量体系的应用。它可能是后来因为实际原因在原来布局上后加的。我们应该注意到，所有从城门进入外城的街道都是“尽端”式街道，而且实际上整个城区并无大街穿通。在外城的北部，直通宫殿，有一座有很多亭子的园子。马可波罗这样描述这座城市：“你来到一座叫上都的城市，为在位的大汗忽必烈所建。在这里，他令宫殿以大理石以及其他优质的石材兴建，其设计的精致与其施工的技艺令人叹为观止。大殿和所有宫室都是镀金的并且非常漂亮，建筑将一个立面显现给城市内部，而其他三个立面朝向城墙；而从建筑的一端，延伸出一座围成周长 16 里的墙体，只有通过宫殿才能进入。在这皇家苑囿内，有丰美的草原，由小溪灌溉着，小鹿、山羊等各种各样的动物在此牧养，腐肉则成为鹰和鸟类的食物……皇帝根据温和的气候和空气选择了这一适于娱乐的地点，而因此，他使其成为了 1 年 3 个月的夏季居所。”这由马可波罗所描述的宫殿似乎是宫殿北墙的大建筑。到目前为止，由考古学家考察城市所发现的非常有趣的特征之一，就是在大建筑之南宫殿区域其他部分的布局。在这一区域，一些休闲性的宫室殿堂沿着小湖布局，犹如在公园中一样它在主要的街道之间被分成四个部分。只有在南部 25 米宽的街道中轴线，引导两步通向 5 米高的中央平台，将大建筑物留在了后面。也有其他用于单座建筑物的较小平台散布各处，在四个部分的各类建筑之间，所有这些也许类似于帐篷般建造，中间的一个大概是皇帝的帐篷。马可波罗如此描述这帐篷：“皇帝之帐，形成了一个硕大的沙龙，皇帝通常和几个贵族占据着这里，而当他觉得是时候该与任何其他人谈话时，这些人就被带到此地介绍给他。在这帐篷后部，有一座巨大的优美的内室，皇帝在那里休息……帐篷由三根木柱支撑，装饰丰富，雕金刻银……，外面以虎皮覆盖着，白色、黑色和红色的条纹如此完美地密织在一起，风雨难侵。在里边则密缝着黑（紫）貂皮，这是所有毛皮中最贵重的，……以品位和技巧安排着。而拉挂帐篷所用的绳子都是丝制的。”如果我们能够想像宫殿的内部空间是一种没有正规布局安排的具有帐篷和建筑物的某种景观园林，那么，外观则似堡垒一般。城墙 6 米高，基座 12 米宽，并且都以石材装饰表面。

我们已经有了几个省级都城以及各地王府所在小城的一些实例。一个是内蒙古的多伦诺尔湖西南的应昌府，在上都以北 150 公里；另一个是集宁，在现今大同以北，金代的防御城墙以南，坐落在一处以蒙古语称为察哈尔右翼前旗的地方。第一座城甚至不及上都的宫殿大，但是，建筑群是以一种非常中国式建筑的惯用手法而进行布局的。主要的建筑物，包括一座喇嘛塔，布局在城镇的北半部分，以南北大街

从庙宇的前面直通到城墙的南门。在主要建筑物的两侧有较小的建筑物，大概是办公类建筑，而在东西街道以南是孔庙建筑，其也坐落在主要建筑群的东南部分，应昌府据记载建于1271年，当时忽必烈建立了元代。集宁城由三座城墙围绕的区域组成，在北部城墙之外有另一座城墙围绕的营地。围城内最核心的部分，是两条主要道路交叉的内城中心宫殿或寺院部分。外城仅在西边和南边围绕着内城，因此，内城在外墙上有两座城门，这种布局与上都的布局有某些相同之处，但是整个城墙围绕区域却并不比上都的内城大，甚至还要小一些。外城是匠人的区域，并且以三条东西走向的市街进行布局的划分。城外的北营包含军营及其哨卡。虽然两个例子中的布局非常规整准确，犹如规划最终实施的那样，却并未发现“神奇方形”概念或任何应用神圣数字概念的做法。然而，围城的形状在每一个例子里都是一个矩形，而非一个方形。

金代的中都在1215年由成吉思汗首先攻克，但直到1234年才成为蒙古人的城市，而且在作战中，这座城市遭受了严重毁坏。城市重新命名为汗八里——大汗的城市，但当忽必烈到访现今北京一带后，他选择居住在北海琼华岛的大明宫，并因此下令于1261年重修了这座宫殿。忽必烈似乎对汗八里并无过多喜爱，而当琼华岛在1264年重建时，他明显已经下定决心，在汗八里东北，为自己建造一座新都城以及新的宫殿建筑群。马可波罗这样写道：“汗八里城位于中国一个省份（原文：province of Cathay，今河北省）近一条大河处，而在古代时是非常显著地，宏伟而具王者之气……可是皇帝殿下接受了占星术士们的观点，即他那至高无上的权力注定要遭到反叛，因此采用在河对岸另建都城的办法来解决，那里耸立着宫殿，正如所描述的那样：新城和旧城以流经其间的溪流彼此分开。新城以大都命名，而所有的中国人包括那些本省的居民们，都被强行撤离故城而进驻新城。”

4.2.4 蒙古人的都城——元大都

1266年，忽必烈下诏兴建新都城。这新都城是在蒙古高官，一位有着中亚或西亚血统家族一位后裔也黑迭儿的监督之下完成的，他也是当时在朝为官的很多外国人，如马可波罗等人其中之一。但是，布局的设计人又是大臣刘秉忠，这个项目是他发展完善神奇方形概念的一个绝好机会，基于周礼和神圣数字体系的旧方子所设计的一个最为复杂的城市结构。

这种度量体系可以在现代地图上重构，并依据艰难的工作——各种文献资料的评判，发现外城墙形成了一个矩形，而城墙长度的比例关系是8 ：9，对于皇帝来说，这是神圣的数字。东西向长度，精确为12里（另一个神圣的数字），是基于30.8厘米为一宋尺和554.4米为一大里的度量单位。南墙、北墙（原文：南部和北部的城墙）均为6652.8米，东墙、西墙（原文：东部和西部的城墙）均为7484.4米；度量的基本单位明显不是1里，而是1.5里，依宋制等于831.6米，以此作基本的单位，8×1.5里等于6652.8米，9×1.5里等于7484.4米。很明显，这里采用了阴阳数字的著名组合，产生出一个72（8 ：9）的方形，这又是一个神圣的数字，每边为1.5里。此外，这些个小的方形，又再每个分成9个半里的方形，遵循着神奇方形的概念。半里的单位又用作内城或围绕宫殿皇城的尺度，所采用的墙体长度也是以8 ：9的比例，这次，南北向的尺度为8×1/2里，为2217.6米；东西向的尺度为9×1/2里，为2494.8米，而应该注意的是，这1/2里为900尺，这又是一个吉利的数字。最终，宫殿建筑群以城墙围绕，选择了古老的5 ：6比例。这里，5实际代表了1里半，等于831.6米，而6实际代表了997.92米。度量单位是540尺，相当于108步，又是一个代表9×12的神圣数字。阴阳数字的相互作用，正如由神圣的奇数和偶数所再现的那样，也有系统地在视觉划分上重复着，而围墙区域由街道的模式所划分。南北方向由通向城门和临近街道的八个街坊进行划分；而东西向的延伸部分，由通向城门的两条街道划分成为九个街坊，两条街道之间的三座街坊，又被划分成为三个部分。沿着南北主轴线是中央的街坊，它并没有计算在内，因为它具有特殊性。

近期的调查发现元代都城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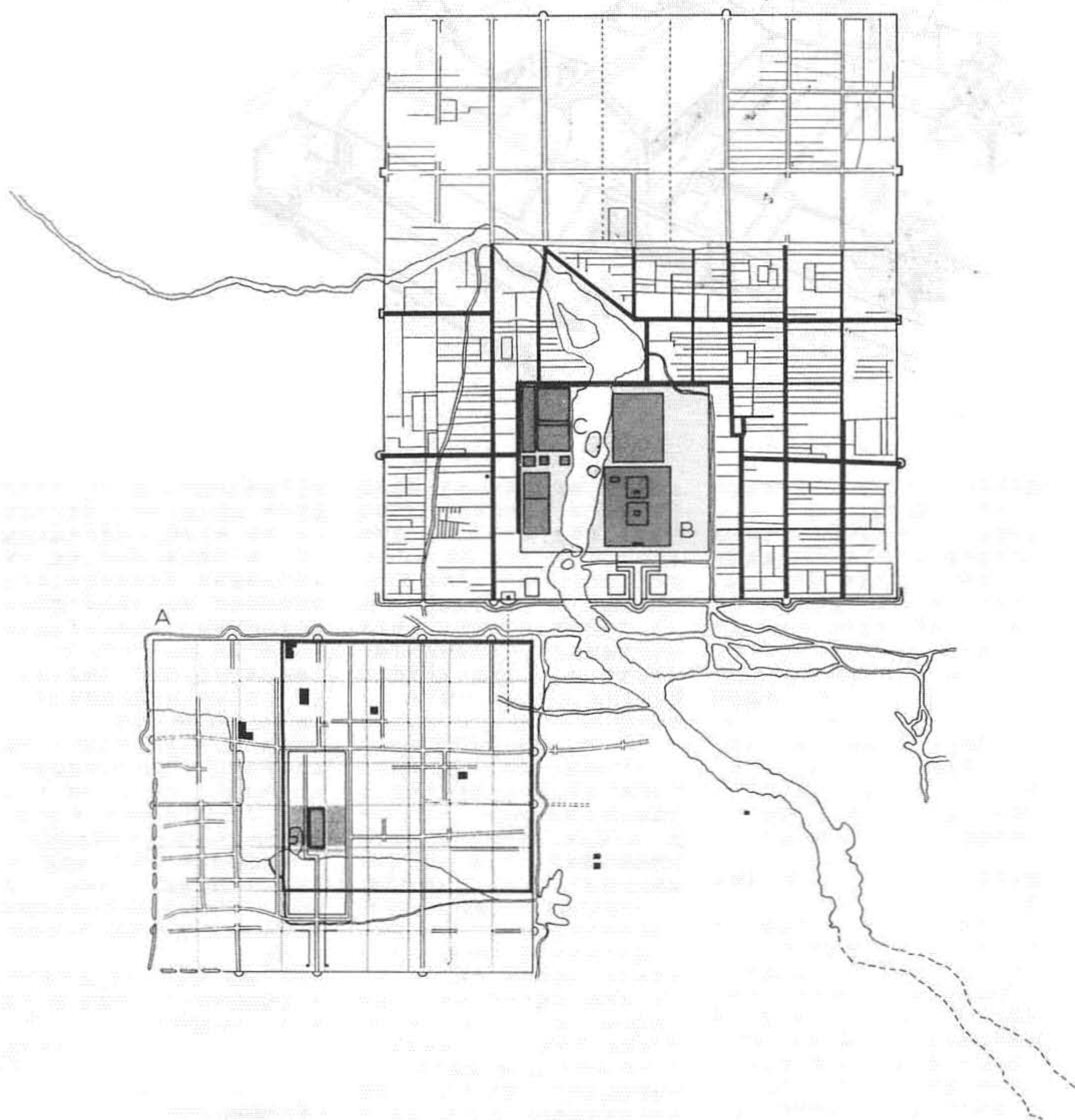
都的街道模式为其城市的主要部分，而似乎神奇方形概念并未在街道模式的布局中严格应用。与上都模式相同，并没有大街直接通往整个的墙围区域。同样，这里的皇城与宫殿一起并未坐落在中心。在此情况下，皇城偏往南方近南墙的地方，通过这种方式，皇帝便可以不必穿行外城的墙围区域而进出宫城。这对于曾经传说的那些强制搬入大都新城，而且皇帝对他们尚未完全信任的汗八里居民们所具有反叛的可能性似乎给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正如马可波罗所记载的，无论那些留在汗八里故城中的居民表现得多么忠诚，皇帝依然无法停止怀疑。这种心存戒备的怀疑，是蒙古领袖们中一种传统情愫，然而，这解释了宫殿的这种布局形式，在蒙古人中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做法，正如我们以上所见。因此，他们不可能完全准确地应用神奇方形的概念，但是从前文提到的很多细节中以及城门和市场的数量和所在位置来看，我们可以初见那试图尽可能准确应用神奇方形概念，以便获得神奇方形帝都外观之端倪。

刘秉忠非旧周朝代的汉人，而是一个在他所处时代里成长，并受到 13 世纪新儒家思想教育和影响的人，因此，他肯定无法真正理解那“神奇”之深意。犹如宋代著名的政治家和哲学家以及杰出的新儒家思想家欧阳修（1007–1072 年）几个世纪前所观察到的“礼乐之用为急”、“礼乐相须为用”，而我们也许可以再加补充，即神奇的仪礼已经失去了其原初自然之韵味。

这位毫无创意的陈腐官僚刘秉忠，以他对于历史的好恶，将那有些过时的概念提供给这游牧族皇帝；而这皇帝，也就接受了这些来自周代经典的如此冗长的引用。首先，这些古典文献是使统治者在占据了帝王宝座并实行统治的一种合法化的做法。城墙所围绕的几何中心，根据古老的概念本应是神圣的王的精神中心，但实际仅仅有一个并不重要的所谓中央亭子的平台，近处是钟楼和鼓楼，它们晨暮报时，因此也控制着居民们的每日生活。马可波罗写道：“夜夜暮鼓，敲过三巡，街上了无行人……三十或四十成群的巡夜人，在夜里的街上搜寻那些鼓过三巡后夜不归家之人。”当在此种情形之下碰到这样的人，他们拘押并且监禁他们，并且在早晨将他们带到那些指定的检查人员面前，根据情节轻重来审讯定罪，有时甚至被判死刑。我们可以再加一条解释，就是万一有谋反的情况发生，皇帝想能够免于在那处位于叛乱群众中心区域的城市中心被捉而尽快离开宫殿。应该可以理解的是，大汗并非以合法权利而是通过武力而获得国家统治权，因此对于这些居民没有信心，故而赐授所有行省和下一级的统治权力给鞑靼人、穆斯林教徒、景教徒和其他外国人，因为这些人算是皇帝当时信任的同伙。结果，这时期的朝廷受到汉人的普遍憎恨，因为他们发现自己被这些鞑靼人或更糟的那些穆斯林教徒当

图 4.2.4.1 现代北京内城中的古老水道，比例 1：80000[1]。
宫殿以西皇城中的湖泊网络，似乎沿着一条永定河北段及其支流的古老河道，后来称为高梁河，其不但作为供应城市灌溉园林之用水，而且作为通汇渠（通会渠）将城市与大运河连接起来。这条河也许就是马可波罗所曾经提到的坐落在新老城市之间那宽广的河流，其中大都中的宫城就是那新城。
A– 汗八里；B– 大都皇城；C– 琼华岛

1 参见 Atlas of Geo-Science Analyses of Landsat Imagery in China. Academia Sinica, 1984.


A
B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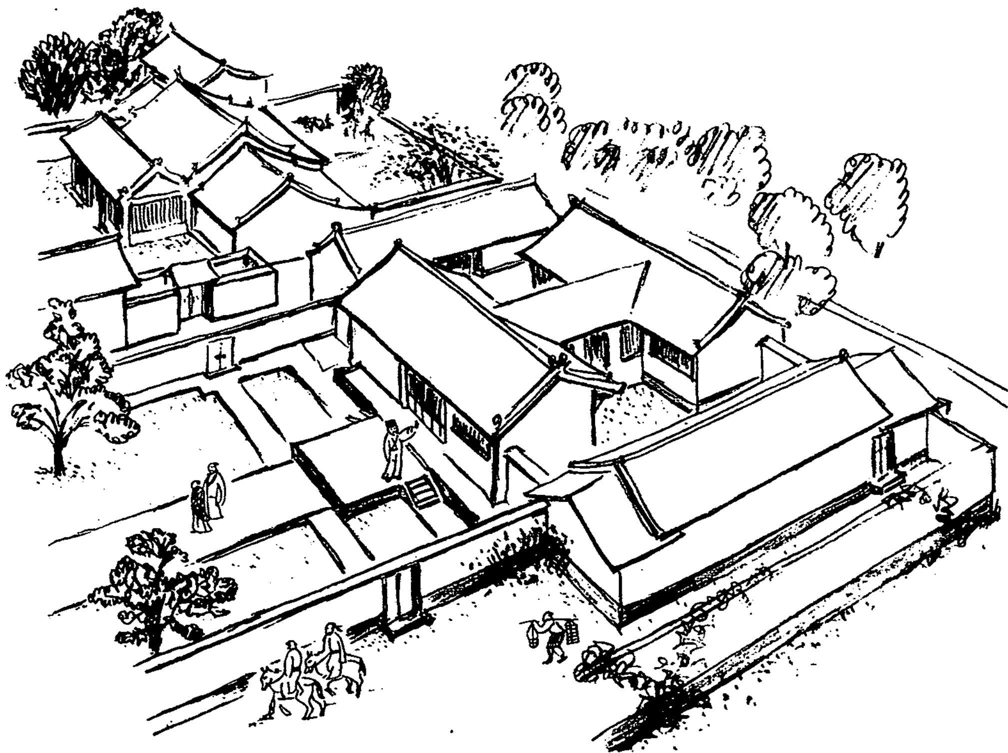


图 4.2.4.2 位于近西城墙白塔北面雍和宫和后营房后面的元大都的两座合院[1]。

复原图显示出典型的中国民居之两种变体。在后面背景中是三段式的设计：中间厅堂具有一个较高的屋顶，并且前面有一座入口的门廊。而在画面前方的另一建筑群是合院式的，在主体建筑物的前面有四座建筑和一座花园，主体建筑物通过廊子与后面的建筑联系起来，形成了"工"字形布局。主要建筑物是由砖建造的，并且建造在砖质基础上，就好像在主要建筑物前面方形的砖质开敞平台一样。带有"内庭"标志的漆器和瓷器器皿表现出房屋主人与宫廷之间密切的关系，犹如 1269 年由忽必烈下令引进使用的"八思巴"字体，它是基于藏语的字母而演变成蒙古语的音标系统。这两座民居的位置在地图 4.2.4.4，no.42 上有所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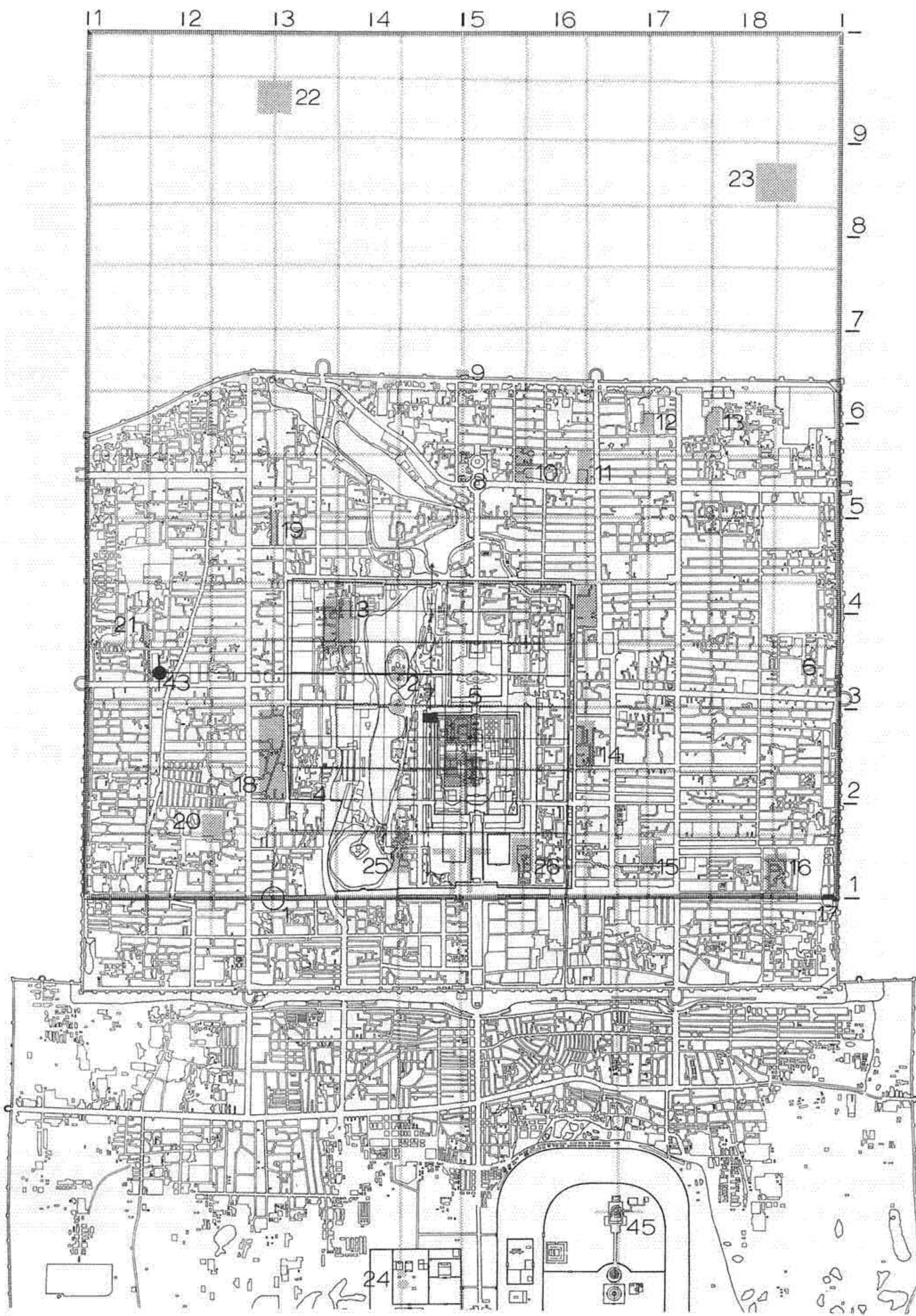
图 4.2.4.3 用于蒙古元代都城大都的度量体系，比例 1 : 40000。

基于 1930 年代初期的地图所进行的复原。当刘秉忠设计了这座新帝都的布局时，他受命以双塔寺为原点，以距离原点以南 30 步的距离，兴建了外城的南城墙 (1)。这座寺庙是由金章宗完颜璟 (1189–1208 年) 在 1190 年兴建的，直接位于都城以北。在选择城市的南北轴线时，刘秉忠起先不得不以在北海琼华岛的金代离宫大明宫作为聚焦点 (2)。正如我们已经在早于 10 年前便已经建造的上都所见的那样，忽必烈皇帝显然十分喜爱园林海子，他决定将他新的帝都近海子而建，甚至围绕着海子并以琼华岛作为中心，而非建于闹市中心。结果，主要的宫殿便建在海子两岸，在东岸，是用于宫廷仪典、谒见及接待之用的大殿 (5)；而在西岸，是皇后、嫔妃的宫殿 (3) 和太子皇儿们的宫殿 (4)。为了这些建筑物的选址，刘秉忠提出了具有三条轴线的度量体系框架。东边的轴线成为了整个城市的主要中轴线。从此轴线向西 6 里和向东 6 里，他建造了外城的城墙，这样一来，起先在琼华岛以东大约 6 里处于 1263 年建造的太庙 (6)，便被包围进这墙体围绕的区域。因此，东西方向 12 里的城市尺度便确立起来，为其他重要建筑物的坐落位置提供了基本结构框架。其度量基础是 30.8 厘米的宋尺 (一大里为 554.4 米)。为了建立南北方向的城市尺度，刘秉忠通过将他那 12 里转变为 8 个 1 里半，并且为南北城墙的长度增加了 1 里半的长度达到 13.5 里，而应用了那吉利的 8×9 个度量单位的比例关系。根据到目前为止的文献记载，忽必烈在新落成的宫殿中首项执政便是于 1269 年 3 月 29 日在玉德殿中对几位高官大臣的贬黜。这座大殿似乎为兴建的第一座典礼大殿，因为大明宫殿建筑群 (5) (在此不要与琼华岛上那座宫殿相混淆) 在当时被称为广寒殿，直到 1212 年末才开始兴建，大约 14 个月之后，第一场庆典在此举行。玉德殿的位置暗示出在最初的阶段里，这座建筑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似乎坐落于皇城东西城墙之间的中心位置。分析一下皇城的度量体系，比例又似乎为 8×9，度量的基本单位为 1 里半，而玉德殿正好坐落在东墙和西墙之间九个单元的第五单元那一中心位置。如果这是忽必烈皇帝本人原来居住在琼华岛并在玉德殿执政的想法，那么，可能刘秉忠借此逐渐成功建立起传统观念，而皇帝也许已试图适应这一观念。然而，忽必烈 1294 年 2 月 18 日在玉德殿紫檀宫逝去。他那位于玉德殿中的毡制宫室，并没有被永久性结构所替换和取代，一直坚持到半个世纪后的 1353 年。

以下目录，给出了以度量体系为基础的其他重要建筑物的样板：1– 建于 1315 年双塔寺里的双塔；8– 鼓楼；9– 钟楼；10– 金库；11– 皇室内宫；12– 太学；13– 柏林寺；14– 枢密院；15– 御史台；16– 宝库；11– 城墙上的观象台；18– 带西花园的兵部上书和太子的宫殿；19– 崇国寺；20– 顺城栈房；21– 社稷坛；22– 建德栈房；23– 广西栈房；24– 在琼华岛轴线城市之南的先农坛；25– 云仙坛；26– 太神坛；45– 天坛。

在琼华岛南部，在同样的轴线上有两座岛屿，具有宫殿般结构和一座圆墙的瀛洲，以及在瀛洲以南一座小岛上的犀山台

1 参见中国画报，1982/5.



I1
I2
I3
I4
I5
I6
I7
I8
I
9
8
7
6
5
4
3
2
1
22
23
9
12
13
10
11
8
19
21
43
2
5
6
14
18
4
20
25
26
15
16
1
17
45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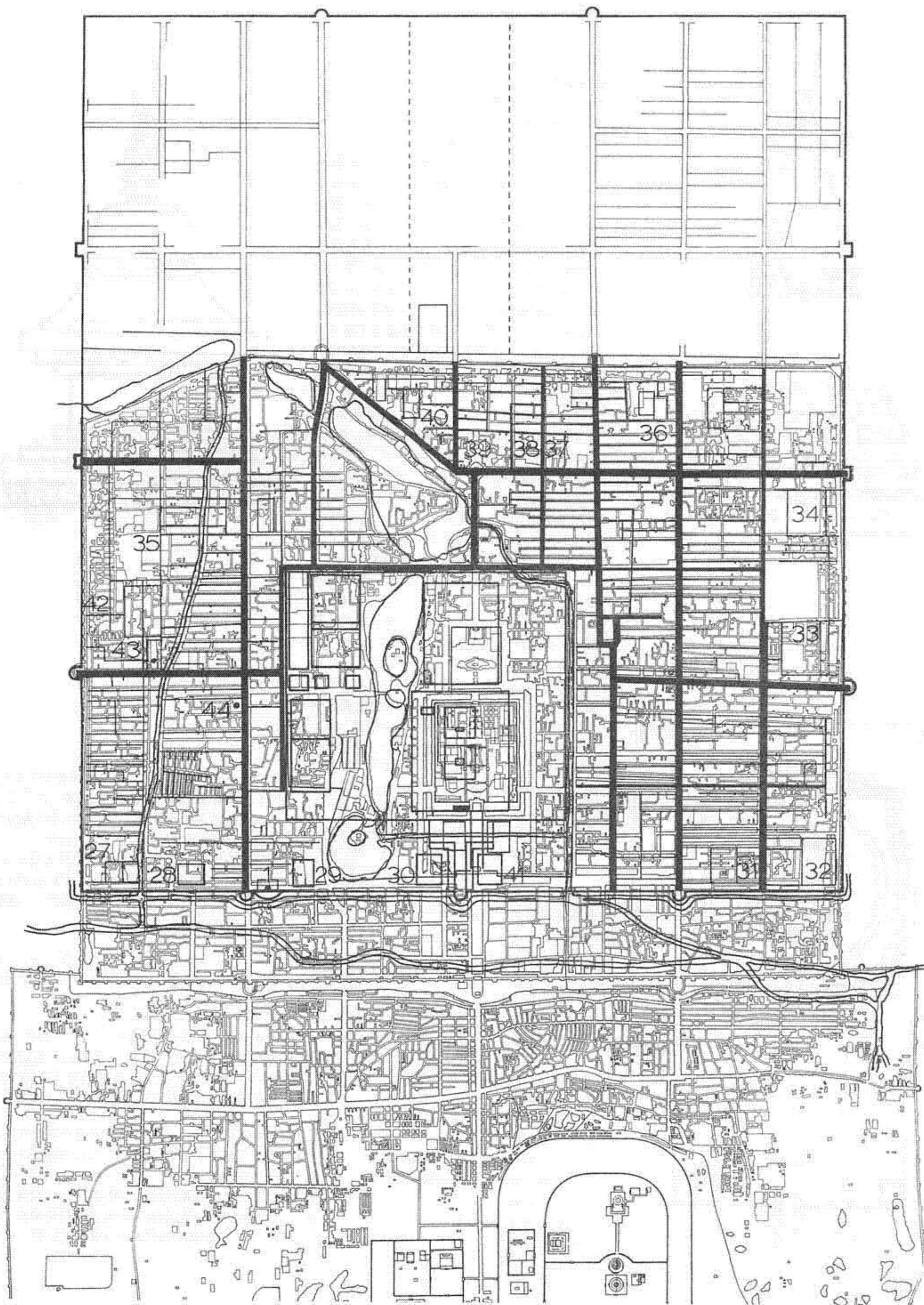
作奴隶般的使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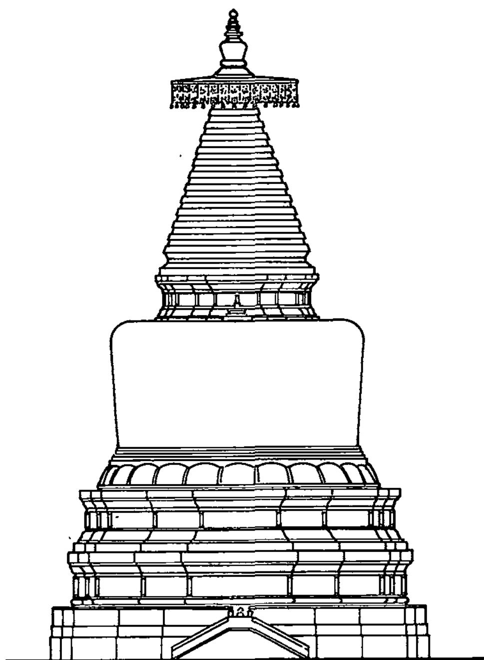
等皇帝随着新都城的建设进展并不断赋予其新秩序后，他将都城的名字从汗八里改为大都。那时，大多的建造工程都已基本完成，但更多的宫殿建筑和官府建筑是直到1294年忽必烈死后才兴建的。直到大约80年后，即1368年明朝军队焚烧大都城以前，这城市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聚落，并且容纳大约超过100万人口的居民，包括郊区的延伸部分。原先，在新城之中，用于一户人家建筑地块的大小是8亩，其大约有4500平方米。以这样的每户人家占有空间，在外城的居住区以具有大约40平方公里的面积，能够包含大约10000户人家，或者说20万居民，人口密度仅为5000人／平方公里这样低。然而，在时间进程中，城中的居民数量戏剧性地上升，因此，在忽必烈死后，两倍以上的居民也许已经居住在城墙围绕的、皇城和宫城之外的区域里，而同样数目的居民生活在郊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发生了另外的增长，因此，在城市发展的高峰时期，整个周围环境很有可能已经容纳了100万人。这其中应该包括具有12000名士兵的皇宫卫队，大约同样人数的城市警察和大概由几千士兵以及他们的雇佣者在内的哨兵卫队。马可波罗这样写道："郊区（其中有12个，与城门的数量相等）甚至比城市更为繁荣，而在那里，要在都城做生意的商人和其他人仰仗是朝廷的营生，便大量占据居所府邸……对于这座城市来说，最为稀少的以及世界上所有地方有价值的一切都能找到，以供应那些民众的需要，他们遵命为君王和嫔妃在宫廷内院兴建殿堂以及在城市中为王侯将相兴建府邸，它们如此宏伟。那里出售的商品质量也超过任何其他地方，因为超过千驾的马车运载着生丝每天进进出出，而各种各样的织金丝绸被制造出来达到一定的豪华程度。在都城中，有很多的围墙区域和其他的城镇，居民主要依靠宫廷贸易而生，售卖那些在以前市场中所生产的商品，并购买他们自己生活所需。

应该注意的是，在北方和南方的不同发展都在同一时期发生，即大唐帝国的覆灭和大蒙古帝国的兴起之间的三个半世纪内。另一方面，在宋代汉族皇室的势力范围内，中国的文化继续发展并达到文明的顶峰，这甚至是在现代意义上的文明。它为思想和物质交流提供了最大自由，变化及丰富的社会变革使其公共生活激发出了外国观者如马可波罗等人最为清晰的描述。在另一方面，一个高度统一的帝国结构继续在尚缺文明的游牧部落首领的势力范围内存在，在军事控制基础上获得皇帝头衔，而对于到此阶段已发展起来的定居的城市文明生活之复杂性了解甚少。结果是一种掠夺开发式的、简单专横的暴政，利用建筑来表现权力，启用那些古老过时的上天之子的神圣法则为正统，但是具有非常明显的改变。这一结论不应该隐藏如以上所描述的政治气氛下那无可争辩的事实，即文化生

图4.2.4.4 蒙古元代时期大都的街道模式，比例1：40000，基于1930年早期的一幅地图的复原[1]。
经过近期的挖掘工作，元代的街道模式已经得到了复原，并且证明这种模式以其那种在明代和清代都城之不规则形式留存着。理论上已有的街道布局模式，因为忽必烈个人观念所表达出的概念而被刘秉忠进行了修正，包括近南墙的城南部分宫殿和皇城非正统的坐落位置，以及围绕海子几处宫殿向西延伸。而且，宫殿北边那一组海子也需要某种街道的再适应。结果，五条大街，其中三条为东西向，两条为南北向，仅有一条是直通的街道从一座城门通往另一座城门，而这也许是上都所表明的布局意向。居住街巷系统被称为胡同，与平江府（现代苏州）的体系非常相似，在两条大街之间横贯东西，但无平江府那样的运河。然而，所有的街巷都有复杂的地下水系，地下水流通往城外护城河。这些灌溉系统大约1米宽，1.65米深。海子以北歪斜的街巷，在此称积水潭，积水成潭，在当时是大都三座商业街中最为繁华的一座，某种程度象征了水边的市街。
如下所列，给出了最为重要建筑物的坐落位置，其并非基于度量网格体系：21－城隍庙；28－刑部；29－大庆寿寺；30－兴国寺；31－太史院；32－礼部；33－宗庙；34，35－米铺；36－孔子庙；37－第二区的监视局；38－栈房、店铺；39－中亭和在它东面的中心标记石头（因为，它们在一处并非元大都布局几何中心的位置被挖掘出来，这大都的城市布局也许在明代被偏移到现今的这个位置，证实了明代宫殿主轴线的偏移）；40－中书省北部（Northern Secretariat）；41－皇史晟；42－挖掘出的房屋；43－白塔；44－万寿塔

1 参见 Zhu Xie，Cian Duo. Yuan Dadu V.1.no.2，1993；1966/1；1972/1；Zhao Zhengzhi. 元大都. Beijing，1976；文物，1977/9；Wu Liangyong. 中国城市规划简史. Kassel.Germany，1986；Chen Qiaoyi. 中国六大古都. Beijing，1983；Nancy S.Steinhardt. Artibus Asiae. vol. XLIV，2/3，1983.


40
39
38
37
36
34
35
42
43
33
44
27
28
1
29
30
41
31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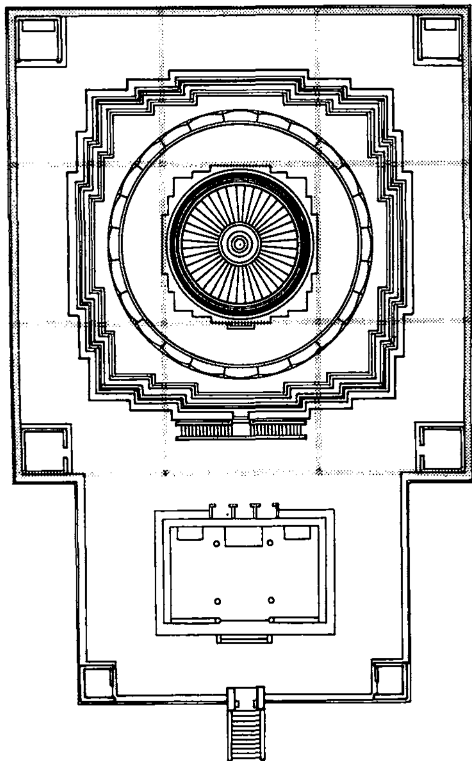


图 4.2.4.5，6　白塔，1271 年由忽必烈建于大都西部，以庆祝他当上了一国的皇帝，并且以表示开始之意的"元"字命名这个朝代，比例 1：500。参见中国古代建筑史，北京，1980。

在这一地区的寺院原来由辽代皇帝道宗（1055–1101 年在位）兴建于 1092 年，他本名耶律洪基。当忽必烈命令重建白塔时，在那拆散的旧白塔中发现了一串 12 个念珠、2000 座香泥小塔和五卷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经（Dharanipitaka），环绕着水晶仗和五卷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经。虽然，忽必烈大汗本人对宗教冷漠，却自认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佛教统治者，正如现代研究所显示的那样。寺庙的名称为大圣寿万安寺。工程建造是在尼泊尔匠师阿尼哥的指导之下完成的，白塔高 50.9 米，其概念和形式代表了另一种 13 世纪印度的影响。

这座白塔是在中国曾经建造的第一座喇嘛塔，也是同时代佛教世界中最高的一座塔。因为，忽必烈意图在中国建立喇嘛教中心，而这佛教寺院是元代最重要的宗教中心，特别适于皇族。喇嘛白塔是佛教密宗对于宇宙概念的再现，其布局的基础为印度的曼陀罗，正如一些学者所相信的那样，是来自或者至少是受到了古老的中国神奇方形概念的影响。似乎白塔那上部构造，可以被解释为是曼陀罗的发散，从二维平面的出现进入到三维的雕塑。印度的曼陀罗，正如藏传喇嘛教的曼陀罗，是宇宙的图景，即整个宇宙以其基本的布局，以及其发散和再汇聚的过程，从中心向外延伸，之后又回到中心。这中心就是佛，那深不可测的玄奥。围绕着佛，是转轮圣王，这宇宙的主宰之宫殿里的理想图景："顶礼膜拜人之主宰——佛者，将会得到最佳的回报。在人类之中消亡，佛去往那三十三重的天穹，而在那里，他获得了珠宝制成的辉煌的宫殿。如若在此岸建造一座尖顶的白塔，将有飞天在彼岸等候他的出现；如若在这座塔上放置花环，他将在三十三重天穹获得重生（Avalokana Sutra of Santideva，299–301，Sikshasamuccaya，Conze 172）。"三十三重天穹，是欢喜佛（兜率天 Tushita）天穹。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与北魏朝代的转世再生概念的紧密关系，这对于蛮族入侵者们来说，无异于作为世界统治者们使其合法统治的意识形态。

这基于曼陀罗布局并且象征宇宙的三个尺度的白塔，表现其构图的元素包括："地"——方形的宝座作为基础；"水"——圆形的穹盖；"火"——启蒙的十三步骤（金字塔）；"空气"——伞、太阳和月亮，或一座小白塔，作为收集露水的小瓶。这实际是一座雕塑，而不是建筑，与中国的塔全然不同，虽然它们来自同一个起源，即印度的窣堵坡。

除了它显而易见的象征性信息，它还是一个圣骨盒，是那神奇能量的贮藏室，是佛法保护之力的物化。如此说来，喇嘛白塔的实际功能是用作魔幻之器，以防宫殿、城市、大门、房屋和其他地方免受恶毒影响的攻袭。然而，与藏族和蒙古族寺院中白塔有所不同的是，这座白塔主要是政治宣传的工具，主要是为皇帝服务，但也为喇嘛教服务，两者相互支撑。这不应该与宗教的信息相互混淆，因为后者是传播给那些信仰佛教之徒，以及一些盲从之徒的。

最后，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白塔位于琼华岛，忽必烈宫殿区域的正西，而宗庙位于宫殿区域的正东，这样一来，三座建筑物形成了一条笔直的东西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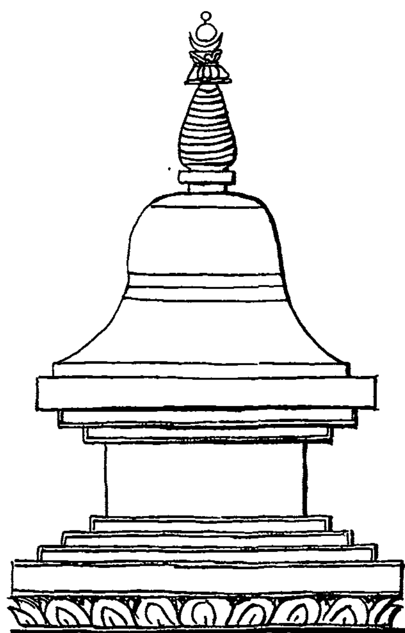


图 4.2.4.7　八座大白塔之一。这是八座中的最后一座，代表了佛进入涅磐境界，这是大都白塔的原型样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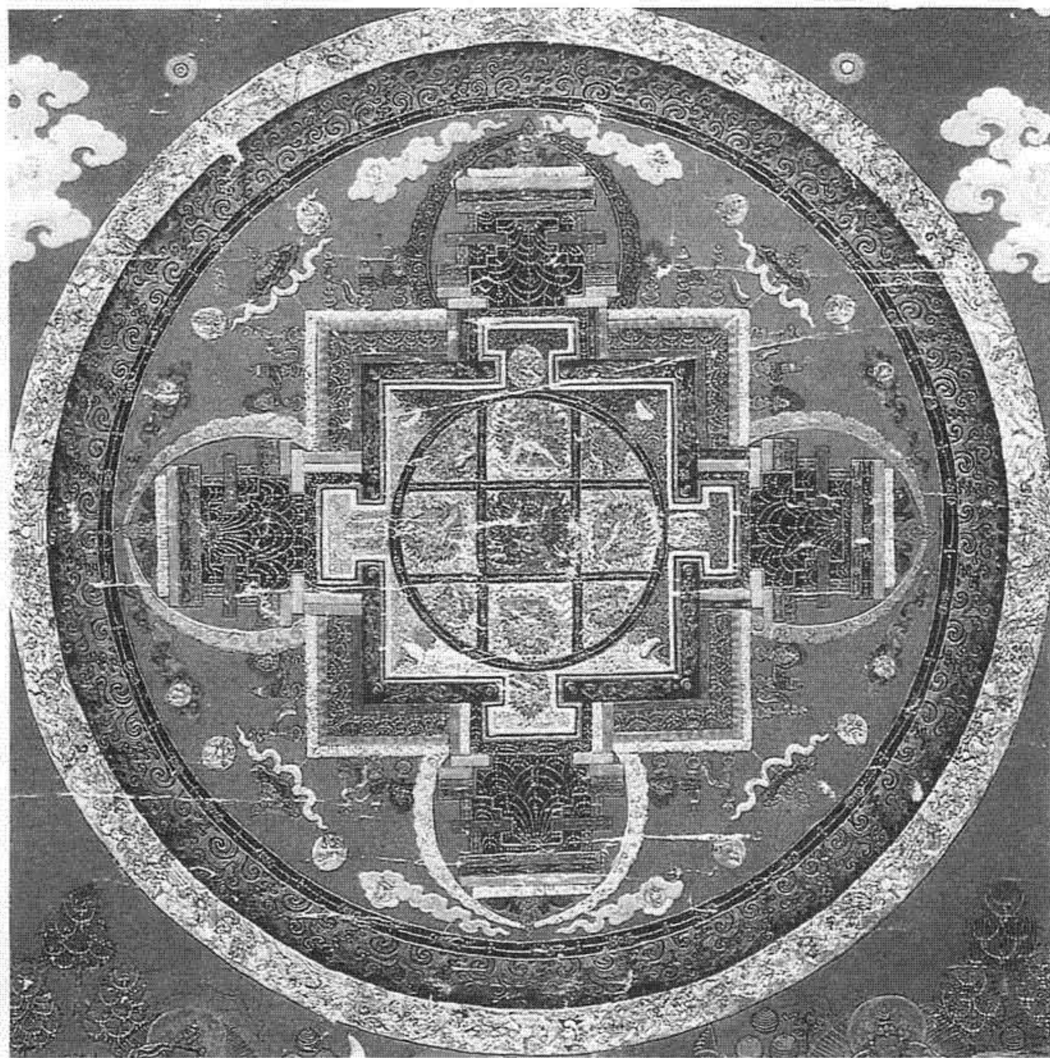
图 4.2.4.8　在白塔宝座上，以太阳和月亮为顶的成吉思汗。来自 17 世纪的一幅蒙古绘画，今天收藏于荷兰莱顿的国家人类民俗馆（Rijksmuseum voor Volkenkunde）

图 4.2.4.9　19 世纪黄教之藏传的曼陀罗，德国慕尼黑国家民族学博物馆（Staatliches Museum fur Volkerkunde）。
在方形之内，象征性的宫殿有 13 个幻化身，也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他是法律的保护者（护法者），曼陀罗的模式是白塔基座的原型

喇嘛教在 11 世纪主要是围绕着封邑开始发展的，这些封邑为僧人们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和膳宿，而封邑的领主变为喇嘛教住持及大喇嘛。1045 年，喇嘛教创立者之一邀请了印度僧人阿底峡（982–1054 年）来讲经，结果，他沿着拉萨一带地区传播信仰。其成果之一便是萨迦寺，他在印度曼陀罗布局的基础上建造了寺院。第四位住持贡噶，与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统治者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的继承人，第五位住持八思巴（1235–1280 年），成为了忽必烈的密参，并且提升到元代“国师”的地位。当忽必烈在 1260 年被选为大汗时，他任命了两位住持。为了促进施政，八思巴发明了标有他名字的字体。

噶玛噶举教派大约在 1170 年创立，并且发展了再生概念，来解决住持们的继任问题。再生有两系：黑帽系和红帽系。1253 年，住持噶玛巴希（Karma Pakshi，1204–1283 年）得到蒙古大汗蒙哥的允许，建立了黑帽系，其将达赖喇嘛的再生概念一直延续至今。元代结束以后，由僧人宗喀巴（1351–1419 年）创建了黄帽系（黄教）。







活贯穿整个辽代、金代和元代，而他们是异族统治阶层的成员，他们是被文化熏陶的人，当然，在中国文化中，受到文化熏陶意味着精通汉文化。

最后，我们应该再来审视一下由马可波罗本人所表达的两个明显不同的概念，他观察到了在这历史中最有趣时代节点的两个方面：宋代的皇帝是和平与正义之友，并且严格地行使这一职权，所发生的哪怕是最小的任何一种人对他人的压迫或侮辱，都以惩戒性方式进行严惩而不姑息。这一行动是公平的印象。这样一来，即使那满是商品的商店偶尔店不闭户，绝没有人敢进入强抢，哪怕最小的物件。各旅行者可以放心大胆地在这帝国旅行，无论白天黑夜都不必担心有何危险发生。宋皇是一个具有宗教情感的人，对于弱者和有需要的人仁爱慈善，与忽必烈大汗这位鞑靼人皇帝的脾性全然不同，好战的本性、对于国家的控制欲，以及延伸他个人的知名度，是忽必烈大汗整个思想的兴奋剂。

稼。1343年之后不久，黄河向更北方向改变河道，结果，山东、河南、江苏和安徽的大部分地区全部淹没在达7米高的泥水之中。瘟疫流行，成千上万的人死去，留下了越来越多荒芜的土地。1351年起，到处都发生暴乱。其中一组所谓的“红巾军”提供了一时的机构和领导。1355年，他们甚至将其中的一位拥戴为重建的“宋王”。但是，不同的反叛小组很快就彼此争斗，这种骚乱直到朱元璋最后的胜利才得以停止。他不但打败了其他的反叛组织，还于1368年打进蒙古大都，逼得皇帝逃跑。朱元璋赢得过很多战斗，他也是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慎重实施政治策略，并亲临所有关于国家重建的事务。历尽几乎20年成功的军事战斗之后，他在集庆路，即现在的南京建立了新的朝代，庙号洪武（1368–1398年）。因此，他以洪武皇帝而著称。在他最后胜利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的周围有很多能干的谋士，并建立了一个有效的政府。甚至在新朝代正式建立之前，就已经实施所有重建帝国的事务。

图4.3.1.1 朱元璋，明代（1368–1644年）的建立者及其第一任皇帝（1368–1398年在位），引自《故宫周刊》，第19期，北京，1935。
这张画像大约绘于1368年，朱元璋刚刚登上王位，当时他正患天花。他出生于1328年今天的安徽凤阳附近，他的童年充满了苦难和向往。作为贫穷家庭的孩子，他没有上过学，16岁时他的父母兄长死于1344年的饥荒和瘟疫。佛门将他收留为新徒，但是又过了三年，他迫不得已沦为乞丐，以乞讨为生。在安徽和河南流浪了一段时日以后，接下来的几年，他回到凤阳附近的佛寺学习读和写。在此期间，中国东部所有遭受洪水和饥荒危害的地方都有暴动发生。1352年，当时他24岁，加入了所谓的“红巾军”的一个组织

4.3 巩固强化和衰退

最后一位元朝皇帝顺帝（1333–1367年）的统治是一段非常混乱的时期。各层次残酷的暴政，不断增长的官僚腐败加上洪水和饥荒给民众带来灾难和疾苦。因此20来年的时间里，持续出现反叛。从1324年起，黄河每年淹没河南开封一带地方，并不断地毁坏农田和庄

4.3.1 明代（1368–1644年）

元代人没有使用前朝留下的长城，因为他们在长城的两边都是国家的主人，更有甚者，他们命令毁掉所有的防御系统。因为，防御长城之外的自己人是不合情理的。相反，汉人可能会使用它们作为堡垒造反起义。于是，很多的城墙也被拆毁。但是，明朝建立后元朝人还没有完全就范，仅是逃入北方宽广

的大草原，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反攻。新皇帝主要关心的问题之一是重建城市并在帝国的边界重立所有的防御工程。在洪武时期，也就是朝代建立者统治的30年中，帝国所有的重要城市，总共大约1200个地方甚至更多取得格局和城墙，这些格局和城墙保留了5个世纪并直至20世纪。这一巨大工程，根据在城市重建中所遇到的不同问题，以及在规划现有城市的扩展或全新城市中所用的不同原则而制度化。

最主要的问题，也是牵涉皇帝本人的问题，是宫廷的选址和布局。对于新朝代都城有几个适宜的位置，然而，没有一个是完全满意的。并且因为传统在唐代覆灭以后已经严重中断，决策显得更为困难。大约有2000年的时间，都城一直在长安或洛阳——中国的心脏地带。但是在最近的3个世纪里，都城建于3个非常不同的地方。首先在东部的中心，后来在极南和极北的沿海区域。在它们极短的存在时间里，这些都城没有发展任何传统，所以新皇帝肩负职责，发现一处适宜的地方。看来，他最终考虑了一个多都城体系，就像他之前的外邦朝代所建立的那种体系，多达5座都城。双都体系已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可以溯源到上古的周代。正如它可以巧妙地回避一些选址的问题，这个体系自我证明可以满足保证都城有一处吉壤的所有要求。他的谋士们认真仔细地调查，显示所有以前的都城选址都有某些缺陷，并非在所有方面令人满意。

为满足新朝代政府建立一个管理中心的需要，实际上没有留下太多的选择余地，而只有发展其在南京已经存在的权力基地。在那里，他已经如此成功地操作了十多年。同时，有一个关于他的皇权合法化的问题，因为他不是以平常的继承方式而是通过非政治和理性的征服赢得政权。这特别重要，因为他的那些前任外族皇帝在某种程度上复兴了久远的“圣王”概念，就是说，他们的皇位都是来自上天，这只有（让皇都坐落）在人间一处吉祥和神圣的地方才能够得以保持，最好还要应用“幻方”的概念。

调查古老的都城时，洪武也许发现了某些先祖之墓和宫廷皇室之间的关系。更何况，上几个世纪所有的都城都已经是相当规模的聚落，不经过巨大的努力，根本难以将它们变成仪态上完美的皇室。南京转变为帝国的中心已经是酝酿了几年的事情了，是战时情况的结果和赤裸裸的需要。甚至帝国宫殿的建造也随着更为实际的考虑，而不能符合古代“圣王”神奇住所的“妙方”。洪武因而在安徽省他家乡附近的一个乡村，邻近他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墓地处选择了一块地方。尽管这些人什么也不是，与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然而，他们已经成为一代皇帝的祖先，因此，洪武皇帝下令为他们建造具有影响力的陵墓。新朝代建立之后不久，他下令在陵墓的北方，安徽淮水之南的府城临濠附近（今凤阳临淮）建立一座全新的帝国都城。按照前几个朝代的



图 4.3.1.2 徐达将军（1332—1385年）为明代的建立者（详见图4.3.1.42 朱元璋的贴身参谋和心腹知己，参见《故宫周刊》，卷19，北京1935

模式，都城被命名为中都。这新都所坐落的府城叫凤阳府，该名至今仍在使用。因为这个地区没有存在过城市聚落，新都的布局没有受到干扰，因而也不需要经过修改。这个工程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幻方”概念应用于宫廷布局设计中一个最后的实例。事实上，它是完全不成功的，而工程本身也许在最初的某个时刻被扼杀在萌芽里。有一件事使它尚有价值的是“幻方”在宋代之后的应用。不过，历史的逻辑注定它要失败。

当中都的名字被选来作为新的中心都城时，旧的宋都开封被当成北都，大概为了和“红巾军”的理想一致，重建宋代。南都已经在南京建立，那里重建工作于1365年朝代建立以前的几年已经开始。1369年，有关中都的工作在汤和将军、洪武皇帝亲密的谋士监督下开始。这位谋士后来负责浙江沿海大约59座城镇的建造，与沿海防御体系的建立密切相关。很显然，他是防御工程建设的专家。皇帝赋予这个新都工程的重要性通过一纸诏书传达，其中他命令1300多座城市（大概都是当地的地方中心）中的每一个城市送上50公斤选自当地名山朝阳山坡的土壤，以建设新中都的社稷坛，如此，这座社稷坛里的土即代表全国沃土中最优者。为了尽可能快地建造，征集了一个由90000名匠人和70000名士兵组成的固定性队伍，还辅以大量无技艺的劳动力、犯人、农民和其他人，达百万人之多。我们听说1374年有140000人被征来修建城墙。然而，当皇帝1375年参观中都建设工地时，民工们聚集一起向皇帝集体请愿改善条件。大臣李擅（善）长（1314–1390年）反应过度，成千人遭到杀害。周围地区的居民起来反抗，皇帝只好慌张离去。皇帝认为这是一个很坏的预兆，回到南京后，命令停止中都的工程，尽管它远超过预期计划已经接近完工。后来，这座废弃的城市被用作训练军队的操场，而在1402年，它依然被当作是一个坚固的堡垒。一些王朝的机构依然留在这里很多年，为帝陵的一些服务依然继续。1383年，佛教性质的隆兴寺建造起来。那里的行政组织直到今天依然是两层的管理模式。

新城当初的布局由一个广场组成，其尺寸由1里和半里的基本单位决定，就像元大都。9个这样的单元或13500米决定了各边的长度，一个有着12座门的完美“幻方”，每边3座门。正如大都那样，以皇城围绕的皇宫并不在方形的正中心，而是向南移了一点，为皇宫前的“千步廊”御街留出了2里半宽的空间。城市区域在建造开始不久后被增大，东墙向东大概移了3里半，也许是出于防御的考虑，需要将一座小山包括进来。大概本着同样的原因，原南墙的围合区域也决定圈进另一座小山。更往南，坐落着皇家陵墓（洪武皇帝的父母）的圈占地。虽然“幻方”概念清晰可辨，布局的最后实施明显有些不规则。这没有什么笼统合理的解释，因为即使作为完美的“幻方”布局，它依然很容易因地形而改变。街道模式依随着度量体系，但是，阴阳数字之间没有像在大都那样明显地让人感到其相互的影响，也许根本就没有规划数字。我们可能会以为“幻方”在大都中是最后一次使用。然而，中都的布局在很多方面是明代其他工程的典范。一些细节，例如宫殿建筑的安排和御街千步廊的设置后来在北京被模仿，并在某种程度上存留至今，也体现在几位皇太子的封邑都城，这些我们将在下面描述。

1382年，中都的宫殿建筑被拆除，并搬到南京用于旧南京城中心东边新建的宫城建设中。这座南京的新宫城是在建立中都之前的几年建造的，1366年就开始建造了，但是，它实际仅是旧城一个新的附属体，这与南宋杭州宫室建造的过程相似。当1368年庆贺明朝建立时，涉及必要的宫室和坛庙建造的第一个阶段已经结束。但是不久，新事务就是考虑旧城的扩展。工程立即从修建城墙着手，而且必须在1373年完成。这些新墙大约长33.5公里长，环绕大约46.0平方公里的面积；与大都相比，这些城墙更长，但它们包围的空间却少一些。在大都，城墙大约长28.3公里长，面积是49.8平方公里。虽然古老的宋代城市是相当规则的，新的皇城也是一个相当规则的矩形布局。作为整体的城市，其形状已经变得绝对不规则。城墙紧随地形，并且为了达到防御的视野而布局，运用山丘、河流和湖泊作为自然防御工事。旧的宋城依然作为市民的居住中心和商

业区。新的皇城包括帝国政府机构以及与宫殿在一起的官僚府邸。新建的北部包括：兵舍军营、仓库、操练场等。

城墙从 6 米到 18.6 米高，在顶部有 8 米多宽。铺以石条，可用作街道。城墙的基础是大理石。墙体是建在基础之上的巨大砖块。这些砖来自于周边方圆 250 公里省份的 152 个府。这些府的名字标在砖上用于质量控制。城墙的外面以石灰和粟（黍）胶的混合物粉刷，看上去为纯白色，的确非常感人。有 13 座门，其中三座在宋城的旧城墙上，非常坚固，每一座有一个城门楼。1390 年，建造了一条有着大约 18 公里直径的防御外城墙，包括城外一片广大的地区——玄武湖及紫金山，并一直延伸到西部和北部的长江岸边。所有这些巨大的建造和工程努力不能仅仅解释为军事意义，而且也必须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考虑。正如汉高祖的主要谋士大臣萧何大约 1500 多年早已经解释的那样，南京的城墙是设计来强化皇帝合法正统的敬畏气氛，并保持皇家之存在的威严感。

我们知道两个人的名字，他们也许辅佐过皇帝的设计和布局。一位是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者刘基（1311–1375 年），他是整个皇朝建立期间皇帝的出谋划策人。另一位是周世宗，他可能专门负责过旧宋城东部皇室的建造。有了这个皇城，建立新城的主要原则，比如中都的布局得以建立。由于绝大多数皇太子们新的皇家宫室，像南京的皇城本身一样，是旧城的加建或重建，对这样的项目，必须进行某些适当的调整。能够看得到的有关宫殿、皇城、内阁部署的安排，以及其他重要建筑群的主要秩序元素，显然是有着主要南北轴线的千步廊。正像千步廊名字所暗示的那样。某些度量体系显然已经得到应用。与老城市的关系也似乎由有关度量的特殊规则所调节，以量度宫城的主要轴线与老城重要建筑物之间的距离。这套体系后来也用于皇太子的宫殿，虽然根据不同城市的不同条件有某种调节。

作为新王朝军事组织的一部分，并且重新组织防御体系，洪武皇帝赐给他的皇太子们一些封邑，希望他的皇子们能在那里看管并有权命令驻守在封邑的分遣部队。1370 年册封第一组封邑，1378 年第二组，1391 年最后一次第三组，总共 25 座封邑，其中一半沿着长城，坐落在北部边界，作为那里军事组织的一部分。第一组中最重要的封邑分别以西安、太原和北京为中心，在那时叫北平府，而且 1368 年被明代军队攻克后，不再是帝国的都城。秦的封邑在西安，有皇太子府。于 1370 年赐给皇帝的第二个儿子。当他于 1378 年到达时，这座城市已经（像南京一样）向东部扩展，城墙已经完全重建了，在重新拓展的城市中心的东边，一座新的宫殿已经建立起来。新宫殿几乎像在南京的皇室一样大，它前面，一条御街千步廊直达南墙，从孔庙东部穿过直抵城门，这门后来被封。这里，走廊只有 2 里长，大概是与皇太子的职位相应，因为他比皇帝低一等，皇帝的走廊长 3 里。与现存宋代城市的关系通过一个东西道路连接起来，从管理机构的总部直通到宫殿之前的主要院落。随着城市的扩展，街道的模式由一个直通城墙四门而交集的十字路口所控制，显示了此地的防御特征。大约 200 年后，即 1582 年，这种印象更加强化，那最初建于 1384 年的防御工事钟塔被直接移到了十字路口，至今尚存。

有些类似的进程就是山西省太原城的扩建。它赐给了皇帝的第三个儿子，作为晋的封邑。1378 年，皇太子到位时，他开始建造宫殿和新的城墙。也是在宋代旧城的东边，将面积从 2.8 平方公里延伸到几乎 9 平方公里。御街千步廊从宫城的城墙向南部的城墙延伸，也是 2 里的距离。其北端布置一些牌坊和一个方形广场，广场四边都有建筑，以增强宫殿入口的威严。街道的模式根据旧城的原则进行了延伸，其特点在于没有直通的大道，所有的主要街道以尽端结束，或者在一个建筑物前结束。但这里，宫殿和行政机构的总部之间也建立有联系。在西安，街道的纵横是一个实用的模式，太原的八座城门则暗示了“幻方”概念的微弱影响，特别是至少三座门遵循了形式方面的考虑。

除了北京，所有于 1370 年成为封邑之首府的城市都有些不规则，而新的宫殿被尽可能地挤进已经建起来的区域里，或多或少成功地建起了千步廊。开封是赐予第五皇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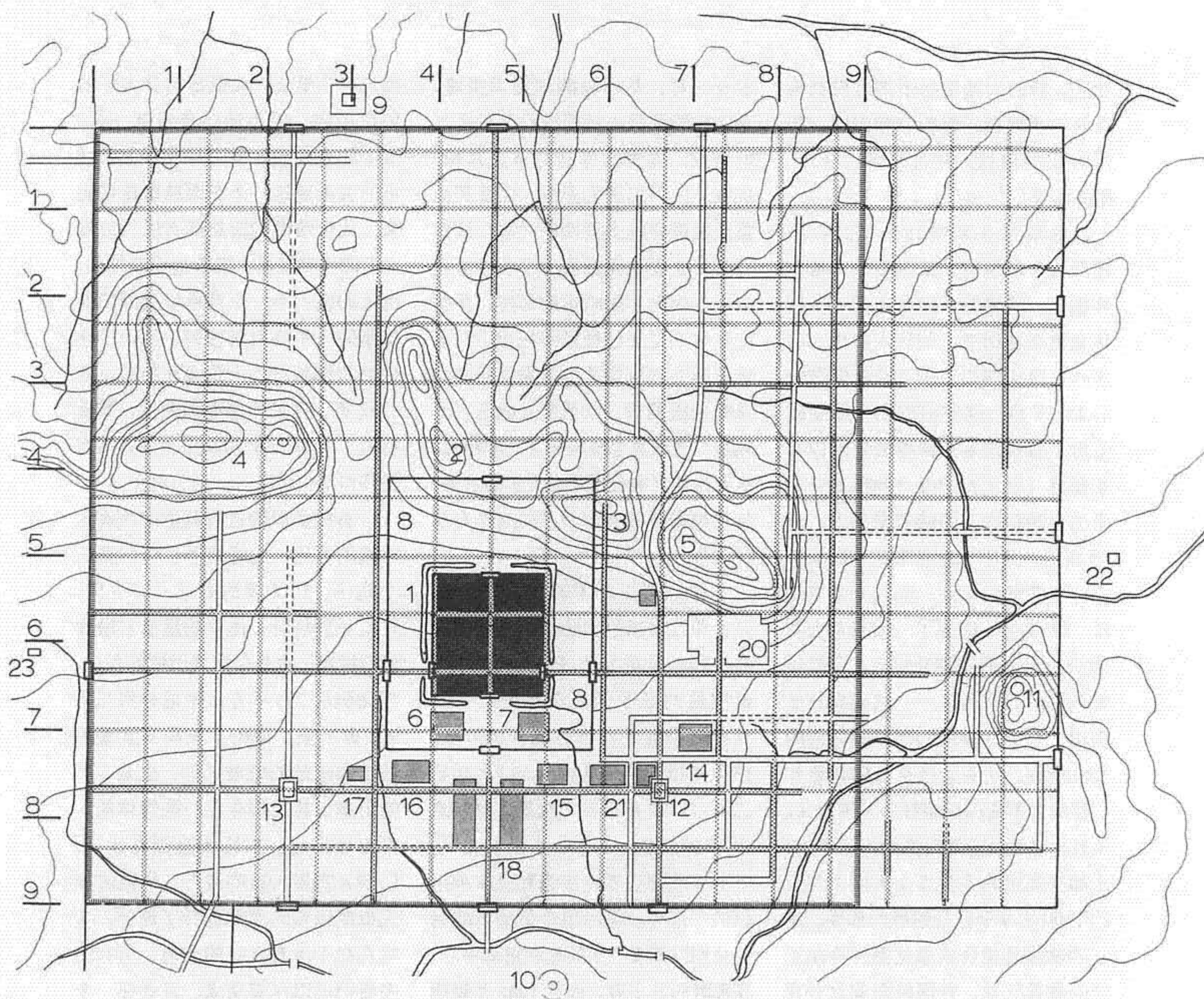


图 4.3.1.3、4 明代在安徽凤阳挖掘出的中都，比例 1 ：40000 和 13、14 世纪的黄河的河床，比例 1 ：160000，参见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北京，1982；吴良镛，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简史，Kassel，德国，1986，J.Wang，中国建设，198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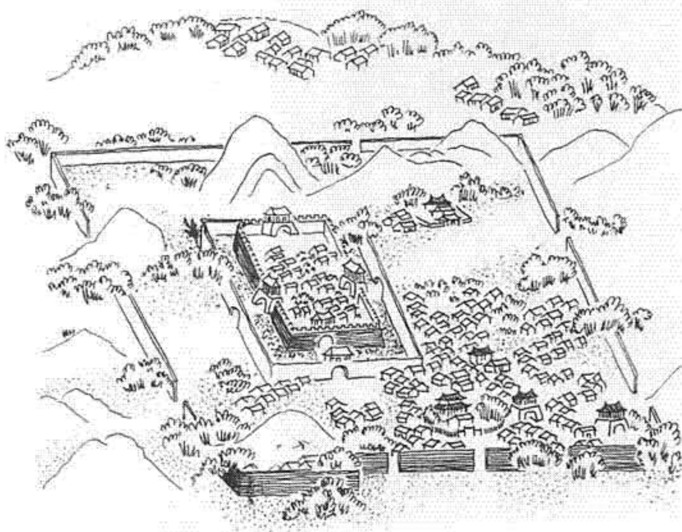
中国学者们已经参照在 1982 年考古学调查和接下来若干年里明代凤阳府志中带有信息的地图之后已经重构了布局，其结果在以上所发表书籍中已经报告出来了。

原先的布局是一个完美的方形，一边 13.5 里，其相等于一个 9×9 的方形，使用一个 1.5 里的度量衡基本单位，正如在大都布局中一样，但是这次基于同样的 30.8 厘米为尺，而采用了 462.0 米为小里的单位，每边墙有 3 座门，总共加在一起有 12 座，遵循着周礼的方案，是完美的神奇方形的概念。然而，宫殿群朝向南边到东边半里移出了方形的中心，而其轴线建立在一里方格网的轴线上，离开西边外墙 7 里，离开原来完整的方形东部边界 6 里半。后来，这布局向东边延伸，为东边外墙的布局增添了 3 里半。在西南角，增加了一个 2.5 里 ×2.5 里

的方形广场将小山合并进墙围的区域。

然而，对于地形的适应，依然跟以前一样不完美。因为在布局内的山脉应该离开北边大约3里，而墙内区域向南边移动，将其全部的宫城安置在水平的地平层上。街道模式，基于1里的度量格子，仅仅提供了四条可能的完全遵循大都例子的一条笔直的街道。鼓楼和钟楼的坐落位置，也是非对称于宫殿轴线的，虽然它们在原来方形布局之内是对称的，离开广场的东边和西边为3.5里的距离。

我们不知道是谁设计了布局，但是，我们知道大约有几项委任是在1367年形成的，来审查适宜的为登基典礼而有的规则和仪式以及其他合法化条款。在新近建立的翰林院的院长陶安（1312—1368年）和宰相李善长（1314—1390年）的领导下，委员们"能够引证来自周礼的古典原则作为基础，来商讨传统标准以及后来的精巧纯化，也做了一些妥协方案，这一决定符合皇帝的意志"，官修明史上这样写到。然而，这委任发现并非是一致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皇帝必须决定要做什么，这使得深受新儒家思想浸染者，如刘基（1311—1375年）看来整个过程有点奇怪。这位杰出的谋士，宫廷天文学家和科学家因此早在1368年就提醒皇帝反对中都的计划。如果某种混淆不明的委托之事的调查计划包括一个仪式完整的皇室，就像这个类似的例子，那么，在中都布局中的偏离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可以解释的了。后来，1368年9月在大都被攻克以后，陶安在10月辞世，皇帝也许已经仔细地研究了大都的布局，并且命令中都的规划宣告完成。在此情形下，两个都城布局之间的相同之处以及折中之处也是可以解释的了。





建筑物的坐落位置可以在两幅地图上被确定如下：1—宫殿；2—凤凰山；3—长寿山；4—太阳山；5—月亮山；6—社稷坛；7—帝国宗庙；8—宫城；9—方形（土地）坛；10—圆形（天）坛；11—观象台；12—鼓楼；13—钟楼；14—凤阳府府衙；15—中都城隍庙；16—功勋人物的纪念堂；17—杰出的前皇帝和太子纪念堂；18—在两侧有皇家（御用）办公御街千步廊；19—洪武家族陵墓；20—建于1383年的龙兴寺（隆兴寺）；21—国子监；22—日坛；23—月坛；A—A—13和14世纪黄河的河床；B—西湖

图4.3.1.5 14世纪末，在废弃的中都废墟城墙内的凤阳府和凤阳县，参见Tan C.Y.收藏的明代初年的黄河卷轴画，尺寸0.18米×12.8米，在他作为皇帝的最初几年里，朱元璋命令一组宫廷官僚和画师绘制一幅黄河的地理图，一些画家，如赵原等与一些官僚一起调查了黄河的下游，其在那时向南流经河南、安徽、江苏，流经凤阳府北面（1324—1853年）。

正如卷轴画所表现的那样，中都工程城墙的遗存依然存在，但是，凤阳县的小镇以坚固的墙体已经占据了宫殿建筑群，在墙内区域东南角的府城在1369年的建设初始就已经开始发展了，在它北面的龙兴寺（隆兴寺）兴建于1383年，因为每一座房屋象征100个家庭，凤阳县在前宫墙区域内包含2100户家庭，大约有12000人，而凤阳府有10400个家庭，大约60000人。

宰相李善长在1370年退位，并被任命监管第二年在中都的宫殿之建造。在他退位时，已经获得了极大的荣誉以及围绕着新都项目的很大财产和1500户为这项目劳作的家庭。他负责140000户富裕家庭从长江南转到围绕凤阳府的农田里，而随着这些举动，他对于这地区个人的利益也一天天地增长。在同一年里，主要谋士和宫廷天文学家刘基退休，又劝皇帝放弃中都项目。刘基1375年死后，皇帝到中都建造基地视察，这在当时已经几乎完成了。令他吃惊的是，匠人们聚会请愿，要求更好的工作条件。因此，皇帝给他们提供了奖金来加紧这项工作。但是，这并非他们所要的。在此时，李善长感觉到他个人利益受到威胁，因而有过激反应，下令调兵，而一切都错了。整个这一地区新的民众们变得群情激奋，并且谴责李善长，皇帝不得不仓皇离开，而这项目就此放弃。他有可能已经得到了刘基警醒的提示，特别是当他有理由怀疑他的前宰相有险恶的阴谋时。最后，他将李善长和他的全家以及许多其他在皇帝早年围绕其左右的那些从非常卑微出身升到极高及极具影响地位的安徽人一起赶出，并将其自己个人利益及其家庭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当然，这公共利益是与皇帝的利益相一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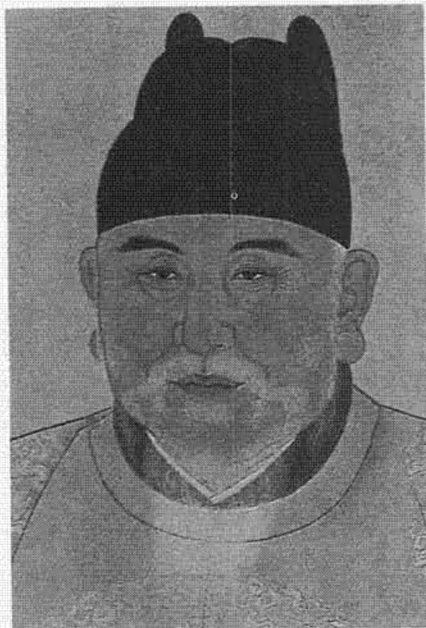


图 4.3.1.6 皇帝朱元璋，其晚年在南京都城的重建完成之后的所绘制的图绘。引自 L.Cerrington Goodrich Collection

图 4.3.1.7 江苏南京城，明代初年所建的宫城，比例 1 ：40000，基于 1929 年所绘制的地图。
当南京在 597 年完全由隋代皇帝文帝（590–604 年）毁灭之后，旧宫城以南以及围绕运河的以前的郊区非常迅速地得到了恢复，而唐代在主要的南北轴线北端建立了一个地方自制机构。短命的南唐（937–975 年）将南京作为其皇室都城，其行政机构转变成为了一个 1 里 ×1 里规模的宫殿，而新的城墙围绕着一整个聚落区域建造起来，其长度据记载为 25 里 44 步，25 英尺高，基座 35 英尺厚，而顶部 25 英尺厚（根据现代地图，城墙大约长 15.7 公里）。据说，这城墙从底座到顶部是以巨石建造的，而且在中国的城墙之中，它是罕见的，其西部和南部依然存在至今。在 975 年后，南京成为了宋代王国的一部分，并且持续地繁荣，甚至它变成了南京朝代的一种边界要塞。在蒙古人战争期间，这座城市在多大程度上遭受重创，我们无从可知。但是，在 1297 年，有大约 95000 居民据记载已经居住在城墙之内，作为这个城市所属两县 30 万居民的一部分。作为一个整体的府城，其中，这个城市作为中心，有 1250000 的人口，城市人口占据了其中的 7.6%。
1355 年后，朱元璋以南京为其权力基地，而在 1368 年，他将南京作为其帝国的都城，在他的内阁中是刘基（1311–1375 年），他已经准备了一个关于政府政策的 18 点的备忘录，而在 1365 年被任命为新设立的天文局的领导人为新朝代准备一个新的日程表。1366 年，刘基受委托来延展城市的设计，为新宫殿政府办公机构和高官府邸提供足够的空间。刘基立即开始工作，排出城市以东的湿地区域的水，并且为新的帝国城市开垦了大约 8 平方公里的平整土地。当朱元璋在 1368 年就任皇帝时，一切的一切都已经为这一庆祝活动而准备就绪。
刘基的概念也许已经是基于城市以南 18 公里富贵山（海拔 125 米）和达山（海拔 96.9 米）之间主要的南北轴线上。旧城的轴线北偏东大约 17°，偏新轴线仅 13°，因此，在两个布局之间并没有正式的故意形成的关系。刘基似乎运用了相当于 451.2 米的明代的短里（小里），并在旧城的东墙和宫城的东墙之间建立了 5 里的距离。一条在富贵山以南大约 5 里跨过主要轴线的东西街道，在这里，宫殿的南门建造了起来，由街道上的东门和西门作为补充。从这里也是御街千步廊（100 步宽）向南延伸为精确的 3 里。在宫门南 1 里建造了另一座门以代表进入紫禁城的入口。这和御街千步廊南端之间，在街道的两侧排列着几座办公室。在西边是军事行政管理，而在东边是市政管理。看起来这些度量体系建立了一种标准，那也将用于具有重要政府（衙门）办公机构的其他城市中。新城通过两座门与旧的城市相联系，其中，新街道以最为实际的样式而布局，而且，这座城市以城墙和宽敞的城壕，以同样的样式围绕着城市。起先，新的北墙继续向西直达西山以包容旧城，在此，建造了一座北门，这后来变成了鼓楼，今天依然耸立在那里。从所有这些可以看出惟一正规的设计是带有御街千步廊的宫殿。新的北墙迅速地拆除，而刘基为都城的新防御工事想出了一个完全新的思路。新城墙的建造完成于 1373 年，当 1375 年中都工程被废止以后，那里的宫殿被拆除了，而在南京的宫殿随之重建。保持南京为中都和帝国主要都城的最后决定了 1378 年出炉，它当时被命名为京师，即都城。1390 年，一座外城墙被建造起来，有 13 座城门，而因之皇室的建造完成了。在 1391 年，在城墙内的人口据记载为 173000 人，其中大约 20000 个家庭依据皇帝之命已经被安排在此。A–A 南唐时期著名的白墙；B–B 南唐具有宫殿和中部行政机构的主要轴线；C–C 玉华山上的佛寺（参见图 3.2.3，G）在 963 年和 968 年之间重建，当时玄奘的一小块头盖骨入寺祀奉。1412 年，著名的琉璃宝塔依照永乐之命在那里建造，总共用了 2485484 两白银，表明了其作为一个明代国家纪念物的重要性。
1– 富贵山；2– 宫殿子午门；3– 宫殿建筑群；4– 社稷坛；5– 帝国祖先坛；6– 皇城；7– 皇城前永久平安的方形广场；8– 御街千步廊，两侧有五个军事和六个市政官吏；9– 洪武门；10– 山川坛；11– 建于 1367 年和 1377 年的大祀殿（敬献天地）的圆丘；12– 国子监，1381 年；13– 钟楼；14– 第一座北墙；15– 第一座北门，后来的鼓楼；16–1373 年，整个新的城墙完成了；17– 玄武湖；18– 独立的办公建筑物；19– 紫金山；20– 徐达和李文忠墓；21– 洪武陵墓，1381 年至 1383 年间建造；22– 红门，通往帝国墓地的入口和通向陵墓的神道


16
16
17
17
Li
20
Xu
19
18
1
16
15
13
14
14
16
14
14
14
21
12
A
B
A
6
22
3
A
2
4
5
6
8
8
9
10
11
A
C
A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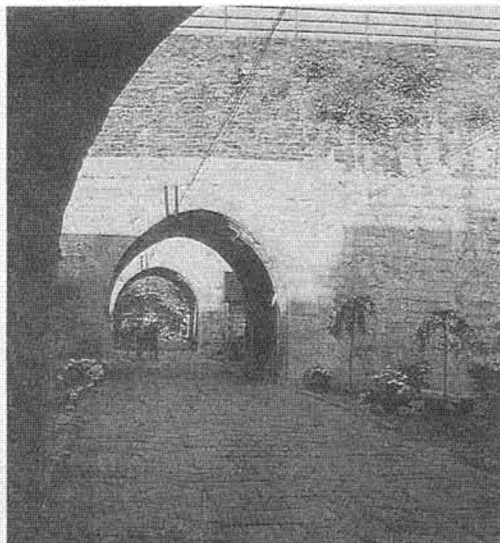

7
8
6
6
5
2
1
4
3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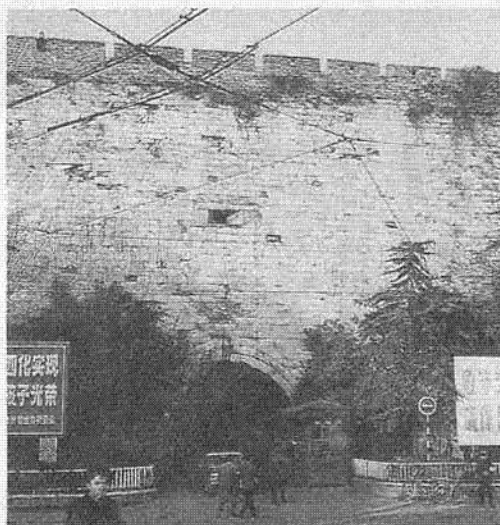
图 4.3.1.8 建于 1390 年的南京外城墙，比例 1：80000，基于一幅现代地图，发表于 1934 年。外墙由一个有城壕和有 131 座城门的双层土墙组成，其不仅环绕城市，而且也环绕紫金山（今日钟山，将宫殿几乎置于这一以大约 18 公里为直径的掩体的中心，这也许是故意的事。1- 明代宫殿；2- 洪武陵墓；3- 红门；4- 陵谷寺；5- 紫金山；6- 玄武湖；7- 长江；8- 梁代（6 世纪）陵墓

图 4.3.1.9 南京城著名的白墙，最初建于 10 世纪的南唐（937-975 年），在 1360 年由明代重建。这里，城市的南门从外部显示出来，城墙在这里为 21.8 米高，包括在其顶上的墙筑雉堞谦逊的印象由外面的门，仅仅是在墙里的一个洞所形成。一旦参观者在里面，就会非常戏剧化地发生变化，在那里，参观者必须穿过四个连续的门，因为碉楼建造是在墙内，而非像往常那样在外面。然而，在墙上的门楼至少有 12 米的高度（参见图 4.3.1.2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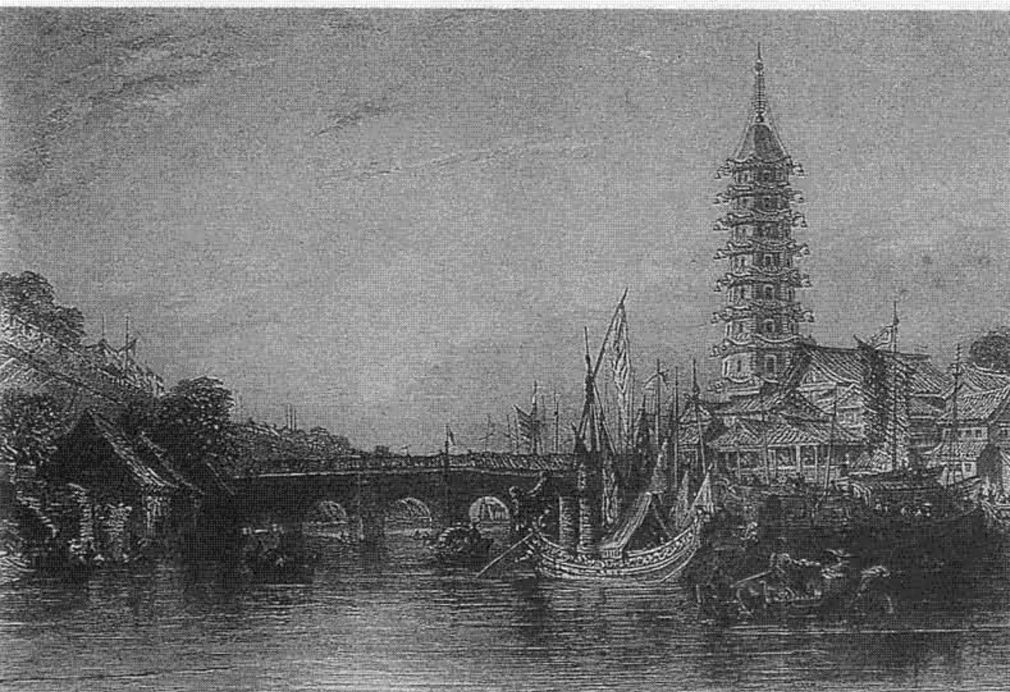
图 4.3.1.10 南京内部白墙的南门。
在门的上方是卫兵和贮藏之用的地域。在带有城门的碉楼的下面可以见到建造墙和门所用的砖块，是在 4 个省的 152 个地区生产的，而且每块砖带有这个区的名字，目的用于质量控制。据记载，大约新墙的 1/3 是由 Chen Wansan 提供经费支持的，他是来自浙江的富人

图 4.3.1.11 南京的白墙在城市之南有其城壕，在左边，墙的外表面清晰可见，在背景之中，东南角的膨胀可以见到，给予墙体一个洁白的良好印象。在右边可见城壕，大约 50 米宽。在城壕和城墙之间，一个小郊区发展为一个小市场街道，通往城壕，它也是一种运河和运输路线。这墙实际上是不同类型的墙体拼贴在一起具有不同的尺度和建造方法而总体上被认为是在中国或甚至整个世界最长的城墙。关于这墙的长度，中国文献中所给出的信息是颇为困惑的，但是，仔细的分析，对于各种各样的信息产生出了有趣的意义。一个传统的数目是 96 里，一再重复直到我们这个时代，另一个给出为 61 里，而第三个仅仅是 57 里，将这些与取自最精确的 20 世纪地图的 33.5 公里的实际长度相比较(作者查阅其中之七,比例从 1：10000 到 1：25000 变化的比例），我们得出了一个有趣的解释。通过计算 1 里的长度，我们得到 348.95 米（96 里），549.18 米（61 里）及 587.72 米（57 里）。最短的里是最古老的度量，而且似乎是古老的周代的度量尺度，以 1 英尺相当于 19.5 厘米。它也许已经由传统的有心人所使用，他们爱好神圣的数字 96=8×12（阴和阳）。另一个是明代的度量之一，30.51 厘米为一尺，而且与建造属于同一时期。
最后，最长的里就是由清代测绘者使用的一英尺为 32.65 厘米，而且也许由清代官僚在自己亲自测量墙体时所使用。对此，我们必须增强在图 4.3.1.7 中所提到的数字。南唐墙体的 25 里 44 步产生自所谓的淮尺，34.13 厘米长，这是所有之中最长的，并且具有本地的重要意义。尽管在 19 世纪用于国际贸易中，而且大概由某个试图重建南唐城实际尺寸的人使用。
正如我们从图 4.3.1.7 的地图所见，墙的布局非常不规则，因为其大部分遵循地形特征，基于刘基的防御性建设的新概念，因为对于战争最现代的方法很熟悉，而且其本身是一个很有造诣的战略家，刘基轻易地使皇帝确信其利用所有自然地形特征的本领来布局新的防御墙体。这样，将没有敌人能获得机会来以其自己的优势使用地形。在城市西北所有的带有群山的地域和玄武湖的南面都包括在围墙之内，而墙的最北部分到达了长江岸边，从那里、渡船和海军的操作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受到控制，朱元璋的胜利缘于使用装在桶中大炮的枪药和战舰的支持。而当他已经攻克了南京城后，他评价了战略地形特征的正反两方面特征，小山对于放置枪支以及运用其海上战略操作的水体来说是特别有价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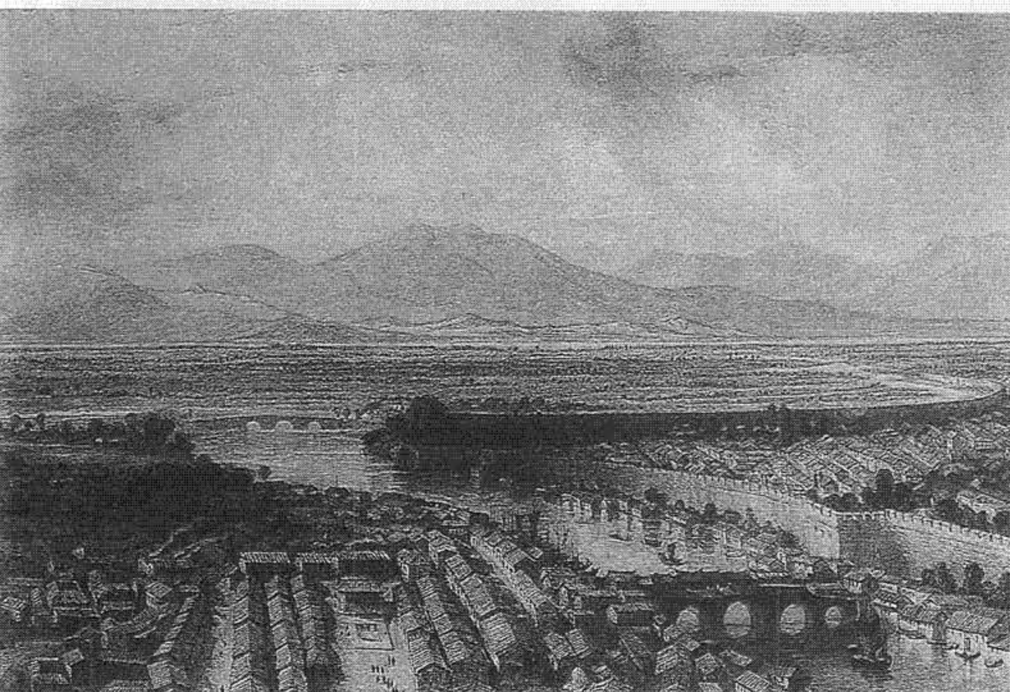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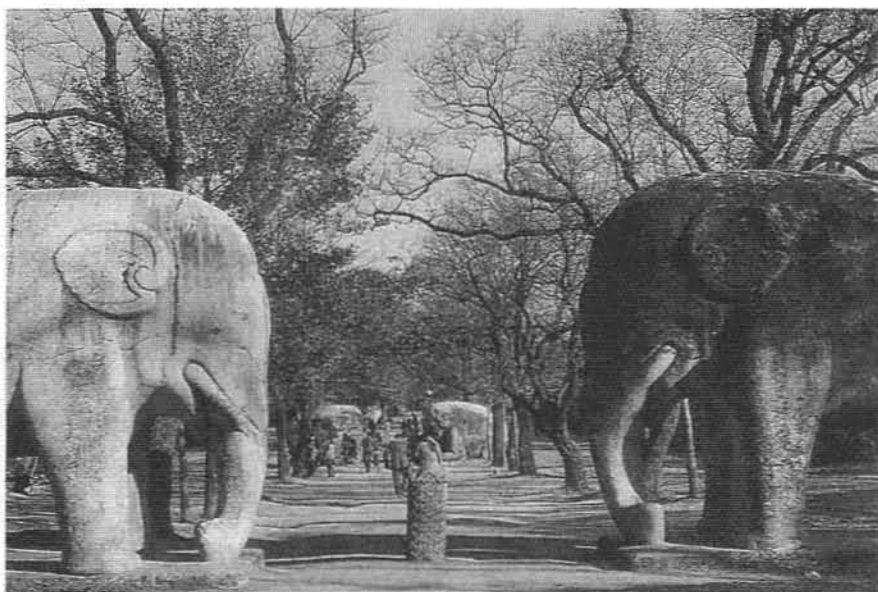
图 4.3.1.12 在城市南面，玉华山上寺庙的琉璃塔，参见蚀刻版画，Thomas Allon，London，1843。
在左面，城墙在南门前面处于中心位置的桥。护城河上熙熙攘攘的船来船往的活动。前景可见一艘帝国行政长官乘坐的中国式帆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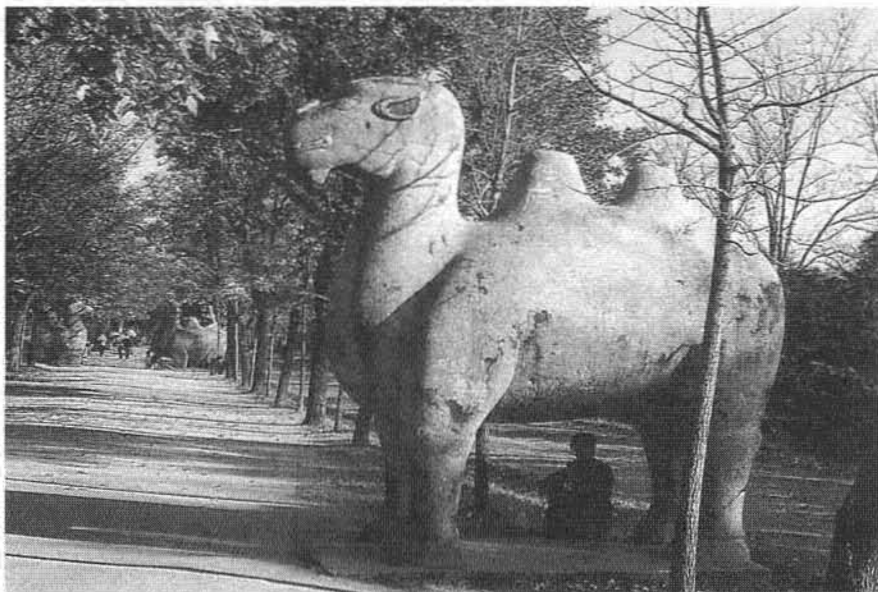
图 4.3.1.13 玉华山上的琉璃塔，参见 19 世纪初的一幅中国木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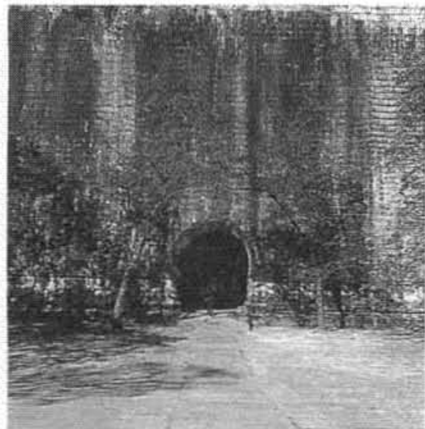
图 4.3.1.14 从琉璃塔向西看的视野，蚀刻版画，Thomas Allom，London，1843。
右边是城墙、城壕和桥；在背景中，长江上的桥梁在远处。前景中可见带有僧舍的寺院的主要庭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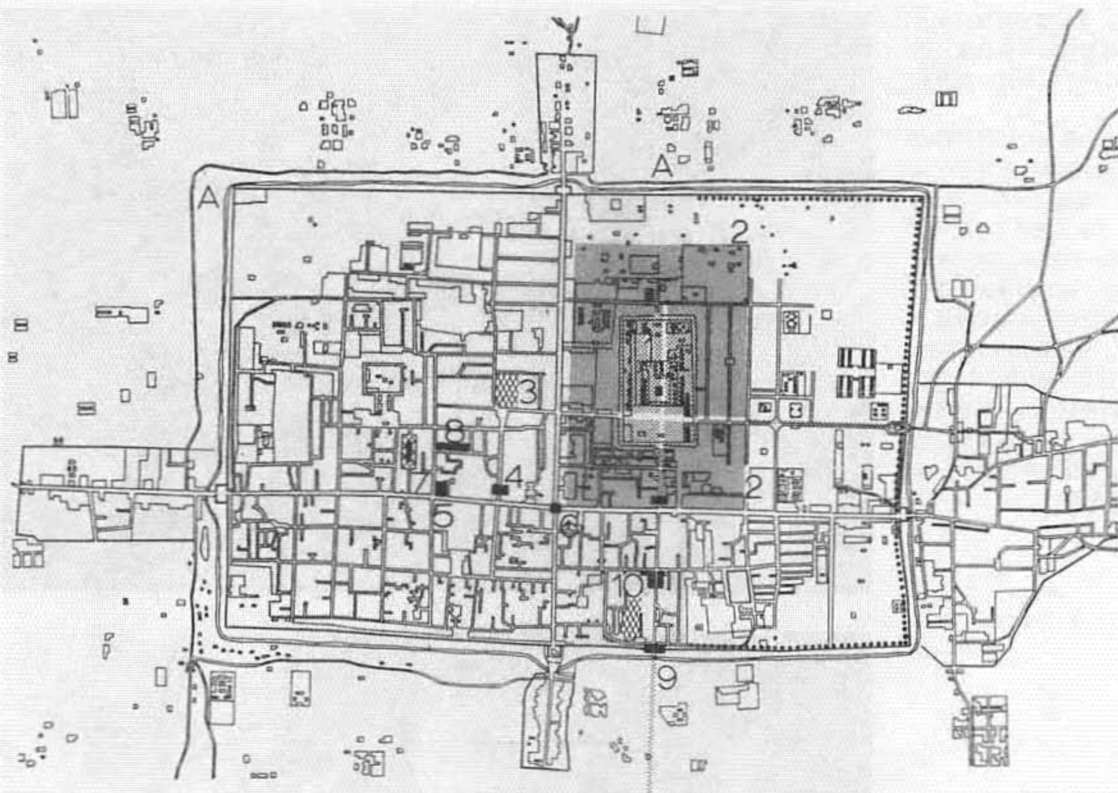
图 4.3.1.15–17 1381 年，朱元璋在宫城以东开始建造陵墓，在紫金山的南面以及孙权陵丘的北面，孙权在 229 年已兴建了吴帝国，其皇都定在南京。

为了确保陵墓的权威地位，陵谷寺不得不移往山的东坡，这样，陵墓的主要轴线就直指在南面可能叫都山的一座小山，其超过海平面 79 米，从正北面向东偏转 5°（参见图 4.3.1.6–8）。在 1382 年，马皇后（1332–1382 年）陪伴朱元璋 30 年死后埋葬于陵墓中，她曾经是朱元璋结发同心的妻子，节制地伴随他从非常卑微的开始直到他最辉煌的时刻。皇家墓地以墙围绕，从宫城延伸直到已经搬迁寺院新的坐落位置，而具有动物和官吏塑像的神道从这座新墙的入口建造，围绕着孙权的陵丘直到陵墓享殿，进入庙宇的次级结构的入口在此也有显示，10 年后，皇太子朱飙埋葬在陵墓以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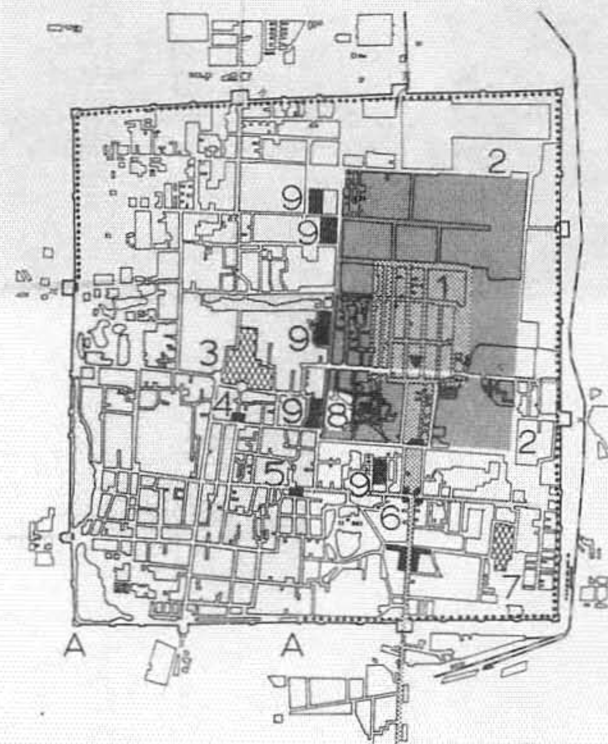


图 4.3.1.18，19　陕西省西安市和山西省太原市，在明代作为皇太子的居室建造，比例：1：40000

图 4.3.1.18　从 1374–1378 年，旧的宋代城市扩展到东部以为新的宫殿提供足够的空间。在朱元璋的二皇子到达西安之前，这个在 1378 年作为他的封地的首府所在。墙大约 12 米高，基座 15 到 18 米宽，而顶部 12 到 14 米宽（参见图 3.3.4.24）。宫殿布局在一个宏伟的尺度带有选作为御街千步廊的旧宋城最东边的街道上，在此情况下，其仅仅 2 里长。围绕着宫殿，形成了一个太子治理的以及军事的城市。在旧宋城中，以一条直通宫殿前面的道路与当地的行政管理联结起来。鼓楼重建于 1380 年，而钟楼重建于 1384 年，而一座新的清真寺建在鼓楼的西北用于穆斯林的社区。后来，在 1432–1433 年，旧城内在一个中心的位置建造了一座新城隍庙。最后，在 1582 年，钟楼移往中心两条主要街道交叉位置，根据"内在防御"体系的原则形成了一个控制的位置，为此扩建的度量体系是基于 31.9 厘米的明尺，正如在中都那样，使用了一个 1 里半的单位，结果，一座四个单位的新的南墙和一座三个单位的东墙，而旧的西墙不适宜这一新的单位，因为它是基于更为古老的度量体系（参见图 4.1.4）。

A–A– 旧宋城；1– 宫殿；2– 宫城；3– 地方行政中心；4– 鼓楼；5– 古钟楼；6– 新钟楼；7– 城隍庙；8– 清真寺；9– 宫殿的大门，后来关闭；10– 孔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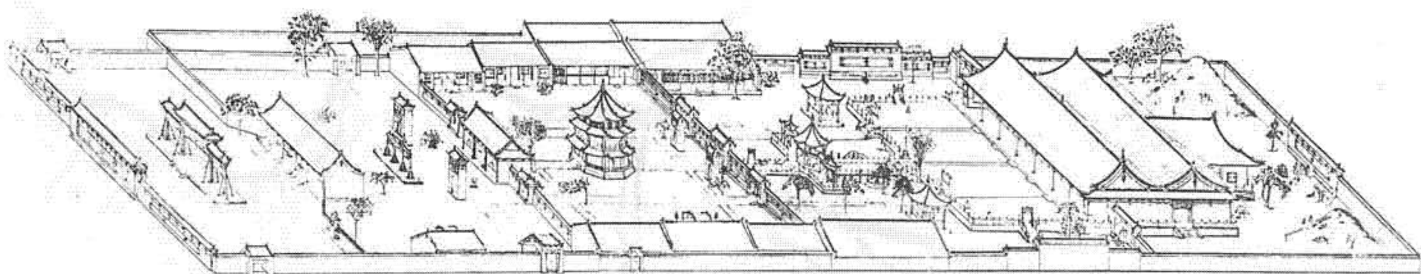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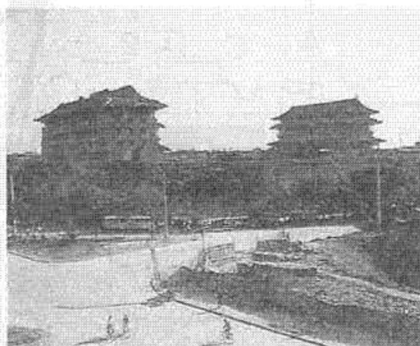


图 4.3.1.19　宋代太原城，是相当小的，当明代将军徐达 1373 年从蒙古人手中夺回时，这座城里已经非常拥挤。因此，其向东边和北边扩展，以供 1378 年到达的皇三子宫殿空间之需。新的布局，包括旧城，形成了一个不太精确的 5 里 ×5 里的方形，基于 31.9 厘米的明尺，并且在宫城内包含宫殿。宫城的南墙为 2 里，正如新城南墙其精确度量为 5 里。但是，所有其他墙体并非那样准确地度量出来。御街千步廊从宫城的两座门延伸 2 里直达南墙对应的门。在 8 座门之间，没有笔直的街道，至少其中有 3 条是没有必要的。但是，8 座门暗示了一种与幻方概念微弱的联系。与旧的街道模式相同之处在于，所有的街道都是以 T 形的十字路口相联系，为皇家贵族成功增建了几座宫殿，同时用于府衙的空间又变得很稀少。

A–A– 旧宋城；1– 宫殿；2– 宫城；3– 本地行政管理机构；4– 鼓楼；5– 钟楼；6– 四座红牌楼（牌坊）；7– 洪武寿辰殿，后来作为孔庙；8– 天地坛；9– 太子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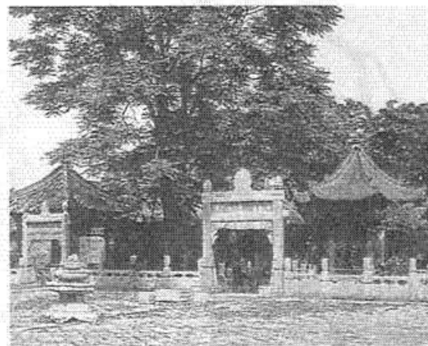


图 4.3.1.20、21　在西安的明代门楼，为巨大的建筑物，包含有大量守备队的营房

图 4.3.1.20　由考特·卡斯蒂尔于 1933 年拍摄的鸟瞰图。这幅照片表现了在内部城墙顶上的南门，而在外部的雕楼顶部是另一座塔楼以及有雕楼和两座塔楼的西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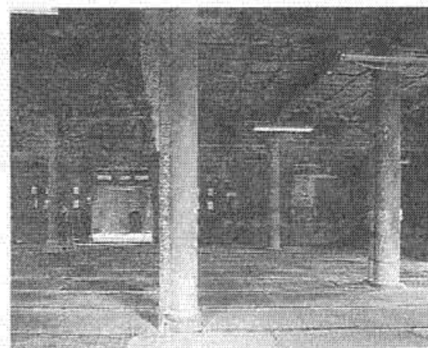


图 4.3.1.22　两条主要街道十字交叉中心的钟楼，是从明代开始的一座雄伟的结构。但是，尽管其高度为 22.3 米，依然被降低到环绕着新的建筑物。平台形成了一个方形的基座，用于塔楼，一边为 34.1 米

23
20　24
21　25
22



图 4.3.1.23–25　西安明代的大清真寺，14 世纪末建造在清真寺的地基上。这座清真寺早已于 742 年在此兴建于隋唐长安的宫城之内

图 4.3.1.23　轴测图

图 4.3.1.24　在祈殿前是铺砌的平台。在此，信徒们在大型节日里聚集庆祝。例如，在先知穆罕默德诞辰日，清真寺变得非常拥挤

图 4.3.1.25　祈殿内部以及在远处的壁龛，直指麦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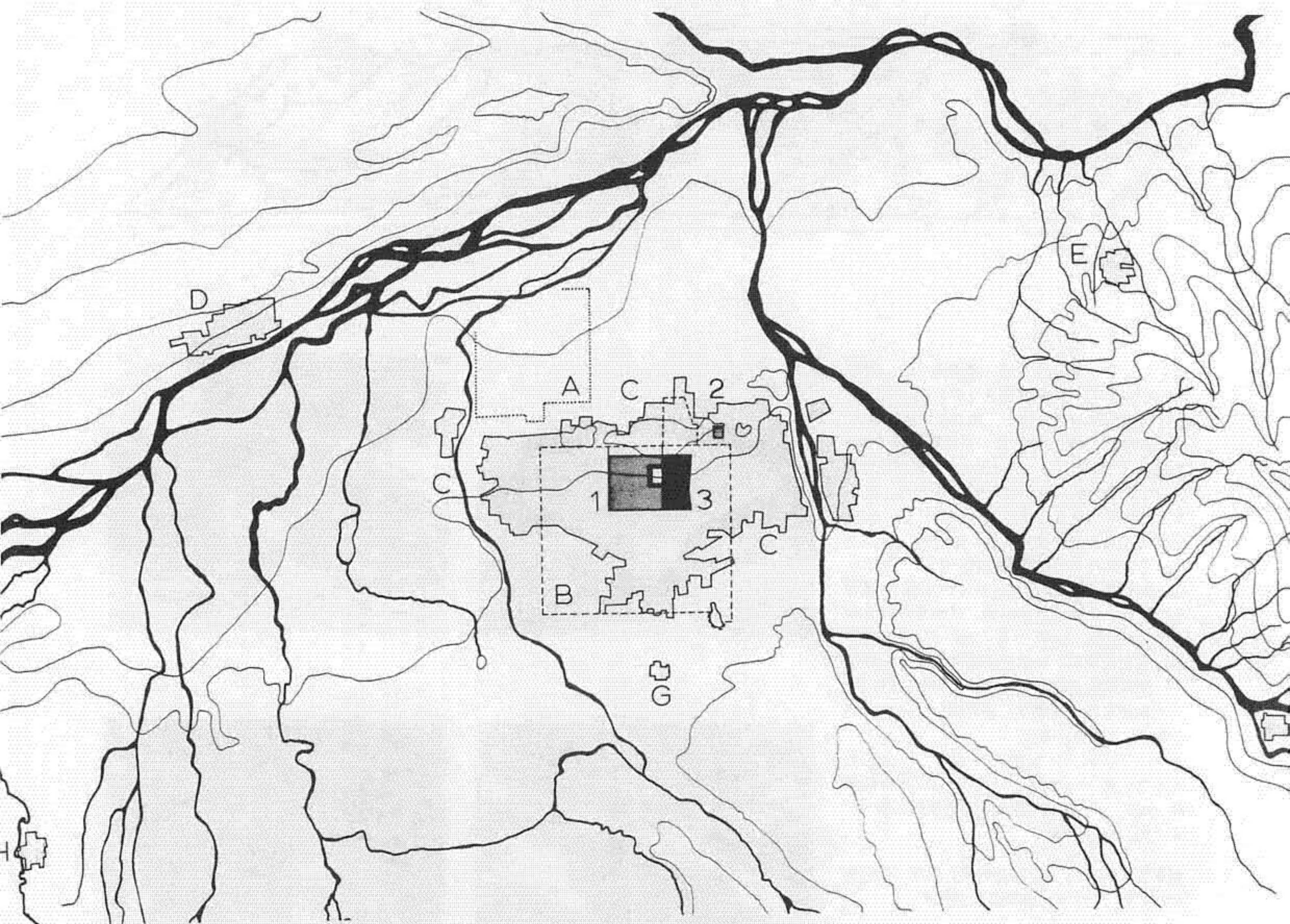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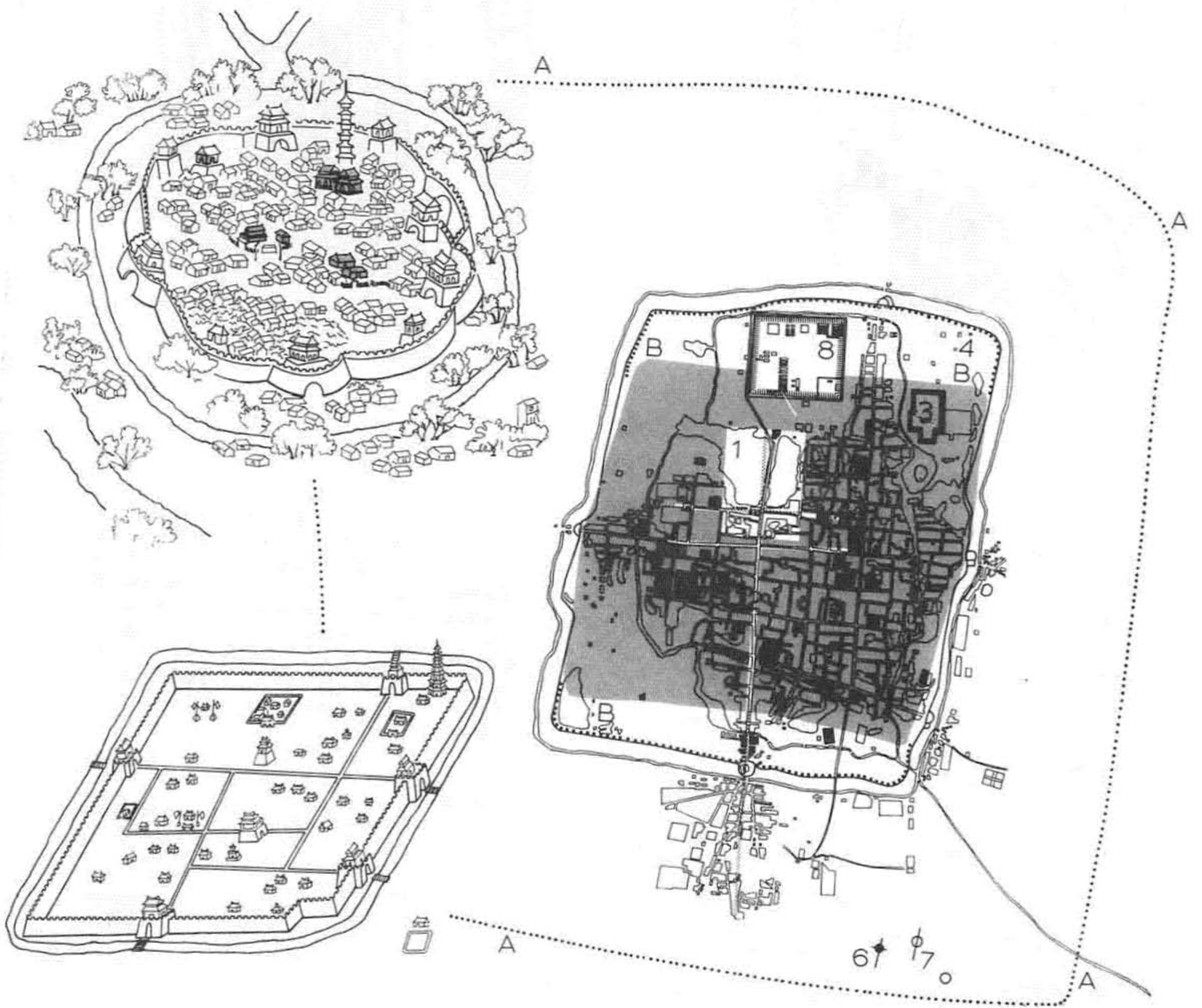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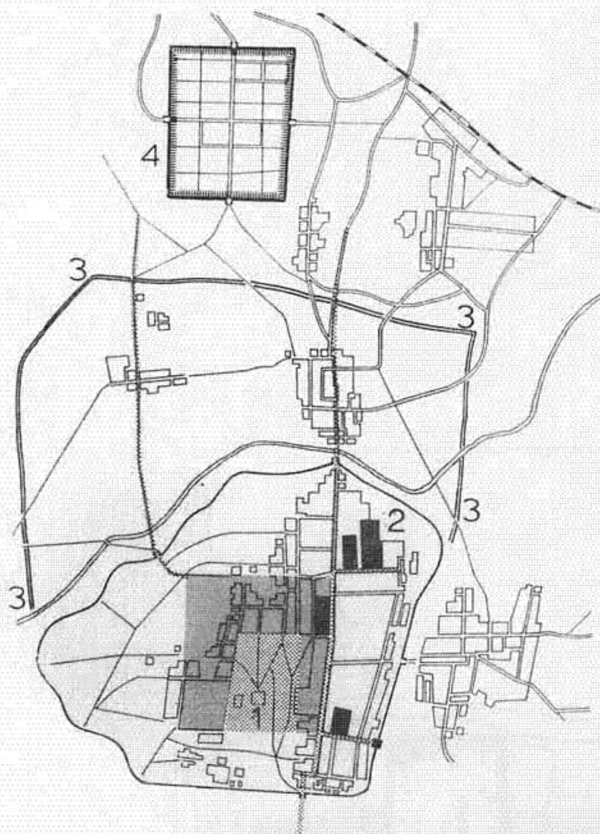


图 4.3.1.26 渭河谷与西安城，比例 1 ：250000。
1– 宋代城池；2– 元代 Ansi Wang 宫殿；3– 明代新宫的扩建；A– 汉长安废墟；B– 唐长安废墟；C– 现代城市；D– 咸阳城；E– 临潼城；F– 蓝田城；G– 长安县城；H– 户县城

图 4.3.1.27，28 两幅关于明代开封的图绘：上面一幅是来自黄河的卷轴（参见图 4.3.1.5），而下面的一幅来自县志。令人感到有趣的是，每一幅图绘都表示出了各墙体不同的位置，正如 20 世纪所测绘的那样，一座是圆的，一座是方的。在县志中所绘的是所谓的铁塔，可以在上方东边的角落看见，而宫殿、鼓楼和钟楼在其左边，主轴线左侧是带有两个升旗杆的开封府的府衙，这条主轴线，可能是御街千步廊，其延伸了 3 里，大概因为城市最初的地位是北部都城

图 4.3.1.29 河南开封城，正如 1928 年的现代地图所示，具有明代的城墙，比例 1 ：40000。最初命名为北都，1370 年城市被选为五皇子的城池，当皇子 1381 年到达时，已经在北部兴建起了一座宫殿，那里有古老的宋代宫殿在 1127 年毁灭后，留下的断壁残垣，原来的内城（参见图 4.1.10）向南北延伸，形成一个不规则的矩形或平行四边形。
A–A– 宋代的外城；B–B– 宋代的内城
1– 明代宫殿区域；2– 地方行政管理；3– 大试殿；4– 铁塔；5– 相国寺；6– 繁塔；7– 禹台；8– 后来的满族兵营


A
A
B
8
4
B
3
1
B
A
6
7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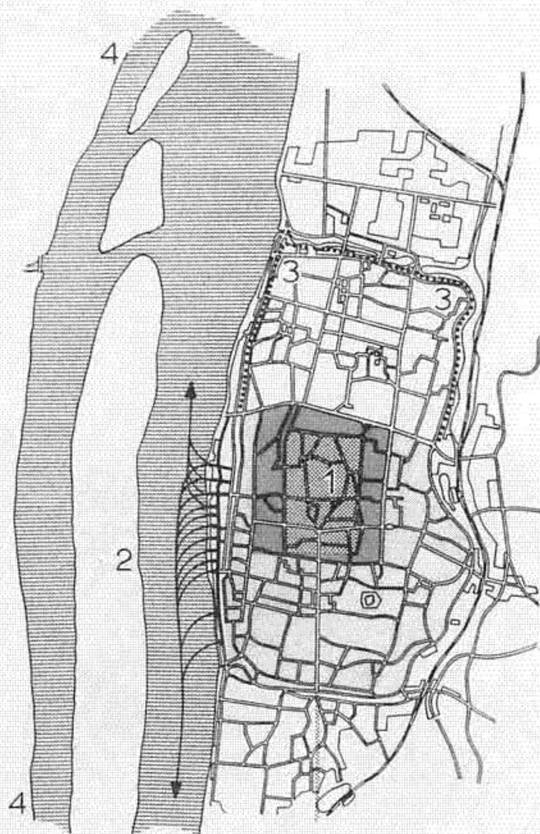


图 4.3.1.30–34　在旧城聚落的五座皇子的城池——山东沂都、湖南长沙、江西南昌、广西桂林、湖北武昌，比例 1 ：40000

图 4.3.1.30　沂都城（当代的名字），在 1370 年被赐予七皇子，并于 1382 年宫殿在南部建立后由太子占据。那时，城市更大，城墙继续向北延伸。原来，作为在山东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其是一个权力中心而具有较悠久的传统，而 1405 年，当封地被废止，城市便迅速衰落，并且退缩成 20 世纪地图上显示的规模。

1– 宫殿和宫城；2– 本地的行政管理；3– 封地期间的城墙；4– 后来的满族哨卡

图 4.3.1.31　长沙城，是当时湖南省的一个州，但后来在 1745 年成为新立湖南省的省会城市。1370 年，这座城池被当作封地赐予了皇八子，而当他 1385 年到达这里时，他的宫殿被挤压成为现存的城市聚落，并让位于新的 2 里长的御街千步廊，因此南门必须移进南墙的中央位置。这招致古老的南北市场街和与河流平行的主要大街失去了其原来自然的南门。新门叫黄道门，大概是参照了千步廊。当它作为一座市场街而具有"黄道"的名字时，我们必须指出，黄色是王者所用的颜色。

1– 宫殿和宫城；2– 沿着河岸的市场街道；3–1745 年的延扩；4– 湘江

图 4.3.1.32　南昌城，明时已经是江西省的省会城市，并且是赣江河谷的自然中心，作为封地赐予了皇十七子，但是，他的兄长明皇三子朱棣（永乐，1402–1424 年在位），在 1403 年将其安插在此，作为宁太子他的宫殿近河边而建，并且在东边和南边以延伸的湖泊围绕。而当围绕整个城市聚落建造了城墙时，商业活动全部被置于沿河郊区的市场街道之外。御街千步廊的建造似乎遇到了问题，而仅仅一条不规则形的街道，从沿河的墙门洞口大概是从陆地通往宫殿，这封地在 1519 年四代之后被废止，作为最后封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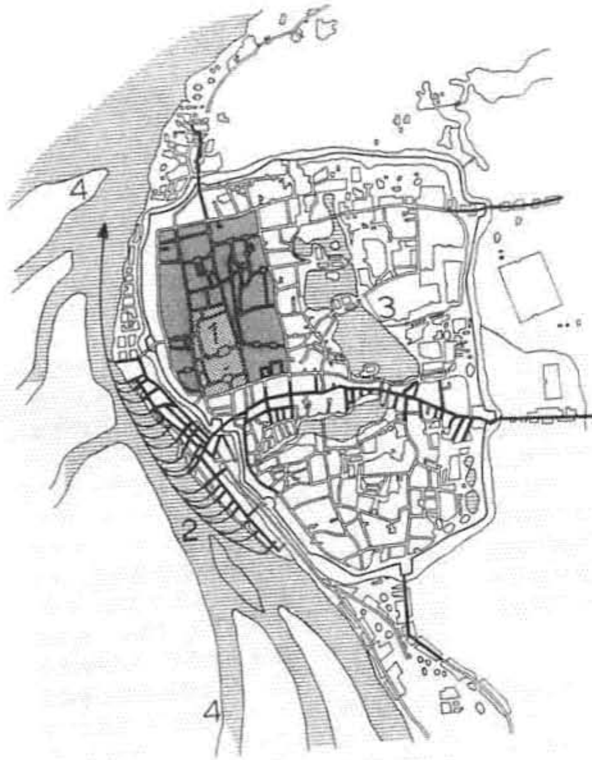
1– 宫殿和宫城；2– 有陆地的市场街道；3– 围绕最古老城池部分的湖泊；4– 赣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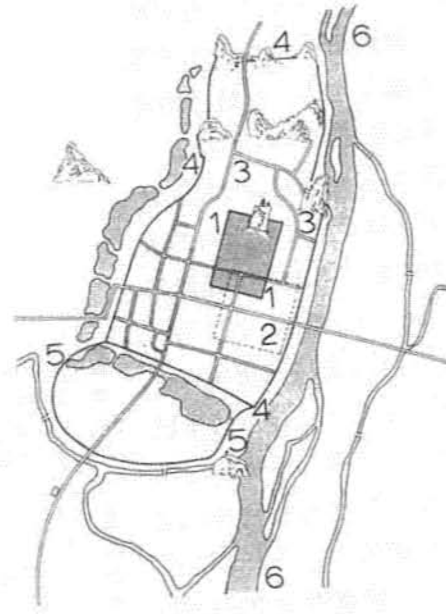
图 4.3.1.33　桂林城，有时作为广西省会，都城，府城，早于公元前 3 世纪始皇帝时代建立，1370 年，皇帝将其作为封地赐给侄儿。正如在图 4.1.2.54–56 中所示，在不同寻常的群山之间，聚落的发展已经产生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围墙系统。1376 年，皇子来到之前，宫殿就已经建好，城的外墙重造并简化。宫殿的轴线始于独秀峰脚下，并指向南方，大概是指向更往南的另一峰，但是偏离正北而偏东 18°，千步廊沿此轴线达 1 里，但是，因一座湖的存在而不能继续延伸，而在城墙处终结。一座宫殿兴建起来，并迅速地发展出郊区，并在城南加筑了围墙，包括湖泊，这曾经是宋代城池防御体系的一部分。城市曾被选作为一处封地，因为它是一个中国皇帝对南方反叛部落安抚政策的一个重要的中心。

1– 宫殿；2– 唐城；3– 宋代内城；4– 宋代外城；5– 明代的延伸；6– 漓江

图 4.3.1.34　自从在 3 世纪兴建以来，武昌是中国南部一个经济、文化和行政中心（参见图 3.2.3 和图 4.1.1.11），1370 年，它被当作封地赐予了洪武的皇六子。

1– 宫殿；2– 旧城；3– 为出行官吏而留的登陆处；4– 清代的扩建；5– 长江；6– 汉水（其北为汉口）；7– 汉阳府


4
1
3
2
4


4
6
4
3
1
3
1
2
5
4
5
6


5
6
6
4
4
7
2
2
3
2
5

子的。城市区域向北和南的方向扩展，在此，御街千步廊获得了3里的长度，大概是作为三朝概念的遗风，开封本来是打算作为北都的。

在1378年所赐予的第二批封邑中，两个例子值得提及。山西的大同和四川的成都。当大同被赐给第十三个儿子时，它已经完全作为一座要塞城镇，以及长城防御体系中的一座要塞而重建了。徐达将军已经建有3里×3里的、围绕着辽和金代旧城遗迹的标准方形城墙，以及十字路的街道模式。皇太子因此不得不将他的宫殿挤进这个已经建立完善的城市之北，当他于1392年到达时，建筑物已经完工了。著名的九龙壁一直留存至今。它是从明代起所谓“神墙”的著名例子。在成都，这个被赐予第十一皇太子的城市里，宫殿以及周围的皇城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被放进原有的街道模式中，其所以别致，在于新宫殿的南北朝向从原来唐代街道模式的东北方向偏离了大约25度。最后一批于1391年赐予的封邑之中，有两座完全新近成立的城市，它们位于旧要塞之地，就是宁夏的银川和河北的宣化，分别被赐予皇帝的第十六和第十九皇太子，并于1393年到1395年由皇太子所居，在此，布局随了凤阳——中都的模式。

银川是一块5里×7里的矩形布局，基于明代的小里，这有些令人吃惊，不过足够准确。我们可以肯定它像1369年的中都那样。大体的街道模式看来由一条主要的东西向街道（街道两头各有城门一

图4.3.1.35–39 因为随着长城防御体系的重建，其整个长度被分成九个管控部分。每一个有一座中央要塞城市，其中有几座也被赐予皇子们作为封地。在这种封地中，有两座布局成为新城，是旧的、被毁的要塞城镇所在地。宁夏银川在1391年被赐予了皇十六子，而宣化也在1391年赐予了皇十九子。这两座城市的规划，总的来说是模仿中都的布局，但是以更小的比例（1：40000）。所有规划，参照重绘的现代地图（1927）以及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1982，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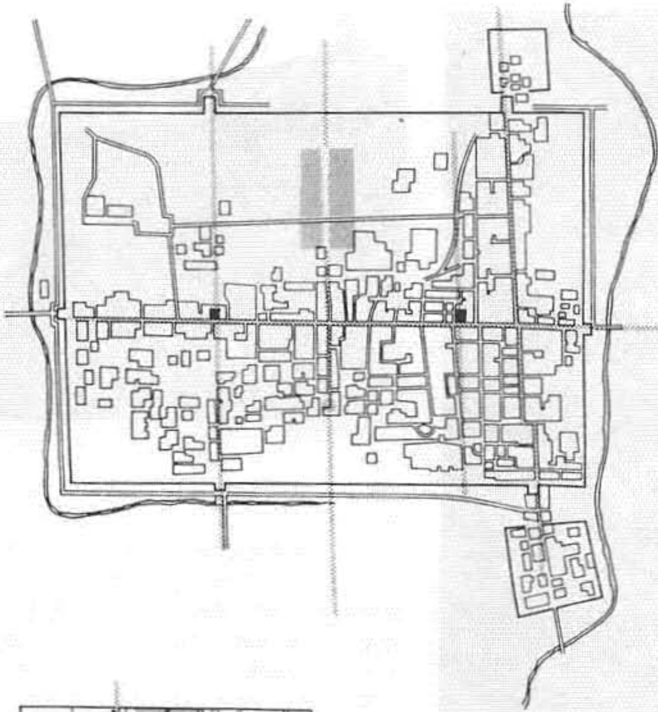
图4.3.1.35 银川基于一个5里×7里的矩形而形成城池，并且相当准确地得以实施；宣化的布局也许是基于一个7里×7里的方形，但是这座城实施得非常马虎，甚至角度也不准确。与中都不同，这座城中宫殿的位置是在北边，处在两条主要的南北向街道和一条主要的东西向街道的网络之内。在街道的交叉处，坐落有钟楼和鼓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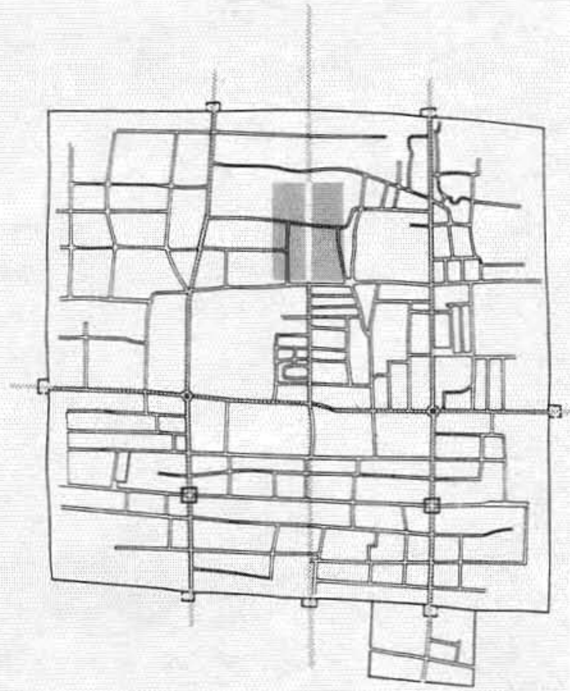
图4.3.1.36 在宣化，可以看到中央南门的痕迹。而在北边通向宫殿中轴线的模糊的平面图清晰可辨

图4.3.1.37 另一座但是小得多的皇子城池建于辽宁，它的布局基本与开原城相同。这本打算作为皇二十子的府邸，但是，这皇子从未占据这里，而且宫殿可能从未建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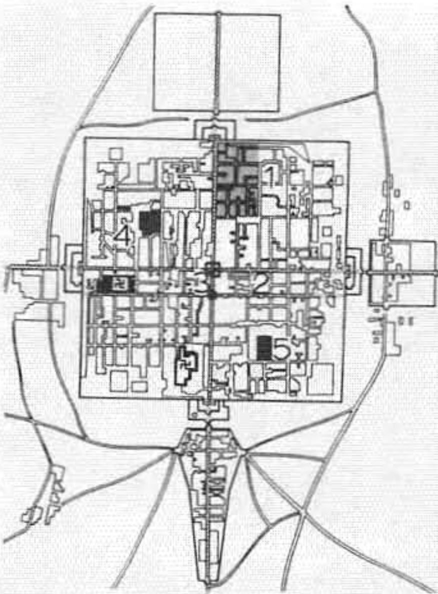
图4.3.1.38 大同的设防城市，已在1373年由徐达将军重建为一个完美的3里×3里的方形，基于31.9厘米的明尺，或者使用1里半为单位计算，作为一个2×2个单位的方形。后者大概是正确的概念，正如由两条主要街道所表示的，在方形的中心十字相交。重建包括辽代的古寺（参见图4.2.2.7），而当皇十三子1392年到达之时，他的宫殿不得不被挤进早已经重新安置的围墙区域，而因此相当小。在北边的城墙之外，又增加了一座设防的城池，而在其他三边，发展了由墙围合的郊区。最为显著的宫殿遗址，就是所谓的龙墙。原来，作为一个防护屏墙，建造在主要的南门的前面，它是至今存在的这种墙体最好也是最古老的实例。
1–宫殿；2–龙墙；3–鼓楼和钟楼；4–本地行政中心；5–孔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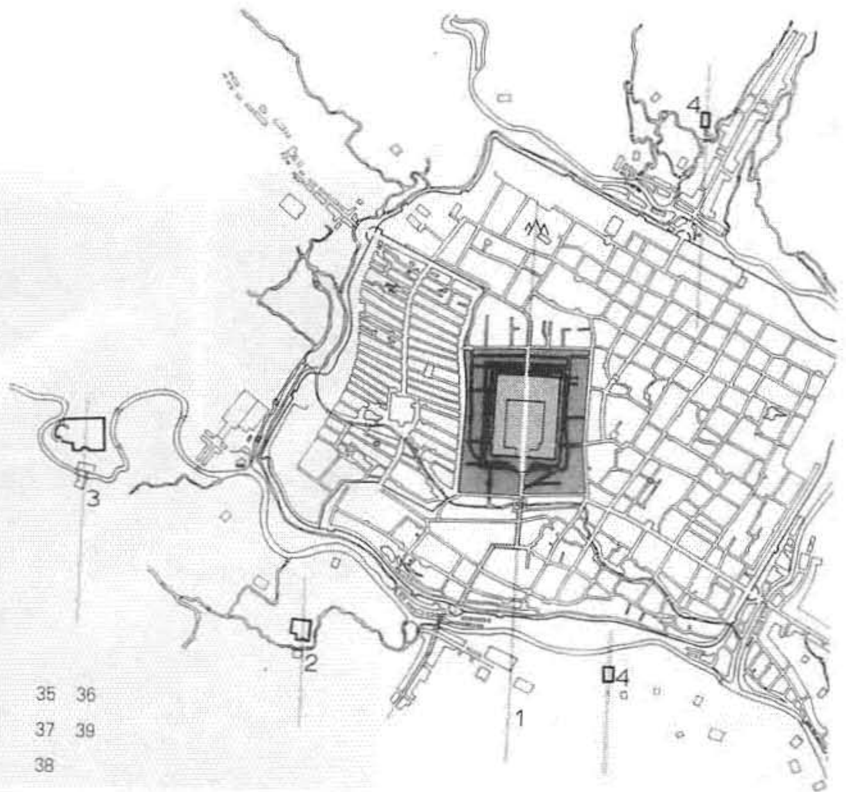
图4.3.1.39 1378年成都作为第一位明代皇帝第十一子的主要封地。当皇子1390年到达时，城市已经经过1371年被攻克之后的重新建造。一座宫殿，在唐代古老布局的西南部分已经兴建，而其主要轴线为南北，与现在城市的形成对比。这是一座集行政和军事为一体的城市，围绕着宫殿，而千步廊，仅仅1里长，向南延伸到足以与另一条直通南门的街道相连。因为现代地图仅表示了清代重建之后城墙的形状，原来的明代城墙，根据记载为22里长，特别是在南部和西部，无法准确地表示。1–新的带有宫殿和宫城的主轴线；2–刘备和诸葛亮重建的墓地（参见图3.4.5）；3–唐代诗人杜甫草堂（参见图3.4.5和图3.3.4.30）；4–以新的南北轴线兴建的佛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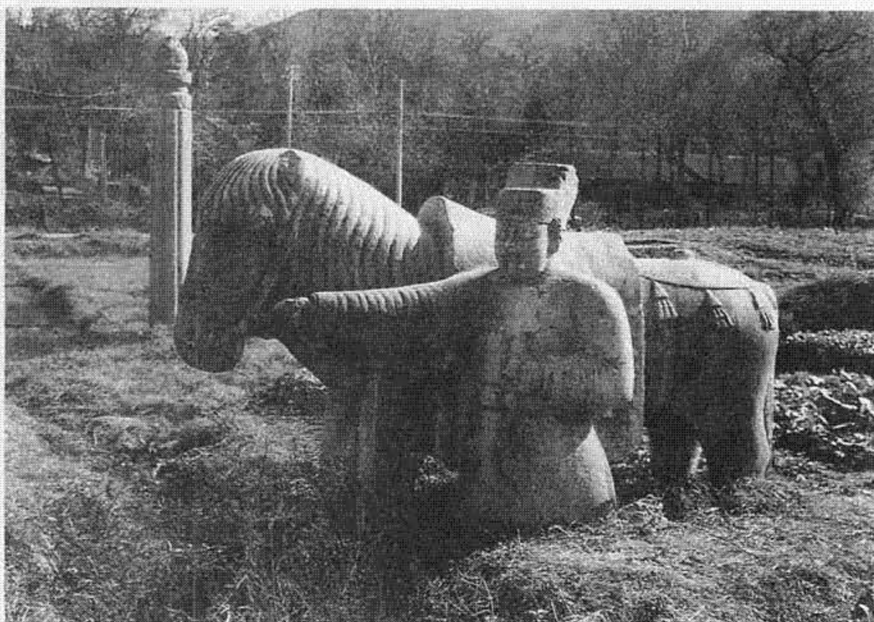
35 36
37 39
38





图 4.3.1.40、41 山西大同（1280–1390 年）的龙墙。
在大同，有两座龙墙，有九条龙的较大的一座墙，原来立于王子的宫殿之前，黄色釉砖制成的一条卷曲的龙，建在深蓝色的带有云雨和波浪的背景之上。较小的在一座小庙宇的前面，竖立于城外，并且是缘于同一设计，但是仅有 3 条龙。尽管具有相当的规模，较小的那座龙墙可以清晰地看到整条龙，而较大的有几乎 50 米的长度和 6 米的高度，无法看全

图 4.3.1.42 明代将军徐达（1332–1385 年）之墓的石雕。徐达是明代第一代皇帝朱元璋最值得信任的伙伴。这座坟墓，在南京城之东和紫金山之北（参见图 4.3.1.8）。
徐达与皇帝同样出生在安徽一带，并在 1353 年当他 21 岁时加入了红巾军，在多次参加朱元璋的各种战役之后，他在 1367 年晋升为最高级的军事指挥。当时，他受命将蒙古人驱逐出中国。在 35 岁时，他率领一支 250000 名士兵的军队向北挺进，并在 1368 年夏季攻进大都，城市不战而降。因为当时情形的确极为严峻，人民正在遭受饥荒。自从 1359 年长江以南各地受控于朱元璋后，几乎全部的大米供给已经全部被切断。蒙古都城人口锐减，同时需要缩小聚落区域。因而，徐达将大都的广大区域削减至原来区域面积的 60%，并且在 1371 年，于旧城之南，建造了一座新的 5 里长的北城墙。1385 年，直到他生命的尽头，都一直在平定华北地区并将蒙古人赶得越远越好。1380 年，明代第一位皇帝的四子朱棣（1360–1424 年）来到大都，当时，这里已经被命名为北平——北部平安，皇子来此任燕王，徐达是他的宰相，并且于 1376 年成为他的岳父，于 1385 年死于南京并葬于此地



座），以及两条主要的南北向街道组成（每条街道的尽头城墙处亦各有两城门）。城市总共6座城门。两条南北向街道之间，东西向街道之北坐落着宫殿。宫殿前有一条2里长的走廊，这走廊开始于街道南部的一小型广场，并向北抵达宫殿的前门。至于宣化的布局，我们可以看到，这也是一个非常类似于中都布局的实例，在于它也是一块方形，墙内面积7里×7里。同样采用的是小里的度量单位，尺寸451.2米，但是角度不够准确。不管怎样，街道模式是一条主要的东西街道及两条主要的南北街道，每头有两座大门。宫殿之前的走廊，坐落在北半部分，估计也是从宫殿南门开始向南2里。但它可能作为（普通）街道继续向南延伸。因为另一个城门在南部城墙建造起来，在两座通主要街道城门之间的三座城门使得南墙非常具有感染力，就像帝国都城一样。

在1370年，洪武帝的第四子成为燕王，燕是现代北京地区的旧称。在这一地区的王府是在大都，蒙古人的前都城。在早两年已经被攻克下来。因为，在那时燕王仅有10岁，因此，由胜利了的将军徐达来负责这一封地。大都城降级为仅仅是一个府城，称为北平府，即"北部平安"的府城，考虑到大都城墙的毁坏以及居民的大量流失，缩减了墙围区域，将军通过在以前的北墙以南大约5里的地方建造大约5里的一座新的北部城墙，似乎是为了新墙体的校正，大都钟塔的位置是确定性的，因为它被结合进入到墙体构造中。新墙非常坚固，40英尺高，顶部50英尺宽，而旧城墙被重新建造，有30英尺的高度，正如以前一样，但是顶部的宽度增加到了20英尺宽，因此，整个49.8平方公里的区域被减至仅仅29.9平方公里。10年后，在1380年，当太子20岁时，他到达北平，并占据最后一位蒙古皇帝原来所留下的宫室。

接下来的20年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作为非常成功将军的太子不断地打败当时依然非常危险的蒙古军队。当时，他的父亲洪武1398年离世时，太子是所存儿子们中最大的，但是，已经指定好了皇太子。新皇帝是洪武长孙，也因此是燕王的侄子。已故的皇帝本人已经建立了从父到子的君主继承权。但是，这野心勃勃的叔叔，这个成功的、也是非常有权势的燕王另有别的想法，并且开始迅速地实施这些想法。三年鏖战后，燕王以新皇帝身份出现，为明代的第三位皇帝，他以永乐为年号而因此以永乐皇帝（1403–1424年在位）著称于世。

永乐皇帝重建了两都概念，而这从未实际体现过。在1403年，在他统治元年，他在北平府的府邸因之升为次都的等级，或者换句话说，是一个旅行中皇帝临时的寓所。在接下来的年月里，他将城墙和宫殿修葺一新。而在1404年，来自山西的大约10万个家庭接受指令移往次级都城，并且跟随来自南京、苏州和浙江10个其他府的和9个其他省份那些富裕家族的追随。渐渐地，在皇帝的头脑里，一个新的概念发



图4.3.1.43　明朝第一代皇帝的四子，第三代皇帝朱棣（1402–1424年在位），参照台北故宫博物院绘画。

在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之后，朱棣1370年10岁时成为燕王。他的王府是大都，元代的旧都城。当他1380年迁入大都后，协助他的岳父徐达将军将蒙古人赶出中国。1398年，当他的父皇故去，他与第二代皇帝，也是他的侄儿发生冲突。在打败了他那侄儿皇帝之后，他于1402年登基当上了皇帝，自立永乐年号。正如他的父皇以洪武皇帝著称一样，他以永乐皇帝扬名。作为皇帝，他将王府升格为帝国北部都城——北京，并且重建了宫殿和部分城市。他继承了父皇的能量以及深厚学养，因而能够在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所有领域，继续重建帝国。他64岁卒于北京，葬于长陵——北京之北的第一座明代皇陵，现今已经被他12位继承者的坟墓所围绕（参见图4.3.2.41，No.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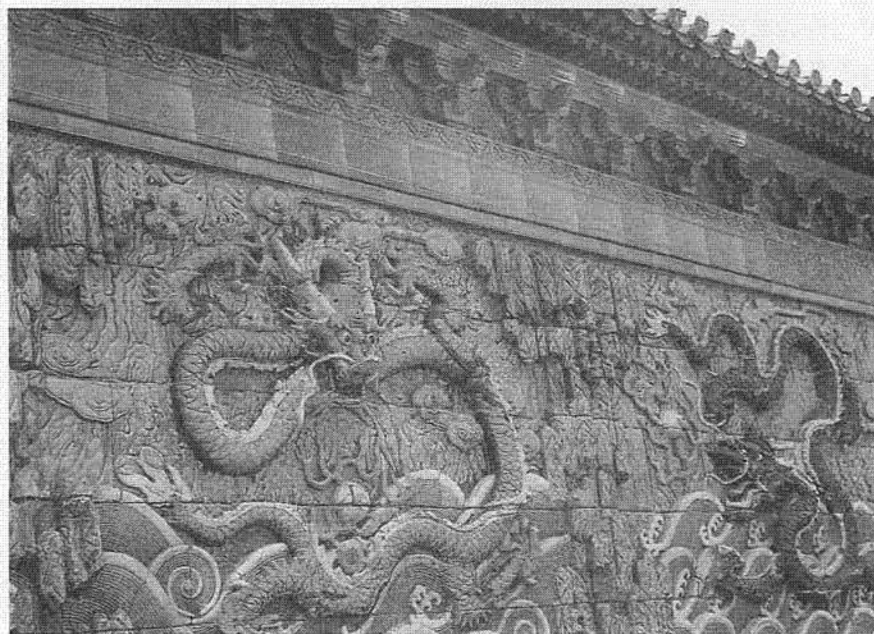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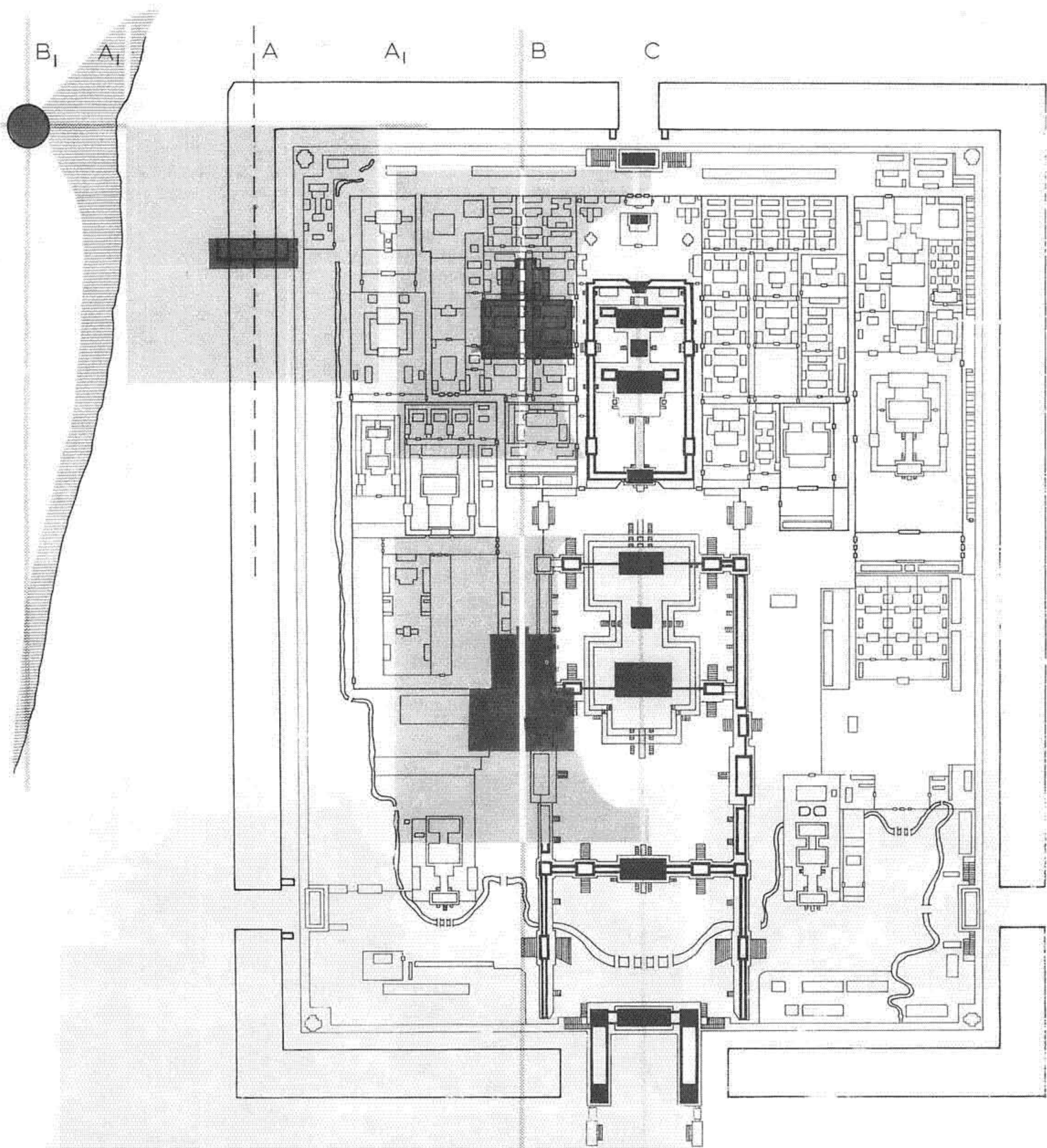


图 4.3.1.44–46　北京以北的明皇陵，在神道两侧所立的文武雕像和从神道开始直到陵墓的五重牌坊仪门做法，都始于永乐 1402–1424 年在位时期

图 4.3.1.47　同时，在 1417 年，永乐皇帝在北海以北建造了九龙壁，宫殿建造时期，他曾经在此居住。这座墙壁，阻止住了墙北面一些建筑物受到邪恶之气的影响。永乐死后，这些建筑改为寺院建筑

图 4.3.1.48　北京新城地图，比例 1 ：5000
A– 元代带有 Yude Hall 的宫城中轴线，A1–A1，宫城网格半里为度量单位；B– 元代城市大都的中轴线，B1 为在琼华岛上大明宫轴线（参见图 4.2.4.3），C– 永乐皇帝在北京的新的中轴线

44
45　46
47



B1
A1
A
A1
B
C

图 4.3.1.49、50　北京钟鼓楼，重建于 1420 年

图 4.3.1.51　大都转化为北京，明代的北部都城，比例 1 ：40000，根据 1934 年的现代地图绘制。

当第三位明代皇帝、朱棣（1402—1424 年）于 1403 年在南京登基时，他面临着其父所面临的同样问题，就是在哪里建造皇宫的问题。他父亲在南京的宫殿曾毁于大火，他的侄儿，刚刚登基的皇帝，在大火期间死去。朱棣自己的燕王宫殿是一座边界堡垒和要塞，其宫殿是他的那些元朝的败寇留下来的。在这两种情况下，扩建修复和重建工作都是必须的。当他还是一个 15 岁的年轻燕王时，中都新都城工程就已经完全失败。因此，他的自信全落到了北部，并且在南京，很多有影响力和复杂的人物，还持有篡夺其王位的想法，而把他当作一个暂时的过渡皇帝。他们中很多人因此受到威胁恐吓，并涉及所有第九或者第十族，包括街坊邻里、老师太傅、学生、侍从和朋友都被杀害。所以，朱棣的统治以武力和恐惧开端。不信任感在南方一直徘徊了很多年。对于他来说，仅仅是一个规矩问题，即选择适当的时机在北方他的燕王居住地，元代的大都建造皇宫。1406 年着手重建宫殿与官署，此时因为治理被前朝滥用的大运河而获得契机。1415 年，当运河恢复而再度开放后，一些超重级的建筑材料，诸如超大的木柱和大理石块，得以从云南和四川等南部和西南部地区通过船运往达大都。在随后的五年里，一座全新的宫殿群及陵墓和其他的外延项目建造起来。当这些工程于 1420 年完工以后，皇帝以一种庄严隆重的仪式，启用了全新的宫殿，并颁布都城采用“北京”新名，而“南京”依然为太祖开朝的都城。次年，北京开始了全新的朝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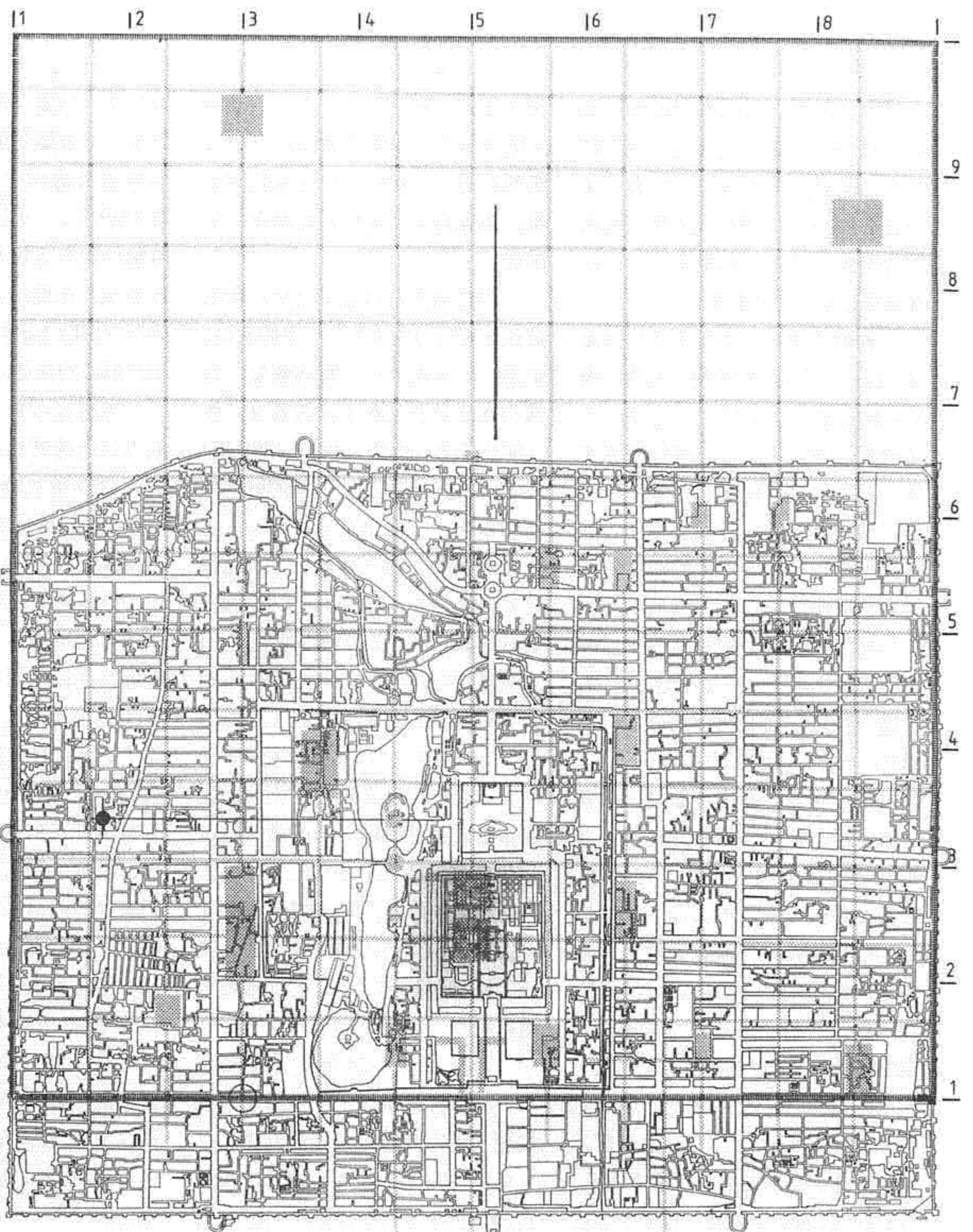
为了履行御街千步廊之制，旧的大都的南墙必须迁移，而在 1419 年，一座新墙在旧墙以南大约 1 里处建造起来，这将宫殿又置于更为中心的位置，尽管依然处在新墙区域中心的南部。对于绝大部分内城砖墙的墙体来说，墙体留在原址，但是，矩形宫殿群略微偏东，为整个城市兴建了一条新的主轴线，比大都的旧轴线更偏东 115 米（参见 **4.2.2.16**，轴线的变化）。因为兴建了新宫殿，而元代旧宫殿依然存在且被使用，新宫殿群的轴线不得不偏移，这样一来，南边新城墙上的中央南门，以一种偏离中心的位置而结束。这种偏离意味着在城市北部，1420 年鼓楼和钟楼必须在旧址以东重建，再建于宫殿以北城市的主轴线上（参见 **4.2.4.4** no.39，及钟鼓两楼照片）。

同一年，在仪式上完美绝伦的主要建筑物完工了，包括：宫殿群中轴线上的殿堂、城墙、城门和绕墙的城壕、太庙、宫殿南部的社稷坛、天地坛、在南城墙以南大约 5 里外的山河坛，以及有九座城门的城墙及挂在城墙上撞时的六座大钟。这是 1406 年在僧人兼朱棣 1382 年以后最具影响的谋士姚广孝（1335—1418 年）的指导下所铸。铜钟 6.75 米高，直径 3.3 米。

20 年后，英宗朱祁镇（1435—1449 年，1457—1464 年）在位时，建造活动又重新开始了。当时，一系列的宫殿和公共建筑物建造起来。新的明代北京城是古老幻方不朽概念的某种修正，因为基本上大都旧格局并未改变许多。然而，随着北墙和南墙的改变，新北京城的形状与中都的形状在尺度比例上十分相近：中都为 6.295 公里 ×7.927 公里，北京为 5.266 公里 ×6.652 公里，但是，这些度量与神奇数字和比例尺度找不出什么关系。如果这第三任皇帝朱棣的确尝试要复兴幻方概念，尽可能达到中都水准，那么，他实际上是做到了，而他的父亲曾竭尽全力地尝试过，但未成功。在两种情形中，布局在仪式上是完整的，因为宋明儒家理学已经接受了早已存在的权力游戏，并依据一千五百年之前孔子的教诲，选择贤达来治理好政府。如此说来，幻方概念以及它所代表的，依然是一个在哲学和实践层面用以建立秩序的典范






1
2
3
4
5
6
7
8
9

展起来，以至于几乎不必由礼部大臣通过 1403 年的呈请来提醒皇帝将北平作为他未来的帝都。然而，又经过了 15 年，直到这项工作在城市和宫殿重建的如火如荼中开始，这次是根据皇帝的新概念。

御街千步廊的重要象征性就是在 1419 年南城墙的转换，来为一条 3 里长的走廊让出空间。这条对于皇帝来说适宜的长度，纯粹是为了这一目的，那仅仅早几十年完全重建的坚固结实的墙体被毁掉了，并且在到南部大约 800 米的距离重新建造。墙体区域由此而成的南北尺度与任何度量尺寸都不符，仅仅使用神圣数字，而这明显不是故意的。更进一步地，主要的南北轴线向东倾转，离开了大约 120 米的两墙之间的中心位置。绝大多数是因为新宫殿是沿着旧的宫殿而建造的，其直到新宫殿完成之后也未曾放弃。结果，在南墙中心的大门并未在墙中心的准确位置，而钟鼓楼必须转向更向东边的新主轴线，并且以陈旧的建筑材料完全重建。城市和宫殿的重建在 1420 年完成，而在接下来的年月里，帝室从南京转向了北京，正如从那时起，其名字所显示出的那样。皇帝诏书，在其中他说："以前，我的皇室祖先，尊贵的太祖（洪武），接受了上天的光荣委任，并且（在南京）建造了都城，以便为国家奠定基础。因此，我及时地接管了帝国，有着特殊的渴望，以使得这个城市成为北方的都城。而因此仿造古代先例，我建立了双都，设立了郊区祭坛、土地坛和祖庙，建造了大堂和宫殿……在前一个南京的例子中，实施尊贵的前皇帝太祖的心愿，而在后一种北京的例子里，为我的子孙万代开始创立一个准则。"

当都城在北京建立之后，南京城在很短时间内失去了一半的人口。但是，并未花太长的时间恢复，而两都概念具有某种不同的意义。作为明代作者，邱浚（1420—1495 年）在 15 世纪中观察到，国家的财富都在东南生产，而南京是其中心；在西北承担守备和军事事物，而北京是其关键……。我们可以大胆地说，这种比较与我们以上所说的关于南宋朝代和元代蒙古人之间的区别有某种关系。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以及在明末一个经验丰富的观察家这样说："南京这座城市是曾经的都城……而虽然皇帝将其皇室都城移至北京，它并未失去其光辉或声誉。"而他描述当时北京的规模："其房屋规划、公共建筑物的结构和防御工事，远远逊色于南京所为。"

永乐皇帝 1424 年死后大约 12 年，城墙又被重建，他增添了碉楼棱堡、塔以及跨越城壕的石桥，并且将城墙的尺寸增加到了 35.5 英尺高，基座 62 英尺宽，顶部 50 英尺宽。后来，在 16 世纪中期，一个延展城市的新项目提交讨论，主要目的就是以一个外墙围绕城市，那将包括所有的仪式建筑物，在 1530 年的城墙之外建造日月坛、土地坛、南部延伸的天坛，这原来是永乐 1420 年兴建的，正如在他的布告中所表明的那样。但是，外墙工程在规模上缩小了，大概是因为并无明显的实际原因来适用于这个项目。最后，在 1563 年，一座外墙完成了，围绕着南部带有天坛和新近建成的郊区农业坛。在那里，皇帝在春季实施耕种（耕除圣田）。这外墙被认为是用作都城的前奏。

永乐皇帝登上王位之后，北京的人口迅速增长。为了给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食物原料和其他商品，必须改善运输网络。在 1413 年，大运河恢复并且开放给来自南方的漕运，供应南京是容易的，因为城市非常方便地坐落在东南富裕的产区附近，并且以河流和运河与整个长江江谷相连系。更进一步地，它成为了中原航海船只的主要港口之一。永乐皇帝已经命令具有大船舰的航海探险进入到非常遥远的地区，如阿拉伯地区和东非地区，而所有为此旅程的船只都是在南京的帝国造船厂建造的。在 1403 年和 1419 年间，2149 艘航海船只建造起来，其中，94 只航船是具有大尺寸的一等船只，其中 62 只是 449 英尺长、184 英尺宽，大约 135 米 ×55 米，而且可以承载达 500 名船员，并且具有在 1000 吨和 2000 吨载重量之间的船仓。

我们已经听说过将军汤和在东南沿海建造了 59 座加固的城镇以与那里的海防体系建立相互连系。起先，洪武皇帝必须击败那些以海为疆并在各岛屿建立大本营的造反的海寇们。他们常常伙同日本海盗一起进犯海岸，甚至威胁到了都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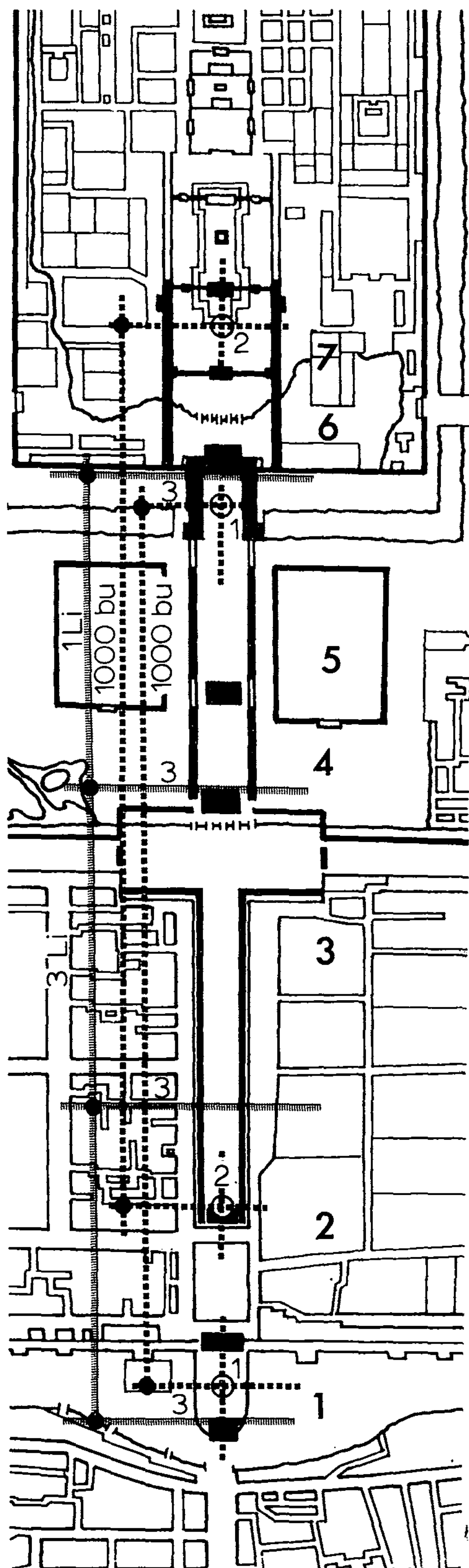
图 4.3.1.52 北京的御街千步廊，比例 1 ：1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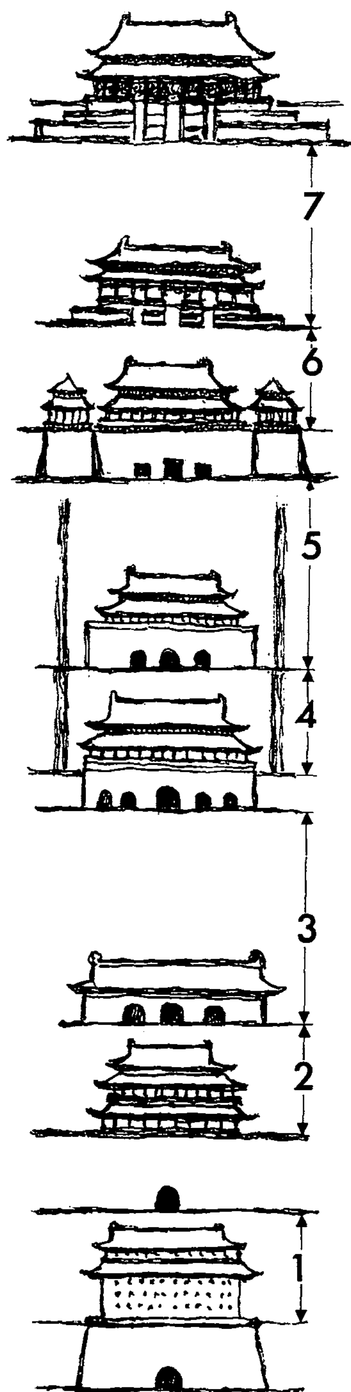
根据字面意义，基于 30.08 厘米为一明尺，"千步廊" 的距离该是 1504 米。那是明代公共事务部？使用的度量单位，一步等于 5 尺或 1.504 米。在现代北京地图上检查这一距离，关于这种 "千步" 的度量，大概有两种说法或者做法，都在有重要意义的两个 "景" 点之间。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以内城南门（即正阳门）望楼（箭楼？）占据中央位置，作为御街千步廊的开始。从这里向北延伸，穿过 3 座以上的门楼一直到午门（即宫殿的南门和大门）前院落的结束。正阳门后面的第一座门是一个单层建筑，相对小而低，有三条门道，但是被称为大明门，即大明朝之门。它是通向有墙围绕的宫殿区广场的入口，在承天门前面。承天门即今天的天安门，也是进入宫城的入口。宫殿广场之墙的后面坐落着皇家政府。承天门前面，宫殿区广场向两侧开敞，形成一个 T 形空间。与巨大高耸的 33 米高的门道相对应，一条运河流过这个空间，上跨 5 座大理石桥（译者注：即外金水河）。穿过幽暗的 45 米长的承天门通道，来访者面临一座同样规模巨大的门楼，这就是端门。这里，他必须再次在守卫于千步廊上的宫廷卫士的眼皮底下，穿过一条幽暗的 45 米长的通道。最后的两百步将行人带到御街千步廊的终点：午门的院落之中。在那里，他必须跪下磕头九次方能穿过幽暗的午门 35 米长的通道，步入宫殿区。

另一种说法，或者可能也是附加千步廊的做法，就是从大明门到三台阶梯踏步的距离。三重台基之上，大殿和御座高出院落 38 米。这也许可解释为一种设计，以提醒大明门前面的来人，身在何处，所面对的是何人。随着在千步廊的移动，来访者穿越各门楼之间 5 个中介空间，然后抵达午门的院落。在宫殿区里，他必须穿过另外两个开敞空间，即第一和第二座宫殿的院落，才能站到御座大殿的台基之前，因此，他在拜见天子之前，总共跨过七个开敞的空间，某种七个导引阶段之后的再生。

正如我们在中都、南京的宫城，以及北京的宫城格局所见，御街千步廊被安置在一个从南门开始约 3 里的空间之中，这可以解释为坐落在外（城）和内（城）方块之间的 9 里 × 9 里神奇 "幻方" 的一部分。

1，2– 正阳门的两座塔楼；3– 大明门；4– 承天门（今日有五座门洞的天安门）；5– 端门；6– 带有角楼的午门；7– 太和门和太和殿，最后是御座大殿





南京，防御体系包含两个元素：在1387年，汤和向皇帝解释道："海盗们正从海上侵犯，所以必须赶回海里……如果在陆上，士兵们驻扎在堡垒和海岸要塞处，而在水上，装甲的船只巡视巡逻，海盗们就不能进犯。"依此，便命令汤和建立一个沿着海岸的防御体系，其渐渐地由54个沿海的守备队城镇组成，有127个和231个控制的港口，其中，我们必须增加一系列防御工事和城堡。大多数的要塞城镇被建立在比较老的城市地点；它们或者是被重新塑造，或者是由新的坚固墙体所围绕，或者创建一个新的墙围区域在老聚落边上建造起来。在上海南边海岸的许多小城镇具有第一种类型的特征；第二种类型由上海本身所代表，并以作为北京港口的北方的天津所代表。永乐皇帝在1404年下令以一种矩形围墙加固。上海在150年之后，海盗在1368年、1419年、1513年和1543年无数次进犯之后获得了其围墙中的区域。十分有趣的是有两组不同的人，他们分别被称为海盗和海上绑匪。在明代最初几年里，这些人是真正的海盗和明皇帝的敌人，但是，在15世纪，他们终于被镇压下去。另一组，在明代的后半个时期出现，是商人和贸易者，他们因明后期的关门政策以及严苛的贸易限制而被逐出社会。

洪武皇帝已经在他在位统治的最初几年里，集中精力于恢复长城防御体系。这是蒙古皇帝所忽略的，因为蒙古人在长城两边都处于统治地位，长城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多用处。但是，蒙古人并没有完全被征服，在整个朝代，他们仅仅保持在后面并在长城以北，并且并非总是成功于此。不仅仅长城本身被恢复而后来日益增强；整个防御组织也被精炼和改造。正如以上所描述的，超过新近建造封地的一半以上都坐落在沿长城一线，大多数处在那样的位置，即在哨卡指挥线所集中的地方。这一体系由几个层次组成，开始于具有帝国宫廷这最高权威的都市。在另一个层次是驻军部队，这是在15世纪这些封地已经消失之后建立的。沿着长城，有几个这样的驻军部队，被称为九个主要前沿哨卡。下一个层级就是地方总部，在其下面，加强的城镇形成了第四层级。离城墙比较近的堡垒是第五层级，然后是具有望塔和烽火台的城墙本身。在不同层级的总部之间有灯塔和信号塔以及全副武装的驿站哨所，在属于大同驻军控制的部分，城墙由在旧城墙之南的第二条线所增强。在防线之内，坐落着大同和宣府，是九个主要前沿堡垒之二，这两者都是前州府所在之地。

明代人口大量增加，在北方的省份具有最大幅度的增长。在这里，蒙古元代时期的巨大损失被弥补了，而南方省份并没有同等程度地遭受到如此损失，所有这些对于城市的一般发展来说都是宜人的，其在南面是宋代城市文化的一种继续，在所有的省份之间，贸易都蓬勃地发展起来，并且由于银的使用而提升了很多，到目前为止，成为了主要的交换方式。所有的税收从现在起

图4.3.1.53–60 千步廊上的诸道门

图4.3.1.53 正阳门之外门和内门的塔楼，也是千步廊的南端，门楼高32米

图4.3.1.54 承天门，今天的天安门，后面是端门，再后面是带有角楼的午门，背景的远处是"煤山"，上有宫殿后面的亭子

图4.3.1.55 端门

图4.3.1.56 午门，御街千步廊结束于其前面的院落，来访者必须跪拜九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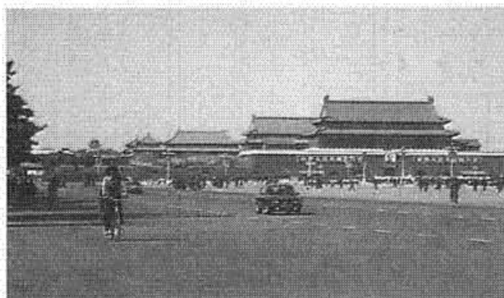
图4.3.1.57，58 从通道及从午门的走廊回望太和门

图4.3.1.59 从太和门的平台所见的午门

图4.3.1.60 从太和门上层的平台跨过宫殿外部的院落看过去的太和殿，这是在千步廊的尽端见到皇帝住所时惊心动魄的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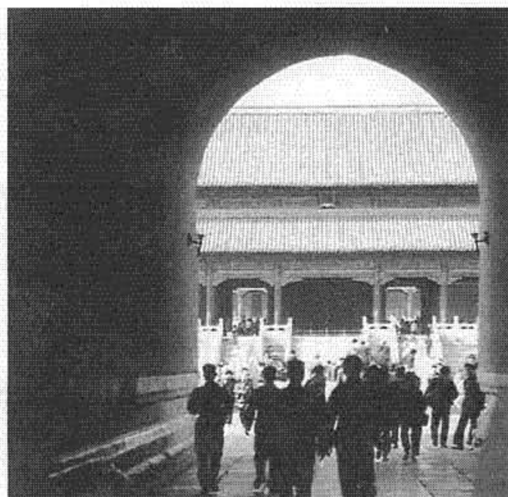
53 57
54 58
55 59
56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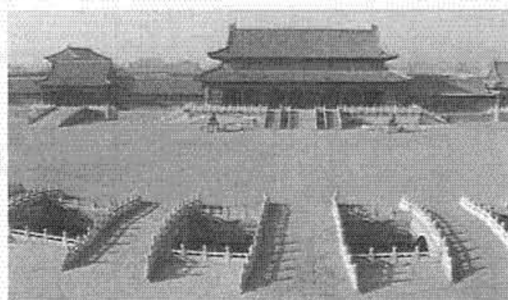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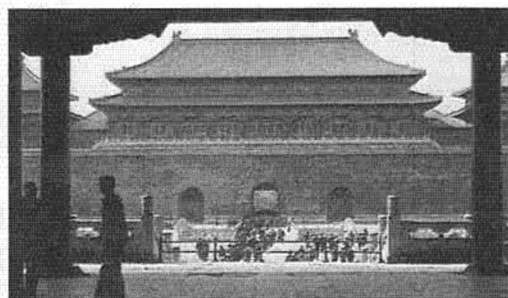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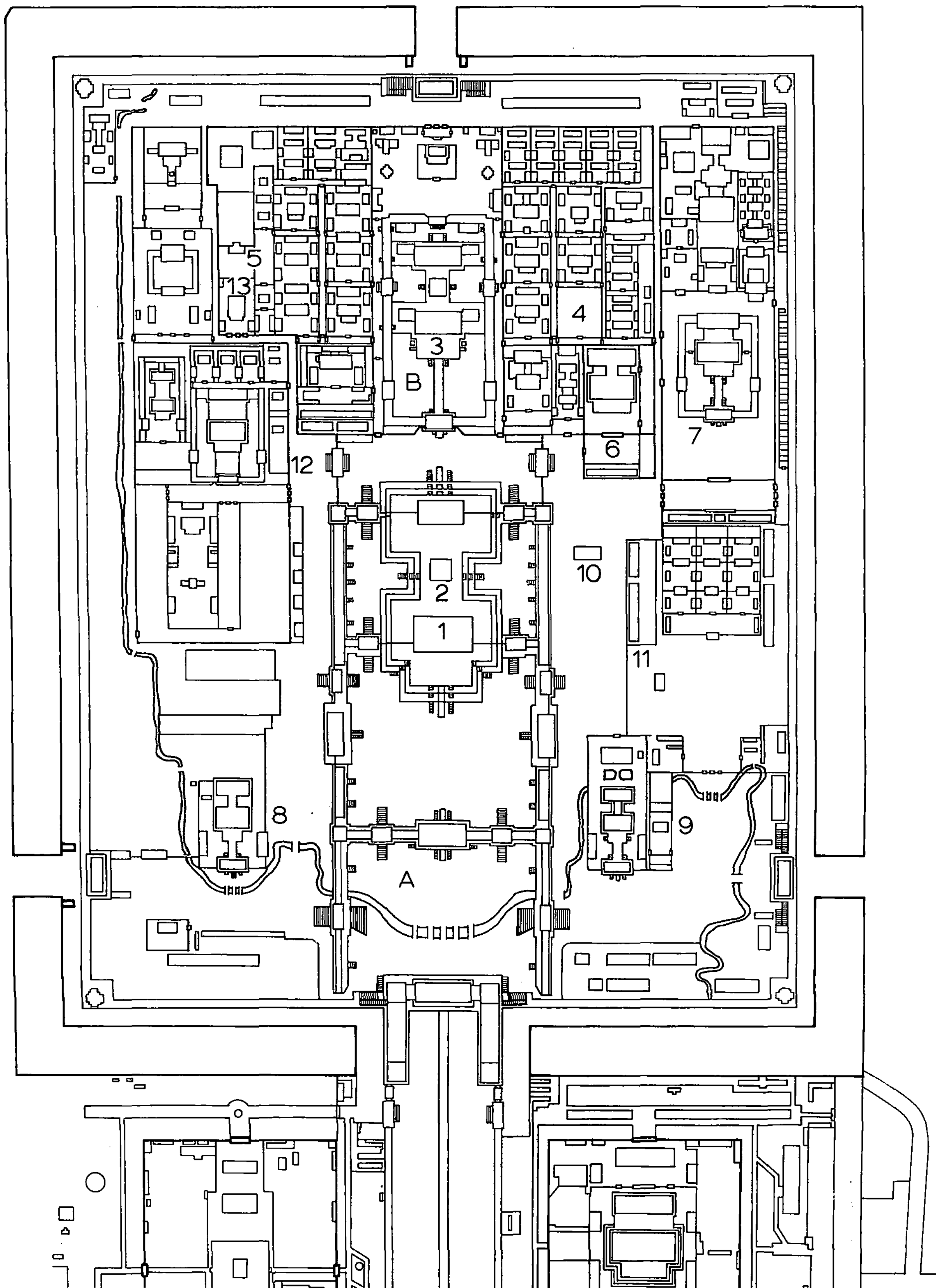

5
13
3
4
B
7
6
12
10
2
1
11
8
9
A

图 4.3.1.61 明代北京的帝国宫殿，比例 1：5000，引自《紫禁城的宫殿》，于倬云编，1982/83，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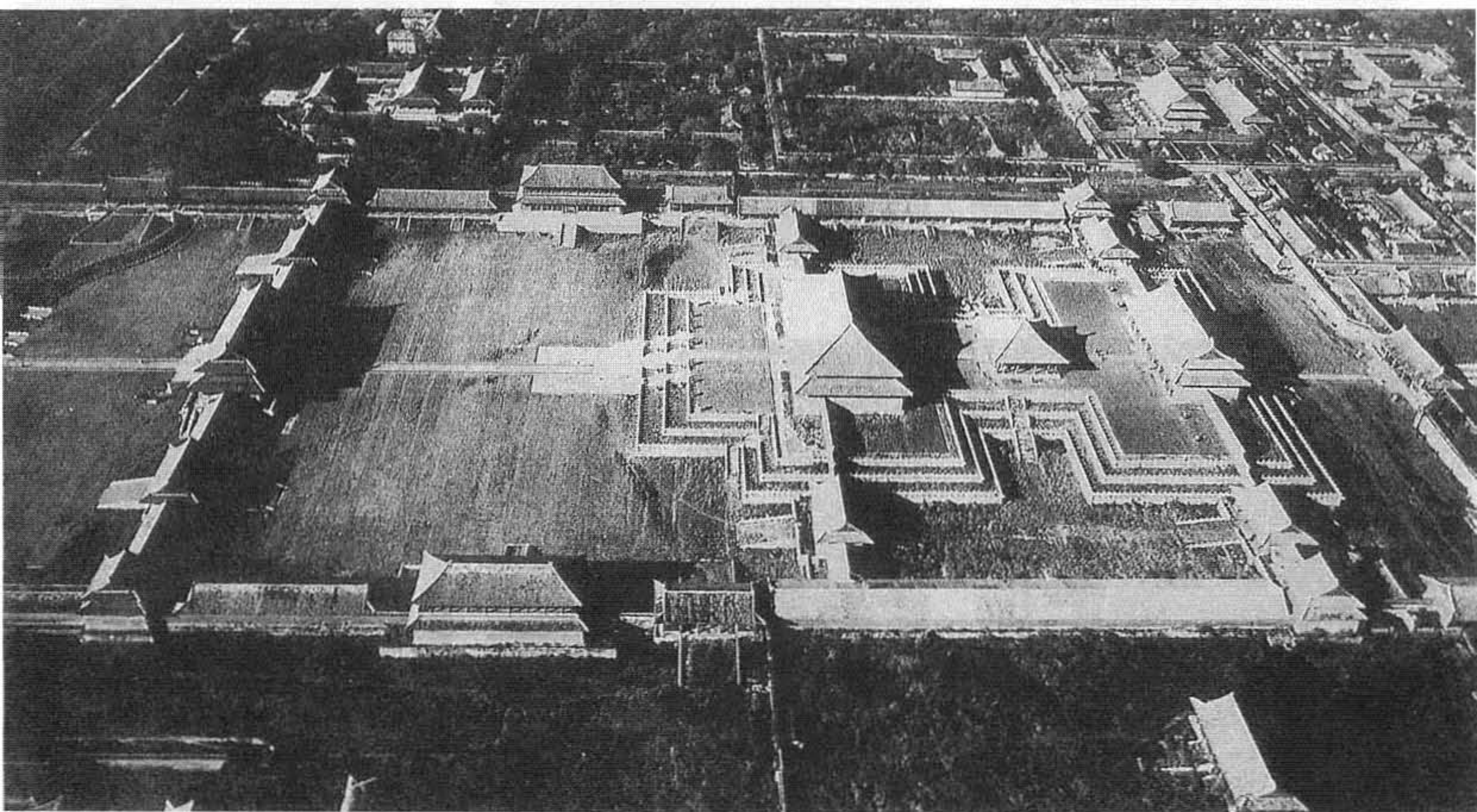
如前所见（参见图 4.3.1.48），明代永乐皇帝的新宫殿被作为一座完全新的建筑群设计和建造，没有留下元代蒙古人宫殿群的任何踪迹，它依然存在至今大约六个世纪之久，其中只有几处小小的改变，因此可以说它是明初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的杰作。整座宫殿群的面积，包括城壕大约 99 公顷，但是，在所谓的"紫禁城"城墙之内，是一块 760 米 ×960 米 =72.96 公顷的矩形（可与纽约曼哈顿街区第五和第八大街之间的中央公园和公共图书馆相比）。墙内的区域，大约 12 公顷由用于仪礼的建筑群所占，另外 2 公顷用于围绕仪礼建筑群外附加的建筑物，大约 13 公顷用于大约 15000 人口的居住，这些人以平均大约每公顷 1000 ~ 1200 人的密度居住于此，这在某种程度上过于拥挤了。其他大约 60% 的区域由树木、花园和公园覆盖，或者是一些空地用于播种和驯马场。

宫殿最为重要的中心部分是外朝。这里，在观众大厅前面（也就是太和殿）举行帝国接见来宾仪式以及国家仪典。其塔楼高出院落大约 36 米（A 和 1），并且是御街千步廊的终极目标。虽然相对较小，大殿后面的方形建筑物是宫殿之中最有意义的地点，"中和殿"意指完美和谐的中心（2）。其布局基于"神奇方形"的概念，具有窗子的亭子四面开敞，象征大约比它早 2500 年（参见图 2.2.2.11，12），公元前 13 世纪殷商（安阳）都城那"四域之极点"的地方。主要仪典建筑群之后是皇帝和皇后私人生活空间的内宫区域（内庭）（B 和 3）以及东边（4）的嫔妃及其仆人的生活空间。对面的西边，是其他的宫殿（12）带有用于戏剧表演和音乐戏台的花园，拥有高大佛像的私人庙宇（13）以及用于报时的著名流水闹钟。嫔妃住房的南面是用于崇拜祖先的大殿（6），其东有一座为乾隆皇帝兴建的宫殿（5），因为 1796 年他为了继承人嘉庆而放弃皇位（7）。宫殿南部，仪典大殿前面的两侧是点有一些小树的大殿，中轴线西侧是武英殿（8），东侧是文华殿（9），其名称表现了帝国权力的两个根基，即军事力量（武）和文化修养（文）。但是，它们以几种方式被使用着，并非都与其名称相关，比如帝国的印刷厂就放置在西边的建筑武英殿里，所有的皇家出版物，像著名的永乐时期的大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就在那里印刷。传统的射箭练习在中和殿东边一定的射程范围之内的一座亭子里举行（10）。最后是位于附近的御膳房（11），这里准备着皇帝及其宾客在皇家宴会和礼仪上使用的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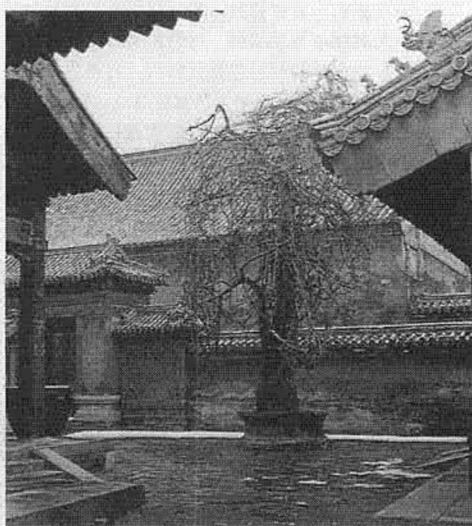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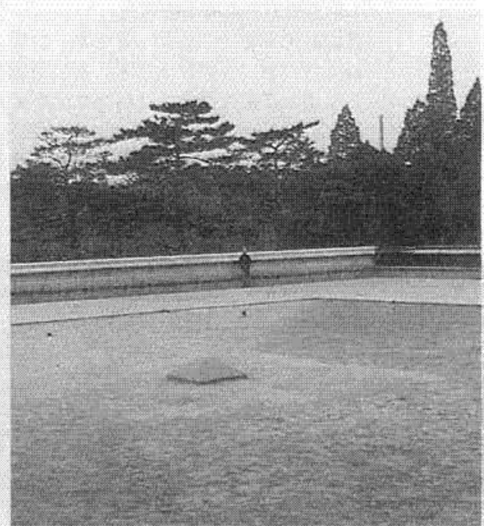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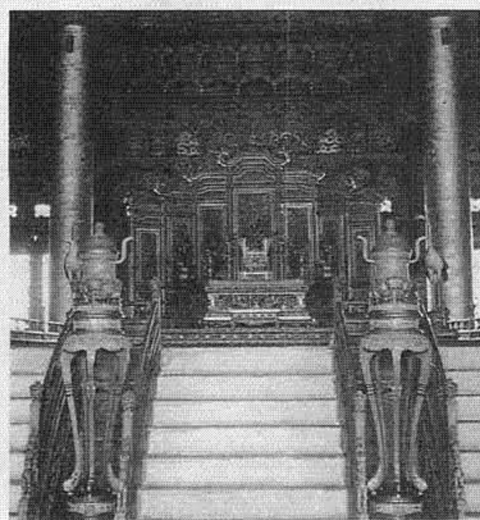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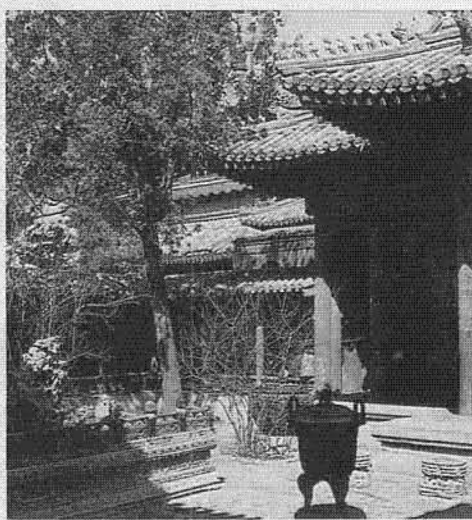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宫廷建筑物不仅具有吉祥的名字，而且人们相信它们具有重要的地理风水上的意义（参见图 4.3.1.87）。整座宫殿似乎是神灵哪吒的身体，其所有的内脏由不同的建筑物和大殿代表，并因此使它们在风水上与中国哲学的传统世界观中的五大元素"五行"相联。南面中央之门（午门）比喻为哪吒的心脏，并与"五行"中的"火"相关。中心的三座主要宫殿代表肝脏，象征"五行"之"木"，而后宫被认为是肾脏，与"五行"中的"水"相关

图 4.3.1.62 从东部所见的中央（三大殿）仪式建筑群，1940 年代所拍摄的鸟瞰图，国家档案馆，华盛顿。

左面是太和殿前面的太和门，太和殿坐落在三重台子上的中心，在帐篷般大屋顶的后面是中心最重要的建筑物中和殿，右侧耸立着保和殿，最右边通向私密的后宫之门——乾清门，清晰可见，背景部分的左侧可以见到带有帝国印刷厂的武英殿，环绕着灌木和小树林，更向右边是慈宁宫，中心建筑群以西最大和最为重要的宫殿，它几次被用作隐退后皇后的居所，例如，乾隆皇帝的母亲钮祜禄氏就在里面住过，在它后面，喇嘛教大佛堂的三重屋顶从其院落之中浮现出来，背景遥远之处，画面外是"中海"和"南海"及围绕四周的公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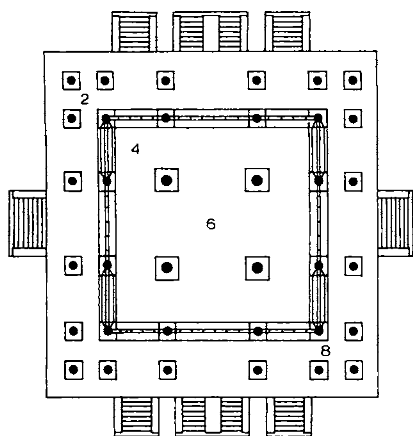



图4.3.1.63–65　正中的中和殿，位于仪式建筑群中心三重大理石台基之上，平面比例1：500。
右边是太和殿，左边是保和殿。非常近距离的特写表现了该殿简单却非常优雅的设计。踏步特征鲜明地偏离东西轴线，以使其毫无阻碍

图4.3.1.66　承载着太和殿的三重大理石台基。右边，主要的斜坡道有两层踏步，皇帝到达龙座时，其御轿从上面经过。三重台基上，耸立一组共有18座青铜容器，这是大禹九鼎的传统。每一鼎代表着一个州。拥有青铜鼎的大禹具有最高位置，而铜鼎所放置的地方即是都城所在（参见图2.1.3.1）

图4.3.1.67　太和殿中满族皇帝的御座（龙椅）

图4.3.1.68　嫔妃宫殿（东六宫）之一的居住合院

图4.3.1.69　乾隆皇帝的宫殿群内的居住合院

图4.3.1.70　社稷坛（土地和谷物坛）。原建于明永乐时期。上层坛包含五色土，即黑色、绿色、红色、白色，象征世界的四个方向，中国位于中心，为黄色

图4.3.1.71　太庙，祖宗庙宇，原建于1420年，仿照明南京的太庙建造，一场大火之后于1462年重建。至今，建筑没有改变。前殿里收有几位前任皇帝的御座（龙椅），在其前面举行仪式。第二座殿设有神灵牌位。第三座殿则献给满清皇朝的祖先，他们原来仅是部落首领，但是，死后都被追奉为皇帝

必须以白银的方式付税，这可以被认为是海外贸易成功的一个确定的表示。其虽然被法律所限制而因此以政府的眼光来看是非法的。从日本以及后来从菲律宾大量进口白银，而这些白银是由西班牙人以船只在16世纪购买了墨西哥白银运来的。

很多城市获得了新的城墙，其现在不仅环绕前几个朝代旧围墙区域，而且也包括了那些在宋代就已经发展的郊区，这种墙围区域延伸的较好实例就是广东的广州，浙江省的绍兴，湖北的武昌（今日武汉）和云南的昆明。但是也有墙围区域的一些实例，其在规模上缩小了，特别是在江苏省像无锡、常州、扬州这样的城市，变得比在宋代时小了。而以前宋代都城开封也仅仅保持了其内墙，被延伸到了北部和南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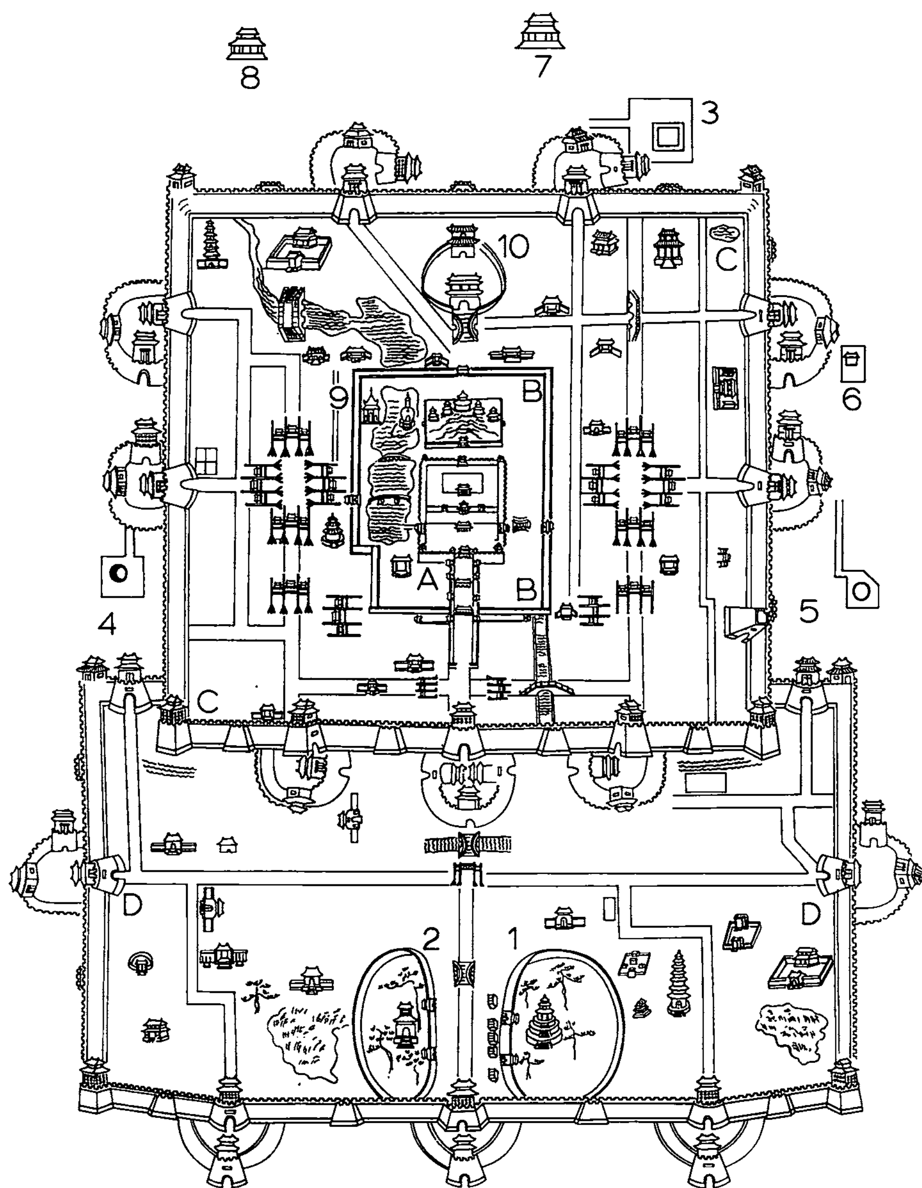
随着贸易的增长，新的工业中心为了特殊产品的制造也成长起来。一些在其中向城市化发展的城镇产生出来，并且由于经济活动而专门特别地得到支持，而非由行政中心的建立所支持。其中一个最为杰出的实例就是江西省景德镇的工业城镇，即著名的瓷器制造中心，那里成百的瓷窑和成千上万的工人们，生产出举世著名的明代青花瓷器。聚落模式遵循着一条河的市场街道的原则，顺着这条河，原材料和木柴运输进来，而产品船运出去至整个中国并且到了广州，甚至从此地出口至欧洲。然而，市场街道作为上下生产线而发生功能作用，其产品以不同的阶段迁移往还，从陶工到画家到瓷窑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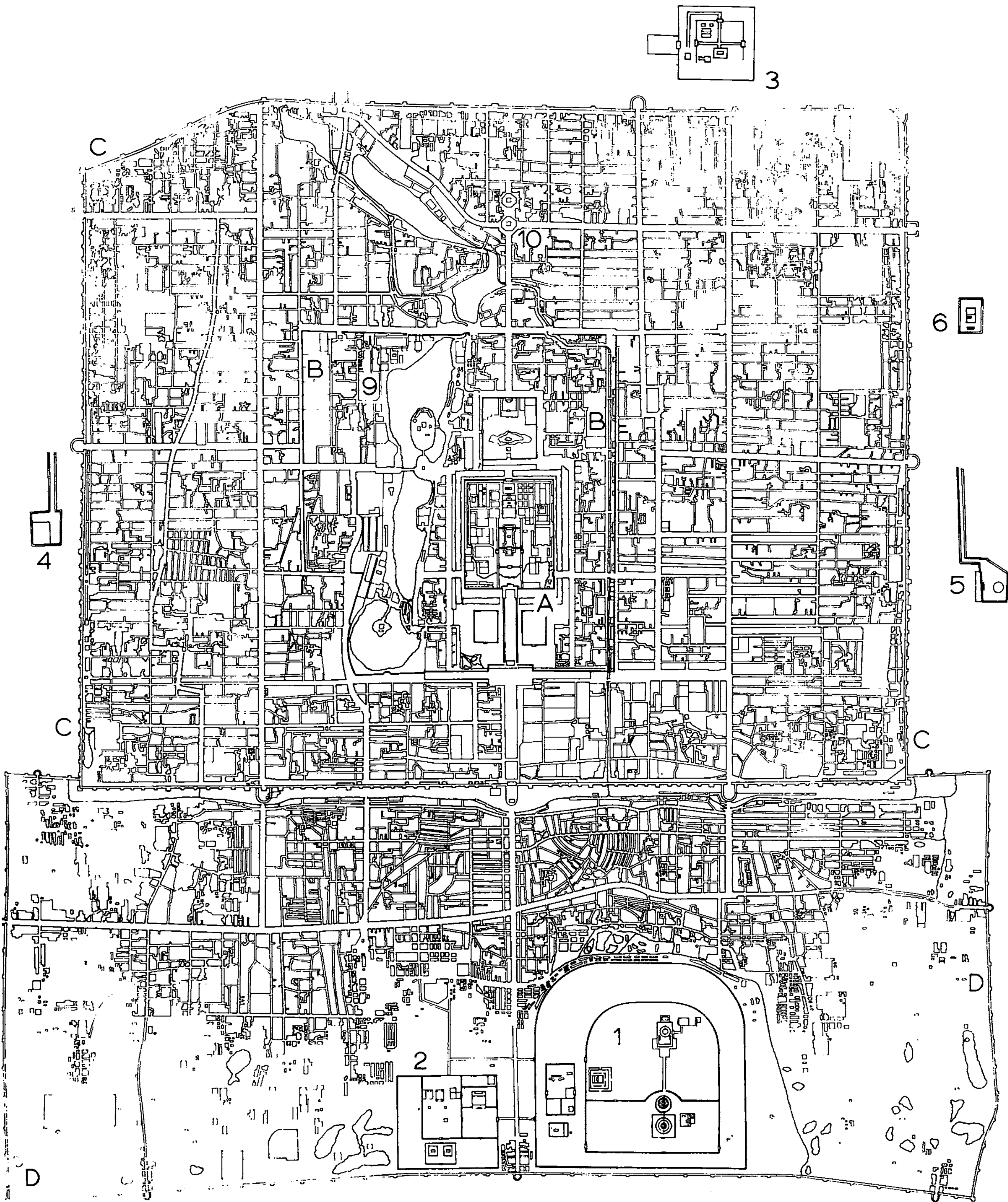
随着在16世纪以整个人口上升大约超过1亿为标志以及乡村持续不断的商业化过程，在乡村，越来越多的小市场城镇涌现出来，城市文明没有仅仅局限于宫廷和富裕的家族。一个城镇市民新的中产阶级涌现出来。他们适当的财富给这些新市民中很多人以机会享受较好的教育，以及自从宋代以来图书生产的持续增加，一个新的通俗文学产生出来，另外由演员和音乐家们巡回演出带来了表演艺术的普及。此外，绘画、诗歌以及写作的艺术成为了城市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且甚至有画家们的作坊，这些画家们为那些希望在家里有收藏的富裕人家生产著名的绘画，以及私人图书馆和艺术收藏。正如在明末的一位作家所观察到的那样，贯穿整个府城和江南（即南中国）的一些县，有本地的专业性，每一处都有贸易。在现在，对所有这些都有控制。在每一个乡村和府城的河流港口，甚至这样普通的物品，如大米、盐、鸡和猪，以及这样普通的原料如木材、煤、蔬菜以及水果全都被政府的日用商品税所影响。在16世纪末的一个外国游客说到了在广州的生活："简而言之，每个人日常所用的每样东西，在那里都非常丰富，每样东西都可以获得来满足温饱以及感官所需，喜剧和其他的节日里的公共表演是很普遍的事情。仅仅由演员们的一个故事性的表现也许需要甚至15～20天而没有白天和黑夜的间断。演出团队的一半人在表演，而另一半在睡觉、吃饭和休闲，



图 4.3.1.73, 74 明都城北京在其完成之后的平面图，比例 1 ∶ 40000，根据一幅 19 世纪的速写，并且参照一幅 1934 年的现代地图。
A– 宫殿；B– 宫城；C– 内城；D– 外城；1– 天坛；2– 先农坛、神祇坛；3– 地坛；4– 月坛；5– 日坛；6– 泰山庙，东岳的道家庙宇；7– 黄寺（喇嘛庙）；8– 黑寺；9– 西苑宫殿；10– 钟鼓楼

图 4.3.1.72 朱厚熜，世宗皇帝（1521–1567 年在位），年号嘉靖。
1507 年出生于他父亲的封邑地，湖广的安陆，(现今武汉的西北，湖南)。1519 年，12 岁时继承其父的王子身份。两年之后，当朱厚照——武宗皇帝（1505–1521 年在位），他父亲兄弟的儿子不留任何子嗣或兄弟而突然死去时，他被他的婶婶皇后非常偶然地选中继承皇位。从继位的第一天起，他就表现出一种固执任性的倾向，不太关心国家治理之事，而更看重荣誉和仪式。在他统治后期的 20 年里不断受到蒙古人的侵犯，骚扰甚至直抵都城北京。扬州至广州整个沿海地区不断受海盗侵犯，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严重。嘉靖皇帝敬重道教，抑制佛教，性格粗鲁固执，且缺乏怜悯同情心。官修明史认为他是一个平庸的皇帝，但是他赋予北京都城以最后的形态，该形态持续了大约 400 年。
嘉靖时期最初的 20 年里，都城中的建造活动，除了重新装饰和扩大，主要涉及天坛、先农坛、神祇坛的重建以及其他新坛的建造。地坛建于城北，月坛位于城西，日坛在城东，所有这些都于 1531 年完成。最后，1563 年，嘉靖皇帝将南部郊区围上城墙。围墙区域包含了两大坛的建筑群落，并给予南部商业区域更多的安全性，使得此处发展成为南城墙前主要轴线两边沿东西向街道的市场街道体系。原来的设想是以另一圈城墙包围整个城市，但是，最终仅仅完成了南面的城墙部分





3
C
10
6
B
9
B
4
5
A
C
C
D
1
2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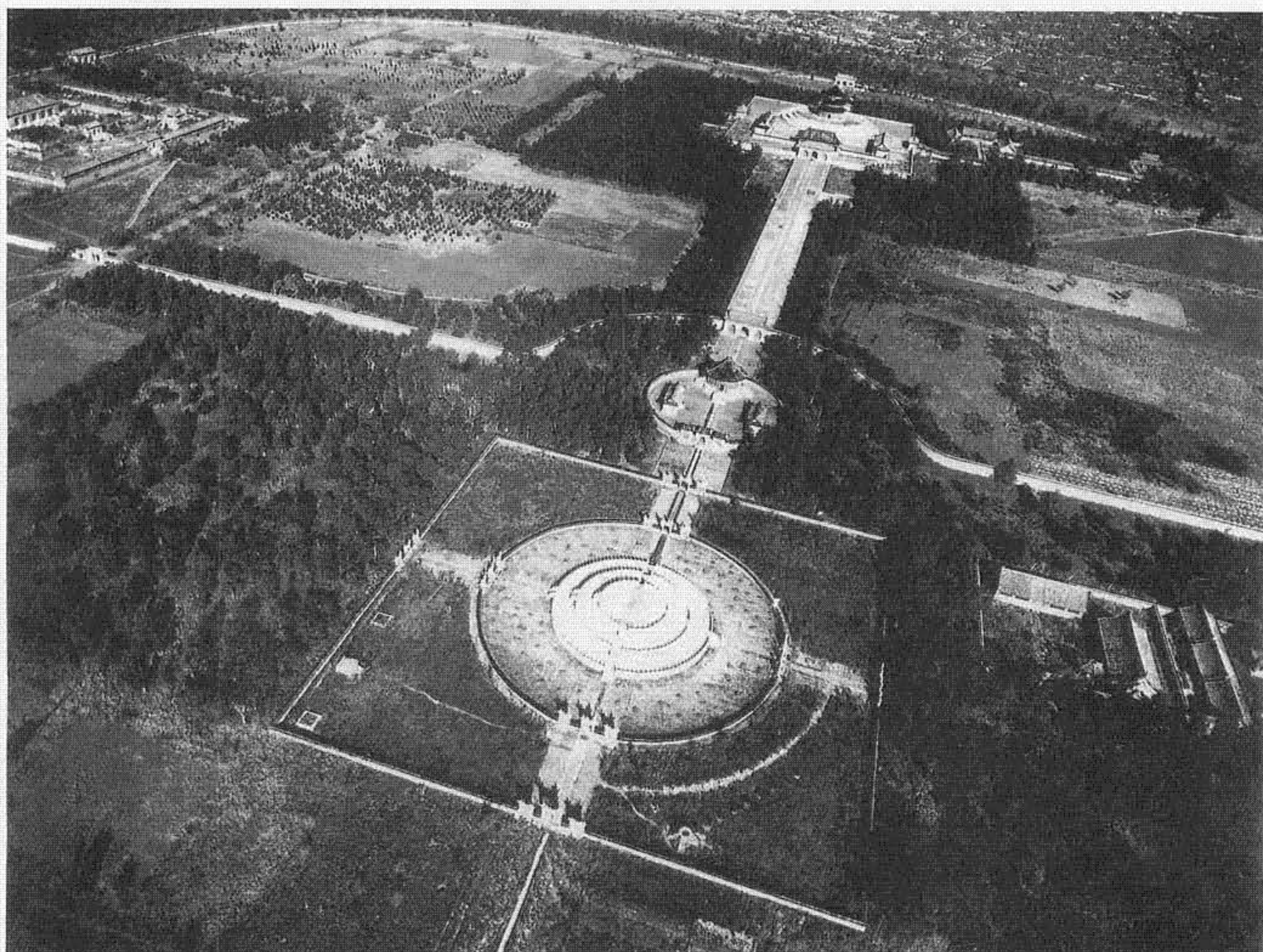






图 4.3.1.75 天坛（1530 年）和祈年殿（1420 年），引自华盛顿国家档案馆的照片。

最前面的地方是天坛三层圆形的台基（译者注：即圜丘），由四座门的复合体标志四个极点方位，北边之门通往存放（"昊天上帝"）牌位的殿堂——皇穹宇。背景的北端是祈年殿，位于方形围合的广场之中的三层圆台之上，建于 1420 年，高约 40 米

图 4.3.1.76 从南面望过去的祈年殿，方形围合广场的门后面，大殿前面的是祈年门。

大殿原建于 1420 年，用于天地合祀，这是洪武皇帝（1368—1398 年在位）在他的大臣们提出一些关于仪礼互相冲突的概念时，制定的仪式制度。我们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洪武皇帝真正的想法，当他发现几乎所有关于国家仪典的规则和神圣的法律不仅对他，而且明显对在他之前所有的皇帝都是件晦涩和混乱的事体时，结果所有（需要改变）的决定都留给了他这个出身最卑微的普通人。永乐皇帝（1402—1424 年在位）遵循了这种天地合祀的做法，当他在北京建立都城之后，便建造了祈年殿，一座位于圆形土台之上的圆形大殿。这个圆形土墩建造在一个大约 8 米高、160 米宽方形的次结构基础之上。这个方形的台基象征大地，它所承载的圆形庙宇象征天穹

祈年殿可被认为是传统明堂概念的另一种表达，是重建公元前 11 世纪最受崇敬的周代文王最神圣的建筑群这一世纪长久过程的一部分。它完全由木建造，没有用钉子，并且由 28 根木柱所支撑。中央的四根柱子象征一年的四季，内环的 12 根柱子象征 12 个月，外环的 12 根柱子象征一天的黑夜与白昼双重的 12 个小时（参见图 3.3.4.9 宇文恺为明堂建筑所提的提案）。然而，这种解释也许没有留存在大殿原来的建筑者们的心里，因为建造是一个圆形模式的一个逻辑序列（结果）。在 1530 年，嘉靖皇帝（1521—1567 年在位）开始了扩展天坛建筑群的一个新项目，他的观念是基于独立祭祀天和地这样的思想，以满足其更精致的仪式和仪典的需求。增加了两座开敞的祭坛，大祀殿南面一座圆形的即今天的天坛和城市北面一座方的地坛。依此，他维护了古代的神圣法则，即这些坛应该是开敞的祭坛，而非由屋顶和大堂（大殿）所覆盖，洪武皇帝在南京庆典时被暴雨所严重湿透后就已经搁置一旁的规则（参见图 2.1.1.2，2.2）。在一个开敞祭坛上加建一个屋顶，是胜者为王的旧习俗，用来使已经为寇的败者更为降级

图 4.3.1.77 除了开敞的三层天坛，还建造了一座建筑，拥有苍天的牌位以及在当时没被用在祭坛祭祀的皇帝祖先们的牌位，这就是所谓的皇穹宇，一个在圆墙之内的石头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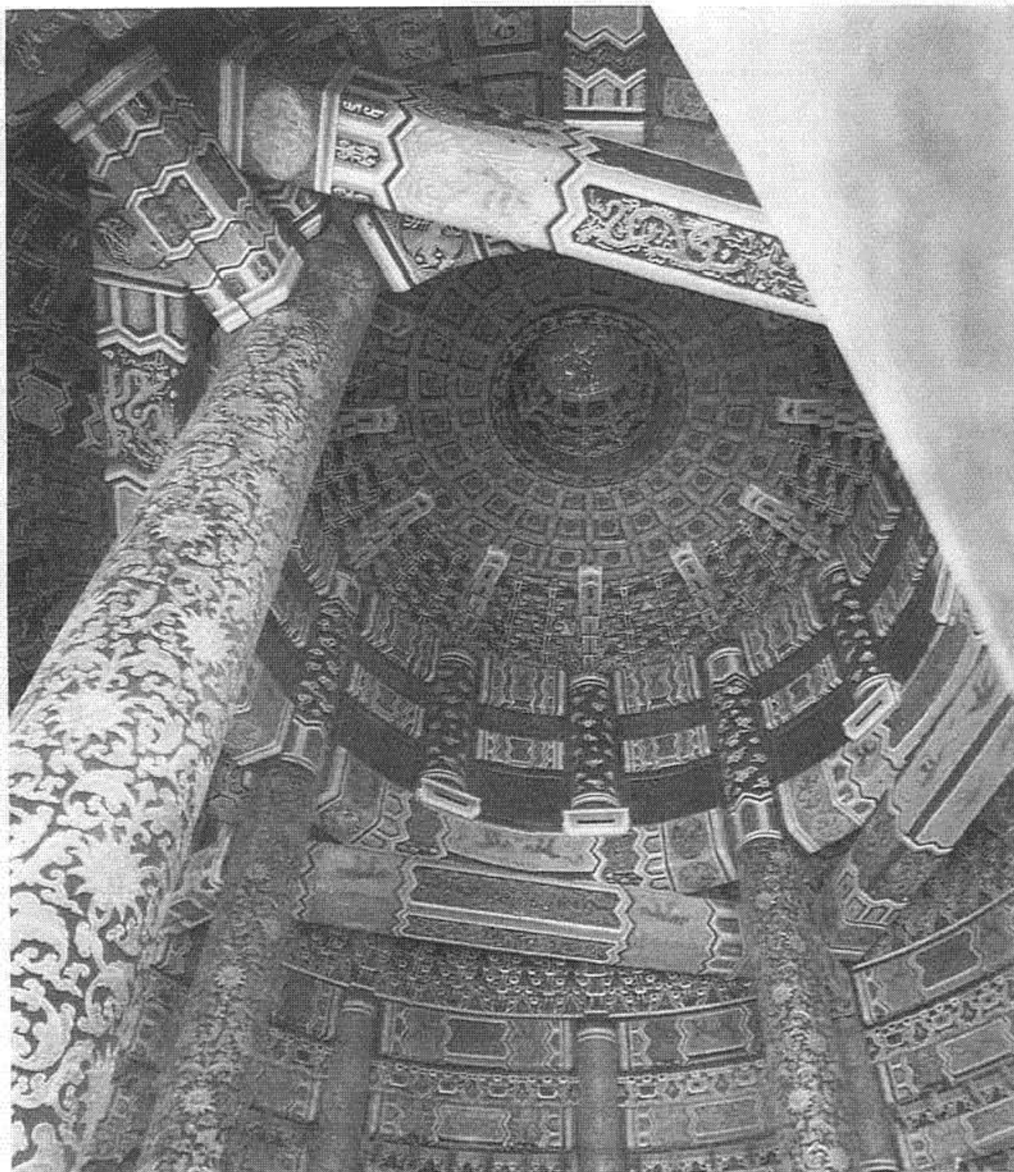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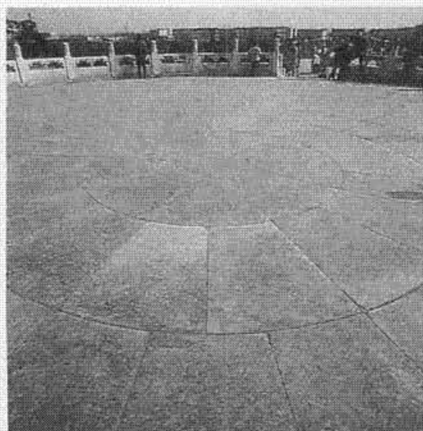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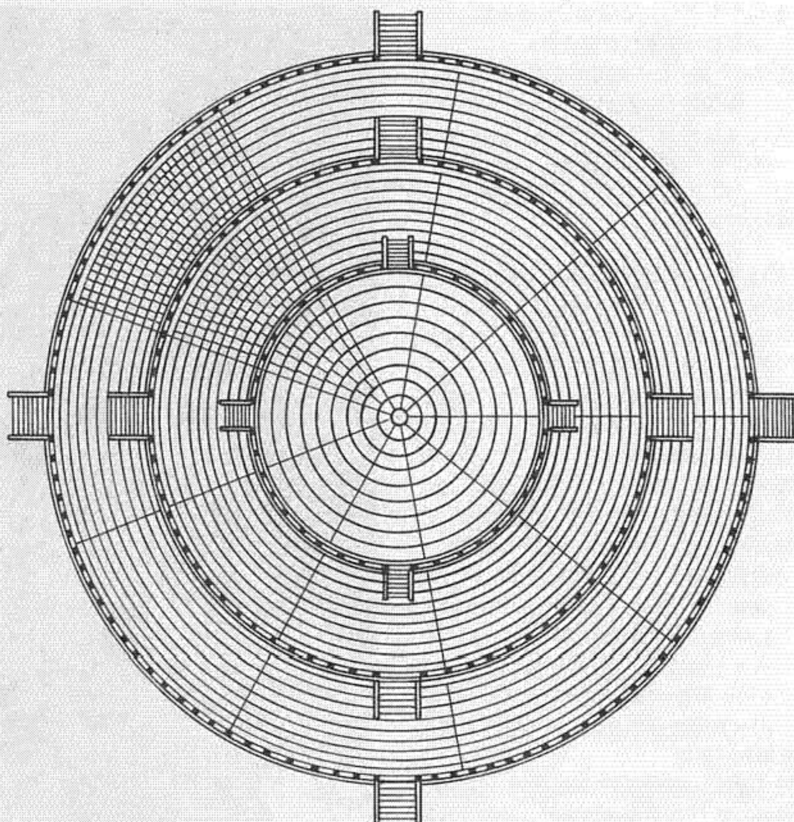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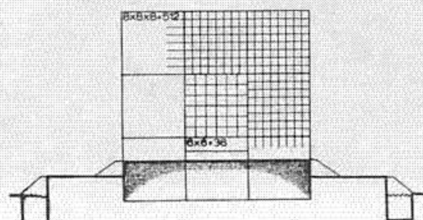


图 4.3.1.78 在大祀殿内复杂精致的建造可以表现为具有在中心的四个主要的镀金柱子以及属于内环的 12 根柱子中的 3 根柱子。连接 4 个主要柱子的 4 根横梁支撑一个圆的梁。在其上，12 根上层的柱子承载着 3 根屋顶支架的上部，这种装饰，表示了清代相当粗俗的品位，奢侈而且超载，并不适宜于结构设计的纪念地以及大殿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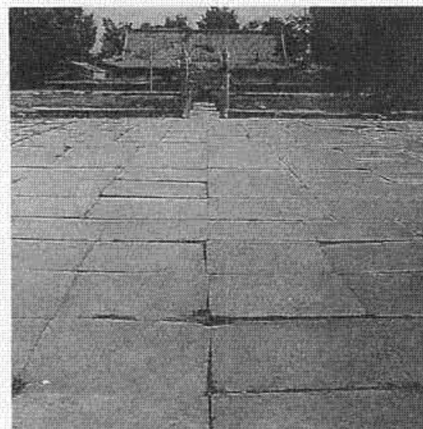


图 4.3.1.79　圆形天坛的上层平台，覆盖着大理石石条，以神圣数字安排布局，中央的平台由九环石板所围绕，并且以九的倍数递增，9、18、27、36、45、54、63、72、81，这同样的模式在下面的台阶上继续着。中间一重的台阶，它开始的一层有 90 块石条，最下一层则为 162 块石条。较低一重的台阶，则以 171 开始，以 243，或者说 9×27（即 3×3×3×3×3）结束。在背景中的栏杆柱之间有九个空间，其中有六个是可见的；在较低的平台栏杆柱间有 18 个空间，而再低的为 27。当旁观者可以看到并且欣赏神圣数字的使用时，天坛的尺度隐去了在度量体系中所使用的神圣数字。这里，帝国的建造大师发明了一个相当奇怪而精致的度量体系，非常不切实际，但是清晰地显示了思想的模式

图 4.3.1.80　从 1530 年的明代祭坛，三个圆形台的平面，比例 1 ： 500，参见中国营造学社 Liang Kou，Vol.V.1935，no.Ⅲ，p.125。

据载，上面台子的直径是：5 丈（每丈由 8 尺加 1 寸组成）=5×9 尺 =45 尺，中间的是 9 丈（每丈由 8 尺加 1 寸组成）=72 尺 +12 寸；下面的是：12 丈（也是由 8 尺加 1 寸组成）=96 尺加 12 寸。台子的高度是 1 丈，上层的台有 9 尺，其他的两个台有 8 尺加 1 寸。这些奇怪的度量体系是基于特殊的 8 寸为尺的度量单位，1 寸 =81 分（9×9），其仅仅用于皇帝，并且是工部的营造尺之一。通常的度量体系是 1 丈 =10 尺 =100 寸 =1000 分，而在皇帝度量尺单位和一般度量单位之间的比例是 1 ： 1.234567……，一个非理性的数字（100 ： 81）。

今天的坛是 1749 年在乾隆皇帝统治时期重建的，这时直径增大到 9 丈，15 丈和 21 丈，或 3×3，3×5 和 3×7。这等于大约 23.3 米、38.8 米和 54.3 米，与明代的直径 14.3 米、23.2 米和 31.0 米相比较。最后，应该注意的是，当皇帝在中央的石基顶上站立的仪典过程中有三次占据四域之中最高地位，在想像世界的中心，而作为上天之子，每一次都需要跪拜九次以敬苍天

图 4.3.1.81，82　城市北面，地坛的上层，比例 1 ： 500。

在中间部分 6×6=36 的大理石板，由较小的石块所围绕，形成八行，每行增加 8，从 36 到 44（原文有误？）等，直到 92 块，整个 512 或 8×8×8，围绕着 6×6 中央广场较小的石板。在底层的八行石板继续着阴数的使用。整个两层结构由城壕环绕，壕沟中有水大约 2 米深，这概念似乎再现地球为一个方形好似立方体基础结构，由“四海”环绕，在祭坛的顶部具有一个“幻方”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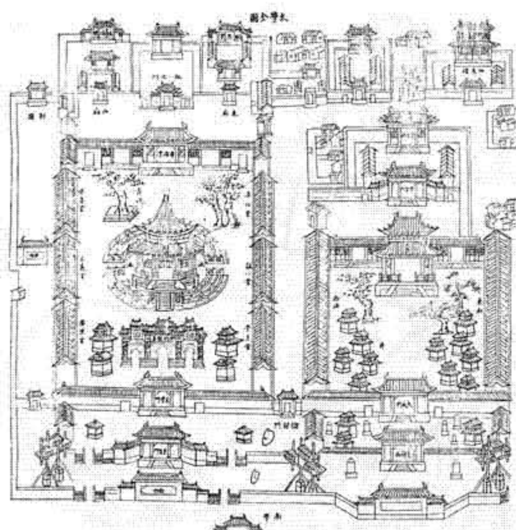


图 4.3.1.83 孔子庙中的木刻画，在其西边是文英殿，参见顺天府志，18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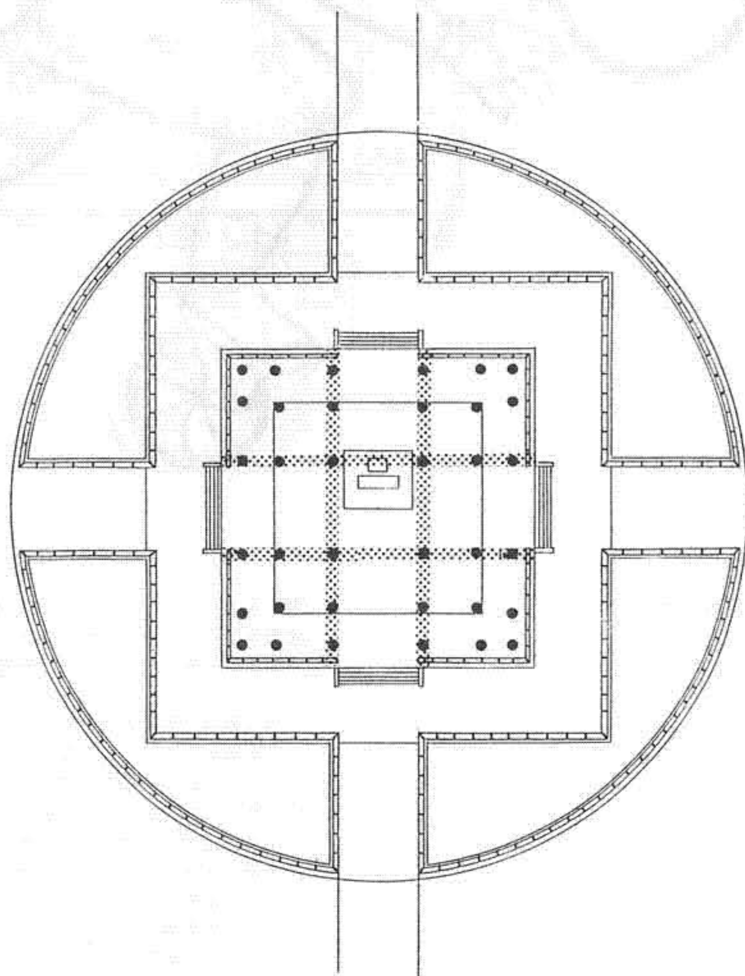


图 4.3.1.84–86 在孔子庙西边的文英殿，北京，比例 1 ：500。

原来，在元代作为最上层阶级子弟的学校而成立，在孔庙西边的建筑群由永乐皇帝重新建立，在 15 世纪的最初 10 年，作为教育学者和官吏的国子监，关于明代建筑物的信息存留很少，但是，我们可以假设，对这布局的基本概念也许已经在那些年代里建立起来了，正如与许多其他建筑物的例子一样。我们的确知道乾隆皇帝（1735–1796 年在位）重建了这些建筑，而且文英殿根据记载建于 1783 年，并且依然作为一个北京城最有趣和最美丽的建筑物之一而存在着。在其布局中，环绕明堂和辟雍的很多旧传统被“幻方”概念和方形与圆形之间的相互关系结合起来。

在直径为 56 米的圆形池塘里，有一个 38 米 ×38 米见方的台子，池子和台子的墙全部贴着大理石表面并且由大理石的贴柱环绕，4 座桥与池外边缘方形台子连接，指向四个极点方向，一个重檐屋顶的方形建筑物耸立在台子上，其黄色的瓦和红色的柱子与白色大理石相对比，并且在池水中有所反映。

大殿的布局是基于“幻方”模式（参见图 3.1.3.8），中央部分是皇帝向朝廷和政府高官教授与解释经典的地方。在围绕文英殿院落中的大殿耸立着 300 块石碑，在其上镌刻着九位文豪的作品，其 80000 个字遵循着汉代和唐代的榜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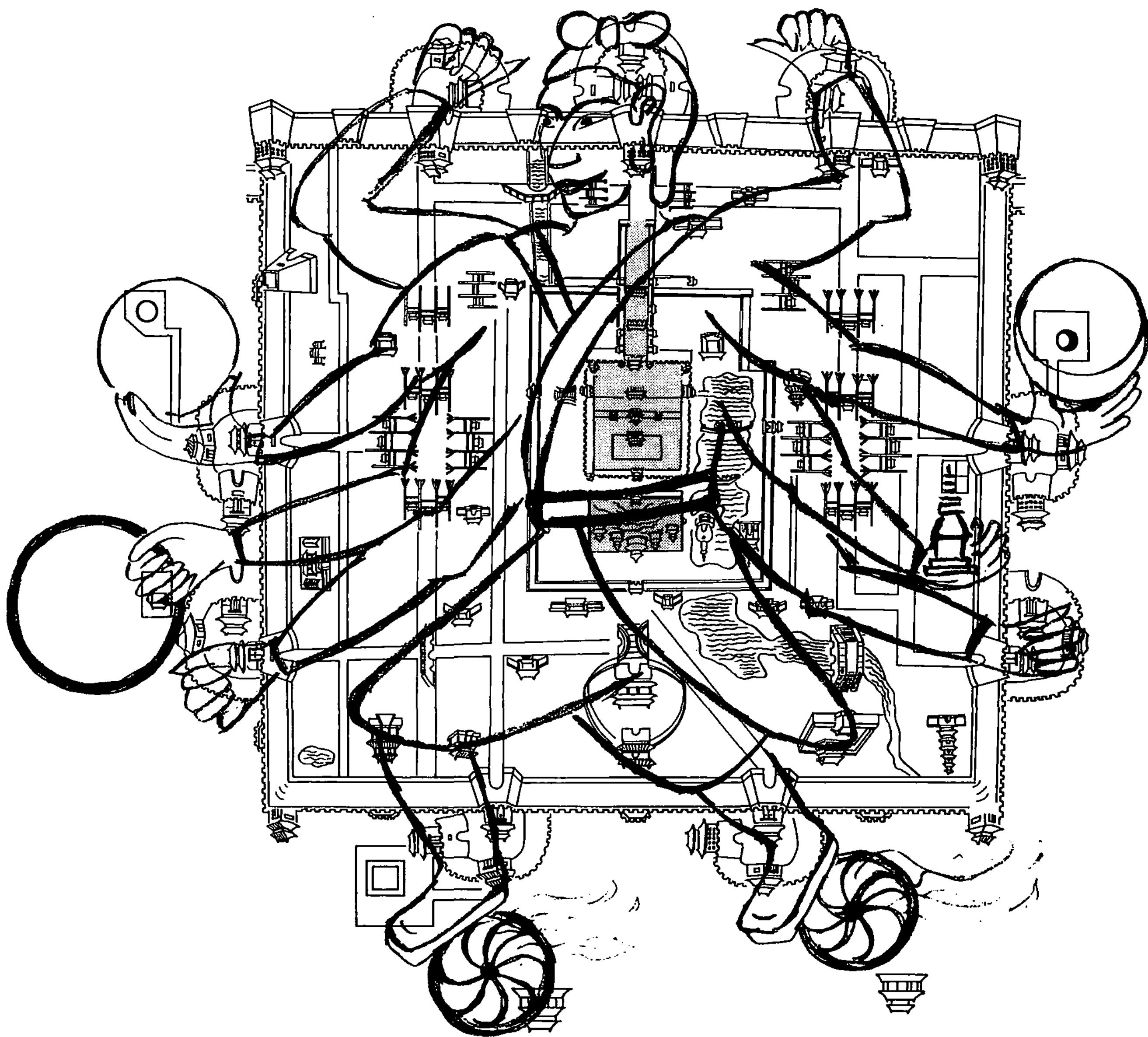


图 4.3.1.87，88　哪吒神话，表现在北京内城城市地图上，上面叠放有哪吒的形象。哪吒是有着八条手臂保护人类，驱逐恶魔的天赐保护神。

大概在嘉靖时期发展了这个流行的神话，它显示了运用一个完全不同的魔幻实践概念来解释明代北京城的格局。基于混合的民间宗教，一种道教、佛教、喇嘛教和萨满教的混合物所产生的迷信仪式和信念。尽管并不为人所知，嘉靖皇帝也许进一步创造了哪吒神话。因为他坚持奉行道教那些寻求不死生命的奇怪理论和实践，以及所有繁琐的手续、仪式和魔幻的象征主义。也因为迷信的原因，他于1542 年搬到北海西边的西苑，之后再没有回到内宫。

结果西苑变成了道教仪式的中心，而他的祈祷仪式越来越频繁，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最初，持续一整天，继而 3 天，而后来发展到 12、13 个日夜。除了特殊的香料、珍珠、龙涎香和其他有价值的东西外，还需要几千盎司的金粉。1556 年，他给自己赠予了有 35 和 37 个字的道士头衔，26 个字的给予了他的父亲，22 个字的给予了他的母亲，并在那之前，将他们提升到已逝先皇和皇后的地位。哪吒神话具有印度的起源，早在公元 5 世纪，这个上天保护者的形象就已经被刻进了云冈石窟的墙上（参见图 4.3.1.88）

北京“哪吒城”的哪吒神话

华北平原的北部，今天北京城市坐落的地方，以前曾经由“海里的黑龙王统治”。当中国的皇帝决定在此建造都城时，他让大臣们计划一个城市的布局并监管城市的建造，但是大臣们感到不够强壮到战胜黑龙王的程度。皇帝明白了其中的原因。北京，他的北都，只能由掌握天文地理知识，既懂天上神灵也知地下魔鬼运行方式的天才来建造。所以，皇上询问他的谋士们。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其中主要的谋士刘伯温（刘基）自愿前往。然后，另一谋士姚广孝跟着前去。两个人都来到了那里，他们每天外出测量地形并算计如何以一种方式建造城市以至于龙王不会找麻烦。但是，他们一整天都在争论，最终完全不和。所以刘伯温建议：“让我们彼此分开一段时间，各自准备一个规划。十天内我们在中心见面并比较一下我们的提案。”于是，刘向东方走，而姚去了西边。在他们分开的深夜，两人都听到了一个男孩的声音说：“只用复制我，复制我，那么你就能做好。”这话一夜又一夜地重复。几天以后，当两个人又独自外出测量时，他们看到一个小男孩在前面走，身着红色上衣和短裤，肩膀上吊挂着柔软的飘带，像手臂一样在风中沙沙作响。他们放慢脚步，男孩也放慢脚步。他们快步向前，男孩也快步向前，他们停下来，男孩也停下来。这意味着什么？他们记起夜晚的声音，再看看那男孩，这不是那个具有超自然魔力，曾经一度杀死龙王之子的哪吒吗？那个将自己的内脏取出捐献自己身体的一些部位来保护他的父母，那个观音的守卫者哪吒吗？他难道没有说复制我吗？这不是意味着为城市勾划一个像哪吒身体那样的平面以保护人民免于黑龙王的侵犯吗？



第十天，两人在中心会面并比较各自的方案。他们哈哈大笑，因为两人的方案一致，每个方案都是一个好像哪吒身体那样的城市。于是，刘伯温解释道：“南部中央的门是哪吒的头，西城门和东城门是他的手臂。他的右手（东面）执金质钻石手镯，就是东岳庙和日坛；他的左手（西面）执（印度的）大白舍利塔，好像珍贵的标枪，就是月坛。两座北门是他的脚，都指向东，踏在黑庙和黄庙之上好像是他的火轮”。姚广孝问：“他的器官如何呢？他的心、肺、肝、脾、肾和胃如何呢？”刘伯温反驳说：“多么愚蠢的问题，看这里，宫城包容了所有器官，一座接一座的宫殿，你自己找找看！”姚广孝变得如此郁郁不乐以致出家当了和尚，自号道衍，并等着看刘伯温如何建造北京，并为了甘甜之水取代来自黑龙王所致咸水与龙王展开猛烈的斗争。[1]

分析这个传说，它将一系列历史事实与神话传统以毫无年代概念的方式混在一起，我们可以指出的是姚广孝和刘伯温都是历史人物。刘伯温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就是刘基，洪武皇帝的著名高参。这两人几乎肯定是不曾见面。而刘也肯定没有在北京呆过，正如姚广孝几乎与建造和城市规划无关一样。姚广孝生活在1335至1418年之间，于1347年出家承道衍法号，在这个法号下，他作为明代第三位皇帝永乐的高参而闻名，这已是刘伯温1375年死后的许多年。当建筑与城市规划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已经年过七旬而居于南京。在那里，他一直住到1418年快要去世前。

刘基，作为知识和文化生活中的杰出人物，著名的思想者，是一位新儒家，并继承了其家族的学者传统，那是宋代城市文化的产物。像他的祖父一样，他学习了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和兵法（战争艺术）。在所有这些领域中，他都证明自己是非常成功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他科学观和性格著称，在通俗故事中围绕他所发展的传说将他表现为一个传说中的道家神秘主义者和灵验的预言者。他撰写了大量关于天文学、宇宙学、风水学、观相术，甚至占卜的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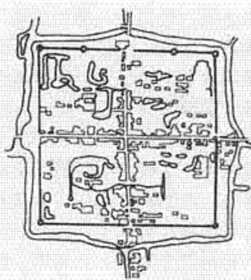
哪吒传说看来似乎具有印度的起源，可能是在汉代之后佛教传入的初期被带到中国。特别是他将身体的很多部位贡献出来以保护自己的父母，这与印度“宇宙人”曼陀罗紧密相关。[2]“宇宙人”是原始时代的巨人，通过将他身体的部位在曼陀罗区划范围内的贡献而形成了这个世界。那些区划范围的精神实质由相应的神所体现，他们居住在“宇宙人”身体相应的部位。这一概念成为“男友是智”的一部分，[3]将印度传统中的建筑科学运用于房屋设计和聚落、宫殿、城市布局。它在印度建筑中扮演的角色和风水术在中国建筑中扮演的角色有些类似。大都（北京）的布局原先是基于上古中国魔幻艺术的抽象几何化的法规。哪吒——“宇宙人”概念是后来非常奇妙的、神话般的、命相和巫术迷信实践的应用。就像明代第十一个皇帝嘉靖统治时期西苑的道教中心所雇佣的那些术士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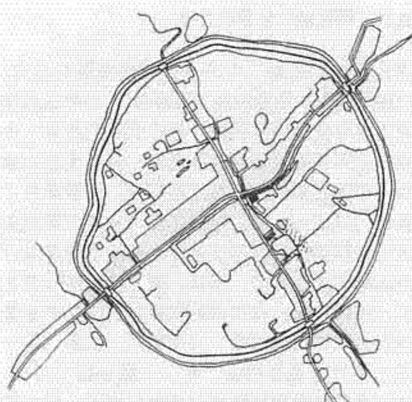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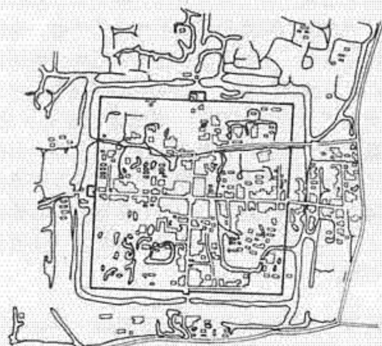
1 译者注：参见 Jin Shoushen，Beijing Legends Beijing，19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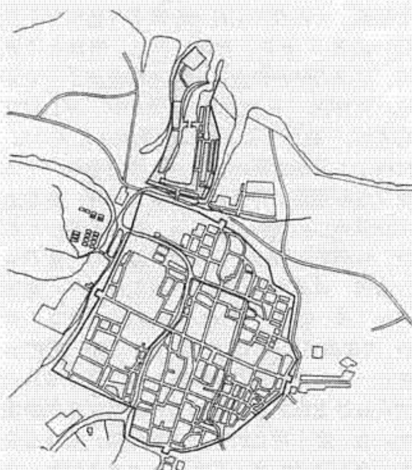
2 译者注：梵语，也是所谓的“好男人”，是“自我”充满宇宙。他的心是月亮，他的眼睛是太阳，他的呼吸是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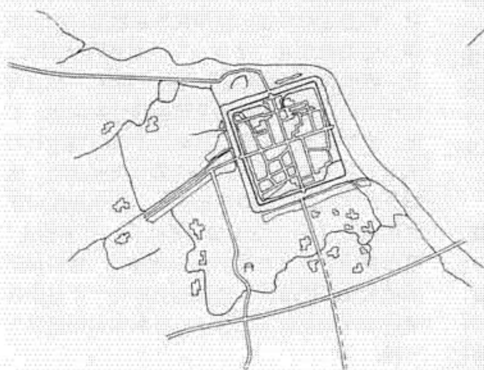
3 译者注：这一词汇是印度用于描述古代雕塑与建筑等科学的词汇，颇似中国的“风水”一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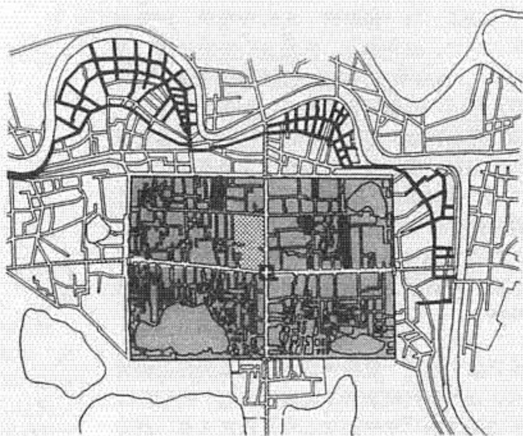












89 92
90
91 93
94

图 4.3.1.89-94 明代海防体系的防御城镇，比例 1 ：40000，参见董鉴鸿，中国城市建设史，北京，1982

图 4.3.1.89 南汇县，宋代开始的一座运河－市场街镇，1376 年增加了围墙，形成一个 850 米 ×850 米的方形，具有一个由两条道路所组成的十字形和四座门的道路模式。坐落在上海东南的海防墙后面，该墙于稍后的 1471 年建造

图 4.3.1.90 奉贤县，1386 年增加了围墙，形成一个 700 米 ×700 米面积的方形，坐落在上海南部的杭州湾，也位于 1471 年建造的海防墙后面

图 4.3.1.91 宝山镇，是明初一个面积为 550 米 ×550 米，有围墙的小哨卡，坐落在长江南岸上海的北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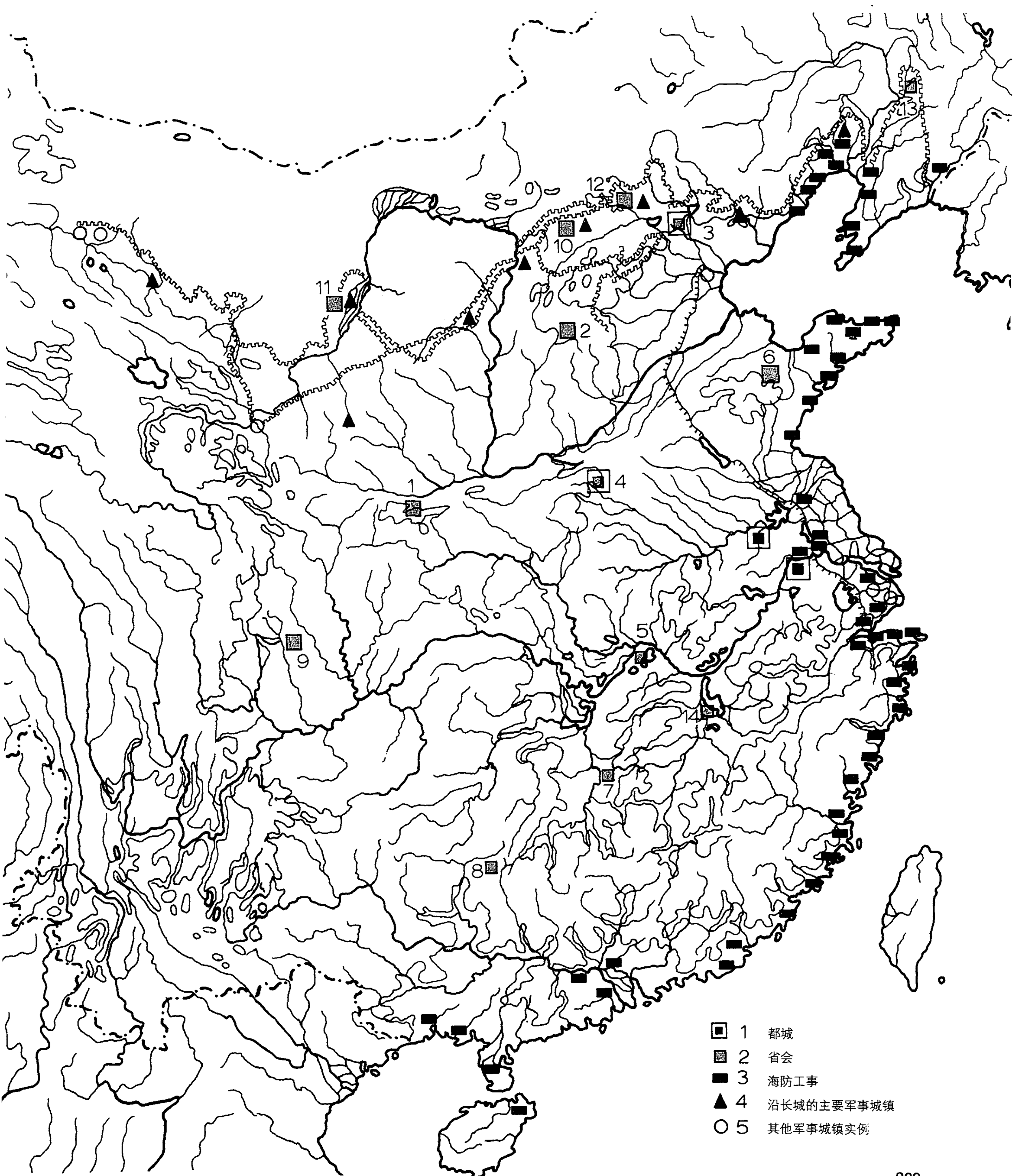
图 4.3.1.92 嘉定县，上海的东北，宋代开始的一座古老的运河－市场城镇，明初，以像上海那样的圆形墙体围绕，1554 年筑以围墙（参见 4.1.1.13），圆形墙体的直径大约 1600 米，在两条运河道路的交叉处耸立着一座宋代之塔，塔之南，湖边公园的北面坐落着孔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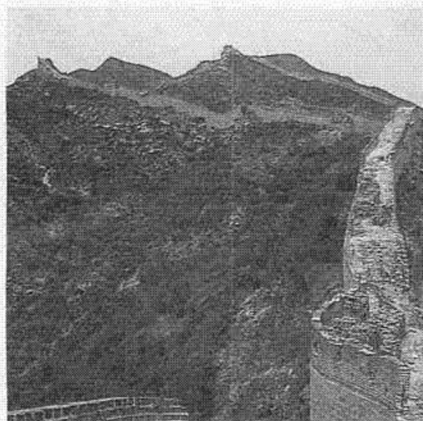
图 4.3.1.93 山东渤海之滨的蓬莱城，在洪武时期以两个部分兴建，南部是周围县的行政中心，有 4.6 公里长，高约 10 米的城墙，街道模式是位于中心的一个主要的十字路，有一座建于 1378 年的钟塔，钟塔之北的海边，有一个用于停泊战舰的港口建于 1377 年，有大约 1200 米长，10 米高的海防墙堤，这是惟一的此类港口

图 4.3.1.94 天津市，从宋代起沿着大运河作为一座市场街道中心渐渐发展，其东为北运河，永乐皇帝继续其父亲的海防计划，于 1404 年在市场街之南建造了一座 1600 米 ×1100 米带围墙的矩形城市，该城市为北京城的主要港口城市，1855 年，为防御太平天国起义建造了一座外城

图 4.3.1.95 明代的诸多封地，标有兴建日期，以及洪武之子（皇子）到达的时间，比例 1 ：10000000。

1－西安（二皇子樉为秦王）1370/78；2－太原（三皇子棡为晋王）1370/78；3－北京（四皇子棣为燕王）1370/80；4－开封（五皇子橚为周王）1370/81；5－武昌（六皇子桢为楚王）1370/81；6－沂都（七皇子榑为齐王）；7－长沙（八皇子梓为潭王）1370/85；8－桂林（侄儿为静江皇子）1370/76；9－成都（十一皇子，蜀）1378/90；10－大同（十三皇子为简王）1378/92；11－银川（十六皇子为靖王）1391/93；12－宣化（十九皇子为谷王）1391/95；13－开元（二十皇子为韩宪王）1391/－－；14－南昌（十七皇子为宁献王）1403/06 年


1 都城
2 省会
3 海防工事
4 沿长城的主要军事城镇
5 其他军事城镇实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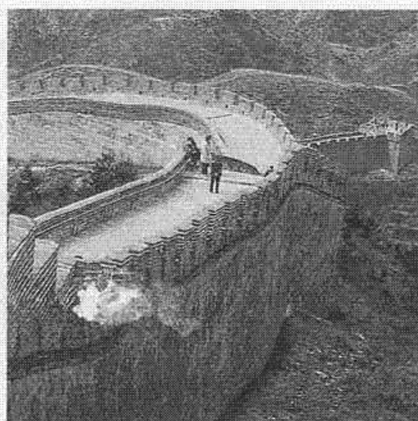


图 4.3.1.96，97　中国长城，明代重建。

1369 年对南京城墙布局测量的重要原则以同样的方式应用于长城的重建，或者说它们已经使用了几个世纪，并且影响了南京的设计。顺着山峰和山谷，长城蜿蜒于中国北方前沿地区的群山之中，充分利用地形优势用作防御。它是以石头基础和砖来建造的，高 6 ~ 9 米，厚约 7 ~ 8 米，两层砖面之间填充碎石和瓦砾。较为方便有利的地段建瞭望塔，作为士兵们的宿营地，以及烽火台。最初由大将军徐达领导，这个工程延续了大约 170 年，占去百万民众的时间，这些劳力不仅仅为了建造，而且将建筑材料、食物、衣服以及人类生活所需的一切运输到最为荒芜的地方

图 4.3.1.98–100　沿长城的堡垒城镇，比例 1：40000，参见董鉴鸿，中国城市建设史，北京，1982，河北，临榆县的县志，河北永平府府志，清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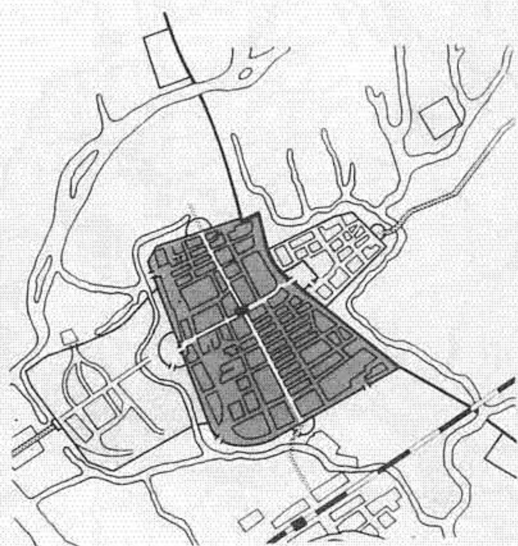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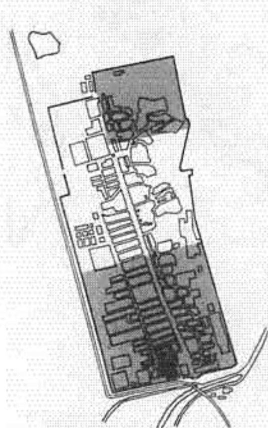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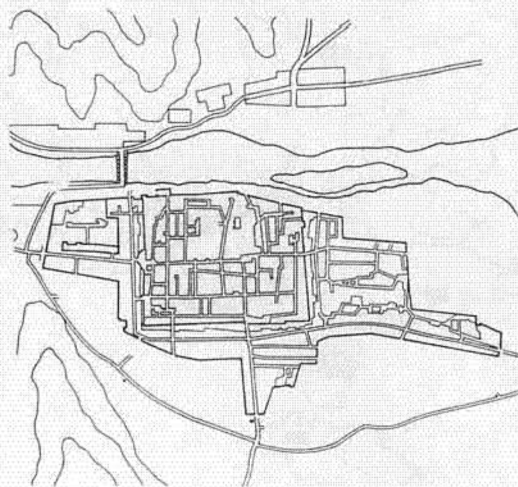
图 4.3.1.98　临榆的堡垒城镇，即今日著名的河北山海关，在长城的东端，这里长城也是该地城墙的一部分。它与城墙上的新城门一起建于 1381 年，这里通往满洲里，并被称为天下第一关。城市由三个加固的部分所组成，中心部分具有中央十字交叉的道路模式，是临榆县的行政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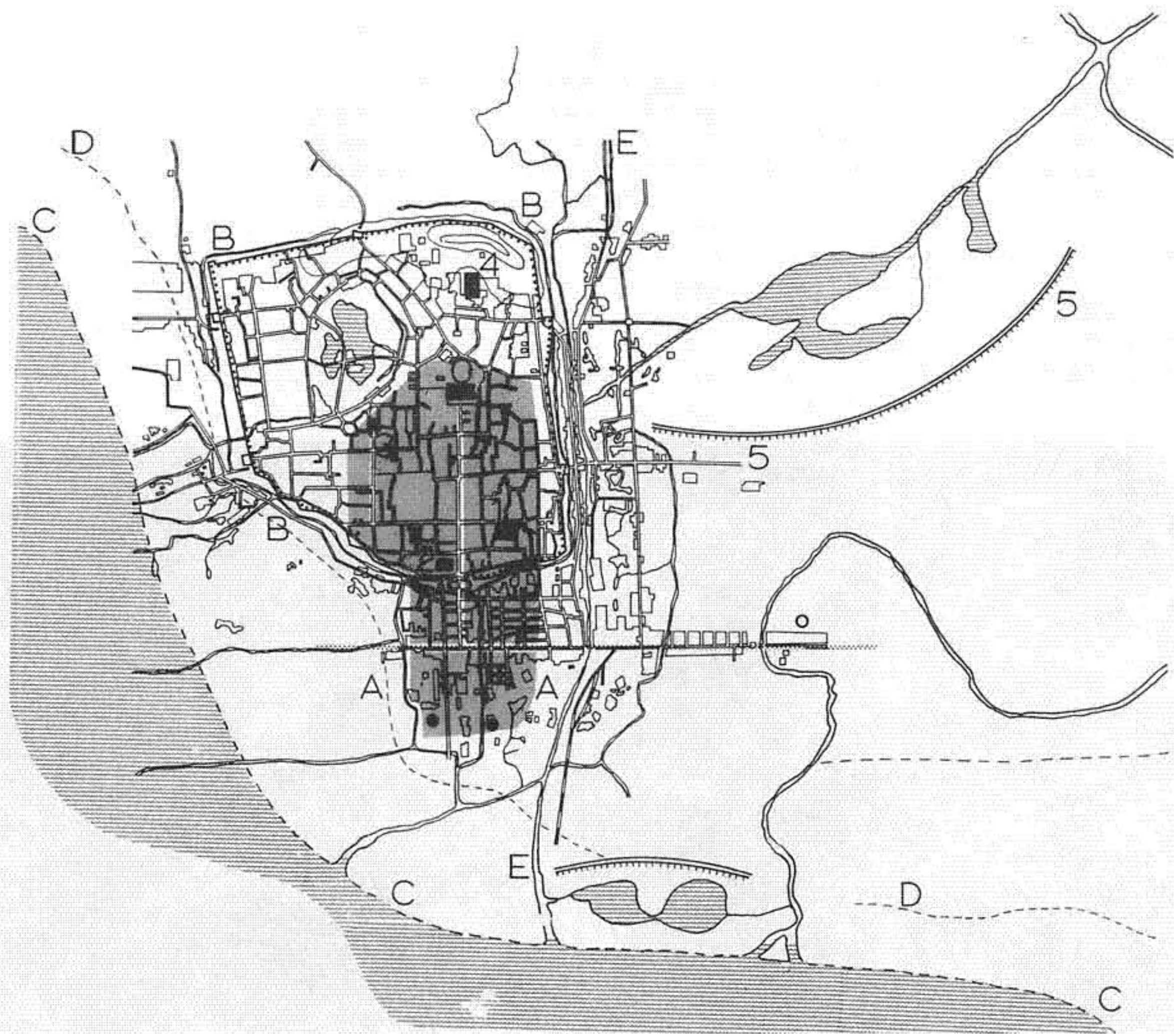
图 4.3.1.99　长城体系的重建，形成了新的行政区划与行政城镇。一个防御区域，榆林（称为延绥）于 1436 年建立。1466 年建造了一座坚固的城堡，即北部的城堡。城堡之南，一座行政城镇建于 1473 年和 1492 年之间，当两者于 1515 年结合到一起时，新的机构和兵营兼于两座城堡之间的中间地带

图 4.3.1.100　甘肃省会兰州城，是西北一个坚固的行政中心，引自 1941 年的现代平面图。

虽然是自汉代以来的重要城镇，1372 年之前漫长的兰州历史却鲜为人知。那个时期，建有一座浮桥，以允许那些沿年代久远的丝绸之路的旅游者更为容易跨越黄河。1377 年，现存的聚落绕以坚固的墙体。周围的郊区也迅速在明代更为和平的情况下发展起来。浮桥于 1385 年移到黄河的下游方向，正对着内城的西墙，并在那里完好地保留了 500 多年。明代长城的几条分支在城市附近汇合，主要的支路正好在黄河的北面穿过。1595 年，长城的主要分支向接近宁夏的更北方建造。兰州发展了其行政功能，到 17 世纪，它成为一个具有五级行政机构的省会。当时，甘肃从陕西省分划出来而成为一个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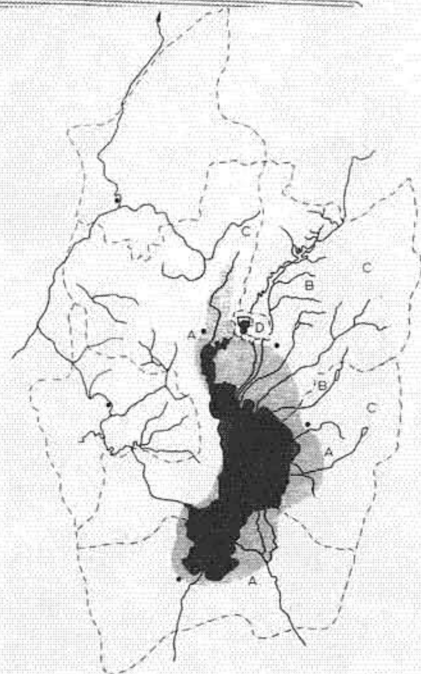


图 4.3.1.101 云南省的省会昆明，元、明两次被重建之后的形态，比例 1 : 40000。引自昆明风物志（1982 年），以及一幅大约 1910 年的现代地图（参见图 3.4.8）。

当蒙古军在忽必烈大汗的领导下，于 1254 年攻克云南大理王国时，一位新的波斯副统帅或阿拉伯后裔被安排在此。1274 年这位副统帅到任不久，就迅速开始重新建城，并为了农业绕湖开垦土地。他希望通过沿河筑堤来降低滇池的表面水位。为了这一目的，湖的出口被加深。盘龙江东面的旧城被废弃，而新的城墙向北边延伸，包进了五华山。然而，元代末年，这座城市又被毁，它仅仅生存了一个世纪。

1382 年，作为明代开国者总体性重建项目的一部分，昆明也被恢复，新的城墙又向北延伸，并包进了另一座小山源头山，其可追溯到唐代的寺院。元代城市的南部现在作为郊区而抛到城墙之外。而五华山则成为新城的中心和政府衙门的所在地。山之南，较老的元代城里，许多的居住巷道是尽处为死端的道路，这是中东城市的典型，却是中国城市中的非典型。这大概暗示了忽必烈那些从中亚和西亚来的非汉人追随者们所带来的影响。这些人在这里建立了伊斯兰信仰，并且建有好几个祭祀殿堂。其中最为重要的位于南门的西面，刚好位于城墙的内侧处。嘉靖时期（1521—1567 年），云南的副统帅张天赋（1517—1578 年）重建并且拓展了元代的洪水防御和灌溉体系，从而获得大约 6700 公顷的可灌溉土地，而滇池的水表面区域从 530 平方公里减至 340 平方公里，最近更进一步减至如今的 247 平方公里。

A—A— 元代城市；B—B— 明代城市；C—C— 晚明时代湖的界限；D—D— 元代以前湖的界限；E—E— 盘龙江；O— 五华山；1— 张天赋宫殿；2— 清真寺；3— 孔庙；4— 源头山；5— 防洪墙

图 4.3.1.102 滇池，比例 1 : 1000000。
A—A— 明代的湖；B—B— 灌溉区域；C—C— 围绕的山；D— 昆明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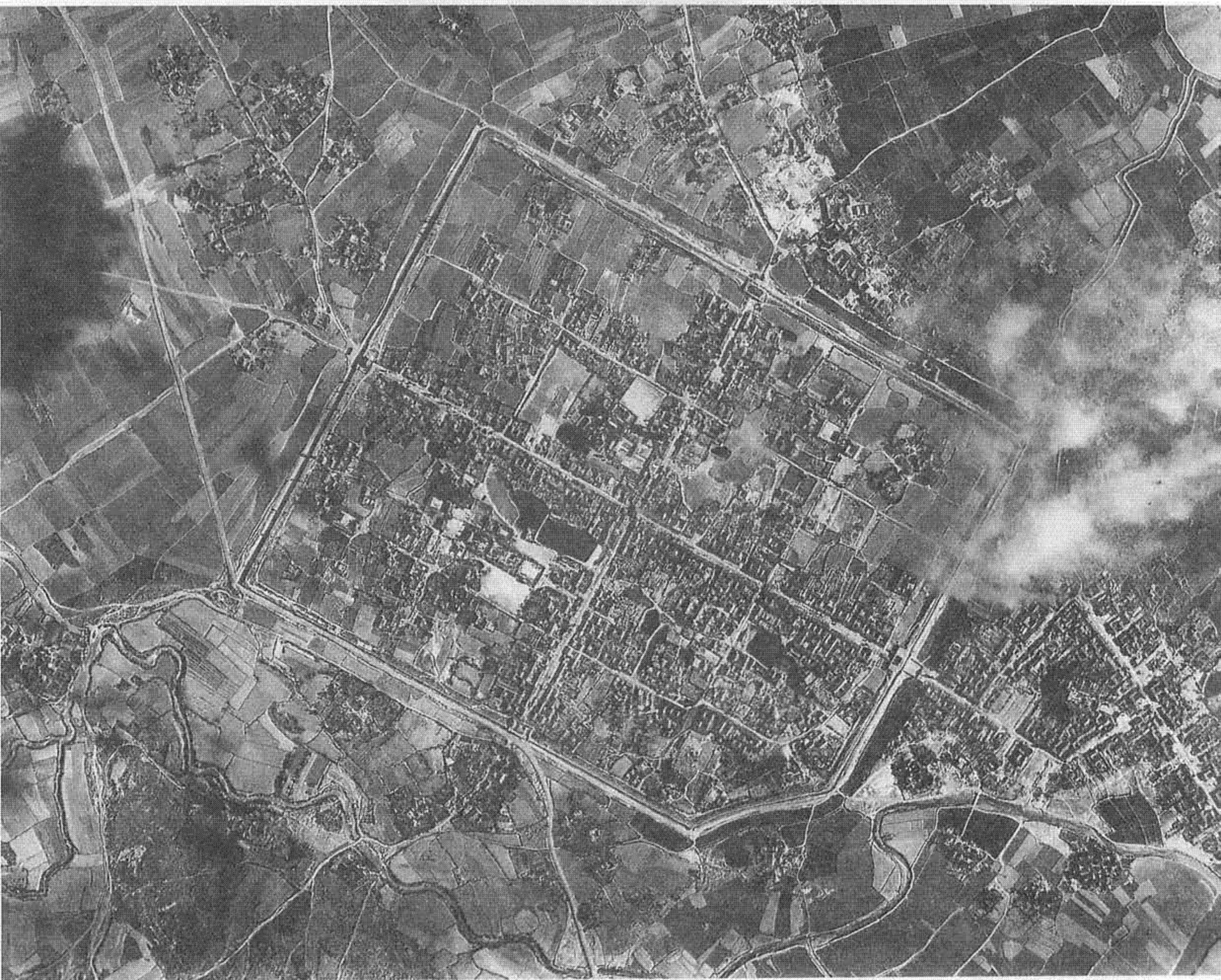
图 4.3.1.103 云南的陆良城，昆明东面，引自华盛顿防卫情报机构档案卫星图（1944 年）。

1382 年墙被建之时，城已经被重建，并且在城中心完成了钟塔，其东的衙门机构、孔庙、城隍庙（西北角）以及东边郊区的关帝庙也都完成。城墙的东南角也许因为风水原因有所改变（图中，南在上）

图 4.3.1.104 元代和明代的扬州城，比例 1：20000，引自 1920 年的规划平面图，1926 年和 1934 年修改。

蒙古军队几乎完全毁坏了这三套城以及南宋时期的主要堡垒，仅仅留下一堆废墟。十几年后，一座市场街道沿着老大运河的分支发展起来，但是，因为洪水、饥荒、起义、战争和其他的灾荒，居民过着悲惨的生活。当明代在 1368 年建立之后，围绕着市场街建造了一座城墙，为（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空间。特别当大运河在 1415 年恢复其足够功能，并因粮食运输和盐业贸易带来了新的开始时，这一发展获得了动力。这一新繁荣的结果，一片新郊区在东边发展起来，并最终于 1555 年加设了围墙。当时城市上升到了府级。文峰塔（1582 年）象征了这种繁荣。

A– 唐城的界限，B– 宋城的界限，C–C– 大运河，D– 明城，E– 大运河新的分支，及 1555 年的新城墙，F– 文峰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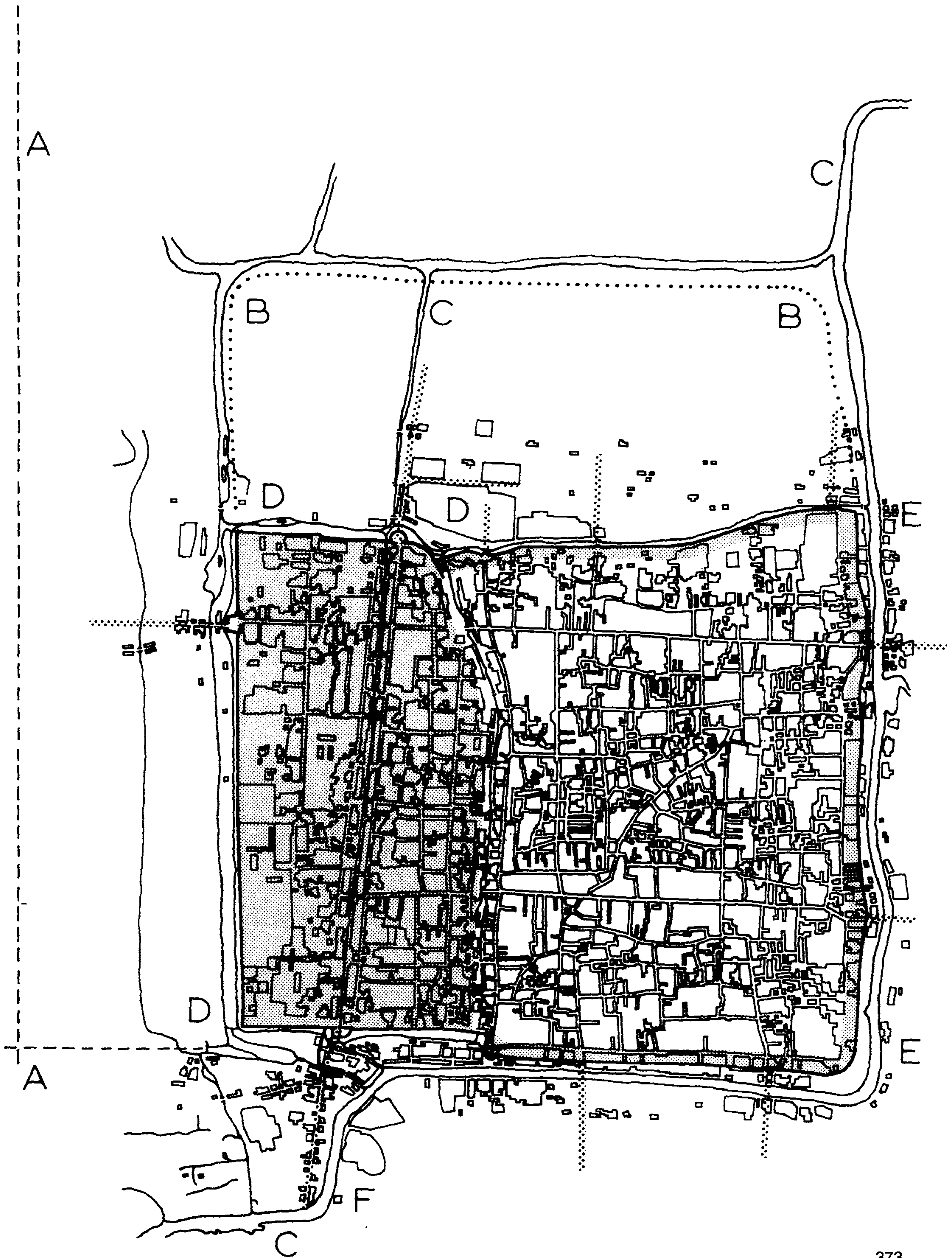

A
C
B
C
B
D
D
E
D
E
A
F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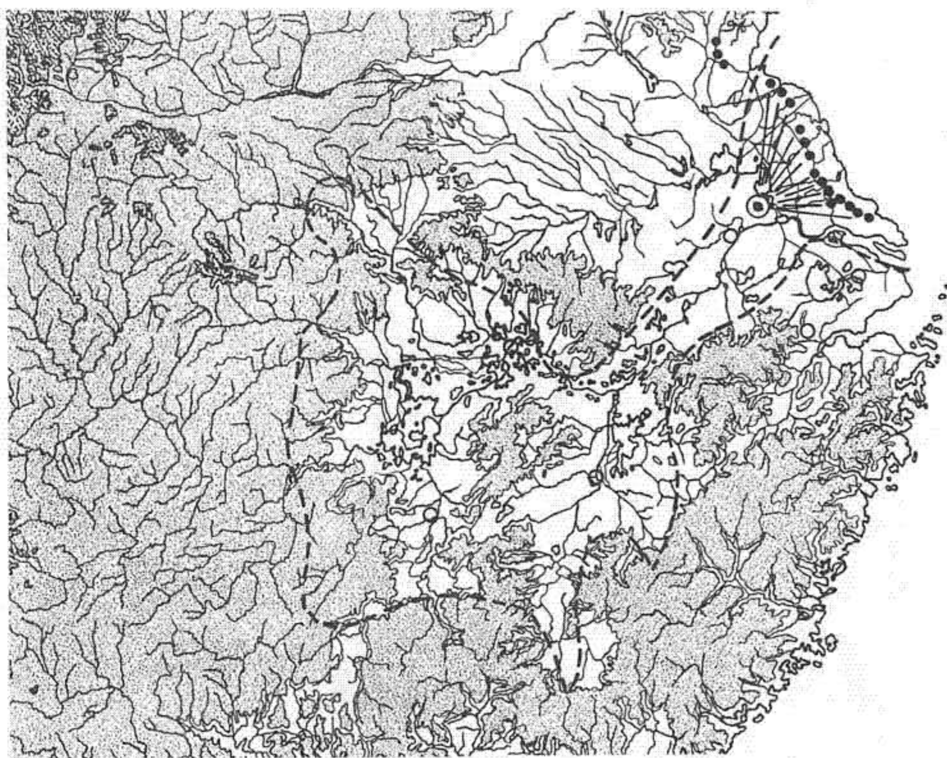




图 4.3.1.105，106　文峰塔及其附近的一条居住小巷

图 4.3.1.107 老的明代城市中心的一个剖面，比例 1 ：5000

图 4.3.1.108-110　扬州是沿着江苏海岸的盐业基地的贸易中心（108，109）。清代时，食盐从这里被运往内地盐业专卖区，如地图上所表现的那样（110），远至四川地界，比例 1 ：100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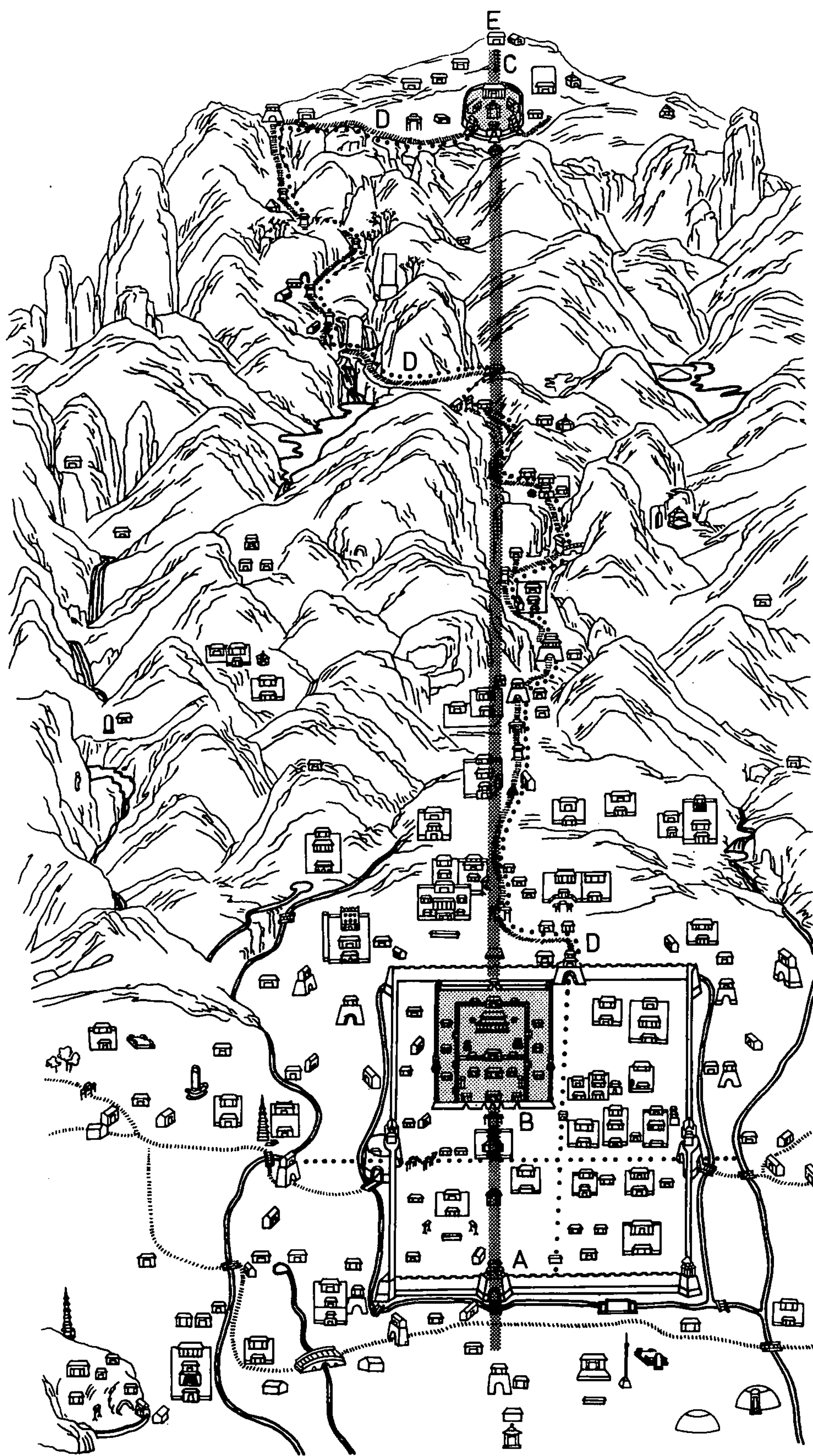


图 4.3.1.111–115　山东泰安。

作为中国五座圣山之一，泰山是最为神圣的，几千年来，它都是来自全中国无数香客的目的地。山峰之南的山脚处，一个景点被保留下来，用于皇帝的封禅仪式。关于封禅的最早记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10 年，当时汉武帝来此举行这些仪式。然而，1008 年之后，再没有举行封禅仪式。汉代，一座庙宇在此处建造，并于宋代重建和扩建，它被认为是继北京故宫和曲阜孔庙之后中国第三座美丽的建筑物。为满足香客的进香朝圣，一座聚落围绕庙宇生长。渐渐地，这聚落本身发展出一座城市，并成为围绕泰山地区的行政和经济中心。1162 年以来围绕该聚落的土墙，于 1511 到 1523 年间，完全以石头重建。建造最终于 1553 年结束，包括门和塔楼，城墙总长 7 里 60 步，大约 4 公里。围墙内的区域是一个矩形，从北到南较长，410 米 ×680 米的区域，庙宇建筑群坐落在其西北角落。庙宇建筑群南门之前，是另一座带有几座小门的前庭，以及一座小庙宇通向彩云公主宫。彩云公主宫向南延伸大约 300 米直达主要的东西街道。从那里，一条街道直通城墙的南门，并有许多的牌坊。所有这些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和城市规划实例。作为围绕着泰山地区的行政中心，城市包含着泰安县的县衙及其附属的办公房屋和监狱、泰安府衙及其官员办公室，府城的孔庙以及府城的城隍庙。敬仰关公的三座庙宇作为省一级俱乐部的旅店，两座佛教和道教寺院完善了一系列的宗教设施。街道网络由一条从门到门的东西大街组成，主要的南北街道由 T 形交叉点联结，其北部穿过泰山庙的东面

图 4.3.1.111　山东泰山的平面，引自明代的县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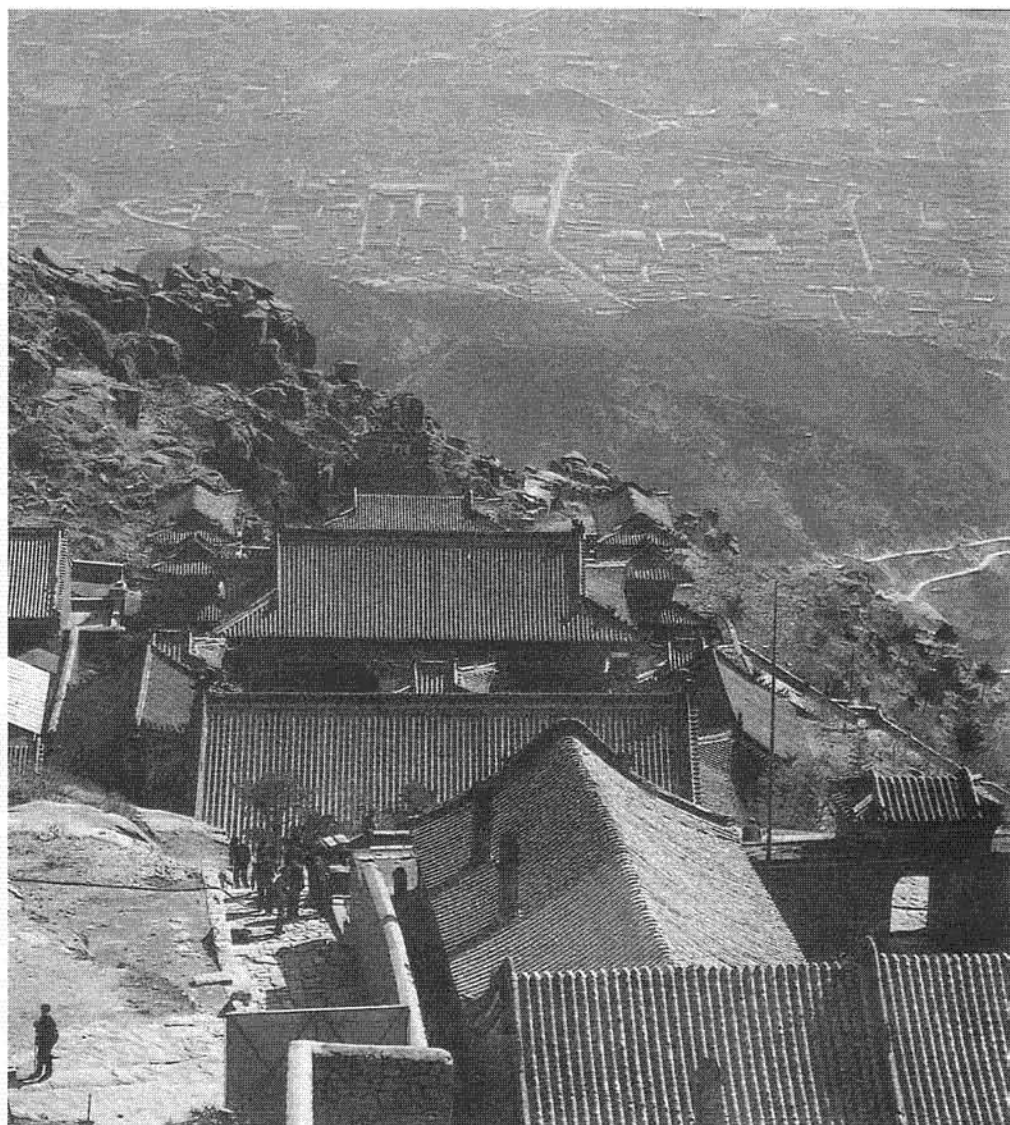
A– 泰安；B– 岱庙；C– 碧霞祠；D– 进香之路和踏步；E– 玉皇大帝庙

图 4.3.1.112　前往碧霞祠之路

图 4.3.1.113　从山顶越过碧霞祠所看到的风景

图 4.3.1.114　城里的岱庙大殿

图 4.3.1.115　城里的牌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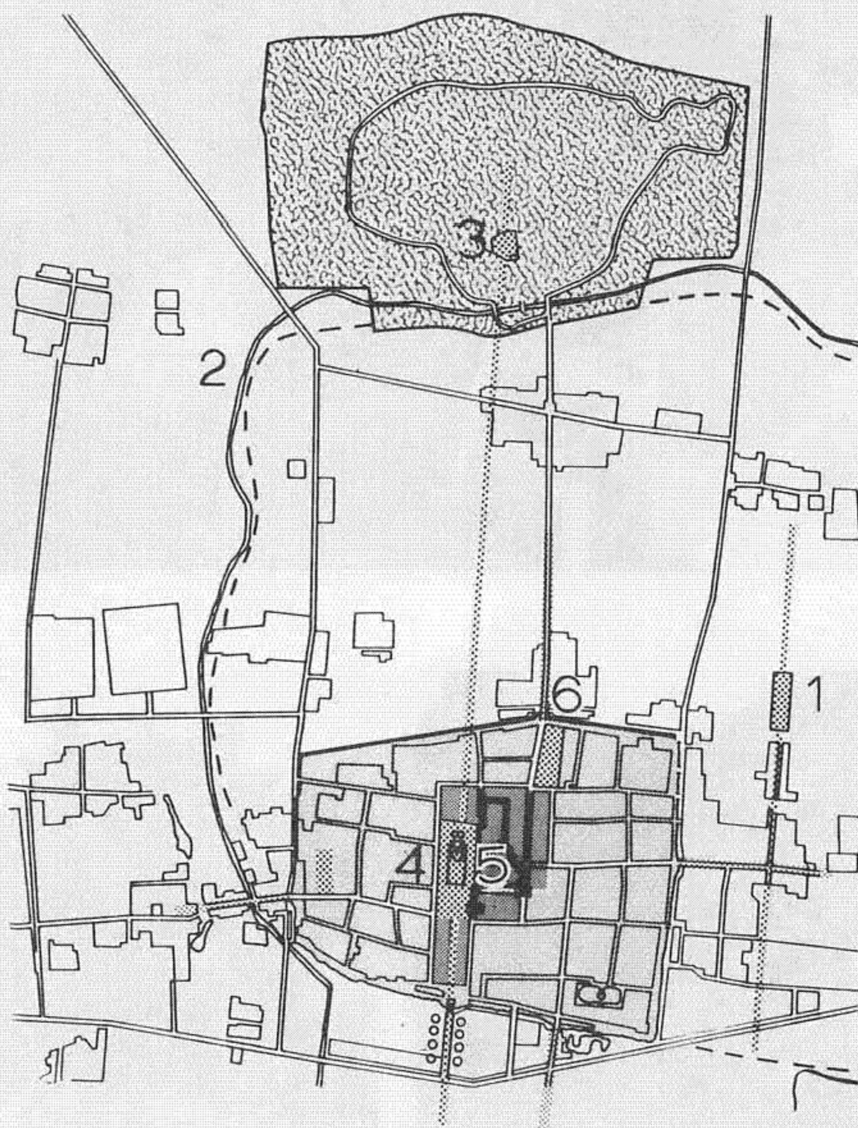


图4.3.1.116–119　山东曲阜

图4.3.1.116　平面图，比例1：20000

1–周公庙；2–鲁城旧城墙；3–孔子墓；4–孔庙；5–孔府；6–颜庙。

曲阜城坐落于孔子出生地附近，也是他的坟墓所在地。孔子在西方世界以孔夫子著名，于公元前551年出生，公元前478年逝去。自汉代开始，据说有一座庙宇用于祭祀孔子的神灵，大概坐落在他教导学生的地方，也是他生活至生命结束的地方，位于"塔楼街"。这座塔楼是由周公大约公元前1000年所兴建的鲁故城的西门（参见图2.3.1.11，图2.3.4.2，3）。

庙宇建筑群的最终格局至明代的初期已经完成，但是城镇仅有庙宇东面的孔府以及一些临近东面的地区。宋代时，孔氏家族已经上升到了公爵的地位。1511年，强盗们掠夺了那时依然在城墙外面的庙宇，因而感到需要更好的保护。嘉靖皇帝命令建造了一座新城墙，并重建孔府的宫殿。这完成于1522到1567年间。新的墙体顺着南面古城墙的一部分，包括进晚些时候的一些围合地带，以及全新的部分，呈不规则形状。但是，它将庙宇置于墙体围绕区域的中心。庙宇的主轴线从南部开始，并通过外墙的南门。那是一座特殊的门，仅仅建造为庙宇的入口。主轴线由一条笔直的柏树排列的大街向南延伸到墙外大约300米，形成一条通向庙宇的道路，某种程度像是故宫的御街千步廊。向北，轴线延伸大约650米，沿着这条轴线，排列着门、院落、平台和大殿，如此给进香朝圣者连续的越来越深刻的印象，并不断提高其期望程度，直到他抵达大殿。这是继北京故宫，古典中国建筑第二个最美丽的作品。庙宇建筑群大约152米宽，因而是帝国最大的庙宇建筑群之一。除了孔府的宫殿，城市里还有孔子学生的颜庙，在孔府的东北。颜庙的东面是一座考试大殿。在大庙的西边是学生居住区，以及曲阜县衙门，它用于管理周围的区域，而不在孔府的管辖之下。钟楼和鼓楼紧密地与包含孔府在内的街区联系，并且实际上形成了通往这一街区的入口

图 4.3.1.117　通往孔府的入口（左侧），远处是鼓楼

图 4.3.1.118　钟楼，可见在上层的钟，左侧是孔庙之围墙

图 4.3.1.119　孔庙三层的奎文阁（图书大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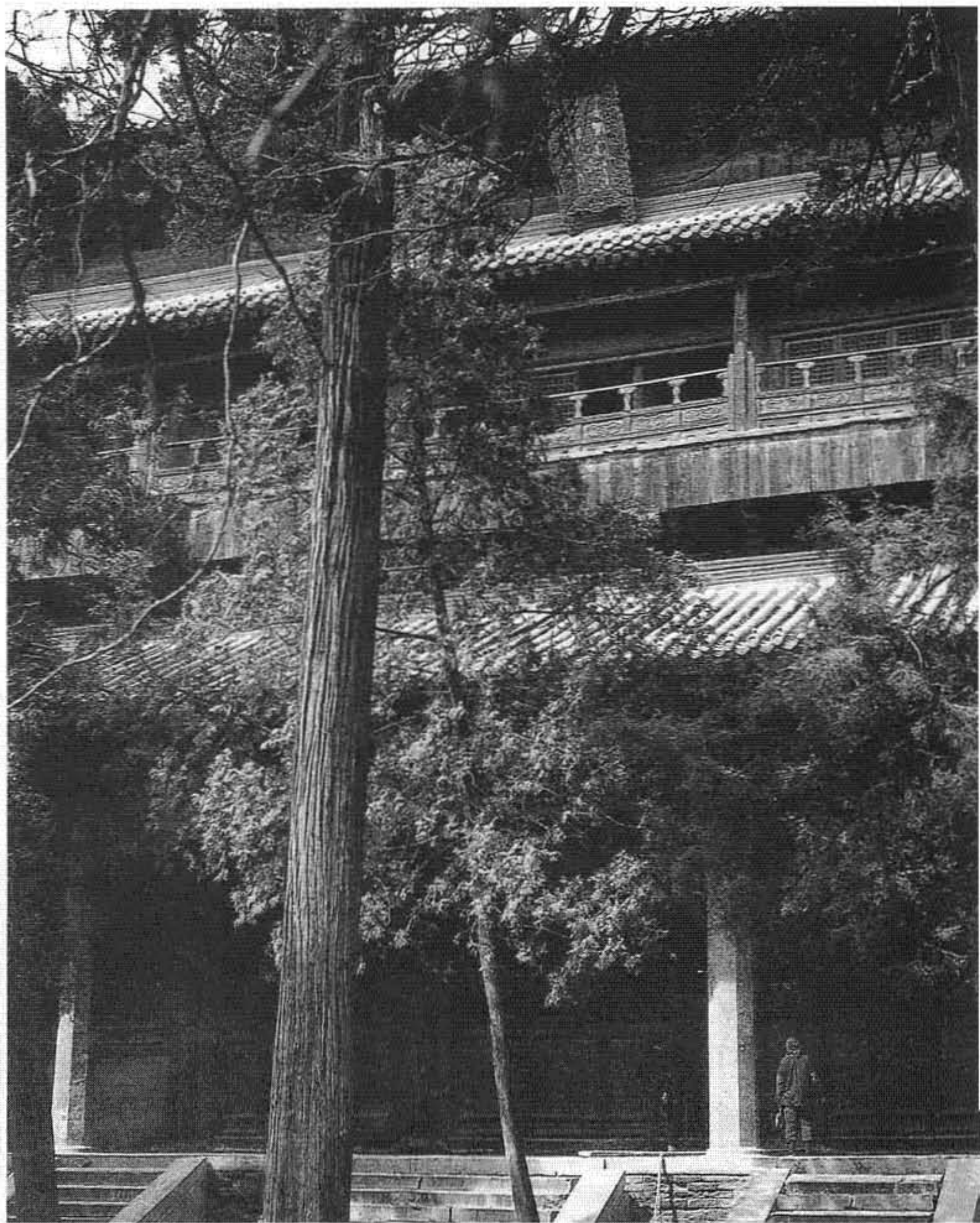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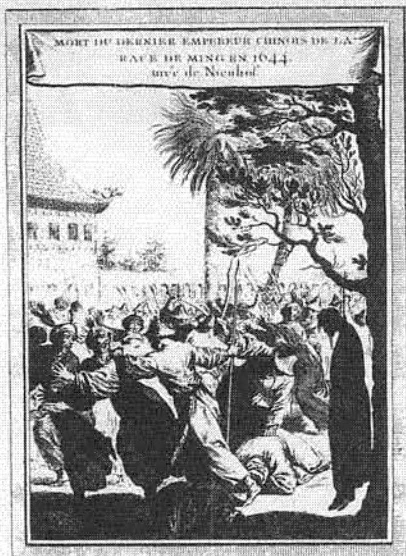


图 4.3.1.120 明代最后一位皇帝崇祯，于 1644 年吊死，引自 Joan Nieuhof（参见图 5.2.1.2）



并且如此继续下去；而每一个喜剧或戏剧以一种非常巧妙的和特殊的风格所构成，仅仅一个内行鉴赏家可以理解整体，因为以他们的语言，对于仅仅一个字就有如此多的不同意义，以至于他们宁愿写下来他们所喜欢的来与其他人交流，然而每一个字都有一个特殊的性格，而因此就不可能有任何的误会。”

明代最后的 50 年非常的喧嚣不安，宫廷的财政局势失控，而所有增加的收入和措施，仅仅使得事情更糟。大约在世纪之交，每年每处都爆发起义，直到最后，整个国家处在了叛军的控制之下。在北方，庄稼严重歉收，使得很多农民远离其北方的省份而加入到了反叛军中；而在南方，城市匠人们和工业化的工人们持续不断地反抗。最后，在北方的起义领袖向东部挺进而在 1644 年的晚春占据了北京。皇帝本人在宫殿后面的小山上自尽。仅仅一个月后，一组满族部落的军队通过了山海关坚固的防御城门而跨过了长城，并且从北方进入北京。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满族的战士们由那曾经防守边关的汉人将军（译者注：吴三桂）请进山海关，因为他非常憎恨那反叛的领袖（译者注：李自成）所刚刚结束了在北京的明朝，因此，他亲自为清军打开了山海关的大门。不但明代被彻底推翻，那胜利了的李自成叛军也被打败，而满族在中国的皇帝宝座上建立了异族的领袖地位。

这些年里的人口损失，随着明代的覆灭而加剧，接下来是在 1640 年满族军队的完全控制。自然地，城市是首先遭殃，而财产和生命的损失是大量的，正如人口的下跌那样明显。在清代开始时，人口减少大约 3000 万人，许多城市被夷为平地，留下整个地区大约两到三代的荒无人烟。这些可怕的、毁坏的、清晰的记录是由那些幸存者亲眼目睹而给出的。控制和残杀的时期以及恐惧持续了几乎 20 年直到康熙皇帝在 1662 年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其在位统治持续了足足 60 年直到 1722 年，不但恢复了和平和秩序，而且又建立了一个为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在南部最后攻克以及在 1683 年台湾岛统一到清王朝后，人口逐渐地增加正如所显示的那样。在 1685 年，这时的人口统计数目为 101710000 人，分布在中国的 18 个省份。1736 年乾隆皇帝统治的开始，人口已经跃升至大约 1.4 亿，表明了一个发展的坚实过程。在这个关键的时期，人口增长突然加剧了，因此，在 1800 年有 2.953 亿人口居住在同样的 18 个省里，在 65 年的时间阶段里，超出了两倍之多。平均每年人口数量 1685-1736 年间增长至 800000 人，1736-1800 年间增长至 2200000 人，而 1800-1850 年间，增至 2700000 人。在 360 万平方公里的农业土地上，在第一时期密度大约是每平方公里 300 人，增加至大约每平方公里 700 人。似乎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体系能够持续这种增长而不损失一致性与安全性；事实上，它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但是，在另一个 70 年

的时间里，持续的人口增长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引起了丧失秩序以及没有安全感，一直到整个国家被起义和造反所撼动，其最后终于带来了1911年朝代的覆灭。到19世纪中期，在同样的区域里，人口已经升至4.299亿。但是，接下来若干年里的反叛，持续的战争和残杀，在1910年，即最终覆灭前一年，人口减少至大约3.6815亿。三个不同的阶段因此，在清代被区分开来。

4.3.2 清代（1644–1911年）

满族人1644年进入北京之前的十二年，他们已经在辽宁省现在的沈阳市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皇宫，那里自汉代以来就由汉族人所居。有几座城市已被建立为行政中心，这包括在沈阳南面的省会辽阳。明代初年，这些城市加固了一些新的城墙，它们的布局似乎与中国其他设防的城市，如前文所提的天津或大同非常相近。在他们控制了辽宁省以后，满族人于1620年将其都城从松花江以东他们部落的故乡移到辽阳。但一些年后，1632年，他们在辽阳的北面重建了一座城市，即现今的沈阳，并参照汉人的想法将其重塑成为一座帝都。当满族统治者于1632年命名其朝代为清时，宫殿和城墙也都完工。

沈阳旧的防御明城墙上有四座门，可以追溯到1389年。因为这一原因也许它曾经有一个十字形路将城区分成四个部分的布局。因为那是明代的普遍做法。然而，满族人采用了汉人经过时间考验的“井田”制，将方形城市分为九个部分，留出中间的部分建造宫殿。布局并不非常准确，估计也显示了再塑现存聚落的困难。17世纪，由于长城以北整个国家人口的减少，辽宁省古老的城市越来越荒芜，汉人被逐出，满人留下来定居到汉人的区域。这时，在更北之地建立新的城市作为反抗俄国侵略者的边防地。1689年俄罗斯和中国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之后，黑龙江（俄罗斯称阿穆尔河）以南的整个区域被控制在一个军事政府的组织之下。1699年之后，最高的鞑靼统帅的宝座在齐齐哈尔建立起来。其他的要塞和贸易哨卡分别建立于大草原之乡的吉林（1673年）、瑷珲（1683年）。这些孤立的地方完全是正常城市化进程的反面，那里行政城市和城镇仅仅建立在人口稠密的农业地区。而齐齐哈尔是一个小的方形要塞，仅有0.25平方公里的面积，由郊区所围绕，其中，士兵们、商人们和匠人们大多数是驱逐出境的流放者而在此安居。这些郊区由一座土墙和一个栅栏所围。沈阳城于1644年失去其作为皇朝宫城的地位以后，其郊区于1681年也由几乎是圆形的外墙所围。那之后，城市发展为一所省会都城，府级行政中心所在地，以及满清第一代皇帝的帝陵所在地。

满族人于1644年进入北京时，开始了城市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他们将所有汉人居民驱逐出内城，这样，他们可以占领其中，并安居下60000名满族士兵，比如八旗子弟的八旗人以及他们的家庭。直到我



图4.3.2.1 努尔哈赤（1559–1626年）的都城，新城（兴城）之南门。努尔哈赤是通古斯部落满族联盟领袖，清代皇帝们的祖先，宋金时代女真人的后裔，1592和1598年间，与中国军队一起在南韩地带抵制日本入侵者时，努尔哈赤作为龙虎将军，异军突起。20年后，他成为东北女真部落的可汗，从1616年起，在长白山地区沿着长城，他与中国的卫士们作战，他宣布建立“后金”朝代，也表示他在其要塞地赫图阿拉掌握了政权。1618年，在抚顺一带战胜了中国军队之后，他在萨尔浒附近建立了自己的权力基地，同时攻击肥沃的辽河盆地。1620年，他围攻省会都城辽阳，并将自己的居室迁移至此，在太子河之东，正对着防御良好的汉人城市，他建造了一座堡垒城市，称之为新城。四年后，已经控制了整个辽河谷一直通到山海关汉人的长城，他将居所移往沈阳，那里，他在旧中国城市的废墟上建造了自己的宫殿。辽阳已经拿下，但第二年，即1626年，努尔哈赤死去，埋葬在沈阳附近的东陵

们当今的时代，这一地区仍被称为鞑靼城，与其南面的汉城形成对比。这个旗人之城在1553年和1564年之间已经加设了围墙，这种事发生在很多其他的城市。凡是满族人想到有必要建立他们旗人要塞的地方，华人就从相应城市的地区撤出，而最终这地方加设围墙，并最终由满族士兵与其家人定居。它一般包括鞑靼将领的宫殿，在紧急情况下，这些将领充当相应省份的最高指挥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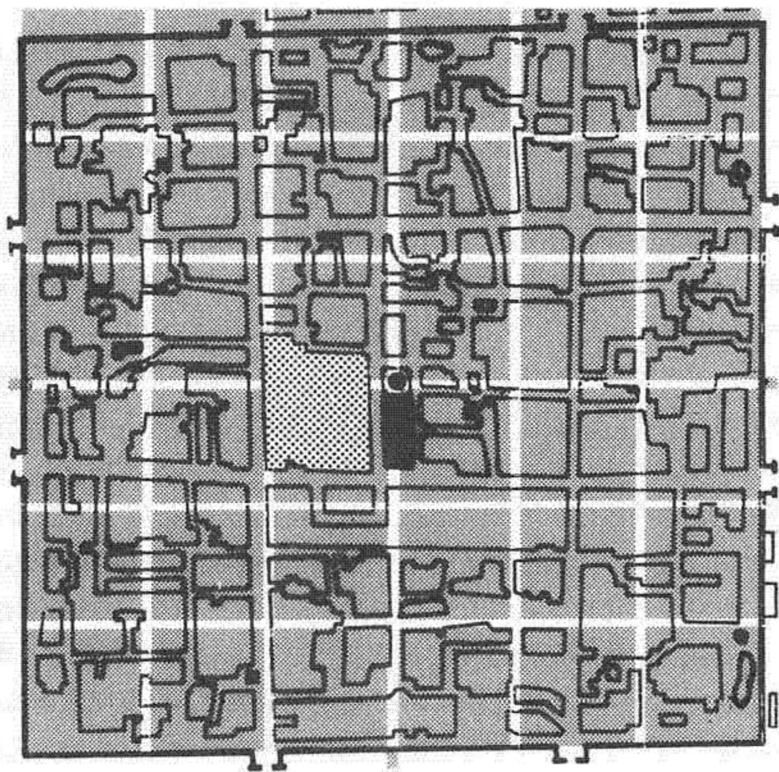
四川省成都的满族城墙建于1718年，大约是城市1645年毁坏之后的80年。在其他地方，如今天山东北部的沂都，满族人在汉人城镇之外建造他们自己的围合聚落区。直到1911年朝代结束，他们依然保持与汉人的隔离。所有这些分离的城镇都由汉人激进分子所毁灭。一些情况下，满族居民完全被消灭，在其他情况下，他们仅仅留下自我处理或者渐渐地融入汉人。

如前所提，18世纪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将许多汉人居民推到长江以南中国的西南地区，现今的云南省、贵州省和广西省。那些地方较大部分土地依然属于少数民族非汉人的原居民部落。结果，原居民部落和新来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加剧。1725年之后，情况变得更糟。最后，经过多年的战争和不断的冲突，建立了一个标准的汉人行政管理区划，在一些新城镇和城市里，产生了大约50个行政中心。其中大多数是非常小的聚落。

1689年康熙皇帝统一台湾岛之后，出现了同样的情况。直到在4座州府确立13个行政区。原住民部落被赶回山区之中，在那里，他们在特殊界限后面的特殊地区，继续以狩猎人和原始农耕为生。大多数这些行政中心最初仅仅是一些散置于栅栏围合的大致为圆形区域内的行政和军事建筑群。作为控制据点，它们建于主要交通路线附近，但是位于已经具有密集人口的农业地区中心。其中，某些具有影响的人物拥有开垦新土地的特权。这些人为那些愿意承受边远地区拓荒者的艰辛生活并交纳所收获谷物的人群提供工具、种子和牲口。新来者与当地的原住民处于一种恒久的对立状态，因为没有人征求原居民的允许就占有他们的土地。很多拓荒家族是来自中国北方的移民后代，所谓的客家人。随着蒙古族征服中原，这些人最初于13世纪向南方迁移。作为后来人，混杂在那些已经安居的中国南方汉人之中。现在，以及后来的18世纪和19世纪，他们抓住机会以改善自身的状况，同时为他们的后裔在台湾建造一个新的家园。到了满族统治的末期，这个岛屿已经大约有300万的汉人。

在行政中心的保护下，商人们和匠人们“贴”在那些大致圆形的栅栏外面定居，并且建造其市场街道。最后，整个聚落由墙所围绕，从而形成了典型的中国汉族城市——宫殿、庙宇、市场街道、具有塔楼的城墙，以及城外附近山坡上的墓地。1878年，当台湾被正式设置为一个新的省份时，该岛屿的北部建立了一座新的省会都城——台北。这是该岛惟一一座以传统汉人方式规划的聚落——矩形围合区域里有笔直的墙体和街道。这里，在一块仅约1.2平方公里覆盖的区域内，修改过的传统城市规划法则以一种复杂的方式被运用。

清朝晚期城市发展的最后阶段主要发生于三个东北的省份。这一区域，西方通称其为满洲里。随着19世纪的到来，持续的人口压力导致了这个满族皇朝家园汉人聚落的产生。本来，在满族占领了中原之后，那里对好几代的中国汉人居民实行关门政策。当初的想法是为游牧武士保留一块家园，从而培养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勇斗精神，以及符合统治者优等种族的德行。但是，随着国家人口越来越少，重新安置满族家庭的项目失败了。19世纪初开始，防止汉人“入内”的严苛条律得以缓和。在清代的第三个时期，到满洲里的移民增加了，越来越多的聚落发展起来，正如在西南各省和台湾岛那样，行政管理紧随着移民的第一次浪潮，也因此，随着汉人郊区聚落无论是村庄、市场还是市集城镇的发展，大多数行政管理城市被建立起来。直到1878年，官方禁止汉人永久居留于长城以北的区域，汉族妇女甚至不允许被带往这些地方，否则被处以死刑。然而，到1878年，这条法律被废止，汉人在此的发展也已经合法化。因为汉人移民曾经被官方通过法律禁止，这里没有设置汉人行政机构。最初，这里也没有建立行政城市。据估计，1800年以前，这一地区的人口总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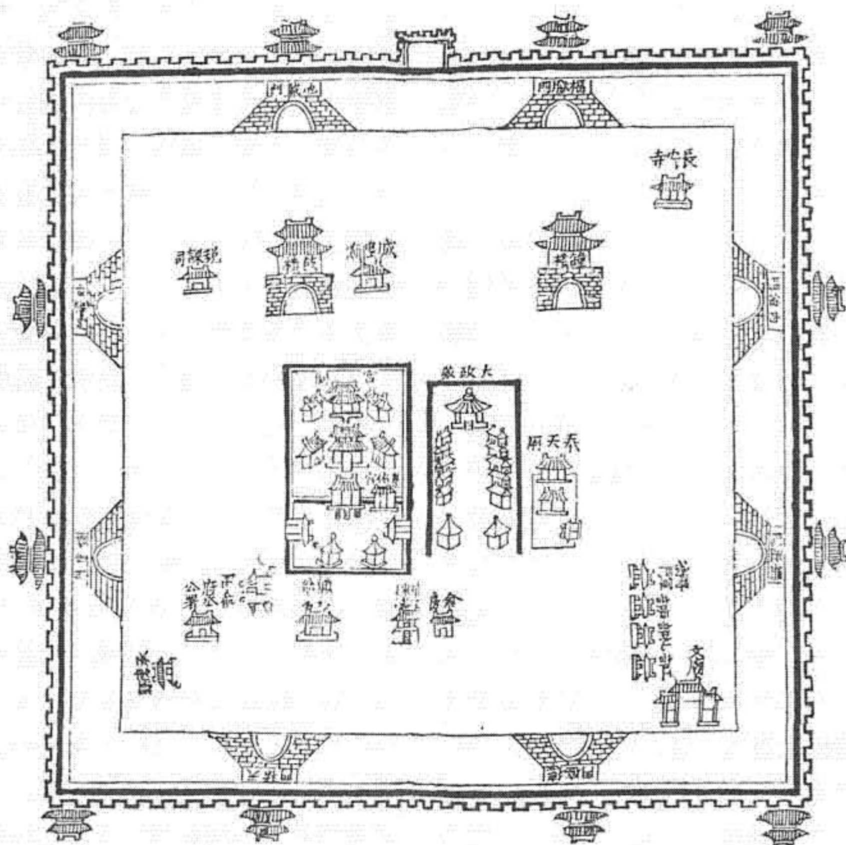


图 4.3.2.2　17 世纪初的奉天城（沈阳），比例 1 ：10000，引自 1909 年、1912 年以及 1711 年地图册的平面图。

1616 年，努尔哈赤攻克明代的沈阳城时，那里已经是几个世纪之久的行政中心，当它 1389 年最后一次被加设围墙之后，其规模、布局和街道模式可能非常类似于辽阳的做法。惟一的区别是城门的数量。辽阳作为省会城市有权拥有八座门，而沈阳作为较低等级的城市只允许有四座门。七年之后，沈阳被选作努尔哈赤的皇家居所，于是，在古老的围合区域内，一部分地带被指定用于建造宫城和八旗的八个居处，军事机构的分支。原来留存的街道模式经过了仔细地调查，新的模式也尽可能地适应它。新模式的概念很明显地基于“神奇的方形”，但是它完美地适合八旗的划分，皇室居中。布局的度量单位仅仅是大致理想的比例，但是我们可以假设，城墙内的区域试图处理为一个 2 里 × 2 里的方形，宫殿区的御座大殿坐落在其中心。八座城门位置的再次确立和街道模式大概适应于原有的街道网络，但是在一些情况下，采用了 100 弓或 150 弓作为度量单位(300 弓 =1 里)。弓也是测量者所使用的竿的名称，其长度为 6 英尺。基于 31.9 厘米的明尺，1 弓为 1.91 米长，20 弓等于 38.28 米，这也是测量者“绳带”的长度。宫殿的居住部分坐落在御座大殿的西边，是一座独立的建筑群，其布局与中国建筑完全不同，而外面看上去却是中国皇家风格的简写版

不足百万，但1890年，几乎约1000万人生活在此。20年后，清朝的末期，有17900000人在册。这最后的发展进程已经为其他力量所强化，是完全与传统发展不同的现代发展。

现存的城市没有一个经过认真仔细的规划，仅是方形围合区域内小型的行政群，通常不大于0.25平方公里，或者仅仅是市场街道，根据贸易和制造业的条件在适宜的地方生长起来。第一种类型里较好的实例有吉林省的通化和辉南，其他的例子则以辽宁省的昌图和新民为代表。我们对于此类新城市的早期历史所知甚少，然而它们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良好实例，合乎礼仪布局的行政城市和经过不同阶段发展起来的市场城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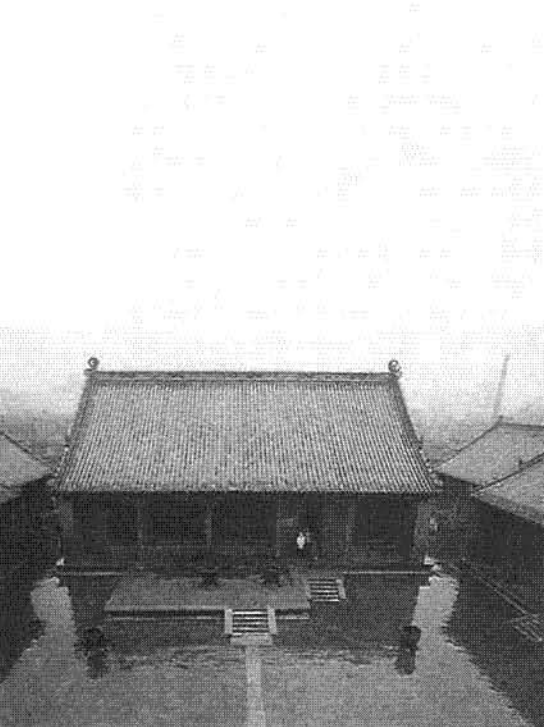
吉林省的辉南是一个县级城市的很好实例，一次性地确立和建造，并以非常有组织的方式展开布局。尽管如此，主街是一条典型的市场街道，其城墙之内结合了行政和经济功能。仅仅一个小郊区沿着市场街道向南扩展，此处的城墙是同一功能性单元两个类似部分之间的随意分划线。同属于吉林省的通化县城具有同样的规模，布局却不同。因为其街道模式形成了一个T形交叉口，县衙位于中心，占据着最为显要的位置。因此，强调了其行政管理的重要性。辽宁省的昌图是一个典型的市场街道聚落，县衙四周具有某种规则性。新民和长春是典型的大市场街道，后来填加了县衙。长春最终加设了城墙，但是以一种非常不规则的方式。这暗示，它当初并没有被规划为一个行政中心。

19世纪中期往后，满洲里的发展进程变得更为复杂。不仅蒙古族、朝鲜族以及许多本地部落那样的少数民族投入到土地的开发进程，其他的民族，例如俄罗斯和日本，也意欲参加开发那些几无人烟的区域。结果伴随着铁路、陆路、钢架桥梁、港口、工业和矿业建设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创造出了一批全新而现代的城市。这些城市拥有经过规划的道路网络，电力、中央供水系统以及运河体系。而且，这些不仅仅发生在满洲里。只是，此处不多涉及。

1644年，满人军队越过长城时，他们有蒙古部落以及明末逃离反叛的汉族士兵陪同。这些蒙古人和汉人被编入旗人组织，对满族新朝代清的建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贝加尔湖以南区域，那些蒙古部落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向满族势力投降，边界区域持续了几十年不断的争战。然而，长城不再具有太多的作用，特别在清朝于1697年处死蒙古族首领噶尔丹之后，长城最终失去了重要性。这一胜利向蒙古西部（现今的新疆）的诸部落敲响了警钟。这些部落曾经试图反抗满族先遣部队的入侵。不过，战斗还是继续了几十年。直到他们于1732年打败了伟大的卫拉特蒙古人部落联盟，清朝军队才获得首次胜利。第二次胜利是1757年准噶尔人最后的屈服，接着是1759年对塔里木盆地的征服。为了在这些用今天的话是中国外部广大区域建立统治，清朝政府在一些便利的地方建立行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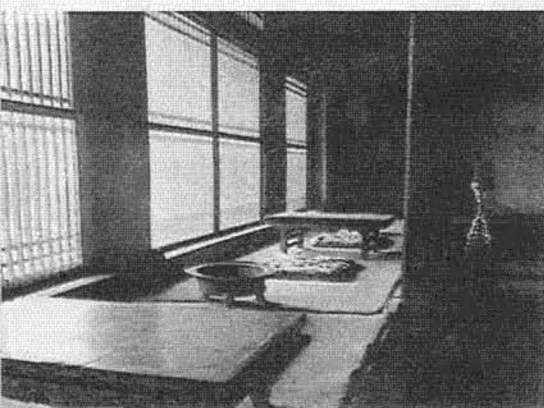
图4.3.2.3–5 努尔哈赤在奉天（沈阳）的皇宫，建于1625年。
虽然像白色石板所显示的那样，通向建筑物前面不对称台基的踏步，坐落在院落的主要轴线上，这里没有直通大殿的中央入口。沿着墙体的内部是一圈炕，一种可以被加热的像床一样的结构，是一个冬季里全家人舒适的地方。大殿西边的背景建筑用作举行女真人的萨满教仪式。炕在近门处的一端，烧火加热煮水，烟气在建筑物的后面排放，与朝鲜房屋的加热系统相同

图4.3.2.6，7 奉天都城围墙围绕区域中心的御座大殿，引自沈阳故宫博物院，1987。
最先是由努尔哈赤所建，御座大殿本身的布局以及宫殿东边的整座建筑群的布局类似女真人统治者的帐篷营。以八旗象征符号作为内部装饰的八边形建筑物中心，耸立着龙椅。主要的轴线，以白色石板铺就的主轴道路直通院落到达大殿。两边建有像帐篷一样的亭子，其中八个代表八旗指挥官，两个代表左右两翼指挥官来护卫皇太子。1636年，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1626–1643年在位）采用了大清或清代的名字，并且颁布满族的名字应该用于所有女真人的部落。所有的满族都是八旗成员（八旗子弟），加上那些参与攻克的蒙古人和汉人，直到1911年清代结束时都是女真人的后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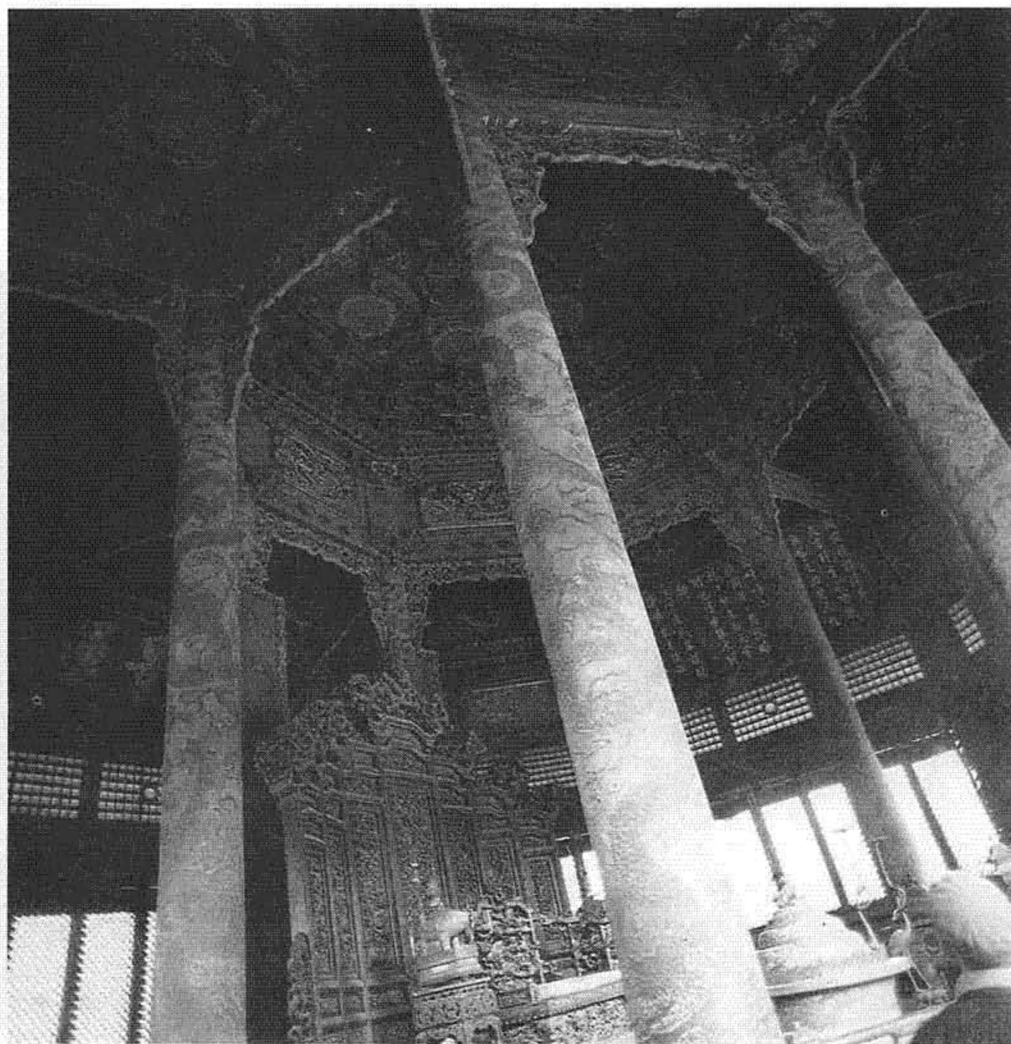




图 4.3.2.8–11　奉天城，清代的第一座城

图 4.3.2.8　北方的大白塔

图 4.3.2.9　奉天城，引自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幅 18 世纪图绘。

图 4.3.2.10　奉天城的航拍照片，华盛顿情报防卫机构

图 4.3.2.11　奉天城，比例 1 : 40000。引自 1917 年现代地图。

传统认为，由努尔哈赤的儿子，后来以太宗（1626–1643 年在位）皇太极知名，发明的满族这个名字与文殊（Manjusri）有关。[1] 那是藏传佛教特别是喇嘛教精神的伟大导师。据说这一举动基于政治考虑，以便与很多蒙古部落和西藏人建立良好关系。这些蒙古部落在满军的征服下加入到满族人中。西藏喇嘛教的黄宗影响了所有的蒙古人。结果，1638 年，在满族都城的西边建造了一座喇嘛寺院。第五世达赖喇嘛（1617–1682 年）派遣的藏族使团 1642 年到达奉天时，四座白塔建于城外的四个方位。这一概念也许具有几处来源：一处可回溯到辽代上都的四座塔，它分划了都城区域；另一处与纯粹中国根源的风水概念有关，以大白塔防御邪恶的影响；第三处意为将喇嘛教普及到世界的四方。这些白塔是相当可观的建筑物，27 米高，在 3 公里之外的宫殿处仍然清晰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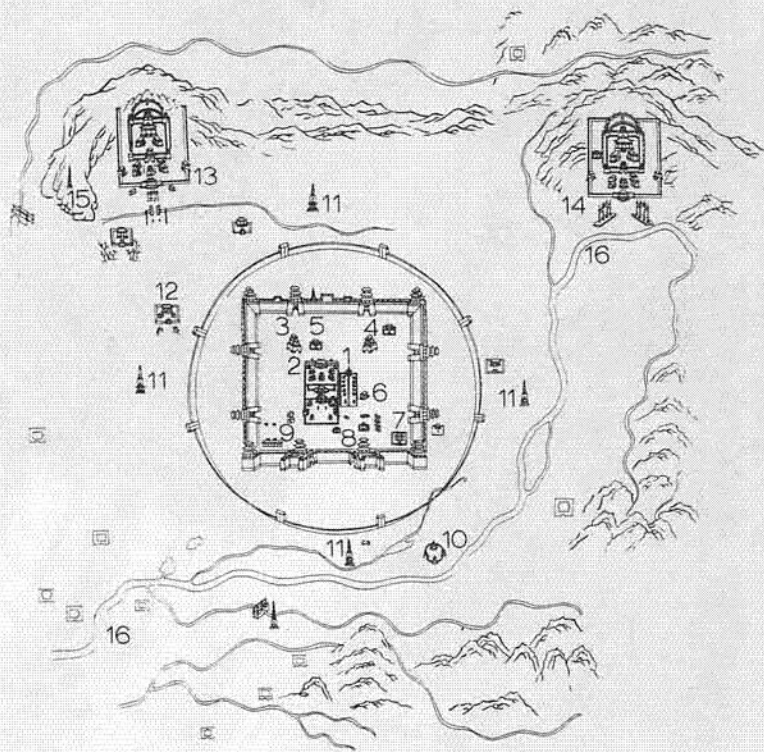
当太宗皇帝完成了宫殿建造并且于 1636 年将其朝代改号为大清时，城的东南建立了天坛，以中国皇帝的皇家仪式向上天宣布其新朝之号。虽然这宫殿在很多方面与北京的皇宫完全不同，宗庙太庙根据年代久远的“周礼”之制坐落在宫殿区之东南角。太宗 1643 年死后，安葬于城市西北的北陵。以喇嘛寺的主要轴线直指陵墓坟丘，为丧葬仪礼指定了正确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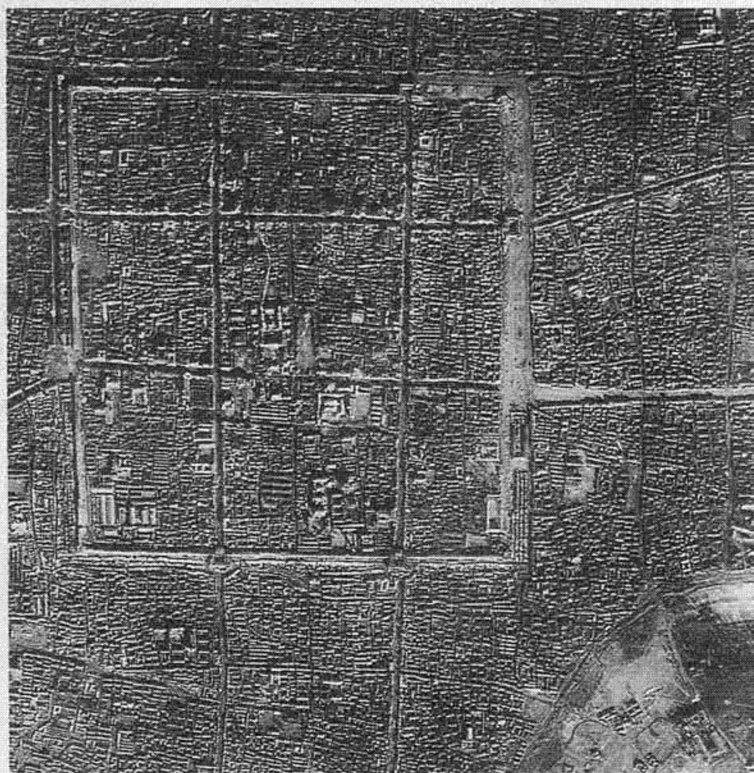
最后，1644 年，满族攻克北京之后，奉天失去了皇都的地位，一些郊区围绕着城墙发展，因此，于 1681 年建立了一座圆形的土墙。尽管其方圆著名地结合，这也许并无任何神奇或象征性意义。因为圆圈是对任何围合结构最为经济的解决方式。

城之西北耸立着建于 1044 年辽代的舍利塔（参见图 4.2.2.6）。那时就已经存有六世纪之久。

1– 皇殿；2– 寝宫；3– 鼓楼；4– 钟楼；5– 城隍庙；6– 府衙；7– 孔庙；8– 内阁；9– 县行政管理；10– 天坛；11– 大喇嘛白塔；12– 喇嘛庙；13– 北陵（皇太极）；14– 东陵（努尔哈赤）；15– 舍利塔；16– 浑河；17– 先农坛。内城 – 黑色区域；浅色阴影 – 明代城市

1 译者注：文殊智慧是佛教圣地最突出的佛教文化精华和最鲜明的人文标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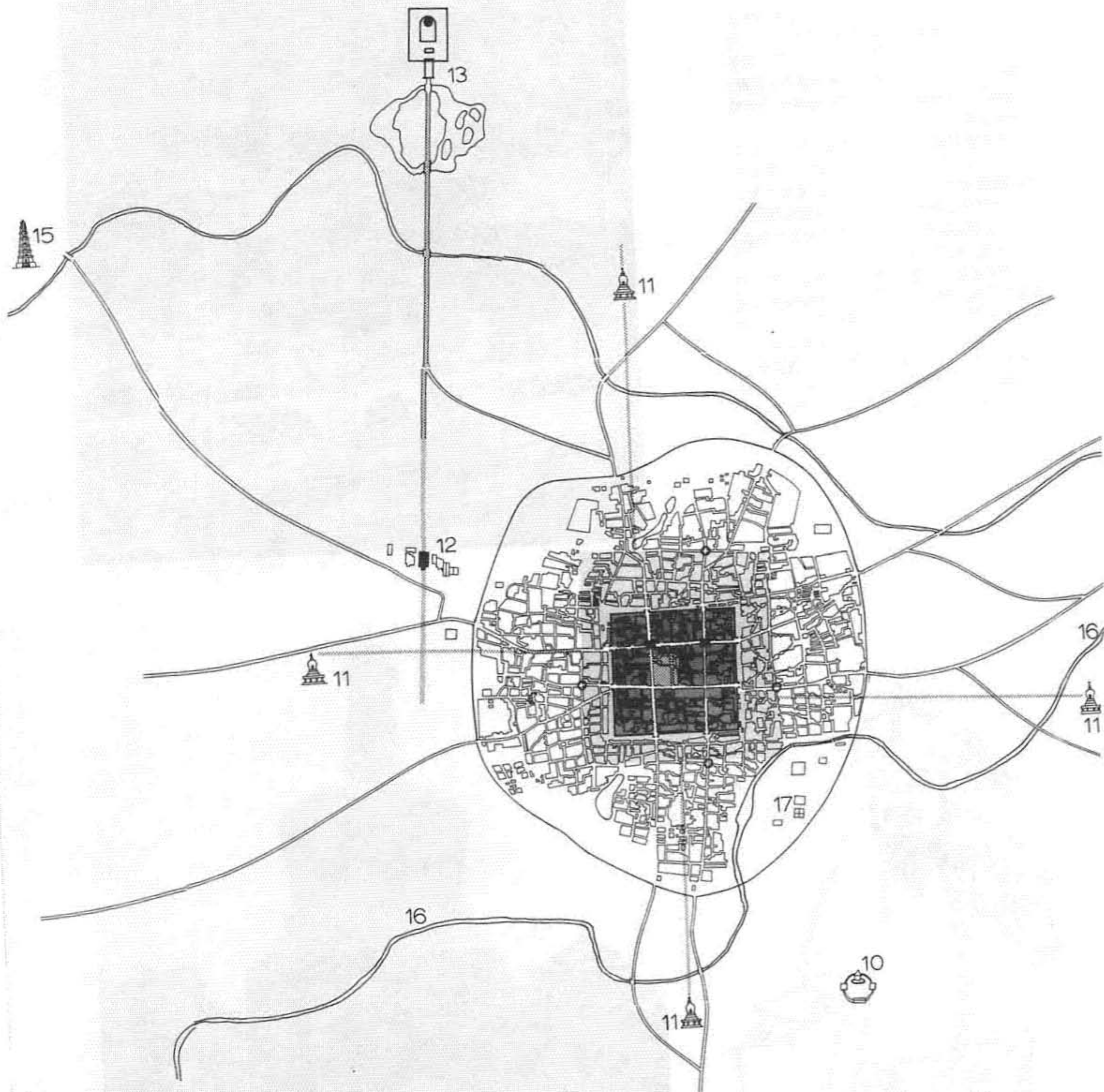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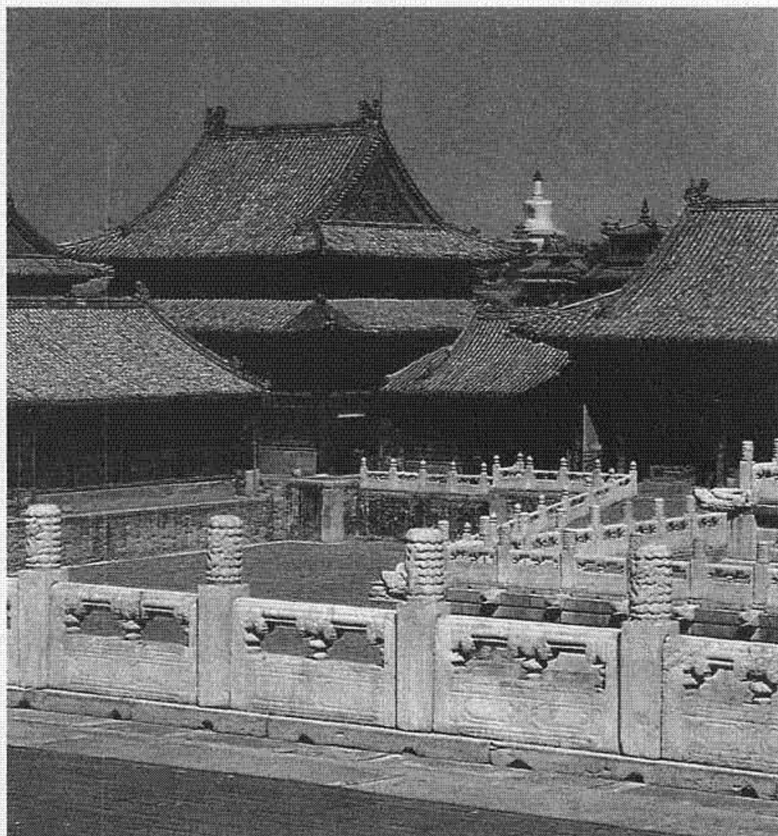

13
15
11
12
16
11
11
17
16
10
11

图 4.3.2.12　多尔衮，参见描绘他的木刻，reprinted in A.P.Favier, Beijing, Histoire et Description, Beijing, 1897, and Lille, 1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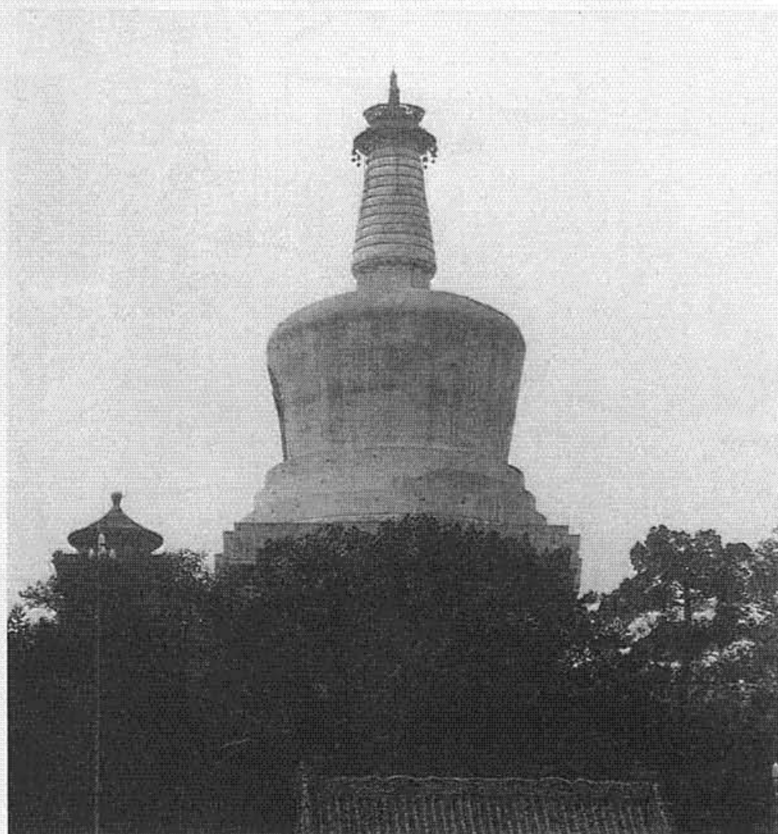
图 4.3.2.13，14　北京宫殿西边的北海琼华岛上的小白塔。清军在 1644 年太宗死后的几个月进入北京。在接下来的若干年里，太宗之弟多尔衮作为六岁皇帝的摄政王，重新建造了宫殿。原有的宫殿被反叛军领袖李自成在摧毁明代最后一位皇帝时，一把火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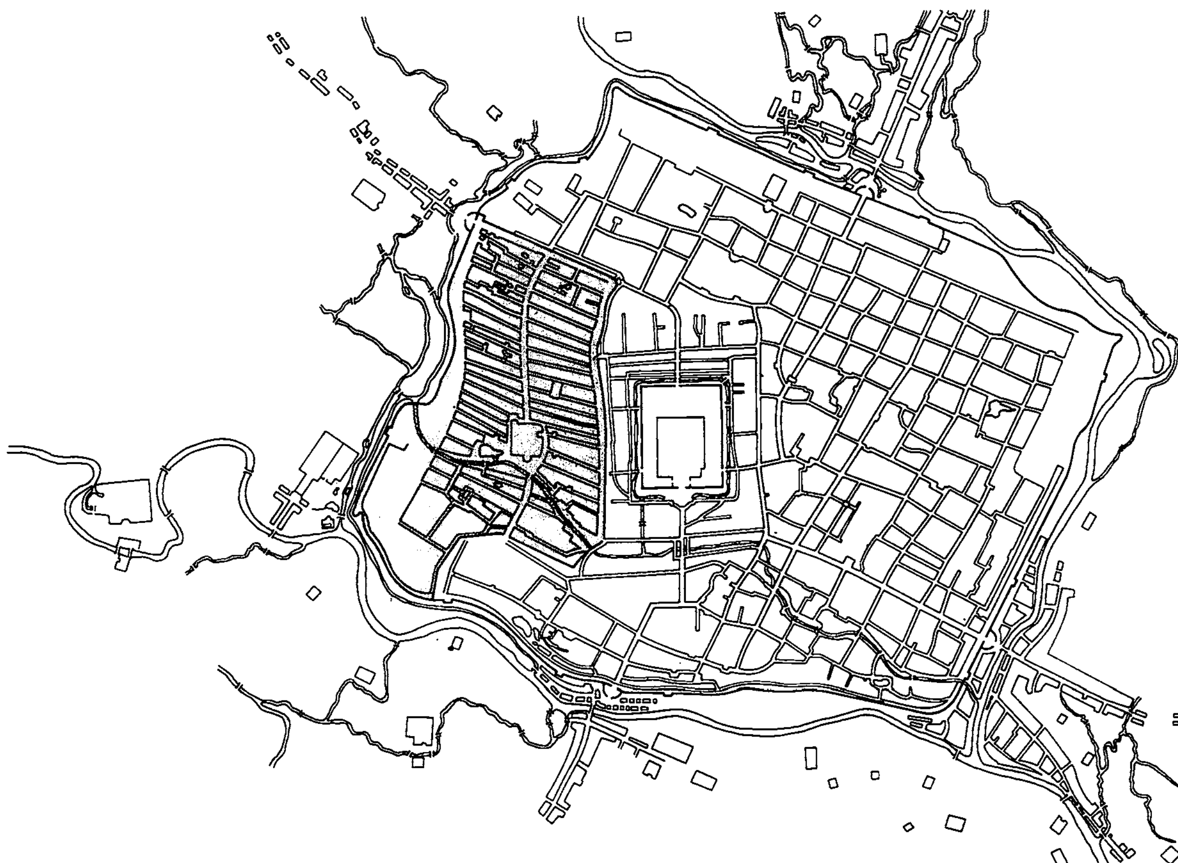
新朝代新建的第一座伟大建筑物就是琼华岛上的小白塔，高于北京的内城。当第五世达赖喇嘛（1617–1682 年）应年轻皇帝之邀于 1652 年到达北京时，白塔已经准备好接待来宾。它是忽必烈大汗的大白塔较为修正的版本，35.9 米高（参见图 4.2.4.5）。

建造这座白塔并非基于宗教考虑，甚至也不是为了忽必烈大汗。因为以达赖喇嘛为领袖的喇嘛教黄教，已强势发展且极具影响，远播蒙古草原直至西伯利亚。皇帝以达赖喇嘛访问清室为仪式，证实达赖喇嘛的地位。这种场合标志着一个惯例的形成，即每一位新任达赖喇嘛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确认，并以白塔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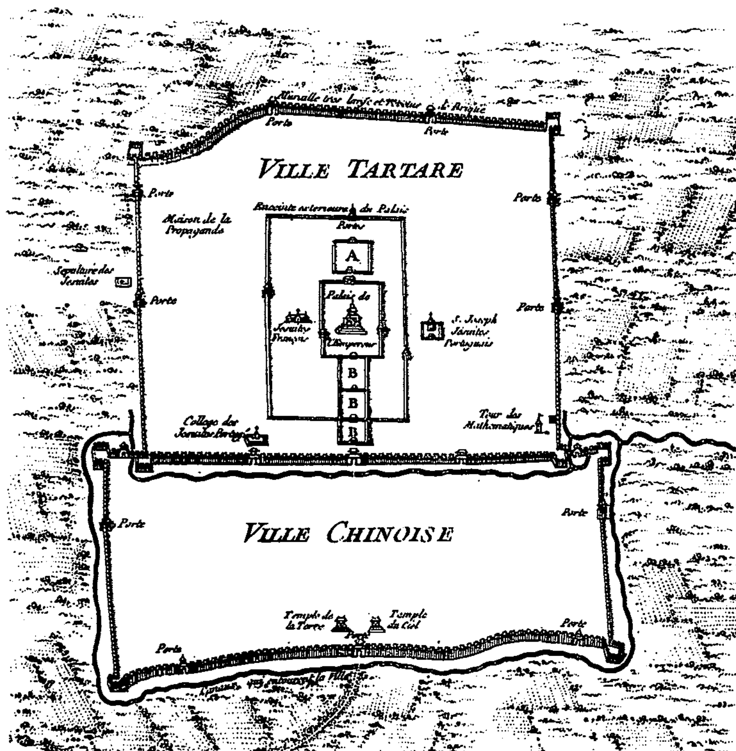


图 4.3.2.15—21 异族朝代的双城概念，在满族清代得到复兴

图 4.3.2.15 北京城里所谓的鞑靼城，参见 J.B.Du Halde，Pans，1735。

当满族军队 1644 年进入北京时，汉族居民已经被驱逐出内城，那里成了所谓的鞑靼城。围绕中心为宫殿的皇城，为八旗而形成了八大区域，大约 60000 多士兵及其家人住进从前（汉人）居民的家中。汉人仅仅允许居住在古老南郊所谓的汉人城中

图 4.3.2.16 四川成都的满族城市，比例 1：40000。

在各省产生了一个相同的概念。城的很多部分以新城墙与原来围墙围绕的区域隔开，从而为八旗子弟及其家人提供空间，还有为满族军官提供宫殿用地。以此方式，新的城区发展起来，街道的模式大多数是基于所谓的胡同，也就是已经大规模存在于北京内城的主要居住里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成都的满族城。

1718 年，城市的西部完全重建，并且加设了围墙。而遭受过毁灭的老城其余部分顺着可追溯到唐代的旧街道模式渐渐恢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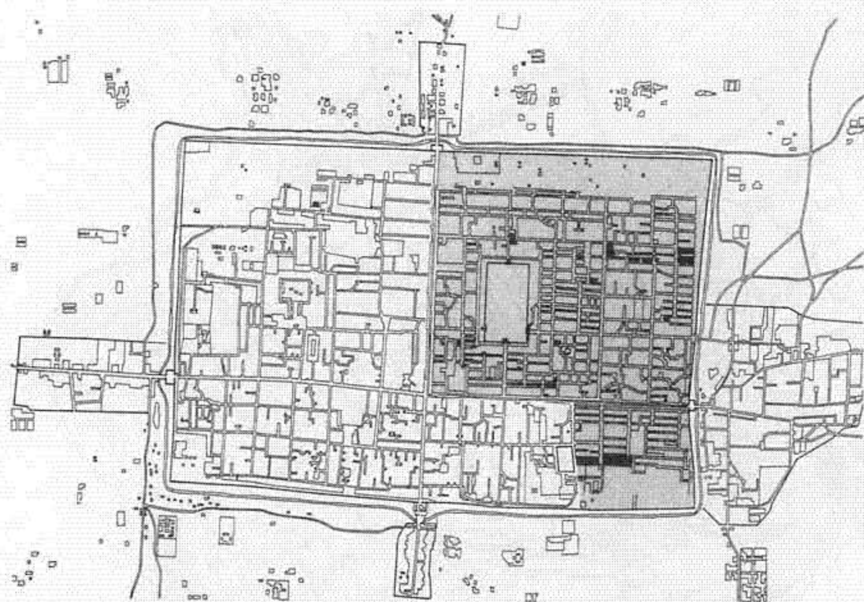


图 4.3.2.17 最大的满族城市建于陕西西安。那里明皇子从前的宫殿住着满族将领。一个新的街道模式强加于城市东部，比例 1 : 40000，在此，房屋建造给属于满族家庭的大约 20000 人

图 4.3.2.18–20 然而，省级的八旗城堡城市不仅建立于省会都城，如以上诸例所示，也建于那些较低等级别但具有特殊性质的城市。例如山东的沂都（参见图 4.3.1.30.No.1）、湖北的荆州，因为它们的历史声誉。江苏的镇江因其在长江和大运河上的战略位置。在几个实例之中，新的城堡不是在城内，而是在城外另择地段建立新城墙，并与城市保持一定的距离，例如沂都和甘肃的兰州

图 4.3.2.18 湖北的荆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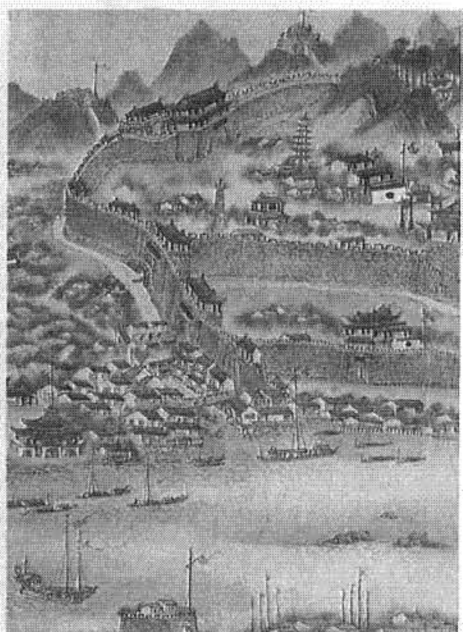
图 4.3.2.19 江苏的镇江，比例 1 : 4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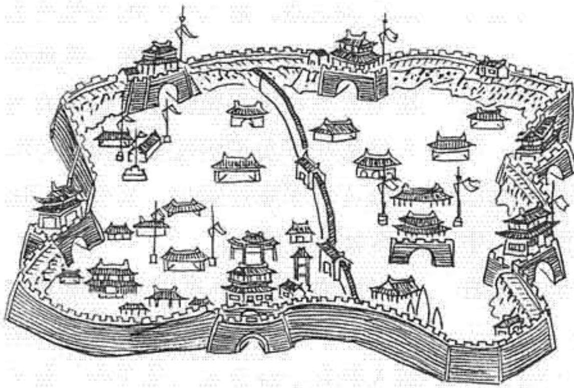
图 4.3.2.20 甘肃的兰州，比例 1 : 4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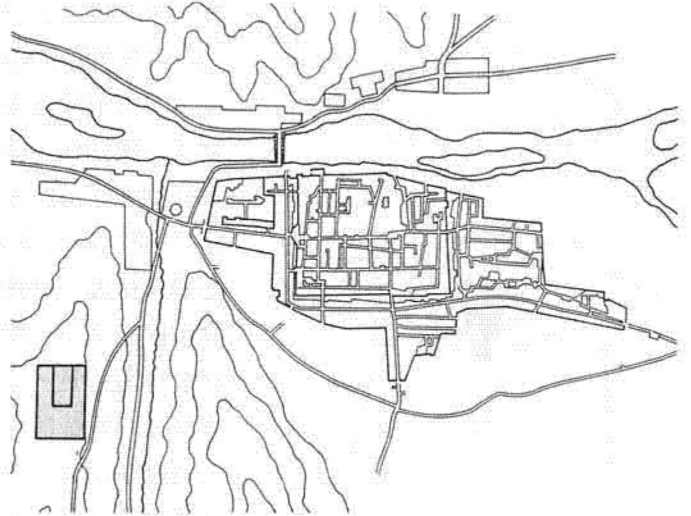
图 4.3.2.21 一幅卷轴画展现了 1743 年以前的广州。Courtesy of Kung l. Husgerdskammarers，斯德哥尔摩

跟北京一样，在广州，整个内城由满族驻军占据，仅仅将郊区留给汉人。相反，在杭州的满族城堡规模相对较小，以一座城墙将西湖附近相当小的区域与内城分离（参见图 4.1.2.9），这也是山西太原和福建福州的例子。在那里，围墙区域西南角留给了满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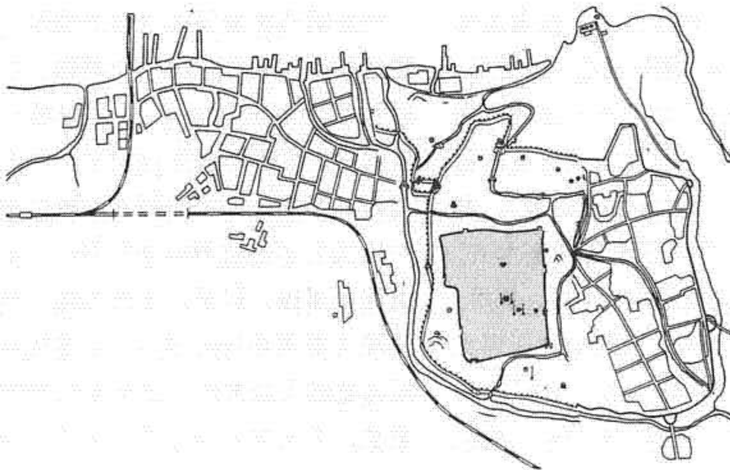








图 4.3.2.22 清代的第二位皇帝圣祖，以其统治的年号称为康熙（1661—1722 年在位）。他是第一位皇帝的第三个儿子，这第一位皇帝于 1661 年 24 岁的年纪离世。引自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绘画。
康熙 8 岁时登上皇帝宝座，统治了 61 年。在他长时间的统治期内，经过 17 世纪中期骚乱的几十年之后，他重建了经济和文化。在他六下江南的巡视中（1684 年、1689 年、1703 年、1705 年、1707 年），以其个人魅力与平和的性情赢得了人心和上层阶级的好感，因此，他被公认为中国最为杰出的皇帝之一

图 4.3.2.23 在热河（现今河北承德）的帝国御苑及其四周，比例 1 ：40000。
1— 宫殿；2— 城镇；3— 帝国苑囿；4— 武烈河；5— 湖；6— 烟雨堂；7— 延熏山馆；8— 南京塔的复制品；9— 藏书楼；10— 殊像寺；11— 普陀宗乘圣庙（布达拉宫）；12— 须弥福寿庙；13 普宁庙；14— 安远庙；15— 普乐庙；16— 普仁庙；17— 孔庙

图 4.3.2.24 金山，模仿江苏镇江的金山寺，康熙帝在 1684 年和 1707 年南巡时曾经到此游历

和军事基地。它们多位于刚刚战败的部落首领的权力中心附近。

打败卫拉特人之后，1735 年建立了一座新城，供蒙古人居住。所选择的地点与北方蒙古酋领阿勒坛汗（1507—1582 年）从前的权力中心非常接近，也就是现今的内蒙古自治区省会——呼和浩特。此地于 1581 年建立过一个要塞，当时，阿勒坛汗与明帝国和平相处，并且沿着当时中国的边境线建立了一个行政区划。后来，这一要塞四周发展成一个拥有一些寺院和一座大市场的开放式聚落。满族攻克该城之后，它被称做归化，即“回归文明”之意。城的东北，一座新城市被称为绥远，意为“遥远而和平之地”。准噶尔联盟的主要都城是乌鲁木齐。在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那里，维吾尔人统治着从南西伯利亚到北部西藏的广大区域。清军在 1757 和 1759 年打败了维吾尔人之后，他们于 1764 年建立了一座新城，位于乌鲁木齐河以外，旧维吾尔城镇的西北。旧城保留故称，新城叫做迪化，是“文明向前进化”的意思。

塔里木盆地由几个绿洲所围绕，那里有从盆地四周高山流下的溪水所滋养的聚落。它们至少从汉代开始就作为丝绸之路几条分路的驿站。但在其已知的历史中，那里一直住着中亚人而从未有汉人定居，并不断重复地创立过一些小王国。小城镇作为统治者们的居所发展起来，以一种与西亚和中亚文化紧密相关的风格建造，毫无汉文明的影响。然而，由于汉族人非常希望控制丝绸之路，每当他们的力量大到足以抵达这些地区，便在一些地段建立要塞和军事殖民地。已经有考古学家在罗布泊附近挖掘出其中的一所古代军事殖民地，其日期可远溯至公元 4 世纪。

清朝 1759 年攻克了塔里木盆地之后，绿洲小的聚落控制在霍加族人的几个分支族系的手中，其王侯般的住宅也就是由简单泥墙所围绕的小城镇。19 世纪初，当汉人在这里建立起完整的行政体系之后，一些小的边塞城镇在这些老城附近建造起来。并且形成一个原则，旧城被称为 Kunashar（意为旧城），新的汉人城镇被称为 Jangishar（意为新汉人城）。这些小的边塞城镇是一块边长不超过 600 米的方形，也由泥墙所围。但是，年代久远一些的汉人要塞和行政城市，如迪化和绥远是较大的方形，边长大约 1600 米长，予人深刻印象的夯土墙，四边有塔楼环绕的坚固城门。看上去，这些老墙体的度量体系与 3 里 ×3 里的方形有些相似，但是，没有迹象表明是否有人特意使它们与“神奇方形”的概念有任何关联。不管如何，简单的十字路只是典型的要塞街道模式，与“神数”或者诸如此类的概念无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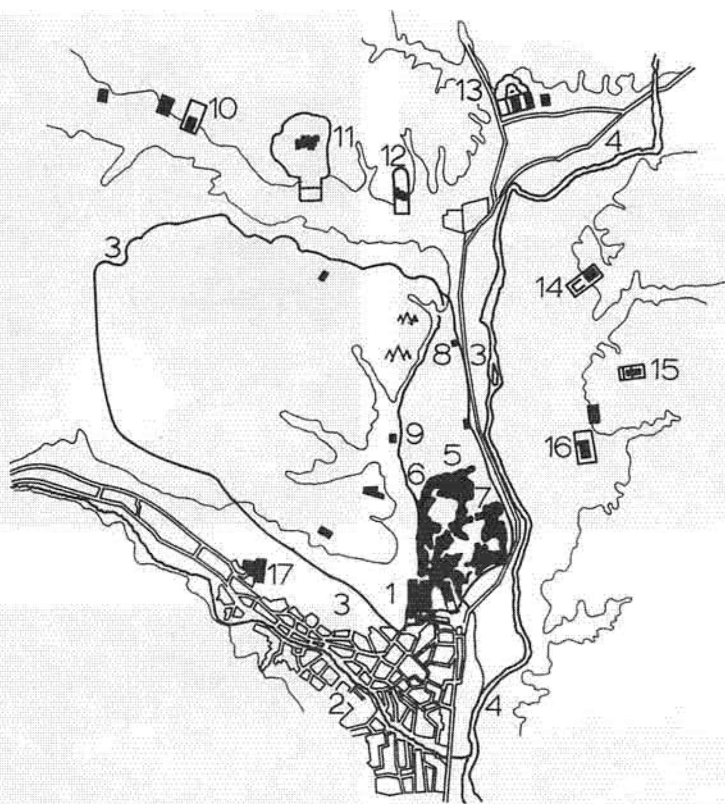
1751 年清军开始对西藏长年驻兵，保障并与所有那些采用喇嘛教为信仰的人达成联盟。然而，与所有其他事件形成对比的是，驻兵并没有激发任何城市化进程，也没有建立什么城镇和城市，甚至仅仅是要塞都没有。因为从来都没有汉人居民

图 4.3.2.25—35 热河，现今河北承德的避暑山庄。

1650 年，摄政王多尔衮写道："皇城非常古老，土壤因此受到污染，而水也是混浊的。春季、秋季和冬季气候宜人，但是夏季的炎热使人无精神。我知道在辽，金和元代的上都城市以及长城之外的其他地方是夏都，如果我们可以遵照这些例子在长城之外建造一座都城，人们将必须非常勤奋地并以极大的精力工作，因此我宁愿建一座小城，用作夏季居住之地。"

1677 年，康熙帝在热河以西近滦平的地方，建造了一座小的夏季避暑之地，而 1703 年在滦河河谷的热河，这个喀喇沁蒙古人的心脏地带，奠定了皇家宫殿和园林的基础。当建造工程在 1711 年完成之时，很明显，皇帝将他南巡所获得的江南印象调换到这个北部的山区里，产生一种犹如沙漠中的肥沃绿洲一般天堂般的景观。虽然皇帝欣赏这美丽的园林及其周围环境，但却是一种政治考虑引导康熙在这长城以北的边远区域兴建一座皇家园林。他将热河当作安抚政策的基地及长城外中华帝国的中心，在此他接受蒙古和西藏的臣民，并通过大量的皇家狩猎操练来显示他军队的技巧和纪律。乾隆皇帝（1735—1796 年在位），将其祖父作为多方面效仿之榜样，继续实施这一政策，并且说道："我的祖父建立了这一避暑山庄，作为安抚边区人民的一部分……如果我仅仅欣赏并陶醉到这美景之中，我就会落入陷阱，并忘记从我的祖先那里继承了什么。"他将这一政策延伸到宗教领域，并且运用黄教来继续发展这一政策，通过支持僧侣寺院，而使得长城在此时也变得可有可无了。因为，黄教吸收了蒙古族和藏族男性大约三分之二的人数，并且让他们从事宗教仪式活动，而非战争。为了这一目的，以及为了在清朝的避暑山庄兴建一个新的仪式中心，他不惜代价，在热河建造了很多的喇嘛寺院，模仿藏式建筑，例如模仿西藏最为神圣的中心拉萨布达拉宫的安远庙，以及在新疆伊犁河边的固尔扎庙围绕宫苑而建。

普宁寺，既以中国式又以西藏式来建造，作为两者之间密切关系的表达，并且用作为镇压准噶尔叛乱的纪念性建筑。当时准噶尔已经蹂躏了新疆的广大区域，甚至曾经一度控制了西藏的拉萨。这座寺院的大殿 37 米高，并且包含了一座观音雕像，它是由一根单独的大树干所刻成的。虽然皇帝扮演了一个狂热佛教徒的角色，并且支持喇嘛教，可是，发现于山庄中一处幽静且很少人能到达的地方的石碑篆刻文字中，表明了皇帝的真实用意："我们的后代应该知道，我已遵循了祖先的勇武之气，并且对于我的职责已经尽力尽责。但是，佛教的普及并非是我最高的目标……深藏我心的秘密无法明说公之于众，并世代铭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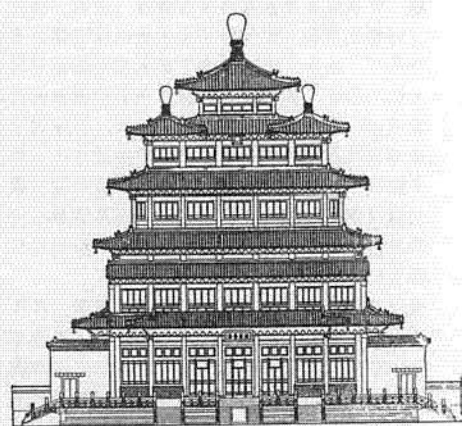

澹泊敬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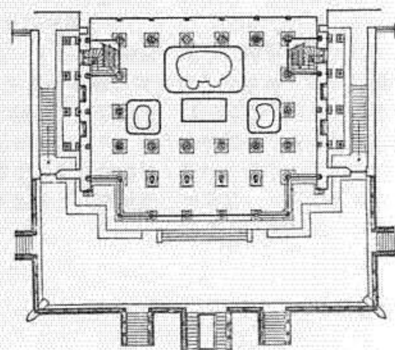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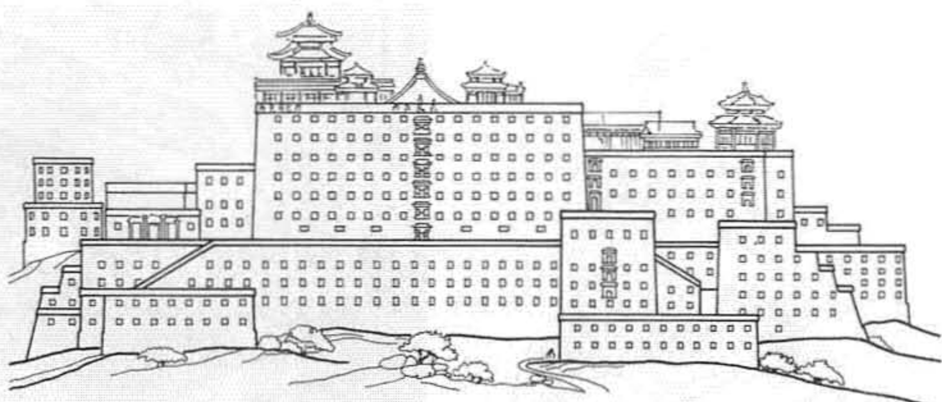
图 4.3.2.25　烟雨楼，模仿浙江嘉兴南湖中的亭子建造，1780 年由乾隆倡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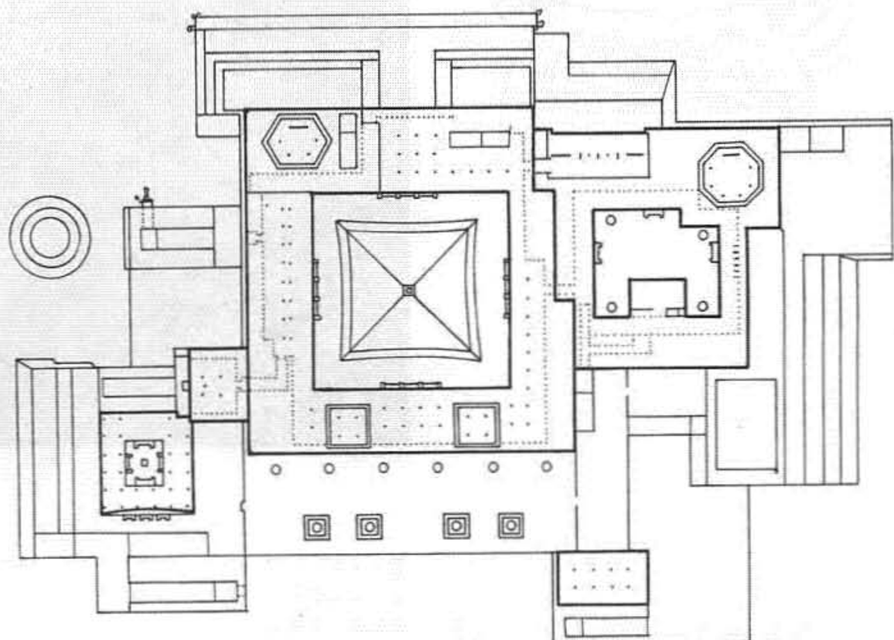
图 4.3.2.26　初建于 1710 年，复建于 1754 年檀香殿中的皇帝宝座

图 4.3.2.27，28　须弥福寿庙的两个景观，为 1780 年六世班禅喇嘛的到访而建，以西藏的扎什伦布寺为原型而兴建，屋顶覆盖着铜瓦，并鎏金 1500 千克

图 4.3.2.29–32　建于 1755 年的普宁寺，内置观音像，平面比例 1 ：600

图 4.3.2.33–35　普陀宗乘庙，1766 ~ 1771 年建造，模仿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建造，平面比例 1 ：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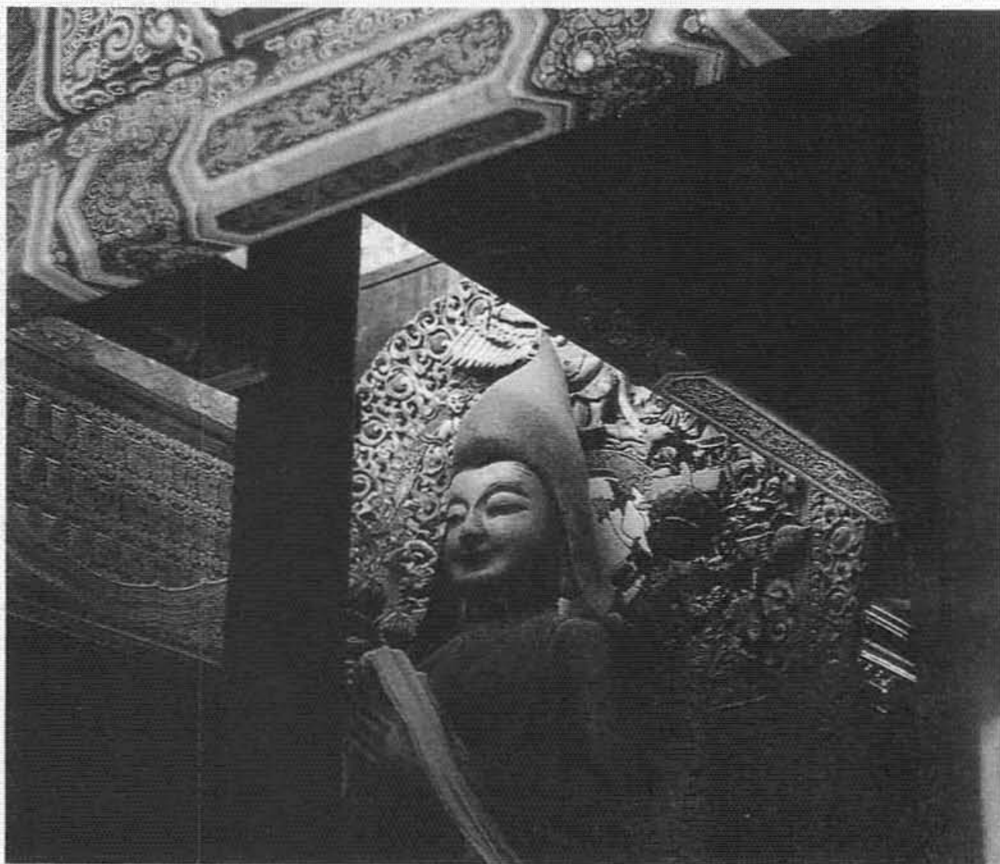




图 4.3.2.36　在一幅大约 1760 年的唐卡图绘上，乾隆皇帝被表现为一位喇嘛。
他坐在一张镶嵌钻石的座位上，他的右手显示出教导的姿态，而左手持着轮子，是法律和尘世力量的象征，绘画中的其他象征符号，暗示了皇帝是文殊菩萨——智慧佛的化身，据说，满族之名便由此而来。在此，5 世纪时北魏皇帝古老转世化身的概念（参见图 3.3.2.1），也许再次在 18 世纪由另一位外族皇帝重新拾起。
与喇嘛教更为政治化的联系，由其他的象征符号所暗示并在图绘中有所刻画。这里，皇帝的形象看上去酷似著名的章嘉呼图克图国师活佛，三世章嘉·若必多吉（1717–1786 年），他当时是黄教的头领，乾隆时期居于北京，是在皇帝与其西藏和蒙古臣民之间重要的联系人

图 4.3.2.37　青海塔尔寺（塔儿寺）。
喇嘛教的塔儿寺是于大约 1560 年兴建的，并得到了阿勒坛汗支持，他利用黄教的组织才能，在整个蒙古建立了他的管辖区域。塔儿寺是中国和蒙古之间最为重要贸易路线上的中心，并且迅速成为了最受敬仰的中国和蒙古的朝圣地。其财富使得僧人们能够施加最为基本的政治影响，并且引起了政治领袖人物的敌视，其中一位在 17 世纪将 8 位僧人处死，为了纪念这 8 位僧人，建造了 8 座塔。图中最近处的这座塔是一种类型——“佛进入涅槃之境（Entrance of Buddhain to Nirvana）”，它也是北京白塔的原型

图 4.3.2.38　喇嘛教改革者和黄教的建立者宗喀巴（1357–1419 年）在北京雍和宫喇嘛庙中的塑像。
北京的喇嘛庙原来是康熙皇帝四子的宫殿，他后来成为了雍正皇帝（1722–1735 年在位）。宫殿在 1694 年建于宫城外内城的东北角。乾隆皇帝 1711 年在此出生，作为四皇子，而其出生地在 1745 年当他登上皇位 10 年以后被转变成为喇嘛庙，遵照着古老的习俗，即前任皇帝的内宫不能被任何其他人用为私人住所。
宗喀巴生于今天的青海省，在那里，著名的喇嘛寺塔儿寺（Kumburn）在大约 1560 年围绕着他的塔被兴建起来。他的改革基于严格的宗规和组织，但是到他 1419 年死于拉萨之时，在那里已经兴建了最重要的喇嘛寺庙。在 16 世纪，蒙古领袖阿勒坛汉（1507–1582 年）利用黄教在蒙古建立了他的版图，并随之有大约 1000 座寺庙在整个蒙古兴建起来，作为宗教和行政中心，受到黄教组织的支持。以此，喇嘛教寺院已成为了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试图定居到西藏高原。

清代的第三个阶段，19 世纪的城市化进程有两种：第一种，作为行政中心，并结合一些军事和商业功能的"原汁"汉人城市的建立；另一种是乡村市场和市场城镇的建立，其中多数没有任何古典意义上的行政功能。市场街道，正如汉语的称谓，是乡村商业化的产物，某种程度上，特别在中国南方，从南宋就已经开始了，并贯穿明代持续发展。终于到了 19 世纪，它获得了日益增长的力量，并为增长的人口提供了生计。在台湾，作为 17 世纪的海岸港口城镇，早已经发展了这些市场街道，它们是第一批中国汉人聚落。因为最初没有清朝官僚的行政管理人员，岛屿的开发化由这些聚落开始。稍后，行政城市在岛内陆地处建立，而不在港口城镇。这构成了城市化进程的第二次浪潮。然而，作为乡村经济的一部分，绝大多数市场城镇在适宜地段的村庄之间发展，几乎 95%的这些城镇的居民不足 2000 人。

那些聚合着巨大贸易路线的地方，特别有些地方，贸易商品必须从较大的船只转运到较小的船只，或者从船转往运货马车，所谓的非行政管理城市从这些市场城镇中发展出来。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汉水和长江集合处的汉口，即现今的武汉。其聚落模式是这类商业城市的典型。一条与河流平行的市场街道，通过许多小巷道与沿着河岸的着陆地相连，是一种或许可称为"梳式"系统的街道体系。在几个实例中，这些地方由墙体所围，行政管理城市倾向于尽可能少在墙体上开门。门也非常狭窄。而这些非行政管理的商业城市有很多宽广的城门，特别沿着河岸，它们一个挨着一个，提供抵达小巷道的入口，从而可以通过巷道进到市场街道。在一些地方，非行政城市在行政中心城附近发展，就像郊区或在河的对岸，形成城市集群聚落。这就是湖北省武汉市所发生的事情，是从三座城市所形成的集群发展而来的两座行政城市（武昌和汉阳）和一个商业中心（汉口的老中国城）。1844–1846 年有目击者描述如下："我们花费了一个多小时越过汉阳的长街……（武昌也是），一座巨大的城镇，一座辽阔的城市，大批巨大的帆船和惊人数目的船只停舶于抛锚地段，这是帝国主要的商业地带之一，最后另一个较大的城镇叫做汉口，位于一条河的汇流处，这几乎将自己抛进这座省会城墙之下的扬子江中。这三座城镇，以一个三角形的方式排列，彼此相见。而仅仅由河流分隔，形成一种心脏。从这里，中国庞大的商业活动循环运送到帝国的所有部分。那些永无休止来来往往的众多船只将它们如此密切地相连，使它们几乎可说形成了一个……特别是汉口，商业市场之口。一定要到此一游，因为它是一个巨大的商店……在城中的各个部分你会见到云集的游客，他们经常完全挤在一起，因此，你非常难穿过他们……。商店挤满了做买卖的人，工厂里有大量的工人和匠人……汉口的大港口在文学



图 4.3.2.39 乾隆皇帝（1736–1795 年在位），是中国皇帝宝座上的第四位满族皇帝，其本名为爱新觉罗 · 弘历，谥号高宗。模自耶稣会士潘廷章（Giuseppe Panzi）所绘的肖像画，并于 1776 年由马提内蒂（Martinet）在巴黎镌刻。

图 4.3.2.40 北京以东大约 125 公里遵化县清东陵乾隆皇帝的陵墓。乾隆皇帝 1795 年从皇帝宝座退位，4 年后以 89 岁高龄仙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长寿的帝王之一。他葬于裕陵，带有地下宫殿的陵墓在由一组轴线组成的建筑物的端头，其中，葬仪大殿设计得像一座宫殿，仅仅比宫殿稍小（参见图 4.3.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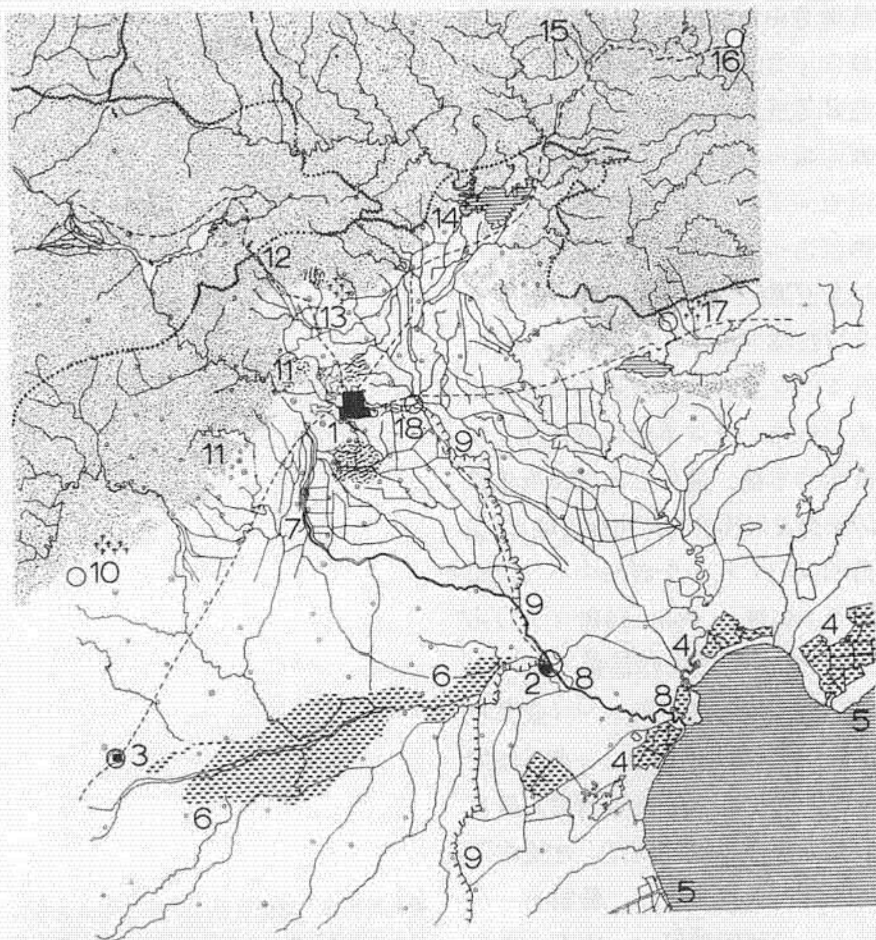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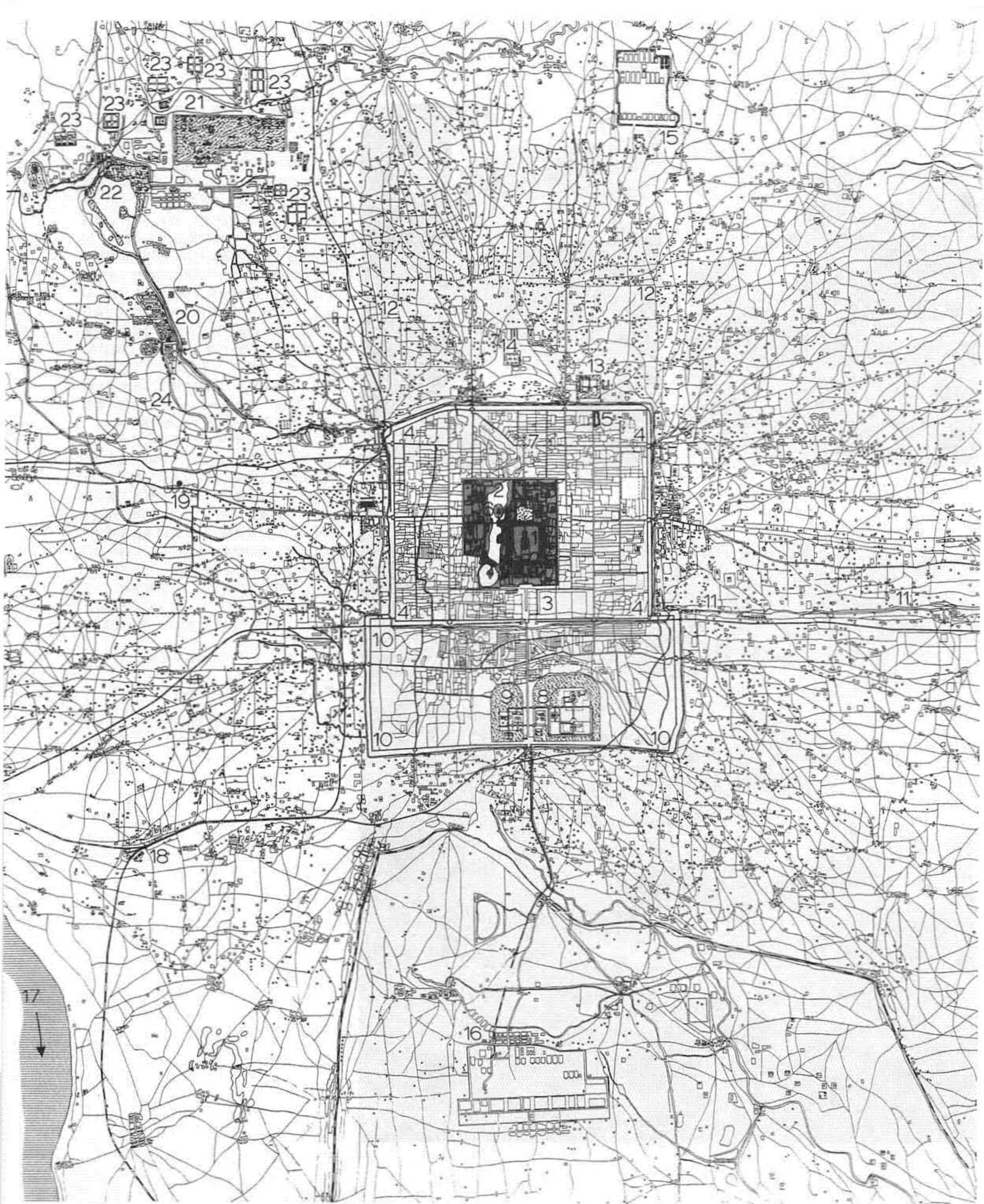
图 4.3.2.41 · 河北省北部围绕北京的区域，比例 1 ：2000000，参见现代地图。
1— 北京，都城；2— 天津，口岸；3— 保定府，清代直隶（今河北）的府城；4— 盐田；5— 渤海的北部湾；6— 白洋淀；7— 永定河；8— 海河；9— 大运河；10— 易县和清代西陵；11— 北京西部的西山；12— 近八达岭的长城；13— 明代的陵墓；14— 密云水库；15— 滦平；16— 承德（热河），直到 1861 年，都用作清代皇帝们的夏季避暑胜地；17— 遵化和清代东陵，有顺治皇帝（1643—1661 年在位），康熙皇帝（1661—1722 年在位），乾隆皇帝（1736—1795 年在位），咸丰皇帝（1851—1861 年在位），同治皇帝（1851—1861 年在位）以及慈禧太后（1861—1908 年控制王权）的陵墓；18— 通县，带有大仓库的大运河北部尽端

图 4.3.2.42 都城北京和其环境，比例 1 ：100000[1]。
1— 皇宫；2— 宫城；3— 使馆区；4— 内城，现为满族八旗家庭的鞑靼城；5— 喇嘛寺；6— 小白塔；7— 钟鼓楼；8— 天坛；9— 先农坛；10— 汉人城；11— 到通县大运河的分支；12— 元大都旧城墙；13— 地坛；14— 黄庙；15— 北营；16— 南营；17— 永定河；18— 丰台市场城；19— 八里庄塔；20— 蓝靛厂及满族旗营；21— 圆明园夏宫（已毁）；22— 万寿山，慈禧的夏宫和昆明湖，在它的西面是玉泉山公园；23— 用于皇家卫士的满族旗营；24— 金水河。

注意朝向城墙具有日益增长密度的聚落模式，围绕南营的南部是传说中的白洋淀

---

1 参见由 Koniglich PreuBische Landesaufnahme1907 年绘制的地图和由 G.Buillard1923 年绘制的地图。



23
23
23
23
23
21
15
22
23
12
12
20
14
13
24
5
4
7
4
19
2
6
3
4
4
11
11
10
9
8
10
10
18
17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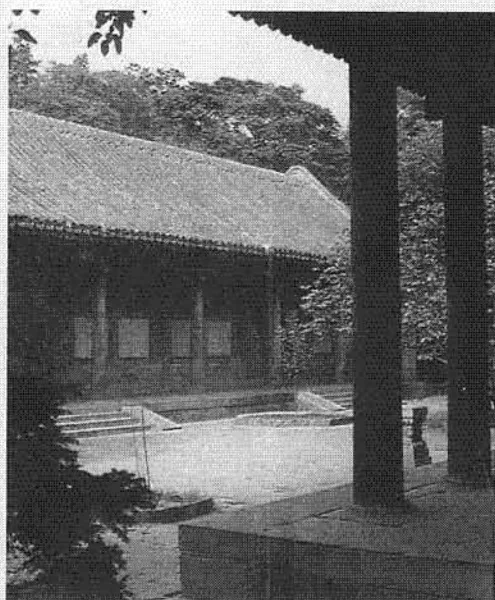




图 4.3.2.43–45　万寿山，颐和园。
在明代北京城西北大约 12 公里，围绕着玉泉山，一组公园和宫殿从 12 世纪发展，直到 1911 年帝国覆灭。玉泉山的清泉形成了湖泊，而在 1150 年和 1161 年间，宫殿建造用作帝国宫廷皇室之夏季避暑之地。清代雍正皇帝（1722–1735 年在位），乾隆皇帝的父亲，开始了一个扩展项目，其渐渐在这一区域发展出 28 座公园。在 18 世纪，这些区域占地大约 800 公顷。其中，今日仅有万寿山和昆明湖的颐和园留存下来。大多数其他园子在 19 世纪下半叶被毁。它们一般代表了清后来一些皇帝们，特别是乾隆的奢侈品位。几乎所有类型的 2000 多座建筑物沿湖绕山而建，大约由 150 座建筑成组形成，具有园林、池塘、亭子和假山。为了炫耀他的天才并以其所受文学教育感染人民，乾隆皇帝喜欢不但在他的花园里，而且在每一处他所到之地，题刻长诗，而这些大多镌刻在相应地方的石碑上。
一切都是人工安排的，而没有什么是留给自然或是事物本身的。慈禧太后在 1860 年颐和园被毁之后修复这座园子时，遵循着这些先例。而在万寿山上的主要宫殿，好像是某种宗教意义上的庙宇般建筑和宫殿般建筑，由廊子和踏步连接在一起的混合物。许多细部模自著名的南方风景区，例如湖堤和莲步，以及驼峰一样的弯拱桥（来自杭州西湖的苏堤）。在玉泉山上的塔，以南京的大塔为原型，具有琉璃砖，在颐和园风景中占主导地位。慈禧太后习惯于在此过夏六个月，并在湖北岸她的内宫里处理国事

图 4.3.2.43　万寿山的庙宇兼宫殿

图 4.3.2.44　慈禧太后的内寝宫

图 4.3.2.45　湖中的石舫：在背景中是带有桥的堤坝

图 4.3.2.46–53　大约从 1600 – 1850 年台湾岛上的城市和城镇。

汉人在 17 世纪初，开始大批移居台湾岛，得益于明代海防重新获得对于台湾海峡的控制权之后，因为在 16 世纪，台湾岛已经被海盗所控制，他们利用这座岛屿作为藏身之地。可以明显看出，有三股移民浪潮，并且从汉人聚居者的分布情况中可以辩别出来。第一股移民浪潮主要来自福建沿海的泉州，大都是商人、贸易者以及土地开发者，他们沿海兴建了口岸，作为与台湾本地居民进行贸易的基地，而这些台湾原住民，有马来亚人血统

图 4.3.2.46、47　台湾鹿港，口岸和市镇

图 4.3.2.46　台湾鹿港，比例 1 ： 10000，参见 20 世纪的地图。

1– 陆地；2– 带有鱼塘的渔村；3– （后来增加的）衙署；4– 孔庙；5– 妈祖庙；6– 佛寺鹿港，坐落在岛屿中部，曾经是岛屿的第一口岸。在一条小河口，选择了着陆之地，这位于濯水溪三角洲的一条分支处，而市街与河岸平行发展，从北向南，逐渐延伸大约 1800 米。在北边增加了一座小渔村，而在清代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大约有 15000 多居民定居于此口岸和市场中心。泉州商人和土地发展者非常迅速地将移民控制在他们手中，并组织传送来自福建沿海的移民。第二股浪潮主要来自漳州和厦门一带，这些人只好生活在内陆地区，他们不得不将原住民赶进更内陆地区，开垦处女地

图 4.3.2.47　城镇的鸟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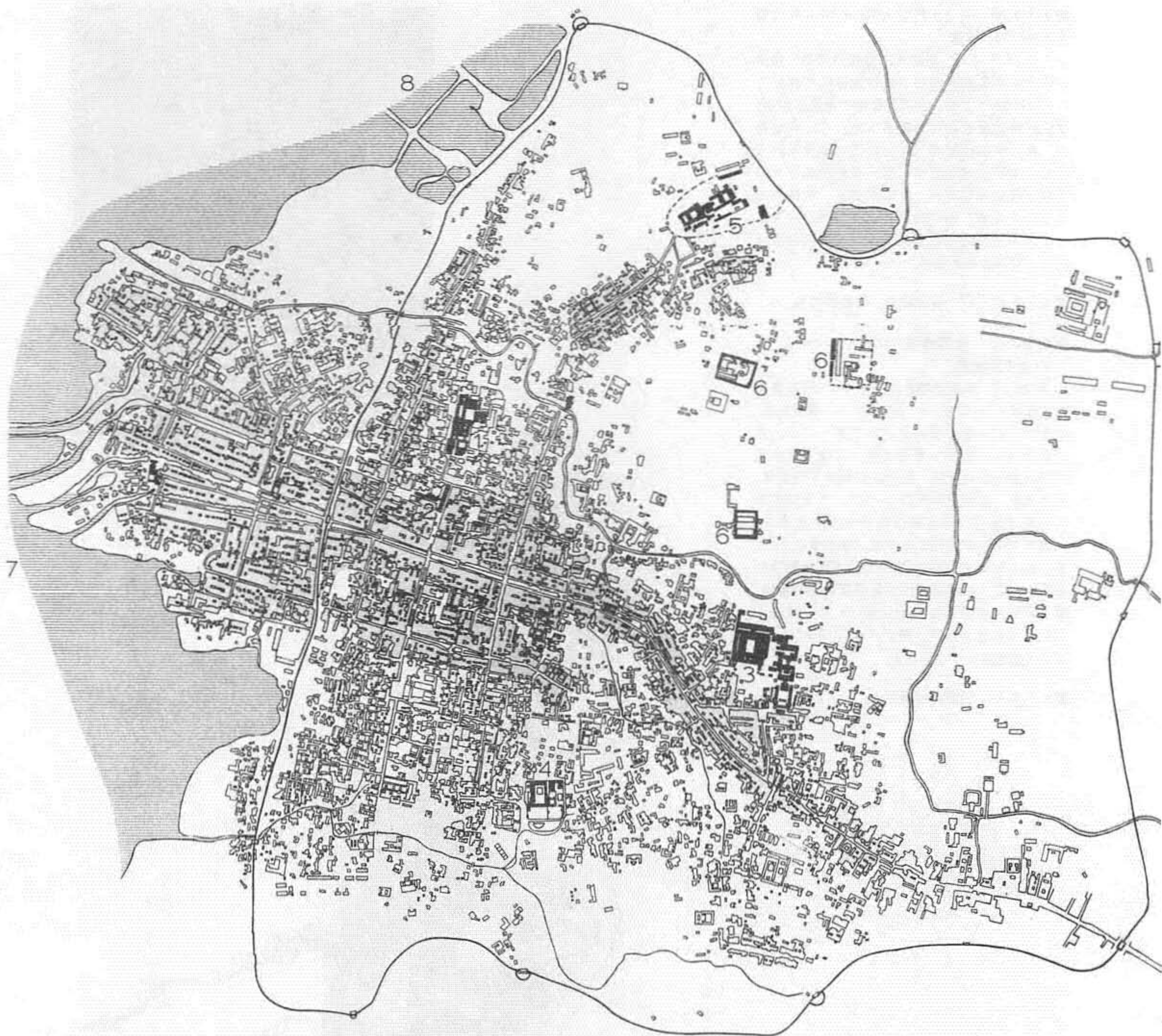

8
5
6
6
1
2
7
3
4

图 4.3.2.48 台湾，台南城，比例 1 : 10000，参见 20 世纪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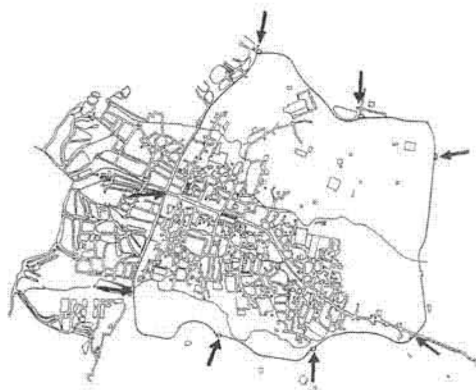
1– 荷兰人的城堡，后来成为当地行政机构；2– 关帝庙和妈祖庙；3– 府衙办公室和城隍庙；4– 孔庙；5– 军事指挥官；6– 军事设施；7– 带有陆地的口岸；8– 渔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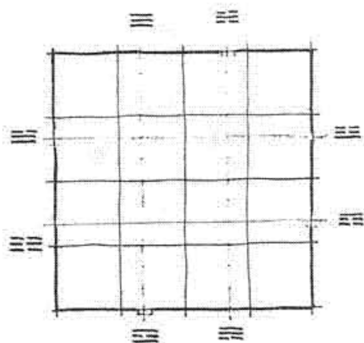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岛屿的南部兴建了一座殖民地，与东亚扩展的贸易关系保护联系，大约在 1640 年和 1642 年之间，他们兴建了小城堡，而且他们也将汉人移民掌控在手中。1647 年当清军攻克了南部的沿海地带之后，这一移民行动加速得非常迅速，而台南城市在荷兰哨卡监视之下发展起来，作为从港口到内陆几个市街的一个复合体，并且形成了荷兰殖民地的市场中心。在十几年里，汉人人口增加到大约 25000 户，有 100000 人。在有大约 600 名荷兰官和使节，以及大约 2300 名荷兰士兵在殖民地一同生活。然而，1661 年，汉人的规则建立起来，当时，明代大将郑成功攻克了荷兰的城堡；1683 年，又由清朝政府重新建置管辖。到 1722 年，清康熙皇帝驾鹤西去时，这座岛屿也许已经容纳了超过 50 万的汉人人口，清代管理机构的建立使其有必要兴建行政管理中心，而这个府衙的首批衙门建筑，是以围桩和竹篱环绕着的。它们坐落在战略据点，并且处在更向内陆的路线上，将口岸留给自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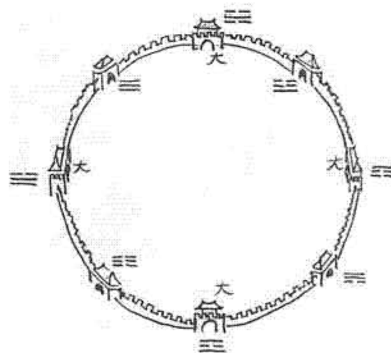
图 4.3.2.49，50 台南城，细部图像

图 4.3.2.51 1722 年，台南府城（今天的台南）由围桩所加固，经过了一个聚落化过程，与经济的发展和军事力量相联系，这已经持续了大约一个世纪。1733 年，在这第一堡垒上，增加了竹篱笆，其布局主要依照地形特征。随着 1788–1791 年间一座石墙的建造，依照竹篱笆的布局模式，这座城市最终获得了一座府城的典型汉民居结构及外观，一座道台、一座 2 – 3 层的行政中心（参见图 5.3.1）。在原来七座门的基础上，又加了第八座门。而从这八座门的名字来看，很有可能得到某些关于仪式结论的概念，用于府城（或用于仪典体系，参见 5.6.1）。这一仪式概念，现在被附加在一个经济的发展过程这样一个结果上，这一过程基于一种功能性的原则上，已经持续了大约两个世纪。

这八座城门的名字很明显地被选择出来，因此，其特征尽可能地与八卦的特征相像，还被风水师和巫师术士所广泛使用，以抵御邪恶之强烈诱惑(参见图 5.7.1.5)。八卦是古代易经的基础，然而也被儒家和佛家所接受(参见图 4.2.2.16)。一个详细的分析，表现出文王八卦的使用，这是八卦的一种特殊安排，其概念很好地适应于坐落位置的特征，即 "兑" 在西边，代表沼泽或海，而 "艮" 在东北，代表山（参见图 4.1.9）。有两种特征门的名字，带有第二重意思，然而 "兑门"，在此用作 "满足商贸" 的口岸之门意，而 "艮门"，意指 "回归平静"（在四年的反叛之后）。此外，城墙的整个长度大概 16 里，基于 31.9 厘米的旧度量体系。这与一个 4 里 ×4 里的方形相对应，是一个阴数的划分，并且对于一个采用阴数（16 里的方形）的城市来说是适宜的规模。然而八座城门，根据幻方的概念，暗示了城市有九次划分。因此，两者的结合完美地表现为较大尺度的古代 "圣田"，带有以阴数所赋予的空间，以及以阳数进行的划分（参见图 2.3.2.1 和图 5.3.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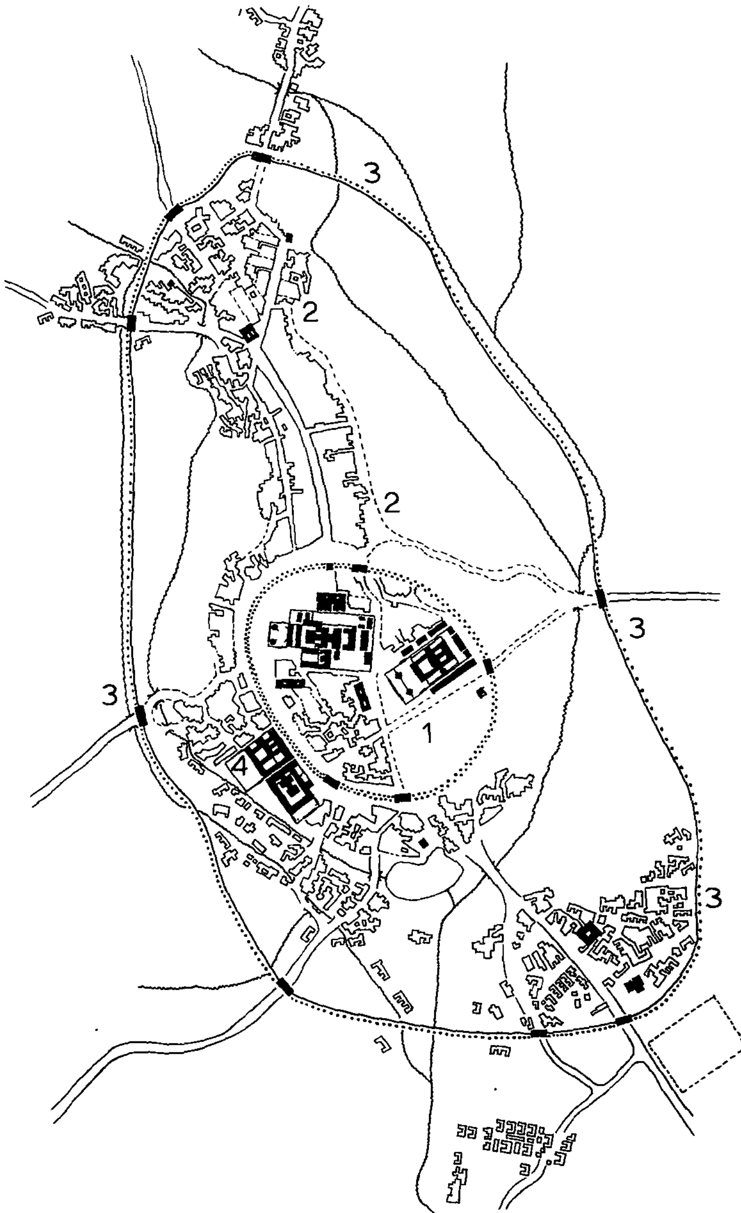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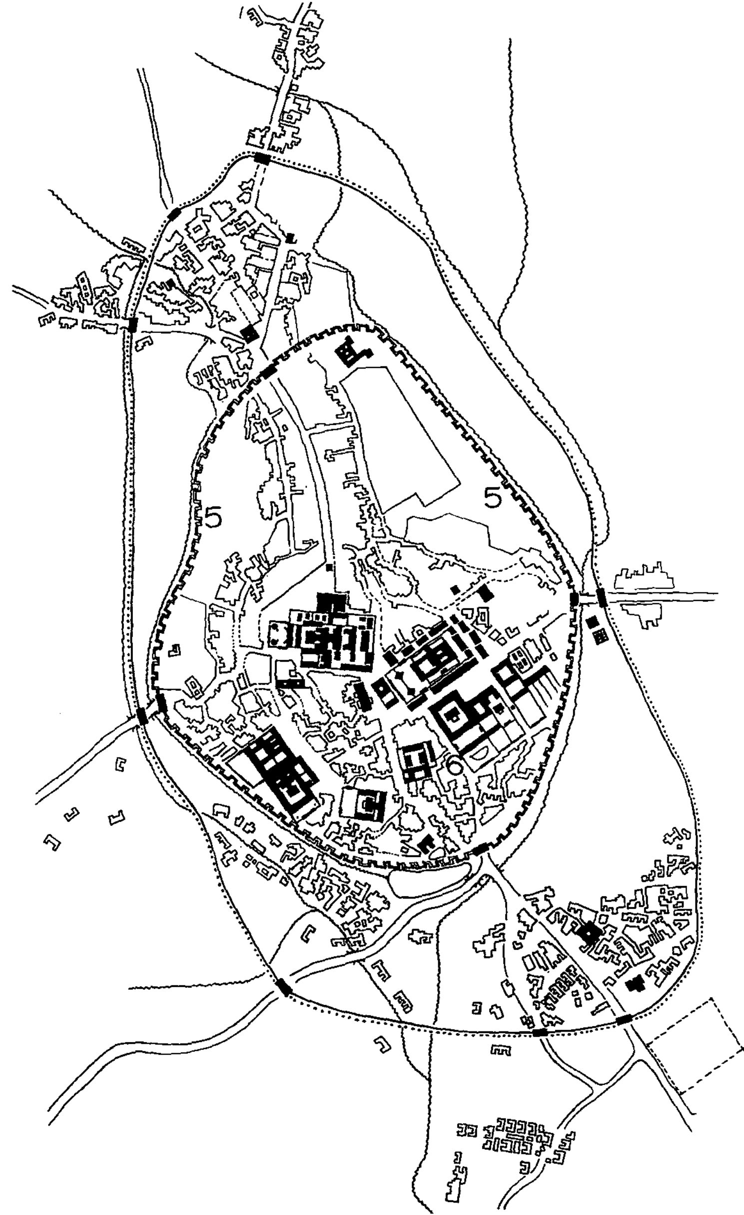









3
2
2
3
3
1
4
3


5
5

意义上是一个桅杆云集之地。在中国的中部看到如此规模巨大和惊人数量的船只很是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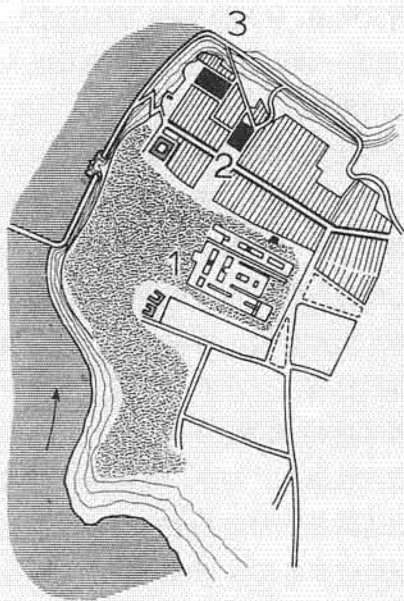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巨大的人口增长孕育了商业和工业企业化发展，反过来，这些发展提供了新的收益和从属性就业机会。以这种方式，吸收了相当一部分的剩余人口。当然，大多数是处于一个边缘的物质层面，这一进程相当程度地改变了聚落结构。鉴于几乎所有的行政管理城市都需要郊区（这有时甚至表现在多个阶段），非行政管理城市、市场城镇以及市场街道丰富了乡村聚落结构，吸收了来自村庄的额外人口，增加了相应地区的人口密度。这一过程在上海的郊区已经详细地调查研究出来。这里，正如前文所见，上海的行政城市已经于明代沿着河岸加设到一个比较古老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港口市场。但是，现在，上海的市区已经拥有一定的市场城镇和市场街道，数量从1600年的不到10个，增长到1870年的超过60个，并且集中在一块人口相当密集的区域，那里，人们不是生活在大型村庄而是众多的小村子里，沿着平坦乡村的运输线路运河发展。这种情况反应在斐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Baron Richthofen) 1870年所做的观察："最小的村子也具有城市的气氛，街道两边，房屋成行成排紧密地建造。甚至在村子里，也有商店、茶室、小吃摊位等等。简言之，每个小村子就像是从城市切下来的一小块碎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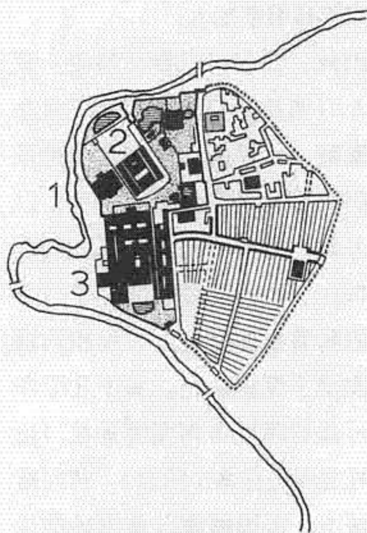
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在一个极度混乱和反叛时期走到了尽头，如前文所述，有大约9000万居民流失。1850～1880年间，大致有6次大型的叛乱，每一次都持续15年之久。这些叛乱动摇了帝国的基石，并且使好多个省份沦为荒凉之地。斐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写道："我已经提到的城市（在浙江和安徽南部）大部分是一堆堆废墟，每座城市只住有几百户人家，每一座城市都遭到13年前太平天国起义带来的毁灭性破坏。如今，连接街区城市的道路是狭窄的小路，很多地方完全是过度生长着15英尺高的杂草或灌木，让人难以行走其间……我曾经在这些不同的地方调查那些逃出太平反叛军之手而幸免一死的人口百分比，大致是百分之三的比例……大多数人在他们藏身的山中死于饥荒，但是，被太平军所杀的男女和儿童依然非常之多。"额尔金1860年察看南京时说："从我们所处的比较高的地方，可以俯视到一大片由城墙所围绕的宽阔区域，那里到处是废墟……镇江的人口从前估计为大约500000，现在，它真的只有大约500个灵魂。"中国南方五省的人口损失上升到大约6700万。考虑到几乎所有的市场城镇和县级城市有着斐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所描述的同样命运，我们可以相应地估计出城市和乡镇的毁坏。甚至像南京这样的城市也无法逃脱毁灭。苏州、杭州和很多其他地方也一样，尽管它们有巨大的城墙和勇敢的捍卫者。因为这一原因，毫不奇怪，我们只能看到仅仅为数不多的地方带有旧时代的气息，清朝最后30

图4.3.2.52，53 台湾新竹，平面1：10000，参见20世纪地图。

1－带有行政治理性质的栅栏，城隍庙以及哨卡长官（东边）；2－市街；3－土墙；4－行政与藏书楼；5－1826年之后的石墙；6－孔庙。

一个较好的例子就是新竹城，它坐落在南北陆路线路并横跨克亚溪。一个圆形直径大约600的栅栏，包括市政管理所在和哨卡长官以及城隍庙。后来，一座郊区市街沿着主要道路发展，跨河直通北方津渡。主要道路沿着河谷有一个小小的升起，而栅栏建造在高出洪水线几米高的安全地带，在那里同时阻挡了道路。后来，郊区围绕着栅栏发展起来，直到一座土墙围绕着整个聚落兴建起来，包括了另一座行政分支机构和一座藏书楼。1826年，士绅家庭，即那些地主和商人以及那些官僚们，向总督请愿允许围绕聚落建造一座坚固的石墙，最好沿着夯土外墙。因为城市在级别上仅仅相当于一个县治所在，因此，只得到允许建造一座石墙来围绕一个较小的区域，大约两倍于那栅栏。这座城墙与孔庙和学校一起建造，为此，军事指挥官已经在其办公所在的南面准备好了一处空间。为此，还增加了一座仓库和婴儿院以完成一个县级行政和军事中心的职能结构。土墙依然是外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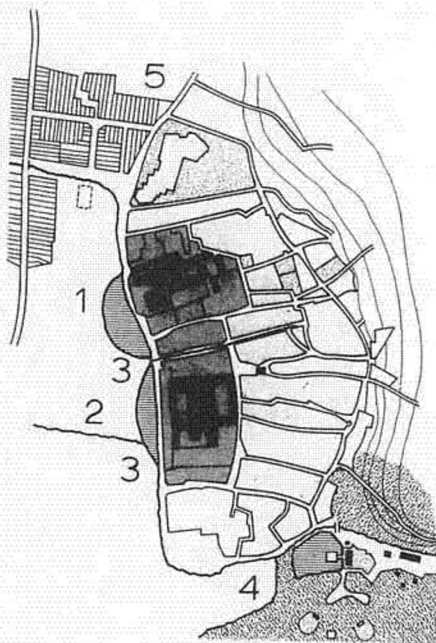


图 4.3.2.54–62　在台湾由富商和地主们于 19 世纪兴建的三座市镇。

1788 年，一场危险的反叛在台湾被镇压，这场反叛由来自福建泉州的第一波移民与来自福建漳州的第二波移民之间的紧张局势所引发。在这时，一位叫林平侯的米商开始了供应他那些来自漳州同伴的生意，因此交了好运，他又非常迅速地展开了盐业贸易。他 40 岁时买了个官，在广西省做了几年地方官。回到台湾以后，他 1815 年定居在大溪，并在那里为家人兴建了一座沿溪带漂亮花园的美宅。大溪，处在汉人聚落区和本地居民山里聚落区的边界，林氏在此开始了与他们的樟木贸易，并以米、盐和其他商品作为交换。他邀请其他商人、贸易者、挑担者和匠人们来此定居，在府邸以北为他们建造了一座市街，其中有两座庙宇，一座为佛寺，一座为航海者和商人们所崇拜的女神妈祖庙，而且铺筑了直通河畔陆地的路径。当林氏 76 岁离世后，他的家人溯溪而下到达板桥，在那里，他的儿子继续着林家的生意。1846 年，在此建造了一座新府邸，与一座市镇一起，由一座带有边界的市街和一座庙宇组成，并围绕着带四座门的竹栅围篱。六年以后，在旧府邸以东建造了一座新宫殿，而一座带有小湖的花园逐渐成型。当台湾在 1887 年成为清朝一省时，林的长孙林维源受到清朝廷赏识，提升为台湾的副总督。为了他的执政需要，他的旧府邸以南建造了另一座类似大型宫殿一样的办公用建筑。在大约 40 年的时间里，林家三代倾资总共 2730000 两白银买官买名，而成为了岛上最富裕的家族。当日本人在 1895 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占领台湾时，林维源星夜驶船逃亡厦门，装扮得像一个苦力，将他的宫殿和市镇交付给他那些下人打理，直到他倒数第二个儿子回到台湾。

向台湾移民的第三波，主要为来自福建和广东内陆地区的客家人，到台湾山脚下与那些原居民一同生活。客家人已经世代习惯于在荒山艰苦的条件之下生存，因而不但能够保护他们的新的家园不受本地居民的侵犯，而且可以抵御来自漳州移民的欺侮，他们试图侵占由客家人新耕耘的土地。在 19 世纪的前半叶，持续的争吵频繁发生，特别是在台中地区（盆地）。1848 年，本地一位豪绅在台中盆地南部的五峰村被谋杀，三年后，他的长子林文查为他复了仇，他在父亲坟前肢解了凶手，割除其心烹制成汤。官方因他那"以血还血"的报复行为（在那些地区是一种广泛并普遍接受的行为）判他三年徒刑。1854 年，他被释放后，领导一帮蛮勇人员去镇压其他的反抗团伙，并且成功歼灭了地方官的仇敌。因为在战斗中表现出的个人勇猛，五年后，他被推选为所谓的台湾义勇军首领，来辅佐福建省反击大陆的太平军乱。他横渡海峡来到福建，而他后几年里在军事上的成功使他迅速提升为福建省陆军司令地位，具有一等头衔，是当时整个国家第二高的头衔。因上级指定他去镇压家乡一带即将发生的反叛，1863 年他返回了台湾。在家乡，他利用权重位高，以及与国家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联系，歼灭了所有他家庭的敌人，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因此为他子孙后代未来的财富奠定了基础。然而，这并不是没有引起中央政府注意的，而为了削弱和抵制即将来临的调查，他回到了大陆。1864 年末，在反抗叛乱的战斗中，他壮烈牺牲。这一死，使他赢得了清代英雄谱系中一员的地位，也平息了他从前所涉的法律窘境。一个十七等的世袭身份，身后授予，而因这样一个提升，他的儿子和幼弟方能摆平所有那些林文查以及其蛮勇人员所带来的一切问题。他们在五峰村，既为家庭建造了豪华别墅，也建造了著名的林家花园。他的儿子，在中国台湾省政府成为了一位领袖人物。以其对樟脑所享有的权利，建立了繁荣的贸易，其中包括采矿、零售业以及房地产业。与新任总督刘铭传（1886–1891 年）的密切合作中，林推出了一项在台中兴建新省府都城的项目设想，这座城市就是后来著名的台中，并在那里兴建了林氏家庙。大约在这一时期，他与叔叔在他们故里的北部兴建起一座市镇。他们自己建造所有商店，并将这些商店出租给那些零售业主们，这解释了为何这市场聚落的特征和外观如此不同。家庭的传统是这样的：在最北面的家族建筑群大概是林文查（1820–1864 年）的家，是在 18 世纪末从广东转向五峰的，其主要的特色结构元素，包括刻柱，门和石雕。当建造新府邸时，依然重复这一过程，而且这些构件进口自大陆，因为即使在 19 世纪末，这些构件在台湾也是没有的。著名的林家花园布局在村庄以南的谷地，在那里，很多的自然风景环绕着家庭成员的坟墓得以保存，近湖布置着亭子和书斋，只有书斋后面的小花园，加建有围墙，而花园在所有方向都是敞开的

图 4.3.2.54 台湾大溪，比例 1 : 10000。
1– 旧府邸，后来移建；2– 妈祖庙；3– 佛寺

图 4.3.2.55 台湾板桥，比例 1 : 10000。
1– 旧宅；2– 新宅；3– 官厅

图 4.3.2.56 台湾五峰，比例 1 : 10000。
1– 旧宅；2– 官宅；3– 其他家族成员之宅；4– 林家花园；5– 市镇

图 4.3.2.57 大溪（原文：Tashi）市街鸟瞰图

图 4.3.2.58 大溪市街，带有整齐划一的商店建筑

图 4.3.2.59 在板桥的小市街，背景中是庙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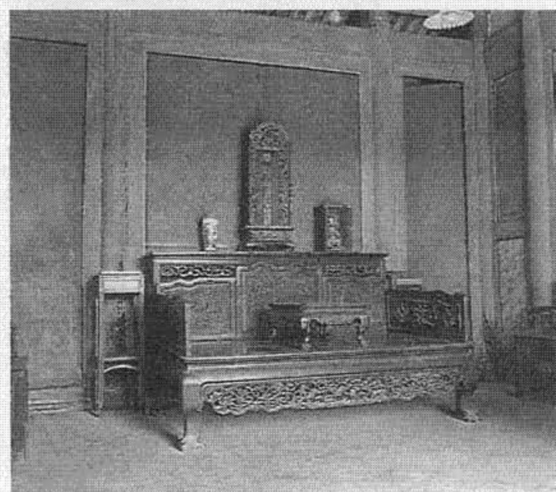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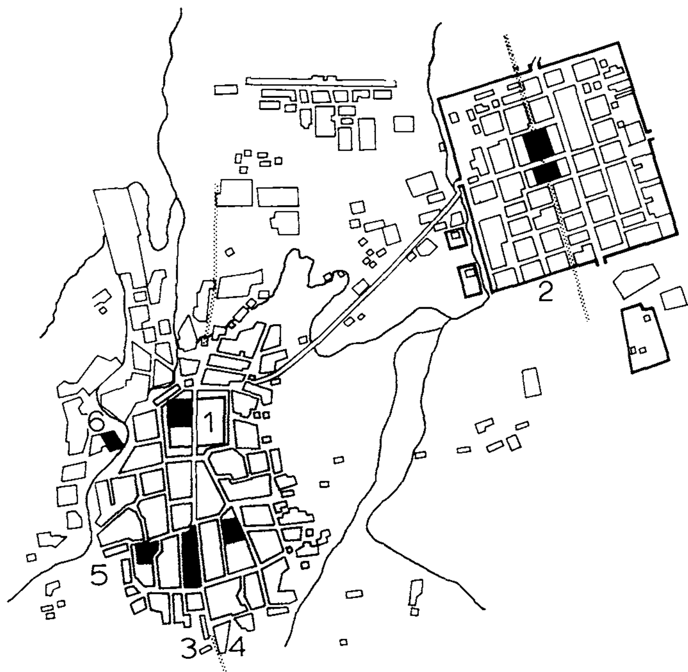


图 4.3.2.60　五峰村鸟瞰，官宅在中心位置

图 4.3.2.61　五峰市镇整齐划一的商店建筑

图 4.3.2.62　林文查（1864 年离世）在五峰的官府接待厅，以及他的雕像和牌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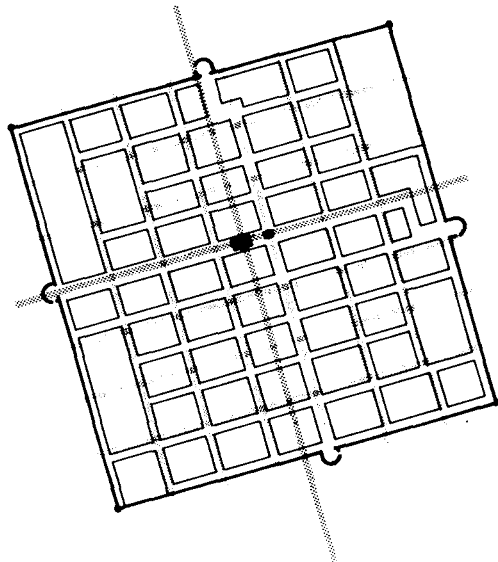




图 4.3.2.63，64，66–71　华夏之外的防御城，大约 1900 年的地图

图 4.3.2.63　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比例 1 ：40000。

这座今日称为呼和浩特的城市，由蒙古首领阿勒坛汗（1507–1583 年）1581 年兴建，在当时对明帝国来说是一个危险的邻居。从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 年）开始，他对于北方的省份进行毁灭性入侵，甚至在 1550 年围攻帝国都城北京。在 1550 年和 1560 年间，他攻克了青海，1573 年和 1578 年间，他攻克了西藏。然而，他与喇嘛教的黄教领袖之间和睦友好，两人合作在有蒙古人和西藏人所居之地传播喇嘛教之黄宗教义。1577 年，阿勒坛汗授予黄宗的喇嘛首领达赖喇嘛头衔，并且邀请他帮助为拟建的蒙古人居住地（今日的呼和浩特）建立一个宗教中心。在去呼和浩特的路上，达赖喇嘛，这位后来算起来应为第三位享此头衔的人，在宗喀巴的出生地，兴建了喀布伦寺，早有几个喇嘛在那里隐居修行。1581 年，阿勒坛汗在呼和浩特建立根据地，作为一个小而坚固的堡垒，周围环绕几个喇嘛寺，而周围郊区住着各路贸易者和各族居民。自从公元前 2 世纪起，这一地区受到汉人文明影响，对于那些迅疾的马背骑手来说，从明长城到此如近在咫尺。大约 150 年后的 1753 年，当蒙古人被打败后，在古老聚落的东北兴建了一座新的驻防城镇，并启用了新的名字，归化，即回归文明，新的城市，叫绥远，即平息遥远之地。新城是一个有墙围绕的方形，边长大约 1365 米，而街道模式由八条东西向街道和六条南北向街道组成，从北到南，形成九个街区，从东到西，形成七个街区。这一布局，暗示出基于基本的 6 尺为一弓的度量体系，为测量师所用之测量杆。计算也许会如下：7×104=728 弓 ×1.875=1365.0 米，9×81=729 弓 ×1.875=1366.8 米，基于清代工部做法的尺 =31.25 厘米 ×6=1.875 米。军事的办公所在和市政所在处于方形广场的中心，而两条主要街道形成了一个直通四座城门的十字。鼓楼坐落在两条主要道路的十字交叉处。

1–1581 年，由阿勒坛汗兴建的行政管理所在，后来名为归化；2– 汉人兴建于 1753 年的军事要塞城镇，称绥远；3– 孔庙；4– 喇嘛寺，五塔寺；5– 喇嘛寺；6– 清真寺

图 4.3.2.64　绥远要塞城镇原来的设计，比例 1 ：20000

图 4.3.2.65　一位军事测量师，称为弓的仗量杆和一个水准仪平板

年的访客们所获得的总体印象非常的抑郁。某种程度上，误导了中国城市性格的走向……。"甚至40多年之后，依然可以看到大量弃置土地的痕迹。从前，那里耸立着优美的建筑群或者容纳成千人的房屋"。杭州的一位外籍居民如此观察道："事实上，正如在任何一座中国城市，这里，人人都可以看到同样低矮的方形简陋棚屋。"（F.D.Cloud，1906年）他总结了他居住在中国几年的印象："很难说服自己，这些杂乱拥挤的沿着狭窄黑暗没有下水道无人清扫并常常未经铺砌的小胡同，千篇一律的，不超过两层的，前门上贴着红色招贴画和鬼脸符的杂乱简陋棚屋构成了真正的中国城市。……难处在于让你认识到如此肮脏、另人不愉快的黏质体和污秽混合物竟然构成了一座城市，甚至更难认识到在这些雷同的棚屋式样的商店里，有着价值成千上万的商品，以及皮发光洁、华衣美食的业主老板。这些人拥有的财富不下六位数字"。

封建王朝还没有死去，然而在其最痛苦时期，没有产生出一座布局基于"神奇方形"概念的、最后的新城。这样说，那为发展世界秩序之概念达3000年之久的进程，那世俗皇帝对帝国2000年之久的统治都走到了尽头。

当成百的城市因战争和反叛而荒芜之时，台湾岛1887年作为清朝的新省份建立之前，一座新的府级都城在岛屿的北部完成，这个城市叫台北，即台湾的北面。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城市布局参照了"神奇方形"概念而规划，并且以传统的中国古代的城市式样：一块拥有笔直城墙和街道的矩形围合。在一块相当小的，仅仅1.2平方公里的区域，一位不知名的建筑师，以一种复杂方式运用中国城市规划几世纪之久的神圣法则，将中国文化和精神世界观执行到底。

台北城1878年始建之时，[1] 围墙区域的规模由当初就已经设定的行政管理层级决定。作为台湾北部府城所在地，它是一个二级的行政管理中心。既然一级中心通常不应比1平方里大，二级城市应该有约4平方里的围墙面积。然而，据此，4平方里的区域只有2里长的边，如果要将奇数和偶数适当地结合在围合的矩形内，"里"的量度就用不起来。因此，必须采用其他的度量单位。

对一幅1897年现代城市地形图的仔细分析表明，采用的度量单位与清代测量师们用于广东省的度量单位相同（33.52厘米为一尺），并且在实际测量工作中形成了一个基本的20或25"弓"的尺度单位。[2] 值得注意的是，地图上的比例显示的标准度量单位为10英尺长的"丈"，从中并不容易辨别出实际所采用的度量单位的真正特性。然而，将之转换成"弓"的度量单位之后，其体系的特征就透露出来。这可以通过台北城墙的长度表现：300丈乘360丈其实是500弓×600弓的矩形，是5∶6的比例。自唐代以来，总是使用着两个不同"里"的度量体系，一小里是250弓，一大里是300弓，

图4.3.2.6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现今的乌鲁木齐市，比例1∶40000。
1—旧维吾尔人城市，有汉人区(a)和蒙古人区(b)以及自治区行署所在(c)；2—五座旧城中一些城市的废墟；3—迪化要塞城镇。
乌鲁木齐要追溯到汉代，当时，其作为天山山脉北坡绿洲之中的一座军事中心，大约兴建于公元前60年。在唐代，这里成为通往费尔干纳盆地（Fergana）和撒尔马罕（Samarkand，译者注：乌兹别克第二大城）丝绸之路最北部一条支路的行政中心。当维吾尔人在9世纪建立他们的势力范围时，这曾经是其上都。在蒙古人（元代）时，这里叫别失八儿里（Bishbalik），表现为一串五个小城的组群，大概为不同民族，表现出典型游牧帝国的城市聚落形态。在1757年和1759年，当清军攻克了天山以北的准噶尔地区时，这五座城市依然存在，并在从前的维吾尔都城西北兴建了一座汉人的城市，这城叫迪化，是推进文明之意。1764年，建造了一座方形的墙围区域，每边1365米，在乌鲁木齐河的西岸，两相互交叉的道路模式将此区域分成为四个区域，为可以容纳大约10000名士兵的军寨。街道直通四座城门。城市所用的度量体系，也许与呼和浩特的绥远所用的度量体系一致。在东岸的旧城，由某种不规则的带有四座城门的内城所组成。在这座内城中，市政办公环绕着一个中央的开敞空间而布置。在其南面是一座由墙围绕的郊区，而南面围墙之外是另一座市街的郊区。军事副长官（Lieutenant—Governor）的办公所在地在汉人城区里，在它的南面发展起另一个郊区

1 译者注：1878～1887年共用了10年的时间完成台北城的建造。

2 译者注：弓，旧时丈量地亩的器具，也是计算单位。1弓约等于5市尺，240平方弓为1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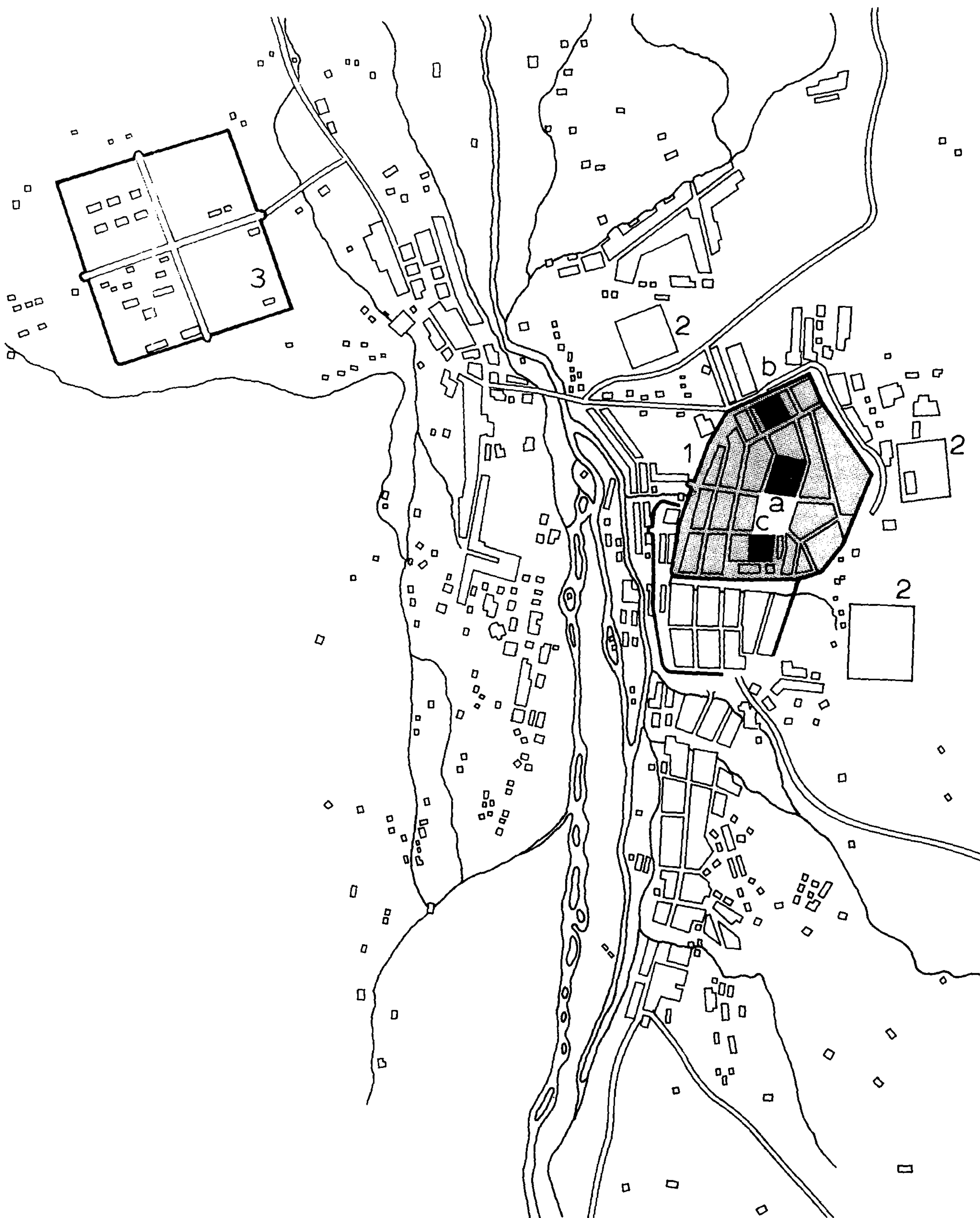

3
2
b
2
1
a
c
2

图 4.3.2.67−71　满族军队攻克准噶尔不久，便迅速掉头南回，并且迅速地"平息"了塔里木盆地，或者说，沿着塔克拉玛干（Taklimakan）南部和北部丝绸之路两条分支的沿线聚落。这些曾经的绿洲是人类居住的古老中心地，而现在，当霍加族的几代统治者被驱逐以后，一个新的军事管理所在地建立起来，并在近旧聚落的地方兴建了小的防御城镇。这成为了满族统治者一种广泛性的做法，而当军事政府将其自身仅仅限制在军事事物时，市政管理留给了本地的高官显贵们，他们接受了汉人官衔，而且负责军事管理。这些加固防御的汉人城镇，以当地语言称为汉人城（Yangi−shahr），而维吾尔人城镇称为维吾尔人城（Kuna−shahr）。这样一组城镇的例子，如今天的沙车，从前叫延坎、吐鲁番（Turfan）、和田（Khotan）和焉耆，从前叫喀拉沙尔。在这些地方，以及其他几处，旧城镇由土墙所围绕。街道狭窄弯曲。房屋朝向小的边巷敞开，仅留下沿街宅墙。因为当地人都是穆斯林，城中布置着清真寺和巴扎。新城镇，或者说汉人城镇，在其坚固的厚墙内，包含有一座城堡，一座军事指挥官的府邸，与士兵们的兵营以及市政官一起生活着大约有4000～5000名汉人商人。

A− 维吾尔人城（Kuna−shahr）；B− 汉人城（Yangi shah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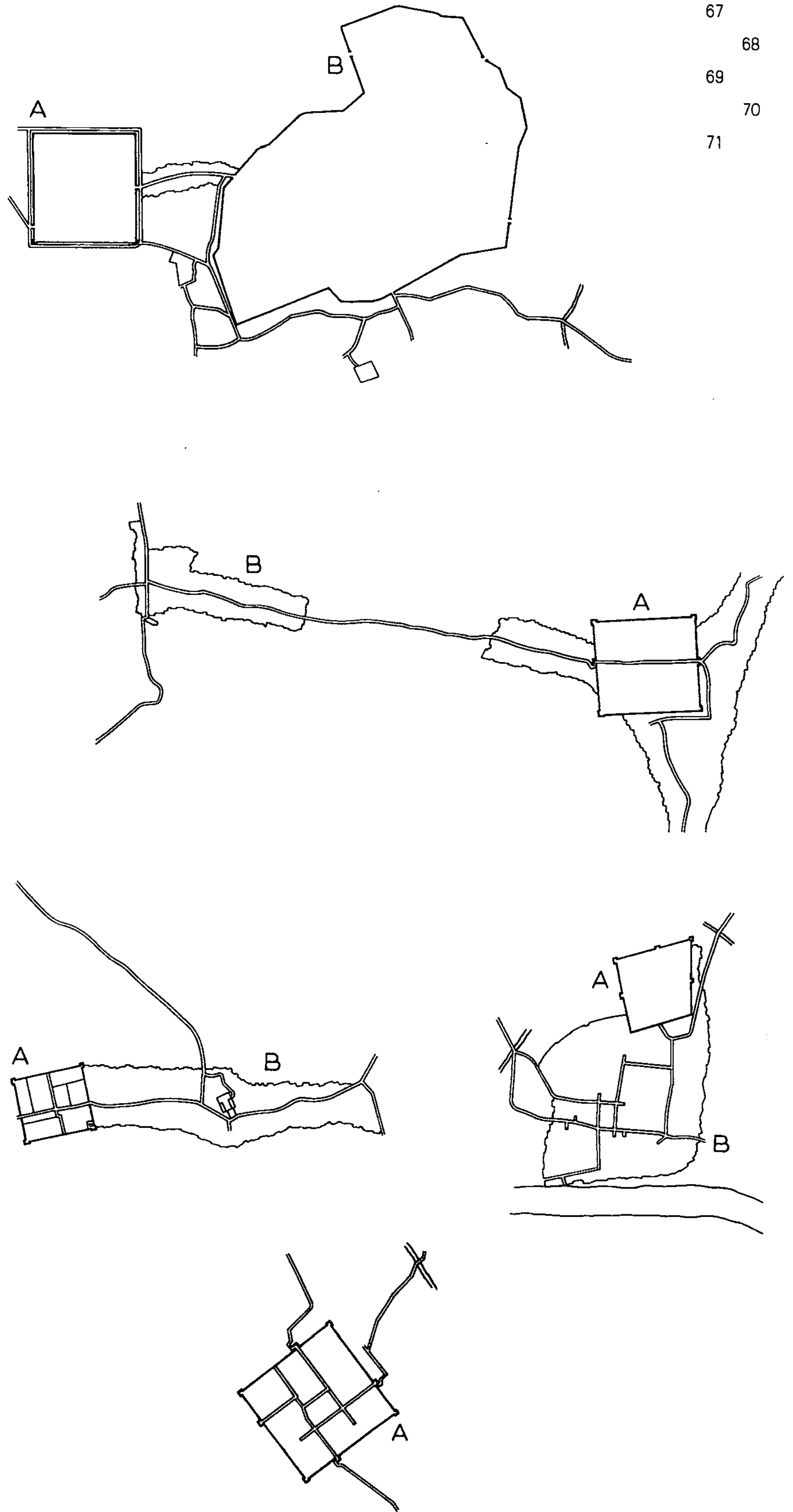
图 4.3.2.67　沙车，比例 1 ：4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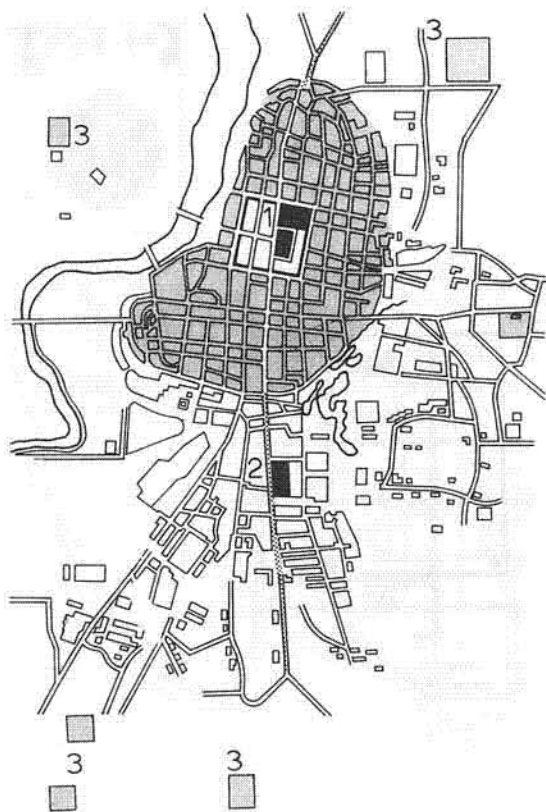
图 4.3.2.68　吐鲁番，比例 1 ：4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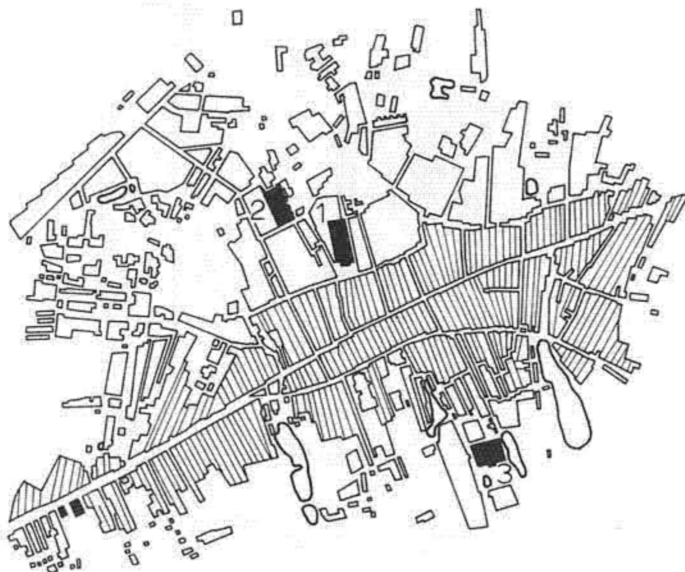
图 4.3.2.69　和田，比例 1 ：40000

图 4.3.2.70　阿克苏，比例 1 ：40000

图 4.3.2.71　焉耆，比例 1 ：4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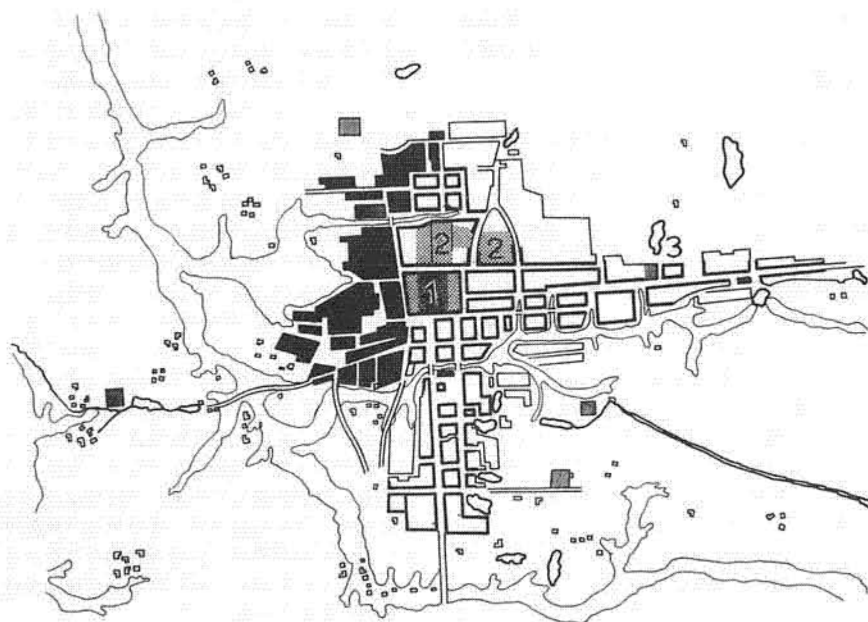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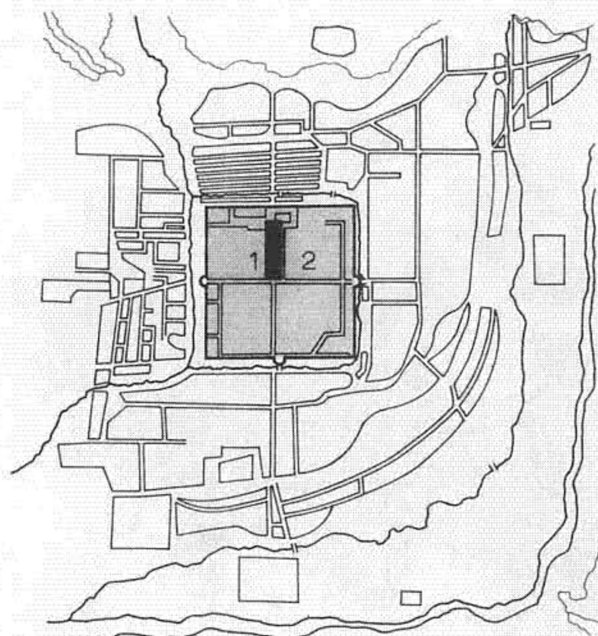


图 4.3.2.72–76　清代在东北地区兴建的城镇和城市，参照 20 世纪前半叶地方志中的现代地图。1689 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Nerchinsk）之后，长城外的东北地区在军事管理之下重新组织起来

图 4.3.2.72　1691 年，齐齐哈尔城作为满族军事统治者所在地兴建起来，比例 1 ： 20000。聚落的核心为坚固的但很小的堡垒，大约 170 米 ×170 米，带有长官府邸和他的行政办公所在地（1）。围绕着堡垒，发展起了郊区部分，作为与这一遥远地区猎人和游牧部落进行贸易的中心。这里，也成为了帝国遣送发配惩处犯人之地。市政管理后来在聚落之外兴建起来（2）。士兵们的营地兴建起来，并且根据周围环境，在接近郊区或者遥远之地重建起来（3）

图 4.3.2.73　新民城（镇），比例 1 ： 20000。市政管理，在 19 世纪初期，仅在东北地区逐渐建立起来，并且仅在某些地区。起先，城市聚落以市街的形式主要在南部（现今的辽宁省和吉林省）发展起来，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新民城（镇），其位于沈阳西北，在沿着辽河河谷的主要南北道路上。沿着主要道路建造了带有商店的房屋、作坊、餐馆、旅店等，逐渐地延伸长达两公里半，直到在帝国最后的几十年里兴建起市政管理设施。因为主要道路已经完全占据了，地方官衙门（1）、城隍庙（2）、孔庙连带学校（3）这些后来的建造，不得不另寻它处



72 73 75 76
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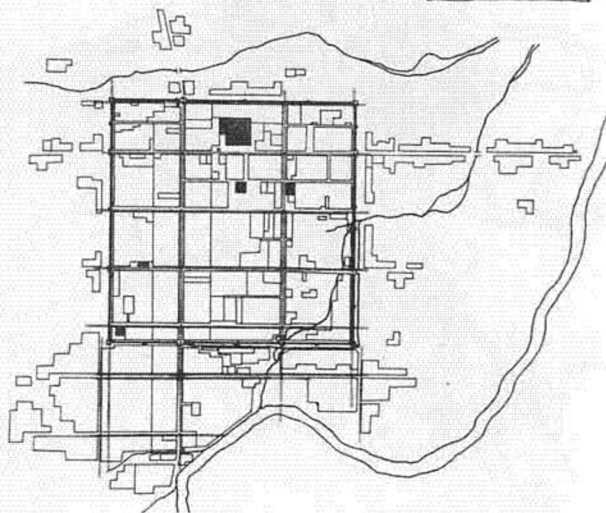


图 4.3.2.74　昌图城（镇），比例 1 ： 20000。另一个例子，是沈阳以北的昌图（镇），也处在主要道路上，那里，一个不规则的村庄转变成为了一个县衙门所在地（1）县衙坐落在村庄以东，以南北街道作为主要轴线，直通官衙的南门。军事办公所在建造在北边（2）而最终，在东边发展起一座市街，在那里建造了孔庙（3）。后来还添加了佛寺、佛龛，最老的佛寺，佛龛位于村子的中心

图 4.3.2.75　通化城（镇），比例 1 ： 20000。最后，一座完全新的行政中心在吉林省通化建造，早在大约 300 年前，努尔哈赤在此地区出生，这里一个 1 里见方的区域，在浑河以北以墙围绕，有一个 T 字形的街道模式和三座城门，南北街道向北直通衙门（1）的南门，在衙门两侧的东西街道以北，有其他的衙署和庙宇（2），这是古代用于中国小型行政城镇的概念，在河流和围墙之间围绕着这座城镇，郊区以一种弯曲的市街形式发展起来，甚至还考虑了风水法则：山之南，河之北

图 4.3.2.76　辉南城（镇），比例 1 ： 20000。这里的最后一个例子，是松花江河的支流，辉发河边通化以北，吉林省辉南的县城。虽然，辉南的布局似乎非常规则，且肯定有一个基于度量体系的网格系统，但其似乎由两个并不完全和谐的相互吻合的模式所组成，一方面是街道模式，而另一方面是围墙的布局。街道模式可以被描述为一条主要的南北大街，其形成了一条长的市街，并且向南延伸超出了南墙，在那里，郊区的布局是一般度量体系的继续和延伸，与这条主要街道相连接的是三条东西向的市街和另一条街道，一条基本的市街。通过城镇东部市街这一地区，又有一条与主要大街相平行的南北街道，但是其两头封死无门，仅仅适于内部交通。两条市街在两端有门，这样有六座门用于与城市内部进行交通。通过认真仔细地调查研究街道模式的划分，我们可以确定到底使用的是何种度量体系。这是基于 19 世纪清代中央政府测绘者们所用的步量度量单位，基本单位相当于 32.07 厘米，一种几何单位，其里对应于 1/192.5 度的纬度，正如 1890 年所确定的那样。测量者们有两个主要用于测量距离的仪器，一是测量竿，叫弓，其为 6 尺长，大约 2 米，以及一条几乎为 20 弓长的长线。这条弓线，似乎为基本的度量单位，用于确定所有的尺度，具有一座市街的宽度，包括在两边的建筑地块，达到六个单元，120 弓或 240 米。围墙形成了一个几乎完美的方形，480 弓，或者说，每边为 24 个度量单元。

尽管，实际上将城墙与街道模式结合并无问题，但这并非是毫无缘由这样做的。主要的行政办公所在地辉南是县级建制，其所在坐落在中央南北轴线的北端；然而，这条轴线并非以街道模式来表达，就像传统上的符合逻辑的选择一样。墙围区域的规模，是大约 2.56 里的方形，是有些不规则的，对于较低层级的城来说太大，但对于较高层级的城来说太小。精确地说，整个布局并无特殊的超出理性规则的特殊意义。

市街，从一座跨过南部小溪的桥，直通正北大约 1400 米，8 弓宽（15.39 米），而在每一边的建筑基地为 56 弓。6 条水平街道，被以 120 弓和 100 弓的距离增加，而平行的南北街，在大街以东长 200 弓。东部和西部的城墙，从西边的市街，以 140 弓的距离被建造起来，而东边的平行街道在墙间的距离为 480 弓。在北边和南边墙之间的距离是同样的。北墙准确地适合街道模式，而南墙却没有。其以相当武断的方式切断了市街的南部。其他各处遍布办公所在地，以及学校和园林，而孔庙坐落在墙体围绕方形的上半部平行街道以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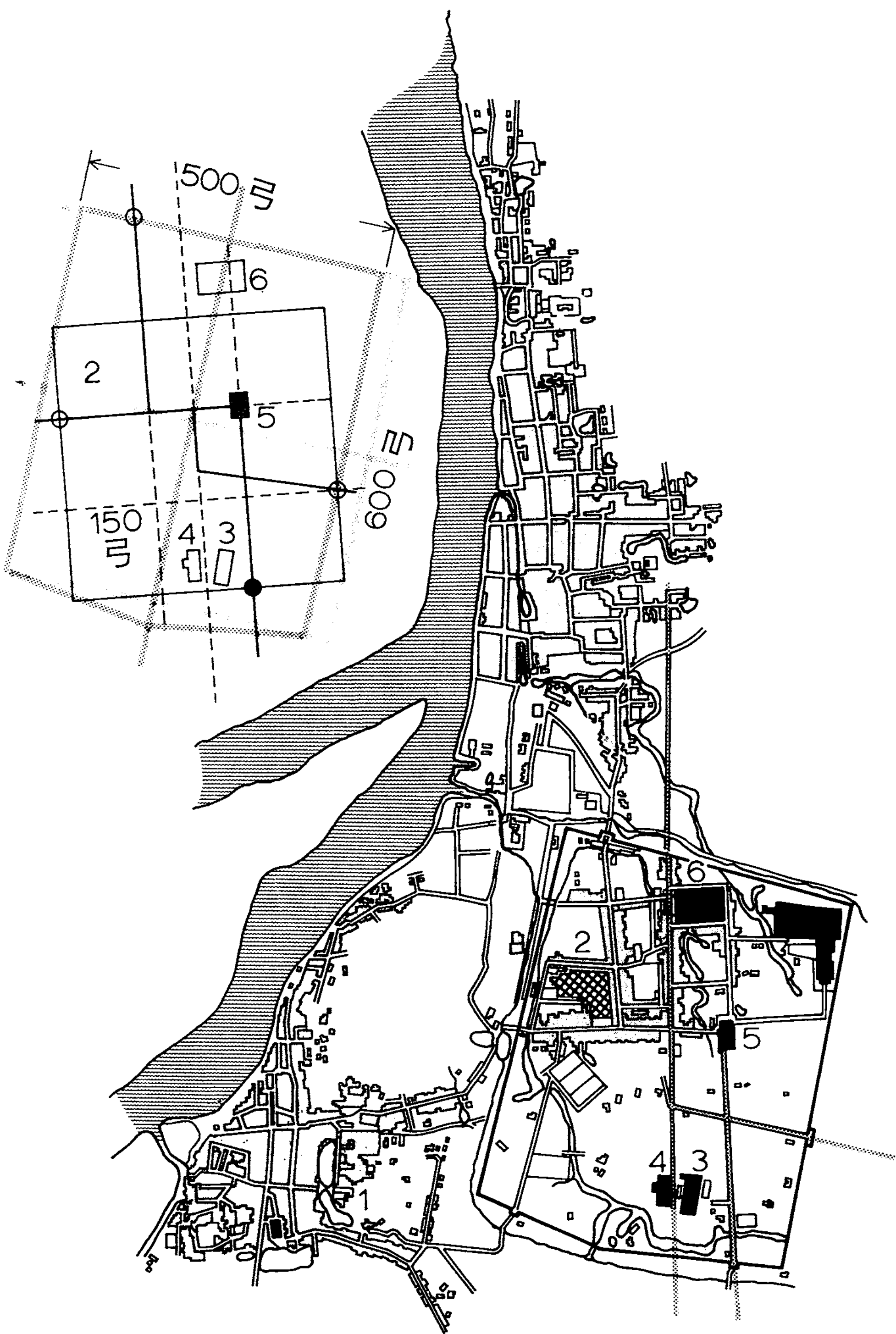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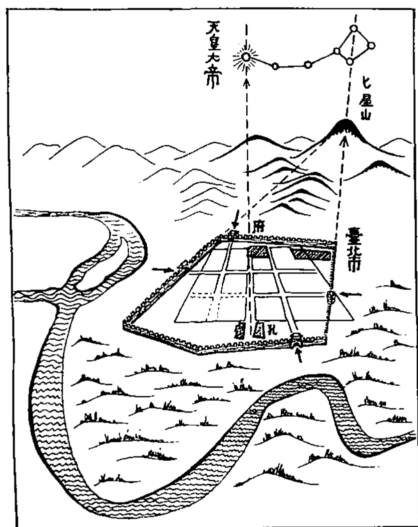


图 4.3.2.77，78　台湾省省会台北市。1878 年，以一府之行政中心而兴建，比例 1 ：20000，参见 1897 年由日本政府所测绘的平面。

早在 18 世纪，沿着淡水河，就已经发展起来了一座市街聚落、城镇，以及 Mengjia（1）口岸。当台湾的行政结构 1878 年由清政府重新组织后，一座新的府城被规划和建造起来，在旧聚落之东呈现一个墙围的矩形。曾经在新城之西几公里处的板桥有所建树的富裕的林家（参见图 4.3.2.54）为建造城墙和办公建筑，捐献出 200000 两银子。一座府衙（2）、一座孔庙（3）、一座关公庙（4）和一座妈祖庙（5）建造在适宜的位置。本地行政办公所在地（6），也许已经在 19 世纪初就已经存在了，作为一种辅助性的衙门，正如城隍庙的例子（7）。墙体布局比例为 5 ：6，南北墙体约两大里长，东西墙体约两小里长，以此稍微不寻常的方式，形成了一个 4 里方形（矩形），这基于广东土地测量师的尺（33.52 厘米），这一尺度单位，清代整个华南地区都在使用。街道模式形成了一个较小度量的复杂系统，而且似乎基于幻方概念，尽管其并未完全展示出来或使用出来。通往城门四条街道的每一条，仅遵循部分的传统模式，将其他部分留作尽端不通的街道。虽然有些不规则，而且草率完成的街道模式是南北指向的，而墙体转为大约朝东 13 度，直接指向远处称“七星”的山脉，这是参照北极星宿所进行的设计。这当然证实了风水的考虑，正如在南墙的弯曲一样，其沿着更向南的河流。犹如沈阳城所做那样。这种尝试，使用幻方概念，似乎是明显的。然而，其应用表现出这也许仅仅不过是一个由传统上受教育之人理论上的练习，一个曾经如此强力的世界秩序模式的最后回眸。一种幻方模式，以其 9 个划分，强加到 4 个方形的空间之上，即 9 加到 4 上，是一种阳模数与阴划分的结合

是 5 ∶ 6 的比例。小里是用于与皇帝、与天文、与医学相关的度量单位，而大里是用于所有其他一般性事务的度量单位。有时，两者兼而用之，只要 5 ∶ 6 的结合合乎时宜，比如这明显的实例——台北城墙的布局。以此方式，形成了一块 2 大里 ×2 小里的矩形，或者说一块 4 平方里的墙体围合区域，恰好是府级都城所规定的规模。在这 4 里的方形（或矩形）空间里，纳入了一种街道模式，就是前面所描述的“拥有四条街道的最基本的‘神奇方形’”，这四条街道以 T 形交叉相连，直通四座城门”。这一模式的主要街道之间的距离是 200 弓，并形成 600 弓为基本单位的方形。一条附加的南北向中轴街道从北边的办公区通往南边的孔庙。这是个合理的关系，正如其所显示的那样，这是办公区前面某种“御街千步廊”性质的街道。两个系统，街道模式以及墙体的矩形都基于测量者们所采用的 25 弓的度量单位。它们形成每边具有 24 个“25 弓的度量单位”的方形网格，从中可以采用所有主要的度量体系。将两个这种以 25 弓为度量单位的网格放在一起，我们获得一个 12 × 12 的方形，一种阴（4）和阳（3）数的结合。阴划分 4 里的矩形，界定了空间，其上建造了城市；阳划分（神奇方形）产生了街道模式。如上所见，这种结合再次在圣田中被发现，在那里，皇帝或者他在当地的代表必须亲手在农耕季节开始犁第一锄。其中，四重空间（阴）和九重划分（阳）的相互结合被用作一个神奇的工具，即通过阴阳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确保土壤肥沃。对城市来说，它套用了类似的概念，即为了保证城市聚落及其居民的繁荣。

城市实际的布局，正如在地图上所显示的，第一眼看去似乎相当不规则，因为，街道和城墙呈不同的走向，而测量者们构想的布局并没有非常准确地执行。只有对度量进行仔细的分析，比方说体会其正在进行操作的状态，才能显示概念原来的意义。但是明显的街道模式和城墙的分离，正如以上我们在辉南的布局所见的那样，显示出一种有趣的思考线索，也是中国非常典型的世界概念。街道模式的方位严格地通向北方，直指北极星，天皇大帝，他在人间的对应物是中国的皇帝，并且扩展到在各地行政单位的所有代表人。这一概念决定了围墙区域内街道模式中办公建筑的位置。然而，围墙不是指向北方，而是指向城市区域的最高山峰。这座非常重要的山称为七星山，与大熊（或小熊）座的北斗七星有关，北极星是其中的一部分。两座南北向墙体的轻微偏离由如下的事实所解释，即两者都需要指向这座山峰。根据风水理论，坐落在城之东北的山脉可能是带来邪恶影响的根源。通过将墙体向东北偏转，外观上，山脉就正好坐落在北墙后面，城市处于一种更加安全和防御的位置。另一点拓扑特征，考虑的是打断南城墙直线，大概是为了调节墙体，顺应其南面的河道，使城市更为和谐地融入其周边环境之中。



第5章　中国城镇的结构

5.1　前言

以西方语言首次对中国城市的描述，出自一位来自西方的旅行者马可波罗。他于13世纪后半叶在中国居住生活了很多年。他的描述给我们一个关于南宋中国城市文化以及元代初年都城严格的控制体系最为生动而良好的印象。马可波罗居住在元朝皇帝忽必烈在大都的宫廷里，以前为金中都（现今北京），并旅行遍及整个中国。他对于城市的描写，包括所有的都市地方，特别有趣的是那些南方城市，在那里他作为帝国政府的高官居住了很多年。他的话显示出那位全能的外族独裁皇室所在的大都，在其北方的强硬管理，与带有南方文化生活方式的世界性贸易都市“行在”（今日浙江的杭州）之间的区别。这里，我们看到中国城市主义的两条根，以他们最为杰出的原型展现出来：行政管理性质的都城，以及商业和贸易的城市中心。那是一个具有相当重要性的历史时刻，马可波罗见证了中国最后一座帝都的创立：以全新的方式重新规划建设。这就是至高行政管理城市——大都。由元朝皇帝忽必烈于1266年建立。其布局基于传统的“神奇幻方”概念，也是此概念最后一个杰出范例。

与此同时，马可波罗在另一座城市亲眼见证了中国城市文化的最高峰，那里，城市的布局是与商业贸易以及手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相关，并得到这些发展支撑的实际活动的结果。那是与国际贸易网络紧密相连，巨大而高度发达的腹地里经济和文化之间好多年代复杂的交互作用的结果。与之相反的是，帝国都城是征服者忽必烈至高无上的军事集权带来的紧迫而高压的结果。忽必烈将其个人意志强加给一个地区，而这个地区实际上没有准备好也没有能力支撑如此巨大的人口集中，它无力成为新大都的消费中心。

在中国的整个政治历史进程中，这两种力量是城市发展的基础，有时完全依据其自身的原则运作而不作互相考虑。上古时代，仪式－政治的中心也许是城市主义的起源。但是，不久就加进了生产和贸易的经济因素。结果，古老的中心发展成为伟大的城市集块，成为权力的中心，也成为当时所知整个世界贸易网络中各种经济活动的中心。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后半叶，城市文化首次开花，然而，由中世纪王朝的宫廷文化所取代。城市主义变得与中央政府的行政治理中心网络相一致，给经济和贸易独立发展留下极小的空间，甚至没有任何空间。随着公元第二个千年的开始，经济力量迅速发展，产生了公元11与13世纪之间宋代城市文化的第二个黄金期。最后一个阶段与元代掠夺性的权力结构并肩共存，两者也尖锐地相互对立。

5.2　外观

“更进一步地，我们必须说城镇和城市，它们在整个中国具有同样的外观”。1655～1657年旅游中国的荷兰大使成员之一尼尔霍夫（J.Nieuhof）这样写道：“它们仅仅在规模，以及通过贸易和商业聚集起来的财富方面不同。大多数由方形城堡所围绕，厚而高的城墙由沿着墙体的方塔和宽阔的城壕防御，同时还有一些附加的夯土工事。每一座城镇和城市通过带有双塔的双城门进入。两座双塔彼此相对，但不在同一条直线上，因此，当你已经进入塔下第一座城门，你必须转弯通过另一座门。这两座城门之间，大多有一个宽敞空间，士兵们在里面军训和模拟战争的演习。门上的中部是高楼，中文称为门楼，是为士兵们所用的营房。城门之外，是广阔的郊区，居住其中的人数和城墙之内的差不多。城外便利之处，城市里的望族出资建有高楼大塔。人们相信这些塔楼对居住在相应城镇的居民的命运与繁荣有着积极的作用，它们还可以避免来自城外的坏影响。”1940年，一位现代作家这样写道：“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有时，我可以看到中国那带有城墙的城市，它们如何从远处出现并延伸到你的眼前。沿着公路、扬子江边小山上的塔幢、中国北方那宽扁的窣堵坡，或者是曲线屋面的庙宇和城门，它们提醒你，不管这一切多么不同，不管你身处何地，这个大国是一个文化整体（Lily Abegg，1940年）。”

然而，著名的德国地理学家斐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在1870

年评论道："中国城市在外观上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雷同。它们中的许多具有个性。如果一个人试图比较一下这些城市，例如广州、成都或济南，就会发现很多不同。当然，尽管如此，到处都可以辨别出某些特定的品质。"他因此如此描述这些相同之处："内城与外城以高墙分隔，外城与郊区又以一座稍矮些的城墙分隔，开敞的商铺里，各种商品一应俱全。竖向招牌拥立在街道两侧展示并陈列这些商品的名号。混在一起的有厨房、茶室、作坊、餐馆以及庙宇。街道与巷子之间成正角相交，并覆盖着石板。房屋低矮，外观单调。许多城市种有一些高大的树木。其枝干伸出房屋的墙体之外，给后面的院落带来浓荫。从一个较高处例如城墙的顶端看过去，这些树木给一地的外观增加了些许花园城市的气氛。"

让我们再听听另一种声音，一个20世纪初杭州居民的声音："对于西方人来说，'城市'这个词意味着高耸和气势壮观的建筑物，宽广、铺筑良好并保持完好的街道，美丽的步道，风景如画的公园和车驾，带有草坪和花园的优美府邸，明亮的霓虹灯光……，因此，当西方人沿着一条中国城市的街道行走时，那狭窄、僵硬、黑暗、似乎永无尽头的街巷，让他意识不到一座'真正的城市'会出现在下一个拐弯处。"

这些可以得到更多引言补充的引言显然表明，中国城市外观和氛围方面的同一性是许多参观者的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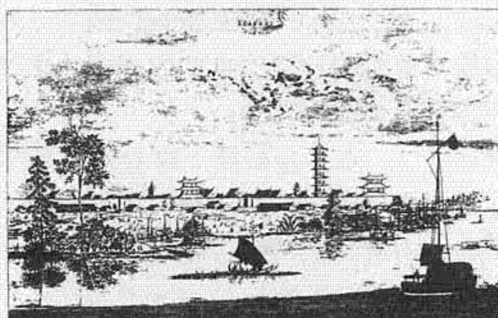






图 5.2.1, 2　1655–1657 年琼 · 尼尔霍夫（Joan Nieuhof）以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身份旅行中国时所见到的城市景观。采用了现代的名称。在 1665 年发表，后来以法语、德语、拉丁语和英语出版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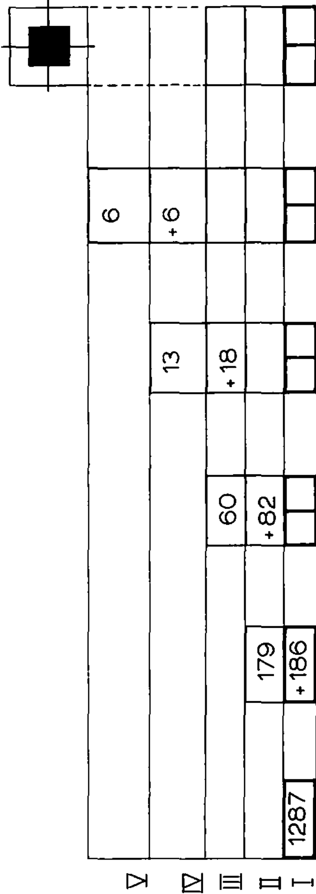
图 5.2.1　河北东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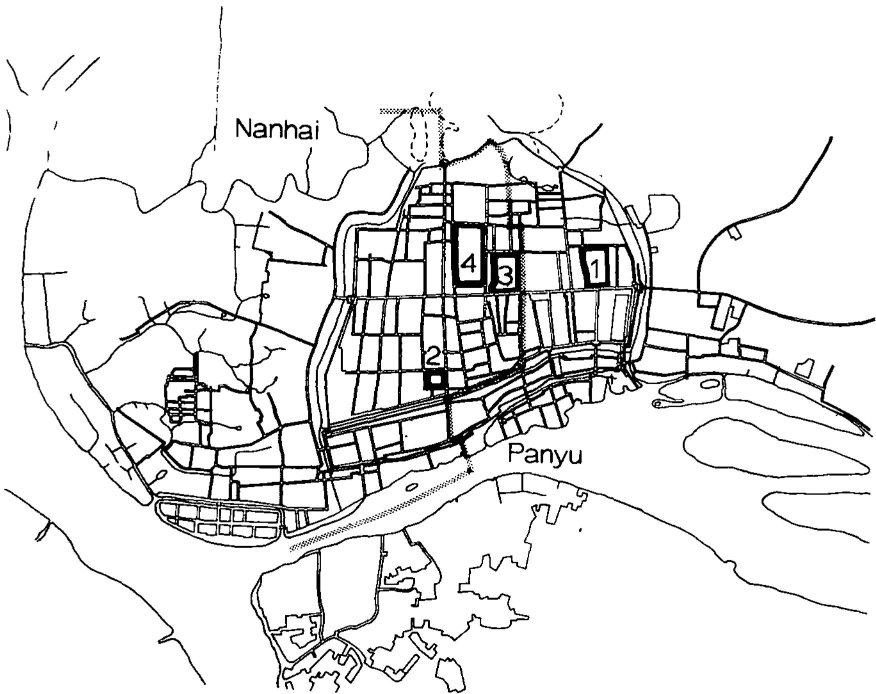
图 5.2.2　江西南昌

图 5.2.3, 4　中国城市中的典型街道，参考旧照片的图绘

图5.3.1 中国城市的行政级别。
从上到下：皇帝居于一座府级城市，居有两位知县；总督的行宫，旁边是巡抚和道台，居有两位知县；省级巡抚和道台居住在府级城市，居有两位知县；道台居住在府城，居有两位知县；居有知县的府城；居有一位知县的县城。方框里的数字表示晚清时期基层行政单位（城市）的数目

图5.3.2 广东省广州市的两个城区。右边的部分属于番禺（1），而左边的部分属于南海（2）；府城（3）；省级巡抚（4）





导印象，远远超过不同之处。当然，这些仅仅对那些了解中国不同地区众多城市的人显而易见。相同之处不仅仅基于帝国政府行政管理及其制度的总体结构，也基于盛行的经济原则和条例，以及生产性和商业性的操作规模，同时还有那统一的交通联系方式。另一方面，不同之处主要基于气候和环境条件，这些因素反过来影响人的生活方式。然而，在一般社会文化方面，也存在一些有趣的不同点或变化，这与方言有关。

5.3 行政结构

整个中国在传统上被分成地方行政单位，每一行政单位由一位国家的地方官知县管理，他在相应行政单位的中心城市设有其行政衙门，被称为县、区或部门。这些地方基层单位的数目在帝国历史的进程中有所变化。然而，在最后的300年，总数目大约在1500左右，也即是在中国内地18个省份之中。多个地方行政单位，一般来说在7～10个之间，形成较高的行政级别中心，成为由知府管理其所在区域诸知县的州府。同样，12～16个州府形成一个省份，而省的管理者巡抚通过其他一些高官辅佐来监管这些知府。那些高官包括法官、盐业审计官和粮食经理人。更进一步地，巡抚拥有控制其所在地区的军权。一般说每一地区大约由4～6个州府组成，因此，省级政府包括大约3～4个巡抚。在一些情况下，两个省结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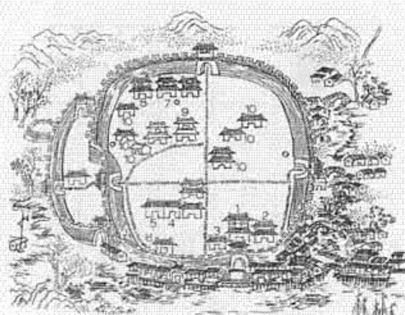


图 5.3.1.1　一级行政管理城镇 广东，乐昌县，引自 18 世纪的县志。
1– 乐昌县衙署；2– 衙门；3– 地社祠堂；4– 文庙；5– 武庙；6– 永富粮仓；7– 城隍庙；8– 守城衙；9– 大试殿；10– 六个姓氏的家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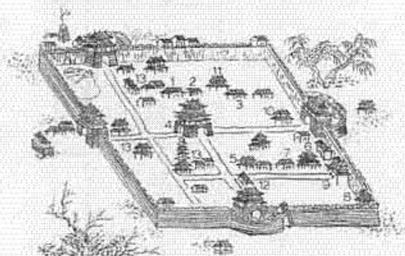


图 5.3.1.2　一级行政城镇，山西，引自 1826 年县志。
1– 县署；2– 衙门，警署；3– 藏书楼；4– 鼓楼；5– 城隍庙；6– 文庙；7– 学校；8– 魁星阁（文帝）；9– 魁文庙；10– 武帝庙；11– 泰山（圣山）庙；12– 龙王庙；13– 佛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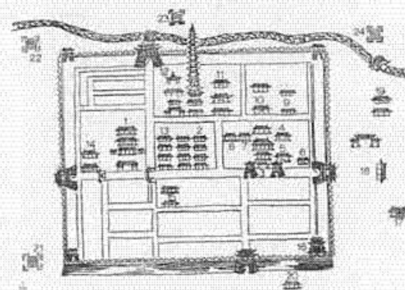


图 5.3.1.3　一级的行政城镇，山西安邑县，引自 1764 年的县志。
1– 安邑县衙；2– 城隍庙；3– 孔庙；5– 文昌阁；6– 土地神坛（本地的）；9– 孤儿院；10– 玉皇大帝；11– 具有塔的佛寺；12– 藏书楼；13– 关帝庙（主掌贸易的神）；14– 马王庙；15– 贞节祠；16– 魁星阁；17– 关帝庙；18– 忠义祠；19– 泰山庙；21– 城墙外的南坛；22– 北坛；23– 饿鬼坛；24– 神农坛（农业神）

在一个总督的领导之下，18 个省份中有 3 个由总督作为管理者。最后，权利的顶层是与王朝宫廷一起的国家都城的帝国行政管理，王朝宫廷又有其自己独立的组织机构。

我们可以将行政管理城市和城镇划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或五级行政的城市，就是说一座城市在其城墙之内可以设有所有自总督级别到地方知县的衙署机构。或者一个城镇仅有本地知县的衙署，或者也有这样的情况，设有一些不同级别的衙署机构。在清朝的最后 10 年里，即 19 世纪末，根据地理字典，内地 18 个省份和台湾地区大约有 1545 个地方基层管理单位，其中 1287 个是小型的仅有县一级衙门机构的县级城镇。179 个城镇里，住有管理其周围地方行政区划的知府，我们可以称第一种类型的例子为一级行政管理中心，而后者是一个二级行政管理中心。接下来，有 60 个三级行政管理中心，13 个四级以及 6 个五级的行政管理中心。最后的 6 个是相应总督的府邸所在，与国家都城一起，总共有 1546 个行政管理中心。其中 259 个可以被称为多级“行政管理”城市。

一级的行政城镇是真正实施行政管理职能的中心，因为只有当地的知县才能算是真正在做实事，而较高等级政府的大官和知府甚至是总督主要依赖那些空洞的文字、文书文件。整个国家都由这些地方行政单位所覆盖，因此，每一座村庄、城镇、城市甚至属于任何一个本地单位的个人都服从知县的规则。地

方机构虽然是最低层级的行政单位，它们因其坐落的位置，在交通网络中的地位，以及官方生意数量上的不同而大不一样。像大运河、城堡和要塞那样专门的设置和机构，以及国家工厂、盐矿、煤矿以及其他设置增加了知县的职责。当地居民的性格，不管是拖欠税收者还是那些脾气凶暴的恶棍都可能增加他的麻烦。为了能够较为公正地评估知县的工作，中央政府建立了一套等级系统，从四个方面区分其间的差别：最重要的、重要的、中等的和容易的。同样，四个“重要性程度”的等级分别确定其地方单元的等级，其中有的具备四种“重要性程度”的等级，或者仅三种、两种，甚至仅一种。尽管这些区别已经是不同类型聚落的表征，地方知县的行政管理通常遵循着整个国家到处可见的模式。仅仅知县本人是帝王委任的官僚。他是决定事务的惟一决策人，而且，他必须承担所有的责任。然而，他的工作依赖于同僚的帮助和合作，包括各个领域的专家以及熟悉本地情况的当地居民。因为知县通常只在指定的地区任期三年，然后，就转到其他什么地方的另一个官位，他必须本人支付他的那些重要幕僚们的薪水。结果，他本人决定手下需要多少人员从事一些必要的工作。通常，大约需要10位私人秘书，一些领域的学者和专家，以及大约40～50名仆人，照看家务和维持衙署的办公。衙署大约平均需要100名职员处理杂务。有些地方，甚至多达800人，并且雇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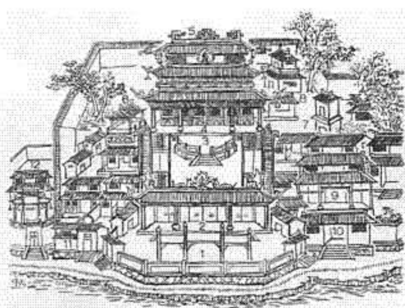


图 5.3.1.4 18 世纪广东乐昌县城区的孔庙。1– 仪门，2– 大门，3– 戏台，4– 大成殿，5– 祖庙，6– 习射亭，7– 焚经炉，8– 文昌阁，9– 明伦堂，10– 东林院，11– 西林院，12– 贞节忠孝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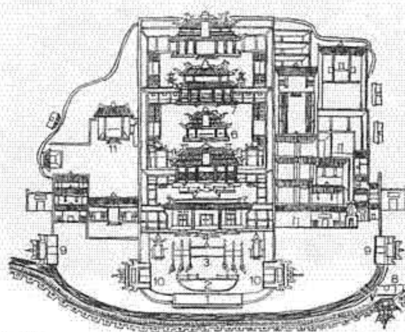


图 5.3.1.5 湖南长沙府 18 世纪的府城孔庙。1– 龙壁，2– 泮池，3– 仪门，4– 大成门，5– 大成殿，6– 杏坛，7– 先圣堂，8– 魁星阁，9– 外门，10– 内门，11– 习射亭



图 5.3.1.6 知县作为地方法官在其大堂里。引自 1628 年的木刻绘画。他的书桌上摆着毛笔和砚墨准备书写。违法者跪在门槛处，两位手执竹棍的衙门小吏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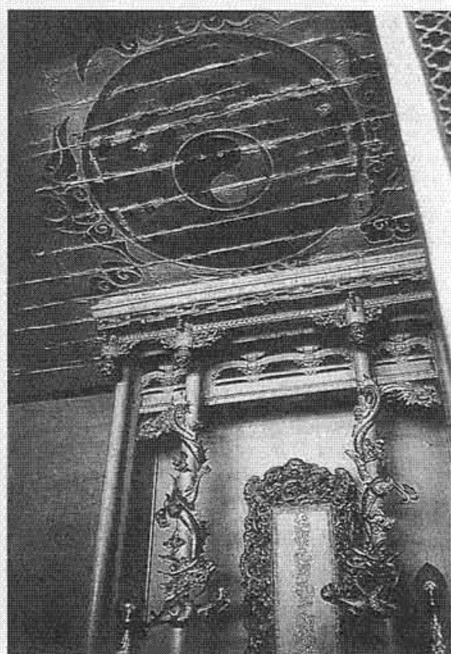






图 5.3.1.7 台湾台南府的孔庙，鸟瞰，1971。左下角我们可见泮池（如今已经干枯），右侧的前庭有遮荫的榕树。大的合院里有大成殿，上部中心的后面是祖先圣人堂，右边可见明伦堂，以及三层的文昌阁和魁星阁

图 5.3.1.8 台湾台南府孔庙的孔夫子牌位，两侧盘旋着两根龙柱，屋顶上有八卦图

图 5.3.1.9 孔德成，1920 年生于山东曲阜，孔子的 77 代后裔，照片摄于 1971 年。自 1950 年起，孔德成在台北台湾大学教授古典文学（照片中左边之人）

图 5.3.1.10 山西太原孔庙中的仪门。中央门上的木牌写着"棂星门"，这是孔庙中这一进门常用的名字，翻译为"棂星门"。"棂星"从其字面意义说，与"神灵力量"有某种联系

图 5.3.1.11–13 1971 年在台湾台北孔庙孔子诞辰日所举行的庆典仪式

图 5.3.1.11 学生们在跳舞

图 5.3.1.12 孔子名字牌位前面的敬献，包括猪、牛和羊

图 5.3.1.13 乐队的大鼓







大约150～200名衙役和勤杂人员。一些大的地方衙署有时设有衙署分部，但是这些分部不负任何行政责任。

5.3.1 地方行政管理

根据国家行政中心化和统一化的基本原则，当地行政中心坐落在县城的中心，并且是这一单元的一部分，因此，围绕着县衙门机构的城市聚落仅仅是地方单元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社区。知县既是城市的市长，也是整个县的知县。因为这个原因，此类城市聚落没有自己的名字，而是在地方县级单位的名字之后加一个后缀——“城”字，表示地方县级单元里那由城墙围绕的区域（城＝墙）。那些多层行政级别的城市，可以采用不同行政级别单位的名称，这里以广东省广州城为例。广州的名字指行政二级，州府之城，而广东，指省一级的行政治理。而居住在广州城墙内两位知县所代表的两个地方单元分别为番禺和南海。这样的城市没有名字，在大众语言里，仅仅本地人称其为羊城，这出自古代“五灵”传说的典故。他们在很久很久以前携带五谷降临到这个市场之地，并且化成看上去像羊一样的石头。实际上，城市区域属于番禺和南海两个地方县域，两者之间的分界线将那些由墙围绕的区域分成两部分。反过来，这两部分又分属于两个不同知县的司法区。每一位知县在其围墙环绕区域内有自己的衙署。因此，行政上说，那里的居民并非广州的市民，而是要么属于番禺县，要么属于南

海县。广州的知府和广东的巡抚居住在南海，而府级的孔庙和省级的贡院坐落在番禺。不过，知识的中心，学府被称为羊城学府。

在其地方单元，知县是管理总务的人。他同时是法官、收税官，他又负责邮政事务、盐业管理、警察、粮仓、公共工作、社会福利和教育，并且必须代替皇帝施行宗教和仪式的功能。最后，在骚乱和反叛时期，他必须从其城墙内的行政中心防卫其本地行政区划。从其各种功能设施的列项看，很明显，知县不但监管自己的衙署，而且掌控一系列庙宇、学校、监狱、盐作坊以及带有城门和防御台的城墙管理。他是其本地的皇帝代表。更为特别的，就像皇帝在整个国家一样，他有着某种仪式上的职责从而赋予其管辖该地区的宗教责任，也赋予知县个人人格某种神圣的气氛。

理想意义上，“神奇的方形”是行政管理中心布局的模式，它是帝都在地方的复制品。大多数行政管理中心的源头能够追溯自遥远的汉代。然而，当“幻方”概念已经失去其建设性的影响时，布局采用长矩形的形式，覆盖大约1平方公里的面积，或者四分之一平方公里的区域。城墙在其排列上也许已经依从地形特征，甚至几乎是圆的，其内部布局以街道成正角相互交叉，建筑物也在适当的位置上尽可能地方正，主要衙署建筑通常坐落在城墙围绕区域的中心，或者至少尽可能地离中心较近。其大门在建筑群的南边，一条街道从墙南门直通而来。主要的东西街道在衙署区大门之前通过，那里，衙署的入口以两座跨街的牌坊为标志，形成某种前庭，因而强调了此处的重要性。前庭南侧正对着衙署大门处，是所谓的“龙壁”，被认为可以保佑衙署的入口免于邪恶的影响。

越过大门，来人进入外庭，那里，两面旗杆显示出建筑群的官式特征，也说明了知县是否具有军权要位。如果没有这种重要性而是一个普通县城，就没有旗杆。继续走过下一座建筑，正义之门的“仪门”，他到达知县办公室前面的主庭。两侧分布有六部：(1) 吏部；(2) 户部；(3) 礼部；(4) 兵部；(5) 刑部；(6) 工部。中央大堂是知县主持公正的公共法庭。这里，他坐在书桌后面，面前放着他的书写用具（笔墨纸张）。中堂之后是另一个院落和另一座大堂。那里，知县接待来宾和那些巡察途中的上级。这三个庭院是衙署建筑群的中心部分，是所有这种类型中的最低标准。这中心部分的东部和西部是衙署的各种分支机构，例如带有马棚的邮局、警署、监狱及狱长办公室，粮仓及其管理员用房。可能的话，还有几处房屋供茶叶、盐以及海关检查官之用。再甚者，还有一座大型文渊阁、巡检官员住屋、文秘办公室，以及警察、勤杂、门房和仆人的用房。后面的部分多为知县私人之用，例如他的私人秘书和家人。前门的东侧是一个敬献地方神灵的土地神圣坛。因为这神灵的允许，这些建筑物才能在这片由神灵拥有的土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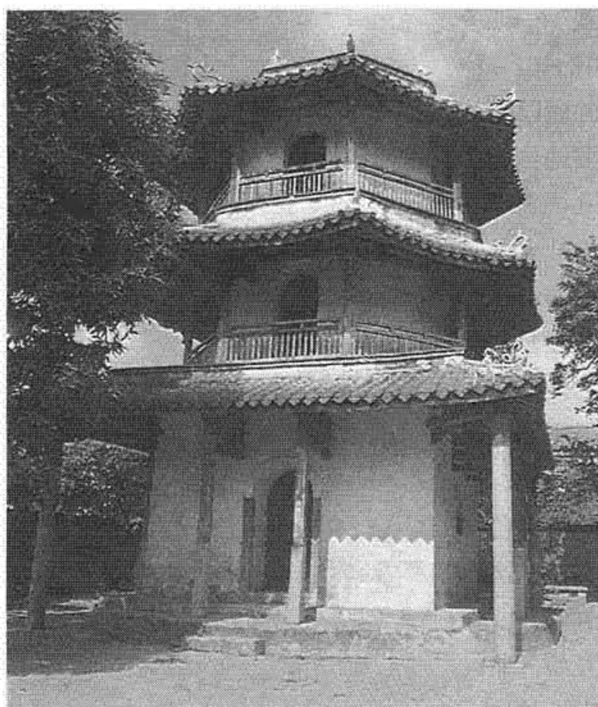
图 5.3.1.14–17 建于明代末期的台湾台南府孔庙的魁星阁

图 5.3.1.14 阁的底层是一个圆台之上的方块；第二层为圆形，第三层为带有八卦的八边形。二层是文帝，文昌坛，其伙伴魁星坐落在三层

图 5.3.1.15 文昌坛

图 5.3.1.16 魁星坛

图 5.3.1.17 19 世纪对魁星的书法描绘









建造起来。永远保证满足这神灵的良好愿望非常重要。其他敬献各种神灵的圣坛到处可见，整片建筑群体大概包含大约 50 ~ 80 座建筑物。

鉴于衙署建筑群，被称为衙门，可以看到知县在日常世俗事务中的作用。他在另一幢建筑群，通常称为孔庙或太学里，履行其仪式职责。这组建筑物合适的位置是城墙环绕部分的东南角，传统上认为，从这个位置，儒学教化和文明的影响可以向南扩展到全县及其民众。与孔庙密切相关的教育机构也在知县的监管之下。作为受到良好教育之人，人们指望他本人也参与到教育的进程之中。他必须监管他所在地区的考试，那里，参加皇家（高级）考试的候选人被选出送到省级考试，更进一步地，他必须授予那些应该得到礼遇的人士杰出荣誉头衔，比如接济穷人的"善人"、从未再婚的"贞妇"，以及其他的荣誉称号。复杂建筑群中的主要建筑物，通常也是整座城中最美丽的建筑物是孔庙。借着其多重合院、建筑物以及动人的老树（大多是银杏苍松古柏），孔庙维持了一种肃穆尊严的气氛，与城市日常生活的高速忙碌完全隔开。建筑物形成了沿着主要南北轴线的一连串院落，在南部以"龙壁"终结。参观者通过两个边门进入到第一进合院，其中一座桥引导人们越过一座半圆形池塘抵达通常是木结构的荣耀之门"仪门"。再通过"大成门"，进到主要的合院，呈一个开敞、安静、整洁带有铺地的矩形，两边是画廊。这合院的北半部，升起的平台之上耸立着主要大殿——"圣人之殿"，至美的双重屋顶，以一种精致优雅的风格建造，并辅以简单的装饰。红色占据着主要地位。主要大殿的祭坛仅仅供有孔子名字的牌位。两边，供有孔圣人最重要的四位门徒名字牌位的四座祭坛。殿前是一个宽敞的平台，其上，勤勉的学生在他们的孔子大师生日之时表演仪式舞蹈。殿后是一座小型建筑物，有供奉孔子祖先的神坛，也只仅仅设立牌位。主要的仪式在农历 8 月 27 日举行，根据传统，这是孔子的生日："生日仪式在绝对安静而漆黑的黎明时分早早开始，那巨大壮观的屋顶在天际线下难以辨认。星星高高闪耀，微风吹动着周围有年轮的树枝……然后，大鼓深沉的音符慢慢地增长。大钟的第一次敲响，震动整个夜晚。这里那里零零星星的微光，投下人们那移动缓慢而不稳的影子，高官们的绣袍，在黑暗里忽闪。"

"……万代宗师，身着紫袍的学者缓慢地移动，司仪神父取代了他的位置。现在是声音、香气、严肃而崇高的音乐慢慢地加强，然后是所有乐器的合声，舞台上的舞者在清晨的光线中摆好姿势，挥舞他们手中带有羽毛的棍棒，各色绣袍、庙宇、树木、天空，在明亮的太阳中闪耀"。"没有人会在这个仪式上更为惊奇，或可能比孔子大师本人更为震惊，"背景后面一位睿智学者如此评说。

东边，与主轴平行，又有一排院落，以明伦堂作为主要建筑。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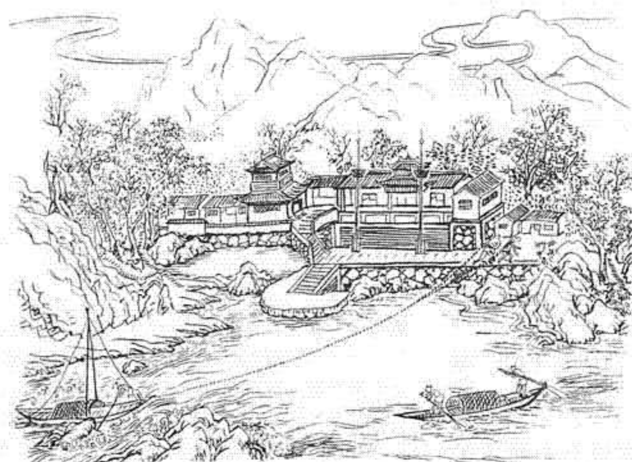
图 5.3.1.18 18 世纪广东乐昌县的纪念庙宇。韩龙阴雨庙献给著名的政治家韩愈（768–824 年），他被封为韩文公。被贬到广东潮州（潮安），在那里作为知县，从而在中国南方尊为广东蛮荒地区文明的使者。这座庙宇坐落在三龙河岸（参见图 3.3.4.1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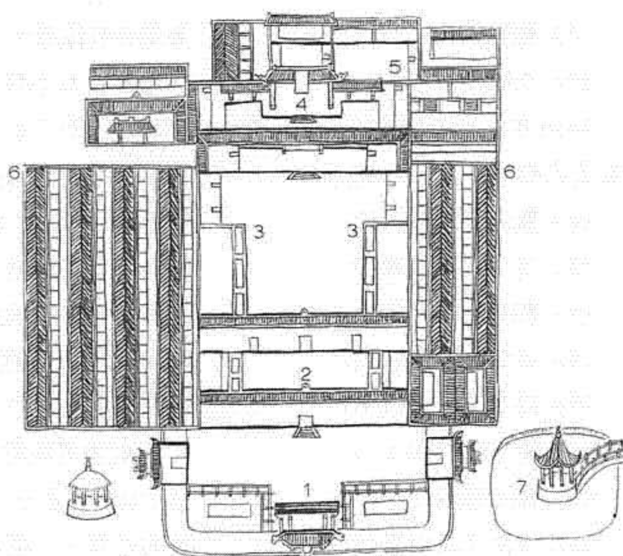
图 5.3.1.19 台湾桃园（译者加）龙潭孔庙后院的焚经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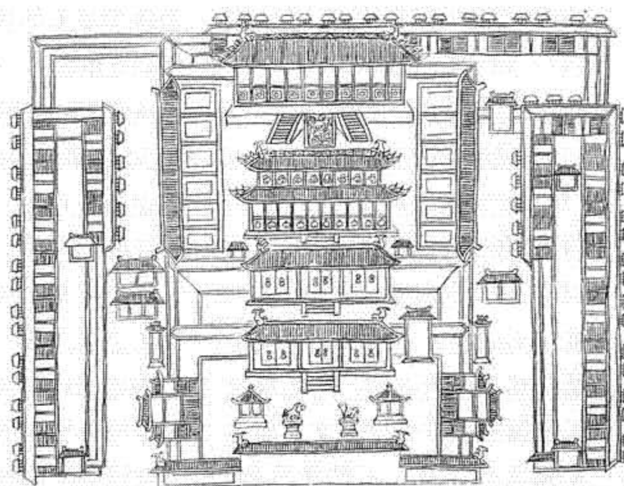
图 5.3.1.20 18 世纪湖南长沙府山华县的地区学宫。
1– 戏剧表演的平台；2– 带有外门的前院；3– 主要院落；4– 仪殿；5– 办公与书房；6– 学生们的单元小间；7– 用于作诗的中有亭子的池塘

图 5.3.1.21 18 世纪湖南长沙府的万年长寿殿。用于皇帝生日庆典主要仪式的建筑群，由沿着中央轴线的几座大殿组成，在两侧，高官显贵的房间与院落形成侧翼建筑群。右边，是来自各州各府参与者们的房间，左边，用于那些来自长沙县和在其后那些来自山华县的人们使用，这是长沙城的两个区域






5
4
6
6
3
3
2
1
7



是知县必须在此向学生和学者颂读“圣谕”的地方，从而解释“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这些圣谕已经由清代皇帝们颁发，作为他们“帝国儒教”概念的一部分，某种维持满族统治的一部分，并且使得人民顺服。六条圣谕，最初在明代颁发，1662年通过清代康熙皇帝官方认可，如下（非原文）：

（1）孝从父母；

（2）尊重兄长；

（3）睦邻和谐；

（4）教育子孙；

（5）勤勉工作；

（6）不做妄行。

1670年，康熙帝将这些扩展，颁发著名的《圣谕十六条》：

（1）敦孝悌以重人伦；

（2）笃宗族以昭雍睦；

（3）和乡党以息争讼；

（4）重农桑以足衣食；

（5）尚节俭以惜财用；

（6）隆学校以端士习；

（7）黜异端以崇正学；

（8）讲法律以儆愚顽：

（9）明礼让以厚风俗；

（10）务本业以定民志；

（11）训子弟以禁非为；

（12）息诬告以全良善；

（13）诫窝逃以免株连；

（14）完钱粮以省催科；

（15）联保甲以弭盗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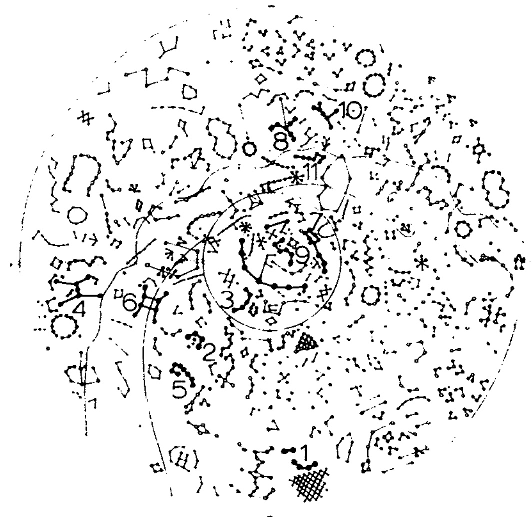
（16）解仇忿以重身命。

孔子大殿附近是文帝庙，文帝天星是仪礼和仪典之司，是北极星天廷天帝国的教育大臣。文帝庙连着一座通常两层或三层的建筑物，魁星庙。这是考生们寻求帮助的另一位天星。如果地上的皇帝是上天之子，那么，上天就是高高在上的皇帝。结果，天具有同样的帝国政府，就像地上的皇帝一样，其帝国是高高在上帝国的同类。如地上的帝国政府一样，上天政府拥有所有类似的大臣，这里，“星帝”就是大臣。例如文帝，它是魁星和文星之“星帝”，也是天上的教育大臣。另一方面，这概念暗示地上的中华帝国是天上帝国的再现，因此，城市、帝国政府的行政中心，以及那些作为皇帝官僚政治一部分的诸多官僚，都代表着天上的“星帝”。每一城市有其自己的“星帝”。每一本地方志的第一章都涉及这位“星帝”及其周围的环境。一幅18世纪的中国地图表现了高高在上圆圆的苍天以及其下部中国的地图，方形的土地。这里，最初的概念表现出来，苍天映照在帝国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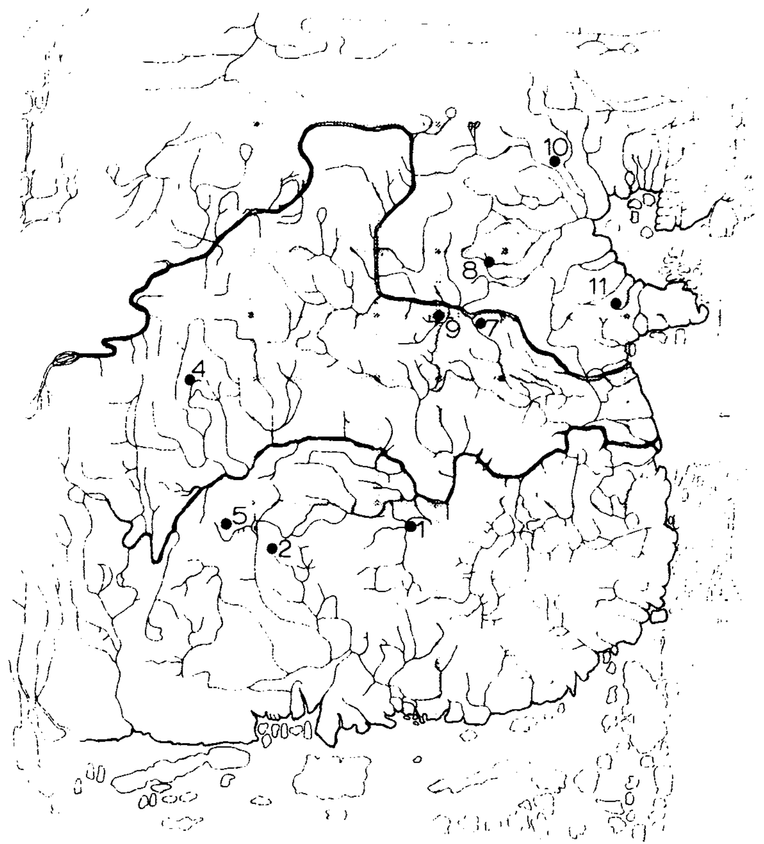
更为可取的是，在大殿的西侧是学官的办公室，这位学官同时是孔庙的监护人，他还作为那些准备参加科举考试考生的导师。附近是一条练习箭术的狭窄通道。这里，学生们互相竞赛，这是一个习惯，作为保持自律和自我教育的重要手段。基于3000年前的传统，在孔子儒学建立之前就存在。这里也有献给本地神灵的祠，即土地祠。一个像炉子一样的结构，当那些考生考试成功很久之后，就在里面燃烧一些经文，因为他们认为所有书写材料都不应该像垃圾那样扔掉。作为敬仰之物，它应该烧掉并敬献给神灵。

图5.3.1.22，23　苍天之下的帝国，正如在1721～1735年间的中国地图上所显示的那样。这张星图是江苏苏州孔庙一块石碑上拓片（与原件反方向对称）的拷贝，最初携刻于宋代时期。1－湖南长沙；2－云南昆明；3－文昌星座，其右边是带有奎星星座的北斗七星；4－四川灌县；5－云南某地；6－某星座；7－河南开封；8－河南安阳；9－河南洛阳；北极星星座；10－燕（北京）；11－山东沂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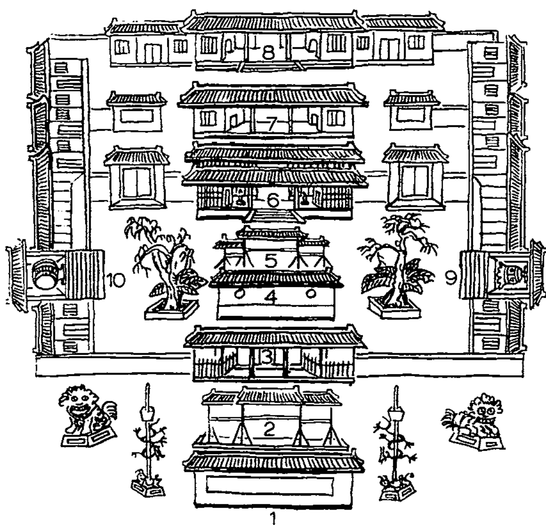
图5.3.1.24　1907年的宁夏固原州城隍庙。1－龙墙，带有升旗杆和狮子；2－牌坊；3－大门；4－内龙墙；5－内牌坊；6－大殿；7－后殿；8－为城隍的妻子所建造的庙宇；9－钟楼；10－鼓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2
4
5
7
8
9
10
11



1
2
3
4
5
6
7
8
9
10

不一定非在孔庙建筑群中，但是通常位于附近的是四座神祠。供奉那些杰出官僚、忠贞的爱国者、诚实的市民以及纯洁贞节的妇人。这里，知县必须主持献祭仪式以鼓励民众遵循这些榜样。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教育原则是“通过仪典和仪式进行教育”，这就要有所奉献和尊敬的举止。这足以解释孔庙和以上所述神祠的重要性。

这方面，这些祠庙与其他庙宇和祭坛不同，特别是道观，那是巫术和萨满教千年老传统的一部分。然而，即使知县是一个狂热的儒家，并不愿意和这些仪式亲近，特别某些情形下，自然主义的古老宗教已经退化为纯粹的迷信，基本对他已经难以接受，知县在上述这些祠庙中也难以避免仪式和仪典。中国宗教实践明显的混合主义并不需要清晰可辨的独断区分。知县参与中国文化中与自然灵魂和祖先传统相关的传统日历中的仪典和节日，这是一个习惯和民间传统。这里，对于知县来说，最为重要的是保护城墙和城壕之灵，通常翻译为城隍。这位神灵背后的概念可回溯到古老文化的堰坝和壕沟，为阻挡洪水而造。城隍是地方保护神，正如他负责管理其所管辖区域所有自然神灵和神祇一样，知县是他在人类世界中的对应物，是人的保护者，负责所有的政府职能和代理机构。正如人类的知县是苍天之下阳世的知县，城隍是地下阴间世界的知县。

结果，对于一位好知县来说，死后，被他曾经所管辖区域的人们当作城隍一样来供奉是寻常之事。城隍不仅对城市负有责任，实际上，他是整个地方单位的保护神，而（县）城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就像知县居住在所管辖区域的分部那样，城隍的神灵到处居住。每当一位新任知县在一处新地方接管三年的任期，作为约定俗成，他必须在当地的城隍庙里度过第一个夜晚。在那里，他与城隍接触，以建立良好的合作，因为城隍永远居住在这个区域，并且神通广大，城隍就像帝国的官僚一样被组织起来，因而，有府级的和省级的城隍，他们监管地方的县级城隍。每一个官吏在他管理的区域都有对应的城隍。城隍庙就像一座衙门那样布局组织也就毫不奇怪了。但是，作为一座庙宇，它比衙门建筑物更为美丽和精致。因为，城隍的实际功能并不因为文件而负担沉重，其庙宇的布局可以更为正式和简单。不需要设置次一级官吏们的办公机构。主要大殿前面的主庭院宽敞得足以摆下人们在他生日时送到他面前的所有敬献。这一天，他周围邻近各县的同僚“城隍”前来拜访。他们一起被人抬着，排着队穿过全县的领地，穿过城市的街道，在那里，他们检查庄稼以及聚居区域里的状况。与孔庙中的摆设相对比的是，城隍和他的助理由坐在神坛和祭坛上的形象代表，它们中很多成为优美艺术的实例。同样不同的是城隍庙有丰富的装饰、更为丰富色彩的游行队伍，以及充满音乐和爆竹烟火的喧闹节日。通常的节日气氛，通过歌

图 5.3.1.25 算盘，城隍的象征，设想城隍将记录下一个人的德行和劣迹，在人死后给予盖棺定论

图 5.3.1.26 台湾新竹城隍庙的屋顶。台湾新竹的城隍是省里排在至高位置的城隍，并且享有类似“公”的头衔，因此，具有鲜艳色彩的装饰祭坛。敬献的牺牲，主要呈现在他的名字牌位前，与敬献山河，敬献风、雨和雷相联系。需要敬献的牺牲，仅仅是一头猪和一只山羊。在入口前面，算命先生和药铺掌柜已经设定了担子，还可以看到白老爷的塑像，他白衣素裹，宛如城隍的助手，在很远的距离就能看清一切是非

图 5.3.1.27 在这幅图里，一起看到的还有黑老爷，那黑脸的助手。他看待周围一切事情，都是持续不断地从一边看到另一边

图 5.3.1.28 在特殊场合，城隍以四人大轿抬着，穿过整个镇子的街道，并且穿过整个的街区

图 5.3.1.29 在他生日那天，城隍迎来了来自附近街区同类们前来祝贺，他们将太师椅留在庙宇大殿的后面


七星汽水


旭泰汽車貨運行
TEL
1559




美都理髮院



剧的剧团、杂要艺人表演的节目而增强，通过庙前临时的食摊、算卦的、卖药的以及巫医而增强。

城隍与知县直接相关，说起来互为同事，然而，作为人的保护者，知县必须尽其能力和向其他的神灵致敬。一种神圣的气氛被加到知县的人身。作为皇帝的代表，又因其调和天地之间的位置，他就是人类的保护者。所有这些赋予他以责任促成天和自然精神力量的对话。这些精神力量通过与农业相关的神灵展示出来：五谷神、山川神、雨神、云神、风神以及雷神。对于他们来说，在知县的命令下，祭坛被建在城墙的外面。这里，知县在适当的季节举行适当的仪式，而且在每个方面都要适当，以避免灾难。

每年的第二个月，春分前三天，整个国家必须举行“耕圣田”仪典。每位官吏，上自京城的皇帝，下到基层的县吏，必须亲手在他所居城市附近的圣田犁上第一锄。就是因为这个目的，圣田在农业坛前铺开，敬献给神农，传说中的第一个农人，覆盖4亩的区域（数字4是阴数），这块地根据“神奇的方形”模式被划分成9个区域（数字9是阳数）。这里，两个数字的结合确保了两个基本创造力的合作，有利于中国人的主要营生方式——农业。三天之后，春分时，田地播种，社稷坛上必须表演播种仪式，类似的与丰收有关的仪典在秋分时举行。

最后，是山川的神坛，这是新石器时期古代神圣之地的再现。此处，知县放置一张纸，并接着祈祷：“只有你，具有神圣力量之神，能够产生万物。也只有你，能够滋养万物。根据皇帝的旨意，他的子民，居住在这个地方的我们，在春分秋分的节日里，带给您——我们的神，动物、酒、丝以及我们其他的产品表示我们的敬奉，也表示我们的敬仰和崇敬。”干旱时，知县有责任前往龙王的庙宇，那里供奉着天气的神灵——雨神、风神、云神以及雷神的神坛。在此，他必须祈雨或为保护人民免受洪水、流行病还有蝗虫灾害而祈祷，因为所有这些灾难被认为是由天气决定的。龙王是水的统治者，结果，他的庙宇总是坐落在水体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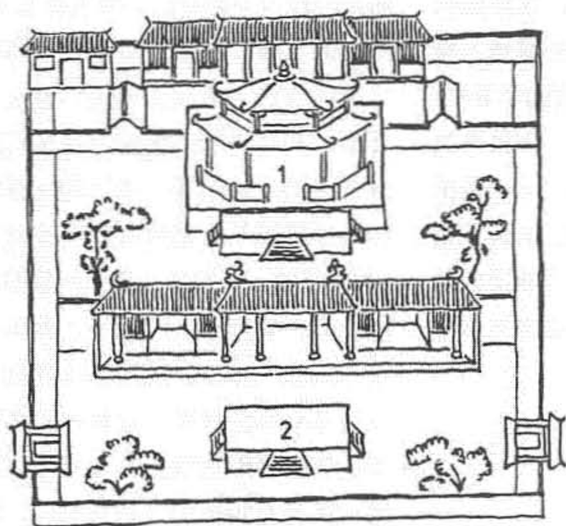
慈善机构、佛教和道教社团的庙宇并不为知县所关心，只要它们不牵涉犯罪的案子。他也不管死人、葬仪或坟墓陵墓的维护。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亲属而死去，就是说，没有后代来照顾他们的灵魂，不能在其坟墓前敬献或者保持适当的仪式时，知县将为这些所谓的“饿鬼”提供某种服务仪式。否则，这些孤独的灵魂也许会在绝望中，变成不愉快甚至危险的幽灵骚扰民众，并且招致不幸。对这些“饿鬼”们，知县必须命令在某些地方建造特殊的祭坛，即所谓的“鬼台”，它们通常建在城墙的北面，但是，如果情况必需，也可建在其他区域。一年之中，知县在这里举行三次仪典取悦他们，主要在仲夏，叫做“（游走的）野鬼”大节或“至善至爱的兄弟”大节。冬天开始时，居住在聚落各处的人们向这些（漫游的）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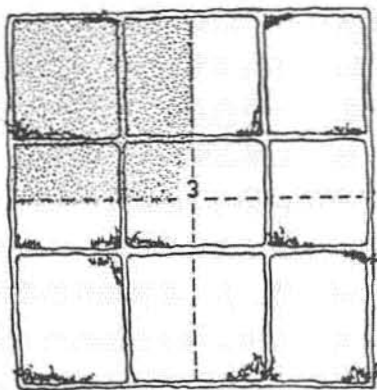
图5.3.1.30 在1979年的台湾，台南府中的神农庙宇。
1—在前面的农业坛；2—圣田；3—在一个四亩空间上的九重分划（神奇方形）（一亩等于697m²）

图5.3.1.31—33 在台湾城隍庙前的戏曲演出，1972年。
舞台是可折叠的，并且可以随着演员环整个省从一个地方移到别的地方。戏班子由那些点戏的人承担经济支持，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来确定一个表演地点，通常是在庙宇的前面，并且与相应的节日保持联系。其中一个最为流行的演出戏目是那聪明的、多才艺的、具有智慧等性格的猴戏




南
劇
北


1
2


3



鬼提供食物。知县和城隍一起，必须确保所有“游走的野鬼”得到善待，从而可以把他们送回到城隍的地下王国。

总结知县的功能，作为政府官僚，作为皇帝真正的奴仆，他实际的责任与收集税收，支持帝国的宫廷管理、军队，以及维护民众保持平和的法律和秩序有关。然而，其保护民众和传达政府文明影响的职责，主要限于仪式和仪典，而不是实际的行动。实际行动留给了民众本身。

5.3.2 军事组织

通常情况下，知县有绝对独立的责任保护其基层单位及其围墙环绕的区域。为了得到支持，他统帅一支在一位帝国官员管辖之下的士兵队伍。一般来说，对于坐落在内陆的基层地区，这只是一种在中尉掌管之下的巡察队，主要用来对付强盗之类的土匪，士兵的作用类似于地方警察。然而，在紧急情况下，知县可以通过“自愿征兵”的法规从他所统治的民众里，组织纠集一支非正规军或“勇士连”。这包括那些通过乡试正在等待分配的学生。在城外区域、边缘区域，以及新近占据的地区，基层军队以一种更为军事化的形式组织起来。这里，要塞驻军通常是一只由少校指挥的大队。少校有上尉和中尉辅佐。通常，地方区划基层单位在中文里被称为县，但是，其他的具有更多军事组织（机构）的单位被称为州或厅，也就是府的分支。虽然，知县决定调动这些武装部队，他必须将决定军事行动的权利留交给军事指挥官，他的同事和同级（官员）。

军事指挥官的办公机构作为知县衙门机构的主要部分以同样的方式组织起来，但是他的办公机构常常拥有一座高墙或至少有木栅围绕，并围有供士兵居住的兵营。在他的主要办公室旁边，有一个小合院，用于演练箭技和其他军事技艺。沿着城墙，在敬奉给真武的武庙前面有几处训练场。城墙外稍偏北处，观察平台的前方是一大片平原，那里，指挥官检阅部队并指挥操练。他手下的一位官员，通常是一个二等中尉作为边防行动指挥官，并拥有独立的办公地点，这位副指挥官负责维持用于防卫的城墙、城壕、炮台，以及在城门上方的守卫室。城门附近有两座神坛，一座供奉当地的地方神——土地神，另一座供奉武神。守卫兵的编制，由班长指挥之下的士兵组成，在当地被分置到特殊的岗位，他们在城市军事指挥官的管辖区域内活动。

5.4 经济结构

如上所见，对城市主义发展贡献极大的经济力量获得势头，宋代，特别在12世纪的南宋，随着唐代末年的萌芽，相应的城市社会不仅仅由帝国官僚及其部属所构成，而且拥有来自所有贸易的民众，他们多富裕并具有文化，与作为整体的国家以及国际贸易有许多联系。随着经济生活的扩展，贯穿国家各地的众多商业中心城市发展起来，并通过经济活动的节点不仅从商业上，也从制造业上，给行政中心增添了附加的城市网络。在帝国末期，大约20世纪之初，有大约39000个如此的经济活动节点，这也是城市的市场中心，它们是可以计数的，平均每25个地方区划单位里有一座行政城市。现代学者根据其经济的重要性将之分为三组：枢纽式城镇、中等性质城镇以及标准的市场城镇，它们通常排在行政中心之下。

经济发展也影响各层等级的行政中心。经济性重要的地方，城市的体系发展与行政等级相关却又具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通过行政中心的经济等级表现出来。所有的五级和四级行政中心，即省一级的省府，被列为中央和地区大都市，其经济上的级别与其在行政制度上的地位相等，但这种同样的经济性等级从最低等级的行政城市（如三级的、二级的、甚至一级的行政中心）算起有七个层次，其中某些不同级别城市在经济上往往比官方看来更高一级的行政城市更为重要。在三级的行政中心城市中，超过一半具有较低的经济等级。二级中心的城市中大约一半在经济上也不太重要，但是，其中一些城市的经济性却更为重要。在地方一级中心城市中，大约60%是不太重要的，仅算为市场城镇，同样，其中约8%被认为更为重要，具有大城市的等级，甚至是区域性的都市。关于地方中心城市杰出的例子是山东省的潍县城，其经济地位的排名与省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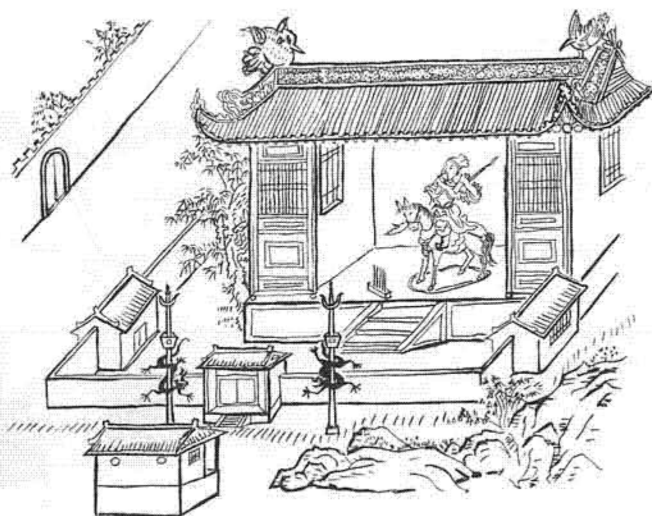
图5.3.2.1 军事管理城镇和城堡，宁夏，固原州，1907年。
1－具有独立地位的州（政府）知县衙门机构，他们无需与知府商量就可直接向省级统治者报告；2－鼓楼；3－主要指挥官办公室；4－孔庙；5－皇帝的生辰大殿；6－教练场；7－副指挥官办公室；8－文昌庙（文帝庙）；9－城隍庙；10－南市，两座建筑；11－上清帝庙；12－龙王庙；13－炎帝庙（火神庙）；14－新校营；15－在雕楼内的武庙。
两座坚固的带有城垛和雕楼的加固墙体，包围着这座行政管理级别的州城，像县一样的地方行政单位，但是具有军事功能，坐落在长城的南部，大约甘肃省都城兰州以东225公里处，戈壁沙漠的南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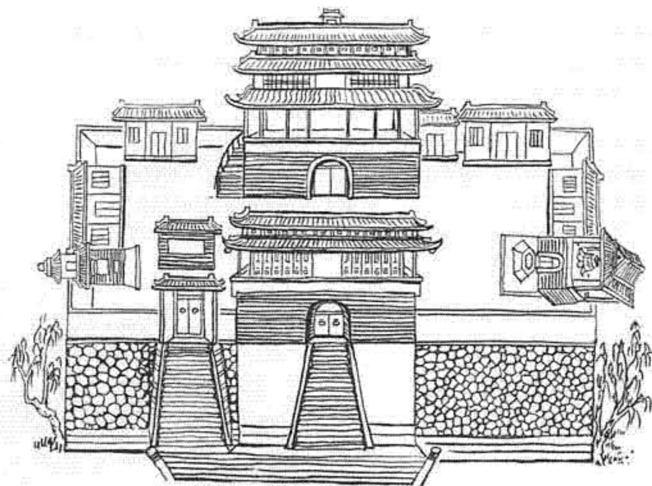
图5.3.2.2-4 宁夏固原边塞城镇内的几座建筑物，190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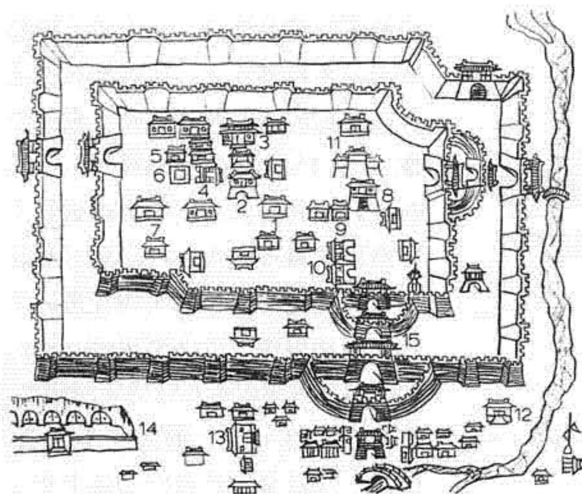
图5.3.2.2 关帝庙，表现了著名的武神关帝配带着战戟骑在马上。城墙之外，中央正门之前是用于戏剧和杂技表演的固定舞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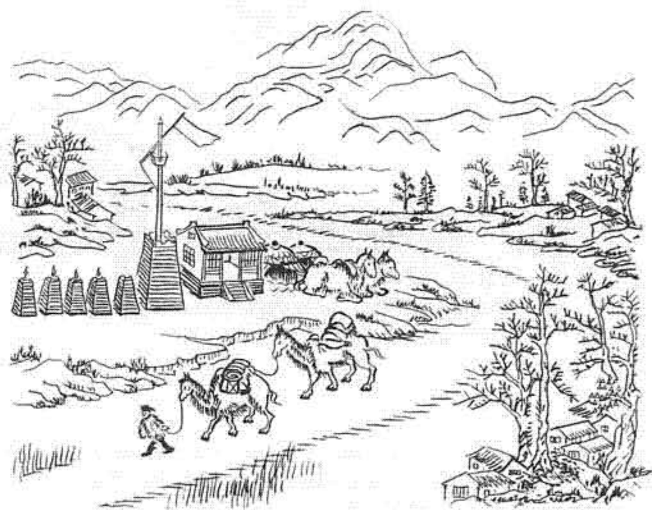
图5.3.2.3 高台上的武神庙，右边有钟亭，左边是鼓亭

图5.3.2.4 一个带有旗桩的公路驿站，有从固原到长城路上的蒙古帐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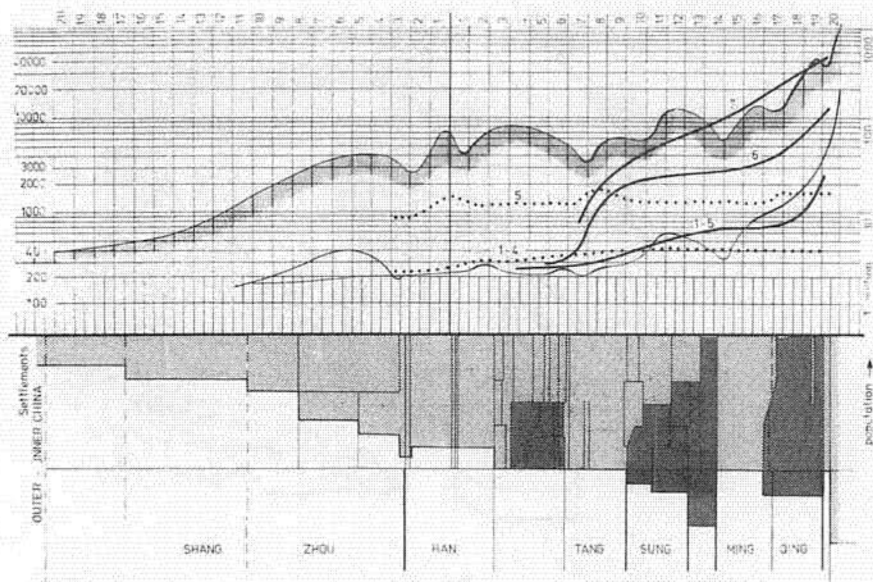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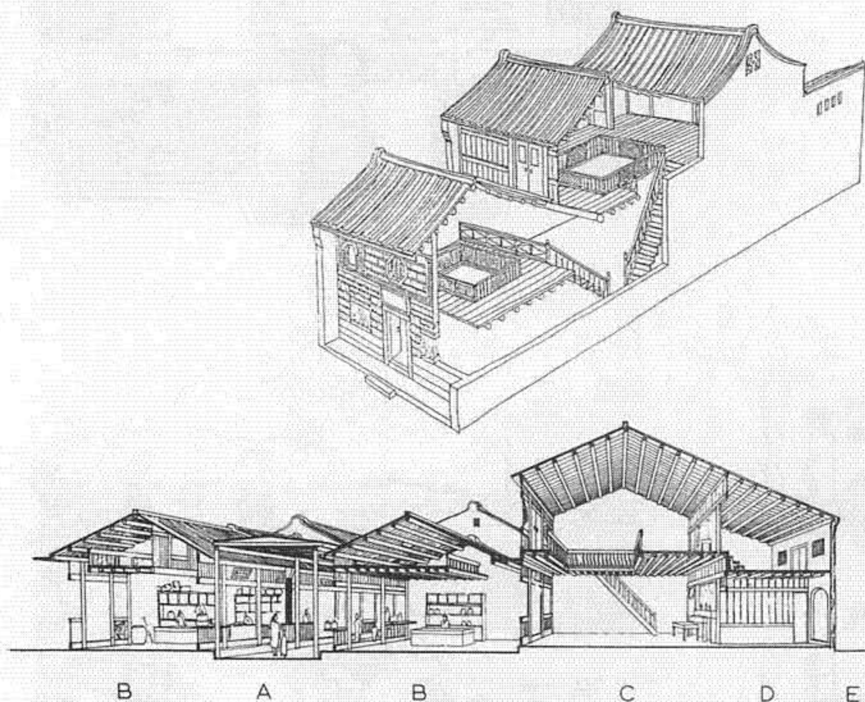


图 5.4.1.1 从汉代到清代，中国聚落的发展，随城市人口增长的聚落相关表[1]。计算尺，百万的人口，成百的聚落，行政管理级别 1-4 和 5 的单位数量，以及具有经济的 1-5，6 和 7 级的聚落等级

图 5.4.1.2，3 中国南方市街上的前店后屋式居住建筑，A- 市街，覆盖着屋顶用来遮阳挡雨；B- 在屋顶之下，带有贮藏之地的商店朝向市街开放；C- 两层的居住建筑：在一层为用于祖先崇拜的家庭祭坛，二层具有一个开口，使得光线进入到一层和居住空间内；D- 在一层和二层的卧室；E- 一座合院，带有厨房，一座小花园，贮藏间，附加的卧室和厕所



一样高。考虑到巨大的经济发展以及众多的市场中心，我们很奇怪地注意到在大约 1538 个行政城市中，仅有 728 个城市具有相当于或者超过其行政级别的经济表现，而且，超过一半以上（810 个）并没有在经济上达到官方所期望的地位。更为令人吃惊的是，因为大约 128 个非行政城镇，即仅仅具有经济重要性的中心城市，与一、二或三级行政中心城市具有同等级别，尽管管理这些城市的官僚住在远离它们之外的等级低得多的行政中心里。结果是许多中心市场城镇变成比它们所在的地方行政中心更大的聚落集群。

虽然以一种与中世纪欧洲非常相同的方式组织，这些非常有势力的行会和商人组织并不将他们自身看成是当时主要势力结构政治上的对手。相反，他们非常努力地尽可能友好地与行政官员联络，以便通过政府的关系更进一步推广自己的商务。高官们总是试图限制这些联系，但是，更为普遍的是他们本身陷入其中。结果，从未发展出“自由城市”的政治概念。由于这样的城市与乡村差不多，没有拥有自己市民机构的行政管理单位，也就不像 12 ~ 15 世纪的欧洲那样，不具备那种使其居民独立于本地强势人群欺压的城市氛围。行会和贸易联盟专门处理与他们相关的业务，是经济活动组织中的主要因素。他们的组织并不局限于自己居住的城市，而是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当地、区域，以及全国范围的功能上相互

1 参见 John.D.Durand The Population Statistica of China AD2-AD1953. Population Statistics.Val.Xll.no.3，1960；Gilbert 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Princeton，1973；G.William Skinner.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1977.

交织的网络，他们根据自己的原则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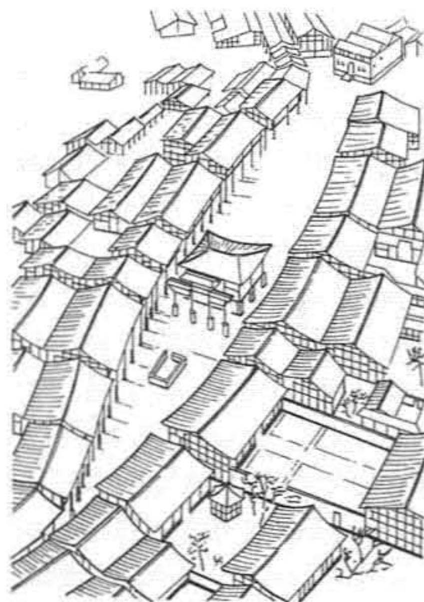
5.4.1 市场街道

城区，用于贸易和工艺的建筑物与那些供家庭居住的普通住宅建筑不同。沿着狭窄的市场街道，开敞的店铺以一条长列布置，一个店挨着一个店，各店前方有着不到5米宽的店面。但是，在商店的后面，一连串建筑物和小院落远远地延伸到背景之中，有时达一百多米深。这里，居住着店主一家，有储存间、作坊、小花园，以及不管是什么，店主为其生意所需要的场地。通常情况下，商店建筑物仅一层高，但是，在南方城市中，它们以二层或三层的建筑物在有遮挡的步行街后面建造起来，这些步行街用于遮挡太阳以及阻碍热带的暴风骤雨。其他情形，作为整体的市场街道，有竹席或其他轻质屋面材料覆盖。因为生意需要更多的空间，两个或者更多的商店建筑物被结合起来，形成带有多个单元的街面。这些建筑物的后边则一起形成一段对外严密的墙体，仅仅留下运输原材料、垃圾或夜间排污物的小门。市场街道通过门被分成几个部分，这些门在营业时间之外关闭。因此，没有人可以进出。这种保护方法几乎像城市的城墙一样有效，因为这些非行政性的市场中心没有资格拥有城墙，只有行政中心城市可以有城墙来保护这些机构。在其他聚落中，这大概仅是非常特殊的实例，其中，非行政性市场中心已经发展为一个由

图5.4.1.4 四川罗城的小市镇，作者著述时代所见。图中上部是本地的庙宇，在市街的中心，庙宇前面是永久性的戏台，为观众留有足够的空间

图5.4.1.5 在四川成都以北，另一条小的市街，从空中的鸟瞰，1945年。引自华盛顿国家档案馆

图5.4.1.6 台湾某市镇，1969年从空中所见，前店后屋式的建筑物，在大街中央的两侧聚在一起







一系列市场街道相连的城市聚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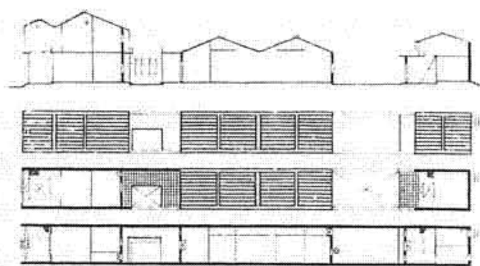
在大型的城市集群中，不同的贸易通常有其自己的市场街道，那里，与一种工艺相关联的所有贸易者或者匠人们在一个地方定居。其中，他们也有自己的行会会所，以及他们在这条街上赞助“圣人”的庙宇或神坛。其他的行会会所，特别对那些在全国旅行的商人们，有时形成像庙宇一般的、有着作为小旅店的广阔合院的建筑群。它们大多由来自同一省份的商人联合组织所拥有，并且有几个机构支撑，例如，银行设施、葬礼设施、邮政设施等。在比较大的城市集群中，有成千的商店，其中有作坊，用于木材加工、铁加工，制作家具、象棋，还聚集有棺材制造商、铁匠、制作刀具和剪刀的人、青铜铸造师和机械师、雕刻制造庙宇中雕像的人、绘制商店招牌的人、用于灯具的装饰、神祇的图像、篮子、灯笼制造商、造纸商、制造绳带人、制造扫帚和刷子的人，还有玻璃和瓷器店、银饰和金匠铺、珠宝店、丝绸店和缎庄、纺纱工、理发的、卖丝织品的商人、油坊和糖果制造商、草药和医药店铺，以及中医、兑币店和当铺、代人写信的、小食摊和街边食店、几间餐馆和茶室提供省里的特产和许多其他产品。另外还有书店、专门印书装订的人、木刻以及卷轴画装裱业务。作坊的主人通常出售他们自己的产品，但是，有些产品在远方专业生产，并且是大批量供应给整个国家，因此，也有商人和贸易者，仅仅专门贩卖这些商品。18世纪开始，一位在台湾岛台南市参观的人士如此写道：“所渴望的每一样东西都可能找到。”“都是岛屿本身所滋养的，例如，大米、糖、糖果、烟叶、盐以及极受华人推崇的烟熏鹿肉。各种水果，各种衣服、棉织品、麻醉剂、一些特定树种的树皮以及有些象征雀巢的植物，还有一定数量的中草药，其中大部分对于欧洲来说是未知的，以及从国外进口的东西。例如，中国人和印度人的织物、丝织品、清漆、瓷器，以及各种欧洲的手工艺品……，街道几乎全部以线状布局，并且在一年中有7到8个月期间都是有遮挡的，以免受太阳的照射。这些街道仅仅30～40英尺宽，但是，在某些地方，有大约5公里长，有一些例外的是这些街上也令人称羡地排列着一些商品房屋，以及丝织品瓷器、漆具和其他物品装饰的商店。这些街道展现了最富有魅力的走廊外观，如果拥挤的农人相对少一些，铺地相对好一些，穿越它们将会是一个极大的乐趣。街道有帐篷遮荫而仅仅允许可以看到一些商店，房屋隐藏在它们的后面”(DeMailla，1715年)。台南城在那个时候仅有100年的历史，在明代末年作为一个港口城市而成立，居住有几万的华人居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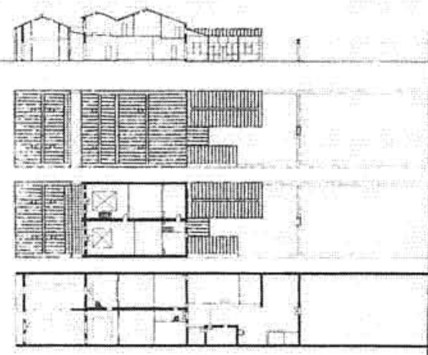
5.4.2 市民

贸易商和匠人在传统华人社会里是最低的社会阶层，只有“士”和“农”被认为具有较高的地位，然而前者是真正可以提供财富教育他们孩子的人，因此这些人对于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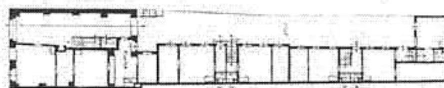
图5.4.1.7 带有庙宇和地主庄园府邸的典型市街，比例1：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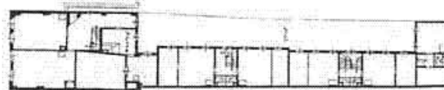
图5.4.1.8 鹿港典型的前店后屋式建筑，与德国柏林15世纪时的一座中世纪的房屋类型比较，比例1：7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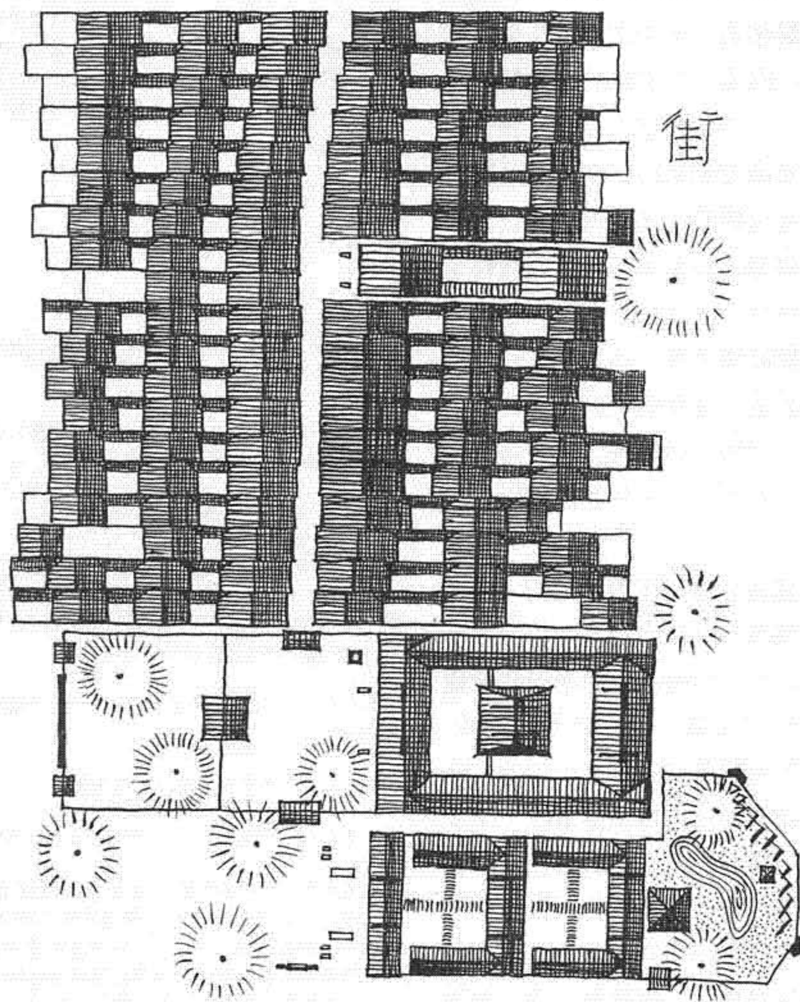











街

市文化的发展有相当的贡献。由于国家政府中官员的数目总是非常受限制的，而且并不随着人口和经济的发展而增加，只有非常少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能够成为官员。然而，通过考试之后，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士绅中的一员，成为社会阶层的顶层，特别是如果他通过了第二次考试并由此获得较高的学历。与来自其贸易而积累的财富相结合，这位官员的社会声望高且稳固。在皇朝的最后几个世纪中，所有人口中仅有大约1%～1.5%是士绅。但是，包括他们的家庭，他们代表了城市人口的大约25%，是城市人口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贸易商和匠人大约构成城市人口的40%～50%，其余的是劳动力、仆人、苦力、轿夫……拾荒倒粪者、音乐人、唱歌的、杂耍的和其他一些人。这些人被排除在作为进阶考试的候选人外，而且，仅有极少的人有机会得到必须的教育。

儒家传统教育提倡每个具有正常心智和正常体魄的人，应该能够成为任何较高社会阶层或职业群体之一分子。获取较高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个人的勤奋与热情，并且需要谨慎生活以保护所取得的成就，但是，这也许在一个家庭之内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因此，是一个家庭获得地位，而每一个人并不是为他／她自己工作，而是为他／她的家庭，也就是说，是为了他家庭将来的几代人工作。一般为大众接受的社会流动性，其意味着一个农民的儿子可以成为一个学者，或一个小商人的儿子可以成为处于最高位的政治家，这使城市人口永远忙碌，并且为勤劳人民独立自尊的人格贡献力量。如果一个商人或艺人的家庭，已经通过家庭成员的成功应试进举取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且，如果经济成功已经转变成为了土地财产的拥有权，那么，一个新的住屋肯定就能够兴建起来。新的住屋宁愿靠近城市，甚至在城市的墙围区域内，它不该离市街太远，市街是生活的基础，益于家庭的富裕兴旺，并且提供所有日常生活必需品。

这新的房屋由几进院落组成，与以上所描述的官衙建筑十分相似，其中居住着一家人之首以及最近的亲人。因为一个家庭的理想是五代同居于一个屋檐之下，有几户分支为小家庭与亲属们居住在附近建筑中。未结婚的家庭成员居住在后面女眷用房，而东厢房居住着男性亲属。拥有一座花园，无论大小，完全根据环境条件，这完全是一个自尊的表达。这样的花园，包含着某种设计好的美丽景观，这些景观拥有适宜的名字，并且是休闲娱乐之地。

富裕和有文化的绅士们，通过他们那些有文化并拥有学位的家庭成员，可以与城市中的帝国官僚建立良好的关系。地方官本人认为，这种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家庭能够通过提供紧急情况下突发事情的财务支持，来满足他从事此项工作，或者为本单位居民从那些非官方的事情中获益。这些事项包括建筑或修建一座城墙，建造额外

9	13	17
10	14	18
11	15	19
12	16	20

图5.4.1.9–20 小型市街，也许仅有非常简单的只是一层的商店，但是，更重要的市街也许排列有两层甚至三层的商业建筑。在底层的商店之前有骑楼。市街非常拥挤，而在商店之前布置了几处作坊，在那里，这几处作坊占据了部分街道

图5.4.1.9 在台湾淡水的小市街

图5.4.1.10 棺材代理商

图5.4.1.11 广东广州的市街，1900年

图5.4.1.12 用于宗教仪式的各种装饰品的商店

图5.4.1.13 在台湾北埔带有骑楼（街廊）的两层商店建筑，背景中是带有庙宇的市街

图5.4.1.14 在商店和居住部分之间的后院

图5.4.1.15 台湾北埔的中药店

图5.4.1.16 福建漳州的两层商业建筑，大概为一人所建，房主将它租给了店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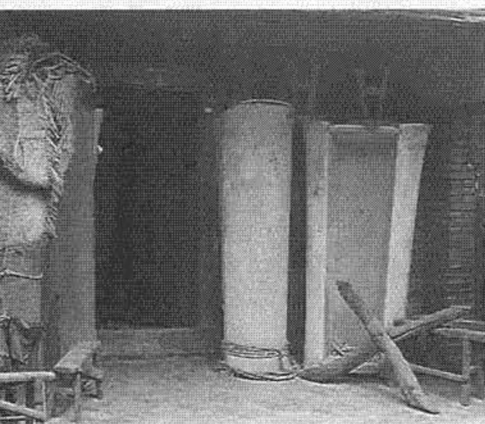
图5.4.1.17 在市街骑楼建筑中，用于丝绸绣花的作坊

图5.4.1.18 市街作坊的黄铜伪造物品

图5.4.1.19 山东曲阜1983年城门之外的市街

图5.4.1.20 台湾鹿港的前店后宅式建筑，1968年。从市街的入口，如果没有商店的话，依然可以以墙围绕。但是，取而代之的是用于特殊产品的作坊，在二层的居住建筑部分的开口处，为底层（一层）提供了足够的光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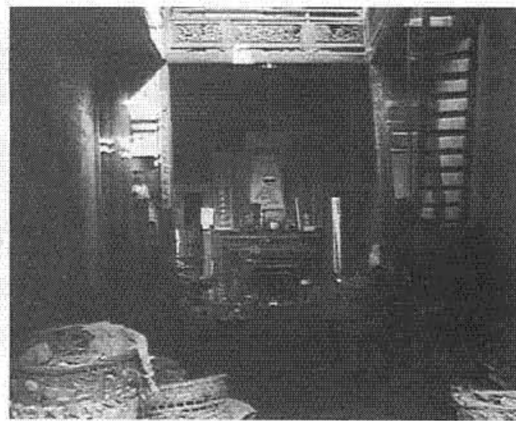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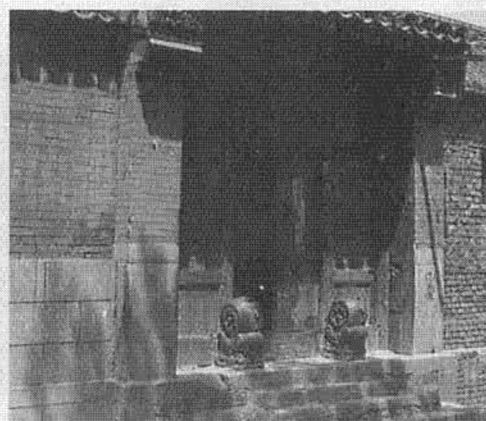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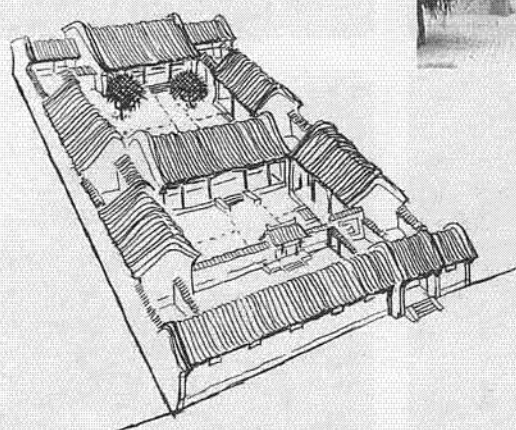












1 4 6

2 5 7

3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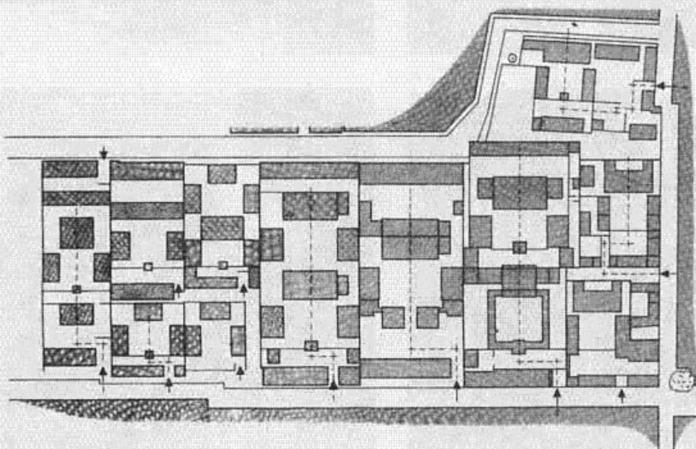


图 5.4.2.1–8 在中国北部的居住建筑，所谓的"合院"形式

图 5.4.2.1 山西太原的合院建筑

图 5.4.2.2，3 在从前北京鞑靼城的合院式建筑布局，平面比例 1 ∶ 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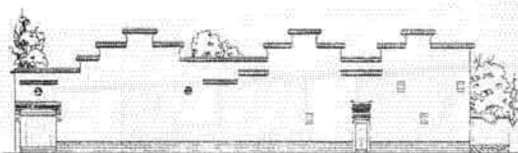
图 5.4.2.4 北京（胡同）的居住巷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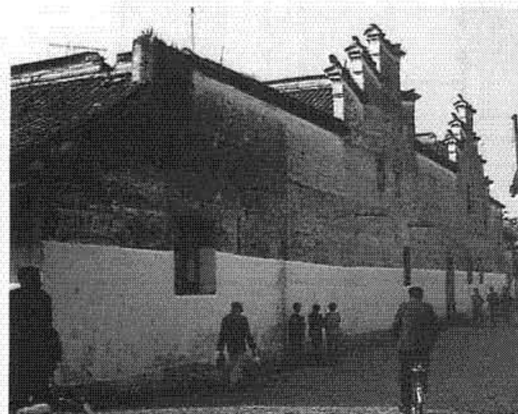
图 5.4.2.5 曲阜孔府的女眷角落以及居屋，198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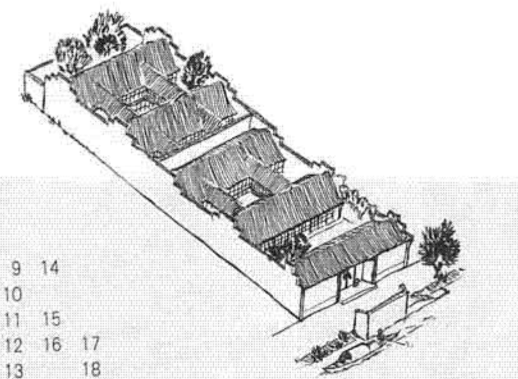
图 5.4.2.6 北京从胡同入口到合院建筑，1983 年

图 5.4.2.7，8 村庄中的房屋建筑是合院式房屋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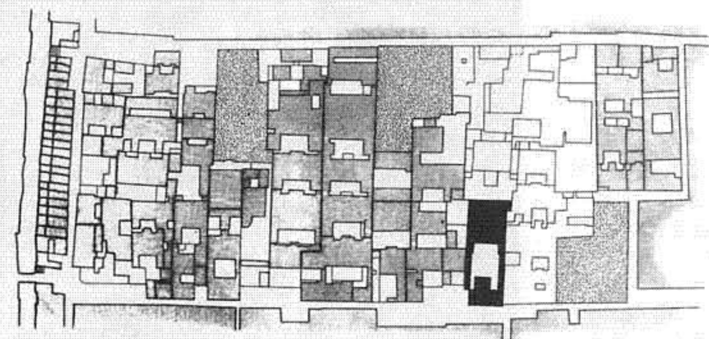








9 14
10
11 15
12 16 17
13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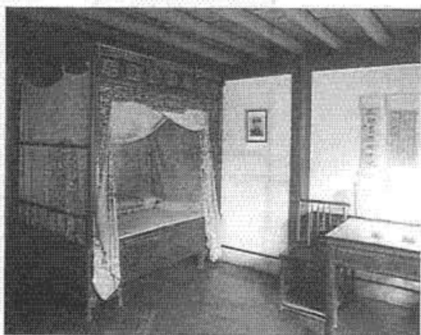




图 5.4.2.9–18 在中国南部的居住建筑，华南的民居是建造在 30 ~ 40 米宽，100 – 200 米长的地基上，有几座大殿和建筑物，一个接着一个，建造在两座长墙之间。这两座长墙是作为财产边界线建造的

图 5.4.2.9，10 江苏苏州一座典型的两层建筑物，比例 1 : 600

图 5.4.2.11 江苏松江一座两层建筑物，具有典型的阶梯形山墙，198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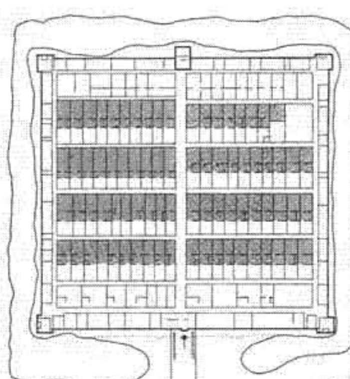
图 5.4.2.12，13 江苏苏州的居住建筑物的布局，平面比例 1 : 2000，参见陈从周《苏州古住宅》，在此院落缩减至小庭院，足够大，为主要的两层建筑提供光线和空气，上海，195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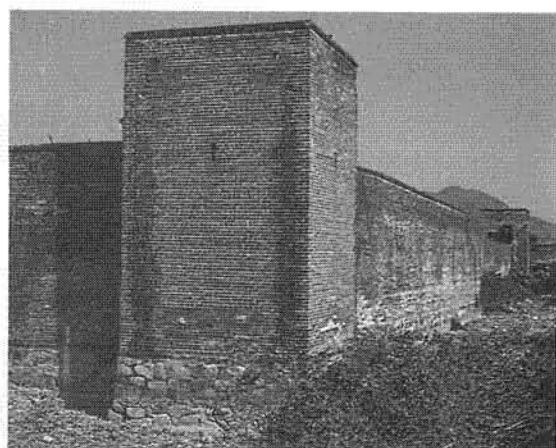
图 5.4.2.14 在江苏扬州的一座两层住宅中，有家庭祭坛的底层接待大厅，1983 年

图 5.4.2.15 在浙江绍兴一座住宅中的卧室，1983 年

图 5.4.2.16 南京的鸟瞰图

图 5.4.2.17，18 香港新界沙田的村庄，平面比例 1 : 2000。原先是一座由坚固围墙所围绕的家庭住宅，用于抵御南部沿海不稳定之状况。祭祖坛位于北墙的中心位置





的米仓，兴建和维护各种庙宇。此外，富裕的家庭还供养乐班及资助其他节庆活动，甚至还为娱乐地方官的客人们提供开销，开销太大以至于地方官本人无法承受。最后，也许这是城市中最为重要的私人事项，即他们关心学校和图书馆的建造，有时叫书院，这些绝大多数坐落在非常宜人的环境中，有时甚至在城外。这些富裕家庭无论在城内还是城外，作为地主都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距离他们乡村府邸很近的地方，他们兴建市街市镇，他们建造相当数量的商店并且根据环境所需，提供庙宇和其他公共设施。也有一些情况下富裕家庭提供出土地作为新城的基础，其中新的行政中心包含一定数量的市街并且以墙体围绕。这些富裕家庭还提供经费来组织挖掘运河，建造桥梁，铺设街道和广场以及其他的公共项目。因为所有的这些活动，他们被授予荣誉称号和市民的身份。对于一些成员来说，地方官得到帝国的允许在城市街道上建造牌坊。他们那些丰功伟绩和善行品德在牌坊上大书特书，镌刻进牌楼门匾彰显给世人。在特殊情形下，皇帝亲自手书文字并将其镌刻进牌坊匾额上。

家族的精神和社会的中心是祖先的祠堂。不但每一个家庭的房屋中心空间为祖先牌位和敬献之坛；具有几个分支的大家族还建造前面带有庭院的独立厅堂，颇像一座庙宇，其中，那些已经作古的祖宗牌位，以代的顺序、关系的顺序和社会地位的顺序进行排列。这些名字排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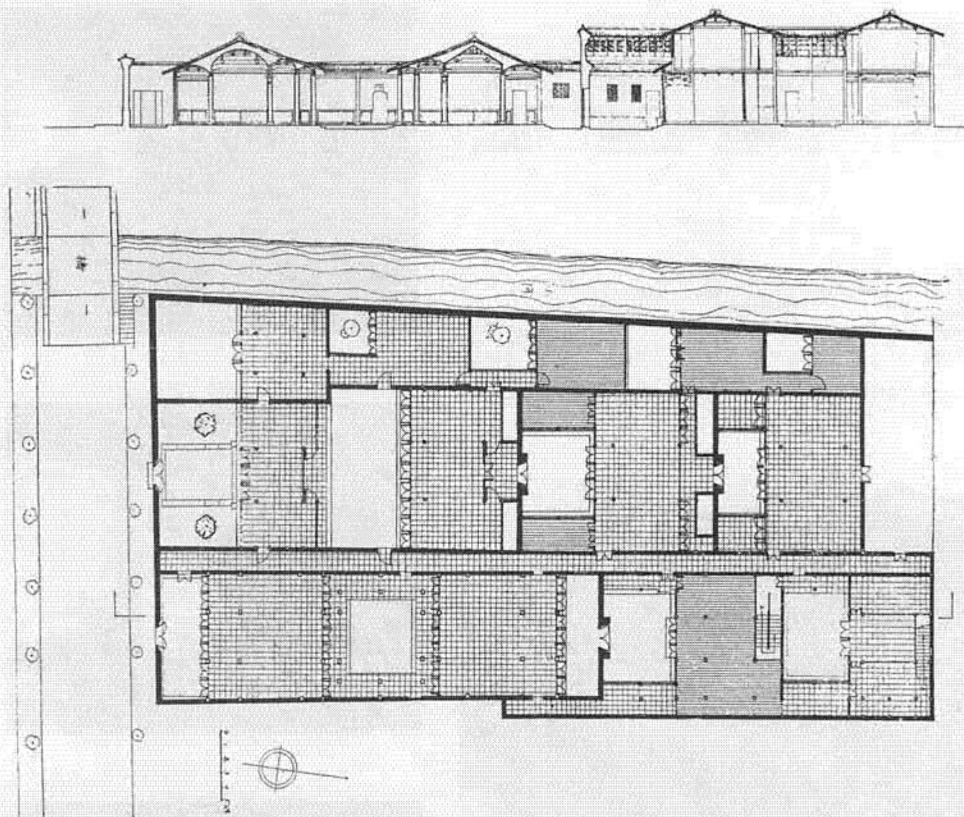


图 5.4.2.19，20 江苏苏州陈氏住宅布局，1958 年，比例 1：400。
在剖面图中的左边，我们见到两座单层的大厅，用于接待客人，并且用于家族族长的营生；在右边，是两层的女性家眷居住用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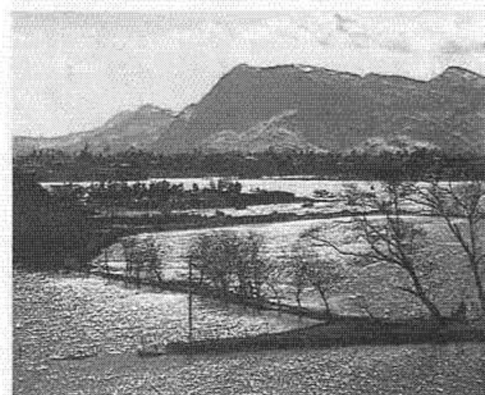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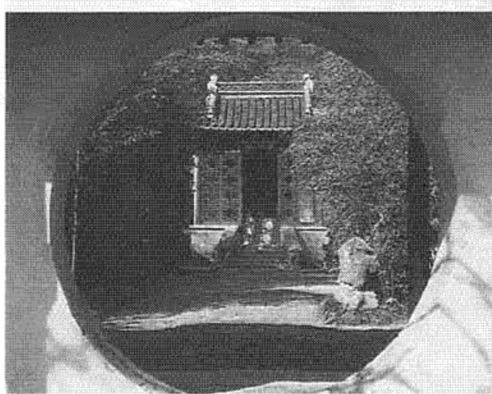


图 5.4.2.21 上海豫园中单层建筑中的接待厅








22 23 24 28

25 29

26 30

27 31

图5.4.2.22，23　一位绅士在园中作诗，而一位女子凝望着花园，晚清绘画

图5.4.2.24–31　在江苏一些城市中和其他地方住宅中的花园景观

图5.4.2.24　在南京的Tian Wan Fu花园，以其简单而有品位的建筑，并没有妨碍花园的自然美，1983年

图5.4.2.25　江苏嘉定的一座小园子，秋霞浦园林之一部分，1983年

图5.4.2.26　19世纪初期，广东省广州市一位富商家庭的园子。Engraving by C.T.Dixon after the drawing by T.Allom，London，1843年。
这园子似乎是拥挤并且以装饰丰富之建筑成群布置，非常接近富人们专横傲慢的不良品味

图5.4.2.27　江苏镇江东北的焦山岛上的园林景观，有其清洁和简洁的建筑特征，1983年

图5.4.2.28，29　著名的江苏无锡寄畅园，1983年。锡山及山上的龙光塔，可以在背景中看到。这两幅是园林所使用的“借景”手法，仅仅覆盖大约1公顷，1983年

图5.4.2.30　湖边的公园，正如在云南昆明大观亭所见一样。
滇池浅湾，由小池坝所弯曲环绕，以允许参观者可以赤脚过河。背景之中的太华山是公园里借景的一部分

图5.4.2.31　江苏扬州寄啸山庄园林中的戏台，由池塘所围绕













图 5.4.2.32–37　在中国南方的祖先崇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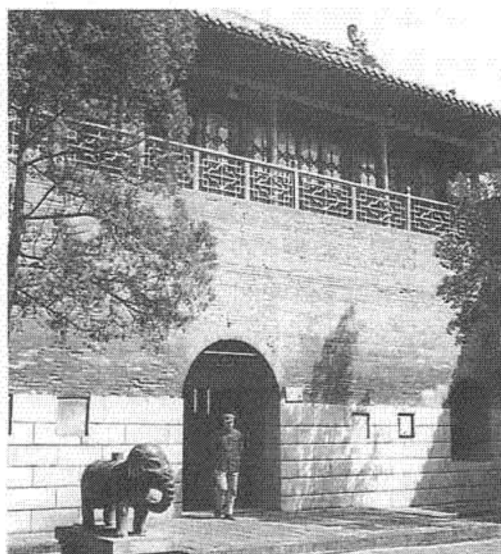
图 5.4.2.32　台湾北埔一个药房老板的家，中央入口装饰，用于现在这一代人的祖父生日庆典之用

图 5.4.2.33　在主要建筑中央大厅中之家庭神龛，祖父、祖母的卷轴画被悬挂于墙上，而神龛装饰偶尔用之

图 5.4.2.34　在香港新界上水的宗祠，1969 年。虽然，这家族的建立者生活在 14 世纪初期，由名字牌位所代表的几代人，仅包括最后从 1828 年开始的七代人，当时，兴建了这座祖宗大殿

图 5.4.2.35，36　居住建筑群之外的宗祠安排着大约八代的名牌，根据他们在家族之树中的位置，上面的一行，是这一地方家庭创始者族谱线，他是一位受过教育的人，并且在 18 世纪的最后几年，在这前沿地区兴建教育设施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图 5.4.2.37　在台湾安平渔人之家的住宅中，一座宗祠，带有家庭的祭坛，在左边门上方摆置祖母的照片，为女性祖先所在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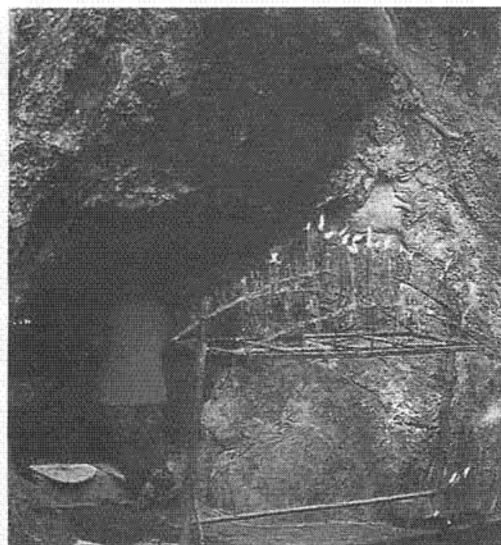


图5.5.1.2 山西太原吕洞宾庙宇，其雕塑放置于大厅底层拱顶的房间之中，1980年

图5.5.3 浙江杭州西北一座窟，其内供奉着吕洞宾像，1983年

图5.5.4 不朽的吕洞宾塑像，吕洞宾是中医、作家和学者们的庇护神。755～805年确有其人，生活在江西德化，是一位地方官，他成为了后来中国最杰出的道士仙人。



被认为是阳灵的体现，而坟中尸骨则代表了阴魂。两者都必须妥善照看以确保子孙后代的运气和家族的繁荣。家族，其由所有同姓家庭组成，是一个社会机构，保护和支持其成员。家族拥有共同的墓地、财产、谷仓、学校，而且作为社会活动的中心和一个归属感和根源精神中心的宗祠。在儒家真正的精神中，大堂中是没有人像的，只立名字牌位，但是在所有其他方面，这些大堂以其良好组织的布局和充满趣味的细部象征了居住建筑的顶峰，在一个更高水准上的家庭起源之所。

5.5 宗教机构

与孔庙和家庙相对比的是，孔庙和家庙限定对精选的一部分人群开放，其中，重点放在公德和社会规则上，而纯粹的庙宇宗教机构对所有的民众开放，很多可以被认为已经提供了一般意义上的公共设施。

中国宗教的非独断性和混合性在于其发展出大量的神灵仪礼，各具特点，在理性基础上无法区别。很多的仪式仅是一般的习俗以及传承的实践，并没有非常严格的宗教意义上的界定，却应用广泛。结果，任何的描述仅仅只能集中在更为重要的机构及其建筑表现的基本特点，以及它们在城市结构中的地位。首先应该区别两个主要的宗教组织，即道教和佛教，两者虽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结构大不相同。佛教是一个非常类似于教堂的机构，主要基于组织精良的佛寺和尼庵，具有规

模宏大而复杂的庙宇建筑物，其布局遵循一个总体上被认可的与信仰的精神结构相关的体系。而道教构成了一个永远动态的、在不同地区千年的进程中发展起来的习惯、传说、神奇巫术实践的巨大库藏。可以这样说，在更近代的时间里，这两个宗教在不同的行动领域里有了各自的建树。道教在所有与繁殖、生产、繁荣之类的事务上服务于人民，在仪典上，也就与婚姻、子女以及家庭的未来繁荣相关；而佛教看重与死有关的事项，并将死者送到“佛的未来西方极乐世界”，也就注重葬礼仪式。然而，两种宗教，或者应该说，它们不同的庙宇和寺院，是社会和兄弟会的中心，以及所有的社会组织的中心，例如，行会、商人组织、省级俱乐部以及其他的机构。并将他们的会馆以及慈善机构与奉祀各自圣贤的庙宇结合在一起。这些社会，其中有的称为秘密社会，涉及一些政治问题，甚至对一些造反活动提供后勤上的支持。

5.5.1 中国传统

一个城市圣贤最好也最突出的实例是关帝、武神，也是商人和其他诸多贸易商的保护神。他的故事表现了如何通过神化一位历史人物而产生神明，并最终将其归入道教的万神系统。公元 162 年，此人在山西省出生，中国文学中最令人喜爱的著作之一《三国演义》对其一生有所记载。1120 年，大约在他 219 年死后的 900 年，他被封为诚实和忠义的“忠惠公”（译者注：应该为宋徽宗崇宁元年，即 1102 年 ）。8 年之后（译者注：应为宣和五年，1123 年 ），他被提升为“义勇武安王”。1130 年，加上了武神和文公的称呼。1594 年（译者注：应为康熙五年，1666 年），又加封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自那时起，他被官方供奉为关帝或武帝。帝国政府建立了大约有 1600 多座庙宇奉祀他，以上所提的国家城市中的各种机构组织则为他建立了 1 万座以上的庙宇。最后，在 19 世纪中叶，他被提升到与孔夫子同等的地位。公众死刑执行人的刀剑被保留在他的庙宇中，而且，负责执行死刑的知县在执行死刑之后需要进入这座庙宇中（得到保护），因为他知道被绞死鬼之魂不敢进入这庙宇。

鉴于关帝的故事，在一座城市里发现好几座关帝庙一点也不奇怪。其中，至少一座关帝庙为士兵开放，几座为了不同的贸易组织，肯定还有一座是帝国级别的关帝庙，官方的，对所有人开放，它成为一种社区中心，用于公共节日，用于民间祈祷和咨询，用于舞台上的戏剧表演，这舞台是关帝庙建筑物中关帝神像前的一个必备部分，还用于杂技和模拟战斗练习。艺术品、植物或特殊产品的展览也在其院落和大殿之中举行，还有音乐会、读唱或说书表演。所有生动的喧闹的中国人社会生活里丰富多彩的事件，那些完全被严格地排除在孔庙之外的事件，都在关帝庙内或关帝庙前发生。就其社会意义来说，这座庙宇堪与中世纪欧洲城市中的教堂比美，因为关帝是皇帝所支持的，他被整个国家所敬仰并且被所有的人崇拜。

在沿海省份，关帝有一位女性对应物。说的是，海神妈祖，这是渔民和航海人的保护神，作为一位救苦救难者，她也在很多情况下被广大民众所崇拜，特别被那些希望有子嗣的妇女崇拜。她也被认为是一位历史人物，公元 960 年出生于福建省，987 年，在通常的提升过程中，被封为一位女神。1127 年到 1280 年间，她被升到皇妃的地位，并于 1287 年升为天妃。最后，1680 年清代的康熙皇帝升她为天后。她的庙宇和有关她的节日尽可能地丰富多彩。通常，她的庙宇矗立在市场街道的尽端，俯瞰着人们每天的各项活动。有时，聚落布局内如此显赫的位置上也耸立着奉祀其他神灵的庙宇，但是所有的都是较小聚落或城市分支中精神和社会生活的焦点，我们可以称它们为街坊寺庙，因为它们完全由邻里街坊的民众支持。

中国人关于神灵的“万神观”可通过如下简单的体系分组：

自然神，由山河、雨水、天气、大地土壤、植物、矿物以及动物代表；

文化神，由农业、养蚕业、工艺、医药、文化、英雄、传说中的皇帝代表；

执政天神，由星神代表，对应人间政府及其所有的政府机构；

历史人物，作为杰出性格和成就的样板；

孤魂野鬼，罪人、石头、树木、



图 5.5.1.1　在台湾北部河边三峡小市镇，庙宇的屋顶冒出建筑的表面，197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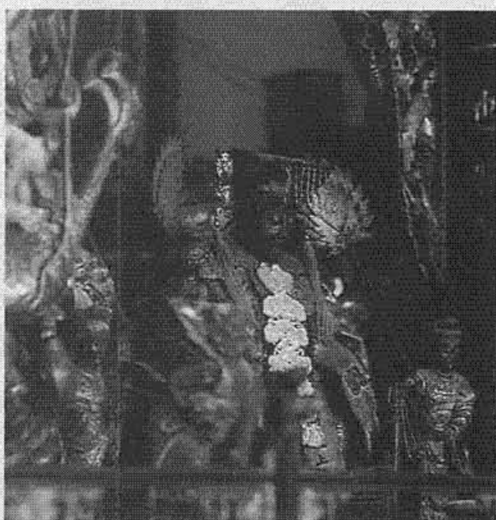


图 5.5.1.2，3　关帝，好战者和商人们的偶像，在台湾新竹的庙宇之中表现出来，作为一个公众贤达来吸引商人，1969 年

图 5.5.1.2　关帝，由其所抱养的儿子关平陪伴，而这两位一起，也被文人作为他们的圣贤所膜拜

图 5.5.1.3　在市街舞龙

图 5.5.1.4，5　在某旧市镇中的龙山庙，现如今是台湾省台北最老的街区，这是一座复合式庙宇的最好实例，因为它是献给神以及传统中国所有信仰之中的神灵的，除了佛教中的观音，最重要的也是最典型的是海神妈祖，是岛民的主要神明，其他神明包括关帝、主生女神、海神、福神等

图 5.5.1.4　龙山庙的主要入口，1969 年

图 5.5.1.5　海神妈祖，从 16 世纪被带到台湾鹿港庙的塑像，福建沿海从湄州岛那里诞生了妈祖

图 5.5.1.6–8　台湾市镇和海丰渔港，台南以南，1971 年，在中央市场靠海的一边是妈祖庙，两行市场畜舍隔栏彼此相对，而在庙宇前面广场之外的临时戏台靠河兴建，在庙宇的前面进行了一个临时的扩建，那里，为了妈祖诞辰这一节日而建造了船模，在节庆的日子里，船模将被带往海边，燃烧后祭献给女神

图 5.5.1.6　海丰的鸟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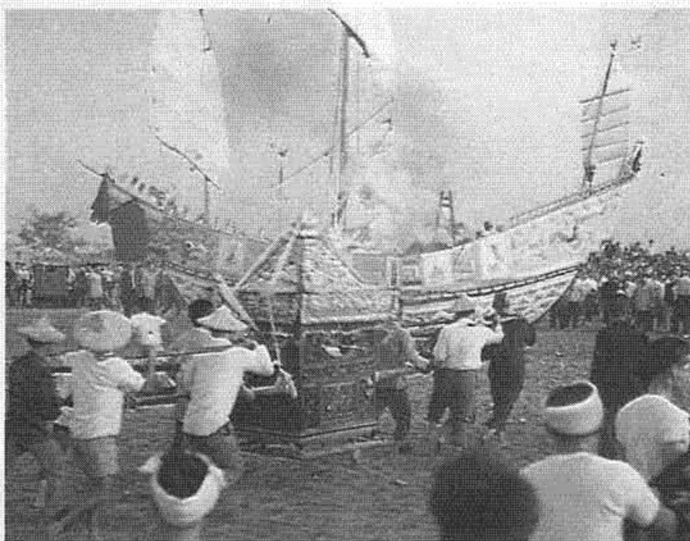
图 5.5.1.7　在妈祖庙前面的船模

图 5.5.1.8　烧船

		6
2	4	7
3	5	8







动物以及其他类似于洞窟和泉水的地方神灵。

这些所有万神中的成员根据各自的重要性而受到崇拜，有些安放在城市中的大庙，其他的则置于偏远过时的地方坛庙之中。在感觉适宜的地方，奉祀着无数的神灵和较小的神祇的神庙和祭坛，在城市和城镇，在村庄和乡村。简言之，已知世界的每一个部分，自然与人类都在一座庙宇或神坛或另一座庙宇里发现其精神表达。这提供了一个复杂的精神力量体系。中国人必须发现并维持与这些力量良好而有用的关系，通过仪典和巫术确保他们的支持或保护，这是一个复杂的具有精神治疗意义的体系。

从以上来看，接下来的就是，一所建筑、一座房子或一座坟墓的建造，一个聚落的发展，或者一座城镇或城市的兴建，只有尽可能地与最佳的自然精神力量相结合，才能成功。必须考虑两种主要因素：首先，选择适当的地段，与山河有关，与气候条件有关，并且该地段会产生支持人类生活的属性，如果发现了某些缺陷，必须采用适当的修复方法来保护人民免受邪恶的影响；第二个因素是发现作为整体建造的最适宜的布局和形式，以及不同部分适当的比例，以确保蕴涵于形状、大小、规模以及建筑材料和色彩之间的自然力量的有效合作，从而保证精神的力量不被侵犯。第一种考虑因素在风水理论中体系化，集中在“气”说，也就是“生命之气”；第二种因素基于阴和阳的原则及其











9 12 1

10 13 2

11 14 3

图5.5.1.9 台湾台南的妈祖庙，前面为小市场，在老树荫之中的社区生活的中心，1968 年

图5.5.1.10，11 张天师（35—157 年），其名张道陵，一直活到 123 岁。天师的称号在 424 年授赐给他的子孙后代，并且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直到第六十四代今天的族长，他立于左边，在参加台湾新竹一个家族祖先们幸福安康的表演仪典

图5.5.1.12—14 一些在民间宗教中重要的神祇

图5.5.1.12 典型的土地公神坛，该坛在一处所形成的像田字一样繁荣的地方旁边的一棵大树下

图5.5.1.13 火神，这一称号以各种各样传说人物的性格显示出来，甚至包括农业神、神农，后者是有益的火神中之一，然而，许多是相当危险的

图5.5.1.14 土地公，这里显示的是泥塑的雕像。这泥由这方神祇所统治的相应的本地土壤制成，雕塑日期为 1623 年

图5.5.2.1 龙华庙，上海西部的，原来兴建于 242 年。现今的建筑物，是在 18 世纪重建的，但是，塔要回溯到宋代。第一座大殿是弥勒佛，侧翼为钟楼和鼓楼；第二座大殿是天王殿，主要大殿是大雄宝殿，而后面的是三圣殿

图5.5.2.2 其名字是由玄奘和尚所译（602—664 年），译为观音，怜悯女神。原来本是印度的男性神祇，他通过采用一个更古老的中国神祇之名而变性为女身

图5.5.2.3 在朝鲜某庙宇里的佛，表现了佛中心的本质和他的两个化身。左边的过去的启智之佛和右边的现今的历史之佛释迦牟尼。雕塑为 5.5 米高，可以追溯至 162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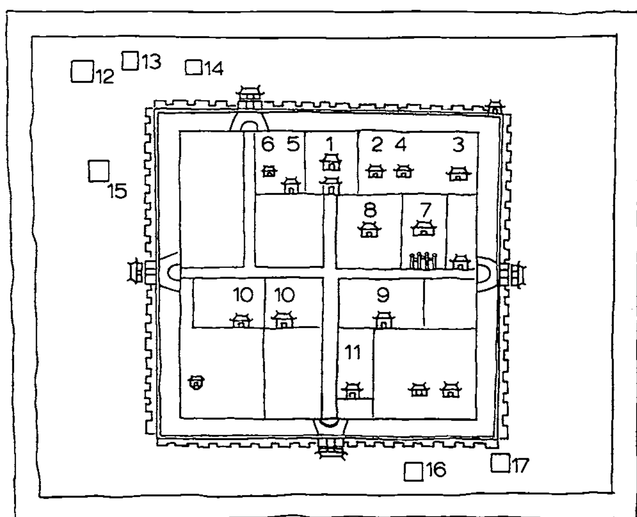
在数字、形状以及和谐构图上的表达。蕴涵在这些理论和原则之中的规则和概念必须尽可能准确地应用和实行。它们至少与当今遍及各地的，现代文明中建筑模式的法则和条例同样重要。如果各个部分和比例落在可容忍的范围之外，这建筑物或聚落就是不适于人聚居的，对这些规则的忽视也就等于招惹灾难和不幸。

在这一点上，我们又可以在第二种考虑之中强调“神奇方形”概念的持续重要性，就是说与建筑物和聚落设计的布局法则和原理有关。许多庙宇和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建筑物布局和设计都基于“神奇方形”，基于代表阴阳力量的神圣数字的应用。在城市和城镇布局中，“神奇方形”的数字及其重要特性的原则是明显的，甚至在一些实例中，其聚落模式是因为几个世纪的毁坏和重建，或者因为聚落区域的逐渐增长，甚至以更为实际的考虑，是城墙位置排列的结果。

5.5.2 佛教

由于其寺院的特征，佛教从公元 1 世纪传入中国起，就是最有组织的宗教社团。起先，这种信仰与中国特殊的地域性没有任何固有的联系，不管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现佛寺，只要它们能够得到支持，居住其中的和尚、尼姑可以受到供养。然而，就寺院社团而言(在佛教的思想之中)，具有一种隔离隐退的倾向，与服务大众的思想有某种矛盾对立。这种倾向导致寺院建于荒野，在遥远的山区或森林地带，在孤岛或类似的偏僻处。关于寺院生活的其他观点需要寺庙与人口集中区域，即城市地区保持永久关系。因为很多高官富人以及狂热的信徒舍宅清财建造庙宇或寺院，一系列庙宇也在城市和城镇涌现出来。分布于城墙围绕的市区或郊区，以及附近的方便地带。公元 6 世纪初，当时的北魏洛阳大都市区包含 1367 座佛寺用于 100 多万居民。而如我们以上所说，道教似乎不存在一样。这些庙宇中有大约 200 座是重要的，而且是相当大的寺院。很容易想像这些寺院建筑物，它们宏大的大殿、院落以及高塔对当时城市景观的影响。13 世纪杭州城市发展的高峰时，城市区域有多于 100 万的人口，城墙之内有 57 座大小寺院，以及邻近的 31 座尼庵。在杭州城区所属的两个府中，建有 385 座佛教建制，其中大约一半位于城市的腹地。佛寺所建的每一处，塔给城市及其周围都增加了一种有趣的建筑元素。参观三世尊佛大殿更是一个提升心智的体验。渐渐地，塔变成了独立的建筑物，在城市内部和围绕城市的适当地段作为一种防御性工具被建造起来，只在其周边围绕以较小的建筑物供养几个和尚。通常，这些塔里存有一些遗迹，如果不是佛本身，便是圣像及其他神圣的人物。

三世尊佛永远是中国佛寺的中心，此外，还有两个非常吸引大众的神圣，就是阿弥陀佛和所谓的怜悯仁慈女神观音。都只在东亚的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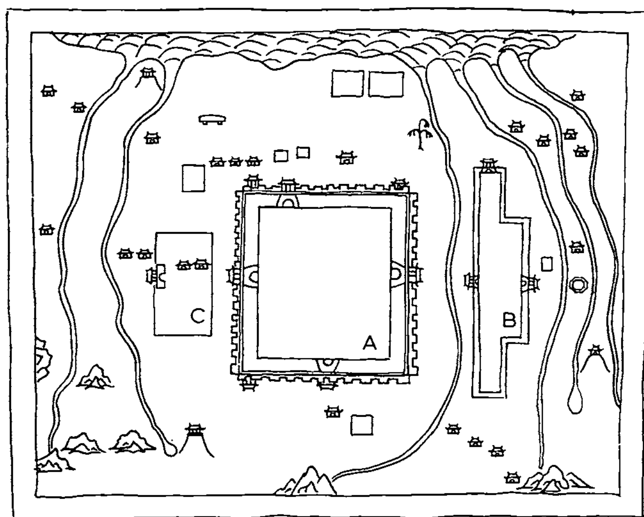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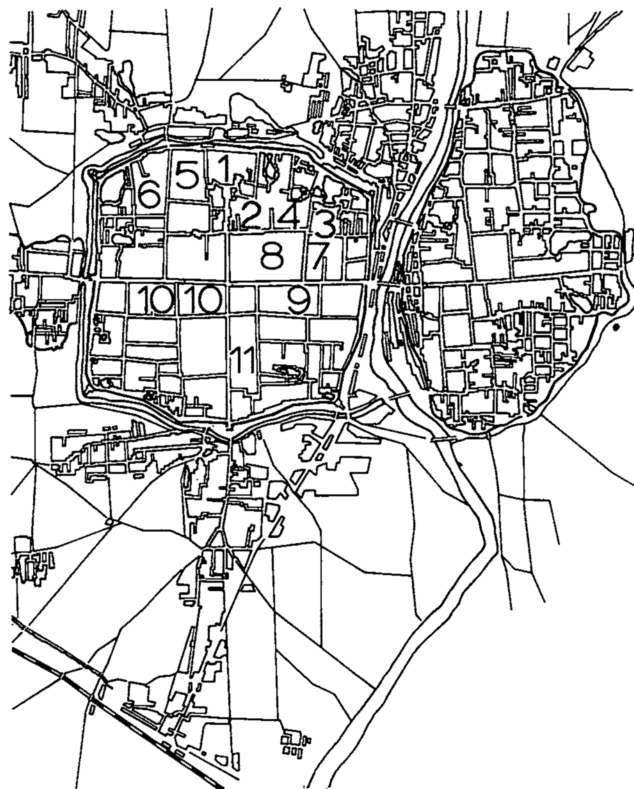
图 5.6.1.1–3 山东莱州府的潍县，一级行政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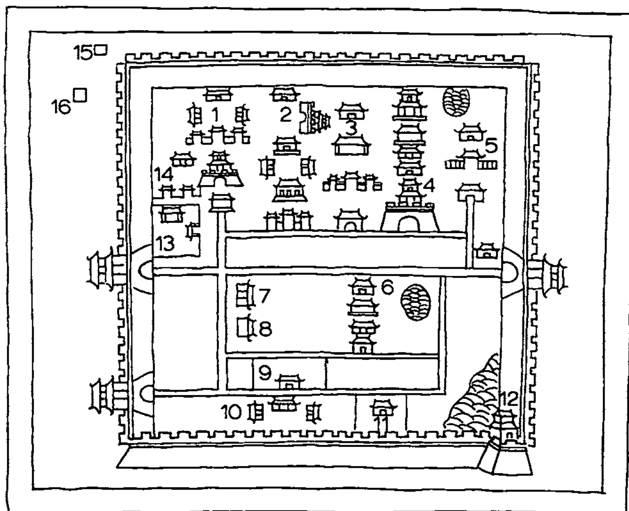
图 5.6.1.1 1603 年城镇的平面。
1– 县衙；2– 刑署法院；3– 法庭；4– 关王（后来的关帝）庙；5– 城隍庙；6– 阴阳学派；7– 孔庙；8– 泰山庙（东岳圣山）；9– 孤儿院；10– 佛寺；11– 仓廪；12– 军训（操场）；13– 社稷坛；14– 饿鬼坛；15– 龙王庙；16– 关王（关帝）庙；17– 风雨坛

图 5.6.1.2 1603 年的潍县地区，表现了行政中心（A）、商业中心（B）和西郊（C），主要的交通线由沿着公路的邮局表示出来

图 5.6.1.3 1937 年城镇的平面，比例 1 ：40000。
在河西的行政城镇和河东的商业城镇。虽然，行政中心仅仅排列为第一级（最低层级）的中心，商业中心是最高级别的中心。作为一个区域性大都市，其重要性远超出了县的界限、府的界限以及甚至省的界限（正如在图 5.6.1.1 中所显示的数目那样）

图 5.6.1.4 1603 年的一座县城。这座城市有某种不寻常的街道模式，仅有三座城门，但是没有北门和南门。
1– 带有钟楼的县衙；2– 孔庙；3– 法庭；4– 带有鼓楼的圣贤宗祠；5– 海防道台行署；6– 城隍庙；7– 忠义庙；8– 关王（后来关帝）庙；9– 孤儿院；10– 社区粮仓；11– 射箭场；12– 魁星阁（楼）；13– 成功显赫市民神祠；14– 阴 – 阳学派；15– 饿鬼坛；16– 社稷坛





传佛教中受到供奉而且都与解救灵魂相关，因此其重要性体现在葬仪中。对阿弥陀佛的介绍是通过信仰和简单仪式的赎身教条。不仅给和尚，而且给所有民众带来拯救。要获得救赎，不再需要十几年的学习和练习，仅仅简单的仪式就行。这与几千年来华人早已谙熟的巫术实践非常紧密地联系起来。这种教义与佛教原初的概念相矛盾，在于它承诺西天的救赎，比如，将升天代替了佛教原来的最高目标涅槃、寂灭。这种涅槃的奇怪概念，对中国人的心智是完全陌生的，与祖先崇拜，中国人的宗教和信仰中心，无法相比。阿弥陀佛的菩萨形式，被称为观音，在公元7世纪被玄奘和尚翻译为此名，在这个名字下，他成为所有围绕佛的菩萨里最受欢迎的一位。因为最初，仅仅男性能够达到佛陀境界，观音原先也是一位男性菩萨，但是，根据广泛流传的传说，他后来转化成一位女性，并且成为一位怜悯仁慈的女神，引导承载灵魂救赎的船只渡过生命和死亡之海达到净土或西方天堂。这里，怜悯仁慈的女神观音和海上女神妈祖彼此非常接近，结果，在很多地方，特别在中国的东南一带，她们被结合在一起，供奉于同一座庙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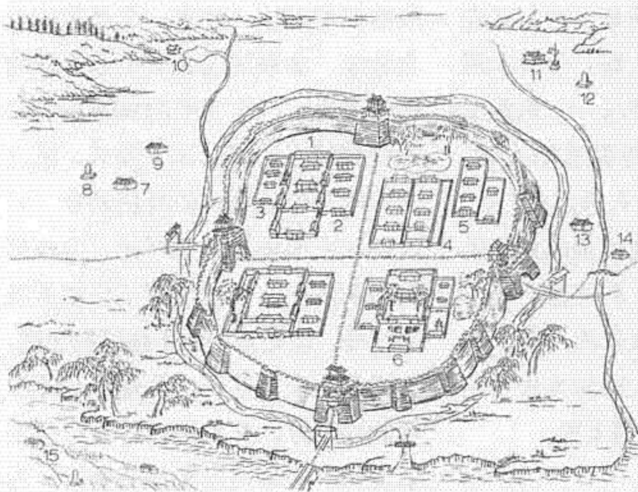
这个非常短小的描述只是作为一个对佛寺和庙宇一般布局的简单引介。越过小河上的小桥之后，参观者通过一个入口大门进入寺庙区。在此，四大天王在四极的四个方位保护着他们的信仰。下一站可能是一个面带欢笑、肥胖、半裸的阿弥陀佛坐像大殿。其后是一座有观音及其保护者雕像的大殿。沿着大殿的墙壁排列着十八罗汉——佛的追随者，也是半具有传说性的人物，其形像有时是最为感人的艺术作品，因为每一位不同的性格都以如此生动的方式描绘出来。在这之后的主要大殿通常是三尊大佛的所在，其尺度惊人，后面的大殿作为居住在佛寺后部和尚们的上课大殿。

5.6 物质结构

在试图提供一个系统的框架描述蕴藏在中国城市和城镇布局的原则时，我们必须再次考虑构成城市总体发展基础的三个主要功能。第一是具有行政结构的政治力量，这是汉代决定城市存在的主要原由，结果，根据其理念和需要，形成了城市聚落的布局模式。其特征可以归结为“中心化”、等级秩序以及仪式的重要性。这表现在城内行政机构的中心位置以及建筑群体布局的轴线化。等级秩序以一种可见的方式表达，建筑物和院落根据其重要性而相互连接，并体现于设计之中，比如它们的规模（尺寸）、装饰、色彩，以及总体上的外观。对仪典的义务影响着城市的布局，即需要城市的总体布局遵循仪典的模式。更进一步地，一套确定的仪式数字码被用于墙体和街道模式的建造。第二个功能是防御。军事政府试图将每座城市变成一座具有坚固的高墙、塔以及让人难以入内的窄门的要塞城堡。在城内，将鼓楼和钟楼置于战略要害部位，建立一个严密的安全体系。如果郊区必须被包含在防御体系里，一个完整的城寨可能会围绕着城市发展起来。最后，第三个元素，就是城市的经济功能。与仪典和军事模式形成对比，它根据实际和功能的考虑决定了交通系统的布局，就是为了便于接近和交换，生产和分配。这产生了城市区域的功能性划分，并将街道体系分为主要大街、市场街道和居住巷弄。因此，出现了中国城市的多功能模式。城市的规模受其经济的重要性和生意的数量影响；城市聚落的位置布局遵循着交通便捷可达的路线，在贸易中心城市，城墙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必须要有一座城墙的话，就必须有许多宽阔的城门提供城内外之间连续的交通。这与行政和防御城市严格的制度形成直接对比。

5.6.1 仪典体系

仪典模式的主要焦点当然是政府机构的建筑物，以知县的衙门大殿为中心。因为，知县是居于世界中心的皇帝的代表，知县也就位居他自己的世界，他所在的县府（或当地行政单位）的中心。城墙代表了其居所的外墙，衙门办公室和院落沿着中央轴线安排，理想的是南北轴线。这轴线有时向更南方向延伸。那里它与该县的主要道路之一相连。有时，这条主要道路也在衙门的大门前通过，或者是南北向的道路和东南向的道路形成一个T形交叉口。这为知县的衙门提供了一个感人的地段。我们很有趣地发


10
11
12
9
8
7
1
3
2
4
5
13
14
6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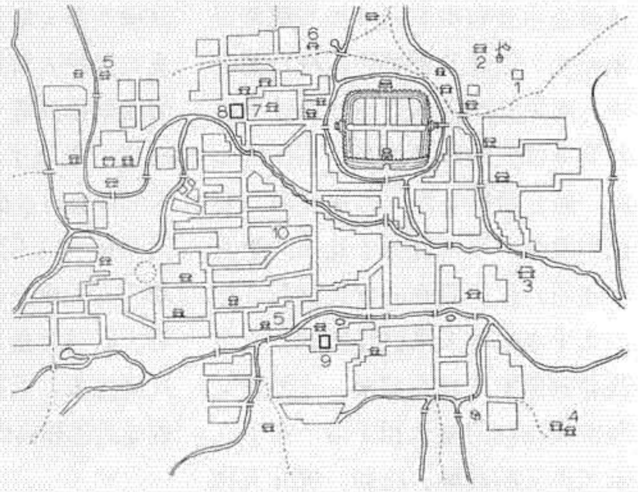

6
5
2
1
8
7
10
3
5
9
4



图 5.6.1.5–7 山东莱州府胶州独立的州城

图 5.6.1.5　1845 年内城的平面

1– 州衙；2– 一等的行政助理；3– 刑署；4– 藏书楼；5– 仓廪；6– 孔庙；7– 城隍庙；8– 社稷坛；9– 马王庙；10– 饿鬼坛；11– 军演操场；12– 神农坛；13– 关帝庙；14– 八牲庙；15– 一等将军署

图 5.6.1.6　1845 年的城镇平面，表现了广阔的郊区，我们会非常有趣地注意到一些重要庙宇和办公建筑坐落在郊区，而不是像往常一样，坐落在围城区域之内。

1– 神农坛；2– 演练（操练）场；3– 文昌庙；4– 龙神庙；5– 关帝庙；6– 饿鬼坛；7– 城隍庙；8– 社稷坛；9– 山川坛；10– 一等将军署

图 5.6.1.7　1945 年的胶州内城鸟瞰，引自华盛顿国家档案馆

城市从北边看过去，关闭的城门可以清晰地在前面的空地上看到，而街道模式形成了一个十字形，并由三座外加的城门所表示。惟一的新建筑群，当我们与 1845 年的平面进行比较的话，是基督教会学校（左边）。很明显，各种各样办公类建筑群占据着城墙之内的绝大多数空间，正如在 1845 年的地图上所表示的那样。

现，在较小的城镇和那些没有任何政府办公机构的市场中心，这种地段由庙宇占据。这也许表明了某种神圣的特征，上承皇帝宫殿下到衙门办公建筑。T 形街道模式导致其城市只有三座城门，如此，布局显得不完整。因为理想城市应该具有通向四个极点方向的四座城门。然而，这种理论上的概念可以通过接受模式中的某种不规则性而得以实施。因此，在很多地方，虽然主要是在较小的地方，一座北门建筑建在墙中，但是没有真正的门，仅有墙上的门楼。在真正需要一座北门的地方，无论是通往北边的主要道路，还是北门，都被移向衙门建筑群的一边，或者建筑群被移往南北路的一边。如此，道路便形成了一种对称的十字形。在两种情况之下，当保持道路体系的对称时，南北道路的两条腿就要被转移，形成两个 T 形的连接，在依然是中心的建筑群两边一边一条。最后，东西的道路也可以分成两条腿，一条是南部的办公建筑，一条是北部的，在中央区域的四个角各自形成四个 T 形的连接。在这种体系中，其他地方也成为重要建筑物在逻辑上的坐落地段。因为所有这些道路在城市里以 T 形连接结束，提供了适宜的和具有感染力的地段。这种最终的街道模式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基本的“神奇方形”。更进一步，城门可以很容易地适应这一概念，或者以不对称的五座或七座门，或者对称地以六座或八座门。后一种情况是完全的“神奇方形”。这种发展完全的“神奇方形”体系仅仅用于大城市，例如省一级的都城，但是即使在此，也不能像“神奇方形”概念所暗含的那样。并非所有的城门在功能上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城门之间的区别表现在名字上，有“大”门和“小”门之分，例如，大南门和小南门，但是，在理论上的地理安排和真正的重要性之间依然有某种冲突。有些门将一个大的郊区与内城相连，或者坐落在穿越城市的国家级公路上。在其他情况下，因为形势发生了变化，城门可能被关闭。例如，一条河流也许已经改变了河道，或者一条高速路已经失去了其重要性，为了将邪恶影响关闭在城外，东北向的门也许已经关闭，因为根据风水理论，东北是散发邪恶影响的方向。在任何情况下，完全新生的“神奇方形”模式的确非常多变，并且能够很容易地适应于现存的功能要求，或者是变化了的功能要求，虽然其原来的概念为的是体现不变和永恒的定律。

最高级别的城市是帝都，在此，“神奇方形”与四个极点方位相互纵横交叉结合。由皇宫的中心点，也是帝国的中心，向外延伸到世界各地。理想上，这种结合导致了 12 座城门，帝国的数字，每边 3 座，中间的城门专门通往皇室。这座城门理论上专供皇帝单独使用，因此大多时间是关闭的，不为普通人接近。这也应用于中央的道路或大街，直通宫殿建筑群大门，即所谓的御街千步廊。这里，原先是不允许有商店或其他活动的。大多数时间，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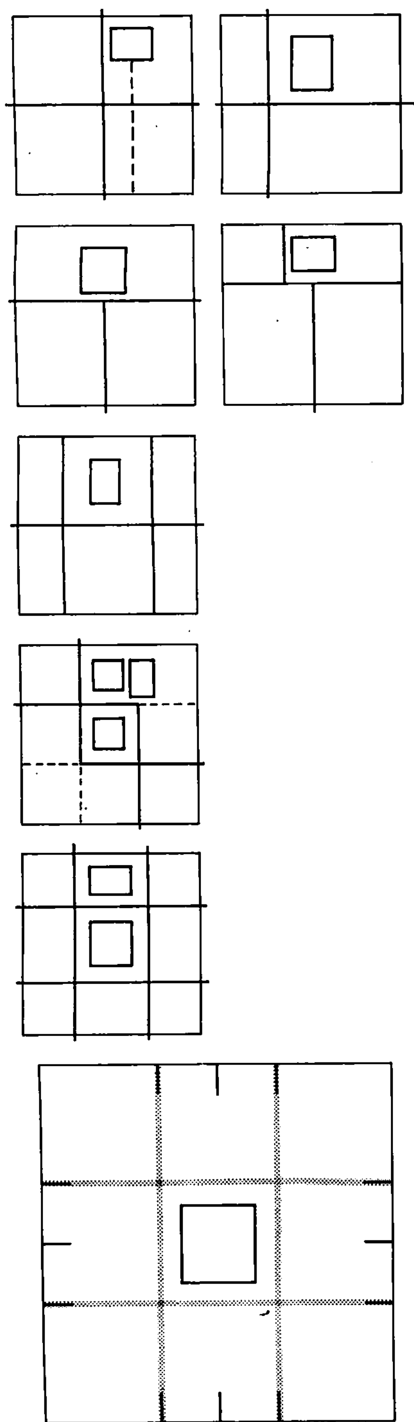


图 5.6.1.8 街道模式和幻方概念

是一处空地，中央通道完全对所有人关闭，而只供皇帝一人用，这皇帝有时坐在轿子里在其上通过。实际上，只是轴线的南部供皇帝所用，其余三个方向仅在理论上归他所有。

在较小的城市里，两种体系的结合，或说其中的一部分也被使用，从而使衙门建筑群拥有自己的轴线和“御街千步廊”，完全独立于通向城门的主要街道的功能模式。在实施街道模式和建造城墙过程中，某些特定的度量体系必须应用到布局的所有部分，这些界定空间的度量体系让城市内部不同土地的使用者都可以获得相应的空间。当然，这对于测量人员是更为实际的。如果这些度量体系基于方便的度量单位形成了一定的体系，并且是基于测绘工具的规模，它们就可以以一种并不复杂的数码系列，毫不困难地得到处理。但是，远不止这些的是，在有关度量体系的选择时，所用的数字必须具有一般所熟知的由阴和阳的概念所限定的神奇特性。他们必须结合在度量体系中，以确保他们创造性地和谐与合作，从而保证城市及其拥有者的繁荣。

如以上所见，这些想法最初在上古时代皇都的布局中得到发展。那个时候的度量单位是“里”，所应用的数字是“三”的倍数，即基本的阳数，并与基本的阴数“四”结合。往后，由于环境的需要，其他数字也用上了。然而，奇数（阳）和偶数（阴）的某种结合，在几乎所有都城中都可以辨别出来，尽管一个方形的布局是一个例外。随着时间的推衍，特别是在繁华和不断增长的城市里，使用了不同的度量体系，结果导致多功能的大都市具有极不规则的布局。在城墙和街道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之后，毁坏、重建，新的部分被增加到城区，街道模式、城门的位置以及城墙的排列可能发生了相当的变化。因此，城市原来的形状以及度量体系被改变得难以辨别。

当全新的都城在中世纪（比如在北魏、隋和唐代）成立时，新的度量体系被用于巨大城市区域的布局。虽然，基本的度量单位依然是“里”，仅仅是采用不同的规模，而且依然使用奇数和偶数结合的方式，完美的方形很少作为城市的总体形状（形式）被应用了。然而，“神奇方形”的基本概念，即空间的九宫划分，留存下来，并且成功地应用到新的文脉环境，一直到帝国的结束，都保持了其当初神奇性的痕迹。在现代初期，即 14 世纪和 15 世纪，明代统治者们和贵族建造了几座新城，并且扩展了其他一些城市，明显以某种变革的方式运用了度量体系，其体现在以更为世俗的结合，而并非过多根据神奇的和宗教理想的先入之见。此外，绝大多数行政城市的城墙是在明代修复或者完全重建的，给予所有这些地方最后的城堡，持续了将近大约 500 年，直到 20 世纪中叶帝国的终结。在此，度量体系非常灵活地应用，并如所想是根据实际的考虑。这些仅在非常特殊的地方可以辨别出来，特别是在那些涉及仪典和防御考虑的地

方。关于神奇方形的概念，仅仅留下基本的痕迹，虽然体系化的安排是非常普遍的，但是，更重实际和技术的务实气氛，将那对于数字和模式神奇性的喜好欣赏推向后台背景。因为明代统治者修复和重建了几乎所有的行政城市，没留给其继承人满族皇帝们什么可以进一步完善的。大量的城市发展转向经济中心，那成千上万的市镇，一些大城市的郊区，使很多旧的行政之地变得萧条甚至衰败，正如许多城墙区域内空无一物的空间所显示的那样。惟一留下用于建造新城的区域是当时中国内地 18 个行省之外的落后地区，即除了台湾岛外，还有东北地区，蒙古和现今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然而，这里的所有新城实际上都是当地旧城市聚落附近区域的军事要塞和防御工事，而东北地区直到 19 世纪的后半叶才开放发展。仅有台湾岛，在 17 世纪的最后二十几年里被清军攻克之后，持续迎来汉人农耕者的开发，因此转变成为一个具有响应的行政组织的中国难以区别的领土部分。当这座岛屿在 19 世纪末期被提升到一个省的级别时，兴建了一座完全新的都城，一座在中国 2000 年历史中最后一座根据传统幻方概念之余思而设计和建造的城市。

5.6.2 防御体系

绝大多数的行政中心，因为其城墙的缘故，成为各级力量的要塞堡垒。在中国北方和边界区域比在中国南方和岛屿所在，城墙更为坚固。许多城墙和街道模式是从防御角度建造的，而这些考虑，以其坚固的墙体和高耸的城门楼对于城市的外观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此我们应这样评说："这些防御体系，并非是用于保护自由民众摆脱帝国及其他强权侵犯和压迫统治的。恰恰相反，这些防御性的城墙，是用来保护帝国官僚和他们的行政管理以及其他尽忠皇帝一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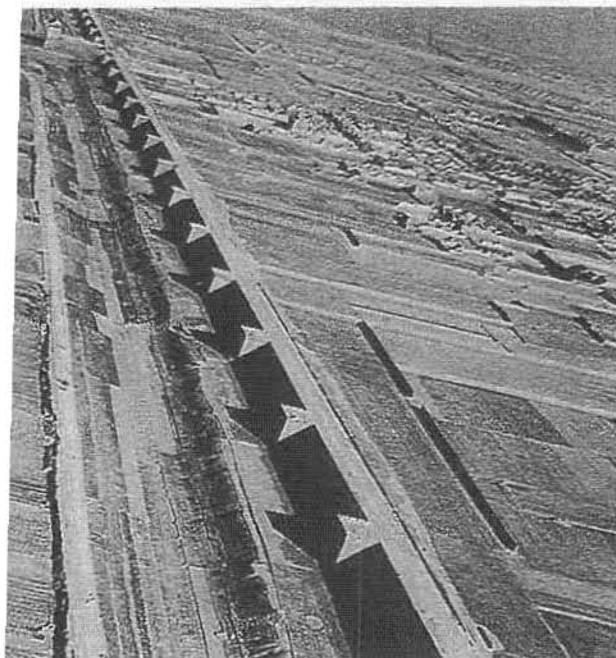
一座防御城镇内部的主要建筑，坐落在两条主要街道十字交叉处墙围区域的中心。除了作为中央瞭望塔楼的功能，其内部悬吊警钟作为报警之用，塔楼本身实际为一座小堡垒，坐落在中心位置并且比其他建筑物高，它实际上是处在从城墙之内保卫城市的地位。如果城门被敌人越过或者打开，这中央堡垒一般的钟楼，依然控制着四个方向主要街道的四翼。因此，在堡垒要塞城镇之中，最为有用的街道模式便是十字形模式，而衙署建筑必须另选它处，这表明，在这样一处防御之地，行政管理乃为二等重要。除了在中心的钟楼之外，另有坐落在离中心不远的鼓楼，或两者位置互换。其位置并未清晰界定，尽管旨在与主要的市场区域或主要行政所在地保持一定的联系。然而，对于两座塔楼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以两条十字形道路来提供街道模式，也即是说，两条南北的街道与一条东西的街道相交，在两个交叉点各安置一座塔楼。这种模式，又为行政机构提供出一个介于两条南北街道之间的中心位置，而所有细节之布置，变得更为和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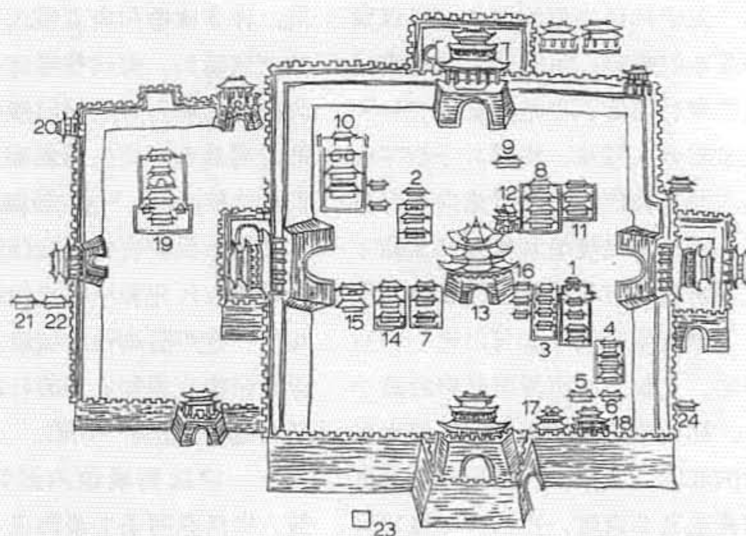
通常情况下，只有四座门可以通达墙围区域，每一座用于相互交叉街道的一端，甚至在非常大的城市中；但是，由于两条南北道路之故，六座城门便成为必须的了，与有最少数量城门的基本原则有些矛盾。然而，沿着城墙城门楼数量的增加，以及在城堡上用枪炮的外加位置在一侧保护墙体也许可以被认为是一个额外的奉送。在有郊区也需要城墙的地方，一种复杂的防御体系和一组防御工事便涌现出来，其最大限度地强调了这个地方的军事特征。

5.6.3 源于经济活动的功能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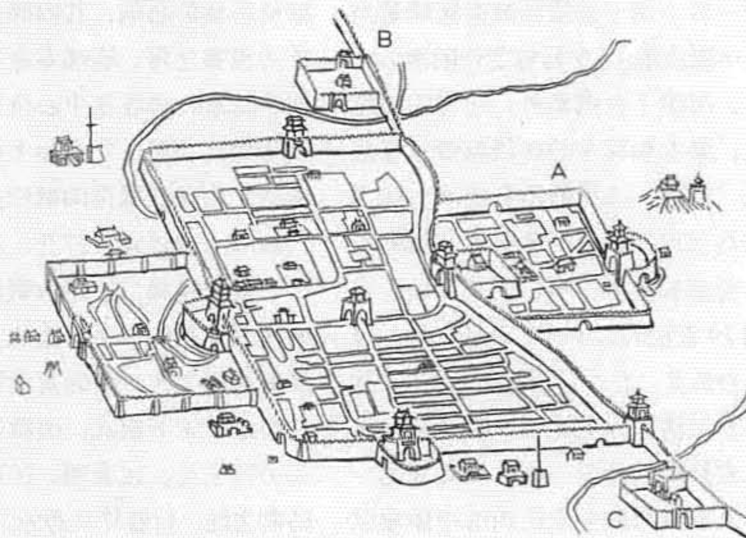
功能模式，在其基本原则的方面，既是仪典模式也是防御体系的对立面。对于中心化与轴线化来说没有用处，而如果墙体是不可避免的，应该有尽可能多的门以满足持续不断的交通需求，通常至少如在一个防御体系中所需要的两倍之多。街道模式必须遵循着最为方便的交通线，而在很多情况下，是与水路紧密联系的，而且必须在不同的运输模式中，例如道路和水上交通之间配备船运装载和卸载的设施。

功能街道模式取代了仪式街道模式的俗套，由不同类型的街道组成，具有独特的街道侧面和尺度来满足不同的目的。至少可以区别出四种不同的类型。首先，我们有主要大街，这在北方是用于车辆交通的宽阔街道，然而，在南方的城市中，水上运输之运河，也许已经取代了其位置。其次是市场街道，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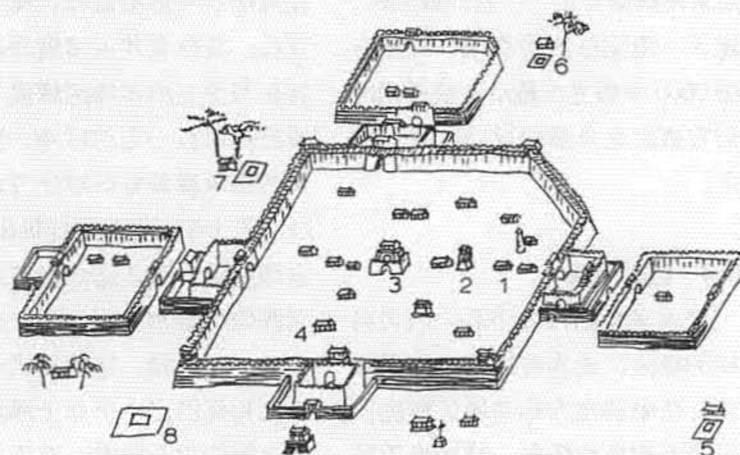


20
10
9
8
2
12
11
19
16
1
21 22
15
14 7
13
3
4
5
6
17
18
24
23



B
A
C





6
7
3
2
1
4
8
5

图 5.6.2.1 在山东曲阜的中央城堡和鼓楼，建于明代，并在清代进行了更新，1983 年

图 5.6.2.2 在陕西西安城很好的坚固城墙实例，由考特·卡斯蒂尔（Count Castell）于1938 年拍的照片

图 5.6.2.3 1750 年山西蒲州府，具有三级行政的坚固城市（今天的蒲县），坚固的城墙，带有塔楼和碉楼，以及中央的加固塔楼。
1－河东回路（第三级）道台的办公所在地；2－蒲州府（第二级）的府衙所在地；3－地区长官上校；4－永济县（第一级）的县衙；5－刑警长；6－秘书的办公所在；7－同知堂；8－试殿；9－清阳殿（用于读书）；10－孔庙；11－城隍庙；12－钟楼；13－鼓楼；14－关帝庙；15－炎帝庙；16－马王庙；17－玉皇大帝庙；18－英武庙；19－传说中的舜帝庙；20－文昌阁；21－龙王亭；22－神农庙；23－饿鬼庙；24－禹王庙（传说中的大禹）

图 5.6.2.4 长城东端和山海关的城堡，山海之间的城堡，引自永平府 1774，1879 年的府志。带有四座城围区域的坚固城堡，是永平府 Linyu 县官方（正式）的行政城。但是，这城堡被称为山海关（A）北部（B）和南部的（C）河流堡垒保护着水门

图 5.6.2.5 山西台州城，1784 年，作为一座具有四座城堡的建筑物，即是具有三座墙围郊区的内部行政城市。内城的城门，由双重的外堡和双重的门楼所防御，而墙体是由四座角楼所加固的。在东边的郊区，仅有一座城门；其他两边，每边有两座城门和相对独立的城堡。
1－州办公机构所在地；2－钟楼；3－鼓楼；4－孔庙；5－东坛；6－北坛；7－西坛；8－南坛

图 5.6.3.1－4 各种街道的剖面（侧面），与各种交通运输相连



图 5.6.3.1 在建筑群之间的窄巷



图 5.6.3.2 （昆明的）市街



图 5.6.3.3 （绍兴的）居住区河道（水道）



图 5.6.3.4 绍兴的输运河

些街道在所有城市和城镇中都相当狭窄。其两侧排列着各种商店、作坊、酒肆、餐厅、客栈及其他建筑物，迎合市场民众的需要。第三种类型由与市场街道相连的窄巷组成，以加强平行的市场街道或水道以及大街和市场街道之间的交通，便于运输日常必需品。最后，是居住巷道，大多数是没有任何商店，并且在两边排列着居住建筑的墙体，那里，谦卑的门屋建筑由巷道通达。偶尔，居住区花园中的树木为相对安静而单调的巷道提供了些许阴凉。只有市场街道铺垫着石板并装备下水道，所有其他的街巷都是肮脏的路，雨天泥泞，干燥天尘土飞扬。然而，南方城市可借助运河体系的优势。根据功能也是不同的，例如，有为居住区交通和为商品运输的运河。因为南方石头充足，铺筑的街道甚至小巷是非常普遍的。南方城市的多山也意味着在很多地方，因为坡度的关系，踏步是必需的，正如城市中跨过运河的很多桥上有些踏步。

一般说，我们可以区别四种不同类型的城市，其中，功能性聚落模式因为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经济活动而产生。首先考虑的大都市具有多功能性质，具有不同街道体系的功能性聚落模式被整合到行政治理的仪式模式。市场街道和居住巷道被插入主要的大街之中，这种方式主宰着三级、四级和五级的行政治理中心城市的总体布局。在一个纷乱的发展过程中，经济活动迅速普及整座城市的围墙区域之内，大街两边最后也都排列着商店，使这种模式变得有些令人迷惑。

第二种类型是行政城市，一个一级至多二级的行政中心。因此，保持在一个相对小的围墙区域内，留给其发展的空间很小。这里，根据需要，经济活动往往在城墙外的郊区安置并沿着通往城市的主干道路、河道，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进行，正如案例所示。在一些繁荣的地方，这些郊区可以发展成为相当大的聚落。在区域和人口上，超过原来的城市几倍之多。这些郊区有很多又加筑了外城墙，与那种从来不多于四座城门的行政城市相比，这座城墙，必须具有很多城门，以允许城郊市街的商业活动得以实施。一些具有城墙的郊区形成了邻近原来城市或河流之外的独立围合区域，尽管它们从未成为独立的城市聚落，而依然处在原先城市本地知县行政治理之下的地方单位的一部分。如果这些郊区的城墙高大坚固并具相当规模，原来的城镇有时似乎仅作为整个城市的一个行政区，安居在其自身的墙体之后，但是，肯定与带有墙体的郊区城市聚落整合。然而，行政区域的气氛依然与郊区繁华的市场街道的喧闹非常不同。

其最后的布局方面非常相似，但是相反的发展过程导致了第三种类型。其中，市场街道是原来的聚落，在省的行政治理结构被重新组织时，行政中心是后来加上的。这些情况下，原来的聚落大多是沿河的港口城镇，那里，市场街道平行

图 5.6.3.5–10　各种类型的商业聚落，比例 1：40000

图 5.6.3.5，6　山东济宁，沿着运河，带有延展的郊区的小行政城镇

图 5.6.3.7　四川乐山行政中心，以几座市街增大。注意沿着河岸的许多门。后来，沿着岷江东岸增加了一处郊区用作为市街。它逐渐地由一座带有许多门（14）的墙体来保护。另一处郊区沿着河发展直到北部。东南方向是一尊巨佛雕像，唐代镌刻进入红沙崖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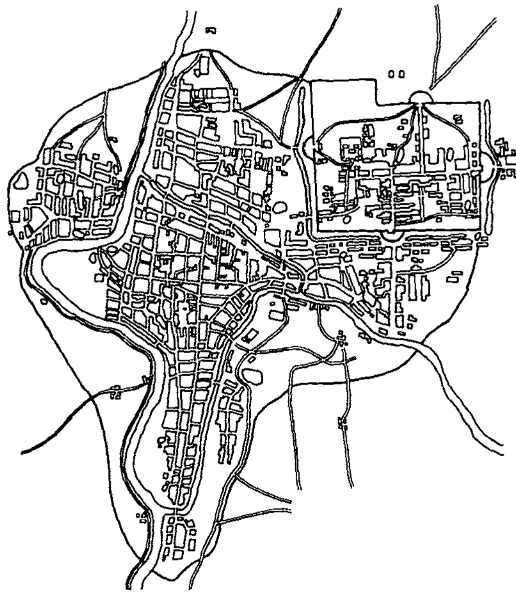
图 5.6.3.8　在河南洛河附近的一座行政中心，以及一座独立的商业聚落，沙河流过商业聚落的南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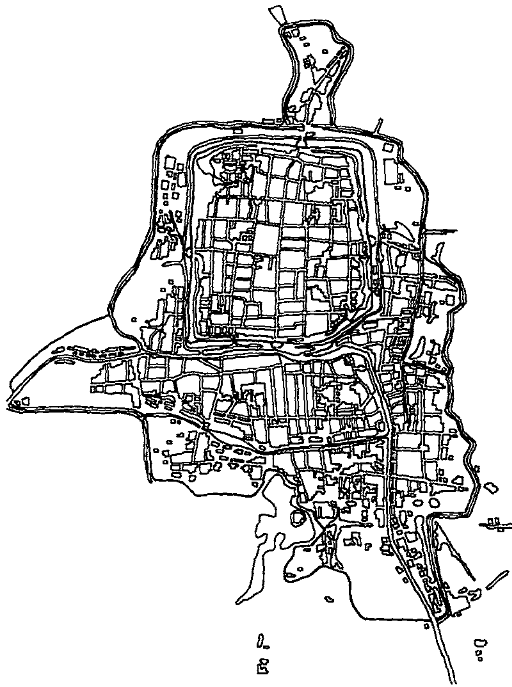
图 5.6.3.9　河南周口，是沿着沙河的一个完全商业的聚落，有三个围墙围绕的区域。在河边，墙体由在河两岸的六座门所贯穿。县的行政中心坐落在西南大约 15 公里处。在 19 世纪，周口（当时称为周家口）在中原一带具有很高的地位，并且是中原一带的区域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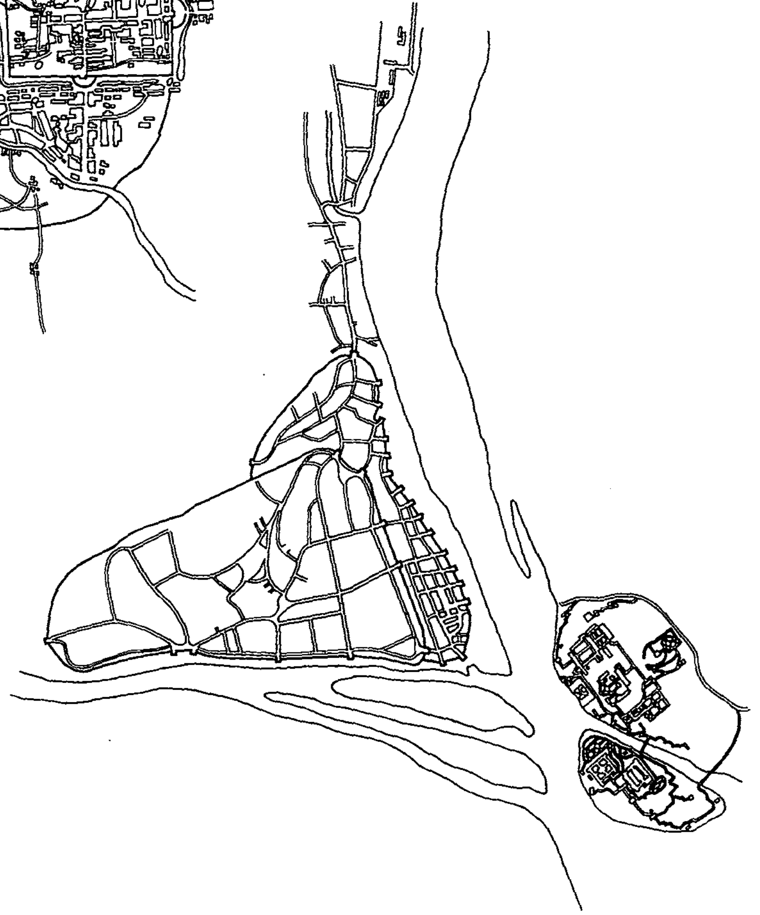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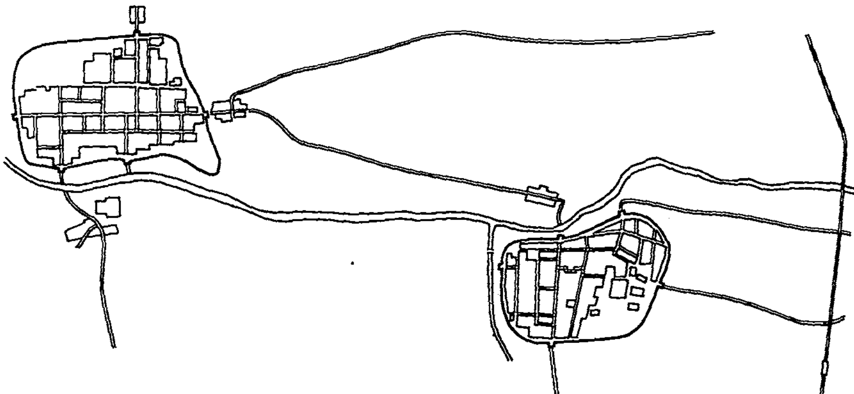
6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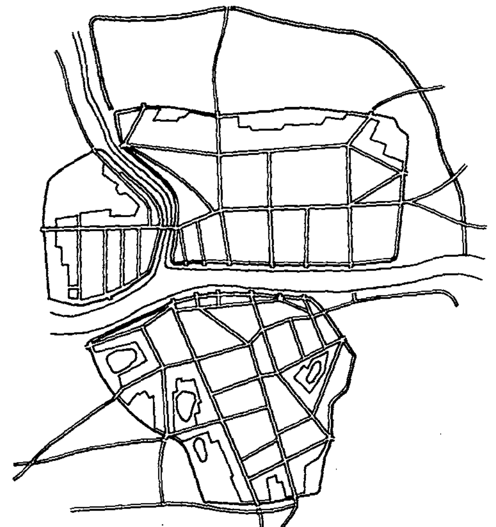
8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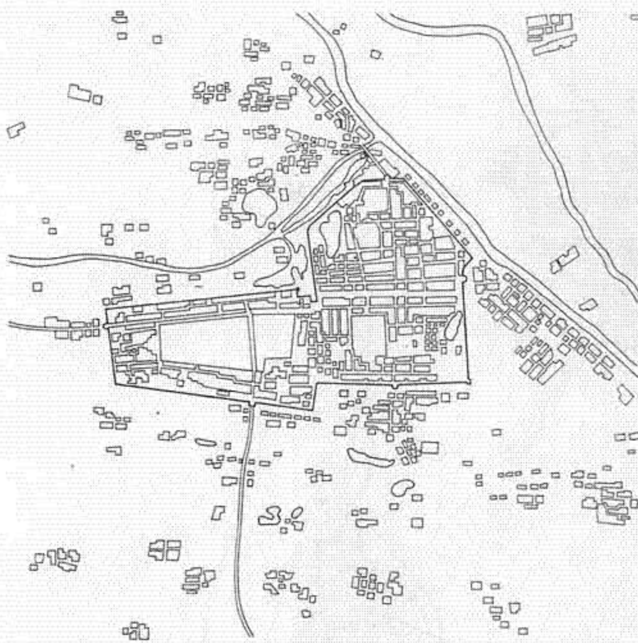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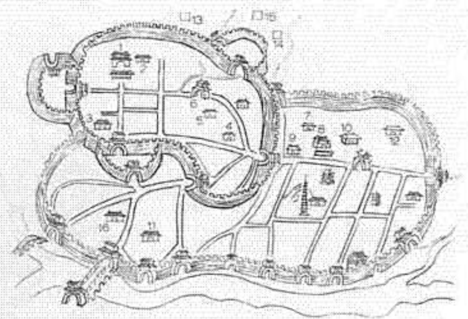




图 5.6.3.10　北京的通州，是大运河的端头，而因此包含有巨大的仓储库房，建造在小行政城市的南面，比例 1 ： 40000

图 5.6.3.11　一座中央市镇和一座一级的行政中心，四川重庆空中鸟瞰。引自华盛顿国家档案馆，1945 年。
在城墙之内和之外的所有主要街道都排列有商店建筑。中央大街从南端直接延伸到衙署前面

图 5.6.3.12　1824 年广东的南雄州城。作为一个可以直接与省交流的独立的州的行政城市，原来兴建于汉代，作为一个要塞和从广州经江西和中原到北方这样一条路上的重要驿站。而内城由碉楼，城堡严格防御，仅仅留出五座城门，沿河的郊区有十座城门来促进商业活动。
带有郊区的行政城市：1－州衙所在，严格的南北方向；2－刑警长；3－城隍庙；4－军事大臣；5－关帝庙；6－鼓楼（1–6 全都在内城）；7－藏书楼；8－孔庙；9－忠良祠；10－贞节祠；11－试殿；12－带有钟楼的团部；13－社稷坛；14 饿鬼坛；15－神农坛；16－佛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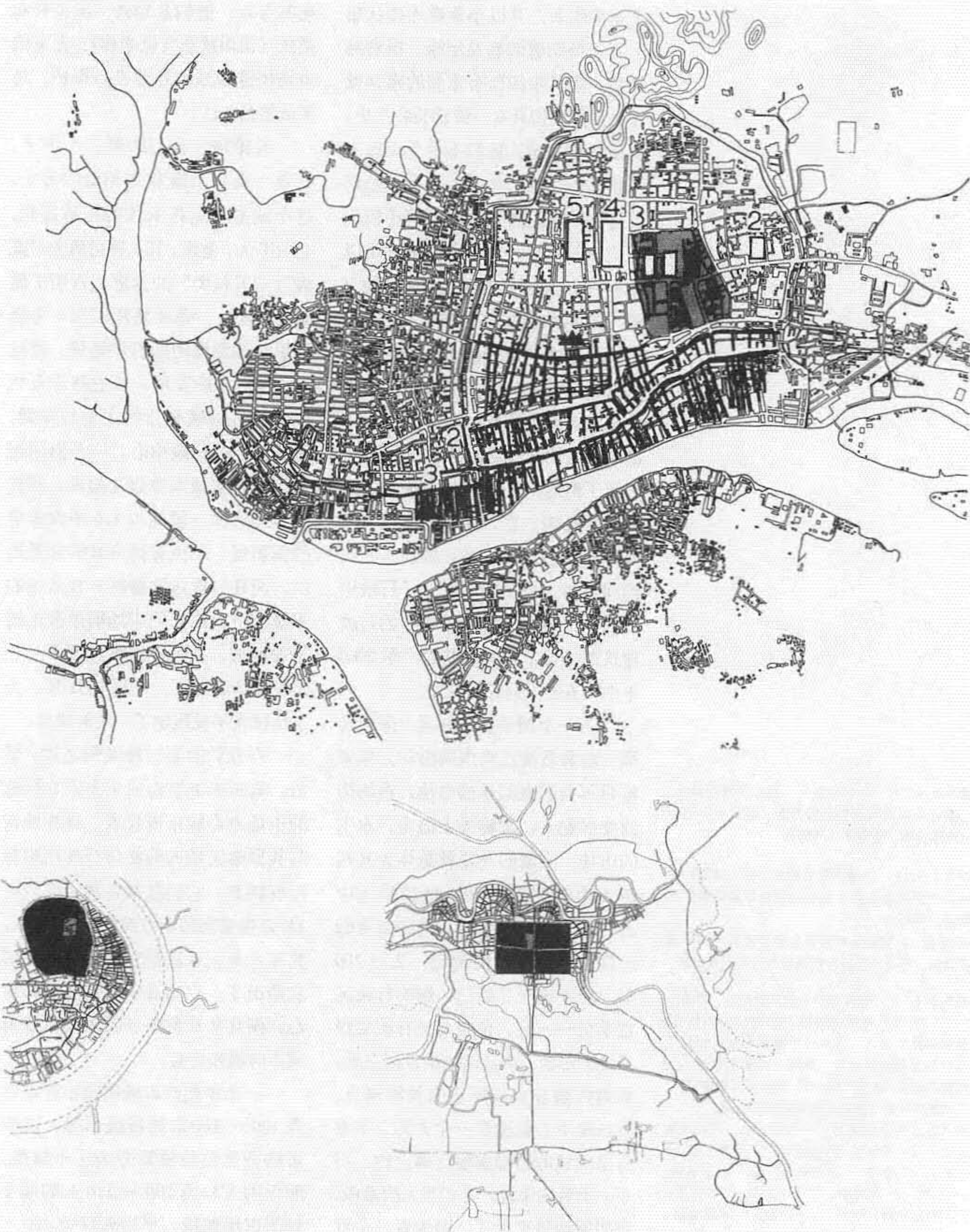
于水岸生长，并以小巷道连接从船上到市场街道的商品运输。很有趣的是，现代中国所有重要的港口城市，如果它们具有一段较长的历史，就是这种类型，他们不但至今保有其原来的功能和本性，而且总是作为进步的促进者。最老的例子似乎是广州，那里，其市场街道远可以追溯到 2000 多年前秦兵占领该地之前。那里的原居民，进化的渔人，早已经熟悉航海和海上贸易，在后来的五灵庙，传说中的城市保护神的两边就有其最为重要的贸易中心。沿着当时的河岸，即现今的汇福路，出现了街道，直到 19 世纪末都一直叫大市场街。在公元前 3 世纪末汉人征服以后，汉人在市场以东，大约河下游 1 公里处，建立了行政中心，称为番禺。在那里建立的行政建筑群在整个帝国时期的广东 2000 年中一直处于同样的位置。

另一个例子是上海城。宋代初期，沿着黄浦江湾内河沿岸，那里船只不会遇到河水的急流，市场街道发展起来，被称为上海市，水上的市场。主要的功能就是作为其西面大约 70 公里苏州大城的船运中心。大约 200 年之后，市场街道的北端建立了帝国海关司。又过 200 年，附近建立了衙门，新的行政区划单位——县，也在当地行政层级系统中形成。再过两个半世纪之后，那些防御公事被厚重的城墙围合，将行政中心包围在一个大约 2 平方公里区域的圆形围墙区域之内，对于一个县城来说，是相当大的面积。它明显地被扩大了，因为有三个官吏的存在，他们是知县、海关官和巡抚（需用核查官位名称）。原来的市场街道在城墙外面没有保护，结果依然是郊区。

天津城，我们的第三个例子，有着一段与上海非常相似的历史。这个地方首先在宋代初年被提到。之后不久，金代，其名称记载为“直沽”，“买和卖”的意思，表明了聚落的性质。一条市场街道和一个船运中心沿着海河的右岸延伸，经过大约 400 年的发展，当它终于开始作为北方都城北京的主要口岸时，作为当地的行政中心，一个坚固而规则的要塞城市被建造起来，并且命名为天津。城墙内 1.6 平方公里的面积里，不但有地方官的官署衙门，而且包含边防指挥官及其他的军事官吏。原来的市场街道聚落被留在城外，并且也依然停留于一个没有保护的郊区。直到 1855 年，为了反抗太平反叛建了一座外城墙。

在我们的第三种实例之后，最后，第四种类型由成千上万非行政的市场中心城市所代表，这些城市与其聚落区域内的任何行政机构都没有联系，它们包括各种不同的布局，在规模和结构方面均相同，但是，其基本单元永远是市场街道，在所有情况下，它构成了城市区域的核心，而且从其发展开始永远保持为城市的最初聚落。

一个单独的市场街道也许包含有 100 ~ 10000 的居民不等，这些市场街道已经被划分为三个等级，即平均人口为 100 ~ 210 人的属于标准市场城镇，平均人口为 450 ~


5
4
3
1
2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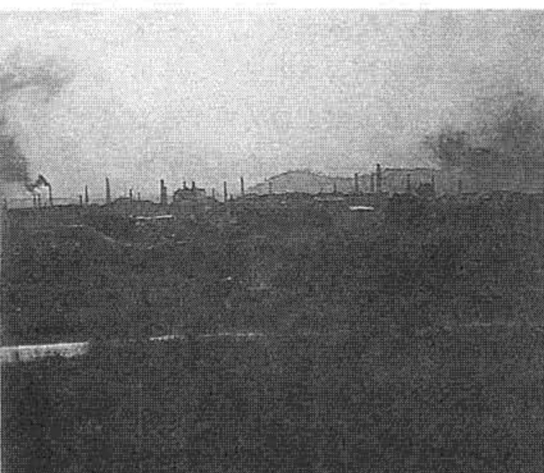




图 5.6.3.13–15 三个旧市场中心的例子，行政城镇是后来加上去的，比例 1 ：40000

图 5.6.3.13 广州，在河之北的古老市场，在它东面番禺县的第一个行政所在地（1），公元前 3 世纪，聚落区域进一步发展并遵循着一个双重的模式：市场向东部、西部和南部扩展（1–3），以及行政城市向西部扩展（3，4，5），一直到整个聚落于明代加了城墙

图 5.6.3.14 上海，9 世纪末期以后，沿着黄浦江发展出的旧的市街，港口的重要性在宋代被认识到，而第一座行政办公所在地随着帝国海关的兴建于 1095 年建立起来，1288 ~ 1292 年间开始了正常的行政管理，当时，县衙和后来的道台在海关办公室以西兴建了行政办公机构，行政聚落延伸，并且最终在 1554 年以一座大型坚固的墙体加固，将开放的港口聚落和市镇留作一处郊区

图 5.6.3.15 当 11 世纪文献记载中首次提到天津这座城市时，该城已经是一个贸易之地，沿着大运河和海河作为一座口岸和市街而发展起来，这座城市于 1404 年兴建，在经过了 400 年的持续发展之后，作为在县一级基础之上具有市政管理职能的哨卡而发展起来

图 5.6.3.16–18 工业城镇，也作为市街和非行政的商业中心而发展起来

图 5.6.3.16 台湾船坞

图 5.6.3.17 台湾瓷厂

图 5.6.3.18 四川五通桥起重机，为 1938 年由 Long Chin-san（1892 ~ 1974 年）所摄的照片

690 人的属于中等城镇，以及中心市场城镇，这里，一条市场街道有 1800 ~ 2330 人左右的人口。19 世纪末，大约 27000 ~ 28000 处属于最低等级标准的市场城镇，即标准市场城镇；大约 8000 处属于第二等级，即具有中等规模的市场城镇，仅有 2300 处被认定为中心市场城镇。另外 128 处是经济上重要的非行政中心，并且要大得多，级别有的为地方城市，有的为区域城市，拥有的居民人口数字算起来大约从 5800 ~ 73500。标准的市场城镇，布局是一条单独的市场街道，沿着原有的通道无计划地随意发展，或分叉，或交叉。然而，很多城市由一群人或由土地拥有者在短期内以一种规划好的或者有秩序的方式进行布局和建造。它们在各种完全不同的地段发展，例如，在运输网络的枢纽、桥梁、河道纵横交错处，运河两岸有海关和小旅馆的驿站处，凡是有商人必须通过的地段，并且也相邻大地主的庄园以及重要商人家庭的乡村别墅。以这种方式，集散网络遍布整个国家。一个标准的市场城镇，大概服务于大约 15 ~ 30 个村庄的腹地。大约 3 ~ 4 座标准市场城镇与一座中等的市场城镇相关，那里有更多的服务设施。最后，几个中等的市场城镇大概必须依赖一座中心的市场城镇，很多情况下，那也是本地的行政管理城市。

市场中心的发展也与工业企业相关，例如，盐矿、陶器作坊或玻璃生产作坊，或者贮藏设备，例如官盐和粮仓。一个最重要的工业城

镇和市场中心城镇就是江西省景德镇——宏大的瓷器和陶器中心。其布局显现了典型的市场街道模式，沿着河流大约3公里长，伸向河边很多巷道，从那里，原材料和木柴从船上运往工厂。在黄金时代，该镇有大约200000～300000的居民。但是，在20世纪初开始衰落。到1982年，其行政区划容纳506955居民。

在以上提到的128座非行政中心城市里，其他大型和重要的城镇主要是贸易中心和船运之地。富裕的商人们住在那里，并控制着区域甚至国家的贸易。例如，河南省周家口这样的地方，其三个城市区域在19世纪末也许容纳大约200000居民。这里，街道模式渐渐地以一种非秩序的方式发展。但是在一场毁灭性的洪水之后重建，这是一个例外，而富裕的商人们在河两岸用围墙围出了三所聚落，很典型地，有22座城门通达河岸，超过16座城门通往内陆的大道。

5.7 发展进程

在前面的章节，我们描述了城市和城镇的基础、生长和衰落，并且给出了一些实例。现在，我们希望以几条一般性的评论作为一个结束。

动物在寻找巢穴或冬眠之处时，必须寻找一个安全地点能够保护自身及其子孙不受敌人的侵犯，不受变化不断的气候的影响。几乎以同样的方式，那些依赖土地为生的人类必须明白他们所处环境的性质，以便能够以周围的自然条件作为生存的根本和保护。为居住和聚落选址时，他们必须考虑到自然力的作用，以避免暴露在这些自然力量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毁灭性过程之中。另一方面，人们必须考虑如何在这些自然力量之间的有效合作中获利。因此，他们全部的注意力必须集中在不同地点的不同特性上。他们必须认识到何处毁灭性的过程可能威胁到生命财产，何处创造性过程可以积聚创造生命并支持生命的条件。

正如我们在远古诗歌中所见，选择适宜于聚落的适当地方的主要责任落在部落、族人或家庭的领导人身上。只要部落处于一种半游牧的方式经常迁移以寻找更好的条件，大概每一代人都会受到这一职责的挑战。其重复性的应用也会积聚足够的知识，帮助认识自然环境中既危险又有益的特性。

因为自然的力量总是以某种结合的形式呈现，没有一种结合完全令人满意或带来益处。一个聚落的选址永远只是一种折衷妥协。某些自然环境的条件必须由人们自己来改善，如果不能以理性的方式，就必然要建立一套神奇的巫术实践以迎合想像中自然力量的精神本质，诱导它们以某种方式修正其自然的行动从而为人类造福。所有这些提供了某种我们称之为原始科学的基础。这种原始科学试图界定自然力量的性质及其精神实质，从而检测指导自然力量作用及其相互作用的法则。以这种知识为武装，人类在“天与地”之间的地位，就必须谐调天地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使自然环境适宜人居。然而，对于具有学识和富于责任感的人来说，很明显地，他无法在违背自然力量的法则时，不毁坏其自身生存的基础。因此，他的责任就是学习如何谐调自然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将自身融入自然秩序之中，遵从指引并支持他自身生命的自然法则，即自然的精神本质“方式”——“道”，为一个聚落、最终为一个城市选址。这种选址的概念需要所寻求的地方，不但可能，而且最大限度地为人类建立聚落带来益处。居民们应该能够将自身融入到自然力的自然创造进程之中。这体现在山河、平原、湖泊、风和雨、日光和雪、热和冷的相互作用。因为四季给予的生命轮回与方位上的四极以及太阳的轨道相关，聚落也必须融入宇宙方位的体系之中。所有的这些考虑，随着时间的推衍，某种命名法发展起来，渐渐地被称为“风水”概念，通过这一法则，“风和水”对于人有益的影响可以被辨别确定。为聚落在总体上的选址，为个人的房屋或陵墓选址成为一种实践性职业。下面，我们将对这种“艺术”给予简短的描述，因为在过去的千年里，它似乎一直被用来为城市和城镇选择适宜的地点。非常专门和复杂的法则，则用于个人坟墓和房屋的选址。

5.7.1 适宜地方的选择

一个地方肯定性正面的特点被凝缩为所谓的“气”，也就是给予生

命的一种呼吸，被认为是一种温柔流动的物质，在一个地方汇聚，而在另一个地方会很容易地消散。风水术的目标就是去发现一个地方，那里，这种蒸发性的物质，“气”可以聚集，而不会消散。必须采取几个步骤来分析和评价一地之特性。

第一组必要的步骤是测绘所定区域的地貌特征，以便找出“龙”、“虎”，即富有男性、女性阴阳特征的山脉。“龙”不要太高，延着山脉形成一条温柔的曲线，有泉水和小溪在小山谷缓缓地顺着有草木和森林覆盖的山坡流下，并且在山脉中间某处某种较陡、较高的地点。与之相对的峡谷，一个较低的山脉，如果它象征一种横卧的动物，脚爪伸进平原之中，便是“虎”的完美再现。如果“龙”坐落于峡谷之东，“虎”坐落于西，两者在一条小河的上游相会，小河的末端蜿蜒地穿过宽阔的峡谷通往肥沃的平原，这一地址就满足了给城市带来益处的主要条件。阴和阳相互作用，产生“气”，从山坡往下达到谷底，就像小溪在龙脉中轻流一样。如果小河蜿蜒曲折，并且流得不太快，那么，它就不会携走汇集于峡谷之中的气，群山抵挡来自北方的强风，留下缓坡和灌溉的良田，那里，城市耸立在太阳之下，将气温保持在一个正常和健康的水准。结果就是所谓的“龙穴”，山之南，河之北，一个被称为“阳”的地方，因此，很多城市的名字都有这样的后缀，例如洛阳、安阳、南阳、麻阳、邵阳、汉阳等。发现了这样一个优美的地方之后，下面的步骤涉及界定具体的土地形式，这可以从基地上看到，为基地带来坏的或好的影响。土地形式根据其形状可以划分出来，与所谓的“五行”，即土、水、金、木、火相关，这可以简单，但并非十分准确地理解为五种元素。这五种元素以两种秩序而彼此相关，即互相生产的秩序，以及互相毁灭的秩序。在第一种秩序中，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第二种秩序的过程被描述为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一种地形，比如一座小山或者小湖，被确定为五行之一的体现，它们可能会以不愉快的方式崩溃并招致毁灭，也可能相互补充并带来有益的影响。因此，在一个街坊里，如果有一座山的形状被确定为代表着“木”，而那里有另一座山被确定为“火”。这种结合被认为是不幸的，因为它将招致财产的损失。[1]在很多情形下，聚落坐落在一座孤立山峰的正南坡，这样它就能够保护居民免受北方的邪恶影响。上古之后，我们知道很多的大型建筑群、宫殿或者办公建筑物坐落在这样的地点。我们也知道，在一些实例之中，其中一座孤独的山峰也升起于南端，这样建筑群便坐落在南北山之间，受到两边的保护。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广州城这样的地方，那里，其第一个行政管理建筑机构建于公元前的三世纪秦代，就是在两座山之间，南面是番山，北面是禺山，聚落也因这两座山被叫做番禺（今天这两座山都被掩埋到现代建筑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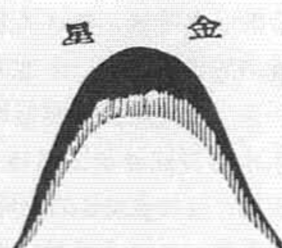
最后，需要第三种操作，将已经选定的基址融合到“八卦”的宇宙体系之中，也就是四个极点及其中间的位置。为此，使用了指南针。随着时间的推进，特别是对于个体坟墓地址的选择，这种指南针发展成为一种非常复杂的仪器，风水师的指南针被叫做罗盘。这里，我们只是涉及如八卦所体现的八个方位。八卦由两条断线和一条不断的横线组成，再次象征着阴阳之力的相互作用。根据这些横线的结合，它们再现了罗盘不同方位不同的特性。有几种方式，将这些卦位安排到指南针上。在此，我们了解它们最古老的秩序也就够了，就是所谓的“付羲八卦”，也是所设计的“先天的秩序”，即“先天八卦”，与附会为古代周文王所发明的“后天八卦”形成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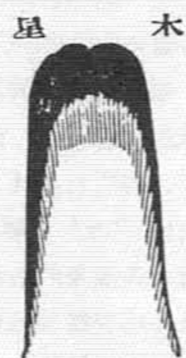
指南针用于确定街道、城墙或聚落的方向，通常以南北方向作为主要的轴线，也用于确定与城市中心相关的门、楼、塔及其他建筑，如庙宇和祭坛的坐落位置。对真正地理上南北轴线的偏离，有时可以被解释为在使用指南针时，参照当时指南针所指的磁北极，或者因为与八卦及其特性相关的风水原因，选择了另一方位作为轴线。指南针主要用在南方的省份福建，那里，传统的“风水罗盘流派”起源于唐代之后。对这种流派，因为所选择的相应八卦卦位的质量和性质，建

1 译者注：这里原文恐怕有误，因为按照五行相生序，木生火，应该兴旺而非招灾，大概另一座小山属土，木克土，或金，金克木。



图 5.7.1.1　根据风水考虑的适于城镇的理想之地。
1– 北极星；2– 此地最高的山；3– 东方山中青龙；4– 在东北的塔和寺，以保护此地不受坏的影响；5– 源泉之水（矿泉水等）的龙头；6– 大河；7– 南山；8– 在西南的好运塔和寺；9– 西部的白虎山；10– 有用于坟墓具有最好地点的北山南坡；11– 大河小支流的进贡之路，蜿蜒径流河谷；12– 城市的阳位，有充足的水从龙脉中流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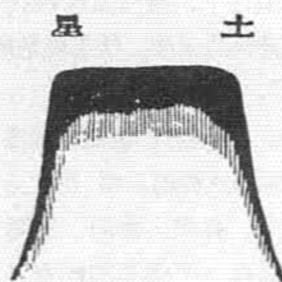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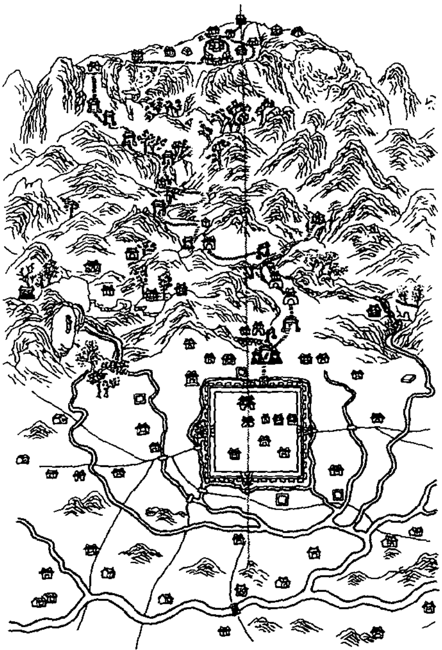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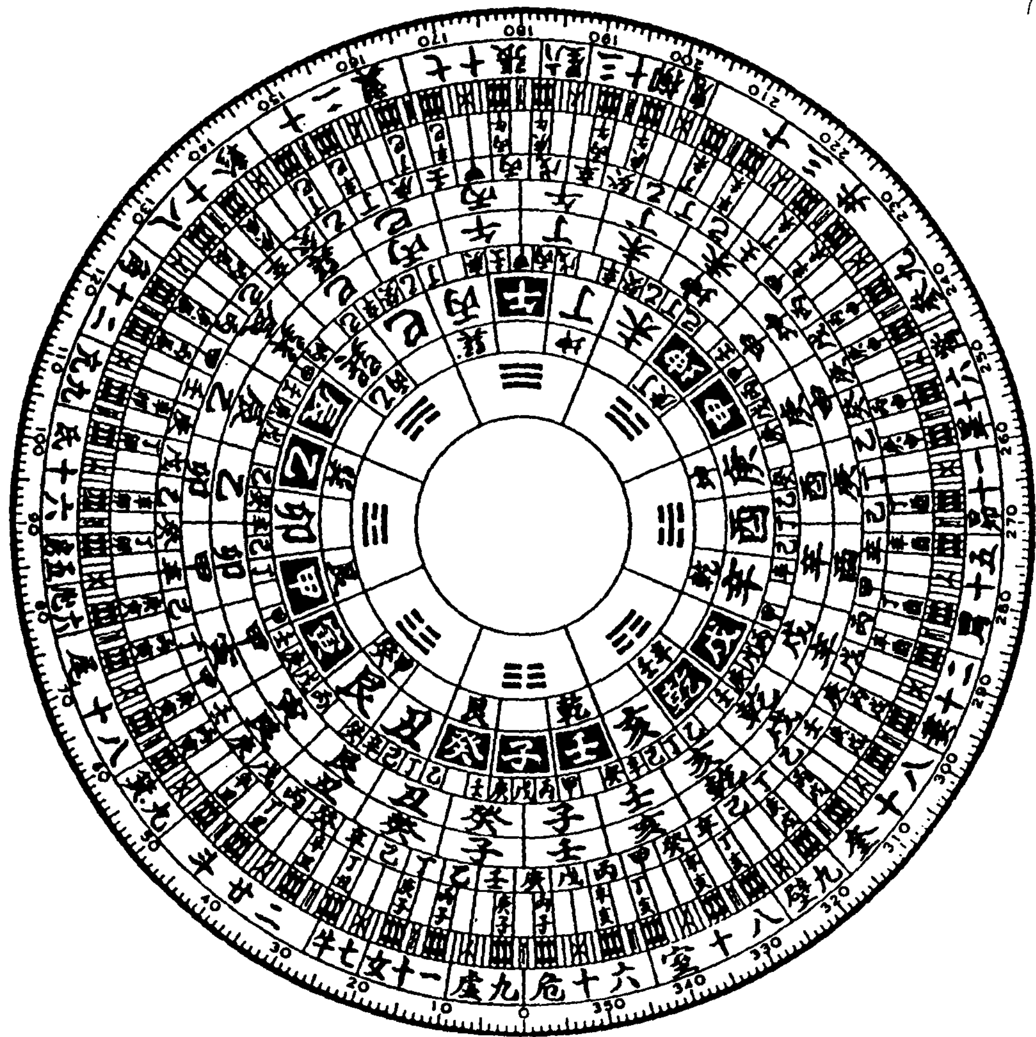


图 5.7.1.2　五个基本的山形，与五行相关：金、木、水、火、土

图 5.7.1.3 风水罗盘，以三和布局。北为上，代表地的卦位在上方，代表天的卦位在南部下方。东边为代表火的卦位，对应于在西边代表水的卦位。卦的顺序是比较老的一种，即伏羲卦，并很好适应四极方位

图 5.7.1.4 18 世纪时的山东东岳圣山——泰山，在其南坡有泰安城。处在一个完全的阳位，有光明河流向南部





筑物或其他结构可以朝向罗盘的任何方向。而在北方，南北方向是占主导的。八卦也似乎与“神奇方形”的概念相关，以其八个位置作为“门”，我们知道，那些多层级行政管理中心城市中，有完全新生的“神奇方形”布局的例子。其中，有些城门是以卦位来命名的，或更为复杂一些，采用有趣的名称，其在书写上与八卦名称紧密相关。总体说，八卦被认为在其圆形安排之中含有保护所有的力量，它们也被描绘在城墙和城门上，以保护城市免于来自不同方向的邪恶影响。八边形建筑，例如，塔也以同样方式，在其八边的每一边上装饰有八卦图形,作为吉祥物。因为,卦是阴（断的横线）和阳（不断的横线）的相互结合，由伏羲所做的圆形安排,也将之与一般意义上的“龙”、“虎”位置相关联。在西边，卦的几段“阴线”与“卧虎”相关，而它们朝向北方也就增加了重要性，那里的卦位，表示“地”，由三条断线组成，老阴。同样，东边的几段“阳线”与“龙”相应，其重要性在南方聚集，以三条不断的横线，代表“天”，老阳。

关于风水之术的评论，我们只需要走这么远，以满足我们解释与聚落和城市选址相关的基本原则。进一步探讨意味着陷入天文学与占卜的问题和实践之中，这不关我们的事。今天，有关这些事务在艺术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因为城市和聚落的建立已经成为一件非常稀少的事件，也就不能提供足够的职业机会让风水专家维持生计，但是，结合天文星像学，还是有事可做的。

我们也许可以补充一下一位晚明时期著名的风水专家关于他自己这一职业的评论：“那些首先编造出五行八卦理论并谈及方位的，是荒谬者。我知道，如果一个人离开了自然事物的“形”，就没有“理”可言。如果抛弃了地形，也便没有“气”可言。但是，攀登（高山以探索研究）是辛苦的，你不可能让别人代替你行走或寻找。但坐而论道是容易的，罗盘对于咨询师来说是舒适的、方便运用的，对于业主来说也是舒服的。这就是为何那些谈论方位的人写了一本接一本的书，而试图以谈论河图和洛书来遮盖，而有些人甚至要遮盖得更多，谈论太极，谈论先天（八卦），这是些关于原初的原初，玄妙之玄妙的理论。他们特别喜欢讨论平坦或潮湿的乡村。在多山的地方，土地形式清晰可辨，也许人们就不听他们的。个性强硬或者没有耐心的人，通常什么也不知道，只是作决定。无头脑的人也不喜欢登山的麻烦，并喜欢悠闲地坐而论道（Shen Hao，前言，1652 年）。

风水术的起源，特别其精神背景，一定与远古发展起来的空洞概念有关。这涉及人与自然力量之间的关系，宇宙的法则。那是圣王进入神圣之地的故事，圣王将其自身适应于天和地的环境及其神圣的力量，建立和保持和谐，从而确保其间的合作，多产和富于生命。结果，这些法则和概念应用于所有后来的城市。那里代表了皇家或后来的帝国权力。因此，这些规则属于仪典的模式。这并不意味着在这种模式之外，它们没有价值。因为它们认真考虑自然的所有形式，并指导人类文明的产品与自然环境和谐相融。它们的价值是普遍的，因此，他们不仅是中国精神传统最好部分的表达，并给所有时代的全人类都提供了一个信息。特别是我们当今的时代和西方文明也许要重新考虑我们铤而走险的行为，这不仅毁坏了自然，也毁坏了我们赖以存在的基础——土地。土地滋养了全人类，是所有生命赖以永久生存的地方。经济活动、日常生活以及其他的考虑，也影响了对于聚落和城市地址的选择。然而，更多的时候这些考虑与风水法相矛盾，很多时候是因为其自身的缺陷。市场街道建造得离河岸太近的低地，易遭受洪水侵袭和爆发流行性疾病。关于中国城市的记载告诉人们很多城市因为忽略风水的本意而遭受盛衰的可怕故事，以及这些城市的恶劣条件。这些也沦落为极端的无稽之谈。

与风水以及实际经济因素的考虑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需求，也导致了城市聚落的产生。这方面的例子有山东圣山泰山脚下的泰山庙。那里，泰安作为一个进香朝圣中心而发展成一座城市。相同的例子是泰安附近的曲阜城。其现存的形式就是围绕古城废墟孔庙发展起来的。这座古老的城市，又是公元前

图 5.7.1.5　风水专家，以罗盘，即这风水师的指南针来确认棺材的最终坐落位置，1968 年



6 世纪（孔）圣人的家乡，圣人的坟墓坐落在城的北面。这些地址的选择，依照人类文化其他领域的决定。毕竟，这是城市聚落发展的主要基础。

5.7.2 生长与衰落

帝国行政的概念、仪式模式以及风水法则没有为城市发展过程设定有条理性的规范。它们的思想概念是永恒的秩序，不可动摇的和谐，持续和不变的生命之流。这一点由下面的事实显示，即地方行政单位城市的数目在整个 2000 多年的帝国官僚政治之下保持着几乎不变的状态，我们看到的是在总体上不可变动的仪典模式，限制在不可变动的围墙内有限和固定的空间。那里，风水的性质不得不被评估，并仅仅因此而具有价值。但历史的进程在很多地方有不同的走向，并在变化的地区、变化的状态下发生着戏剧性巨变。虽然大约直到 200 年以前的 2000 年里，中国的总人口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繁荣与衰落不断交替，相应地，城市聚落生长和衰落，因为这些变化的条件时不时地影响着几乎所有的城市和城镇。大多数城市聚落的布局是建造的结果、破坏的结果、重建的结果、扩展和衰落的结果。因此，在很多情况下是类型和模式混合的结果。虽然我们已经提到几个关于城市结构变化的实例，我们应该试图描述一种制度化的结果，通过这种制度化，发展进程得以继续。如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粗略的规律，通过它来评价鉴定任何既定城市的模式和结构。

封建王朝权力范围的延伸以及一个行政治理单位的建立进程之中，可能会建造一座新城。聚落大概以一片保护区域之内的衙门办公建筑群体开始，或围以栅栏或围以土墙，外带城壕。这初期阶段，行政也许更带有军事性质，因此其基址应该根据战略上的考虑进行选择。如果聚落位于区域性道路或者贸易线上的控制站，地理上的特征大概起决定作用。当然，要咨询风水专家。他必须对于基址的选择作最后的决定，并可能影响到建筑物主轴线的方位等问题的决定。

到了发展的第二阶段，办公区域也许会得到扩建，因为行政管理已经被扩大，功能有所区分。也许还增加了仪式设施，这样，知县可以完成其仪式职责。诸城门之一的地带，一座市场街道渐渐成形，并带有一座庙宇和一些小神坛。献给城隍的庙宇也建造起来以便符合衙门办公建筑的外观形像。为警署或监狱长之用的新办公室，建造在栅栏之外。想到要建造一座孔庙时，也就感到需要建造一座新城墙。一座坚固的石构造当然是理想。设计请求批准的呈请被送到了更高一级的官员那里，然而，只要围墙环绕的区域太大，而难以只作为本地行政单位的管理中心，知府或省里的巡抚都不会同意。最后获得同意，并被建造起来的新设计，围墙区域小一些，市场街道的一部分以及郊区也都留到了城墙之外，但城墙内

有孔庙和一座新图书馆。至此，城市发展的第一阶段得以彻底完成，出现了一座全新的行政治理城市。

然而，市场街道依然在增长，必须建造第二条市场街道与之平行。另一座城门外，一个新郊区也发展起来。一个突然的反叛之后，所有的郊区都沦为灰烬，但是不久，整个区域又被重建，而且因为反叛的原因，行政中心被重新组织起来。城市被赋予一个新的地位，因为其战略重要性，加入了二级行政中心的行列。作为州一级的首府所在，新衙门办公室更大更为辉煌，必须拥有足够的空间，带有新城墙的区域也必须附加到原来的城市，这一次包括了已存的面积相当可观的郊区部分。街道的模式必须调整以便尽可能地遵从“神奇方形”概念。原来城市的旧城墙渐渐地消失了。最终，出现了新的二级行政中心城市，并建有为另一州府使用的孔庙以及另一座城隍庙。另一次反叛之后，新的郊区再次得到发展，有了自己的防御墙围绕。一段时间后，高速路网络的一个变化，使主要的交通线路远离城市，经济的衰退开始。城墙之内的市场街道渐渐地废弃不用。因为有了可用的空间，官僚们的居住区可能得到扩建，花园也可能增加。郊区曾经是富有之家的居住建筑群里可能会建造一座佛寺，那里，经济活动依然继续着。一个新的行政机构取代了原来较高级别的行政管理，如此城市仅仅具有当地的行政管理。这时，城墙就太大了，陷入失修，城墙内一些大的区域被用于蔬菜园，仅仅郊区依然拥有一定规模的人口。

5.8 展望

这一描述也许足以表明变化的城市模式。它还应该扩展到报告洪水、战争、其他的灾难以及新时期的繁荣。所有这些改变了城市的布局和结构。每一阶段，一个地方或另一个地方都会有一个实例。然而，时代变化了，它们也再一次变化。这一次发生在公元20世纪，城市景观似乎仅仅在几十年内就变得难以辨认。一些古老的元素，如庙宇或一些其他建筑物，将作为过去孤立的残余而存在。然而，典型的中国城市内部的关联性和复杂性迅速消失，当然，在大多数城市，这些已经消失。如今的生活完全追随着不同的法则，沉浸在不同的活动之中。特别是随着贸易和私人生意的消失，以及市场街道中传统小作坊的消失，那里，所有的日常和文化生活用品都由专门的熟练工人生产，整个氛围以及原来的市民性已经远离了城市。如何保护拯救老建筑和花园依然拭目以待。然而，城市集群已经过分生长超出任何可以辨别的布局。几乎所有的地方，街道模式以及运河系统因为机动车辆和大量新交通线路的建设已经改变。

3000年，多少个世纪以来指引着城市发展的“神奇方形”概念，作为建立秩序和形式的手段已经永远失去力量。最近，城市规划师们做过一些尝试，将“神奇方形”的概念用于准备为未来中国城市的总体规划，但这次它被称为“超网格”。

当中国人的世界观于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从远古的传说涌现，“神奇方形”的概念为想像中永恒世界秩序的系统化提供了模式。原则上，它是一个静止而固定的概念，因为它包括对于人类来说已知的所有一切，包罗万象。变化被认为仅仅是阶段性的变更，并且在宇宙和永恒条件法则的永恒框架之内。阶段性的变更包括人口规模的变化，在约2000年里，在中国内陆不变的心脏，即中国内地的18个省，今日称为中原，来回变动着大约10亿人口。这整个的10亿数字是普遍性的，是内陆不变的、框架中永恒的状况，正如“神奇方形”所表达的概念，也正如大禹在传说中历史的黎明时期所做的宏伟规划所展现的。而普遍的和看上去永恒的状况包括一种几乎不变的城市人口比例，大约6%～8%，居住在总数目几乎从没有改变的行政中心城市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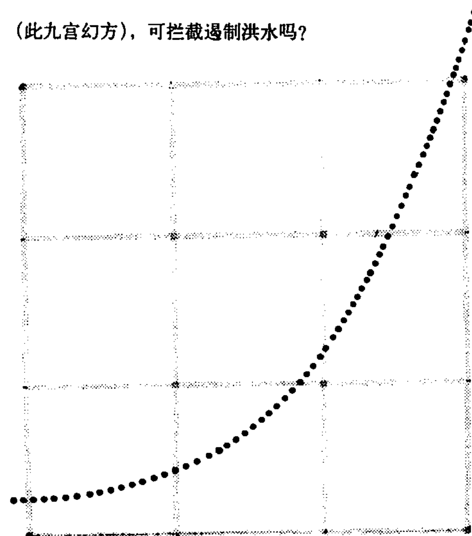
唐代末期经济发展的变化，特别在宋代的变化，创造了中国中世纪的城市文化，有可能改变传统的世界观。但是知识的发展被后来朝代的异族统治者们以及旧的观念限制。这些旧观念虽然过时，被滥用，却被有意地保持活力以便（新帝王的）权利合法化。1800年，人口数量超过30亿高峰时，特别是50年之后，达到40亿人口时，就不能再忽视变化了。然而，清代异族皇帝及其政府僵硬的态度使他们无力发展新观念，结果，“神奇方形”概念

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在好几个世纪失去其原来的目的和效用。接下来的100年里，人口的增长因为革命和反革命带来的可怕损失受到抑制。但是，当20世纪中期重获和平之后，人口在30年中的增长超过了2.5倍。到2000年世纪之交，人口的增加将超过3倍，或者，换句话说，300年之后，中国的人口已经增加10～12倍之多。仅在最近过去的几十年，整个国家和城市居民人口的比例才产生可以想像（令人信服）的变化。然而，这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滞缓。

我们可以将此与西方世界相比，那里，欧洲的储备人口增长几乎与中国的人口增长达到同样的程度。这里，移民带来的人口遍布世界各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结合从总体程度上为大多数人保持了一种相对合理的高生活水准。迄今为止（译者注：作者成书与出版的年代），在中国，由于移民不被算作重要的因素，而最近的工业化也没有伴随城市的发展，中国的生活水平标准低。

戏剧性变化，不仅仅是阶段性变化，已经永远推翻并粉碎了旧的永久性框架和静止的世界秩序概念。对问题的解决方法似乎能够成功，但这些方法应当灵活并适应实际情况，并且将非中心化的职责给予那些受到良好教育和思想开阔的人。这些人绝对需要这些职责，而许多都还得不到。

自从19世纪以来，西方“无极限发展”的理念并未证明是惟一的真理，永久性框架的概念，近期在西方世界引起新的关注，并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有限资源”、“宇宙飞船地球”，或者“人类环境的生态文脉”的概念而得到复兴。这再一次表明，人们认识到自然法则，并且重视人类对于其自然环境资源有限的依赖，以小心的开发取代赤裸裸的掠夺。我们也许必须为未来的永久框架寻找新的概念，而中国必须舍弃旧的观念。“神奇方形”也许是一个象征。


（此九宫幻方），可拦截遏制洪水吗？

朝代	尺 步 里
商代	16.75 厘米 ×6=100.50 厘米 ×300=301.50 米
	16.90 厘米 ×6=101.40 厘米 ×300=304.20 米
周代	19.90 厘米 ×6=119.40 厘米 ×300=358.20 米
东周	22.00 厘米 ×6=132.00 厘米 ×300=396.00 米
	22.70 厘米 ×6=136.20 厘米 ×300=408.60 米
	23.10 厘米 ×6=138.60 厘米 ×300=415.80 米
秦代	22.60 厘米 ×6=135.60 厘米 ×300=406.80 米
西汉	23.00 厘米 ×6=138.00 厘米 ×300=414.00 米
	23.81 厘米 ×6=142.86 厘米 ×300=428.58 米
东汉	23.90 厘米 ×6=143.40 厘米 ×300=430.20 米
公元 220 年	24.10 厘米 ×6=144.60 厘米 ×300=433.80 米
公元 600 年	25.50 厘米 ×6=153.00 厘米 ×300=459.00 米
唐代	24.65 厘米 ×5=123.25 厘米 ×300=369.75 米
	×360=443.88 米
	29.55 厘米 ×5=147.75 厘米 ×300=443.25 米
	×360=531.90 米
宋代	27.00 厘米 ×5=135.00 厘米 ×300=405.00 米
	×360=486.00 米
北宋	30.80 厘米 ×5=154.00 厘米 ×300=462.00 米
	×360=554.40 米
明代	30.08—31.90 厘米 =451.20(541.44)—478.50(574.20) 米
清代	30.80—33.52 厘米 =462.00(544.40)—503.89(603.46) 米

作者后记

虽然在孩提时代就对中国的事感兴趣（因父亲作为一名市政工程师在中国服务了18年），但是，在成为一个城市规划师的职业生涯中从未想到要写这样一本书。然而，当有缘在20世纪60年代遇见Wolfram Eberhard，虽然感到知识装备不够，但还是在他的鼓励下承担起这项工作，翻检了图书文献与收集的地图，并回忆起从老师Hans Scharoun和朋友Lee Chen Kuan处所学到的关于中国人的思想、艺术和文化。他们曾经是Ernst Boerschmann 的助手。我曾经在Wihelm Pinder 的指导下学习过艺术史，在Walter Andrae指导下学习过考古学和建筑史，在Hans Scharoun 指导下学习过建筑与城市规划，但所有这些都在柏林。而且，我曾经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作为城市和区域规划顾问服务于中国政府。同时，我也在太平洋区域大量旅行过，并且参观了很多国家。在其中，中国文化的影响和中国的移民文化都曾留下过痕迹。回家后，我撰写了博士论文，是关于清代（1644～1911年）中国城市规划的论文，并因此在1976年获得了德国慕尼黑技术大学的博士学位。之后，我贡献出大量时间进一步研习中国城市的发展，并且旅行了长达10年之久，走遍了中国内陆18个省并到过内蒙古满洲里和青海省的几个地方，也到过南北朝鲜（现韩国和朝鲜）。在1983～1984年，作为上海同济大学的访问学者度过了冬季的一个学期，得到过中国朋友和同事们的支持。更进一步地，我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图书馆从事研究。在那里曾是1981年艺术研究生院和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的高级访问学者。在德国，我常常去慕尼黑大学东方研究所的图书馆、慕尼黑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和柏林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关于中国城市的主题，我在慕尼黑技术大学发表过讲座，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城市和区域规划系，在柏林的Gesellschaft fur Erdkunde和在慕尼黑的Geographische Gesellschaft发表了一系列的期刊杂志文章，最后，在1989年，我的书《中国的城市》(Cities in China)由Borntraeger 柏林和斯图加特出版，并作为由Wolf Tietze主编的《地球的城市化》(Urbanization of the Earth）一书中的第7卷。《中国的城市》主要是从城市地理学的立场来写，因此，只涉及19世纪至今的城市发展过程。而本书，描述自新石器时代定居聚落开始。

这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当然是基于中国和西方几代学者的研究，对于他们我表示由衷感谢。我认为，对于这个广袤的学术研究领域的个人贡献就是调查研究各种城市的物质结构的布局。作为一个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运用一种度量衡学的方法来分析中国城市规划师的工作。以这种方法，我能够重构许多规划师工作中的很多“什么”和“如何”等方面，关于“为什么”这问题，进行映像和沉思，政策和人们的行动放置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之中的一般性历史发展相联系。正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的第3卷（1959年）所写的：“一位非常杰出的批评家评论我们的第2卷，它使得古代中国哲学家们的言论具有意义。当然，对于哲学家们，我们几乎不敢保证，但是，在考虑到实际的人类时，如计算者们和星相学家们、榨取他人利益者们、矿工和铁匠们，毫无疑问，这里应增加城市规划师和测绘师。”将我的研究与其他学者的工作相连系是一个困难的工作，因为我必须在经常冲突的观点之中和各种学者涉及他们特殊的与历史和文化发展相关问题的论争中，或者与宗教的、哲学的、语言的、民族学的、技术的、法律的或者美学性质的问题讨论之中选择，然而，我认真选择，并且在发现的基础上试图建立一种理性的关系，在很多实例之中增加其他对立冲突的观点，为了可读性的缘故，我必须戒除讨论不同的观点和由此引发的争论。但是，所涉及的学者将肯定会确认出他自己的工作被引用的情况。

因为，度量衡学是基于技术和物质方面和数学的计算，对于争论观点的讨论留下度量衡学的研究完全取决于以现代方法和根据现代标准测绘准确地图。因此，它只在最近成为可能来实施这一研究。特别是自过去的20年中，考古学发掘已经大规模采用了这些现代测绘技术和方法，甚至应用于整个城市和聚落。

这肯定是为什么直到近期，大多数与现今主题相关的西文和中文书籍之中所用的地图，绝大多数是不够的，甚至是没有价值的。另一原因是中国城市和城镇根据准确测绘以及运用现代拓扑学技术准备的地图仅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时产生，大多是由外国工程师，日本人、美国人、德国人和法国人和后来的中国测绘师们完成，并存在图书馆中作为地图收藏。自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种类型的地图属于国家秘密，而城市和城镇的出版地图仅仅是用于旅游和访客用的一般版本。这样的地图在任何报亭都能买到，对设计是无用的。因为这个原因，现今作者花费了很大努力收集评价分析和展现这些最为准确的地图于书中。因为有大量的原始材料，作者能够第一次在中国城市研究中应用度量衡学的方法。希望在几个例子中，能够提供线索帮助指导进一步的发掘和考古研究。然而，一般读者也许享受到发展历史的连续性，有时传统的中国因政治文化的发展和在形成人类环境中丰富的思想和成就的戏剧性结果。为了更好地了解和欣赏，我在书中收纳了150多张地图和大约300张图绘，这些图是参照原真的中国书法、雕塑、图画、石刻和绘画绘制的。这些绘制的线性图绘风格使其更易于比较图画的主题而因此在几个例子中展现未见的特殊性和装饰性，特别是在石刻底片拷贝之中。

最后，我愿引用李约瑟的结论，当然，不敢将自己与这位杰出的学者相比，他指出要进行中国技术与科学研究所需要的资格：①应该受过科学的训练教育，并且多年从事有用并多产的科学研究；②应该广泛涉猎欧洲科学史，并且应该在一个或其他方面实施一些原真性的工作；③他应该有兴趣并熟悉某种在欧洲历史连续阶段的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和经济背景；④他应该有中国人生活的一种亲身体验并且欣赏在那个国家大量旅行的机会，最后，既不是作为一个传教士或一个通常意义的外交官，也不是一个商人的身份；⑤他应该知晓中国语言，如果不足以迅速阅读，至少足够允许查阅原始资料和相关的文献工作；⑥他应该幸运地具备来自广泛的中国科学家和学者们的引导。那么这些奇怪的各种各样的环境应全部落入到了我的运气中，这也是我抵御批评的最基本的防御基础，我必须保存那些来自一个领域或另一个领域中的所学，也就是这本书中所涉及的过去的大师那里的东西（以我的例子，“科学”应由“建筑和城市规划”来替代）。也许，Wolfram Eberhard 知道这一点，并且当他鼓励我承担这项工作时已经心中有数。